**毛泽东大传之**

**第七卷**

**九天揽月**

**第1章**

**“关于四中全会开会的方针，除文件表示者外，对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评**

**均表欢迎，但应尽可能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以便等候犯错误同志**

**的觉悟。这后一点我在1月7日致你和书记处各同志的信中已说到了。”**

话说1953年12月27日，毛泽东带着一个由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等人组成的宪法起草小组来到杭州。自此，他两个多月没有公开在媒体上露面，官方称他去休假了。

关于毛泽东在杭州期间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汪东兴在回忆中是这样说的：“1953年底，毛主席到杭州去搞宪法。他住在刘庄，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也住在刘庄，他们到北山办公。毛主席喜欢爬山，每天12点左右起床，吃点东西就去爬山。他宣布一条，共产党员上山坐滑竿，开除党籍。有一次我们爬上玉皇顶，用了两个多钟头。以后又上了南高峰、北高峰、六和塔，还上了凤凰山。田家英说，他们就靠主席爬山的时候改宪法稿子。毛主席有一次问我们，在杭州看风景哪里最好？我们各人有各人的说法。主席说：在山顶看，风景最好，杭州全景尽收眼底。西湖是一个锅，杭州市区是锅边。毛主席还考我们：哪个朝代在这里建都？雷锋塔为什么建在这里？美国的首都为什么在华盛顿，不搬到纽约？等等。和毛主席在一起，我们增加很多知识。毛主席爬山，有毅力，风雨无阻，坚持锻炼，说得到就做得到，要改变他的主意很难。说今天下雨，不上山了。他说，去，带上雨伞。说路滑，他说拄上竹棍。毛主席喜欢杭州，主要是气候好，空气新鲜，靠水边。毛主席喜欢水。他为什么喜欢中南海？因为有水。”

毛泽东的保健医生徐涛是这样回忆的：“有这么一天，主席比较早就醒了。他对我说：‘我现在想爬山。’我建议他去爬丁家山。这是刘庄旁边的一座小山。主席说“‘我不爬小山，要爬大山。’我去找叶子龙、汪东兴、罗瑞卿、王芳商量，大家觉得还是爬丁家山。主席一听，这么多人都不同意他爬大山，只好听从。丁家山不高，大概有一二百级台阶。主席爬的时候，跟走平路似的，一会儿就爬完了，没有尽兴。第二天，主席睡醒以后还要爬山。我们商量后，建议他爬桃花岭。以后，又爬了宝石山、梯云岭、葛岭、栖霞岭等。这些山比丁家山高一些，大约是海拔200米左右。再以后，还爬了炮台山、凤凰山、狮峰、天竺山等。在制定宪法的繁重工作中，主席抽时间坚持爬山，充分体现了一位伟人的毅力和胸怀。这是主席在建国以后规模最大、时间最集中，也是最有特殊风格的一次爬山活动。”

毛泽东的随行摄影记者侯波在回忆中也说：“跟随毛泽东爬山，是我和他在一块时最愉快的时刻。他不喜欢人搀扶，拿着一根竹竿当手杖，说这是他的‘第三条腿’。他边走边和我们聊天，了解我们每个人的学习情况、生活情况，提出很多问题让大家回答，给大家讲一些知识性和趣味性的问题，古今中外，天南海北都有，引发大家读书学习的兴趣。他谈笑风生，大家也无拘无束。这种时候，他是我们慈爱的长辈，是我们敬重的老师。”

负责警卫工作的王芳回忆说：“毛泽东几乎每天都在北山路84号30号楼办公。在他办公桌上摆满了各种书籍、资料和文件，其中包括苏联、东欧一些国家宪法译本，还有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宪法译本。这些都是当时主席阅读研究的内容，起草新宪法参考的资料。主席工作起来精力非常集中。他在思考研究问题时，会到忘我的地步。一天下来，**他办公桌上的烟灰缸里堆满了烟蒂。这些烟蒂短到不能再短，因为主席抽烟的习惯是抽到快要烧着指头了，剩下的再用烟嘴继续抽，一直抽到烟熄了才抠到烟缸里去。主席下班后茶杯总是空的，他喝光了茶水后，连茶叶也掏出来吃了。他说茶叶有营养，倒了可惜。**”“我们在搞警卫工作时，**为了保卫毛主席的绝对安全，在安排他去的地方，有时搞了一些诸如对群众进行疏散、控制，甚至清场等安全措施，致使主席不能随时见到群众、接触群众、了解群众的思想和要求。这使主席感到很不满意，几次向我们提出批评。他还说，我们党和群众的关系，就是鱼水关系，脱离群众，就像鱼离开水，活不成了。**我们领导干部和群众是平等的，不是高人一等，不能脱离群众，更不能欺压群众。这里有个立场问题，也有个感情问题。我们共产党人要时刻牢记，千万不要犯这个错误。”

闲话打住，且说毛泽东到杭州的第二天，对王芳说要出去走走，王芳就陪他去了一个叫云栖的地方。云栖环境幽静，满山修竹，溪水潺潺。王芳在前面带路，从入口处一直走到最里边。毛泽东非常高兴，他抬头挺胸，双目远视，脚下路面坑坑洼洼，也不理睬，只管跨着大步往前走。王芳见路面不平，且长满杂草，中央还有一堆粪便，惟恐毛泽东踩着粪便，便提醒他说：

“主席，当心前面有粪便。”

毛泽东停下脚步朝王芳笑着说：

“你大概不是贫下中农？”

“我是中农。”

“你过去没有干过农活吧？”

“小时候在地里干过轻便活，重活没有干过。”

毛泽东“哦”了一声，微笑着说：

“怪不得你害怕大粪。农民看到了就会把它捡起来，拿回去当肥料，给庄稼施肥时还要用手抓大粪。在路上看到大粪有什么好害怕的？”

12月下旬的一天，毛泽东对叶子龙、王芳说，要去看看钱塘江。王芳还以为他要去观潮，就说：

“主席，现在不是看潮的时候。”

毛泽东说：

“不是看潮，是去看江堤。”

王芳立即通知杭州市公安局易成铸，要他带人去实地勘察一下，选好地段。

第二天下午，天气比较冷，毛泽东穿了件大衣，乘车沿杭沪公路过了杭州七堡，就停了下来。这里靠钱塘江堤大约有六七十米。毛泽东走上江堤，沿堤坝步行了一里多路。这一段堤坝大概是在晚清年间修的，在长方形的石块与石块之间，用特制的铁条紧紧扣住，比较牢固。毛泽东看了一遭，显然很满意。

12月30日晚，浙江省委以庆祝元旦的名义邀请毛泽东吃饭，毛泽东愉快地接受了。

原来，江青到杭州后曾对王芳说：“12月26日是主席的60大寿，可他不愿人家向他祝寿，所以就在车上过了一天。但我们得有个表示。元旦快到了，是否请浙江省委以庆祝元旦的名义，请主席吃顿饭，以此向主席表示祝寿。”王芳遂将江青的建议告诉了浙江省委谭启龙等人，大家觉得是个好办法，就在12月30日邀请了毛泽东。

在这次晚宴的餐桌上，除了平时常见的饭菜外，还特地摆上了花生、红枣和面条，有庆贺华诞、祝愿长寿之意。席间，众人轮流向毛泽东祝酒，气氛热烈愉快，毛泽东高兴地一一作答。平时很少喝酒的他这一次倒喝了不少。

晚宴快结束时，毛泽东见面前的酒杯里还剩有茅台酒，就对坐在同桌的王芳说：

“这里还有4杯酒，不要浪费掉，我看还是请王厅长喝掉它。”

王芳不好推却，便鼓起勇气把4杯酒一口气喝了下去。毛泽东高兴得大声说：

“好，这就好！”

饭后，大家围着兴致很高的毛泽东聊天。罗瑞卿指着王芳说：

“王芳同志的名字应该改一改。一个山东大汉，名字怎么像女人似的？认识的还好，不认识的还以为是个女同志呢。”

王芳当即表示同意改名，把草字头去了。不过，他又说：

“我改名字要报上级批准，因为我这个省公安厅长，周恩来总理在签署的任命书上写的是‘王芳’，所以改名必须得上级批准才行。”

酒后的毛泽东红光满面，他指着王芳风趣地说：

“你们同意，我不同意！你山东绿化这么差，到处荒山秃岭，山上不长树，有的连草都不长。你王芳头上刚刚长了一棵草，就要除掉它，我不同意。什么时候山东绿化搞好了，你再改名字。”

他这一番话说得大家都开心地笑了。

1954年1月1日，黎锦熙写信给毛泽东，提出推广注音字母的意见。毛泽东在给他的回信中写道：

“我同意您的推广注音字母的意见，具体解决，请向文字研究会商洽。”

元旦过后，毛泽东第一次去爬莫干山，陪同他的是王芳，还有一个刚到警卫处没几天的干部。此人叫伍一，毛泽东不认识伍一，就打量着他，微笑着问王芳：

“这是谁呀？没见过嘛！”

王芳回答说：

“主席，这位是刚调来的警卫处处长。”

伍一诚惶诚恐地站在那里，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你叫什么名字？”

毛泽东问伍一，并伸出他那宽大的右手。

“报告主席，我叫伍一。”

伍一恭恭敬敬地向毛泽东行了一个军礼，连忙伸出双手握着毛泽东的手。毛泽东幽默地说：

“**噢！你这名字好哇，又好记又伟大，全世界人民每年都要为你开庆祝大会。很好，以后我就叫你‘劳动节’喽！”**

伍一怕毛泽东把他的名字理解错了，赶紧解释说：

“主席，我这‘伍’是‘五’字前加个单‘人’旁。”

毛泽东听罢，哈哈大笑，他说：

“对呀，你和伍修权是本家，你是革命队伍里的一员嘛。”

他的幽默和随和，顿时驱散了伍一的紧张情绪。此后，伍一就经常陪着毛泽东去爬山、散步、游泳。

且说毛泽东上得山来，在蒋介石退到台湾前住过的松月庐别墅里休息。吃午饭时，他望着眼前郁郁葱葱的风景，又想起了王芳改名字的笑话，就说：

“**莫干山应当成为全国绿化的典范**，你山东一半地方的绿化像莫干山，你的名字就可以改了。”

从莫干山返回途中，毛泽东余兴未尽，遂口占一绝：

七绝·莫干山

翻身复进七人房，回首峰峦入莽苍。四十八盘才走过，风驰又已到钱塘。

诗文中所说的“七人房”，是指他和从人乘坐的汽车。诵毕，他又拿起英文教程，带着几分乡音，开始了外文朗诵。

一天早晨，天刚蒙蒙亮，人们还在睡梦中。毛泽东又工作了一个通宵，他对王芳说：

“去新登吧，看看那里的农业合作社。”

王芳等随行人员拥着毛泽东分乘4辆轿车，径直到了新登。此时的天气还很冷，路边积水结了冰。毛泽东下了车，脚踩在冰碴子上咯咯作响。他手拿一根竹杆，走在前面，步行了3里多路，才来到了一个村子旁边。王芳请他戴上口罩。毛泽东便戴上口罩，大步进村。

这个村子有10多户人家，大多数人姓王，又因村旁有一个舂米的水碓，所以就叫王家水碓村。早在1953年初，这个村的农民们就自发地组织了农业合作社。

毛泽东在村口和一位老大娘拉了一会家常，便朝着她所指的民兵连长兼会计的王关林家走去。一行人来到王关林家，王关林及家人热情地招呼着客人。毛泽东亲切地询问了王关林的年龄、家庭出身和生活情况。王关林一一作了回答。毛泽东又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

“农民是不是都是自愿入社的？中农的耕牛、大型农具如何折价？土地如何评产入股？如何参加分红？如何记工算账？”。

王关林介绍了中农入社的情况，又说：

“农民入社都是自愿的，年终分配都是按政策办的。原来有几户中农担心吃亏，不想入社，看到我们增产增收，都要求入社。”

毛泽东高兴地说：

“还是组织起来好。合作社增产增收了，大家就会自愿参加的。”

王关林还告诉毛泽东：

“合作社成立后，社员的劲头很大，起早贪黑兴修水利，改造田地，生产很好。过去水稻亩产只有200斤，现在可达到400斤。今年在农技部门指导下，开始试种连作莰稻，这样改单季为双季，产量还可以提高，估计亩产可达600斤。”

毛泽东问了连作莰稻插种时间与方法，连说：

“好，这要好好地推广。”

由于他戴着口罩，王关林和家人始终都没有认出眼前这位亲切的老人就是毛泽东。王芳见王关林家门前的人越来越多了，便催说可以回去了。

“不忙。”

毛泽东说罢，又向社员们询问了农业合作社的一些情况，就像久别的老农回到了老家一样。临走时一大群干部和社员拥着他，一直送到村口。毛泽东辞别大家，离开了王家水碓村。他对随行人员们说：

**“我们是个人口大国，发展农业是我们的第一要务。农业搞不好，国家工业化就是一句空话。**占人口80%以上的农民是不能脱离的，脱离了他们是永不翻身的。**那种心中没有农民的倾向和恶习，要坚决克服掉。**”

这一段时间，毛泽东还有一个“失踪”的小故事，不能不说。那是在一个下午的4点半，他从办公室里走了出来，对王芳说：

“老毛病又犯了，昨天晚上没有睡好觉。我们出去走一走。”

天已晚了，到哪里去比较合适呢？毛泽东的习惯是说走就走，不容迟疑。王芳脑子里迅速思索着，决定到钱塘江边上的钱江果园去。那里的梨花已经开了，地势比较平缓，山坡不陡，路也不太远，转一下回来吃晚饭还来得及。他们一行数人立即陪毛泽东乘车来到钱江果园。毛泽东健步走上北边的山坡顶上，回身南望，眼前是一片雪白的梨花和长势良好的小麦、油菜。空气中散发着甜甜的清香。他显然很高兴。王芳在前面带路，他在后面走。王芳知道毛泽东有个从不改变的习惯，就是不走回头路，所以他从山坡的西侧领路上坡，准备从山坡东侧下坡回去。毛泽东停住了脚步，朝王芳笑笑说：

“要回家？还早呵！你们不累吧？继续往前走。”

说着，他迈开大步朝狮子峰方向走去。到了狮子峰山顶，毛泽东才歇下脚来。这里是狮峰龙井茶的产地，在坡地上，一层层，一片片，远近几千亩茶山，在早春的夕阳下映得格外清新。毛泽东活动着胳膊，深深地呼吸着，好长时间，他又向五云山方向走去。

五云山在杭州西南方向，钱塘江北边，离市区有七、八公里。这里群山连绵，峰峦叠彩，风光宜人。太阳已经快要落山了，王芳想劝劝毛泽东回去，但毛泽东不走回头路，往前走，路还长着呢。他心里暗暗着急。

五云山是这里最高的一个山峰，海拔近400米。毛泽东上了山，伫立山顶，举目远望。太阳已经落山了，西边的天上映出大片彩霞，南望钱塘水，滔滔东去，东眺西子湖，平明似镜。五云山顶有一个庙，毛泽东和王芳等人在庙前拍了一张照，天逐渐暗下来了，大家还想再照几张，已经来不及了。王芳催毛泽东抓紧赶路，因为下午出来时家里不知道，已经过了吃饭的时间了，还不见毛泽东回去，他们肯定会着急。可是毛泽东却说：“不忙。”他点上一支烟，慢悠悠地吸着，眼看着五云山下暮色苍茫，峰峦起伏，烟云缭绕，几处农户已经亮起了电灯。毛泽东还不想走。不知他是被眼前的景色吸引住了，还是在思考什么问题，或者是在酝酿一首诗词。

大家都感到有点累了，渴了，可毛泽东却丝毫没有疲劳的表示，下五云山时，仍然大步往前走着。北京来的几位警卫干部不知道脚下是什么地方，还要向什么地方走去？他们已经辨不清所在的方位了。四周是荒山野岭，走的是崎岖不平的羊肠小道，有的地方被水冲了，根本无路可走，加上天已全黑了，他们几乎在摸黑行进。不一会儿，前面真的无路可走了。王芳说：

“主席，不行，前面没有路了。”

毛泽东说：

“**鲁迅说过，路是人走出来的，这里没有路，我们给杭州人民走出一条路来。**”

他是从来不怕任何困难的，越是困难越要挑战。他加快步伐往前走去。王芳赶紧走上前去探路，越过几道被大水冲成的土坎和乱石，接着是陡坡，因泥土潮湿，有点打滑。由于树木长得茂密，他们连星光也借不到了。毛泽东两手搭着王芳的肩膀，王芳则凭着脚底的感觉，一步一步探着往下走。毛泽东个头又高又大，一双手的分量也很重，压在王芳肩膀上，王芳如脚底滑倒，就有和毛泽东一起滚下山去的危险。为了安全，他只得挺直腰板，稳住全身，一步一步地往下移动着，过了五云山，又上了天竺山，这里地势比较平缓了，荒草中的小路也依稀可以辨认。毛泽东在路旁一块大石头上坐下来休息。幸亏有个警卫员身上带了一壶水，给他喝了两杯。大家又饥又渴又疲劳，但看到毛泽东这么大年纪了，走了这么多路，还没有疲劳的表现，还显得那么高兴，便谁也不肯说累，个个显示精神振奋，毫无倦意。

此时已经是下午6点了，毛泽东住所的工作人员，仍不见他回来，便打电话问他办公的地方。对方回答说，主席下午4点半已出去了。他们又问罗瑞卿、杨尚昆，罗瑞卿等也说不知道。

下午7时许，毛泽东还没有回来。罗瑞卿和杨尚昆急忙赶到刘庄，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可是谁也说不清楚。

罗瑞卿、杨尚昆赶紧派出几路人马去寻找，同时又打电话到几个公安执勤点查询。时间到了晚上8点多，还是不见毛泽东的踪影，也没有任何消息。罗瑞卿、杨尚昆急得团团转，头上直冒汗。不知道毛泽东到底去哪里了，路上会发生什么问题，万一有个什么长短，这天大的责任谁能承担得了！

正在此时，王芳叫人通过浙江省公安干校给住地打来了电话，告诉了毛泽东现在的方位。正在焦急万分的罗瑞卿、杨尚昆，立即赶到上天竺把毛泽东一行人接了回去。回到住地已是晚上8点半了。一到住地，罗瑞卿就对叶子龙和王芳发作起来，严厉地批评他们不打招呼，太大意了。他还对王芳说：

“对主席的安全，不能有半点疏忽。”

后来，毛泽东在1955年第二次上五云山时曾即兴吟诗一首《七绝·五云山》，诗云：

五云山上五云飞，远接群峰近拂堤。若问杭州何处好，此中听得野莺啼。

诗人的情怀已经与五云山融为了一体，他的声音也与山中的啾啾鸟鸣汇成了别致的合唱。毛泽东用诗歌赞美杭州的自然风光，表达了他对第二故乡的深情热爱。

1月7日，毛泽东约请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伊·费·捷沃西安和驻华大使尤金到杭州会见。他在北山路84号一幢平房里（这里是毛泽东后来主持起草宪法的办公地方）和捷沃西安、尤金谈了话，他说：

“我们党内，或许也是国内要出乱子了。当然，我今天说的只是一种可能。将来情况如何变化，还要等等看。这个乱子的性质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有人要打倒我。我们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秦灭六国，秦灭了楚。”

毛泽东指指出生于陕西韩城的翻译师哲，又指着自己说：

“秦就是他们陕西，楚就是湖南。这是历史上的事实。那么现在怎么样？还要等等看。”

他说的陕西就是暗喻高岗，两个苏联人听了，都感到莫名其妙。

尤金后来在回忆中还说：“谈到中共内部情况时，毛泽东说最近出现了一些不健康的现象。**有某些人想挑拨政治局委员之间的关系，有人想对某些政治局委员的偶然失误与错误找出规律，从而贬损他们。**毛泽东说，我们现在还在研究这问题，始终牢记党员的团结是解决它面临问题的关键。中央现正就党的团结一致制定专门文件。这个文件不会公开发表。在今后两三个星期内即可完成这个文件。毛说在完成这个文件后，他会下令向我通报其内容。”

1月7日下午，杨尚昆将北京送来的《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及刘少奇的一封信交给毛泽东，毛泽东看罢，随即召集陈伯达等人对决议草案作了修改，还征求了在杭州休养的林彪的意见，尔后就建议召开七届四中全会问题给刘少奇并书记处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少奇同志，并书记处各同志：

信及决议草案收到。决议草案已作了修改，使之有根据些和更明确些。参加修改的，有在这里的几位同志，林彪同志亦表示同意。此决议似宜召开一次中央全会通过，以示慎重。中委大多数在京，不在京的是少数，召集甚易，加上若干负重要工作责任的同志参加会议。此议是否可行，请你们考虑。如召开全会，时间以在1月下旬为宜。议程可有3个：

1. 批准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

二、决定于本年内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讨论第1个“五年计划”纲要；

三、通过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报告请刘少奇同志做，事先写好，有四五千字就够了。报告可分为3段：第一段，略叙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反，恢复经济；过渡时期总路线及第1个“五年计划”第一年的成绩等事；第二段，为了讨论和通过第1个“五年计划”的纲要，有必要于本年内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并述代表已经选出，只待文件准备好，即可召开；第三段，将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的要点加以叙述，请求全会讨论和批准这个决议。此报告有三五天功夫即可写成，如时间许可，请用有线电发给我一看，如定于1月25日开会，则时间完全来得及。

余请尚昆同志面报。

毛泽东 1954年1月7日

毛泽东写完信，仍觉得有话没有说完，于是又加了下列附言：

全会应发一简单公报，将3项议程公布就可以了，其它都可不公布。又及。

关于第三个议程，**应尽可能做到只作正面说明。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

同高岗的斗争，毛泽东开始始终抱着团结的愿望，所以要求在正式的决议里，“尽可能做到只作正面说明。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为了这个目的，毛泽东经过考虑，又给刘少奇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少奇同志：

如各同志同意开全会，于**你的报告稿宣读完毕后，似宜接着宣读你已有准备的自我批评稿，两稿各有一小时左右即够。自我批评稿宜扼要，有三四千字即可，内容宜适当，不可承认并非错误者为错误。**如可能，请一并电告我一阅。

毛泽东 1月7日

1月7日晚，杨尚昆带着毛泽东给刘少奇等的两封信和杭州方面对《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的修改意见，返回北京。

毛泽东让杨尚昆带到北京的修改意见里有这样一段话：“**党的团结的利益高于一切，因此应当把维护和巩固党的团结作为指导自己言论和行动的标准，即有利于党的团结的话就说，不利于党的团结的话就不说，有利于党的团结的事就做，不利于党的团结的事就不做。”**

1月8日凌晨，毛泽东又给刘少奇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刘少奇同志：

杨尚昆同志于7日下午10时由此返京，9日可到，带有修改了的决议草案及我的一封信。我在信中建议召开一次中央全会通过这个决议以示慎重，目前大多数中委在京，召开全会甚为容易，请待尚昆到后会商酌定。

毛泽东 1月8日上午3时

1月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批转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党组《关于加强人民体育运动工作的报告》起草了一个指示，他写道：

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市委；并中央各部、中央人民政府各部委党组、军委总政、全国总工会、青年团中央：

中央体育运动委员会党组关于加强人民体育运动的报告很好。他们对目前开展体育运动的方针和各项工作意见，中央认为是正确的。现将这个报告发给你们参酌执行。

**改善人民的健康状况，增强人民体质，是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特别是当前国家已进入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更需要人民有健康的身体，但现在人民健康状况还远不能适应各项工作的需要。为了改变这种情况，除了加强卫生工作和逐步改善劳动、学习等条件外，开展体育运动确是一种最积极的有效的方法。不仅如此，体育运动并且是培养人民勇敢、坚毅、集体主义精神，和向劳动人民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重要手段之一。当着我们国家正在为实现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而奋斗的时期，加强体育工作就有更重大的意义。4年来，人民的体育运动已有初步开展，获得了一些成绩，但因过去的基础太差和条件的限制，特别是由于很多人不了解体育运动的重要意义，这就使得体育运动的开展远远赶不上客观的需要。人民的体育运动还是国家的一项新的事业，各级党委必须予以充分的重视，加强领导，协助政府配备必要的干部；建立和充实各级体育运动委员会；根据中央体委党组所提出的方针和任务，结合各地实际情况，领导和推动各有关部门共同努力，使群众性的体育运动首先在厂矿、学校、部队和机关中切实地开展起来。各级党委应将体育工作作为宣传部门的业务之一。青年团应该把它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工作，并在这个工作中起骨干作用。工会应具体领导厂矿、企业中的体育工作使之得到正常地开展。军委总政治部亦应在全军中注意展开群众性的体育运动。

**此件和中央体委党组给中央的报告，可登党刊**。

中共中央 1954年1月8日

1月9日，毛泽东召集宪法起草小组成员第一次会议，“五四”宪法起草工作正式开始。

此前，他和小组成员广泛地阅读和研究了中国和世界各国各类宪法，既有社会主义国家的，也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在这次小组会议上，他指示宪法起草小组人员说：

“**起草宪法时要坚持人民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同时在具体条文上又要体现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结合**，要简单、明了。”

负责安排毛泽东一行住所的浙江省委书记谭启龙后来回忆说：“毛主席住在刘庄1号楼。每天午后3点，他便带领起草小组驱车绕道西山路，穿过岳王庙，来到北山路84号的办公地点。当时北山路84号大院30号是由主楼和平房两部分组成。主楼先前是谭震林一家居住的，谭震林调到上海后，我家搬进去了。我们让出后，毛主席就在平房里办公，宪法起草小组在主楼办公，往往一干就是一个通宵。”

1月15日，毛泽东给在北京的刘少奇等人发了一封电报，提出了关于宪法从起草到通过的整个计划和流程的设想。他写道：

“宪法小组的宪法起草工作已于1月9日开始，计划如下：1、争取在1月31日完成宪法草案初稿，并随将此项初稿送中央各同志阅看。2、准备在2月上半月将初稿复议一次，请邓小平、李维汉两同志参加。然后提交政治局（及在京各中央委员）讨论，作初步通过。3、3月初提交宪法起草委员会讨论，在3月份内讨论完毕并初步通过。4、4月内再由宪法小组审议修正，再提政治局讨论，再交宪法起草委员会通过。5、5月1日由宪法起草委员会将宪法草案公布，交全国人民讨论4个月，以便9月间根据人民意见作必要修正后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最后通过。”

毛泽东在电报中还开列了一个关于中外各类宪法的书目，共有10种，要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在京的中央委员抽时间阅读。他写的是：

“1、1936年苏联宪法及斯大林报告（有单行本）。2、1918年苏俄宪法（见政府办公厅编宪法及选举法资料汇编一）。3、罗马尼亚、波兰、德国、捷克等国宪法（见人民出版社《人民民主国家宪法汇编》，该书所辑各国宪法大同小异，罗、波取其较新，德、捷取其较详并有特异之点，其余有时间亦可多看）。4、1913年天坛宪法草案，1923年曹锟宪法，1946年蒋介石宪法（见宪法选举法资料汇编三，可代表内阁制、联省自治制、总统独裁制三型）。5、法国1946年宪法（见宪法选举法资料汇编四，可代表较进步较完整的资产阶级内阁制宪法）。”

1月16日，中央财经委员会召开的扩展公私合营工业计划会议要求在今后两个“五年计划”期间，对雇佣10个工人以上的私营工厂，基本上纳入公私合营轨道，然后在条件成熟时，将公私合营企业改造为社会主义企业。毛泽东基本赞成这个计划，在批示中写道：

**“10年搞掉10人以上的私营工厂，这没有什么急躁冒进。**已过了4年，天下小变；再过4年，天下大变。改造10人以上的私营工厂，可能不要10年，也许只要7年。**明年一定要比较稳，后年大进一步，突飞猛进还在后两年。**‘撑着石头打泡泅（指游水——笔者注），淹不死人’。”

1月18日，毛泽东就征求对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的意见致电刘少奇并书记处：

少奇同志并书记处各同志：

中央全会既定本月30日开会，还有十几天时间，为使在各地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及参加会议的同志事先有所准备起见，**建议将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即日用电报发给他们阅看，如有因病因事不能到会的，请他用电报表示意见。同时可征求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的意见，以供全会参考**。**又张闻天同志宜通知他到会**。以上请酌定。

毛泽东 1月18日

1月21日晚上10时，杨尚昆从北京回到杭州刘庄，带来了一些文件和高岗的一封信，向毛泽东做了汇报。

1月22日晚8时，毛泽东致电刘少奇，他在电文中写道：

刘少奇同志：

杨尚昆同志到此，收到所需文件，并收到高岗同志一信。**高岗同志在信里说完全拥护和赞成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并说他犯了错误，拟在四中全会上作自我批评，想于会前来这里和我商量这件事。我认为全会开会在即，高岗同志不宜来此，他所要商量的问题，请你和恩来同志或再加小平同志和他商量就可以了。关于四中全会开会的方针，除文件表示者外，对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评均表欢迎，但应尽可能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以便等候犯错误同志的觉悟。这后一点我在1月7日致你和书记处各同志的信中已说到了。**如你们同意这个方针，就请你们据此和到会同志事先商谈，并和高岗同志商谈他所要商谈的问题。尚昆留此几天即回北京。**此电请送高岗同志一阅，我就不另复信了。**

毛泽东 1月22日

1月23日零点10分，天上下起了几十年以来罕见的大雪，霎时间，天地苍茫，远近一色，整个杭州成了一个银的世界。在天亮时分，浙江省公安厅长王芳往毛泽东住处打了一个电话，问李银桥：

“主席起来了没有？我们好派人去扫雪。”

李银桥告诉他说：

“扫不得，不但扫不得，还动不得。这是主席的指示。我因扫雪还挨过批评。”

7点多钟，毛泽东头戴浅灰色呢帽，内穿黄呢中山装，外罩灰色呢子大衣，走出户外，小心翼翼地踏着雪，来到一棵树下，仰起头凝视着树上的琼枝银花。过了一会儿，站在他后面的李银桥提醒说：

“主席，靴里的雪一会儿都化成水了，回去看吧。”

毛泽东兀自沉醉在雪的世界里，轻轻地摇摇头，喃喃地说道：

“化了，就看不成了。”

说罢，他迎着寒风，迈着轻轻的步子，朝西湖那边走去。卫士们只好跟在他的后边，非常小心地踏着他的脚印向前走，生怕再破坏了雪景。

西子湖畔和远近的群山，都披上了银装。毛泽东兴致勃勃地来到湖边，驻足观赏苏堤雪景。尔后，他两手交叉在身前，含笑站立在西湖边的石栏处，让侯波为他拍照留念。侯波抓住毛泽东凝眸远望的一刹那，按下了照相机的快门，拍摄了《毛泽东在杭州》的雪景照片。

随后，意犹未尽的毛泽东又兴致勃勃地登上住所后面的小山，远眺西湖的雪景。

1月25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第一次找高岗谈话，与高岗的斗争正式开始。

欲知此次党内斗争如何发展，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刘、周、邓与高岗的第一次谈话，是高岗“倒刘”活动由进攻到败退的转折点。这次谈话已经不是毛泽东嘱咐的“**请你和恩来同志或再加小平同志和他商量”**了，更不是**“对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评均表欢迎，但应尽可能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以便等候犯错误同志的觉悟”**的“**四中全会开会的方针”，**而是两个联盟之间的决战开始了。高岗败就败在他在财经会议上把“新税制”问题作为突破口，向刘少奇发起进攻。他忽视了一点，“新税制”是薄一波提议的，说到底是个思想认识问题，可先后批准的中央财经委员会和政务院，则是要负主要责任的。而且能指挥《人民日报》为之大力鼓吹，绝不是薄一波所能主导的。尽管高岗张冠李戴，把责任推到刘少奇身上，可坐在一旁的周恩来、陈云难免如坐针毡。高岗觊觎刘少奇的接班人位置，他人又何尝不觊觎他的高位？这就加速形成了另一个比高、饶联盟更具实力的联盟，高岗的败亡已经为期不远了。

**第2章**

**“伸手岂止高、饶。只是目前不必如此提出，以免有扩大化的嫌疑。”**

话说1954年1月25日下午，负责京杭之间联络的专机飞抵杭州，给毛泽东带来了一些文件，包括刘少奇写的自我批评稿。

是日晚，毛泽东与杨尚昆谈话，又与刘少奇通了电话。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杨尚昆与陈伯达商量修改刘少奇的自我批评稿。

1月26日下午5时30分，毛泽东约来杨尚昆，谈文件修改事。

1月27日下午，毛泽东参加讨论文件。尔后，毛泽东给刘少奇并书记处写了一封信：

刘少奇同志，并书记处各同志：

关于文件修改情形及我的一些意见，尚昆同志向你们作报告。我和其他同志在这里都好。敬礼！

毛泽东 1月27日

1954年2月1日，杨尚昆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向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提交了中共关于党的团结问题的文件。这份文件将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讨论，并形成决议。

2月2日，刘少奇和周恩来向尤金做了详细通报，点了高岗的名，相当详尽地谈到了事件的经过：**高岗的罪名是派性，有野心，过分抬高自己在中共党史上的军事统帅地位，诬蔑刘少奇等**；**高岗可能承认错误，但可能不是真诚的，也可能以自杀威胁党。**

**周恩来并将高岗事件与苏联贝利亚事件相提并论，他说：**

**“贝利亚事件迫使我们特别注意在党内提高警惕。”**

2月5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第2次与高岗谈话。

这一天，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与饶漱石谈了话。

2月6日至10日，中国共产党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刘少奇主持了会议。

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了报告，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44人在大会上发言，**全面地揭露了高岗、饶漱石的阴谋活动**。

全会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全会正式批准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学习、宣传和贯彻总路线的群众运动。

2月13日，刘少奇和周恩来向尤金作了关于高岗问题的通报。**他们说高岗的问题比饶漱石的问题严重，因为他没有真诚悔改之意，并仍以自杀相威胁。高岗**承认想推翻刘少奇，**但声称他并无意占据仅次于毛的位置。作为悔过的姿态，他表示准备离开领导岗位，成为普通公民。但是党认为高岗没有做认真的坦白，必须再开一次会给他机会承认错误。**

2月15日，**刘少奇为核查在全会上揭露出的高岗、饶漱石的问题，决定每天用半天时间，由周恩来主持召开高岗问题座谈会；**由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主持召开饶漱石问题座谈会。要高岗、饶漱石也分别参加座谈会，让他们听取对他们的批评，同时，要让他们在会上作检查。

在座谈会期间，高岗并没有像他在全会上表示的那样去做，而是一直表白他是清白的，没有任何反党阴谋。

2月17日中午，高岗在座谈会上拔出手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要以自杀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旁边的人抓住了他的胳膊，子弹射穿了天花板。他第1次自杀未遂（据杨尚昆说，高岗是触电自杀未遂，座谈会中断了一天）。

2月17日这一天，宪法小组经过一个多月紧张细致的工作，写出了宪法草案初稿。

是日晚，毛泽东就宪法初稿的讨论和修改给刘少奇并书记处各同志拍了一封电报，他在电报中写道：

刘少奇同志，并书记处各同志：

现将宪法初稿5份派人送上，请加印分送政治局及在京中委各同志，于2月20日以后的一星期内，开会讨论几次，交小平、维汉两同志带来这里，再行讨论修改，约7天左右即够。然后，再交中央讨论，作初步决定（仍是初稿），即可提交宪法起草委员会讨论。因此，小平、维汉原定20日动身来此的计划，可推迟到月底动身。送初稿的人明（18）日动身，20日可到北京。

毛泽东 2月17日下午10时

是日晚，刘少奇打电话通知毛泽东，高岗中午自杀未遂，并谈了政治局讨论的意见。

2月18日，毛泽东派中央办公厅警卫局的张一平，专程到北京将宪法草案初稿送给刘少奇。

2月24日凌晨，毛泽东给刘少奇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少奇同志：

兹将宪草初稿第二章以下二读稿及宪草小组报告送上，请印发各同志阅看。

毛泽东 1954年2月24日上午2时

2月24日下午，毛泽东给胡乔木写了一封短信，他写道：

乔木同志：

今天所谈可作修改的地方，请于明日加以修改，并由小组各同志商酌一次，于明夜24点以前打好清样送我，准备后天（26）送给中央。

毛泽东 2月24日

2月25日，在北京召开的关于高岗、饶漱石问题座谈会结束。**以刘少奇为临时主持的中共中央决定：高岗、饶漱石停职反省，分别在家里写书面检查。**在东北和华东两个地区，传达七届四中全会精神，进一步揭发、批判高岗、饶漱石的反党阴谋。

这一天，周恩来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的总结发言提纲中写道：

“**高岗的极端个人主义错误已经发展到了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以图实现其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力的个人野心。**在其野心被揭穿和企图失败以后，他就走上了自绝于党和人民的自杀道路。”

周恩来列举了高岗的9条阴谋活动和罪行，这9条是：

1、在党内散布所谓‘枪杆子上出党’、‘党是军队创造的’荒谬理论，及制造所谓‘军党论’作为分裂党和夺取领导权力的工具。2、**进行宗派活动，反对中央领导同志**。3、造谣挑拨，利用各种空隙，制造党内不和。4、实行派别性的干部政策，破坏党内团结，尤其是**对干部私自封官许愿**，以扩大自己的影响，企图骗取别人的信任。5、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看作个人资本和独立王国。6、假借中央名义，破坏中央威信。7、剽窃别人文稿，抬高自己，蒙蔽中央。8、**在中苏关系上，拨弄是非**，不利中苏团结。9、**进行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

邓小平、陈毅、谭震林在为饶漱石问题座谈会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

“**饶漱石同志是一个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的野心家**，他个人野心的欲望是日益上升的，而最尖锐的罪恶，是1953年他和高岗共同进行分裂党的活动。”

2月26日凌晨，毛泽东就宪法草案三读稿给刘少奇并书记处各同志写了一封信：

少奇同志，并书记处各同志：

为便于中央在这几天讨论宪法草案，这里的小组赶于两天内又作了一次修改，称为三读稿，现送上，请照此印发中央各同志阅看。

敬礼！

毛泽东 1954年2月26日上午2时

2月底的一天，毛泽东又一个晚上没有睡好觉，提出要去爬山。他在谭震林、罗瑞卿、柯庆施、谭启龙、张耀祠、王芳及卫士的陪同下，去爬玉皇山。

玉皇山原名育王山，耸立在西湖与钱塘江之间。山下有滑杆，是预备给上山的游客乘坐的。毛泽东爬山从来不肯坐轿，警卫人员就悄悄从驻军那里调来两匹马，准备让他在中途累了的时候骑。毛泽东见后面跟着两匹马，就问是干什么用的。当他知道用意后很不高兴，说：

“我爬山还要去部队调马，像什么话？把马送回去！”

这一天，天上下着毛毛细雨，山上的游人很少。山腰有一紫来洞，毛泽东一行在洞前俯瞰山下的八卦田。有人说南宋皇帝祭祀先农的时候，就在那田里做做样子，亲耕一番。

山上有个福寿观，毛泽东在观外兜了一圈，便步入观内。观内的主持是一位盲人，说他是道士吧，他还光着脑袋，像个和尚。毛泽东面壁看了一番，来到供游人烧香拜佛抽签的供桌前。供桌上没有点香，只摆着一桶卦签。毛泽东朝那卦签望了片刻，伸手上去抽出一支，看了一眼，便笑出了声。谭震林、罗瑞卿等人围了过来，毛泽东笑着把卦签递给罗瑞卿，罗瑞卿看了也笑起来，将卦签递给谭震林，谭震林看了也笑着递给其他人。众人传看一遍，又交给毛泽东。毛泽东没有再看，随手扔在地上。卫士张木奇觉得好奇，等毛泽东等人出门的时候，他从地上捡起卦签匆匆看了一眼，便悄悄地揣入兜里。回到住处，张木奇掏出卦签细细观看，这是一个竹片上贴着的版印的纸签，内容是“此命权威不可挡，紫袍玉带坐朝堂”，还有一句是什么娶妻3房的话。难怪毛泽东和众人发笑了。

2月28日，毛泽东对周恩来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的总结发言提纲作了一个批示：

少奇同志，并书记处各同志：

恩来同志2月25日的发言提纲经胡乔木、陈伯达二同志作了一些修改，我同意这些修改，请你们考虑酌定。

毛泽东 1954年2月28日

毛泽东所说的在提纲中作的修改内容是：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高岗虽有其正确的有功于革命的一面，因而博得了党的信任，但他的个人主义思想（突出地表现于当顺利时骄傲自满，狂妄跋扈，而在不如意时，则患得患失，泄气动摇）和私生活的腐化欲长期没有得到纠正和制止，并且在全国胜利后更大大发展了，这就是他的黑暗的一面。**高岗的这种黑暗面的发展，使他一步一步地变成为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实际代理人。高岗在最近时期的反党行为，就是他的黑暗面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就是资产阶级在过渡时期企图分裂、破坏和腐化我们党的一种反映。**”

1954年3月1日，毛泽东复电给杜平等，召回正在板门店参加停战谈判的乔冠华参与参加日内瓦会议中国代表团的筹备工作，他在电文中写道：

杜平、乔冠华同志并告金首相、彭司令员：

2月28日电悉。

一、为了准备参加日内瓦会议，同意李克农同志意见，乔冠华、黄华同志迅速回京，参加筹备工作。乔、黄过平壤时应向金首相报告工作并请示意见。

二、同意代表团党委改组，由丁国钰同志任党委副书记；以后向北京、平壤的报告请示改由李相朝、杜平、丁国钰3同志署名。

三、因杜平同志尚不能完全离开部队工作，故在杜不在开城时，党委工作即由丁国钰同志负责（柴成文同志协助），向北京、平壤的报告请示即由李相朝、丁国钰二同志署名。在工作情况许可的条件下，丁国钰、柴成文二同志可以轮流回国休假。

毛泽东 1954年3月1日

3月2日，毛泽东以短函嘱咐田家英，他写道：

家英同志：

一、杨秀生信请抄转长沙杨开智先生，询问信内所述情况是否属实，我完全不记得了。

二、今年寄杨家补助费1200万元，上半年的600万元宜即寄去，请予办理。

三、李淑一女士，长沙柳直荀同志（烈士）的未亡人，教书为业，年长课繁，难乎为继。有人求我将她荐到北京文史馆为馆员，**文史馆资格颇严，我荐了几人，没有录取，未便再荐**。拟以我的稿费若干为助，解决这个问题，未知她本人愿意接受此种帮助否？她是杨开慧的亲密朋友，给以帮助也说得过去。请函询杨开智先生转询李淑一先生，请她表示意见。

毛泽东 3月2日

后来，杨开智收到田家英的询问信后，立即去办这件事，然后回信给毛泽东。毛泽东据此在4月份给李淑一汇去了一笔钱，帮助杨开慧的这位朋友。

3月4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批准中财委（资）《关于一九五四年扩展公私合营工业计划会议的报告》暨中财委（资）《关于有步骤地将有十个工人以上的资本主义工业基本上改造为公私合营企业的意见》，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市委并各有关财委，并发政府财经各部党组：

中央批准中财委（资）《关于一九五四年扩展公私合营工业计划会议的报告》暨中财委（资）《关于有步骤地将有十个工人以上的资本主义工业基本上改造为公私合营企业的意见》，并认为中财委（资）对扩展公私合营工业所提出的政策原则及1954年扩展公私合营工业的工作方针和具体措施是正确的和适当的。希望各中央局、各省、市委据此进一步研究和制订各大区、省、市1954年扩展公私合营工业的正式计划，各省、市委并应据以制订分期的具体执行计划，按中财委（资）报告中所规定的审批程序批准执行；报告中提出的有关问题，请有关主管部门负责办理。

必须指出：过去几年来，在实际经济生活中，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虽然我们已经作过不少工作，但这方面的经验系统地加以总结不够，各种必要的章程和办法还需要逐步制订，望各省、市委，对此加以重视，尤要组织适当力量进行调查研究，为制订1955年至1957年的3年计划和1955年的年度计划作好必要的准备工作。

中财委（资）《关于有步骤地将有十个工人以上的资本主义工业基本上改造为公私合营企业的意见》可登党刊。

　 中共中央 1954年3月4日

3月9日，宪法起草小组完成了宪法“四读稿”，毛泽东亲自领导的宪法起草工作第一阶段的工作结束了。

有一天，毛泽东和王芳及摄影师侯波一行人**再登玉皇山**，他们边走边谈论着《红楼梦》。

毛泽东问侯波：

“你现在看什么书啊？”

侯波说她看的就是《红楼梦》。毛泽东说：

“看得懂吗？”

“看故事呗。”

“要好好看，看3遍、5遍！”

“看3遍？我一遍还没看完呢。”

“哎，要仔细看喽！那样的社会，那样的家庭，你没看到过，只能看看故事。《红楼梦》这部书写得很好，是一部社会政治小说，它是讲阶级斗争的，你要看5遍才有发言权呢。**《红楼梦》里写了贪官污吏，写了皇帝王爷，写了大小地主和平民奴隶。大地主是从小地主里冒出来的，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看了这本书就懂得了什么是地主阶级，什么是封建社会。就会明白为什么要推翻它。”**

毛泽东还谈到了《西游记》，他说：

“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一块去西天取经，中途发生了矛盾，闹不团结，但经过互相帮助，战胜了妖精鬼怪，到了西天，取回了经，成了佛。我们革命不怕有不同意见，只要大家朝着一个目标，团结一致，目的就一定能达到。”

上得山来，侯波回头一看，山下有个房子着火了。南方的草房见了火就扑不灭。这种临时性的草房，几根木架，席子一围，茅草盖顶，着了火只需要把值一点钱的东西抱出来就行，灭火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侯波不懂得这些，着急地喊道：

“哎呀，房子着火了！”

毛泽东在山坡上的石头上坐了下来，不慌不忙地说：

“着火好。烧了好，烧了好。”

侯波听他说话的口气，非常惊讶，不解地问：

“着火……还好？”

“不烧它就总住茅草房。”

“烧了人家住哪里去呀？人家盖不起瓦房才住茅草房的。”

“嗯，看来是你说的有理。那怎么办呢？烧了到哪里住呢？”毛泽东说罢，便沉思不语了，良久，他才又自言自语地喃喃道：“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侯波听毛泽东如此说，才知道此时他仍然处于现实生活和《红楼梦》的转换中，这是他独特的一种幽默情趣和开阔胸怀。眼看着山下的火已经烧尽，只剩下一缕袅袅青烟，毛泽东又说：

“唉，烧了好。烧了3年盖瓦房，不烧10年住草房。我看朝鲜还是有希望的。”

侯波感叹不已，她心里说：“伟人就是伟人，他的思想太活跃，他怎么就想到了停战不久还是一片废墟的朝鲜？他所考虑的问题与我们想的事情实在不是一个层次。”

侯波到石头缝里采了许多野花，拿到毛泽东跟前，说：

“主席，你看，这里都开花了，北京现在还下雪呢。”

毛泽东从中抽出两枝花，凝视着，问：

“这是叫什么花呀？”

“南方的花，不知叫什么花。”

“那就叫侯波花吧。”

毛泽东笑着打趣。侯波说：

“咱们建两个首都才好呢，夏天在北方，冬天在南方。”

“你这个想法不错嘛。”

毛泽东随口应付着，起身往前走，来到了福寿观。大概是警卫人员已经采取了措施，观里只有那个盲人主持。毛泽东想起上一次抽签的事，指指桌上抽签的木筒，说：

“侯波，你替我抽支签吧。”

侯波上去抱住木筒摇一摇，抽出一支，一看，说是命不好，家里家外不安宁。于是，她又换了一支说得好的，拿去让毛泽东看，毛泽东看完哈哈大笑。

福寿观里有玉皇大帝和周武王、姜太公、哪吒等人的塑像，他们都是神话小说《封神演义》里的主要人物。毛泽东看了问王芳：

“《封神演义》你看过没有？”

王芳说：

“在家读中学时看过。”

“你知道殷纣王为什么被周武王打败？”

王芳说：

“纣王宠信妲妃，乱了朝政。”

“不对。**纣王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在军事上采取分兵把守，消极防御的办法。而周武王用的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办法。所以纣王败了，周武王胜了。**看来蒋介石没有看过《封神演义》，要么看了没有真正看懂。蒋介石搞的就是分兵防守的办法，我们用的就是集中优势兵力的办法，所以被我们打败了。”

毛泽东又问道：

“你看过《三国演义》吗？”

王芳说：

“在济南读书时看过。”

“你知道关羽姓什么？”

“姓关。”

“不是，关羽原来不姓关，也不叫羽。因为关羽生性仗义，在家乡杀了人，被官兵追捕。他逃到潼关，但出关要登记姓名，签字画押。为了安全，他便指关为姓，以羽为名，比喻自己像鸟一样飞出潼关。所以后来就叫关羽。”

这天，毛泽东本来说要在山上吃素斋，可菜一端上来，多是鱼呀鸡呀的。毛泽东说：

“怎么又吃荤菜，不是说好吃素斋吗？”

王芳说：

“主席，这是素斋，全是蔬菜做的，样子像鱼和鸡。”

3月中旬的一天，天上下着毛毛细雨，毛泽东坚持要到绍兴东湖农场去视察。

早在3月初，他在听取浙江省委负责人汇报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情况时候，得知绍兴东湖农场通过科学种田，使当年的“放鸭畈”变成了浙江有名的高产样板田，十分高兴，当即向谭启龙表示，以后要抽时间亲自去看看。

这一天，毛泽东在谭启龙陪同下，来到东湖农场。他冒雨走在田埂上，一面细心观察，一面向农场负责人了解情况。视察结束后，他称赞东湖农场科学种田好。

离开农场，毛泽东来到东湖风景区，沿着湖的长堤，欣赏着东湖的山水：惊险的悬崖，陡峭的山壁，飞檐的亭榭，涌流的泉水，拱形的石桥。他坐在刻有“此峰自蓬岛飞来”字迹的假山旁的石凳上，一面向谭启龙询问绍兴人民的生活和生产情况，一面谈起东湖的景观。他又问站在一旁的刘邦俊：

“东湖水有多深？”

刘邦俊答不上来，但机灵的他把刻在东湖“仙桃洞”上的一副对联念给毛泽东听：

“洞五百尺不见底，桃三千年一开花。”

毛泽东听后，哈哈大笑起来，对身边的人说：

“这不是自然湖，是人工开创湖。这陡立的石壁，惊险的悬崖，不是天然而成的，而是劳动人民开采了不知多少年的石条才凿成这壮丽景观的。”

说罢，他来到室内的走廊上小憩，坐在八仙桌的上方，谭启龙坐在他的右侧。他与秘书们从科学种田和东湖的景观说起，又谈到了《红楼梦》和对《红楼梦》的研究。他说：

“《红楼梦》不仅是一部文学名著，而且是一部阶级斗争史。里面有6条人命呢！冯渊、贾瑞、鲍二家、尤三姐、司棋、晴雯，都白白地断送了性命。‘红学’派、“新红学’派，他们借研究《红楼梦》，推销他们的主观唯心论，毒害着青年人。”

毛泽东话锋一转，又说：

“绍兴，古称会稽，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也是吴越文化的重要发源地。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就在这个地方。近代以来，这里也出了两个人物，一个是清末女革命家秋瑾，自号‘鉴湖女侠’；另一个就是鲁迅。”

他问谭启龙：

“你去过鲁迅故居吗？”

谭启龙说：

“去过。”

毛泽东说：

“鲁迅生前有两句名言，一句是‘横眉冷对千夫指’，另一句是‘俯首甘为孺子牛’，你知道吗？”

“知道。”

谭启龙点点头说。毛泽东说：

“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有这种为人民甘做牛马的精神啊。”

谈话结束后，摄影师侯波为毛泽东与谭启龙在八仙桌旁合了影。

3月12日，毛泽东给黄炎培写了一封回信。

此前，黄炎培就自己在3月1日对上海工商界的讲话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征询毛泽东的意见。并随信寄去了3月1日的讲话稿。讲稿中黄老先生借用“无痛分娩法”这个术语告诉工商界同人，进入社会主义的过程没有什么痛苦。

毛泽东在给黄炎培的复信中写道：

黄副总理：

3月8日惠书阅悉。附件已付周总理、李维汉部长斟酌奉告。“人们”是指资产阶级和民主党派，不包括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即不是“包括一切的”。**“无痛分娩法”一词最好不写在印刷品上，因实际上那些不甚觉悟的人们总会觉得有些痛苦的**。支票开得多了，可能引起幻想，而不去加重教育和学习，不去提高政治觉悟，结果感觉痛苦的人就会对我们不满。尚请斟酌。敬颂大安！

毛泽东 1954年3月12日于杭州

接着，毛泽东又给周恩来、李维汉二人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恩来、维汉同志：

此件请审阅斟酌，并告黄副总理。“阶级消灭，个人愉快”似以改为“阶级消灭，个人存在”为适宜，亦可告以非正式发表的谈话不要他在印刷品中引用，请酌。如他的讲演不登报，又碍难修改，听其引用亦无不可。他所谓“无痛分娩法”亦不甚妥当，只作印刷品不登报，亦可不改。末了引我的话之后他说“人们”“是包括一切的”，我已复告他不是包括一切的，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不包括在内。我复黄信只说这一点和批评无痛分娩法一点，此外说他的信已付你们二位斟酌告他。

敬礼！

毛泽东 1954年3月12日

复黄信请阅后送交。

后来，黄炎培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将讲稿中有关“无痛分娩法”的提法删去了。

3月14日下午3点30分，毛泽东和起草小组离开杭州刘庄，至晚到达太湖之滨的无锡。正在济南出席山东分局会议的陈毅立即赴无锡迎候，把毛泽东安排在太湖华东干部疗养院。夜里2点多，李银桥端来一盆开水，张木奇问：

“怎么啦？”

李银桥说：

“老头儿便秘，给他灌肠。”

张木奇把开水晃动凉了，就让李银桥端进去灌肠。

保健医生徐涛劝毛泽东注意休息和饮食的规律性及营养性，请他吃蜂蜜，说否则就容易便秘。毛泽东不听，他自有他的办法：蔬菜不让切，整株洗净了炒，保持长纤维，吃下去利大便。他还说：

“我的生活里有4味药：吃饭、睡觉、喝茶、大小便。能睡、能吃、能喝、大小便顺利，比什么别的药都好。”

“孔老夫子吃饭很讲究，”毛泽东越说兴致越高，而且有点神秘了：“他有10不吃：鱼和肉不新鲜不吃，食物变色变味不吃，烹调不合宜不吃，不到吃饭时间不吃，这些都很合乎卫生嘛！不过孔老夫子有病啊！”

徐涛说：

“我没注意这个问题。”

毛泽东愈发得意了，说道：

“你应该给他诊诊病，我看他有胃病。”

“你怎么看出来的？”

“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东西搞得那么精细不是消化不好吗？再说他常喜欢吃姜。你们西医研究不研究姜的作用？”

“中医研究的比较多。”

“姜性温，孔老夫子有胃病，用姜祛寒暖胃；老百姓不是喝姜糖水嘛，祛寒发汗治感冒。我看他还有胃下垂。”

“你怎么又给诊断出一个病来了？”

“他胃不好，又忙着周游列国，吃了饭就坐车子颠簸，还不得胃下垂？”

毛泽东说罢，自个儿禁不住笑了起来。

有一次，毛泽东牙龈发炎，肿得厉害，已经化脓了。他疼的时候用手捂着腮帮，皱着眉吸凉气，饭都吃不下去。徐涛学着毛泽东以前说过的话：

“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了命。”

毛泽东一听就笑了。徐涛说：

“这次可真是病了，牙床化脓，淋巴肿大，你得吃药，吃抗生素。”

“我不用药。”

毛泽东连连摇头，一边还疼得直吸凉气。徐涛说：

“别讳疾忌医啊，这是你常说的话。”

“我不忌医我忌药，你有不用药的办法吗？”

“病重了不行，重了必须吃药。吃抗生素很快就可以好。”

“我不吃药。靠吃药，自身的抵抗力就没发挥作用，就得不到锻炼。应该调动自身抵抗力对付外来侵略。总用药抵抗力就会衰退，再有细菌侵入就要出大乱子。只有经过斗争抵抗力才能变强大。”

“照这样说，还生产药干什么？”

“只有抵抗力不行时，才用药助他一臂之力，反败为胜。这次我要看看我的抵抗力能不能战胜。”

几天后，毛泽东没有用抗生素牙疼就好了，他得意地笑着说：

“怎么样？我的抵抗力战胜了。自力更生了，不能光依靠外援。天下万物万事，都脱不出这个道理。”

他还不止一次地说过：

“医生的话不可不听，也不可全听，全听你的我就完了，全不听你的我也不行。”

毛泽东就喜欢无拘无束的生活。他在游泳池游泳，如果没有女性在，他便吩咐一声不要让女性来，自己脱得赤条条的下水游泳，更觉得自由自在，畅快无比。

正是：真人真性情，与众大不同。

不药病自愈，医嘱不全听。

戏言寓真理，自力能更生。

3月15日清晨，陈毅陪同毛泽东到无锡太湖边观看日出。回到疗养院，毛泽东邀陈毅谈话。据陈毅日记记载：毛泽东在谈话中最触动他的一句话是：

**“伸手岂止高、饶。只是目前不必如此提出，以免有扩大化的嫌疑。”**

这才叫：洞若观火，腹有韬略。教尔育尔，良莠难说。花开花落，无可奈何！

后来不久，陈毅因受毛泽东谈话的启发，写出了一首也许是他所有诗作中最具影响力和思想性的长短句《手莫伸》，开篇便说“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党与人民在监督，万目睽睽难逃脱。”

3月17日，毛泽东一行回到了北京。

欲知毛泽东此后的工作情况，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高、饶事件后对陈毅说：**“伸手岂止高、饶。只是目前不必如此提出，以免有扩大化的嫌疑。”**斯言果真能应验否？请诸君拭目以待之！

**第3章**

“**文家任何人，都要同乡里人一样，服从党与政府的领导，勤耕守法，**

**不应特殊。请你们不要因为文家是我的亲戚，觉得不好放手管理。**”

话说在1954年初，毛泽东对江青说：

“黄军衣我不穿了，你看送给谁就送给谁吧。”

于是，江青就把李银桥叫到办公室，指着沙发上的4套制服，说：

“银桥，这些衣服，主席不穿了，送你1套，马武义 1套，赵鹤桐1套，李家骥1套，4个内卫每人一套。”

李银桥“嗯”了一声，动手翻翻那几件衣服，问：

“还有孙勇怎么办？”

孙勇是负责外卫的副卫士长。江青“噢 了一声说：

“要不这样吧，你和孙勇一人两套吧。”

一听说分给孙勇两套，李银桥就多了个心眼，将那4件黄军衣打开挑选，他要挑出毛泽东参加开国大典时穿的那件衣服，他感觉那件衣服比另外3件特殊些。再说，那一件是美国的呢料，另3件是国产呢料；那件的袖子带了黑白条纹的里子，另3件袖口里没有条纹里子，这样一比较，从质量上讲也是开国大典穿的那件最好。于是，他选出毛泽东参加开国大典穿过的制服，又从另外3件里选一件，一起抱回家里，剩下的2件就送给了孙勇。

李银桥没有毛泽东身材高大，穿上“军衣”肥肥大大的，就想把衣服改一改，遂与爱人韩桂馨商量。韩桂馨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你可别瞎改呀。这要是在旧社会，那衣服就算皇帝登基的龙袍呢！”

李银桥说：

“现在不是新社会吗？主席一再说：‘我是国家主席，是人民公仆，不是皇帝。’你瞎扯什么？”

于是，他就找裁缝将开国大典中最有意义的那件衣服按照自己身材裁剪了，改后的衣服穿上很合身，也很精神。可他没想到，一件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文物就毁在了自己的手里。

后来在1967年，天津历史博物馆找到李银桥收集历史文物，“请”走了那套衣服，给他做了一套新呢子衣服作为补偿。这时，李银桥才意识到那套衣服的珍贵，后悔当初没有听从妻子的意见。在毛泽东主席逝世后，中央有关部门寻找开国大典时毛泽东穿过的衣服，找到了李银桥。李银桥告诉来人：“被天津历史博物馆的同志收走了。”来人让他要回来，可天津历史博物馆坚决不同意。中央有关部门只好跟孙勇要来一套黄呢子军衣，陈列在毛主席纪念堂内，说明上写的是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穿的衣服。

再说在3月间，毛泽东再次与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会面。一开始，**毛泽东否认外国传说他在杭州期间病重，将为高岗所取代**。然后他讲述了批判高岗的原因。

尤金回忆说：“**毛继续按照他谈到高岗时的思路说，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来，他感到党内党外都有什么不对劲。有一种地震正在发生的感觉，一会儿这里有震感，一会儿那里有震感，但就是说不出震中在哪里。**去年6、7月这种感觉特别明显，那时中共中央正在召开有关金融和经济事务的会议。**然后自7月到12月，越来越明显感觉党内有两个中心，一个是中央委员会，另一个看不见，在地下。在党内，这种震感特别强烈。12月24日以后，在政治局讨论这个问题后，许多问题澄清了。我们现在知道这种震动来自哪里，但这并不是说，在别的地方不会发生地震。**”

毛泽东对尤金谈到，高岗不仅是个阴谋家，还有别的理由使他不信任高岗，他说：

“在个人生活上，高岗是个荒淫的人，他有许多女人，现已明确其中有些人是敌对分子。现在中央正设法多方明确高岗是否与帝国主义分子有联系。”

毛泽东在下面的谈话里，隐约指责了苏联。

尤金回忆说：“毛泽东继续说，高岗因贝利亚事件飞赴莫斯科，回来后变得异常活跃。特别发人深省的是他从莫斯科回来后，从不对人谈到苏共决议中的两条极为重要的段落，即宣传个人崇拜的危害和党的集体领导的必要性。有特别意义的是，高岗从莫斯科回来后，没有回家，立刻去各省党的工作者因公来京下榻的北京饭店，开始对他们做工作。……毛察觉到高岗与科瓦廖夫（苏联在华总顾问）之间建立了友谊。他问我，你是否看过科瓦廖夫写给斯大林的信。我回答说，我没有见到信，但斯大林同志对我谈起过这封信。毛说他有这封信，可以给你看。**在这封信里，高岗等于说在中共中央里，除了高岗外，没有一个同志是好的。高岗对科瓦廖夫说中央有些同志可以定为亲美，而其他人则是反苏。**”

3月2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宪法起草委员会第1次会议。刘少奇、周恩来、陈云、董必武、邓小平、宋庆龄、张澜、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马寅初、马叙伦、陈叔通、黄炎培、程潜等共26名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出席了会议。

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正式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提交给宪法起草委员会。他说：

“这个初稿可以小修改，也可以大修改，还可以推翻另拟初稿。”

陈伯达受毛泽东委托，在会议上作了关于宪法草案起草工作的说明。

会议决定：在最近两个月内完成对宪法草案初稿的讨论修改，以便提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批准作为草案公布。同时决定：除了在宪法起草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进行讨论外，还要会同全国政协进行分组讨论，同时将草案分发全国各大行政区、各省市领导机关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地方组织进行讨论。

会议还决定，为了加强对宪法草案讨论修改的组织工作，以李维汉为宪法起草委员会秘书长，以齐燕铭、田家英、屈武、胡愈之、孙起孟、许广平、辛志超为副秘书长，并由他们负责成立一个宪法起草委员会办公室。

随后，北京组织了500多人讨论。全国各大城市组织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社会各方面的代表共8000多人，进行了宪法草案大讨论。各界人士一致认为这个草案是好的。在这次大讨论中，还从各地征集到了5900多条方方面面的意见和建议。

3月31日，毛泽东给老友彭石麟先生写了一封回信。

彭石麟，湖南湘潭人。大革命时期，他曾任湘潭县清溪乡女子职业学校校长，毛泽东在清溪一带从事革命活动时得到过他的资助。毛泽东在复信中写道：

石麟先生：

1954年3月9日函示敬悉。尊事已托毛蕊珠兄，我的斡旋可以不必了。我不大愿意为乡里亲友形诸荐牍，间或也有，但极少。李漱清先生，文运昌兄，以此见托，我婉辞了，他们的问题是他们自己托人解决的。先生生计困难，可以告我，在费用方面，我再助先生若干，是不难的。此复，祈谅是幸。

毛泽东 1954年3月31日

1954年4月1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和张闻天乘飞机抵达莫斯科。他们此行是为即将召开的日内瓦会议做准备，要同苏联政府协商有关事项，以便在会议上统一步调。

4月2日，中央农村工作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召开第2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会议检查了各地对中央第3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决议和毛泽东指示的执行情况，着重研究了合作社大发展后如何巩固的问题。

4月上旬，毛泽东给班禅额尔德尼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班禅额尔德尼先生：

感谢你1953年8月1日的来信和礼物。知道你身体很好并经常为团结而努力，我很高兴。**西藏每年有些人来内地参观是很好的。此外，每年还可以选送一些青年来内地学习，长期学习和短期学习都好。因为这样可以更多的培养一些建设西藏的民族干部。**

随函附上牛奶分离机一部，扩音机一部，两用无线电收音机一台。顺祝

健康！

毛泽东 1954年4月

4月12日，毛泽东为中央批转华北财委党组《关于努力活跃初级市场、增进城乡物资交流的报告》，他写道：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省、市委：

兹将华北局批转的华北财委党组“关于努力活跃初级市场、活跃城乡物资交流的报告”转发给你们。华北报告中所反映的农村初级市场物资交流陷于死滞的状态，其他省区也有不少地方发生了这种现象，尽管程度是不相同的，应该引起各地严重注意。

农村初级市场在粮食统购统销以前和以后起了一个带根本性的变化。在粮食统购统销以前，粮食交易在农村初级市场中占的比重很大，**农民是卖出粮食以后再买进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私商也不是单纯贩货下乡，而多半是贩货下乡又贩粮进城兼营多种买卖的，过去粮食在初级市场中确实居于枢纽的地位。统购统销以后，农民手中固然还有一小部分余粮可以出售，也还有调剂掉换粮食品种的需要，国家也应该委托合作社或设立在国家管理下的粮食市场允许农民在市场内与消费者直接交易，**但能上市的粮食比之过去是大大减少了。粮食基本上脱离了自由市场。这是农村初级市场的新的带根本性的变化。各级党委和商业合作部门，必须深刻研究这种新的变化，**更注意从土特产品和手工业方面采取适合这种新情况的适当措施，以活跃初级市场，活跃城乡物资交流。**华北财委党组报告中所提出的5项措施是正确的，可供各地参考。

本件及附件可登党刊。

中央 1954年4月12日

4月12日，毛泽东视察了官厅水库大坝工地。

官厅水库位于永定河上游延庆县与河北省怀来县交界处，海拔490米，是新中国建设的第一座大型水库，在中国水利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永定河在历史上被称为“小黄河”，含沙量大，且河道多变，经常发生水患。1949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召开各解放区水利联席会，人民政府和毛泽东在会议期间决定，在永定河上游修建官厅水库。1949年底，官厅水库工程处成立，1951年10月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官厅水库建设工程正式开工。4万多水库建设大军，投入到了官厅水库的建设中。

4月12日上午9点，毛泽东乘专列前去视察刚刚竣工的官厅水库大坝主体工程。他登上拦河大坝，从52米高、290米长的大坝西头一直走到东头，认真详细地察看了溢洪道工程的施工现场，询问了水库的设计、施工等情况。他对官厅水库工程建设作了充分肯定，对水库建成后的巨大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同时又语重心长地告诉工程负责人员：

“人怕出名猪怕壮啊！”

他教育大家要谦虚谨慎继续努力工作。到1954年5月间，官厅水库仅用了两年半的时间就胜利竣工。毛泽东接到喜报之后，欣然写下了“庆祝官厅水库工程胜利完成”的题词，表示祝贺。

再说周恩来、张闻天在苏联期间，为协商日内瓦会议的问题，与苏方多次会商，取得了一致的看法，由苏联政府草拟了具体方案，周恩来将要带着这一方案回国向中央汇报。

4月16日，苏联政府为了庆祝会谈顺利，以赫鲁晓夫的名义设晚宴招待周恩来、张闻天。苏联人本来就喜欢饮高度白酒，这一天更是特别兴奋。赫鲁晓夫入席时不停地转动手腕上的表带，一会儿捋下来放桌上，一会儿又拿起来戴在手腕上，完全是一种跃跃欲试准备大喝一场的架势。

赫鲁晓夫开始讲话了，很简短，他说了几句便开始端起酒杯敬酒。苏联人的热情豪爽是没法比的，赫鲁晓夫咕咚一声就干了杯，于是，其他的作陪者，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等人，也一齐起身，高举着酒杯，咕咚咕咚干了杯。周恩来也随着主人干了杯。

酒场上也是来而不往非礼也，周恩来是主要客人，他不能不回敬主人。于是，他就讲了几句外交礼节上的辞令，端起酒杯回敬主人们。

这种外交宴会，主人和客人都是彼此敬酒多，不大注意吃菜，菜还没怎么动，酒瓶子已经不知道空了多少。周恩来、张闻天是客随主便，即便想吃一点儿菜，也不能那么随意了。

赫鲁晓夫又在敬酒，他已经红了脸，鼻尖上渗着汗，嘟嘟噜噜说个不停。翻译出来的大致意思是：这次日内瓦会议将是一次带有政治意义的国际会议，但对它不必抱有过分的希望，也不要期望它能解决多少问题。周恩来则说：

“醉翁之意不在酒。我们是从另一个角度考虑问题的：中国、朝鲜、越南一起出席这次国际会议，这件事本身就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就是一种胜利。”

赫鲁晓夫晃着脑袋，重复着说：

“这次会议可能根本解决不了什么问题，结局是我们难以预料的。”

周恩来进一步解释说：

“现在是美英法不得不同我们坐在一起，不得不同我们对话，听我们阐明对各项问题所持的原则立场和对若干有关问题做出解释和澄清性的声明，这本身就是我们的一个胜利。”

赫鲁晓夫终于明白了周恩来所说的胜利的含义，便大叫着“哈拉少，哈拉少”，激动地向周恩来敬酒，干杯。周恩来没有马上干杯，他举着酒杯又说：

“这次会议如果能解决某些问题就会有更大的收获，我们是想经过努力，解决一些问题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请同志们干杯！”

说完，他率先干了杯中酒。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马上相继向周恩来敬酒，与他干杯。此时，周恩来的脸色已经由红润慢慢转成了苍白。莫洛托夫也端着酒杯对周恩来说：

“这次日内瓦会议，我们俩将并肩战斗。为我们的友好合作，干杯！”

周恩来尽管脑子里已经有些混沌，错把莫洛托夫当成了斯大林，但他表面上风度依旧，点头微笑，贴近莫洛托夫说：

“我们的友谊很久了。1928年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六大，我来参加了。那次我见到了你，你对我们代表们讲了话。你是老大哥，我们要向你学习。日内瓦，中国参加这样的国际会议还是第一次，缺少国际斗争的知识和经验，还要继续向你们学习，来，为我们的共同奋斗目标干杯！”

宴会继续进行着，主人客人互相敬酒，苏联人自己跟自己人也互相敬酒、干杯，还各自聊着感兴趣的话题。周恩来也离开了席位，在大厅里转着，同苏联领导人说着热情友好的话，敬酒、干杯。此时，他的脚步已经踉跄了，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对面站着，欲言又止，身体摇晃几下，突然弯下腰，呕吐了，甚至连站也站不住了。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也已经带了醉意，面对这种突然发生的状况，一下子愣住了，既想叫人，又想伸手扶周恩来，又发觉手中的杯子没地方放。张闻天抢上去扶起周恩来，莫洛托夫也赶过来帮忙，他俩一左一右扶着周恩来往外走。

“这是我们的过错，这是我们的过错。”莫洛托夫边喘息边说：“没有照顾好你，我们很不安，我们感到内疚。”

周恩来下意识地应酬着说：

“不要紧，喝猛了些，这段时间太累……”

张闻天解释说：

“周总理肝脏不太好，长征时得过脓肿，不宜多饮酒，加上这些天疲劳过度，才出现这种情况。”

莫洛托夫还是一个劲地道歉自责：

“怪我们，这是我们应当吸取的一次教训，一切责任都在我们。”

周恩来吐了几次，工作人员将他扶到车上，回到奥斯特洛夫斯卡亚街8号公寓。他已经停止了呕吐，但仍然昏昏沉沉。大家忙着沏浓茶，找医生。工作人员扶起他喝了两口茶水，又扶着他躺好，皇宫医院的医生赶来了。医生检查了一遍，说：

“不要紧，没什么大事。他的肝脏可能受过亏损，经不起酒精的刺激，再加上疲劳，所以呕吐。吐了好，这是人身体一种自卫的反映。现在不要打扰他，叫他安静睡一夜，明天早晨我再来看看。”

医生留下一点药就离开了。

4月17日8点左右，周恩来睁开了眼，他双手搓搓脸，坐了起来。

“总理，你感觉怎么样？”

秘书递过去一杯温茶水，周恩来喝了一口漱漱口，又喝了一口。

“比昨天好多了。”说着，他下了床，又说：“嗯，还有点头昏脑胀。”

他轻轻地晃一下头，望着师哲，不无担心地问道：

“我昨天都说了些什么？”

师哲说：

“你讲得很好，苏联人都说哈拉少。”

“有没有什么出格的地方？”

“没有。”

“我是说过一些话的，但具体内容一点也记不起来了……”

周恩来脸色苍白，竭力回忆着，眉头皱着，摇摇头。师哲安慰他说：

“你没有什么出格的话，谈了我们出席这次国际会议的意义，说这件事本身就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就是一种胜利。如果能解决某些问题就会有更大的收获。”

周恩来问：

“还讲了什么？”

“别的都是一般的应酬话。”师哲想了想又说：“涉及个人的只提到莫洛托夫一个人，而且是尊重的话。你说你1928年在中共六大见到了莫洛托夫，他对中共代表们讲了话，表示向他学习。我想，给中共代表讲话的，你指的大概是斯大林同志，只是错说成莫洛托夫了。”

“嗯——”周恩来沉重地吁口气，仍然不放心地说：“还讲了些什么不妥当的话？要如实告诉我。”

“没有，”师哲肯定地说：“确实没有。”

这种场合的一言一行，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大事，如果讲了出格的话，必须马上采取补救措施。周恩来相信师哲是不会遮掩的，于是稍稍放下了心，懊悔地摇摇头，自语道：

“我记得昨天晚上离开了席位，在大厅里转了一会儿就头晕脑胀，不清醒了。”

师哲劝慰道：

“总理，没事。从外表上看不出来，因为你的语言举止，表现都很正常，甚至没有看出什么醉意。否则，早就请你回寓所了。”

正说着，皇宫医院那位老医生又来了。周恩来迎上去同他握手致谢。医生检查后，说：

“一切正常，但是，还需要休息。”

周恩来说：

“我是准备今天回国的。”

“绝对不能长途跋涉。”医生断然说：“推迟一天走，今天好好休息。”

周恩来只好留下来多住了一天。上午休息，下午参观。

4月18日，周恩来乘飞机回到了北京，向毛泽东、中共中央汇报了莫斯科会谈的情况。汇报结束后，他又专门向毛泽东作了个别汇报，他说：

“主席，这次我还犯了个错误，要向你检讨呢。”

毛泽东问：

“什么错误？”

“我在宴会上喝多了。”

“比重庆喝得多？”

“吐了。回来的日期也推迟了一天。在这样的外交场合喝吐了，丢了丑，这是我的错误，我向主席，向中央检讨。”

“哈哈——”毛泽东笑出了声，轻描淡写地把手一挥，说：“**喝酒的人喝醉了，这是常有的事，算不得丢丑。要是换成我，我不跟他们对酒，我跟他们比吃辣子，以己之长击人之短嘛。”**

4月18日这一天，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的第2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结束。会议认为已有的10万个社能否办好，对以后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关系极大。会议要求各级党委积极努力把已有的10万个社切实办好，为迎接行将到来的合作化大发展的新时期作好准备工作。

会议还拟定了农业生产合作社新的发展计划：1955年发展到30万或35万个；1957年达到130万或150万个，入社农户占全国总农户的35%左右；到1960年前后，在全国基本上实现合作化。

4月19日，毛泽东任命周恩来为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任命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为代表。

是日晚，毛泽东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德怀、邓小平，研究日内瓦会议问题。

这天深夜，周恩来接到毛泽东打来的电话，询问他身体如何，出发的准备怎么样了？周恩来说明了情况后，又说：

“主席，我明天就要率领代表团去日内瓦了，主席还有什么指示吗？”

毛泽东爽朗地笑着说：

“指示那倒没有，我想在瀛台涵元殿以茶代酒，为你送行。”

周恩来说：

“主席那么忙，送行就不必了。”

毛泽东说：

“我想请你来瀛台，主要是想请你放松一下，你一直很累，为了出席日内瓦会议更是日夜操劳，到了会上斗争更激烈，会更忙更累。你要注意身体，注意休息。**礼记云：‘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你这个人哪，只会工作，不会休息。”

周恩来听毛泽东如此一番话，感到一股暖流传遍全身，赶紧说：

“谢谢主席对我的关心，我一定注意劳逸结合。”

毛泽东说：

“当然啦，这次日内瓦会议对我们国家，对世界和平关系都很大，你的担子很重，把会议开好，开出成果，这是头等大事。关于日内瓦会议，中央已经批准了你提出的方针，并且已经授命你全权负责，没有特殊的事，也不必请示中央，或者请示了中央也不必等批复。

朝鲜战争，我们是逼着鸭子上架，现在的印度支那战争还在进行，我们要给予大力的支援，负担很重。当然这是为了印支人民的解放事业，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可是我们国家从鸦片战争以来，屡遭外国侵略，战祸不断，经济落后，生活贫困，急需有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休养生息。所以，我们非常希望日内瓦会议能够达成一些协议，使朝鲜的和平得以巩固，印度支那战争能够停止下来，哪怕是停它一段时间也好。

**有人误以为我们是好战的。其实，我们最不希望再打仗，而最需要的是和平，是最爱和平的。我们代表团要高举和平的旗帜，协商的旗帜**。为了和平，我们可以做出必要的让步和妥协。”

周恩来已经领会了毛泽东的意图，他见时间已经不早了，就说：

“主席说得好，我们是要和平的，不要战争。国际国内都迫切需要和平，这是中国人民的要求，也是世界人民的愿望。你的意思我明白了，也更坚定了我的信心和决心。我一定努力去做，尽可能争取达成一个和平的协议。时间不早了，主席该休息了。”

毛泽东说：

“那好吧，祝你一路平安，马到成功！”

4月20日，江青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对她擅自提议给毛泽东修建游泳池一事作了检讨。

原来，江青在毛泽东外出到杭州起草“五四宪法”期间，擅自提议给毛泽东修建游泳池。游泳池修好了，江青满心欢喜地向回到北京的毛泽东汇报，没想到毛泽东发了脾气。动用公款为他建造游泳池，他是绝对不允许的。

4月21日，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全体人员抵达莫斯科。师哲到机场迎接，周恩来握着他的手说：

“我跟主席承认了错误。主席笑嘻嘻地说，这是常有的事，算不得丢丑。”

师哲也笑了，说：

“总理，你就是太认真，多喝了点酒也值得向中央检讨？都像您这样的话，苏联那些酒桶们就别干事了，三天两头向中央做检讨去吧。”

周恩来摇摇头，认真地说：

“你讲的不对，那是他们，我们不同。还是要接受教训。”

4月21日凌晨，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公安部长罗瑞卿、铁道部长滕代远陪同下，乘专列前往天津、秦皇岛、山海关、唐山视察。

是日清晨，东方红日冉冉升起，毛泽东在秦皇岛市委书记、市长王植范及市区负责人的陪同下，在“天下第一关”城楼前下了车。这是他第2次来到山海关。他看着眼前宽阔的柏油路面，高兴地说道：

“这儿变了。”

毛泽东在长城上看到城外不远处有一平台，问那是怎么回事？山海关区委书记、区长柴洪山告诉他说：

“那是威远城的遗址，是明朝吴三桂投降清兵的地方。”

毛泽东“噢”了一声，就给大家讲起了吴三桂的故事。他沿着长城缓步向北走，见前边有一墙垛，就问柴洪山：

“那是烽火台吧？”

柴洪山说：

“是的，战争时做信号用。”

毛泽东又给大家讲起了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故事。王植范说：

“请主席到箭楼看看。”

毛泽东说：

“好，欲穷千里目嘛。”

在箭楼上，毛泽东极目远眺，隐约看到远处有起伏的山峦，就问：

“那是什么地方？”

王植范说：

“那是碣石山，在昌黎县北。”

毛泽东一行从山海关城楼上下来，驱车到了南海口关附近的“老龙头”。这老龙头是万里长城之首，像龙头一样俯在海中饮水。原本威武壮观的城楼，已被帝国主义毁坏了，城墙已经坍塌，只留下一个土坡，像是一道堤坝。毛泽东惊奇地问：

“老龙头在哪呀？”

工作人员向他详细讲述了老龙头被毁坏的经过，毛泽东感慨地说：

“现在，中国人再不会受外国的欺侮了。”

这天下午，毛泽东一行来到秦皇岛码头，港务局石新生向毛泽东详细介绍了情况。

晚上，毛泽东在北戴河休息。

北戴河是秦皇岛市的一部分，位于市区西南角，是著名的海滨避暑胜地。

4月22日早上，毛泽东登上山坡观看了日出，而后便去了唐山。他亲临唐山启新水泥厂视察。后来这个厂在全国率先实现公私合营。

4月25日，毛泽东把江青4月20日的检讨信转交给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人，还写下了一个批示，他写道：

刘、陈、邓、罗瑞卿、尚昆、汪东兴诸同志：

江青此信请阅。**为补救计，建造费5亿由我的稿费中支出，游泳池封闭不用**。

毛泽东 4月25日

毛泽东所说的建造费5亿元是旧币。

4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大区一级党政机构。同日，由邓小平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央组织部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4月29日，毛泽东给湘乡县写了一封《致石城乡党支部、乡政府》的信。

此前，文南松的次子文炳璋已经由部队转业到地方工作，担任湘乡县石城乡武装部长。他在年初给毛泽东写信反映说，文家个别人从北京回到家乡后，便不把当地政府放在眼里了。他认为，这种情况应该引起注意。毛泽东非常重视这封信和文炳璋的意见，于是就在《致石城乡党支部、乡政府》的信中写道：

石城乡支部、石城乡政府诸同志：

毛月秋同志来北京，带来你们的报告，甚为感谢。

我的亲戚唐家圫文家，过去几年常有人来北京看我。回去之后，有些人骄傲起来，不大服政府管，这是不对的。**文家任何人，都要同乡里人一样，服从党与政府的领导，勤耕守法，不应特殊。请你们不要因为文家是我的亲戚，觉得不好放手管理。我的态度是：第一，因为他们是劳动人民，又是我的亲戚，我是爱他们的。第二，因为我爱他们，我就希望他们进步，勤耕守法，参加互助合作组织，完全和众人一样，不能有任何特殊。如有落后行为，应受批评，不应因为他们是我的亲戚就不批评他们的缺点和错误。**

现有文炳璋同志的一封信，附给你们看，我是同意文炳璋同志的意见的，请你们加以处理。并请你们将我这信及文炳璋的信给唐家圫的人们看，帮助他们改正缺点和错误。我相信，只要我和你们都采取正确的态度，只要他们不固执成见，他们的缺点和错误是可以改正，并会进步的。

此致同志的敬礼。

毛泽东 1954年4月29日

1954年5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给越南战场上的韦国清的指示电后面，加写了一段话，他写道：

“如和谈成功则另做停战部署，目前应做和谈不成功的部署，不可等待和谈。”

5月17日下午4时，毛泽东身穿灰色中山装，脚蹬白底布鞋，手拿一根小竹竿，和他的一个秘书，不声不响地来到北京故宫，在故宫保卫科长韩炳文一人陪同下，从神武门东马道登上了城楼。他们顺着城墙向东走，一直走到东华门。毛泽东高兴地浏览了故宫的全景。在东华门城台，他坐在小马扎上休息，向韩炳文询问了故宫的机构设置、各部门分工和人员的文化程度。他听说故宫里的人员还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就说：

“那可不行，要好好学文化，文化不高是难以做好工作的。”

毛泽东又参观了“基本建设出土文物展览”，直到天色近黄昏才离开故宫。

5月19日下午，毛泽东又来到故宫，这次是进午门，登上了午门城楼，继续参观“基本建设出土文物展览”，这一次他看得比较详细。他对陪同人员说：

“这就是历史。你们应当学点历史，要懂得历史，知道中国的昨天和前天。”

毛泽东在故宫大约有2个多小时。

5月20日下午，毛泽东第3次来到故宫，这次是进神武门，17日那天是向东走，这次是向西走。在西北角楼处，工作人员为毛泽东照了相。

毛泽东在西边城墙上看到近处防空部队的高炮阵地，看了他们的演习，他说：

“高射炮设在这里不好，敌机飞到这里再打就晚了。”

直到晚上7点，毛泽东还想参观宫殿内的文物展览，由于没有照明设备，无法继续参观，只好向大家挥手告别。

5月2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限期建立国家粮食市场的指示》，他写道：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省（市）委：

自中央发出建立国家控制的区乡集镇粮食交易市场的指示后，各地已先后举办了一批。初步的经验证明，只要举办，就比不办好，即使初办时不很成功，但只要抓紧领导，改进工作方法，就可慢慢走向成功。目前举办国家市场的工作尚未引起各级党委普遍注意，大多停留在以县为单位进行试办阶段，不再前进，既已举办起来的，领导不及时不具体，遇到困难，就丧失信心，转回来起用一些错误的强制办法去解决粮食供应问题。这种缺点是必须纠正的。为此请各地注意：

一、**要限期在6月份内，将应建立的初级市场普遍建立起来，不必过久地搞试点工作，**以致失掉时效。

二、国家领导的初级粮食交易市场农民直接进行交易，在开始时期，关于粮食交换限额、价格、手续等方面必须有所限制，但又不可限制的太严太死，否则不易打开僵局面。

三、**国营粮食机构和合作社粮食部，必须大力配合粮食初级市场的工作，除了派遣干部协助外，粮食市场因品种调换发生困难时，也应帮助解决。**

四、**必须仔细地进行组织工作，耐心地贯彻思想教育工作，决不可因工作开始不见起色，即采取简单急躁强迫的办法，去命令余粮户拿粮食到市场去交易，或迫使余粮户对缺粮户分片包干供应，造成群众间的对立，将事情越弄越坏。**

　 中共中央 1954年5月27日

5月28日，毛泽东为中央转发华北局《关于在国营厂矿企业中实行厂长负责制的决定》：

华北局并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市委，中央财经，文教各部党组：

中央同意华北局《关于在国营厂矿企业中实行厂长负责制的决定》，并转发各地区，各部门参考。

**中央认为在全国胜利之后，党在国营厂矿中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作，使生产的管理日益进步，并开始走上正规。目前国家有计划的建设已进入第二个年度，中央各工业部和各地区对国营厂矿的领导亦日益加强，因此，中央认为有必要也有可能在全国各国营厂、矿（包括地方国营厂矿）中实行厂长负责制，以便进一步地提高工业企业的领导水平，更好地完成国家计划。**

各地区各部门在着手实行厂长负责制中所发生的问题和经验望随时上报中共中央，以便积累全国的经验。

　 中央 1954年5月28日

欲知此后厂矿企业中总结出了哪些管理经验？请慢慢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一生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如果说他那封《致石城乡党支部、乡政府》的信是一个严于律己的例证的话，那么在周恩来酒醉之后作检讨的时候他笑着说：“**喝酒的人喝醉了，这是常有的事，算不得丢丑。要是换成我，我不跟他们对酒，我跟他们比吃辣子，以己之长击人之短嘛。”**这虽然是一句玩笑话，却也算得上一个宽以待人的例证。

**第4章**

**“帝国主义国家的宪法尤其是欺骗和压迫多数人的**。**我们的宪法**

**是新的社会主义类型，不同于资产阶级类型。我们的宪法，就是**

**比他们革命时期的宪法也进步得多。我们优越于他们。”**

话说1954年6月11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宪法起草委员会第7次会议，他在讲话中说：

“宪法的起草，前后差不多7个月。**最初第1个稿子是在去年11、12月间，那是陈伯达同志一个人写的。第2稿，是在西湖两个月，那是一个小组起草的。第3稿是在北京，就是中共中央提出的宪法草案初稿，**到现在又修改了许多。每一稿本身都有许多修改。**在西湖那一稿，就有七八次稿子。前后总算起来，恐怕有一二十个稿子了。**大家尽了很多力量，**全国有8000多人讨论，提出了五千几百条意见，采纳了百把十条，最后到今天还依靠在座各位讨论修改。总之是反复研究，不厌其详**。将来公布以后，还要征求全国人民的意见。宪法是采取征求广大人民的意见这样一个办法起草的。这个宪法草案，大体上是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

“**宪法起草委员会已经开了6次会议，今天是第7次会议**，也可以说是中央人民政府开会前的最后一次会议。宪法起草委员会应当把它所做的工作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报告，并把这个宪法草案（修正稿）作为草案批准公布，在全国人民中间进行讨论，收集意见。那时，起草委员会还要做工作。宪法草案公布以后，估计意见不会很多，但是尽管意见不多，总还会有些意见。在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做报告以前，宪法起草委员会还要开会，同时要准备一个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报告。因为宪法草案是起草委员会起草的，收集了意见以后，还要再修改。修改成了最后稿，还要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做报告。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这个报告进行讨论，那就是它的事了。”

这次会议对宪法草案（修正稿）的全部条文作了最后的审查，定为106条。

6月1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0次会议。

李济深、宋庆龄、张澜、黄炎培、张治中等21人在会议上发言，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表示了自己的看法。张治中用3句话概括了这部宪法草案的特点：“第一，结构严谨而明确。第二，内容完整而充实。第三，措词简易而明确。”

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总结讲话，全文如下：

这个宪法草案，看样子是得人心的。宪法草案的初稿，在北京500多人的讨论中，在各省市各方面积极分子的讨论中，也就是在全国有代表性的8000多人的广泛讨论中，可以看出是比较好的，是得到大家同意和拥护的。今天很多人讲了话，也都是这样讲的。

为什么要组织这样广泛的讨论呢？有几个好处。首先，少数人议出来的东西是不是为广大人们所赞成呢？经过讨论，证实了宪法草案初稿的基本条文、基本原则，是大家赞成的。草案初稿中一切正确的东西，都保留下来了。少数领导人的意见，得到几千人的赞成，可见是有道理的，是合用的，是可以实行的。这样，我们就有信心了。其次，**在讨论中搜集了5900多条意见（不包括疑问）**。这些意见，可以分作3部分。其中有一部分是不正确的。还有一部分虽然不见得很不正确，但是不适当，以不采用为好。既然不采用为什么又搜集呢？搜集这些意见有什么好处呢？有好处，可以了解在这8000多人的思想中对宪法有这样一些看法，可以有个比较。第3部分就是采用的。这当然是很好的，很需要的。如果没有这些意见，宪法草案初稿虽然基本上正确，但还是不完全的，有缺点的，不周密的。现在的草案也许还有缺点，还不完全，这要征求全国人民的意见了。但是在今天看来，这个草案是比较完全的，这是采纳了合理的意见的结果。

这个宪法草案所以得人心，是什么理由呢？我看理由之一，就是起草宪法采取了领导机关的意见和广大群众的意见相结合的方法。这个宪法草案，结合了少数领导者的意见和8000多人的意见，公布以后，还要由全国人民讨论，使中央的意见和全国人民的意见相结合。这就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领导和广大积极分子相结合的方法。过去我们采用了这个方法，今后也要如此。一切重要的立法都要采用这个方法。这次我们采用了这个方法，就得到了比较好的、比较完全的宪法草案。

在座的各位和广大积极分子为什么拥护这个宪法草案呢？为什么觉得它是好的呢？主要有两条：一条是总结了经验，一条是结合了原则性和灵活性。

第一、这个宪法草案，总结了历史经验，特别是最近5年的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它总结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革命的经验，总结了最近几年来社会改革、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政府工作的经验。这个宪法草案也总结了从清朝末年以来关于宪法问题的经验，从清末的“十九信条”起，到民国元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到北洋军阀政府的几个宪法和宪法草案，到蒋介石反动政府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一直到蒋介石的伪宪法。这里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比如**民国元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那个时期是一个比较好的东西，当然，是不完全的，有缺点的，是资产阶级性的，但它带有革命性，民主性。**这个约法很简单，据说起草时也很仓卒，从起草到通过只有一个月。其余的几个宪法和宪法草案，整个说来都是反动的。我们这个宪法草案，主要是总结了我国的革命经验和建设经验，同时它也是本国经验和国际经验的结合。**我们的宪法是属于社会主义宪法类型的。我们是以自己的经验为主，也参考了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宪法中好的东西。**讲到宪法，资产阶级是先行的。英国也好，法国也好，美国也好，资产阶级都有过革命时期，宪法就是他们在那个时候开始搞起的。我们对资产阶级民主不能一笔抹杀，说他们的宪法在历史上没有地位。但是，现在资产阶级的宪法完全是不好的，是坏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宪法尤其是欺骗和压迫多数人的**。**我们的宪法是新的社会主义类型，不同于资产阶级类型。我们的宪法，就是比他们革命时期的宪法也进步得多。我们优越于他们。**

第二、我们的宪法草案，结合了原则性和灵活性。原则基本上是两个：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我们的民主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而是人民民主，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的原则贯串在我们整个宪法中。另一个是社会主义原则。我国现在就有社会主义。宪法中规定，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这是原则性。要实行社会主义原则，是不是在全国范围内一天早晨一切都实行社会主义呢？这样形式上很革命，但是缺乏灵活性，就行不通，就会遭到反对，就会失败。因此，一时办不到的事，必须允许逐步去办。比如国家资本主义，是讲逐步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是只有公私合营一种形式，而是有各种形式。一个是“逐步”，一个是“各种”。这就是逐步实行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以达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是原则，要达到这个原则就要结合灵活性。灵活性是国家资本主义，并且形式不是一种，而是“各种”，实现不是一天，而是“逐步”。这就灵活了。现在能实行的我们就写，不能实行的就不写。比如公民权利的物质保证，将来生产发展了，比现在一定扩大，但我们现在写的还是“逐步扩大”。这也是灵活性。又如统一战线，共同纲领中写了，现在宪法草案的序言中也写了。要有这么一个“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可以安定各阶层，安定民族资产阶级和各民主党派，安定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还有少数民族问题，它有共同性，也有特殊性。共同的就适用共同的条文，特殊的就适用特殊的条文。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有自己的特点。少数民族经济特点是什么？比如第5条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现在有4种，实际上我们少数民族地区现在还有别种的所有制。**现在是不是还有原始公社所有制呢？在有些少数民族中恐怕是有的。我国也还有奴隶主所有制，也还有封建主所有制。**现在看来，奴隶制度、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都不好，其实它们在历史上都曾经比原始公社制度要进步。这些制度开始时是进步的，但到后来就不行了，所以就有别的制度来代替了。宪法草案第70条规定，少数民族地区，“可以按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所有这些，都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结合。

这个宪法草案所以得到大家拥护，大家所以说它好，就是因为有这两条：一条是正确地恰当地总结了经验，一条是正确地恰当地结合了原则性和灵活性。如果不是这样，我看大家就不会赞成，不会说它好。

这个宪法草案是完全可以实行的，是必须实行的。当然，今天它还只是草案，过几个月，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就是正式的宪法了。今天我们就要准备实行。通过以后，全国人民每一个人都要实行，特别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要带头实行，首先在座的各位要实行。不实行就是违反宪法。

我们的宪法草案公布以后，将会得到全国人民的一致拥护，提高全国人民的积极性。**一个团体要有一个章程，一个国家也要有一个章程，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根本大法。用宪法这样一个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使全国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使全国人民感到有一条清楚的明确的和正确的道路可走，就可以提高全国人民的积极性。**

这个宪法草案公布以后，在国际上会不会发生影响，在民主阵营中，在资本主义国家中，都会发生影响。在民主阵营中，看到我们有一条清楚的明确的和正确的道路，他们会高兴的。中国人高兴，他们也高兴。资本主义国家中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如果看到了，他们也会高兴的。当然也有人不高兴，帝国主义、蒋介石都不会高兴的。你说蒋介石会不会高兴？我看不需要征求他的意见就知道他是不高兴的。我们对蒋介石很熟悉，他决不会赞成的。艾森豪威尔总统也不高兴，也要说它不好。他们会说我们这个宪法是一条清楚的明确的但是很坏的道路，是一条错路，什么社会主义、人民民主，是犯了错误。他们也不赞成灵活性。他们最喜欢我们在一天早晨搞出个社会主义，搞得天下大乱，他们就高兴了。中国搞统一战线，他们也不赞成，他们希望我们搞“清一色”。我们的宪法有我们的民族特色，但也带有国际性，是民族现象，也是国际现象的一种。跟我们同样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的国家很多，人口在世界上占多数，我们有了一个革命的宪法，人民民主的宪法，有了一条清楚的明确的和正确的道路，对这些国家的人民会有帮助的。

我们的总目标，是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我们是一个6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械化，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究竟需要多少时间？现在不讲死，大概是3个“五年计划”，即15年左右，可以打下一个基础**。到那时，是不是就很伟大了呢？不一定。**我看，我们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大概经过50年即10个“五年计划”，就差不多了，就像个样子了，就同现在大不一样了。**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台拖拉机都不能造。牛皮不要吹得太大，尾巴不要翘起来。当然，我不是讲，能造一辆，尾巴就可以翘一点，能造十辆，尾巴就可以翘得高一点，随着辆数的增加，尾巴就翘得更高一些。那是不行的。**就是到50年后像个样子了，也要和现在一样谦虚。如果到那时候骄傲了，看人家不起了，那就不好。100年也不要骄傲。永远也不要翘尾巴。**

我们的这个宪法，是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但还不是完全社会主义的宪法，它是一个过渡时期的宪法。我们现在要团结全国人民，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和应当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这个宪法就是为这个目的而写的。

最后，解释一个问题。有人说，宪法草案中删掉个别条文是由于有些人特别谦虚。不能这样解释。这不是谦虚，而是因为那样写不适当，不合理，不科学。在我们这样的人民民主国家里，不应当写那样不适当的条文。不是本来应当写而因为谦虚才不写。科学没有什么谦虚不谦虚的问题。搞宪法是搞科学。我们除了科学以外，什么都不要相信，就是说，不要迷信。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死人也好，活人也好，对的就是对的，不对的就是不对的，不然就叫作迷信。要破除迷信。不论古代的也好，现代的也好，正确的就信，不正确的就不信，不仅不信而且还要批评。这才是科学的态度。

会议通过表决的方式，一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和《关于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决议》。

会议结束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正式公布，交付全国人民讨论。

6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在全国人民中广泛地展开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社论。此后，在近3个月的时间内，总共有一亿五千多万人参加了讨论。广大人民群众热烈拥护这个宪法草案，同时提出了许多修改和补充的意见。还有人提议将这部宪法命名为“毛泽东宪法”，被毛泽东断然拒绝了。

6月18日，中共中央发布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处理受刑事处分的共产党员党籍问题的规定》，内容如下：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省市委，中央、军委各部，政府各党组，各大军区、志愿军：

在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内，共产党的利益和国家法律和法令规定的国家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共产党员不仅要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同时还要成为国家法律和法令的模范遵行者。**共产党员不能有任何为国家法律和法令所不允许的行为，这种行为也就是损害党的利益、为党的纪律所不允许的**。为了严肃党纪、国法，为了保持党在人民中间的崇高威信和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对于受国家刑事处分的共产党员的党籍处理问题，特作如下规定：

一、凡共产党员因违犯国法，经法院审判，确定给予刑事处分时，在判决之前，即应开除其党籍。

二、对于那些并非由于品质恶劣、有意破坏国法，但其所犯错误和罪行须受刑事处分的党员，也应开除其党籍。**如果他在犯罪之前，思想和工作一贯表现好，在犯罪之后对其错误也有正确地认识和深刻地悔悟，在刑期满后，经过本人申请，经过上级党委审查，可准其重新入党。**

三、对于某些判处2年和2年以下徒刑，且经宣告缓刑不予监禁、管制或判处其他更轻的刑罚者，可考虑不开除其党籍，但必须给予适当的党纪处分。

四、**党中央、中央组织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以及各地党的组织过去对这一问题所作的规定、答复、解释等，凡与本规定有抵触者，一律作废。**

五、这类案件过去已作处理者，原则上不再变动。

（本规定许可登党刊。）

1954年6月18日

6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2次会议决定：增补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增补徐海东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6月24日，毛泽东给堂弟毛泽荣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胜五弟：

你给我的信都收到了，很高兴。江青病情略有进步，她对你的关怀，甚为感谢。孩子们都好。你们都好吗？

祝进步

毛泽东 1954年6月24日

1954年7月2日晚，毛泽东派人到北京俄语专科学校留苏预备部把王鹤滨叫到中南海。王鹤滨走进毛泽东的卧室，毛泽东正侧身躺在床上，在床头桌上的台灯下看书，见他回来了，马上合起书放在床头，从床头桌上拿起香烟、火柴，燃起了一支烟，吸了一口。王鹤滨习惯地拉过一把木质靠背椅子坐下来。毛泽东一边吸烟，一边慢慢地说：

“王医生，要出国学习啦，去多久啊？”

王鹤滨说：

“我想把基础打得扎实一些，从头学起，用上6年的时间，从大学一年级学起。”

毛泽东沉思了一下，又慢慢地说了一句：

“时间太长了！”

原来，王鹤滨在去年向毛泽东提出想到苏联留学的时候，毛泽东舍不得让他走，说：“王医生，我需要你在我这里工作啊！”当王鹤滨第3次提出请求时，他才答应了。现在，王鹤滨听到毛泽东说时间太长了，就马上改口，说：

“主席，那我就去报考研究生，时间短些，是3年。”

毛泽东仍旧显得很沉闷，慢慢地吸着烟，没有再说什么。王鹤滨要告辞了，毛泽东说：

“王医生，你去留苏预备班找一个同学。我接到她的一封信，要求见见我，她是一个革命烈士的后代，你找到她后，把她领来见我。”

说毕，他把一封信交给了王鹤滨。王鹤滨回到学校，按着写信人的姓名、班次，找到了一位女生。这位女生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在湖南一师的老同学、老战友陈昌也就是陈章甫烈士的女儿陈文新。王鹤滨掏出毛泽东给他的信，亮到陈文新面前，问道：

“这是你给毛主席写的信吗？”

陈文新惊奇地瞪大了眼睛，说：

“是我写的呀！怎么到你手里去了呀？”

王鹤滨说：

“毛主席叫我通知你，明天去见他。”

陈文新闻听此言，乐不可支，又是跳，又是鼓掌，叫道：

“真好呀！真好呀！”

7月3日下午3点半，陈文新被王鹤滨带到毛泽东家里作客。她被领进一间孩子们的卧室里，那间房子里的陈设很简陋，摆着一张湖南农民家常见的木板双人床，一张旧方桌，4条长板凳。房子里有毛泽东的女儿李敏、李讷，侄子毛远新，还有叶子龙等人。一会儿，毛泽东来了，陈文新迎了上去。毛泽东握着陈文新的手，对儿女们说：

“认识她吗？1951年来过的。她是武汉大学学农业的，你们也要去学农。”

5时左右，毛泽东和他的一家人及客人，乘车到了京郊的一个旧式别墅（据王鹤滨说，这里是万寿路的新六所，毛泽东有时在周末来这里小住）。毛泽东和陈文新、王鹤滨一起，在一栋陈旧的两层楼前的树丛旁的藤椅上坐下来。毛泽东问了陈文新很多问题，像土壤结构，培肥地力，土壤的矿物质成份，植物营养吸收和中南地区的土壤改良，还问了全国学土壤学的人数。他说：

“要增产，不研究土壤怎么行呢！应该有更多的人学农。”

陈文新对于土壤改良，很推崇苏联的草田轮作制。毛泽东说：

“不行！现在农民一个人才二三亩地，怎么轮作？饿着肚皮不吃饭？现在没有畜牧业，牧草怎么处理？”

他留陈文新和王鹤滨一起吃晚饭，饭菜比较简单，有湖南人爱吃的苦瓜炒辣椒。他指着这道菜说：

“辛苦！辛苦！”

陈文新要告别了，毛泽东招呼她说：

“来，合个影吧。”

毛泽东站在新六所住房的东侧，面朝西，对着夕照的阳光，陈文新站在毛泽东的左侧。王鹤滨怕影响摄影师侯波取景，就往旁边退了几步。毛泽东招呼说：

“王医生，你也来呀！”

王鹤滨赶紧走过去，站在毛泽东的右手旁。像照完了，毛泽东微笑着说：

“祝你们学习胜利！”

7月6日，周恩来一行趁着日内瓦会议休会的时机回到了北京。

是日晚，毛泽东在住处同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一起，听取周恩来关于日内瓦会议情况的汇报。

7月7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出席日内瓦会议以及访问印度、缅甸和举行中越会谈等情况的报告。

周恩来报告结束后，毛泽东作了总结讲话，他说：

“周恩来同志的报告很好，我们应当同意他所讲的这些方针，并且批准代表团过去这些活动。过去两个半月的活动是很好的。我们几个国家，苏联，中国，还有朝鲜和越南，是团结得很好的，方针是正确的，活动是有成绩的。”

“在谈判中该让的就必须让，该坚持的就必须坚持。根据总方针，这些具体活动做得恰当，是可以和下来的，就可以达到联合多数、孤立极少数（就是美国人）的目的。”

“今后是会议的最后一个阶段了，继续执行这个方针，并且在有些具体问题上抓紧一点，估计可以达成协议，就可以开展一个局面。”

“**在日内瓦，我们抓住了和平这个口号，就是我们要和平。而美国人就不抓这个东西，它就是要打，这样，它就很说不过去了，没有道理了。现在要和的人多了，我们要跟一切愿意和平的人合作，来孤立那些好战分子，就是孤立美国当局，主要还是那里头急于要打仗的那一派。**美国抓住印度支那这样一个地方，这样一个战争，对这一点，我们国内有许多人还看不大清楚。为什么这样一个小地方的战争牵动全世界？就是因为美国要借这个地方做文章，借这个地方扩大战争，继续打下去。这个问题是牵动很大的，牵动了东南亚，牵动了亚洲、欧洲、美洲（比如加拿大）和澳洲。所以，有很多人就同意和平。”

“现在总的国际形势就是美国人相当孤立。这个东南亚的问题——印度支那问题解决之后，估计它的孤立会要继续发展。现在英国一大帮、法国、东南亚各国、加拿大、墨西哥，还有一些南美的国家，都是不喜欢美国的。所以，这个局势很有希望。现在，门要关死已经不可能了，而且很有一种有利的局势，需要我们走出去。”

**“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不同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这是苏联提出来的口号，也是我们的口号，现在变成艾登他们口里的话了，变成尼赫鲁他们口里的话了，他们也讲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这就是很大一个变化。这种变化，估计再有一个时期，只要东南亚这个问题和下来之后，会有个促进。所以，整个形势应当说是比较过去大为好转。因此，**我们要对许多国家，比如英国、法国、加拿大这一类国家，比如印度、缅甸这一类国家，凡是有可能的，都要进行工作。甚至像泰国这样的国家，它在我国附近，也是怕我们的，也要进行工作。”**

“美国内部也是有矛盾的。”“对美国这样的国家也不是没有文章可做。”“对美国要使它分化，使它孤立，孤立以后它总要分化的。在目前世界上这样四分五裂的形势下，一块铁板那样的事情是不可能的。它们反苏、反共，反对中国，反对人民民主国家，反对我们这个阵线，那是真的；但是，它们那个资本主义世界是很不统一的，是四分五裂的。美国现在主要的最大的目的，还是整这个中间地带，就是从日本到英国这些地方，整得这些国家哇哇叫。”“美国现在往往就是利用反对共产主义这个旗帜来把它那些朋友的地方占领起来。”

“现在美国同我们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台湾问题，这个问题是个长时间的问题。**我们要破坏美国跟台湾订条约的可能，还要想一些办法，并且要做宣传。我们要组织一些宣传，要大骂美国搞台湾，蒋介石继续卖国。**另外，在外交方面要有一种适当的表示，比如在侨民问题上的接触，目的就是迫使美国跟台湾不要订条约。我看，美国跟台湾订条约，英国也怕，也反对，法国也可能是反对的，对于它们也没有什么好处，就会成为很长时间的僵局嘛。”

“总之，**国际上我们就是执行这个方针，只要在和平这个问题上能够团结的，就和他们拉关系，来保卫我们的国家，保卫社会主义，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7月8日，周恩来在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会第57次会议上，作了关于出席日内瓦会议以及访问印度、缅甸和中越会谈等情况的报告。

毛泽东在讲话中再次肯定了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上的方针和外交成就，他说：

“同意周总理报告中所讲的外交方针——国际和平统一战线。目前在外交方面，比过去8年中间开始有了改变——和平协商达成协议。”

接着，毛泽东提出了11条意见：

“1、争取恢复印度支那和平。

2、开始建立东南亚和平区域，建立合作并发展它，订立互不侵犯条约或集体和平公约。

3、**与英国改善关系，争取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4、争取与法国改善关系，建立邦交。**

**5、争取与美国政府改善某些关系——孤立与分化。**

6、团结一切愿意和平的力量（包括政府在内），孤立和分化美国。

7、国内要团结，支持代表团，争取外交胜利。

8、国内统一战线的发展和巩固。有人怀疑圈子越搞越小，并非如此。

9、**国际和平统一战线**。

10、增强警惕。敌人要破坏和分裂我们的国内联盟和与苏新国家（指苏联和东欧新民主国家——笔者注）的和平联盟。门大开了，要团结、警惕。

11、增强外交工作阵营。为保卫建设和工业化，没有外交阵营的发展是不可能的。”

7月9日，周恩来一行带着毛泽东确定的外交方针，飞离北京，于12日返抵日内瓦。

7月21日，在日内瓦会议上，越南、老挝、柬埔寨的交战双方分别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法国政府发表了关于从印度支那3国撤军的声明，以及尊重3国的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声明。会议最后通过了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只有美国代表团拒绝在《最后宣言》上签字。历时近3个月的日内瓦会议，终于落下了帷幕。

7月23日，毛泽东给两个女儿写了一封回信。

原来在1954年学校放暑假后，江青带着李敏和李讷到北戴河休养。李敏和李讷倾听着大海的波涛，尽情地玩着，感到特别高兴。毛泽东早就说过他也要来的，可是，他却迟迟没有来。姐妹俩想念爸爸，爸爸为国家大事日理万机，想让他也来放松一下，就各自给父亲写了一封信。毛泽东收到两个女儿的来信后，便在23日的复信中写道：

李敏、李讷，我的亲爱的女儿：

你们的来信都收到了，很欢喜。北戴河、秦皇岛、山海关一带是曹孟德（操）到过的地方。他不仅是政治家，也是诗人。他的碣石诗是有名的，妈妈那里有古诗选本，可请妈妈教你们读。我好，勿念。

亲你们！

爸爸 1954年7月23日

不久，毛泽东就动身前往北戴河，专列乘务员姚淑贤奉命跟随。下午3点，毛泽东登上专列，在客厅里忽然立住脚，回头对所有的工作人员说：

“今天是礼拜六噢，你们有没有约会？”

大家都微笑着摇头。

“有。我有。”

姚淑贤脱口而出。原来她正在谈恋爱，已经和男朋友约好，晚上到中山公园会面。

“跟什么人有约会？”

毛泽东认真地看着姚淑贤，嘴角含着笑，带着亲切带着关心带着一点逗趣。姚淑贤腼腆地说：

“跟男朋友。”

毛泽东认真了，他说：

“哎约，糟糕。搅了你们的好事。”

他看了看姚淑贤，皱了皱眉头，问道：

“怎么办？你们打算在哪儿约会？”

“说好去中山公园玩，在门口见。”姚淑贤回答罢，又说：“不过没事。”

“怎么会没事呢？”毛泽东有些急了：“你告诉他了吗？”

“没有。”

“你这个小姚呐，要是不见不散怎么办？你就连个电话也没有给他打？”

“我们只要接受任务，就不能告诉其他的人。”姚淑贤解释说：“主席，没事的，我们在一个处工作，他做食品检验，一会儿到专列上来采样，就知道了，我有任务，他会理解的。”

“嗯——”毛泽东摇摇头，嘴里嘀咕着：“久了会出误会的，不要因为我而影响你们。”

晚上，姚淑贤将一捧削好的铅笔给毛泽东送去，毛泽东忽然对她说：

“小姚，你等等，有个东西你拿回去给你的朋友看看，你的朋友就不会生气了。”

说着，他挑出一支铅笔，又铺开一张16开的白纸，说：

“我给你写个东西，你拿回去交给他。再把失约的原因讲给他听。”

毛泽东说罢，就伏案书写，一边写还一边自得其乐地吟诵着：

**“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

姚淑贤看了，心情十分激动。可是，她还是忍不住小声对毛泽东说：

“主席，我们有纪律。凡是带有文字的东西都必须上交。”

“你为什么要那么老实？现在没有谁看到，我是不会打小报告的。”毛泽东笑了笑，做个手势，说：“藏起来，带给他。”

姚淑贤心里还是很不安，她向卫士长李银桥做了汇报，在得到李银桥的同意后，就把这个墨宝收藏了起来。

毛泽东来到北戴河，一边休息，一边工作。每天上午工作完毕，一身轻松，下午必然下海游泳。他有时还带着李敏、李讷、毛远新下海游泳。

入夜后，万籁俱寂，毛泽东常在松涛声中夜读，有时持卷入睡，又香又甜。

有一次，毛泽东在工作之余，带着工作人员到渤海边游泳。来到海边，他一声不响脱了衣服，只穿一条短裤，看着卫士和一中队的战士说：

“你们害怕吗？”

战士们回答：

“不害怕！”

毛泽东说：

“你们可以跟我走，也可以不跟我走，可以在岸上看，也可以回去。”

战士们回答：

“我们跟主席走，我们都不回去。”

毛泽东径直走向大海，往大海深处游去，时而跌入浪谷，时而冲出浪尖。孙勇、韩庆余和十几个战士围在他的前后左右，护卫着他。毛泽东却在浪尖上大声喊道：

“放心，都不要慌——现在是涨潮，沉住气，只有被冲上岸，不会被拖入海去。”

不一会儿，他又在浪尖上喊道：

“现在是考验你们的胆量呢！”

他在风浪中一直游了一个多小时才上岸。朱仲丽见他安全上了岸，高兴地迎了上去，说：

“主席，风浪太大，今后不要再冒这样的险了。”

毛泽东看了一眼朱仲丽，又扫视了一下战士们，说：

“**你们不要怕什么风险，凡事不冒险，就不能成功，许多成功就是通过冒险才取得的。这取决于一个人有没有勇气，敢不敢于排除万难。**我说你们要有决心和信心，**当然不是盲目地冒险。**”

此时，在北京出席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第一届第1次代表大会的湘潭地区代表毛继生、邹祖培、庞菊中，在会议即将结束时相约由毛继生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达了他们想见见毛泽东的愿望。毛泽东接到毛继生的来信后，立即吩咐秘书去北京，带他们坐火车来到了北戴河。

毛继生，1922年生于韶山冲，建国前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邹祖培，湘乡人，1925年参加过毛泽东在家乡组织的“雪耻会”，与毛泽东有过较密切的接触；大革命时期曾担任过中共韶山区委书记。庞菊中，宁乡人，抗日战争时期担任过中共潭湘宁边区县委书记。

毛泽东站在北戴河住处的门口，满面笑容地同毛继生、邹祖培、庞菊中一一握手，表示欢迎，尔后将他们引领入一间宽敞的客厅里，落坐叙话。3位客人都显得有些拘谨，毛继生更像一个刚入学的学生，很不自在，只见他脸上飞红，耷拉在藤椅下的两条腿紧紧并拢着，两手放在膝盖上一动不动。毛泽东亲切地向客人们打听起土地改革、互助组、合作社的情况，可是他问一句，客人答一句，气氛怎么也活跃不起来。3个客人也感到别扭，暗自埋怨自己：

“冇得用！想见毛主席，劲头那样大，如今真的见到了，有话讲不出。”

“乡里人进了城，难怪咧！”毛泽东这样想着，观察着大家的神情，决定转换话题，让他们放松下来，于是便用地道的家乡话问毛继生：“冲里那两棵大枞树，还在啵？”

“一棵早两年死了，一棵还在，如今长到咯样大了。”毛继生知道毛泽东问的是他家旧居附近的两棵大树，一边回答，一边伸出双手做了个合抱的姿势。同时他也感到奇怪，就问道：“主席，这么多年了，为什么还记得那两棵大枞树？”

毛泽东嘴边挂着一丝神秘的微笑，风趣地说：

“讲起那两棵树呀，还是我的救命恩人呐，还有不记得的？”

他见客人们满脸疑惑，便把他幼时与小伙伴们如何偷吃被称为“小气鬼”、“背时婆”的邻家邹四阿婆树上的果子，邹四阿婆发现后如何冷笑着挥动竹竿追打他们，他们又如何逃跑，如何分头爬上那两棵大枞树这才躲过一劫的故事，如此这般地说了一遍，直逗得3个客人眉开眼笑，拘谨也在笑声中一扫而光。毛泽东见大家乐了，又突然问毛继生：

“你是什么派？”

“我是贻字派。”毛继生回答完，又随口念出了韶山《毛氏族谱》中派序歌：“祖恩贻泽远，世代永承昌。”

毛泽东笑着说：

“这么说，你还是我的族叔啰！”

“哪里！哪里！”

毛继生红了脸。他虽然比毛泽东长一辈，但年龄却比毛泽东小了近30岁。

该吃午饭了，桌子上摆着4盘菜，一碗汤，其中一盘鸡块显然是为客人特意加的，做得特别考究。还有几样小菜则是毛继生他们带来的家乡风味腊肉、火焙鱼和豆豉辣椒。

毛泽东招呼客人一一就座，给每人斟满了一杯酒。大家高兴地喝着酒，拉着家常。毛泽东一边津津有味地吃着家乡的小菜，一边谈笑风生。他说起20多年前和邹祖培一起在韶山搞农民运动，两人一起喝过酒，知道邹祖培很有酒量，因此今天特地请人买了白酒，希望他多喝一点。

一会儿，毛泽东把江青和孩子们叫了出来，一一介绍吃饭的客人。他还指着毛继生对孩子们说：

“快叫叔公。”

毛继生怪不好意思，涨红了脸，一面摆手，一面连声说：

“不敢当，不敢当。”

毛泽东说：

“敬老尊贤还是要的，受了，受了。”

李敏、李讷、毛远新便亲热地叫了声：“叔公！”

吃完饭，毛继生3人被安排在西边一间房里休息。不一会儿，毛泽东来到他们的房间，跟在他身后的工作人员带着3个救生圈。毛泽东说：

“你们初次来这里，去的地方不多，我们到渤海湾去游泳，看看海边风光吧。”

3位客人感到又新鲜，又兴奋，便随着他一起乘车到了海边。毛泽东见刘少奇、朱德也在海边上，就叫住他们，把客人一一介绍给他们，尔后大家一起下海游泳。

第二天上午，毛泽东走进毛继生3人的房间，亲切地问他们休息得怎么样？还说：

“你们难得有机会往城里跑一跑，要看个名胜古迹更不容易。今天，我请秘书陪你们到山海关过个瘾。”

毛继生等人尽兴游览了一天，归来后3人相商：

“主席忙，再不要耽误他的时间了，我们早些回去吧。”

商议已定，他们在晚饭后就去见毛泽东，说是明天就回南方去。毛泽东挽留说：

“在乡下难得出门，到北方来更不容易，还是多住几天吧！”

毛继生说：

“我们每人都是代表县供销社来开会的，还要赶紧回去传达会议精神呢。”

毛泽东听了这话，点了点头，只好说：

“如果从工作上考虑，你们要走我也不能强留。反正权在你们手上，你们自己定。”

次日清晨，毛继生3人就要启程了，毛泽东带着工作人员来为他们送行，送给每人半条大前门香烟，每人一篓桃子。又给邹祖培、庞菊中各送了一个箱子，一根手杖，一双皮鞋。

“没有好东西，送你们几件衣裳吧。”毛泽东客气地对邹祖培、庞菊中说。他转对毛继生笑了笑，亲切地问道：“过去一个长工好多谷一年？”

毛继生想了想，回答说：

“精壮劳力12担谷。”

“乡里好多钱一担谷？”

“6元多钱一担。”

毛泽东计算了一下，微笑着说：

“啊，你现在一个月就相当于过去一个长工一年的工资咧。”

毛继生毕竟是年轻人，脑子灵泛，他马上意识到：主席一定是怕我少了一口箱子有意见咧。邹祖培、庞菊中都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主席多送点东西给他们，这一番心意我是理会得了的，便说道：

“我是年轻人，家里又冇得负担，政府每月给我的钱，我都用不完哩！”

毛泽东听了，十分高兴，便语重心长地嘱咐他说：

“要好好为群众办事。”

说罢，与3位客人一一握手。邹祖培深情地说：

“主席已经有二十六七年冇得回去了，现在家乡人民生活好了，都念着您，欢迎您回去看看呢！”

“难为家乡人的好意啊！”毛泽东微笑着说，接着又摇摇头：“我现在大不大，细不细，是个主席，回去一趟不容易呀！”

1954年8月6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送来的华南分局的一份电报上作了批示。电报中说：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有代表提出提案，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予毛泽东主席最高荣誉勋章。毛泽东批道：

“请即复，不要通过此项议案。”

8月13日，即农历七月十五，毛泽东一夜未睡，待工作完毕，已经是晨光破晓。他要到室外新鲜空气中去散步，带着工作人员到海边去观潮落。

大家捡了许多贝壳，而毛泽东则看着水平如镜的汪洋大海，想的是这狂暴的海洋的平息时刻也很有趣嘛！何不下去一游？身边的人劝道：

“主席工作了一夜，还未吃早饭，早晨水凉，早点回去休息吧。”

毛泽东主意既定，不听劝说就解衣下水，工作人员清早出来，没有游泳的思想准备，穿着衬裤就跟着毛泽东下了海。毛泽东一直游到防鲨网边，工作人员劝他往回游，他说：

“怕什么，我们这么多人，还怕鲨鱼？”

说着就游出了防鲨网，还一直向前，时而平卧水面，仰望蓝天；时而滚动戏水，悠然自得。看看旭日东升，不觉已经游出七八里远。毛泽东望见正前方有一只小船，游近一问，方知是一只渔船，叔侄二人捕蟹为生，已捉到两篓螃蟹。工作人员商量说：

“主席未吃早饭，腹中空空，正好买了蟹，请主席上岸吃螃蟹。”

毛泽东同意了，大家十分高兴，于是请毛泽东上了捉蟹人的小船。毛泽东光着身子，渔民也分辨不清他是谁。毛泽东问起叔侄二人的生活情况，渔民一一道来。及至工作人员照顾毛泽东上岸，两位渔民才认出了毛泽东，惊喜非常，说是这回总算见到人民的大救星了，非要把螃蟹送给毛主席不可。毛泽东表示了感谢，让工作人员收下螃蟹，照价付款，还请他们叔侄二人一同上岸吃螃蟹。渔民说：只知道共产党毛主席帮助我们穷苦人民翻了身，从没有想到还能亲眼见到毛主席！我们请毛主席还请不到，哪里还能让毛主席请吃螃蟹。

众人说着话，来到了浴场的大厅里。不久，服务人员就端上来刚做好的螃蟹，毛泽东和大家一边吃一边聊，谈笑风生，好不畅快。

吃罢螃蟹，那叔侄二人执意不肯收钱，他们说：毛主席的恩情我们无法报答，这点螃蟹算什么。我们能不能和毛主席照个相，留个纪念。

毛泽东答应了，和他们照了相，又让工作人员说服他们收了钱。那两个渔民方才高高兴兴地去了。

欲知毛泽东在北戴河期间还有什么惊人之举，请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54年6月14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0次会议上说：“**我们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大概经过50年即10个‘五年计划’，就差不多了，就像个样子了，就同现在大不一样了。”**实际上，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到七十年代中后期，仅仅用了20多年时间，中国就已经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了！远远超过了毛泽东的预期。可世上的事情从来都是祸福相依的，在“**大不一样”的情况出现以后，**党会怎么样？人民又怎么样？可能就大大地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了。

**第5章**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

**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将我国建设**

**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

话说1954年8月中旬，北戴河一连几天刮着大风，又不停地下暴雨，大海里白浪滔天，那隆隆的咆哮声，在屋子里都能听到，很多人都到海边去观看大海潮，但却没有人敢下海游泳。此时的毛泽东显得很激动，他掷下手中的毛笔，站起身说：

“我们去游泳！”

“不行啊，绝对不行！”保健医生徐涛吓了一跳，拦在毛泽东面前说：“主席，这不是小事，也不是您个人的事，我必须向全党全国人民负责。”

卫士们闻声也全都出来挡在前面。毛泽东虽然固执，但他一看全体工作人员像铁板一块，没有一个支持者，也就只好退让了。

那几天，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十分紧张，生怕毛泽东一个人溜到海边去。汪东兴要求大家看好他，并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要求毛泽东身边的人一刻不离地跟着毛泽东，绝对不许发生意外。

这一天下午，雨终于停了，徐涛反而更紧张，他料到毛泽东会闹着去游泳，便匆匆赶往海边去观察，只见白浪滔天，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负责测量水温的人报告说：水温19度！不到20度！

下午4点多，天还阴沉着，北戴河的海面上依然是狂风肆虐，洪波涌起，银山万叠。已经几天没有游泳的毛泽东坐不住了，放下笔，对卫士们说：

“走，我们到海边去。”

李银桥说：

“不行！主席，今天还不能游。”

“雨停了！”

毛泽东有些不耐烦了。李银桥说：

“天可没晴，随时还会下。”

“这个房子还可能地震塌下来呢！”

毛泽东生气了，他早已忍无可忍。李银桥忙请徐涛出面，徐涛是知识分子，毛泽东对他总是客气一些。徐涛劝道：

“主席，水很凉，会抽筋的。”

“我不怕冷。就你们怕冷，你们别游嘛。”

“那也不行，浪太大。岸边的浪有1米多高，海里的浪会有3米高！”

“好么，乘风破浪，正是机会！”他见卫士们不动身，又说：“听见没有？鞋子！”

徐涛说：

“主席，下海是顶风，几个年轻战士试过了，都被浪打回来，根本冲不过去。”

“一个人冲不过去，这么多人还冲不过去？岂有此理！”

毛泽东气冲冲地往外走。

“不行！”徐涛情急之下，一把扯住他说：“主席，我还没有说完，浪太大，贝壳全冲到岸边了，不少都是又破又尖，会扎伤脚的。”

毛泽东甩一下手，说：

“我从小打赤脚，就不上山砍柴了？叫你说的！”

“我还没说完，贝壳冲上来一堆一堆的，容易绊脚。您岁数大了，摔一跤我受不了，担不起责任。李维汉同志就摔断了腿。今天天气这样恶劣，说什么也不能让你去……”

徐涛这话不说还好，一说出来反而更糟，“岁数大”、“摔跤”这些话对毛泽东来说，只能起到一个“激将”的作用。毛泽东动怒了，只听他吼道：

“他摔跤我就一定要摔跤？你这么说，我今天就非去不可！”

毛泽东那灼灼的目光和紧抿着嘴唇的沉默，吓得卫士们谁也不敢拦挡了，只好匆匆带上泳裤、毛巾和急救药箱，追随左右。毛泽东往身后看了一眼，给游泳高手孙勇使个眼色。孙勇急忙跟上，说：

“主席，我们不要走远了，天气预报说，今天有雷阵雨。”

孙勇见劝阻不住，只好随着他到海边去看看，以为他一见那狂吼怒号的海浪，就不会下海了。

毛泽东和众人来到海边，天空突然暗了下来，只见那排山倒海的巨浪由远而近，冲到海岸，好像那道蜿蜒的长城，铺天盖地倾倒在岸上，使人眼花缭乱，感觉透不过气来。毛泽东看得特别高兴，嘴里不住地念叨：

“这才算得上大风大浪嘛！正好斗它一斗！”

他回首对孙勇说：

“你先下去看看。”

孙勇闻言，不敢怠慢，脱了外衣，纵身跃入海里。李银桥一看毛泽东要下海了，就劝道：

“主席，风大浪大，不要下去游泳吧？”

毛泽东豪迈地说：

“风浪越大越好，可以锻炼人的意志。”

他一边说一边准备下海。他和几个卫士刚走到海边，猝不及防被突然冲来的一个大浪给打倒了，他们立刻爬起来。李银桥急了，知道自己无法阻止，只好派一个战士去海滨搬兵。汪东兴闻报，马上给周恩来打电话。周恩来的卫士张永池拿起话筒一听，是汪东兴的声音，只听他急得嗓子都变调了：

“主席下海了！下海游泳去了！我们拦不住！快！快请总理，请总理马上来，我们叫不上来！”

张永池扔下电话就往总理办公室跑，大喘着气报告说：

“总，总理，主席下，下海游泳去了！”

周恩来正在批阅文件，闻声忽地立起身，把笔一扔就朝外跑，大声喊道：

“快，叫司机！快开车！”

周恩来赶到海边，朱德、杨尚昆也都赶来了，他们远远地使劲喊：

“不要下了，不要下了！”

他们一边喊，一边向毛泽东跑来。周恩来声嘶力竭地喊着：

“主席，上来吧！我是周恩来——”

可是他们的喊话毛泽东根本听不到，打招呼也看不见，眼睁睁地看着毛泽东又带着一群战士冲了下去，在一人多高的浪花中钻进海里。此时四处雷声不断，暴雨劈头盖脸地洒下来。周恩来、朱德等人无可奈何，也只好作壁上观了。

毛泽东一入大海，立刻游向大海的深处，在大浪小浪的参差起落中，硕大的身躯时而被浪头举到高空，时而又落入深谷。他对身边的一个战士说：

“不要怕，海水就是被子，我们钻进了棉花套里了！”

正说着话，他突然被海水冲到了一个战士身上，这个战士正想拉他一把，又一个浪头把他俩打开了。此时，突然有一条破船在浪中翻滚。毛泽东担心地说：

“我刚才看见了几个打鱼的，不知道出事了没有？”

一个战士说：

“不会的，这只船刚才靠到岸边的，上面没人，是被水卷到这里了。”

毛泽东说：

“那就好。”

一个战士说：

“主席，雨太大了。”

毛泽东说：

“没关系，雨大了多在脸上抹几把！”

风停雨住了，毛泽东等人早已游过了防鲨网，时隐时现。这可吓坏了岸上的人，他们提心吊胆，目瞪口呆。

毛泽东一群人不知游了多久，终于像得胜的英雄，尽兴而归。岂知下海不容易，上岸更难。毛泽东被卫士们簇拥着好不容易上得岸边，又一个巨浪扑来。毛泽东还想斗它一斗，站好骑马式，准备用右肩抗过去，谁知浪头一来，一下子竟把他冲到了几米以外，倒在了一个卫士身上。周恩来见毛泽东身上刮出了一道道血痕，就说：

“快上来，快上来！”

毛泽东上了岸，甩打着身上的水，不住地说：

“今天真畅快！今天真畅快！”

众人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毛泽东在那一片汪洋中畅游了一个多小时，上了岸依然精神抖擞，不知疲倦。朱德说：

“主席偏偏游了这段风险时间。”

毛泽东却说：

“秋风萧萧，洪波涌起，算不了什么！”

他坐在沙滩上，点着了一支烟，吸了几口，又说：

“征服急难险恶，你强它就弱，不能怕，一怕，喝上几口水，就胆怯了，就被海水制服了你！**大凡世界上凶恶的东西也是这样的，你表现得怯懦，你就会遭到凌辱。世界上一切反动派看起来样子是可怕的，其实并没有什么了不起。**”

朱德说：

“主席善于联想，当年你骑在马背上，就一步三叹：‘惊回首，离天三尺三。’”

周恩来说：

“还有：‘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

毛泽东说：

“那是过去，那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大志。”

周恩来说：

“今天总算可以了吧？我们叫都叫不住。”

毛泽东说：

“我一个心思斗海浪，思想高度集中，哪里听见你们叫。”

毛泽东在数次游泳中，已经在心中孕育出了一篇著名的诗词。第二天，他欣然命笔，写出了《浪淘沙·北戴河》：

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鱼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

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8月17日，高岗在被管教（因其第一次用手枪自杀，刘少奇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决定对他实行管教）的楼上服食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

据他的秘书赵家梁说：“1954年8月，高岗已被管教半年。他写给中央的《我的反省》已交上去100多天了，一直没有回音。从7月初开始，电台陆续广播各地人大代表的名单，他仔细地收听着，注意是否有他的名字。他的心情越来越焦躁不安，终日心事重重，少言寡语，行为乖戾。”赵家梁所说的这种情况，可能就是他绝望自杀的直接原因。

周恩来得知高岗自杀的消息后，和陈云、彭德怀、邓小平、杨尚昆等先后到了现场，由周恩来提名的与高岗熟悉且在一起工作过的19位领导者也到现场勘验，尔后，由几名医生对高岗遗体进行解剖检验，验明其确系服用过量安眠药自杀。

后来在9月1日，中共中央以主席毛泽东的名义向苏共中央作了通报。通报中说：

“在最近半年，根据中共各个地方党的组织所揭发的材料，更加证实了高岗的罪行。但是，高岗在被管教的这一期间，却仍然毫无悔悟表现，反而于8月17日，实行第2次自杀，充分暴露了他坚持仇恨党的立场和自绝于中国人民。

高岗死后，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以便确切查清他的死因。根据医生所做的临床诊断、尿便化验、病理剖检的各项结果，和公安工作同志调查、现场检查情形等，可以肯定高岗确实自杀，是服用多量安眠药致死的。同时，从其它各方面所做的进一步调查，亦证实了高岗在他的阴谋被揭穿后，早就有意识地积存安眠药和准备用这种办法实行自杀。”

8月24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了英国工党领袖、前首相艾德礼（本传前面已经说过，毛泽东在1937年11月1日给他写了一封亲笔签名的寻求英国帮助中国抗战的信）率领的工党访华代表团。工作人员见他穿着一条屁股上扎满了罗纹补丁、膝盖等处磨得发白的裤子，劝他换一条，他说：

“不要紧，谁看我后面呢？”

英国工党创建于1900年，**是第二国际的成员**之一。**工党自称要寻求一种不同于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工党领袖艾德礼出任英国首相。这是工党第3次执政，**对内采取高福利的政策，在一些重要公交等部门推行国有化；对外奉行追随美国的方针。**

且说英国工党代表团参加会见的还有比万、萨末斯基尔、菲利普斯等；中方参加会见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李济深、章伯钧、黄炎培、张奚若等。毛泽东在谈话中说：

“从第2次世界大战开始以来，中英关系已经根本改变。虽然并不是说我们之间没有争论，没有不同意见，也不是说我们两国的制度没有不同之处。”“在我们和你们之间，基本的争论是不多了。是不是？这是基本问题。我们和法国的关系同样是这样。”

接下来，工党领导人着力宣传他们的社会主义。毛泽东则心平气和、语调平缓，摆事实，讲道理，在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毫不含糊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尔后，客人问道：

“你们能不能与这样的社会主义（指工党的社会主义——笔者注）和平共处和合作？”

毛泽东说：

“我认为可以和平共处。这里发生一个问题，难道只能和这种社会主义共处，不可以和别的事物共处吗？不可以和非社会主义的事物，像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封建王国等共处吗？我认为，回答也是肯定的，只需要一个条件，就是双方愿意共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认为，**不同的制度是可以和平共处的。**”“我们走的是两条路。**让我们做朋友吧，不仅在经济上合作，而且在政治上也合作。**在日内瓦会议上，中、苏、英、法4国，还有越南民主共和国，就能合作，因为我们有共同要求。”

客人又问：

“你看国际形势可能怎样发展？”

毛泽东说：

“我看现在的国际形势是好的，日内瓦会议以后有了一些改变。有些人批评说，你们到中国来会上当，主要是美国这样说。我看你们以不听他们的话为好。历史是以若干年为单位来计算的，不能以一时的议论为准，不能听那么多。

中国是一个正在开始改变面貌的落后国家，经济上、文化上都比西方国家落后。但是现在正在开始改变面貌，已经取得了改变的可能性。**中国是农业国，要变为工业国需要几十年，需要各方面帮助，首先需要和平环境。经常打仗不好办事，养许多兵是会妨碍经济建设的。**如果诸位同意的话，我们要继续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我想，这也是英国、法国所需要的。我们的国家现在还很穷，如果能得到几十年和平就好了。”“**有两个基本条件使我们完全可以合作：一、都要和平，不愿意打仗；二、各人搞自己的建设，因此也要做生意。**和平，通商，这总是可以取得同意的，对不对？”

“太平洋不太平，根源主要在美国。美国人做的事太不像样子，他们支持蒋介石差不多每天都骚扰大陆。所以你们最好劝劝美国人把第7舰队拿走。几条船好办，一拿就走了。他们是违反国际形势、违反历史的。他们只是美国的少数人，如杜勒斯之流。我们希望工党朋友们劝劝美国人：一、把第7舰队拿走，不要管台湾的事，因为台湾是中国的地方。二、不要搞东南亚条约，这也是违反历史的，要搞就搞集体和平公约。三、不要武装日本，武装日本的目的是反对中国和苏联，最后会害自己和西南太平洋各国，这是搬石头打自己的脚，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四、不要武装西德，武装结果不是好事，也会是搬石头打自己的脚。”

“希望美国也采取和平共处的政策。美国这样的大国如果不要和平，我们就不得安宁，大家也不得安宁。”

这次长达3个小时的会见就这样结束了。

1954年9月4日，西藏人大代表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抵达北京，受到了朱德、周恩来和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热烈欢迎。

9月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宪法起草委员会第8次会议，对宪法草案作了最后一次讨论和修改。

9月11日下午3时许，毛泽东穿着一件洗得有点发白的中山装，神采奕奕，在中南海勤政殿等待两位特殊的客人。不久，两辆吉斯车一前一后准时开到勤政殿前，14世达赖和10世班禅精神焕发地走了下来。刚进大门，达赖看见一个身材魁伟、满面笑容的人向他伸过手来。尽管是第一次见面，他一眼就认出了毛泽东，忙拿出早已准备好的哈达，躬身献给毛泽东。毛泽东双手接过哈达，表示谢意后交给身边工作人员。他转过身来向达赖伸出大手，动情地说：

“欢迎你哟，达赖喇嘛！我们等你好久喽，很早就想请你到北京来。”

“毛主席好！谢谢毛主席的邀请。”

达赖紧紧握住毛泽东的双手，激动地说着。毛泽东微笑着答道：

“好，好，达赖喇嘛身体也好吧？”

达赖感激地说：

“好，好，谢谢毛主席的关心。”

毛泽东接受班禅敬献的哈达后握住他的手说：

“班禅额尔德尼，你好哇！你是第二次来北京，我们见过面，已经是老朋友了嘛！”

班禅高兴地说：

“毛主席好！您的身体还是这么健康！”

“托新中国的福，身体还不错。”

毛泽东说完，一一介绍刘少奇、宋庆龄、张澜等领导人与达赖、班禅见面。

9月1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临时会议，对即将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的宪法草案做最后审议。

毛泽东首先讲话，对全国人大代表提出的两项修改意见作了说明：一是在序言中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后面加上“第1次会议”，将“庄严地通过我国的第一个宪法”改为“庄严地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二是根据西藏代表的意见，将总纲中“各民族……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的自由”一句中的“和改革宗教”5个字删去。

会议通过表决，一致通过了这两处修改。毛泽东说：

“这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宪法了。最先是中共中央起草，然后是北京500多高级干部讨论，全国8000多人讨论，然后是3个月的全国人民讨论，这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000多人又讨论。宪法的起草算是慎重的，每一条、每一字都是认真搞了的，但也不必讲是毫无缺点，天衣无缝。这个宪法是适合我们目前的实际情况的。它坚持了原则性，但是又有灵活性。”

“宪法不是天衣无缝，总是会有缺点的。‘天衣无缝’，书上这样说过，但天衣我没有看见过，也从没有从天上取下来看过。我看到的衣服都是有缝的，比如我穿的这件衣服就是有缝的。宪法，以及别的法律，都是会有缺点的，什么时候发现就及时修改。反正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一年一次，随时可以修改。”

“我们在座的各位是不是圣人？要说是圣人嘛，圣人就多得很；要说不是圣人嘛，我看圣人也就一个没有。人总是有缺点的，总是要犯错误的，只是不要错得太多就是了。比如当主席，说10句话错了6句，错了60%，那他的主席就当不成了。要说一句话都不错，没有那回事。**写文章，总是改来改去，如果不错，何必改呢**？作一篇文章，往往要犯很多错误。过去我到过上海，上海那个地方很复杂，我经常走错路，总是犯错误。**凡是我有了错误，希望能及时得到朋友们的批评和纠正。一个人总是会有许多缺点的。如果觉得自己一点缺点也没有，‘老虎屁股摸不得’，那就不好了。要做到‘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我们是靠老实吃饭，不靠摆架子吃饭。**当然，在帝国主义面前，在艾德礼等人面前，还是可以‘摆摆架子’的。但靠摆架子吃饭就不好了。如果我们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就说不得，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领导人物就说不得，那就不好了。对孔夫子，自董仲舒以来，就说不得了，‘非圣诬法，大乱之殃’。我们不能这样，我们要实事求是。我们对一切事物都要分析：好，就肯定；不好，就批评。”

毛泽东在讲话中还首次说到了郭沫若在学术上的问题，他说：郭沫若用很多材料证明孔夫子是“革命党”。

毛泽东所说的郭沫若的论证，源自郭沫若的《十批判书》，该书是郭沫若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分期问题和古代诸子思想的10篇论文集。此书于1945年上半年在重庆首版发行，1954年改排出版。毛泽东最早于何时读过《十批判书》，已经不得而知。但他在此时已经读过《十批判书》，则是肯定无疑的了。

后来，《十批判书》于1959年发行新一版，1961年编入《沫若文集》，1976年重印此书。毛泽东的书房中收藏有《十批判书》，他在1959年外出时，还让工作人员带上此书，以便随时查阅。后来，他还经常阅读此书，并在多次讲话中涉及到郭沫若的观点。此是后话，待以后详细表述。

再说在全国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开幕前夕，张治中听说毛泽东不准备讲话，就通过周恩来和彭真转述他的意见，建议毛泽东讲话。后来，周恩来、彭真告诉张治中，毛泽东仍然不愿意讲话。于是，张治中就直接去找毛泽东，他说：

“这次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人民大会，您是国家主席，开幕时是主持人，怎能不讲话？”

毛泽东说：

“就是你一个人希望我讲话。”

张治中说：

“不，不是我一个人，是全体代表，全国人民都希望听到您的讲话。”

毛泽东还是不同意讲话。

9月15日下午3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

第14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和第10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作为西藏代表参加了会议。阿沛·阿旺晋美作为西藏代表之一和达赖喇嘛随行官员领导小组负责人，出席会议并协助达赖喇嘛处理政治事务。

毛泽东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词，他说：

各位代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今天在我国首都北京举行。

代表总数1226人，报到的代表1211人，因病因事请假没有报到的代表15人，报到了因病因事今天临时缺席的代表70人。今天会议实到的代表1141人，合乎法定人数。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负有重大的任务。这次会议的任务是：制定宪法；制定几个重要的法律；通过政府工作报告；选举新的国家领导工作人员。

我们这次会议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这次会议是标志着我国人民从1949年建国以来的新胜利和新发展的里程碑。**这次会议所制定的宪法将大大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

**我们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援，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为了保卫国际和平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

我国人民应当努力工作，努力学习苏联和各兄弟国家的先进经验，老老实实，勤勤恳恳，互勉互助，力戒任何的虚夸和骄傲，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国家。（热烈鼓掌）

**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热烈鼓掌）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热烈鼓掌）

**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热烈鼓掌）

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热烈鼓掌）

**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鼓掌）

**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鼓掌）

全中国6万万人团结起来，为我们的共同事业而努力奋斗！（热烈鼓掌）

我们的伟大的祖国万岁！（长时间的热烈鼓掌）

齐白石老人怀着兴奋的心情，出席了大会，聆听了毛泽东的开幕词。在会议休息时，毛泽东幽默地对张治中说：

“你胜利了。本来不准备讲话，只因开幕式我是主持人，不能不说几句，谁知一拿起笔来越写越多，就成了一篇讲话了。”

这一天，刘少奇受宪法起草委员会的委托，在会上作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报告》。

是日晚，贺子珍和嫂嫂李立英坐在收音机旁，一起收听中央广播电台关于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开幕式的实况转播，毛泽东致开幕词的录音使贺子珍一下子惊呆了。这声音对她来说是多么熟悉，又是多么遥远！李立英赞叹地说：

“毛主席的声音真洪亮。”

贺子珍也说：

“是呀，他的声音很洪亮，跟过去一样。”

这个讲话录音太重要了，广播电台播放了一遍又一遍，贺子珍也跟着听了一遍又一遍，忘了吃饭，也忘了睡觉。

第二天一大早，李立英起床后去看贺子珍，见贺子珍一动不动地坐在老地方，耳朵紧贴在收音机上一副全神贯注地倾听的模样，便轻轻地叫了她一声。贺子珍没有回头，过了一会儿，她对李立英说：

“咦，收音机怎么不响了，不广播毛主席的讲话了？”

李立英走过去拿起收音机一看，收音机竟一夜未关，已经烧坏了。她再一回头，见贺子珍脸色煞白，嘴唇哆嗦，心里便“咯噔”一下，忙将贺子珍扶起。

贺子珍从此病了，处在一种时而清醒时而糊涂的状态。贺敏学夫妇赶紧把她送进华东医院，医生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可是贺子珍不肯吃药，拒绝治疗。贺敏学无计可想，不得不让妻子李立英给李敏写信，告诉她妈妈病重的消息。

李敏得知母亲的病情后，难过极了，马上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爸爸，并把信递给了爸爸。毛泽东拿过信看看，又看看，不说一句话。李敏看得出，爸爸的情绪很不好，心里很沉重，她第一次见爸爸流泪了，她也伤心地哭了。

毛泽东想让李敏去看望她妈妈，可又怕耽误她的学业，便给贺子珍写一封信。他知道，贺子珍的病是因心事太重引起的，他相信心病还需心药医。在给贺子珍的信中，他劝贺子珍要注意身体，好好治病；并且说，华东医院里的苏医生是个好同志，杨医生也是好的，要听医生的话，不要抽那么多的烟，烟抽多了对身体不好。最后，他恳请贺敏学代为照顾贺子珍，殷殷之情，溢于言表。

毛泽东的信就像一把钥匙，打开了贺子珍心里的锁。当亲人们告诉她，毛主席给她来信要她好好吃药，好好看病时，她的神智竟然逐渐清醒起来。她自己读了信，也肯看病了，肯吃药，而且把烟也戒了。

且说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期间，毛泽东看到了张治中交给彭真转交刘少奇的一份建议。张治中在建议中主张，每一位人大常委每年都要出去视察，了解地方情况，听取群众意见。毛泽东看后，笑着对大家说：

“他这人专做好事，做了很多好事。”

他立即批示：“同意。”并把外出视察人员的范围扩大到全国人大代表。后来又加上了全国政协委员。

会议期间，毛泽东还召见了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吴晗，他在谈话中说：

“《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旧本没有标点，不分段落，今人读起来不方便，市上流传亦已不多，应该找些人把它整理出一个有标点分段落的新本子来，付诸排印，以广流传。”

毛泽东还说：

“读历史不能没有一部历史地图放在手边，以便随时检查历史地名的方位。解放前一些书局虽然出版过几种历史地图，但都失之过简，满足不了读《资治通鉴》之类史书的需求。”

后来在10月份，吴晗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召集了一些历史学家，在中国科学院第3历史研究所开会，研究了毛泽东交给的任务，决定成立一个标点《资治通鉴》和改绘清末民初杨守敬的《历代舆地图》的委员会，成员有科学院两个历史所的范文澜、尹达、侯外庐、刘大杰，北大的翦伯赞，出版总局的金灿然和高教部、地图出版社的负责人，由范文澜、吴晗领衔。之后又成立了工作小组：标点《通鉴》的具体工作，聘请顾颉刚、郑天挺、王崇武、周一良、齐思和等十来位在京的史学家分担。改绘《杨图》工作的人选，则由吴晗推荐、委员会通过，请上海复旦大学的谭其骧担任主编。1956年2月，中国古籍出版社首次出版了《资治通鉴》标点本。而改绘《杨图》的难度更大，可惜毛泽东生前没能看到。

欲知毛泽东在传播传统文化方面还有哪些建树，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不管是在夺取全国政权以前的战争年代，或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和平时期，毛泽东在外交方面，一直是积极主动地扩大邦交的。本章叙述的他和英国工党领袖艾德礼的交往，便是一个例证。1937年11月1日，为了中国的抗战事业，他给艾德礼写了一封求助信；1954年8月24日，在接见艾德礼等人时，他又明确地说：只要“**双方愿意共处”**，不但可以和英国工党所标榜的“社会主义共处”，而且也“**可以和非社会主义的事物**，**像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封建王国等共处”，“不同的制度是可以和平共处的。**”“我们走的是两条路。**让我们做朋友吧，不仅在经济上合作，而且在政治上也合作。**”认真研究一下这方面的历史，读一读他在这方面的理论，你还能说他是闭关锁国吗？

**第6章**

“**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

**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

**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

话说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先后两次接见了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还亲自到他们的住处看望和交谈，毛泽东提议说：

“在西藏不再成立军政委员会，直接筹备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为实行区域自治做准备，请你们考虑。”

原来，在西藏成立军政委员会是“十七条协议”中的一项规定，可是在西藏地方政府中，有些人担心成立军政委员会，会取代西藏地方政府，使他们丧失既得权益，因此，他们百般阻挠，致使西藏军政委员会一直没有成立。毛泽东鉴于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各大行政区军政委员会即将撤销，就向他们提出了这一建议。

后来，经西藏地方政府、班禅堪布会议厅、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的代表多次讨论，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提议。由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和西藏3方代表组成的筹委会筹备小组，经过充分协商，提出了成立筹委会的具体方案。

在第一届全国人大召开期间，曾志到菊香书屋看望毛泽东，她见毛泽东依然过着简朴的生活，唯有书籍更多了：床上一半的空间都堆放着书，有精装的，有平装的，还有报纸和期刊杂志；办公桌上，书架上，窗台上，堆集的书本也像一座座小山。曾志好奇地问毛泽东：

“这么多的书，一天要看多少？”

毛泽东解释说：

“每天送来的报刊杂志就有200多种，我一个人是看不完的。我有几个秘书，他们分门别类地先看，觉得比较重要的，就给我划上。必须要有选择性地看，看书也是要讲方法的。”

“看那么多书，不觉得累吗？一天看到晚，能看得进去吗？”

“看书也是一种休息嘛！”

“我不明白看书怎么个休息法，我认为看书是很累人的事。”

“看一种书疲倦了，就换另一本书，调剂脑筋，也就得到了休息，交换看书，也是一种好的休息方法。”毛泽东一说起书，就滔滔不绝：“我没有吃过洋面包，过去也没有去过苏联，更没有去西方留学，我是土生土长的中国农民儿子。我根据中国的国情，革命的实际，提出建立井冈山根据地，建立罗霄山脉中段的红色割据，提出游击战术16字诀和迂回打圈的战略战术。”

他点燃一支烟，深深地吸一口，继续说道：

“但是那些个吃洋面包的人，就是不信任我，看不起我，认为山沟子里面出不了马克思主义。**从1932年起，实际上就把我摆到了一边，同志们不大愿意同我接近，连贺子珍也不愿理我了。**我说组织上决定我服从，但观点要坚持，不是说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吗？我不相信有这样的事情，我就是要狠狠地读书。在漳州搞了许多书，又向同志们借一点子，扎扎实实地读书，硬是读了两年的马列主义，后来写的《矛盾论》和《实践论》就是这两年的读书心得。

我这个人呀，就是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处分，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有了这‘5不怕’，敢将皇帝老子拉下马。”

正在此时，工作人员走来请毛泽东去怀仁堂观看袁雪芬、傅全香演出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毛泽东便邀曾志一同去看戏。

演出开始了，毛泽东看得很专注，很投入。可是曾志却一直是漫不经心的样子。当戏演到梁祝诀别时，曾志哪里欣赏得了这种痛苦缠绵的情节，忍不住笑了起来。全身心投入剧情里的毛泽东，侧过头不满地看了她一眼，说：

“你都不懂，这是艺术欣赏，现在正是艺术上的最高潮！”

曾志一看毛泽东认真的样子，急忙止住了笑。

9月中旬，江青奉毛泽东之命来到《人民日报》社，找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林默涵和《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谈话。

原来在不久前，刚刚从山东大学毕业的学生李希凡、蓝翎利用暑假的时间，写出了一篇批评俞平伯的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一文是于1954年3月发表在《新建设》杂志上的。李希凡、蓝翎将文章写好后，写信向《文艺报》询问，是否可以批评俞平伯，结果没有得到答复。他们只好又向自己的母校学报投稿。山东大学校刊《文史哲》就把李希凡、蓝翎的这篇文章刊登在9月号上。江青曾看过多遍《红楼梦》，她很有兴味地看了李希凡、蓝翎这篇批判文章，对此大加赞赏，并推荐给毛泽东。

毛泽东曾对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曾志说过：“在生活上江青同我合不来，但在政治上还是对我有帮助的，她政治上很敏锐。”由此看来，毛泽东还是相信江青的判断力的。这一次，他接受江青的建议，认真看了李希凡、蓝翎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非常高兴，便让江青出面，建议《人民日报》予以转载。江青就给《人民日报》社总编辑邓拓打电话说了这个意思。邓拓哪里把江青看在眼里，根本不予理睬。过了两天，江青看看《人民日报》没有动静，就拿着《文史哲》第9期，来找周扬、林默涵和邓拓谈话，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她说：

“主席十分欣赏刚刚出版的《文史哲》杂志上两个小人物李希凡、蓝翎写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希望《人民日报》全文转载。”

周扬以《人民日报》转载这样“小人物”的文章不合适为由，拒绝了毛泽东的建议，他提出可以由《文艺报》予以转载。

9月20日，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的1197名代表，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一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由主席团公布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用法律的形式规定了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向和途径，确立了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明确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民主精神贯穿于整部宪法之中。

齐白石在人大会议上郑重地投下了赞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一票。他回到家里，高兴地说：

“**《诗经》上说：‘济济多士，文王以宁’，哪里能和这次大会比？立法立宪，搞了几十年，如今真有人民的宪法了**，这是五福临门的宪法，我可要把《诗经》上‘文王以宁’改为‘中国以宁’了。”

他一边说着，一边写下了毛泽东在开幕词中所告诫人们的8个字：“老老实实，勤勤恳恳。”

9月27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一致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为副主席。

选举刘少奇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庆龄、林伯渠、李济深、张澜、罗荣桓、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彭真、李维汉、陈叔通、达赖喇嘛·丹增嘉措、赛福鼎13人当选为副委员长；彭真当选为秘书长；王昆仑、王维舟、古大存、司徒美堂、吴玉章、吴耀宗、李书城、李雪峰、李烛尘、邢西萍、林枫、周建人、周纯全、竺可桢、邵力子、南汉宸、胡乔木、胡愈之、胡耀邦、柳亚子、施复亮、高崇民、徐向前、徐特立、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韦国清、马明方、马叙伦、马寅初、张邦英、张治中、张云逸、张闻天、张难先、张苏、许广平、许德珩、陈劭先、陈嘉庚、陆定一、程子华、程潜、黄火青、黄克诚、黄绍竑、彭泽民、杨明轩、叶剑英、廖承志、熊克武、刘伯承、刘长胜、刘格平、刘宁一、刘澜涛、蔡廷锴、蔡畅、邓颖超、赖若愚、龙云、聂荣臻、蓝公武、罗隆基、谭平山、谭政65人当选为委员。

董必武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鼎丞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大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的提名，决定任命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陈云、林彪、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贺龙、陈毅、乌兰夫、李富春、李先念10人为副总理；还任命了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

会议决定设立国防委员会，毛泽东兼任国防委员会主席。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会议决定任命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程潜、张治中、傅作义、龙云为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于学忠、郑洞国等81人为国防委员会委员。

是日晚，郑洞国突然接到一张套红的金字请帖，打开一看，竟然是毛泽东派人送来的请帖，要在中南海宴请他。

原来，郑洞国等原国民党军将军刚刚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毛泽东为了祝贺他们，就在中南海设宴招待他们。郑洞国十分不安，他想：“毛主席日理万机，还想到我，甚至要设宴招待我，一个国民党的败军之将，见了毛主席，说些什么呢？”郑洞国迟到了几分钟。贺龙、叶剑英，还有鹿钟麟等人早已在座。郑洞国一到，毛泽东就迎了上去，同他握手，说：

“你还是有功的嘛，如果不是你回电蒋介石，曾泽生的60军就会被蒋介石的飞机炸平了嘛，……而且，你还是一位抗日名将。我们说话算话，只要放下武器，我们一律欢迎。你很年轻，还可以为中国人民做很多的工作。”

毛泽东一边说，一边拉郑洞国坐在自己身边。郑洞国刚坐下，毛泽东又笑着说：

“这下好了，我们终于同坐在一条凳子上了嘛！”

在座的客人，都被毛泽东的话逗乐了。郑洞国本来有些拘谨，毛主席的一句话一个动作就使郑洞国轻松多了。毛泽东又问郑洞国：

“你抽不抽烟？”

郑洞国应声说：“抽。”说着，顺手就近拿了一支香烟，没想到，毛泽东十分敏捷地擦着一根火柴，站起来给他点烟。毛泽东是那样随和、亲切，彬彬有礼，毫无国民党当官的那种令人生畏、令人讨厌的傲慢派头。郑洞国心想：

**“我在国民党阵营里20多年，上自蒋介石，下至若干上级，谁曾如此待我！而毛主席——共产党的第一把手、国家元首、人民拥戴的领袖居然为我点烟，共产党的领导人果真不是官，而是朴实的人民公仆，既平凡又伟大。”**

毛泽东问及郑洞国全家的生活情况，郑洞国说，儿子还未结婚，刚从上海同济大学毕业，在沈阳的一个建筑部门工作。毛泽东说道：

“你的家庭生活安排好了，就得为人民做点工作嘛！你今年才51岁，还很年轻啊！”

郑洞国闻言，心中暗想：“毛主席怎么这样了解我！”便情不自禁地连声答应，要好好地为人民服务。郑洞国越说越随便，不知怎的，他竟然向毛主席提出了这么一个他自己也觉得不甚得体的问题，他说：

“你的马列主义为什么学得这样好？”

毛泽东也似乎感到有点出乎意料，怔了怔，望着郑洞国，郑洞国有点不好意思了。毛泽东爽朗地笑了，他回答说：

“我当年接受马列主义之后，总认为自己已经是个革命者了。哪知道一去煤矿，和工人打交道，工人不买账。因为我还是那么一副‘学生脸’、‘先生样’，也不知道怎样做工人的工作。那时，我成天在铁道上转来转去，心想，这样下去怎么行呢？想了很长时间，才有些明白，自己的思想立场还没有真正转变过来嘛！”

他又加重了语气说：

“我也不是生而知之的圣人，而是在向社会学习向群众学习的过程中，逐步走上革命道路的。一个人的思想总是发展的，立场是可以转变的。只要立场转变了，自觉地放下架子，拜人民为师，这就灵了，学马列主义也就容易学好。”

9月28日下午3时50分，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闭幕式上宣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已经顺利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在庄严的国歌声中，会议胜利闭幕。

人大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接见了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和阿沛·阿旺晋美，他在谈话中说：

“你们是国家最年轻的领导人了，担负着很重要的责任。现在你们不仅仅是西藏的领袖人物，而且是一个国家的领导者。”

他又亲切地望着达赖和班禅，强调说：

“因此搞好你们两位活佛之间的团结非常重要。还要搞好噶厦和堪厅两方面的团结，搞好汉族和藏族同志之间的团结。”

毛泽东说罢，点燃了一支烟，接着说：

“要搞好团结，就要互相学习，在西藏工作的同志要学习藏语文，不懂藏语文怎么和藏族同胞接触？怎么能够为藏族同胞服务呢？”

班禅说：

“希望中央给我派一名汉语教员，下次来北京开会，我不要翻译，要直接用汉语同主席交谈。”

“很好，很好！”毛泽东非常高兴，他风趣地对翻译说：“两位佛爷学会汉语，不用翻译，你不用担心，你不会失业，以后可以当干部。当然，翻译也是干部。我说的是当领导干部，担负更重要的责任。西藏有很多工作要做，需要大批优秀的干部。”

他又转向达赖、班禅和阿沛·阿旺晋美，说道：

“我再一次告诉你们，中央代表、解放军、汉族干部到西藏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西藏人民发展经济、文化，为了西藏民族的发展和进步。如果他们不是按这个原则办事的话，你们可以直接找我，找周总理谈，丝毫不用客气。”

接见就要结束了，毛泽东站起身来，最后说：

“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说话是算数的，今后我们要重视发展西藏的经济和文化事业。这一次，也不能让你们空着手回西藏去，中央人民政府给西藏准备了一批礼物。”

不久，中央人民政府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向西藏地方政府和班禅堪布会议厅赠送了一大批农牧业机具。

就在9月28日这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成立党的军事委员会的决议》，决定撤销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整个军事工作。中共中央军委由12人组成，他们是：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

由毛泽东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由彭德怀主持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日常工作。

毛泽东在第1次军委会议上宣布说：以后在一般情况下，军委会议由彭德怀主持。

9月29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尼·谢·赫鲁晓夫率布尔加宁、米高扬等党政代表团到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赫鲁晓夫走下飞机，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其他中国党政领导人的热烈欢迎。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紧紧拥抱，行贴面礼，呈现出亲密、友好、团结的气氛。后来，赫鲁晓夫说：

“毛泽东的热情友好是我未曾预料到的。”

毛泽东早在他第一次访问苏联时，就认识了赫鲁晓夫。在他眼里，喜欢玉米棒子的炮筒子赫鲁晓夫，像公牛一样到处乱撞。赫鲁晓夫从那时起，也对毛泽东留有很深的印象，他认为喜欢读书的毛泽东，“行动起来像熊一样沉着迟缓”，思想不轻易外露，但是他才智过人，一般人不是他的对手。

当晚，毛泽东在会见赫鲁晓夫的时候，重提他那个“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赫鲁晓夫则认为帝国主义是一只危险的猛兽，他对毛泽东说：

“再也不能根据哪一方的人多来计算力量大小了。以前用拳头和刺刀解决纷争的时候，谁的人多、刺刀多，结果的确不一样。可是，出现机关枪以后，兵力多的那一方就不一定占上风了。**现在有了原子弹，双方部队的数目，对真正力量的对比和战争的结果，就更没有意义了。哪一方的部队愈多，他的炮灰也就愈多**。”

赫鲁晓夫竭力要毛泽东相信：

**“一两枚原子弹就足以把整个中国化为灰烬。**”

赫鲁晓夫的观点当然不可能说服毛泽东。毛泽东关于“纸老虎”的论断，是从战略的角度，从正义与非正义、从长远和辩证的观点上看待这个问题的。**赫鲁晓夫的一番说道，反而使毛泽东更加认清了眼前的这个大国领袖。伟大的斯大林尚且惧怕美国的原子弹，何况他的追随者赫鲁晓夫呢？**因为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毛泽东也不便与赫鲁晓夫过多理论。

国庆节前夕，朝鲜金日成首相来到北京，赠送给毛泽东24箱苹果，每个苹果上都有一行被太阳晒出来的字：“毛主席万岁”。这上面的字是擦不掉的，能吃掉“毛主席万岁”吗？工作人员面对苹果犯了愁。李银桥将此事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皱着眉头说：

“我就不喜欢这个口号。哪有人能活1万岁的？活不到，那就吃掉。”

于是，24箱晒有“毛主席万岁”的国光苹果，便分给警卫部队全部吃掉了。

9月30日，毛泽东会见印中友好协会访华代表团团长、国会议员乌玛·尼赫鲁夫人，他在谈话中说：

“五项原则应当适用于各国之间的关系。现在这五项原则已经是世界闻名了。”

1954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建国5周年庆典。

上午9点50分，毛泽东与赫鲁晓夫、金日成及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登上天安门城楼的还有波兰、罗马尼亚、蒙古、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保加利亚、越南和阿尔巴尼亚等国的来宾。

毛泽东快步走到张澜面前，握着他的手亲切地说：

“表老啊！你很好。你的德很好。你是与日俱进的。”

10时整，北京市市长彭真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第5周年国庆典礼开始！”

在阅兵式开始时，国防部长彭德怀在华北军区兼京津卫戍区副司令员、阅兵总指挥杨成武陪同下，乘敞篷汽车检阅部队。而后，他登上天安门城楼，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命令》，命令说：

中国人民解放军“时刻保持战斗准备，加强军事、政治训练，加强集中统一意志，提高社会主义觉悟，努力学习苏联军队的一切先进经验，掌握现代化的技术，发扬革命英雄主义，服从命令，遵守纪律，为争取和保证每一个军事任务的胜利完成而奋斗。”

接着，受阅部队的分列式开始了。这次受阅的部队是从全军60个单位抽调编成的，共10384人。徒步方队由200人编成，横排面20人，共10个排面。骑兵受阅部队来自内蒙古草原，功臣模范占50%，他们共编成6个方队，每个方队都是毛色相同的军马，侧面看，骑兵和战马各成一直线，队形整齐。坦克、火炮每方队横排面4台车（炮），共4个排面，三轮摩托车横排面6辆，共27个排面。受阅航空兵由111架作战飞机编成，由3机按三角形编队，通过天安门广场的高度为600米，航速每小时为400～650公里，这对中国年轻的飞行部队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整个阅兵历时63分钟。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了全国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主席团成员黎锦熙，他问道：

“六先生还好吗？”

毛泽东所说的“六先生”是黎锦熙的六弟黎锦明，字艮甫，号均亮，生于1905年，从小酷爱文学，1925年考入北师大。黎锦明先后创作中篇小说4部，短篇小说11部，剧本5部。他的小说《尘影》曾经受到鲁迅的称赞，鲁迅说：黎锦明的作品“蓬勃着楚人的敏感和热情”。

“我看过六先生的中篇小说《尘影》。”毛泽东兴致勃勃地说：“是在1927年‘四一、二’政变以后写的。他以海丰农民斗争为背景，较真实地描写了我国南方一隅在大革命时期波澜壮阔的农民运动。”

黎锦熙静心地听着毛泽东的话。毛泽东接着说：

“难能可贵的是，六先生在小说中显示了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在于我党没有自己的武装。这真是一针见血。”

是日晚，赫鲁晓夫在焰火晚会上像是一个察看庄稼长势的农民；毛泽东则兴致勃勃地观看着焰火。两人的兴致不一样，却是同样愉快，脸上堆满了笑容。

周恩来忽然发现了毛泽东的夫人江青，就走上前去，要把她介绍给赫鲁晓夫，却被毛泽东制止了。毛泽东带着江青迅速地穿过紫红色平台，走到稍远的角落，夫妻俩在那里一起观看焰火。

江青在解放后由于身体不好，曾到苏联治病养病，在苏联的工厂、农村调查研究，发现了不少问题。同时，她对斯大林时期苏共党内的问题也有察觉。这些都成为毛泽东研究苏联的重要信息。

10月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赫鲁晓夫，他在谈话中说：

“我们对原子能、核武器感兴趣。今天想同你们商量，希望你们在这方面对我们有所帮助，使我们有所建树。总之，我们也想搞这项工业。”

赫鲁晓夫一听就愣住了，他没有想到毛泽东会提出这个问题，他说：

“**假若你们目前要搞核武器，那把你们中国的全部电力集中起来用在这个方面，够不够还很难说呢！这东西你们要搞既费钱，又费力，搞成之后既不能吃，又不能用，储存起来也要钱，更新改造也要钱。你们另搞一摊子太浪费了，社会主义大家庭有苏联的核保护伞就够了，无须大家都来搞。**如果你们十分想办这件事，而且是为了科研、培训干部，为未来的新兴工业打基础，那么我们可以帮助先建设一个小型原子堆。这比较好办，花钱也不太多。”

**赫鲁晓夫的“核保护伞”论，毫无疑问又一次刺痛着毛泽东**。但毛泽东觉得他的分析也并非是毫无道理，况且他又做出了承诺，便说道：

“也好，让我们考虑考虑再说。”

10月初，毛泽东翻看《文艺报》第18期上为转载李希凡、蓝翎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而由《文艺报》主编冯雪峰根据周扬等人的意思所加的一个编者按，大为不满。只见按语中写道：

“这篇文章原来在山东大学出版的《文史哲》月刊今年第9期上面。它的作者是两个在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青年，他们试着以科学的观点对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简论》一文中的论点提出了批评，我们觉得这是值得引起大家注意的。因此征得作者的同意，把它转载在这里，希望引起大家讨论，使我们对《红楼梦》这部伟大杰作有更深刻和更正确的了解。在转载时，曾由作者改正了一些错字和由编者改动了一二字句，但完全保存作者原来的意见。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但他们这样的去认识《红楼梦》，在基本上是正确的。只有大家来继续深入的研究，才能使我们的了解更深刻和周密，认识也更全面，而且不仅关于《红楼梦》，同时也关于我国一切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

**毛泽东边看边批，他在“他们试着”4字旁边批了两句话：**

**“不过是小人物。”“不过是不成熟的试作。”**

**他又在“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一句旁边批道：**

**“对两青年的缺点决不饶过。”“很成熟的文章，妄加驳斥。”**

**他还在“希望引起大家讨论”和“才能使我们的了解更深刻和周密”两句旁画了两道线，打了问号，批了两句话：**

**“不应当承认俞平伯的观点是正确的。”“不是更深刻周密的问题，而是批判错误思想的问题。”**

先是周扬等人公然拒绝了毛泽东的建议，继之是冯雪峰又在按语中连俞平伯的错误一个字都不提，反而指责“小人物”，这就惹恼了毛泽东。由此，在中国掀起一场轩然大波那肯定是迟早的事情。

10月8日，毛泽东让叶子龙将表兄文运昌写给他的一封信转交给王季范看，王季范展开此信，只见上面写着：

润之老三表弟主席大鉴：

湖南燕北，凭书传衷。遥想起居佳胜，为贺且祝。报载，表弟二次当选，足见功德在民，群情爱戴。除专制建共和，七亿友好；按程序而事建设，中华光辉。谊属中表弟兄，尤欢欣起舞的奉告内各弟孙们，眉开眼笑地高歌鼓掌庆贺。本拟出游汉皋，重上都门，瞻仰新规模的建筑事业，以饱眼福，恰与我三姐和王九弟共话家常，时机似是难得，今日的我，以酒养性。学习了宪法草案，破衣洗补，行色拟飞黄河。因大水所困，是未果。小阳节后，当束装上京畅谈，平生愿满，便以所见的地区人们生产救灾各情作介，**并祈指示机宜，直赴台湾，扫除残敌，投笔从戎，有赵云雄风宛在，请缨系虏，终军之大志可到，兄虽年已七十，亦间忘其老也，先此布达。**并问江青夫人懿康。

表兄 文运昌

王季范看罢此信，记起自己也收到了表兄9月20日的来信，表兄在信中似有怨艾，尚未作复。此时，他已明白了毛泽东的用意。

10月9日，王季范提笔给表兄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运昌表兄：

前日接你9月20日来信，知你极愿到武汉和北京一游，参观5年来之新建设，且倪志壮。昨日叶子龙同志送来你致主席手书一件，知你决于小阳时节来京欢叙，并想赴台杀敌立功，老来勇气，令人钦敬。中南海方面以你来京甚好。古衡老人，不堪作战，笔谈舌战则可。嘱我以此意代为转达。昨晚，章淼洪来，说及北方冬季天寒地冻，树枯花谢，名胜冷落，绝少游人；南客初来，重哀不暖，不如待之明年中秋来京赏月，犹便参观最伟大热闹之国庆观礼。此话理充。述供参考。总之，你若来京，无论今冬明春，可住舍间，借叙情谊。专此布达。顺致

敬礼!

表弟 王季范

10月10日，王季范又嘱咐儿媳萧凤林给文运昌写一封信。萧凤林在信中写道：

运昌十六伯：

前日叶子龙处长来舍，送来你寄主席的信，家父立即函湘促驾，**我家正扫榻迎接也。**主席寄来手条，说欢迎你来京一游。不过，只限你一个人来京，住一个月，并指定住在我家。我家无好招待，你是否来住呢？主席寄家父的手条，你到京后，可以看到。家父说，现今火车非常便利，你起程时，须坐直达加快车，以免转车旷时；如行李多，须打行李票。列车照顾老人很周到。**你有万里赴台杀敌立功的本领，单身独马，千里畅行，毫无问题，切不必结伴同行。**因北京物价高过长沙几倍，粮油限内极度，木床价数十万元，我家无力担负。总之一句话，你一人来京。**你来京时，一定要带棉袍、棉鞋、棉被，**因为北方很冷，现在一般都着棉衣之故。

我有一双新皮鞋在长沙，敬请你至三角格萧八婆处，为我取出带来。麻烦之事，来京面谢。并请带长沙豆豉和好吃的麻菌、玉兰片。太贵则不必带。

敬仰旅安，并叩

十六伯母福安。凤良同志和凤始均此问好！

侄媳 凤林 敬上

这正是：三封来往信，忍俊不禁读。表亲诉衷肠，最是凤林书。

10月10日，中央农村工作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召开第4次农村互助合作会议。会议总结了一年来农业合作化的工作，制定了农村合作社新的发展计划和党在农村的阶级政策。其中，党在农村的阶级政策是经过毛泽东修改补充而确定下来的。

这次会议一直开到30日才结束。

10月10日晚，毛泽东翻阅《光明日报》上刊载的李希凡、蓝翎的另一篇文章《评<红楼梦研究>》及编者按。

《红楼梦研究》是俞平伯的《红楼梦辨》在1952年修订再版时改用的书名。毛泽东曾经在他仔细阅读过的俞平伯的《红楼梦辨》一书中，差不多从头到尾都画有横线和圈点，还打了许多问号，共有50多处。如今再看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及《光明日报》的编者按，自然有许多联想。只见编者按中写道：

“目前，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点去研究古典文学，这一极其重要的工作尚没有很好的进行，而且也亟待开展。本文在试图从这方面提出一些问题和意见，是可供我们参考的。同时我们更希望能因此引起大家的注意和讨论。”

毛泽东在编者按旁用质问的口气一连批了3句话：

“不过是试作？”“不过是一些问题和意见？”“不过可供参考而已？”

他还在李希凡、蓝翎文章中所引用的俞平伯的“原来批评文学的眼光是很容易有偏好的，所以，甲是乙非，了无标准”，“麻油拌韭菜，各人心里爱”这些话旁边，批了一句话：

“这就是胡适哲学的相对主义即实用主义。”

10月12日，赫鲁晓夫在中国的访问结束。

赫鲁晓夫是苏联方面访问中国的第一位最高领导人。在他访华期间，中苏达成了一系列协议，苏方把旅顺港和中苏4个股份公司移交给中国，给予中国5亿卢布长期贷款；还有关于科技合作及关于修建兰州——乌鲁木齐——阿拉木图铁路等一系列问题的协议。

苏联还答应在促进原子能和平利用的研究方面，给予中国帮助。毛泽东深表感谢。

在此期间，赫鲁晓夫还经常和毛泽东在中南海的游泳池旁边躺着，像最要好的朋友一样，谈论着各种事情，彼此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地各抒己见。他们有许多共同语言，在许多问题上取得了一致的看法，但也有许多认识不一致的地方，除了在战争问题上的分歧外，毛泽东在提到中国的文艺方针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时，赫鲁晓夫却说：

“任何一个农民都知道，有些花应栽培，而其余的应砍掉。”

他认为毛泽东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诱骗各种“花”都“开”，然后，将“有毒的花”消灭掉。

赫鲁晓夫回到国内后就对他的同事说：

“与中国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几个月后，赫鲁晓夫又向西德总理阿登纳暗示，中国“可能会给西方带来麻烦”。他对中国日益增长的潜在势力感到惊恐，提出要与西德重修旧好，“共御黄祸”。赫鲁晓夫这些话，后来都传到了中国人的耳朵里，为中苏关系埋下了隐患。

10月16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和其他有关人员写了一封《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他在信封上写了28个人的名字：除了中央政治局成员，还有中宣部、国务院及有关部委的负责人。他写的是：“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朱德、邓小平、胡绳、彭真、董老、林老、彭德怀、陆定一、胡乔木、陈伯达、郭沫若、沈雁冰、邓拓、袁水拍、林淡秋、周扬、林枫、凯丰、田家英、林默涵、张际春、丁玲、冯雪峰、习仲勋、何其芳诸同志阅。退毛泽东。”

毛泽东何以将这一问题提到中共中央政治局里来，此事说来话长。

原来，自从曹雪芹的《红楼梦》一书在问世以后的200多年中，中国社会的各个阶级、各个阶层都对其作了各自不同的评价。《红楼梦》研究逐渐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人们称之为“红学”。研究“红学”的学者先后有“旧红学派”和“新红学派”之分。“旧红学派”即为“索隐派”，他们把《红楼梦》看成是影射清朝人物事件和清朝政治的，其研究是为了“索”出“隐”去的真人事件。“新红学派”也称“考证派”，他们则用唯心主义的实验主义方法研究《红楼梦》。俞平伯就是“新红学派”中的著名学者。

俞平伯，原名俞铭衡，1900年出生于浙江德清县。他曾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加入过新文化社团新潮社、文学研究会、语丝社等。他是闻名文坛的散文小品作家，也是当时著名的新诗人，1922年曾与朱自清、叶圣陶、郑振铎、刘延陵等人共同创办了“五四”以后最早的诗刊《诗》月刊。

俞平伯开始研究《红楼梦》，是受胡适的影响。胡适是《红楼梦》研究“考证派”的代表。1922年，俞平伯写成《红楼梦辨》一书，并于1923年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此书与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改定稿》成为“新红学”的代表作。

前边已经说过，早在1951年毛泽东就提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作为改造旧文化、建设新文化的方针。后来为了研究和继承祖国古典文学的优秀传统，国家出版部门整理和出版了一大批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优秀作品，《红楼梦》就是其中之一。做为著名红学家的俞平伯，将自己于1923年出版的《红楼梦辩》进行了删改、增订，并易名为《红楼梦研究》，于1952年9月由棠棣出版社出版。后来俞平伯还应报刊的约稿，陆续发表了一些介绍《红楼梦》的文章。1954年3月，他又将自己研究《红楼梦》的成果作扼要总结，写成《红楼梦简论》一文。发表在《新建设》上。《文艺报》于1953年第4号的“新书刊”栏目内，对俞平伯的新版《红楼梦研究》作了简要报道，并推荐说：“研究《红楼梦》，向来有一个诨名，叫作‘红学’。过去所有红学家都戴了有色眼镜，做了许多索隐，全是牵强附会，捕风捉影。《红楼梦研究》一书做了细密的考证、校勘，扫除了过去‘红学’的一切梦呓，这是很大的功绩。”正是由于《文艺报》这样推崇俞平伯，所以它一直拒绝刊登批评俞平伯的文章。早在李希凡、蓝翎之前的1952年10月，就有一篇署名为白盾的批评俞平伯的文章《<红楼梦>是“怨而不怒”的吗?》，寄给了《文艺报》，《文艺报》不但不予刊载，还在退稿信中说：“俞平伯先生研究《红楼梦》很有贡献，《红楼梦研究》一书基本上优点多于缺点，文中所提出的缺点，在目前一般读者思想水平已有提高的情况下，人们自会分清。所以，用不着批评。”后来白盾的这篇文章，最终还是在1954年11月12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这自然是在开展批判俞平伯以后的事了。

前面已经说过，江青发现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后，推荐给毛泽东，毛泽东指示《人民日报》转载。江青传达毛泽东的指示，结果碰了一鼻子灰。就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看了10月10日《光明日报》专刊《文学遗产》第24期发表的李希凡、蓝翎的另一篇批评俞平伯的文章《评<红楼梦研究>》及编者按，他也按捺不住了，于是就在10月16日写出了给中央政治局和其他有关人员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这封信全文如下：

各同志：

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附上，请一阅。**这是30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地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驳《红楼梦简论》。问题又回到北京，有人（指江青——笔者注）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嗣后，《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又发表了这两个青年的驳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文章。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30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拦阻，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毛泽东 1954年10月16日

**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

毛泽东的这封信，以雷霆万钧之力给了周扬等人以沉重的打击。

10月18日，中央宣传部和中国作家协会召开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

欲知毛泽东10月16日的信传达以后有何影响，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文化革命”一词，曾让一些人闻之丧胆，其实大可不必。笔者在本传第六卷第25章末已有小议。这一命题贯穿于毛泽东的一生，在他文章里、谈话中时常出现。本章所述李希凡、蓝翎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无疑是“文化革命”的两朵小花，毛泽东闻之心喜，而周扬、冯雪峰及他们的一些上级“**大人物”**，还有《光明日报》的编者们，则“**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拦阻”。**这就不能不使毛泽东认为“**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因而要在文化战线上开展一场思想教育运动了**。**由此，也给世人留下了一个重要的思考问题，那就是，他们这些“共产党员”，为什么与毛泽东存在着这么大的差异呢？

**第7章**

**“1954年，我们国家自己出产了一架飞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

**帝到如今，这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虽然还只是一架教练机。”**

话说1954年10月18日下午，毛泽东在国防委员会第1次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全文如下：

中国军队的近代化，我看可以分作3个阶段。

第一代是清朝末年搞的新军。新军有36镇，就是36个师。今天在座的有相当多的人参加了那个军队，里面有日本士官学校的；有云南讲武堂的，我们的朱德副主席就是云南讲武堂的；有湖南讲武堂的；有保定军官学校的，唐生智委员就是保定军校的。这个新军和孙中山建立的革命党，在人民拥护的基础上，完成了推翻清朝的任务，但后来腐化了，脱离了人民，四分五裂，各人筹各人的饷，各搞各的地盘，被人民所唾弃。

第二代是黄埔军。它曾经是一个革命军队，革了前面所说的那个军队的命。今天在座的中间，有许多人，共产党的非共产党的，都是亲眼看过、亲身经历过的。我还曾经在上海为黄埔军校招过一期学生，地址是上海环龙路44号。周恩来总理是当时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以黄埔军为主干的国民革命军起初成立了8个军，黄琪翔、蔡廷锴是4军的，程潜、李明灏是6军的，唐生智是8军的。黄埔军也曾受到了人民的拥护，北伐时势如破竹，但也有一个缺点，就是脱离人民。**共产党那时候犯过一个错误，就是不要军队，只在军队里派党代表。**后来蒋介石把党代表一驱逐，进行清党，在共产党直接控制下的军队就只有叶挺的一个独立团。南昌起义后，党所领导的军队变成了游击队，这个游击队一直打了22年。

现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第三代。人民解放军的前身是红军。

这三代，代表了中国近代军队的3个阶段。中国要搞一部军事史，把这3个时代的进步写一下就好。

我们的军队，首先是游击队，以后比较正规一些，现在更好一些，但严格地说来，距现代化还相差很远，因此必须努力学习。原子武器出现以后，军队的战略战术和装备都有很大的变化，而在这一方面我们一点都不懂。

从历史上看，我们的建军目标是能够达到的，我们的事业是有希望的。我们的军队距离现代化很远，但是在朝鲜打败了美帝国主义。北伐战争末期，蒋介石和帝国主义搭上了线，不久国共两党分裂，北伐军队变更了方向，我们单独地搞。天下是蒋介石的，我们只有几支烂枪，可是，我们的斗争代表着人民的方向，我们能把游击队集合起来，成立了军团、方面军，以后又进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不简单的，假定在地球上对钻一个洞从美国钻出来，恰好是一万二千五百公里多一点。**长征结束时，我们的军队没有剩下多少。一方面是因为蒋介石打我们，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在政治上军事上都犯了错误，才被迫来了个大搬家。**到了遵义，进行了自我批评，才纠正了错误。

1945年日本投降后，我们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集中起来一共有120万人。重庆谈判前，蒋介石请我们一定要去商量国是，国是者全国之是也，不能不去。其实到了重庆，蒋介石毫无准备，只临时召集几个人商量了一下，他们一面谈一面发兵。我们几个人在重庆也商量了。古语说，水来土掩，将至兵迎。我们也发兵，只要把蒋介石打得越痛，就越好谈。高树勋委员就是在这个时候起义的。打到1948年冬天，局面就差不多了，到1949年春天，局面就定下来了。现在来算算这笔账，**我们所以能获得胜利，基本的条件是我们代表着人民的希望和方向。**日本投降后，当时全国人民希望休息，哪怕是两三年也好。结果只休息了一年，但就是在这一年里也打了不少的仗。

人民的希望，人民所需要的方向，再加上我们自己的各种努力，过去可以北伐，可以解放全中国，可以进行国家的建设。今后，在人民拥护的基础上，加上我们的努力，我们就一定能够战胜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解放台湾，也一定能够建设一支现代化的革命军队。

我们现在工业、农业、文化、军事都不行，帝国主义估量你只有那么一点东西，就来欺负我们。**他们说“你有几颗原子弹？”但他们有一条对我们的估计是失算的，就是中国现在的潜在力量将来发挥出来是惊人的。**

中国是个大国，要有强大的陆、海、空军。我国有那样长的海岸线，一定要建设强大的海军。全国人民都希望我们有空军，开始的时候只有一支小小的，就像在天安门阅兵时看到的那样。**1954年，我们国家自己出产了一架飞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这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虽然还只是一架教练机。中国是一个庞然大国，但工业不如荷兰、比利时，汽车制造不如丹麦。有一句俗话，叫作“夹起尾巴做人”，做人就是做人，为什么还不能翘尾巴呢？道理很简单，我们现在坦克、汽车、大口径的大炮、拖拉机都不能造，还是把尾巴夹起的好。**希望大家一面努力工作，一面保养身体，一来是为了继续工作，二来是看一看将来我们自己造的飞机、坦克、大炮、拖拉机。

为了我们共同的目标，应当搞出些名堂来，使国家像个样子。能不能办到？能够的，只要我们有信心。我们所有干部，都要努一把力。

今天，国防委员会有各方面的人，具有各个时代经验的人，大家为爱国主义所鼓舞，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这一点是很可宝贵的。**在座许多人是老前辈，你当师长时，我还在当兵。我们有一条是好的，就是我们所做的事，使全体人民都知道。**过去蒋介石有什么意见，人家要猜摸一番，过了一个时期就变了。现在我们用不着猜摸，**我们的方向就是人民的方向**，是载于宪法的。现在常常听到有人说要摸底，有什么底？宪法就是底。共产党的底就是发挥一切有用的因素，破坏阻碍的因素。建设性的力量，包括各种知识分子，旧军队出身的将军和士兵。共产党的将军们，很多也是从旧军队来的，像贺龙副主席就是当过湘西镇守使的。没有天生下来就是共产党的人。一个人初生下来并没有什么任务，母亲生儿子也并不是要他当军人，当将军，这是社会历史条件造成的。

我们的海军，目前还只是一点萌芽。去年我还坐过一次军舰，从汉口到南京，在南京还看过鱼雷快艇演习，**海军战士都是19到23岁的青年，见了他们就忘了我们是老朽。**当时也看到林遵（原国民党海军第2舰队司令，1949年4月23日率领所部25艘舰艇起义，新中国成立后，任国防委员会委员——笔者注）委员，你们变成先生了。建设工业要有工程师，办学校要有教授，要团结他们，没有他们是不行的。当然，没有新人也不行。割断历史是不行的，好像什么都是我们白手起家是不对的。

10月19日下午4时10分，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同来访的印度总理尼赫鲁举行了第一次会谈。中方参加的人员有：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宋庆龄、陈云和中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毛泽东一见尼赫鲁来了，就迎上前去，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说：

“我们欢迎你，十分欢迎你。”

尼赫鲁笑容可掬，连忙说：

“我非常高兴来到中国，这使我非常愉快，我向往这一天已经很久了。我抵达北京后，受到了盛大的欢迎，使我深为感动。我是作为和平和善意的使者到你们这里来的，而我已在这里发现了和平的精神和善意。”

宾主落座后，毛泽东说：

“**我们所有东方人，在历史上都受过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欺侮。中国受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欺侮有100多年。你们的国家受欺侮的时间更长，有300多年。**现在日本人也处在受压迫的境地。因此，我们东方人有团结起来的感情，有保卫自己的感情。中国人民有爱国的感情，有对印度人民和其他东方国家人民的感情。**尽管我们在思想上、社会制度上有不同，但是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要对付帝国主义**。此外，尼赫鲁总理知道，我们的国家不是一个工业国。**我国的工业水平比印度还低**。我们要努力10年20年之后才能取得一些成绩。**我们现在需要几十年的和平，至少几十年的和平，以便开发国内的生产，改善人民的生活。我们不愿打仗。假如能创造这样一个环境，那就很好。**凡是赞成这个目标的，我们都能同他合作。帝国主义国家现在是看不起我们的。我们两国的处境差不多，这也是东方国家的共同处境。”

尼赫鲁说：

“你说的一点也不错。过去200多年来，我们两国和亚洲其他国家都遭受外来殖民主义国家的压迫和统治。这是我们两国共同的经历，也是其他亚洲国家的共同经历。我们有许多共同的地方，这不仅是有过去的联系，而且由于近代都受到殖民主义的统治。”“自古以来我们就有许多共同的地方，现在的问题也是共同的。主席说得对，我们两国工业落后，这是共同的。我们都想尽快发展我们各自的国家。”

毛泽东说：

“我们两国着重的不是思想和社会制度方面的不同，而是我们的共同点。”

“是的，我们着重的是共同点。”尼赫鲁说：“在印度，五项原则被认为不仅适用于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也适用于其他各国之间的关系。”

毛泽东说：

“应当把五项原则推广到所有国家的关系中去。问题是有些大国不愿意受约束，不愿像我们两国那样，根据五项原则订立协定。”

他还说：

“对于中国来说，获得和平并不容易。美国变着法不遗余力地排挤中国。不仅如此，它还炫耀武力，把第7舰队开进了台湾海峡。美国飞机飞到中国内地上空，空投特务。他们还加紧援助和支持蒋介石对中国大陆骚扰性战争。”

尼赫鲁说：

“美国害怕它的利益受到损失，正像一个既得利益者一样，怀着恐惧，神经紧张，四处插手。”

“美国的恐惧也实在太过分了。”毛泽东微微一笑，幽默而又鄙夷地说：“它要把防线摆在南朝鲜、台湾、印度支那，这些地方离美国那么远，离我们倒很近。这使得我们很难睡稳觉。”

尼赫鲁闻言，微笑着点了点头。毛泽东又说：

“国与国之间不应当互相警戒，尤其是在友好的国家之间。像我国同美国这样互相警戒着是不好的。我们是信任印度的，印度是使我们可以睡得好觉的。”

会谈结束时，毛泽东提议下一次专门谈一谈战争问题，尼赫鲁表示，愿意与毛泽东共同讨论。

10月21日晚，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在北京新侨饭店为尼赫鲁访华举行宴会。毛泽东应邀出席。席间，毛泽东对尼赫鲁说：

“我们在合作方面得到一条经验：无论是人与人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合作，都必须是互利的，而不能使任何一方受到损害。如果任何一方受到损害，合作就不能维持下去。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的五项原则之一就是平等互利。”

尼赫鲁点头称是。

10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署名钟洛的文章《应该重视对<红楼梦>研究中错误观点的批判》。

钟洛的这篇文章，公布和体现了毛泽东10月16日那封信中的一些内容。

10月23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同尼赫鲁举行第2次会谈。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宋庆龄、陈云和中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在座。毛泽东微笑着问坐在对面的客人：

“你们两位总理的会谈进行得如何？发生冲突没有？”

尼赫鲁说：

“会谈得很好。怎么能有冲突呢？”

毛泽东笑着说：

“我们同印度好像没有多少架好吵。”

接着，他直奔主题，问道：

“关于战争问题，不知尼赫鲁总理有何看法？”

尼赫鲁谦虚地说：

“主席是这方面的专家，你的意见应该得到最大程度的尊重。”

“我认为，战争并不那么可怕。”毛泽东说：“从战争最后结果来说，决定因素是人。至于武器，当然某一方拥有先进的武器，就占有优势。但是这是暂时的现象。仅靠先进的武器来赢得彻底胜利，根本不可能，除非一开始就一次性把对手完全毁灭。**从现代战争的意义上说，原子弹、氢弹似乎可以做到这一点，但这是冒极大风险的，侵略者可能由此丧失了自己存活的权利和机会。谁又能把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大国，一下子翻个底朝天，然后扔到太平洋或印度洋里去呢？破坏之后的彻底征服，只能作为梦想而无法实现**。战争，只会加速人民的觉醒，导致人民的反抗。人民持久的反抗，必将削弱以至打败侵略者。第2次世界大战削弱了日本，中国得以从帝国主义的铁蹄下站立起来。英国被削弱，印度便获得了独立。”

尼赫鲁说：

“我认为，你所说的人是战争胜败的最后的决定因素；战争可以使人觉醒，最终获得解放；这一点是对的。但是，战争也可能把人类变得残酷，变得堕落。如果战争消灭了有知识和有训练的人，那么一切都得从头做起，人类将面临巨大的倒退。”

毛泽东知道尼赫鲁是印度圣雄甘地的忠实追随者，曾经坚定不移地信奉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策略，反对一切暴力运动。眼看话不投机半句多，他便就来了个顺水推舟，说道：

“所以，归根究底，我们应该共同努力来防止战争，争取持久的和平。”

尼赫鲁则说：

“终有一天，世界的调整都用协议来完成。”

毛泽东问道：

“在世界调整以前，从现在起，10年之内没有战争，可能吗？”

尼赫鲁依然坚持他的信仰和愿望：

“终有一天，人们会承认，战争如果爆发，会把双方都毁掉，谁也打不起战争。不过我并不能提出任何担保。”

毛泽东看看谈不下去了，就打算结束这个话题，他说：

“尼赫鲁总理到中国来已经有几天了，一定已经知道了我们的情况。**我们现在正在执行‘五年计划’，社会主义改造也正在开始。如果发生战争，我们的全盘计划就会被打乱。**我们的钱都放在建设方面了。如果发生战争，我们的经济和文化计划都要停止，而不得不搞一个战争计划来对付战争。这就会使中国的工业化过程延迟。但是把中国全部毁灭，炸到海底下去，是有困难的。中国人是会永远存在的。”

毛泽东最后又谈到了在两个月前会见英国工党代表团的情况。这是尼赫鲁所关心的事。他告诉尼赫鲁说：

“同英国工党代表团谈谈是好的，意见虽然不同，但是谈开了是有好处的。我们热诚地招待了他们，他们想看的都给他们看了。”

10月24日，郑振铎主持召开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红楼梦研究讨论会。一些《红楼梦》研究者和大学古典文学教授参加了讨论会；李希凡和蓝翎也参加了讨论会；受批判的对象俞平伯更是不能缺席的，还有他的助手王佩璋；与会者共有49人。另外还有报刊编辑20人作为旁听者列席了会议。何其芳、老舍、王昆仑、启功、舒芜、冯至、黄药眠、聂绀弩、范宁、钟敬文、吴恩裕、杨晦、浦江清等人在会议上先后对俞平伯、对《红楼梦》的研究观点作了批判性的发言。

10月26日，尼赫鲁携爱女英迪拉·甘地夫人（后来成为印度总理）及其他的随访官员，来到中南海勤政殿向毛泽东辞行。双方举行了第3次会谈。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宋庆龄、陈云和中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也在座。尼赫鲁对毛泽东说：

“在这里我结识了许多朋友，也得到了很深的友情。我虽然要走了，但是可以说，已经把我的一部分留在中国了。”

他又转对周恩来说：

“我想周总理一定知道法国的一句话：‘离别好像是使人死去一部分一样’。”

毛泽东听他这样说，当即吟诵了屈原《九歌·少司命》中的两句诗：

“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

吟罢，他解释说：

“离别固然令人伤感，但有了新的知己，不又是一件高兴的事吗？”

接着，他向尼赫鲁这位异国政治家介绍了屈原的生平。他说：

“屈原是中国一位伟大的诗人，他在2200多年前写了许多爱国的诗篇，政府对他不满，把他放逐了。最后屈原没有出路，就投河而死。后来，中国人民就把他死的一天作为节日。这一天就是旧历五月五日端午节。人们吃粽子，并把它投入河里喂鱼，使鱼吃饱了不伤害屈原。”

尼赫鲁说：

“主席刚才引用的两句诗，不仅适用于个人，而且也适用于国与国之间。我们两国经过了很久的时期以后又相遇了，因此第二句诗特别适用。”

毛泽东说：

“尼赫鲁总理这次来访，一定会看出来，中国是很需要朋友的。”“我想印度也是需要朋友的。”“朋友之间有时也有分歧，有时也吵架，甚至吵得面红耳赤。但是这种吵架，和我们同杜勒斯的吵架，是有本质上的不同。”“我们是一个新中国，虽然号称大国，但是力量还弱。在我们面前站着一个强大的对手，那就是美国。美国只要有机会，总是要整我们，因此我们需要朋友。”

毛泽东对尼赫鲁提出的建立和扩大和平区域的建议表示支持，他说：

“建立和扩大和平区域是一个很好的口号，我们赞成。为此目的，就需要去除一些足以引起怀疑、妨碍合作的因素。中印签订了关于西藏的协定，这是有利于消除引起怀疑、妨碍合作的因素的。我们共同宣布了五项原则，这也是很好的。华侨问题也应该适当地解决，免得有些国家说我们要利用华侨捣乱。”“凡是足以引起怀疑、妨碍合作的问题，我们都要来解决，这就能达到五项原则中的平等互利。”

尼赫鲁表示赞同。第二天，他便离京去华东、华南参观访问。

10月27日，毛泽东在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关于10月24日中国作协古典文学部红楼梦研究讨论会的情况报告上作出批示。

报告中说：看到毛主席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示后，作家协会党组即召开了会议，参加会议的同志初步检查了自己思想上的错误和缺点，大家认为这是又一次暴露了文艺方面的领导同志对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危害性的严重麻痹和忽视新生力量的狭隘作风。为了开展这一思想斗争，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于本月24日召开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讨论会，到会的有古典文学研究者、作家、文艺批评工作者和各报刊编辑等60多人，俞平伯在上午也到了会。会上，一致认为李希凡、蓝翎二人关于《〈红楼梦〉研究》和《〈红楼梦〉简论》的批评具有重要意义，并且认为消除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观点在古典文学研究界的影响，是一场严重斗争，经过这个斗争，将使古典文学研究工作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报告指出：在讨论和批评中必须防止简单化的粗暴作风，允许发表不同的意见，只有经过充分的争论，正确的意见才能真正为多数人所接受。对那些缺乏正确观点的古典文学研究者，仍应采取团结的、教育的态度，使他们在这次讨论中得到益处，改进他们的研究方法。这次讨论应该发展到其他部门去，从哲学、历史学、教育学、语言学等方面彻底地批判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影响，以确立和巩固我国整个学术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领导地位。

毛泽东在陆定一的这个报告上批示道：“刘、周、陈、朱、邓阅，退陆定一办。”

这一天，毛泽东还审阅了袁水拍的《质问<文艺报>编者》。袁水拍在文章中写道：

“这种老爷态度在《文艺报》编辑部并不是第一次。在不久以前，全国广大读者群众热烈欢迎一个新作家李准写的一篇小说《不能走那一条路》及其改编而成的戏剧，给各地展开的国家总路线的宣传起了积极作用。可是《文艺报》却对这个作品立即加以基本上否定的批评，并反对推荐这篇小说的报刊对这个新作家的支持，引起文艺界和群众的不满。《文艺报》虽则后来登出了纠正自己错误的文章，并承认应该‘对于正在陆续出现的新作者，尤其是比较长期的在群众的实际生活中，相当熟悉群众生活并能提出生活中的新问题的新作者……给予应有的热烈欢迎和支持’，而且把这件事当作：‘一个很好的教训’。可是说这些话以后没有多久，《文艺报》对于‘能提出新问题’的‘新作者’李希凡、蓝翎，又一次表示了决不是‘热烈欢迎和支持’的态度。”

毛泽东在袁水拍这段话后面，亲笔加上了一段话，他写道：

**“文艺报在这里跟资产阶级唯心论和资产阶级名人有密切联系，跟马克思主义和宣扬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却疏远得很，这难道不是显然的吗？**”

写罢，他将该文批给了邓拓，要求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接着，毛泽东应湖南省省长程潜的请求，提笔书写了“湖南省人民委员会”8个大字。

原来在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以后，各级人民政府按照宪法规定，统统改称为人民委员会。

毛泽东写罢，叫来工作人员，将这幅墨迹寄给程潜。

10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袁水拍的《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

周扬看到这篇文章后，立即给袁水拍打电话，向他询问情况。袁水拍告诉他说，这是毛主席批发的。

10月间，中共中央组织部通过新华社为毛泽东物色一个懂英文的国际问题秘书，在新华社国际部工作的林克被选中了。新华社领导找林克谈话，林克毫无思想准备，他一方面感谢组织对自己的信任，又担心自己能否胜任。领导鼓励他说，相信你能做好这个工作。

这一天，一辆小轿车载着林克从中南海西门经过怀仁堂，沿着中南海边的马路向南驶去，经过勤政殿和对面的瀛台，在丰泽园大门西边的静谷停了下来。静谷的门呈八角形，4边门框用汉白玉砌成，横额上镌刻着“静谷”二字，两边镌刻着一幅对联，上联是：胜赏寄云岩，万象总输奇秀；下联是：清阴留竹柏，四时不改茏葱。

静谷有两重院落，房屋已经破败。前院有高耸的苍松翠柏，还有些假山。办公厅副主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田家英，就住在这个院子的3间西屋里。后院也是一个四合院，3间北房是办公厅主任张经武及其秘书的办公室，他们不常来。耳房是毛泽东的图书管理员、田家英的秘书逄先知的居室。林克被安排在3间西房里，这里是两明一暗，家具只有1张办公桌，两把椅子，1个文件柜，1张木床。南房也是前院的北房，是毛泽东临时的藏书室。这个院子有条走廊通往毛泽东的住处菊香书屋。走出静谷，东侧就是丰泽园的大门。在1957年以后，为了工作方便，林克搬进了菊香书屋的东院，距毛泽东的寝室只有20多米。直到1966年8月离开中南海，林克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12个春秋。

林克在见到毛泽东之前，田家英找他谈话说：

“你要有思想准备，要有坐冷板凳的准备，要刻苦钻研，充实多方面的知识，否则也可能在三五年内帮不上主席的忙。”

田家英还谈了他自己的工作体会，使林克感觉到毛泽东对秘书的工作要求很高，对自己能否胜任不免有点疑虑。

10月下旬，粟裕应召来到毛泽东菊香书屋的办公室，毛泽东问他：

“你到总部工作快3年了，各方面都适应了吧？”

粟裕回答说：

“逐渐适应了。在总部工作和在野战军大不相同，关系全局，压力很大。”

毛泽东说：

“人就是要不断地加压才能有所作为，当然不能压垮了。身体怎么样？好多了吧？”

粟裕说：

“好多了。感谢主席和中央安排我去苏联治病，基本解决了我的老毛病。”

毛泽东说：

“不过还是要注意劳逸结合，收支平衡。经常透支，时间一长，身体就会吃不消的。这几年你在总参干得不错，能较好的看出问题，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和建议，我和军委都采纳了，部队反映很好。”

粟裕说：

“我是按照主席和中央指示做工作，许多方面做得还不很好，缺点、问题不少。”

“很好，很好。当然不是说没有缺点，中央和军委比较满意。”毛泽东喝了一口茶，继续说道：“这次找你来谈谈，是要向你传达中共中央的最新决定，要你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粟裕一听感到很突然，连忙站起来说：

“主席，我不能胜任，这副担子太重了！”

毛泽东要他坐下来，肯定地说：

“这是我首先提名的！根据我的了解，你可以胜任，能够把这副重担挑起来，而且挑得很好。中央和军委其他领导都这样认为。”

粟裕说：

“当总长和当副总长大不一样。副总长我当得还不好怎么能当总参谋长呢？全军比我水平高的同志很多，应该从他们中间挑选。”

毛泽东说：

“我考虑很久了，相信你可以胜任。中央已经决定，你就干吧。不要有什么顾虑，大胆工作，我和军委支持你。”

粟裕见毛泽东这样说，就起身表态说：

“中央已经决定，我服从中央决定，一定努力去干。”

毛泽东朝粟裕做了一个手势，待他坐定，又交代说：

“总参谋部首先是军委的最高参谋机构，同时又是军委的办事机构。作为总参谋长，一定要在军队建设、国防建设的战略性大事上给军委当好参谋。你在这方面有长处，要进一步发扬。牡丹虽好，还需绿叶扶持。中央会很好考虑选配副总参谋长。我赞成你刚才讲的，努力去干吧。”

10月31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发布命令：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任命粟裕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任命陈赓、张宗逊、李克农、王震、许世友、邓华、彭绍辉、张爱萍、杨成武、韩先楚为副总参谋长。

任命黄克诚为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萧向荣为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在中央军委领导下，负责协调各总部的工作。

10月31日下午，毛泽东、刘少奇、李富春乘专列离开北京南下。毛泽东在专列上召见了水利专家林一山。

此时，毛泽东已经了解到1954年长江特大洪水的损失，远远超过修建三峡大坝工程的投资。他用了整整一夜的时间，听取了林一山关于三峡工程的技术问题和坝址的情况汇报。

毛泽东首先询问了花岗岩的风化情况。林一山回答说：

“花岗岩是坚硬的、不透水的，但花岗岩风化较快。石灰岩漏水，但是它抗风化。”

“你们都做了哪些勘探工作？”

“在三峡坝区，我们只是做了一些坑探，所以对它的地质情况，现在只是一个初步的了解。根据坑探资料，我们所选择的三斗坪坝区，属于花岗岩地带，其地形地质条件都很好，只是岩石风化问题比较严重。”

“根据已有资料，风化层有多厚？”

“根据国内外资料，世界上已有风化层最深的可达百米。”

“如果这里风化层有100米，那么，100米以下呢？”

“风化层以下，就是新鲜的花岗岩了。请主席不用担心，我们现在还未全面勘探，在它的上游，有一段片麻岩河段。”

**“好，好！”毛泽东顿时面带笑容的连声说：“片麻岩是花岗岩的变质岩，抗风化性能要好得多，这下子好办了。**”

接着，他问起三峡工程在技术上的可能性。林一山说：

“如果中央要求在较早的时间内建成，依靠我们自己的技术力量，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是可以完成的。”

毛泽东问：

“你的根据是什么？”

林一山回答说：

“目前，苏联在建的水利工程，在技术上、规模上同美国已经建成的差不多。当年美国工程师萨凡奇有信心建三峡工程，那么我们可以相信，苏联水利专家同样有这个水平。如果不用苏联专家的帮助，我们自己也可以建成三峡工程，但需要在例如丹江口水利枢纽这样的工程建成以后，因为这个工程的规模，也算得上是世界第一流的大工程了，我们有了这个经验，就可以把技术水平提高到能够胜任三峡工程的设计了。不过，这样设计工作的时间就要长一点。”

毛泽东点点头，表示同意林一山的分析。

1954年11月3日，毛泽东、刘少奇、李富春等人到达广州，开始集中力量审阅第1个“五年计划”草案。

后来，周恩来乘飞机也来到了广州。

11月8日，郭沫若以中国科学院院长的身份，以《文化学术界应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为题，向《光明日报》记者发表了谈话。郭沫若在这个谈话中，根据毛泽东指示信的精神，发出了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的号召，他说：

这是“一场严重地思想斗争”，“应该看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与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的斗争。”

郭沫若还说：

“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学术观点在中国学术界是根深蒂固的，在不少的一部分高等知识分子中还有着很大的潜在势力。我们在政治上已经宣布胡适为战犯，但在某些人的心目中胡适还是学术界的‘孔子’。这个‘孔子’我们还没有把他打倒，甚至可以说我们还很少去碰他。”

11月10日，毛泽东仔细阅读了《人民日报》上署名为黎之的文章，文章的题目是《<文艺报>编者应该彻底检查资产阶级作风》。文章中说：“正是这种骄傲自满的情绪，使《文艺报》逐渐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对新鲜事物越来越失去了感觉。”

毛泽东在这段话旁打了个问号，批道：

**“不是骄傲的问题，而是编辑部被资产阶级思想统治了的问题。”**

文章中说：“在许多问题上，表现出《文艺报》编者已丧失对当前重大政治问题的敏锐感觉。”毛泽东旁批道：

**“不是丧失敏锐感觉，而是具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极敏锐的感觉。”**

文章中说：“《文艺报》编者的骄傲自大的情绪，也表现在这个刊物的老大的作风上面。”毛泽东在“骄傲自大”和“老大的作风”这些文字下面画了粗线，旁批道：

**“不是这些问题，而是他们的资产阶级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问题。”**

11月14日，毛泽东看到《南方日报》上转载的冯雪峰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一文，他边读边批。冯雪峰检讨说：“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内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长期的统治着的事实，我就一向不加以注意，因而我一直没有认识这个事实和它的严重性。”毛泽东旁批道：

**“限于古典文学吗？”“应说从来就很注意，很有认识，嗅觉很灵。”**

冯雪峰检讨说：“这完全说明我对于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失去了锐敏的感觉，把自己麻痹起来，事实上做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毛泽东在旁边批注：

**“一点没有失去，敏感得很。”**

冯雪峰检讨说：“我感染有资产阶级作家的某些庸俗作风，缺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斗精神。”毛泽东批道：

**“不是‘某些’，而是浸入资产阶级泥潭里了。”“不是‘缺乏’的问题，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冯雪峰检讨说：“我平日当然也做过一些帮助青年的工作，例如替他们看原稿，设法把他们的作品发表或出版。但虽然如此，仍然可以不自觉地在心底里存在着轻视新生力量的意识。”毛泽东在这一段中的“可以不自觉地”和“在心底里存在着”几个字旁划了竖线，批注：

**“应说自觉的。不是潜在的，而是用各种方法向马克思主义作坚决斗争。”**

冯雪峰检讨说：“这是立场上的错误，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毛泽东在“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旁画了粗线，批道：

**“应以此句为主题去批判冯雪峰。**”

11月的一天，毛泽东曾到广州越秀山游泳池尽情游了一番，尔后坐在树影婆娑的游泳池畔，和他的新任秘书林克进行了第一次交谈。毛泽东很有兴致地询问林克有多大年龄，什么地方人，询问他的学历和工作经历。林克说：

“我的原籍是江苏常州，今年29岁了。幼年生活在保定。”

毛泽东听林克提到保定，就说：

“保定很有名呀，是兵家必争之地。我在20年代曾到过保定，并沿着城墙走了一圈。你晓得那里有个莲花池吗？那是北洋军伐头子曹锟的私人花园。”

他淡淡一笑，接着说：

“曹锟用5000银元1张选票，收买了500多名‘猪仔议员’，很下本钱呐。他是个很有名的贿选总统哩！”

往事如烟，毛泽东一触及历史，总能信手拈来一段与话题有关的历史故事。林克见毛泽东讲完了，就接着介绍自己的经历，他说：

“我们举家在七七事变后迁到北平。我是燕京大学经济系毕业，1946年在大学参加了地下党，参加并组织了学校的历次学生运动。离开学校后，我被调到华北局城市工作部，从事社会调查工作。解放后，被调到新华社工作。”

毛泽东听完了林克的介绍，就说：

“当前你的工作就是研究国际形势的发展和重要动向，随时向我汇报。”

他又诚恳地对林克说：

“你做我的老师，教我英语，好么？过去，我做过教书先生，现在要做学生，拜师喽。”

林克从别人那里得知，毛泽东在延安时就自学过英语，但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现在学习从哪儿入手，心中没底。于是，他就建议说：

“您看，是不是从学习一些短的政论文章开始？”

毛泽东欣然同意。林克随即拿出一本事先准备好的《人民中国》给毛泽东看。

自此以后，林克无论在哪里，总是要在公文包里带着毛泽东学习的英语材料。毛泽东学习英语的兴致很高，善于挤时间学习，经常在起床后，在饭前、饭后、游泳、登山、散步之后，在开会或会见内外宾客之后或长时间紧张工作之后，学一点英语。他在外地巡视期间，无论在火车上、轮船上、飞机上，都随时挤时间学英语。除了重要会议或生病之外，从未中断。

11月25日，毛泽东结束在广州的工作，在返京途中，专列停在株洲车站。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省公安厅李强、唐瑞亭等早早来到株洲车站，迎候毛泽东。

毛泽东在站台上踱步，遇见一位铁路局的年轻负责人，便问他多大年纪。年轻人回答说27岁。毛泽东很高兴地说：

“好啊，你们年轻人起来了，我就放心了。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马列主义，把建设祖国的任务完成好。”

是日中午，毛泽东又乘专列到了长沙，在大托铺专线停车休息，不久，乘汽车到程潜先生家去探望他，又观看了长沙市容。

晚7时，毛泽东离开长沙北上。

11月28日，毛泽东同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一起回到北京。

欲知毛泽东回京后的工作情况，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54年10月23日同尼赫鲁谈话时说：“**我们现在正在执行‘五年计划’，社会主义改造也正在开始。如果发生战争，我们的全盘计划就会被打乱。**我们的钱都放在建设方面了。**如果发生战争，我们的经济和文化计划都要停止，而不得不搞一个战争计划来对付战争。这就会使中国的工业化过程延迟。但是把中国全部毁灭，炸到海底下去，是有困难的**。中国人是会永远存在的。”这才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对朋友，对敌人，既不吹牛，也不示弱。正像他自己所说的“**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在10月31日同水利专家林一山谈到三峡坝区的地质情况，当林一山说：“请主席不用担心，我们现在还未全面勘探，在它的上游，有一段片麻岩河段。”毛泽东**顿时面带笑容地连声说：“好，好！片麻岩是花岗岩的变质岩，抗风化性能要好得多，这下子好办了。**”由此可见他对地质学有关方面的材料已经进行了研究，这就是政治家的另一面！你还能说他只会打仗吗？

**第8章**

**“目前主要的危险倾向是急躁冒进，把私商排挤得过**

**快过多，以致失业人员大增，一时无法安插。”**

话说1954年11月底，王季范接到中南海的电话，毛泽东的秘书通知说：

“主席今天下午接见文运昌和文梅清两位老人，请你和章淼洪同志一起去。”

秘书还告诉他说，要把章淼洪的母亲文静纯一起请去。

前文已经讲过，文运昌年届七旬，体弱多病，难以单独外出旅行。又因王季范及其儿媳萧凤林复信之故，加之天气渐冷，致使他二次赴京迟迟没有动身。正在此时，文梅清和文蔚池要求上京，得到毛泽东的许可，于是，3人结伴同行，于10月底到达北京，住在王季范家里。将近一个月来，他们依旧是游览名胜，参观首都这几年的建设，等候毛泽东的接见。

文运昌、文梅清听说毛泽东要接见他们的消息，异常兴奋，连声说：“好，好。”文静纯也满口答应了。

中南海来了两辆轿车，文运昌、文梅清、文蔚池、王季范、文静纯依次上了轿车，同去的还有章淼洪和两个女儿。

这一天，毛泽东接见的家乡客人还有他的老同学邹普勋，堂弟毛泽连，老朋友谭熙春，堂叔祖毛锡臣。在京的钱希钧、毛远耀、胡觉民等人也应邀作陪。

毛远耀是在1953年由衡阳市委书记调回北京化工部工作的。他一家到京后，可以经常见到毛泽东。

毛泽连、毛锡臣、邹普勋、谭熙春4人是在9月份来到北京的，他们抵京后，住在西郊宾馆。

丰泽园里车来车往，人声喧哗，好不热闹。毛泽东用韶山口音对大家说：

“今天请大家来，我们一起会会餐，打打讲。”

他询问了家乡土改和生产情况。毛锡臣和毛泽连说：

“乡下土改，我们分了田，每人平均9分田。”

毛泽东说：

“东北土改，有的地方人均七八亩地，最少的也有四五亩。”

毛泽连问：

“北方怎么有那么多地？”

毛泽东说：

“北方地多人少，南方地少人多。将来最好是从南方迁一部分人到北方去。”

毛泽连说：

“他们不会愿意上北方，南方人在家乡搞习惯了，到北方生活怎么能习惯呢？”

毛泽东笑道：

“那就听他们自己的，我不勉强。**农村要解决生产困难，人民要提高生活水平。农民没饭吃，没油吃，这怎么行？要养好猪，开荒种地，多种些油菜，多种些山薯。山薯可以补充粮食，可以喂猪，猪肉多了就能提高农民生活水平。**”

毛锡臣说：

“现在农村缺少肥料。不过，大家都在想办法，担塘泥巴，换陈墙土还田。”

“今年担塘泥，明年换陈壁，后年怎么办呢？”毛泽东摇摇头，又说：“**要多喂猪，多喂牛，猪牛都可以造粪。单靠猪牛粪还不行，国家还要想办法，搞些肥料，譬如办化肥厂。你们回去也要多想些办法，多开荒，多积肥。田多肥足，粮食也就可以增产了。**”

毛锡臣说：

“我们田里都种了草籽、油菜，都种了粮食和小菜。”

毛泽东又想起了过去熟悉的韶山那几个头面人物，他问毛锡臣：

“毛吉臣还在不在？”

毛吉臣是毛锡臣的堂兄，地主出身，韶山过去的“四大宪”之一。毛锡臣回答说：

“毛吉臣死了多年，他有4个儿子。有一个原来在国民党部队，现在搞回来了。其余3个都在家种地，还有几个孙，也在家劳动。”

毛泽东点点头，又问到韶山另一位绅士毛棠圃。毛锡臣说：

“毛棠圃死了。”

毛泽东问到劣绅毛明德。毛锡臣说：

“也死了。只剩下毛鸿初了。”

毛泽东说：

“毛鸿初没有文化，只是嘴巴子厉害，会讲，跟他们搞到一起。”

邹普勋插话说：

“我姐姐毛邹氏到北京来了一段时间了，住在她儿子毛泽全家，很想来见见主席，只是怕打扰主席的工作。”

毛邹氏是毛泽东的启蒙老师邹春培的女儿，是毛泽东堂叔毛喜生之妻。大革命时期，她曾帮助过毛泽东。抗日战争爆发后，她又把儿子毛泽全送到了延安。毛泽东听邹普勋这么一说，连忙道：

“不要紧，我马上派人去接她来。”

毛泽东命叶子龙驱车前往后勤部大院，接毛泽全一家人。毛泽全和他的母亲，他的妻子徐寄萍及3个女儿，先后上了车。车子经新华门驶向中南海。叶子龙笑着对毛泽全说：

“今天到主席家去的人多，乡下来了好几位亲友，王季范先生也去了。主席的孩子平时住校，今天星期六，也都回来了。”

叶子龙走进会客厅，向毛泽东报告说：

“主席，泽全同志全家来了。”

毛泽东问道：

“他母亲来了吗？”

叶子龙说：

“同车来了。”

“婶母来了！”

毛泽东连忙起身朝屋外走去。卫士长李银桥见毛泽东起了身，也跟着向外面走去。毛泽东来到菊香书屋前的草坪里，已听见南屋走廊里传来一阵笑语。

“婶母您好！”

毛泽东迎上前去，朝着毛邹氏亲切地叫着。老太太颤巍巍地移动着缠裹的小脚，仔细端详着毛泽东，也激动得喊了一声：

“润之！”

毛泽东拉着毛邹氏的手，亲热地说：

“婶婶！您老人家身体好吗？”

“好，好。”

老太太爽朗地说。

“你老人家什么时候来北京的？”

“来了3个月了。”

毛泽东转身对毛泽全、徐寄萍说：

“婶婶到北京这么久了，你们也不告诉我一声？”

毛泽全连忙解释说：

“主席工作忙，我们怕打扰您……”

毛泽东摇了摇头，对邹氏说：

“不要紧。你叫泽全打个电话给我，我抽个时间见见你，不就行了嘛。”

毛泽东说着，双手搀着老太太走上屋前的台阶，一边走一边嘱咐说：

“慢点走，您老人家慢慢走。”

老太太年近8旬，又是小脚，她倚着毛泽东，慢慢地移动着小脚，也喃喃地说：

“慢点，慢点。我老了，腿脚不行了。”

毛泽东把客人迎进屋里。屋里先到的一众客人毛锡臣、王季范等，与毛泽全和他的母亲都相互打着招呼，笑语盈盈，好一场乡亲大聚会。

毛泽东的女儿李敏、李讷、侄子毛远新及毛岸英的爱人刘思齐也都回来了。李敏非常活泼热情，她的两条长辫子垂在两耳后边，笑眯眯地倒茶水，削水果，招呼客人。李讷则不爱说话，她只是羞涩而矜持地站在一边。

吃饭时，客厅里摆了两张大圆桌，宾主就座，大人一桌，青年人和孩子们一桌。大家一边吃一边谈笑风生。毛泽东给客人们敬了酒，又劝大家多吃菜。饭菜虽然比较丰盛，却也还是二米饭和一般的家乡菜。

文运昌生性诙谐，不拘小节，他爱喝酒，好讲大话，外号“酒癫子”，喝起酒来讲话不免失口，就是到了中南海毛泽东家里作客也不免喝醉。在毛泽东心目中，十六哥是一个“不大老实的人”。所以，毛泽东也不多劝他喝酒。

叶子龙从一大盘红烧肘子里挑了一块肉，放到毛泽东饭碗里，毛泽东很快吃了；叶子龙又从青年人和孩子们的餐桌上，夹了一块红烧肉给毛泽东，毛泽东吃得特别香。

饭后，毛泽东又和文家表兄谈起在外婆家读书的事，还背诵了外婆家堂屋的一幅对联。文运昌把带来的几本线装书拿给毛泽东看，这些书都是毛泽东当年读过的。徐寄萍拿过一本一看，只见书中每一页都用毛笔写满了蝇头小楷。毛泽东见到自己几十年前读过的书，如今还保存完好，很是高兴，他对文运昌说：

“十六哥，你还真会保存文物啊！你可当收藏家啰。”

“泽全，”毛泽东指着邹氏对毛泽全说：“泽全，你母亲是个好人，你父亲死得早，她带着你们受了很多苦。现在，你们要好好照顾婶母，让她老人家过一段好日子。”

他还说：

“大革命时期，我有一次到韶山调查，婶母见我脚上布鞋破了，连夜赶做了一双新布鞋给我穿。那双鞋，我一直穿到广州。”

毛泽全听了，心头一热，说：

“几十年前的一桩小事，主席还记得这么清楚。”

有一位表兄没见江青，就问道：

“主席，怎么不见江青同志？”

毛泽东风趣地说：

“她是候鸟，冬天去南方，夏天去北方，不常在家。”

文运昌提出请毛泽东给湖南省政府写一个条子，为他在湖南安排一个参事之类的工作。毛泽东一听，神色顿时严肃起来了，他说：

“建国后，韶山很多乡亲想来北京看看，我是很欢迎的。但是，一年不能来的太多，来多了我招呼不起哟！你们来去的一切费用，都是我的稿费支付的。另外，还要给当地政府添许多麻烦。生活确实困难的，我可以接济点，至于安排学习、工作这类的要求，就办不到了。”

毛泽东又指着毛泽全、钱希钧、毛远耀等人说：

“他们干革命，都是靠自己、靠组织闯出来的，我是从不干预。”

文运昌见毛泽东这么说，就再不做声了。

“还有，”毛泽东清了清嗓子继续说：“你们也不要打我的旗号，找湖南当地政府的麻烦。这点请你们原谅，也请你们回去跟其他的亲友说清楚。”

此时，毛泽连、谭熙春、邹普勋、毛锡臣等因来京日久，打算回湖南去，毛泽东就说：

“十六哥他们可以和你们一起走。”

文运昌一听就不高兴了，他说：

“主席，我还没有打算走啊！”

毛泽东听了，有些生气地说：

“你走不走由你，我不管你了！”

文运昌只好答应和毛泽连等人一同乘火车返回湖南。毛泽东在客人们离京时，给谭熙春、毛锡臣这些第一次来京的人，分别添置了一套棉被、一套棉衣裤及鞋帽等物品；其余的客人都是第2次来京，以前已经添置了衣物，这次就免了。邹普勋告诉毛泽全、徐寄萍说：

“这次来京的乡亲，主席为他们添置的衣物规格，比以前低多了，主席也真是招待不起了。”

文运昌听了，也感慨不已。他想：主席虽然生性节俭，且有不少稿费收入，但开支大，经济并不宽裕，今后可不能过多地来北京打扰他了。

1954年12月1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和缅甸联邦首任总理吴努率领的代表团进行了第一次会谈。吴努是在11月30日应周恩来之邀，首次来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陈毅及中国首任驻缅甸大使姚仲明参加了会见。

毛泽东一见吴努就关切地说：

“今天天气有点冷。”

“很冷。我们是从一个气候炎热的国家来的。”吴努拘谨地说：“我有这个机会来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领袖致敬，非常高兴。我们听到毛主席的名字，已经很久了。主席的名字，对于为自由而斗争的缅甸青年来说，一直是一个鼓舞的源泉。”

“谢谢。”毛泽东说：“我们也高兴看到吴努总理、吴努夫人和其他几位朋友。中国人民也很高兴，因为我们两国是密切的邻邦，多年的友好国家。”

他针对一些周边邻国因受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的挑拨而对中国产生恐惧心理的情况，开门见山地问吴努：

“在历史上，中国同缅甸打过仗吗？恐怕次数很少吧？”

“打过两次。”吴努小心翼翼地说：“一次是在元朝忽必烈汗的时期，另一次是在清朝。但是我们同汉族从来没有打过仗。”

**“这两次战争，都是中国人不对，中国侵略了你们。”毛泽东真诚地说：“在历史上，朝鲜和越南受中国的气最多，缅甸比较少。**以后我们两国应该和平共处。”

毛泽东的坦荡和自责使吴努很受感动，他那拘谨的心情和不必要的顾虑顿时一扫而光，于是也敞开了心扉，说道：

“很坦率地讲，我们对于大国是恐惧的。但是周恩来总理访问了缅甸以后，大大消除了缅甸人的这种恐惧。”

毛泽东说：

“我们之间来往多了，更熟悉了，就能更好相处。两个国家在一个时期之内互相不够了解，这是很自然的。我们应该在合作中增进了解。我们很需要和平的环境，我们还有许多事没有办好。我们两国的经济水平差不多，主要都是农业国。像中国、缅甸、印度、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国家，大体都在同样的一个经济水平上。我们都希望把自己的国家变成工业国家。这是一个长时期的工作，不能在短期内完成。**我们需要的是国际合作和帮助，我们需要和平环境，我们需要朋友。因此我们看到吴努总理，感到很高兴**。”

吴努点了点头，动情地说：

“中国对缅甸的态度一直是正确的。如果中国政府利用了国民党军队在缅甸这一事实，那可能使缅甸政府遇到很多麻烦。但是中国政府不但不加利用，而且对缅甸政府的困难表示同情。对于中国政府这样一个正确和友好的态度，我代表缅甸政府和人民向主席致谢！”

吴努所说的在缅甸的国民党军队，是李弥部的大批残匪越境流窜在缅甸边境一带，大肆破坏、袭扰、贩毒、抢掠。毛泽东见吴努主动提及此事，便摆了摆手说：

“你们的困难，我们是谅解的。我们知道，国民党军队继续在缅甸存在，是因为你们有困难，而不是你们故意允许他们留在缅甸。我们决不借口国民党军队在缅甸，而破坏我们两国间的和平关系。”

说罢，他点燃了一支烟，接着说：

“我们曾经对边境上的人下过严格的命令，叫他们只采取防御措施，不得越过边境一步。”

吴努说：

“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取的不是一个同情我们的态度，那么很可能发展成为第二个朝鲜或印度支那。这是我们过去所担心的。因为上一次战争使我们的国家遭到很大的毁坏，许多城市被夷为平地。**过去我们曾从美国政府接受过两年援助，但是后来我们停止接受了。虽然我们非常需要援助，但是我们更需要和平和中国的友谊。我们把中国的友谊看得比美援还重要。”**

毛泽东说：

“我们两国的国界很长，有些疆界还没有定。我们两国边境上的少数民族也有许多是相同的，这些人互相往来是非常可能的；不满意政府的人相互跑，也是非常可能的。但是我们决不利用跑来的人，去损害缅甸政府的利益。这就是互不干涉内政，同时也是互利，因为互利就不能互相损害。”

他还说：

“你们心里想的，我们知道。你们怕我们的云南省对你们不利。”

吴努毫不掩饰地说：

“是的，怕得很。正因为如此，我曾建议周总理同我一起到云南走一趟。但是，很遗憾的是我们的飞机这次不能飞过云南的山脉。”

毛泽东耐心地解释说：

“我们的想法同你们的想法是有些距离的。你们很害怕，因为不了解情况。我们对情况很清楚。我们嘱咐那里的人对缅甸友好，不要闹麻烦。我们已经作了准备，让吴努总理从云南回国。”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接着说：

“我们应该想出各种办法来解决我们之间的问题，这样可以增加我们的互信。也许有些问题现在还不能解决，例如边界问题，不过将来是要解决的，可以留到以后解决。总之，要使双方的利益不受损害。”

关于华侨问题，毛泽东说：

“我们经常教育华侨遵守居留国的法律，不参加居留国国内的非法活动，搞好同居留国政府和人民的关系。国籍问题也要搞清楚，到底是中国籍还是外国籍，不应该有双重国籍。”

吴努说：

“在周总理访问仰光的时候，我曾经向他提出这个问题。他说这个问题超出他的权限，必须回国后同他的同事们商量。今天听到主席关于双重国籍所说的话，非常高兴。”

毛泽东还谈到了亚非会议，他说：

“对于亚非会议，我们很感兴趣。尼赫鲁总理告诉我们，亚非会议的宗旨是扩大和平区域和反对殖民主义。我们认为，这个宗旨很好，我们支持这个会议。如果各国同意，我们希望参加这个会议。”

吴努告诉毛泽东说，有些国家会建议蒋介石参加会议。毛泽东说：

“看来似乎有些困难啊！不过我们还是希望中国能够被邀请。**只是不能像有些人建议的那样，请中国参加联合国，又把蒋介石保留在联合国里。这样我们就不好去了。**因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如果我们能够参加亚非会议，我们将感到光荣。”

12月1日晚，毛泽东召见周扬，就中宣部报送的批判胡适思想的计划草案，谈了他的一些修改意见。

12月2日上午，中宣部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对批判胡适思想的计划草案作了重大修改。

下午，中国科学院院部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召开联席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这个计划；决定联合召开以批判胡适思想为主的讨论会。讨论的内容分为9个方面，即：**胡适哲学思想批判（主要批判他的实用主义）；胡适的政治思想批判；胡适的历史观点批判；胡适的文学思想批判；胡适的《中国哲学史》批判；胡适的《中国文学史》批判；考据在历史和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红楼梦》的人民性和艺术成就及其产生的社会背景；对历来《红楼梦》研究著作的批判（即对新旧“红学”的评价）。**

联席扩大会议推定郭沫若、沈雁冰、周扬、潘梓年、邓拓、胡绳、老舍、邵荃麟、尹达9人组成委员会，以郭沫若为主任。

尔后，周扬将上述情况报告给毛泽东。

12月3日，毛泽东在周扬12月2日的报告上批示道：

“刘、周、朱、陈、邓、陈伯达、胡乔木、邓拓、周扬同志阅，照此办理。毛泽东”

12月3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进一步作好编制地方经济五年计划纲要的工作的指示》，全文如下：

各省、市委，国务院所属各委各部党组：

自中央11月10日指示各省市编制地方经济的“五年计划”纲要以来，各地都在紧张地进行这一工作。为使这个工作作得更好一些，特提出如下意见，请各省市委研究执行。

一、各省市委在编制当地的“五年计划”时，不但应当注意参考国家计划委员会发下的“五年计划”草案的分省指标，而且应当认真地研究当地的经济特点和具体情况，以便结合国家计划而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中央建议各省委在12月10日作出当地初步的“五年计划”纲要，并上报中央以后，于12月15日左右召开一次市委书记、市长、地委书记、专员、县委书记、县长、县计划科长和农业科长的会议，专门讨论各该省市的“五年计划”纲要。省委应该经过这次会议，亲自调查各地的情况，了解各地的经济资源，发现各地的生产潜力，听取各地的意见，然后对初步的“五年计划”纲要再做一次修改和补充，使计划能够更充分的放在比较可靠和积极的基础之上。**

二、除了个别省份（例如辽宁）工业比重很大，省委应把工作重点摆在工业方面外，一般省委都应该明确地把工作重点放在领导农（牧）业方面。对于“五年计划”中的农业部分，应当细致研究，找出办法，力求完成和超额完成。对于国家掌握的粮食和技术作物等主要产品应当列入地方计划，同时关系当地人民生活的农副产品、土特产品和各种出口物资也应当尽可能地列入地方计划；对于国家的统一的要求应当充分照顾，对于当地的具体的要求也应当切实照顾。

三、各省管理的各种类型工业（包括地方国营、地方公私合营、合作社营和私营）目前还存在许多问题，其中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是地方工业应当服务于当地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的具体需要的问题。**中央认为，不论在地方工业的生产方面，或地方工业的基本建设方面，都必须贯彻为农村经济服务并与农业经济密切相结合的方针**。各地在编制地方工业计划、安排地方工业生产和地方工业基本建设时，应当根据全国平衡和当地供产销平衡的原则，一方面充分考虑当地的农业生产能否保证当地的工业生产以足够的原料，另一方面又应充分考虑当地的工业生产能否满足农业生产资料和农民生活资料两方面的各种要求。但应当注意，关于新式农具的生产，国家已作统一的安排，不要与中央的计划相抵触。对于私人资本主义工业的改造计划，亦应当放在积极而又可靠的基础之上，并逐步使之适应上述方针的要求。

四、在编制商业计划时，对于公私比重，必须贯彻中央稳步前进的方针，不应当进得太快。**目前主要的危险倾向是急躁冒进，把私商排挤得过快过多，以致失业人员大增，一时无法安插。**关于这个问题，各省市委必须有迅速地部署，把步子放慢，对于被排挤的私商小贩，应当给予适当的安排。同时，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实行城乡分工后，已经在许多地方发生了不便利于人民买卖货物的严重情况和某些阻塞商品流通的现象，因此，如何使商品的周转环节合理化以利发展城乡的物资交流，并改变目前城乡联系中某些阻塞的现象，请你们仔细加以研究，提出关于中央和地方的商业管理计划的改进意见。

　 　 中央 1954年12月3日

12月5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就“毛泽东思想”应如何解释的问题发出通知说：

“毛泽东同志曾指示，今后不要再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以免引起重大误解。”“党章已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它的内容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同一的。……我们认为今后党内同志写文章作报告，应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办理。至于讲解党章和过去党的重要决议文件时仍应按照原文讲解，不得改变，但应注意说明‘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避免对两者有不同内容的可能误解。”

毛泽东在审阅这一通知时还加了一句：

“在写文章作讲演需要提到毛泽东同志的时候，可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等字样。”

12月8日，在文联主席团和作协主席团召开的联席扩大会议上，文联主席郭沫若作了题为《三点建议》的发言；作协主席沈雁冰作了题为《良好的开端》的发言；中宣部副部长、作协副主席周扬作了题为《我们必须战斗》的发言。这3个发言稿事先都送毛泽东看过。3位发言人从不同角度阐明、发挥了毛泽东指示信的精神，提出了开展讨论批判的建议。

联席会议通过了经毛泽东审定的《关于<文艺报>的决议》。决议第一条就是改组《文艺报》的编辑机构，重新成立编辑委员会。

从批评俞平伯转向批判胡适，正如历史学家嵇文甫所解释的那样：“随着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已经在全国展开一个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运动，而它的锋芒就逐渐从俞平伯转向胡适。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方法，完全继承着胡适的传统。‘擒贼先擒王’，几十年来中国学术思想界，如果要找一个资产阶级思想的典型代表人物，当然是胡适。胡适这个人在研究‘学问’上涉及面很广。他提供了一种方法——治学方法和思想方法，好像在哪一个学术部门都用得上。因此，现在各种学术部门都展开了对胡适思想的批判。”

自此以后，艾思奇、胡绳、任继愈、孙定国、金岳霖、张世英等哲学界人士集中批判胡适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他的实用主义的世界观、实用主义的真理论、实用主义的唯心史观、实用主义美学、教育学和心理学。批判者认为，胡适用实用主义对抗辩证唯物主义，用唯心史观对抗唯物史观，用改良主义对抗社会革命论，用个人主义对抗集体主义，他的全部思想的哲学基础是主观唯心主义；胡适否认真理的客观性，否认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可知性。

李达、侯外庐、王若水、曾文经、汪子嵩、孙思白等人系统地剖析胡适的政治思想和立场，认为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是一个改良主义者。“五四”以后，一贯致力于抵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运用，抗拒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革命。“胡适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的产物，是美国帝国主义所一手造成的买办洋奴，他是彻头彻尾为美帝国主义服务的。”

范文澜、黎澍、嵇文甫、周一良等史学界人士，以大量文章批判胡适的历史观，着重批判胡适的“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的治学方法，认为胡适的所谓“科学的方法”是反历史的、反科学的。

何其芳、游国恩、刘绶松、蔡仪、王瑶、余冠英、陆侃如、冯沅君等文学界人士发表了大量文章，批判胡适的文学思想、文学史观点和对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考证，指责他歪曲中国文学史，在古典文学研究中制造混乱；认为他以虚无主义的态度对待祖国文学遗产——根本取消“文言的文学”的价值，否定了一些最杰出的作家，降低了一些优秀的古典文学的评价；一味崇拜西方文化，主张“全盘西化”。

罗尔纲、罗根泽、周汝昌、冯友兰、贺麟、李长之、吴景超、向达、陈友松等在解放前同胡适有过交往、受胡适思想的观点和治学方法影响深入的文化学术界的这些老前辈，也纷纷撰文，一面批判胡适思想，一面检讨自己。贺麟在他的文章中，非常严厉地批判了胡适的唯心主义思想，还顺便牵涉到梁漱溟早年的唯心主义思想，同时作了自我批评。他说：“向敌对思想作斗争，同时，就是对自己思想的一种改造；批判别人，同时，也是自己照一下镜子。批判别人的反动唯心论思想，也就是自己要和自己过去的反动唯心论思想划清界限的一个表现形式。”

再说12月11日晚，毛泽东在颐年堂和缅甸联邦总理吴努举行第2次会谈。他在会谈中说：

“五项原则是一个大发展，还要根据五项原则做些工作。我们应该采取些步骤使五项原则具体实现，不要使五项原则成为抽象的原则，讲讲就算了。现在世界上就有两种态度，一种是讲讲算了，另一种是要具体实现。**英美也说要和平共处，但是他们是讲讲就算了的，真正要和平共处，它们就不干了。**我们不是那样。我们认为，五项原则是一个长期方针，不是为了临时应付的。这五项原则是适合我国的情况的，我国需要长期的和平环境。五项原则也是适合你们国家的情况的，适合亚洲、非洲绝大多数国家的情况的。对我们来说，稳定比较好，不仅是国际上要稳定，而且国内也要稳定。”

吴努见毛泽东如此说，便当着毛泽东的面，对中缅边境的一些纠纷发了一大通牢骚。周恩来在一旁沉思不语。毛泽东则平静地说：

“我们希望缅甸国内和平。中国不会干涉邻国的内部事务，既不会利用邻国的共产党去干涉那个国家的内政，也不会利用华侨去干涉居留国的内政。对缅甸是如此，对泰国也是如此。**国家不应该分大小。我们反对大国有特别的权利，因为这样就把大国和小国放在不平等的地位，大国高一级，小国低一级，这是帝国主义的理论。一个国家不论多么小，即使它的人口只有几十万或者甚至几万人，但是它同另一个有几万万人口的国家，应该是完全平等的。”**

说到这里，他将手中的烟掐灭，挥了一下手，加重语气说：

“这是一个基本原则，不是空话。既然说平等，大国就不应该损害小国，不应该在经济上剥削小国，不应该在政治上压迫小国，不把自己的意志、政策和思想强加在小国身上。既然说平等，互相就要有礼貌，大国不能像封建家庭里的家长，把其他国家看成是它的子弟。不论大国小国，都应当是平等的、民主的、友好的和互助互利的。应该是平等互利的关系，而不是不平等的和互相损害的关系。

我们同缅甸已经有了5年的相互关系，我们可以再看5年，再进行5年的共处和合作，来看看我们究竟是讲讲算了，还是要真正实行的。以后，我们两国之间还会发生一些问题，互相之间还会有些怀疑和不满的地方，希望我们互相都讲出来，以便采取措施，解决问题。这样就可以使我们的关系更好，使我们的合作更发展。”

吴努说：

“坦率地说，过去我们是不敢有什么话都讲出来的，怕的是我们会被误认为英国、美国的走狗。曾经有过一个时候，我不知道在中国会遇到怎样的人，害怕会遇到像希特勒那样的人，讲话的时候拍桌高喊。但是我现在发现，我的恐惧都是毫无根据的。我们互相见面了以后，互相进行了讨论和有了了解以后，我们就不怕有话直说了。这是我这次访问所取得的最大成就之一。对于这几次恳切的谈话，我感到十分高兴。”

会谈结束后，吴努的同僚说吴努在会谈中关于中缅边境纠纷的一大通牢骚，是对毛泽东的直接冲撞，会对他不利。吴努闻言，心中很是不安。

第二天，吴努离京到中国各地参观访问，周恩来陪同他一起去北京机场，吴努非常诚恳地问道：

“周总理，我昨晚那样对待毛主席，是不是不妥？”

**“吴努总理，”周恩来说：“你和我是经常见面的，如果你有什么不满，可以对我说，不必对毛主席说。”**

“我很抱歉。”

“没关系。”周恩来热情地说：“不必过虑。”

欲知毛泽东的外交方针如何贯彻，请慢慢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54年12月1日和12月11日同缅甸联邦总理吴努的谈话，值得研究。在这一时期，关于外交方面，他考虑的重点问题就是确立和宣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外交方针。他还说：“**国家不应该分大小。我们反对大国有特别的权利，因为这样就把大国和小国放在不平等的地位，大国高一级，小国低一级，这是帝国主义的理论。”**应该说，这一类议论是毛泽东反对大国霸权主义理论的一部分。正是由于“五项原则”外交方针的成功实施和反对大国霸权主义的努力，这才团结了第三世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为中国的和平建设争得了一个几十年的越来越好的国际环境。这是不争的事实，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

**第9章**

**“以哲学的观点来说，物质是无限可分的。质子、中子、电子**

**也应该是可分的。一分为二，对立统一嘛！现在，实验室里还**

**没有做出来，将来，会证明它们是可分的。”**

话说1954年12月17日，毛泽东给章士钊写了一封回信。

章士钊在12月9日给毛泽东的信中，建议安排七七事变时任宛平县县长并担任中日谈判的中方首席代表王冷斋为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毛泽东在回信中写道：

“惠书敬悉。某君事因有些人不同意，故未能提名。此复。”

后来王冷斋成为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12月18日，毛泽东复信给毛泽荣，他写道：

胜五弟：

你的信收到了。你要求明年4月再来北京一次，我认为可以。还有毛仙梅想来，你可和他一道来。在京住一个月回家。寄上人民币200万元（旧币——笔者注），以助日用。

顺问近安

毛泽东 12月18日

12月19日，毛泽东召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民主人士几十个人座谈政协工作，他在谈话中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后的政协的性质和任务等问题作了说明，他说：

“主要的问题是政协的性质问题，是国家机关还是人民团体？政协的性质有别于国家的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它也不是国家的行政机关。”

毛泽东针对有人曾经提出政协全国委员会的职权要相等或大体相等于国家机关才说明它是被重视的这一说法，明确说道：

“不能这样看。**如果把政协全国委员会也搞成国家机关，那就会一国二公，是不行的**。要区别各有各的职权。”**“政协是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统一战线组织，是党派性的。**”

毛泽东提出政协有5项任务：第一是协商国际问题。第二是商量候选人问题。第三是提意见。第四是协调各民族、各党派、各人民团体和社会民主人士领导人员之间的关系。第五是自愿地学习马列主义。

关于“毛泽东思想”问题，他说：

“我们不提毛泽东思想。如果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并提，有人会以为是两个东西，为了不使发生误会，就不提毛泽东思想。”

最后，他还对身边党内的负责人说：

“为了实现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一定要运用统一战线的武器。我们自己要有主张，但一定要和人家协商，不要把自己孤立起来，要发挥各民主阶级、各人民团体的作用。工农联盟是我们国家的基础，但还要懂得去运用在此基础上的广泛的与非劳动人民的联盟——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这样，动员起来的力量就会更多了。**瑞金时代是最纯洁、最清一色了，但那时我们的事特别困难，结果是失败了。**所以真理不在乎清一色。”

12月21日，全国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1次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幕。毛泽东主持会议，周恩来做工作报告。

毛泽东在宣布会议休息时，说他有别的事情要提前退场，说罢便从主席台上走了下来，同委员们握手告别。他走到哪里，哪里的人们都争着和他握手。“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委员们发自肺腑的欢呼声，震撼着年轻委员李希凡的心，他和毛泽东握手后，一直痴痴地跟在毛泽东后面走，绕场一周直到东廊的尽头，目送着毛泽东在众人簇拥下走出怀仁堂。新华社摄影记者迅速按下快门，拍摄了一帧珍贵的照片《在毛主席身边》，留住了这一令人振奋的历史瞬间。胡耀邦见李希凡还呆呆地站在东廊上，就上前拉着他的手说：

“走，去见见总理。”

周恩来交叉着双臂站在东廊出口处，正同一位政协委员交谈，胡耀邦向他介绍了李希凡。周恩来打量着李希凡，问道：

“蓝翎是你的爱人吗？”

李希凡说：

“蓝翎是我的男同学。”

周恩来爽朗地笑了，说：

“人们总是爱信这些猜测中的事。”

12月25日，全国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1次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

会议推举毛泽东为政协名誉主席，选举周恩来为政协主席，副主席有：宋庆龄（女） 董必武 李济深 张澜 郭沫若 彭真 沈钧儒 黄炎培 何香凝（女）李维汉 李四光 陈叔通 章伯钧 陈嘉庚 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 包尔汉

邢西平为秘书长。

政协常务委员有：王芸生 王宗槐 王首道 王从吾 王稼祥 史良（女）吉雅泰 安子文 朱学范 朱蕴山 吴晗 吴溉之 吴鸿宾 吴耀宗 吕正操 李六如 李纯青 李葆华 李德全（女） 李烛尘 沈雁冰 车向忱 周叔弢 周建人 邵力子 施复亮 唐生智 孙起孟 马叙伦　马寅初 高崇民 康生 张治中 张奚若 张经武 张际春 梁希 章乃器 许广平（女） 许德珩 陈少敏（女） 陈正人 陈伯达 陈其尤 陈铭枢 陈毅 傅作义 彭泽民 盛丕华 程潜 黄琪翔　杨尚昆 楚图南 达赖喇嘛·丹增嘉措 刘文辉 刘晓 蔡廷锴 邓小平 邓初民 郑位三 卢汉　钱端升 龙云 罗隆基 谭震林

是日晚，全国政协委员会在北京饭店西楼宴会厅举行宴会，毛泽东健步走进宴会厅，后面是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人，大厅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宴会开始了，毛泽东、周恩来频频和张澜、陈叔通、李济深等老先生碰杯。与李希凡同席的朱学范见他一直深情地望着毛泽东，便鼓励他说：

“去敬酒吧，毛主席要知道是你，一定很高兴。”

同桌的一位台盟的委员见李希凡还踌躇着不敢前去，就拉着他来到毛泽东面前，一面向毛泽东敬酒，一面介绍说：

“他是李希凡。”

毛泽东含笑和李希凡碰了杯，看着他说：

“谢谢你。”

李希凡急忙说：

“祝毛主席健康长寿！”

旁边的刘少奇也和李希凡碰了杯，眯起眼睛瞧了他一会儿，说：

“你很年轻么！”

毛泽东回到菊香书屋，读《人民日报》得知，在12月25日这一天，青藏、康藏两条公路正式通车，结束了西藏地区因为没有现代交通而一切运输完全靠肩背和牲畜驮运的历史。

青藏、康藏公路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指战员在毛泽东“为了帮助各兄弟民族，不怕困难，努力筑路”的伟大号召下，经过4年的艰苦奋战修筑而成的。为修筑好这两条公路，平均每一公里都要牺牲一名战士，其艰难困苦的程度可想而知。

毛泽东正在翻阅着报纸，周恩来来了，将中央军委给志愿军总部的一份复电稿和彭德怀写给他的信，交给了毛泽东。

原来在12月下旬，志愿军总部致电中央军委总干部部，请示如何安置毛岸英的遗骸。12月24日，总干部部由赖传珠起草了一份复电稿，内中要求将毛岸英的遗骸运回北京安葬，尔后将复电稿送交主持军委工作的彭德怀审批。彭德怀立即将电稿送给周恩来审阅。12月25日，他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

总理：

昨24日，赖传珠同志拟一电稿将毛岸英同志尸骨运回北京，我意即埋在朝鲜，以志司或志愿军司令员名义刊碑，说明其自愿参军和牺牲的经过，不愧为毛泽东的儿子，与其同时牺牲的另一参谋高瑞欣合葬一处，似此对朝鲜人民教育意义较好，其他死难烈士家属亦无异议。原电稿已送你处，上述意见未写上，特补告，妥否请考虑。

彭德怀 12月25日

毛泽东在烟雾缭绕中看罢电稿和信，缓缓地对周恩来说：

“让他和千千万万的志愿军烈士一样，安葬在朝鲜的领土上。”

说罢，他提笔在信上批道：

“同意彭的意见，请告总干部部另拟复电。”

后来，在朝鲜平安南道桧仓郡山丘上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之中，埋葬着134名中华儿女，最前排的正中间修着一座普普通通的坟墓，墓前立着一块3尺高的花岗岩石碑，碑的正面镌刻着郭沫若题写的7个大字：

毛岸英同志之墓

墓碑背面镌刻的文字是：

毛岸英同志原籍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是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的长子。1950年他坚决请求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950年11月25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英勇牺牲。毛岸英同志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精神将永远教育和鼓舞着青年一代。毛岸英烈士永垂不朽！

再说12月28日，毛泽东给李达写了一封回信。

此前，李达曾撰写了《胡适思想批判》和《胡适政治思想批判》两篇文章，寄给毛泽东，请他审阅。毛泽东在给李达的回信中写道：

鹤鸣兄：

12月20日的信及两篇文章，收到看过了，觉得很好。特别是政治思想一篇，对读者帮助更大。似乎有些错字，例如“实用主义者主张物质的第一性和意识的第二性”。此外，在批判实用主义时，对实用主义所说的实用和效果，和我们所说的大体同样的名词，还需加以比较说明，因为一般人对这些还是混淆不清的。宇宙“是一篇未完的草稿……”几句话，也须作明确的批判。你的文章通俗易懂，这是很好的。在再写文章时，建议对一些哲学的基本概念，利用适当的场合，加以说明，使一般干部能够看懂。**要利用这个机会，使千百万的不懂哲学的党内外干部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未知以为如何？

顺致敬意！

毛泽东 1954年12月28日

1955年1月，文东仙和文泮香的大儿媳妇、文赐生的遗孀刘媛英，和她护送的文运昌老伴十六阿婆杨达昌、文南松老伴二十阿婆文刘氏，应毛泽东之邀，前往北京。因为她们3个人谁都没有到过北京，就由韶山招待所派人送到长沙，再由省委交际处购买火车票护送上车，在武汉停留一宿，转乘去北京的列车，到京后住在中直机关招待所。

这一天是个星期日，毛泽东派秘书把刘媛英3人接到中南海叙旧。寒暄之后，宾主落座。毛泽东和几个老太太拉起了家常：

“乡下生活好不好？有没有饭吃？”

“有。搭帮共产党翻了身，我们生活过得好多了。”

“油盐足不足？”

“还有吃。有时也缺一点油盐。”

“家里喂的猪、鸡、鸭多不多？”

“喂了一些。”

“**要多喂些鸡鸭。特别是多喂些猪，猪多肥多粮多，还能改善生活。”**

毛泽东满口家乡话，刘媛英3人感到很亲切。刘媛英从包里拿出一条带给毛泽东的腊鱼，说：

“主席表叔，这是送给您吃的。”

毛泽东摇摇头，说：

**“你们来不要带什么礼物。我这里都有。你们应该留着自己吃。乡里物资少，弄点东西不容易呀！”**

中午，毛泽东设宴招待乡里来的客人，作陪的有王季范与夫人、章淼洪的母亲文静纯、章淼洪的丈夫朱光以及王海容等人。

毛泽东叫人把孩子们喊出来。李敏、李讷、毛远新，还有刘思齐，从南屋拥到北屋的客厅，面朝客人站成一排。毛泽东指着老太太们向孩子们介绍说：

“这些老太太，都是家乡来的亲戚。中国革命成功了，与她们是分不开的。你们要好好地尊敬她们。”

孩子们一齐朝客人鞠了一躬，按辈分一一称呼客人。毛泽东又对秘书说：

**“这些老太太家里很穷，生活很不宽裕，我那稿费还有，你给她们拿些钱，再添置几件衣服。”**

吃饭的时候，毛泽东不断地为客人们夹菜，指着腊鱼对刘媛英说：

“这是你带来的，你们舍不得吃，现在多吃一点。”

饭后，毛泽东同客人们合影留念。前排坐着毛泽东、王季范夫妇、文静纯、杨达昌、文刘氏、刘媛英；后排站着朱光、王海容、刘思齐、李敏、李讷、毛远新。背景是齐白石送给毛泽东的那幅《普天同庆》的国画。

合影后，毛泽东又同3个老太太谈了一会儿。说到毛岸英的牺牲，刘媛英含着泪说：

“岸英1950年还到了唐家圫，看望表伯和表伯母们，彬彬有礼，尊重长辈，关心穷人疾苦，是一个很有作为的青年，只可惜牺牲太早了。”

其他人听刘媛英一说，也都唏嘘不已。毛泽东说：

“你们不要难过。抗美援朝牺牲了很多人，都是为了保家卫国，为了人民的利益。岸英只不过是成千上万牺牲的志愿军战士的一个。”

毛泽东转对秘书说：

“这些人很少到城里来，你带她们到处玩一玩，看看北京的风景名胜，颐和园、故宫、明十三陵。”

客人告别的时候，毛泽东对刘媛英说：

“赐生二嫂，这次我十六嫂、二十嫂来了，只有十嫂、十七嫂没来了，以后，你能不能再送她们两个来京？”

刘媛英满口答应说：“能！”

后来，秘书遵照毛泽东的吩咐，带着客人游览了北京的名胜风景，还给她们每人300元钱，添置了衣服，购买了礼品。

刘媛英回到家乡，把毛泽东的话告诉了婆婆文十阿婆和婶婶阿婆，两位老太太高兴得不亦乐乎。

1月10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

上海局、各分局、省（市）委：

一、现在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经发展到48万余个。在现有社中，约有10万个是1954年春夏建立的，还有30多万个是秋收前后建立的新社。**这些新社由于其中有相当部分是无准备或准备很差的条件下建立的，又由于1954年11、12两个月全党正集中力量进行粮食统购工作，没有对这些新社进行整顿，因而在许多地方陆续有新建社垮台散伙和社员退社的现象发生。**整顿和巩固这40几万个社，已经成为十分迫切的任务。

二、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合作社能够有这样大的发展，有大批的农民看到合作化既有经济上的优越性又是“大势所趋”，因而踊跃入社，当然是好现象。但是，对这种有利的形势，需要有全面的估计，不能只是盲目叫好，将合作化工作看得过分容易简单，而忽视了农民特别是中农在改变生产关系时，可能发生的严重的怀疑和顾虑，以及可能在农村中引起的震动。**最近许多地方发生大批出卖耕畜、杀羊、砍树等现象，原因固有多端，但是必须了解，在合作化运动大发展当中，农民怕财产归公，想要抓一把的思想，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不晓得针对农民的实际思想状况，反复进行思想教育，细致地进行组织工作，认真地解决社内的重要经济问题，及时组织好当前生产活动，其结果，必然会造成工作中的夹生现象，影响合作化运动的继续前进，并可能引起不利于生产的严重后果。切不要以为党在农民中的信仰很高，现在所采取的半社会主义合作化的政策基本上取得农民拥护，就不会发生任何偏差。在合作化运动大发展时期，如果由于我们工作做得不好，发生了偏差，并因此而产生各种不利于生产的现象，即使是局部的、暂时的，也会遭致很大的损失，所以必须兢兢业业努力避免。

三、鉴于以上两点，中央认为有必要重申只许办好、不许办坏的方针；对当前的合作化运动，应基本上转入控制发展、着重巩固的阶段。按不同地区来说：1、凡是基本上完成或者是超过了原定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计划的地方，例如东北、华北、华东各省（除内蒙外），应该停止发展，全力转向巩固。等到现有的合作社大体上整顿就绪以后，再考虑是否继续发展。2、离完成原定发展计划尚远的地方，例如中南、西南、西北各省，应该认真巩固已建立的社，有准备地在巩固中继续发展。要切实掌握原定发展计划，勿使超过。如果有些省、市认为原订计划过高，可以报请中央农村工作部批准，适当收缩。例如山东已决定从10万个社减为8万，河南已决定从5万个社减为4万，这是适当的。3、对那些准备不足、仓促铺开的地方（例如河北和浙江的个别县份就有此种情形），有关省委要切实帮助县委进行整顿杜的工作。在不伤害积极分子热情、而又保证新建社质量的原则下，允许已有的社数和社员户数作必要的合理的减少。

四、在巩固社的工作中，要强调宣传自愿原则，放手让广大社员说出内心的怀疑和顾虑，针对暴露出来的思想去进行教育工作。要和广大干部说清楚：这样做的结果，即使有少数人要求退社，也不必害怕。因为，全体社员的自愿联合，乃是办好社最基本的保证。

最近某些地方在干部催办、群众被迫应付的情况下，出现了一些有名无实的挂名合作社。这种社，经过帮助重新组织如能继续办下去固好，如不能，应该允许他们改为互助组，将来再转为合作社。因为群众发动得不够充分，许多地方有富农、地主或反革命分子混入社内的现象，应该教育群众分别清除。为敌对分子所操纵掌握的冒牌合作社，要争取群众，加以改组或解散。

五、巩固社的另外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正确处理社内的重要经济问题。**土地产量和报酬的评定，牵扯到每一个社员的根本利益，必须认真掌握。当前应特别加以注意的是私有牲畜入社问题。在耕畜价格狂跌的地方（例如在河南、河北），为了租用或收归公有实行牲畜作价时，一般应高于现在的不正常价格，公议一种正常的价格，这一方面可以免得过后中农后悔，另一方面也有助于稳定人心。此点一定要说通贫农去进行。过去有些老社牲畜作价归公，讲好分期付款，而未认真执行，失信于有牲畜的社员，这是很不对的。**除了在发生严重灾荒可以议定缓还外，在通常情况下，必须依原定时间付价，做到遵守信用。羊群和林木等容易被破坏的生产资料，目前暂不提倡入社，等形势稳定以后，再办未迟。**社员自留地过多，或不准自留的两种偏向也应注意纠正。**

六、巩固社以及继续发展社都必须密切结合冬季生产。对当前不利于生产的各种现象，应根据中央批转商业部关于目前牛羊市场情况和毛猪生产问题的通报的指示精神迅速研究，查明原因，向党委提出切实有效的建议，以便改进。

七、现在约有半数省份已经大体上完成了统购工作，还约有半数省份要到1955年1月份才能完成任务。春节以后，还必需在适当时间内集中力量进行征兵。春耕以前的农村工作任务是极其繁重的。望省委地委对这些工作通盘筹划，妥善安排。必须保证有适当的力量及时投入办社工作。春耕开始以前，应有一段时间指导大量合作社建立劳动组织，实行包工，避免往年曾经发生的新建社劳动管理的严重混乱现象。

此件可登党刊。

　 中共中央 1955年1月10日

1月13日是农历腊月二十，李敏在学校放了寒假，毛泽东让她去上海看望母亲。在她临行前，毛泽东除了让她带去专门为贺子珍购买的药物外，还特地嘱咐李敏，代他向贺子珍问好。后来，毛泽东又托人给贺子珍送去了吃的和用的东西。

1月14日下午，毛泽东让工作人员把周恩来请到了他的办公室。他对周恩来说：

“我们已经发现了铀矿石，这是一个福音，你组织一下，把那些石头搬到中南海来，让大家都看一下，我们自己能不能搞出原子弹？”

毛泽东所说的铀矿石，是中国地质部于1954年上半年首次在广西发现的。

周恩来回到办公室，按照毛泽东的要求，立即召来了核物理学家钱三强和地质部长、地质学家李四光，同时被召见的还有国务院第3办公室主任薄一波和地质部副部长刘杰。周恩来先请李四光介绍了国内铀矿资源的勘探情况，然后转向钱三强说：

“三强同志，那么你们这里现在的原子能科学研究状况怎么样呢？”

钱三强便详细地介绍了原子核科学技术研究的状况。周恩来全神贯注地听着，尔后询问了核反应堆、原子弹的基本原理，以及发展核能事业的必要条件。最后，他告诉钱三强和李四光说：

“明天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要听取这方面的情况，你们要做点准备，简明扼要，把问题说清楚。地质部可以带点铀矿石，三强同志可以带简便仪器做点现场演示。”

1月15日，印度总理尼赫鲁致电中华人民共和国，邀请中国政府派代表团出席亚非会议。这一消息使世界为之震惊。

1月15日，中共中央发布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大力保护耕畜的紧急指示》：

上海局、各分局、各省（市）委并转各地委、县委：

近几月来，不少地区发生大量出卖耕畜，畜价猛跌，和滥宰耕畜的严重现象，有的省估计至少杀了30万头，有的省估计耕畜减少20%。这些估计虽然不是很精确的，但已可看出问题的严重程度。分析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第一、部分农民对于农业合作化政策还有某些误解，**部分地方在政策执行中也存在着某些偏差。例如过早过急地实行牲畜折价归社，而估价又偏低，价款又不按期归还；或者是合作社使用私有耕畜所给的报酬过低，于是有牲畜的农民往往在入社之前卖掉耕畜**；同时，合作社一般都要求把小耕畜（驴）换成大耕畜（马、骡），有的并限制老病幼弱的耕畜入社；也有的合作社因畜力确有多余而出卖。后一种情况固然是合理的，但在合作化比较发展的地区，一般农民是很少买牲口的，卖的多买的少，也造成宰杀耕畜的现象。第二、**部分地区粮食统购统销中工作上有些偏差，因而引起某些农民对于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误解和抵触情绪，再加上口粮算的偏紧，未留牲畜饲料或留得不足，就出卖和宰杀耕畜。**第三、有些地方，对牲畜贩运限制过严，畜贩在社会主义改造的潮流中很难活动，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又无力代替。于是，某个地方卖畜者愈多，畜价愈低，愈低愈抢着出卖，结果畜价狂跌，卖牲口不如杀了卖肉卖皮。滥宰耕畜的现象就更趋严重了。此外，历年冬季，农民出卖和宰杀病老的耕畜也是常有的；但数量没有今冬多。灾区草料更缺，保育牲畜存在许多困难，引起耕畜大批死亡或大量外流。

大量出卖和滥宰耕畜的现象是十分严重的，如不及时扭转，不仅今年春耕受到阻碍，而且今后几年内农业生产的发展，亦将受到严重影响。因为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耕畜仍为农业生产的主要动力，耕畜的大量损失，不是一两年所能恢复的。为此，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必须把保畜工作列为当前重要工作之一，认真贯彻保护耕畜政策，并立即采取有效办法，做好以下各项工作：

一、**继续深入地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使之正确认识农业合作化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消除他们存在的各种误解和顾虑。**鼓励他们饲养牲畜、发展生产的积极性。

二、**各地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对牲畜入社问题，必须妥善处理，克服急躁草率情绪。**必须了解：耕畜入社问题，直接关系着有牲畜户的利益，关系着中、贫农的团结，必须正确贯彻依靠贫农和巩固地团结中农的阶级政策，根据互利原则，通过民主评议，给以公平合理的折价，分期归还，期限不宜太长，到期非特殊灾情不宜拖欠。一般新办的合作社，不必过早过急地实行耕畜折价归社的办法，可采取私有公用的办法，根据贫中农团结互利的原则合理评定畜工的报酬，使畜主不致吃亏，以稳定养畜情绪，在目前畜价狂跌的地方，某些合作社如确实需要采取折价归公办法，应该说服全体社员，耕畜作价稍高于当地不正常的市价；这样做是合理的，对稳定农民饲养耕畜是有利的，对合作社的团结也是有利的。同时，凡采取公有牲畜的合作社，必须改善使役制度，加强饲养管理，努力消灭喂瘦喂死的现象，以带动广大农民爱畜保畜。

三、**切实帮助群众解决饲料困难，保护牲畜安全过冬**。粮食部门在统购粮食时，务须认真贯彻政策，给农民留下一定数量的牲畜饲料，不许任意压低留量；在统购工作已经结束而未留牲畜饲料或留得太少的地区，应根据实际情况，供应部分杂粮和薯类充作饲料。供销合作部门应积极做好糠麸、各种饼类和糟渣等供应工作。供应饲料的手续应力求简便。同时，要动员农民积极寻找可资利用的饲料代食品，指导农民妥善地保管现有草料，提倡粗草精喂，在有条件的地区可用部分煤炭代替烧草，以节约饲草。并大力提倡农民间的互助互济，组织有牛户与无牛户订立合同，互助伙养，约定以畜工换草料，使缺乏草料的耕畜能以安全过冬。

四、**大力拯救灾区耕畜**：对于灾区饲料缺乏的困难，除采取上述措施外，应贯彻生产自救的方针，积极组织群众开展各种副业生产以畜养畜。供销社应加强饲料的供应工作，或组织群众到非灾区购运草料。部分灾区畜棚不足，更易形成耕畜冻饿死亡，应动员农民就地取材，因陋就简，积极修建；并可组织互助、调剂畜棚。灾情特别严重的地区，当地无法饲养过冬的，应有组织地移至非灾区寄养，由当地政府帮助双方根据互助互利精神，商订托养协议。已经移至非灾区的耕畜，在不影响回乡春耕的条件下，可酌情延长寄养期限，不必急于回乡。对灾区特别困难的养畜农民和农业生产合作社，应采取贷款或贷料的办法予以扶持。各受灾地区的农业部门还须特别注意做好牲畜的防疫工作。

五、**加强市场管理，严格执行屠宰耕畜的检验制度**。宰杀前必须经乡政府证明，确无使役能力的耕畜方能宰杀。并应教育税务工作和畜产收购工作的干部，使他们懂得任何单纯为了完成税收和商业任务而实际上是刺激滥宰耕畜的作法都是极严重的错误，必须改正；对现有屠宰户要进行审查，予以严格控制，以堵塞滥宰耕畜的漏洞。**对偷宰耕畜和造谣破坏、压价套购、投机倒把等不法行为，应视情节轻重依法惩处。**各地供销合作社应积极加强领导耕畜市场，要鼓励并组织畜贩的正当经营，把耕畜确实较多地区的多余耕畜贩运到耕畜缺乏的地区，有计划地做好牲畜交流和调剂工作。这是一件对扶持农业生产有重大意义的工作，望供销合作部门努力把它做好。

　 　 中央 1955年1月15日

1月15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发展原子能事业问题。钱三强在他的回忆录中对此次会议的整个过程作了比较详细的记载：

这天下午，钱三强和李四光、刘杰按照约定时间准时到达中南海的一间会议室里，会议室里边已经围坐着许多他们所熟悉的中央领导人，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陈毅、聂荣臻、邓小平、陈云、李富春、彭真、薄一波。

毛泽东一见钱三强、李四光、刘杰来到会场，便笑着招呼他们3人近前坐下，开宗明义地说道：

“今天，我们这些人当小学生，就原子能有关问题，请你们来上一课。”

李四光见毛泽东这样坦诚，也不便客套，拿出一小块黄黑色的铀矿标本，说明铀矿资源与发展原子能的密切关系。毛泽东等人一个一个地传看着铀矿标本，对它那神话般的巨大能量感到新奇。接下来，钱三强站起来汇报了世界上几个主要国家在原子能方面的发展概况和国内科学家近几年所作的工作。他为了加深毛泽东等的直观印象，便把带来的自制的盖革计数器放在会议桌上，把铀矿石装进自己口袋里，从桌旁走过，盖革计数器立刻发出“嘎嘎嘎”的响声。全场的人都高兴地笑了起来。有的人兴趣很浓，也亲自作了试验。当钱三强讲到核原理时，毛泽东问道：

“原子核，是由中子和质子组成的吗？”

钱三强说：

“是这样。”

毛泽东又问：

“那质子、中子，又是由什么东西组成的呢？”

钱三强闻言，一时语塞。此时的科学界尚无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既然毛泽东有此一问，他就思考着回答说：

“根据现在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只知道质子、中子是构成原子核的基本粒子。所谓基本粒子，也就是最小的，不可分的。”

“它们是不可分的吗？”

毛泽东追问道。钱三强说：

“现在的研究是这样。能不能分，还没有被认识。”

“我看不见得。”毛泽东打着手势说：“从哲学的观点来看，物质是无限可分的。原子里头分为原子核与电子，他们是对立统一。原子核里头又分为质子和中子，它们也是对立面的统一。一分为二是普遍的现象。质子、中子、电子仍然是可以分的。一分为二，对立统一嘛！”

听毛泽东如此说，在场的领导人和科学家都沉默了，有的还露出了怀疑的神色。毛泽东环视了一下在座的人，非常自信地微笑着说：

“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不过现在实验条件不具备，还没有做出来，将来，实验条件发展了，会证明它们是可分的！”

毛泽东点燃了一支烟，开始做总结性讲话，他说：

“我们还有很多矿石没被发现嘛！我们很有希望，要找！现在已经找到了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到更多矿床来。我们有丰富的矿物资源，我们国家也要发展原子能。解放以来，我们也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础，创造了一定的条件。过去几年，你们也反映过，但其它事情很多，我们还没有腾出手来，还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是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我们要大力发展原子能研究工作。你们看怎么样？”

他看了看大家，接着说：

“现在苏联政府愿意给我们积极援助。这很好。我们要尽快把反应堆、加速器建立起来。苏联对我们援助，我们一定要搞好！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与会者对大力发展原子能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和决心，有不少人提出了这样那样的问题，询问国内国外的情况。钱三强都一一作了回答。

会议一直开到7点多钟，到了吃饭的时间，大家从会议室来到餐厅。餐厅里早已摆好了3张餐桌。毛泽东请钱三强、李四光与他同在一桌，钱三强坐在毛泽东的对面。毛泽东的右边是彭真，左边是李四光。李四光改用湖北话与毛泽东交谈，无拘无束，十分开心。少顷，彭真把话题引向了钱三强，他对毛泽东说：

“三强的父亲就是钱玄同，是北大教授。主席那时也在北大，见过面没有？”

“知道，但是没有见过面。”毛泽东又笑着对钱三强说：“最近我看了一本书，有你父亲的一篇文章，《<新学伪经考>序》。”

钱三强说：

“父亲写这篇文章时，我正读高中，曾经听他说过。他写这篇序，很认真，下了不少功夫。”

毛泽东徐徐点头，说道：

“钱玄同先生在他的文章里，批评了他的老师章太炎。《新学伪经考》是康有为的著作，他说有许多古书都是经过后人篡改过的。章太炎对这本书有反对意见。钱先生为这本书作了长序，这篇文章代表他对经学今文、古文问题的成熟见解。他在文中提出：‘总而言之，我们今后解经，应该以实事求是为鹄的，而绝对破除师说、家法……’钱先生就在这篇长序里，反驳了他的老师章太炎。有这种勇气来追求真理，这是很不容易的啊！”

这顿饭是毛泽东请客，开始上菜了，每个桌上6样菜，都是极普通的湖南风味菜。看看饭菜上齐了，每个人的杯子里也斟满了酒，毛泽东端起酒杯站起来，大声说道：

“为我国原子能事业的顺利发展，请大家共同干杯！”

欲知未来的原子能事业如何发展，且待以后慢慢叙述。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月15日下午对李四光等人说：**“从哲学的观点来看，物质是无限可分的。”“质子、中子、电子仍然是可以分的。”**这个结论的确是前无古人。后来科学发展证明，这一论题的正确思考者，正是毛泽东。他的这一番议论以及本传后面还要多次叙述到他在这方面的重要议论，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1977年在夏威夷召开的世界第7届粒子物理学讨论会，与会的物理学家们集体起立，为毛泽东默哀**。美国著名微粒子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金获得者谢尔登·格拉肖回忆了他与毛泽东的交往。**格拉肖和史蒂文·温伯格曾多次访问中国，受到毛泽东接见，双方就基本粒子还能不能继续分割进行讨论。格拉肖倾向于不能，毛泽东则认为物质是无限可分的，质子、中子、电子和更小的物质也应该是可分的，一分为二，对立统一，直到无限。**后来更小物质确实发现，中方科学界称为层子，美方科学界称为夸克。因此，格拉肖在第七届夏威夷粒子物理学年会上发言说：“我提议把构成物质的所有这些假设的组成部分命名为‘毛粒子（Maons）’，以纪念已故的毛主席，因为他一贯主张自然界有更深的统一。”格拉肖的建议和“毛粒子”的命名，表明了整个世界科学界对一位伟大的哲学家的崇高敬意。

**第10章**

**“美国的原子弹威力再大，投到中国来，把地球打穿了，把**

**地球炸毁了，对于太阳系说来，还算是一件大事情，但对整**

**个宇宙说来，也算不了什么。”**

话说1955年1月12日，毛泽东对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准备公开印发胡风给中共中央报告（即三十万言书）部分内容的报告，作了不少修改，并批示道：

“刘、周、邓即阅，退陆定一同志，照办。”

1月14日晚，听到风声的胡风找周扬谈话，表示承认错误，并要求不要发表他给中央的报告；如果要发表，他希望在卷首附上他写的《我的声明》，声明的内容如下：“这次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运动开展后，我受到了很大教育，现在正在检查这个‘材料’里面的错误，在这个材料公开发行时，我首先声明两点：这个‘材料’里面所表现的对党对文学事业上的态度，我已初步认识到是错误的，有害的。这个‘材料’里面对今天的文艺运动所得出来的判断是带有很大主观成份的。其中有些具体提到的情况和例证，当时没有很好的调查研究，后来发现有不切合实际之处，但现在‘材料’已印好，来不及修正。以上一切，我当负我应负的责任，希望同志们加以批判。”

周扬认为胡风的声明内容太笼统，不具体，发表了对读者没有好处。

1月15日，周扬给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写了一封信，并请转呈毛泽东。

陆定一在周扬的信上作了批示：“建议将胡风声明送作协主席团传阅，由主席团决定给以口头答复，即：内容太不具体，决定不登载。”

这一天，毛泽东看了周扬的信和陆定一的批示，当日即将信批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传阅。他写道：

“1、这样的声明不能登载。2、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不是让他逃到‘小资产阶级观点’里躲藏起来。”

由此引出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段公案。毛泽东何以对胡风问题如此重视？此事说来话长。

胡风其人，本名张光人，1902年生于湖北省蕲春县，他在中学时代，接受了革命思想，曾积极参加五卅学生运动。1929年，胡风到日本东京留学并加入了日本共产党和日本普罗科学研究所的艺术学研究会，参加了左翼组织活动。1933年，他回国到上海，曾一度担任“左”联宣传部长和书记。

胡风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进步文学活动。在文艺创作理论方面同其他作家存在着分歧。从30年到50年代，胡风与其他一些作家在文艺思想上有过5次大的争论：

第1次是在1936年夏，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扬等人提出“国防文学”作为文艺界联合战线的口号；而鲁迅、沈雁冰、冯雪峰、胡风等人则主张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那时，鲁迅正在病中，胡风就用自己的名字写了《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首次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

第2次在1940年前后，延安和重庆的文化思想界开展了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热烈讨论。民族形式问题，是毛泽东在1938年《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中首先提出来的。在延安，没有发生严重地分歧和论争。而在重庆文化界思想界的讨论中，向林冰等人提出了民间形式是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的观点，而葛一虹等人否认旧文艺形式还有可取的东西。郭沫若等人也发表自己的意见。胡风却独树一帜，既不同意向、葛的观点，也不同意与向、葛不同意见的观点。他既肯定“旧形式”的作用，又强调外来文艺形式的意义。胡风处于“孤军”地位，他的观点受到批评。

第3次是在1945年及其以后，1945年重庆文艺界的某些领导根据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认为当前主要是反对“非政治倾向”，而胡风认为主要反对倾向是“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要求作家奋发“主观战斗精神”。重庆进步文艺界召开了几次座谈会对胡风的文艺思想进行了比较深刻的批评。但胡风没有接受这些批评，而且感到十分反感。1948年，在香港的党内文艺工作者邵荃麟、林默涵、胡绳发表文章，批评了胡风等人主张的“主观精神”、“战斗精神”、“人格力量”脱离了社会实践和阶级关系。胡风发表文章，批判“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从实际出发，历史地、正面地论述了文艺创作的现实主义原则。1949年7月2日，第1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沈雁冰作了《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的报告，不指名地批评了胡风的文艺思想。胡风对此极为不满。

第4次是在1951年冬，全国文联常委会根据毛泽东“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号召，决定在文艺界进行整风。一些读者给《文艺报》来信，提出应该对胡风的文艺思想进行批判。1952年4月，周扬在上海同胡风进行一次长谈，批评了胡风。胡风感到不安。5月4日，胡风给毛泽东、周恩来写了信，并附上了《文艺报》通讯员《内部通报》所发表的要求公开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读者来信。5月23日，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10周年。5月25日，武汉《长江日报》发表了舒芜的《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文章。文章对照《讲话》结合自己解放前后的思想实际检查了自己过去的错误思想。6月8日《人民日报》予以转载，并由胡乔木加了编者按语，肯定舒芜的检讨，指出胡风的文艺思想的实质是“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文艺思想。”舒芜的文章发表后，在胡风和与胡风接近的人们中间引起了很大震动，但胡风仍没有接受批评。从9月6日开始，文艺界在北京先后召开了4次座谈会，讨论胡风的文艺思想。胡风就他和党的不正常关系作了一些反省。但对于自己文艺思想上的原则问题，始终没有什么检讨，而是作了辩解。1953年2月15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向周恩来和党中央报送《关于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经过情况的报告》，周恩来作了肯定的批示。中宣部的报告和周恩来的指示均曾经毛泽东、刘少奇圈阅。1953年《文艺报》第2期和第3期上分别发表了林默涵执笔的《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何其芳执笔的《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两篇文章都认为胡风的文艺思想是“根本性质的错误”，它“实质上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是和毛泽东同志所指示的文艺方针背道而驰的。”《人民日报》转载了林默涵的文章，有的省市的报纸也转载了林、何的文章。1954年，胡风借着中国共产党七届四中全会决议和《人民日报》社论《学习四中全会决定，正确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在7月间，撰写了《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呈交当时政务院文教委员会主任习仲勋，由习仲勋转交中共中央。胡风在《三十万言书》中，对林默涵批判他的观点一一加以辩驳；论述了“主观战斗精神”问题；指出文艺界存在着的宗派主义没有得到清算；**他把提倡共产主义观，提倡作家到工农兵生活里去，提倡思想改造，提倡民族形式，提倡写革命斗争的重要题材，比喻成插在读者和作家头上的“五把理论刀子。”**

第5次是在1954年10月，毛泽东提出了对《红楼梦》研究中资产阶级倾向的批评。他指出文艺界一些领导同志压制马克思主义新生力量，保持资产阶级权威。于是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在10月31日至12月8日先后召开了8次扩大会议，对《文艺报》进行了批评。胡风作为文联委员和作协理事也参加了几次会议，他在两次发言中点名批评了周扬等10多个文艺界的负责人并指责《文艺报》对阿垅、路翎、鲁藜的批评，是资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的进攻，是压制新生力量。胡风的发言，引起一些与会者的不满。郭沫若、沈雁冰等不点名地批评了胡风。12月8日，周扬作了总结性的发言《我们必须战斗》。其中第三部分是：“胡风先生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之间的分歧”，着重批评了胡风所集中力量攻击的《文艺报》宣传了的庸俗社会学的观点。该文送给毛泽东看过。12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周扬的讲话。

这就是关于反对胡风反党集团一段公案的由来。

正是：不是冤家不聚头，冤家聚头事不休。新账旧账从头算，几人欢乐几人愁。

且说1月18日，人民解放军陆海空军协同作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解放了浙江大陈岛外围的一江山岛。

此前，《人民日报》在1954年7月23日发表社论，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决定，昭告全世界。8月3日，美国公然宣布，要用海空军“保护台湾和澎湖列岛”。9月3日开始，人民解放军第一次炮击金门。9月8日，美、法、英、澳大利亚、新西兰、泰国、菲律宾、巴基斯坦8国在马尼拉签订了针对中国的“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组成了**马尼拉条约集团**。9月22日，人民解放军再次炮击金门。12月2日，**美国与台湾当局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于是，**毛泽东命令人民解放军集中力量首先解放与海运、渔业直接有关的浙江沿海岛屿，向世界各国表明中国要解放台湾的决心；同时要尽力避免引起中美直接冲突，酿成国际争端。**

1月20日，中央宣传部向中共中央报送了一份《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报告中说：

“胡风的文艺思想，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是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他的活动是宗派主义小集团的活动，其目的就是为他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争取领导地位，反对和抵制党的文艺思想和党领导的文艺运动。”

毛泽东在这一段之后加写了两句话：

“企图按照他自己的面貌来改造社会和我们的国家，反对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代表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他对党领导的文艺运动所进行的攻击，是反映目前社会上激烈的阶级斗争。”

1月23日，中央军委先后发出《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指示》和《关于颁发勋章奖章工作的指示》。

1月24日，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发表《关于美国政府干涉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声明》，揭穿了美帝国主义的阴谋，郑重声明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的主权和内政，决不容许他人干涉。

1月24日是农历正月初一日，这一天，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与达赖、班禅欢聚一堂，共度新年。毛泽东在致词中说：

“我们大家应当努力，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汉藏民族团结，共同建设我们的伟大祖国。”

1月26日，中共中央以（55）018号文件批转了中宣部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018号文件中写道：

“胡风的文艺思想，是资产阶级唯心论的错误，他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在长时期内进行着反党反人民的斗争，对一部分作家和读者发生欺骗作用。因此，必须加以彻底批判。各级党委必须重视这一思想斗争，把它作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一个重要斗争来看待。把它作为在党内党外宣传唯物论反对唯心论的一项重要工作来看待。”

中国作协主席团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将胡风的《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和林默涵、何其芳的文章，印成专册，随《文艺报》1955年第2、3期合刊附发。

1月27日，毛泽东在陆定一的请示报告上作了一个批示。

此前，梁漱溟曾写了一篇《告台湾同胞书》，呼吁“台湾同胞归来欢聚”，使“祖国统一达到完整无缺”，送给陆定一审阅。陆定一提出了几点修改意见，并就修改和发表问题向周恩来请示，周恩来又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看后批道：

“陆拟各点均不可改，只在文尾倒数第3行第2删去‘事不宜迟，……’几句。此文可以广播，并可在北京、香港两处报上发表。”

1月28日，芬兰首任驻华大使孙士敦向毛泽东递交国书。毛泽东在同他谈话中说：

“中国和芬兰是友好的国家。我们的关系，是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之上的。

**中国同芬兰从来没有发生过冲突。在欧洲国家中，在历史上，中国只同英国、法国、德国、沙皇俄国、意大利、奥匈帝国、荷兰等国有过战争，都是这些国家从老远跑来侵略中国的，比如英法联军和包括美国、日本在内的八国联军对中国的进攻**。参加侵朝战争的有16个国家，其中有土耳其、卢森堡等国。这些侵略国家都说他们是爱好和平的，却把朝、中两国说成是侵略国。

**今天，世界战争的危险和对中国的威胁主要来自美国的好战分子。他们侵占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还想发动原子战争。**我们有两条：第一，我们不要战争；第二，如果有人来侵略我们，我们就予以坚决回击。我们对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就是这样进行教育的。美国的原子讹诈，吓不倒中国人民。**我国有6亿人口，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美国那点原子弹，消灭不了中国人。即使美国的原子弹威力再大，投到中国来，把地球打穿了，把地球炸毁了，对于太阳系说来，还算是一件大事情，但对整个宇宙说来，也算不了什么。**

我们有一句老话，小米加步枪。美国是飞机加原子弹。但是，如果飞机加原子弹的美国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那么，小米加步枪的中国一定会取得胜利。全世界人民会支持我们。”**“美国如果发动第3次世界大战，那么，算它要打8年或10年吧，其结果是美国和英国及其它帮凶国家的统治阶级要被扫光，世界上大部分地方都要变成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世界大战的结果，不是有利于好战分子，而是有利于共产党和世界革命人民。**他们要发动战争，那就别怪我们搞革命，也就是他们口口声声所说的我们搞‘颠覆活动’**。他们不搞战争，还可以在地球上多存在一些时候。**他们发动战争越早，他们在地球上被消灭也就越早。那时候就要建立人民的联合国，可能设在上海，也可能设在欧洲一个什么地方，也可能还设在纽约，如果那时美国好战分子已被扫光的话。”**

1月30日，人民解放军下达准备进攻大陈岛的命令。

此时，美国见大陈岛失守已成定局，向台湾当局施加压力，要其撤离大陈岛。

1955年2月初，李敏眼看快要开学了，便离开母亲，从上海返回了北京。毛泽东见女儿回来，挺高兴，问道：

“你妈妈现在是个什么样子了？她过去可苗条了，腰细细的，现在还那么苗条吗？”

“我妈妈现在这么胖了，像个大水桶。”

李敏边说边比划，故意逗爸爸。毛泽东惆怅地说：

“不会，你妈妈的身子骨绝不会变成个大胖子，她过去身体就瘦弱，更何况现在有病，心事重，怎么可能胖呢。”

李敏本来是想让爸爸开开心，看来是瞒不过爸爸的，就照实告诉爸爸说：

“妈妈身体很瘦，很弱，很……”

毛泽东很久没有说话，转过身去取了一支烟抽了起来。他的思绪回到了遥远的从前。

“你妈妈很小的时候就追求进步，投身革命了。是一位很了不起的红军女战士，她作战很勇敢……”毛泽东说：“你妈妈是一个很开朗、很豁达、很有善心的人，常常是一高兴就开怀大笑。过去，我们在茅坪河里抓鱼，她也打着赤脚，站在河的中央，看到鱼游过来了，伸手就去抓。你妈妈比我灵活，有时还真能抓住一两条警惕性不高的笨鱼，她高兴得开怀大笑，差点跌倒在水里。”

伤心人怕说伤心事，可越是伤心又越想说那些伤心的事。有的尽管是过去的快活事，也同样会勾起伤心人的伤感。毛泽东打住话头，又是一阵沉默。李敏坐在爸爸身边，拉着爸爸的手。毛泽东把女儿的手放在他的大手心里，另一只手在女儿的手背上来回抚摸着，又讲起了过去的事情：

“那是1928年10月的一天下午，你妈妈在井冈山的后山，捡来半篮子金黄鲜嫩的小松菇，洗干净后，煮了一大碗端给我吃。我吃得好香。你妈妈见我吃得额头上都出汗了，问我说：‘田里的泥鳅你吃吗？’我跟她开玩笑说：‘我这个人，4脚的不吃板凳，长毛毛的不吃蓑衣。’谁知第二天早晨，你妈妈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后来，见你妈妈裤脚卷得老高，提着一只鱼篓回来了。我一看你妈妈提的是半篓鲜活的泥鳅，才恍然大悟说：‘你呀！我随口说了声，你就去抓泥鳅。’好吧，我烧水，你妈妈煮菜，我们忙活起来。也不知你妈妈从哪里弄来的米粉，蒸熟了粉巴泥鳅，又放上些葱花、姜丝，还有辣椒粉，那味道鲜美可口，这顿晚餐吃得好开心哟！”

晚上，李敏为爸爸端来洗脚水，为爸爸洗脚。毛泽东望着女儿，又想起了过去。他说：

“1928年10月23日，我率领部分队伍向井冈山转移，由于连续奔波，我的脚被草鞋带子磨烂了，行动很困难，脚背肿得像个大茄子，紫里透亮，他们要担架抬我。我是坚决不坐担架的，坚持自己拄个棍子步行。队伍到达井冈山南荆竹山下时，王佐派人接应我们上了山。

你妈妈看见我这个样子上的山来，她心疼呀！她几乎是以命令的口吻，让我把脚伸向她的手里。她小心翼翼地揭下我脚上的药膏后，又起身忙着去熬药汤，给我洗脚，敷药。‘疼吗？’她抬头问我，我强忍着钻心的疼痛，笑着对她说：‘世界上的万物都是物极必反，这脚疼过了也就不疼了。’你妈妈说：‘都这样了，还开玩笑呢！’”

爸爸把脚从盆里抬起来，擦干，冲着女儿说：

“好了。”

说着，冲李敏笑了。李敏知道，爸爸该工作了，自己也该走了。

2月2日，毛泽东得知美军将掩护国民党军撤离大陈岛，立即给彭德怀写了一个批复。

此前，海军司令部在给中央军委的关于蒋军从大陈岛撤退期间我海岸炮使用问题的请示电中说：“如无美舰直接参加大陈撤退时，我海岸炮可对大陈及港口实施准确射击。”毛泽东在一旁批道：“不妥。”他又在给彭德怀的批复中写道：

“**在蒋军撤退时，无论有无美舰均不向港口及靠近港口一带射击，即是说，让敌人安全撤走，不要贪这点小便宜。”**

后来，国民党军在2月11日撤离大陈岛。到2月13日，人民解放军陆、海、空军协同作战，又解放了渔山列岛、披山岛等岛屿。至此，浙江沿海岛屿全部解放。

再说2月5日、7日，中国作协主席团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开展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各地也按照中央指示召开了文艺工作的座谈会和讨论会。

《学习》杂志1955年第1期发表了《展开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的批判》的评论。

《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批判性文章。许多作家、艺术家、理论家也在中央和地方报刊上发表文章，公开批判胡风的《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其中最有权威的是郭沫若的《反社会主义的胡风纲领》。

2月8日这一天是农历正月十六，李讷一大早就将一件小礼物和一封给爸爸的信送到了警卫值班室。这件礼物是一个用丝线在圆形的硬纸上编织出来的非常精致的小书签，上头一面画有寿桃，一面写着：送给亲爱的爸爸。她在信中这样写道：

亲爱的爸爸：

你正在睡觉吗？一定睡得很香吧？

你一定奇怪，我为什么突然要写信给你。事情是这样的：在你过生日的时候，我想给你送礼，一块手绢还没有绣成，你的生日就过去了；而且也绣得很不好，于是我就没有送。因为我知道你不会生气，你是我的好爸爸，对吗？**这次妈妈的生日就要到了，就趁此补补吧。**我送的东西也许你不喜欢，但这是我亲手做出来的。东西虽然小，但表示我的心意：我愿我最亲的小爸爸永远年轻，慈祥，乐观，你教导我怎样生活，怎样去做人，我爱你呀！小爸爸，我愿你永远活着和我们生活在一起。

吻你。热烈爱着你的女儿

李讷 2月8日

2月8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6次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

在人大常委会议期间，毛泽东见到了曾志，问她：

“你学过英文吗？”

曾志说：

“我在小学学过一点儿，我们的校长是美国人，教师和校长都用英文讲话。这么多年了，早已忘得干干净净。”

“英文将来是世界语言，要学一点儿，会有用处的。”

毛泽东非常认真地说。曾志却有些为难：

“我都46岁了，脑子记不住了。”

“我都62岁了，还请了一位英文教员，每星期给我上几小时的英文课，都已经学了两年了，你才40多岁就不能学了？”

曾志被毛泽东说得不好意思了。她看着毛泽东，仿佛眼前的毛泽东还是1929年在苏家坡旁若无人地念他那特有的湖南腔英语的那个毛泽东。

2月23日，是藏历木羊年正月初一（藏历新年和春节的公历时间都是不固定的。有时候相差两三天、有时候相差一个月，但也有重叠的时候），达赖和班禅到中南海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拜年。

2月24日下午，达赖和班禅在中南海举行盛大宴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应邀出席。毛泽东致词，强调要进一步加强和巩固各民族间的团结，共同建设伟大的祖国。

2月2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指示》，全文如下：

新疆、华南、内蒙分局，广西、湖南、云南、贵州、四川、西康、青海、甘肃、热河、吉林省委：

广西省委统战部民族工作组《关于三江侗族自治区目前互助合作运动情况和今后工作意见》的报告很好，广西省委对这一报告的批语也是正确的，现一并转发给你们参考。

目前，很多已经完成了民主改革的少数民族农业区，正着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些地区中很多是经济、文化上还很落后，群众的觉悟程度和对互助合作运动的经验还很不够的。**只有在当地党委充分注意到民族特点和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落后状况，决心用更多的时间和慎重稳进的方针逐步地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情况下，才可能把少数民族地区的互助合作运动健康地顺利地推向前进。对于任何上述少数民族地区，如果不去注意当地的特殊情况，企图用汉族地区同样的速度、同样的方式去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的互助合作运动，就势必会发生急躁冒进的错误，造成工作的损失和困难，影响互助合作运动的健康发展，甚至可能发生群众性的骚乱。**这样就正和若干同志的主观愿望相反，不是加速了而是延缓了少数民族地区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

广西省委统战部民族工作组的报告中所反映的问题，正是由于当地党委忽视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殊情况，不仅不是有意识地用比汉族地区更多的时间和更为稳健的方式去推行互助合作运动，相反地是存在着“硬赶汉区”的错误思想。甚至超越了必经的历程，盲目追求高级形式，建立所谓“直升”合作社。因而群众疑虑很多，生产松劲，干部力量分散，顾此失彼，造成老社陷于瘫痪，新社维持吃力，互助组无人管等恶果。这种在少数民族地区“硬赶汉区”的急躁冒进的思想和作法，不仅在广西曾经发生过，其它许多少数民族地区也是或多或少存在着的，中央认为有必要提起各地党委注意，并要求各地党委，认真研究和检查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各项工作，防止或纠正这种“硬赶汉区”的冒进倾向，以便使已完成民主改革的少数民族农业区的互助合作运动，更加稳步、更加健康地向前发展。同时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互助合作组织时，尚应注意民族间生活习惯和感情融洽等条件，不顾这些条件，硬把两个不同民族组织在一个互助组或合作社内，是错误的。

附原报告。

中共中央 1955年2月25日

1955年3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发行新人民币。1元新人民币相当于1万元旧币。

3月1日这一天，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全文如下：

一、**为了实现党的总路线，在3个“五年计划”15年左右（1953年算起）的时期内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达到消灭城乡资本主义的成份，在6万万人口的伟大国家中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在知识分子中和广大人民中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并在这个思想战线上取得胜利。没有这个思想战线上的胜利，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就将受到严重阻碍。**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进展，阶级斗争更为复杂和尖锐起来了。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已被消灭和将被消灭的阶级中的坚决反动分子，力图破坏社会主义的事业。他们破坏我们事业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用资产阶级的思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用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反对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他们用这个方法抗拒改造，阻碍社会的进步，阻碍科学和文化的进步，阻碍建设事业的发展，并且腐蚀劳动人民，直到腐蚀我们的党。**

**应当指出：由于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还采取联合的政策，由于小资产阶级还像汪洋大海一样的存在，由于资本主义包围的存在，资产阶级错误思想在广大劳动人民中间，在知识分子中间，在学术和文化领域中间，以至在党内很大一部分党员和干部中间，都还有深刻的影响，许多人分不清唯物主义思想和唯心主义思想的区别，有不少党的干部或者自己在思想上是唯心主义者，或者在实际上被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世界观所俘虏。**

中央认为，必须唤起全党的注意，进一步认真地加强党的思想工作，各级党委必须真正做到把思想领导当做自己领导的首要职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任何形式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核心就是唯心主义世界观。因此，党在思想工作中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宣传唯物主义的思想，反对唯心主义的思想，使党的干部能够懂得思想和客观存在的关系，懂得思想、意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懂得要根据社会现实生活的发展规律来进行党的工作，从而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和政治觉悟，便于在实际工作中学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思想武器，改进党和国家的工作，同时使广大人民群众脱离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大大提高他们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的觉悟程度，便于形成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基础的政治上和思想上的一致。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加强党的理论工作对于改进党的工作和国家工作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对理论工作的忽视是不能容许的。长期以来，许多党委对于理论工作是不注意或注意不够的。党需要有一支强大的理论工作的队伍，这样的队伍现在还没有组织起来。这种情形，如果再任其继续下去，就会严重地妨害党的思想工作的加强，妨碍党的总路线的实现。

各级党委首先是省市以上的党委，必须加强对理论工作的领导，组织和培养理论工作的队伍，在广大人民和党员中、在党内外知识分子中、在学术和文化的各个领域中，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为实现党的总路线而斗争。

二、从1954年10月开始的对胡适、俞平伯和胡风等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有极其重大的意义。1951年10月所发动的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的直接目的是清除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的思想，同时也对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给了初步的批判。关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唤起了全党的注意，使大家认识到必须对资产阶级错误思想提高警惕，进行坚决斗争。但是，在各个学术和文化领域中清除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任务，是不能在一个短期的运动中解决的，必须以长期的努力，开展学术的批评和讨论，才能达到目的。现在进行的在各个学术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的批判，就是非常必要的。这种批判，是在学术界中在党内外知识分子中宣传唯物主义的有效方法，是推动科学和文化进步的有效方法，是促进各个学术领域中马克思主义新生力量的成长的有效方法，是培养和组织理论工作的队伍的有效方法。**在学术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是社会生活中的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的理论化、系统化、集中化了的表现，所以决不能认为，在学术问题上的反对唯心主义的斗争只是学术界内部的事情。恰恰相反，由于在学术领域中进行了有系统的反对唯心主义的斗争，同时就有系统地宣传了唯物主义，这就会使党的干部、全国的知识分子和经过他们使广大人民群众得到唯物主义思想的教育，这种教育就会使党和非党的干部提高嗅觉，学会在实际生活中去同帝国主义思想和封建主义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和富农思想、同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同各种腐化堕落的倾向进行斗争，这种教育就会使广大的人民群众鄙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更自觉地拥护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省市委以上的党的委员会和国家机关、群众团体的党组，必须注意领导和发展这种思想斗争，并且用各种方法使它的影响首先扩大到党内外广大知识分子中，然后普及到广大的人民群众中。这种工作做得愈加好，愈加能与实际工作联系起来，愈加能为更多的人所了解，就对实际工作的帮助愈大。

除了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人物的批判外，各个学术领域中还有很多争论的问题，这些争论中也有许多是反映着工人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对立。对这些问题要分别处理，其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必须在根本点上做出结论；另一些问题不是紧急的，或者不可能立即得出结论的，可以容许长期讨论。

为了充分地和正确地开展在学术问题上的反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斗争和各种学术问题的批评和讨论，各级党委在领导上应注意下列问题：

1、**必须坚决反对阻碍开展学术批评和讨论的思想。这些思想表现为：对资产阶级“名人”的偶像崇拜，认为他们是“权威”，不能批评；对青年的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工作者采取资产阶级贵族老爷的态度，对他们实行压制；某些党员以“权威”自居，不许别人批评自己，不进行自我批评；某些党员因为“怕破坏统一战线”“怕影响团结”，不敢批评别人，某些党员，因为私人友情或情面的关系，对别人的错误不去批评，甚至加以掩护。必须坚持这样的原则：在学术批评和讨论中，任何人都不能有什么特权；党员可以批评党员，也可以批评非党员；非党员同样可以批评党员和非党员；任何著名的或不著名的学术工作者都可以对别人提出批评和受到别人的批评。共产党员的学术工作者应当在批评和自我批评上起模范作用。以“权威”自居，压制批评，或者对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熟视无睹，采取自由主义甚至投降主义的态度，都是同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不相容的。**

2、学术批评和讨论，应当是说理的，实事求是的。这就是说：应当提倡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尖锐地学术论争。批评和讨论应当以研究工作为基础，反对采取简单、粗暴的态度。说明问题，应当力求内容生动，词句明白，善于分析具体的事实。解决学术的争论，应当采取自由讨论的方法，反对采取行政命令的方法。应当容许被批评者进行反批评，而不是压制这种反批评。应当容许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保留自己的意见，而不是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对于在学术问题上犯了错误的人，经过批评和讨论后，如果不愿意发表文章检讨自己的错误，不一定要他写检讨的文章。在已经做了结论之后，如果又发生不同意见，仍然容许讨论。这样做，是为了使学术界减少顾虑，敢于大胆展开不同意见的争论，从而给读者以深刻的教育，使他们知道什么是真正对的，什么是真正错的，以便达到对资产阶级错误思想彻底批判的目的，或达到学术问题得到正确解决的目的。

3、报刊编辑部和学术机关应当在党委领导之下发起和组织学术问题的讨论。学术讨论应当是有领导的。党委应当掌握自己手中的报刊，分别问题的轻重缓急，发起和组织学术问题的讨论。**报刊编辑部应当尽最大可能发表讨论的文章，但同时应当防止坏分子借学术讨论为名，挑拨是非，进行宗派斗争，甚至进行政治性的破坏活动，或者伪装进步、骗取党和群众的信行等行为。**为此，报刊编辑部对于作者、对于所批评的内容，要进行必要的调查研究。对于坏分子或显然别有企图的“批评”和“反批评”，不应发表，如果为了揭露他的真面目而必须发表时，应在发表时加按语指出其阴谋，并立即组织反驳，以教育群众。

4、在一个学术问题的批评和讨论进行到一定阶段时，应当及时做出结论或总结。方式是由学术机关，或由报刊编辑部，单独地或联合地召开学术会议或学术讨论会，对可以做出结论的做结论，对尚不能做肯定结论的做讨论总结，以便继续讨论。

5、**学术的批评和讨论，一般地应当服从于向广大知识分子和人民宣传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其他思想的基本方针，因此批评和讨论的主要内容和语言形式，应当力求使广大群众能够理解和发生兴趣，并着重在批评和讨论的过程中正面地有系统地和力求浅显地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各项基本观点，以便各种读者读了都觉得有所获益。**无论宣传唯物主义或进行学术的批评讨论，都是为了帮助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反对帝国主义，保卫祖国，因此这种宣传和讨论应当力求联系到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迫切问题，联系到当前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迫切问题，联系到党和国家工作中的迫切问题，使知识分子、干部和人民群众能够经过这种宣传教育，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正确地理解这些迫切问题。应当注意在思想批判的过程中，善于把唯物主义的宣传工作和具体的实际的研究工作结合起来，使同志们能够运用唯物主义作为自己研究工作的向导，能够运用唯物主义的原理总结各种工作的经验，说明和解决问题。也就是说，**在向干部和知识分子进行唯物主义思想的宣传时，必须强调理论与实际联系的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引导他们去批判自己头脑中的唯心主义思想，批判自己在实际工作和生活中所接触到的资产阶级思想，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认识和解决自己工作中所遇到的问题。**

6、唯物主义在各个学术部门中的彻底胜利，依靠在这些部门中产生一系列的联系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的教科书和基本科学著作。这是一个困难的、复杂的、巨大的任务，但又是一个必须完成的任务。党的宣传部门应当进行准备工作，然后拟出计划，以便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逐步组织力量加以实现。

7、应当注意在思想批判的过程中发现和培养学术界中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组织和培养理论工作的队伍。近几年来，青年的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工作者已经逐渐增加，有些党员的学术工作者和党外的马克思主义学术工作者回到了自己原来的岗位，旧的学术工作者中间也有一部分在思想上得到了改造，这些力量都应当很好地运用起来。在党的理论工作的发展中，青年的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工作者必然能够日益增加起来，这是我国学术发展的希望。必须在对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批判工作中，在学术批评和讨论的过程中，发现他们，了解他们的情况，给他们以必要的指导和帮助，把他们之中的优秀人物放到适当的工作岗位上。目前社会科学研究机关或者极为薄弱，或者还没有成立，高等学校的社会科学教学力量和学生数目极为不足，省级以至中央级报刊编辑部中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力量也很不够，这就严重地妨碍党的思想战线的工作。党的组织部门、宣传部门和政府文教工作领导机关应当逐步改进这种状况。

8、在进行对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批判和学术问题的批评和讨论时，应当坚持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团结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首先，应当分清思想上的敌友我3方。**对于在思想上坚持资产阶级错误观点的代表人物，应当视为思想上的敌人，展开斗争，使他在思想上孤立，肃清这种资产阶级错误思想在群众中的影响。**对于虽有错误，但是倾向于唯物主义的知识分子，应当视为朋友，帮助他们进步。再则，**应当分清政治上的反革命分子和学术思想上犯错误的人，对学术思想上有严重的资产阶级错误观点的学术工作者，只要他政治上不是反革命，应当保障他们获得适合于他们的工作岗位，保障他们有可能继续进行对于社会有用的研究，尊重和发挥他们对社会有用的专长，并将这种专长传授给青年，同时鼓励他们积极参加学术的批评和讨论，实行自我改造。**他们的含有错误观点的著作，如果在学术上有一定的价值，仍可允其继续发行，在加上适当序言或经原著者修改后可以重新出版。有些出版发行机关一看到某种学术出版物受到批评，立即不问情由地停止出版或停止发行，是不妥当的。在学术的批评和讨论中，对年老有病的、在学术研究工作上有一定成绩的人，各级党委应特别注意掌握分寸；对有全国影响的人物如需进行集中批判，应经中央批准。

三、在党内外干部和知识分子中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并且通过他们用唯物主义思想教育文化水平较低的广大的人民群众，是极为艰巨的任务。为此必须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一个长期的思想运动。

1、现在全国党的、军队的、文教系统的、经济系统的、政法系统的，以及其他部门和各群众团体的有阅读能力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大约有500万人，中央认为，应当在今后8年内（即到第2个“五年计划”期末），做到他们的绝大部分（例如300万人）都能够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知识，了解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区别，懂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各级党委，除加强对在职干部的理论自学的指导外，还应采取有效办法，坚决地完成这一项重大的战略任务。为此必须：

（1）执行中央1955年1月26日的通知，在各大城市、各省会、各工矿城市和文化比较发达的城市中，组织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演讲工作，积极提倡党内党外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前去听讲，并把这种演讲工作逐渐经常化，使之成为党向知识分子和干部宣传唯物主义、时事问题、重要政策的定期讲坛。

（2）依照中央1954年12月17日指示的精神，轮训全党干部，并力求在今后5年左右，使全党高级干部凡有阅读能力者经过轮训，中级和初级干部也应积极进行轮训工作。为此目的，要逐步发展中级党校，尽可能使各省市都有一个。要逐步发展初级党校，尽可能使每个地委都有一个。为了增设党校，需要训练教员，中级党校的教员由马列学院负责训练，初级党校的教员由中级党校负责训练，对于文化较低的党员干部，应当用设立干部文化补习学校和组织在职文化学习的方法，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到一定程度，并限期做完这项工作。党校工作和干部文化补习工作由党委的组织部门主管，宣传部门负责教学工作的指导。

（3）在城市中按地区，按系统组织业余政治学校和政治夜校，组织在职的党员和非党员干部去学习。在各县，也应当尽可能设立业余政治学校和政治夜校，或采用由教员巡回讲课及其他方法。为此目的，应训练和配备大批教员。责成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会同各有关方面具体解决这个问题。

（4）加强高等学校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课程。中等学校教科书中也要有通俗浅显的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课文。

（5）在报纸刊物上组织学术论争，介绍这种论争的情形，介绍唯物主义的理论知识，组织对资产阶级思想、富农思想、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堕落腐化现象的批评。

（6）利用广播向听众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7）出版学术论争的文集，出版向各种不同对象介绍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书籍，特别注意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哲学著作。

2、对文化程度较低的广大劳动人民，也应当按照可能随时随地向他们进行唯物主义思想的教育和反对资产阶级各种错误思想的教育。**近年全国各地发生的许多事实，证明帝国主义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经常利用宗教迷信在群众中进行破坏活动，党的组织和人民团体必须同这种破坏活动进行经常的持久的斗争。**使广大劳动人民正确地认识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客观规律，是引导他们接受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重要方法之一，为此就应当在尊重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下，认真进行自然科学常识和无神论思想的通俗宣传（在有些宗教信仰很深的少数民族地区，则着重正面宣传自然科学常识），认真进行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宣传，关于总路线的宣传，关于劳动人民必须在工人阶级政党共产党领导之下才能得到解放、才能达到社会主义的宣传。进行这种宣传，应当利用各种文教工具，采取为群众所愿意接受的形式。通俗的报纸、刊物、画册、书籍、广播、电影、幻灯、通俗演讲、展览会等都是可以运用的工具，应当充分利用。

四、上海局、各分局、各省市委和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应当讨论中央的这个指示并作出决议报告中央。中央和省、市的国家机关和群众团体的党组，科学研究机关、文学艺术团体、党校、高等学校、报社、出版社的党的组织也应当讨论这个指示，并作出适当的决定和计划送交上级党委。在讨论中并可适当吸收党外的人参加。

（此件除登党刊外，并可发给一切能够阅读的党员干部阅读。党外人士除在文教系统工作的应发给外，其他方面的由省市委自行规定。）

欲知宣传唯物主义思想和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结果如何？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55年3月1日起草的《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纲领性文件。此后，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在20余年间持续不断地开展宣传唯物主义思想和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教育运动，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工农兵学商有信仰、有理想、有道德、争做活雷锋的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强国。但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道路并非坦途，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在一定条件下一旦占领统治地位，封、资、修一类残余的沉渣泛起，和全民道德沦丧的现象出现，也是难以避免的。这正说明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两个“彻底决裂”（即：“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是在社会主义过渡阶段中不可忽视的一项艰巨而长期的任务。

**第11章**

**“帝国主义、国内反革命分子以及他们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等等，**

**都不过是垂死的力量，而我们则是新生的力量，真理是在我们方面。**

**对于他们，我们从来就是不可战胜的。”**

话说1955年3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批转卫生部党组给“主席并中央”的《关于节制生育问题的报告》作出批示，他写道：

上海局、各分局、各省市委：

中央同意卫生部党组关于节制生育问题的报告。现将这个报告发给你们。

节制生育是关系广大人民生活的一项重大政策性的问题。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国家、家庭和新生一代的利益，**我们党是赞成适当的节制生育的。各地党委应在干部和人民群众中（少数民族地区除外），适当地宣传党的这项政策，使人民群众对节制生育问题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附卫生部党组报告一件。本文和附件均可登党刊。

中共中央 3月1日

这是中共中央对中国人口计划生育问题的首个决策。

3月3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关于迅速布置粮食购销工作，安定农民生产情绪的紧急指示》，指示中说：

“**粮食的紧张情况，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是不能完全避免的，粮食紧张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不足，而发展生产则是解决粮食问题的决定环节**。粮食生产增长一分，粮食紧张的情况就可以缓和一分。因此，农村工作的一切措施，都必须围绕这一环节，都必须有利于生产，有利于发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都必须避免对于这种积极性的任何损害。必须认识，粮食的购销是具体表现工人阶级同农民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做到既取得粮食，又能巩固工农联盟，既照顾国家的需要，又照顾农民的可能。这里，政策的界限具体表现于粮食统购数字和粮食统销数字的正确规定。**统购数字过大，农民的口粮、种子、饲料和必需的机动粮留得不够，就不仅要招致农民的不满，而且实际上要妨害农民的生产。统购数字过小，就不仅不能保证国家工业化的需要，不能保证工人阶级和城市人民的需要，而且不能保证约五千万缺粮农民、五千万经济作物区农民和每年都有的几千万灾区农民的需要。**这样也就必然会发生严重的混乱，影响市场物价的稳定，影响国家的建设。因此国家对于粮食的统购数字和统销数字的规定，必须切合实际；必须进一步采取定产、定购、定销的措施，即在每年的春耕以前，以乡为单位，将全乡的计划产量大体上确定下来，并将国家对于本乡的购销数字向农民宣布，使农民知道自己生产多少，国家收购多少，留用多少，缺粮户供应多少。这样，使农民心中有数，情绪稳定，才有利于缓和农村的紧张情况，才使农民有可能订定自己的生产计划和安排自己的家务，才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才有利于国家有计划地控制粮食的购销。”

3月5日，毛泽东将他的卫士从家乡带回的一封群众来信批转给河北省委书记林铁。信中反映河北安平县一个乡里在农业合作化当中，干部粗暴地用“跟共产党走，还是跟老蒋走”一类的大帽子压群众入社。毛泽东在批语中写道：

林铁同志：

此事请你予以处理。这是我的卫士回他的家乡安平县从那里带回的一封信。这种情况恐怕不止安平县一个乡里有，很值得注意。

毛泽东 3月5日

据杜润生回忆说：“在3月8日，邓子恢还跟我说，毛泽东嘱咐要重视党和农民的关系，农民负担很重。5年实现合作化步子太快，有许多农民入社，并不是真正自愿的。1957年以前三分之一的农民和土地入社就可以了，不一定要达到50%。”

3月初，正当中国外交部为周恩来出席万隆亚非会议进行紧张筹备之际，国家有关部门获悉国民党特务制订了“1号”行动计划，要在会议期间暗杀周恩来及代表团成员。

毛泽东和政治局委员们担心周恩来万隆之行有什么闪失，考虑不让周恩来出席这次亚非会议，毛泽东动情地对周恩来说：

“恩来呀，这次风险比较大，国民党特务机关已经在多处布下暗杀你的网，你若是有点闪失，那可不得了。我们党和国家需要你呀。我们是多年的好战友，亲密的战友，你对我的支持和帮助太大了，一刻也离不开你，所以我请你慎重地认真地考虑，是否你就不要去参加这次会议了。”

周恩来说：

“我知道，诚如主席所说的，去固然要冒很大风险，但是去，可以促使亚非会议更好的进行，取得好的成果，多交些朋友，扩大中国的影响，促进亚非国家的团结和友谊，在亚非国家中架起友谊之桥，和亚非人民一道，为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扩大和平地区，为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做出贡献。外交也是斗争，有斗争就有牺牲。如果我因为怕死而不出席会议，就辜负了亚非人民的希望，也对不起吴努、尼赫鲁、苏加诺、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他们诚心邀请我出席亚非会议，而我却不能如约对印尼进行访问，谈好了的计划日程不能实行，岂不是失信于人吗？所以就是刀山火海，我也要出席。”

毛泽东也考虑到找不到合适的人来代替周恩来，就说：

“你和陈毅去可以，但一定要提高警惕，做好妥善安排，千万不可粗心大意。”

周恩来说：

“这次去得分兵两路，全部经过缅甸，对方接待有困难；同时，印度的飞机已租好，不能毁约。我想，我和陈毅同志及代表团主要成员经缅甸飞雅加达，现在民航已准备从昆明试飞仰光，如果成功，就快了，我们可以在昆明多停留两天，把会议文件再斟酌一遍。其它的同志则按原计划从香港飞雅加达。”

3月8日，毛泽东到达赖喇嘛住地看望他，并和他进行了亲切交谈。毛泽东说：

“你很有希望，你比我年轻。**我们要将全中国都搞好，再把眼光放大，要把全世界都搞好。佛教的教义也有这个思想。”**

达赖激动地说：

“主席突然到这里来，我像是在做梦。经过和主席的几次见面谈话，我的内心起了极大的变化。我回去之后，一定把这些指示变成实际行动，有什么事一定向主席直接报告，同时也请主席给我各方面的指示。”

毛泽东说：

“我这个人薪水不多，开支不小。一要抽烟，二要喝茶，三还要买点书看。这样一来，所剩无几。你要走了，我也没有什么礼物可送，**就送你8个字：团结进步，更加发展，作为临别赠言。**”

3月9日，国务院第7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决定》，规定自治区筹委会是负责筹备成立西藏自治区的带政权性质的机关，由达赖喇嘛任主任委员，班禅额尔德尼任第一副主任委员。

3月9日下午，毛泽东到畅观楼班禅额尔德尼住地为其返藏送行，在座的有汪锋、计晋美等人。毛泽东说：

“昨天我去看望了达赖，今天特意来看您，为您送行。”

他又说：

“每个民族都应有自己的民族领袖，西藏有达赖和班禅这样的领袖是很好的。”

班禅听到毛泽东称自己是“领袖”，感到很惊讶，以为自己听错了。毛泽东便把这句话重复了一遍。班禅觉得自己承受不起，他说：

“我不是领袖，只有毛主席是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

毛泽东认真地说：

“您就是领袖嘛！我看在西藏，不能只喊‘毛主席万岁!’‘朱总司令万岁!’还要喊‘达赖喇嘛万岁!’‘班禅喇嘛万岁!’”

他问计晋美：

“我早给张代表讲过，在西藏，不能只挂我和朱总司令的像，还要挂达赖和班禅的像。他们挂了没有？”

计晋美回答说：

“1953年国庆节时，在拉萨和日喀则都挂了。”

毛泽东满意地说：

“这就好嘛!”

他又对班禅说：

“昨天我给达赖喇嘛讲了，我这个人薪水不多，开支不小。一要抽烟，二要喝茶，三还要买点书看。这样一来，所剩无几。你们要走了，我也没有什么礼物可送，就**送你们8个字：团结进步，更加发展，作为临别赠言。**”

3月12日早晨，毛泽东连续工作了一个通宵，正准备躺下休息，听说达赖马上就要离京了，立即吩咐备车。仓促之间，他竟然只穿了睡衣，乘车直奔东交民巷为达赖送行，与达赖握手告别。

3月13日，应周恩来之邀准备从香港归国的卫立煌，将事先草拟好的《告台湾袍泽朋友书》发至北京。毛泽东展开一看，见卫立煌在《告台湾袍泽朋友书》中写道：

各位朋友、各位袍泽：

我现举两项个人亲身经历之事，使各位更知蒋介石如何卑劣。

抗战时期，我负第一战区责任，在黄河北岸，背水奋战，拒敌5年。因为我主张国共共同抗战，故凡八路军（解放军前身）担任之任务和补给，都主张公平办理。乃竟召蒋疑忌，认为我偏袒八路军，破坏他攘外必先安内之阴谋，将我调离第一战区，并暗行监视。东北之战，完全由蒋三到沈阳亲自主持策定，虽经各将领一致陈述意见，认为不可，但蒋一意孤行，终至全军覆没。事后因受立法院及国人指责，乃竟向部下诿卸责任，谤为系我失职，派宪兵特务将我监视于南京私邸，并由宪兵司令张镇告我：未见蒋以前，最好不要接见其他客人。后经吴礼卿先生向蒋提问此事，蒋竟诿称不知。吴先生事后又问张镇何以总统并不知道卫长官家中会派有宪兵，不许见客。张镇闻言，惶恐不知所答。

以上二事，不过就我亲身经历中较大者而言。我同蒋介石共事30余年，他都肯做出这种丧心病狂、倒行逆施、背信弃义、陷害部属的事来，诸位还不及早警惕吗？

我自辛亥年投笔从戎以来，即决心献身革命，希望有所助益于改革腐旧社会，建设现代国家。只因蒋介石窃据领导地位，利欲迷人，背叛革命，只图千方百计巩固私人权势，置国计民生于不顾，以致数十年光阴虚耗，未能如愿以偿，既恨且愧。自从我在香港住了5年以来，闭门阅读各种书报杂志，站在客观的立场观察实际，寻求革命真理。**新中国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凡百设施，突飞猛进，为有史以来所未有。回想过去蒋介石几十年来的所作所为，比起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5年来的建树，使我更为明白是非功罪，何去何从。所以我觉得这几十年误随了祸国殃民的蒋介石，实在愧对国家愧对国人**。现在祖国正在进行解放台湾，予我们大家一个效忠革命，为人民尽力的机会，以赎前愆。

卫立煌

毛泽东看罢，稍加思索，提笔在上面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刘朱邓（请小平办）：

此件以一字不改，照原文待卫到广州时即行发表为好。在广州发表时，即送香港登报，并登广州报纸。同时由新华社发来北京，播发北京及全国登报，并发口语广播，译成外文发表。此件完全可用，不需要修改。

毛泽东 3月13日

3月14日，毛泽东在彭德怀转报的华东军区司令部关于对马祖、金门斗争问题给总参谋部的请示电上批示道：

彭德怀同志：

马祖及其它任何岛屿敌人撤走时，我均应让其撤走，不要加以任何攻击或阻碍。此点请予考虑酌定，指示华东及福建。

毛泽东 3月14日

3月1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转发王化云《关于进一步开展水土保持工作的总结报告》：

陕西、山西、甘肃、河南、河北省委、内蒙古分局并告上海局、各分局、各省委：

兹将王化云同志根据会议总结经验所提出的“进一步开展水土保持工作”的报告和水利部党组意见，发给你们。中央认为这个报告很好，所总结的各种经验都切合实际。这个报告说明陕、甘、晋3省几年来的水土保持工作已取得了显著成效。也说明，**只要我们实事求是，因地制宜，依靠群众，因势利导，那么“大自然的破坏力是可以利用到另外一方面，即利用它来为人民造福。”**

中央认为召开这种水土保持工作会议，很有必要，责成中央水利部每年或每两年召开一次有华北、西北各地代表参加的这样的会议，总结水土保持工作经验，并拟定实施计划，报告中央批准施行。各有关的省、专区和县亦应酌量召开这样的会议，并将结果报告上级和中央。

关于水土保持领导机构问题，望水利部本精简精神加以研究后，另定方案按国家规定的批准手续办理。

此件及附文二件可登党刊。

　 中共中央 1955年3月15日

3月15日这一天，卫立煌和夫人韩权华一行甩掉国民党特务的跟踪，由香港回到祖国大陆。他们一到广州，就受到了华南局书记陶铸和华南局统战部长林李明及广东省党政负责人的热烈欢迎。

卫立煌立即发表了《告台湾袍泽朋友书》。新华社及香港、广州和内地各大媒体按照毛泽东的批示，均同时播发了这一重要文告。

3月16日，卫立煌给北京发电报，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致敬，报告他已经回来了。

3月17日，毛泽东在卫立煌的电报上给杨尚昆写了一个批示：

“应发一电表示欢迎。由华南分局派适当干部好好护送来京。如他愿意广州、长沙、武汉、郑州等处（或走上海天津）看看建设情况，应先电告各处好好引导招待，并表示热情欢迎态度。”

他还拟写了一份发给卫立煌的复电稿：

广州华南分局即送卫俊如先生：

3月16日电报收到。先生返国，甚表欢迎，盼早日来京，藉图良晤。如有兴趣，可于沿途看看情况，于本月底或下月初到京，也是好的。

毛泽东 3月17日

卫立煌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和夫人韩权华一起在有关人员的陪同下，由南向北，沿途参观访问。

3月17日，毛泽东召见邓子恢、陈伯达、廖鲁言、陈正人、杜润生。他在听完农村互助合作和粮食征购的情况汇报后，说道：

“合作社问题，也是乱子不少，大体是好的。不强调大体好，那就会犯错误。在合作化的问题上，有种消极情绪，我看必须改变。再不改变，就会犯大错误。对于合作化，一曰停，二曰缩，三曰发。缩有全缩，有半缩，有多缩，有少缩。社员一定要退社，那有什么办法。缩必须按实际情况。片面的缩，势必损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后解放区就是要发，不是停，不是缩，基本是发；有的地方也要停，但一般是发。华北、东北等老解放区里面，也有要发的。譬如山东30%的村子没有社，那里就不是停，不是缩。那里社都没有，停什么?那里就是发。该停者停，该缩者缩，该发者发。”

3月21日，毛泽东为在北京开幕的空军首届英雄模范代表大会题词，他写的是：

建立一支强大的人民空军，保卫祖国，准备战胜侵略者。

毛泽东

3月21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开幕式上致词，全文如下：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各位代表同志们：

我们这次全国代表会议有3个议事日程：第一，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1个“五年计划”和关于这个计划的报告；第二，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第三，关于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

中央委员会根据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学说，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经验，在我国国民经济恢复阶段将要结束的时候，即1952年，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个总路线就是在大约3个“五年计划”的期间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同时对于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改造，以求达到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目的。党的总路线以及党为着实现这个总路线而采取的各项重要的政策和办法，已经在事实上被证明是正确的。依靠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的努力，我们的工作是有很大成绩的。但是我们在工作中也有缺点和错误。我们的许多办法不可能在一切方面都规定得很恰当，这应当在实行中根据新的经验加以补充和修正。

发展国民经济的第1个“五年计划”是实现党的总路线的一个重大的步骤。这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应该根据实际经验，认真地讨论这个计划草案，使它的内容能够比较妥当，而成为切实可行的计划。

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里面，情况是复杂的，国民经济原来又很落后，要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我们可能经过3个“五年计划”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要建成为一个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就需要有几十年的艰苦努力，比如说，要有50年的时间，即本世纪的整个下半世纪。我们的任务要求我们必须很好地处理我国人民内部的关系，特别是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很好地处理我国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同时，必须很好地继续发展同伟大的先进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亲密合作，也要发展同资本主义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合作。

我们经常说，不要因为我们的工作有成绩就骄傲自满起来，应该保持谦虚态度，向先进国家学习，向群众学习，在同志间也要互相学习，以求少犯错误。在这次党代表会议上，我感觉仍然需要重复地将这些话说一遍。**鉴于高岗、饶漱石的反党事件，骄傲自满情绪在我们党内确实是存在着，在有些同志的身上这种情绪还是严重的，不克服这种情绪，就会妨碍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最大任务的完成。**

同志们都知道，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出现，不是偶然的现象，它是我国现阶段激烈阶级斗争的一种尖锐地表现。这个反党联盟的罪恶目的，是要分裂我们的党，用阴谋方法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而为反革命的复辟开辟道路。全党在中央委员会团结一致的领导下，已经把这个反党联盟彻底地粉碎了，我们的党因此更加团结起来和巩固起来了。这是我们在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中的一个重大的胜利。

对于我们的党说来，高岗、饶漱石事件是一个重要的教训，全党应该引为鉴戒，务必使党内不要重复出现这样的事件。**高岗、饶漱石在党内玩弄阴谋，进行秘密活动，在同志背后进行挑拨离间，但在公开场合则把他们的活动伪装起来。他们的这种活动完全是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历史上常常采取的那一类丑恶的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上说过：“共产党人认为隐秘自己的观点与意图是可耻的事。”我们是共产党人，更不待说是党的高级干部，在政治上都要光明磊落，应该随时公开说出自己的政治见解，对于每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表示自己或者赞成或者反对的态度，而绝对不可以学高岗、饶漱石那样玩弄阴谋手段。**

为着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这一个目的，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在这个时候按照党章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代替过去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借以在新的激烈的阶级斗争时期加强党的纪律，加强对各种违法乱纪现象的斗争，特别是防止像高、饶反党联盟这一类严重危害党的利益的事件重复发生。

鉴于种种历史教训，鉴于个人的智慧必须和集体的智慧相结合才能发挥较好的作用和使我们在工作中少犯错误，中央和各级党委必须坚持集体领导的原则，继续反对个人独裁和分散主义两种偏向。**必须懂得，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这样两个方面，不是互相对立的，而是互相结合的。而个人负责，则和违反集体领导原则的个人独裁，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

目前的国际条件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有利的。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是强大的，内部是团结的；而帝国主义阵营则是虚弱的，在它们那里有不可克服的重重矛盾和危机。虽然是这样，但是我们应该了解：帝国主义势力还是在包围着我们，我们必须准备应付可能的突然事变。今后帝国主义如果发动战争，很可能像第2次世界大战时期那样，进行突然的袭击。因此，我们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要有所准备，当着突然事变发生的时候，才不至于措手不及。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国内反革命残余势力的活动还很猖獗，我们必须有计划地、有分析地、实事求是地再给他们几个打击，使暗藏的反革命力量更大的削弱下来，借以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安全。如果我们在上述两方面都做了适当的措施，就可能避免敌人给我们的重大危害，否则我们可能要犯错误。

同志们！我们现在是处在新的历史时期。**一个6万万人口的东方国家举行社会主义革命，要在这个国家里改变历史方向和国家面貌，要在大约3个“五年计划”期间内使国家基本上工业化，并且要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要在大约几十年内追上或好过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决不会不遇到困难的，如同我们在民主革命时期所曾经遇到过的许多困难那样，也许还会要遇到比过去更大的困难。**但是，同志们，我们共产党人是以不怕困难著名的。我们在战术上必须重视一切困难。对于每一个具体的困难，我们都要采取认真对待的态度，创造必要的条件，讲究对付的方法，一个一个地，一批一批地将它们克服下去。根据我们几十年的经验，我们遇到的每一个困难，都被克服下去了。种种困难，遇到共产党人，它们就只好退却，真是“高山也要低头，河水也要让路”。这里就得出一条经验，它叫我们可以藐视困难。这说的是在战略方面，是在总的方面。不管任何巨大的困难，我们一眼就看透了它的底子。所谓困难，无非是社会的敌人和自然界给予我们的。**我们知道，帝国主义、国内反革命分子以及他们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等等，都不过是垂死的力量，而我们则是新生的力量，真理是在我们方面。对于他们，我们从来就是不可战胜的。只要想一想我们自己的历史，就会懂得这个道理。**我们在1921年刚刚建党的时候，只有几十个人，那样渺小，后来发展起来，居然把国内的强大敌人给打倒了。自然界这个敌人也是有办法制服它的。**不论在自然界和在社会上，一切新生力量，就其性质来说，从来就是不可战胜的。而一切旧势力，不管它们的数量如何庞大，总是要被消灭的。因此，我们可以藐视而且必须藐视人世遭逢的任何巨大的困难，把它们放在“不在话下”的位置。这就是我们的乐观主义。这种乐观主义是有科学根据的。只要我们更多地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更多地懂得自然科学，一句话，更多地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少犯主观主义错误，我们的革命工作和建设工作，是一定能够达到目的的。**

会议听取了陈云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1个“五年计划”的报告。

3月22日，陈毅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毛主席：

送上我的发言稿，如你能加以审阅指正，会使我获得进益，并增加发言的勇气。本文对高、饶的罪恶作了揭露，又引申到批评党内现状，是否需要，是否过火，我在这点上是有些犹豫感的！另外关于路线检讨，我是把我入党30多年来的思想演变过程作了概括叙述，既不护短也不是哗众取宠，力求适当，即做到有更大的妥当性。这个问题我所用功夫是很多的，但是否够格，是否有毛病，尚不敢完全自信。你昨日说反革命有规格，我想自我检讨亦有其一定的规格，我开的规格只此而已，故热望指正。

陈毅

3月23日，毛泽东在陈毅的发言稿上作了批示，他写道：

“你的发言稿，看了一遍，觉得很好，可以和应该那样说，不算过火。在第21页上，我加上几个字。我感觉饶漱石的罪恶，可能不比高岗小一些。”

全国代表会议期间，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作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此后在会议讨论中，由于饶漱石闹翻案以及大批新的揭发材料的出现，高、饶问题“逐步升级”。

3月下旬，毛泽东与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话时，谈到了高岗问题。

尤金回忆说：“在这时，毛提出高岗可能与贝利亚之间有阴谋，贝利亚的代表到东北会见了高岗，但高岗没有向中共中央报告。毛同志说高岗可能通过贝利亚与英国人有联系，他当时正在认真地研究这问题。”

“毛还说：**进城后，没有受过很好的马克思主义训练的党员，受到城市资产阶级的腐朽影响。这些人丧失了革命精神、革命观点，滑回到小资产阶级立场上去了。这些人赞扬斯大林和毛泽东，但实际上是反对他们的。在革命中，他们跟着党走到一定程度，就离开了革命**。高岗和饶漱石就是这样的人。”

3月31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接收高级知识分子入党问题给上海局的复电：

上海局：

原华东局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1月22日曾来电提出关于接收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入党的意见，中央基本上同意他们的意见。**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一些党员是需要的，对党团结、改造知识分子有很重要的作用，应积极地去进行这项工作。**但为了同样的目的，**经过党的培养教育，在进步的高级知识分子中，有目的、有计划地培养一些具有共产主义观点同党忠诚合作的党外朋友，即非党布尔什维克也是很重要的。**在实际工作中必须注意到这两方面。对上面所说的这样的党外朋友，党的组织应同党员一样的教育和帮助他们，并应吸收他们参加党内讨论同他们工作有关的会议。

关于民主党派省（市）级负责人中的高级知识分子入党问题，应按照1955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执行。

中央 1955年3月31日

欲知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和**培养非党布尔什维克**的情形如何，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致词说：“**不论在自然界和在社会上，一切新生力量，就其性质来说，从来就是不可战胜的。而一切旧势力，不管它们的数量如何庞大，总是要被消灭的。因此，我们可以藐视而且必须藐视人世遭逢的任何巨大的困难，把它们放在‘不在话下’的位置。这就是我们的乐观主义。这种乐观主义是有科学根据的。只要我们更多地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更多地懂得自然科学，一句话，更多地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少犯主观主义错误，我们的革命工作和建设工作，是一定能够达到目的的。”**这段话实在太精辟了，应该成为一切愿意献身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志士仁人的座右铭！

**第12章**

“**我希望，所有的省委书记、市委书记、地委书记以及中央各部门**

**的负责同志，都要奋发努力，在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的基础上，**

**使自己成为精通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的专家。**”

话说1955年3月31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决议》；一致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开除了高岗、饶漱石的党籍，撤销了他们在党内外的各项职务。对于高岗反党集团的五虎将**张明远、张秀山、赵德尊、马洪、郭峰的处理比较宽，没有开除他们的党籍，只是给予降级处分。对于中共山东分局书记向明和上海公安局长杨帆，给予开除党籍、撤职查办的处分。**

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还一致通过了《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议》，选出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5人，候补委员6人；董必武为书记，刘澜涛、谭政、王从吾、钱英、刘锡武为副书记。

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了结论性长篇讲话，他说：

同志们：

大家发言已经完了。我就下面的几个问题讲几句话：关于这次会议的评价，“五年计划”，高饶问题，目前形势，八次大会。

一、关于这次代表会议的评价。

绝大多数同志认为，这次会议开得很好，是从延安整风以来的又一次整风会议，发扬了民主，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得我们互相了解更多了，思想更加统一了，使得我们有了共同的认识。本来我们是有共同认识的，但是在若干问题上，我们中间还是有不同意见的，经过这一次会议，统一了我们的认识。在这个基础上，在这个思想的、政治的以及许多政策的共同认识的基础上，就可以使我们党更好地团结起来了。正如恩来同志所说，如果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同它以前一个时期全党的思想、政治上的整风，奠定了我们党的统一思想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取得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种民主革命的胜利，那么，这一次会议就会使我们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

这次会议证明，我们党的水平是大为提高了，不但比10年前的七次大会时期大进了一步，而且比1949年的二中全会、1950年的三中全会时期大进了一步。这个情况是好的，这次会议表明我们是进步了的。

**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全党同志钻得有深有浅，在座的同志也是这样。像医生一样，有的能够开刀，有的不行。有的打针能够打静脉，有的就不能，只能打皮下。有一些医生连皮下都不敢动手，就在那个皮上面。虽然有些同志没有钻进去，但大多数同志是在钻，看样子有许多人是钻进去了，就是有一点内行的味道了。在这一次会议上，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这是极大的好事。因为现在我们面临的是新问题：社会主义工业化、社会主义改造、新的国防、其他各方面的新的工作。适合这种新的情况钻进去，成为内行，这是我们的任务。所以必须对那些钻不进去的人、浮在皮面上的人进行教育，使他们都成为内行。

反对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斗争，将促使我们党大进一步。

**我们要在党内外500万知识分子和各级干部中，宣传并使他们获得辩证唯物论，反对唯心论，我们将会组成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而这是我们极为需要的，这又是一件大好事。**

我们要作出计划，组成这么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有几百万人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即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各种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我们现在有许多做理论工作的干部，但还没有组成理论队伍，尤其是还没有强大的理论队伍。而没有这支队伍，对我们全党的事业，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社会主义改造、现代化国防、原子能的研究，是不行的，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因此，我劝同志们要学哲学。有相当多的人，对哲学没有兴趣，他们没有学哲学的习惯。可以先看小册子、短篇文章，从那里引起兴趣，然后再看七八万字的，然后再看那个几十万字一本的书。马克思主义有几门学问：**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但基础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东西没有学通，我们就没有共同的语言，没有共同的方法，扯了许多皮，还扯不清楚。有了辩证唯物论的思想，就省得许多事，也少犯许多错误。**

二、关于第1个“五年计划”。

同志们认为，在讨论“五年计划”的时候，大多数同志的发言很好，大家是满意的。其中有一部分发言特别好，他们讲透了问题，有点专家的味道了。但是，中央各部门的发言中间，有一部分内容较差，分析和批判不够；地方同志发言中间，也有一部分是较差的，分析和批判是不够的。另有一种情况，就是在有些同志发言中间，对严重的浪费问题以及别的错误，只是揭露了现状，没有说明如何处理。对于这些发言，有些同志不满意。我以为这些不满意是有理由的。

**我希望，所有的省委书记、市委书记、地委书记以及中央各部门的负责同志，都要奋发努力，在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的基础上，使自己成为精通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的专家。**一方面要搞好政治思想工作，一方面要搞好经济建设。对于经济建设，我们要真正学懂。

这次会上，地方要求中央解决的许多问题，凡是中央已经有了规定的，应当积极解决。其他的问题，由秘书处会同提议的同志，研究解决办法，报告中央处理。

中央各部门要求地方协作的事也不少。中央部门在各地方办的事业，要请地方党委给以监督和帮助，特别是在政治思想工作方面。地方党委有责任帮助中央在地方所办的事业去完成任务。所以，不仅地方对中央有要求，中央对地方也有要求。只有中央各部门和地方党委齐心协力，分工合作，第1个“五年计划”才能够完满的实现。

三、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

第一点，有人问：究竟有没有这个联盟？或者不是联盟，而是两个独立国，两个单干户？有的同志说，没有看到文件，他们是联盟总得有一个协定，协定要有文字。文字协定那的确是没有，找不到。我们说，高岗、饶漱石是有一个联盟的。这是从一些什么地方看出来的呢？一、是从财经会议期间高岗、饶漱石的共同活动看出来的。二、是从组织会议期间饶漱石同张秀山配合进行反党活动看出来的。三、是从饶漱石的话里看出来的。**饶漱石说，“今后中央组织部要以郭峰为核心”。组织部是饶漱石为部长，高岗的心腹郭峰去作核心。**那很好嘛！团结得很密切嘛！四、**是从高岗、饶漱石到处散布安子文私拟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名单这件事看出来的。在这件事上，安子文是受了警告处分的。**高岗、饶漱石等人把这个名单散布给所有参加组织会议的人，而且散布到南方各省，到处这么散布，居心何在？五、**是从高岗两次向我表示保护饶漱石，饶漱石则到最后还要保护高岗这件事看出来的。高岗说饶漱石现在不得了了，要我来解围。我说，你为什么代表饶漱石说话？我在北京，饶漱石也在北京，他为什么要你代表，不直接来找我呢？在西藏还可以打电报嘛，就在北京嘛，他有脚嘛。**第二次是在揭露高岗的前一天，高岗还表示要保护饶漱石。饶漱石直到最后还要保护高岗，他要给高岗申冤。在揭露高岗的中央会议上，我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叫作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究竟是政出一门，还是政出多门？从上面这许多事看来，他们是有一个反党联盟的，不是两个互不相关的独立国和单干户。

至于说，因为没有明文协定，有的同志就发生疑问，说恐怕不是联盟吧。这是把阴谋分子组成的反党联盟同一般公开的正式的政治联盟和经济联盟等同起来了，看作一样的事情了。他们是搞阴谋嘛！搞阴谋，还要订个文字协定吗？如果说，没有文字协定就不是联盟，那么高岗、饶漱石两个反党集团内部怎么办呢？高岗跟张秀山、张明远、赵德尊、马洪、郭峰之间，也没有订条约嘛！我们也没有看见他们的文字协定嘛！那么连他们这个反党集团也否定了！还有饶漱石跟向明、扬帆之间，也没有看见他们的条约嘛！所以，说没有明文协定就不能认为是联盟，这种意见是不对的。

第二点，受高、饶影响的同志和没有受他们影响的同志，各自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受影响的，有浅有深。有些是一般性的，被他们扫了一翅膀；少数几位同志是比较深的，同他们谈了许多问题，在下面有所活动，替他们传播。这两者是有区别的。但是，所有这些人，不管有浅有深，大多数同志在这个会议上都已经表示了态度。有的表示得很好，受到全场的欢迎。有的表示得还好，受到大部分同志的欢迎，但是有缺点。有的表示得不够充分，今天作了补充。有的全文讲得还好，但是有某些部分不妥当。不管怎么样，这几种人总之已经有所表示了，我们应当一律表示欢迎，总算有所表示嘛！还有个别同志要求发言，没有来得及，他们可以用书面向中央写一个报告。还没有讲的人，问题不严重，就是被扫了一翅膀的，知道一些事情，他没有讲。至于已经发了言的人，是不是也还有一些是留了尾巴的？那么现在我们决定，不论是关于“五年计划”还是关于高饶反党联盟问题，所有的发言、报告，都可以拿回去修改，字斟句酌，在5天之内，把那些没有讲完全的，或讲得不妥的，再加以修改。不要因为在这一次会议上没有讲妥，我们就抓住他的小辫子，将来使他下不去。你还可以修改，以你最后修改的稿子为准。

对这些同志，我们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就是希望他们改正错误，对他们不但要看，而且要帮。就是讲，不但要看他们改不改，而且要帮他们改。**人是要有帮助的。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一个篱笆要打三个桩，一个好汉要有三个帮。**单干是不好的，总是要有人帮，在这样的问题上尤其要有人帮。看是要看的，看他们改不改，但单是看是消极的，还要帮助他们。对受了影响的人，不管有深有浅，我们一律欢迎他们改正，不但要看，而且要帮。这就是对待犯错误同志的积极态度。

没有受影响的同志，不要骄傲，谨防害病。这一点极为重要。前面讲的那些同志，可能有些是上当，有些是陷进去比较深，因为犯了错误，他们可能有所警觉，以后不再犯这类错误。害了一次病，取得了免疫力。种了一次牛痘，起预防作用。但是也不能保险，还可能害天花。所以，最好是3年5年再种一次牛痘，就是开我们这种会。其他的同志就不要骄傲，谨防犯错误。高岗、饶漱石为什么对这些人没有惹呢？有几种情形：第一种是他们认为是他们的敌人的人，当然不去传播；第二种是他们看不起的人，认为无足轻重，现在不必去传播，将来“天下大定”了，那些人自然跟着过来的；第三种是他们不敢惹的人，那些人大概是免疫力比较强，他们一看就不对头，虽然这些同志并不被认为是他们的敌人，也不是无足轻重，但是他们不敢去惹；第四种，就是时间来不及。这个瘟疫散播也要时间，再有一年的工夫不揭露，有些人那就难保。所以不要逞英雄：你看，你们不是惹了一点骚吗？而我可干净啦！再有一年不揭露，保管有不少的人是要受他们影响的。我认为，以上就是受高、饶影响的和没有受影响的两部分同志应当注意的地方。

第三点，在原则性的问题上，在同志之间，对于违反党的原则的言论、行动，应当经常注意保持一个距离。他们那些话，他们那些行动，不符合党的原则，我们又看不惯，在这一部分问题、这一部分情况上，就不要打成一片。对其他的问题，符合党的原则的，比如“五年计划”，关于高饶反党联盟的决议、报告，以及各种正确的政策，正确的党内法规，这样一些言论、行动，当然要积极支持，打成一片。对不符合党的原则的，就应当保持一个距离，就是说，要划清界限，立即挡回去。不能因为是老朋友，老上司，老部下，老同事，同学，同乡等而废去这个距离。在这次高饶反党事件中，以及在过去党内的路线斗争中，都有过许多这样的经验：**只要你以为关系太老了，太深了，不好讲，不保持一个距离，不挡回去，不划清界限，你就越陷越深，他们那个“鬼”就要缠住你。所以，应当表示态度，应当坚持原则。**

第四点，有些同志说，“知道高、饶一些坏事情，但是没有看出他们的阴谋”。我说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听到高岗、饶漱石讲了许多不符合党的原则的话，甚至高岗、饶漱石还同他们商量过一些反党活动问题，那就应当看出来。一种是普通知道他们一些坏事情，而没有看出阴谋，这是难怪的，那是很难看出的。中央也是到了1953年才发现他们的反党阴谋。经过财经会议、组织会议，以及财经会议以前的种种问题，看到他们不正常。财经会议期间，发现了他们的不正常活动，每一次都给他们顶了回去。所以，以后他们就完全转入秘密了。对这个阴谋、阴谋家、阴谋集团，我们是到1953年秋冬才发现的。**对于高岗、饶漱石，长期没有看出他们是坏人。这种事情过去也有过。井冈山时期有几个叛变分子，我们就从来没有想到他们会叛变。**恐怕你们各位都有这种经验。

我们应当从这里得出一条经验，就是不要被假象所迷惑。我们有的同志容易被假象所迷惑。一切事物，它的现象同它的本质之间是有矛盾的。人们必须通过对现象的分析和研究，才能了解到事物的本质，因此需要有科学。不然，用直觉一看就看出本质来，还要科学干什么？还要研究干什么？所以要研究，就是因为现象同本质之间有矛盾。但假象跟一般现象有区别，因为它是假象。所以得出一条经验，就是尽可能不要被假象所迷惑。

第五点，**骄傲情绪的危险。不要逞英雄。事业是多数人做的，少数人的作用是有限的。应当承认少数人的作用，就是领导者、干部的作用，但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作用，有了不起的作用的还是群众。干部与群众的正确关系是，没有干部也不行，但是，事情是广大群众做的，干部起一种领导作用，不要夸大干部的这种作用。**没有你就不得了吗？历史证明，各种事实证明，没有你也行。比如没有高岗、饶漱石是不是不得了呢？那还不是也行吗！没有托洛茨基，没有张国焘，没有陈独秀，还不是也行吗！这些都是坏人。**至于好人呢，没有你也可以。没有你，地球就不转了吗？地球还是照样地转，事业还是照样地进行，也许还要进行得好些。**孔夫子早已没有了，我们中国有了共产党，总比孔夫子高明一点吧，可见没有孔夫子事情还做得好一些嘛！

有两种人：一种是老资格，在座的不少，资格很老；一种是新生力量，这是年轻的人。这两种人中间哪一种人更有希望呢？恩来同志今天也讲了这个问题，当然是新生力量更有希望。有些同志，因为自己是老革命，就骄傲起来，这是很不应当的。比较起来，如果说允许骄傲的话，倒是青年人值得骄傲一下。四五十岁以上的人，年纪越大，经验越多，就应当更谦虚。让青年人看到我们确实是有经验的：“这些前辈，确是有点经验，不要看轻他们，你看他们那么谦虚。”四五十岁的人了，因为得了许多经验，反倒骄傲起来，那岂不是不像样子？青年人就要发议论:“你们那些经验就等于没有，还不是跟小孩子一样。”小孩子有点骄傲情绪，那是比较合理的。上了年纪的人，有了这么多经验，还骄傲，把尾巴翘得那样高，可以不必。**俗语说:“夹紧尾巴做人。”人本来是没有尾巴的，为什么要夹紧尾巴呢？好比那个狗，有翘尾巴的时候，有夹尾巴的时候。大概是打了几棍子的时候它就夹紧尾巴，大概是有了几批成绩的时候它的尾巴就翘起来了。我希望，我们所有的同志，首先是老同志，不要翘尾巴，而要夹紧尾巴，戒骄戒躁，永远保持谦虚进取的精神。**

第六点，**戒“左”戒右。有人说，“‘左’比右好”，许多同志都这么说。其实，也有许多人在心里说，“右比‘左’好”，但不讲出来，只有诚实的人才讲出来。**有这么两种意见。**什么叫“左”？超过时代，超过当前的情况，在方针政策上、在行动上冒进，在斗争的问题上、在发生争论的问题上乱斗，这是“左”，这个不好。落在时代的后面，落在当前情况的后面，缺乏斗争性，这是右，这个也不好。我们党内不但有喜欢“左”的，也有不少喜欢右的，或者中间偏右，都是不好的。我们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左”，也反对右。**

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问题，我就讲这么几点意见。

四、关于目前形势。

国际形势，国内形势，党内形势，这3种形势怎样呢？是光明面占优势，还是黑暗面占优势呢？应当肯定，不论国际、国内、党内形势，都是光明面占优势，黑暗面占劣势。在我们这个会场上也是如此。不要因为有很多人作了自我批评，以为就黑暗了。这些同志是着重讲了他们的缺点错误，没有讲他们的长处，哪一年参加革命，哪里又打了胜仗，哪里有工作成绩，这些话都没有讲。专看他们这一篇检讨，那么就黑暗了。其实，这是一面，在很多同志身上，这是次要的一面。这跟高岗、饶漱石和张、张、赵、马、郭五虎将不同，他们不能适用这个估计，光明面占优势。高岗有什么光明面占优势呀？他是全部黑暗，天昏地黑，日月无光。至于我们的同志那就不同，略有黑暗，这个东西可以洗干净，用肥皂多洗几回。

**为什么要提出准备对付突然事变，准备对付反革命复辟，准备对付高饶事件的重复发生呢？这是说，从最坏的可能性着想，总不吃亏。不论任何工作，我们都要从最坏的可能性来想，来部署。**无非是这些坏得不得了的事：帝国主义者发动新的世界大战，蒋介石又来坐北京，**高饶反党联盟一类的事件重新发生，而且不只一个，而是十个，一百个。尽管有那么多，我们都先准备好了，就不怕了。**你有十个，也只有五双，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都估计到了。帝国主义拿来吓唬我们的原子弹和氢弹，也没有什么可怕。世界上的事情，**总是一物降一物，有一个东西进攻，也有一个东西降它。**看《封神榜》就知道，哪有一个“法宝”是不能破的呀？那样多的“法宝”都破了。我们相信，**只要依靠人民，世界上就没有攻不破的“法宝”。**

五、为胜利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而斗争。

中央决定1956年下半年，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有3个议事日程：（一）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二）修改党章；（三）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明年7月以前要完成代表的选举及文件的准备工作。要求在这一年多的时间内，各方面的工作，经济、文教、军事、党务、政治思想、群众团体、统一战线、少数民族工作，都要大进一步。

我顺便讲一讲少数民族工作的问题。要反对大汉族主义。不要以为只是汉族帮助了少数民族，而少数民族也很大地帮助了汉族。有些同志总是在那里吹，我们可帮助了你们，就没有看到没有少数民族是不行的。我国50%到60%的地方，是什么人住的？是汉族住的，还是什么人住的？50%到60%的地方是少数民族居住的。那里物产丰富，有很多宝贝。现在，我们帮助少数民族很少，有些地方还没有帮助，而少数民族倒是帮助了汉族。有些少数民族，需要我们先去帮助他们，然后他们才能帮助我们。**少数民族在政治上很大地帮助了汉族，他们加入了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就是在政治上帮助了汉族。**少数民族和汉族团结在一起了，全国人民都高兴。所以，少数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国防上，都对整个国家、整个中华民族有很大的帮助。那种以为只有汉族帮助了少数民族，少数民族没有帮助汉族，以及那种帮助了一点少数民族，就自以为了不起的观点，是错误的。

我们讲在这一年中各方面的工作要大进一步，就是要把已经揭露出来的缺点、错误加以改正。不要在这次会上许了愿，到明年召开“八大”时还照样有那么多缺点、错误，原封未动。所以要为召开“八大”而斗争者，就是要把缺点、错误改正，比如铺张浪费、大屋顶这样一些东西，认真地负责地改一下。不要在这里许了愿，一回去大家就把两脚一伸睡起觉来了。

有人建议一年或者两年开一次这样的会议，使同志之间互相监督，我认为可以考虑。**谁监督我们这些人呢？互相监督是好办法，可以促进党和国家的事业迅速进步。**是迅速进步，不是慢慢地进步。党的代表大会，10年没有开了。当然头5年不应当开，因为兵荒马乱，又开了“七大”，后5年可以开而没有开。没有开也有好处：高饶问题搞清楚再开，不然他们要利用“八大”大做文章。同时，我们的“五年计划”也上了轨道，过渡时期总路线也提出来了，又经过这次代表会议使大家在思想上更加统一了，为召开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准备了条件。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不要每个人去检讨一篇，但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还是要作公开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不实行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条是不行的。

批评要尖锐。这次有些批评，我觉得不那么尖锐，总是怕得罪人的样子。你不那样尖锐，不切实刺一下，他就不痛，他就不注意。要有名有姓，哪一个部门，要指出来。你没有搞好，我是不满意的，得罪了你就得罪了你。怕得罪人，无非是怕丧失选举票，还怕工作上不好相处。你不投我的票，我就吃不了饭？没有那回事。其实，你讲出来了，把问题尖锐地摆在桌面上，倒是好相处了。**不要把棱角磨掉。牛为什么要长两只角呢？牛之所以长两只角，是因为要斗争，一为防御，二为进攻**。我常跟同志讲，你头上长“角”没有？你们各位同志可以摸一摸。我看有些同志是长了“角”的，有些同志长了“角”但不那样尖锐，还有些同志根本没有长“角”。我看，还是长两只“角”好，因为这是合乎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有一条，叫作批评和自我批评。所以，**定期召开会议，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一种同志间互相监督，促使党和国家事业迅速进步的好办法。**建议各省、市委同志们考虑，你们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做？你们不是学中央吗？我看这一点是可以学的。

最后，我请同志们注意，也请全党同志注意：为在1956年胜利地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而斗争！为胜利地完成第1个“五年计划”而斗争！

1955年4月1日，公安部以反革命罪将饶漱石逮捕入狱。

4月2日，潘汉年由于受到饶漱石一案的震动，带着写好的一份检查材料去见出席党代表会议的上海代表团团长陈毅，请他将这份材料转呈中央。陈毅看了潘汉年的报告及材料，大吃一惊，安慰了潘汉年几句，便匆匆将材料亲自送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看罢材料，大为震怒，当即批示道：

“此人从此不能信用。”

4月3日，公安部受命逮捕了潘汉年，罪名是潘汉年在检查材料上所检讨的两件事：一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秘密会见过汪精卫而长期没有向组织上报告（据有关材料说：潘汉年在1943年秋随李士群前往南京见汪精卫的事，有一个绝好的解释机会，他没有抓住。那是在1944年，他到延安参加党的“七大”，在杨家岭见到了毛泽东。那时，毛泽东正在看文件，见到潘汉年十分高兴，两人握手后，毛泽东顺手从旁边书架上拿了一瓶酒，倒了一杯给潘，然后举起杯子祝贺潘工作的胜利。这本是极好的解释的机会，但潘汉年几次欲言又止，终于没有把事情说出来，离开延安后，他十分后悔。事后潘汉年对朋友说，是因为小资产阶级的爱面子和个人英雄主义使他把要说的话吞了回去。）；二是对上海市公安局“重用、包庇和掩护”胡均鹤等大批特务的问题负有直接责任。

4月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五中全会。

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批准了1955年3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决议》、 《关于高岗、 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和《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议》，批准了全国代表会议选出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5人，候补委员6人的名单，及董必武的书记职务和刘澜涛、谭政、王从吾、钱英、刘锡武的副书记职务；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全国代表会议的公报。

全会补选林彪、邓小平为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

4月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并批准了周恩来提交的《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草案）》、《访问印度尼西亚计划（草案）》和《关于目前中缅两国间一些实际问题的处理方针》。

4月5日，卫立煌及夫人韩权华一行抵达北京，毛泽东安排由周恩来负责接见。

4月6日，毛泽东离开北京，乘专列南下，对农业合作化运动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

4月6日晚，周恩来设宴欢迎卫立煌及夫人韩权华一行。席间，卫立煌再次感谢周恩来，他还高兴地说：

“抗战之初，我们在太原有过竟夜长谈，那时您就在搞统一战线了！”

4月7日，周恩来、陈毅一行人驱车到北京西郊机场，前往万隆参加亚非会议。他们刚要登机，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匆匆赶来，把一份重要情报交给了周恩来，周恩来见上面写道：

“蒋介石特务机关已高价收买香港启德机场的地勤人员，准备利用‘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香港停留之机，将定时炸弹放入飞机油箱内，以暗害周总理和代表团成员。”

周恩来看罢情报轻蔑地一笑，与陈毅等人飞往重庆，再转昆明。

周恩来到了昆明，打电话给西花厅，要工作人员告诉外交部，要外交部在“克什米尔公主号”抵达香港之前，将罗青长送给他的情报通报英国驻华代办处、新华社香港分社及赴香港候机的部分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

4月10日上午，中国外交部有关负责人将情报通报给英国驻华代办处参赞艾惕斯。是日晚，新华社香港分社将情报向印度航空公司驻香港办事处作了通报。

4月11日上午，驻香港的国民党特务机关让收买的启德机场地勤人员周驹在“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上安放了定时炸弹，致使飞机飞离香港前往印度尼西亚途中5小时后爆炸，机上的中国、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及随同前往的中外记者11人，全部遇难。

此时，周恩来、陈毅等一行人尚在昆明，幸免于难。

4月13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批转陕西省《关于检查用地单位消费土地情况及处理意见》的意见，全文如下：

上海局，各分局、省（市）委并中央各部委党组：

特将陕西省委所批转省人民委员会民政厅《关于检查用地单位浪费土地情况及处理意见》转去。从陕西省民政厅对部分用地单位浪费土地情况的检查看来，**在国家建设征用土地中，浪费土地的现象是很严重的。浪费土地不只增加了农业生产的损失，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过多引起农民与市民失业的现象，陷于无法解决，对城市建设亦不相宜。**估计这个问题不只在陕西省，在其他有工厂建设的各城市都会存在的。这是关系到工农联盟问题，望各省及中央各部委党组对这个问题均予以深切注意，务必切实进行一次检查与处理。**要对那种有意浪费国家财资，过多征用土地或任土地荒芜而不顾的单位及负责人，查明其责任，正式给以批评或处分，以防错误继续发生。**对于已征未用的土地可仿照陕西所提办法处理，务必做到不荒芜土地。

此件及附件可登党刊。

中央 1955年4月13日

4月14日早晨，周恩来一行从昆明出发，开始了亚非会议的行程。

这天下午，毛泽东在刘庄与卫生部副部长朱琏谈话。

朱琏是在13日午夜匆匆从北京抵达杭州，被安排在离毛泽东下榻处刘庄不远的一招待所里。

4月15日下午，工作人员通知朱琏去见毛泽东。毛泽东在谈话中说：

“针灸是中医里面的精华之精华，要好好地推广、研究，它将来发展前途很广。有些同志坚持努力，是有成绩的，也证实了中医政策的提出是正确的。中国医学的经验是很丰富的。它有几千年的历史了，要有同志去整理它。这项工作是难做的，首先是卫生部行政领导上不支持，去年7月以后可能好一些，但还没有具体行动。我是支持的。我可以当卫生部长，也可以把这项工作做起来。不要以为我不懂医就不能做。这不是懂不懂医的问题，而是思想问题。”

毛泽东在跟朱琏谈话的时候，还说起了她的《新针灸学》。

《新针灸学》这本书是朱琏在3月23日送呈毛泽东的。毛泽东不但全看了，而且颇为赞同书中说到的针灸与现代医学理论发展的关系。毛泽东对朱琏说：

**“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活动学说的理论，对针灸治病的神秘提供了解释的钥匙。反过来针灸又能够给它提供丰富的实际材料。如进一步研究，一定可以发挥更大的效果，丰富与充实现代的医学。研究针灸，对医学理论的改革将发生极大的作用。**你说是吗？”

朱琏肯定地回答说，是的。毛泽东也频频点头，又说：

“很好。医学理论的确要改革。”

是日晚上，毛泽东请朱琏和他一道吃晚饭。

和毛泽东一起用餐的人坐满了一张大圆桌，其中有江青、叶子龙、林克、田家英，徐涛和洪敏大夫，还有浙江省公安厅厅长、中南海保健处处长周毅胜等。

浙江省委书记江华也在座。他说他已经吃过晚饭，毛泽东便幽默地要他坐在一边“观餐”。

毛泽东的风趣，逗得大家都笑了。

开饭了，菜有几盘，却不奢侈。大家都举起面前的酒杯。毛泽东也站起来，举杯说：

“今天——”他沉吟着，“该说些什么祝酒辞呢？”

叶子龙建议说：今天祝各界大团结万岁。毛泽东说：

“不是。**今天——是祝针灸万岁！”**

他环顾几个在座的大夫，自己先喝了口酒，接着说：

**“你们不要以为针灸是土东西，针灸不是土东西，针灸是科学的，将来世界各国都要用它。”**

他做手势让大家都坐下，自己也放下了酒杯，说：

**“中医的经验，需要有西医参加整理，单靠中医本身是很难整理的。**”

卫士送上一盘油烤馒头片，毛泽东指着推荐道：

“土面包比洋面包好，大家都尝尝。”

说着，便随手夹了两片送给朱琏和洪敏大夫。

众人围坐一桌，谈话喝酒吃饭，都很随意，气氛十分融洽。有时一个话题，东一句西一句能扯好久。说到锻炼问题，毛泽东自有他的见解，他说：

“我是没有出门休养过的。去年出来，医生为我定下一个计划，规定我第一天散步10分钟，第二天散步15分钟，第三天散步20分钟，以后每天散步定为25分钟。我突破了医生的这个计划，第一天就走了三个多钟点，还上了山。**身体是要锻炼的，还要看具体人的适应程度，不能作一般的硬性规定。”**

他夹起一片猪肝，颇有些得意地放进嘴里，说：

“医生不叫我吃动物内脏，说是增加什么胆固醇，我已经上了整整两年当了。今天开戒。”

他津津有味地嚼完，又夹起一片，接着说：

“**他们不叫林老（指林伯渠）喝鸡汤，说是外国出版的杂志上讲到鸡汤增加胆固醇。经过一段时间，又同意林老喝鸡汤了。其所以同意，也是因为看到外国杂志上说鸡汤不增加胆固醇。殊不知外国人是没有多少蔬菜吃的呀。中国医学上有的还把动物内脏用来治疗人的内脏病，常常用之有效。”**

毛泽东最讨厌的是人云亦云，被人牵着鼻子走。

吃完饭，众人没有马上散去。毛泽东不走，大家都不便起身。他悠然地点燃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身边有人说，吸烟对身体有害。毛泽东笑了，并不把烟掐灭，只是说：

“吸纸烟，有了习惯，一下子戒不了，也不必太勉强，倒是应该吸少些，每天不要吸得太多，10支至15支就差不多了。**中国的农民，从十来岁就会吸烟，工具是用木头自制的烟嘴，把烟叶装进去吸。从来就没听到过农民因吸烟吸死的。**”

晚上近10点钟了，大家知道毛泽东晚间还要办公，请他先去休息一会儿。劝了几次，他才动身。

4月22日，毛泽东结束了近20天的调查研究，乘专列回到北京（很遗憾，有关此次南下活动的记载，只能见到只言片语，请看下面5月9日的谈话，而详细的资料至今无法搜寻到）。

4月25日傍晚，毛泽东在菊香书屋会见了17年未曾谋面的卫立煌，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卫立煌回忆起1938年4月17日访问延安，曾受到热烈欢迎，并和毛泽东第一次晤面。毛泽东听后说：

“时间过得真快啊，想不到我们又走到一起来了。人间正道是沧桑！”

他对卫立煌的归来感到非常高兴，详细询问了卫立煌的近况和在海外的生活情况，向卫立煌介绍了解放后中国的变化和将来的发展蓝图。卫立煌为之欢欣鼓舞，感谢毛泽东的关怀，表示向往新中国的建设。

是日晚，毛泽东设宴招待卫立煌，饭罢，又一起观看了一场电影。卫立煌十分感激毛泽东的热情款待。

4月27日，毛泽东会见了巴基斯坦新任驻华大使苏尔丹乌丁·阿哈默德。

巴基斯坦在1951年就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但它后来又参加了美国策划的东南亚条约集团。刚刚结束的这一次亚非会议，巴基斯坦也是发起国之一。毛泽东在同苏尔丹乌丁·阿哈默德谈话中说：

“中国和巴基斯坦都是东方国家，东方国家有许多共同点，他们过去都受西方国家的压迫。中巴之间从来没有战争，现在也没有任何争执，两国有贸易来往，因此中巴应该成为好朋友。

亚非会议要不是由5个科伦坡国家发起，而由中国发起，那就开不成。他们相信你们，不相信我们，原因是我们是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但是，我们共产党并不像美国所描写的那样是不理发的，是青面獠牙、三头六臂的，我们是讲道理的。”

关于两国关系的最大障碍——巴美结盟问题，毛泽东坦诚地表达了中国的态度，他说：

“你们还签订了《马尼拉条约》，我们怕的不是巴基斯坦、泰国、菲律宾，甚至也不是英国和澳大利亚，而是美国。**现在我们了解，巴基斯坦当初参加马尼拉条约集团是因为怕中国侵略。希望你们慢慢地能了解中国是不会侵略的，并希望消除彼此间的误解，改进彼此间的关系。”**

毛泽东还说：

“我们已经同巴基斯坦建立了外交关系和贸易关系，我们同泰国、菲律宾尚未建交，但也希望能改进我们同他们之间的关系。周恩来总理在亚非会议上已同他们的代表有了接触。中国愿意同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和平共处。周总理在声明中已表示我们愿意同美国人坐下来谈判。在亚非会议期间，我们同5个科伦坡国家和泰国、菲律宾曾谈过台湾问题。一切问题应通过谈判来解决，打仗的办法不好。”

1955年5月1日晚，毛泽东就陈嘉庚来信建议节约粮食和福建晋江青阳机场改建问题，给他写了一封回信：

嘉庚先生：

迭接惠书，论及粮食和飞机场二事，均已转付有关机关研究去了。盛意甚感，谨此奉复。顺祝

兴居佳胜

毛泽东 1955年5月1日

是日晚，毛泽东想起近年来许多乡下亲友来京，或要求来京，或要求解决工作问题，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便提笔给文炳璋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炳璋同志：

2月15日的信收到。你可去找毛泽荣（逊五）、毛仙梅2人，和他们一到来京一行，即持信为证。其他各人均不要来，请你转告文梅清、文东仙二同志，他们给我的信收到了，他们的问题我不能解决，他们不要来京。韶山方面有要来的，除泽荣、仙梅二人可以来之外，均不可来，问你母亲及各位朋友的好！

毛泽东 1955年5月1日

毛泽东写毕，把信看了一遍，觉得对“不要来京”还有必要强调一下，便又在信的天头上加了一句：

“此信给毛泽荣、毛仙梅二人一阅。”

5月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最高国务会议。台盟总部秘书长徐萌山作为台盟的唯一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休息时，示意叫徐萌山过去，他同徐萌山握手后说：

“你是第一次来吧？过去没有见过。”

徐萌山说：

“我叫徐萌山，在台盟工作，1946年从台湾来念大学的。”

站在毛泽东旁边的徐冰副部长介绍说：

“他是台盟的秘书长。徐，就是我徐冰的徐，500年前是我的本家。”

毛泽东笑了说：

“啊，是你的本家啊，那很好！”

毛泽东幽默的话语，使徐萌山紧张的情绪变得轻松了。毛泽东转对徐萌山说：

“你还年轻，要很好学习，做好工作。”

徐萌山激动得不知怎样回答，只说了声：

“好的，谢谢。”

5月5日晚，邓子恢向毛泽东汇报第3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情况，准备在第二天作总结。毛泽东警告他说：

“不要重犯1953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那种错误，否则又要作检讨。”

5月6日，邓子恢在第3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做了总结，他没有在会议上传达毛泽东昨天晚上和他谈话内容，**仍然照3月间毛泽东同他谈话的精神，说：现在根据主席决定，今年一般停止发展。有少数省份秋后还可以酌情发展，一般地区停止发展一年半，全力进行巩固。**

5月7日，第3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结束，会议决定农业生产合作社停止发展一年半，全力进行巩固。

这天中午，周恩来率领参加亚非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回到北京。

下午，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会议，周恩来、陈毅和政治局委员参加了会议。周恩来、陈毅汇报了亚非会议的情况。毛泽东请大家一起用餐。

5月7日傍晚，毛泽东派秘书和专车把文炳璋、毛泽荣、毛仙梅及毛泽荣的养子毛会华接到中南海叙旧。

文炳璋一行是在5月初应毛泽东之邀来京的，他们住在中南海外面一个招待所里。

毛泽东的堂弟毛泽荣这一次已经是第2次来京了。此时，毛会华刚从部队转业，忙着找工作，他知道养父和毛泽东的关系，便央求父亲到京找毛泽东帮忙找个工作。毛泽荣犹豫再三，还是答应了儿子的要求。

毛泽东见到毛会华，当即叫秘书拿了200元人民币，作为见面礼交给了毛会华。毛泽东还勉励毛会华好好学习，努力工作。毛泽荣借此机会提出，请主席三哥帮忙找个工作。毛泽东闻言，沉吟不语，半晌才说：

“这个事情不大好办。我是国家主席，不能随便给人介绍工作，更不能只考虑自己的亲属、故旧、同事的利益。”

毛泽荣听了，心中有些不悦。

毛仙梅是毛泽东的远房族兄，曾在烈士毛新梅的影响下参加农民运动。他一身农民打扮，上穿一件补丁青衣，腰系一条旧围裙，还带着一杆旱烟袋。毛泽东见他如此打扮，就拿出自己的衣服给他换上。毛仙梅喜欢抽旱烟，一抽就烟雾沉沉，很呛人。毛泽东看他一个劲地抽，就说：

“仙梅大哥，你还是把烟袋脑壳丢了，抽纸烟吧。”

毛泽东向文炳璋了解了农村的生产和农民、教师及转业军人的生活情况。毛仙梅向毛泽东反映了杨林蒋梯奎烈士的胞弟蒋浩然被划为地主成份引起亲属不满的事，并把蒋浩然写给毛泽东的信交给了毛泽东。

此时，工作人员端来了晚餐，毛泽荣在吃饭的时候见毛泽东爱吃红烧肉，便对他说：

“三哥回韶山，我们餐餐搞红烧肉给你吃。”

毛泽东高兴地说：

“那好！那好！你们能经常吃到红烧肉吗？”

毛泽荣闻言，立时放下筷子，不高兴地说：

“莫说吃肉，好多人家饭都没得吃！”

毛泽东忙问何故？毛泽荣说，去年秋天，中央来了文件，粮食全部由国家统一收购，收购后留给农民的口粮每天只有1斤。对庄稼汉来说，1天1斤哪里够吃？眼下春季青黄不接，借贷无门，韶山有40%的人没有饭吃。毛泽东听了，沉默了许久，歉意地说道：

“**我了解的情况没那么严重，看来我没有十足的官僚主义，也有五成呢。只有你肯讲真话。”**

他立即让秘书把在家的中央领导都请到这里来。不一会儿，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彭真等人先后到了。毛泽东向他们介绍了自己的客人，又让毛泽荣介绍一下乡下缺粮的问题。毛泽荣说：

“你们领导闹革命，我举双手赞成，就是粮食要充足点。”

接下来，他详细汇报了乡间因为统购过头而造成春荒缺粮的情况。周恩来解释说：

“现在国家搞建设，有些困难，要注意节约，北京的机关事业单位，星期天只吃两顿饭。”

毛泽荣说：

“乡里没有多少油吃，城里还有副食卖，当然够了……”

毛泽东见谈得差不多了，便止住堂弟的话说：

“好，好！泽荣暂时莫讲了，我们要开会研究一下。”

送走刘少奇等人后，毛泽东和毛泽荣出去散步，兄弟俩漫步在中南海的林荫大道上。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

“泽荣，你有困难，不要来找我，要靠当地政府解决。你的困难要根据实际情况出发，政府能解决就解决，不能解决就不要耍蛮。你是我的亲属，我必须严格要求，不会只为你们考虑。至于你的儿子要参加工作，想法是好的，但要靠他自己努力，不要要求政府照顾。”

这一天，毛泽东让摄影师为他与毛仙梅、毛泽荣、文炳璋、毛会华合影留念。

过了两天，毛仙梅从住所去见毛泽东，他说：

“三弟，我在北京住不习惯，我要回去了。”

毛泽东有些诧异，问道：

“怎么不习惯？这里生活不好吗？”

毛仙梅说：

“很好。可惜的是我丢了两件东西。”

“什么东西？”

毛泽东急切地问；毛仙梅扳着手指说：

“一件是叶子烟袋，一件是围裙子。”

毛泽东闻言，哈哈大笑，说：

“呵！就是那两件东西。我不是都给你换了吗？”

毛仙梅说：

“我舍不得。”

在毛泽东的挽留下，毛仙梅又住了下来。

5月8日，司徒美堂因脑溢血在北京与世长辞，享年87岁。

5月9日晚，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周恩来、李先念、邓子恢、廖鲁言、陈国栋，研究粮食问题和合作化问题。他说：

“粮食，原定征购900亿斤，可考虑压到870亿斤。这样可以缓和一下。这也是一个让步。粮食征购数字减少一点，换来个社会主义，增加农业生产，为农业合作化打下基础。”

他问邓子恢：

“到1957年化个40%，可不可以？”

邓子恢不同意大发展，仍然坚持3月间毛泽东同他商定的数字，说：

“上次说三分之一，还是三分之一左右为好。”

毛泽东的脸色掠过一丝不悦，勉强地说：

“三分之一也可以。”

他说起4月6日至22日到南方视察的情况。那时候，他穿着白衬衣到田里察看庄稼，看到小麦长势很好，有半人高，心里便嘀咕：看来，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蛮高嘛，怎么在北京看到的材料上都说农民生产消极呢？即使消极，也是一小部分呀。到了上海，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汇报说：“在县、区、乡3级干部中，有30%的人对待合作化存在右倾消极情绪，他们是反映农民要‘自由’、不要社会主义的情绪的。这和上级有关部门的领导不无关系。”

毛泽东沉吟一下，接着说：

“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有矛盾的。农民是要‘自由’的，不愿意搞社会主义。在县区乡干部中，有一批是反映农民这种情绪的。不仅县区乡干部中有，上面也有。省里有，中央机关干部中也有。”

他加重了语气说：

“说农民生产情绪消极，那只是少部分的。我沿途看见，麦子长得半人深，生产消极吗？”

欲知农业合作化运动能否顺利进行下去，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听堂弟毛泽荣说粮食由国家统一收购，收购后留给农民的口粮每天只有一斤不够吃，便歉意地自我检讨说：“**我了解的情况没那么严重，看来我没有十足的官僚主义，也有五成呢。只有你肯讲真话。”**他立即让秘书把在京的中央主要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彭真等请来，又让毛泽荣介绍了一下乡下缺粮的情况，并说要开会研究一下。隔了一天，有关方面果然研究决定，粮食征购降低30亿斤。这就是人民的领袖。

**第13章**

“**反动的、淫秽的、荒诞的书刊图画，是传播封建阶级和**

**资产阶级的反动的、腐朽的思想的主要方法之一，也是目**

**前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实行思想进攻的重要工具之一。**”

话说1955年5月10日，司徒美堂公祭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及首都各界人士700多人出席公祭。灵前摆着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送的花圈。

周恩来亲自主持公祭大会。司徒美堂的遗体被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5月11日，毛泽东在周扬的来信上作了一个重要批示。

早在4月间，舒芜把胡风在40年代写给他的信件交给了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林默涵发现信件中有许多暗语，对一些党和非党的作家抱有憎恨的态度，他要舒芜整理清楚后，交给了周扬。5月9日，周扬把胡风写的一篇《我的自我批判》和舒芜提供的材料清样一同报送毛泽东，并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胡风的自我检讨和舒芜的揭露材料拟在下期的《文艺报》一同登载，在胡风文前加了一个编者按语，请毛主席审阅。”

毛泽东看罢周扬的来信，认为拟的编者按语不行，对舒芜所提供的材料的题目《关于胡风小集团的一些材料》也不满意，便提笔将其改为《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他在给周扬的批示中写道：

周扬同志：

按语不好。改写了一个，请你和陆定一同志看看可用否？如以为可用，请另抄付印，原稿退还给我为盼！可登《人民日报》，然后在《文艺报》转载。按语要用较大型的字。如不同意，可偕定一于今晚11时以后，或明天下午，来我处一商。

毛泽东

毛泽东重新起草的按语是这样写的：

“胡风的这篇在今年1月写好、2月作了修改、3月又写了‘附记’的《我的自我批判》，我们到现在才把它和舒芜的那篇《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一同发表，是有这样一个理由的，就是不让胡风利用我们的报纸继续欺骗读者。从舒芜文章所揭发的材料，读者可以看出，胡风和他所领导的反党反人民的文艺集团是怎样老早就敌对、仇视和痛恨中国共产党和非党的进步作家。读者从胡风写给舒芜的的那些信上，难道可以嗅得出一丝一毫的革命气味来吗？从这些信上发散出来的气味，难道不是同我们曾经从国民党特务机关出版的《社会新闻》、《新闻天地》一类刊物上嗅到过的一模一样吗？什么‘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什么‘在民主要求的观点上和封建传统反抗的各种倾向的现实主义文艺”；什么和‘人民共命运的立场’；什么‘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什么‘反帝反封建的人民解放的革命思想’；什么‘符合党的政治纲领’；什么‘如果不是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我个人二十多年来是找不到安身立命之地的’。这种话，能够使人相信吗？如果不是打着假招牌，是一个真正有‘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的知识分子（这种人在中国成千上万，他们是和中国共产党合作并愿意接受党领导的），会对党和进步作家采取那样敌对、仇视和痛恨的态度吗？

**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胡风反党集团中像舒芜那样被欺骗而不愿永远跟着胡风跑的人，可能还有，他们应当向党提供更多的揭露胡风的材料。**隐瞒是不能持久的，总有一天会暴露出来。从进攻转变为退却（即检讨）的策略，也是骗不过人的。**检讨要像舒芜那样的检讨，假检讨是不行的。路翎应当得到胡风更多的密信，我们希望他交出来。一切和胡风混在一起而得到密信的人也应当交出来，交出比保存或销毁更好些。

胡风应当做剥去假面的工作，而不是骗人的检讨。剥去假面，揭露真相，帮助党彻底弄清胡风及其反党集团的全部情况，从此做个真正的人，是胡风及胡风派每一个人的唯一出路。”

5月12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八大”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名单，由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王稼祥、陆定一、胡乔木、陈伯达7人组成；通过了修改党章和修改党章报告起草委员会名单，由邓小平、杨尚昆、安子文、刘澜涛、宋任穷、李雪峰、马明方、谭震林、胡乔木9人组成。

这一天，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提出了“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的肃反方针。

据统计，全国工矿企业在1954年发生政治性破坏事件345起。从1955年1月到4月，在闽、浙、苏、皖、桂、湘、鄂、赣、豫、川、康、滇、冀等15个省的一些地区，发生反革命暴乱4起，反革命暴乱未遂案10起，较大的骚乱25起。这些暴乱、骚动、破坏事件，多数与美蒋间谍活动和深藏的反革命分子有联系。实行第2次大规模镇反和内部肃反，已经成为必要的政治运动。

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成立了由罗瑞卿、陆定一等10人组成的肃反领导小组和办公室。

5月12日这一天，毛泽东为中央转发浙江省委《关于当前改变耕作制度工作中几个问题的通报》作出批示：

上海局、各分局、各省（市）委：

浙江省委关于改变耕作制度工作中几个问题的通报很好，特转发各地供研究参考。

为了实现粮棉增产，各地根据具体条件，进行若干农业改革，这是完全必要的。事实证明，许多切合实际的改革措施业已获得了显著的增产效果。但也有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做法，造成了若干减产的损失。这种情况亟应引起各地注意。中央认为：

一、**农业的地区性是很大的，各个地区的具体条件有很大差别，甚至一区一乡之内也各有不同。因此在确定农业耕作方面的改革时，必须注意因地制宜，绝不能用一套办法在一省一县之内硬性普遍推行。在推广成功的典型经验时，必须根据不同地区的群众条件和经济条件逐步地进行，要总结一步，发展一步，绝不可冒然前进。**

二、**我国农业的生产和技术装备是落后的，至于耕作制度和耕作技术并不能一般看成是落后的。它是我国广大农民几千年来在生产实践中长期经验的积累，必须重视这种宝贵的民族遗产。**各地进行农业耕作方面改革时，必须重视群众的生产经验，反复研究，比较得失，绝不能粗暴地轻率地否定群众的经验，强迫群众改变。**低估或忽视群众长期积累的丰富的生产经验，就会犯错误，就会造成生产上的严重损失。**

三、改革耕作制度必须与提高其他技术相结合，才能充分发挥增产作用。譬如有的地方，单纯追求复种面积而不注意技术和物质条件（特别是肥料）是否跟得上去，盲目推行一年两熟，结果两熟收成加在一起反不如一熟打粮多。

四、推行农业改革，必须树立全面增产、全年打算的观点。在计算增产效果时，不应孤立地计算某一种作物、某一个季节的增产与否，必须从全面算账，从全年算账，不能只图这一季增产，而造成下一季减产，耽误下一季的种植。也不能不根据当地技术条件和物质条件（特别是肥料），轻率地否定群众合理轮作的经验，挤掉必要的季节休耕或绿肥种植的面积，以致使地力衰退，算起总账来反而减产。

五、农业耕作方面的改革是极其错综复杂的工作，它基本决定于各地自然条件、耕作技术和其他物质条件，决定各地劳动组织状况。当推行这种改革而群众有抵触的时候，绝不能简单看成只是群众的落后习惯和保守思想，应该再做仔细考虑。就是确实可行的一种改革办法，如群众没有亲身经验一时尚不能接受，也只能先在国营农场实行示范，待取得良好效果后，再吸引群众参观评比，向群众宣传教育，在群众自觉自愿的基础上逐步推广。改革计划开始不要定得过大，计划确定之后，还必须充分考虑和征求下边提出的修正意见。单纯自上而下地硬性规定实行耕作改革的面积指标，势必助长主观主义和强迫命令作风，从而带来不利于生产的后果。

根据浙江经验，中央要求各地结合春耕，对去年推行农业改革的结果，进行一次深入检查。在检查中要注意实事求是，肯定正确的，批判错误的，补充不足的。要有全面的具体的分析，不能只看增产的典型而不问减产的事例。还要充分发扬民主，倾听群众的真实反映，以便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实事求是地订正今年的改革计划。

（此件及附件可登党刊。）

　 中央 1955年5月12日

5月13日，《人民日报》将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和《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即第一材料）以及毛泽东重新起草的编者按语一同发表。

《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即第一材料）是舒芜交出的从1943年到1950年胡风写给他的34封信的摘编。他把有关材料分为4类：

1、胡风一贯反对和抵制中国共产党对文艺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2、胡风一贯反对和抵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由党和非党进步作家所组成的革命文学队伍。3、胡风为了以上两个目的，进行了一系列的宗派活动。四、狂妄的个人野心和唯心主义世界观是胡风一切活动的思想基础。

舒芜还说：胡风的信，使人强烈地感到“反共反马克思主义的卑鄙的个人野心的气味。”

5月13日下午，董其武到中南海去见毛泽东。

董其武从1953年底起兼任69军军长。这一次，他到北京是参加“五一”节活动的。在此之前，有一些起义人员因受了委屈，就给他写信诉苦，对起义的意义表示有怀疑。

董其武对毛泽东说：

“主席日理万机，有点小事找您，耽误您的时间。”

毛泽东说：

“有什么事哩！”

董其武说：

“过去您代表共产党说对国民党起义人员是既往不咎，现在有抓的，有押的，有管制的，有劳动改造的，几乎都究了。我接到许多起义人员的来信，都转到国务院去了，但问题仍没有得到解决。”

毛泽东听后说：

**“我们的政策没有变，我们的经是一部好经，是一些小和尚、歪嘴和尚念错了经！就是下边搞错的，我们也有责任，有错一定要改。”**

毛泽东拍着桌子大声说：

“改！一定能改好！”

董其武听了毛泽东的话，很高兴，随身带来的信，一封也没有给毛泽东留下。

后来，在毛泽东的亲自过问下，不少起义人员的错案得到了平反。

5月14日下午5时半，毛泽东游泳后来到中南海丰泽园警卫部队驻地，身着新军装的战士们列队接受检阅。毛泽东走到队伍前和战士们打招呼，内卫班的一些战士，他可以叫出名字，那些没有担任过内卫任务的战士，他叫不出名字，就一一询问了他们的情况。回到队伍的正前方，他的目光从前排扫到尾，亲切地说：

“讲什么，讲讲工作，讲讲工作方法。我们工作是为什么目的呢？”

站在前排的王明富和战士们齐声回答：

“为共产主义！”

“也对。”毛泽东点点头，示意大家坐下，他也坐在藤椅上，接着说：**“共产主义就是平时讲的为人民服务**。过去打日本帝国主义，再早是打倒皇帝。你们这里有没有打过皇帝的？一个也没有吧？我是皇帝的老百姓，光绪、宣统皇帝。现在宣统皇帝在东北学马列主义，是个战犯，吃了饭没事坐班房。他是6岁做皇帝，作了3年。我那时革命当过兵，程潜就是现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那时在湖南当师长，我当兵，不在一个师。那时革命叫打皇帝，以后就打军阀，军阀很多，有袁世凯这些人，后来就出了蒋介石，我们和他一块办过事的。推翻皇帝算来有44年啦。共产党成立34年啦，开头人很少，只有几十个人。那时志向很大，闹革命，革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命。34年前还没有共产党，只有几十人的小组在各省。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只有12个代表，有董必武同志一个，我一个，还有两个，其他有当汉奸的，陈公博、周佛海。有的叛变了，有的死啦。陈公博是汪精卫的总理。此外还有个张国焘，这个人不好，现在香港帮助帝国主义做事。人都不一样，各走各的路。第一次代表大会意义很大，以后1925年至1927年有5万多党员。北伐从广州打到长江，这时蒋介石不干啦，叛变革命。这一打，打了22年。中间日本打进来了又合作，开始是合作的，后来又不合作，一方面打日本，一方面打国民党蒋介石。一方面合作，一方面打，两只手（比手势）。”

“**做革命工作，过去就叫反帝反封建，也叫为人民服务，现在叫革资本主义的命，革小农经济的命。**过去也有总路线，**过去的总路线就叫反帝反封建，反帝反封建为社会主义开了一条公路，把那些王八蛋赶走，然后才走社会主义。**过去这个地方不能来，来的话就要脑袋。过去这地方有地下工作同志，北京市刘仁同志就是，此人就钻在地下。过去这地方杀共产党，杀不完。中国有个好处就是人多，有6亿，全世界没一个国家有这么多人。三国刘备破曹操采用火攻，万事具备，就缺东风。你们看过《三国》没有？《三国》可以看。现在我们就是缺东风。什么是东风呢？就是缺工业，缺近代工业，有工业才有汽车、拖拉机、火车头、飞机、坦克、重机器、细机器。现在我们只能造不大不细的，3个‘五年计划’就差不多都能造啦。就是为这个服务，就是为共产主义、为人民服务。**3个改造，是两个性质，农业和手工业是劳动人民，不是剥削者，但他们是个体经济不利发展，要用合作社的办法，用机器耕种。资本主义是剥削者，以后不叫他剥削啦，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一个工业化，一个改造， 搞他15年基本上达到这个目的，15年后还要干。你们现在多大年纪？年龄平均23、22，10个‘五年计划’50年，70多岁。孔夫子是72岁死的，这个人读书不少。孔夫子搬家净是书嘛（大笑）。到那时候就赶上美国啦。**现在好处就是人多，基本上工业化是10个五年，你们还都很年轻，你们还行，那时我就去开会啦，马克思、恩格斯召集国际会议请我去参加。**

**我们各人工作不同，有的站哨，有做别的工作的，但都是为共产主义，为人民服务这个目的。**你们都是做警卫工作，我现在想给你们加一样，不知同意不同意？”

战士们齐声回答：同意。毛泽东接着说：

“就是调查工作，这个对我对中央都有帮助。光站哨工作很单纯，和吃菜一样，不光吃青菜，还要吃点辣椒。”

他用右手扳着左手的指头说：

“3个任务。一个是保卫工作；一个是学习，学文化；加一项调查工作。一方面可以看家，一方面调查，以看家为名做调查工作。但是可不要说：‘我是给毛主席做警卫的，是毛主席派来的。’我们国务院就有一个，回家以后召开干部会，说是总理派来的。他没回来，国务院就知道了。”

说到这里，毛泽东禁不住笑了，因为在警卫战士中，也曾经发生过一个有趣的故事，他一提起来就想笑。他说：

“一个家在陕北的战士，回家探亲时，遇到一个当年的老游击队员。老人问这个战士在哪个部队里，干什么工作？战士说，在北京搞警卫工作。老人问：‘可见过毛主席？他老人家身体可好？’战士想起了部队的保密制度，就回答说：‘我没见过毛主席。’老人看着这个满脸稚气的小战士，试探地说：‘听说毛主席病了，还病得很厉害哩！’这个战士一听就急了，马上反驳说：‘不对！这是造谣。’老人问：‘你咋知道？’战士说：‘我回来的时候还亲眼见毛主席在海边散步嘛，毛主席的身体很好，你不要听信谣言！’老人听了哈哈大笑，说：‘娃，你还小呢！’”

毛泽东说罢，引得在座的人们都笑了。他接着说：

“我们拟个章程，对人要谦虚，对父母对乡村老百姓，要尊重家里边人，要尊重老百姓，要尊重区乡干部，别摆架子。我向你们摆架子你们也不高兴，团长向你们摆架子你们也不高兴。谦虚就可调查出东西。调查生产情况，生产的粮食、特产、花生、芝麻、烟叶、小米、大麦等等，数也数不清。生产的情况怎么样，吃的够不够。现在叫的不少，有一个真的两个假的。粮食部有个干部说，老婆都骗丈夫，存着两千斤粮食说没有粮食。**赵虎城他姐夫向他诉苦说没有粮食，他在他家住了两天后，发现他有粮食。他说为什么哭穷呢？第一叫了就是穷，第二明年可以少卖粮，第三人家都叫一个人不叫也不好。不要相信那些都叫的是饿肚子了的，顶多是10%是真叫，没粮食，其他是很多有粮。**去年购粮是政府向他们进攻，现在是大家向政府进攻。

**统购统销有5项好处：第一，对贫农有利。**贫农是缺粮，保证他们饿不死，而且不涨价，有粮食。**第二，对灾民有利。**去年水灾有5千万灾民，重灾六分之一，其中有4千万没饭吃，不统购统销的话就要饿死百十万人。老百姓讲是百年没有的洪水，五百年没有的好政府，我看五万年也没有的好政府。**第三，对经济作物有利。**种棉花、甘蔗、烟叶可买到粮食。**第四，对城市里人有利。**我们有八千万城市人口，有产业工人、手工业者、政府工作人员和军队，还有资本家。过去吃现在也吃，现在是统一吃，比粮食私有好，保证工业化的实现。**第五，买机器。**拿些豆子出去，没有统一就少一些，统一了呢就多出口一点，不能出的太多，我们是个缺粮的国家，这一条不要讲的太多，出口主要是大豆，不出口吃也就吃掉啦，吃个豆腐、豆芽来。送给苏联可以买回机器，没有很多，900亿中只30亿，而且主要是豆子。解放军吃32亿，出口38亿，过去30亿。现在总共为870亿斤，不是900亿斤，今年希望增加30亿，870亿也可以。800的分配，城市450，农村350。乡村第一是缺粮户，第二是四千万灾民，第三是经济作物区，第四是4民，盐、渔、林、牧民。渔民懂不懂，你们不会打鱼吗？鱼可好吃哩，长江、沿海鱼才多呢。牧民是搞牲口的。他们为什么350呢？因为不搞粮食嘛。灾民不都是一年4季缺粮，顶多6个月。现在销多啦，大喊大叫不给就要打人，干部吓坏了就发粮票。要注意真叫假叫。河北省有个内丘，老百姓说，真不真三百三，够不够三百六。有些地方只要280斤就够了，还有要220斤，靠吃番薯叶，叫的三百三，三百六过得去，南方500斤稻子也够啦。

老百姓瞒点粮食好不好呢？好，心里知道他瞒了就好，你知道就行，瞒是有啊。实行三定政策就好啦，粮食一堆，现在要变非法为合法。现在我作主席也没法，以后三定后多吃、多喂、多卖、多存都有自由，心里边舒服，变非法为合法。现在装穷，哭，你抓住了不要骂，心里高兴。**我对他们那些发现存粮的同志说，现在抓住了不要骂，心里高兴，但不要提倡，也不要说毛主席讲的存粮好。但有的地方确实不够，卖过头粮牲口不够吃，也有把母猪杀了的，逃荒的也有，把牛杀了的也有。**老牛不杀不行，老牛杀了又可吃肉又可买小牛，又可投资农业。河南省出牛，去年杀了60万头，但是还增加了20%。别的省也有出牛的。

我们这个地方代表6亿人口，乡村、城市，东西南北中都有。6亿人口的代表非常重要，不要轻视自己，态度要好。**你们团结好不好啊，要互相关照，不要打架，要打不要打出了血，打掉了牙。**为什么要团结呢？为了工业化，为了社会主义。要搞好中国工业化，‘万事俱备、就欠东风’，东风，就是社会主义的改造。等到你们72岁时作寿，10个‘五年计划’要赶过美国，全国都可作寿。赶过美国是好事，目标很远大，可以达到。

刚才讲了有50多分钟，讲了几十年的历史。现在我们是705万的大党，青年团一千多万，解放军有三、四百万，全国人口有六万万，在座的是六万万人的代表，尤其是你们青年，二十几岁，老头子也要点，你们团长老头子，我也有点好处，有点经验，打拳走路不如你们。分工合作为了总的目标。团结起来，学习，调查，为把工作做好。要互相团结。**今后我们常在一起，我们可以互相研究，你们不懂的来问我，当然我也不一定都懂。很对你们不起，进北京5年多啦，今天是头一次和你们讲话。为人民服务，你们为人民服务，我也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一说完，全场立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接见结束后，毛泽东又对李银桥说：

“以后你也要这样做，搞社会调查，写书面报告，拿来给我看。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是提高你们文化知识水平，锻炼工作能力。二是使我了解全国的真实情况，并且使我从你们那里学到一些知识。”

后来，每当警卫战士从农村回来，毛泽东总要听取他们的汇报，详细询问他们了解到的情况，并认真地批阅他们的调查报告。毛泽东在一个战士的报告中写道：

“要研究社会情况，学得经验。”

有一次，毛泽东听了湖南、湖北两个省籍战士汇报他们家乡的情况后，非常高兴地说：

“了解两个省6千万人口的情况，用了3个钟头，这个方法实在好，通过你们同广大农民联系起来了。”

毛泽东还伸出3个手指头，比划着说：

**“你们看到农民，我看到你们，就间接见到农民，就离这么远。”**

5月16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批准中央手工业管理局、中华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联合总社筹备委员会党组“关于第四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的报告”的指示》：

上海局、各分局、各省、市委：

中央基本上同意并批准《关于第四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的报告》，特批转各地，希望认真研究并贯彻执行。

**手工业在过渡时期内，支援农业生产、满足城乡人民生活需要、辅助大工业产品不足和特种工艺品出口等方面都有其重要作用，是地方工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1954年6月中央指示加强对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的领导以来，各级党委一般都重视并加强了这一工作，这是好的。但尚有若干地区还缺乏应有的重视。为此，对目前的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特提出如下注意之点：

一、我国手工业经济行业复杂、分散、面广，变化多，有关部门曾作过不少调查研究，但至今情况还是不全不透。为此，各地在对手工业的某些行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生产安排中，同时必须继续对当地各种手工业进行全面的深入的调查研究，务期在今明两年内，把手工业重要行业的基本情况彻底摸清楚，以便于对手工业进行安排和改造；并注意在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种新问题，及时地加以研究和解决。

二、目前除少部分已在没落的手工业行业外，绝大部分手工业行业一般地可以逐步通过合作化的道路，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因此，各地、各部门，特别是地方工业部门应在对各种经济类型工业进行统筹安排时，必须将对手工业的安排和改造同时予以考虑；将手工业部门的各种计划，首先是供产销计划，逐步纳入地方工业的计划之内。以便**通过计划平衡，贯彻对手工业“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改造方针**；逐步克服大工业与手工业、手工业同行业之间、手工业组织起来与未组织起来之间及手工业与其他有关行业之间在供产销方面的不协调现象；并注意劳动力的合理安排。这样才利于有准备、有步骤、有目的地对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并发挥其对国营工业的有力助手作用。

三、1954年手工业合作社（组）的经营管理，虽有了一定改进，但存在的问题还是不少的。1955年应当比较普遍深入地进行一次整顿、巩固和提高的工作。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强民主管理、改进生产技艺、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节约原材料，特别是扩大利用废品和代用品，并改善财务工作，逐步扩大公共积累。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同时必须发展党、团组织，加强社会主义教育，克服资本主义经营思想。以争取1955年生产任务和组织发展的顺利完成，为今后进一步作好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创造更有利的条件。为此，各级党委必须进一步加强对手工业工作的领导，经常地进行监督和检查，并及时地予以在工作上的指导和帮助。

四、第3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至今，绝大多数省市已建立了手工业管理机构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联合社（或筹委会）。但有些地方至今还没有把机构建立与健全起来，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工作的顺利进展。为此，各地应迅速抓紧这一工作，在精简节约的原则下，调配与充实各级手工业部门的干部，特别是领导骨干。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联合社亦应视基层社的建立情况，争取尽早建立。

（本指示和附件，均可登党刊。）

中央 1955年5月16日

5月16日这一天，毛泽东还为中央起草了《关于人民代表到各地视察工作的通知》：

上海局、各分局、各省、市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中央各党组和群众团体中央各党组：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2次会议将于1955年7月初召开。在开会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除病人外，将分赴各地或就近在城市和乡村视察。**这次视察的重点，在城市中主要是粮食和建设等方面的问题，特别是浪费问题，在乡村中主要是粮食统购统销、社会治安、农业生产和互助合作等问题。**各地对于代表的视察，应该采取积极和欢迎的态度。

**中央认为不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应该下去视察，各省、市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也应该下去视察，并且每年一般地应该视察两次，**时间以春耕以后和秋收以后为好。

中央认为这种视察对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省市人民代表大会和它们的代表们的职务的履行，甚为必要，因为**通过这种方法，可以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能够集中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从而能够正确及时地解决国家和地方的主要的和重大的问题，并便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例如在**最近，党外人士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就对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和工作，提出了不少的批评和怀疑；还有一些人要求大赦和特赦，而对目前反革命活动的猖獗情形，却不愿接触。**对于党外人士的这些观点，必须加以重视，最好的办法，就是帮助他们去接触实际。通过实地的考察，就易于使大多数人对当前的重大问题取得一致的正确的认识，使那些错误的反动的意见陷于孤立，并受到多数人的反对，所以它不仅是对于代表们的一种实际教育，而且是对某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反人民意见进行斗争的一种有力的方法。

中央认为，采用这种方法的最大好处，还在于它能够对于各级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起一种非常有益的鞭策和推动的作用。必须了解，**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是很多的，我们有一些干部的作风是很恶劣的。如果党和政府的领导同志每年能同全体代表一道出去视察两次，检查各方面的工作，对于发扬成绩和纠正错误；对于发现坏人坏事；对于克服领导机关中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目前在干部中普遍存在着的骄傲自满情绪，必然会有很大的益处。**同时，因为这种视察有各阶级的代表人物参加，他们从各种角度来考察问题和提出问题，就比较容易反映和暴露当前各阶级的利害关系，即矛盾的焦点，就比较容易使我们集中地了解各阶层人民的动向和意见，及时地抓住问题，正确地加以处理。

因此，中央认为，**代表们定期下去视察工作，应该成为党和国家领导机关联系群众、调查研究的一种工作制度。**

这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视察时间，一般为两三个星期到一个月，实在没有时间的，出去视察三五天也比不出去视察好，当代表们在各地开始视察前，当地的人民委员会应当邀集他们开会，由党政负责同志就粮食、治安等当前的主要问题及他们所提出或所需要了解的其他问题向他们作一次介绍。对于情况的介绍，应该采取是就是，非就非，好就好，坏就坏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在选择视察地区和对象时，应该分别选择比较好的、比较坏的和中等的三种不同的类型给代表们看。要使代表能够真正实地进行考察，接见他们所要接见的人。**各级党政领导同志和一般干部应该用诚恳、谦虚的态度，欢迎他们对各种工作提出批评和意见，不要怕民主人士发现、挑剔我们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不要怕麻烦。对于他们提出的批评和意见，凡是正确的应该采纳，不正确的也应该耐心地倾听，让他们提出来，然后平心静气地向他们加以解释或作适当地批驳。那种惧怕揭露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即惧怕揭露工作中的矛盾的心理是错误的。

各地对于代表们的视察工作，应尽可能给以各种工作上的便利，在生活招待方面要热忱和朴素，务须注意不要铺张浪费，不要举行专门的欢迎宴会和晚会。

关于视察工作中所发现的问题和代表们对工作的意见，望及时报告中央。

中央 1955年5月16日

5月17日下午1时，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召开有华东、中南、华北15个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会议，着重讨论粮食统购统销、发展农业生产合作化的问题。

省市委书记们汇报了各省市农业生产合作社当前的情况。有些省委书记在发言中埋怨中央农村工作部压抑了下面办社的积极性。毛泽东在讲话中说：

“**合作社问题，也是乱子不少，大体是好的。不强调大体好，那就会犯错误。在合作化的问题上，有种消极情绪，我看必须改变。再不改变，就会犯大错误。对于合作化，一曰停，二曰缩，三曰发。缩有全缩，有半缩，有多缩，有少缩。社员一定要退社，那有什么办法。缩必须按实际情况。片面的缩，势必损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后解放区就是要发，不是停，不是缩，基本是发；有的地方也要停，但一般是发。华北、东北等老解放区里面，也有要发的。譬如山东30%的村子没有社，那里就不是停，不是缩。那里社都没有，停什么？那里就是发。该停者停，该缩者缩，该发者发。**

发展合作社的原则是自愿互利。牲口（连地主富农的在内）入社，都要合理作价，贫农不要在这方面占便宜。在土地、农具、牲口上，贫农都不要揩油。互利就能换得自愿，不互利就没有自愿。互利不损害中农，取得中农自愿入社，这首先有利于贫农，当然也有利于中农。所以必须坚持这个原则。半妥协，半让步，不能解释成为损害中农的经济利益。有人说，‘让中农吃点亏’这句话是我讲的，我不记得讲了没有，但是马恩列斯从来没有这样说过。对于中农，国家要加点贷款，让他们腰杆硬起来。在合作社里面，中农有牲口、农具，贫农有了钱，也就说得起话了。合作社章程要快点搞，要做到完全不损害中农利益。这样，合作社就可以迅速发展起来。

发展合作社，河南7万、湖北4万5、湖南4万5、广东4万5、广西3万5、江西3万5、江苏6万，也是自愿互利。发展合作社对国家是有利的，对你们各个地区也有利，如果你们自愿，那就拍板，把这个数字定下来。东北、西北、西南、华北，由林枫、马明方、宋任穷、刘澜涛去召开一个会，把精神传达一下，讨论解决。今天在会上已经认定了的，就照这样办，大体不会错。但是，发展起来的合作社，要保证90%是可靠的。”

“**在粮食问题上，党内外有一种潮流，就是说大事不好。这不对。照我说，大事好，就是有些乱子。**总之，第1个‘五年计划’及其以后若干年，粮食的生产和购销是大事。”“粮食问题根本上要从生产解决。”“征购，原定900亿斤，已经减了9亿斤，可再减11亿斤，留下880亿斤。如果再减，也可减到870亿斤。这不能再减了。**征购减下来，3年不变**。**以后3年，要做到年年有余。‘过头粮’，在购粮的时候不要有了，要搞得适当。**”“主要的矛盾，是个体农民和国家，跟社会主义的矛盾。这不是对抗性的矛盾，是可以克服的。粮食是互利（对缺粮户也就是贫农有利，对六民（指在农村中从事盐、林、渔、牧、船和经济作物六种行业的人——笔者注）有利，对灾民有利，也有利于城市——工业化，有利于打台湾，一无损（对自给户无损），一小有不利（对余粮户）。”

会议一直开到晚上10点才结束。

5月18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公安部将胡风及其夫人梅志逮捕。

公安部在逮捕胡风时，从胡风家里搜查出了许多胡风与他一些接近的人们之间在50年代的往来信件。这些信件中也有不少暗语。于是，中宣部便派林默涵、何其芳等人对这些信件进行了整理。

在胡风被逮捕后，**公安部在江西省吉安图书馆找到了胡风曾写过的《剿共宣传大纲》，他过去未曾作过交代。**这样，中共中央更加认定胡风的问题是政治性质的问题。

5月20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处理反动的、淫秽的、荒诞的书刊图画问题和关于加强对私营文化事业和企业的管理和改造的指示》，全文如下：

上海局、各分局、各省、市委，国务院各办，国家机关各党组，青年团中央、各人民团体党组、人民日报：

中央同意文化部党组关于处理反动、淫秽、荒诞书刊图画的请示报告和关于加强对私营文化事业和企业的领导、管理和改造的请示报告，现转发你们，望各地党委和有关部门研究执行。

**反动的、淫秽的、荒诞的书刊图画，是传播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反动的、腐朽的思想的主要方法之一，也是目前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实行思想进攻的重要工具之一。**全国解放以后，各地文化行政机关和公安机关曾对这类图书进行过取缔和收换，但因对这个工作重视不够，方针不明确，对于著绘、摄制、印行、贩运、租赁这类有毒图书的各个环节缺乏有效的社会主义改造措施，同时，出版和发行适合于水平低的读者阅读的通俗读物的工作又做得很差，以致至今这类有毒图书仍在公开的或暗中流行。**这对于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少年、儿童的身心健康，对于社会公共秩序的巩固，对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推进，都有很大的危害。**因此，**坚决地有计划地有步骤地处理这类反动的、淫秽的、荒诞的书刊图画，是当前阶级斗争中必须完成的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

**鉴于过去曾发生乱禁书刊和乱禁戏曲的教训，今后查禁书刊和戏曲必须有严格的控制。即凡要查禁书刊和禁演剧目，必须经省市以上政府文化部门审查，在党内报经省市以上党委宣传部批准，然后执行，同时必须将书刊和剧本报送中央文化部，以备中央文化部的检查和复审，不准其他任何机关和个人胡乱查禁。**为此，文化部和各省市文化局（文教厅）应组织图书和戏曲审查委员会，专门负责对于查禁的书刊和戏曲的审查工作，所有应行查禁和收换的书刊和剧目都必须经过该委员会审查通过。这个委员会应该吸收一些党外文化界人士参加。

**要扩大和巩固社会主义思想阵地，加强对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大力发展群众性的文化事业，而发展和改进通俗图书特别是适合思想水平较低的读者阅读的故事性、趣味性较强的图书的出版和发行，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出版机关和发行机关应努力做到这点。现在不少出版和发行机关轻视通俗读物的出版发行，不注意对思想水平低的广大劳动人民进行宣传教育，这是一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倾向，必须坚决克服。须知我们的出版物只有为广大劳动人民所需要所接受，才能达到教育和提高他们的目的。报刊和广播电台应注意组织对于具有一定教育意义而又读者范围广泛的图书的评介工作，以推广这些读物，并指导读者阅读。

与处理反动的、淫秽的、荒诞的图书同时，应该积极地对租书铺摊和有关行业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这类有毒害的图书之所以能大量的流行，一方面固然是由于这类图书能够迎合一部分落后群众的喜好，而我们新的社会主义的文化事业还远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的要求；另一方面也还由于这些租书铺摊和少数著绘、摄制、印行、贩运这类图书的人看到这种行业确还有利可图，就群趋以赴，这正反映出资产阶级在思想战线上向我们的进攻。**因此，如果不对租书铺摊和有关行业加强领导和管理，实行进一步的社会主义改造，并对从事这些行业的人员的生活加以妥善的安排，这个问题还是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的。中央责成各地党委和政府有关部门，对私营出版业、印刷业、发行业、照像业、租赁业加强领导和管理，实行统筹兼顾，全面安排，并逐行逐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各地文化行政部门应该责成和指导文化馆负责把租书铺摊用一定形式组织起来，改造成为流通通俗图书的据点，并引导它们中的一部分兼营或改营书利发行业务。对于流散在社会上的旧的著译、绘画、编辑人员，除反革命分子和不可救药的流氓分子外，应一律加以收编，或以组稿办法发挥他们的力量，维持他们的生活，并逐步改造和提高他们。

对于其他私营文化事业和企业，也应采取统筹安排、利用改造方针。在我们加强文化工作的思想政治领导，掌握影片、戏剧、出版物及其他文化活动的内容的前提下，正确地利用私营文化事业和企业的力量，不但可以满足人民群众的一部分文化需要，而且可以为国家节省很大一笔资金，使我们可以集中力量进行重点建设。对私人举办电影院、剧场等，可允许私人修建房屋，但在经营上应由国家与之进行公私合营。**那种对私营文化事业和企业盲目排挤，不加安排的作法，已给国家带来了不少困难，是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但在利用和改造私营文化事业和企业时，必须防止反革命分子和不法资本家的反抗和破坏，并且决不允许放弃领导，放松警惕，以致削弱工人阶级的思想阵地。

（本件和两个附件可登党刊。）

中央 1955年5月20日

5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和经过毛泽东审阅修改的编者按和结束语。

《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是根据胡风与其“集团”成员之间往来的68封信件摘编的。第2批材料分为3个部分：第一，胡风对中国共产党和党的领导、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文艺界的污蔑和攻击。第二，胡风如何扩大以他为首的反动集团的组织，建立活动据点，派遣他的集团分子打进共产党内进行偷窃文件，探听情报等反革命活动。第三，胡风如何指挥他的反动集团向中国共产党和党所领导的文艺战线发动猖狂进攻，并在进攻失败以后，如何布置退却，掩护自己，以待时机。

毛泽东在编者按中加写了一段话：

“**有些同情胡风或者口头上反对胡风但内心是同情胡风的人们在说，那些材料大都是解放以前的，不能据此定罪。那么，好吧，现在请看第二批材料。**”

毛泽东在结束语中也加写了一段话，他写道：

“**反革命的胡风分子同其他公开的或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一样，他们是把希望寄托在反革命政权的复辟和人民革命政权的倒台的。他们认为，这就是他们要‘等待’的‘时机’。”**

5月24日这一天，《人民日报》还发表了毛泽东为批判胡风的反动言论撰写的《驳“舆论一律”》一文（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全文如下：

**胡风所谓“舆论一律”，是指不许反革命分子发表反革命意见。这是确实的，我们的制度就是不许一切反革命分子有言论自由，而只许人民内部有这种自由。我们在人民内部，是允许舆论不一律的，这就是批评的自由，发表各种不同意见的自由，宣传有神论和宣传无神论（即唯物论）的自由。**一个社会，无论何时，总有先进和落后两种人们、两种意见矛盾地存在着和斗争着，总是先进的意见克服落后的意见，要想使“舆论一律”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只有充分地发扬先进的东西去克服落后的东西，才能使社会前进**。但是在国际国内尚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的时代，夺取了国家权力的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必须镇压一切反革命阶级、集团和个人对于革命的反抗，制止他们的复辟活动，禁止一切反革命分子利用言论自由去达到他们的反革命目的。这就使胡风等类反革命分子感到“舆论一律”对于他们的不方便。他们感到不方便，正是我们的目的，正是我们的方便。我们的舆论，是一律，又是不一律。**在人民内部，允许先进的人们和落后的人们自由利用我们的报纸、刊物、讲坛等等去竞赛，以期由先进的人们以民主和说服的方法去教育落后的人们，克服落后的思想和制度。**一种矛盾克服了，又会产生新矛盾，又是这样去竞赛。这样，社会就会不断地前进。**有矛盾存在就是不一律。克服了矛盾，暂时归于一律了；但不久又会产生新矛盾，又不一律，又须要克服。在人民与反革命之间的矛盾，则是人民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之下对于反革命的专政。在这里，不是用的民主的方法，而是用的专政即独裁的方法，即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这里不但舆论一律，而且法律也一律。在这个问题上，**胡风等类的反革命分子好像振振有词；有些糊涂的人们在听了这些反革命论调之后，也好像觉得自己有些理亏了。你看，“舆论一律”，或者说，“没有舆论”，或者说，“压制自由”，岂不是很难听的么？他们分不清楚人民的内部和外部两个不同的范畴。**在内部，压制自由，压制人民对党和政府的错误缺点的批评，压制学术界的自由讨论，是犯罪的行为。这是我们的制度。而这些，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则是合法的行为。在外部，放纵反革命乱说乱动是犯罪的行为，而专政是合法的行为。这是我们的制度。资本主义国家正相反，那里是资产阶级专政，不许革命人民乱说乱动，只叫他们规规矩矩。剥削者和反革命者无论何时何地总是少数，被剥削者和革命者总是多数，因此，后者的专政就有充分的道理，而前者则总是理亏的。胡风又说：“绝大多数读者都在某种组织生活中，那里空气是强迫人的。”我们在人民内部，反对强迫命令方法，坚持民主说服方法，那里的空气应当是自由的，“强迫人”是错误的。“绝大多数读者都在某种组织生活中”，这是极大的好事。这种好事，几千年没有过，仅在共产党领导人民作了长期的艰苦的斗争之后，人民方才取得了将自己由利于反动派剥削压迫的散沙状态改变为团结状态的这种可能性，并且于革命胜利后几年之内实现了这种人民的大团结。**胡风所说的“强迫人”，是指强迫反革命方面的人。他们确是胆战心惊，感到“小媳妇一样，经常的怕挨打”，“咳一声都有人录音”。我们认为这也是极大的好事。这种好事，也是几千年没有过，仅在共产党领导人民作了长期艰苦斗争之后，才使得这些坏蛋感觉这么难受。一句话，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我们每年的国庆节，首先就是庆祝这件事。胡风又说：“文艺问题也实在以机械论最省力。”这里的“机械论”是辩证唯物论的反话，“最省力”是他的瞎说。**世界上只有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最省力，因为它可以由人们瞎说一气，不要根据客观实际，也不受客观实际检查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则要用气力，它要根据客观实际，并受客观实际检查，不用气力就会滑到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方面去。**胡风在这封信里提出了三个原则性的问题，我们认为有加以详细驳斥的必要。胡风在这封信里还说到：“目前到处有反抗的情绪，到处有进一步的要求”，他是在1950年说的。那时，在大陆上刚刚消灭了蒋介石的主要军事力量，还有许多化为土匪的反革命武装正待肃清，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的运动还没有开始，文化教育界也还没有进行整顿工作，胡风的话确实反映了那时的情况，不过他没有说完全。说完全应当是这样：目前到处有反革命反抗革命的情绪，到处有反革命对于革命的各种捣乱性的进一步的要求。

5月25日，全国文联主席团和作协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通过决议，开除胡风的中国作协会籍，撤销他的作协理事、文联委员和《人民文学》编委的职务。

欲知此后如何深入批判胡风等人？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撰写的《驳“舆论一律”》一文，短小精悍，说理性极强，且充满唯物主义辩证法，堪称政论文的范文！批判胡风一案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究竟是对是错，从一些别有用心的文人在毛泽东身后的丑恶表演，就可以看清楚了！在上个世纪的1980、1986、1988年，一些人出于某种政治需要，曾经先后3次为胡风平反。这种“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试探性的做法，不正是他们心虚的表现吗？

**第14章**

**“反革命分子怎样耍两面派手法呢？他们怎样以假象欺骗我们，**

**而在暗里却干着我们意料不到的事情呢？这一切，成千成万的**

**善良人是不知道的。”**

话说1955年5月25日下午，毛泽东在与尤金谈话中，提到了高岗的私生活和他与苏联的关系。

据尤金回忆：毛泽东说“高岗是没有道德的人，想要夺权，……毛同志说高岗在一个星期里就安排了8次舞会，只要他想跳舞，就下令去找女人。他说他接近一个神秘人物张门远（音译），使张成为他自己与苏驻沈阳总领事之间的联系人。”

这是毛泽东与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最后一次谈到高岗事件。

5月26日，毛泽东会见了25日到京来访的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毅参加了会见。毛泽东热情地对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及其他客人们说：

“欢迎你们，欢迎其他各位朋友，我们十分欢迎你们。我们是朋友，我们和中国人民都很高兴看到你们。”

毛泽东还说：

“我们之间没有隔阂。我们为你们好，因为对你们好的，也对我们好。希望你们强盛起来，发展起来，这对我们和对世界和平都有好处。亚非国家刚在万隆开过一次会，这些国家都应该强盛起来，包括日本在内。过去日本不好，但是现在也受欺侮。受帝国主义欺侮的国家都强盛起来就好了。

由于科伦坡5国的发起和召集，并在印尼总统和总理的主持下，万隆会议才开得好。中国是作为一个亚非国家参加这次会议的，以这种身分中国也尽了一份力量。中国愿意同所有的国家友好合作，中国参加这次会议不是去做坏事的。由于中国所采取的态度，有些对我们不友好的国家，如日本、菲律宾、泰国，在会议中同我们还可以相处，还过得去，没有什么大的过不去。当然，别扭还不少，但还是有些共同的地方。我们同这些国家有一种情况是相同的，它们也有同样的困难，那就是受美国这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欺侮。泰国的经济也是不发达的。日本虽然比我们先进，但是它也有经济困难。这是一般地说，当然也有个别例外。因此，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一般地说，我们是有某种共同点的。这次亚非会议恐怕是有史以来亚非国家举行的第一次会议。

西方国家几百年以来，由于进行长期的侵略，它们对亚非两洲产生一种心理，轻视落后国家。它们说我们是有色人种。这是拿肤色来区分，就好像说有色金属那样。我们这些‘有色金属’是会膨胀起来的，当然，我们不会去侵略别人。但‘有色金属’是更有价值的，因为有色金属包括金、银、铜、锡等。

一个民族多少世纪以来不仅保存了而且发展了，一定有它的长处，否则不能理解。西方国家说我们的民族不好，那么我们的民族怎么能保存并发展了呢?

我们很谈得来。我们同尼赫鲁总理和吴努总理谈过，现在又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总理谈了话。我们作为朋友是能够处得好的。**在西方国家面前，我们的问题是团结起来，保卫自己，而不是互相打主意，彼此损害。**我们的关系不是互相损害，而是互利，不仅在商业上和文化上如此，在政治上也进行合作，万隆会议就是一个例子。我们要使这些国家每年都能看到进步。我们要互相帮助，解决一些可能解决的困难问题。我们各有各的困难问题，经过互相帮助，争取解决这些难题。为此，就要采取步骤来消除存在于我们之间的不了解和障碍，增加互相的了解。例如，中国同印度之间过去有一个西藏问题，中国同缅甸之间有华侨问题和国界问题，中国同印尼之间也有华侨问题。对于那些同我们关系不大好的国家，我们也要采取具体步骤来解决一些问题。就是像泰国、菲律宾那样的国家，我们的想法也是一样，只要有可能，就争取搞好同它们的关系。我们曾经同尼赫鲁总理和吴努总理谈过泰国的问题，并请他们帮助我们劝说一下泰国。泰国说怕我们派军队去打它，但是怎么可以乱打呢？泰国又怕我们的傣族自治区。我们说它可以派领事到昆明，看看我们是不是要去打它。周总理在万隆曾经同泰国的外长谈过，也是为了搞好关系。如果可能的话，希望总理先生见到泰国和菲律宾的领导人时替我们说说，告诉他们中国是想跟他们的国家友好的。

就是西方国家，只要它们愿意，我们也愿同它们合作。**我们愿意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存在的问题。打仗总是不好的，特别是对西方国家是没有好结果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在战争中固然双方都损失物资和生命，但是，历史证明战争有一个政治后果对西方国家是不利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苏俄解脱了旧有的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和许多国家得到了解放。第二次世界大战产生了两种结果：第一，产生了像中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由共产党管事的国家；第二，像在印尼、印度、缅甸这样的许多亚非国家中，民族主义者所领导的运动使这些国家成为独立自主或者接近独立自主的国家。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埃及有了很大的改变，许多近东和中东国家也是如此。虽然美国强了起来，但是西方国家的阵营总的说是削弱了。

几年前，在座的人都是不合法的，我们都是‘非法之徒’、‘叛徒’、‘坏人’。但是现在改变了。**我们把那些所谓的好人赶跑了，你们赶走了日本人和荷兰人，我们赶走了日本人、美国人和蒋介石。这些人都说我们坏得很。尼赫鲁总理、吴努总理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总理都是坐过很久班房的。**我们可以用这段历史去说服西方国家。它们说，它们的势力大得很，那么为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我们都独立起来了呢？这个历史根据是很有力量的，不是造谣，也不是吓人。过去西方国家吓了我们几百年，现在到底是它们吓倒了我们，还是我们吓倒了它们呢？因此，结论是**第三次世界大战最好不打，如果打，结果不是对我们不利，不是对亚非国家不利，而是对西方国家不利**。如果说这是吓人，那也可以，但是我们这样说是有根据的，我们是有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作为根据的。正是考虑了这一点，我们说，用谈判来解决问题，试试看。况且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战争最后都是用谈判解决的，台湾问题也可以用谈判解决。我们已经在万隆会议表明了这一点，可以用这一点去说服西方国家。但是**西方国家可能不听，它们的想法是偏在一边的，认为它们钢铁多、钱多、原子弹多。对于这些，我们怕不怕呢？有一点怕，不十分怕。我们说有一点怕，因为武器是杀人的。我们的人民不希望遭受损失，因此我们不要战争。西方国家手里这些东西的作用，是不会超过人民的力量的，因为人民是有生命的。西方国家有许多大王，什么煤油大王、钢铁大王、汽车大王，历史证明大王的结局都是不妙的。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蒋介石都曾经是大王。这间屋子就是皇帝曾经住过的，但是他们现在已经不在这里了。**大王都是手里掌握许多东西的，人民手里没有东西。我相信，印尼朋友开始斗争的时候手里也是没有东西的。我们在开始斗争的时候手无寸铁，我们的对手都是全副武装的。但是手无寸铁的人民却把全副武装的人赶跑了。**几千年来的历史证明，腐朽的人手里东西越多，倒得也越快。因此，结论还是一个：和平为上。**

就原子弹而言，亚非国家是无产者，我们这些国家连一个原子弹都没有。希望在这方面富有的国家善用其‘宝’，如果乱用的话，不见得对它们有利。**我们连一个原子弹也没有，怎么能去侵略人家呢？用双手去侵略有原子弹的人，岂不危险？但是人家却把我们叫‘侵略者’，说中国人是好侵略的。**第一，我们‘侵略’了中国大陆，现在又要‘侵略’金门、马祖；第二，金日成在朝鲜‘侵略’到三八线，中国后来又帮助了金日成；第三，胡志明也‘侵略’到十七度线。而说我们的那种人倒似乎是十分爱好和平的。我们听说，荷兰人也说印尼要‘侵略’西伊里安。

总理先生说，印尼要和平利用自己的丰富的资源，我完全同意。印尼的前途是了不得的，有那么多的宝藏。日本虽然现在比较发达，但是资源贫乏，印尼是一定能超过日本的。印尼和日本的人口差不多，但是印尼的地方大，气候好，蕴藏的物资尤其丰富，若干年以后也会出现一个比日本更强的新印尼。当然印尼是和平利用它的资源，这对其他的人也是有利的。

中国人民完全支持印尼人民保卫自己的国家。我们相信，印尼人民也同样支持中国人民保卫自己的国家。我找不到我们两国间有任何利害冲突，而只能找到两国合作有互利的方面。

亚非国家的团结是有希望的，万隆会议已经走了第一步。以后我们应该共同努力，继续工作，团结起来，促进和平。即使有战争，我们也可以把它推迟。我们要争取和平的环境，时间要尽可能的长，这是有希望的，有可能的。**如果美国愿意签订一个和平条约，多长的时期都可以，五十年不够就一百年，不知道美国干不干。**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美国，我想你们是不会反对的。”

这一次会见，毛泽东给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后来他在回忆中说：“毛泽东给我的印象是，他没有摆出一个已经改变了中国历史、国家和民族命运的人民领袖的架子，而是平易近人，像是中国大家庭的长辈，正如我们在印尼也能经常看到的华人聚居区大家庭里德高望重的长者。”

5月26日，毛泽东复信给黄炎培，他在信中写道：

任之先生：

5月25日惠书收读。**凡重要问题不厌其详地征求意见，总是有好处的。**最近我又找了15个省市的负责同志征询了关于粮食、镇反、合作社等项问题的意见，得到了更多的材料，证实了我在最高国务会议所说的那些。但还要进一步研究，看到底是否如此。先生此次下去考察，望注意用全面分析方法。民建会议材料我已看过，很有兴趣，拟发各党派参考。顺致敬意！

毛泽东 1955年5月26日

5月间，毛泽东的老同学谭世瑛到了北京。本传前面已经说过，他是毛泽东的同学，又是毛泽东在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时的国文老师谭咏春的儿子。此前，毛泽东已经先后4次给他回信，并两次寄款给予资助。

这一次，毛泽东很快便在中南海会见了他，两位老友深情地回忆起往事，毛泽东不忘师恩，感激地说：

“你爹还在东山不？你老倌子有点眼光，那时候，我的个性与人家不一样，只有他老先生看重我。在当时，他能够那样关心我这个学生，真是不容易的呀！”

毛泽东还说：

“**李元甫先生、贺岚岗先生，还有你父亲，都是热心的教育家，他们是爱惜人才的！没有他们，我进不了东山学堂，也到不了长沙，只怕还出不了韶山冲呢！”**

他又问：

“世瑛先生，家里有些什么人呀？”

谭世瑛说：

“我和婆婆子，还有仨崽，一个已经成家。”

毛泽东高兴地说：

“这真是‘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啊。儿子都在做什么事呀？”

谭世瑛本来就是因为儿子的事使自己受了牵累来见毛泽东的，他见毛泽东主动问起儿子的事儿，时机已到，便把两个大儿子已经被人民政府镇压一事说了一遍。

原来，谭世瑛的大儿子谭可和二儿子杀害过共产党员，后又接受派遣和一个女特务潜伏回乡，与人民政府为敌，3年前已经被镇压。谭世瑛因为要替儿子申诉，也曾被管制起来。毛泽东闻听此事，看着眼前清贫了一辈子的老同学，家中竟出了这样的逆子，也算是老年一大不幸。他一步一步踱到谭世瑛面前，语重心长地说：

“世瑛先生，我们家乡有一句乡谚：‘儿大不由娘’。又说：‘崽大爷难做’。做父母的，只能生他的身，不能生他的心。就算同胞一母所生，比如萧子升、萧子暲两兄弟，一个要朝东，一个要朝西。人各有志，谁也管不了谁。所以我劝你，儿子们的事，你不要去管。据我看，你想管也管不了。”

毛泽东先安排老同学住下，接着专门给湘乡县委和第二区区委及石洞乡支部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石洞乡的谭世瑛，40多年前，曾在湘乡东山学校和我有过同学关系。解放后来过几次信，因他叫困难，最近又寄了一些钱给他。最近因患眼病，到汉口找谭政同志求治，谭不在，到北京找我。现在医院治眼，两三星期即回乡。我嘱他好好听区乡党政干部管教。据他说，他有两个儿子在3年前的镇反斗争中被枪决，一个是营长，一个是排长，听说有血债被枪决的。他本人也被剥夺公民权，管制一年，现已解除管制但仍不能入农会。他的妻子和其他两个儿子则有公民权并入了农会。他说，他的成分是贫农。他又说，他教了几十年书，只在27年前在国民党的邵阳县政府当过5个月的科员，并未作坏事云云。此人历史我完全不清楚，请你们查明告我为盼。”

1955年6月初的一天傍晚，毛泽东带着江青一起到户外去散步，他和江青聊了几句，就回头叫过来跟在身后不远处的卫士王笃恭，说：

“小王啊，你的家乡山西沁县，过去叫沁州，治所在上党脚盆的北面。沁州历史上可是出过一位宰相的，你知道吗？”

王笃恭回答说：

“是的。老人们说那位宰相叫吴阁老，他的坟墓修得可威风啦，离我们家只有10多里路。”

“那你一定去看过啦？”

“没去过。”

“那么近为什么不去看看？”

王笃恭认真地说：

“一是年纪小，二是听长辈老人们说，那里经常闹鬼，不要说小孩子，就连大人们都不敢去，生怕鬼跟上了倒运。”

毛泽东笑了，说：

“哪里有什么鬼嘛！”

王笃恭坚持说：

“有，我们村里有一个人就被鬼跟上了。”

“那好嘛，你说给我听听。”

“那人叫王东明，”王笃恭一本正经地说：“30多岁，晚上去8里路的外村看夜戏，散戏后往回走，经过路边一片坟地就遇见鬼了。王东明说：‘那鬼打着个蓝灯笼，左摇右晃，开始离我不远，我想绕过他，就加快脚步走，谁知它从前面跑到了我身后，离我很近，我快走，它也快，我走慢，它也慢，我拼命地跑想甩掉它，结果我跑多快，它也跑多快，一直跟到家里才不见了。’王东明一头栽倒在炕上，病了一个多月。后来他逢人便说，见人就讲，还说他以后再也不去看夜戏了。他这一说不要紧，闹得村子里的人晚上不敢出门，天还没黑就点灯，生怕碰上鬼。”

“你信吗？”

毛泽东盯着王笃恭问道。王笃恭说：

“当时我信，后来我就不信了。”

“不信是对的，根本就没有鬼。”毛泽东慢慢解释道：“王东明看到不是鬼，那是什么呢？是磷火。磷火是怎么回事？人死后埋在地下，人体腐烂后，产生出一种气体，比空气要轻，称为磷火，白天看不见，只有在夜里能见到，蓝光点随着空气的活动在晃悠，在一定条件下就自然而然地消失了。有人把它说成是鬼，其实不是鬼，也根本没有鬼。我国没有鬼，就全世界而言也没有鬼，你明白了吗？”

6月3日，毛泽东在审改中共中央《关于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指示》稿时，加写了第6条。他写道：

“**各省市委和党组必须认识这一斗争的目的，不但在于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主要的是借着这一斗争提高广大群众（主要是知识分子和干部）的觉悟，揭露各种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国民党特务分子、帝国主义的特务分子、托派分子和其他反动分子），进一步纯洁革命队伍。**因此，当斗争有了进一步地发展时，就要公开号召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反动分子进行自我坦白，这种坦白，向小组会向大会向负责人去做或写书面材料都可以。但**在中学学生和小学学生中不要去进行这种坦白的号召。**”

毛泽东将修改后的指示批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请他们阅后发出。

6月6日，毛泽东收到了中宣部送来的关于胡风等人的第3批材料和《人民日报》社论清样，他当即在第3批材料上作了批示：

定一、周扬同志：

社论尚未看，对第3批材料的注文修改了一点，增加了几段。请你们两位或再邀几位别的同志，如陈伯达、胡乔木、邓拓、林默涵等，共同商量一下，看是否妥当。我以为应当借此机会，做一点文章进去。

最好今天下午打出清样，打出来后，除送你们要送的人之外，请送刘、周、小平、彭真、彭德怀、董必武、张闻天、康生各一份(朱、林、陈云同志不在家)，请他们提出意见，又及。

毛泽东 6月6日

6月初，毛仙梅、文炳璋、毛泽荣及毛泽荣的养子毛会华等人来北京转眼将近1个月了，辛苦惯了的毛仙梅横竖觉得不是滋味。那天吃过午饭，他就让人打电话找毛泽东的秘书，说要见见三弟。毛泽东很快安排了见面。毛仙梅刚坐下来，又提出要回湖南，他说：

“这下我真是要回去了。”

毛泽东开玩笑地问：

“是不是又丢了东西了？”

毛仙梅老实巴交地说：

“东西倒冇丢，一颗脔心放在屋里了。”

毛泽东乐呵呵地说：

“‘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呵，看来大哥是真想家了哟！”

毛泽东引用的这两句诗，出自李白的《蜀道难》。他很欣赏这首诗，曾经圈划和批阅过，称其“有些意思”。毛仙梅听三弟如此说，仿佛周身都不舒服，他说：

“住在这个地方，热闹是热闹，就是听不到猪叫鸡叫，心里不踏实，还是早点回去好些。”

毛泽东表示理解地点了点头，挽留道：

“再住两天吧。过两天，我要到南方去看看。你到过中国风景最好的地方吗？”

“哪里？”

“杭州。我去南方要路过杭州。”

毛仙梅长这么大年纪，也没见过什么世面，就说：

“我没到过杭州，我只到过韶山和北京。”

毛泽东说：

“那好，过两天你跟我一起乘飞机去吧。”

6月8日，毛泽东改好了《人民日报》社论稿，他在批示中写道：

定一、周扬、邓拓同志：

社论和材料两件都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请你们酌定。请照此再打清样送各政治局委员看。**关于写文章，请注意不要用过于夸大的修饰词，反而减损了力量。必须注意各种词语的逻辑界限和整篇文章的条理。废话应当尽量除去。**

毛泽东 6月8日

毛泽东在社论稿中加写了3段文字，他写的是：

**“我们革命队伍中的绝大多数（百分之九十几）都是好人，只有少数是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但是我们决不可以看轻这些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必须坚决地把他们清除出去。否则，他们就会蔓延起来，扩大他们的人数，损害我们的肌体，使我们的事业遭到严重的损失。”**

“在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运动中，阶级斗争更加尖锐，反革命分子必然要更加进行破坏活动。但是我们是有能力粉碎一切反革命分子的活动的，因为我们有着强大的革命力量。**我们力量的基础是人民群众的政治警惕性和他们对于反革命分子的辨别能力。这就要求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充分注意加强自己对群众的政治教育工作和组织领导工作。”**

“必须注意清查出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地有分别地对于清查出来的这些分子给以适当的处理。**这是整个革命队伍一切成员的任务，这是一切爱国者必须注意的大事情。”

接着，毛泽东给老同学谭世瑛写了一封回信。

原来，谭世瑛准备离京返乡，在6月4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并附了一首诗。毛泽东在给他的复信中写道：

世瑛兄：

6月4日的信及大作一首收到，甚谢！我赞成你于月内返乡。

中共湘乡县委有信（乡支部也有一信）给我，对于你家情况有所说明。据称：你的两个儿子确实有罪，这是因为他们在几次宽释之后还要犯罪，而且犯了严重罪行的缘故。因此，政府和人民对他们依法处理，是应该的。你则只有一些旧社会带来的缺点和在对待你两个儿子的态度上有些不当，故给以一年管制，现已解除，县委来信认为你无其他罪行。我认为县委对你的评语，是公道的。

你应当在旧社会的根本变化上去看问题，逐步把自己的思想和情绪转变过来。这样就可以想开些，把一些缺点改掉，督促全家努力生产。最要紧的是服从政府法令，听干部们的话。这样，几年之后，人们对你的态度就会更好些了。

如你认为必要的话，此信可以给县区乡负责同志一阅。

祝你平安！

　　 毛泽东 1955年6月8日

谭世瑛读罢老同学的信，彻底服了，毛泽东重情重义，没有忘却过去，而在对这件事情的处理上，既没有为情所动，仅听一面之词，又亲自过问调查，给了自己一个满意的答复。

6月8日这一天，毛泽东离开北京，乘专机去杭州，此行的主要目的，仍然是对农业合作化运动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

毛仙梅、文炳璋、毛泽荣及毛泽荣的养子毛会华等人随毛泽东乘坐的专机飞往浙江杭州，在飞行途中，毛泽东对毛仙梅说：

“等一下到了杭州，你就用劲看看杭州的风景。”

飞机飞到杭州上空，绕着西湖、钱塘江、六和塔等风景上空盘旋。毛泽东又对毛仙梅说：

“大哥，杭州到了，你使劲看吧。”

6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及毛泽东所写的17处按语；同时发表了经毛泽东修改的《人民日报》社论：《必须从胡风事件中吸取教训》。

第3批材料的主要内容侧重于揭发胡风的“反革命”阴谋，是胡风与其友人之间相互往来的67封信件摘编。其中涉及到胡风“集团”骨干分子“国民党军官”阿垅，“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特务分子”绿原，“国民党上校军官”芦甸；胡风本人也“和国民党的许多特务头子有联系”。

毛泽东在第3批材料中写的按语主要有：

“**由于我们革命党人骄傲自满，麻痹大意，或者顾了业务，忘记政治，以致许多反革命分子‘深入到’我们的‘肝脏里面’来了。这决不只是胡风分子，还有更多的其他特务分子或坏分子钻进来了。”**

“由阿垅这些信里可以看出，胡风分子是很懂得一些反革命的地下工作的策略的。他说：‘**不要在阵地未强固前就放起枪来。’**‘而主要是准备条件，多一些条件，要埋头工作，在群众中做好工作。’‘**把群众基础弄好，然后就找大的对象即对准革命的要害加以攻击。在进攻时，要多同朋友商量了做，把论点组织和考虑得更严密些，小东西和小事情最好不理。**’反革命分子不是那样笨的，他们的这些策略是很狡猾很毒辣的。一切革命党人决不能轻视他们，决不能麻痹大意，必须大大提高人民的政治警惕性，才能对付和肃清他们。”

随后，中共中央为了便于系统开展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决定将关于胡风的三批材料汇编成册，在全国发行。

6月15日，毛泽东为汇编成册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写了一个序言，又给陆定一等人写了一个批语：

定一、周扬、邓拓同志：

写了一个序言，两条按语，另外有些文字上的修改，请你们看后打出清样交上次会议那些同志看过，加以修改，然后付印。

6月16日凌晨，毛泽东又作出批示，他写道：

定一、周扬、邓拓同志：

此件又作了一些修改，请你们再看一遍，如无错误，即可付印，并打纸版供各地照印。此书出版的时候，可将《序言》一篇放在《人民日报》发表，题目叫《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以期引起人们的注意。

6月16日，中共中央公布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小册子。《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后来，《序言》和部分按语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抄录如下（部分有删节）：

　　 序言

为应广大读者的需要，我们现在将《人民日报》在1955年5月13日至6月10日期间所发表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3批材料和《人民日报》1955年6月10日的社论编在一起，交人民出版社出版，书名就叫《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在这本书中，我们仍然印了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一文，作为读者研究这个反革命两面派的一项资料，不过把它改为附件，印在舒芜那篇“材料”的后面。我们对3篇“材料”的按语和注文，作了少数文字上的修改。我们在第二篇“材料”中修改了一些注文，增加了一些注文，又增加了两个按语。第一、二两篇题目中的“反党集团”字样，统照第三篇那样，改为“反革命集团”，以归一律。此外，一切照旧。

估计到本书的出版，如同《人民日报》发表这些材料一样，将为两方面的人们所注意。一方面，反革命分子将注意它。一方面，广大人民将更加注意。

**反革命分子和有某些反革命情绪的人们，将从胡风分子的那些通信中得到共鸣**。胡风和胡风分子确是一切反革命阶级、集团和个人的代言人，他们咒骂革命的话和他们的活动策略，将为一切能得到这本书的反革命分子所欣赏，并从这里得到某些反革命的阶级斗争的教育。但是不论怎么样，总是无救于他们的灭亡的。胡风分子的这些文件，如同他们的靠山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一切反对中国人民的反革命文件一样，并不是成功的纪录，而只是失败的纪录，他们没有挽救他们自己集团的灭亡。

广大人民群众很需要这样一部材料。**反革命分子怎样耍两面派手法呢？他们怎样以假象欺骗我们，而在暗里却干着我们意料不到的事情呢？这一切，成千成万的善良人是不知道的。**就是因为这个缘故，许多反革命分子钻进我们的队伍中来了。我们的人眼睛不亮，不善于辨别好人和坏人。**我们善于辨别在正常情况之下从事活动的好人和坏人，但是我们不善于辨别在特殊情况下从事活动的某些人们**。胡风分子是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他们给人以假象，而将真相隐蔽着。但是他们既要反革命，就不可能将其真相隐蔽得十分彻底。作为一个集团的代表人物，在解放以前和解放以后，他们和我们的争论已有多次了。他们的言论、行动，不但跟共产党人不相同，跟广大的党外革命者和民主人士也是不相同的。最近的大暴露，不过是抓住了他们的大批真凭实据而已。就胡风分子的许多个别的人来说，我们所以受他们欺骗，则是因为我们的党组织，国家机关，人民团体，文化教育机关或企业机关，当着接收他们的时候，缺乏严格的审查。也因为**我们过去是处在革命的大风暴时期，我们是胜利者，各种人都向我们靠拢，未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作一次彻底的清理。**还因为辨别和清理坏人这件事，是要依靠领导机关的正确指导和广大群众的高度觉悟相结合才能办到，而我们过去在这方面的工作是有缺点的。凡此种种，都是教训。

我们所以重视胡风事件，就是要用这个事件向广大人民群众，首先是向具有阅读能力的工作干部和知识分子进行教育，给他们这个“材料”，借以提高他们的觉悟程度。这个“材料”具有极大的尖锐性和鲜明性，十分引人注意。反革命分子固然注意它，革命人民尤其注意它。**只要广大的革命人民从这个事件和材料学得了一些东西，激发了革命热情，提高了辨别能力，各种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就会被我们一步一步地清查出来的。**

　　按语（选辑）

　　　一

宗派，我们的祖宗叫作“朋党”，现在的人也叫“圈子”，又叫“摊子”，我们听得很熟的。干这种事情的人们，为了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往往说别人有宗派，有宗派的人是不正派的，而自己则是正派的，正派的人是没有宗派的。**胡风所领导的一批人，据说都是“青年作家”和“革命作家”，被一个具有“资产阶级理论”“造成独立王国”的共产党宗派所“仇视”和“迫害”，因此，他们要报仇。《文艺报》问题，“不过是抓到的一个缺口”，这个“问题不是孤立的”，很需要由此“拖到全面”，“透出这是一个宗派主义统治的问题”，而且是“宗派和军阀统治”。**问题这样严重，为了扫荡起见，他们就“抛出’了不少的东西。这样一来，胡风这批人就引人注意了。许多人认真一查，查出了他们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集团。过去说是“小集团”，不对了，他们的人很不少。过去说是一批单纯的文化人，不对了，他们的人钻进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部门里。过去说他们好像是一批明火执仗的革命党，不对了，他们的人大都是有严重问题的。他们的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共产党的叛徒，由这些人做骨干组成了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这个反革命派别和地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他们随时随地寻找我们的缺点，作为他们进行破坏活动的借口。那个地方有他们的人，那个地方就会生出一些古怪问题来。这个反革命集团，在解放以后是发展了，如果不加制止，还会发展下去。现在查出了胡风们的底子，许多现象就得到了合理的解释，他们的活动就可以制止了。

　　二

芦甸这种以攻为守的策略，后来胡风果然实行了，这就是胡风到北京来请求派工作，请求讨论他的问题，30万字的上书言事，最后是抓住《文艺报》问题放大炮。各种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当着他们处在不利情况的时候，为了保护他们现在的生存，以利将来的发展，他们往往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或者无中生有，当面造谣；或者抓住若干表面现象，攻击事情的本质；或者吹捧一部分人，攻击一部分人；或者借题发挥，“冲破一些缺口”，使我们处于困难地位。**总之，他们老是在研究对付我们的策略，“窥测方向”，以求一逞。有时他们会“装死躺下”，等待时机，“反攻过去”。他们有长期的阶级斗争经验，他们会做各种形式的斗争——合法的斗争和非法的斗争。我们革命党人必须懂得他们这一套，必须研究他们的策略，以便战胜他们。切不可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

　　三（同上，略） 四（略）

　　五

……**照胡风分子说来，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力量是要“呜呼完蛋”的，这种力量不过是“枯黄的叶子”和“腐朽的尸体”。**而胡风分子所代表的反革命力量呢？虽然“有些脆弱的芽子会被压死的”，但是大批的芽子却“正冲开”什么东西而要“茁壮地生长起来”。**如果说，法国资产阶级的国民议会里至今还有保皇党的代表人物的话，那么，在地球上全部剥削阶级彻底灭亡之后多少年内，很可能还会有蒋介石王朝的代表人物在各地活动着。**这些人中的最死硬分子是永远不会承认他们的失败的。这是因为他们不但需要欺骗别人，也需要欺骗他们自己，不然他们就不能过日子。

　　六

**这封信里所谓“那些封建潜力正在疯狂的杀人”，乃是胡风反革命集团对于我国人民革命力量镇压反革命力量的伟大斗争感觉恐怖的表现，这种感觉代表了一切反革命的阶级、集团和个人。他们感觉恐怖的事，正是革命的人民大众感觉高兴的事。……**

　　七（略）

欲知毛泽东此后的重要活动，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同小学时期的老同学谭世瑛谈话时说：“**李元甫先生、贺岚岗先生，还有你父亲，都是热心的教育家，他们是爱惜人才的！没有他们，我进不了东山学堂，也到不了长沙，只怕还出不了韶山冲呢！”**位居庙堂之高，仍念念不忘师恩，这才是知恩图报的真君子！人世间最可恨的是中山狼一类人物，倘若他们再孽生出一个明目张胆地突破人类道德底线的无耻之徒，那简直就是一堆不齿于人类的臭狗屎！

**第15章**

**“要看到问题的本质方面，看到事物的主导或主流方面，这样才能不**

**动摇。事物的非本质方面，次要方面，必须不忽略，必须去解决存在**

**着的一切问题，但不应将这些看成事物的主流，迷惑了自己的方向。”**

话说毛仙梅、毛泽荣等人在杭州逗留一些时日后，又随毛泽东乘专列沿浙赣铁路到达江西南昌。

1955年6月19日，毛泽东乘专列去长沙。

是日晚，毛泽东在列车行进途中，拿着毛仙梅原来交给他的蒋浩然的信件，看了一遍又一遍。

蒋浩然的弟弟蒋梯奎，在1925年协助毛泽东开展韶山农民运动，由毛泽东介绍入党，后担任过湘区委员会委员，1927年11月牺牲于韶山新屋湾。此后，蒋浩然也受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他东奔西走，生活贫困，解放后土改时被划为贫农。不久，当地有人公报私仇，又把他家划为地主成份。蒋浩然当然不服气，便写信向毛泽东反映情况。毛泽东拿着信问毛仙梅：

“大哥，你到过蒋浩然家吗？蒋浩然家里情况到底怎么样？”

毛仙梅说：

“那还有怎么样？连饭都没有吃，蛮困难的！”

毛泽东想了想，说：

“等下到了长沙，我会跟湖南的省委书记谈话。你就坐在侧边，为他多讲几句话。”

专列抵达长沙，停在大托铺机场附近的车站。湖南省省委书记周小舟、省委副书记周里、徐启文等人和湖南省教育厅副厅长周世钊及文字语文学家、湖南师范学院教授杨遇夫（即杨树达）等都来欢迎毛泽东。毛泽东一行下榻在湖南省委蓉园1号楼。

蓉园1号楼是一幢坐北朝南的砖木结构的宽敞平房，屋前有一片挺拔而茂密的树林，屋后是一个小山丘，有挺拔的树木。走进这幢平房，就可以看到从东到西有一条宽阔的走道把房间隔开，走道北面是一个小会议室，走道东侧南面是卧室和办公室，走道西侧南面是餐厅和乒乓球娱乐室。

毛泽东与省委副书记周里等人谈话时，毛仙梅也在座，他冷不丁地插了一句：

“主席，我先天跟你讲的那件事呢？”

湖南省委的领导们，看着坐在毛泽东身边这个农民，贸然说出这不冷不热的话，都感到莫名其妙。毛泽东也不见怪，对周里说：

“周书记，韶山杨林有个蒋浩然，是个烈属，土改他家划了地主成份，他家有意见，这个问题具体调查一下。”

毛泽东说罢，把蒋浩然的那封信转给了周里。

此后，毛泽东还派人到新化看望他在湖南一师时候的国文老师袁吉六先生的夫人。

毛仙梅和毛泽荣要回韶山了，二人向毛泽东告别，毛泽东说：

“我还要到别的地方去，这次就不回家了，不送你们了。你们回去的车票，已经叫警卫员给你们买好，由他们送你们上车。”

毛仙梅这次上北京，想要毛泽东帮助他解决一下生活困难，但又不便开口，所以一直闷闷不乐。毛泽东明白他的心思，也不做声。临分手时，毛泽东对他说：

“这里有一口箱子，里面有一点东西，一点小意思，就送给你了。”

毛仙梅接过皮箱，不知里面装的什么东西，他凝神看了很久。毛泽荣、文炳璋和他一样，也得到了一只同样的箱子。警卫员提着箱子，把毛仙梅、文炳璋、毛泽荣及毛泽荣的养子毛会华等人送到长沙汽车站。

毛仙梅郁郁寡欢地回到家里，打开皮箱，见里面放着一床鸭绒被，心想，送这东西做什么？他再把被子打开，才看见里面还放着100元人民币，顿时惊诧不已。他当天跑到杨林，将毛泽东赠物和过问蒋家的事告诉了蒋浩然。后来在1955年底，蒋浩然家的地主成份改成了“小土地出租”，还挂上了“烈属光荣”的牌匾。

再说6月20日上午10时，毛泽东要去湘江游泳。

蓉园里有一个游泳池，也有更衣室。但是，喜欢游泳的毛泽东以前来蓉园时，嫌游泳池水面太窄，从不去那里游泳，坚持要到宽阔的湘江里去游泳。

此时，正值湘江水涨，按照湖南人的习惯说法，正是“涨端阳水”、划龙船、吊屈原的时节。湘江水面比平时涨高2米，宽五分之二以上，江水浑浊，泥沙特别多。

省委领导人一面积极组织人进行游泳的准备工作，一面劝毛泽东不去游泳或改期游泳。一位副省长说：

“今天江中水浊，似乎不适合游泳。”

毛泽东笑容可掬地说：

“水清水浊不是决定适不适于游泳的主要条件。”

周世钊说：

“湘江水涨，水面又宽又深，游泳也许不便。”

“你不要说外行话！”毛泽东深知自己的这位老同学文史知识丰富，于是就引经据典，说：

“**庄子不是说过吗，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水越深，浮力越大，游起来当然要便利一些，你怎么反说不便呢？**”

这时候，中央警卫人员刘顺德协助省里的人已经测试了水温，还调集省体委的游泳健儿来陪游。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孙勇、马武义也在江边测量了水温，观察了水势。

10时30分，毛泽东从城北七码头乘船逆江而上。久雨初晴，天上还有薄薄的浮云，南风掠过水面，使人感到分外凉爽轻松。毛泽东身着白衬衫，站在甲板上，极目远眺。

20分钟后，船到南郊猴子石。猴子石是插入湘江的大石头，形似金猴，属于豹子岭的山麓。这里距水陆洲约2.5公里。毛泽东在猴子石跃入湘江，陪泳的体育健儿也纷纷下水。毛泽东时而侧泳，时而仰泳，时而自由式，时而蝶式，随着奔腾的江水，上下跳动，或在浪头，或在浪谷，搏击起层层水花。

一个小时后，毛泽东在岳麓山下的牌楼口北侧登上游船，盥洗了一番。上岸后，他听了长沙市委书记秦雨屏的工作汇报，满意地对身边的群众说：

“这是你们的书记，你们有事就找他。”

毛泽东又驱车去登岳麓山，省委为他登岳麓山准备了两顶轿子。毛泽东坚持步行，在众人的陪同下，从白鹤泉沿着石级步步攀登，登上了岳麓山高峰的云麓宫，还不肯坐下来休息，四处搜寻楹联、故物。他又走到宫外的望湘亭，感觉云麓宫、望湘亭外形依旧，里面却空荡荡、黑漆漆的，许多对联都不见了，就回头问秦雨屏：

“云麓宫壁间、柱上，悬挂的‘西南云气来衡岳，日夜江声下洞庭’的联语，还有‘一雨悬江白，孤城隔岸青’的楹联，如何不见了？”

秦雨屏回答说：

“岳麓山经过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火的摧残，宫亭碑楹所剩无几。解放后逐步恢复，但还有很多东西尚未来得及修复。”

毛泽东伫立望湘亭，凭着石栏，眺望着美丽如画的湘江、橘子洲、白帆、楼房，指点着飞烟缭绕、红旗招展的长沙市区，他觉得眼前呈现出来的一片繁荣兴旺景象，和过去是迥然不同了。

下午2时，毛泽东在云麓宫望湘亭请众人吃饭，有红烧肉、炒猪肝、蛋汤、蔬菜、辣椒各一样，另加他在学生时代露宿所吃的那种野果子。他对随身警卫人员说：

“请你们尝尝湖南菜，湖南菜的特色就是辣椒、豆豉、酱油、大火、红锅、煎炒。诸位仔细品味。”

李银桥辣得满头大汗，毛泽东望着他微微一笑，说：

“锻炼，锻炼。”

他又对罗瑞卿说：

“你们辛苦了，要多吃一点，吃饱点，特别是大个子。”

饭后休息时，周世钊见毛泽东在大运动量后依然是有说有笑，就说：

“你是60岁以上的人了，还能横渡湘江，攀登岳麓山，赛过许多年轻人。如果把今天的真实情形讲给全国青年们听，一定会使他们深为感动并向你学习。”

毛泽东听他的话音，就知道他是想写一点关于自己的东西，于是便说：

“这算什么！爬山吧，仅仅这样几步路。游水也算不了什么难事。我们每天不是都要走路吗？游泳时有水的浮力帮助，比走路应该是容易得多了。当然游水也容易出问题，不能粗心大意。我在第一师范学习时，有次游湘江，不是同学救护，早就出了‘洋’。”

下午3时，天上又下起了雨，毛泽东不能去爱晚亭了，便直奔岳麓书院、赫曦台而来。这两个地方也是毛泽东青年时代常来常往的处所，岳麓书院内的半学斋，还是毛泽东和蔡和森从事半耕半读建设新村的实验场地。

在岳麓书院，毛泽东与杨遇夫讨论了中国文字改革的问题。他微笑着对杨遇夫说：

“黎锦熙是提倡文字改革的积极分子，蒋竹如是文字改革的怀疑派，你是择善而从，由反对到赞成。”

此前，毛泽东曾多次与杨遇夫讨论文字改革问题。就在这一年的1月29日、3月17日及5月17日，他先后给杨遇夫写了3封信，还将杨遇夫的著作《<耐林庼甲文说>自序》转给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并在介绍信中对杨遇夫的自我批评精神予以赞赏，他写道：“我以为取这种态度较好。”

毛泽东出了岳麓书院，又驱车到省长程潜的住所去看望程潜。

6月23日晚，毛泽东乘专列回到了北京（此次历时半个月之久的调查研究，也像他4月间那次南下一样，详细资料无法搜寻到，只能从下面7月11日的谈话中略窥一斑）。

6月24日，毛泽东召见邓子恢，首先让邓子恢介绍了全国农业合作化的基本情况。他听完汇报后，要邓子恢修改原先的计划，把发展到100万个社的计划改为发展到130万个。邓子恢一听，心想：搞100万个社就够多的了，怎么又要搞到130万个？他虽然不同意，却没有说出来，只是说：

“主席，等我回部里商量一下再向你汇报吧。”

6月25日上午，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应中国政府和毛泽东主席的邀请，率领越南政府代表团乘专机飞抵北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首次国事访问。

胡志明走下飞机时，毛泽东迎上前去，同他亲切握手、拥抱。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相继同胡志明亲切握手，互致问候。

胡志明在毛泽东等人的陪同下，绕场一周，同上万名欢迎群众见面，机场上顿时彩旗飞舞，欢声雷动。

中午，毛泽东在与胡志明的会见中，热情地称赞英勇的越南人民历时9年的抗法战争的最后胜利和建设独立国家的斗争。胡志明则对毛泽东和中国人民所给予越南人民抗法斗争的无私援助，表示衷心的感谢。

6月26日晚，周恩来在北京饭店新楼大厅举行盛大欢迎宴会，招待胡志明和越南政府代表团全体成员。

胡志明在京期间，在毛泽东的陪同下，参加了北京市为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34周年而举办的盛大游园联欢活动，观看了文艺演出。同时，毛泽东和中国政府决定将8亿元人民币无偿赠送给越南人民，帮助越南在各方面的建设。

1955年7月4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厉行节约的决定》，全文如下：

中央同意李富春同志在中央各机关、党派、团体的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厉行节约，为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任务而奋斗》的报告，现将这个报告发给各地方和各部门的党组织。

根据检查，目前在基本建设中，企业经营管理中，各机关、学校、企业、部队的办公开支和生活设施中，均存在着严重的浪费现象，这是违背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要求的，这同中央历来强调的厉行节约的方针和我党一贯地艰苦奋斗的作风是不相容的，这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最危险的事情之一，必须坚决地加以纠正。为此，中央特作如下决定：

一、在基本建设上，除了新建的主要厂房、主要设备和其他主要的生产性工程及技术性工程（如广播电台的播音室）应该按现代技术的标准进行设计和施工安装，并保证其进度和质量外，其他次要的和附属的各种建筑工程项目，必须从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出发，尽量地组织现有企业和新建企业协作，凡能削减者应当削减；不能削减者，也应该降低设计标准和工程造价。**特别是在非生产性的建设上，必须严格控制，削减非急需建设的项目，认真地降低设计标准和工程造价，以适合我国目前的经济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从1955年下半年到1957年的基本建设投资（生产用的必需设备和国外设计的厂房投资除外）和各种费用，必须在现有计划的基础上，再削减15%至20%；在1955年下半年的数额中要求先做到削减15%左右。

1955年下半年在贯彻以上节约要求的过程中，应当特别注意减少和避免可能引起的工人窝工、材料积压等另一方面的损失或浪费，为此，国务院已于7月3日颁发了《关于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在基本建设中如何贯彻节约方针的指示》，各部和各地区应该认真地加以贯彻。

二、**各经济部门，必须改善经营管理，贯彻经济核算制，加强财务成本工作，节约资金，杜绝浪费，降低成本，增加上缴利润。**特别是工业生产企业，必须加强技术领导，加强试验研究工作，进行必要的技术措施，认真地进行新产品的设计和试制，不断地总结新产品的制造经验，推广先进经验和先进定额，节约原材料，开辟新的原料来源，以求达到扩大新产品、增加产量、提高质量和降低成本的目的。

三、各部门必须严格地遵守老企业、老单位增产增事不增人，新企业、新单位增人从老企业、老单位多余人员中调配和优先录用复员建设军人的原则。积极地整顿劳动组织，建立和健全编制定员制度。**在1955年下半年一律停止从社会上招收新职工，必需增人者，由劳动部门统一调配解决，为此必须加强中央各部门和各地区的劳动力的调配工作。**对被精简人员必须予以妥善安置，具体办法将由国务院另行规定。

四、在机关、学校、企业、部队的生活设施方面，必须简洁朴素，不许铺张浪费，现行行政办公杂支的开支标准，特别是有关汽车、宿舍、家具的使用标准应当降低，具体办法将由财政部另行规定。

厉行节约不是消极的措施，而是加速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积极的方针，各部门和各地区在厉行节约的同时，还应该努力增加生产。

请你们根据中央的决定和李富春同志报告中所提出的各种节约措施，结合本地区本行门的具体情况加以讨论，按照1955年下半年和1956年、1957年的不同情况，分别制订出各该省市与各该部门的节约方案和节约指标，并指导各企业、机关、学校、部队也同样订出节约的指标。**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是全国普遍的长期的经常的政治任务，应动员全党，团结全国人民，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养成节约风气，为有成效地实现这一任务而奋斗。**

各地方和各单位的党组织，应该将讨论和执行本决定的情况随时报告中央。

7月6日，毛泽东为中央转发河北省委《关于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中几项政策问题的指示》写了一个批语，全文如下：

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

河北省委《关于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中几项政策问题的指示》，基本上是适用的。原指示的附件《邢台县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牲口私有伙用办法的经验》，也很好。现在一并转发各地供参考。应当着重指出：**合作经济中贫农中农之间的互利政策乃是贯彻自愿原则的基础，为了进一步巩固去冬今春新发展的合作社，必须有计划地对各个社的具体政策，特别是对贯彻互利政策和自愿原则的情形，做一次检查。**

一、**经验证明：在初办社的时候，或者在合作社生产还没有显著提高和社员的经济力量尚差的情况下，对社员牲口入社采取私有私喂由社租用雇用的办法，是更为有利的。**河北省委研究了邢台的经验，决定有领导有步骤地提倡和推广这种办法，并对某些业已实行牲口折价归社，致负债过多，草料缺乏，影响牲口瘦弱病亡的合作社，分别情况进行教育和说服工作，使之改变为社员私有私喂由社租用或部分归社公有部分转为私有的办法，是合乎实际的。牲口采用租用雇用办法的时候，所付租金，一般应明确规定给以相当于当地社会畜租一样的报酬，使畜主除去牲口消耗之外，尚有利可得。但是，在提倡和改变为私有公用办法的时候，必须注意：不可生硬强迫，不要拘泥于上边订出的统一规格，不要无准备地一声号令说改就改，遗留下许多争议不予解决，反而影响社的巩固。**如果有一些社组织基础和经济条件都比较好，对牲口归社所折价款和偿还期限的规定比较合理，贫农社员负担得起，就不要一律改为私有**；其中有的未认真按约定期限偿付价款，则应督促它切实执行约定，不再失信于社员，并消除一般农民对发展牲畜的怀疑和顾虑。

二、土地报酬不论采取比例分益制还是定量分益制，均应固定一个时期。为了使土地报酬更趋合理，对于那些单纯按照负担产量作为入社产量的合作社，也须考虑加以改变。因为农业税的负担产量是以土地质量为标准评定的，而同等质量的土地由于经营的好坏实际产量并不一定相等，那些占有实际产量较高的土地的农民（主要是中农）对于单纯按负担产量评产入社是不满意的。如果改为按常年实际产量评定，同时注意对那些因无力经营而产量低于同等质量土地者加以适当照顾，这样做可以取得多数社员的拥护。此点请加研究。

三、按入社土地分摊的生产底垫，不要摊得过多，要以大多数社员出得起为限，再加上国家对贫农的低利长期贷款的扶助，贫困社员分摊不起的问题大体已可获得解决。**河北省委指示：“个别特别贫困者，经社员公议，可少交或免交”的规定可以删去；因为分期缓交是可以的，而少交免交则容易引起中农不满。**

本件及附件可登党刊。

　 　 中央 1955年7月6日

7月8日，胡志明离开北京，赴蒙古、苏联访问。

7月9日，刘少奇给毛泽东的值班秘书打电话说，邓子恢对农业合作化问题有些意见，他准备和毛泽东谈谈，并**建议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让邓子恢也参加。

7月10日下午，毛泽东**没有召开书记处会议**，而是召见刘少奇，双方谈了一个小时。

7月11日12时，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和副部长廖鲁言、陈伯达、陈正人、王观澜、刘建勋及秘书长杜润生7人谈话。

此前，**毛泽东在6月间的南下视察中，已经看到中国的农业合作运动又有了迅速的发展，在部分地区已经显露出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之势**。所以他在6月24日同邓子恢谈话时，提议将发展合作社的原计划100万个，改为130万个。邓子恢答应回部里商量后再汇报。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首先问邓子恢：

“你们商量的结果怎么样？”

邓子恢回答说：

“我们认为，还是维持搞100万个社的计划为好。改为130万个，太快了，超过了客观可能性，难以完成。”

接着，他列举了几点理由：（1）合作社的发展速度，应该与国家工业化的进度相适应，而我国工业目前尚不能为农业现代化提供相应的技术和机械设备。（2）现有的65万个社，质量不好，问题很多，巩固任务很重，要打好基础，才能较好的前进。（3）全国各地情况不一，群众觉悟程度也有很大差异，发展过快，超过了群众觉悟程度，会发生强迫命令。（4）干部领导经验尚须积累，培养会计也需一定的时间。（5）苏联和东欧国家农业合作化过急，已有教训，值得我国注意。

毛泽东听了很生气，批评说：

“什么超过了‘客观可能性’！实际上是有着很大的潜力可挖嘛。现在看来，翻半番太保守了，翻一番才比较符合客观实际。你说的理由根本不成其为理由。”

“怎么不是理由？办社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啊！”邓子恢申辩说：“不顾客观条件，人为的加速合作化的进程，会闹大乱子的。”

“事在人为嘛！条件是人创造的嘛！”毛泽东反驳道：“**你的‘要和工业化进度相适应’还是‘先机械化，后合作化’的老调重弹嘛。什么“超过了群众的觉悟程度’，你们的眼睛只盯着少数的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上中农，根本看不见广大的贫下中农群众中所蕴藏的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我们向来是‘从战争中学战争’的，干部的经验和会计能力是在实践中积累和锻炼的，你不成立合作社，他们去哪里积累！去哪里锻炼！我们到1956年秋收前发展到130万个社，不是急，更不是过急，而是恰如其分。这怎么能和苏联和东欧国家合作化过急的错误相提并论。真是奇谈怪论！”**

邓子恢坚持说：

“主席，我说的理由都是实事求是的，不是奇谈怪论。你一向都是主张实事求是的。翻一番不是实事求是啊！”

“什么实事求是？**你到处讲要大砍合作社**，也是实事求是吗？”

“我只是按照你和中央的指示整顿合作社，从来没有说过‘砍’合作社啊。”

“你自以为了解农民，太固执啦！”

“我不是固执。我是个老党员，是党的干部，我要对主席负责，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

二人你一言我一语，互不相让，谈话陷入了僵局。在座的副部长们从来也没有见过这种阵势，都为邓子恢捏着一把汗，不敢轻易说什么。毛泽东知道这个老部下的犟脾气，觉得不能再顶下去了。他只好缓和一下气氛，说：

“好啦。你没有说过‘砍’合作社，我就放心了。我的话说得挖苦一些，没有别的意思，就是希望你们今后注意。”

邓子恢也说：

“主席，我的态度不好，请你原谅。翻一番的事，容我再想一想。”

到下午5点40分，谈话结束了。邓子恢等人起身要走。毛泽东笑着说：

“别走，我请你们吃饭。”

吃罢饭，众人回到部里，都劝邓子恢：

“邓老，何必为了30万个合作社和主席争论呢。”

邓子恢说：

“不只是30万个合作社的问题，要紧的是他不顾客观条件，要按个人主观意志搞大发展，这要出大乱子的，怎么能不说清楚呢！”

7月15日，邓子恢觉得还是不能听毛泽东翻一番的主张。他向刘少奇汇报说，到1956年合作社发展到130万个不行，还是100万个为好。刘少奇说：

“邓老，**你们是专家，这个意见我们考虑**。”

7月18日，毛泽东给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杜润生写了一封信，说**要调阅4、5月间召开的第3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的全部材料，其中包括邓子恢的总结报告。**

7月19日，毛泽东批阅了他身边的几名警卫战士所写的回乡调查报告。

河南兰考籍的战士写的是：由于连年水灾，该村缺粮户达50%。今春没有东西吃，只好吃树叶。原因主要是发放的购粮证太少，定产过高，实际产量达不到，农民不满。毛泽东批道：

“**此乡缺粮，农民不满，值得注意。”**

河南延津县籍的战士写的是：该村农民对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反映不一，有好有坏。实际上没有吃的是少数。开始建社时，由于速度快，又没有采取自愿互利原则，使部分人思想不通，准备退社。社里的牲口死了一些。社员不断吵架，生产情绪不高。毛泽东批道：

“**此乡粮食有些问题，不大。合作社问题较大。**”

河南新蔡县籍的战士写的是：该乡连年受灾，粮食收成不好，缺粮户增多，私商从中牟利，粮价上涨。毛泽东批道：

“**据说，这个乡有些问题。乡主席邹明发（较富裕的中农）有320斤余粮，只出卖70斤，春季又向政府购进20斤，人民有意见。**”

广东南雄县籍的战士写的是：**这个村的合作社成立一年来，战胜了自然灾害，完成了增产任务，产量比单干户和互助组增加30%。许多去年有顾虑的农民今年纷纷要求入社，最后全村除被剥夺政治权利者和一家单干外，全都入了社**。农民踊跃卖粮，但也有极少数不愿卖。一户中农和一户贫农拒卖余粮，被工作干部扣留起来，造成不好的影响。毛泽东批道：

“**扣留了两户不愿卖粮的。合作社很好。**”

广西防城县籍的战士写的是：该村粮食问题的反映主要是叫苦，而这些叫苦的绝大多数是单干的中农。据了解，10户叫苦的中农中没有一户是真正的苦。与防城相邻的钦县，遭受大旱灾，粮食恐慌，每人每天只能吃到一两米，完全靠上山挖野生植物吃。毛泽东批道：

“**中农叫苦是假的**。钦县大旱灾。”

毛泽东在湖南宁乡县籍的战士的报告中批道：

“此份报告写得不错。有分析，有例证。”

他特意将前3个批件送给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阅，要求他阅后退还。

7月19日，20日、22日，毛泽东还分3批听取身边警卫战士的探亲调查汇报，每一次汇报都在3个小时以上。他对战士们说：

“我想的这个办法实在好，通过你们和广大农民联系起来了，建立了关系。”

说着，他伸出3个指头，比划着说：

“就离这么远。”

毛泽东一面看战士们写的调查报告，一面询问情况。他问一名战士说：

“你家参加合作社没有？参加了合作社以后有没有时间回家干活？你家是不是比过去好一点？”

毛泽东还要求战士们说：

“要分清中农多少，贫农多少，下次要调查他们的态度。”

汇报会开得生动活泼，战士们无拘无束地把自己想说的话都说出来了。毛泽东总结说：

**“新中农思想起了变化，不愿参加合作社，老中农愿参加合作社。”**

7月21日，胡志明访问苏联后经北京归国，毛泽东亲自到机场为他送行，亲切告别。

7月26日，**毛泽东单独召见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要他汇报山西农业合作化的情况。**陶鲁笳汇报说：

“合作社的发展是渐进的，是在互助组的基础上发展壮大起来的。这3年的试办，是一步一个脚印向前推进的。这为去年的飞跃发展创造了条件。到今年4月，入社农户占农户总数的41%。”

毛泽东问道：

**“你们的合作社在面上铺开了，有没有减产、死牛的情况？”**

陶鲁笳说：

“去年全省减产4.8%，而**合作社占60%以上的平顺、武乡等20个县粮食比上年增产3.8%。**全省的大牲畜，从1951年到去年，年递增率为10%。”

毛泽东听了很高兴，他说：

“你考虑过没有，苏联在搞集体农庄前，不少地方已初步实现了农业机械化，水平比我们现在还要高。但苏联农业生产长期停滞不前，集体农庄不断减产死牛，直到现在还没有达到十月革命前最高水平。什么原因？”

陶鲁笳想了想说：

“苏联共产党没有像我党那样始终重视农业重视农村，了解农村，我们大多数领导干部是从农村根据地走出来的，比较了解农民。我们的农业社和苏联集体农庄也不同，我们是经过互助组一步步发展起来的。”

毛泽东用赞赏的目光望着陶鲁笳说：

“哦，你说对了一点。要记住，**我们和苏联一样，受帝国主义封锁，要搞社会主义，只有搞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不跟在资本主义后面一步步爬行。苏联工业基础比我们强，工业人口比例比我们大，这是优势，如果只注意优势不提高劣势，就不能两条腿走路，苏联农业可能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这是一个极为深刻的教训。**新中国要不受帝国主义欺侮，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发展工业，必须两条腿走路。农业跟上来，靠一家几亩地不行，要靠合作化大农业，才能有社会主义大工业，有民族重工业。**农业合作化就是为这个打基础，新中国工农业要均衡发展，两条腿走路，才能避免苏联农业今天的困难。要做到这一点，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和可靠的干部队伍是至关重要的。”

毛泽东在陶鲁笳告辞时，还一再叮嘱他说：

“一定要增产，一定要增牛，一定要使我们的合作社比苏联的集体农庄搞得更好。”

7月28日，柯庆施来京准备参加会议，特意将浙江省委副书记林乎加向华东局作的电话汇报记录呈报给毛泽东。

关于浙江省整掉15000个合作社问题，林乎加在电话汇报中说：“我们认为坚决收缩是正确的，但**在收缩过程中有缺点，这就是把一些可以不收缩的也收缩了，很多地方当成了运动，主要搞收缩。有些收缩得很草率，善后工作没有很好处理，部分农民吃了亏，伤害了他们的积极性。**这些缺点在中央5月会议以后就纠正了。”

毛泽东当即**在“我们认为坚决收缩是正确的”这句话后面，写了一个批注：**

**“这种估计不对。”**

并批示印发到会人员。

7月29日，毛泽东在中央农村工作部**7月26日报送的农业合作社情况简报**的正面和背面上，写下了许多文字。**中央农村工作部在简报中提到1955年到1956年度合作社发展计划是103万个，而不是毛泽东所要求的130万个**。**这个近乎开玩笑的数字，使毛泽东更加生气：这个邓子恢，真是顽固不化！**他指示有关人员，将这份简报印发给来京参加省市区党委书记会议的负责人们，又嘱咐说，他在上面写的那些文字不要印。

毛泽东在简报上写的是：

“**目前不是批评冒进的问题，不是批评‘超过了客观可能性’的问题，而是批评不进的问题，而是批评不认识和不去利用‘客观可能性’的问题，**即不认识和不去利用广大农民由于土地不足、生活贫苦或者生活还不富裕，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而我们有些人却不认识和不去利用这种客观存在的可能性。”

“农民的两面性——集体经营与个体经营两种思想的矛盾，哪一面占优势？随着宣传和合作社示范，集体经营的思想先在一部分人中占优势，然后在第二部分人中优势，然后在第三部分人中占优势，然后在大部分人中占优势，最后在全体人民中占优势，我们应当逐步地（经过15年）造成这种优势。”

“要有坚定的方向，不要动摇。要别人不动摇，就要自己首先不动摇。**要看到问题的本质方面，看到事物的主导或主流方面，这样才能不动摇。事物的非本质方面，次要方面，必须不忽略，必须去解决存在着的一切问题，但不应将这些看成事物的主流，迷惑了自己的方向。”**

“增加生产，必须完成，并争取超额完成‘五年计划’所规定的增产指标，决不能减产。是否能做到？我们党是否在这个问题上要犯一次大错误？苏联所犯过的错误我们是否能避免？”

欲知毛泽东在即将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有何高论，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55年**4月和6月间两次南下，对农业生产合作化运动进行大范围的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正是他对此前的战略部署进行调整的重要依据**。可惜这两次调查研究的详细资料至今还未曾公之于世。但从7月9日以后的史实中，读者完全可以看明白毛泽东与邓子恢、刘少奇等人在农业生产合作化问题上的巨大分歧：邓子恢不是向毛泽东汇报思想，而是向刘少奇倾诉了自己的意见，刘少奇便向毛泽东建议召开有邓子恢参加的**中央书记处会议**。可是毛泽东偏偏**不开坐在中南海专听汇报的书记处书记会议**，而是在第二天召见了刘少奇，第3天与邓子恢7人谈了话。7月15日，邓子恢再次寻求刘少奇的支持。刘少奇便说：“邓老，**你们是专家，这个意见我们考虑**。”毛泽东这才不得不审时度势，另辟蹊径，从7月18日开始，着手准备召开一个**工作在全国各地第一线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他调阅第3次全国农业工作会议的全部材料和邓子恢的总结报告，批阅卫士的回乡调查报告，召见陶鲁笳，将林乎加的电话汇报记录和农村工作部的简报印发来京参会人员等等，像部署一次战役一样（**有些人说是准备炮弹）**，为会议做了周密的准备。这就是一般凡人和庸人难以企及的千古伟人毛泽东！

**第16章**

“**这里看来只有一字之差，一个要下马，一个要上马，却是表现了**

**两条路线的分歧。”“必须现在就要看到，农村中不久就将出现一个**

**全国性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这是不可避免的。”**

话说1955年7月30日，第一届全国人大2次会议正式通过了第1个“五年计划”。

7月31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会议原定在下午3时开始。

下午1时，毛泽东早早来到了怀仁堂东侧的游泳池。

1时40分，毛泽东找来陶铸、江华、周小舟3位省委书记谈话，大约有半个多小时。随后，毛泽东步入会场。

会议按原定时间准时开始，毛泽东首先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参看《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长篇报告。他一开头就说：

“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大风暴（毛泽东后来在8月下旬修改这篇报告时，将“大风暴”一词改为“高潮”——笔者注）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清的清规和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否，这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

据一位参加会议的省委书记回忆说：此时的会议气氛是比较平和的，毛泽东也显得轻松自如，他在批评“小脚女人”时还连说带笑。

毛泽东接着说：

“**目前农村中合作化的社会改革的高潮，有些地方已经到来，全国也即将到来。这是5亿多农村人口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带有极其伟大的世界意义。我们应当积极地热情地有计划地去领导这个运动，而不是用各种办法去拉它向后退。**运动中免不了要出些偏差，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不难纠正的。干部中和农民中存在的缺点或错误，只要我们积极地去帮助他们，就会克服或纠正。干部和农民是在党的领导之下前进的，运动基本上是健康的。在有些地方，他们在工作中犯了一些错误，例如：一方面排斥贫农入社，不照顾贫农的困难；另一方面又强迫富裕中农入社，侵犯他们的利益。这些都应该向他们去进行教育，加以纠正，而不是简单地去进行斥责。简单的斥责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要大胆指导运动，不要前怕狼，后怕虎。干部和农民在自己的斗争经验中将改造他们自己。要让他们做，在做的中间得到教训，增长才干。这样，大批的优秀人物就会产生。**前怕狼后怕虎的态度不能造就干部。必须由上面派出大批经过短期训练的干部，到农村中去指导和帮助合作化运动；但是由上面派下去的干部也要在运动中才能学会怎样做工作。光是进了训练班，听到教员讲了几十条，还不一定就会做工作。

总之，领导不应当落在群众运动的后头。而现在的情况，正是群众运动走在领导的前头，领导赶不上运动。这种情况必须改变。”

“**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毛泽东批评了在浙江采取的“坚决收缩”（毛泽东解释说不是浙江省委决定的）的方针，他说：

**“这种‘坚决收缩’的方针，是在一种惊慌失措的情绪支配下定出来的。这样一件大事不得中央同意就去做，也是不妥当的。并且在1955年4月，中央就提出过这样的警告：‘不要重犯1953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那种错误，否则又要作检讨。’可是有些同志不愿意听。**

在胜利面前，我认为有两种不好：1、胜利冲昏了头脑，使自己的头脑大大膨胀起来，犯出‘左’的错误，这当然不好。2、胜利吓昏了头脑，来一个‘坚决收缩’，犯出右的错误，这也不好。现在的情况是属于后一种，有些同志被几十万个小型合作社吓昏了。”

接下来，毛泽东从农业合作化与工业化相互关系的角度，论证了加快发展农业合作化的必要性。他说：

“我国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生产水平，现在是很低的，而国家对这些物资的需要却是一年一年增大，这是一个尖锐地矛盾。**如果我们不能在大约3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即农业由使用畜力农具的小规模的经营跃进到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经营，包括由国家组织的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移民垦荒在内（3个‘五年计划’期内，准备垦荒4亿亩至5亿亩），我们就不能解决年年增长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同现实主要农作物一般产量很低之间的矛盾，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就会遇到绝大的困难，我们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

“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一个重要的部门——重工业，它的拖拉机的生产，它的其它农业机器的生产，它的化学肥料的生产，它的供农业使用的现代运输工具的生产，它的供农业使用的煤油和电力的生产等等，所有这些，只有在农业已经形成了合作化的大规模经营的基础上才有使用的可能，或者才能大量的使用。**我们现在不但正在进行关于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进行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而这两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在农业方面，在我国的条件下（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是使农业资本主义化），则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由此可见，我们对于工业和农业、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农业改造这样两件事，决不可以分割起来和互相孤立起来看，决不可以只强调一方面，减弱另一方面。”

“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技术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其中有一个相当大的部分是要从农业方面积累起来的。这除了直接的农业税以外，就是发展为农民所需要的大量生活资料的轻工业的生产，拿这些东西去同农民的商品粮食和轻工业原料相交换，既满足了农民和国家两方面的物资需要，又为国家积累了资金。而轻工业的大规模的发展不但需要重工业的发展，也需要农业的发展。因为大规模的轻工业的发展，不是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所能实现的，它有待于大规模的农业，而在我国就是社会主义的合作化的农业。因为只有这种农业，才能够使农民有比较现在不知大到多少倍的购买力。”

毛泽东还批评说：

“老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上替较少的人打主意。而没有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替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打主意。”“**这里看来只有一字之差，一个要下马，一个要上马，却是表现了两条路线的分歧。”“必须现在就要看到，农村中不久就将出现一个全国性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这是不可避免的。”**

1955年8月1日，邓子恢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就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工作作了自我批评。

毛泽东在各地代表发言后作了结论，提出了“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方针。

8月3日下午，毛泽东约见邓子恢，他们从下午2时30分一直谈到4时45分。

8月6日，毛泽东给刘思齐写了一封回信。

原来在8月初，刘思齐由毛泽东安排准备去苏联留学，此时她患了重感冒，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毛泽东马上回了一封信：

思齐儿：

信收到。患重感冒，好生休养，恢复体力，以利出国，如今日好些，望来此一看，否则不要来。最要紧是争一口气，学成为国效力。你要的列宁选集2卷，给你送上。

祝好！

父字

后来在9月间，毛泽东把刘思齐送到苏联莫斯科大学数学系学习。

在8月初的周六晚上，毛华初来到中南海看望伯父毛泽东。

此前，毛华初在1949年由东北随南下工作团到达湖南湘潭，先后担任中共湘潭县组织部长、县委副书记、县委书记职务，在湘潭任职达5年之久。1955年5月，他调任省林业厅副厅长。这一次，他是从湖南来到北京参加林业部召开的全国林业工作会议的。在京参加会议期间，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会议开了五六天，一直没见到伯伯回信，就后悔不该去打扰伯伯。散会后，毛华初去看望爱人韩谨行的姑父、法学家张友渔。

这一天，叶子龙从中南海打来电话，说毛泽东约毛华初星期六晚上见一见。毛华初说：

“我要回去了，不打扰主席了。”

叶子龙说：

“好多年没见面了，主席说要见见你。”

毛华初如约来到了中南海。中南海的周末，华灯齐放，五彩缤纷。工作人员为了让毛泽东愉快地度过周末，特地安排了舞会。舞会在一个简陋的不大不小的平房里举行，厅里没有什么豪华的陈设，除了一套旧沙发外，就是木凳。参加舞会的大都是干部、警卫员、服务员和其他工作人员。

毛华初走进舞厅，见毛泽东坐在沙发上休息，他容光焕发，神采奕奕，只是比过去老了一些，胖了一些。这是毛华初在离开延安之后第一次见到伯伯，分别整整10年了。毛泽东认出了毛华初，连忙招呼他进去。毛华初走上前去，叫道：

“伯伯。”

毛泽东起身和侄儿握手。俩人落座后，毛泽东问起了韶山一些老人及堂弟毛泽连、毛泽荣的生活状况，毛华初一一作答。毛泽东又问道：

“你是什么时候来北京的？”

“来了一个星期了。”毛华初说：“我是来参加林业工作会议的。”

毛泽东想到了东北砍伐森林的现象严重，就说：

“你搞林业很好，林业要发展，还要靠你们多努力。你是林业厅副厅长，你告诉林业部，不要变成一个砍伐部、毁林部。要变成一个管林部，育林部。”

毛泽东左手手指间夹着香烟，又用右手掰着左手指，如数家珍地说着全国还有多少平原和丘陵，有多少森林覆盖率，还有多少荒地，分别占多少百分比。毛华初认真听着，非常佩服伯父管理着国家大事，还对林业状况如此清楚。

这时，一个小姑娘走了过来，蹲到毛泽东面前，请他跳舞。毛泽东朝毛华初望了一眼，对小姑娘说：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毛华初完全明白，伯父面对着的是小姑娘，而实际上这番话是说给自己听的。伯伯对年轻人寄于多大的期望啊！

正在此时，毛泽东的女儿李敏也来了，她拉着爸爸走进了舞池。那个小姑娘则拉着毛华初跳起了舞。毛华初隐约听到侧面的李敏问爸爸：

“这是哪一个？”

毛泽东低声说：

“他是我家里人。”

一曲舞毕，毛华初向伯伯告辞。毛泽东叫秘书把他送到门口，直至上了汽车。

8月7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去了北戴河。

他每天下午到海水浴场游泳三四个小时，晚上工作，主要是修改7月31日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稿，直到次日凌晨两三点钟，有时到六七点钟。他根据8月1日省市区党委书记们讨论的意见，对报告稿作了必要的修改和补充。他加写的重要文字有：

“**我们必须反对任何没有准备的不顾农民群众觉悟水平的急躁冒进的思想。”**

**“反对不顾质量、专门追求社和农户的数目字的那一种倾向。**”

**“必须一开始就注重合作社的质量，反对单纯的追求数量的偏向。”**

**“在发展了一批合作社之后，必须有一个停止发展进行整顿的时间，然后再去发展一批合作社。那种不许有停顿、不许有间歇的思想是错误的。”**

此外，毛泽东每天还要阅读省市区党委送来的报告，读得非常认真，仔细地圈、点、批、画，还修改文字。

8月11日，国防部长彭德怀、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签发《关于军士和兵评定军衔的指示》，全军评定军衔的工作正式展开。

8月13日，毛泽东在**批转湖北省委关于农业合作化部署问题的报告**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关于用大力、分几次、认真地而不是走马看花地整顿现有合作社的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湖北报告中没有提到，中央希望你们严重地加以注意。于9月20日以前，务必作出切实的部署，连同全省发展规划，一起报来为盼。”

8月21日，毛泽东通知陈伯达到北戴河，研究为党的七届六中全会准备的关于农业合作化决议的起草问题。

同时，毛泽东要廖鲁言负责修改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试行草案。

8月23日，毛泽东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修改本送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董必武、彭德怀、陈伯达、陆定一、陈毅、谭震林、邓子恢、李富春13人，征求意见。

8月25日，毛泽东为中央批转辽宁省委《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的报告》，他写道：

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

现将辽宁省委1955年8月12日《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的报告》发给你们参考。中央认为辽宁省委的方针是正确的。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相互关系问题，必须强调二者的紧密联系，而不可只强调前者，减弱后者。**因为如果不使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速度相适应，则社会主义工业化不可能孤立地完成，势必遇到极大的困难。**而目前党内正有许多人还不了解这一点。关于整社建社扩社的各项准备工作，辽宁省委指出，应包括“逐级做好思想发动，批判克服右倾思想，积极发挥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热情和积极性；逐级做好发展社的全面规划，特别是着重解决村一级（按即乡一级，东北各省还未改称乡）合作化的阶级规划；继续做好现有社整顿巩固工作，进一步贯彻合作化的具体政策，审查清理和纯洁合作社的组织；加强对互助组的领导，打好建社的基础；把整社建社和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密切结合起来”，这些都是适当的。辽宁省委决定于9月上旬召开全省县委书记和区委书记的联席会议讨论合作化问题，各省可以酌量仿行。辽宁没有地委一级，为了加强对合作化的领导，立即建立这一级机构，我们认为是必要的。

中央 1955年8月25日

8月2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通知，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修改本发给上海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并要求他们印发各级党委直到农村党支部。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发表后，在全国农村干群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酝酿建社办社，走社会主义道路．不仅成为舆论中心，而且成为广大干群的实际行动。

8月27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转发中央宣传部《关于学校教育工作座谈会的报告》给各地党委的指示，全文如下：

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党组：

中央同意中央宣传部《关于学校教育工作座谈会的报告》，现发给你们，望认真研究执行。

**在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必须相应地发展和提高学校教育，为国家培养建设人才和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不培养出足够数量合乎国家建设需要的德才兼备的优秀干部并把劳动人民的文化程度提高到相当的水平，要想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须引起全党对学校教育工作的重视，应当明确地认识到办好一所大学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办好一所大工厂，而管理学校比起管理工厂来还有它许多特殊的困难。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是直接为国家培养建设人才的地方，对于国家各项建设事业的关系特别重大。资产阶级正在学校中同我们争夺领导权，敌视社会主义的分子以至敌人的特务奸细也正在经过这条路打进我们的工矿企业和国家机关中去。这里进行着严重的阶级斗争。要保证做好学校工作，首先必须建立起那里的强有力的党的领导。**没有党的组织，没有强有力的党的领导，党委不管学校中党的工作，就等于把学校交给资产阶级去领导，就会犯很大的错误。为了建立起学校中首先是高等学校中党的强有力的领导，必须选派得力的干部到这些学校担任领导职务，办好这些学校。**近几年来，各地党委对于学校教育工作的领导和监督虽已有所加强，但远赶不上工作需要，不重视或不大重视学校教育工作的现象，还相当普遍地存在，许多党委不注意学校中党的工作，对学校教育的政治思想领导还很薄弱，以致学校教育各项改革和建设工作的进行，显得不够有力。这种只重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不重视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人才的作法，是缺少远见的，必须迅速加以改变。望各地党委按照中央宣传部这一报告的精神和所提出的建议，认真地把学校教育工作列入议事日程，定期在党委会议上讨论学校教育方面的重大问题，在党委书记或党委常委委员的分工上应有人专管学校教育工作，积极建立和健全党委管理学校教育的工作机构，以加强党委对学校教育工作的领导和监督。目前应尽可能拿出足够的力量来，领导学校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认真作好建党工作；下决心调配一批强的干部到高等、中等学校担任校（院）长、党委书记等领导职务，并经常注意加强对他们的教育和帮助。高等学校所需要的党员正副校（院）长，由中央宣传部会同中央组织部和各有关政府党组及省（市）提出具体方案，加以调配，党委书记则由各省（市）委和自治区党委负责调配。**在学校中要积极宣传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健全人事制度，作好师生员工的政治审查工作；使学校教育工作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得到应有的改进，以保证教学质量的提高。

　 　 中央 1955年8月27日

1955年9月4日，毛泽东与周恩来、陈伯达、廖鲁言一起，审定了由陈伯达起草的为七届六中全会准备的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决议草案，以及由廖鲁言负责修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试行草案这两个文件。

9月4日晚，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转发福建省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起草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

现将福建省委1955年8月31日《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一件，发给你们参考。中央认为福建省委的方针是正确的。**关于“依靠贫农（包括全部原为贫农的新中农在内）巩固地团结中农”这个口号，在目前基本上依然是正确的**，但是因为（一）新中农中间出现了富裕中农（即上中农），这些人中间除了若干政治觉悟较高的人以外，其余的人暂时还不愿意加入合作社；（二）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由于他们的经济地位原来就不富裕，有些则因为在土地改革的时候不正当地受了一些侵犯，这些人在经济地位上和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大体相似，他们对于加入合作社一般地感到兴趣。因为以上两个原因，故在一切合作化还没有达到高潮，富裕中农还缺乏觉悟的地方，以首先吸收（一）贫农；（二）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在毛泽东同志报告的修正本中，对于中农只分为上中农下中农两部分，未提中中农，以免分得过细，不易区别。现在所说的下中农实际上包括原来所说的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和中中农两个部分）；（三）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这样3部分人加入合作社为适宜（并应依其觉悟程度，分作多批吸收进来，首先吸收觉悟较高的分子）。对于凡在目前不愿入社的富裕中农，即新老中农中间的上中农，则不要勉强拉入。**目前许多地方发生强迫富裕中农入社，目的在打他们的耕畜农具的主意（作价过低，还期过长），实际上侵犯他们的利益，违反了“巩固地团结中农”的原则。而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我们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是决不可以违反的。**至于富裕中农中间资本主义思想浓厚的一些人，在目前一切合作社初办或者还不占优势的地方，不论是把他们拉进来，或者他们自己企图钻入合作社谋取领导地位（并非由于真正的政治觉悟），或者企图组织低级社如黑龙江双城县所发现的那样，对于树立贫农和下中农的领导地位都很不利（个别公道能干政治觉悟高的富裕中农，当然不在此例），而一切合作社是必须树立贫农和下中农的领导地位的。有人说，现在的提法似乎是放弃“依靠贫农巩固地联合中农”这个口号了，这是不对的，我们不是放弃这个口号，而是使这个口号按照新的情况加以具体化，即将新中农中间已经上升为富裕中农的人们，不算作依靠对象的一部分，而将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算作依靠对象的一部分，这是按照他们的经济地位和对于合作化运动是否采取积极态度来划分的。**这即是说，贫农和两部分下中农，相当于老贫农，作为依靠对象，而两部分上中农，则相当于老中农，作为巩固地团结的对象，而目前团结他们的办法之一，就是不要强迫他们入社，侵犯他们的利益。**

此外，关于在农村中依靠什么人的问题，还要明了几点。**我们首先应当依靠党团员**。我们区委以上的领导机关或者派到农村指导工作的干部，不去首先依靠农村中的党团员，而把党团员混同于非党团员群众，这是不对的。**第二，应当依靠非党群众中比较更积极一些的分子，**这种人应当占农村人口5%左右（例如一个2500左右人口的乡，应有这样的积极分子125人左右），我们应当努力训练出这样一批人，我们也不应当把他们混同于一般群众。**第三才是依靠一般贫农和两部分下中农的广大群众。这个依靠什么人和如何依靠法的问题不弄清楚，合作化运动就会犯错误。**

中央

毛泽东写完之后，将这个批语送给周恩来、陈伯达、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邓子恢传阅，并嘱咐说：

“如有不同意见，请少奇同志召集会议讨论一次，待我返京斟酌后再发。”

9月5日，毛泽东由北戴河返回北京。

9月5日晚，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颇具特色的关于在10月间召开党的七届六中全会的通知。他在通知中要求参加会议的上海局、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和区党委、地委的书记的发言，都要写成发言稿，并且根据各省地域的大小和各省、各地区合作化经验的多少，规定了各省委书记和地委书记发言稿的字数，而且还明确要求：

“发言内容主要讲合作化，应占字数十分之七之八左右，可以连带说一点粮食三定、社会镇反和建党整党等项工作的意见，连同召开‘八大’问题，总共占字数十分之二之三左右。发言内容应尽可能有较深刻的思想性，而以具体经验和计划数字充实和证明之。”

后来，毛泽东起草的这个通知稿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后，于9月7日正式发出。

9月6日，中共中央将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草案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章程试行草案印发给在京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各副秘书长、农村工作部各副部长和秘书长，征询修改意见。

9月6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草案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章程试行草案。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同陈伯达、胡乔木、廖鲁言对这两个草案进行了两次修改。

9月7日，毛泽东将他在9月4日晚为中共中央转发福建省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所写的批语略加修改，作为中共中央《农业合作化必须依靠党团员和贫农下中农》（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党内指示，发往全国各地。

在夏末秋初的一天，中国美术家协会副秘书长钟灵在中南海怀仁堂筹办全国第一届美展。毛泽东要亲自看一看美展。

那一天，钟灵去菊香书屋迎接毛泽东。毛泽东一见钟灵，就高兴地说：

“噢，钟灵啊，是你在办这件事！”

毛泽东来到怀仁堂，同工作人员一一握手，与大家交谈，在钟灵和美协领导蔡若虹、王朝闻、张谔等人陪同下，漫步于美展展厅。他逐幅观赏，十分仔细，指着一幅木刻问：

“木刻就是版画吧？”

旁边的王朝闻说：

“木刻只是版画的一种。”

王朝闻给毛泽东讲了版画的种类。毛泽东认真听着，时不时地点点头。

参观结束了，众人在送毛泽东上车时，毛泽东邀请蔡若虹、王朝闻、钟灵、张谔说：

“我请你们几位去当当参谋。”

不等众人表态，工作人员就把他们请上了车，直驶勤政殿而去。进了勤政殿西门，只见贺龙、聂荣臻、徐向前、罗荣桓、叶剑英等人都在这里。毛泽东对贺龙等人说：

“我请来了几位美术家，也听听他们的意见。”

原来，人民解放军即将实行军衔制，今天是军委领导在这里审定军服的式样。毛泽东请钟灵等人来，是让他们以美术家的眼光审视一下军服。毛泽东和大家一起来到军服陈列厅，边看边议。贺龙指着北洋军阀的服装说：

“这种服装太难看，不能仿照。”

众人来到新式军服展柜前，彭德怀说：

“样子嘛，是见过的了，今天就是要看看穿起来怎么样，有没有一点威武之师的气派！”

一位领导指着新式军服的军官肩章说：

“这肩章倒是挺漂亮的，但是戴上它就不好参加劳动了，一挑担子，一背筐不就压坏了。”

贺龙说：

“你就不能脱下军服再劳动吗？”

一句话说得大家哈哈大笑。军衔办公室负责人李平将毛泽东引领到身穿大元帅服的模特前。毛泽东一边抽烟，一边打量着“大元帅”。李平说：

“主席，这是大元帅服。”

毛泽东脸上露出了不以为然的样子，诙谐地说：

“大元帅？你靠边站吧！”

他指着其它新式军服问钟灵等人：

“以你们美术家的眼光看这军服式样如何？”

钟灵等人都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意见。毛泽东最后对众人说：

“要从节约的原则出发，样式好看、统一、正规，又要节约。”

就这样，实行军衔制的新式服装算是审定了。

按照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干部部制定的初步方案，以毛泽东为大元帅，周恩来、刘少奇在元帅之列，李先念、谭震林、邓子恢、张鼎丞也在大将之列。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宋任穷和副部长赖传珠随着彭德怀、罗荣桓（总干部部部长、总政治部主任）来向毛泽东汇报授衔授勋工作。毛泽东听完汇报后说：

“你们搞评衔，是很大的工作，也是很不好搞的工作。**我这个大元帅就不要了，让我穿上大元帅制服，多不舒服啊！到群众中去讲话、活动，多不方便啊！**依我看呀，现在地方工作的，都不要评军衔为好！”

毛泽东指着周恩来、刘少奇说：

“总理和少奇同志，你们在部队搞过，也是元帅。”

刘少奇见毛泽东已经发表了意见，就说：

“不要评了。”

毛泽东又问周恩来：

“你的元帅军衔，还要不要评啊？”

周恩来连忙摆手说：

“不要评了，不要评了。”

毛泽东又转身问几位过去长期在军队担任领导职务，后来到地方工作的邓子恢、张鼎丞等人说：

“你们几位的大将军还要不要评啊？”

邓子恢等人也都说：

“不要评了。”

在讨论元帅问题提到粟裕时，毛泽东说：

“我看粟裕可以授元帅军衔。战功、资历、品德、才干、威望，粟裕都够当元帅。解放战争时期，谁不知道华东战场的粟裕，蒋介石的几大金刚谁不害怕粟裕！”

刘少奇说：

“抗日战争时期粟裕领导的苏中根据地和1师，在新四军中打的仗最多，消灭的敌人最多。”

朱德说：

“解放战争5年的任务3年提前完成，粟裕的功劳很大啊！他指挥打的大仗最多，消灭蒋介石的军队最多，给军委提出的好建议最多。”

有人提出异议说，解放战争时期粟裕是华东解放军副司令。毛泽东马上纠正说：

“粟裕两让司令，品德高尚，全军有名。1948年中央已经决定粟裕担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他再三请求中央把陈毅留在华野，实在不成，最后提出陈毅在华野的职务保留。中央只好同意。他当了华野的代司令员兼代政委，实际做的工作，担的责任与司令员兼政委没有两样。”

周恩来说：

“可是粟裕已经提出请求辞帅，态度很诚恳。他说，我党我军许多老前辈在，他们资历更老，威望更高，贡献更大，应该首先考虑他们，有利于全党全军团结。”

毛泽东一听此话被深深地感动了，他说：

“两让司令，再辞元帅，粟裕高风亮节！”

周恩来建议说：

“粟裕不当元帅，大将还是要当的。”

毛泽东依然在激动着，他说：

“而且是第一大将！”

会议最后决定：授10位元帅，10位大将。粟裕居大将之首。

许光达得知自己被授予大将军衔，接连3次提出要求降低军衔的申请书，军委一致意见不予批准。许光达在申请书中写道：

军委毛主席、各位副主席：

授我以大将衔的消息，我已获悉。这些天，此事小锤似地不停地敲击心鼓，我感谢主席和军委领导对我的高度器重。高兴之余，惶惶难安。我扪心自问：论德、才、资、功，我佩戴4星，心安神静吗？此次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功绩授勋，回顾自身历史，1925年参加革命，战绩平平。1932年至1937年，在苏联疗伤学习，对中国革命毫无建树；而这一时期是中国革命最艰难困苦的时期：蒋匪军数次血腥的大围剿，3个方面军被迫做战略转移；战友们在敌军层层包围下，艰苦奋战，吃树皮草根，献出鲜血生命；我坐在窗明几净的房间吃牛奶面包。自苏联返回后，有几年是在后方。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列里，在中国革命的事业中，我究竟为党为人民做了些什么？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实事求是地说，是微不足道的。不要说同其他大将们比，心中有愧，与一些年资较深的上将比，也自愧不如。为了心安，为了公正，我曾向贺副主席面请降衔。现在我诚恳地慎重地向主席、各位副主席申请：授我上将衔。另授功勋卓著者以大将。

许光达 1955年9月10日

毛泽东在军委会议上，举着许光达的降衔申请书，对朱德、彭德怀、贺龙等人说：

“这是一面明镜，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

毛泽东越说越激动，他大步走到窗下，双手推开两扇窗户，说道：

“500年前，大将徐达，二度平西，智勇冠神州；500年后，大将许光达，几番让衔，英名天下扬。”

后来在1965年军队取消军衔制时，许光达坚持把自己应定的行政4级降为行政5级。

这个时期让衔的还有董其武，当他得知要给他受上将衔，就找到杨成武说：“杨司令，你是有功，我是有罪；你当上将，我不能当上将。我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请你帮我转递一下，无论如何我不能当上将。”**杨成武将董其武的信交给毛泽东，毛泽东看了以后说：“成武啊，你告诉董其武两句话：杨成武是共产党员，当不当上将无所谓。董其武一定要当上将。”**杨成武向董其武传达了毛泽东的两句话，董其武痴痴地望着杨成武，嘴角抽动着，泪水像小河一样往下淌，终于控制不住情绪，嚎啕大哭起来。

第二天，杨成武在中南海紫光阁参加国防委员会会议，见到了傅作义，他问：“傅先生，昨天董其武先生的事，你知道不知道？”傅作义激动地说：“知道了，知道了。我也只有两句话：毛主席伟大，共产党伟大！董其武昨天晚上在我那里折腾了一夜，又哭又笑，反复讲的就是这两句话。”

关于中将问题，毛泽东看了初步方案，说：

“中将定得多了，年轻的同志以后还有机会。”

总干部部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进行了调整，把卢仁灿的名字从拟定的中将部分移到少将里面。卢仁灿没有任何怨言。有人为自己的军衔找过领导，甚至上书中央，也有人替卢仁灿打抱不平，说在海军的将军里论起来，卢仁灿的年龄的确算年轻，但是，他的资历不浅、能力不低。

按照条件，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干部部副部长徐立清，应当授予上将军衔，因需要减少上将名额，他提出自己是主抓授衔工作的人，不能近水楼台先得月，要求降为中将。彭德怀几次找徐立清谈话，徐立清都坚持把自己降为中将。在兵团级干部中，他是仅有的几名中将之一。

总干部部根据皮定均的资历和历史职务，在初步方案中把他定为少将军衔。毛泽东一直记着皮定均在解放战争中，率领中原军区第1纵队第1旅，孤军千里突围的赫赫战功，他在审批时，大笔一挥，在皮定均的名字下面写了6个字：“皮有功，少晋中。”

孙毅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

“我只有从劳之苦，而乏建树之功，在评衔时要宁低勿高，授我少将足矣。我投身革命决不是为了升高官、要厚禄。”

军委考虑到孙毅资深望重，还是决定授予他中将军衔。

此一时期，与让衔的领导人相反，在一些人眼里，授衔就如同梁山好汉一百单八将排座次一样重要，有人哭了，有人笑了。毛泽东听说了这些情况，很不高兴地说：

“我们军队中有些人，打仗时连命都可以不要，现在为了肩上一颗星，硬是要争要闹，有什么意思？哪像共产党！”

朱德笑笑说：

“肩上少了一颗豆，脸上不光彩，回家没法向老婆说呀。”

毛泽东叹了口气，说：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评衔时。粟裕两让司令再辞帅，高风可嘉！”

欲知授衔情况如何，请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东方翁曰：本传从抗日战争初期一直到新中国建立后，按照历史发展顺序，先后叙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高级负责人多次要求军队授衔的整个过程。到1955年9月间，他们的要求总算有了结果，只待日后宣布、换装、分等级了。

当兵吃粮，论功授衔，光宗耀祖，这是中国军人几千年的追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人也不例外。从北伐时期的革命军，到后来的工农革命军，再到红军，一直到八路军、解放军、志愿军，经历了数十年的各类战争，那些领导者们终于从被统治阶级转化为统治阶级，坐上了自己的江山。如今按功分等级，论资加军衔，本也无可厚非，何况苏联老大哥早就这样做了。毛泽东不是不通“情理”的人。**尽管他创建这支军队的初衷是要指挥员和战斗员一律平等，几十年来在军中禁忌使用“官”这个词，更不要说“划分等级”了**。可是现在毕竟是江山稳固了，经济复苏了，面对着自己亲手培养起来的功臣们的请求，已经没有任何托辞了。他的“猴气”不得不再一次表现出来，那就论资排辈分等级吧。毛泽东认为，目前的革命还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以后的路还更长、更艰巨。因此，妥协是必要的，也是暂时的。以后一旦时机成熟，他的“虎气”还会占上风的。诸君如若不信，那就请看他后来是如何命令将军轮流下连队当兵、进而取消军衔制的吧！

**第17章**

**“对青年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必须紧密结合当前的阶级斗争来进行，必须注意**

**以阶级斗争的活人活事来教育青年，逐步培养青年具有工人阶级的立场和思想，**

**成为对敌人的无限憎恨、对劳动人民和共产党无限忠诚和热爱的战士。”**

话说在1955年9月10日，毛泽东为中央转发河北省委关于农业合作化规划和农业增产规划的报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

现将河北省委9月1日关于农业合作化规划和农业增产规划一件，发给你们参考。中央认为河北省委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个报告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除合作化规划之外，作了全省的农业增产规划，请你们着重地加以研究。**中央要求全国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一律仿照河北办法（安徽省委早几年就注意这个问题了，只是在最近的合作化报告上没有写上这一部分）对自己区域的农业增产问题，经过研究，做出全面的规划，报告中央，是为至要。

中央 1955年9月10日

9月11日晚，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草案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章程试行草案。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继续审阅修改后的决议草案，一直到12日清晨4时才审阅完毕。他接着写了一个批示，要刘少奇、陈云、邓小平、陈伯达在12日将决议草案看完，尔后由杨尚昆立即把它印发给在京中央委员等人，并同时派飞机分送各省市区党委，征求修改意见，要求他们在月底来京参加七届六中全会时把修改意见带来。

9月13日下午，毛泽东同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听取李先念关于召开9省粮食会议的汇报。

9月14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去了北戴河。

9月15日，毛泽东开始着手编辑《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书。

此时的北戴河，秋风中已带有几丝寒意，但毛泽东游泳的兴致依然很高，他每天都要下海，风雨无阻。

有一天，天上下着瓢泼大雨，海面上被狂风卷起的巨浪有一人多高，毛泽东还是坚持下海游了10分钟。

9月16日，毛泽东为中央批转青年团中央书记处《关于开展培养青年共产主义道德、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工作的总结报告》写了一个给各地党委的指示：

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组，总政治部转军事系统：

兹将青年团中央书记处《关于开展培养青年共产主义道德、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工作的总结报告》转发你们。在党委的领导下，青年团组织协同有关方面所进行的培养青年共产主义道德、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宣传教育工作是有成绩的，它不仅在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及其生活方式对青年的侵蚀方面起了显著作用，而且通过这一工作打击了社会上勾引青年犯罪的资本主义势力及其他腐朽势力，引起了社会上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对于教育青年的重视，推动了青年团组织注意改进对青年的思想教育工作。所有这些，都为今后经常地、有系统地结合各项实际斗争来培养青年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创造了有利条件。

必须充分认识在社会主义革命斗争中青年工作的重要性。**敌对阶级及反革命分子和我们争夺青年的斗争，无论城市或农村都是十分剧烈的。同时，青年队伍本身也是复杂的，有各种不同阶级出身的青年，有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曾受过国民党的教育，并有反革命分子和阶级敌对分子，阶级斗争在青年中间也必然会得到尖锐的反映。**因此，**对青年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必须紧密结合当前的阶级斗争来进行，必须注意以阶级斗争的活人活事来教育青年，逐步培养青年具有工人阶级的立场和思想，成为对敌人的无限憎恨、对劳动人民和共产党无限忠诚和热爱的战士。**

青年团组织应在巩固和发扬这次道德教育成果的基础上，改进工作作风，进一步密切和青年群众的联系，从各方面改善对青年的共产主义教育，特别是进一步开展各项有益于培养教育青年的实际活动。

附青年团中央书记处原报告。

（本件及附件可登党刊。）

中央 1955年9月16日

9月25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为《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写好了一篇序言，即序言一（参看《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全文如下：

**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内，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是：基本上完成国家的工业化，同时对于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的改造。这个过渡时期大约需要18年，即恢复时期的3年，加上3个‘五年计划’。**在我们党内，**对于这个总路线的提法和时间的规定，从表面上看，大家都是同意的，但是在实际上是有不同意见的。这种不同意见，在目前，主要地表现在关于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上。**

有些人说，在农业合作化的问题上，几年以来，似乎可以看出这样一条规律，即在冬季是提倡发展的，一到春季就有人反冒进。这个说法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看见已经反过几次所谓冒进了。例如，1952年冬季有一个发展，1953年春季就来了一个反冒进；1954年冬季有了一个发展，1955年春季又来了一个反冒进。**所谓反冒进，不但是停止发展，而且是成批地强迫解散（一名“砍掉”）已经建成的合作社，引起了干部和农民群众的不满意。有些农民气得不吃饭，或者躺在床上不起来，或者十几天不出工。他们说：“叫办也是你们，叫散也是你们。”**叫散，富裕中农高兴，贫农发愁。湖北的贫农听了停或散的消息，感到“冷了半截”，有些中农则说，“等于朝了一次木兰山”（湖北黄陂县有一个木兰山，山上有一个农民高兴去朝拜的木兰庙）。

为什么有些同志会发生这种在常人看来完全不应该有的动摇呢？因为他们受了一些中农的影响。有一些中农，特别是有严重的资本主义倾向的富裕中农，在合作化的初期，对于社会主义改造这件事是有抵触情绪的。这里关系到党在合作化运动中对于中农的政策和工作方法。许多经济地位较低政治觉悟较高的中农，主要地是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和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只要我们实行对于贫农和中农这两个阶层互相有利，而不是只利于贫农不利于中农的政策，加上我们的工作方法是好的，他们就愿意加入合作社。但是有一些中农，即使实行这种政策，他们也还是想暂时站在社外，“自由一两年也好”。这种情况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合作化是要变更农民的私有生产资料的制度和整个的经营方法，这对于他们是一个根本的变化，他们当然要审慎考虑，在一个时期内不容易下决心。我们的一些同志不去从党的政策和工作方法上解决问题，听了富裕中农一叫，工作中又有一些偏差，就惊惶失措起来，大反其“冒进”，动不动就要“砍掉”合作社，好像如果不赶快割去这个毒瘤，人就会要死了似的。**实际的情况完全不是这样。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是有的，但是整个的运动是健康的。广大的贫农和下中农欢迎合作社。一部分中农需要看一看，我们就应当让他们看一看。富裕中农，除了那些自愿的以外，更应当让他们看的时间长一些。目前，在这个问题上的主要的缺点，是在很多的地方党的领导没有赶上去，他们没有把整个运动的领导拿到自己的手里来，没有一省一县一区一乡的完整的规划，只是零敲碎打地在那里做，他们缺乏一种主动的积极的高兴的欢迎的全力以赴的精神。这样，就发生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下面运动很广，上面注意不足，当然要闹出一些乱子来。我们看了这些乱子，不是去加强领导和加强计划性，而是消极地企图停止运动的前进，或者赶快“砍掉”一些合作社。这样做，当然是不对的，必然要闹出更多的乱子来。

我们现在编了一本书，叫作《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这本书里所收的，都是各省、市、区的实际例子，共有120几篇。这些材料的绝大部分，是1955年1月至8月的，一小部分是1954年下半年的。这些材料的绝大部分，是从各省、市、区的党内刊物上取来的，有几篇是从报纸上取来，有几篇是下级党委或者工作同志向上级党委的报告，有一篇是请了一个合作社社长到北京谈话的记录。对于这些材料，我们只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内容都照原样。在一部分材料上，我们写了一点按语。为了区别于在有些材料上原来刊物的编者所写的按语，我们写的按语，用了“本书编者”的名义。我们认为所有这些材料的作者所表示的观点是正确的，或者是基本上正确的。读者从这些材料，可以看出全国合作化运动的规模、方向和发展的前景。这些材料告诉我们，运动是健康的。出乱子的地方都是党委没有好好去指导。一待党委根据中央的方针跑上去做了适当的指导，那里的问题就立即解决了。**这些材料很有说服力，它们可以使那些对于这个运动到现在还是采取消极态度的人们积极起来，它们可以使那些到现在还不知道怎样办合作社的人们找到办合作社的方法，它们更可以使那些动不动喜欢“砍掉”合作社的人们闭口无言。**

**在几万万农民中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是一件了不起的工作。**就全国来说，时间还不算很久，经验还不算很多。特别是我们还没有在全党进行一次广泛有力的宣传工作，这就使得很多的同志对于这个问题没有提起注意，不明了这个运动的方针、政策和办法，使得党内的意志还不统一。现在我们党的六中全会很快就要开会讨论这个问题，即将作出关于这个问题的新的决议。我们应当根据这个决议做一次广泛有力的宣传工作，使得全党的意志统一起来。这本书的出版，对于这一次宣传工作，可能是有些帮助的。

毛泽东 1955年9月25日

这一天，毛泽东从北戴河返回到北京。

9月26日，毛泽东在中央农村工作部9月20日的检讨报告上写了5个批语，摘要如下：

一、刘、周、陈、朱、彭真、小平、伯达、鲁言即阅，退邓子恢同志。

毛泽东 9月26日

请各同志即阅，子恢催要此件。

二、三（略）四、为什么老是去挫折社会主义因素，而老是不喜欢去挫折资本主义因素？你们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回答应是：**你们脑子里藏着相当严重的资本主义思想，所以你们觉得社会主义因素没有什么可爱，忍心地去挫折他。**

五、这样讲不真实。**实际上你们有一条路线，有一个方针，而这是和中央的路线和方针相抵触的，所以在长时间内中央总是不能说服你们，即使经过严重的批评还是说不通**，还是要坚持你们自己的东西。直到8月1号的会议才开始认真地转变过来，是否彻底也还是问题。所以**不是什么“对中央意见不够尊重”，而是根本不尊重。不是“不善于抓住任何一种微小的分歧意见”的问题，而是中央同志对你们的严重的批评，书记处和政治局对你们提议的否决，都不愿意接受，**何况你们部内一些同志的意见，他们对你们有什么办法呢？你们会理睬这些小人物吗？**这是同全国农村中大量的普遍的积极因素不能影响你们，你们只愿意接受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影响这一点直接地联系着的。**这一点，在第3条内你们已承认了。这是应当好好地想一想的：**占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影响了你们，占百分之六十至七十的贫农和下中农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你们却熟视无睹，敢于抹杀，敢于“与此相反，而不是去爱护而是去挫折它”，难道这是偶然的吗？**

9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通过了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决议；同时决定授予一批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上将、中将、少将军衔。

这天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休息室里和将被授予元帅衔的朱德、彭德怀、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人，正在海阔天空地谈笑风生，只有林彪一个人郁郁寡欢、一言不发，蜷曲在柔软的沙发上。毛泽东走近他身旁，关切地问他的身体如何？林彪说：身体很差，怕光、怕风，怕水，怕声音，见风感冒，见水拉稀。

后来，毛泽东指示卫生部副部长、军委总卫生部副部长及中华医学学会会长傅连暲，组织专家为林彪做一次全面细致的检查和会诊。会诊前，林彪让叶群出面，暗示傅连暲为林彪开一张生病的证明。傅连暲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在会诊后说林彪无大病，应该多进行一些户外活动。他还关切地劝林彪，一定要戒掉用吗啡的习惯；要治病，有别的办法，吸毒是万万要不得的。林彪由此对傅连暲忌恨在心。

傅连暲如实地向毛泽东做了汇报，说在林彪身上没有发现重要器官的严重器质性病变，许多症状与精神因素有关。毛泽东得知林彪的病情并不十分严重，一时沉吟不语。他为了鼓励林彪，曾特意抄录曹操的《龟虽寿》一诗赠给林彪，希望他振奋精神，有所作为。

且说在9月27日下午5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衔授勋典礼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典礼局局长余心清宣布典礼开始，军乐队奏国歌。人大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彭真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命令。

毛泽东将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命令状，一一授予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10人。

彭真又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勋章的命令。被授予勋章的人员共千余人，仅宣布命令就用了30分钟。

毛泽东为10大元帅授衔后，又亲自为在京的将官们授勋，授予傅作义、董其武、陶峙岳等人一级解放勋章。董其武心中极不平静，连声说：

“感谢毛主席、周总理对我的教育和培养，感谢你们的恩情。”

毛泽东手捧一级解放勋章走到少将李贞面前时，李贞想跟毛泽东说几句话，却激动得说不出来。周恩来赶紧说：

“祝贺你，李贞同志，你是我们中国的第一位女将军啊！”

9月27日晚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在国务院礼堂隆重举行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官军衔的授衔典礼。

全国人大常委会典礼局局长余心清宣布典礼开始，军乐队奏国歌。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官军衔的命令。

授予10大将军衔的是：粟裕 徐海东 黄克诚 陈赓 谭政 萧劲光 张云逸 罗瑞卿 王树声 许光达

授予55人上将军衔，按姓氏笔画排列，他们是：王平 王震 王宏坤（海军） 王新亭 韦国清 乌兰夫 邓华 叶飞 甘泗淇 吕正操 朱良才 刘震（空军） 刘亚楼（空军） 许世友 苏振华 李达 李涛 李天佑 李志民 李克农 杨勇 杨至成 杨成武 杨得志 萧华 萧克 宋任穷 宋时轮 张宗逊 张爱萍 陈士榘 陈再道 陈伯钧 陈明仁 陈奇涵 陈锡联 周桓 周士第、周纯全 赵尔陆 洪学智 钟期光 贺炳炎 郭天民 唐亮 陶峙岳 阎红彦 黄永胜 谢富治 董其武 彭绍辉 韩先楚 傅钟 傅秋涛 赖传珠

（后来王建安在1956年、李聚奎在195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上将人数上升至57人。）

授予177人中将军衔，按照姓氏笔画排列，他们是：丁秋生 万毅 王诤 王必成 王近山 王尚荣 王宗槐 王秉璋 王恩茂 王道邦 王辉球 王紫峰 韦杰 文年生 方强 方正平 邓逸凡 孔从洲 孔石泉 孔庆德 甘渭汉 卢胜 田维扬 邝任农 皮定均 成钧 毕占云 匡裕民 朱明 朱辉照 向仲华 庄田 汤平 刘飞 刘忠 刘少文 刘西元 刘兴元 刘先胜 刘志坚 刘转连 刘金轩 刘昌毅 刘浩天 刘培善 刘道生 孙毅 孙继先 朵噶·彭措饶杰 杜平 杜义德 杨秀山 杨国夫 杨梅生 苏静 李耀 李天焕 李成芳 李寿轩 李作鹏 李雪三 萧向荣 萧望东 萧新槐 旷伏兆 吴先恩 吴克华 吴法宪 吴信泉 吴福善 吴瑞林 何德全 邱会作 邱创成 余立金 余秋里 张震 张藩 张才千 张天云 张仁初 张令彬 张达志 张池明 张贤约 张国华 张经武 张南生 张祖谅 张翼翔 陈康 陈仁麒 陈正湘 陈庆先 陈先瑞 阿沛·阿旺晋美 林维先 范朝利 欧阳文 欧阳毅 罗元发 罗舜初 周彪 周仁杰 周玉成 周希汉 周志坚 周赤萍 周贯五 冼恒汉 郑维山 胡奇才 赵镕 赵启民 钟汉华 钟赤兵 饶子健 饶正锡 饶守坤 姚喆 贺诚 秦基伟 袁子钦 袁升平 莫文骅 聂凤智 聂鹤亭 顿星云 晏福生 钱钧 倪志亮 徐立清 徐深吉 徐斌洲 郭鹏 郭化若 唐天际 唐延杰 陶勇 黄火星 黄志勇 黄新廷 曹里怀 常乾坤 崔田民 康志强 阎揆要 梁从学 梁必业 梁兴初 韩伟 韩练成 韩振纪 彭林 彭明治 彭嘉庆 覃健 程世才 傅连暲 温玉成 曾绍山 曾泽生 曾国华 曾思玉 谢有法 赖毅 鲍先志 詹才芳 蔡顺礼 廖汉生 廖容标 谭甫仁 谭希林 谭冠三 谭家述 赛福鼎·艾则孜 滕海清

（其中有两人是后来授予的。）

授予800人为少将军衔，其中有：丁盛 马宁 王猛 王新 王六生 王良太 王砚泉 王蕴瑞 王耀南 尤太忠 邓岳 甘祖昌 叶运高 向守志 刘丰 刘镇 刘华清 刘振华 江腾蛟 李贞（女） 李觉 李真 李水清 李丙令 李德生 李耀文 萧全夫 吴忠 汪洋 汪东兴 张廷发 张树芝 张耀祠 陈坊仁 陈其通 钱信忠 郭林祥 傅崇碧 栗在山 康健民

（后来，少将中有2人晋升为中将，另授560名少将。到文化大革命前夕，中华人民共和国先后总共授少将以上将军衔1614人，其中有原国民党军官159名。）

在800名少将中，还有一位传奇人物，不得不在此做一简单交代。他就是袁也烈。1899年，他出生于湖南省武冈州（今洞口县金田乡袁家垅）。1921年8月，袁也烈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在校期间，他听过毛泽东关于《共产党宣言》的演讲。1924年7月，袁也烈考入桂林军官学校，后投奔黄埔军校，任政治部秘书股干事，成为林彪的老师。在北伐时，林彪还是袁也烈手下的一个见习排长。袁也烈入党的时候，彭德怀和贺龙还没有入党。在黄埔军校当教官，他的名气比徐向前还大。在南昌起义时，身为营长的他，因误会“俘虏”过教导团团长朱德，下了朱德的枪。

1931年2月，红七军北上江西与中央红军会合，在广东乳源县梅花村遭敌袭击，袁也烈身负重伤。在组织的安排下，袁也烈到上海养伤，1931年5月，被英国巡捕逮捕入狱。在狱中，敌人施以酷刑，袁也烈忠贞不屈，没有动摇自己的革命信念。敌人只好以“危害民国罪”把他关进了提篮桥监狱。在监狱里，敌人还试图拉拢他，表示只要他写下“悔过书”，就可以释放他。袁也烈断然拒绝：“我无过可悔”。无奈的国民党反动派又把他押到苏州反省院关押一年之久。袁也烈前后被关押了6年，直到抗战爆发才被释放出狱。他被安排在地方工作，直到1942年才又回归部队，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1953年2月23日，毛泽东主席视察华东海军，与袁也烈政委、司令员陶勇进行了亲切的谈话。1955年9月，袁也烈被授予少将军衔和一级“独立自由”勋章。

再说授衔工作，周恩来分别把大将、上将、中将、少将军衔的命令状，一一授予粟裕、徐海东等在京将官。

徐海东主动提出受之有愧，高了。周恩来说：

“海东同志，授你大将军衔，不高也不低，恰当。”

9月28日，国防部举行授衔典礼，国防部长彭德怀授予在京部分校级军官军衔。

后来从11月开始到1956年初，各军兵种和各军区的授衔典礼，相继在各领导机关所在地举行，贺龙、聂荣臻、叶剑英以及其他高级将领，代表中央军委、国务院和国防部，分别授予各单位将官、校官和尉官军衔。贺龙代表毛泽东授予邓宝珊一级解放勋章。

同时，各部队还举行了授予军士和兵军衔的典礼。

1955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周年的纪念日，首都军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盛大的集会和阅兵仪式。

这一天，所有登上天安门城楼或观礼台的军人，参加阅兵的部队，都换上了新的制式军装，分别佩戴了从元帅、将军到校、尉、列兵不同的军衔肩章。

毛泽东仔细地端详着身穿大将军服、佩戴大将军衔的粟裕，亲切地说：  
 “我们的粟总长一身戎装，气度不凡。新中国成立6周年了，解放军应该改一改战争年代的土气了。”

粟裕笑笑说：

“穿着这样一身服装，很不习惯！”

周恩来说：

“慢慢就习惯了。这是形势发展的需要啊！”

由于受浓云影响，受阅飞机延迟原定起飞时间，后与群众游行队伍同时通过天安门广场。

10月4日，毛泽东给周世钊回复了一封信，并寄去了一首和诗。

原来，周世钊在6月20日陪同毛泽东游览岳麓山后，写出了一篇题为《难忘的一天》的日记和几首诗。后来，他给毛泽东寄来了一封信和他所作的几首诗，其中有一首题为《七律·从毛主席登岳麓山至云麓宫》，诗云：

滚滚江声走白沙，飘飘旗影卷红霞。直登云麓三千丈，来看长沙百万家。

故国几年空兕虎，东风遍地绿桑麻。南巡已见升平乐，何用书生颂物华。

毛泽东接到周世钊的来信和诗作后，因国事繁忙，一直未回复。直到10月4日这一天，才写了这封回信，他写道：

惇元兄：

惠书早已收读，迟复为歉。承录示程颂万遗作，甚感，并请向曹子谷先生致谢意。校额诸件，待暇当为一书，近日尚未能从事于此。读大作各首甚有兴趣，奉和一律，尚祈指正。

春江浩荡暂徘徊，又踏层峰望眼开。风起绿洲吹浪去，雨从青野上山来。

尊前谈笑人依旧，域外鸡虫事可哀。莫叹韶华容易逝，卅年仍到赫曦台。

顺问近佳！

毛泽东 1955年10月4日

毛泽东诗中的“卅年仍到赫曦台”一句，是指他在1925年自韶山赴广州，途经长沙，曾游岳麓山一带，作《沁园春·长沙》；到1955年重登岳麓山，恰好间隔30年。

10月4日这一天，中国共产党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在北京怀仁堂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38人，候补中央委员25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和各地委书记、中央各部委和国家机关各部门党组负责人等388人列席了会议。

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农业合作化问题；讨论关于召开党的“八大”的问题。

毛泽东主持了会议。

全会听取了陈伯达代表中央政治局所作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邓小平代表中央政治局所作的《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的说明》。

全会对上述两项议程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德怀、彭真、邓小平等80人发了言，还有167人作了书面发言。

湘潭地委书记华国锋在会议上介绍湘潭地区合作化运动的经验。一位地委书记，列席中央全会并讲话，不能不说是一种特殊的待遇。

此前，华国锋曾先后写出了《克服右倾思想，积极迎接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的到来》、《充分研究农村各阶层的动态》、《在合作化运动中必须坚决依靠贫农》3篇报告。这些来自故乡的报告，毛泽东读起来尤感亲切。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注意到华国锋的名字；也是安排他在这次全会上发言的主要原因。

在全会上发言的人们一致拥护毛泽东一再修改的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报告：《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批评了邓子恢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出现的右倾错误；一致主张加快发展农业合作化。朱德说：

“我听到同志们的讲话都很有信心，叫我这个素来乐观的人更加乐观了。我估计在全国农村中基本上完成合作化，可能会比中央预定的速度要快些。”

刘少奇也说：

“根据各省委地委同志对农业合作化所作的规划的报告，**大约将在今后3年至4年内基本上完成全国半社会主义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发展的速度，可能大大超过我国‘五年计划’中所规定的合作化的速度，也可能超过毛泽东同志在7月31日报告中所提出的速度。”**

邓子恢在发言中作了检讨。

10月11日，毛泽东在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上作了题为《关于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参看《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总结讲话。他说：

“**我们这次会议，是一场很大的辩论。这是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期间，关于我们党的总路线是不是完全正确这样一个问题的大辩论。这场全党性的大辩论，是从农业合作化的方针问题引起的，同志们的讨论也集中在这个问题上。**但是，这场辩论牵涉的面很广，牵涉到农业、工业、交通、运输、财政、金融、贸易、文化、教育、科学、卫生等部门的工作，牵涉到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牵涉到镇压反革命，还牵涉到军队，牵涉到外交，总之，牵涉到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工作。应当有这么一次大辩论。因为从总路线发布以来，我们的党还没有这样一次辩论。这个辩论，要在农村中间展开，也要在城市中间展开，使各方面的工作，工作的速度和质量，都能够和总路线规定的任务相适应，都要有全面规划。”

关于农业合作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关系，毛泽东说：

“农业合作化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关系问题，即在大约3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基本上完成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在同一时期内基本上完成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关系问题，也就是农业合作化和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

我们认为，**只有在农业彻底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在新的基础上，就是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逐步地巩固起来，才能够彻底地割断城市资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系，才能够彻底地把资产阶级孤立起来，才便于我们彻底地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我们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是要在农村这个最广阔的土地上根绝资本主义的来源。**

现在，我们还没有完成农业合作化，工人阶级还没有同农民在新的基础上结成巩固的联盟，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还是动荡不定的。过去我们同农民在土地革命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那个联盟，现在农民不满足了。对那一次得到的利益，他们有些忘了。现在要有新的利益给他们，这就是社会主义。现在，农民还没有共同富裕起来，粮食和工业原料还很不充足。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就可能在这个问题上找我们的岔子，向我们进攻。几年之后，我们会看到完全新的形势：工人阶级和农民在新的基础上结成比过去更加巩固的联盟。

以前那个反地主、打土豪、分田地的联盟是暂时的联盟，它巩固一下又不巩固了。在土地改革后，农民发生了分化。如果我们没有新东西给农民，不能帮助农民提高生产力，增加收入，共同富裕起来，那些穷的就不相信我们，他们会觉得跟共产党走没有意思，分了土地还是穷，他们为什么要跟你走呀？那些富裕的，变成富农的或很富裕的，他们也不相信我们，觉得共产党的政策总是不合自己的胃口。结果两下都不相信，穷的不相信，富的也不相信，那么工农联盟就很不巩固了。**要巩固工农联盟，我们就得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起来，穷的要富裕，所有农民都要富裕，并且富裕的程度要大大的超过现在的富裕农民。只要合作化了，全体农村人民会要一年一年地富裕起来，商品粮和工业原料就多了。**那个时候，资产阶级的嘴巴就被堵住了，资产阶级将发现自己处于完全孤立的地位。

**我们现在有两个联盟：一个是同农民的联盟，一个是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这两个联盟对我们都很必要，恩来同志也讲了这个问题。同资产阶级的联盟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可以得到更多的工业品来换得农产品。十月革命后有一个时期，列宁就打这个主意。因为国家没有工业品去交换，农民就不拿粮食出来，单用票子去买他不干，所以列宁打算让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和国家资本主义结成联盟，为的是增加工业品来对付农村中的自发势力。我们现在搞一个同资产阶级的联盟，暂时不没收资本主义企业，对它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也就是为了搞到更多的工业品去满足农民的需要，以便改变农民对于粮食甚至一些别的工业原料的惜售行为。这是利用同资产阶级的联盟，来克服农民的惜售。同时，**我们依靠同农民的联盟，取得粮食和工业原料去制资产阶级。资本家没有原料，国家有原料。他们要原料，就得把工业品拿出来卖给国家，就得搞国家资本主义。他们不干，我们就不给原料，横直卡死了。这就把资产阶级要搞自由市场、自由取得原料、自由销售工业品这一条资本主义道路制住了，并且在政治上使资产阶级孤立起来。**这是讲这两个联盟的相互作用。这两个联盟，同农民的联盟是主要的，基本的，第一位的；同资产阶级的联盟是暂时的，第二位的。这两个联盟，在我们这样经济落后的国家，现在都是必要的。

土地改革，使我们在民主主义的基础上同农民结成了联盟，使农民得到了土地。**农民得土地这件事，是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它只破坏封建所有制，不破坏资本主义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这一次联盟使资产阶级第一次感到了孤立。**1950年，我在三中全会上说过，不要四面出击。那时，全国大片地方还没有实行土地改革，农民还没有完全到我们这边来，如果就向资产阶级开火，这是不行的。等到实行土地改革之后，农民完全到我们这边来了，我们就有可能和必要来一个‘三反’‘五反’。农业合作化使我们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基础上，而不是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基础上，巩固了同农民的联盟。这就会使资产阶级最后地孤立起来，便于最后地消灭资本主义。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是很没有良心哩！马克思主义是有那么凶哩，良心是不多哩，就是要使帝国主义绝种，封建主义绝种，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在这方面，良心少一点好。**我们有些同志太仁慈，不厉害，就是说，不那么马克思主义。**使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在6亿人口的中国绝种，这是一个很好的事，很有意义的好事。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要使它在地球上绝种，变成历史的东西。凡是历史上发生的东西，总是要消灭的。世界上的事物没有不是历史上发生的，既有生就有死。资本主义这个东西是历史上发生的，也是要死亡的，它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去，就是“睡”到那个土里头去。**

现在的国际环境有利于我们完成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我们要用3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我们一定要争取这个和平建设的时间。15年已经过了3年，再有12年就行了。看样子是可能争取的，要努力争取。我们应当在外事工作方面、国防建设方面加强努力。

在这个15年的期间内，国际国内的阶级斗争会是很紧张的。我们已经看见是很紧张的。在阶级斗争中，我们已经取得了许多的胜利，并且将要继续取得胜利。**拿过去一年国内的阶级斗争来说，我们主要做了4件事：一个是进行反唯心论的斗争，一个是镇压反革命，一个是解决粮食的问题，一个是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在这4个问题上的斗争，都带着对资产阶级作斗争的性质，给了资产阶级严重地打击，并且在继续给他们以粉碎性地打击。**

反唯心论的斗争，从《红楼梦》那个问题上开始，还批评了《文艺报》，以后又批判胡适，批判梁漱溟，已经搞了一年。我们要把唯心论切实地反一下，准备搞3个‘五年计划’。在反唯心论的斗争中间，要建立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的干部队伍，使我们广大干部同人民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武装起来。镇压反革命，准备今年和明年一年，在包括国营工厂、国营商业、合作社、县、区、乡各种组织，还包括军队的干部、工厂的工人在内，大概共1200万人的范围内，进行肃反工作。讲起反革命来，好像没有好多，看也看不见，一直有，确实有，现在就已经查出来一批。粮食问题上也打了一大仗。**资产阶级借口粮食问题向我们进攻，我们党内也有一股谣风，因此我们就展开了批评**。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我们进行过许多斗争，这次会议也是集中讨论这个问题。在这4个问题上，我们展开了巨大的斗争，打击了资产阶级的反抗和进攻，取得了主动。

资产阶级怕我们在这几个问题上对他们展开斗争，特别是怕镇压反革命。我们的镇反工作搞得好。这个工作要注意讲规格，没有规格那是很危险的。要合乎标准才叫反革命，就是要搞真反革命，不要搞出假反革命来。也要估计到，可能会出假反革命，说不出，那很难。但是，我们要求出少一点，尽可能不出假反革命。要完全合乎规格，货真价实，硬是真反革命，不要冤枉好人。同时，也可能漏掉一些真反革命。你说这次搞得那么干净，也不见得，漏掉是难免的，但是要尽可能少漏掉一些。”

关于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问题，毛泽东提出了防止“左”的倾向，他说：

“省（市、区）一级、地区一级、县一级，这3级必须时刻掌握运动发展的情况，一有问题就去解决。”“专门喜欢事后批评，缺乏临机应变的指导，这是不好的。如果遇到情况不对，怎么办呢？情况不对，立即刹车。或者叫停车。”“省、地、县都有刹车的权力。**必须注意防‘左’。防‘左’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机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说要‘左’倾，‘左’倾机会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

以后在发展合作社的工作上，我们要比什么呢？要比质量，比规格。数量，或者速度，有前面所说的那个规定就行了，重点是比质量。质量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要增加生产和不死牲口。怎样才会增加生产，怎样才会不死牲口？就是要遵守自愿互利的原则，要有全面规划，要有灵活的指导。”“我们务必避免苏联曾经犯过的大批杀掉牲口的那个错误。”“请你们各位注意，务必不要出大问题，不要发生死一批牛的事。因为我们现在拖拉机还很少，牛是个宝贝，是农业生产的主要工具。”

毛泽东在谈领导工作方法时，说到了他编辑《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书的情况，他说：

“我用11天功夫，看了120几篇报告、文章。先是请廖鲁言同志同农村工作部的同志他们看了一千几百篇，选了120几篇，然后我对这120几篇搞了11天，包括改文章写按语在内。我就‘周游列国’，比孔夫子走得宽，云南、新疆一概‘走’到了。”

毛泽东鉴于有些省委书记在会议上提出：《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中的材料已经过时了，应当补充新的材料，他说：

“《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你们可以带回去，看一看，把你们要增的材料送来，哪些应该抽掉的提出来，应该修改的地方加以修改，按语有不对的地方也提出来修改意见。限10月25日以前报送中央办公厅。”

关于思想斗争问题，毛泽东说：

“**中央农村工作部的一部分同志，首先是邓子恢同志犯了错误。他这一次所犯的错误，性质属于右倾的错误，属于经验主义性质的错误。邓子恢同志作了自我批评，虽然各小组会上有些同志觉得他讲得还不彻底，但是我们政治局的同志，还有一些同志，谈了一下，觉得基本上是好的。**在现在这个时候，他有了这样的认识，已经是好的了。邓子恢同志在过去长期革命斗争中做过许多工作，有成绩，应当肯定。”

在回答有人提出的“将来趋势”问题时，毛泽东说：

“在上一次党的代表会议上也讲过了，**大约在50年到75年的时间内，就是10个‘五年计划’到15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可能建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在50年到75年这个期间内，国际、国内、党内一定会发生许多严重的复杂的冲突和斗争，我们一定会遇到许多困难。**按照我们的经验，**我们这一辈子有过多少冲突，武装的，和平的，流血的，不流血的，你能说以后就没有？一定会有，不是很少，而是很多。这里面包括打世界大战，在我们头上甩原子弹，出贝利亚，出高岗，出张国焘、陈独秀。有许多事现在是没有法子料到的。但是，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可以肯定，一切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一定会出现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这是不是一定呢？我看是一定的。按照马克思主义，这是一定的。那个资产阶级已经给自己造好了掘墓的人，那个坟墓都挖好了，它不死呀？要讲趋势，比较粗枝大叶一点说，就是这么一种趋势。”**

正是：毛公前瞻发宏论，今人读来可惊心？

六十春秋铸铁证，“将来趋势”必成真！

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决议中写道：

“现在农村中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农业合作化的高潮即将到来。党面临的任务就是要大胆地和有计划地领导运动前进。1957年春以前，70 %到80％的参加合作社，即基本上实现半社会主义合作化。全国大多数地区，在1958年春以前，基本上实现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在新疆地区实现合作化则需要更多的时间才能基本完成。”

全会还通过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示范章程（草案）》，通过了《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关于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办法的规定》。

欲知七届六中全会后农业合作化运动发展的情况，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七届六中全会上的总结讲话实在是太深刻了，无论是他的结论，或是对未来的预见，都不能不使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在50年到75年这个期间内，国际、国内、党内一定会发生许多严重的复杂的冲突和斗争，我们一定会遇到许多困难”，“出贝利亚，出高岗，出张国焘、陈独秀”——**这还不够神奇吗？但是，革命绝对不会就此终结，因为，在**“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可以肯定，一切困难是可以克服的”，“按照马克思主义，这是一定的。那个资产阶级已经给自己造好了掘墓的人，那个坟墓都挖好了，它不死呀？”**这掷地有声的宣言，不正是劳苦大众的希望所在吗？！

**第18章**

**“全国统筹兼顾，这个力量大得很。资本主义私有制大大的妨碍统筹兼**

**顾，妨碍国家的富强，因为它是无政府性质的，跟计划经济是抵触的。”**

话说1955年10月13日，毛泽东为征求对《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第3次修正稿意见，给在京的10位中央政治局委员、8位副秘书长和邓子恢、陈伯达、廖鲁言写信，要求他们“收到后，即予审阅，提出修改意见”，并及时返回。关于第3次修正稿，他在信中写道：

“修改之处，主要是将原来的第2第3两节，合并为第2节；增加了解释工农联盟问题的第9节；在第2节中将落后乡除外一句改为一部分边疆地区除外；在第3节中将河北省的例子删去一部分；在第5节中，在谈社员成份问题的第1第2行和谈地主富农是否可以入社的那几行都作了一些修改，将第10节中谈地富入社的那几句删去；在第10节和第11节中也各有一些修改。在第3节的第2行、第4节的第2行和第13行，都说了注重质量的问题；在第8节的‘第三’中，加了要有停顿、间歇的意思，还加了要有及时的批评一点。”

10月15日下午5时，毛泽东会见了由上林山荣吉率领的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他在谈话中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说：

“热烈的欢迎你们，我们都属于同一人种。”

翻译刘德有听不大懂湖南话，慌乱中把“人种”翻译成了“民族”。周恩来马上予以纠正，说：

“不是‘民族’，而是‘人种’。”

廖承志看到刘德有更加紧张起来，立即坐到毛泽东身旁，微笑着说：

“我来，我来！”

毛泽东对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说：

“热烈的欢迎你们。我们都属于有色人种。有色人种是被人家看不起的，最大的‘缺点’就是有色。有些人喜欢有色金属而不喜欢有色人种。据我看，有色人种相当像有色金属。有色金属是贵重的金属，有色人种至少与白色人种同等重要。有色人种同白色人种一样都是人，都是第一类，不是第二类。第二类是动物，不是人。世界上所有的人，不管他是什么肤色，都是平等的。我们两个民族现在是平等了，是两个伟大的民族。你们这个民族是个很好的民族，日本人，谁要想欺侮他们，我看是不容易的。你们现在有很多地方比我们高明，你们是工业化的国家，而我们现在还是农业国，我们正在努力。”

接着，毛泽东以幽默的口吻，从中国传统的待客之道说起：

“客人来看主人，是客人看得起主人，做主人的应该感谢客人。今天来的客人是我们的邻舍，左邻右舍，是很接近的一个邻舍。日本朋友到中国来，从你们日本家里到我们家里来看一看，我们应该感谢。以后我们要多来往，世界上没有只有一方面感谢另一方面的事情。如果只有一方面感谢另一方面的事情，那就不好了。互相有好处，互相有帮助，互相感谢。”

毛泽东看有些日本议员仍然有紧张情绪，就幽默地予以解释说：

“我们之间是没有什么紧张的，你们感觉怎么样？也许你们没有来中国的时候，觉得中国是共产党国家，而共产党这个事情，有人说好，有人说坏，也许脑子里面会有一些紧张。中国对你们是不是有礼貌？是不是欢迎你们？是不是对你们提出许多责难？我想，也许你们没有来的时候是这样想的。”

日本议员联系到十几天来的访华情况，觉得毛泽东所说丝毫不差，一个个脸上露出了笑容。毛泽东又说：

“我们对你们没有提出什么苛刻的条件，没有什么可紧张的。不要那么紧张，紧张了不好过日子，还是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好。再说，我们之间的社会制度虽然并不一致，但这个不一致并不妨害我们相互的尊重和友谊。过去的老账并不妨害我们，今天的制度的不同也不妨害我们。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主要是将来的问题。”

日本议员很爱听毛泽东这些话，觉得毛泽东的确不像蒋介石与美国人宣传得那么青面獠牙，狰狞可怖。他们又当场直接提出释放日本战犯问题，毛泽东极其明确地回答说：

“战犯问题提得早了一点，把正常的外交关系恢复了，就尽可能争取迅速解决这个问题。这道理很简单，我们并不需要扣留这批战犯。扣留他们有什么好处呢？中日关系的历史是很长的，人类几十万年以来过着和平的生活，我们的祖先吵过架，打过仗，这一套可以忘记啦！从法律上说，中日就是处于战争状态。你们把恢复中日关系放在第一条，这是很好的。就人民的利益要求，应尽早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

“你们现在难以承认我们，我们是谅解的，我们不会责备你们。我们彼此间可以先搞些互相帮助，互通有无，和平友好，文化交流，以改善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一步一步地就会建立起邦交。按照你们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做，如果暂时不能承认我们，我们可以等待，有误会的可以慢慢解释。”

毛泽东还说：

“**美国说我们是殖民主义，讲我们的坏话，说我们争夺他们的市场**。这是不对的。因为第一，中国没有抢夺各国市场，而是美国人在抢夺各国市场；第二，不是中国在各国建立军事基地，而是美国在各国建立军事基地；第三，中国没有派军事顾问团到各国去，而是美国派军事顾问团到各国去，中国没有同各国订立不平等条约并附有政治条件。”

“中日两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美国压在我们的头上。美国的手很长，它抓住我们的台湾，也抓住日本、菲律宾、南朝鲜。亚洲这样大的地方它都想抓。这件事情终究不能持久的。这里是我们的地方，这里的事情应当由我们的人民来管。现在我们要求它放手，把手拿走。放手以后，我们再来拉手。”“各国的事情要由各国自己管，这是个真理。”

10月27日下午，毛泽东趁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在北京开会的机会，在中南海颐年堂约见了陈叔通、章乃器、李烛尘、黄长水、胡子昂、荣毅仁。他在谈话中说：

“中国的统一战线有很久的历史，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反帝反封建，到现在的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是经过共产党领导统一战线的。我看统一战线有好处，又反帝反封建，又赞成社会主义，为什么要把人家赶走呢？是人多好些，还是把许多积极因素赶走好些？还是把积极因素团结起来好。要把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村的、城市的）、宗教家等等都团结起来。团结了更多的人，阻碍就少些，事情就容易办得通。至于选举，不选民主人士不好，要说服选民，使他们了解这样做对劳动人民没有坏处而有益处，是可以说服他们的。当然也还有‘左’派，门关得紧点，对他们也可以说服。”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同其它国家的不同，从孙中山起就为建立民主共和国而奋斗。后来我们接手，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中外的资产阶级在历史上都有过积极的作用，曾经革命的力量对生产发展都有作用。”

“关于私营工商业改造的时间问题，有人说，现在锣鼓点子打得紧，胡琴也拉得紧，担心搞得太快。我们说，社会主义改造是3个‘五年计划’基本完成，还有个尾巴要拖到15年以后，总之是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苹果不熟摘下来吃就是酸的。现在是协商办事，这样大的事情，与全国人民有关的大事，当然要协商办理。如果大家不赞成，那就没有办法做好。有些事缓点比急要好，但是否现在锣鼓点子就不要打紧了，戏就不唱了？不是的。现在还是要劝大家走社会主义道路。”

“现在中国正处在大变革时代，社会动荡不安，农民的个体所有制要变成集体所有制，资本家也要改变其私人所有制，许多人掌握不住自己的命运。其实要掌握是可以掌握的，即要了解社会发展趋势，站在社会主义方面，有觉悟的逐渐转变到新制度去。人们考虑的，不外是一个饭碗，一张选票，有饭吃不会死人，有选票可以当家作主，说文明点就是一个工作岗位和一个政治地位。地主只给饭碗，暂时不给选票，这对地主来说是突然转变，没有思想准备的。对资产阶级则不同。马克思说：**无产阶级要解放自己，就要解放整个人类。如果地主、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不解放，无产阶级本身就不能解放，必须全人类都解放，变成一个新制度，无产阶级才能最后解放自己。”**

毛泽东讲完了，他请大家提意见。章乃器发言说：

“骂社会主义来得早的固然有，但我要乐观些。我认为欢迎社会主义早来的多些，因为他们在过去受过官僚资本的压迫。”

毛泽东说：

“不一定见得，国民党并没有搞掉他们的剥削制度。”

章乃器说：

“他们对制度感觉不到，他们注意的是工作、生活。”

黄长水插话说：

“还有下一代。”

章乃器接着说：

“帝国主义同官僚资产阶级要毁灭他们，我们则安排他们，少数人不舒服，多数人好了，生产增加，利润多了，收税的人来了不发抖。”

毛泽东说：

**“你是主张红色资本家的，我们大有合作之势。”**

章乃器说：

“因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一些人怕共产主义不如解放之初怕共产党。我是乐观派，主张调查一下。过去帝国主义倾销，官僚资本搞金元券，没有安排，反被挤垮。”

毛泽东说：

“总有人要被挤下台的。我们民主党派上了台不会下台，除非做了坏事。多数人是能改变的，对民族资产阶级不要像对官僚资产阶级、地主一样打击。究竟是先挤垮后收容好呢，还是不挤垮好呢？现在不先挤垮，抵触、破坏可以少一些。这样做看起来似乎慢一点，但整个生产力是向前发展的。农业也是一样。必须增加生产，使一些人的忧虑慢慢减少，说服家属朋友，波浪式地扩大。不要误认为今天谈了，明天回去就要共产。少数人开了会回去做宣传，有想得通的，有想得比较通的，有想不通的，会参差不齐。”

李烛尘说：

“几年来工商联做了工作，有成绩。一般工商业家与解放初期不同，但对他们宣传教育不够，方法不好，惩罚多、奖励少。政府方面也有些干部平时没有说清楚，开会就批评坏的，甚至抓人。公私合营企业的干部，对资方有错不当面讲，要人自己去体会，资方就怕了。”

毛泽东说：

“有意见，要讲清楚、明确。”

陈叔通、胡子昂都说，积极分子是越来越多了。黄长水接着说：

“积极分子是越来越多的。学习很重要，广州工商界参加有组织的学习的5000多人，每周3小时学习时间，工商讲座可发展到10000人。参加了学习的，违法就少了。”

毛泽东说：

“不是天生要违法的，是政府工作没有做好。”

荣毅仁说：

“政府干部批评工商业者有‘三靠’思想，即业务靠国营，资金靠银行，生产靠工人。靠要受批评，不靠又不好。现在工商业者在政治、工作、利润等方面都有些问题。政治上有些距离，工作上职权有问题，利润方面有些比较困难。”

毛泽东说：

“宣传要具体，只有批评没有鼓励不好，要估计，要分析，要肯定主要的方面。”

胡子昂说：

“‘三反’、‘五反’以后，资本家是两头小中间大，多数人是大势所趋，得过且过。总路线宣传以后，情况有些转变，主席的合作化问题报告发表后，工商界很感兴趣。”

毛泽东说：

“把鬼讲开了就不怕了。”

胡子昂说：

“现在怕基础不稳，希望工商业改造也来个高潮，政府加强领导，工商界大起胆量。现在有基础。”

此时，吃饭的时间到了，毛泽东与大家一起共进晚餐。晚餐后又继续座谈。毛泽东说：

“中心的目的是要经过一批先知先觉做思想准备，要大家掌握自己的命运。**在旧社会连蒋委员长自己也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现在要大家逐渐减少吊桶，改用抽水机，不要吊桶。**我是宣传共产主义的，要走向共产主义，就要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真正富强的国家。”**

10月28日上午，毛泽东在给彭真、邓小平的信中写道：

彭真、邓小平同志：

明日下午4时勤政殿的会集，在京各中共中央委员及各副秘书长，似宜邀集到会，陈伯达亦宜通知到会。座位挤一点，能有300人左右为宜。是否可以，请酌定。我觉得此次座谈有重要意义，时机是好的。

毛泽东 10月28日上午8时

10月29日下午，毛泽东召集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原定在勤政殿举行，可由于参加会议的人员太多了，勤政殿容纳不下，便不得不改到怀仁堂进行。参加座谈会的有中华全国工商联第一届执行委员会全体委员，有在京的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有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还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门和各企业单位负责人。

陈云首先讲话，他主要是讲私营工商业的生产安排和改造问题。

接着，毛泽东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

“刚才陈云同志说了许多，我来补充讲几点意见。这些意见，早两天跟有些朋友说过的。总的是这么一个问题，就是人们问：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前途如何？或者趋势如何？我们早几个星期开了党的七届六中全会，对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也有许多人提出这样的问题：趋势如何？前途如何？这个问题，全国广大的人都是存在的，这是因为我们现在是要改变社会制度。**现在我们存在两种私有制：一种是个体小生产者的私有制，一种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在改变这两种私有制的过程中，凡是处在这两种私有制地位的人，都发生前途如何或叫趋势如何的问题，都处在一种动荡不安的情况之中，不晓得将来会如何。本来，对前途问题，我们的宪法已经规定得很清楚，在去年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刘少奇同志关于宪法草案的报告、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都讲过，关于‘五年计划’等各种文件也都讲过。为什么还是经常发生这个问题呢？原因就是处在这样一个地位的人，对改变这样一种制度，自然地会发生不晓得命运怎么样的问题。说完全不晓得？也不是。晓得一点，但是问题还是发生，还是要问这样一个问题。所以，我想就这一问题贡献一点意见，就是说，自己要掌握自己的命运。自己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那是不好的，每天难过日子。旧社会就是那样子，无论哪个阶级，自己都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者是在被统治之下的，他们没有得到什么权利，命运操纵在人家手里。统治阶级也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比如国民党政府，它也是不安的。我们有一个一定的发展方向，有一个社会发展的规律可以把握，应该是安的。但是对这一点要讲清楚，并且要经常讲。如果不经常讲，今天安了，明天又不安。比如讲统一战线到底还要不要？现在经常发生这个问题。这不是一个政党（共产党或者它的中央委员会），一个集团，少数人或者个别的人，说要就要，说不要就不要这么一个问题。这是看统一战线存在下去有好处还是没有好处，对劳动人民事业、对走社会主义道路，有利益还是没有利益来决定的。刚才陈云副总理说，我们的道路很宽广，将来不怕没有事情做。我们跟国民党那个时候完全不同，我们的事业很宽广，每年都发展，我们不怕人多。我们已经在长期革命中证明：有统一战线比没有要好。革命战争时候，就是找不到许多人，哪能有今天这样的机会，找了许多人坐到这里来开会。那时候，国民党不许可嘛，他们不赞成我们，**讲共产党许多坏话，说什么共产党不像样子，头就不只一个，有3个头，样子也很难看，总之，是坏透了，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国民党拿这种话到处讲，讲得许多人也似乎相信了**。那个时候，要找人谈，要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有困难。现在证明，建立了统一战线对我们的帮助。不但对过去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有利的，就是对现在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也是有好处的。因此，统一战线要维持下去。宪法上已经作了规定。总之，我们的事业一天天地发展，与国民党的事业一天天地缩小相反。现在我们的事业，包括反对帝国主义对我们的欺负，包括国内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等各方面的建设工作。建设工作还刚刚开始，所以大家应该安下心来。我总劝朋友们，经过你们再劝更多的人，大家安下心来，不要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我建议减少吊桶，增加抽水机，最好全部用抽水机，因为抽水机它不是七上八下。这样，睡觉就比较好些。刚才陈云副总理讲的话，也是抽水机性质。不要发愁，开始是会有困难的。比如工作安排和政治安排是否妥当等等，会有些问题发生。但是经过商量，经过考虑，经过调查研究，总可以实事求是地求得解决的。这样，大家就能够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我们是要使我国比现在大为发展，大为富、大为强。现在，我国又不富，也不强，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我国是个大国，但不是富国，也不是强国。飞机也不能造，大炮也不能造，坦克也不能造，汽车也不能造，精密机器也不能造，许多东西我们都不能造，现在才开始学习制造。我们还是一个农业国。在农业国的基础上，是谈不上什么强的，也谈不上什么富的。**但是，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包括地主阶级**。**地主过了几年之后，就有了选举权，他就不叫地主了，叫农民了。资产阶级，总有一天，大约3个‘五年计划’之内，就不叫资产阶级了，他们成为工人了。农民这个阶级还是有的，但他们也变了，不是个体私有制的农民，而变成合作社的集体所有制的农民了。这种共同富裕，大家有把握，不是什么今天不晓得明天的事。那种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情况，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应该逐步结束。那时，全国只有一种工人、一种农民和一种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工人、农民的知识分子。**

刚才陈云副总理说，全面规划里面有宣传这一项，要加强宣传教育工作。现在，听到各大城市工商界都有学习的组织，我们很高兴。学习应该逐步地扩大，每个城市要有几千人，要逐步地有更多的人来学习应该学习的东西。这里有个问题，就是要有比较少数的核心人物。这次召集会议，我们有这样一个基本的要求，希望每一个大城市有几十个、几百个核心人物。在工商界里面，这些人比其他的人要觉悟一些，要进步一些，经过他们来教育其他的人。这点是不是可能呢？我们看，过去这几年，工商界已经有一些人觉悟程度是比较高的，他们懂得国家的政策、方针。因此，我们觉得完全可以设想：经过工商联、民建会、各民主党派的工作，壮大这么一个队伍，全国有几千人。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要有几年的准备工作。我曾经同一些朋友说过，并不是今天说了，明天就要共产（指资本主义工商业国有化——笔者注）了，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讲准备共产。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要广泛宣传。这个东西是历来被人家说成不好的，曾被蒋介石说得很不好。最近几年情况虽然变了，但是还有一些人对实行社会主义动荡不安。**由一种制度变为另一种制度，他们势必不安，因为还在变嘛；变了以后，在一个时期，他们还会感到不舒服，因为旧制度残余还在脑筋里面存在着。新制度的宣传，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要逐步宣传，使新制度的思想逐步增强，使旧制度的残余逐步减少。**工商界的人中间也会是参差不齐的，有些人更觉悟些，有些人不觉悟些，甚至最后还有一些顽固分子。资产阶级连他们的家属，大概有700万人左右。城市小资产阶级，就是小商小贩、独立手工业者（不包括店员、手工工厂的工人），有两千几百万人。两者合计有3千万人左右。面对这么大一个队伍，应该有一个整个的宣传教育计划。有许多工商界的朋友提意见说，‘五年计划’报告中间关于宣传教育方面提得不够。我说，这个意见提得好，过去的确有这个缺点，没有全面规划。今天到会的有政府许多部门的同志，有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同志，你们就没有管这个事嘛。而且，宣传的时候要作得恰当，要实事求是，对情况的估计、分析，应该是好的就说好的，坏的就说坏的，有多大程度的缺点就说多大程度的缺点，不要夸大。据我们看，经过这几年，整个工商界是有进步的，各民主党派的工作是有进步的，基本情况是好的，是向着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上前进了一步的。作这样一个总的估计，我看是合乎事实的，是需要的。因为，如果没有一个恰当的基本的估计，那么我们就不能建立信心，工商界本身会没有信心，向他们进行工作的人也会没有信心。感到横直是不能改造嘛！横直是没有希望嘛！那个私有制无论如何拔不掉嘛！根挖不掉嘛！那有什么办法呢？白费气力，搞了五六年了，成绩没有，或者有也很少。总而言之，搞社会主义改造，搞国家资本主义，这个路线错了。是不是能这么说呢？我看，不能这么说。能不能说工商界在抗美援朝、经济建设、加工订货、公私合营、买公债等方面，一点好事没有做，一点成绩都没有呢？我看，不能这么说，也没有听到有人这么说过。对整个工商界，各民主党派，应该肯定他们的成绩，不然就没有信心，下文就不好办，而且那种说法根本不合事实，因为这几年确实是有成绩的。同时，讲到成绩并不是抹煞缺点，会有缺点的。是缺点就说是缺点，缺点有多少就说多少。这就叫作实事求是，全面分析。我们不要那个不实事求是的方法，不要片面的分析方法。不实事求是就是主观主义，片面分析就站不住脚。

对共产这个问题要讲开，要说穿。要经常说，朋友几个人在一起扯一扯，就不怕了。我看，共产这个事情是好事情，没有什么可怕，你们会知道的，会看到的。**全国统筹兼顾，这个力量大得很。资本主义私有制大大地妨碍统筹兼顾，妨碍国家的富强，因为它是无政府性质的，跟计划经济是抵触的。**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个东西要说开，当然也要注意，不要一说开就晚上睡不着觉，就神经衰弱，说是明天早上就要共产了。不是的。我们讲几年准备，要经过几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加工订货。第二个步骤，公私合营。第三个步骤，那个时候我们再议嘛。究竟哪一年国有化，我们总是要跟你们商量嘛。国有化不会是像扔原子弹那样扑通下地，全国一个早上全部实现，而是逐步地实现的。现在来说，还是一个宣传教育问题。通过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的做工作，慢慢地使我们的新制度往大家的脑筋里面钻进去一点，使不安的心理逐步减少，增加核心分子，扩大核心集团，让大家认识到新制度确实可行，确实有益。**如果新制度不能证明比旧制度大为有利，那新制度就不可取了。新制度所以应该采取，就是因为比旧制度有利得多，不是只对少数人有益处，而是对全国人民都有益处。**

**我们现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际上就是运用从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提出过的赎买政策。**它不是国家用一笔钱或者发行公债来购买资本家的私有财产（不是生活资料，是生产资料即机器、厂房这些东西），不是用突然的方法，而是逐步地进行，延长改造的时间，比如讲15年吧，在这中间由工人替工商业者生产一部分利润。这部分利润，是工人生产的利润中间分给私人的部分。有说一年四五个亿的，有说没有这么多的，大概是一年几个亿吧，十年就是几十个亿。我们实行的就是这么一种政策。全国资本家的固定资产的估价，有这么一笔账：工业方面有25亿元，商业方面有8亿元，合计是33亿元。我想，如果15年再加恢复时期3年共18年，工人阶级替资产阶级生产的利润就会超过这个数字。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是采取1949年全部没收、一个钱不给这个办法好呢，还是拖15年、18年，由工人阶级替他们生产一部分利润，而把整个阶级逐步转过来这个办法好呢？这是两个方法：一个恶转，一个善转；一个强力的转，一个和平的转。我们现在采取的这个方法，是经过许多的过渡步骤，经过许多的宣传教育，并且对资本家进行安排，应当说，这样的办法比较好。**对资本家的安排主要是两个，一个是工作岗位，一个是政治地位，要通统地安排好。政治地位方面，给选举权的问题，无所谓安排了，因为我们早已宣布，对民族资产阶级是不剥夺它的政治权利的，跟对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采取不同的政策。对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利，要剥夺一个时期。比如地主一般是要5年，有些还要延长，看他表现好，才能改变成份，才给他选票。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合作的政策，他们的政治权利是已经有的，将来阶级成份变了，不是资本家了，变成工人就更好了。因为工人阶级比资产阶级更吃香嘛。过去有钱的人很吃香，现在似乎讲一讲工人阶级才舒服的样子。你们想当工人阶级有没有希望呢，是一定有希望的，我可以开一张支票给你们。这是一个光明的政治地位，光明的前途。把个体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私有制废除了，社会上就剩下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整个民族只有到那个时候才更有前途，更有发展希望。**

**我们的目的是要赶上美国，并且要超过美国。美国只有1亿多人口，我们有6亿多人口，我们应该赶上美国。李富春同志作过报告，不是说赶上美国不要100年吗？这个看法我也赞成。究竟要几十年，大家努力，至少是50年吧，也许75年，75年就是15个‘五年计划’。**哪一天赶上美国，超过美国，我们才吐一口气。**现在我们不像样子嘛，要受人欺负。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吹起来牛皮很大，历史有几千年，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但是一年才生产两百几十万吨钢，现在才开始造汽车，产量还很少，实在不像样子。所以，全国各界，包括工商界、各民主党派在内，都要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我们在整个世界上应该有这个职责。世界上4个人中间就有我们1个人，这么不争气，那不行，我们一定要争这一口气。**

再谈谈领导方法问题。领导的方法可以好一些，也可以差一些。领导要能够适合客观发展的规律。如果领导得好一些，适合客观规律好一些，缺点错误就少一些，工作也就好一些。如果领导得差一些，适合客观规律差一些，工作也就差一些。所以，我们要注意领导方法，各个党派、工商联，中央同地方，都要注意用什么方法使大家更觉悟一些。为什么企业偷税、漏税呢？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领导者对他们宣传教育得不够。学习多一些，偷税、漏税就少一些，没有学习的就偷税，漏税。所以，偷税、漏税也有我们领导者的问题，不能只怪人家。当然，领导者不止我们这几个人了，在座的都是领导者，许多人都是人民代表、副市长、工商联委员，政协委员、民主党派负责人，你们都有责任。你看，归根到底又把问题搞到你们身上来了。当然，我也是要担负一点责任，不担负也不行罗！我们大家担负责任，共同负责，这是整个民族的问题嘛！”

毛泽东讲完后，全国工商联主任委员陈叔通、副主任委员李烛尘、荣毅仁、黄长水、胡子昂先后作了重要发言。李烛尘在发言中还说：

“我建议今天在座的同志们，在庄严的怀仁堂，当着毛主席的面，每个人应提出保证，一定要把核心工作做好。大家如无异议，请大家起立表示决心。”

工商联全体执委立即起立，高声欢呼。毛泽东仔细地听完工商联各位负责人的发言后，再一次讲话，他说：

“听了好几位的讲话，觉得很好。关于回去传达的问题，我感觉有些地方需要请诸位注意。就是讲，不要搞一阵风，说是要共产了，不是这么个意思。**今天大中小资本家有几百万人，人员不齐，进步程度也不一致。搞一阵风，一点破坏都没有也不可能。总而言之，不要说是要共产了，引起一阵风，好像刮台风一样，那个不好。**关于社会主义改造，我们需要有充分的准备，包括思想准备、宣传教育等许多工作在内，要有秩序有步骤的进行。而不是一阵风，以免引起误会，招致可能的某些损失。我们要力求保障损失越少越好。所以，核心分子非常重要，因为有核心就能有领导，就能达到有秩序有步骤的进行。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有成绩的，将来还可以看见有很大成绩。我们商店的柜台上、货架上货品很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没有断过。经过这样大的革命，我们货品没有断过，这是了不起的大事。很多外国人看见我们货品充足，很羡慕。**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包括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不仅有全国的意义，还有国际的意义，因为整个世界都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在这方面，我们在世界上是走在前面的，中国的资本家将来是先进者，我这个支票也是可以开的。中国人是要走在前面的。**（周恩来插话：是对比较落后的国家来说。）当然，我不是讲一切国家都会走我们的方向，而是讲比较落后的国家会跟我们学的。现在不是讲社会主义高潮吗？我就怕没有准备好，一个高潮来了一阵风，请诸位注意这一点。要做好事，这是一个原则。我们跟许多朋友谈过，做好事越多越好。做好事越多，前途就越好，得到的好处就会多一点，在社会上就更有名誉。在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间，在参加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间，替人民做好事越多，工作成绩越好，得到人民的嘉奖就应该越多，不会成反比例的。总不能说，立了功了，还得倒霉。不是那么一个趋势，那是不合道理的，是说不通的，人家是不服的。这样，定下这么一个标准，就可以鼓励上进，鼓励做更多的好事，做得更好一些。当然会有参差不齐的。**你们都是先进分子，说要来一个高潮。但是，大中小资本家有几百万人，那些小商小贩有几千万人，会有各种动摇、各种犹豫的。最后达到一个不动摇、一个不犹豫，是要经过好多次反复的。农民也是这样，他加入合作社也要经过多少次考虑，经过家庭商量，想加入又不想加入，搞过几次以后，才下决心。你说，工商界就没有三番五次的考虑，不开家庭会议、同业会议商量？我们最后要引导他们到一条路上，就不动摇了。要逐步引到那一步，先有少数先进分子不动摇，逐渐使更多人把怀疑、犹豫、动摇减少。**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总是要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这样反而快。早两天跟朋友说过，就是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这样的话是好话。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就比较自然。这不是‘听其自然’的那个‘自然’，而是讲，经过说服，经过教育，经过批评，克服许多困难而达到的‘自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一定会有困难的，也一定会有破坏的。**有的地方搞合作化，曾死了一些牛，猪也减少了，出现了‘三叫’：人叫、猪叫、牛叫。合作化要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才能够做到‘三不叫’。要‘三不叫’，就要人有饭吃，猪和牛也要有东西吃。你们工商界就不好提这个‘三不叫’了。人不叫是要的，但机器不好不叫。**总而言之，社会主义改造要减少损失，要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要充分准备，准备工作越充分，这个事情就越能办好。”**

1955年11月1日，全国工商联第一届执行委员会召开第2次会议。会议传达和讨论了毛泽东在座谈会上的讲话。

与会者在讨论中，纷纷表示一定要掌握好自己的命运，把个人的前途与国家的前途结合起来，分析对比了解放前和解放后资本主义企业不同的发展道路，认识到只有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才是唯一光明的道路。

11月1日下午，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农业合作社要有计划地发展和整顿”的指示，全文如下：

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

现将江苏、山东两个省委关于在发展了一大批合作社之后，如何完成整顿工作，使它们巩固起来，以利明春大规模地发展农业生产的报告，发给你们参考。两个报告中，特别是山东的报告中，有许多新的意见，值得各地注意。这两省（还有云南、贵州和其他若干省份），由于在中央召集的今年5月17日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之后，即在夏季（6、7、8月）做了准备工作（山东的准备时间较短，是一个缺点），所以他们在秋季的头两个月（9月和10月）即完成了一年的发展计划。他们准备在今后5个月内（今年11月至明年3月），结合粮食三定、统购统销等项尚未完成的工作，大力完成整顿合作社的工作，这主要是建立和健全合作社的管理机关，建立和健全劳动组织，做好生产规划，做好生产工具和生产资金等项问题上的互利安排，制定社章，做好冬耕冬种（在南方）和积肥等项工作，以利明春的生产。在这个季节安排问题上，中央认为这样做是很有利的。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可以这样做，都可以将合作社的建社整社工作提早一季，即夏季完成建社的准备工作，秋季完成建社工作，冬春两季完成整社工作。只要夏季的准备工作做得充分妥帖，秋季的建社并不需要很多的时间，有两个月时间即可以完成。秋季剩下的时间和整个冬春两季，都可以做整社工作和其他工作。此事请你们加以研究，好好地安排1956年的工作。合作社大发展一批以后，区乡干部感到问题很多，担子很重，难于解决，这种情况是存在的。其实，这是不难解决的。其办法，就是**在每一个乡里，抓住一个至两个问题最多的合作社，深入进去，加以研究，找出解决的办法，就可以引导该乡一切合作社迅速地仿照办理。在一个区里，只要整好几个合作社，就可以引导全区各乡的合作社迅速地仿照办理。**在这里，建立乡、区和县的合作网的组织，是很有用的。这一点，请你们向县、区、乡干部加以强调。至于**按照计划大发展一批合作社以后，及时地宣告停止发展，使运动转到整顿阶段，这是完全必要的。**按照上述的季节规划，**一年只有一季是发展的时间，其余各季都是整顿和准备发展的时间。其余各季也可以有一些零星的个别的发展，但是主要的发展时间只有一季，并且还只需一季中的两个月，这样就可以基本上避免由于漫无限制而引起的“左”倾错误。**因为有了这样的有计划的发展和整顿，合作化的总的进展是好的，有一些县、一些区和一些乡，由于种种原因，合作社发展少一些，也就不要紧了，在以后几年中逐步地跟上去就好了，**不要怕被批评为右倾机会主义**。**从现在起，全国各地的要求，主要是合作社的质量问题，而不是数量问题。因为数量问题已经引起全党注意，而质量问题则还没有引起全党注意。**

中央 1955年11月1日

尔后，毛泽东就陈嘉庚的来信给周恩来写了一个批语。

陈嘉庚在10月9日给毛泽东的来信中，叙述了他9月再访延安途中拜谒黄帝陵和轩辕庙时看到的情况，提议政府采取措施，保护黄帝陵庙。毛泽东在批语中写道：

周总理：

此件阅后，请提交有关机关处理。我看陈先生的提议是有道理的。

毛泽东 11月1日

这天晚上9时25分，毛泽东离开北京乘专列南下，视察农业合作化和农业生产及城市工商业等情况。11时50分，专列抵达天津，停车1小时。毛泽东在车上召见天津市委书记黄火青、副市长万晓塘，听取了汇报。

11月2日清晨6时58分，专列到德州车站，停车1小时。毛泽东召见德州地委书记谈话。

上午10时43分，专列抵达济南。毛泽东召见谭震林和山东省委书记舒同，谈话到下午1时结束。

是日晚9时10分，毛泽东与济南市委书记、副书记、市长谈话，9时55分结束。

晚11时56分，专列到达泰安。毛泽东在专列行进中，与被召上专列的泰安地委书记、副书记谈话。

11月3日凌晨1时54分，专列到达兖州，毛泽东结束了与泰安地委书记、副书记的谈话。2时25分，毛泽东与兖州地委书记、副专员谈话。

凌晨6时45分，专列抵达徐州，停车1小时。毛泽东与徐州地委书记、专员谈话。

上午9时40分，专列到达符离集，毛泽东与地委书记和专员谈话1小时又10分钟。

11时45分，专列到蚌埠，毛泽东与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副省长张恺帆谈话，至下午1时30分结束。

11月4日凌晨1时45分，专列到滁州。毛泽东与滁州两位地委副书记谈话，2时50分结束。

凌晨3时，专列到浦口。25分钟后，毛泽东与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省长惠浴宇及南京市委书记、市长谈话，5时28分结束。

7时21分，专列到镇江。毛泽东与镇江地委书记、专员谈话，8时18分结束。

上午10时45分，专列到无锡。毛泽东与无锡市委书记、市长谈话，11时55分结束。

中午12时47分，专列到苏州。毛泽东与上海局书记柯庆施、上海市副市长许建国、苏州地委书记、副书记及苏州市委书记、市长谈话，下午2时30分结束。

下午4时25分，柯庆施、许建国与毛泽东同行抵达上海。毛泽东下车到游泳池游泳1小时候后，上了专列。

11月5日晨6时，毛泽东与柯庆施、许建国及上海市其他领导人谈话；吃过早饭，又谈到9点40分。

中午，毛泽东下车游泳1个小时。

下午2时45分，专列到松江。毛泽东与松江地委书记、专员谈话，3时37分结束。

下午7时，毛泽东终于抵达了目的地——杭州。

**从北京到杭州不过区区4000余里，毛泽东的专列竟然走了5天4夜。他一路上先后召见了省市委书记、副书记、省长、副省长、市长、副市长及地委书记、副书记、专员、副专员等大大小小40多名地方领导人。一时间，空中电波频传，地面上有关人员闻讯奔走，你来我往，川流不息，此情此景，蔚为奇观也！**

这正是：五天走京杭，一路连夜日。宵旰为底事，专列人如织？

且说此时的杭州，虽已临近立冬时节，却依然风景宜人。毛泽东游兴很高，接连攀登了南高峰、北高峰、玉皇顶、莫干山、五云山。

北高峰在西湖附近。毛泽东在攀登途中，常常要停下来略作歇息，学习英语。他第二次攀登北高峰，很有感触。最后一次登临，心情极佳，健步踏过数百个石级，盘绕26道弯，登上山顶。上面平旷如盘，高塔矗立，四外远眺，入目而来的是群山屏列，西子湖云光倒垂，波平如镜。整个杭州城尽收眼底，高楼大厦，比比皆是，往来汽车，蠕动如蚁。毛泽东立于山颠，随口吟道：

三上北高峰，杭州一望空。飞凤亭边树，桃花岭上风。

热来寻扇子，冷去对佳人。一片飘飘下，欢迎有晚莺。

他的国际问题秘书林克马上将这一首《五律·看山》记录了下来。毛泽东解释说：

“这里的‘扇子’是指扇子岭，‘佳人’就是美人峰喽。”

说罢，他又翻开了英语课本，说：

“现在，既不热也不冷，只有学习喽。”

关于这首诗的写作时间，最早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由林克提出来的。林克说：“1959年11月，他在杭州休息时，游兴很高，接连攀登了南高峰、北高峰、玉皇顶、莫干山等处。在攀登途中，他常常要停下来略作歇息，这时往往坐下来学习英语。在多次攀登北高峰之后，他曾诵诗一首：‘三上北高峰，杭州一望空；飞凤亭边树，桃花岭上风。热来寻扇子，冷去对佳人；一片飘飘下，欢迎有晚莺。’”

据陪同毛泽东的王芳回忆，《五律·看山》一诗是毛泽东在第一次到杭州期间三上北高峰时打的腹稿，诗成时间则是在1955年。他是这样说的：

“这是毛主席1955年在杭州写的一首诗《五律·看山》。八十年代公开发表后，大家都说毛主席这首诗是对杭州的湖光山色的赞美。如果光从字面上看，是无可非议的，也是可以接受的。其实不然，主席是在批评我们警卫工作。主席对我们在搞警卫工作中脱离群众的做法十分不满，用写诗词的方法提出了严肃的批评。

主席三上北高峰，都是他第一次来杭州那段时间。根据主席不走回头路的习惯，3次我们分别从北高峰的正面和东、西两侧爬上去，再从不同方向下山的。主席为什么对北高峰特别感兴趣，连去3次？我分析是北高峰是杭州近郊最高的山峰，主席喜欢登高望远，站在北高峰顶，放眼远眺，湖光涟滟、山色空濛，滔滔钱江、烟波浩渺。主席诗人气质，对这景色的感受肯定和常人是不大一样的。社会上有人传说，一些小报过去也捕风捉影，说主席在北高峰的庙里抽过签，说他有帝皇之相。那是胡编乱造。我清楚记得，第一次我陪主席去北高峰，是从北高峰的正面即灵隐后面，经上天竺过韬光寺上去的，李敏和毛远新也跟去了。当时他们还都是小孩子，对在天竺庙里有人抽签算命感到很新奇。主席上山热了正在擦汗。毛远新、李敏跑来对主席说有不少人在庙里抽签算命的事。主席说，这是一种迷信活动，等你们长大就见不到了。你们愿意的话，可以去试一试，若干年后你们就体验不到了。主席这句话的意思是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这种封建迷信活动很快就要取缔掉了。他是让孩子们作为生活体验去接触一下这种东西的。”

“第二次登北高峰是从玉泉经凤来亭过桃花岭上山的。往留下方向下来时天色已晚，望见村烟缭绕，正是农家点火做饭的时候。我们下山路过一户农舍，只见门户紧闭，不见一人。尽管这种情况事先我就知道，此时我心中仍就觉得有些矛盾和不安。主席外出，既要确保绝对安全，又要能够接触群众，如何处理好其中的关系，我们在工作中不断努力和探索，但离主席的要求还是很远。主席和我们站在农舍旁的几棵大松杉下休息。这种松杉不仅长得高，树冠大，冬天不落叶，春天长新叶，掉老叶，风一吹，树叶纷纷落下。主席站在树下闷声不响，似在思考什么问题。我准备挨主席的批评。这时，忽然从房后跳出一只大公鸡，它见人也不害怕，迎面向我们走过来。这时主席笑着对我说：‘厅长，厅长，你把群众管住了，却没有把大公鸡管住。是这只大公鸡不听你管，还是你管不住它？我们到这里，没有群众欢迎我们，还有大公鸡欢迎我们呢！’主席用这种风趣的方式批评我们，对警卫工作脱离群众表示不满。

主席第三次上北高峰，是从留下老东岳上去的。那条路是石板铺成的，年代久远，多有破损，路面长满杂草，但相当陡，两旁没有树木。已是三月中旬，那日天气晴好，空气有些闷热。登山时身上微微出汗，主席敞开衣裳，手里拿了把扇子。由于当时国内阶级斗争十分尖锐复杂，浙江又是蒋介石的老巢，敌人的破坏活动很频繁。中央指示公安机关要提高警惕，严防阶级敌人破坏捣乱。因此，我们对主席的警卫工作也特别小心。为保万无一失，在主席活动经过的地方，我们都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那天上山前，我们事先派人对游人做了疏散和布控。主席一路上见不到群众，他很不高兴，也不吭声。那首《五律·看山》的诗歌，我估计就是那天打的腹稿。

主席在诗中写的‘三上北高峰，杭州一望空’，指的是他三次登上北高峰，远望杭州一座城，不见杭州老百姓，在北高峰上，只看到‘飞凤亭边树’，吹到‘桃花岭上风’，凤来亭，桃花岭，原名飞凤亭，桃源岭，主席在诗中把它名称改了。这些地方本来是人们来往休息的地方，但此时却见不到群众。‘热来寻扇子，冷去对佳人’两句，意思是冬去春来，杭州西湖更美。他记得二上北高峰时，在大松杉树下休息，春风吹来，‘一片飘飘下，欢迎有晚鹰’，在门户紧闭的农舍旁，只有一只大公鸡来欢迎他。主席由此感受到一个领袖人物，一个党的领导干部，从现实生活中到思想上、感情上，如果不能和群众紧紧在一起，以致脱离群众，远离群众，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呢？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另有《党的文献》杂志在1993年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根据毛泽东的手稿，将《五律·看山》的写作时间定为1955年。此后，仍有诸方面详细考证，认定是写于1959年11月。

欲知毛泽东在杭州有何重要活动，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毛泽东1955年10月27日在中南海颐年堂约见陈叔通、章乃器、李烛尘、黄长水、胡子昂、荣毅仁谈话，10月29日在怀仁堂召开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座谈会，11月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农业合作社要有计划地发展和整顿”的指示，标志着农业生产合作化运动已告一段落，他的工作重心开始向**农业发展规划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转移。**更有意思的是，他和陈叔通等人的谈话和在座谈会上的讲话，不厌其烦地娓娓道来，颇有深意，讲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道理，这就是：“**如果地主、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不解放，无产阶级本身就不能解放，必须全人类都解放，变成一个新制度，无产阶级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有人说，教育和带领民族资产阶级搞社会主义改造，是毛泽东的一大创举，这话不无道理！由上述两例便可窥见一斑。

**第19章**

“**富裕中农说：‘穷光蛋想办合作社哩，没有见过鸡毛能上天。’鸡毛**

**居然飞上天去了。这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的斗争。**”

话说1955年11月7日，毛泽东在杭州与警卫一中队的江苏、浙江籍7名战士座谈，了解农村情况。

11月10日，毛泽东与刚刚探家归队的几名战士座谈，了解他们家乡农民们的情况。

这一天，毛泽东在全面的调查研究之后，召集华东、中南地区9个省市委书记和有关人员柯庆施、陈伯达、王任重、吴芝圃、刘顺元、陶铸、邵式平、舒同、曾希圣、周小舟、江华、陈丕显、张劲夫、张霖之、李丰平等19人开会，即第1次“杭州会议”，专门研究农业发展规划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为起草决议做准备。

11月12日，毛泽东要陈伯达打电话给北京的陈云，征求他对起草决议的意见。

杭州会议就发展农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问题交换意见，听取了浙江省委关于农业生产和农业合作化情况的汇报，讨论并提出了《农业十五条》。

11月14日（至17日），经毛泽东和柯庆施、陈伯达讨论，由陈伯达执笔，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决议草案中写道：

“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充分有利的条件和完全的必要，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工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即从原来在私营企业中所实行的由国家加工订货、为国家经销代销和个别地区实行公私合营的阶段，推进到在一切重要的行业中分别在各地区实行全部或大部公私合营的阶段，从原来主要的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形式推进到主要的是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

11月16日，毛泽东指示刘少奇、邓小平等在北京召开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大中城市党委代表参加的关于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问题的会议。

11月16日晚，胡乔木给毛泽东写了一封回信。

此前，胡乔木奉命为《人民日报》起草社论《统一认识，全面规划，认真地做好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工作》，初稿写成后，曾送毛泽东审改。因此，他在回信中写道：

主席：

14日社论修改稿收到。对社论稿少奇、恩来、陈云、小平、维汉、涤新、拓夫、邓拓、冷西等同志也提了不少好的意见，昨15日已据主席和他们几位的修改意见又改了一下。中央已把这个稿子印发给到会各代表，并要他们再提修改意见，在18日午前汇齐，准备19日定稿，20日见报。现将昨天的修改稿校正一份送上（伯达同志处另送）。定稿以前主席想已返京，估计那时还会有些修改，所以主席若待那时再作最后审阅也可以。

敬礼！

胡乔木 11月16日晚

11月17日凌晨，毛泽东在给刘少奇、邓小平的信中写道：

少奇、小平同志：

送上《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13份，请予审阅处理。这个文件是陈伯达、柯庆施和我3人讨论，由陈伯达执笔写成的，因为时间仓促，来不及过细修改。陈伯达可于18日或19日飞回，可以帮助你们再加斟酌。这个问题，因为各省市委缺乏思想准备，似以作为草案于这次会后先行发出，待明春开中央全会时再行通过，较为适宜。因为是一个大问题，故以全会决议的形式为好。这些，统请政治局加以酌定。我准备日内回京参加这次会议的末尾一、二天。

农业合作化的情况，根本好转，估计明年一年，即可达到全国基本上初级合作化，即达到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农户入社，大大有利于农业生产。为了商量这个问题，附带也谈一下工商业改造问题，我召集了9个省的书记在这里开会一二天，情况容面报。

敬礼！

毛泽东 11月17日上午4时

随后，他派人回京把印出来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送给刘少奇、邓小平。

这一天，毛泽东还给黄炎培回了一封信。

原来，此前的黄炎培因病住院动手术，他在病榻上给毛泽东写信说：“我准备这副老机器活动力安全恢复以后，将发挥新的精神，重新投入战斗部队，为光荣的执行主席又一次对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珍贵指示努力。”毛泽东在复信中写道：

任之先生：

从医院给我的信收到了。尊恙痊愈，极为高兴。尚望注意保养，恢复健康。工商界改造工作有进步，令人欣慰。惟须加强教育，使之普及到大中小城市的各行各业。看来在工商界是可以采用自我批评这个方法的，这次工商联合会讨论的经验可以推广。因在旅行中，故未能早复。顺致

敬意！

毛泽东 11月17日

11月17日晚，毛泽东复信给胡乔木，他写道：

乔木同志：

此件看过，可用，可以不再给我看了。作了两点修改：一、在第5页倒数第7行“镇压的”3字不妥，改为“按照他们的具体情况，有分别地加以惩处的”；二、在第6页末行“私股”下加“按照具体情况适当地”9字，下接“分得”，此点请商陈云同志，是否这样较妥当些。

毛泽东 11月17日夜

11月18日，毛泽东离开杭州北上。

11月20日，毛泽东抵达天津，召集北方几个省的省委书记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开会。参加会议的有吴德、乌兰夫、白坚、吴砚农、马文瑞、陶鲁笳、黄欧东、欧阳钦。会议讨论了在杭州搞出的《农业十五条》，又加写了两条，使之成为《农业十七条》。

《农业十七条》的主要内容包括：1、1956年下半年基本完成初级形式的建社工作，1959年基本完成合作化的高级形式。2、12年内全国基本消灭荒地荒山。3、12年内各地90％以上的肥料由地方合作社自给。4、12年内粮食亩产，秦岭、白龙江和黄河（青海境内）以北达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达到500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达到800斤。5、7年内基本上消灭十几种不利于农作物的虫害和病害、若干危害人民和牲畜最严重的疾病，消灭老鼠、苍蝇、蚊子等4害。6、7年内基本扫除文盲，修好各地必要的道路，并建立有线广播网和乡社的电话网。

《农业十七条》是毛泽东南下视察的主要成果，以后经过不断修改补充，形成为《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简称《四十条》。此是后话。

是日晚，毛泽东由天津回到北京。

11月21日，全国工商联第一届执行委员会第2次会议通过了《向毛主席致敬电》和《告全国工商界书》，**号召每一个工商业者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1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胡乔木起草、经毛泽东两次审阅修改的社论：《统一认识，全面规划，认真地做好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工作》。

11月23日，毛泽东召集中央书记处会议，商定召开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负总责、彭真、陈毅等人参加的中共中央研究知识分子问题10人小组，为即将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做准备。

11月24日，毛泽东参加了中共中央召开的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大中城市党委代表参加的关于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问题会议的最后一天会议。他在讲话中说：

“帝国主义眼前还不敢发动战争，我们要趁着这个机会，加快社会主义改造，加快我国的发展。”

毛泽东批评了党内、特别是领导机关总是思想落后于实际情况的现象，他说：

“**右，是我们很突出的一个东西。**反右，我想中央各部门、地方各级党委都是值得注意的。”“**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有两个，一是全面规划，二是接近群众。所谓全面规划，就是将许多侧面结合起来研究，这样就可以发现许多问题。但是不能只坐在房子里搞规划。**办公室是要坐的，但总坐在办公室里，是危险的，在一年里要有几个星期到外面跑，跟群众接触，这样才可以发现问题。现在中央提出的一些问题，都是在跟群众的接触中发现的。”

他还批评了一封署名为“上海工人”的来信，他说：

“**这封信的基本观点是把资产阶级跟地主阶级等同起来，否认它还有积极的一面，不承认资本家能够改造好。**马克思主义历来承认资产阶级比地主阶级要进步。**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落后，但比封建主义进步，比小生产也进步，因为它是用机器生产，而小生产是用手工生产**。这封信是以‘左’的面貌反对党的路线，不能代表工人阶级。不能认为，‘五反’以前资产阶级有积极性的一面，现在实行公私合营了，资产阶级反倒没有积极性的一面了，资产阶级越搞越反动了。恰恰相反，**‘五反’以前，它的反动性多一些，它的坏的方面多一些，‘五反’以后逐步减少。现在，它是一只半脚踏进社会主义，人家快要变工人阶级了，已经是半社会主义者了。**我们的社论上也写了，一只脚进了门，那一只脚也要进了，到了门槛上了。头一只脚占二分之一，第二只脚进了一半，它只有四分之一没有进来了。那么它积极的一面还有没有呢？现在来一个结论，说是没有了，它坏的方面不是越搞越少，而是越搞越多。这是一种机械的看法，否定了我们党的教育工作。这样看是不对的。”

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

11月24日晚，毛泽东复信给达赖喇嘛，他在信中写道：

亲爱的达赖喇嘛：

1955年7月6日给我的信收到了，很高兴。我时常想念你，想念你在北京的时候我们相处的那种愉快的情形。何时再能和你见面呢？大概要再等3年，等到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的时候，那时你也许会来这里吧。你回去以后的许多活动，我觉得都很好。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不久可以成立，各族人民都会很高兴。西藏是在前进。当然不要性急，每年有一些进步就好了。希望你好好保养身体。**我们这里的情况还好。也做了一些错事，正在批评改正。中国是个大国，但是现在还是不富不强，希望经过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后，变为一个又富又强的国家。**西藏是很有前途的地方，希望你们好好做去。很高兴地看到你在信里附寄的西藏鲜花，我在这里也附寄一朵给你。希望经常看到你的信，随便写几句，不拘形式，就是好的。余事请问张国华同志。我已嘱咐张国华同志，叫他好好向你请教。

祝你健康愉快！

毛泽东 1955年11月24日

尔后，毛泽东又给班禅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亲爱的班禅额尔德尼：

你在1955年8月13日给我的信收到了，很感谢！你们那里工作有进步，听了很高兴。希望你们和拉萨方面的团结日益增进和巩固。希望整个西藏一年一年地兴旺起来。此复

顺祝健康！

毛泽东 1955年11月24日

接着，他给湖南省教育厅副厅长兼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校长周世钊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惇元兄：

你的信好久就收到了，你的大作及附件各种都已读悉，极为感谢！嘱写的字至今未能应命。你那里还不那样急需罢，我想等一等再讲，如何？你下去跑没有？最好一年下去跑几次，每次两三星期也好。我最近出外跑了一次，觉头脑清新得多。你下去时，不只看学校，还可看些别的东西。再谈。

顺问教安

毛泽东 1955年11月24日

11月26日，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致电铁托等，祝贺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电文中说：

“中、南两国人民过去在争取自己祖国独立和解放的斗争中就存在着深厚的友谊。中、南两国的友好合作自从两国外交关系建立以来，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我们相信，这种友好合作还会不断地得到加强和发展。”

11月27日，毛泽东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传达和讨论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等文件的指示稿，他加写了两段话：

“四、在12月下半月内，你们要召开一次关于研究改善我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的会议，准备派人出席在明年1月10日左右由中央召开的讨论这个问题的会议的意见和材料。此事将另有通知。”

“五、中共中央七中全会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的修正本，日内即可送给你们。”

11月28日，毛泽东就西藏贸易等问题，在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李先念、李维汉的信中写道：

刘、周、陈、小平、李先念、李维汉同志：

**和张国华谈了一次，他提出对西藏贸易每年赔钱1800万至2000万元以求降低物价的计划，我认为很值得注意，似应实行他这个计划。**因为我们去后，粮价涨了几倍，茶价涨了两倍，百货也涨了60%，这对西藏人民是很不利的，长此下去，什么改革都谈不到，最后可能引起失败。因为西藏不能和新疆、内蒙相比，那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要用特殊的办法解决。而目前行得通的办法，就是经济上长期补贴办法。**西藏面积很大，地质形成较全国许多地方为晚，很可能有极大的地下蕴藏，有待将来开发，目前赔一点钱，将来会补偿的。**此事请陈云、先念、小平研究一下，在张国华走前，在书记处一谈。

附件请一阅。

毛泽东 11月28日

阅后退毛

11月28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日本前首相片山哲为团长的“拥护宪法国民联合会”访华团，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董必武、李济深、沈钧儒等在座。毛泽东在谈话中说：

“我们两个国家、两个民族、两国人民的合作对于亚洲和世界和平是有利的。鉴于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现在世界大多数的国家都希望着和平。联合公报中相互保证尊重国家主权、互不侵犯、互相不干涉内政的规定是很好的，是尊重目前世界上的实际情况的。**战争已经结束了10年，美国还占领着日本，有将近一千个军事基地，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束缚着日本，这同战争刚结束后美国的占领日本，是两回事。很明显的现在是美国侵犯了日本，美国的占领日本，性质是侵略的。我们相信，日本人民有能力用各种方法包括非战争的方法把美国从日本赶出去。同样美国也侵占着中国的台湾。我们中、日两国都要求完全独立。”**

11月29日，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在题目下写了一个说明：

（这个文件曾经在1955年11月16日至24日中央政治局召集的有各省委、自治区党委和市委的代表参加的会议上，进行了讨论，并且作为草案通过。）

尔后，他批示道：

小平、尚昆同志：

此件请将题目下括弧内的几句话加上，即付排，先打清样7份，于本日下午分送刘、周、朱、陈云、彭真、小平及我（送前标出修改的地方），再看一次，即可印发。

毛泽东 11月29日

11月30日，毛泽东审阅中共甘肃省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两个报告，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甘肃省委并告青海、陕西、四川、云南、贵州、湖南、福建、热河省委及其他各省市区党委的指示电，他写道：

“看了甘肃省1955年11月10日关于批判‘甘肃落后论’等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报告和11月23日关于合作化进展情况的报告，我们认为你们的路线是正确的，只是合作化的发展计划小了一点。”“你们应当改变这个计划，将已经积极要求入社占总农户40%的农户，就在今冬明春分两批吸收入社，连同已入社的农户，共达50%左右，这样你们就主动了，明年秋冬再来一个浪潮，就可以基本上合作化了。这样做对于用全面规划的方法去发展生产和发展文化教育是很有利的。”

毛泽东根据中南、华东、华北、东北16个省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比例，大多数的省已经达到50%以上等情况，在指示中写道：

“看来各省群众的积极性都很高，如果今冬明春全国各省入社农户最少的能达40%以上，则可以肯定1956年下半年全国各省（除新疆自治区）均可以基本上完成初级形式的合作化，这对今后的工作极为有利。你们的意见如何，请你们和各地委联系加以研究，电告为盼。”

进入12月份以后，毛泽东将主要精力用在重新编辑、修改《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书上，田家英在他身边协助做一些编辑工作。

在此后近20天的时间里，毛泽东全神贯注，仔细精选材料，认真修改文字。有的材料文字太差，他像批改学生的作文一样，在材料中写上了密密麻麻的修改文字。他还把一些冗长、累赘、看了让人头痛的标题，改得鲜明、生动、有力，引人入目，又突出了文章的主题思想。有一篇材料的题目是：《天津东郊区庄子乡民生、民强农业生产合作社如何发动妇女参加田间生产》，共31个字，毛泽东将其改为《妇女走上了劳动战线》，只用了9个字，简单明了，又抓住了主题。有一篇材料的题目是：《大泉山怎样由荒凉的土山成为绿树成荫、花果满山》，毛泽东将其改为《看，大泉山变了样子！》。

且说1955年12月2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关于西藏等问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康生、彭德怀、邓小平、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邓子恢、陆定一、陈伯达、王首道、李维汉、张经武、张国华出席。

12月4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复甘肃省委并告上海局、各省市区党委的指示电。

中共甘肃省委在12月2日关于全省农业合作化速度问题的报告中说：中央11月30日对我省农业合作化规划速度的指示是完全正确的。我省农业合作化的发展规划确实是小了。根据目前各地合作化进展的实际情况看，**在今冬明春的一个浪潮中，入社农户数发展到占总农户的75%左右是完全可能的。**毛泽东在指示电中写道：

“**像甘肃那样的情况，我们的意见，今冬明春分作两批，共发展到占总农户40%多一点，如果不勉强，则占总农户50%多一点也可以，再多就可能不适合了。**1956年下半年再一个浪潮达到占农户80%左右，那就很好。**你们说在今冬明春的一个浪潮中，发展到占总农户‘75%左右是完全可能的’，这个数字太大，以控制在40%左右或50左右为宜。**”

12月4日，毛泽东在新华社12月3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239期刊载的一则消息《江苏省农村宰杀耕牛现象严重》一文旁批示道：

陈云同志：

此件中江苏一条消息请看一下。这个问题，请在研究曾希圣提出的问题的时候，全面地研究一下，替中央起草一个回答曾希圣并告各地的电报，能在一星期内外，写好发出就好。

毛泽东 12月4日

12月5日，刘少奇在中央召开的座谈会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要求各条战线要批判“右倾保守”思想。他批评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不积极，太慢了”，要求手工业合作化到1957年达到70％到80％。

周恩来、朱德、陈云等人针对手工业改造高潮中出现的问题，都作了阐述。

12月1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上海局、各省委、自治区党委关于《征询对农业十七条意见》的通知。通知中说，中央提出准备在1956年1月10日中央召集有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会议上加以确定，以便纳入1956年的计划，认真开始实行。

12月15日晚20时，徐冰电话通知卫立煌说，毛主席有事商谈，希即准备，马上派车来接。

卫立煌来到中南海毛泽东住处，见傅作义、张治中等人先已到了，还有徐冰陪同在侧。毛泽东说，这次是请大家来谈谈话，交换意见。

谈话的内容包括怎样安排被俘的国民党军事将领等问题。

12月20日，毛泽东重编《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书的工作全部结束。收入这本书的按语共有104篇，计4万多字，其中有他写于9月份的19篇未作任何改动，也有一些是他在9月所写而在12月又加以修改的，其它的全都是他在12月份新写的。

通观毛泽东撰写的按语，无论其内容的重要性和广泛性，还是其文字的尖锐性和抒情性，所有在12月份写的都远远超过了9月份所写的。他在《书记动手，全党办社》一文的按语中写道：

“遵化县的合作化运动中，有一个王国藩合作社，23户贫农只有3条驴腿，被人称为‘穷棒子社’。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在3年时间内，‘从山上取来’了大批的生产资料，使得有些参观的人感动得下泪。我看这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难道6万万穷棒子不能在几十年内，由于自己的努力，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又富又强的国家吗？**”

他在《这个乡两年就合作化了》一文的按语中写道：

**“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那些在革命时期还只会按照常规走路的人们，对于这种积极性一概看不见。他们是瞎子，在他们面前出现的只是一片黑暗。他们有时简直要闹到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程度。这种人难道我们遇见的还少吗？这些只会循着常规走路的人们，老是对于人民的积极性估计过低。一种新事物出现，他们总是不赞成，首先反对一气。随后就是认输，做一点自我批评。第二种新事物出现，他们又按照这两种态度循环一遍。以后各种新事物出现，都按照这个格式处理。这种人老是被动，在紧要关头老是止步不前，老是需要别人在他的背上击一猛掌，才肯向前跨进一步。**”

他在《谁说鸡毛不能上天》一文的按语中写道（全文）：

这一篇很好，可以说服很多人。这个地方的党组织，在合作化的问题上，从来没有动摇过。它坚决地支持贫苦农民的办社要求，在和富裕中农的竞赛中取得了胜利，由小社变大社，年年增产，不到3年，实现了全村合作化。**富裕中农说：“穷光蛋想办合作社哩，没有见过鸡毛能上天。”鸡毛居然飞上天去了。这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在中国，富农经济很弱（在土地改革时期，征收了他们的半封建的那部分土地，老富农大多数已无雇工，他们在社会上的名声又很坏），富裕的和比较富裕的中农的力量却是相当强大的，他们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在中国的农村中，两条道路的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通过贫农和下中农同富裕中农实行和平竞赛表现出来的**。在两三年内，看谁增产：是单干的富裕中农增产呢，还是贫农和下中农组成的合作社增产呢？在开头，只是一部分贫农和下中农组成的合作社，同单干的富裕中农在竞赛，大多数的贫农和下中农还在那里看，这就是双方在争夺群众。**在富裕中农的后面站着地主和富农，他们是有时公开地有时秘密地支持富裕中农的。在合作社的这面站着共产党，他们应当如同安阳县南崔庄的共产党人那样，坚决地支持合作社。**但是，可惜，并不是每一个乡村的党支部都是这样的。在这种情形之下，就造成了混乱。首先是鸡毛能不能上天的舆论问题。这当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几千年以来，谁人看见过鸡毛能够上天呢？这似乎是一个真理。如果党不给以批评，它就会使许多贫农和下中农感到迷惑。其次，在干部方面，又其次，在物质力量例如贷款方面，如果都得不到党和国家的支持，合作社就会发生很大的困难。**富裕中农之所以敢于宣传鸡毛不能上天一类的从古以来的真理，就是因为合作社还没有增产，穷社还没有变成富社，个别的孤立的合作社还没有变成成千成万的合作社。就是因为党还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宣传合作化的好处。还没有明确地指出“鸡毛不能上天”这个古代的真理，在社会主义时代，它已经不是真理了。穷人要翻身了。旧制度要灭亡，新制度要出世了。鸡毛确实要上天了。在苏联，已经上天。在中国，正在上天。在全世界，都是要上天的。**我们的许多地方党组织没有能够给贫苦农民以坚决的支持，也不能完全怪它们，**上面还没有给机会主义思想以致命的打击，还没有给合作化做出全面的规划，并且在全国范围内加强对于这个运动的领导。**1955年，我们做了这些工作，几个月工夫，形势就完全不同了。站在那里看的广大群众，一批一批地站到合作化这边来了。富裕中农也改变了腔调。有些要求入社，有些准备入社。最顽固的，也不敢议论鸡毛能不能上天的问题了。地主和富农，一点神气也没有了。这同人民政府惩治了一批破坏治安和破坏合作化的反革命分子，也是有关系的。总之，1955年的下半年，我国的阶级力量对比起了一个根本的变化，社会主义大为上升，资本主义大为下降。1956年再有一年的努力，过渡时期内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就可以从基本上奠定了。

他在《机会主义的邪气跨下去，社会主义的正气升上来》一文的按语中写道：

“**有些人虽然顶着共产主义者的称号，却对于现在要做的社会主义事业表现很少兴趣。他们不但不支持热情的群众，反而向群众的头上泼冷水。”**“1955年上半年是那样的乌烟瘴气，阴霾满天。1955年下半年却完全变了样，成了另外一种气候，几千万户的农民群众行动起来，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实行合作化。到编者写这几行的时候，全国已经有六千万以上的农户加入合作社了。**这是大海的怒涛，一切妖魔鬼怪都被冲走了。社会上各种人物的嘴脸，被区别得清清楚楚。党内也是这样。**”

他在《在合作化运动中，工人家属的积极性非常高》一文的按语中写道：

“这也是一篇很有兴趣的文章。**想要阻挡潮流的机会主义者虽然几乎到处都有，潮流总是阻挡不住的，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地前进，把一切绊脚石抛在自己的后头。**”

他在《一个违背领导意愿由群众自动办起来的合作社》一文的批语中写道：

“这是一篇动人的叙述，希望读者好好地看一遍。**特别要请那些不相信广大农民群众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的同志和那些动不动就想拿起刀来‘砍掉’合作社的同志好好地看一遍。现在全国农村中，社会主义因素每日每时都在增长，广大农民群众要求组织合作社，群众中涌出了大批的聪明、能干、公道、积极的领袖人物，这种情况十分令人兴奋。**”“不要重复叶公好龙那个故事，讲了多少年的社会主义，临到社会主义跑来找他，他又害怕起来了。”

他在《高级社利益最大，而且并不难办》一文的按语中写道：

“看完这一篇，使人高兴。希望大家细心一读。希望一切条件成熟了的初级社，将这一篇向社员们宣读一遍，并且加以讨论，以便动员他们高兴地并社升级。这个浙江省慈溪县五洞闸合作社的了不起的事例，应当使之传遍全国。”

他在《勤俭办社》一文的按语中写道：

“这里介绍的合作社，就是王国藩领导的所谓‘穷棒子社’。勤俭经营应当是全国一切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方针，不，应当是一切经济事业的方针。**勤俭办工厂，勤俭办商店，勤俭办一切国营事业和合作事业，勤俭办一切其它事业，什么事情都应当执行勤俭的原则。**这就是节约的原则，节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

他在《一个在三年内增产百分之六十七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一文的按语中写道：

“曲阜县是孔夫子的故乡，他老人家在这里办过多少年的学校，教出了许多有才干的学生，这件事是很出名的。可是他不大注意人民的经济生活。他的学生樊迟问起他如何从事农业的话，他不但推开不理，还在背后骂樊迟做‘小人’。现在他的故乡的人民办起社会主义的合作社来了。经过了两千多年仍然是那样贫困的人民，办了3年合作社，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都开始改变了面貌。这就证明，**现在的社会主义确实是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比起孔夫子的‘经书’来，不知道要好过多少倍。有兴趣去看孔庙孔林的人们，我劝他们不妨顺道去看看这个合作社。”**

12月21日，毛泽东会见了泰国经济文化秘密访华团，他在会见中的谈话全文如下：

**我们中国可以同泰国贸易。泰国要卖几十万吨大米给中国，我们是可以买的。我们还可以买一些橡胶。你们需要什么呢？要钢，要铁，我们都有。要轻工业品我们也有。至于日用品，你们应该自己设厂生产。我们可以帮助你们设轻工业工厂。目前可以帮助你们设棉纺厂、造纸厂和糖厂。你们可以用大米、橡胶来换。如果你们需要，我们还可以派技术人员去帮助你们设计工厂，完工后他们就回来，把工厂全部交给你们。**

对銮披汶总理、乃炮警察总监和乃练的致意，我表示感谢。我们希望大家合作团结起来，希望銮披汶同乃炮团结起来。中国并没有什么秘密，我们不是当面一套，背后另一套，我们只有一套，没有两套。这一点你们到印度和缅甸去就可以向他们了解。你们和我们接触再多一些，时间久些，也就可以了解到。

中国会不会侵略你们？你们可以看，看他十年八年。中国尊重不尊重你们，是不是把你们当做兄弟看待，你们也可以看。看他多少年，就可以看清楚了。还有一点，我们究竟讲不讲道理，你们也看吧。有人说共产党是不讲道理的，不讲信义的，不好惹的，过去闹过别扭，就不好做朋友了，你们也可以看吧！**美国同我们的别扭闹得最大，我们都还想同美国做朋友，就是美国它不干。我们想干，它不干，那有什么办法呢？只好等吧。**

**你们的做法要慎重，美国是会下毒手的，要小心。**你们当初提出要秘密地来，当我们了解你们的困难后，就同意了。我们要慢慢地、逐步地改进中泰关系。銮披汶同乃炮应该团结，团结对泰国有利。**美国希望你们不和，内部争吵。它制造这派反对那派，那派反对这派，是为了乘机捣鬼。**这次你们来很好，以后有机会再来。我们也可以派人去你们那边访问，只要你们愿意，我们就可以去；如果你们不方便，我们也可以不去。**如果我们去了，美国会同你们找麻烦，造成你们的困难，那我们也可以不去。我们也不在你们国家讲共产主义，我们只讲和平共处，讲友好，讲做生意。我们不挑起人家来反对他的政府。**吴努总理害怕我们挑起缅甸共产党来反对吴努政府，我们说，我们只承认你们一个政府，一个国家不能同时有两个政府。**你们国内也有共产党，我们也不去挑起他们来反对你们的政府。**

泰国有华侨，加入你们国籍的，就算泰国人了，没有加入泰国籍的才是中国人。要不华侨很多，人家会害怕。**我们国外华侨的共产党组织也取消了，以消除华侨所在国政府的怀疑，使大家互相信任。**我们究竟是否说的一套，做的一套，那你们也可以看。口说无凭，你们以后还可以看事实。看的时间久了，就看清楚了。

后来，泰国秘密访华团同中国政府签订了《中泰贸易会谈纪要》。这次秘密访华的成功，促成了泰国人民促进友好访华代表团在1956年1月间的公开访华。

欲知中泰关系以后如何发展，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为重编的《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书撰写的按语，值得仔细玩味。这些里程碑一般的文章，记载了那一时代的辉煌历史。他写道：**“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那些在革命时期还只会按照常规走路的人们，对于这种积极性一概看不见。他们是瞎子，在他们面前出现的只是一片黑暗。他们有时简直要闹到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程度。这种人难道我们遇见的还少吗？”**“**有些人虽然顶着共产主义者的称号，却对于现在要做的社会主义事业表现很少兴趣。他们不但不支持热情的群众，反而向群众的头上泼冷水。”“这是大海的怒涛，一切妖魔鬼怪都被冲走了。社会上各种人物的嘴脸，被区别得清清楚楚。”“想要阻挡潮流的机会主义者虽然几乎到处都有，潮流总是阻挡不住的，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地前进，把一切绊脚石抛在自己的后头。**”这些激情四射、掷地有声的文字，毫无疑问，将会永远彪炳史册！

**第20章**

**“让他们封锁吧，封锁个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自己解决了。”**

话说1955年12月21日夜，毛泽东来到杭州，住进了西子湖畔的刘庄，准备主持召开修改《农业十七条》的会议。

这一天，他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给上海局、各省委、自治区党委的《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的通知（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全文如下：

今年11月间毛泽东同志在杭州和天津分别同14个省委书记和内蒙自治区党委书记共同商定的《十七条》，中央认为应当于1月10日中央召集的有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会议上，加以确定，以便纳入1956年的计划，认真开始实行。为此目的，请你们于接电后即召集所属各地委书记和一部分县委书记详细研究一下：甲、究竟是否全部可以实现，还是有一部分不能实现，实现的根据是否每条都是充分的；乙、除了《十七条》以外，是否还有增加（只要是可行的，可以增加）；丙、你们是否准备立即纳入你们的1956年计划内开始实行。以上各点，请你们于1956年1月3日以前研究完毕，准备意见。

《十七条》内容如下：

一、农业合作化的进度。1956年下半年基本上完成初级形式的建社工作，省、市、自治区（除新疆外）一级的指标以要求完成75%的农户入社为宜，让下面超过一点，达到80%至85%左右。合作化的高级形式，争取于1960年基本上完成，是否可以缩短一年，争取于1959年基本上完成。为此，需要于1956年由县最好由区直接掌握每县或者每区办一个至几个大型（100户以上的）高级社，再于1957年办一批，这两批应占农户25%左右，以为榜样。这样是否可能？又由小社变大社，规模如何？一乡几社，一乡一社，数乡一社，3者是否都可行？全国总社数30万个，或者40万个，或者50万个，究以何者为宜？苏联是10万个社，我国是否以30几万个社或者40万个社为适宜？又先并社后升级为好，还是并社升级同时进行为好，还是先升级后并社为好？以上各点请你们一并加以研究。

二、地主、富农入社，1956年是否即照安徽、山西、黑龙江等省的意见办理，即好的许其入社，不好不坏的许其在社生产，不给社员称号，坏的由社管制生产，凡干部强的老社均可这样做。**这样做好处很多，但是有一个缺点就是势必逼使那些目前还不愿入社的上中农勉强入社，并且让他们先入社，然后再让地富入社，才使他们面子上过得去。**这样是否有利？或者推迟一年，即到1957年才行上述办法。这二者哪一种有利些？请加研究。

三、合作社领导成份，由现有的贫农和原来是贫农的全部新下中农占三分之二，老下中农和新老两部分上中农占三分之一。

四、增产的条件：（甲）实行几项基本措施（内容待商，各地可以有些差别）；（乙）推广先进经验（每年收集典型例子，每省印成一本）。

五、**1956年一切省、地、县、区、乡都要做出一个包括一切必要项目的全面长期计划，着重县、乡计划，于上半年完成初稿，下半年定稿，以后还可修改。计划包括的时间，至少3年，最好7年，可以到12年。**此事必须抓紧去做，你们是否已有布置？因为无经验，有许多可能是很粗糙的，但是必须争取少数县、乡的计划比较接近实际，以利推广。

六、**全面规划保护和繁殖牛、马、骡、驴、猪、羊、鸡、鸭，特别要保护幼畜。**繁殖计划待商，请你们准备意见。

七、**同流域规划相结合，大量地兴修小型水利，保证在7年内基本上消灭普通的水灾旱灾。**

八、在7年内，基本上消灭十几种不利于农作物的虫害和病害。

九、**在12年内，基本上消灭荒地荒山，在一切宅旁、村旁、路旁、水旁，以及荒地上荒山上，即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均要按规格种起树来，实行绿化。**

十、**在12年内，大部分地区90%的肥料，一部分地区100%的肥料，由地方和合作社自己解决。**

十一、**在12年内，平均每亩粮食产量，在黄河、秦岭、白龙江、黄河（青海境内）以北，要求达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500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800斤。**棉花、油料、大豆、丝、茶、黄麻、甘蔗、水果等项指标，请你们提出计划数字，待商。

十二、**在7年内，基本上消灭若干种危害人民和牲畜最严重的疾病，例如血吸虫病、血丝虫病、鼠疫、脑炎、牛瘟、猪瘟等。**请你们研究各省区的地方病，那些是7年内可以基本上消灭的，那些是要延长时间才能消灭的，那些是目前无法消灭的。

十三、除四害，即在7年内基本上消灭老鼠（及其他害兽），麻雀（及其他害鸟但乌鸦是否宜于消灭，尚待研究），苍蝇，蚊子（后来在1963年3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中说：“再有一事，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子’。”——笔者注）。

十四、**在7年内，基本上扫除文盲，每人必须认识1500到2000个字。**

十五、**在7年内，将省、地、县、区、乡的各种必要的道路按规格修好（其中有些是公路，有些是大路，有些是小路）。**

十六、**在7年内，建立有线广播网，使每个乡和每个合作社都能收听有线广播。**

十七、**在7年内，完成乡和大型合作社的电话网。**

以上各项，请你们和有关同志加以研究，于1月3日以前准备完毕。中央可能于1月4日左右先行邀集若干省委书记开会研究几天，为1月10日的会议准备意见。

12月27日，毛泽东在刘庄为《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书重写了一篇序言，后来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时放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一文中，即“序言二”，全文如下：

这是一本材料书，供在农村工作的人们看的。本来在9月间就给这本书写好了一篇序言。到现在，过了3个月，那篇序言已经过时了，只好重新写一篇。

事情是这样的。这本书编辑了两次：一次在9月，一次在12月。在第一次编辑的时候，收集了121篇材料。这些材料所反映的情况，大多数是1955年上半年的，少数是1954年下半年的。当时，曾经将这些材料印成样本，发给参加1955年10月4日至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扩大）的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和地委的负责同志阅看，请他们提出意见。他们认为需要补充一些材料。会后，大多数省、市、自治区送来了补充材料。在这些材料中间，有许多反映了1955年下半年的情况。这就需要重新编一次。我们从原来的121篇材料中删去了30篇，留下91篇，从新材料中选出了85篇，共计176篇，约有90万字，成了现在这个本子。收在这本书里的所有的材料，都经负责编辑的几个同志在文字方面作了一些修改，对于一些不易看懂的名词，作了一些注解；又按问题的性质作了一个分类索引。除此以外，为了批判某些错误思想和建议某些东西，我们还在一部分材料上写了一点按语。为了区别于在有些材料上原来刊物的编者所写的按语，我们写的按语，用了“本书编者”的名义。这些按语因为是在9月和12月两次写的，故在语调上也就有了一些差别。问题还不是简单地在材料方面。问题是在1955年的下半年，中国的情况起了一个根本的变化。中国的1亿1千万农户中，到现在——1955年12月下旬——已有60%以上的农户，即7千多万户，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加入了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我在1955年7月31日所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提到加入合作社的农户数字是1690万户，几个月时间，就有5千几百万农户加入了合作社。**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这件事告诉我们，只需要1956年一个年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再有3年到4年，即到1959年，或者1960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合作社由半社会主义到全社会主义的转变。**这件事告诉我们，中国的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应当争取提早一些时候去完成，才能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这件事告诉我们，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

**农业合作化的进度这样快，是不是在一种健康的状态中进行的呢？完全是的。一切地方的党组织都全面的领导了这个运动。农民是那样热情而又很有秩序的加入这个运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最广大的群众第一次清楚地看见了自己的将来。**在3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即到1967年，粮食和许多其他农作物的产量，比较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最高年产量，可能增加100%到200%。文盲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例如7年至8年）加以扫除。**许多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例如血吸虫病等等，过去人们认为没有办法对付的，现在也有办法对付了。总之，群众已经看见了自己的伟大的前途。**

**现在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问题，已经不是批判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速度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也不是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按行业实行全面公私合营的速度方面的问题，这个问题也已经解决了。**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问题，在1956年上半年应当谈一谈，这个问题也会容易解决的。现在的问题，不是在这些方面，而是在其他方面。这里有农业的生产，工业（包括国营、公私合营和合作社营）和手工业的生产，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基本建设的规模和速度，商业同其他经济部门的配合，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工作同各种经济事业的配合等等方面。在这些方面，都是存在着对于情况估计不足的缺点的，都应当加以批判和克服，使之适应整个情况的发展。人们的思想必须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情况。当然，**任何人不可以无根据地胡思乱想，不可以超越客观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计划自己的行动，不要勉强地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但是现在的问题，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认为做不到。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

这本书是给在农村工作的同志们看的。城市里的人是不是也可以看看呢？不但可以看，而且应当看。这是新事情。如同城市里每日每时都在发生社会主义事业的新事情一样，乡村里也在每日每时的发生着。农民在做些什么呢？农民所做的，同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和一切爱国人士所做的有什么关系呢？为了要了解这些，看一看农村方面的材料是有好处的。

为了使更多的人了解现在农村的情况，我们准备从176篇材料中抽出44篇，约有27万字，印一个节本，使那些不可能阅读全书的人也能够接触这个问题。

后来，《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书在1956年1月出版时，毛泽东准备为这本书改一个新书名，他起先考虑叫《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后来又向田家英征求意见说：

“书名叫作《五亿农民的方向》如何？”

田家英说，书中有许多材料是反映反面情况的，并不能作为五亿农民的方向，不如仍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好。毛泽东欣然接纳了田家英的意见，遂将该书定名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他还对田家英说，他很高兴，1949年全国解放时都没有这样高兴。

且说12月30日下午，刚刚访日归来的以郭沫若为团长的科学家代表团大部分成员从上海来到了杭州。他们正要吃晚饭，突然接到了一个赴宴的通知，便从宾馆乘车出发了。42岁的物理学、金属学工作者葛庭燧问代表团副秘书长、中宣部办公室主任熊复：

“我们这是到哪儿去呀？”

熊复说：

“我们要去见毛主席。”

天色已近黄昏，车队来到丛林中的一块草坪上，毛泽东正站在圆圆的篱笆门前等候科学家们。他和每一位科学家亲切握手，大家跟着他进了篱笆门，走过一段园林路，来到一间宽敞的大厅里。毛泽东招呼大家落座，满面笑容地说：

“你们这次出国访问的担子可不轻啊！”

郭沫若向毛泽东汇报了访日的情况。原来，他率领的代表团成员有北大历史系主任翦伯赞，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副所长尹达、中山大学副校长冯乃超、复旦大学教务长苏步青、北京医学院药学系主任薛愚、水利部设计院总工程师汪胡祯、中国科学院生理生化研究所所长冯德培、中国科学院应用化学研究所所长吴学周、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研究员葛庭燧、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副主任茅以升等11位科学家及熊复等4名随员。因为没有直达航班，代表团只能选择从香港转机，12月1日到达东京。在日本期间，郭沫若率团紧密围绕“访问目的”，与日本各界人士进行友好接触，至25日结束，访问取得了巨大成功。

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

“一切事情都是在变的嘛！”

郭沫若又汇报了代表团各个团员在日本各地活动的情况，说到了关于武汉长江大桥和三门峡工程的报告深受日本科技界的赞扬。毛泽东满面春风，高兴地说：

**“让他们封锁吧，封锁个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自己解决了。”**

郭沫若把曾经主持修建钱塘江大桥、现任铁路研究院院长兼武汉长江大桥技术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茅以升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爽朗地说：

“啊！我们是本家嘛！”

茅以升向毛泽东汇报了钱塘江大桥兴建经过。毛泽东说：

“你的钱塘江大桥我已经走过8遍了，你为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现在又主持修建武汉长江大桥，希望你再立新功。”

郭沫若指着葛庭燧向毛泽东介绍说：

“他是代表团中最年轻的一员，在日本东京大学和其它城市作的几次学术报告很受欢迎。”

毛泽东说：

“好嘛，要赶上去嘛，要培养年轻人嘛。”

正说着，服务员来请大家到大厅另一端就餐。毛泽东和十几位科学家围坐在一起，葛庭燧就坐在他身边。他亲切地劝大家多吃菜，多饮酒。葛庭燧也端起酒杯向毛泽东敬酒。吃完了饭，服务员端来了桔子。毛泽东让大家吃桔子，还亲手递给葛庭燧一个，让他吃。众人离开餐桌，回到原来的地方继续谈话。毛泽东拿出香烟招待大家。葛庭燧说：

“我不会吸烟。”：

“青年人不吸烟是好事。你是哪里人呀？”

葛庭燧回答说：

“我是山东蓬莱县人。”

“蓬莱是个好地方，出神仙啊！”毛泽东笑着说：“你们那里还出了个吴大帅！”

葛庭燧说吴佩孚是“二七”惨案的罪魁祸首。毛泽东连连点头，说：

“好啊，要学点革命历史啊！”

茅以升向毛泽东汇报了全国铁路建设情况。毛泽东说：

**“中国的铁路太少了，今后我们要努力建设新铁路。在今后15年内，应完成8条铁路新线，其中包括成都至昆明、昆明至贵阳、贵阳至长沙等线，用来连通云南、四川、贵州、湖南4省，形成大西南的铁路交通网。**”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送科学家们去上车。他边走边问茅以升：

“你是哪里人？”

茅以升回答说：

“镇江人。”

毛泽东笑呵呵地说：

“镇江有个甘露寺，是全国出名的。《三国演义》上说，刘备在那儿招亲，实际不对。孙权是把他妹妹送到荆州成婚的。”

12月31日，陈毅应召来到刘庄，参加即将召开的修改《农业十七条》的会议。

是日晚，陈毅来到毛泽东住处，和毛泽东谈了一个多小时。

1956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过毛泽东修改的《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的社论，首次提出了“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针。社论中说：

“在工业、文教事业的面前，就摆着一个问题：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发展自己的事业。**必须又多又快，才能赶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必须要好，要保证质量，反对不合规格的粗制滥造；必须要省，要用较少的钱办较多的事，以便用可以积累起来的财力来办好一切应该办而且可以办的事情**。**又多又快，是反对保守主义，又好又省，是反对潦草从事，盲目冒进，铺张浪费。又多、又快、又好、又省，这四条要求是互相结合而不可分的，**遵守这四条要求，我们就能按照社会主义经济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法则，来进行全面规划。这样做法，我们就完全有可能，在工业建设和文教建设方面，也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第1个‘五年计划’，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这里一定会有困难，但这是应当办而且办得到的事情，困难是可以解决的，应当根据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原则解决这些困难来提高发展速度，因此，这是稳步前进，而不是盲目冒进。”

元旦这天，首都北京的私营工商业者首先提出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的申请。这种申请已不是一户一户进行，而是一个行业又一个行业的进行了。

元旦节上午，陈毅在刘庄听取了浙江省委书记江华的汇报。

这天下午，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和江苏省委书记刘顺元来到刘庄，陈毅和他们交谈了两省的情况。

是日晚上，陈毅到毛泽东住所汇报工作。

1月3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部分省、市委和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即第2次杭州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谭震林、陈伯达、廖鲁言、陈毅、柯庆施、罗瑞卿、陈丕显、张仲良、张德生、陶鲁笳、林铁、黄欧东、李井泉、舒同、曾希圣、刘顺元、江华、江一真、吴芝圃、王任重、周小舟、陶铸、陈漫远、杨尚奎，共计25人。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审议并修改《十七条》。

1月5日晚，陈毅和廖鲁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将《农业十七条》这个题目改定为**《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

1月9日，经过杭州会议再次修改的《1956 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已经形成为40条的大文章了。这个草案准备提交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

是日下午，毛泽东在《对“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稿的修改和给周恩来的信》中写道：

“兴修水利，保持水土。一切大型水利工程，由国家负责兴修，治理为害严重的河流。一切小型水利工程，例如打井、开渠、挖塘、筑坝和各种水土保持工作，均由农业生产合作社有计划地大量地负责兴修，必要的时候由国家予以补助。”

这一天，毛泽东在陈毅陪同下，离开刘庄来到上海。

这天晚上7点半，复旦大学数学教授苏步青应邀到南京西路中苏友好大厦来见毛泽东。陈毅介绍以后，毛泽东握着苏步青的手说：

“欢迎数学教授，社会主义需要数学。”

说罢，他示意苏步青落座。在座的还有周谷城和著名医学教授黄家驷及电影界的著名人士赵丹和沈浮。毛泽东问坐在他旁边的周谷城：

“在长沙游泳时的照片还有吗？”

正说话间，上海警备区的欧阳政委领着上官云珠来了。上官云珠见坐在正中沙发上的那位面目慈祥而又似曾相识的老人，正与陈毅和几位社会名流谈笑风生，一下子便楞住了，差点叫出声来，毛主席！这不是毛主席么？

原来，上官云珠与丈夫何路正在建国西路一幢公寓的新家里收拾东西，陈毅的轿车司机突然来找她，递给她一个牛皮纸大信封，上面写着上官云珠的名字。上官云珠拆开信封，展开一张竖格8行的毛边纸信笺，只见上面写着：上官云珠同志：请你来一次。陈毅。上官云珠知道陈毅是上海市长，可她还从未和陈毅打过交道，也不认识陈毅的字迹，心中不免有些迟疑。何路接过信看了，劝她还是去看一看，说是不会有人这么大胆敢冒充陈毅的。上官云珠便换了衣服，上了车，来到了中苏友谊大厦，欧阳政委上前迎接。上官云珠问道：“欧阳政委，你知道陈毅同志找我有啥事呀？”欧阳政委笑笑说：“总是好事么，你一到里面就知道了。”

毛泽东见上官云珠来了，便从沙发上站了起来。上官云珠急忙上前，双手紧紧握着毛泽东伸过来的大手，问候道：

“毛主席，您好！”

“你坐这儿。”毛泽东拉她坐到自己的旁边，风趣地笑着说：“真是应了那句老话了，‘说曹操，曹操就到’，我们刚才正在说你呢。”

上官云珠不禁又是一愣：

“说我？说我什么呢？”

“说你《南岛风云》演得好。”毛泽东说：“我也看了影片，感觉和大家一样，你把那个女英雄演活了。大家都没有想到，以前娇滴滴的阔太太竟有七十二般变化的本领，一下子给我们变成了一个在风雨中成长起来的女英雄。”

众人闻言，都忍不住笑了。毛泽东接着说：

“这次演了个女战士，我看像个战士嘛！不过，为了演好这个角色，你一定卖了很大力，吃了不少苦吧。话又说回来，没有一番风霜苦，哪得梅花扑鼻香啊。我希望你今后不停留于现在，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让我们看到你越来越好的银幕形象。”

上官云珠连忙说：

“谢谢毛主席，我一定好好努力。”

“上官云珠？这个名字很漂亮。”毛泽东说罢，又问上官云珠：“是你艺名还是真名呀？”

上官云珠回答说：

“我原姓韦，名均荦，字超群。上官云珠这个名字，是我刚刚涉足电影界时一位导演给起的。”

陈毅介绍说：

“她可是一位坚强的女性哟，在解放前，受过不少的磨难。我听说，上海解放前夕，有人劝她走，她硬是拿定了主意，留下来了。前几年，演员们下工厂，下农村，与工农兵结合，吃苦受累，我们这位艺术家热情还蛮高哩。”

“这就好。”毛泽东说罢，转向上官云珠：“解放前，我们的许多名演员，演惯了老爷太太，先生小姐。可工人农民呢，演不来，原因就是他们和工农接触少，不了解。但是归根结底，推动历史前进的却是他们。所以，我们的艺术家现在就应该补上这一课。其实，过去在延安时，我们有些人就已经这样做了，他们创作出了一批好东西。虽然那些东西还不见得那么完美，但却是真正地来源于生活，让人看了以后能受感动，能思考一些问题。《白毛女》你看了没有？”

上官云珠说：

“看过了。”

毛泽东说：

“我已看过好几次了，每次都泪流满面。我相信，这些不完美的东西总比那些胡编乱造无病呻吟的好！”

谈话已经进行了一个多小时，苏步青用心的数着毛泽东在这中间就抽了三四根香烟。黄家驷劝毛泽东少抽点香烟，毛泽东笑着问他：

“有没有八九十岁的老人还在抽香烟？”

该吃饭了，服务员端上来酒菜，众人围坐在一个圆桌旁，大家纷纷向毛泽东敬酒，毛泽东举杯一饮而尽，突然脱口说：

“这是水嘛！”

工作人员担心毛泽东喝酒多会影响身体，就悄悄地在他的酒杯里加了大半的白开水，没想到被他一语道破，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1月10日，北京市召开公私合营大会，宣布全市35个私营工业行业的3990家工厂，42个私营商业行业的13973家商店，共17963户，经批准全部实行公私合营。

1月10日这一天，毛泽东在上海市长陈毅陪同下，要去视察上海公私合营申新九厂。此时，荣毅仁正在公司里上班，陈丕显给他打电话，要他速回家中。荣毅仁便匆匆赶回，陈丕显已经在那里等他了。陈丕显说：

“毛主席来上海了，要去视察申新九厂，我们马上去厂里。”

他们赶到厂里不久，毛泽东也到了，他一下车，就对荣毅仁说：

“我来了。”

原来在1955年10月间，荣毅仁在北京的一次会议上向毛泽东发出邀请，希望他能抽空到上海去看看。荣毅仁没想到毛泽东果然如约而至了。毛泽东在申新九厂一边视察，一边和荣毅仁亲切交谈。

是日晚，毛泽东会见了上海80位工商界领袖。这些人都是私营企业的老板。毛泽东为了使这些企业界的巨头们不受拘束，说话时语调缓慢，如叙家常。

“你们怎么不抽烟？”他亲切地询问面前的听众，并且解释说：“**抽烟不一定对你们有害。丘吉尔一生抽烟，身体很健康。我所知道的唯一不抽烟而命长的人是蒋介石。**”

毛泽东在谈话中说，最近我在北京听说，有的商业资本家自己提出要国有化，他们不想在建设社会主义大厦的过程中拖后腿。毛泽东说我不相信，有怀疑，所以，我来到了上海。想听听诸位的意见。“我今天只带两个耳朵来参加会议。”

在两个小时的会见中，已经嗅出变化的资本家们，竞相表态要转向国营。结果，一个资本家星期一还是私营企业的老板，到了星期五就成了拿薪水的经理了。

在这次会见之后不久，有一则关于毛泽东的工作方法的故事，在上海各单位流传开来。这个故事讲的是：毛泽东召见刘少奇和周恩来，向他们提出了一个问题：

“你们怎样才能使猫吃辣椒？”

刘少奇说：

“这有何难！你让人抓住猫，把辣椒塞进它的嘴里，然后再用筷子捅下去。”

对于这种莫斯科式的解决方法，毛泽东很不赞同，他极其厌恶地摆摆手，说：

**“绝不能使用武力，每件事都应当是自觉自愿的。”**

周恩来一直在听着二人的对话，毛泽东要他谈谈看法。

“先让猫饿上3天，”周恩来回答道：“然后，把辣椒裹在一片肉里，如果猫非常饿的话，它会囫囵吞枣般的全部吞下去。”

毛泽东像不同意刘少奇的办法一样，也不赞成周恩来的办法。

“**不能用欺骗手段——绝不能愚弄人民。”**毛泽东坚决地说。他认为政治欺骗不能唤起人们的参与热情。他解释说：“这很容易嘛！把辣椒擦在猫的背上，让它感到火辣辣的，就会自己去舔掉辣椒，并为能这样做感到高兴。”

1月11日，毛泽东从上海来到南京，要到农村去看一看，和农村干部、社员谈一谈。

上午8时许，他在陈毅、谭震林、罗瑞卿、江渭清、彭冲等人陪同下，乘车来到南京玄武湖红光农业生产合作社，一边与前来迎接的生产合作社社长孙其金握手，一边问道：

“你是社长？叫什么名字？”

接着，他又指着一群正在干活的社员问道：

“那边的人在忙什么？”

孙其金回答说，社员们正在挖塘蓄水，准备浇菜地用。毛泽东就朝着挖塘的社员走去。女社员徐淑贞正好从塘底挑泥上来，毛泽东便问徐淑贞：

“你们挑塘泥作什么用？”

徐淑贞说：

“挑塘泥既能积肥，又能让塘里盛更多的水。”

毛泽东连连点头说：

“很好！很好！”

他又转问孙其金：

“你们男女社员是不是同工同酬呀，女劳力一年能得多少工分？”

孙其金回答说：

“是的，女社员和男社员干一样的活，就拿一样多的工分。女工一年能得二百三四十个工分。男的能得330个左右。”

毛泽东又问：

“一个劳动日能分多少钱？”

孙其金回答说：

“一块五角九分六。”

毛泽东扳着指头一算，对陪同的人员说：

“收入还不坏。”

他问身边其他的村里人：

“你们晓得合作社的性质是什么？”

合作社干部牛泰武回答说：

“是社会主义性质，按劳分配。”

毛泽东听后笑着说：

“嗬，你还是办社专家哩！”

接着，毛泽东一行来到了村里的社员俱乐部。社员任庆和正在俱乐部里打扫卫生，看见毛泽东来了，怕扬起灰尘，就停了下来。毛泽东连忙说：

“不要紧，不要紧。”

他一边说着，一边走了进来。俱乐部里放了很多课桌，陪同人员介绍说：

“这里是农民夜校，社员们晚上在这里学习文化。”

毛泽东见教室的墙上贴着一份名单，就问这名单是做什么用的？社员告诉他说：

“这是冬防值班名单。社里养了很多猪，怕夜里有狼来吃猪，所以要组织社员看夜。”

一位市委负责人插话说：

“1953年，有一只狼窜进南京城，吃了一个小孩。”

毛泽东严肃地说：

**“野狼闹南京城，这还得了！你们要搞好预防，保护好人民的生命财产！”**

走出夜校，毛泽东来到了村办的养猪场。有4名女社员正在清扫猪圈。毛泽东主动走上前去与她们一一握手。他看见猪圈里的小猪依偎着卧在一起，便风趣地说：

“你们看，这猪仔好团结哟！”

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此时已是半晌时分，毛泽东离开玄武湖红光农业生产合作社，又来到了栖霞镇的十月农业生产合作社。他问社长何昌椿：

“你年龄多大了？入党了没有呀？这里是什么时候土改的？土改以后农村的变化怎么样？”

何昌椿回答后，还告诉毛泽东说：

“这社是群众自发办起来的。”

毛泽东高兴地说：

“**办社就是要群众自愿。群众愿意办，你们干部又肯带头办，就能办好**！”

来到村头，毛泽东突然对江渭清说：

“渭清啊，上次我们谈过城市绿化的事，依你看这郊区的绿化该怎么搞法？”

本传前边说过，1953年2月下旬毛泽东在紫金山天文台谈过南京城市绿化的问题。如今江渭清见他又提到郊区绿化的问题，便回答说：

“我们已有部署了，根据具体情况作了综合安排，打算搞防风林、用材林、薪炭林和经济林。针对树木品种不同、生产快慢不同，搞长短接合、‘公孙三代’，不久就会见成效的。”

毛泽东又问：

“经济林是以什么品种为主呀？”

江渭清回答说：

“根据调查研究，很适合种水蜜桃树。”

毛泽东开心地说：

“这可好，将来南京地区的水果供应问题也就能够解决了，真正是造福后人啊。”

何昌椿引领着毛泽东在田埂上参观，毛泽东说：

“要把土地平整好，要准备使用机器生产。”

毛泽东环顾了一下四周，手指着北面的山坡问：

“那里有没有栽树啊？”

何昌椿说：

“新栽了一些桑树。”

毛泽东走上山坡，眺望着周围的几个山头，挥着手说：

**“把四周的山都栽上树更好，让荒山变果园，荒山变良田。”**

此时，社员们得知毛泽东来到了十月村，便从四面八方跑来，围在毛泽东身边。一群下课的小学生，也挤到了毛泽东身旁，并异口同声地说：

“真是毛主席，真是毛主席！”

毛泽东笑容满面地对小朋友们说：

“这可不能是假的啊！”

一位双脚沾满河泥的青年妇女也挤到了毛泽东跟前。毛泽东问她叫什么名字，她回答说：

“我叫余福珍！”

毛泽东指着身边的何昌椿说：

“你认识他吗？”

余福珍笑着说：

“认识，他是我们的社主任。”

毛泽东又问：

“他的工作怎么样？”

余福珍回答说：

“好，他带领我们办社。”

毛泽东高兴地说：

“你们社员都说好，那就好！”

毛泽东该走了，在上车前，他对社员和干部们说：

“你们要努力把合作社办好，过几年我再来看你们。”

上午10时许，毛泽东一行来到了南京无线电厂一车间。在机器轰鸣的车间里，毛泽东边观看精密镗床，边问陪同人员：

“这台机床是哪里制造的？”

厂总工程师李奉贤回答说：

“是外国的。”

毛泽东“哦”了一声说：

“我们国家能制造就好了。”

他看着正在操作划线的吴展兴，高兴地说：

“真行！能在钢板上划花。”

毛泽东看到青工李孝平躬着身子，要从地上把一块大约50斤重的工件往钳台上搬，他立即卷起袖子，快步来到小李身边蹲下，准备帮忙。旁边的一位老师傅赶忙把他扶了起来，其他的随行人员一起动手，帮小李把工件抬上了钳台。毛泽东拍拍小李的肩膀问道：

“你多大了？”

小李回答说：

“19岁！”

毛泽东关心地说：

“年纪还小，下次搬重的东西要两个人搬。”

上午11点刚过，毛泽东又来到四车间，听了车间主任陈奉桂的介绍后，便问道：

“你是我的老乡吗？”

陈奉桂激动地回答说：

“是！我是湖南人。”

毛泽东高兴地伸出手和陈奉桂握了握。

11时30分，毛泽东来到五车间，经过一条生产流水线时，他指着一个纸包问大家：

“这包的是什么？”

工人们回答说：

“这是加工好的零件。”

毛泽东又指着上面写了一个“毛”字的纸包风趣地问道：

“这是送给我的吗？”

厂里陪同的人介绍说：

“这零件是谁加工的，就在纸包上写上谁的姓。”

毛泽东又指着这包零件，笑着说：

“这厂里还有我的本家呢，那么这一包就是我加工的了。”

大家听了都笑了起来。

11时40分，毛泽东来到广场上，微笑着向欢呼的人群频频挥手致意，并对厂长说：

“时间不早了，向同志们问好！”

下午3时许，毛泽东一行来到南京军事学院。此时，院长兼政委刘伯承已率院、部、系领导和各教研室主任在门口迎接。在刘伯承的引导和介绍下，毛泽东一一与大家握手。当刘伯承介绍到宣传教育部部长郭奇时，毛泽东笑着说：

“我认识你，你是延安的大哲学家。”

郭奇是中共北平地下党员，曾参加过“一二·九”运动，是研究哲学的。1937年7月，郭奇从北平到了延安。当时他与很多到延安的知识分子一样，都想到前方去扛枪打仗，而作为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了解到这个情况后，特意来到延安城里的西北旅社找郭奇等人谈话。毛泽东对他们说：

“在抗大教学是很重要的，你们教好一个学员队，就有几十个连长，几十个连长到前线能起多大作用？要是教好几十个营长、几十个团长呢？”

毛泽东谈完话后，郭奇和其他同志都写了在抗大教书的决心书。从此，郭奇就一直在院校从事政治教育。

在刘伯承介绍战史教研室主任方正时，毛泽东风趣地说：

“你是方正，不但要方，还要圆，没有方圆不成规矩嘛！”

刘伯承和陈伯钧向毛泽东汇报了学院情况，毛泽东和院、部、系负责人等合影留念。毛泽东发表了简短的讲话，他说：

“党中央派刘伯承同志当军事学院院长是知人善任。希望大家在刘院长的领导下，把军事学院办得更好，把培养训练全军中高级干部的工作做得更出色。”

随后，毛泽东来到学院礼堂亲切接见了全体学员，希望大家要好好地总结过去革命战争年代的经验。他还兴致勃勃地在南京军事学院的室内游泳池畅游了一个多小时。

欲知毛泽东此后去向何方？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请读者诸君再认真地看一看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农业十七条》吧！用他的话说，在中国“一穷二白”的纸上，“**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这就是：“**在12年内，平均每亩粮食产量，在黄河、秦岭、白龙江、黄河（青海境内）以北，要求达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500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800斤。”“在7年内，基本上消灭若干种危害人民和牲畜最严重的疾病，”“在7年内，基本上扫除文盲”，“在7年内，建立有线广播网”，“在7年内，完成乡和大型合作社的电话网”。**这一副亘古未有、充满诗意、美妙无比的新中国未来建设蓝图的草图构架，能不使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来的5亿农民欢呼雀跃吗？这是空想吗？否！十几年后，毛公亲手绘制的蓝图果真变成了现实，矗立在世界东方的社会主义宏伟大厦，竟成了全球资本主义国家首脑朝拜的圣地。

**第21章**

**“经济上没有独立，科学上没有独立，文化落后，要实现现代科学**

**技术的革命，必须充分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无知、愚蠢是不行的。”**

话说1956年1月中旬，毛泽东在长沙站的专列上接见地方领导，他说：

“沩山我也去过，那里有个万佛寺，即密印寺，建筑得很雄伟，珍藏很多佛经。这个寺在日本也有一点名气。”

1月1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说：

“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

“我们目前的任务，就是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把各项工作进行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

1月15日，北京市各界20多万人冒着凛冽的寒风在天安门广场热烈庆祝全市实现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和农业、手工业实现合作化。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黄炎培等党政领导人出席了大会。毛泽东在城楼上先后接受北京市工商界、农民、手工业者代表送来的报喜信。

彭真市长在会上宣布说：

“我们的首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

接着，20多万群众举行了盛大的游艺活动。喜庆的群众在东西长安街一字排开，载歌载舞，锣鼓震天，狂欢的气氛弥漫在整个北京城。

1月17日，毛泽东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1月19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廖鲁言就王任重关于湖北省高级社发展计划打电话给中央农村工作部一事，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

王任重在电话中说：湖北正在召开地委书记会议，一部分人赞成省委的计划，在春耕前全省发展一万个高级社就停下来，到秋收前后再发展；而另一部分人则主张放手发展，于春耕前在全省基本实现高级合作化。王任重认为省委的计划是比较稳当的。他还说：最近一些报纸的宣传对一部分人的急躁情绪也有某种刺激作用。

毛泽东当即在廖鲁言的报告中批示道：

先送廖鲁言同志办，同意王任重同志的意见，控制在一万个左右。再送《人民日报》邓拓同志和新华社吴冷西同志，注意在宣传方面加以控制。

毛泽东 1月19日

1月2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最后一天，到会并讲了话。他针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中出现的问题说道：

“**搞社会主义羊肉不好吃了，这个社会主义就值得考虑了**。还有北京的烤鸭，南京的板鸭，云南的火腿，看来是退化了，还有各种布匹等等，花样少了，质量坏了。搞社会主义应该更好些。”“我们要把社会主义事业办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

毛泽东又说：

“我们的工作要加紧一点。现在我们的主动一天一天地多起来，农业改造方面主动更多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方面主动也更多了。但是，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没有主动，在工业方面没有主动。大多数重要装备要从外国进口，精密的仪器不能造，大的机器不能造，这上头我们没有主动。经济上没有独立，科学上没有独立，文化落后，要实现现代科学技术的革命，必须充分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无知、愚蠢是不行的。”

毛泽东着重讲了以下几点：

1、哪怕是知识分子中间的落后分子，也是可以改变的。党要加强领导，促进他们的改变，并且要看到他们的改变。2、现在我们是革什么命呢？现在是革技术的命，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要搞科学，要革没有文化、愚昧无知的命。3、搞技术革命，没有科技人员不行，不能单靠我们这些大老粗。这一点要认识清楚，要向全体党员进行深入的教育。4、我们国家大，人口多，资源丰富，地理位置好，应该建设成为世界上一个科学、文化、技术、工业各方面更好的国家。5、中国要培养大批知识分子，要有计划地在科学技术上赶超世界水平，先接近，后超过，把中国建设得更好。

毛泽东最后说：

“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

此后，全国出现了“向科学进军”的高潮。

1月2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陈毅、李富春及各部委负责人、各省负责人一起，听取中国科学院各部负责人关于各学部所属研究工作的报告。竺可桢作了生物学、地学报告。

1月21日晚，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了速度问题。他说：  
 “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使事业进行的慢一些差一些的方法； 另一种是使事业进行得快一些好一些的方法。”

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修改稿，准备提请最高国务会议通过。

1月25日，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6次会议，讨论中共中央提出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参加会议的除了最高国务会议成员以外，还有各方面的负责人，部分政协委员，一些科学家和文化界、教育界、工商界人士。

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国家农业部部长廖鲁言就1956年至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作了说明，他说：

“第一，《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是在全国农业合作化的高潮蓬勃发展的形势下提出来的。第二，《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主要是向农民提出的，并且主要是依靠农民自己的力量来实现的。它向农民指出实现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具体计划和关于发展农业的长期奋斗的目标，也描画出我国农村的繁荣幸福的明天。第三，《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所提出的各项任务，是积极的，又是可靠的，是有条件的、有根据可以保证实现的，并且可以提前实现或者超额完成的。第四，由于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在正确解决了农业合作化问题以后，紧接着又提出了这个基本环节，从而使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更顺利地向前推进。”

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目前我国正处在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潮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即进入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在过去的6年中，前3年的工作主要是恢复国民经济和进行前一革命阶段中没有完成的各项社会改革，主要是土地改革。**从去年夏季以来，社会主义改造，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就以极广阔的规模和极深刻的程度展开起来。大约再有3年的时间，社会主义革命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

**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的获得解放。**这样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

**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用的方法是和平的方法**。对于这种方法，过去在共产党内和共产党外，都有许多人表示怀疑。但是从去年夏季以来，由于农村中合作化运动的高潮和最近几个月以来城市中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他们的疑问已经大体解决了。**在我国的条件下，用和平的方法，即用说服教育的方法，不但可以改变个体的所有制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而且可以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为社会主义所有制。**过去几个月来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大大超过了人们的意料。过去有些人怕社会主义这一关难过，现在看来，这一关也还是容易过的。

目前我们国家的政治形势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去年夏季以前在农业方面存在的许多困难情况现在已经基本上改变了，许多曾经被认为办不到的事情现在也可以办了。我国的第1个‘五年计划’有可能提前完成或者超额完成。**《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任务，就是在这个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的基础上，给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的发展指出一个远景，作为全国农民和农业工作者的奋斗目标**。农业以外的各项工作，也都必须迅速赶上，以适应社会主义革命高潮的新形势。

**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决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同时，要继续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我国人民还要同世界各国人民团结一起，为维护世界的和平而奋斗。”

1月26日，《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在 《人民日报》公开登载。《纲要》（草案）分前言和本文（即四十条）两部分。

1月26日下午，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对目前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应注意的问题的指示》：

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并转各地委、县委、镇委：

目前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已经进入全国高潮，中央认为各地有必要注意下列各点：

一、北京市所采取的现为全国各地仿行的办法，即，先批准公私合营，以后再做行业的生产安排、企业改组、人事安排等等工作，这种办法在对公私合营工作有了相当准备的地方是可以这样做的。但这绝不是表示公私合营工作已完成，而只是合营工作的开始。因此，批准公私合营以后，仍然需要对各行各业妥善地进行生产和人事安排。

二、对一切已经批准了公私合营的企业中，原有的制度，包括进货办法、销货办法、管理制度、会计制度、工资制度，暂时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不要改变。**在私营工商业原有的经营技术方面，有许多是不合理的，将来应当加以改变的，但也有不少是合理的，是需要保留的，我们应当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经营技术中有用的东西，看成是民族遗产，把它保留下来，决不应该不加分析地全盘否定。北京市东来顺羊肉店和全聚德烤鸭店合营后，不适当地变动了这些店的原有货源甚至操作方法，使食品质量下降，顾客不满，这应该引为教训。**因此，调整商业网，并厂、并店等等除确实已经作了仔细的研究，统盘规划好了的以外，都暂缓进行，应该经过一个时期考察研究，才有可能恰当地、有步骤地进行生产改组和商业网的调整。

三、对商业中不雇用店员的小商店，如果他们要求公私合营，可以批准公私合营，但是对于这类小商店中的绝大部分，为了刺激他们在经营方面的积极性，对他们的资金暂时不要采取定息的办法；对店内参加劳动的人员，暂时也不要采取发工资的办法，在一定时期内，有些小商店应该保留他们原有的独资经营的形式，有些小商店应该让他们代销国家的商品，他们原有向国营商业以外的手工业者和小工厂的进货关系，应该责成他们继续加以保持。凡是代销国家商品的小贩，必须实行卖多少货给他们多少手续费的办法，不能实行按月工资制。**应该向小商店和小贩说明：实行代销的办法，是公私合营的方式之一，代销的手续费，类似计件工资制，而计件工资制是社会主义企业的主要工资制度，只有这种工资制度，才能鼓励生产和经营的积极性。**

四、手工业合作化中，应当保持过去手工业者十分关心他的产品质量和市场销路的优点，因而组织形式上，凡是不适宜于集体生产的，应当保持他们分散生产的形式。现在有些地方采取了由国营商业全部包销手工业产品的做法，这是一种危险的做法。其结果将使广大手工业者不再关心产品的质量。应当规定，在手工业产品中，适宜于由国家包销的，只是由国家供给原料进行加工订货的产品，其他产品只能由手工业合作社或手工业者自己推销，或者由商业部门根据产品质量，按照市场需要，自由选购。

五、**城乡小贩中，有一部分是分散的肩挑小贩，对这些人的组织和改造，应该暂缓进行。为了适应人民的需要，对这些小贩需要长期保留他们现在的经营方式。**因此，今后在组织他们的时候，应当采取一种适当的形式，例如只要到合作社或国营企业的某一部门登记一下即可。不要把同类挑贩组成统一资金的合作经营的形式。

六、应该看到，如果我们不立即采取切实有效的办法，那么在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中，就有降低产品质量和减少经营品种的危险。因此，各地必须与私营工商业的劳资双方和手工业者，具体研究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定出纠正的办法，保证不降低产品质量和不减少经营品种。

（本件应登党刊。）

中央 1956年1月26日

1月26日晚，毛泽东给黄宗潽先生写了一封回信。

黄宗潽是民国时湖南省立第1师范的地理教员，曾是毛泽东的老师。1953年，他由儿子黄筱三接到北京赡养，自觉无大病，精神尚佳，便几次写信给毛泽东，希望能到中央文史馆做点工作。毛泽东在回信中写道：

黄先生：

多次惠书收到，迟复甚歉！文史馆事，已将尊函转去，成否不一定。送上人民币1000元，聊佐杯水之资。

敬颂教祺。

毛泽东 1956年1月26日

后来毛泽东这封信送达时，黄老先生已在十多天前病故了。

是日晚，毛泽东又致信宋庆龄，他写道：

亲爱的大姐：

贺年片早已收到，甚为高兴，深致感谢！江青到外国医疗去了，尚未回来。你好吗？睡眠尚好吧。我仍如旧，十分能吃，七分能睡。最近几年大概还不至于要见上帝，然而甚矣吾衰矣。望你好生保养身体。

毛泽东 1956年1月26日

毛泽东所说江青到外国医疗，是江青在1955年7月第3次去苏联治病。据一个美国人描述说：

“她高烧很重，并且经久不退。体重急剧下降，使她瘦得不像人样。”

江青这次在苏联期间，周恩来曾经去看望她。后来，江青在苏联没有治好病，就回到了国内。195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正式任命军委主席毛泽东的秘书。毛泽东提名4人，他们是陈伯达、胡乔木、叶子龙、田家英。周恩来又提议加上江青，他的理由是：由江青任秘书，在工作的同时，也适合方便照顾毛泽东的生活。经过常委会讨论同意，最后定下5人为军委主席的秘书。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五大秘书”。“五大秘书”的分工是：陈伯达、胡乔木侧重政治、文书；叶子龙依然是主管机要；田家英、江青为日常秘书，江青侧重于生活方面。

此后，国内的医生为江青会诊，怀疑她是“子宫癌肿”。江青要去苏联放射治疗，于是，她在1957年第4次去苏联治病，终于彻底治愈了。

再说1月2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文字改革工作问题的指示》，他写道：

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中央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党组，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

现将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党组和教育部党组《关于全国文字改革会议的情况和目前文字改革工作的请示报告》发给你们。这个报告中关于我国文字改革的方针、关于汉字简化的原则和步骤、关于大力推广普通话和积极准备文字拼音化的各项措施的意见，中央认为都是正确的。希望各地和各有关部门在党内外加以宣传，并研究执行。除《人民日报》已经中央同意自1956年1月1日起改为横排外，关于这个报告中提出的其他事项，中央决定如下：

一、汉字简化方案即由国务院公布；其中的第1批230个简化汉字自公布的日子起正式推行；其余的285个简化汉字和54个简化偏旁即可陆续分批试用，同时交由各省市政协讨论，在两个月之内将讨论结果报告国务院，以便根据多数意见对其中个别的字作一些必要的修正。

二、**在全国汉族人民中大力推广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是加强我国在政治、经济、国防、文化各方面的统一和发展的重要措施，是一个迫切的政治任务**。教育部决定自1956年秋季起在全国中小学和师范学校开始教学普通话。军委总政治部亦已指示全军推广普通话。各地和各有关部门党的组织必须重视这个工作，加强对这个工作的领导和检查，使它能够迅速地顺畅地开展。中央同意成立中央一级的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和这个委员会的名单，各省、市、自治区也应及早成立同样的机构（不设编制，其日常工作由教育厅、局负责）来号召和推动这个工作。报告中提出的有关推广普通话的其他建议，由国务院指示有关部门切实执行。

三、**为了推广普通话和辅助扫盲教育中的汉字注音，汉语拼音方案应该早日确定。中央认为，汉语拼音方案采用拉丁字母比较适宜。**文字改革委员会现已拟定草案，提交全国政协和各省市自治区政协讨论，同时在报刊发表，征求各方意见，以便争取在今年4月修正确定，并在今年5月1日前后公布。

四、为了在党内党外引起对文字改革应有的重视，为了加强和改进关于文字改革的宣传工作，并消除一部分人的怀疑和顾虑，中央决定在最近期间发布一个文字改革宣传提纲。这个提纲的草稿由中央宣传部会同文改会拟定后送中央审核。

（本件和附件可在党刊发表。）

中央 1956年1月27日

1956 年1月间，参加审判日本战犯的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司法部的有关人员，已经集中在香山卧佛寺，开始紧张的筹备工作。 毛泽东对他们说：

“在一定的条件下，在敌人放下武器缴械投降之后，敌人中的大多数是可以改造好的，但要有好的政策，好的办法，要他们自觉改造，不能只靠强迫、压服。犯了罪的人也要教育。动物也可以教育嘛！牛可以教育它耕田，马也可以教育它耕田、打仗，为什么人不可以教育他有新的进步呢？问题是方法和政策问题：采取帮助他们的方法，还是采取镇压的方法。采取镇压的方法，他们宁可死。你如果采取帮助他们的方法，慢慢来，1年，2年，8年，10年，绝大多数人是可以进步的。”

早在1955年末，周恩来曾对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司法部的有关人员说：

“对日本战犯的处理，不判处一个死刑，也不判处一个无期徒刑，判有期徒刑的也要极少数。这是中央的决定。起诉书要把基本罪行搞清楚，罪行确凿后才能起诉。对犯一般罪行的不起诉。”

1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隆重召开。全国各地的工人、农民、手工业和工商界政协委员，带着各地建设的喜讯，来到北京，向党中央、毛泽东报喜。

毛泽东亲切接见了参加第二次会议的全体政协委员。

据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出版的陈冠任的《治国录：毛泽东与1949年后的中国》一书记载：来自安徽省贵池县的政协委员龙冬花，已经是第二次来北京了。

原来这位童养媳出身的龙冬花22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乡亲们走上了互助合作道路。在1952年初春的贵池县乌沙大圩水涝灾害中，这位年仅23岁的互助组长10天10夜不下火线，带领群众抢险，被评为省级劳动模范。1953年她又被评为全国妇女积极分子。1954年春，龙冬花在长江沿岸圩区再次遭受的百年不遇的大水灾中，先后救出22人，还抢运出一批粮食，被乡亲们称作“不要命”的“龙恩人”。可她却说：“我是党员，应该这样去做。”是年4月间，她以全国妇女积极分子和幸福合作社社长的身份参加了全国妇女联合会会议，并在怀仁堂幸福地见到了毛泽东。龙冬花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心情非常激动。合影的时候她在第三排，因为大会规定与会人员不准随便走动，她便无法接近毛泽东。合影结束后，毛泽东等人就要走了，她心里一急就发狠向前挤，由于激动和慌乱一不小心摔倒在了地上。旁边的人笑她说：“干嘛这么急？”龙冬花爬起来，红着脸说：“我要亲自向毛主席汇报合作化的喜讯呢！”毫无察觉的毛泽东已经走远了。摔了一跤还没有和毛泽东说上话，龙冬花十分遗憾。后来她又几次见到了毛泽东，不是相距太远，就是参加接见的人数太多，根本无法靠近毛泽东。

这一次龙冬花来北京参加政协二次会议，再次见到了毛泽东，但一个在台上一个在台下，当面向毛泽东汇报的打算不可能如愿。机会终于来了！就在会议安排毛泽东接见全体政协委员并照相合影时，龙冬花好不容易挤到了毛泽东身边，可她与刘少奇握了手已经激动得不行了。周恩来发现了她，问道：

“哎！姑娘，你是哪里人？”

龙冬花急忙回答说：

“我是安徽省贵池县幸福农业社社长，叫龙冬花。”

她和周恩来握了手，又朝毛泽东那里挤过去，一把抓住老人家的手，使劲地握着，由于过分激动已经说不出话了，两眼目不转睛地仰望着毛泽东那慈祥的面容，等到她被人们挤开时这才醒过来了，后悔了：见到毛主席，怎么那么笨，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啊！

1956年2月1日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在怀仁堂设宴招待出席第2次会议的全体委员们。毛泽东特意让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坐在自己的身边。他在同钱学森的交谈中说：

“新生的，最有生命力的东西，总是在同旧的、衰亡着的东西斗争中生长起来的。”

毛泽东还勉励钱学森要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一些科技人员。

钱学森是在1935年8月作为清华大学公费留学生到美国留学的，专业是飞机设计。在美期间，他与卡门一起最早提出的高超音速流概念——高亚声速飞机采用的公式，就是以“卡门——钱公式”命名的。1943年，他与马利纳合作提出了一份《远程火箭的评论和初步分析》的研究报告，为美国四五十年代研究成功的地地导弹和探空火箭奠定了基础，成为美国复合推进火箭发动机导弹的先驱。钱学森归国前，美国五角大楼的海军部长金布尔声称：“我宁愿枪毙了他，也不让他离开美国！那些对我们来说至为宝贵的情况，他知道的太多了，无论到哪里，他都值5个师。”经周恩来授意王炳南在大使级会谈中与美国政府反复交涉，钱学森才于1955年9月17日踏上了归国的道路，10月8日经香港回到大陆。

再说在2月1日的晚宴上，龙冬花再次见到了毛泽东。据陈冠任在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出版的《治国录：毛泽东与1949年后的中国》一书记载：龙冬花委员与毛泽东只隔着几张桌子，宴会还没有开始，她就急不可待地来到毛泽东身边，向毛泽东敬酒。敬酒者本应站在右边，她却跑到了毛泽东的左边。周恩来向毛泽东介绍说：

“她就是安徽的女社长龙冬花同志。”

毛泽东正聚精会神地查看代表名单，听到周恩来介绍，立即放下代表名单，紧紧握着龙冬花的手，微笑着连连点头，说：

“好，好，姑娘你多喝，我少喝点。”

一名摄影记者“咔嗒”按下了快门，拍下了毛泽东接受龙冬花敬酒的一瞬间（后来，《毛泽东和农业劳动模范龙冬花在招待会上》的大幅照片刊载在全国各地报刊上。这张照片还被制作成年画，在全国各地流传。）。龙冬花满满地一杯酒喝下去，激动得泪水涌流。毛泽东问她：

“姑娘，你那儿合作社有多大啦？”

龙冬花慌乱中急忙回答：

“有1000户了。”

毛泽东笑着摇了摇头，疑惑地问了一句：

“不会那么快吧？”

宴会很快就开始了，龙冬花忍不住又跑过去敬了毛主席一次酒。宴会结束后，她的心情才渐渐平静下来，猛然想到：

“糟糕！刚才向毛主席汇报说错了话呀，入社户数只有500户，自己却说1000户了。这还得了！”

她回到宾馆后悔得暗自落泪，却又不敢声张。后来她回到贵池县将此事向县长如实做了汇报，要求组织上批评自己。谁知县长听后哈哈一笑，安慰她说：

“你说得没错！现在你那里入社户数已猛增到2000多户了！你说的不是多了一倍，而是少一倍了。”

龙冬花一块压在心头的石头才算落了地。

且说2月4日晚上，毛泽东、周恩来、陈毅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出席关于知识分子会议的文学艺术界的代表。毛泽东走到作家杜鹏程（代表作长篇小说《保卫延安》）面前和他握手，问道：

“你现在哪里工作？”

沈雁冰介绍说：

“他在西北的铁路建设工地体验生活。”

周恩来走过来说：

“就是宝成铁路工地。”

陈毅也说：

“往我的家乡修铁路啊！”

毛泽东望着杜鹏程说：

“李白的《蜀道难》，就是写的你们现在工作的那些地方的艰险的情景。不过‘蜀道’很快就不‘难’啰！”

说罢，他随意而动情地朗诵起来：“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2月8日，周恩来在国务院第24次全体会议讨论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时发表了讲话，他说：

“不要只看到热火朝天的一面。热火朝天很好，但应小心谨慎。要多和快，还要好和省，要有利于提高劳动效率。**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

陈云也说：

“有些工厂和商店并得对，应该并。但也有很多是并得不对的，其中数量最大的是手工业。”

他还说：

“并错了怎么办呢？要分开来，退回去。”

朱德也一直主张稳步前进的方针，对如何解决加快改造带来的问题，曾多次发表意见。

2月10日，毛泽东会见了泰国人民促进友好访华代表团全体成员。这个代表团的成员既有泰国各党议员，还有一些商人和记者。毛泽东在谈话中说：

“**我们可以等待。目前你们处在困难中，必要时对美国说几句好话，对我们说几句坏话，我们是谅解的。”**“各国都必须发展自己的经济和文化。你们的国家和别的国家有了独立自主，发展了经济和文化，对中国是有好处的。”

2月12日，毛泽东同藏族人士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谈话记录全文如下：

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筹备好了就要成立，你们还怕吗？对土地改革赞成不赞成？**对西藏地区的土地改革要采用不同的办法，要采用云南的办法。云南有土司，他们也是贵族，那里是通过和平协商的办法进行土地改革的，人民满意，土司也满意。**总之，**贵族的生活不变，照老样子，可能还有些提高。宗教信仰也全照老样子，以前信什么，照样信什么。**宗教信仰自由，可以是先信后不信，也可以是先不信后信。在中国，信仰宗教的人不少。信耶稣教的有80万人；信天主教的有300万人；信伊斯兰教的有1000万人；信佛教的更多，有几千万人，还有信道教的，数目也很大，约有1000多万人。人们的宗教感情是不能伤害的，稍微伤害一点也不好。除非他自己不信教，别人强迫他不信教是很危险的。这件事不可随便对待。**就是到了共产主义也还会有信仰宗教的**。

西藏现在不是搞合作社的问题，而是进行民主改革的问题。什么时候进行，由你们自己去决定。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后，可以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要由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下决心，要由西藏的僧俗官员和寺院里的喇嘛、堪布们决定。要有一个酝酿的时期，一年、二年、三年，通过讨论，打通思想。有人赞成，也有人反对，两方面的意见都可以讲。多酝酿、多讨论有好处，大家都讲，慢慢地就讲通了。贵族、喇嘛有好多人害怕改革，你们回去后要对贵族、喇嘛多做工作，不论如何改革，对他们的政治地位、生活水平都要维持。

我们同资本家、同各民主党派合作得很好，大家互相帮助，有了错误加以批评，共同进步。同时，也采用自我批评的办法，各民主党派也进行自我批评。**少数民族自己内部也可以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办法，代替你打倒我、我打倒你，你毒死我、我毒死你的办法。**你们西藏可以商量商量，破除老办法，采取新办法，用互相批评互相帮助的办法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用互相信任代替互相不信任。藏族和汉族过去互相不信任，慢慢地就可以互相信任。**你们前藏、后藏、昌都过去也互相不信任，今天也要用互相信任来代替**。前藏、后藏自己内部也有互相不信任的现象，这同汉族过去各个地方和各个部门的内部互相不信任或信任不够是一样的。过去资本家很怕我们，各民主党派也有一些怕我们。经过了6年的时间，现在他们和我们的相互信任大为增强。过去他们不信任共产党，共产党也不那么信任他们。大家在一起工作，搞久了，常常见面，慢慢地就互相信任了。我建议你们回去好好研究和协商，增强你们内部的互相信任互相帮助，也增强你们和我们之间的互相信任互相帮助。

关于民主改革这一条，这里要讲清楚，不要回去乱讲，说我讲了西藏现在要实行土地改革了。我是要你们回去酝酿，回去报告达赖和班禅，可行即行，你们如果都不同意，我也没有办法。我不能一定叫你们做什么，我只是提建议给你们，采纳不采纳是你们的事，不要误会。

**参观团的参观很有益处**，大家应当相互交流经验。**西藏是个了不起的地方，占全国面积的八分之一。**我同达赖说过，不要以为西藏落后，地方小，西藏地方可不小。西藏如果不参加祖国的大家庭，这个家庭的事便不好办了，西藏在祖国大家庭里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再一条就是落后问题。在经济文化方面，藏族是落后的，汉族也落后，比美国、英国、法国、苏联、波兰落后，比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东德落后，比日本也落后，不要以为只是你们落后。我们的目的是使大家都发展起来，我们要经过几个“五年计划”来克服这种落后状况。我们支援你们，你们自己也要发展。**你们应该发展人口，发展经济，发展文化。**经济不发展，人口也不能发展，文化发展了，可以帮助经济发展。你们在座的都是知识分子，有文化。你们的普通老百姓文化就落后，和汉族农民一样。**将来农民都要大学毕业，所有的人都要大学毕业，你们相信不相信？全国人民都从小学毕业要七八年才做得到；全国人民都从中学毕业要30年到40年，你们可能看得到，我们有些人就不在了；要做到全国人民都从大学毕业要100年。**西藏人都愿意大学毕业吗？这也是可以做到的。西藏的小学现在还赶不上内地的小学，将来是可以赶上的。西藏也要设立大学。只要努力去做，一年年地进步，就可以达到目的。

解放军进入西藏后，西藏的物价上涨了，西藏人民是受了些损失，以后老是这样可不行。解放军到西藏，要给人民办好事，不然要解放军干什么？修了两条公路是好事，但这还只是为做好事准备了有利的条件。好事要西藏地方自己做，我们可以帮助。你们也可以搞“五年计划”这么一套，一年也可以搞一个计划，标准是提高人民的生活。人民生活提不高，便不能持久。

民族区域自治地区要搞建设，便要有自己民族的干部，自己的科学家。青年要学科学，有很多科学要学，像电呀、机器呀这些东西。西藏地方大，地下有很多好东西。要有使用机器的人才，要有农业科学家，要有地质科学家。汉人也是一样。在反动派统治下，中国的科学不发达，但我们一搞起来就相当快。例如全国解放时，我们的地质科学家只有100多人，不到200人，搞了6年，已经发展到几千人了。现在柴达木盆地正在开采石油，离青藏公路不远，你们可以去看看。培养人才要慢慢来，不是几个月、几年的事，你们要有计划地培养科学干部。

西藏内部要更加团结起来，看见你们团结，我很高兴。你们回西藏后要多去见达赖喇嘛，听听他的指示，多增长些知识。**西藏有两三个头不好，我们尊重班禅的重要地位，也尊重昌都的地位，整个西藏要有一个主席，还是达赖为好。你们已经搞清楚没有？你们是否讲我们偏心达赖？拉萨方面又怕我们偏心班禅，我们没有这些。主席让达赖喇嘛当，这样办好，对团结有利。**

西藏这些年有了很大的进步，要承认这个进步，然后逐步发展，就有希望。

欲知毛泽东以后如何处理西藏事务，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56年2月10日会见泰国人民促进友好访华代表团全体成员时说：“**目前你们处在困难中，必要时对美国说几句好话，对我们说几句坏话，我们是谅解的。”**这是何等的坦诚啊！在同藏族人士的谈话中，毛泽东也同样如此。从他一生成功的经历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需要坦诚，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也需要坦诚，有了坦诚，才可以建立友谊，才可以进行合作，才可以互利共赢，这是立身之道、立国之本。

**第22章**

“**不论美国、法国、瑞士、挪威，只要他们要我们的学生，我们就派去。”**

话说1956年2月14日，苏联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世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都派出代表团出席会议。中国共产党也派出了由朱德、邓小平、谭震林、王稼祥和新任驻苏大使刘晓组成的代表团，参加了苏共二十大。

2月14日下午，毛泽东开始听取国务院有关工业、农业、商业、财政等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还有国家计委关于第2个“五年计划”的汇报，一直到4月24日才结束。在那繁忙的43个日日夜夜里，国务院34个部委的负责人和国家计委的负责人鱼贯而入，到中南海颐年堂向他做了详细报告。此一时期，毛泽东为了听汇报，不得不改变他长期形成的夜间工作的习惯，用他的话来说，几乎每天都是“床上地下，地下床上”，一起床就开始听汇报，每次四五个小时才结束。周恩来除了个别时候因事请假外，都要参加。刘少奇、陈云、邓小平有时也来参加。各部都事先把汇报内容写成书面材料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在听取口头汇报时，不断插话，提出问题，发表意见，进行评论。

毛泽东第一个听取的是主管重工业的国务院第3办公室的汇报。他首先说道：

“我去年出去了一趟，跟地方同志谈话。他们流露不满，总觉得中央束缚了他们，地方同中央有些矛盾，若干事情不放手让他们管。他们是块块，你们是条条，你们无数条条往下达，而且规格不一。他们若干要求，你们也不批准，约束了他们。”

当第3办公室的负责人汇报到设计问题时，毛泽东说：

**“设计是客观实际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反映不可能就是那么完全，因此就要在实践中修正。世界上没有圣人那种人，有贤人就了不起了。**事先什么事情都知道得很清楚，特别是地下的情况，不可能嘛。”

是日晚，毛泽东给远在莫斯科大学数学系学习的刘思齐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亲爱的思齐儿：

给我的信都收到了，很高兴。希望你注意身体，不使生病，好好学习。我们都好，勿以为念。**国内社会主义高涨，你那里有国内报纸否？应当找到报纸，看些国内消息，不要和国内情况太隔绝了**。

祝好！

得胜 1956年2月14日

2月15日上午，毛泽东听取电力工业部负责人的汇报。关于一长制问题，毛泽东说：

“**你们为什么对一长制那么感兴趣？党委领导就不好？**可以找两个厂子分别试一下看，一个是一长制，一个是党委集体领导制，看后者是不是就一定搞得那么坏。你们讲一长制这一段，依靠党的领导问题只有8个字。把党的领导问题同依靠群众、精通业务等问题并列，这种提法不妥。**苏联有些东西就不能学，内政部可以不受党的领导，这样一个武器不要党的领导，那还得了！**一个工厂几千人，很不容易搞好，没有党的领导，很容易形成一长独裁。任何情况下，党的集体领导这个原则不能废除，如果企业可以除外，那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就变成了有头有肚子没有脚。”

2月15日下午，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首次来华访问的柬埔寨首相西哈努克亲王。西哈努克亲王深深地弯下腰，双手合十，向毛泽东致意。毛泽东以其特有的幽默方式，表达了他的欢迎之情，他微笑着说：

“我是人民的儿子，是农民出身的共产主义者，但我为有你这样的亲王做朋友而感到荣幸。”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会见西哈努克。他向西哈努克讲述了中国的外交政策。他强调说，真正独立的国家可不要让别的国家所控制。他还说：

“中国赞成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原则。很小的柬埔寨完全可以同很大的中国在平等的基础上做朋友，并且在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关系嘛。”

毛泽东又说：

“柬埔寨采取中立乃是最好的方针。中国会一如既往支持这种方针。”

2月16日，毛泽东听取第一、第二、第三机械工业部负责人的汇报。他在插话中再一次批评了一长制，他说：

**“家庭也不能搞一长制，没有商量是不行的。工厂总比家庭复杂些**。工厂要有一定的纪律，按时、按量、按质完成任务。为达此目的，没有集体领导，个人负责是不行的。**单有一个集体领导也不行，还要有个人负责，又对立又统一才行。两者缺一不可。只统一没有个人负责不行，是集体领导基础上的个人负责制。单讲集体领导，不讲个人负责，或者单讲个人负责，不讲集体领导，都很危险。”**

关于好大喜功，毛泽东说：

“好大喜功好像是坏事，历来骂汉武帝好大喜功，可不名誉哩。**木船变轮船，马车变汽车、火车，都是好大喜功。不加区别地说好大喜功都不好，是不妥当的。”**

2月17日，毛泽东继续听取第一、第二、第三机械工业部负责人汇报。当他听说到1962年国防材料将全部由自己生产时，就断然说道：

**“全部自给，不仅1962年不可能，1967年也不可能。脑子太热不行。**”

毛泽东还批评了只讲多快、不讲好省的片面性，他说：

“多快好省必须全面，是在好省、在有充分根据的基础上多快。你们只讲多快，不讲好省，谁干？”

他又说：

“我们搞革命，很长时间不上轨道。从1921年到1941年整风以前，有20年不上轨道。经过整风才上轨道。搞建设究竟要多少年才上轨道？应该缩短。1953年各部还没有方向。1952年就提出总路线，未公布。财经会议中心问题是总路线。经过1953、54、55几年，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手工业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尚未上轨道。中央这期间没有怎么管工业。去年由于农业合作化、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迅速发展，反过来推动了建设。搞建设，想缩短犯主观主义的时间。看样子3个‘五年计划’可能加快，3个‘五年计划’变成两个‘五年计划’，甚至还要缩短，这是可能的。”

2月1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出号召说：

**“全党动员，全民动员，消灭血吸虫病。”**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专门成立了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有关部门派出医务人员，赴疫区为广大患者实行免费治疗。

后来，毛泽东还亲自到广东、上海、安徽等地视察，接见从事防治血吸虫病研究工作的专家教授，他号召说：

“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

2月18日晚，西哈努克亲王来到中南海勤政殿，郑重地将柬埔寨国王诺罗敦·苏拉马里特的赠勋证书交给毛泽东、周恩来，又把柬埔寨王国最高勋章大十字勋章分别为毛泽东、周恩来佩戴在胸前。

赠勋仪式结束后，周恩来和西哈努克亲王签署了联合声明。毛泽东为西哈努克举行宴会，庆祝他访华获得圆满成功。

2月19日，毛泽东听取建筑工业委员会负责人的汇报。万里是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不免有些紧张。毛泽东为了缓和气氛，就问他是哪里人？万里说是山东人。毛泽东又问他：

“你看过《水浒》和《金瓶梅》没有？”

万里说没有看过。毛泽东说：

“《水浒》是反映当时政治情况的，《金瓶梅》是反映当时经济情况的，是《红楼梦》的老祖宗，不可不看。”

他的话使会场的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了。

2月19日这一天，毛泽东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陈伯达、陆定一写了一个批示。

原来在1956年2月1日，中宣部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说中山大学党委反映，有一位在中国讲学的苏联学者，向中国陪同人员谈起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说他不赞成毛泽东对孙中山世界观的评价，他认为孙中山是唯物主义者。中宣部在报告中说，这种议论有损于我党负责同志的威信，请示中央，是否有必要跟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一谈。毛泽东在这份报告上给刘少奇等人的批示中写道：

刘周陈、彭真、小平、陈伯达阅，退定一办。

我认为这种自由谈论，不应当去禁止。这是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无所谓损害威信。因此，不要向尤金谈此事。**如果国内对此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如果企图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

毛泽东 2月19日

2月20日，毛泽东听取建筑工业部负责人的汇报。

2月21日，毛泽东听取城市建设局和二机部负责人汇报。万里问毛泽东：

“北京远景规划是否摆大工业？人口发展到多少？”

毛泽东说：

“现在北京不摆大工业，不是永远不摆。**按自然发展规律，按经济发展规律，北京会发展到1000万人，上海也是1000万人。将来世界不打仗了，和平了，会把天津、保定、北京连在一起。北京是个好地方，将来会摆许多工厂的。”**

2月22日，毛泽东听取二机部负责人关于原子能工业的汇报。

2月24日，毛泽东在清华大学教授、建筑学家梁思成要求入党的信上对刘少奇、彭真写了一个批示。

原来在2月6日，梁思成应邀参加全国政协招待宴会。他托周恩来向毛泽东转呈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最敬爱的毛主席：几年来，我是您一个最坏的学生。我脱离了您的领导，犯了严重错误，为祖国人民带来了巨大损失，而长期看不见自己的错误。但是，今天我却正在为自己祝贺，因为在您和各位领导同志的关怀下，在彭真同志的亲切教导下，我终于初步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我觉得我一步步地更接近了党。一个多月来，我内心不可抑制的要求，就是不仅仅从外面靠拢党，而是要求自己成为党的一个儿子。当我知道在今晚的宴会上将得到最大的幸福，将能陪同您坐在主席台上的时候，我不能抑制这‘再生的青年’的兴奋，在感情的推击下写了这封信，向您表达我心底深处最大的愿望和奋斗的最高目标……准备着把一切献给您，献给我们伟大的党和可爱的祖国。”

毛泽东看罢梁思成的信，甚是欣慰，他在给刘少奇、彭真的批示中写道：

**刘、彭真阅，交北京市委酌处。我觉得可以吸收梁思成入党。**

毛泽东 2月24日

此后，梁思成入党的事长期没有下文，其原因是清华大学很多党员不赞成他入党，说他犯过大屋顶的错误。一直到1959年1月，梁思成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激动地说：“我生命中的第二个青春开始了。”

再说在2月24日夜晚至25日凌晨，即苏共二十大结束的前夜，赫鲁晓夫在没有通知各兄弟党代表团参加的情况下，向苏共二十大与会代表作了长达4个半小时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赫鲁晓夫的这个秘密报告全盘否定了斯大林。赫鲁晓夫还说：

“我们必须极其认真地考虑个人崇拜问题，请不要把这个问题泄露到党外，尤其不要泄露给报纸。我们之所以在大会的秘密会议上讨论，其理由正在于此。我们应当知道限度，不要给敌人制造武器，不要把家丑外扬到敌人面前。”

此前，在二十大开幕式上，赫鲁晓夫还建议全体代表起立悼念斯大林，在他所作的政治报告中，也还称斯大林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旗手。可是在转眼之间，还是这个赫鲁晓夫，一反过去的态度，只讲斯大林的错误，不讲斯大林的功绩，把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错误，完全归咎于斯大林身上。

2月25日，苏共中央在二十大结束后，派人向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宣读了一遍赫鲁晓夫的报告，而后把原文拿走了。朱德、邓小平等立即把这个秘密报告的大致内容发回北京。毛泽东获悉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消息，气愤地说：

“一个十月革命时期还不是布尔什维克的人，有什么资格评论一个伟大的革命领袖呢？在这个赫鲁晓夫面前，我还得给他摆摆老资格！”

2月25日这一天，毛泽东听取重工业部负责人汇报。关于发展速度问题，他说：

“我国建设能否超过苏联头几个‘五年计划’的速度？我看是可以赶上的，工业也可以超过。**中国有两条好处，一曰穷，二曰白，一点负担没有。**美国在华盛顿时代，也是白，所以发展起来是很快的。要打破迷信，不管是中国的迷信，外国的迷信。我们的后代也要打破对我们的迷信。**我国工业化，工业建设，完全应该比苏联少走弯路。**我们不应该被苏联前几个‘五年计划’的速度所束缚。我们可以超过它，理由有四：国际条件不同；国内条件不同；技术水平不同；中国人口多，农业发展快。同样，即使在技术发展方面，在现代技术发展方面，也可以超过苏联，有社会主义积极性，有群众路线，少搞官僚主义。**我们有群众工作的传统，有群众路线，这是我们的好处。**”

周恩来插话说：

“开始几年学他们是必要的。经过这两三年，我们也有些经验了，就应该总结总结。”

毛泽东接着说：

“加上他们揭盖子（指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笔者注）啦，我们开始有些把握，不要迷信咧。”

周恩来说要派人到资本主义国家去学技术，毛泽东说：

“**不论美国、法国、瑞士、挪威，只要他们要我们的学生，我们就派去。”**

2月26日，毛泽东在勤政殿听取石油工业部部长李聚奎和去年9月份曾带团到苏联考察学习的副部长康世恩的汇报。在座的还有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

李聚奎刚到石油工业部任职不久，这次汇报主要由康世恩讲。周恩来向毛泽东介绍了康世恩。毛泽东问康世恩是哪里人？又问了他的经历。康世恩一一作了回答。接着，他开始汇报，照着提纲念了一段。毛泽东打断他说：

“你不要念了，我这里也有本本，就随便说吧。你讲讲地质年代如何划分，根据是什么？”

康世恩回答说：

“主要是根据地球发展不同时期的古生物标本，这是主要标志。”

毛泽东问：

“那为什么叫第三纪、白垩纪、侏罗纪呢？”

康世恩回答说：

“这是按照世界某一个代表性的地点和剖面来划分和命名的，比如白垩纪的代表地点是英国，侏罗纪来自欧洲的侏罗山，震旦纪来自我国的南口。”

毛泽东点点头，又问道：

“石油是怎样生成的？”

康世恩就讲了世界上石油生成的两派学说，一是有机生成说，一是无机生成说。毛泽东问：

“你赞成哪一种学说？”

康世恩回答说：

“我赞成有机生成学说。”

毛泽东接着问：

“有机物为什么又会变成石油呢？”

康世恩讲了石油生成的环境、温度和压力等，说是要经历几百万、上千万年，逐步演化才能生成石油和天然气。毛泽东又问：

“是否有油的地方都有气？有气的地方是否一定有油？”

康世恩一一作了回答。毛泽东问：

“怎么找油呢？什么叫构造？”

康世恩拿着纸边说边画，说明了各种储油构造。毛泽东问：

“原油出来后怎么炼制？怎么出来汽油？汽油为什么要分号头？汽油的分子式是什么？”

康世恩汇报了炼油的原理和过程，还把汽油、煤油、柴油的分子式一一写了出来。毛泽东很认真地看了。康世恩讲了柴油由于含蜡多少不同，凝固点也不同，寒带用油要低凝固点，不然就冻结了。毛泽东说：

“这非常重要，中国严寒地带不少。”

接着他又问中国怎么找石油？康世恩着重汇报了西北地区石油勘探情况。毛泽东说：

**“美国人讲中国地质老，没有石油，看起来起码新疆、甘肃这些地方是有的**。怎么样，石油部，你也给我们树立点希望。”

康世恩汇报说：

“我国石油工业还很落后，今年天然石油年产量才42万吨，远不能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一些世界先进的石油勘探开发技术还没有掌握；资金也很紧张，一年用于天然石油勘探的投资才2亿多元；新疆、玉门等地都是戈壁、荒滩、沙漠，野外勘探开发工作十分辛苦。”

毛泽东感慨地说：

**“搞石油艰苦啦！看来发展石油工业还得革命加拼命。”**

康世恩汇报说，苏联老巴库油田有几十个油层重叠在一起。毛泽东说：

“这是架起来的楼房啊，比单层油田更好，开起来更省钱。你们也要找几个楼房式的油田。”

康世恩汇报说，找油要经历从普查、详探到开发3个阶段，我国才开始第一阶段的普查。毛泽东说：

**“在有希望的地方，你们要给每个县发一台钻机，让他们到处凿一凿**。这对以后在全国各地逐步开展石油勘探有着重要意义。”

康世恩说，苏联重视区域勘探，整体解剖，所以勘探成果大。我们对区域勘探研究不够，因而未掌握寻找油田的规律。毛泽东说：

“这是经验咧！你们要有全面规划。”

康世恩汇报到苏联一年打井很多，石油投资占总投资比重也大。毛泽东说：

“我们一年也要钻一百万米井。”

康世恩说，我们石油部成立晚，干部少。毛泽东当即对周恩来说：

“调一些给他们。”

2月27日，毛泽东听取地质部负责人的汇报。

2月28日，毛泽东听取电力工业部负责人汇报。当他听到1955年发电量仅有98亿度时，感慨地说：

“就这么一点，怎么不受人家欺负呢？”

电力工业部负责人汇报说，按照现在的发展速度，我国的年发电量要50年才能赶上美国。毛泽东用肯定的口气说：

**“就在这个世纪赶上它，并且超过它！”**

2月29日，毛泽东听取煤炭工业部负责人汇报。

1956年3月1日，毛泽东听取国务院主管轻工业部门的第4办公室和纺织工业部负责人汇报。关于发挥现有企业生产潜力问题，毛泽东说：

“技术改造这个问题重要，这方面的潜力很大。”

在谈到对上海、天津等工业基地的利用时，毛泽东说：

“限制发展是错误的，不能限制发展，应该是充分利用或充分合理利用。沿海地区要充分合理利用，不能限制。”

当汇报到划分中央和地方企业隶属关系时，毛泽东说：

“是不是中央部门想多管一点？要注意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中央企业和地方企业划分的主要根据是供销范围。”

他还嘱咐说：

**“轻工业为国家建设积累资金，很重要，能多搞尽量多搞些。”**

3月2日，毛泽东听取地方工业部负责人汇报。他首先指着地方工业部的汇报材料说：

“有什么办法使人听了不致忘记？照这样汇报，听过去就忘记了。讲存在的问题，要举事例，把人指出来，不举事例等于无用，别人不好懂。文件重要的是要使人懂，为了使人懂，长一点也不要紧。**文字方面不是要反对标语口号吗？就是要有具体形象，有人物。没有具体形象，作品就没有生命。半月来汇报都存在这个问题，这是使我强迫受训，比坐牢还厉害。坐牢脑子还自由，现在脑子也不自由，受你们指挥。**只有观念形态，没有物质，要脱离实际。你们这些条条，一定是从许多具体问题的材料中得出来的，应把具体问题写清楚。”

关于沿海地区问题，毛泽东说：

“要采取积极合理发展的方针。有的可以内迁，不能内迁的应该积极合理利用，不要加以限制。有的同志，好像战争就要来的样子，准备着架子等待战争，因此要限制沿海。这样不妥。轻工业70%在沿海，不积极利用还靠什么来提高生产？”

3月3日上午，毛泽东听取轻工业部负责人汇报。当他听说烟叶质量下降时，便批评道：

**“你们心平气和，程朱哲学，没有气，没有长角，不敢斗争。农产品质量下降，要向农业部斗争。农业部要设技术作物局。**”

关于沿海地区工业的利用和多发展轻工业积累资金的问题，毛泽东说：

“鞍钢、石景山钢铁厂、上海造船厂等沿海的重工业都利用，轻工业为什么不利用？要积极合理利用。”“沿海都要利用。上海赚钱，内地建厂，这有什么不好？这同新建厂放在内地的根本方针并不矛盾。”“多搞些轻工业，就是多搞重工业。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尽量搞。投资1元，回来4元、3元，为什么不搞？”

关于培养干部问题，毛泽东说：

“你们搞得落后了，学校搞得太少了，要开几个学院。这是大问题。要开展科学研究，搞些技术人员自己干。”

3月3日下午1时半，出席苏共二十大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成员邓小平、谭震林回到北京。

下午4时半，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休息室召集刘少奇、周恩来、彭真、康生、聂荣臻、刘澜涛，听取邓小平、谭震林关于苏共“二十大”情况的汇报。

3月3日晚，毛泽东看到了中国科学院水生动物专家秉志给他的一封信。秉志在信中建议说：在消灭血吸虫病的工作中对捕获的钉螺应当采取火焚的办法，才能永绝后患。如果还用土埋灭螺的方法，病虫容易复出。毛泽东立即指示说：

“卫生部要把消灭血吸虫病作为当前的政治任务。”

他还指示卫生部要重视秉志的建议，并嘱咐邀请这位专家参加本月将在上海召开的第2次防治血吸虫病的会议。

3月5日，毛泽东在听取手工业管理局负责人汇报时作了不少指示，摘录部分如下：

一、个体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我觉得慢了一点。今年1月省市委书记会议的时候，我就说过有点慢。1955年底以前只组织了200万人。今年头两个月就发展了300万人，今年基本上可以搞完，这很好。手工业的总产值，你们设想在3个‘五年计划’期间平均每年增长10.9%，似乎低一点。第1个‘五年计划’定低了，吃了点亏，现在可以不更改，你们要在工作中掌握。

二、手工业合作社的规模，一般的100人左右为宜，有的也可以几百人，有的也可以几十人。

三、**组织铁、木业合作社为农业生产服务，下乡修理农具，这个办法很好，农民一定欢迎。**中国手工业几千年来就有这样做的。组织合作社以后，提高了技术，就能更好地为农民服务。

四、你们说，在手工业改造高潮中，修理和服务行业集中生产，撤点过多，群众不满意。这就糟糕！现在怎么办？“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五、手工业生产的劳动生产率，同半机械化、机械化生产比较，最高最低相差达30多倍。每人每年平均产值，国营现代化工业是2万元到3万元，半机械化、机械化的合作社是5000元，百人以上的大型合作社是2000元，小型合作社是1500元，个体手工业是800至900元。**把劳动生产率作一个比较，就清楚了：手工业要向半机械化、机械化方向发展，劳动生产率必须提高。**

六、手工业的各行各业都是做好事的。吃的、穿的、用的都有（毛泽东听说北京东来顺的涮羊肉，已经失去原有的特色，就说：“社会主义的羊肉应该比资本主义的羊肉更好吃。”）。还有工艺美术品，什么景泰蓝，什么“葡萄常五处女”（指以吹制玻璃葡萄而闻名的北京手工业艺人常家的5位妇女——笔者注）的葡萄。**还有烤鸭子可以技术出口。有些服务性行业，串街游乡，修修补补，王大娘补缸，这些人跑的地方多，见识很广。**北京东晓市有6000多种产品。

提醒你们，**手工业中许多好东西，不要搞掉了。王麻子、张小泉的刀剪一万年也不要搞掉。我们民族好的东西，搞掉了的，一定都要来一个恢复，而且要搞得更好一些。**

七、**提高工艺美术品的水平和保护民间老艺人的办法很好，赶快搞，要搞快一些**。你们自己设立机构，开办学院，召集会议。**杨士惠是搞象牙雕刻的，实际上他是很高明的艺术家。他和我坐在一个桌子上吃饭，看着我，就能为我雕像。我看人家几天，恐怕画都画不出来。**

八、国家调拨物资给合作社，要合理作价，不能按国家调拨价格作价。合作社和国家企业不一样，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有区别。合作社开始时期经济基础不大，需要国家帮助。**国家将替换下来的旧机器和公私合营并厂后多余的机器、厂房，低价拨给合作社，很好。“将欲取之，必先与之。”**待合作社的基础大了，国家就要多收税，原料还要加价。那时，合作社在形式上是集体所有，在实际上成了全民所有。

**国家要帮助合作社半机械化、机械化，合作社本身也要努力发展半机械化、机械化。机械化的速度越快，你们手工业合作社的寿命就越短。**你们的“国家”越缩小，我们的事业就越好办了。你们努力快一些机械化，多交一些给国家吧。

九、**手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四分之一，它的供产销为什么没有纳入国家计划？手工业这样大，应当纳入国家计划。**

十、**有些地方党委忙，手工业排不上队，这不好。为什么有些干部不大愿意做手工业的工作？我倒很想搞这样的事，很重要嘛！**

十一、**你们要在6万多个手工业合作社组织中，选择突出的例子，编写典型材料。各地区、各行各业都要有；好的、坏的，大的、小的，集中的、分散的，半机械化的、机械化的都要有。出一本书，像《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样。**

3月5日这一天，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在农业生产合作社扩大合并和升级中有关生产资料的若干问题的处理办法的规定》，全文如下：

上海局、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

**全国各地已经有大批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升为高级社，小社扩大、合并成为大社，**也有一批过去的地主分子和已经放弃剥削的富农分子被接受到合作社中来，作为社员或者候补社员，或者由合作社管制生产。这就在生产资料如何处理方面，发生了一系列的新问题。这些新问题，在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中并没有规定处理办法。为了便于各地处理这些问题时有所依据，中央提出如下的原则规定：

一、**在初级社转为高级社的时候，社员的土地转为合作社公有，取消土地报酬。**土地归社公有以后，如果有的社员退社，合作社应当从社公有的土地中拨给他一份耕地。有的高级合作社，要求社员交出土地证，这是不必要的。土地证，可以允许社员保留，不要收回。**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仍然应当像初级社一样，允许社员留下一定数量的自留地。**社员修新房屋所需要的基地和埋葬所需要的坟地，由合作社统筹解决。

二、**在初级社转为高级社的时候，社员私有的零星树木仍然归社员自己所有，自己经营；社员私有的果园和其他成片的林木，可以归社公有，也可以在一两年内采取过渡办法，暂不归社公有，仍然按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办理，即由社统一经营，给原主以合理的报酬。果园和其他成片的林木转归合作社公有的时候，必须经过充分协商，取得原主的同意，并且应当给原主以合理的代价。**果园和林木的价款，除了应摊的股份基金以外，下余部分由果园和林木的每年收益中抽出一定的比例分年偿还。必须注意在社员中充分说明上述的各种合理的公私两利的办法，并且按照社员自愿的情况，分别作具体的处理，以避免社员在转社的时候破坏林木的现象。

三、**在初级社转为高级社的时候，社员私有的耕畜和大农具等主要生产资料应当合理作价，归社公有，价款由合作社付给本主，一般在3年内付清，至多不能超过5年。**如果在合作社升级以前，耕畜和大农具已经实行公有化，而到升级的时候价款还没有付清，应当按原定的办法继续分期付清。**社员私有的牧畜（例如羊群、牛群等），可以采取作价归社公有，也可以在一两年内采取过渡办法，仍然归社员所有，由社统一经营，给畜主以合理的分益。**

四、**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合作社合并的时候，各社原来所积累的公共财产、公积金和公益金，不论数量多少，都必须妥善保管，统一转为合并后的大社的公有财产，不得损坏和分散。各社之间多少不等，不必补齐，新社员入社也不补交。**

五、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合作社合并的时候，各社原来分摊股份基金的标准，如果相差不多，就不再补齐，如果悬殊过大，社员意见较多，就应当统一计价，重新分摊，**各个社员原来交的股份基金，按照新的分摊标准长退短补。新社员入社应当照摊股份基金。**高级社股份基金的分摊办法，应当由贫农和中农社员协商决定，可以按劳动力分摊，也可以按劳动力和土地比例分摊。

**各社在合并前没有还清的耕畜、农具归公时原主应得的价款，没有归还的农贷、社员投资和其他欠款，都应当由合并后的大社负责归还。**

六、一部分富裕中农社员，占有价值很大的马车和大农具等生产资料，在这些生产资料转归公有的时候，除了同别的社员一样，扣掉他应交的股份基金以外，需要归还给他的价款数目仍然很大。为了避免合作社负债过重，避免引起大多数贫农和下中农社员的不满，避免发生提高他们的阶级成份按照富农对待他们的现象，可以采取如下的办法处理。即这部分富裕中农的生产资料归公时应得的价款，如果不超过他应交的股份基金的2倍，除了扣掉应交的股份基金以外，其余的部分，按照规定分期还清；如果超过他们应交的股份基金的2倍，2倍以内的部分照上述办法处理，超过部分，则经过民主协商，议定在一定年限内（例如3年），按照银行贷款的利率付给利息，付息满期后转为股份基金，退社时可以带走。

七、**过去的地主分子和已经放弃剥削的富农分子（包括新富农在内）入社的时候，他们入社的土地，在初级合作社内，按照家庭人口的多少，在当地每人占有土地平均数以内的部分可以取得土地报酬，多余的土地不给土地报酬；在高级社内，他们的土地当然转为合作社公有，一律取消土地报酬。**他们占有的耕畜和大农具等主要生产资料应当一律作价入社，应得的价款除了补交公积金和公益金以外，其余部分一律作为股份基金，退社时可以带走，平时不付利息，**他们经营家庭副业所需要的生产资料，一律仍归本人所有。**

地主富农分子，从今年1月起，如果在入社前有出卖和破坏他们所占有的生产资料的行为，在入社的时候应当负责补偿，情节严重的还应当依法惩办。

为了使打击面不致过宽，减少划分阶级中的纠纷，对于那些剥削分量较小、界线不很明显的新富农可以按第六项对于富裕中农的办法处理。

八、**在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潮中，特别是在高级社发展较多的地方，有一部分贫农和干部总想扩大公有化的范围，希望一下子消灭一切私有，对于归公的牲畜、农具等生产资料，总想把价格压低一些。这种倾向，望各地注意教育防止，否则，将使贫农和中农的关系紧张起来，不利于生产。**

最后，少数民族地区，由各自治区党委和有关省委分别参照这一规定，根据民族特点，自行拟定处理办法，报中央备查。

中央 1956年3月5日

3月6日，毛泽东继续听取汇报，一直到3月9日，他先后听取了国务院主管交通、邮电部门的第6办公室、铁道部、交通部、邮电部、民航局各负责人的汇报。

3月10日，战犯管理所的工作人员让溥仪到接待室去会见他的亲人，溥仪闻言，不禁心存狐疑：“谁还能来看我呢？”及至他来到接待室推开门一看，顿时楞住了，来人竟是与他阔别了10年之久的七叔载涛和三妹、五妹！载涛告诉溥仪说：

“前些日子开第二届全国政协第2次会议，我见到了毛泽东主席，毛主席和我握过手，说：‘听说溥仪学习得不错，在管理所看了不少马列主义的书，你可以带家属去看看他嘛！’”

爱新觉罗·溥仪，字耀之，号浩然，笔名植莲，1906年出生于北京，1908年光绪帝驾崩，溥仪嗣位，翌年改元宣统。辛亥革命后，溥仪被迫退位，成为清朝末代皇帝，也是中国两千余年封建历史上最后一个皇帝。九一八事变后，他先后被日本帝国主义扶持为伪满州国执政、傀儡皇帝，年号康德（1934年—1945年），因之又称康德皇帝。1945年8月17日，溥仪在沈阳准备逃亡时，被苏联红军俘虏，带到苏联囚禁，1950年8月由苏联移交中国，入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自从被关押的那天起，他就万念俱灰，从来也没有幻想再见到亲人，如今见了七叔、三妹、五妹，已是吃惊不小，又听说是毛主席让他们来看望自己的，心头一热，禁不住流下了眼泪。

3月13日，毛泽东听取主管农林水利的第7办公室负责人汇报。

3月14日，毛泽东会见了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长征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艾地，周恩来陪同在座。毛泽东与长征、艾地进行了亲切的谈话，内容摘录如下：

长征：《毛泽东选集》第4卷什么时候可以出版？

毛泽东：因为我怠工，所以拖迟了。出版之前想把过去写的东西再看一遍，但总懒得看。对已经发表过的东西，完全满意的很少。比如，《实践论》算是比较满意的，《矛盾论》就并不很满意。《新民主主义论》初稿写到一半时，中国近百年历史前80年是一阶段、后20年是一阶段的看法，才逐渐明确起来，因此重新写起，经过反复修改才定了稿。《论联合政府》则只是把政纲排列起来，加工不多，不好。

周恩来：《论联合政府》当时动员的力量和作用很大，甚至比《新民主主义论》还大。

艾地：《毛泽东选集》出了第3卷之后，毛主席对第1卷、第2卷有没有打算作什么修改？

毛：现在还没有这个打算，只是想到还可以补一些注解。

艾：《毛泽东选集》里有一篇文章谈革命的武装斗争的问题，不知道那是就中国的特点说的，还是指所有国家说的？

毛：那不单是说中国的问题，也包括外国。

艾：现在是不是也还那样说？

毛：现在也还是那样说。波立特（英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笔者注）同志也曾提到这个问题，问要不要修改。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和波立特同志的意见是不一致的。

**要不要进行武装斗争，不是我们单方面能决定的，我们并不是资产阶级的参谋长。**我们可以而且应当这样说，我们要争取和平进到社会主义；但还应当说，即使一时不说也要这样考虑问题，**当资产阶级用武装来进攻的时候，我们就要被迫进行武装斗争来取得革命胜利**。**恩格斯生前曾经说过，在特定的条件下，英国和美国也可以和平进到社会主义。但到20世纪，到帝国主义时代，美国和英国都成为帝国主义国家，情况就不同了。列宁就不再那样说了。**自然，也可以设想，今后会有少数国家，在全世界范围内整个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的条件之下，可能不再经过国内的武装斗争而和平取得革命的胜利。力量的因素是很重要的，包括武装力量在内。现在我们的阵营还只包括全世界三分之一的国家。**到我们占大多数或绝大多数的时候，是会有一些国家在我们的巨大力量包围之下，不必经过国内的武装斗争而和平取得革命胜利的。在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机关和军队的国家，我们如果只作和平取得革命胜利的打算，那是要吃亏的，因为我们并不是资产阶级的参谋长，他让不让你和平取得胜利，并不决定于你的主观愿望。**我们现在也说要争取和平解放台湾，但我们并不是美国和蒋介石的参谋长，我们不能替他们做答案。

艾：印尼有许多同志认为毛主席思想成熟，写文章一定是一气呵成，不必修改。

毛：那样的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我们的头脑、思想反映客观实际，无论什么时候谁都不可能一下子就反映得完全正确，无遗无误。**客观实际是错综复杂的，不断发展变化的。我们的头脑、思想对客观实际的反映，是一个由不完全到更完全、不很明确到更明确、不深入到更深入的发展变化过程，同时还要随客观实际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写《新民主主义论》时，许多东西在起初是不明确的，在写的过程中才逐渐明确起来，而且经过反复修改，才把意思表达得比较准确。过去写的文章，很多现在并不满意。迷信是不好的。你们听我们的意见，要分析，要从你们本国的实际出发。我们对中国国内问题的意见还不都是一点错也没有的，何况用来处理外国的事。还说一点，现在传播的关于我的故事，有些并不真实，是不可信的。例如，香港有一家报纸说我曾经在一个深夜到离开延安40里地的地方去看一个伤兵，因为他说他死前一定要见一见毛主席。实际上并没有这回事。伤兵我是去看过的，但就在延安，而且在白天，并不是应一个快断气的伤兵的要求而赶去看他。还有一篇故事，说我8岁就不相信神，成为一个无神论者。但当时我还是相信神的，后来又曾经是唯心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那篇文章说的话不符合实际。那也是一种迷信，那样是不好的。

3月15日、16日，毛泽东先后听取农业部、水利部、林业部负责人的汇报。

欲知毛泽东此后的工作情况，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从2月14日开始听取国务院有关工业、农业、商业、财政等34个部门和国家计委的工作汇报，的确是够辛苦的。正像他在3月2日所说的“**半月来汇报”，“使我强迫受训，比坐牢还厉害。坐牢脑子还自由，现在脑子也不自由”。**后来一直到4月24日，汇报工作才全部结束，历时43天之久，他的辛苦程度是可想而知的。这一重要活动，是他在建国后乃至他一生中所作的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最周密而又最系统的经济工作调查研究和总结。随着汇报的结束，一篇初步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的经典之作——《论十大关系》，已经酝酿出来了，这就是巨人的脑袋！

**第23章**

“**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

**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

**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话说1956年3月17日晚饭后，吴冷西乘车从国会街的新华社总部出发，沿着华灯初放的西长安街东驶，由新华门进入中南海，在丰泽园下车，来到颐年堂，列席毛泽东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会议。吴冷西见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张闻天、中联部部长王稼祥，已经坐在了西边小厅里。这几个人也都是来列席会议的。接着，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伯达也陆续到了。

晚8时左右，毛泽东来到了颐年堂，他坐下后问吴冷西：

“赫鲁晓夫报告全文已发给哪些同志？”

吴冷西说：

“发给了所有政治局同志和有关负责同志。”

前文已经说过，早在苏共二十大结束后，毛泽东就得到了朱德、邓小平关于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情况汇报，这不能不引起他的高度重视。但是，毛泽东所了解的只是一个大致内容，并没有文字根据，所以一直无法深入研究。直到3月10日，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了这个报告的全文，在全世界引起了轰动，中共中央才得到了文字依据。新华社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立即着手翻译，尔后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开列的名单，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文本分送给中央负责人阅读研究。

再说毛泽东环视了一下与会者，问道：

“大家看了没有？”

好几个人都说没有看完。毛泽东也说：

“我刚开始看，很费力，还没有看完。大家有什么看法？”

邓小平说：

“我们当时在苏联，只是听苏共中央联络部一位联络员让翻译读了一遍，感到内容很乱，逻辑性差，说了一大堆关于斯大林破坏法制、肃反中杀错了很多人、对苏德战争毫无准备、在战争中靠地球仪指挥等等，还讲了一个南斯拉夫问题，其它政策性的问题无甚印象。我对苏共中央联络员说：‘此事关系重大，需要向中央报告。’现在再看全文，还没有看完，印象还是不好。现在全世界都议论这个报告，许多兄弟党已表示了态度，恐怕我们党也要表态，采取什么方式可以考虑。”

邓小平说完了，其他人也议论纷纷，有人说：苏共事先不同兄弟党商量，就批评斯大林这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人物，是对各国党的突然袭击，引起了严重混乱。有人说：赫鲁晓夫报告中全盘否定斯大林是严重错误的。毛泽东听了大家的议论，就说：

“我们党从一开始就对苏共‘二十大’有保留的意见。我们《人民日报》发表了两篇社论。第1篇是根据大会开始时赫鲁晓夫的公开报告写的。那时，我们不晓得他会大反斯大林，从大局考虑给予支持。但社论中只谈了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问题，没有谈和平过渡问题，因为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不同意见。苏共‘二十大’结束后，中央收到代表团发来的电报，报告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但不了解详细内容，不好仓促发表意见。所以在第2篇社论中，我们采取顾左右而言他的方针，只讲他们的第6个‘五年计划’，笼统地表示支持。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值得认真研究，特别是这个报告所涉及的问题，以及它在全世界所造成的影响。现在，全世界都在议论，我们也要议论。现在看来，至少可以指出两点：**一是他揭了盖子，二是他捅了娄子。说他揭了盖子，就是讲，他的秘密报告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是正确的，这就破除了迷信。说他捅了娄子，就是讲，他做的这个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是不是这样，大家可以研究。大家昨天才拿到全文，还没有看完。希望仔细看一看，想一想，过一两天再来讨论。”

这次会议一直开到18日凌晨1时，会后，毛泽东又留下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康生、杨尚昆，继续讨论到凌晨两点。

3月18日，毛泽东听取气象局负责人的汇报。

这一天，毛泽东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伯达，分析研究西方通讯社对苏联国内情况的报道等问题。

从3月19日到21日，毛泽东听取国务院主管财贸金融的第5办公室负责人汇报。

3月2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研究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全体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参加了会议，列席会议的除了17日参加中央书记处会议的王稼祥、张闻天、杨尚昆、胡乔木和吴冷西以外，又增加了陆定一、邓拓、胡绳。与会者就赫鲁晓夫的报告及其影响、斯大林的错误、中苏两党的关系、个人迷信问题进行了讨论。毛泽东在最后也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首先谈到了斯大林在中国问题上所犯的错误，他说：

斯大林在抗日战争开始时，支持王明的“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路线；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又要中国共产党不要反击国民党发动的内战；在1949年底我访苏期间，不愿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直到中国志愿军抗美援朝后，他才相信中国共产党是国际主义的共产党。

毛泽东总结了4点意见：

“第一，共产主义运动，从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算起，于今只有100年多一点。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从十月革命算起，还不到40年。实现共产主义是空前伟大而又空前艰巨的事业。不艰巨就不能说伟大，因为很艰巨才很伟大。在这艰巨斗争的过程中，**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走的是前无古人的道路。我历来是‘难免论’。斯大林犯错误是题中应有之义。**赫鲁晓夫同样也要犯错误。苏联要犯错误，我们也要犯错误。问题在于共产党能够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克服自己的错误。

第二，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否认存在矛盾就是否认唯物辩证法。矛盾无所不在，无时不在。斯大林的错误证明了这一点。有矛盾就有斗争，只不过斗争的性质和形式不同于阶级社会而已。

第三，**斯大林犯过严重错误，但他有伟大功绩。他在某些方面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但他仍然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著作虽然包含某些错误，但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只不过在学习时要采取分析的态度。

第四，赫鲁晓夫这次揭了盖子，又捅了娄子。他**破除了那种认为苏联、苏共和斯大林一切都是正确的迷信，有利于反对教条主义。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应该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了。**应该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了。至于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失误，我们要尽力加以补救。”

毛泽东提议说：

**“对于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我们党应当表示态度，方式可以考虑发表文章，因为发表声明或做出决议，都显得过于正式，**苏共还没有公布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而且此事的后果仍在发展中。”

政治局全体委员，都表示赞成毛泽东的建议。毛泽东最后说：

“**这篇文章可以以支持苏共20大反对个人迷信的姿态，正面讲一些道理，补救赫鲁晓夫的失误。对斯大林的一生加以分析，既要指出他的严重错误，更要强调他的伟大功绩。**对我党历史上同斯大林有关的路线错误，只从我党自己方面讲，不涉及斯大林。**对个人迷信做一些分析，并说明我党一贯主张实行群众路线，反对突出个人**。文章不要太长，要有针对性地讲道理。最好一个星期内写出来。”

会议决定这篇文章由陈伯达执笔，由中宣部和新华社协助。

3月25日，毛泽东在怀仁堂观看话剧《在康布尔草原上》。剧间休息时，毛泽东、刘少奇先后来到休息室里喝茶。卫立煌夫妇与统战部长徐冰本来也准备到休息室喝茶，可卫立煌在门口看见毛泽东已在里面，就有点犹豫了。此时，毛泽东也看见了卫立煌，他便站起身来同卫立煌打招呼，并请他抽烟。刘少奇也马上凑过来同卫立煌握手寒暄。

3月26日、27日，毛泽东分别听取商业部、对外贸易部负责人的汇报。

3月29日，陈伯达将对苏共二十大的评论文章写出初稿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定名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他与陆定一、胡乔木、吴冷西、胡绳一起，又经过两次讨论、修改后，于4月1日呈送给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

1956年4月1日晚10时50分，毛泽东约陈伯达一起商谈《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的修改问题，一直到4月2日凌晨2时才结束。

4月2日凌晨4时，毛泽东就印发和讨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修改稿，给刘少奇、邓小平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社论已由陈伯达同志写好，请小平于本日（2日）夜间印成清样约20份左右，立即送各政治局委员，各副秘书长，王稼祥、陈伯达、张际春、邓拓、胡绳等同志，请他们于3日上午看一遍，3日下午请你们召集一次政治局会议（有看过清样各同志参加），提出修改意见；于4日上午修改完毕。4日下午打成第2次清样，由书记处再斟酌一下，即可发稿，争取5日见报。目前有了这篇社论就够了。”

4月2日下午，阳光明媚，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常务副主任兼党组副书记张启龙，同邓辰西、邓飞一起来到菊香书屋，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刘少奇、彭真、李先念、马明方等人也在座。张启龙汇报说：

“供销社对野生植物、小土产的收购，比较重视，例如：红根、笋子、板栗、苍耳子等等，这有几样好处，可以搞活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有的土特产还能出口销售国外，很受欢迎，为国家换取外汇。”

毛泽东听了很感兴趣，他说：

“**对红根、苍耳、笋子这类土特产要多收购。多收，农民就可以多种，增加收入，改善生活。**苍耳子出油率和大豆差不多。现在大豆不够，听说扩大大豆种植面积不易。种大豆的地可种粮食。收购苍耳子要当成收购大豆一样，苍耳子2斤等于大豆1斤，供销社要设一科学研究机构，研究这些东西。你们这么大的单位，应有科学研究机构和学院。”

张启龙说：

“现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很高，化肥对农作物的增产增收起了很大作用，很受农民欢迎。但国家生产的化肥产量有限，即使从国外进口一些，也远远满足不了需要。我们设想组织地方制造杂肥、细菌肥。今年计划搞2200万吨杂肥，满足农民的需要。”

毛泽东点点头说：

“对，应该这么做，过去注意搞大的，国家也只生产50万吨化肥，而2200万吨杂肥等于多少个工厂的生产啊！你们可以大量制造。如果不搞，河泥、塘泥都要被挖光，墙也不能年年拆吧！”

张启龙说：

“这几年全国掀起了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高潮，农村生产形势很好，供销社的生产资料零售额逐年增加，但生活资料零售额却有下降的趋势，各地供销社反映消费品不好卖。”

毛泽东说：

“生产资料增多，难怪生活资料卖不出去。生产资料销售量还要增加，这是合理的。因为要搞生产，要勤俭办社。只要在生产上打下了基础，两年以后，生活资料销量就可能多些。现在被生产的气氛压倒，这是暂时的，将来消费资料还是有前途的。”

李先念插话说：

“现在没有人敢去信用社存款，不敢买酒、烟、百货等用品。”

毛泽东说：

“等二三年吧，中国富农占4%，保守的不是富农，而是富裕中农，富裕中农又是那样多。酒还要喝，我有个朋友来北京，临走时，我还送他2瓶酒。**花钱可以合法，要发一个指示，不影响生产，可以自由用钱，不要限制。**”

张启龙说：

“经营小商品赚钱不多，又很麻烦，过去供销社不经营，农民群众反映强烈，从为人民服务的角度考虑，供销社应经营与群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小商品。”

毛泽东问道：

“为什么过去不经营？是否有唯利是图？”

李先念说：

“过去商业部门对小商品注意不够。”

张启龙说：

“过去这些商品私商经营，如果我们经营，把他们挤垮了，无法安排。”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吐了一口气，沉思了一下，说：

“农村这个市场海阔天空，供销社应从方便农民群众生活出发，把小商品纳入自己的经营范围。”

张启龙说：

“供销社现在这种按行政区域进货的做法，不符合商品经济规律，也不适应形势的发展，必须坚决改变。供销社在经营上要扩大‘直达运输’业务。”

毛泽东说：

“**‘直达运输’就是不机械地按行政区划进货。这种做法，我同意。**过去商人没有什么行政区划，沙市附近的可以从汉口进货，不一定非到长沙进货，江西邻近浙江的可以到浙江进货。**按行政区划进货是共产党的倒退，一定要按经济规律办事，要目无行政。**要开一个全国性会议，先发个指示，写清楚，要达到什么目的，由先念同志负责。”

张启龙说：

“总社的领导一致认为，为了搞好工作，必须深入实际，多下基层，加强调查研究。”

毛泽东一挥手，说：

“很好，这样做，就有办法了。”

4月3日，毛泽东委托刘少奇在西楼会议厅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要大家对陈伯达执笔撰写的对苏评论文章充分讨论修改。

是日晚，毛泽东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伯达、胡乔木、胡绳，一起讨论修改文章。会后，陈伯达、陆定一、胡乔木、吴冷西、胡绳根据大家提出的意见，又连夜修改，于4月4日凌晨打出清样送毛泽东。

4月4日，毛泽东在文章中作了多处修改。

4月4日中午，毛泽东再次召集会议，他解释了对稿子的修改，征求大家还有什么意见。与会者又提出了一些属于文字上的意见，毛泽东让陈伯达等人边听意见边修改。

毛泽东在会议快结束时，又说了一番话，他说：

“发表这篇文章，我们对苏共二十大表示了明确的但也是初步的态度。议论以后还会有。问题在于我们自己从中得到什么教益。**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在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2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个问题，我几年前就开始考虑。先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考虑怎样把合作社办得又多又快又好，后来又在建设上考虑能否不用或者少用苏联的拐杖，不像第1个‘五年计划’那样照搬苏联一套，自己根据中国的国情，建设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现在感谢赫鲁晓夫揭开了盖子，我们应从各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不要再像过去那样迷信了。其实，过去我们也不是完全迷信，有自己的独创。现在更要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看了修改后的文章，又在题目的下面加上说明：“这篇文章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

毛泽东鉴于米高扬将在4月6日率苏联政府代表团到达北京，便决定先由新华社在当晚播发这篇文章，4月5日再由《人民日报》等全文刊发。

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曾经毛泽东先后7次作了重大修改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文章末尾的一大段文字便是毛泽东的手笔：

“共产党人对于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发生的错误，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有些人认为斯大林完全错了，这是严重的误解。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也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对于他的正确的地方和错误的地方做出全面的和适当的分析，从而吸取有益的教训。不论是他的正确的地方，或者错误的地方，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现象，带有时代的特点。整个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还只有100年多一点的时间，从十月革命胜利以来，还只有39年的时间，许多革命工作的经验还是不足的。我们有伟大的成绩，但是还有缺点和错误。如同一个成绩出现了接着又创造新的成绩一样，一个缺点或错误克服了，新的缺点或错误又可能产生，又有待于我们去克服。而成绩总是多于缺点，正确的地方总是多于错误的地方，缺点和错误总是要被克服的。好的领导者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认真对待错误。完全不犯错误的人在世界上是从来没有的。”

这篇文章最终不是用社论的形式，而且署名是“《人民日报》编辑部”，这种方式很特别，更加引人注目。

4月5日这一天，毛泽东听取了粮食部负责人的汇报。

4月8日，毛泽东听取了农产品采购部负责人的汇报。

4月9日到11日，毛泽东分别听取财政部、人民银行负责人的汇报。

至此，国务院34个部门的汇报全部结束。

从4月12日到17日，毛泽东又连续6天参观了设在中南海的机械工业展览。每天下午，他少则看上一两个小时，多则看上3个多小时。有时他不满足于讲解员的解说，还找来一些有关的图书和材料进一步研究。

4月17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观看浙江昆曲团的《十五贯》。

4月18日，毛泽东听取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关于第2个“五年计划”的汇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也在座。李富春的汇报一直持续到4月24日。

4月19日，毛泽东在听取李富春的汇报时说：

“3个关系必须很好地解决，即：沿海与内地的关系；轻工业与重工业的关系；个人与集体的关系。真想建设内地，就必须充分利用沿海；真想建设重工业，就必须建设轻工业；真想搞好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就必须搞好个人所得。”

他警告说：

“**现在的危险是忽视个人利益，基本建设和非生产性建设太多。**应该使90%的社员个人收入每年增加。**如果不注意个人收入问题，就可能犯大错误**。搞命令主义和减少农村副业也是错误的。”

毛泽东还提出了两个“万岁”的口号，他说：

“共产党万岁，民主党派也万岁。他们可以看着我们，这也是一种民主。共产党有两怕，一怕老百姓，二怕民主人士。”

毛泽东所谓的“怕”，是一个形象的说法，即接受监督的意思。

4月20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事务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事务委员会，分别致电祝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成立。

中央政府派出以陈毅为团长、由许多兄弟民族的代表人物组成的庞大代表团，到西藏去祝贺，并带去了毛泽东亲笔题写的“祝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成立”的锦旗。

在4月22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举行成立大会。达赖喇嘛致开幕词。陈毅副总理宣读国务院命令，并代表国务院把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印鉴授予达赖喇嘛。

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由达赖喇嘛担任，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担任第一副主任，张国华担任第二副主任。

《人民日报》为此发表了题为《民族政策的伟大胜利》的社论。

4月20日下午，毛泽东听取李富春汇报。

这一天，毛泽东进一步把问题归纳为5个关系，他说：

“除了轻工业与重工业、沿海与内地、个人与集体、地方与中央几个关系，还有经济与国防的关系。”

毛泽东还说：

“提出又多又快之后，可能产生盲目性，如在杭州开会时，有些省要种的红薯太多。工业也可能有这种情况。过去我们要他们提高，现在又要他们压缩。”

4月20日晚10时许，毛泽全接到中南海来的电话，要他们夫妇和其兄长毛纯珠一起到中南海与毛泽东见面。

毛纯珠谱名毛泽掌，是毛泽全的胞兄，长毛泽全11岁，在乡下务农，不久前从韶山东茅塘老家来到北京，看望弟弟和弟媳一家。

毛泽全、徐寄萍带着大女儿远慧和小女儿远平，同哥哥毛纯珠一起来到中南海毛泽东的办公室。毛泽东微笑着同他们一一握手寒暄，爽朗地说：

“我刚睡醒，现在是我精神最好的时候，大家先吃饭，饭后再谈吧。”

毛泽全等人早已吃过晚饭，但毛泽东盛情邀请，却之不恭，毛泽全只好答应一起吃饭。毛泽东的办公室房间不大，放了一张办公桌，摆着几张沙发。服务人员就在办公桌旁放了两个不大的方桌，端来盛有茄子、苦瓜、西红柿炒鸡蛋、辣椒之类的几个碟子。毛泽东指着西红柿对毛纯珠说：

“这东西我就不爱吃，可医生说有营养。**鸡蛋呢，医生一会说应多吃，一会又说不能多吃，我就不管那一套。医生的话，不可不听，也不可全听啊！”**

饭后，毛泽东向毛纯珠询问了家乡合作化的情况，他又问：

“农民对合作化喜欢不喜欢？”

毛纯珠说：

“喜欢。”

“是真喜欢还是假喜欢？”

“真喜欢。”

“每个农业合作社的范围有多大？每户是不是还自家喂猪？”

毛纯珠是个老实忠厚的农民，他尽自己所知作了回答。毛泽东说：

“看来目前农业合作社宜小不宜大，回去后告诉乡亲们，每户还是要多喂猪。猪多肥多，地里肥多就能多打粮。”

毛纯珠是个种田能手，他想不到毛泽东对种地、养猪这些事还这么操心，就连声说是。

“婶母身体还健吗？”

毛泽东又问。毛纯珠说：

“我母亲身体还健康，还能喂猪喂鸡，只是下的鸡蛋自己舍不得吃，卖了换钱花。”

毛泽东一听，就动了感情，他说：

**“拿200块钱给你，带给婶母买点吃的，补补身子。”**

说完就叫秘书去拿钱。毛泽全在一旁急了，连忙说：

“不必了，主席，我们常寄钱回去，不用你管。”

毛泽东这才向秘书招了招手，说：

“那就算了。”

毛泽东接着又问毛泽全：

“你现在工作任务紧张吗？”

毛泽全说：

“现在正参加总后的干部哲学学习班。”

毛泽东说：

“那正好，你学习完以后，向总后领导请个假，到湖南跑一趟，到你做过工、种过地的地方，去了解一下农业合作化的情况和问题，回来向我汇报。”

毛泽东说完，给毛宇居写了一封信，请毛纯珠带回去。他在信中写道：

宇居兄：

迭次惠书，均已收到，甚为感谢。今托纯珠之便，敬致问候之意。恭祝

兴居康吉！

毛泽东 1956年4月20日

毛泽东写毕，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在上面写着：请带交 宇居兄 毛泽东。将信笺插入信封，一起交给了毛纯珠。他又对徐寄萍说：

“上次你不是想拍张合影吗？那天没拍成，今天就拍吧。”

摄影师来了。毛泽东征求大家意见说：

“我们就这样自然地坐着拍好吗？”

徐寄萍笑着说：

“主席，还是站在一起合拍吧。”

“好，依你的意见。”

于是，毛泽东站在中间，毛纯珠站在右边，毛泽全、徐寄萍站在另一边，远慧、远平站在毛泽东跟前。摄影师摆好镜头，按下了快门。

后来，毛泽全几次调动工作，这是他们夫妇和孩子们与毛泽东的最后一次见面，这张合影也成为他们这次见面的珍贵纪念。

4月21日，毛泽东在听取李富春汇报时插话说：

“农业机械化实行一部分之后，要看看情况，再考虑发展程度。”

4月23日，毛泽东在听取李富春汇报时插话说：

“在第2个‘五年计划’工业投资中，轻工业投资的比重，比第1个‘五年计划’时略有增加，这就是与苏联不同之处，将来历史会判断谁正确些。”

4月24日，毛泽东在听取李富春汇报时进一步归纳出“六大矛盾”，也就是6个关系：1、轻工业与重工业；2、沿海与内地；3、国防、行政与经济、文化；4、个人与集体；5、地方与中央；6、少数民族与汉族。他说：

“这几个矛盾如果调整得好，工作就会搞得更好些，犯错误也犯在这些矛盾上。如斯大林就在第4个矛盾上犯了错误，东欧兄弟国家在第1个矛盾上犯了错误。”

至此，毛泽东长达43天的调查研究工作全部结束。此后，他在整理调查材料时，重新把它概括为“十大关系”，即：1、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2、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3、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4、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5、中央和地方的关系；6、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7、党和非党的关系；8、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9、是非关系；10、中国和外国的关系。

4月25日，毛泽东签发命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

此后，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根据《决定》，对于关押在中国的最后一批日本战争罪犯进行审判。6月28日，第一批免予起诉的335名战犯乘日本“兴安丸”号轮船回国，不久，又有两批战犯免予起诉，共计有1017名日本战犯被免予起诉遣返回国。另外45名从宽判处有期徒刑的，也允许其家属前来探视；他们中间的一部分，或服满刑期、或获得减刑、或因病释放，至1964年3月6日，最后3名战犯获释回国。

再说4月25日下午，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董必武、彭德怀、邓小平等人，接见出席全国邮电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的全体代表。

此前，朱学范到中南海向毛泽东汇报工作，他说，会议在5天中，交流了130多种先进经验，还请苏联邮电先进生产者代表团团长索罗金、莫斯科市内电话管理局副总工程师马克西莫娃、莫斯科市中央电报局报务员克利马诺娃介绍先进经验。毛泽东说：

“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广中国自己的先进经验，学习苏联先进经验，都是必要的。对外国的经验，不能照搬，对苏联的经验也不能照搬。学习苏联经验，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你这个邮电部的职工中有不少知识分子，工程技术人员不少，要把他们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要依靠工人、工程技术人员，这样，你这个邮电部长就可以睡得着觉了。”**

接见结束后，毛泽东在中直俱乐部第2次观看浙江昆剧团演出的《十五贯》。

4月25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除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外，还有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这次会议一直开到28日才结束。

毛泽东在这次扩大会议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重要讲话。他开宗明义地说：

“最近几个月，中央政治局听了中央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财政等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从中看到一些有关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综合起来，一共有10个问题，也就是十大关系。提出这10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在“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问题上，毛泽东强调说：

“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

谈到“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毛泽东说：

“**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彭德怀插话说：

“如果将来爆发战争，由我们出军队，苏联出原子弹。”

毛泽东说：

“经过一段时间，我们就不但会有很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可能有自己的原子弹。这里也发生这么一个问题，你对原子弹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还是只有几分想，没有十分想呢？你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你不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还是按老章程办事。这是战略方针的问题，希望军委讨论一下。”

在“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问题上，毛泽东说：

“国家和工厂、合作社的关系，工厂、合作社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这两种关系都要处理好。为此，就不能只顾一头，**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3个方面，也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军民兼顾’、‘公私兼顾’。”**

谈到工厂在统一领导下的独立性问题，他说：

“从原则上说，统一性和独立性是对立的统一，要有统一性，也要有独立性。比如我们现在开会是统一性，散会以后有人散步，有人读书，有人吃饭，就是独立性。**如果我们不给每个人散会后的独立性，一直把会无休止的开下去，不是所有的人都要死光吗？**个人是这样，工厂和其它生产单位也是这样。各个生产单位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才会发展得更加活泼。”

在谈到苏联“把农民挖得很苦”的教训时，他说：

“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

关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毛泽东说：

“**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破坏这种必要的统一，是不允许的。同时，又必须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各地都要有适合当地情况的特殊。**这种特殊不是高岗那样的特殊，而是为了整体利益，为了加强全国统一所必要的特殊。”

关于“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毛泽东说：

“我们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也要反对，但是那一般的不是重点。”“我们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我们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来共同努力于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

关于“党和非党的关系”，他说：

“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一切善意地向我们提意见的民主人士，我们都要团结。像卫立煌、翁文灏这样的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我们应当继续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就是那些骂我们的，像龙云、梁漱溟、彭一湖之类，我们也要养起来，让他们骂，骂得无理，我们反驳，骂得有理，我们接受。这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比较有利。”**

关于“是非关系”，毛泽东说：

“党内党外都要分清是非。如何对待犯了错误的人，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正确的态度应当是，对于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允许他们继续革命。”

关于“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毛泽东说：

“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不然它为什么能存在？为什么能发展？同时，每个民族也都有它的短处。”“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

“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1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9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按照这个分寸，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三七开的评价比较合适。斯大林对中国做了一些错事。第2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1949、1950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可是，我们还认为他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这是公正的。”

“我国过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不是帝国主义，历来受人欺负。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但是，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在这方面要鼓点劲，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把抗美援朝中提倡的‘藐视美帝国主义’的精神发展起来。”

毛泽东最后说：

“这10种关系，都是矛盾。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4月27日，陆定一在讨论毛泽东《论十大关系》讲话的发言中，提起了中国生物学家胡先骕的一篇文章，他说：

“从前我们看重他的政治问题，因为他那个时候骂了苏联，所以我们就生气了。他讲的问题是生物学界很重要的问题，这个人在生物学界很有威望。”

毛泽东问道：

“不是什么人叫我们跟他斗一斗吗？”

陆定一说：

“后来我们把那个东西和缓了，报纸上没有提他的名字，因此还没有和他撕破脸。”

毛泽东问：

“胡先骕那个文章对不对？”

陆定一说：

“他批评李森科的那个东西，很好，那是属于学术性质的问题，我们不要去干涉比较好。”

毛泽东说：

“这个人是很顽固的，他是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年纪七八十了。他赞成文言文，反对白话文。这个人现在还是学部委员吗？”

陆定一说：

“不是，没有给。”

毛泽东说：

**“恐怕还是要给，他是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

陆定一在继续发言中还谈到了文艺问题，他说：

“要写新人物，但写一些老人物也可以。如果现在有一个人能把上海30年代社会的变化写出来，我说那是世界第一的小说。”

毛泽东说：

“《乌鸦与麻雀》，那是部很好的电影。我们电影局就是不许它演，这两天可以找出来给大家看一看，见识见识，这是中国一篇很好的历史。”

周恩来问：

“最近看《十五贯》了没有？”

陆定一说：

“我看过，很好。”

毛泽东说：

“《十五贯》应该到处演，戏里边那些形象我们这里也是很多的，那些人现在还活着，比如过于执（县令过于执，凭熊友兰所有的15贯钱判定其为杀人凶手。知府况钟监斩时发现其中有冤情，重审此案，拿获了真凶。过于执，就成了中国戏剧中官僚主义者的典型形象——笔者注），在中国可以找出几百个来。”

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总结讲话。关于修改党章问题，他说：

“现在党章草案已经发给省委、市委和区党委去讨论了，请你们在这上面多提意见。我认为，党章确实应当充分体现纪律性和创造性，体现群众路线。没有纪律是不行的。但是纪律太死了也不行，妨碍创造性的发挥，这样的纪律是不好的，应当不要。

中央究竟是设一个副主席还是设几个副主席，也请你们讨论。少奇同志提出设几个副主席，现在的这个党章草案上是说设一个副主席。还有，是否可以仿照人民代表大会的办法，设党的常任代表。我们有人民的国会，有党的国会，党的国会就是党的代表大会。设常任代表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可以一年开一次代表大会。我们已经有10年没有开党的代表大会了，有了常任代表制度，每年就非开会不可。是不是可以考虑采用这个办法，比如5年一任。这还没有写到党章草案上去，提出来请大家考虑，看是否可以。”

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毛泽东说：

“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百花齐放’是群众中间提出来的，不晓得是谁提出来的。人们要我题词，我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百家争鸣’，这是两千年以前就有的事，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讲学术，这种学术也可以讲，那种学术也可以讲，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讲的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来越多。”

4月28日这一天，国务院审查了公安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军司令员兼政委罗瑞卿递交的《关于在人民警察中实行警衔制度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警衔条例（草案）》。

国务院第38次全体会议通过后，由周恩来提请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提案审查委员会审议。

随后，罗瑞卿前往毛泽东住处汇报工作，谈到了准备实行警衔制一事。毛泽东说：

**“你们警察也要挂牌牌了？肩上扛了牌牌，还怎么帮老百姓挑水、担粮食呀？”**

他还对贺龙说：

**“我看见那个牌牌，就不舒服。过去没有牌牌打胜仗，现在有了牌牌我看要打败仗了。”**

罗瑞卿见毛泽东如此说，立即返回公安部召开党组会，会议决定主动撤回警衔制议案。

4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此前，毛泽东在审阅修改社论稿时加写了一句话，他写的是：

“百家争鸣是说诸子百家在春秋战国时代两千年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说，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

4月29日下午，毛泽东会见了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党的代表，他在谈话中说：

“我很高兴见到同志们。跟同志们见面是不容易的，南北美洲同中国相距很远，中间隔着一个太平洋，再加上美国的人为的障碍。目前中国同世界上很多国家还没有建交，特别是同南北美洲的国家，商务和文化的往来也少。但是，我们相信外交关系是可以逐步建立的。”

“你们对我们的帮助很大，可能你们还没有感觉出来。美国是不放心中南美洲的，怕你们起来造反。**美国到处有火药库，亚洲是一个，欧洲是一个，非洲是一个，你们中南美洲也是一个。”**

4月底，程思远应邀来北京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庆祝活动，周恩来在中南海紫光阁设宴招待他。饭后，周恩来在谈话中说：

“请你转告所有在海外的国民党军政负责人员，我们的方针是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我们赞成这样一句古话：‘和为贵’。”

周恩来还说：

“我们欢迎李宗仁先生在他认为方便的时候回来看看。也欢迎国民党军政负责人来大陆探亲、访友、观光，我们将给予各种方便和协助，并保证他们来去自由。”

后来，程思远一回到香港就给在美国的李宗仁写了一封信，把周恩来的话转告给他。

1956年5月1日上午，应邀来华访问的日本友人宫崎龙介参加了“五一”劳动节观礼。在天安门城楼上，周恩来把宫崎龙介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握着宫崎龙介的手说：

“还是学生的时候，我曾给滔天先生写过一封信。”

宫崎龙介听了毛泽东的话，既兴奋又不知如何应对。他心想，怎么没有听父亲说过此事呢，既然毛泽东这样说了，肯定确有其事。

读者诸君可能还记得，宫崎龙介的父亲就是本传在第一卷中所提到过的宫崎寅藏，其人自号白浪滔天，也就是毛泽东这一次所说的“滔天先生”。毛泽东所说的信，是指他在1917年3月和萧三即萧植蕃写给“白浪滔天”的联名信。其内容已在第一卷中，恕不赘述。

宫崎龙介回到日本后，立即在父亲的遗物中寻找那封信，终于在一箱书信堆里找出了毛泽东那封用毛笔书写的手迹。1967年7月3日，这件毛泽东早年的手迹首次发表在日本《朝日新闻》上。原迹至今保存在日本。

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7次会议上再次讲了《论十大关系》，他还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说：

“我们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市区委书记会议上还谈到这一点，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在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有必要的。这个问题曾经谈过。百花齐放是文艺界提出的，后来有人要我写几个字，我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说春秋战国时代，两千年以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派，诸子百家，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在大的范围内，让杜威来争鸣好不好？那不好嘛。让胡适来争鸣好不好呢？也不好。那么说胡适要回来可以不可以呢？只要他愿意回来，是可以回来的，让我们批评过他以后再回来，就批评不着他了嘛，批评已经过去了嘛。只有反革命议论不让发表，这是人民民主专政。香港报纸、台湾报纸在北京出版是不是许可？应该不许可，不许可有好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李森科、非李森科，我们也搞不清楚，有那么多的学说，那么多的自然科学学派。就是社会科学，也有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谈。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

欲知毛泽东此后的重要活动，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人民日报》在1956年4月5日发表的经毛泽东作了7次重大修改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科学地评价了斯大林的历史功过，同时也认真地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为写这篇文章，毛泽东事先曾经强调说：**“对于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我们党应当表示态度，方式可以考虑发表文章，因为发表声明或做出决议，都显得过于正式，苏共还没有公布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而且此事的后果仍在发展中。**”这是一个极其冷静、极其慎重地反对苏修叛徒集团斗争的原则和策略。《经验》一文正是遵循这一原则和策略而撰写出来的“王顾左右而言他”之力作，一经发表，其影响即远播海内外。赫鲁晓夫一帮浑人焉知其中之奥妙，苏共机关报《真理报》竟然也全文予以转载了。

**第24章**

**“一切会有变化。腐朽的大的力量要让位给新生的小的力**

**量。力量小的要变成大的，因为大多数人要求变。”**

话说1956年5月3日早晨，毛泽东乘8205号飞机从北京西郊机场起飞，经武汉去广州。

毛泽东此次出行，是在4月25日提出的，并且坚持要乘坐由本国飞行员驾驶的飞机。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据此在4月30日向驻京专机飞行团团长胡萍下达了执行毛泽东专机的飞行任务，由胡萍亲自担任机长，飞行员为陈锦忠，领航员为张振民，通信员为柳昆尚，机械师为舒执章。专机选定飞行团按专机要求改装过的两架苏制里-2运输机中较好的8205号飞机。因为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乘坐人民空军的飞机出行，所以中央对于这次飞行特别重视，8205号飞机经过了仔细的维护和试飞。

这天上午，毛泽东乘坐8205号专机飞行4个半小时后，于12时30分在武昌南湖机场降落休息。下午2时30分，专机又从南湖机场起飞，飞行3个半小时后，于下午6点在广州白云机场降落，安全到达目的地。

毛泽东在广州期间，先后接见了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江西等省区领导人，主持召开了华东地区书记会议，又视察了广东水产馆和广州造纸厂，对发展沿海地区的工业、处理好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等问题作了重要指示。

5月2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根据毛泽东确立的“双百”方针的基本精神，向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医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说：

我们所主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中有独立思想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我们主张政治上必须分清敌我，我们又主张人民内部一定要自由。

5月28日，毛泽东在中南局负责人陶铸等陪同下，来到蛇口（即后来的深圳）视察。在陶铸汇报到港澳华侨投资问题时，毛泽东说：

“**要有更积极的政策，港澳华侨拿外汇来外汇走，这是合理的，这对我们并无所损，就是作为存款性质吧，**在一定期限内，例如一年，他们可以拿外汇来，一年后随时可以拿外汇走。这样就可以来来往往。**但有一条，钱怎么用他们不要去管，由国家计划使用**。股息多少，股息给不给外汇，这个问题可以研究。**要针对港澳华侨的顾忌，想办法争取利用这一大笔外汇。**”

5月29日傍晚，毛泽东在广州珠江乘坐小船溯流而上。小船绕过狭窄的河道，江面顿时开阔了。从附近几只小渔船上传来了热烈的欢呼声：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毛泽东兴致勃勃地向肤色黝黑的渔民们挥手致意，尔后纵身跃进珠江。他搏击着江水，忘情地高声呼喊：

“我自由了！”

他的保健大夫非常着急，眼睁睁地看着人们围着毛泽东悠闲地漂流着。

后来，毛泽东在海边散步时，又突发奇想，要马上去武汉游长江。同行的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立刻回去安排准备工作。毛泽东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

“我游泳不要告诉他们。”

毛泽东所说的“他们”，是指罗瑞卿等人。卫士长李银桥感觉事情重大，就立即报告了罗瑞卿。罗瑞卿马上来劝毛泽东，他说：

“长江水情复杂，有危险，不要去游吧。”

罗瑞卿还说：

“主席，我是不同意您游的，我是您的大警卫员，我要负起责任。您去游长江，我负不起责任。”

毛泽东只要到外地视察，或在公开场合露面，总是由罗瑞卿亲自护驾，不离左右，衣食住行，工作、休息、会客，都由罗瑞卿亲自安排。为了陪毛泽东在大江大海中游泳，罗瑞卿到了50岁，坚持学会了游泳。许多高级领导人都说“罗瑞卿是毛主席最好的警卫员。”

毛泽东见罗瑞卿不赞成他游长江，满脸不高兴，说道：

“你这个大警卫去‘警’国民党好了，不要‘禁’长江。”

罗瑞卿也倔得很，坚持说：

“主席，这不是您个人的事情，游长江这么大的事情要经过组织研究，组织上是不会同意的。”

毛泽东一听，怒火中烧，训斥罗瑞卿说：

“无非你们就是怕我死在你那个地方么！你怎么知道我会淹死？”

罗瑞卿连忙解释说：

“主席，不是那个意思。保护您的安全是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是不同意您冒风险。哪怕是一点风险也不许有。”

毛泽东冷笑一声，说：

“哪里一点风险没有？坐在家里，飞机可能扔炸弹呢，房子还有可能塌呢！”

罗瑞卿见劝不住毛泽东，就退了出去。他知道，只要自己不点头，毛泽东发再大的火也没有用。毛泽东毕竟高人一筹，罗瑞卿说不能游吗？他就派人到武汉做实地调察，看看到底能不能游。

第一次，毛泽东派警卫一中队队长韩庆余去武汉了解水情。韩队长也是反对毛泽东去游泳的，他到武汉问了问老百姓，都说不能游，就回来向毛泽东报告说，不能游。毛泽东问韩庆余：

“你下水试了没有？”

韩庆余回答说：

“我没有下水。”

毛泽东大怒道：

“你没有下水，怎么知道不能游？你怎么不说话了？把孙勇叫来！”

副卫士长孙勇来了，毛泽东指着他说：

“你再去，你亲自看看长江到底能游不能游？”

孙勇到了武汉，见到了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说明了来意。莽撞的陈再道立刻带着孙勇等人，跳到江里逆流而游。他喝了好几口水，差点溺水，护卫人员赶紧将他救上船来。孙勇回来如实地向毛泽东报告了情况。毛泽东有了根据，就理直气壮地对罗瑞卿说：

“这就对了么，要知道梨子的味道，就要亲口尝一尝。谁说长江不能游？孙勇不是游了吗？”

罗瑞卿无奈，只好同意了。毛泽东又提出要马上乘飞机到武汉。罗瑞卿说：

“中央有规定，为了您的安全，不能乘飞机。您不属于自己，而属于全党和全国人民。”

毛泽东又火了，他说：

“我9次不属于个人，总得有1次属于我自己吧？”

罗瑞卿只得再让一步。行前，毛泽东说：

“这个老韩哪，不讲真话，他没有下水去体验就说不能游。我们去游，不叫他去。叫他离开这里。”

就这样，韩庆余离开了一中队，不让他见毛泽东了。事后，毛泽东也觉得有点过分，他说：

“老韩是个好人，忠心耿耿，兢兢业业，就是反对我游泳。唉，这件事办得不好。”

5月30日上午，毛泽东乘8205号专机到了长沙，在长沙大托铺机场降落。他稍事休息，便召集省委书记座谈，了解他在广州主持召开的专门研究华中5省工作会议的贯彻情况。主人用清明节前刚采制的清茶招待毛泽东。

毛泽东见天气闷热，要去湘江游泳。罗瑞卿陪同到了江边，他见湘江水势平稳，水质清澈，就放了心。

湖南省公安厅长跑在最前边，去安排船只，在过一片草地时，竟被毒蛇咬了一口，大概是太紧张太激动了，他根本没有发觉，等他跑到江边，才喊了一声：“准备好，来了！”突然一屁股坐倒了。眨眼的功夫，他那条腿已经全肿了。大家立刻把他抬上车送医院，好在医治及时，没有什么大碍。

毛泽东故地重游，精神焕发，乘船行到河中心就下了水。他游姿翩翩，自由自在，好像是在办公坐久了伸个懒腰一般。他在湘江里畅游着，一直游到了橘子洲头。捧着照相机在岸边跟着拍摄毛泽东的侯波，一不小心掉进了一个粪池子里。她爬出来跑到河里去洗涮，刚洗好，看到毛泽东要上岸，立刻又赶到前面去抢镜头。

毛泽东上了岸，披着浴衣踩着烂泥走。他登高远眺，洲上的人们看到了他，立刻跑过来将他团团围住，抢着和他握手，殷勤问候，亲切异常。毛泽东同大家频频招呼，用家乡话和乡亲们谈着故乡的山山水水和生活情况，情趣盎然。他们谈到了大家正在培育的蔬菜，又由蔬菜的品种谈到了一旁生长茂密的茄子，在核对茄子两字的乡音的笑声里，毛泽东告别了依依不舍的乡亲们。

他带着满腿满脚的泥巴，顺着河岸边一条小路来到一户人家门前。这家没有大人，只有几个娃娃。

“给我点支烟吸。”

一名卫士给毛泽东递烟点火，另一名卫士借来了一把椅子让他坐下歇歇。娃娃们围着他看热闹。毛泽东看见一个小娃娃手里拿了一个什么东西，就问他：

“给爷爷看看好吗？”

那孩子是个鬼精灵，他双手捂得紧紧的，往上一举说：

“你猜不着！”

多好的画面呀，“咔嚓”，侯波按下了快门。在这张照片上，毛泽东的腿上脚上糊满了泥巴，睡衣下摆上也全是泥。他和娃娃的神态都是那么自然、朴实。若不是那件睡衣“现代化”了一点，真可以说是一幅“农家乐”了。

毛泽东在长沙还亲自请杨开慧的母亲杨老太太到蓉园吃了饭。他一直惦记着杨老太太，在全国由供给制改为薪金制后，他都是按期从工资中给杨老太太寄去生活费，以尽半子之义。

5月31日晨，毛泽东乘8205号专机飞抵武汉。当飞机在南湖机场降落时，他特意从空中观察武汉长江大桥的桥墩施工情景。

5月31日上午，毛泽东听取了省委书记王任重的工作汇报，还视察了武汉国棉一厂和湖北省工农业展览馆。

下午，毛泽东在武汉召开调查座谈会，中心议题是对农业合作化的经验进行总结。安排座谈会的负责人，原来在会场上的安排是：会议记录者与毛泽东坐在正面的主席台上，其他人的座位都安排在主席台的对面，地委书记们是第1排，省委的负责人们坐在第2排。

会议3点开始，毛泽东进来了，他看到这样的座位安排后，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说：

“这不是搞‘三堂会审’吗？还是按圆桌会议好，没有主席台，不要记录席。”

毛泽东等工作人员重新安排好座位后，这才坐了下来。他问道：

“同志们接到提纲没有？现在不按会前准备的提纲发言，各人畅所欲言，一不划右派，二不扣帽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要讲真话，不要讲假话，否则，我就会上当，就会浪费时间。”

他说完后，会场上有15分钟无人发言，后来发言的人也大多是一个调子，大唱赞歌。毛泽东听得很不耐烦，就说：

“今天休会，明天再讲。”

他叫住一位省委的负责人，问道：

“今天的会议开得怎么样？是否畅所欲言、言无不尽了？”

那位负责人说：“没有。”

“何以为据？”

“都是一个调。”

毛泽东用铅笔在纸上写了两句话：

“真是可惜，时间浪费了。”

他接着说：

“可惜呀，大家说一样的话，千篇一律，这个不是党的传统。开一大时就在争论，二大、三大、四大、五大都是如此。党魁这么讲，下面就跟着讲，人们不用自己的语言讲，而用领袖的语言讲话。所以，第一我还是不能死掉，我还得搞一段。第二，怎么提高我们党的理论水平。延安整风后，我快活了一阵子，指导思想统一，领导机构改善了，七大开成了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今天开的是重复发言的小会，耽误时间的小会。你把我的意思转告王任重同志，明天开会，中心议题是否能搞生产规划，要畅所欲言。”

1956年6月1日上午，座谈会继续进行。省委主要领导人就农业生产发展规划问题进行了重点发言，举出实例，说明这个规划的制订是符合实际的。与会者在会上畅所欲言，言无不尽。毛泽东在笔记本上不停地记着，脸上露出了笑容。最后，他高兴地说：

“好，同志们都说出了心里话。昨天的会议使我失望，今天的会议使我高兴。你们不能看眼色行事，尤其不能看我的脸色办事。**我的脸色是千变万化的，蒋介石是以不变应万变，我是以万变应蒋介石的不变的。”**

此时，武汉长江大桥正在施工，毛泽东要到大桥工地视察。大桥工程局局长彭敏问：

“是岸上看还是水上看？”

毛泽东说：

“水上看。”

武汉长江大桥水中的桥墩已全部建成，从汉阳江岸开始，钢梁正在向江中延伸。毛泽东乘上“武康”号轮船，经汉阳晴川阁，从2、3号桥墩间穿过，驶到鹦鹉洲附近的江面，又折回下行，从3、4桥墩间穿出。他回到船舱里听彭敏汇报工作，一面听，一面翻阅材料。彭敏详细地报告了中苏技术人员共同创造的世界桥梁史上史无前例的大型管柱基础和管柱钻孔法。毛泽东问：

“参加修建钱塘江桥的老工程师，现在还有谁？”

彭敏回答说：

“还有茅以升、罗英。”

毛泽东在一张纸上记了下来。杨尚昆问道：

“什么叫覆盖层？”

毛泽东解释道：

“就是岩面上的沙层。”

他问彭敏，是不是这样？彭敏点头称是。毛泽东还询问潜水工如何在水里沉下去，在水里怎样进行烧割和电焊？彭敏一一作答。毛泽东又问道：

“为什么铁路桥1957年10月通车？公路桥要到年底？”

彭敏说：

“铁路桥在下层，钢梁架完后，铺轨即可通车；公路桥在上层，钢梁架设后，还需要一段时间铺路面。”

“长江上还要修哪几个桥？”在有关人士回答后，毛泽东接着说：“将来长江上修上20个、30个桥，黄河也修上几十个，到处都能走。”

6月1日下午，天气闷热，气浪蒸人。毛泽东第1次横渡长江，要在长江南岸武昌的蛇山一带下水。他兴致勃勃地到了蛇山，马上被群众认了出来。成千上万的群众向他涌来，好几万人挤成一团，都想看看他。这下子可把罗瑞卿急坏了，他怕群众挤倒毛泽东，就和王任重及其他随行人员挽起手臂，拼命地承受着群众的压、推、挤，保护着毛泽东来到停在长江边的一艘船上。毛泽东打趣地问：

“游长江有危险吗？”

罗瑞卿挺着伟岸的身躯说：

“在长江里游泳，危险还是有的。但是主席不怕，我们就不怕，我们同主席在一起历经艰险，每次都能化险为夷。”

大家听他二人一问一答，都笑了起来。毛泽东说：

“长江大海能吓得住人吗？！”

说着，他就顺着汽艇甲板放下的软梯，爬下黄色江水中，众人一起跟随着下了长江。

毛泽东为了避免陈再道逆流而游的错误，决定顺流而下。他在水中先扎个猛子，把全身在水中浸一下，然后就把头露出水面，以侧泳式两臂左右交替着，一直游向前方。江面上刮着6级风，风大浪高，水深流急，波浪滔滔，时有漩涡。毛泽东泰然自若，轻浮水面。有时水面稍稍平稳，他便缓缓仰泳，面对蓝天，极目远望，悠然自得。

长江岸上的行路人，突然看到有这么多人在江里游泳，又是在中流激浪中顺流而下，也不知要游到何方，都以惊奇的目光望着这少见的景象。有许多人想看个究竟，就跟着在岸边奔跑，有的人还边跑边喊，也不知喊些什么。两岸上的人流越聚越多，直到岸上的建筑物挡住了去路，人们才停下脚步，还踮着脚尖瞭望，不肯离去。毛泽东游过了建筑物，在前面的岸上，又同样聚集了观望的人群，有的人在鼓掌，有的人发出惊奇的赞叹声。

毛泽东游兴起时，如蛟龙戏水，顺流而下，以至岸上追随的人们都追赶不及。

时已夕阳西下，毛泽东游到对岸汉口的谌家矶。侯波迅速地换了一卷胶卷，随手将空盒子扔在水中。谁知毛泽东看见了，他游过去一把抓起盒子，身子一翻，平躺在了水面上，仔细端详起来，口中还念念有词。他念的竟是英语。侯波见状一惊，她用的是进口的柯达胶卷，盒子上印的是英文说明书，想不到毛泽东竟然认识不少英文单词，把柯达胶卷的英文说明给念了出来。

毛泽东因两岸陡峭不能上岸，这才上了船。他指着侯波，笑着问：

“你没有下江吗？”

侯波说：

“我不会游泳。”

毛泽东说：

“喝几口长江水就会了。”

他身上滴着泥水，心满意足了，得意地对他的卫士们说：

“胆量小的人，常在风浪里锻炼，胆子也会大起来的。罗部长不叫我来游，我偏要来，还不是来了吗？明年6月份我还要来。”

毛泽东一气游了13公里，历时2小时零4分钟。更衣后，他坐在船头的藤圈椅上歇息抽烟，大家都夸赞他水性好。

6月2日下午，毛泽东从汉阳鹦鹉洲附近下水，游过龟山一带江面。他游到大桥上游的水域，一边踩水，一边观看正在紧张施工的大桥。

毛泽东临近桥墩，挥臂侧泳，从2、3号桥墩间游过。他还游过了长江、汉水的汇合处——龙王庙水域，战胜了漩涡，突破了急流，顺利地游到了武昌八大家附近；游程14公里还多，用了两个小时。在大家的劝说下，他才肯上了岸。

6月3日下午，毛泽东第3次横渡长江。

此时，他已经从汉口搬到东湖下榻，大家准备让他在东湖游泳，他不同意，说：

“长江是一个天然的最好的游泳池。在大江里游，随便它漂去。”

这一次，毛泽东从汉阳下水游到武昌。在江中，他时而仰游，时而侧游，有时还潜入水中，又顺利地游过了长江。

史无前例的游泳，超迈前人的胆略，亘古未有的气魄，使毛泽东在武汉的江水中酝酿出了自唐宋以来词家中唯一以游泳为题材的、词书双绝的著名篇章《水调歌头·长江》：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馀。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据陈再道多年后回忆说：“我陪同毛主席畅游长江，聆听了毛主席吟诵《水调歌头·游泳》的辉煌诗篇，深刻地感受到了一位伟大革命者征服大自然的宽广胸怀。给我印象很深的还有另外一件事。有一次，毛主席和我们围在一起吃苹果。有一个同志刚抓起水果刀要削皮，被毛主席看见了，他笑着亲切地对大家说：‘吃水果的时候，最好不要削皮，把它洗净就可以了。如果你要削皮，也只要薄薄地削一层。因为靠皮和靠核的果肉，是最有营养的。’说完，他便拿起洗净的苹果，大口大口地吃起来。”

再说毛泽东连续3次横渡长江的传闻，一时间不翼而飞，轰动了整个武汉。第4天午时刚过，长江两岸就已经聚集了无数观望的人群，有的人带了望远镜，有的人拿着照相机，谁不想亲眼看一看伟大领袖搏击风浪的风采呢！可遗憾的是，毛泽东于6月4日下午6时前离开了武汉。

这天下午6时许，毛泽东乘坐专机从汉口王家墩机场起飞，飞到河北衡水附近上空时，突然遭遇雷雨云阻断航路。雷雨云是垂直发展达数千米的云层，飞机一旦误入这样的云层，就会受到强烈地扰动和冰雹与雷电的袭击，即使是设备先进的飞机和技术高超的飞行员也不敢闯入这种危险的云层。喷气式飞机可以爬升到8000米高度以上，从云顶越过。但对于升限只有5600米的里-2飞机来说，就只有改变航线，绕过雷雨云区。8205号的空勤组经过研究，果断地改变了航向，先是飞向天气比较稳定的沧州机场上空，躲开雷雨云后，再改向北飞，回到北京西郊机场降落。这绕云飞行的过程约有40分钟，飞机与地面失去了联系，地面雷达也无法找到空中的飞机。守候在西郊机场迎接毛泽东的中央领导人和在指挥塔台上的刘亚楼，以及所有在场人员都焦虑万分。失踪的飞机终于出现在西郊机场的上空，缓缓降落。当毛泽东放下手中的书卷，从容走下飞机的时候，人们才松了一口气。

6月10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基本通过预算报告初稿，**经过政治局讨论的修改稿中强调反对急躁冒进。**

6月14日下午，毛泽东接见了全国科学发展规划会议的与会代表们，他在讲话中说，感谢科学家们为祖国科技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他还赞扬了数学家华罗庚所取得的成就和忘我的工作精神。

华罗庚听了毛泽东的讲话深受鼓舞。

6月14日这一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要注意多种经营”的党内指示，他写道：

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

现将两件调查材料发给你们参考。一件是谭震林同志关于湖南攸县农村情况的报告，一件是河北省委关于河北省农业和副业产值中各种产物所占的比例。两件材料都说明，**有必要号召各农业生产合作社立即注意开展多种经营，才能使90%以上的社员每年增加个人的收入，否则就是一个很大的偏差，甚至要犯严重错误**。河北省的粮食产值只占该省全部农业产值的28%多一点，而粮食以外的农产物则占71%多一点，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数目字。河北省产棉花较多，产粮食较少，其它各省情形与此有些不同，但是粮食产值似乎不会超过50%，而粮食以外作物及副业的产值至少占50%，或者在50%以上。我们如果不立即注意这个问题，不论在社员的收入方面，合作社的积累方面，国家的积累方面，势必都要大受影响。因此请你们自己，并且通知专、县、区、乡直到合作社，都对这个问题做一调查，加以分析，算出一笔粮食与非粮食产值比例的账，借以教育干部和群众。

中央 1956年6月14日

6月15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届第3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恩来在大会上就经济建设问题作了政府工作报告。**他在肯定成绩的基础上，**提出了克服急躁冒进是经济建设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中央宣传部根据政治局的意见起草**的经**刘少奇、陆定一、胡乔木等人审定的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

社论中说：在最近一个时期中，在有些工作中发生了急躁冒进的倾向，这种情况是值得我们严重注意的。

社论对经济建设中的急躁冒进倾向进行了公开的批评，阐述了毛泽东提出的多快好省的方针，强调“在执行中央的这条方针的时候，不能只注意多和快，而不注意好和省。”

此前，这篇社论成稿后，经过刘少奇等人的审阅修改，最后又由刘少奇定稿，尔后才送给毛泽东审阅。身在外地的毛泽东早已知道了北京反冒进的新动向，他一见《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这个题目，就很不客气地在他的名下批道：

“不看了。”

也就在6月20日这一天，毛泽东在上海西郊的一个别墅里，接见了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刘大杰。

此时，刘大杰正在学术上就蔡琰的《胡笳十八拍》与郭沫若争鸣，又为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问题与茅盾展开了讨论。毛泽东见到刘大杰，幽默地说：

“你现在和沫若不睦，和沈雁冰矛盾。你这个战斗精神，希望能继续发扬下去嘛。你参加百家争鸣，不要怕丢掉名誉地位。”

毛泽东在谈到李商隐时说：

“李商隐的《无题》诗要一分为二，不要一概而论。”

他在谈到《贾生》一诗时，问刘大杰说：

“你能背得出吗？”

刘大杰立即用湖南乡音吟诵道：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毛泽东听罢，感叹道：

“写得好哇！写得好！”

最后，毛泽东就学术争鸣问题，鼓励刘大杰说：

“要多商量，宁肯存疑，不要轻易做结论。真理是会越辩越明的。还是要投入到百家争鸣当中去。”

6月28日下午，毛泽东会见了罗马尼亚驻中国大使尼古拉·乔洛尤，他在谈话中说：

“你可以找我们政府各部、军队、党和群众团体的负责人谈谈。你希望同谁谈，你就可以找谁。如果同你谈的人只谈成绩，不谈错误和缺点，那么他们就没有反映现实的真实情况。经验多一些的人是不会相信这些的。我们不要迷信，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一切都是好的。事物都有两面：有好的一面，有坏的一面。在我们的社会里，一定有好的东西，也有坏的东西，有好人，也有坏人，有先进的，也有落后的。正因为是这样，我们才要进行改造，把坏的东西改造成为好的东西。我们必须准备着还有坏的东西，否则一个问题出来了，就会认为不得了了。过去认为苏联是没有错误的，现在斯大林问题出来了，许多人就惊讶不止。世界是美丽的，但也不是美丽的，世界上有斗争，有矛盾。希望一切都是好的，这是我们的主观，而现实是客观。**世界上有好的东西，也有坏的东西，自古以来是这样，一万年后也会是这样。正因为世界上有坏的东西，我们才要改造，才要做工作。但是我们不会把一切都做好，否则我们的后代就没有工作可做了。”**

**“我们要使错误小一些，这是可能的。但否认我们会有错误，那是不现实的，那就不是世界，不是地球，而是火星了。”**

1956年7月6日至14日，毛泽东先后6次召集起草委员会，讨论“八大”政治报告初稿。

7月14日，毛泽东会见了危地马拉前总统阿本斯，在谈话中提出了“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他说：

“美国到处打着反共的招牌，为着达到侵略别人的目的。美国到处欠账。欠中南美国家、亚非国家的账，还欠欧洲、大洋洲国家的账。全世界，包括英国在内，都不喜欢美国。广大人民都不喜欢美国。日本不喜欢美国，因为美国压迫日本。东方各国，没有一国不受到美国的侵略。它侵略中国的台湾省。日本、朝鲜、菲律宾、越南、巴基斯坦，都受到美国的侵略，其中有些还是美国的盟国。人民不高兴，有些国家的当局也不高兴。

一切受压迫的民族都要独立。**一切会有变化。腐朽的大的力量要让位给新生的小的力量。力量小的要变成大的，因为大多数人要求变。美帝国主义力量大要变小，因为美国人民也不高兴本国的政府。”**

“现在美帝国主义很强，不是真的强。它政治上很弱，因为它脱离广大人民，大家都不喜欢它，美国人民也不喜欢它。外表很强，实际上不可怕，纸老虎。外表是个老虎，但是，是纸的，经不起风吹雨打。我看美国就是个纸老虎。

整个历史证明这一点，人类阶级社会的几千年的历史证明这一点：强的要让位给弱的。美洲也是这样。

**只有帝国主义被消灭了，才会有太平。总有一天，纸老虎会被消灭的**。但是它不会自己消灭掉，需要风吹雨打。

**我们说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是从战略上来说的。从整体上来说，要轻视它。从每一个局部来说，要重视它。它有爪有牙。要解决它，就要一个一个地来。比如它有10个牙齿，第一次敲掉一个，它还有9个，再敲掉一个，它还有8个。牙齿敲完了，它还有爪子。一步一步地认真做，最后总能成功。**

**从战略上说，完全轻视它。从战术上说，重视它。**跟它作斗争，一仗一仗的，一件一件的，要重视。现在美国强大，但从广大范围、从全体、从长远考虑，它不得人心，它的政策人家不喜欢，它压迫剥削人民。由于这一点，老虎一定要死。因此不可怕，可以轻视它。但是，美国现在还有力量，每年产一亿多吨钢，到处打人。因此要跟它作斗争，要用力斗，一个阵地一个阵地争夺。这就需要时间。

看样子，美洲国家、亚洲非洲国家只有一直同美国吵下去，吵到底，直到风吹雨打把纸老虎打破。”

**“要帝国主义干什么？中国人民不要帝国主义，全世界人民也不要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无存在之必要。”**

7月1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八大”政治报告草稿。

7月16日，毛泽东和秘书林克一起读英文本《共产党宣言》，其中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毛泽东指着这段话说：

**“可惜教条主义者不懂得这个道理。”**

毛泽东几次对林克说：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新的一系列的问题，如果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

1956年仲夏的一天，毛泽东邀请在北京开会的周谷城到中南海去。汽车一直开到中南海露天游泳池旁边。毛泽东身穿浴衣，坐在凉棚底下，见周谷城来了便站起来，紧紧握手。寒暄之后，毛泽东问：

“你能游泳吗？”

周谷城说：

“少年时在家乡的小河里或池塘里，也可以浮游几十码，不知现在还浮得起否？”

毛泽东说：

“试试看。”

于是，周谷城换了泳装，和毛泽东一同下水。毛泽东从深水处下水，周谷城则从淹到脚背的浅水处小心翼翼地往下走，一直不敢到能够没顶的深水区去。在深水区悠然自得的毛泽东见周谷城仍在浅水区里，便招呼道：

“来呀！”

周谷城打趣地说：

**“我这个人哪，是既不能由浅入深，也不能深入浅出。**”

毛泽东只好叫工作人员用竹竿递给周谷城一个救生圈。二人游了多时，方才上岸休息。

毛泽东坐在藤椅上，拿起一本线装的《汉书》，翻到列传第39《赵充国》那一段，他说：

“赵充国这个人，当年主张西北边疆屯田，很能坚持真理，坚持正确的主张。”

赵充国是汉武帝时的大将，是中国历史上在西北屯田戍边的一个著名人物。毛泽东接着说：

**“赵充国的主张，开始时赞成者不过十分之一二，反对者达十分之八九。可是到了后来，他的主张逐渐被人接受了，最后，赞成者十之八九，反对者只有十之一二。可见真理要被人接受，总要有一个过程，无论是在过去的历史上，还是现在，都是这样。**”

周谷城告辞时，毛泽东又鼓励他在学术上要敢于争论，不要害怕犯错误。

7月19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再次讨论“八大”政治报告草稿。

7月23日下午5时，毛泽东到了北戴河海滨。此后，他几乎每天都要下海游泳，有时一天下海两次。

在北戴河的28天里，毛泽东先后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八大”两个报告的起草委员会会议，对政治报告、党章、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进行仔细推敲和认真修改。

在这期间，从苏联回国度假的王鹤滨也带着老婆和两个孩子来到了北戴河来。

这一天午夜刚过，王鹤滨接到毛泽东办公室的通知去看望毛泽东。他爬上了一个小山坡，来到一所房屋的大门前。这所宅院原是张作霖的别墅。值班卫士把他让到院内。就在此时，毛泽东从北房中间的门里出来了，抬头看了一下高悬的明月，抬起双手把单衣领口的扣子扣上。王鹤滨向毛泽东轻轻地靠近了一步，毛泽东发现了他，惊喜地喊道：

“咳呀！这是谁来了呀！”

说罢，转过身去，对着北房门喊道：

“江青，你看是谁来啦！”

他又对王鹤滨说：

“王医生，毕业回国啦？”

他把手伸向王鹤滨。王鹤滨双手紧紧地握着毛泽东的手说：

“回国过暑假，来看望主席，还有一年多就毕业了。”

江青从北房里走了出来，穿着一身深色的衣裙，与王鹤滨打过招呼后问道：

“王医生，我们的信你收到了吗？”

王鹤滨说：

“收到了。”

江青说：

“主席和我很感谢你去莫斯科看了岸青。我在莫斯科疗养时，接到你的电话，你说去，怎么没有去呀？”

“我出了大使馆，没有找到去克里姆林宫医院的路，又不好意思请大使馆派车。”

王鹤滨解释了以后，见江青没再说什么，就问候毛泽东说：

“主席身体好吧？”

“很好，很好。工作之余就下海游泳，益处很大，虽然跌了几斤肉，但却感到身体很好，精神也很好！”

毛泽东说罢，笑着看看自己的双臂，又用手摸了一下。王鹤滨也高兴地说：

“主席的身体看上去很好，很好！在海水中游泳，是非常好的体育运动。”

毛泽东说：

“游泳的确很好，你来北戴河要多住几天，好好地在大海里游游泳吧！”

他忽然又问：

“吃住安排好了吗？”

王鹤滨说：

“安排好了，由保健处安排的。”

王鹤滨感觉毛泽东要工作了，不便久留，就向毛泽东和江青告辞。毛泽东说：

“那好，你要多住几天。”

1956年8月7日，章士钊带着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嘱托，从北京乘火车经广州赴香港。

据章含之回忆说：“从1956年开始，父亲每两年去一次香港，因为在香港有个夫人，所以他有个很好借口去探亲，当然家人知道他执行的是中央给的和台湾建立渠道的使命，否则我母亲该吃醋了。”每次出行前，周恩来都会找到章士钊商谈很长时间。章含之说：“但父亲的嘴很严，从来不对我们多说什么。”

更重要的是，章士钊与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张群等人的关系都很好，由他充任统战工作“斡旋人”的角色是再适合不过了。

章士钊到香港后，将周恩来的一封信转给蒋介石。周恩来在信中提出进行第3次国共合作，以期统一大业。周恩来还告诉蒋介石说：“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

据章含之透露，章士钊与寓居在香港的杜月笙的关系也非同寻常，“中央当时还有一任务，动员杜月笙回国”，但对大陆心存疑惧的杜月笙最终还是未能成行。

8月16日，中国政府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关于支持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公司的长篇声明。

此前，毛泽东在声明稿上写了一个批示：

“似应有几句劝告英、法政府不要做出违反世界人民和平意志的事，不要过于激动和走极端，致使事态扩大，不利于世界和平，也不利于英、法。”

8月18日，毛泽东复信给达赖喇嘛，他在信中写道：

亲爱的达赖喇嘛：

给我的两封信都收到了，很高兴。

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已经成立，得到各族人民的拥护，大家满意。

**西藏社会改革问题，听说已经谈开了，很好。现在还不是实行改革的时候，大家谈一谈，先作充分的精神上的准备，等到大家想通了，各方面都安排好了，然后再做，可以少出乱子，最好是不出乱子。四川方面出了一些乱子，主要是亲帝国主义分子和国民党残余分子在那里煽动，我们的工作也有缺点。我希望西藏方面尽量避免出乱子。**

陈毅副总理回来，转达了你的意见。我们大家对你很了解，相信你能把西藏的工作做好。**我总是担心，汉人在那里和你们合作得不好，得不到藏人的信任。请你负起责来，对于犯了错误的汉人，给他们以严格的教育，把他们当作你自己的干部看待。**

望你保重身体。有事随时给我写信。

这封信你能看懂否？草字尚多，一时改不过来，但比上次少了一点。

遇到困难，务宜忍耐。困难总可以慢慢克服的。

希望同你见面。

祝你健康！

毛泽东 1956年8月18日

8月20日，毛泽东从北戴河回到北京。

8月22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七届七中全会第1次会议，他在谈到“八大”的政治报告时说：

“这一次重点是建设，有国内外形势，有社会主义改造，有建设，有人民民主专政，有党，报告里面有这么几个大题目，都可以讲。但是**重点是两个，一个是社会主义改造，一个是经济建设。这两个重点中，主要的还是建设。这个报告的主要部分，3万字中有三分之一是讲建设。”**

关于大会发言问题，毛泽东说：

“可以组织一些短稿子，比较生动。对工作要有批评，要有自我批评，要有分析，5分钟的发言也可以有分析。如果我们开一次会议没有批评，净讲一套歌功颂德，那就没有生气，那无非只有一个‘好’字就行了，还要多讲干什么？但不是说，每一个稿子一定要批评什么东西，如果没有批评根本就不许讲，那也不好。”

8月24日，毛泽东审阅了刘少奇送来的“八大”政治报告的一部分草稿及刘少奇的信。刘少奇在信中说：“这是我写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统一战线的一段，下面还有民族问题和国家工作中若干问题在继续写。特先送上这一部分，请审阅，看是否可以这样写？这一段的题目还没有想好。”

毛泽东批示道：

“此件已经看了一遍，改得很好。我又做了一些小的修改，请酌定。觉得文中还有一些重复拖累的地方，还可以删节一些，可待下月上旬去改。这里已经讲了统一战线，李维汉写的关于统一战线那部分，似乎可以不要了。”

欲知毛泽东此后如何审阅有关“八大”的文件，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56年6月4日乘8205号专机从汉口起飞返京途经河北衡水上空遭遇雷雨云，的确是很危险的。可是后来有人说，中央政治局在这次“空中历险”后，一致决定，毛泽东以后外出考察一律改乘火车或其他交通工具。这种说法纯属无稽之谈。试想，以毛泽东的个性，政治局岂能限制他的出行自由？对此，谢静宜曾经做了一个解释，她说：“毛主席每次离京都是乘坐火车外出，也就是专列。极少乘坐飞机，并不是出于个人安全方面的考虑，而是从工作出发的。有一次，主席曾对我谈到此事，说‘乘火车就可以掌握主动权，想停就停，想走就走。想停就让火车找个支线停下来，下车去看看，或者找当地领导谈谈都行。’”这倒是真实可信的！

**第25章**

**“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

**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

**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

话说1956年8月24日下午，毛泽东在怀仁堂东北角一间平房里接见了中国音乐家协会负责人。周恩来、朱德、陈毅、周扬、夏衍在座。毛泽东在接见中发表了长篇重要谈话，他说：

“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原则，各个国家都是相同的。但是在小的原则和基本原则的表现形式方面是有不同的。比如打仗的原理是一样的，都是攻、守、进、退、胜、败，但是在打法上，怎么攻，怎么守，各有不同，有很多的不同。抗美援朝，打到三八线双方顶住了，这种形式就是世界上少有的。革命的表现形式一定有许多样子。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就有许多不同。苏联是由城市到乡村，我们是从乡村到城市。

**艺术的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现形式要多样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一棵树的叶子，看上去是大体相同的，但仔细一看，每片叶子都有不同。有共性，也有个性，有相同的方面，也有相异的方面。这是自然法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法则。作曲、唱歌、舞蹈都应该是这样。**

说中国民族的东西没有规律，这是否定中国的东西，是不对的。**中国的语言、音乐、绘画，都有它自己的规律，过去说中国画不好的，无非是没有把自己的东西研究透，以为必须用西洋的画法。**当然也可以先学外国的东西再来搞中国的东西，但是中国的东西有它自己的规律。**音乐可以采取外国的合理原则，也可以用外国乐器，但是总要有民族特色，要有自己的特殊风格，独树一帜。**

艺术上‘全盘西化’被接受的可能性很少，还是以中国艺术为基础，吸收一些外国的东西进行自己的创造为好。现在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可以搞，听凭人选择。外国的许多东西都要去学，而且要学好，大家也可以见见世面，但是在中国艺术中硬搬西洋的东西，中国人就不欢迎。这和医学不同。西医的确可以替人治好病。剖肚子，割阑尾，吃阿斯匹灵，并没有什么民族形式。当归、大黄也不算民族形式。艺术有形式问题，有民族形式问题。艺术离不了人民的习惯、感情以至语言，离不了民族的历史发展。艺术的民族保守性比较强一些，甚至可以保持几千年。古代的艺术，后人还是喜欢它。

我们要熟悉外国的东西，读外国书。但是并不等于中国人要完全照外国办法办事，并不等于中国人写东西要像翻译的一样。中国人还是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

我们当然提倡民族音乐。**作为中国人，不提倡中国的民族音乐是不行的。但是军乐队总不能用唢呐、胡琴，这等于我们穿军装，还是穿现在这种样式的，总不能把那种胸前背后写着‘勇’字的褂子穿起，民族化也不能那样化。**乐器是工具。当然工具好坏也有关系，但是如何使用工具才是根本的。外国乐器可以拿来用，但是作曲不能照抄外国。

**地球上有27亿人，如果唱一种曲子是不行的。无论东方西方，各民族都要有自己的东西。西方国家发展了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是起了作用的。但是现在世界的注意力正在逐渐转向东方，东方国家不发展自己的东西还行吗？**

**不中不西的东西也可以搞一点，只要有人欢迎。全盘西化，有人提倡过，但是行不通。**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应该接受，不接受是没有道理的，也不利。第二国际曾经否定这些基本原理，但是被列宁驳倒了。**中国也有过‘第二国际’——江亢虎的社会党，影响很小。**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实践中的表现形式，各国应有所不同。在中国，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要和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十月革命就是俄国革命的民族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在政治方面是如此，在艺术方面也是如此。**西洋的一般音乐原理要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这样就可以产生很丰富的表现形式。**

**中国的豆腐、豆芽菜、皮蛋、北京烤鸭是有特殊性的，别国比不上，可以国际化**。穿衣吃饭也是各国不同。印度人穿的衣服就和中国人不同，它是适合印度的环境的。**中国人吃饭用筷子，西方人用刀叉。一定说用刀叉的高明、科学，用筷子的落后，就说不通。”**

贺绿汀插话说：

“美国只有一二百年的历史。”

毛泽东说：

“历史总是要重视的。历史久，有好处也有坏处。美国历史短，也许有它的好处，负担轻，可以不记这么多东西，我们历史久，也有它的好处。把老传统丢掉，人家会说是卖国，要砍也砍不断，没有办法。但是**要回顾那么久的历史，是有些麻烦的。**

**要向外国学习科学的原理。学了这些原理，要用来研究中国的东西。**我们要西医学中医，道理也就是这样。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一般道理都要学。水是怎么构成的，人是猿变的，世界各国都是相同的。艺术又怎么样呢？中国的音乐、舞蹈、绘画是有道理的，问题是讲不大出来，因为没有多研究。**应该学外国的近代的东西，学了以后来研究中国的东西，如果先学了西医，先学了解剖学、药物学等等，再来研究中医、中药，是可以快一点把中国的东西搞好的。**马克思讲过，首先研究近代社会，就容易理解古代社会。这是倒行的，却要快些。

手工艺品的事情，请美术家请不到。对中国民间艺术看不起，这是个兴趣问题。应该逐步地引起他们的兴趣。可能一时说不通，要长期说服。

**要反对教条主义。在政治上我们是吃过亏的。什么都学习俄国，当成教条，结果是大失败，把白区搞掉几乎100%，根据地和红军搞掉90%，使革命的胜利推迟了好些年。这就是因为不从实际出发，从教条出发的缘故。**教条主义者没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他们说中国革命是民主革命，但是又要革一切资产阶级的命。照那样办，就搞错了，那就不是民主革命，而是社会主义革命了。这个道理他们没有搞通。革命办法没有搞对，党内关系没有搞对，使革命遭到了很大的损失。必须反对教条主义，假使不反，革命就不能胜利。

对资产阶级，对知识分子的问题处理不好的话，对革命事业是不利的。对资产阶级的办法，中国就与苏联不同。中国的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人数虽少，但是他们有近代文化，我们现在还是要团结他们。地主阶级也有文化，那是古老文化，不是近代文化。做几句旧诗，做几句桐城派的文章，今天用不着。像工人农民来说，工人比较有文化，他们有技术，但还不能当工程师，比较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就差。农民不能说没有文化，精耕细作，唱民歌、跳舞也是文化。但是他们大多数不识字，没有现代的文化技术，能用锄头、木犁，不能用拖拉机。资产阶级在近代文化、近代技术这些方面，比其他阶级要高，因此必须团结他们，并且把他们改造过来。资产阶级掌握的文化，有些是旧的、用不到的，但是许多东西用得到。音乐家中的许多人在思想上是属于资产阶级的。我们这些人过去也是这样。但是我们从那方面转过来了，他们为什么不能过来呢？事实上已经有许多人过来了。团结他们是有利于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的。要团结他们，帮助他们改造，把他们化过来。**在座的都是“西医”，是学西洋音乐的。要依靠你们。请吹鼓手来办音乐专门学校是不行的，这些事还是要靠你们办。**

中国革命有中国的特点。苏联革命采取苏联当时的那种形式，有其不得不如此的原因。列宁也曾经想到过对资产阶级采取别的办法。但是那个时候资产阶级不相信布尔什维克会胜利，他们要反抗。**无产阶级开始又没有军队，只有8万党员。**我们的情况和苏联不同。中国不是帝国主义国家。我们打了20多年仗，有军队，有200万党员。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也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革命的表现形式不同。

**表现形式应该有所不同，政治上如此，艺术上也如此。特别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应该‘标新立异’，但是，应该是为群众所欢迎的标新立异。为群众所欢迎的标新立异，越多越好，不要雷同。**雷同就成为八股。过去有人搞八股文章，搞了五六百年。形式到处一样就不好。**妇女的服装和男的一样，是不能持久的。在革命胜利以后的一个时期内，妇女不打扮，是标志一种风气的转变，表示革命，这是好的，可不能持久。还是要多样化为好。**

民族形式可以掺杂一些外国东西。小说一定要写章回小说，就可以不必；但语言、写法，应该是中国的。**鲁迅是民族化的。但是他还主张过硬译。我倒赞成理论书硬译，有个好处，准确。**

要把根本道理讲清楚：基本原理，西洋的也要学。解剖刀一定要用中国式的，讲不通。就医学来说，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发展中国的新医学。音乐的基本原理各国是一样的，但运用起来不同，表现形式应该是各种各样的。比如写游记，我们一起去游香山，游的地方虽然一样，但是每个人写出来的就不一样。

**要把外国的好东西都学到。比如学医，细菌学、生物化学、解剖学、病理学，这些都要学。也要把中国的好东西都学到。**要重视中国的东西，否则很多研究就没有对象。**中国历史上有好多东西没有传下来。唐明皇不会做皇帝，前半辈会做，后半辈不会做。他是懂艺术的，他是导演，也会打鼓，但是没有把东西传下来。**还要靠你们。你们是‘西医’，但是要中国化，要学到一套以后来研究中国的东西，把学的东西中国化。

学了外国的，就对中国的没有信心，那不好。但不是说不要学外国。

**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高，要承认这一点。**艺术是不是这样呢？中国某一点上有独特之处，在另一点上外国比我们高明。**小说，外国是后起之秀，我们落后了。鲁迅对于外国的东西和中国的东西都懂，但他不轻视中国的。只在中医和京剧方面他的看法不大正确。中医医死了他的父亲。他对地方戏还是喜欢的。**

孔子是教育家，也是音乐家，他把音乐列为6门课程中的第2门。

我们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地结合，而不是套用外国的东西。学外国织帽子的方法，要织中国的帽子。外国有用的东西，都要学到，用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搬要搬一些，但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要《死魂灵》，也要《阿Q正传》。鲁迅翻译了《死魂灵》、《毁灭》等等，但是他的光彩主要不在这方面，是在创作。**

中国的文化应该发展。外国的乐曲不会听，不会奏，是不好的。外国作品不翻译是错误的，像西太后反对‘洋鬼子’是错误的。要向外国学习，学来创作中国的东西。

**演些外国音乐，不要害怕。隋朝、唐朝的9部乐、10部乐，多数是西域音乐，还有高丽、印度来的外国音乐。演外国音乐并没有使我们自己的音乐消亡了，我们的音乐继续在发展。**外国音乐我们能消化它，吸收它的长处，就对我们有益。**文化上对外国的东西一概排斥，或者全盘吸收，都是错误的。**

**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这样争论就可以统一了。**要反对教条主义，反对保守主义，这两个东西对中国都是不利的。学外国不等于一切照搬。**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

中国的和外国的，两边都要学好。半瓶醋是不行的，要使两个半瓶醋变成两个一瓶醋。

**这不是什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学’是指基本理论，这是中外一致的，不应该分中西。**

**非驴非马也可以。骡子就是非驴非马。驴马结合是会改变形象的，不会完全不变。中国的面貌，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都不应该是旧的，都应该改变，但中国的特点要保存。应该是在中国的基础上面，吸取外国的东西。应该交配起来，有机地结合。**

西洋的东西也是要变的。西洋的东西也不是什么都好，我们要拿它好的。我们应该在中国自己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西洋有用的成份。

吸收外国的东西，要把它改变，变成中国的。**鲁迅的小说，既不同于外国的，也不同于中国古代的，它是中国现代的。**

你们是学西洋的东西的，是‘西医’，是宝贝，要重视你们，依靠你们。不要学西洋的东西的人办事，是不对的。要承认他们学的东西是进步的，要承认近代西洋前进了一步。不承认这一点，只说他们教条主义，不能服人。教条主义要整，但是要和风细雨地整。要重视他们但是要说服他们重视民族的东西，不要全盘西化。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这样道理才能讲通，也才不会丧失民族信心。”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与参加全国音乐工作会议的2000多名音乐工作者一起合影留念。

黎锦晖参加了全国第3次音乐工作代表大会。毛泽东知道后，单独接见了他。毛泽东回忆了当年他们青年时代在长沙求学的往事。

黎锦晖，字均荃，出生于1891年，在黎家排行老二。他曾与老大黎锦熙一同考入湖南省立第一中学读书，后入省立优级师范习绘画音乐科。20年代末在上海创办中华歌舞专门学校，后又组建明月歌舞社。他是著名的现代音乐家和音乐教育家。

毛泽东对黎锦晖说：

“陈毅同志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时期，曾用你创作的《桃花江上美人多》的曲子填词，把“桃花千万朵，比不上美人多”，改成“红花千万朵，送给红军哥”。

毛泽东说罢，两人相对笑了起来。

8月29日凌晨3时，刘少奇把“八大”政治报告中关于民族问题、共产党、国际支援3部分的修改稿送给毛泽东审阅。他在附信中说：“昨天早起把以前写的稿子推翻了，所以这段稿子今天才写好。有4700多字。请审阅，看是否可以这样写？请看完后要高智通知我到主席处谈一谈如何修改这一大段的问题。前面统一战线部分有些同志提出了修改意见，其中有些原则性的问题，要请示后才好修改。”

毛泽东在给刘少奇的复信中写道：

“这一部分改得很好，字数不多，清爽好看。前一部分盼能迅速加以修改。今天晚上10时左右准备开书记处会议谈一些事。”

8月30日，毛泽东审阅刘少奇送来的“八大”政治报告序言、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3部分修改稿，以及政治报告各部分的编排顺序。刘少奇在附信中说：“这一段已加修改。按实际计算不到12000字，按版面计算有13000多字。请再加审阅。在各节的编排上是否这样做？请考虑。其中国防问题排在华侨问题后面，似不大妥，但不这样，华侨问题又不好放在其它地方。似还可以考虑把华侨问题同民族问题合成一节，它们联系虽不多，但可以摆下。请酌定。”

毛泽东在复信中写道：

“可以这样编排，将来再考虑是否变动。在国防问题上还可以讲几句人民解放军的英勇奋斗的鼓励话。”

8月30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第1次会议。他在讲话（参看《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说：

“今天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预备会议。预备会议要开十几天，要做的主要事情，一是准备大会文件，二是进行中央委员会的预选，三是准备大会发言稿。现在我讲几点意见。”

“这次大会要解决什么问题，达到什么目的？总的说来，就是**总结七大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

“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党，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的革命是伟大的革命，我们的建设事业是伟大的事业。6亿人口的国家，在地球上只有一个，就是我们。过去人家看我们不起是有理由的。因为你没有什么贡献，钢一年只有几十万吨，还拿在日本人手里。**国民党蒋介石专政22年，一年只搞到几万吨。我们现在也还不多，但是搞起一点来了，今年是400多万吨，**明年突破500万吨，第2个‘五年计划’要超过1000万吨，第3个‘五年计划’就可能超过2000万吨。我们要努力实现这个目标。”

毛泽东提出了一个赶上和超过美国的设想，他说：

“美国只有一亿七千万人口，我国人口比它多几倍，资源也丰富，气候条件跟它差不多，赶上是可能的。应不应该赶上呢？完全应该。你六亿人口干什么呢？在睡觉呀？是睡觉应该，还是做工作应该？如果说做工作应该，**人家一亿七千万人口有一万万吨钢，你六亿人口不能搞它2万万吨、3万万吨钢呀？你赶不上，那你就没有理由，那你就不那么光荣，也就不那么十分伟大。美国建国只有180年，它的钢在60年前也只有400万吨，我们比它落后60年。假如我们再有50年、60年，就完全应该赶过它。这是一种责任。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

关于继承党的优良传统问题，毛泽东说：

“这次大会应当继续发扬我们党在思想方面和作风方面的优良传统，把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两个东西切实反一下，此外，还要反对官僚主义。官僚主义那个东西我今天不讲，只讲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两个东西，扫了又发生，发生了又要扫。”

“斯大林为什么犯错误呢？就是在一部分问题上他的主观和客观实际不相符合。现在我们的工作中还经常有许多这样的事情。主观主义就是不从客观实际出发，不从现实可能性出发，而是从主观愿望出发。”“现在，我们反对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主观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一定要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如果不结合，那就不行。这就是说，理论与实践要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按照辩证唯物论，思想必须反映客观实际，并且在客观实践中得到检验，证明是真理，这才算是真理，不然就不算。我们这几年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是主观主义的毛病到处都有。不仅现在有，将来还会有。主观主义永远都会有，一万年，一万万年，只要人类不毁灭，总是有的。有主观主义，总要犯错误。”

在谈到反对宗派主义的时候，毛泽东幽默地说：

“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全局，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全局，一个地球有一个地球的全局。**现在地球以外不去讲，因为交通路线还没有打通。如果发现火星或者金星上有人，那个时候我们再来交涉关于团结他们，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

“反对宗派主义，特别值得谈一下的，就是要团结那些跟自己做过斗争的人。他跟你打过架，把你打倒在地，你吃了亏，脸上无光，而你并不那么坏，却封你一个‘官’，叫机会主义者。至于打得对的，那就应该打，你本来是机会主义，为什么不应该打呢？”**“所谓团结，就是团结跟自己意见分歧的，看不起自己的，不尊重自己的，跟自己闹过别扭的，跟自己做过斗争的，自己在他面前吃过亏的那一部分人。”“从前我讲过，对于任何有缺点的人，犯过错误的人，不仅要看他改不改，而且要帮助他改，一为看，二为帮。”**

关于中央委员会的选举问题，毛泽东说：

“我们选举王明路线和立三路线这两位代表人物是表示什么呢？这是表示我们对待这种犯思想错误的人，跟对待反革命分子和分裂派（像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饶漱石那些人）有区别。”“七次大会的时候，我们说服了那些同志，选举了王明、李立三。那么，七大以后这11年来，我们有什么损失没有？毫无损失，并没有因为选举了王明、李立三，我们的革命就不胜利了，或者迟胜利几个月。”“如果我们‘八大’对他们两位采取的态度还是同‘七大’的态度一样，那我们党就可以得到一种利益，得到一种好处，就是对于改造全国广大的小资产阶级比较容易些。这在全世界也有影响。”

8月31日凌晨3时，毛泽东审阅完了“八大”政治报告中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两部分修改稿。他在给陈伯达、刘少奇的信中写道：

“此部分修改得很好，可以作为定稿了。我只做了一些小的修改，请酌定。请伯达即行着手对‘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若干问题’进行修改，在9月5日以前改好，打清样于9月5日晚上送阅为盼！”

8月31日清晨6时，毛泽东致信胡乔木并刘少奇，他写道：

“请你利用今天上午的时间，将报告的头几部分——导言，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总路线，过细修改一下，缩小到8000字左右就好。改好后，即送少奇同志汇总看过，送我一看，以便下午或晚上会谈时和其它部分编辑付印。”

1956年9月4日，毛泽东嘱咐陆定一把“八大”政治报告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部分的修改稿送给陈云，并要求在5日晚10时以前把陈云的修改意见送给他看。

9月4日这一天，毛泽东接见由远藤三郎率领的旧军人代表访华团。

远藤三郎原是前日本陆军航空兵中将，轰炸重庆的第3飞行团团长，**重庆轰炸无用论和日中友好军人协会的创始人，**由于他在出版的日记中披露了石井四郎的731部队拿活人做实验的事实，被日本右翼骂为国贼和赤色将军，几乎所有的前陆军同僚都和他断了交。

在接见中，远藤三郎把一把日本军刀亲手交给了毛泽东，表示日本军人从此永远不再和中国打仗了，并为往日的战争行为道歉。毛泽东接受了他的军刀，说：

“不需要道歉，你们也是我们的先生，我们要感谢你们。正是你们打了这一仗，教育了中国人民，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打得团结起来了。所以，我们应该感谢你们。”

毛泽东回赠一幅齐白石先生的原作给远藤三郎，上面有他的亲笔题词：“承远藤三郎先生惠赠珍物，无以为答，谨以齐白石画一幅为赠”。

毛泽东在会谈中还说：

“你们虽然过去和我们打过仗，一切愿意再来看看的旧军人我们都欢迎。……比起那些左派人士，我们更愿意见到右派人士，特别是远藤先生这样的军人。”

后来，远藤三郎回国后组织了日中友好旧军人会，为促进中日友好关系发挥了积极作用。

9月5日，陈云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有几个地方与定一、乔木商量后改了一下。商业一节，还有一些修改，稿子在乔木处，由他改好后送我看，再送你。”

9月6日凌晨2时，毛泽东看罢经陈云修改的稿子，立即给胡乔木写了一个批语：

“建设部分，除商业外，又看了一遍，用铅笔作了一些修改。请你将商业部分改好，于今天下午送我一阅，再送少奇同志。”

9月7日晨6时，毛泽东要人将政治报告中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两部分送给周恩来。他在给周恩来的信中写道：

“政治报告头几部分修改了以后，请你继续修改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两部分。这几部分今天一定要修改完毕，今晚一定要交付翻译，否则就来不及了。”

上午10时，毛泽东又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你担任的建议和报告两件，亦须于9日交付翻译，请将最后修改本于8日交我看一下。”

毛泽东在信中所说的“建议”和“报告”，是指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以及关于这个建议的报告。

9月8日凌晨，毛泽东给陈伯达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请你将我准备讲的那段话，加以修改，并请让你的秘书给我抄正一张，于下午交我为盼！”

原来，毛泽东的主要精力一直放在“八大”政治报告上，他准备在“八大”上的开幕词动手写过两次稿子，但都没有能够写完，所以他不得不让陈伯达代为修改了。

毛泽东信中所说的他的那段话，主要内容是这样说的：

“大家知道，要将一个在经济上文化上都落后的农业国，改变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新式的工业国，需要许多的条件，例如人民群众的拥护，社会制度的改革，国家的巩固，党的巩固，统一战线的巩固，等等，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条件。除了这些条件以外，我们还需要一些什么条件呢？我们还需要时间，还需要和平环境，还需要朋友帮助。”

“到那时，即到1967年第3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工业产值将占百分之六十几，农业产值将占百分之三十几，这样我国就可以说基本上有了现代工业了，就可以说初步的工业化了。但是我国是一个具有6亿人口的国家，到第3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按照每年增加1200万人口计算，那时将有7亿几千万人口，按照每人占有各项主要工业产品的数量来说，我国要进一步工业化，要接近或者赶上世界上工业最发达的国家，那就需要几十年才有可能。”

“为了建设还需要有一个和平环境，这是不是可能的呢？我们认为是可能的。当然，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从来都认为，只要世界上的垄断资本存在一天，战争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是一方面。但是还有另一方面，即制约战争的因素现在已经强大起来，并且还会继续增强。这些因素中，第一个，是以苏联为首具有9亿人口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第二个，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第三个，是西方国家的革命的和反对战争的工人运动的发展。第四个，是几个帝国主义国家，或者有强大垄断资本存在的国家，对于战争的态度是不一致的，它们之间存在着很多的利害冲突。社会主义阵营、民族解放运动和西方世界的人民运动这3个力量占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是互相支援、互为同盟军的。我们还可以利用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利害冲突，作为间接的同盟军而为和平服务，使对战争最感兴趣的美国好战分子处于孤立地位。……这样看来，需要一个持久的和平环境，并且愿意为和平事业努力，争取避免再发生一次世界大战的人们，占了人类的大多数，这种趋势还会发展。这样就制约了战争趋势，使它不易，使它日益孤立，不得人心，因而使新的大战不容易打起来。”

毛泽东起草的这两个未完成的开幕词草稿都围绕着一个主题：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这也是“八大”政治报告的主题，也是整个“八大”会议的主题。

再说9月8日清晨，周恩来将修改完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两部分送给毛泽东过目。

上午9时，毛泽东将这两部分转送给刘少奇，并在周恩来的改稿上批示道：

“恩来同志的改本送上，我看改处均可用。如你同意，请让人将改处准确地抄在一个本子上，和你我改的合在一起，立即付印，付翻译。”

9月8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七届七中全会第2次会议，审议提交“八大”的重要文件。

是日晚，毛泽东审阅了陈伯达送来的开幕词修改稿。他不满意，说写得太长，扯得太远，又交给田家英修改，并嘱咐说：

“不要写得太长，有个稿子带在口袋里，我就放心了。”

9月9日，毛泽东看了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作了一些小的修改。

9月10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八大”预备会议第2次会议。他在讲话中说：

“**现在是搞建设，搞建设对于我们是比较新的事情。早几年在中央范围内就谈过，我们希望建设中所犯的错误，不要像革命中所犯的错误那么多、时间那么长。我们搞建设，是不是还要经过14年**（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立到1935年遵义会议——笔者注）**的曲折，也要栽那么多筋斗呢？我说可以避免栽那么多筋斗。**因为过去栽筋斗主要是个思想问题，是不认识、不觉悟的问题。

搞经济，我们也有了一些经验，现在搞这些新的科学技术我们还没有经验。安排经济，对人、对资本家、对民主党派、对知识分子的工作，我们比较学会了，我们有22年根据地的经验。世界上新的工业技术、农业技术我们还没有学会，虽然我们已经有了6年的经验，学会了许多东西，但是从根本上说，我们还要做很大的努力，主要靠第2个‘五年计划’和第3个‘五年计划’来学会更多的东西。

我们要造就知识分子。现在我们只有很少的知识分子。**旧社会留下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只有10万，我们计划在3个‘五年计划’之内造就100万到150万高级知识分子（包括大学毕业生和专科毕业生）。**到那个时候，我们在这个方面就有了18年的工作经验，有了很多的科学家和很多的工程师。**那时党的中央委员会的成份也会改变，中央委员会中应该有许多工程师，许多科学家**。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我看还是一个政治中央委员会，还不是一个科学中央委员会。所以，有人怀疑我们党能领导科学工作、能领导卫生工作，也是有一部分道理的，因为你就是不晓得，你就是不懂。现在我们这个中央的确有这个缺点，没有多少科学家，没有多少专家。”

关于增强党内的团结问题，毛泽东说：

“党内的关系如何，关系极大，关系到能不能团结全国人民，团结全世界人民。所以，这一次的大会有一点跟七大相同，就是要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

“对于那些冤枉和委屈，对于那些不适当地处罚和错误地处置，比如把自己打成什么‘机会主义’，撤销自己的职务，调离自己的职务等等，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态度是从此消极，很气愤，不满意；另一种态度是把它看做一种有益的教育，当做一种锻炼。”

他为了说服没能进中央委员会的高级领导干部，就现身说法讲了他在井冈山当民主人士的往事。他说：

“开除党籍了，又不能不安个职务，就让我当师长。我这个人当师长就不那么能干，没有学过军事，因为你是个党外民主人士了，没有办法，我就当了一阵师长，后来又说这是谣传，是开除出政治局，不是开除党籍。啊呀，我这才松了一口气。”

毛泽东接着说：

“你晓得，这个世界就是这么个世界，要那么完全公道是不可能的，现在不可能，永远也不可能。我是这么看，也许我比较悲观。有那么一些人非常乐观，说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一点矛盾也没有了，我就不相信。有矛盾，就要出主观主义，就要犯错误。**那些人并不是跟我们前世有冤，今世有仇，从前都不认识，他为什么要整你呢？就是因为思想不同，对问题的看法不一样。**后来证明，政策问题上思想统一了，就完全团结了。所谓不团结，都是思想上有距离，政治问题、政策问题上有争论。**除开极个别的别有用心钻到党内来破坏的敌对分子以外，所有犯错误的人，不管他犯的错误怎么严重，哪怕是路线错误，也只是思想不对头。**既是思想问题，那么改正错误就是改正思想的问题，就是整风学习的问题，讨论研究的问题。而各种不公平的事情在任何社会都是难免的。那怎么办呢？我们就是力争求得一个比较的公平。应该说，我们党的七大的选举，七大以后到现在，党内是比较的公平一些。凡事都是有比较的，不是绝对的，绝对的公平或者绝对的不公平，是不可能的。如果地方的同志说中央搞得不好，那么，地方同志的事情是不是搞得十全十美，一点不公平都没有？我就不相信。有些事情想不到，有些事情想错了，有些事情安排不恰当，是难免的。”

“应该肯定，我们的中央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央，我们的党是马克思主义的党。我们的党能够领导民主革命，这已经在历史上证明了，又能够领导社会主义革命，现在也证明了，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上胜利了。我们党能够领导经济建设，这一点还没有完全证明，需要经过3个‘五年计划’。现在我们已经差不多完成第1个‘五年计划’了，连恢复国民经济的3年，搞经济建设也有7年了。根据我们在革命时期自己的觉悟，即觉悟到过去犯的错误是什么，后头改正错误应该怎么改法，现在我们虽然还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残余，这些东西是可能减少的。完全肃清很难说，肃清了还会有，但是可以减少，可以大为减少。”

9月13日，毛泽东看了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稿，批示道：

“你的报告全文很好。只是觉得头一部分（总结第1个‘五年计划’时期经验）写得不甚清楚，不大流畅，不如以下各部分写得好，似乎出于两个手写的。如能在今明两天请一位（乔木没有工夫）文笔流畅的同志改一下，那就更好。如不可能，也就罢了。”

9月13日这一天，毛泽东在怀仁堂主持召开七届七中全会第3次会议。他在谈到“八大”文件的起草修改过程时说：

“第1次推翻你的，第2次推翻他的，推翻过来，推翻过去，这也说明我们是有民主的。不管什么人写的文件，你的道理对，就用你的。完全是讲道理的，不讲什么人，对事不对人。”

毛泽东接着说：

“大会的几个主要文件大体上都准备好了。根据预选的统计，大家基本上赞成中央提出的名单。现在，中心转到发言问题。所有同志都要注意这个问题。发言要精彩，生动，多样性，还要短。要有内容，要有表扬，有批评，有成绩，也有缺点，有解决的办法，不要千篇一律。这个文章是可以做的，比如政治报告，原来是10万字，一砍就是4万多字，现在不到5万字了。所以，文章可以这样写，也可以那样写，可以用第3种写法，也可以用第4种写法。如果我们的发言稿能有比较高的水平，我们这个会议就会开得好。现在，这几个文件是相当有水平的，选举也会选举得好。文件是大家参加意见，集体创作。这样，大家也都有精神准备。没有精神准备，就要强加于人。我们对党外人士也是这样。**我们每个重要法律，比如《共同纲领》和后来的宪法，土地改革法，农业合作社章程，都是经过了长期的酝酿的，根据大家的意见，改过来，改过去。为什么我们通过一个东西总是大家举手？人家莫名其妙，‘这不是强迫命令’？土地改革法，刘文辉都举了手。这不是偶然的，这是事先听大家的意见，改过来，改过去，讲通了，这样办事办得快，步伐比较整齐，就团结统一了。”**

七届七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日程（草稿）》、《大会规则（草稿）》、《八大预备会议安排（草稿）》、《七届七中全会关于第八届中央委员会选举工作的建议（草稿）》、《各代表团团长、副团长名单（草稿）》、《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名单（草稿）》、《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草案）》、《中国共产党章程（草稿）》、《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草稿）》、《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年到1962年）的建议（草案）》、《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草稿）》、《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名单（草案）》、《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秘书处名单（草案）》。

全会接着讨论选举问题。毛泽东在讲话中说：

“我说我们这些人，包括我一个，总司令一个，少奇同志半个（不包括恩来同志、陈云同志跟小平同志，他们是少壮派），就是做跑龙套工作的。我们不能登台演主角，没有那个资格了，只能维持维持，帮助帮助，起这么一个作用。你们不要以为我现在打退堂鼓，想不干事了，的确是身体、年龄、精力各方面都不如别人了。我是属于现状维持派，靠老资格吃饭。老资格也有好处，因为他资格老。但是能力就不行了，比如写文章，登台演说，就不行了。同志们也很关心我们这些人，说工作堆多了恐怕不好，这种舆论是正确的。那么，什么人当主席、副主席呢？就是原来书记处的几个同志。这并不是说别的同志不可以当主席、副主席，同志们也可以另外提名，但是按照习惯，暂时就是一个主席、4个副主席。我是准备了的，就是到适当的时候就不当主席了，请求同志们委我一个名誉主席。名誉主席是不是不干事呢？照样干事，只要能够干的都干。”

“上一次也谈过，中央准备设4位副主席，就是少奇同志，恩来同志，朱德同志，陈云同志。另外还准备设一个书记处，书记处的名单还没有定，但总书记准备推举邓小平同志。4位副主席和总书记的人选是不是恰当？当然，这是中央委员会的责任，由中央委员会选举。但是要使代表们与闻，请你们去征求征求意见，好不好？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党，这样的大国，为了国家的安全，党的安全，恐怕还是多几个人好。请同志们酝酿酝酿，看这样是否妥当。中心的目的就是为了国家的安全，多几个人，大家都负一点责任。至于秘书长改为总书记，那只是中国话变成外国话。”

邓小平插话说：

“我还是比较安于担任秘书长这个职务。”

毛泽东指着邓小平对众人说：

“他愿意当中国的秘书长，不愿意当外国的总书记。其实，外国的总书记就相当于中国的秘书长，中国的秘书长就相当于外国的总书记。他说不顺，我可以宣传宣传，大家如果都赞成，就顺了。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你说他样样事情都办得好呀？不是，他跟我一样，有许多事情办错了，也有的话说错了；但比较起来，他会办事。他比较周到，比较公道，是个厚道人，使人不那么怕。我今天给他宣传几句。他说他不行，我看行。顺不顺要看大家的舆论如何，我观察是比较顺的。不满意他的人也会有的，像有些人不满意我一样。有些人是不满意我的，我是得罪过许多人的，我想起来就不舒服，今天这些人选我，是为了顾全大局。你说邓小平没有得罪过人？我不相信，但大体说来，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他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格。他说他有点诚惶诚恐，他是在党内经过斗争的。

至于陈云同志，他也无非是说不行，不顺。我看他这个人是个好人，他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他看问题有眼光。我过去还有些不了解他，进北京以后这几年，我跟他共事，我更加了解他了。不要看他和平得很，但他看问题尖锐，能抓住要点。所以，我看陈云同志行。至于顺不顺，你们大家评论。他是工人阶级出身，不是说我们中央委员会里工人阶级成份少吗？我看不少，我们主席、副主席5个人里头就有1个。”

“党章上现在准备修改，叫作‘设副主席若干人’。首先倡议设4位副主席的是少奇同志。一个主席，一个副主席，少奇同志感到孤单，我也感到孤单。一个主席，又有4个副主席，还有一个总书记，我们这个‘防风林’就有几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样就比较好办。**除非一个原子弹下来，我们几个恰恰在一堆，那就要另外选举了。如果只是个别受损害，或者因病，或者因故，要提前见马克思，那么总还有人顶着，我们这个国家也不会受影响，不像苏联那样斯大林一死就不得下地了。我们就是要准备那一手。**同时，多几个人，工作上也有好处。”

毛泽东最后说：

“请你们在代表里头酝酿一下，因为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主席、副主席要一道提出一个整个的名单，要一道选。**至于常委，准备就由主席、副主席和总书记组成。**这不是说别的人不可以当常委，别人也可以，因为要提一个就可以有第二个，还可以有第三个，所以暂时用这么一种办法。这就是把过去的书记处变成常委，只是比过去多了一个总书记。还要设一个书记处，书记处的人数可能要多几个，书记、候补书记可以有十几个人。很多事情要在那里处理，在那里提出议案。**政治局委员的名额也要扩大，不是13个，要扩大到20人左右。**因为我们的中央委员会是170人，也许170多。看是不是可以这样安排？今天不做决定。”

全会决定递补王首道、邓颖超、陈少敏为第七届中央委员，确定了八届中央委员的候选人名单，决定八届中央委员名额为170人。

9月14日凌晨，毛泽东审阅前一天刚刚修改排印出来的政治报告稿，并作了部分文字修改。尔后，他在报告稿的封面上用钢笔写了一个批语：

“即送少奇同志：1、国际部分的一段增加和一些其它字句的修改，请即令人抄正付翻译，并另打清样。2、党的部分，本日12时前伯达等修改，已要他们直接付翻译。因为我们要下午才能起床，我们看了有意见，可以再改。”

他考虑到时间已经很紧迫了，便又在封面的另一个空白处写道：

“你在其余地方有修改，请直付翻译，并打清样，不要送我看了。”

清晨4时30分，毛泽东审阅完田家英送来的开幕词修改初稿，他在上面作了多处重要修改和补充。接着，他给杨尚昆写了一封信，嘱咐说：

“此件请打清样（校正错字），并付翻译。清样请于本日上午12时以前送各书记处同志以及胡乔木、陈伯达、田家英，请他们再做修改，于9月14日下午3时交田家英汇集酌定交我。这件是否讲，要看15日我睡眠的情况才能临时做决定。所以暂时不要印发各代表和外国人，请注意。”

欲知中共“八大”开会的情形和结果如何？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56年9月13日七届七中全会第3次会议上，谈到“八大”文件的起草修改过程时说：“第1次推翻你的，第2次推翻他的，推翻过来，推翻过去，这也说明我们是有民主的。不管什么人写的文件，你的道理对，就用你的。完全是讲道理的，不讲什么人，对事不对人。”他还说：“**我们每个重要法律，比如《共同纲领》和后来的宪法，土地改革法，农业合作社章程，都是经过了长期的酝酿的，根据大家的意见，改过来，改过去。为什么我们通过一个东西总是大家举手？人家莫名其妙，‘这不是强迫命令’？土地改革法，刘文辉都举了手。这不是偶然的，这是事先听大家的意见，改过来，改过去，讲通了，这样办事办得快，步伐比较整齐，就团结统一了。”**岂止是写东西，民主作风贯彻于毛泽东的一生。像本章讲述的筹备“八大”的整个过程和一些纲领性文件起草的情形，不过是他处理各种内部事务的一个缩影罢了。“专制”、“独裁”论可以休矣！

**第26章**

**“没有战争，资本主义国家就会有经济困难。我们的门是开着的，几年**

**以后，英、美、西德、日本等都将与我们做生意的。他们有技术，我们**

**需要技术，他们的经济有困难，就会向我们出口技术了。”**

话说1956年9月15日下午2时，中国共产党第8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隆重开幕。会场主席台中央破例没有悬挂毛泽东的画像。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026名，候补代表107名，代表着全党1073万党员。

苏联、南斯拉夫、法国、意大利等59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劳动党和人民革命党的代表团，国内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中央国家机关、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人民团体的负责人，应邀列席了会议。

宋庆龄、黄炎培等应毛泽东之邀，在主席台上就坐。宋庆龄激动地说：“这是我毕生中感到最光荣和最愉快的事。”

在热烈的掌声中，毛泽东宣布大会开幕，并致开幕词。他说：

同志们：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幕了。（全体起立，长时间地热烈鼓掌）

从我们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的11年间，在全中国和全世界，为了共产主义和人类解放事业而英勇奋斗和辛勤工作，因而付出了自己生命的同志和朋友，是很多的，我们应当永远纪念他们。（全体起立，默哀）

我们这次大会的任务是：总结从七次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热烈鼓掌）

**在七次大会以来的11年中，我们在一个地广人多、情况复杂的大国内，彻底地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的胜利。**在两个革命的实践中，证明了从七次大会到现在，党中央委员会的路线是正确的，我们的党是一个政治上成熟的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热烈鼓掌）

我们的党现在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加团结，更加巩固了。（热烈鼓掌）

我们的党已经成了团结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力量。（热烈鼓掌）

我们各方面的工作都有很大的成绩。我们的工作是做得正确的，但是也犯过一些错误。在这次大会上，需要把我们工作中的主要经验，包括成功的经验和错误的经验，加以总结，使那些有益的经验得到推广，而从那些错误的经验中取得教训。

就国内的条件来说，我们胜利的获得，是依靠了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并且广泛地团结了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进行伟大的建设工作，在我们的面前，摆着极为繁重的任务。虽然我们有**一千多万党员**，但是在全国人口中仍然只占极少数。在我们的各个国家机关和各项社会事业中，大量的工作要依靠党外的人员来做。如果我们不善于依靠人民群众，不善于同党外的人员合作，那就无法把工作做好。**在我们继续加强全党的团结的时候，我们还必须继续加强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团结，继续巩固和扩大我们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必须认真地纠正在任何工作环节上的任何一种妨害党同人民团结的不良现象。**

在国际范围内，我们胜利的获得，是依靠了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持，（热烈鼓掌）以及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深厚同情。（热烈鼓掌）

现在，国际形势的发展对于我国的建设事业是更加有利了。我国和各社会主义国家都需要和平，世界各国的人民也都需要和平。渴望战争、不要和平的，仅仅是少数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某些依靠侵略发财的垄断资本集团。由于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不断努力，国际的局势已经趋向和缓。（鼓掌）

为了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我们必须进一步地发展同社会主义阵营中各个兄弟国家的友好合作，（热烈鼓掌）并且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加强团结。（热烈鼓掌）

**我们必须争取同一切愿意和我们和平相处的国家，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以及世界上一切国家的和平运动和正义斗争，我们都必须给以积极地支持。（热烈鼓掌）

我们坚决支持埃及政府收回苏伊士运河公司的完全合法的行动，坚决反对任何侵犯埃及主权和对于埃及实行武装干涉的企图。（热烈鼓掌）

**我们必须使帝国主义的制造紧张局势和准备战争的阴谋彻底破产。**（长时间的热烈鼓掌）

我国的革命和建设的胜利，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许多年来，特别是从1942年整风运动以来，我们在加强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方面，做了许多工作。现在，比起整风运动以前，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水平，已经提高了一步。但是我们还有严重的缺点。**在我们的许多同志中间，仍然存在着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作风，这就是：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这些观点和作风都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是不利于党内和党外的团结的，是阻碍我们事业进步、阻碍我们同志进步的。**必须用加强党内的思想教育的方法，大力克服我们队伍中的这些严重的缺点。（鼓掌）

十月革命以后，列宁给苏联共产党提出了这样的任务：学习，再学习。苏联的同志们，苏联的人民，按照列宁的指示做了。他们在不长的时间内，取得了极其灿烂的成就。（长时间的热烈鼓掌）

苏联共产党在不久以前召开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又制定了许多正确的方针，批判了党内存在的缺点。可以断定，他们的工作，在今后将有极其伟大的发展。（长时间的热烈鼓掌）

我们现在也面临着和苏联建国初期大体相同的任务。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我们面前的工作是很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很不够的。因此，必须善于学习。要善于向我们的先进者苏联学习，（鼓掌）要善于向各人民民主国家学习，（鼓掌）要善于向世界各兄弟党学习，（鼓掌）要善于向世界各国人民学习。（鼓掌）

**我们决不可有傲慢的大国主义的态度，决不应当由于革命的胜利和在建设上有了一些成绩而自高自大。**国无论大小，都各有长处和短处。即使我们的工作得到了极其伟大的成绩，也没有任何值得骄傲自大的理由。**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热烈鼓掌）

同志们，我和大家都相信：已经得到解放的中国人民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我们又有伟大的盟国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的援助，（鼓掌）我们又有世界上一切兄弟党的支持，（鼓掌）又有世界上一切同情者的支持，（鼓掌）我们并没有孤立的感觉，这样，**我们就一定能够一步一步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热烈鼓掌）

我们这次大会，对于我国的建设事业的前进，将要起很大的推动作用。（鼓掌）

今天在座的有五十几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劳动党和人民革命党的代表。（长时间的热烈鼓掌）他们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们和我们有一种共同的语言。（鼓掌）他们走了很长的路程来到我国，以崇高的友谊参加我们党的这次代表大会。这对于我们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和支持。（热烈鼓掌）我们对他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全体起立，长时间的热烈鼓掌）

今天在座的还有我们国内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热烈鼓掌）他们是和我们一道工作的亲密的朋友。（鼓掌）他们一向给了我们很多的帮助。（鼓掌）我们对他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全体起立，长时间的热烈鼓掌）

这篇开幕词总共不到3000字，与会者热烈鼓掌竟多达34次。

毛泽东在开幕词中多次提到民主党派和坚持统一战线的方针，黄炎培情不自禁地即席作七绝4首，题为《东方红遍环瀛》，祝贺共产党“八大”的召开。其中第4首诗云：

天安国庆延佳节，万水千山念苦辛。杖策延安如昨梦，《东方红》已遍环瀛。

在会议休息时，一些代表走到毛泽东面前，称赞开幕词写得简短有力、鼓舞人心。毛泽东说：

“这不是我写的，是个年轻秀才写的，此人是我的秘书，叫田家英。”

前边已经说过，这篇开幕词是毛泽东和陈伯达、田家英、胡乔木以及书记处诸人集体创作的结果，毛泽东之所以这样说，是有意提携和鼓励田家英。众所周知，毛泽东是写文章的大手笔，他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以及他的所有文章，从来不让别人代笔，都是他亲自动手写的。这篇开幕词应该说是他一生中的唯一的一个例外。当然，田家英功不可没，开幕词中那一句“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的确是田家英的得意之笔，也是毛泽东很喜欢的一句话。

再说毛泽东致词后，宋庆龄也在大会上致词说：

“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我们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将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终于会成为全世界的一种通行的社会制度。”

接下来，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了《政治报告》。《政治报告》中说：

“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了，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在革命战争中行之有效的经验，不能够用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

早在政治报告起草时，薄一波说，稿子只写了反对保守主义，没有写反对冒险主义，有片面性。他建议作为中共中央的政治报告，两种倾向都应当提到。刘少奇认为薄一波的意见很好，就把反对冒险主义也加进去了。

**《政治报告》中仅仅有4次提到毛泽东的名字。报告反复强调的是加强党的集体领导。早在1945年中共中央“七大”上，刘少奇在他的报告中曾经有105次提到了毛泽东的名字。**

9月15日晚，中共“八大”主席团举行会议，选举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康生、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林彪、邓小平13人组成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

9月16日，邓小平在“八大”会议上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强调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反对个人崇拜，反对突出个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

邓小平报告结束后，周恩来作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2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报告。

此后，大会对3个报告进行了热烈讨论。朱德、陈云、董必武、彭德怀、陈毅、李富春、薄一波、罗瑞卿等68人在大会上作了发言，还有45人提交了书面发言。

罗瑞卿的发言内容是《我国肃反运动的主要情况和若干经验》。毛泽东对罗瑞卿的发言很满意，带头为罗瑞卿鼓掌。

9月17日下午，毛泽东在周恩来陪同下，接见了埃及首任驻华大使哈桑·拉加卜，接受了拉加卜递交的国书，并致答词说：

“**你们收回苏伊士运河是一个很好的开始，纳赛尔总统最近最好不要到没有警戒的地方去，因为帝国主义的计划失败后，他们会采取各种手段，像暗杀等等**。西方国家骂纳赛尔总统是个野心家，是个希特勒，说他想统治阿拉伯世界。但是，我们认为，纳赛尔总统是亚非地区的民族英雄，因此，帝国主义才不喜欢他。

据我看，美国也同意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它不会帮助英国从埃及手里把运河夺回去，这样对美国也有好处。美国另外有它的目的。对美国说来，运河在英、法手里和在埃及手里没有什么区别。它本来就不期望实现杜勒斯计划。美国是想借此机会把英、法从中东赶出去，以便建立它自己的势力范围。苏联、阿拉伯国家、印度和科伦坡国家都支持埃及，有苏联在，英国、美国、法国就不敢轻易行动。”

毛泽东请哈桑·拉加卜大使转告纳赛尔：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将尽一切可能支持埃及人民维护苏伊士运河主权的英勇斗争，我们的帮助没有任何条件。你们有什么需要，只要我们能力所及，一定帮助。我们对你们的帮助，你们能还就还，不能还就算了，我们可以给无代价的援助。当然，埃及是个有民族自尊心的国家，如果接受我们的援助还是要还，那么现在可以记账，以后再说，或者过了100年以后再还吧。埃及现在遭受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我们也经历过这种封锁，深知埃及人民的艰苦。中国在抗美援朝时，花了不少钱，死了不少人，现在没有战争了，可以尽力帮助埃及。”

9月17日这一天，毛泽东给黄炎培写了一封回信。

此前，黄炎培在9月9日将老朋友张叔通所作的书画册送给了毛泽东，并附信说：“‘八大’快要召开了，这一时期紧张得很。希望缓和些紧张，谨奉上书画册一本，公余浏览一下，可能增进些神情的潇洒。这书画册，是一位80岁老画师一年画成，每幅自加跋语的。我在这上边写了一首长古，为他介绍，他和我是新闻记者同事20年，他在抗日时期，吃了很大的苦，他的爱国热情是可敬的。**他能画而很少作画，惜墨如金，最近为了农村和工商界对领导上一片颂声而作。**最近工商界接受种种新的措施，特别是5厘定息，大、中、小皆大欢喜。他是本着极高度诚意而写出来，特代陈，乞赐教；我的诗附求赐教！”

毛泽东在复信中写道：

“画册、叙诗和另诗3首均已收到，十分感谢！张先生是否生活上有困难？是否愿意接受援助，请便告知。”

黄炎培收到毛泽东的回信后，复信毛泽东，告知张叔通生活穷困，其所在的江苏省文史馆每月只给他生活费50元，黄炎培认为如果政府给他更多的照顾的话，他会接受的。

后来在12月16日，毛泽东致信黄炎培，委托他转送给张叔通500元。

９月18日下午6时，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团米高扬、波诺马廖夫、尤金等，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邓小平、王稼祥在座。双方就两党处理党内关系的经验教训，并准备共同帮助兄弟党解决党内矛盾、增强团结的问题，交换意见。

毛泽东说：

“对党内犯错误的人，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我们说，犯了错误，还是要给他工作做，还是要给他饭吃，不能一棒子打倒，要给他改正错误的机会。”

米高扬说：

“您讲的对待犯错误的人应该采取的这种正确的态度，我在1949年来中国时，就曾听您说过，当时给我的印象很深刻。我回到苏联后，曾经一字不掉地对斯大林讲过。可是，当我说完了以后，斯大林并不作声。他的办法同您的相反。我知道，他是不以为然的。”

毛泽东说：

“当国内只有一个党的时候，更应注意听取反面的意见。”

这其间，彭德怀和米高扬有一段对话，彭德怀说：

“米高扬同志，为什么斯大林生前你们都喊他天才、英明、万岁，可他死后你们又骂他漆黑一团？他的错误既然那么严重，为什么不在他生前提意见，人死了才算旧账？他还能听得到能改正吗？”

米高扬说：

“当时谁敢提呀。”

彭德怀说：

“这是对党对人民对领袖负责的态度吗？”

米高扬说：

“谁提了谁就要掉脑袋。”

彭德怀说：

“怕死还当什么共产党员！”

是日晚10时，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朝鲜劳动党代表团崔庸健等，刘少奇、彭德怀、邓小平、聂荣臻、王稼祥、李克农在座。毛泽东就党内团结问题，党内发扬民主问题，谈了意见。他说：

“党内如果有不同的意见，应该展开争论，取得一致的看法，或者进行表决，少数服从多数，同时应该允许那些少数同志保留他们不同的意见。”

此后一个时期，毛泽东几乎每天下午或晚上都要像这天一样，会见一些兄弟党代表团，一天一般是两个代表团，有时是3个。每次会见，少则1个多小时，多则3个小时。据不完全统计，他先后一共会见了29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会见结束后，他又常常接着召开“八大”主席团常委会和各代表团团长会议，直至深夜，其紧张而繁重的工作情况由此可知。

9月19日下午，毛泽东出席中共“八大”全体会议。大会休息时，他和周恩来会见希腊共产党代表团和巴西共产党代表团。

9月21日晚7时，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在北京饭店出席中共“八大”主席团招待55个国家的兄弟党代表团、代表和观察员的宴会。“八大”主席团全体人员，七届中委和候补中委，中央各部门负责人以及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作陪。

是日晚10时40分，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八大”主席团常委扩大会议，讨论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

９月22日下午2时，毛泽东在政协礼堂休息室会见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斯科奇马罗、拉约洛，王稼祥在座。谈到斯大林问题时，毛泽东说：

“斯大林的错误，有它的历史和社会根源，但主要应从主观认识上找根源。苏联在阶级消灭以后，当国家机构的职能丧失了十分之九时，当阶级斗争已经没有或已经很少的时候，仍找对象，大批抓人杀人，继续行使它们的职能。客观形势已经发展了，社会已从这一个阶段过到另一个阶段，这时阶级斗争已经完结，人民已经用和平的方法来保护生产力，而不是通过阶级斗争来解放生产力的时候，但是在思想上却没有认识这一点，还要继续进行阶级斗争，这就是错误的根源。**斯大林的错误还是小部分，七分是正确的，三分是错误的，也许还比三分少些，只有一分到二分。看历史问题是要时间，需要几十年，甚至几百年。”**

９月23日下午2时40分，毛泽东在政协礼堂休息室会见德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团乌布利希等，刘少奇、王稼祥在座。乌布利希说：

“第8次党代会对我们有很大教育意义，不仅了解了中国，并且对我们是一种鼓励和支持。你们在经济、哲学问题的提法上很有趣。”

毛泽东说：

“要互相参考。只可参考，不可硬搬，好像我们不能硬搬苏联一样，硬搬就危险，我们曾经硬搬而吃了大亏。”

乌布利希说：

“我们的道路相同，而走法不一样。”

毛泽东说：

“方向是一个，内容是一个，是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共产国际很长时期犯了很大错误，把我们的革命搞掉了90%。共产国际解散了，就搞出一个新中国来。我们不是不相信马列主义，而是更相信了。共产国际搞教条主义，情报局又搞教条主义，教条主义就不是马列主义。”

是日下午5时，毛泽东在政协礼堂休息室会见英国共产党代表团波立特等，刘少奇、王稼祥、刘宁一在座。在讲到斯大林的错误时，波立特说：

“你们那篇文章（指《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笔者注）是共产主义运动中关于斯大林问题的最好文章，是对共产主义的伟大贡献。”

毛泽东说：

“在斯大林时期，阶级没有了，社会已进入了没有阶级的社会，反革命更少了，但斯大林的思想仍停留在旧社会的时代。我认为这样才能够解释他的错误，即是认识的错误，认识不符合客观事实。”

他还说：

“我们的胜利只有7年。我们的政权专政的职能，即对反革命分子的专政，只剩下10%了。由于没有这样多的反革命分子，所以专政的范围缩小了。”“现在我们的任务是解放生产力。生产力首先需要人。要人们不恐慌，要党内不恐慌，要民主党派不恐慌，要全国人民不恐慌。其次，是保护生产力。”

9月24日晨5时，毛泽东致信杨尚昆，要他通知各代表团团长和各小组组长，立即阅读由陈伯达、胡乔木起草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草案，并于下午2时以前，各小组开会讨论一次，由秘书处将修改意见汇总送交胡乔木，再作修改。

9月24日下午3时，毛泽东在政协礼堂会见了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维塞林诺夫等人，王稼祥在座。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毛泽东外交文选》中的《吸取历史教训，反对大国沙文主义》一文，毛泽东在此次会见中的谈话，全文如下：

我们欢迎你们来到中国。你们来，我们很高兴。我们得到你们的支持，得到各国兄弟党的支持。当然，我们也支持你们，支持所有的兄弟党。现在世界上马列主义的共产党的阵线，不管是在取得胜利的地方，或者是在尚未取得胜利的地方，都是团结一致的。但是也有过不团结的时候。我们有对不起你们的地方。过去听了情报局的意见，我们虽然没有参加情报局，但对它也很难不支持。这是1948年的事。**1948年情报局骂你们是刽子手、希特勒分子，对那个决议我们没表示什么。1948年我们写过文章批评你们。**其实也不应该采取这种方式，该和你们商量。假如你们有些观点是错了，可以向你们谈，由你们自己来批评，不必那样急。反过来，你们对我们有意见，也可以采取这种办法，采取商量、说服的办法。在报纸上批评外国的党，成功的例子很少。这次事件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说，是取得了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你们吃了亏，但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说来，却取得了犯错误的教训。要充分认识这个错误。

**你们承认新中国，我们没有回答，也没有反对。当然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反对，而且也没有理由反对。英国帝国主义承认我国的时候，我们都没有反对，你们社会主义国家承认的时候，又有什么理由反对呢?**

**那时没有回答你们，也有一个原因，就是苏联朋友不愿意我们和你们建交。**那么中国是不是独立国呢？当然是独立国。既然独立，为何要听他们的话呢？同志！那时苏联提出这样的意见，我们不同意也很难办。当时有人说世界上有两个铁托，一个在南斯拉夫，一个在中国。当然没有作出决议说毛泽东就是铁托。我对苏联同志讲过，你们怀疑我是半个铁托，现在他们不承认。从何时起才摘下半个铁托的帽子呢？从抗美援朝打击了美帝国主义以后，才摘下了这个帽子。

过去的王明路线，实际上就是斯大林路线。它把当时我们根据地的力量搞垮了90%，把白区几乎搞垮了100%。少奇同志在‘八大’的报告中也谈到这一点。为什么不公开说明这就是斯大林的路线呢？这也有原因。苏联可以公开批评斯大林，我们公开批评就不那么好。我们应该和苏联搞好关系。也许过一些时候可能公开提出。世界上的事总是这样，事实就是事实。那时第三国际做了许多错事。**第三国际前后两段还好，中间有一大段不好：列宁在世的时候好，后来季米特洛夫负责的时候也较好。**中国第一次王明路线搞了4年，对中国革命的损失最大。王明现在在莫斯科养病，我们还要选他当中央委员。他是我们党的教员，是教授，无价之宝，用钱都买不到的。他教育了全党不能走他的路线。这是我们第一次吃斯大林的亏。

第二次是抗日战争的时候。王明是可以直接见斯大林的，他能讲俄文，很会捧斯大林。斯大林派他回国来。过去他搞“左”倾，这次则搞右倾。在和国民党合作中，他是“梳妆打扮，送上门去”，一切都服从国民党。他提出了六大纲领，推翻我们党中央的十大纲领，反对建立抗日根据地，不要自己有军队，认为有了蒋介石，天下就太平了。我们纠正了这个错误。蒋介石也“帮助”我们纠正了错误。**王明是“梳妆打扮，送上门去”，蒋介石则是“一个耳光，赶出大门”。蒋介石是中国最大的教员，教育了全国人民，教育了我们全体党员。他用机关枪上课，王明则用嘴上课。**

**第三次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投降以后。斯大林和罗斯福、丘吉尔开会，决定把中国全部都给美国，给蒋介石。当时从物质上和道义上，尤其是道义上，斯大林都没有支持我们共产党，而是支持蒋介石的。决定是在雅尔塔会议上作出的。斯大林把这件事告诉了铁托，在铁托自传中有这段谈话。**

共产国际解散后我们比较自由些。这以前，我们已经开始批评机会主义，开展整风运动，批评王明路线。整风实际上也是批判斯大林和第三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问题上的错误，但是关于斯大林和第三国际我们是一字未提。不久的将来也许要提。过去不提的原因有二：一、既然中国人听了他们的话，那么中国人自己就应该负责。谁叫我们去听他们的话呢？谁叫我们去犯“左”倾、右倾的错误呢？有两种中国人：一种是教条主义者，他们就听斯大林那一套；另一种中国人就不听那一套，并且批评教条主义者。二、我们和苏联的关系中不愿引起不愉快。第三国际没有检讨这些错误，苏联也没有提到这些错误，我们提出批评就会同他们闹翻的。

第四次，就是说我是半个铁托或准铁托。不仅苏联，就是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非社会主义国家中，都有相当一些人曾经怀疑中国是否真正的革命。

你们可能不很了解，为什么现在中国还挂斯大林的像。**莫斯科的同志通知我们，他们不挂斯大林的像了，游行的时候只拿列宁及其他活着的领袖的像，当然没说也让中国照办。**我们很为难。斯大林的4条错误，中国人民并不知道，就我们整个的党来说也是不知道的。这和你们的情况不同，你们的事人民都知道，全世界都知道。我们党内知道两次王明路线的错误，但人民并不知道这是来自斯大林的错误。至于斯大林不让中国革命和怀疑我是半个铁托的错误，只有我们党中央知道。

**我们支持苏联作为中心，这对社会主义运动有利。这一点你们也许不同意。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你们从上到下都欢迎，而我们就不同，我们人民不满意。因此，中国不挂斯大林像不行。过去我们游行中拿着马、恩、列、斯的像，拿着几个中国人——毛、刘、周、朱的像和兄弟党领袖的像。现在我们采取了“打倒一切”的办法：谁的像都不拿。今年“五一”波波维奇大使在北京，你看游行时不是没有拿像吗？但是有5个死人——马、恩、列、斯、孙的像，和一个活人——毛泽东的像，还挂着。挂就挂吧。**你们南斯拉夫人可能说，苏联都不挂斯大林的像了，你们中国人还挂。

到现在还有人怀疑我们社会主义建不成功，说我们是假共产党，那又有什么办法呢？这些人吃完饭，睡完觉，就在那里宣传，说什么中国党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中国建不成社会主义，要建成那才怪呢！看吧，中国也许要变成一个帝国主义，除了美、英、法帝国主义以外，又出现了第4个帝国主义——中国！现在中国没有工业，没有资本，可是过100年以后，那才厉害呢！成吉思汗复活，欧洲又要吃亏，也许要打到南斯拉夫去！要防范“黄祸”呀！绝不会如此！中国党是个马列主义的政党，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我们认为，侵略就是犯罪，我们不侵犯别人一寸土、一根草。我们是爱好和平的，是马克思主义的。

在国际上，我们反对大国主义。我们工业虽少，但总算是大国，所以就有些人把尾巴翘起来。我们就告诉这些人“不要翘尾巴，要夹紧尾巴做人”。我小的时候，我的妈妈就常常教育我“夹紧尾巴做人”。这句话很对，现在我就时常对同志们讲。

在国内，我们反对大汉族主义。这种倾向危害各民族的团结。大国主义和大汉族主义都是宗派主义。有大国主义的人，只顾本国的利益，不顾人家。大汉族主义，只顾汉族，认为汉族最高级，就危害少数民族。

以前有人认为，中国人不愿和别人友好，要和苏联分裂，要成为祸害。现在，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这样的人少了，从抗美援朝起开始减少。而帝国主义则不同了，中国愈强大，他们就愈怕。但他们也知道中国工业不发达，只靠人多力量大，没什么可怕。他们第一怕苏联，第二才怕中国，怕我们的政治，怕我们在亚洲起影响。所以他们就经常说，中国不得了，将要侵略，等等。

我们非常谨慎小心，不盛气凌人，遵守五项原则。我们自己曾是被欺侮的，知道受欺侮的滋味不好受。你们可能也有同感吧？

关于中国的前途，就是搞社会主义。要使中国变成富强的国家，需要50到100年的时光。现在已不存在障碍中国发展的力量。中国是一个大国，它的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但是它对人类的贡献是不符合它的人口比重的。将来这种状况会改变的，可是这已不是我这一辈的事，也不是我儿子一辈的事。将来要变成什么样子，是要看发展的。**中国也可能犯错误，也可能腐化，由现在较好的阶段发展到不好的阶段，然后又由不好的阶段发展到较好的阶段。**当然即便不好总不会像蒋介石时代那样黑暗，是辩证的，即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这样曲折地发展下去。

**腐化、官僚主义、大国主义、骄傲自大，中国都可能犯。**现在中国人有谦虚的态度，愿意向别人学习，这也是有原因的，我们没有本钱：一、我们原先没有马列主义，这是学别人的；二、我们没有十月革命，是在十月革命32年以后才在1949年取得革命胜利的；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们是一个支队，不是主力军；四、**我们没有工业化，主要是农业和破破烂烂的手工业。因此，就是有人想翘尾巴，也没有本钱，顶多翘一两公尺。但是我们要预防将来，10年、20年以后就危险了，40年、50年以后就更危险了。**

同志们，我劝你们也要注意这一点。你们工业化程度比较高，发展比较快，斯大林整了你们，但是有理的是你们，真理在你们这一方面。这都可能成为你们的包袱。

上面讲的斯大林对我们犯的4条错误，也可能变成为我们的包袱。中国过几十年在工业化后，翘尾巴的可能性就更大了。**你们回去以后，请告诉你们的下一代，将来中国如果翘尾巴，翘到一万公尺以上，就批评它。要监督中国，要全世界都来监督中国。那个时候我就不在了，去找马克思开代表大会了**。

我们过去对不起你们，欠了你们的账。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们写过文章批评你们，为什么现在还要沉默呢？在批评斯大林以前，有些问题不能说得这样清楚。过去我和波波维奇谈话时只是说：苏联不批评斯大林，我们就不好批评；苏联不与南斯拉夫恢复关系，我们也不好和你们建交。现在就可以讲了，关于斯大林的4条错误，我就和苏联朋友讲过，和尤金讲过，将来见到赫鲁晓夫时也要对他讲。你们是同志，所以也和你们讲了，但是现在还不能登报，不能让帝国主义知道。以后也许有一两条错误要公开讲的。我们和你们不同，你们在铁托自传中提到斯大林的错误，因为你们和苏联断绝了关系。

斯大林提倡辩证唯物主义，有时也缺乏唯物主义，有点形而上学；写的是历史唯物主义，但做的常是历史唯心主义。他有些做法走极端，个人神化、使人难堪等等，都不是唯物主义的。

**我在见到斯大林之前，从感情上说对他就不怎么样。我不太喜欢看他的著作，只看过《论列宁主义基础》、批判托洛茨基的一篇长文章、《胜利冲昏头脑》等。他写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文章我更不爱看。他和列宁不同，列宁是把心给别人，平等待人，而斯大林则站在别人的头上发号施令。**他的著作中都有这种气氛。我见到他以后就更不高兴了，在莫斯科的时候和他吵得很厉害。斯大林有脾气，有时冲动起来，讲一些不大适当的话。

我曾写过一些歌颂斯大林的文章，一共3篇：一篇是在延安庆祝他60寿辰时写的，第二篇是在莫斯科的祝词，第三篇是他死后《真理报》要我写的。我向来不愿祝贺人家，也不愿人家祝贺我。但**到莫斯科去祝寿，不歌颂他，还能骂他不成？**他死后，苏联需要我们的支持，而我们也要支持苏联，就写了那篇歌功颂德的文章。这不是对斯大林个人的，而是对苏联党的。延安的那篇文章，我抛掉了个人感情，把他当做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那篇文章还比较有生气，其他两篇不是出于内心意愿，而是出于需要。**人的生活就是这样矛盾的，感情上不愿写，但理智上不这样不行。**

莫斯科批评斯大林以后，我们就可以讲这些情况了。今天把他的4条错误讲给你们听了，但是为了和苏联保持关系，不便在报纸上公开讲。在赫鲁晓夫的报告中关于斯大林对我们犯的错误，只提到一个糖厂的问题，所以我们还不便公开讲。矛盾的事情还是有的。

**苏联一般来说，总的是好的。他们有4个好：马列主义、十月革命、主力军、工业化。他们也有阴暗面，有些错误。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是次要的。**敌人利用对斯大林的批评在全世界展开攻势，我们应该支持苏联。他们的错误是会纠正的。对南斯拉夫的错误已由赫鲁晓夫纠正了。对于王明的错误，他们已经了解了，而过去我们批评王明，他们就不愿意。他们也取消了“半个铁托”的帽子，一共取消了一个半铁托。取消了给铁托戴的帽子，我们很高兴。

对斯大林的批评，我们人民中有些人还不满意。但是这种批评是好的，它打破了神化主义，揭开了盖子，这是一种解放，是一场“解放战争”，大家都敢讲话了，使人能想问题了。这也是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

自由、平等、博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而现在我们反而为它斗争了。**是父子党，还是兄弟党？过去是父子党，现在有些兄弟党的味道了，但也还有些父子党的残余**。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残余不是一天就能搞清的。去掉盖子以后，使人可以自由思考，独立思考。现在有点反封建主义的味道。由父子党过渡到兄弟党，反对了家长制度。那时的思想控制很严，胜过封建统治。一句批评的话都不能听，而过去有些开明君主是能听批评的。你们南斯拉夫想来也有过这样的君主，别人指着鼻子骂他都行。**资本主义社会就比封建时代进了一步，美国两党——共和党和民主党可以相互骂架。**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想些办法。当然，没有集中和统一是不行的，要保持一致。**人民意志统一对我们有利，使我们在短期内能实现工业化，能对付帝国主义。但这也有缺点，就在于使人不敢讲话，因此要使人有讲话的机会。**我们政治局的同志都在考虑这些问题。

**我国很少有人公开批评我，我的缺点和错误人们都原谅。因为我们总是为人民服务的，为人民做了一些好事。我们虽然也有命令主义、官僚主义，但是人民觉得我们做的好事总比坏事多，因此人民就多予歌颂，少予批评。**这样就造成偶像，有人批评我，大家就反对他，说是不尊重领袖。我和中央其他同志平均每天都能收到300封信，其中总有几封信是批评我们的，但这都不署名，或署假名。他们并不怕我整他，而是怕周围的人整他。

你们提到的《论十大关系》，这是我和34个部长进行一个半月座谈的结果。我个人能提出什么意见呢？我只是总结了别人的意见，不是我的创造。制造任何东西都要有原料，也要有工厂。但我已不是一个好工厂了，旧了，要改良，要重新装备，像英国的工厂需要改装一样。

我老了，不能唱主角了，只能跑龙套。你们看，这次党代表大会上我就是跑龙套，而唱戏的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

９月24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八大”主席团常委和各代表团团长会议，讨论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草案。

9月25日下午，毛泽东会见了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党的代表团（参看《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他在谈话中说：

“**美帝国主义是你们的对头，也是我们的对头，也是全世界人民的对头。**美帝国主义要干涉我们比干涉你们是困难一些。美国离我们很远，这是一种因素。但是，美帝国主义的手伸得很长，伸到我国的台湾，伸到日本、南朝鲜、南越、菲律宾等地。**美国在英国、法国、意大利、冰岛、西德都驻了兵，在北非和中近东也有它的军事基地。它的手伸到全世界。它是一个世界性的帝国主义。它是全世界人民的反面教员。全世界人民要团结起来，互相帮助，在各个地方砍断它的手。**每砍断它的一只手，我们就舒服一点。”

接着，毛泽东重点讲述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些经验、教训，最后强调说：

“共产党人不要怕犯错误。错误有两重性。错误一方面损害党，损害人民；另一方面是好教员，很好地教育了党，教育了人民，对革命有好处。失败是成功之母。失败如果没有好处，为什么是成功之母？错误犯得太多了，一定要反过来。这是马克思主义。‘物极必反’，错误成了堆，光明就会到来。”

9月25日晚8时45分，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谈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草案。

是日晚11时，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交谈会见各兄弟党的情况。

９月26日下午2时，毛泽东出席中共“八大”全体会议。会议选举了中央委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1945年写进中国共产党党章中的“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这句话，在新党章中删去了。整个“八大”都没有再提“毛泽东思想”。**

下午4时15分，毛泽东在政协礼堂休息室会见保加利亚共产党代表团于哥夫等，王稼祥在座。谈到季米特洛夫（保加利亚共产党领袖）时，毛泽东说：

“季米特洛夫同志给我们的印象很深，这是一位好同志，对同志关系好，没有教条主义，没有命令主义，不强迫别人接受他的意见。他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报告很好。”

毛泽东问：

“你们觉得我们这个大会怎样？”

于哥夫说：

“提出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值得我们研究。”

毛泽东说：

“时间开的太长了，砍掉一半就好了。主要是总结一些经验。十一年（从1945年的“七大”到这次“八大”——笔者注）时间是很长，斗争很丰富。这次大会的空气，是反映人民的希望，建设工业。”

9月26日晚10时30分，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八大”主席团常委会，讨论政治报告决议草案和新一届政治局委员候选人名单。这次会议一直开到27日凌晨1时55分才结束。

9月27日凌晨2时，毛泽东在决议草案的封面上给胡乔木写了一个批示：

“照此付印，付翻译。我在第5页上加了‘各人民民主国家’几个字。”

是日下午1时10分至1时50分，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

就在这个期间，陈伯达、胡乔木急急忙忙将经过修改的政治报告决议稿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见决议稿上又增加了一句话：“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此时离“八大”闭幕式开会只有1个小时了，他略一沉吟，就同意印发了。

关于决议中临时增加的这一句话，据胡乔木在1980年10月9日回忆说：“这个问题是陈伯达提出的，陈伯达找了康生，这时大会已经快闭幕了。他们商量了一个修改的意思，把我找去。陈伯达搬出列宁的《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这篇文章的一些话作为依据，说明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问题。然后我和陈伯达去找毛主席，把修改的方案拿给他看，他琢磨了半天以后，同意了。他说，好，赶快去印。”

据参加决议起草工作的邓力群回忆说：“我记得，大概是（‘八大’闭幕）两个星期以后，毛主席对这个问题提出怀疑。他说列宁讲的是亚洲与欧洲比较，你们讲的是自己与自己比。陈伯达向我们传达过毛主席讲的这个意思。”

９月27日下午2时，毛泽东出席中共“八大”闭幕式。

会议选举中央候补委员。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批准刘少奇代表第七届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会议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

在刚刚产生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中，有97位中央委员和73位中央候补委员。

王明、李立三均当选为中央委员。

此前，李立三在“八大”上将自己准备发言的稿子呈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看后，只作了一些文字上的改动，就批示说“可用”。于是，李立三在大会上发了言，深刻地检讨了自己在历史上的错误，讲述了对“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的深切体会，表达了对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感激之情，决心继续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奋斗。后来在1958年初，身为工业部副部长的李立三，深入工厂调查研究，发现了鞍钢总工程师马宾等人总结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工作经验，即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领导干部、工人、技术人员相结合。李立三对这一经验非常重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提法，也受到了毛泽东的称赞，批示在全国进行推广。

马宾，原名张源，1913年出生于安徽省滁州市，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参加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后曾任新四军政治部编译组组长、新四军军部军法处科长（经历过皖南事变）、射阳县委书记（陈云曾为其撰写《学习马宾式群众工作方法》的社论）、松江省军区民运部部长、哈东地委书记、辽宁省委秘书长、民运部部长等职。他在东北解放后，任鞍山钢铁公司总经理，1956年毕业于苏联西伯利亚钢铁学院，归国后任鞍钢总工程师。

再说9月27日下午3时，毛泽东在政协礼堂休息室会见罗马尼亚工人党代表团乔治乌—德治等，王稼祥在座。毛泽东提到了李立三在“八大”上的发言，他说：

“前几天在会上的发言，很受外国同志的欢迎，民主人士听了很欣赏，犯过错误的同志听了也高兴。他的错误也有破坏作用和教育作用两面，现在剩下的也只有教育作用的一面了。”

毛泽东提起了1949年2月他会见米高扬时的谈话，他说：

“我们曾经和苏联同志谈过，如果过去对布哈林、季诺维也夫，甚至托洛茨基，不采取赶走他们和枪毙他们的办法，而仍留他们在党内，仍选举他们做中央委员，是否会更好一些。苏联同志也认为恐怕会更好一些。”

乔治乌—德治说：他们在上海看了些工厂，印象是产品质量好，劳动热情高。毛泽东说：

“我们的质量还不好，只注意数量，不注意质量。要提高质量，成本就高，就不能得奖；要成本低，质量就不高。现在的制度有很多毛病。过去我们没有选购制度，今后将改变方针，实行选购制度。我们的制度较之过去只是相对的好，而不是绝对的好。**资本主义在经营上有许多地方比我们好，我们也要学习他们的好东西。**目前的国际形势是好转了，我们估计战争是很难打起来的。**没有战争，资本主义国家就会有经济困难。我们的门是开着的，几年以后，英、美、西德、日本等都将与我们做生意的。他们有技术，我们需要技术，他们的经济有困难，就会向我们出口技术了。”**

是日下午4时半，毛泽东在政协礼堂休息室会见波兰统一工人党代表团奥哈布等，王稼祥在座。毛泽东说：

“中国还是一个未经开发的国家，人民是穷的。穷是坏，也是好。穷了就要革命，迫切要求提高生活水平。无文化，不好，但整个中国是一张白纸，好写字。”

奥哈布说：

“中国有悠久的文化传统，文物古迹很多。”

毛泽东说：

“帝国主义是不怕我们的几千年文化的。古董当然是要保护的，但我们更需要现代的科学和文化。”

在讲到波兹南事件时，毛泽东说：

“就是一万年以后，人类还会有矛盾。”

波兹南事件是波兰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针对波兰统一工人党政府的大规模罢工事件，因发生在波兰中西部城市波兹南而得名。1956年6月28日，采盖尔斯基机车车辆制造厂约80%的职工开始上街游行，从捷尔任斯基大街向波兹南市中心行进。游行者举起“要面包和自由”的标语，并喊出了“俄国佬滚回去”、“释放囚犯”和“打倒秘密警察”等口号，沿途有更多的群众和铁路修车厂的工人加入游行队伍，聚集10余万人，逐渐发展成暴力事件，6月30日被波兰政府镇压。波兹南事件导致了至少74人死亡（包括军警8人），800人受伤，658人被拘捕。波兹南事件是波兰逐渐摆脱苏联政治控制的里程碑事件之一。毛泽东接着说：

“**现在我们把未来想得很美，可是未来到来时，人们又会感到不满意。那时，社会上还有善恶，无恶即无善；社会上还有美丑，无丑即无美。那时，还有真理，也有谬误。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没有矛盾的思想，是错误的。**”

毛泽东还说：

“我们将向你们学习。任何民族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否则就不能生存下来，也不会发展。应该学习任何民族的长处。**哥白尼**（文艺复兴时期的波兰天文学家，他在40岁时提出了日心说，著有《天体运行论》——笔者注）**，他是一个天文学家，他不仅属于波兰一个国家，他属于全世界，凡是科学都是全世界的。**”

9月28日下午2时，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共“八大”主席团常委和各组组长、副组长会议，商谈选举新的中央领导机构问题。

下午4时，毛泽东在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共八届一中全会，预选新的中央领导机构。

是日晚7时，毛泽东召开“八大”主席团常委会会议，讨论中央领导机构预选情况。

晚7时50分，毛泽东主持召开“八大”主席团常委和各组组长、副组长会议，通报预选的结果和通过候选人名单。

晚11时，毛泽东继续主持中共八届一中全会，正式选举中央领导机构。

八届一中全会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有17人，他们是：毛泽东 刘少奇 周恩来 朱德 陈云 林彪 邓小平 林伯渠 董必武 彭真 罗荣桓 陈毅 李富春 彭德怀 刘伯承 贺龙 李先念

选出政治局候补委员有6人：乌兰夫 张闻天 陆定一 陈伯达 康生 薄一波

选举了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央书记处书记有：邓小平 彭真 王稼祥 谭震林 谭政 黄克诚 李雪峰

候补书记有：刘澜涛 杨尚昆 胡乔木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邓小平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

全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为中共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会议结束后，从不愿打扰毛泽东的王稼祥去找毛泽东，他说：

“主席，请把我在中央委员会和书记处的职务，让给比我更有贡献的老同志、好同志。”

毛泽东听了，笑着说：

“稼祥同志，你做了那么多的工作，当一名中央书记处书记，是完全应该的，你就不要谦让了。”

王稼祥继续申述自己的理由，他说：

“在政治上教育我挽救我，使我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中解脱出来的是党；我负伤以后，又被从死亡线上抢救下来的还是党；长征开始时，‘左’倾错误的中央领导人曾想把我抛弃，但是后来终于被抬着上了路，使我再一次死里逃生，并且一直活着和健康的成长着，仍然是党！而我奉献给党的，根本比不上党所给予我的，我觉得有负于党。”

毛泽东见王稼祥坐着不动，笑着问：

“你今天找我，还有别的事吗？”

王稼祥说：

“我就是为这件事来的。”

毛泽东说：

“既然这样，你也就不必再谈了！”

欲知毛泽东此后的工作情况，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本传前边已经说过，王明在1956年1月间以治病为由再次去了苏联。中央在8月上旬致电王明，希望他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回国参加“八大”。9月8日，王明回电表示因病无法回国，向中央请假。毛泽东对王明仍然采取团结的方针，在“八大”上多次做工作，使许多代表投了王明的票，在王明缺席的情况下，仍然当选中央委员。后来自六十年代起，随着中苏关系不断恶化，长期留居苏联的他根据政治需要，化名为**“马马维奇”、“波波维奇”等**，先后发表《**论中国事件》、《列宁、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中共五十年》、《“整风运动”是“文化革命”的演习》等书，全面地系统地歪曲、篡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把自己打扮成正确路线的代表，**污蔑毛泽东，为自己的错误翻案，**无中生有地造谣说毛泽东多次谋害他，企图加速他的死亡，公开地走上了背叛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道路。即便如此，中央对他再没有作任何决议，也没有开除他的党籍。1974年3月27日，王明病逝于莫斯科。第二天，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刊登了《追悼王明同志》的文章，称其为“国际共运的老战士，中国共产党的著名活动家”，“苏联的老朋友，苏中两国人民的友好和合作的积极捍卫者”。这才是：**永不翻案人尽知，嘴尖皮厚枉称明。江山代有小人出，翻云覆雨每相同。青史如鉴能照妖，大鬼小鬼现原形**。

**第27章**

**“英国、美国、法国都是帝国主义国家、殖民主义国家。这些国家，**

**我们迟一点在国内给它们合法地位，就好一些。**”

话说1956年9月30日下午，印度尼西亚有“独立之父”之称的总统苏加诺应毛泽东之邀，来到北京进行国事访问。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前往北京西苑机场迎接苏加诺。

下午2时，苏加诺的座机在北京西苑机场徐徐降落，他迈出舱门，走下舷梯。毛泽东迎上前去，和苏加诺亲切握手。苏加诺是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他们互相拥抱，就像多年未见的老朋友”。毛泽东把他身边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向苏加诺一一作了介绍。机场上奏起两国国歌，毛泽东陪同苏加诺检阅三军仪仗队。欢迎仪式结束后，毛泽东和苏加诺登上敞篷帕卡德轿车，缓缓驶出机场。从西苑机场到新华门，20公里的道路两旁有数十万群众夹道欢迎。毛泽东面带微笑，挥动右手向路边欢迎苏加诺的群众们致意。苏加诺也微笑着向群众做手势。欢迎的人群站在离敞篷车5英尺远的路旁抛撒着鲜花。路两边没有荷枪实弹的士兵，而那些漫步而行的警察并不阻拦他们。

下午6时，稍事休息后的苏加诺一行，由周恩来陪同在中南海勤政殿拜会毛泽东。毛泽东和苏加诺的谈话记录全文如下：

毛泽东：万隆会议是一次很好的会议，万隆会议真了不得。一年多来，整个世界有很大的变化。是不是?

苏加诺：是的，的确如此。我不论到哪里，大家都提到万隆会议。

毛泽东：从前大家都同时提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大家都不大提了，剩下来的只有万隆会议。读了你在美国的演说，我们都特别高兴。在那样的国家，讲那样的话，非常好。你代表了整个亚洲。

苏加诺：我自己也认为是代表亚洲说话的。

毛泽东：实际上，你是代表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美国招待得还好吧?

苏加诺：一般地说，美国人的欢迎还是相当热烈的。但是，美国政府的领导人员大多不很高兴，因为我说的话，是他们不喜欢听的。不论他们喜欢不喜欢，事实我还是要说出来的。在美国不论到哪里，记者都问，印尼对于中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采取什么态度？我们的答复是很坚决的，中国必须参加联合国。我们还补充说，如果联合国没有代表6亿人民的中国参加，那么联合国就变成了演滑稽戏的场所。

毛泽东：你认为中国进入联合国，是早一点好还是迟一点好?

苏加诺：越早对联合国越好。

毛泽东：我们曾经想过另外一方面，不参加也不坏。

苏加诺：印尼认为，越早越好。

毛泽东：早参加或者迟参加，这两条我们都要准备。

苏加诺：要快才好。

毛泽东：我们觉得慢一点好。

苏加诺：很想了解主席的想法。

毛泽东：我们公开说要参加，朋友们也在这方面帮我们的忙，这是我们的权利。6亿人民的代表不参加，台湾却参加了，这是不公平的。这是不妥当的。在日内瓦的谈判中，我们也对美国提到这一点，指出他们不对。但是，这不是日内瓦谈判的一个题目。日内瓦谈判的题目是：平民遣返问题，解除禁运问题，人民来往问题，更重要的是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问题。

苏加诺：希望主席谈谈为什么中国不急于参加联合国。

毛泽东：**英国、美国、法国都是帝国主义国家、殖民主义国家。这些国家，我们迟一点在国内给它们合法地位，就好一些。**

苏加诺：但是，问题是这3个帝国主义国家都抱有坏的企图，如果在联合国里没有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参加，那么，帝国主义国家会更猖狂。

毛泽东：我们可以在联合国以外反对。

苏加诺：我还是不太了解。

毛泽东：英国急于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我们想出一个办法叫作谈判，就如何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一谈就谈了5年。这期间，英国在中国的是谈判代表，而不是合法的外交官员。英国在联合国投蒋介石的票，而不投我们的票。这样，我们就更有理由，指责英国在两边搞，现在，我们和英国之间是半正式的外交关系。

苏加诺：但是，主席还没有谈到联合国的问题。

毛泽东：我正在讲这个道理。法国、西德这些国家，我们也不急于同它们建交。它们既然不急，我们也不急。至于要拖多少年，那就看吧！它们要拖多少年，就拖多少年，美国也是这样。是比较好的。美国天天骂我们，我们的耳朵已经听惯了。这就说到联合国了。美国是不赞成我们进入联合国的，它是要阻挠的。

苏加诺：这个问题可以分开来谈。中国同英国、法国、西德、美国建交的问题和中国参加联合国的问题，是两回事。帝国主义国家想控制联合国，中国参加了以后，就可以反对这种企图。

毛泽东：问题是台湾。

苏加诺：台湾问题可以搁在一边，台湾和中国是一回事，控制大陆的应该代表中国。

毛泽东：这是你的意见和我们的意见。但是，美国和追随美国的国家不这样想。

苏加诺：问题可以这样解决：一个国家提出要中国参加联合国，其他的国家支持。这是要经过斗争的，印尼愿意参加这个斗争。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了联合国，代表台湾的人当然就没有权了。

毛泽东：这样的提案需要过半数，还是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

苏加诺：三分之二的多数。如果大会以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安理会不能否决。

毛泽东：提案被大会通过以后，我们能不能进入安理会？安理会里是有否决权的，5大国是需要一致的。在这5大国中，一大国曰美国，二大国曰蒋介石。

苏加诺：不管安理会有没有否决权，提出来以后，就会引起斗争，这总是好的。

毛泽东：这个我们赞成，但是最后还是难于解决。

苏加诺：但是世界舆论就会不同。例如，大会以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安理会里如果有一个大国否决，那就做了一件笨事，一定会引起反感。

毛泽东：好的，**作为斗争，这是应该做的。但是，联合国里只能有一个中国，不能有“两个中国”，而那个中国是我们。**那么，我刚才已经说过要准备两条，我们就要准备进去，同你们一起，各一票。

苏加诺：**由一个中国代表整个中国，另外由台湾集团代表台湾，作为过渡的办法，主席认为这样一个策略如何?**

毛泽东：**这个办法不妥。我们要借这个题目做文章。只要在联合国里有一个小小的台湾，我们就不进去。**

苏加诺：但是，这只是作为一个过渡阶段，正像西伊里安和印尼的关系一样。

毛泽东：西伊里安不代表印尼。相反地，在联合国里，印尼有代表，西伊里安没有。

苏加诺：**中国和台湾的问题是不是可以弄成像印尼和西伊里安的问题一样，那就是说，把台湾作为中国将要收复的领土?**

毛泽东：**在联合国里有没有西伊里安的代表?**

苏加诺：我建议的只是过渡的办法呀!

毛泽东：**我们要借这个题目做文章。如果联合国里有台湾的代表，我们一万年也不进去。**

苏加诺：那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蒋介石就要退出，没有台湾代表的地位。

毛泽东：对。

（他面向黄镇大使）中国京剧团到印尼去表演过没有？演出过《雁荡山》没有？

黄镇：演出过。

毛泽东：在这个戏里，两派作战。保守派守城，革命派把城围住，后来飞进城去。英国报纸画了一幅漫画，说中国进入联合国，就像《雁荡山》一样，要飞进去，也就是说，我们要打进去。

苏加诺：已经参加联合国的会员国可以联合起来，要求把中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列入议程。

毛泽东：赶走蒋介石的代表。

苏加诺：这是最终要达到的目标。

毛泽东：**如果蒋介石的代表不走，我们就不去。我们还有很多文章好做。**

苏加诺：**我这样提出问题，是为了要了解中国的态度。**

毛泽东：我们就是这样的态度。如果联合国大会以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提案，而我们却不能进入安理会，那我们就有了斗争目标，就还有时间。对我们来说，最好再等五六年。6年之后，我们的第2个“五年计划”就完成了。最好是等11年，那时候我们的第3个“五年计划”就完成了。不是强国。美国怕苏联，但是不怕我们，它知道我们的底子。中国是一个大国，但不是一个强国，因为我们什么也没有，只有6亿人口。人家看我们不起，而且他们手里还有一个大东西，叫作原子弹。我们连一个小的都没有。因此，何必急呢？

苏加诺：刚才主席说，美国不怕中国。其实不是这样，美国是怕中国的，但这并不是因为中国已经工业化，或者有原子弹。

毛泽东：**它是怕我们的政治。**

苏加诺：**是的，怕中国的政治，怕中国的思想意识。**

毛泽东：**怕我们去散布，对它不利。**

苏加诺：**美国不赞成中国进入联合国，就是因为美国怕中国**。

毛泽东：**美国是有一点怕中国。**说老实话，我们也有点怕美国。

苏加诺：澳大利亚也有点怕印尼。这不是因为印尼已经工业化了，而是因为印尼如果收回西伊里安，东伊里安也会成问题。

毛泽东：你说的这个道理很对。你认为我们做工作，交朋友，重点应该放在什么地方？我认为，应该放在3大洲，那就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另外还有大半个欧洲。剩下来的，只有小半个欧洲，半个美洲，一个澳洲。他们不赞成我们，我们准备等候他们100年。

苏加诺：哪些国家不赞成中国?

毛泽东：英国，它现在还投蒋介石的票。只要它一天如此，我们就一天不同它建交。它100年投蒋介石的票，我们就100年不同它建交，只是交换代办。法国、比利时也不承认我们，还有葡萄牙、西班牙。

苏加诺：**正如我昨天在乌兰巴托的演说中提到的，世界上大多数人，几乎是全部，都赞成中国进入联合国。如果有些国家提出议案，要求联合国接纳中国，并且附上一个条件说，中国必须参加联合国，否则联合国就变成演滑稽戏的场所，这些国家就要退出。这样，美国如果反对，它就做了一件笨事。**

毛泽东：**我们完全赞成这样做，但是不必退出联合国，可以在联合国里进行斗争。**

苏加诺：这个斗争是复杂的，我们需要互相商量。

毛泽东：对的。最后，斗争的结果是蒋介石走路。到那时候，我们就飞进联合国了，戏就唱完了。但是，我们必须准备第二条，那就是，多少年不让我们进去。

苏加诺：这同我们收回西伊里安的问题几乎相同。在印尼，一部分人主张把西伊里安问题撇在一边，先考虑如何建设，等到我们强大以后，西伊里安自然会回来。我的看法不是这样，我认为，应该一方面进行建设，另一方面要为收回西伊里安而斗争。

毛泽东：这同台湾问题一样。一方面，我们要把自己建设强大，另一方面要尽快收回台湾。台湾和西伊里安一样，有两个收回的时间。第一是早一点，这当然是最好的。第二是迟一点，这也可以，我们也可以睡觉，不致于失眠。

苏加诺：但是，这样会不会影响人民的斗争情绪呢?

毛泽东：问题不是全靠我们来解决的，对我们来说，当然最好是早一点。

苏加诺：是不是应该考虑到，人民的斗争情绪像火一样，不扇的话，就会熄灭?

毛泽东：火是在烧的，但是，仍然有两个时间：一个是早一点，另一个是迟一点。

苏加诺：从这一点来说，我是同意的。我们应该一方面进行建设，同时还要继续斗争。

毛泽东：早一点当然最好，迟一点也可以。

苏加诺：当然不是一两天可以办到的。

毛泽东：不是一两天，也不是一两年，而是十年八年，甚至还要多。

苏加诺：**这一点我同意。收回西伊里安不是五六年之内的事，还要更长的时间。但是，对人民说话的时候，我们必须说，要继续斗争**。

毛泽东：**我百分之九十九同意你。**我们也是每天宣传收回台湾，但是我们不讲时间。我们天天说要同世界上一切国家建交，包括美国在内，但是我们不讲时间。中国人办事，就是不讲时间的。有些人讥笑我们，说中国人总是慢慢来。我们恰好就是这一条。

苏加诺：这是一种策略。

毛泽东：不是，的确是如此。问题的解决，不决定于我们这一方面，要对方改了才成。

苏加诺：对方是谁?

毛泽东：英国、美国、法国、台湾、西伊里安、荷兰。问题是它们的参谋长是它们自己的人，而不是我们的人。如果阿卜杜加尼外长去作美国的外长，那就好了。

苏加诺：现在西德的人也是这样说。他们说，阿登纳下台的话，整个西德就会变。

毛泽东：如果它变了，并且提议同我们建交，我们就没有理由拒绝了。

苏加诺：主席的话很有味道，都是实实在在的。我们现在来总结一下：中国方面认为，我们应该早一点还是迟一点在联合国提出中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

毛泽东：早提。

苏加诺：这就好了。

毛泽东：每年都要提一次，哪年成功就算完事。

苏加诺：要成功的话，还要经过斗争。早提有很多好处，这样可以使各国表明立场，阵线分明。

毛泽东：完全对。禁运的问题也是这样。我们天天要求解除禁运，但是迟一点解除也可以。实际上，最好是再迟几年解除。说老实话，我们没有好多东西，无非是一些苹果、花生、猪鬃、大豆。不解除禁运，我们也睡得着，吃得饱。我们可以等6年，等11年。到那时候，解除了禁运，承认了中国，让中国进入联合国，然后他们到中国来一看，他们会后悔的，也就是说，他们发现已经无能为力了。

苏加诺：难道他们对中国的发展不了解吗？

毛泽东：了解是了解的，但是，他们是矛盾的。一方面，他们说现在这样做是上当了，但是他们还有另一方面的困难，使他们要同我们顶。因为这个口子是决不得的，一决以后，黄河的水就要流。对他们来说，面子就很不好看。我们的想法是，早一点承认也好，迟一点承认更好。到那时候，他们到中国来，就悔之已晚，就将无能为力。而且，我们还有第二条，那就是，要他们在全世界面前丢脸。因为是他们不承认我们，而不是我们不承认他们。我们天天要同他们建交，而他们不同我们建交。不是我们不进入联合国，而是他们不让我们进去。我们天天要他们解除禁运，但是他们不解除。结果，就会使美国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一切理由都抓在我们手里，都抓在我们朋友手里。对付美国人是要有一点办法的，要有两条，一条不行。第一是坚决斗争，每天都要叫，这是你的办法。第二是不要着急，这一条是不登报的。**我们同蒋介石也是这样微妙的关系。我们要同他恢复友好和合作的关系。我们过去合作过两回，为什么不能合作3回呢？但是蒋介石反对。他每天反对，我们就每天说要同他合作。这样就使我们的蒋委员长很难处，他的内部正在分化。**

苏加诺：美国人民和美国的统治阶级也不一致。美国国会里也有人赞成中国进入联合国。

毛泽东：不是多数赞成。

苏加诺：但是已经有人赞成。

毛泽东：我们看到有人赞成就高兴。这次中国共产党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我们在政治报告和决议中都说，愿意同一切国家建交。但是，在这些报告和决议里，都没有我刚才向你讲的第二条的内容。因为我们是好朋友，所以我让你知道这个底子。

是日晚，毛泽东和苏加诺一起出席了国务院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周年举行的盛大招待会。席间，苏加诺和毛泽东先后举杯致了祝词。苏加诺还与毛泽东开玩笑说：

“在抽烟方面，毛主席堪称第一，从抽烟中看到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毛泽东想起周恩来给他介绍的苏加诺爱吃辣椒的生活习惯，于是手举着香烟，望了周恩来一眼，说：

“湖南人喜欢吃辣椒，我是湖南人，但在吃辣椒方面，我就不如苏加诺总统，因人各有长处嘛。”

毛泽东一番话，说得宾主开怀大笑。

1956年10月1日，首都各界群众50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国庆庆典。

毛泽东和苏加诺来到了天安门城楼上。

一阵礼炮轰鸣过后，由各军兵种和群众组成的16排纵队的游行队伍，冒雨在广场上接受检阅。

雨越下越大了，天安门广场成了一片汪洋。但见坦克隆隆、枪支如林、锣鼓喧天，指战员们的衣服全被雨打湿了，可他们的热情却丝毫未减，依然踏着军乐的节奏，高挺胸膛，踏起水花，齐步向前。**车辆方队都是第一批出厂的国产“解放牌”汽车**。**雷达探照灯也初次公开亮相。**游行的群众一会儿挥舞彩扇，一会儿又举起鲜花或标语，人海花海，令人目不暇接。

由于下雨，**原定参加阅兵式的国产喷气式飞机未能参加受阅。**

毛泽东在休息期间，亲切接见了应邀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礼的茅以升及其家人。尔后，他又和刘少奇谈了话，他说：

“**党的‘八大’政治报告决议上关于我国基本矛盾的提法不正确。**”

毛泽东认为，现在提出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又说现在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所以要努力发展经济，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刘少奇没想到“八大”刚刚结束，毛泽东这么快就提出了政治报告决议里的问题。正像王光美后来所说的那样，刘少奇听毛泽东如此一说，表现出十分震惊。他说：

“哟，《决议》已经通过了，那怎么办？”

刘少奇又说：

“所有的事情都做得太匆忙，”“没有时间去修改。”

毛泽东知道，大会一旦通过，这个决议就将会字字如镂，不可更改了。

10月1日晚，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兴致勃勃地观看了焰火，回到中南海已经10点多了。稍事休息后，他在颐年堂会见了杜克洛率领的法国共产党代表团。邓小平、王稼祥在座。毛泽东问杜克洛：

“你在中国还要待一阵？”

杜克洛回答说：

“去广州、上海。返北京后回法国。满脑子里装满了你们的东西。”

毛泽东说：

“中国是未被开垦的处女地。”

杜克洛说：

“有意思的东西很多。”

毛泽东说：

“中国的前途是好的，但有艰苦的任务。”

杜克洛说：

“中国人民的力量超过了这些任务的重荷。”

毛泽东说：

“从落后的经济基础上建设工业化国家，并不容易。你们是先有了工业和无产阶级，再革命，等到你们革命胜利了，东西是现成的。我们就不同。**你看法国政府能否摆脱美国干涉，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在贸易上能把成套设备卖给我们，是很久还是不很久？你如何估计？”**

杜克洛说：

“这样的情况比一般人想象的会早一些，目前政府的政策正在破产？”

毛泽东又问：

**“技术和装备出口的可能性怎样？”**

杜克洛说：

“法国资本家也很着急。”

毛泽东说：

**“不是指一般地做生意，是说替中国设计工厂、提供装备、安装装备，并教会中国工人开动机器。”**

杜克洛说：

“现在都有一些可能，可以转弯抹角地搞一些，不过美国还在阻碍。”

毛泽东说：

**“现在瑞典已经答应替我们设计、准备、安装造纸厂。”**

杜克洛说：

“我们在这方面可能做些推动的工作。”

毛泽东说：

“请帮助。”

这正是：毛公一生，从不保守；青史昭昭，天地可鉴。

自力更生，立为根本；科技引进，早着先鞭。

最后，毛泽东就尚未取得革命胜利的国家是否能够和平过渡的问题，发表了意见。他说：

“关于未取得政权国家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共产党人总的说法有两条。第一条，我们愿意和平过渡，只要资产阶级也愿意这样，那很好。第二条，如果他们不干呢？不是要打吗？他们要打，没有办法只有被迫回击，用暴力斗争。**看样子世界上资产阶级心甘情愿走上交出政权的路是不会有的，非得在群众逼迫之下才有可能。**我们提出两条，两方面都有充分理由。第一条表示我们要和平，不要战争，我们要他们和平地把政权交出来。如果光有这一条就危险，当他们不肯移交政权时怎么办？如果他还利用国家机器来镇压人民时又怎么办？所以势必要有第二条，只要人家用战争来压迫我们的时候，那就得有武装斗争。”

这次会见结束时，已经是10月2日凌晨2时35分了。

10月2日晚，毛泽东举行盛大国宴，招待苏加诺总统一行。他在讲话中称赞印度尼西亚人民是伟大的人民，热情歌颂印尼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而进行的伟大斗争；还高度评价了苏加诺在万隆会议及国际事务中所起的重大作用，并且说，中国和印尼必须团结起来，使殖民主义者的阴谋彻底破产。

苏加诺在讲话中颂扬中国和印尼两国人民不是新朋友，已经相识了几百年，有着共同的经历和苦难遭遇，曾经互相支持和同情，两国在各自国内事务和国际事务中都具有许多共同点，今天和明天为我们提供了相互联系的条件。他还说，此次访华确定的两国友好关系的任务不难完成。

席间，宾主频频举杯，祝两国人民的友谊地久天长。

国宴结束后，毛泽东邀请苏加诺一同欣赏著名京剧艺术家谭富英、裘盛戎等人的精彩表演。

10月3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被邀参加国庆观礼的曹聚仁夫妇，在座的还有张治中、邵力子、徐冰、童小鹏。毛泽东和曹聚仁之间的谈话部分内容如下：

曹：台湾方面了解了第3次世界大战已经没有可能，反攻大陆也不可能。他们曾表示，国共和谈，条件成熟时，可能在一个晚上成功。

毛：也可能很快，也可能很慢，但我们并不着急。台湾以前说，1年准备，2年反攻，3年扫荡，4年成功。现在4年已过了，又改说7年了。

**美国怕苏联三分，因为苏联有原子弹。美国也怕我们一分，因为我们有影响。当然我们也有点怕美国。台湾只要同美国断绝关系归还祖国，其它一切都好办。**现在台湾的连理枝是接在美国的，只要改接到大陆来，可派代表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台湾一切照旧。台湾何时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则要取得蒋先生的同意后才做，现在可以实行三民主义。可以同大陆通商，但是不要派特务来大陆破坏。谈好了可以定个协定公布。**我们现在已不骂蒋介石了。大陆上的人民对蒋的仇恨也慢慢淡了。我们也不会拿从前蒋对我们的办法对付他，因为没有必要。目前台湾为了对付美国内部，可以反共，因为他们要生存。台湾可以派些人来大陆看看，公开不好来可以秘密来。**

我们并不着急去加入联合国，但进行这种斗争是必要的。我们进入联合国的条件是：只能一个中国，不仅要进入联合国大会，而且要进入安全理事会和其他各种组织，否则就不干。反对“两个中国”这一点，台湾和我们是一致的。

张治中插话说：

“在反对南越占领西沙群岛问题上，台湾也是和我们一致的。”

毛：这次联合国大会可能美国方面的票仍是多数，但迟早总要承认我们的。外交关系是要严肃的，因为英国在联合国还投蒋介石的票，所以只能跟它建立半外交关系，只能派代办来。

谈话结束时，毛泽东告诉曹聚仁：去台湾见到熟人时代我致意。

张治中则提醒曹聚仁：今天主席提到蒋时称“蒋先生”，请注意。

10月4日，毛纯珠又一次见到了毛泽东。他是来向毛泽东辞行的，说是要回湖南去。毛泽东问起毛碧珠的生活情况，得知他已经加入了农业合作社，十分高兴，当即给毛碧珠写了一封短信，托毛纯珠捎回去。毛泽东在信中写道：

笔珠兄：

纯珠兄来说你已加入了合作社，甚为高兴。望你努力工作，顺祝

安康！

毛泽东 1956年10月4日

前文已经说过，毛笔珠即毛碧珠，系毛宇居、毛智珠的胞弟，土改时被勉强划为富农成份。毛泽东此信话语不多，余意不尽。毛笔珠看后感激涕零，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10月6日，苏加诺一行将要离开北京到中国其它地方去访问，毛泽东一大早就去了机场，为苏加诺送行。在机场上，毛泽东与苏加诺握手话别。苏加诺盛情邀请毛泽东访问印度尼西亚，他还说：

“我希望不久就在印度尼西亚见到你，印度尼西亚人民正在等待着你。”

毛泽东愉快地接受了他的邀请。在送走苏加诺后返回的路上，警卫车辆在前面先过去了，当司机周西林开着车子行至阜成门外时，毛泽东突然对他身边的卫士长李银桥和秘书高智说：

“快7点钟了，肚子饿了，想吃饭。”

高智知道毛泽东工作了一个通宵，还没有来得及休息，又忙活了一大早，确实应该吃点东西了，便说道：

“主席，不远了，快进城了，咱们回到家，别的什么也不搞，先吃饭。”

毛泽东拿着李银桥给他点上的烟，吸了一口，拉长声调说：

“不！找一个饭馆，到饭馆里面去吃。”

高智见他态度坚决，没有一点商量的余地，就说：

“主席，听罗部长说过，新街口有个陕西羊肉泡馍馆子，我们去吃羊肉泡馍吧？”

“好！”

毛泽东高兴了。高智对周西林说：

“老周，你逐渐减速，把车子开慢些。”

周西林放慢了车速，前面的车子见毛泽东的车慢下来，不知出了什么事，就停下来等候。待两车渐渐靠近，周西林将车停了下来，高智拉开门准备下车。毛泽东问：

“高智，干什么去？”

高智说：

“咱们去吃羊肉泡馍，得先有人去看看，安排一下。”

毛泽东“哦”了一声，交代高智说：

“到了饭馆不要说是什么人，免得警察把人们赶走。”

说罢就继续抽烟。高智见坐在前面车子里的警卫局副局长王敬先和王荫清跑了过来，就走上前对他们说：

“主席要去新街口吃羊肉泡馍，请你们赶快去安排一下。注意，一定不要把吃饭的群众撵走，安排好就在门口等着，找个适当的地方停车。”

王敬先、王荫清应声去了。李银桥和高智看看街上行人不算太多，便指挥着周西林尾随前面的车辆，将车停在了一家普通的饭馆旁边。警察一看来的车辆，知道是大首长的车子，马上指挥其它车辆让开了。毛泽东带了个口罩，在王敬先和王荫清的引导下，和一左一右的李银桥、高智一起径直往里走。正在吃早点的群众，各人低头吃着喝着，谁也顾不上看看新到的这几位不速之客。店主人热情地招呼他们到里间的桌子旁就坐，并手脚麻利地先为客人沏上茶。李银桥见饭一时还上不来，就为毛泽东点了烟。毛泽东吸了一口，随口问道：

“你们现在工资多少啦？。”

“不到100。”

高智小声回答。毛泽东说：

“都不少啦，现在老百姓还达不到。”

此时高智是行政16级，100元钱可以养活七八口人。说话间，羊肉泡馍端上来了。毛泽东端起一碗说：

“我吃不了这么多。”

高智用筷子把毛泽东碗里的馍给李银桥和自己拨了一点，毛泽东便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还边吃边问道：

“这羊肉泡馍多少钱一碗？”

邻桌的一位顾客随口答了一句，连头也没有抬。等毛泽东几个人吃完饭，算账时才发现谁也没有带钱。高智只好和店主人商量说：

“实在对不起，我们是在路上临时决定吃饭的，没带够钱，明天一上班，我就送来，行不行？”

此时物价便宜，几碗羊肉泡馍也才只有6元3角9分钱。店主人连连答应说：

“行，行，没问题，你们走吧！”

这一餐，毛泽东吃得很满意，享受到了与群众共同生活的乐趣。

国庆节刚过不久的一个下午，一辆黑色轿车驶进湖南长沙中南矿业学院，在文风良家门口停下来，车上下来两个人，问道：

“这是文风良同志家吗？”

文风良连忙答道：

“正是。”

“文涧泉、文运昌、文梅清3位老人在家吗？”

“他们今天游岳麓山去了，等会就回来。”

“我们是省委交际处的。北京中南海来电：毛主席欢迎文涧泉3位老人去北京，并请你护送他们赴京。请你转告3位老人，让他们做好准备，明天上午我们开车来接。”

文风良，生于1922年，系文运昌之次子。他于1949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湘中纠察队，任第2大队6中队政治指导员。后转到地方工作，参加了土地改革和组织农会等工作。1951年9月入湖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一年后被分配到中南矿业学院工作。

此前，在国庆节前夕，文涧泉和文梅清来到中南矿业学院侄儿文风良处，邀请他父亲文运昌一道去北京。文风良婉转地劝道：

“毛主席是一国之主，他老人家日理万机，工作很忙，如果你们像农村串门一样，经常去打扰他老人家，这恐怕有些不妥。再则，你们即使要去，也应该先取得他老人家的同意。否则，不就成了不速之客。”

文风良如此一说，3位老人顿时沉默了。少顷，文涧泉用征询的口气说：

“风良，你讲的都在理，可是我们已经做好准备到了这里，难道要我们扫兴而归不成？”

文风良见他们不愿就此罢休，便劝文涧泉、文梅清先住下，自己先写封信去请示毛泽东，待到有回示后再定行止。文涧泉兄弟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文风良不揣冒昧，寄出了他平生第一次写给毛泽东的信。文风良没有想到一星期后，毛泽东就来了邀请。

第二天上午，天高气爽，风和日丽。两辆轿车来接文涧泉4人，他们赶忙把送给毛泽东的礼物带上了轿车。这些礼物有：一条10多斤重熏得金黄金黄香喷喷的腊鱼，几瓶永丰辣酱，几斤衡阳豆豉和几包韶山清茶。

两天后，文涧泉一行4人到了北京，住进了西郊宾馆。他们先是由中央办公厅秘书派人陪同，游览北京的名胜古迹；后来，毛泽东在颐年堂会客厅接见了他们，王季范也在座。毛泽东说：

“今天，我请你们来，不是为了别的，而是想通过你们了解一些农村的情况。中国历来是一个农业大国，全国6亿人口，80%以上的人口在农村。”

他点了一支香烟，接着说：

**“常言道：‘民以食为天’。人民的吃饭问题，是一件至关重要的大事**。如果农业搞不上去，怎么能解决吃饭问题呢？因此，**只要我们把人民的吃饭问题解决好，那就什么事情都好办了。”**

毛泽东吸了一口烟，吮了吮嘴唇，问表兄文涧泉：

“今年你们那里的粮食收成如何？”

文涧泉回答说：

“托主席的福，今年的收成很好，亩产比往年都高。只是6月欠雨水，旱情比较重，唯有车水救禾。你晓得唐家圫前面的6亩大丘，是有名的‘干鱼脑滩’，从我家屋门前塘里车水上6亩滩，要4、5道车才车得上水。我们日夜轮班车水，硬是屁股都磨起了泡！”

毛泽东听后，对旁边的两个女青年说：

“你们听到没有，农民种粮，付出的是辛勤和汗水，要知道粮食来之不易啊！这位老人所讲的，是你们书本上难得找到的东西。”

他又问文涧泉：

“你们那里合作社的情况如何？”

文涧泉说：

“农民对合作社都非常拥护，我们那里大多已由初级社过渡到高级社。”

“农民的生产情绪怎么样？”

“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很不一致。”

文梅清插话说：

**“如果是以时记工，有的人磨洋工，出勤不出力。如果是定额记工，就省事图快，只顾工分不顾质量。**这样对增产增收大有影响。”

文运昌接过话茬说：

**“这样的人如果是少数，还不要紧。俗话说：‘三勤一懒，懒也会仿’。如果这样的人是多数，那就成问题了，所谓‘三懒一勤，勤也会懒’，**所以，能会不影响生产么？”

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

“**你们所说的这个问题，是有代表性的。所以，我曾说过：‘重要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的问题’。这要通过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来提高农民的觉悟，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促进和发展农业生产。**”

他又问：

“农村生猪发展情况如何？农民有肉吃吗？当前肉猪、架子猪和仔猪的行情价格如何？”

文涧泉回答说：

“近年来农村生猪生产发展很快，生猪存栏数逐年增加，行情稳定，价格合理，农民吃肉已不成问题。”

文运昌也说：

“今年4月的猪肉吃不完，他们加工成腊肉运到长沙来销售，可先登记称肉，再分期付款。我家都称了几十斤哩！”

毛泽东感到很满意，爽朗地说：

“生猪生产应该加速发展。不是说猪多肥就多、肥多粮就多吗？”

他又点燃了一支香烟，接着说：

“我也种过田，种田就要肥料。猪、羊、牛和家禽的粪便就是上乘肥料，它既能改良土壤又能促进植物生长，所以，要大力发展养殖业。现在农民在秋收后种油菜和绿肥的积极性如何？农民在稻田里种荞麦、拖泥豆，在田边种花豆等杂粮作物，既不占全地，收获又可观，现在还种吗？”

文涧泉和文梅清都说：

“如今推行双季稻，拖泥豆不种了，其它仍继续播种。”

毛泽东含笑道：

“常言道：‘菜好半年粮’。所以，对各种杂粮的生产，要大力提倡，不能使田地荒芜。我记得你们那里的芭蕉潭上有一片油茶林，现在还有吗？”

“还有，并且依然生长得很好，每年茶籽收入可不少。”

毛泽东点点头说：

“油茶是多年生的油料植物，不似油菜一年一度，只要管理得法，年年有收。所以，有条件的山区和林区可大力发展。”

毛泽东和文家诸位亲人的谈话已经过了3个小时，一位工作人员走到他跟前说：

“晚餐已准备就绪，请主席和客人就餐。”

毛泽东随即起身，招呼大家入席。于是，文涧泉等人随毛泽东步入餐厅。餐桌上摆满了清蒸鸡、红烧肉、黄焖鱼、炖羊肉、海鲜、鱼肚片、鱿鱼、香菇、寒菌、玉兰片、辣酱等菜肴，还有茅台酒和葡萄酒。

酒过三巡，王季范站起身来，提议大家举杯，祝毛泽东长寿。毛泽东亦起身举杯祝各位表兄长寿，祝大家健康。饮罢酒，毛泽东指着碗里的饭，问工作人员：

“这米是不是四川来的？”

工作人员说：“是。”毛泽东点头称好，说：

“你可以告诉他们，就说是我说的，这米质地好，可以推广。”

饭后，客人们拥着毛泽东回到会客室，有的品茶，有的吃水果，无拘无束，谈论着新中国的建设成就。毛泽东忽然想起家乡韶山的仙女峰，便问起山上那座石庙的情况。文涧泉说：

“石庙早被拆毁了，现在只有些残留石壁。”

毛泽东甚感惋惜，又问道：

“韶山的几个庵子还在不在？比如西边的莲花庵，东边的慈悦庵，仙女峰下的仙女庵。”

文涧泉和文梅清说：

“这几处庵堂，在土改时，作为住房分给了附近的农户，改动改建，拆的拆迁，因此原貌已不存在了。”

毛泽东说：

“其实这几处也可算是韶山的名胜。各处地势较好，周围古树参天，山泉潺潺，曲径通幽，晨钟暮鼓，响彻群山，风景蔚为壮观。”

他又兴致勃勃地问：

“过去农村作兴在正月耍龙灯、狮灯和花灯，现在还搞吗？”

文梅清说：

“为了闹新春，有的地方仍然作兴，有的地方不搞了。”

毛泽东说：

“其实玩民间传统灯的意义不仅是闹新春，还可以活跃农村文化生活，盘龙舞狮还有不少艺术性呢。”

欲知毛泽东此后的重要活动，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本章关于毛泽东和几位表兄的谈话，涉及农业合作社的收成、农民生活、文物保护、传统民俗等方面，这是了解毛泽东不可或缺的资料。请注意，在毛泽东问到农民生产积极性时，文梅清说：**“如果是以时记工，有的人磨洋工，出勤不出力。如果是定额记工，就省事图快，只顾工分不顾质量。**”文运昌说：**“这样的人如果是少数，还不要紧。俗话说：‘三勤一懒，懒也会仿’。如果这样的人是多数，那就成问题了，所谓‘三懒一勤，勤也会懒’。**”笔者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也有这方面的亲身体验。他们所说的情况，正是农村实行集体化后出现的一个不太好的侧面的真实写照。对此，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你们所说的这个问题，是有代表性的。**所以，我曾说过：**‘重要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的问题’**。**这要通过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来提高农民的觉悟，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促进和发展农业生产。**”这的确是**对症良方**！后来的社会实践证明，**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克服几千年以来的**私有制传统观念**，广大农村便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新局面！请诸君耐心往后看。

**第28章**

“**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

**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

**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

话说1956年10月12日晚，毛泽东会见了以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员、南斯拉夫联邦国民议会副主席申特尤尔茨为团长的妇女代表团，南斯拉夫驻中国大使波波维奇也在座。毛泽东在谈话中说：

“在我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中，有12%是妇女；在基层人民代表大会中，女代表占17%。**在北京、上海、天津3个中央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中，女代表占20%。**

**将来女同志的比例至少要和男同志一样，各50%。如果女同志的比例超过了男同志，也没有什么坏处。**这个目标只能在全世界不打仗了，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那时生产有了高度的发展，人民的文化、教育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才可以完全实现。不尊重妇女权利的情况，是在阶级社会产生后才开始的。**在阶级社会出现以前，有一个女权时代，妇女是占统治的地位，听说那时候她们不需要打扮，而相反的男人却要打扮，以获得她们的欢喜。**只有当阶级社会不存在了，笨重的劳动都自动化了，农业也都机械化了的时候，才能真正实现男女平等。”

会见将要结束了，申特尤尔茨真诚地对毛泽东说：

“感谢毛主席今晚的接见，我们能有机会同你谈话，觉得很高兴。在中国期间，我们看到了很多东西。**我们看到了生产力的发展，也看到了工人们高度的热情。你们对工人福利的关怀，对母亲和孩子的照顾，给我们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我们是到了一个友好的和同志般的国家，在各地受到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妇女的热烈欢迎，就好像置身在老同志和老战友之间。”

波波维奇也说：

“我也要感谢毛主席和其他在座的同志们。每一个南斯拉夫的代表团来到北京时，毛主席总是予以接见，南斯拉夫政府的领导人和人民深切感谢毛主席这一盛情的表示，他们非常懂得这种表示的意义。”

10月19日下午，毛泽东会见了18日到京来访的巴基斯坦总理苏拉瓦底。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参加了会见。毛泽东对苏拉瓦底说：

“我们愿意进一步搞好我们两国的关系，如果你们也有同样的愿望，我们两国的关系是可以搞好的。亚非各国，根据万隆精神，都应该建立和平共处和友好的关系。”

毛泽东对巴基斯坦参加马尼拉条约和巴格达条约（巴格达条约即1955年2月在巴格达签订的《伊拉克和土耳其间互助合作公约》；英国、巴基斯坦、伊朗等国于同年相继加入）表示了中国的态度，他说：

“我们原来希望你们不参加这两个条约，但是你们已经参加了，没有办法。你们有自己的政策，我们只能作为朋友提出建议，不能干涉，无权告诉你们采取什么外交政策。**我们建议你们不反对中国和印度，而且对整个亚非地区国家都以团结为重。**”

10月20日上午，新华社负责人吴冷西接到中央办公厅会议科通知，要他列席下午在颐年堂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吴冷西不知道这次会议的内容是什么，但他想起最近几天的国外动态有些反常：从10月17日开始，外国通讯社就传说，苏联与波兰关系骤然紧张，苏军在波兰边境调动频繁，正向波兰东部移动，苏联的波罗的海舰队也正向波兰海域前进，华沙空气非常紧张。10月18日，杨尚昆打电话告诉他说：新华社要注意收集这方面的消息，迅速报告中央。自此，吴冷西及新华社各有关部门一天24小时值班，一有重要消息，马上报告总理办公室和中央办公厅。吴冷西估计这次政治局会议与此事有关。于是，他马上到参考资料编辑部了解最新消息。

原来，苏联与波兰关系紧张的起因是，在波兹南事件后，苏联担心波兰会摆脱自己的控制，决定进行干涉。10月19日，在波兰党举行二届八中全会之际，赫鲁晓夫未经邀请，率领一个阵容强大的代表团飞赴波兰，同时调动军队包围华沙。赫鲁晓夫要求参加波党会议，遭到断然拒绝。在二届八中全会上，被批评为“有右倾民族主义倾向”的哥穆尔卡当选为波兰中央第一书记，新改组的党中央为波兹南事件平反，释放被捕者。赫鲁晓夫指责波党关于新领导层的安排排斥了优秀共产党员，为反动派和反革命分子开辟道路，指责波党对领导层擅自进行调整是对苏联的蔑视，因而反对改组政治局。哥穆尔卡等人坚决拒绝赫鲁晓夫的指责，并要求包围华沙的苏军撤离。赫鲁晓夫被迫妥协，同意哥穆尔卡等人进入政治局，但坚持不能把罗科索夫斯基排除在政治局以外。罗科索夫斯基原是苏联元帅，他在1949年10月应波兰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担任波兰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防部部长，获波兰元帅军衔，并被选为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议会议员。面对赫鲁晓夫的要求，哥穆尔卡明确指出，在波兰人民眼中，罗科索夫斯基是“苏联控制的象征”。这就是波兰“十月事件”。

下午3时许，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除了因病请假的林彪、林伯渠、刘伯承、康生外，全部到会；王稼祥、胡乔木、杨尚昆、田家英和吴冷西列席了会议。与会者正谈论着从莫斯科发来的电报，毛泽东穿着睡衣缓步走进颐年堂，落座后，一讲话就开门见山，他说：

“苏共中央给我党中央发来一份电报，说波兰反苏势力嚣张，要苏军撤出波兰。苏联根据华沙条约有权驻兵波兰，有义务保卫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全。苏联不能允许反苏事件继续发展，准备调动军队来解决问题。苏共在通知中表示想知道我们党对此有何意见。看来，苏联要对波兰实行武装干涉，但还没有下最后决心。情况很严重，很紧急，所以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如何答复苏共中央。”

毛泽东说罢，回过头问吴冷西：

“有什么新消息？”

吴冷西报告说：

“今天收到外国通讯社的消息，说波兰军队已动员，保安部队也处于紧急状态，华沙工人也纷纷拿起武器。同时，从斯德哥尔摩、赫尔辛基传出消息说，除苏联军舰已到达波兰港口格但斯克港外，原驻在苏联西部和民主德国东部的苏军也在调动中。”

毛泽东听了，说道：

“现在情况非常紧急，我们要早定方针。**儿子不听话，老子打棍子。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对另一个社会主义邻国武装干涉，是违反最起码的国际关系准则，更不说违反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的原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这是严重的大国沙文主义。**”

他一说完，与会者议论纷纷。有人说这是亲者痛仇者快的严重事件；有人说，我们一定要坚决反对，尽最大努力加以制止；有人建议，中央采取紧急措施，向苏共中央发出严重警告，表明我们坚决反对苏联武装干涉波兰。

正在此时，吴冷西接到他的秘书从新华社打来的电话，说外国通讯社报道：苏联一个代表团到达华沙与波兰谈判。吴冷西马上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说：

“事不宜迟，我们应马上警告苏方，坚决反对他们对波兰动武。”

与会者一致同意毛泽东的决定。毛泽东说：

“会议到此结束，马上约见苏联大使。胡乔木、吴冷西留下作陪。”

胡乔木见毛泽东仍旧穿着睡衣，就说：

“主席，您是不是换上中山装？”

毛泽东说：

“就这样也没什么关系！”

大约有半个小时，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被召到菊香书屋毛泽东的卧室里。毛泽东和尤金是朋友，过去两人多次在一起讨论哲学问题。尤金见毛泽东穿着睡衣，表情严肃，预感到这次紧急召见非比寻常。他刚一坐下，毛泽东就直截了当地说：

“我们的政治局刚才开过会，讨论了你们中央发来的通知。**我们政治局一致认为，苏联武装干涉波兰是违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中共中央坚决反对苏共中央这样做，希望你们悬崖勒马。如果你们竟然不顾我们的劝告，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将公开谴责你们。就是这几句话，请你立即打电话告诉赫鲁晓夫同志。**情况紧急，时间无多，谈话就此结束。请你赶紧去办。”

尤金满头大汗，连声称是，迅速退走了。毛泽东转对胡乔木、吴冷西说：

“你们也没事了。新华社要密切注意情况发展，有新消息随时报告。”

10月21日，苏共中央致电中共中央，说波兰情况极为严重，要求中共中央派一个代表团去莫斯科，参加苏共中央和波兰党中央的会谈。

这天晚上，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波兰问题。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胡乔木、李富春、彭德怀、王稼祥、康生、李维汉、薄一波、李先念出席会议。

零时45分，毛泽东紧急约见尤金，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在座。毛泽东答复尤金说，我党同意派一个代表团去莫斯科；并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对波兰问题的意见。

尤金走后，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继续进行，决定由刘少奇、邓小平、王稼祥、胡乔木组成代表团，于23日前往莫斯科。代表团的任务是调解。毛泽东提出的方针是：**批评苏共的大国沙文主义，劝说波兰党顾全大局。方式是分别同苏共或波兰党会谈，不参加他们两党会谈。**

10月22日晚，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讨论波兰问题。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又一次约见尤金，对他说：

“看来波兰还不像马上要脱离社会主义阵营，加入西方集团。他们要改组政治局似乎是坚决的。对于这种情况，苏联方面到底采取什么方针？无非一种是软的办法，一种是硬的办法。所谓硬的办法就是派军队，把他压下去，比如武装干涉；软的办法是劝告。劝他，他不听，剩下一个就是让步。**他要改组政治局，就让他改组，承认哥穆尔卡为首的中央，同他打交道，在平等的基础上跟他合作。他不是要独立要平等吗？就让他独立，跟他讲平等。这样，就可以争取到波兰留在社会主义阵营里面，留在华沙条约里面。”**

尤金立即通过电话将毛泽东的谈话报告给赫鲁晓夫。

10月23日晚，刘少奇、邓小平等一行飞抵莫斯科，在苏波之间进行斡旋。

世间的事情可真是无独有偶，这边苏联与波兰“十月事件”在中国共产党的调解下刚刚趋于和缓——赫鲁晓夫同意将苏军撤回，并把罗科索夫斯基调回苏联，那边匈牙利又出现了非常严重的事态。

早在10月21日，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内外受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治局改组的影响，纷纷要求效法波兰，走独立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人民群众也对拉科西时代的错误政策严重不满。一些右翼团体也乘机活动。10月23日，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爆发了20万人的示威游行，各种反动分子、亲法西斯分子混进了示威群众队伍。一些军警同示威群众发生了冲突。一些示威游行者在右翼势力的煽动下，提出了反政府口号，占领了电台和一些军事设施，冲击劳动人民党和政府机构。就在这天晚上，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原先在1955年4月被撤销总理职务、12月被开除出党、1956年10月恢复党籍的纳吉，重新当选为党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并出任政府总理。

此时，正在莫斯科同苏共领导人会谈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闻知匈牙利发生了暴乱，由刘少奇通过电话将这一消息报告给毛泽东。

10月24日，毛泽东召开会议，讨论匈牙利十月事件，并直接与刘少奇保持电话联系。

10月25日，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选举卡达尔为中央第一书记。

10月29日，赫鲁晓夫、莫洛托夫、布尔加宁来到中国代表团驻地。在双方谈话中间，毛泽东与刘少奇通了一次电话，要他跟苏方商量：苏联是不是可以对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上、经济上放手，放开，让这些国家独立发展。苏方最终接受了中方的建议。

10月30日，苏联政府发表了《苏联政府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承认了过去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上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

这一天，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从米高扬来自匈牙利的报告中得知，匈牙利的形势继续恶化，纳吉政府已经宣布退出华沙条约组织，实行多党制，解散保安队和保安机关，人民民主专政的体制已经解体。暴乱分子烧死、绞死、活埋保安队人员和共产党人。全国出现了无政府状态。

就在这严重的局势面前，苏共领导却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们决定从匈牙利撤军。中国代表团获悉了这一情况后，由刘少奇立即报告给毛泽东。

10月30日晚，毛泽东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电告在苏联的代表团：立即约见苏共中央主席团，声明他们是受中共中央的委托，反对苏联军队从匈牙利撤退。

此时，苏共领导对匈牙利已经完全绝望，他们认为匈牙利政变已经完成，反革命已经取得了政权，没有采纳中方的意见。

10月31日，刘少奇、邓小平会见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体成员，再次表达了中共中央在匈牙利问题上的态度。

这天晚上，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就要归国了，赫鲁晓夫在送刘少奇去飞机场的汽车上，告诉刘少奇说：

“主席团开了一整天的会，最后决定苏军仍然留在匈牙利，帮助匈牙利党和人民保卫社会主义。”

此时，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体成员也到机场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送行，他们纷纷表示说，中国共产党在波兰问题上帮助了他们，现在又在匈牙利问题上帮助了他们。

正是：**百年孱弱累受欺，抗美援朝始扬眉。民族之林三鼎立，问尔称霸敢是谁？**

再说10月31日晚，邵力子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表了《在中山先生爱国感召下重新团结起来》的广播演说。

此前，北京为隆重纪念孙中山诞辰90周年，成立了“孙中山先生诞辰90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由周恩来担任主任，邵力子担任副主任兼秘书长。

1956年11月1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支持《苏联政府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

这一天，刘少奇、邓小平等一行回到北京。

是日晚，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代表团莫斯科之行的汇报。汇报结束后，毛泽东说：

“代表团的同志们长途飞行劳累，现在暂时休会，改日再开。”

11月2日晚，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波、匈“十月事件”。这次会议的时间不长。毛泽东最后说：

“在匈牙利，完全照过去的一套是不行的，而新的一套还要靠匈牙利的同志自己去摸索，我们也要支持他们。**现在摆在世界各执政党的共产党面前的问题是如何把十月革命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结合的问题，这是个大问题。**波、匈事件应使我们更好地考虑中国的问题。苏共二十大有个好处，就是揭开了盖子，解放思想，使人们不再认为苏联所做的一切都是绝对真理，不可改变，一定要照办。我们要自己开动脑筋，解决本国革命和建设的问题。”

11月3日，中国政府就10月29日下午5时英法帝国主义不顾中苏的多次警告，指使以色列军队向埃及的西奈半岛发动大规模进攻的侵略行为，向英法和以色列提出严重警告，坚决要求英法和以色列立即停止对埃及的侵略，从埃及撤走侵略军。

在此后的几天之内，中国各大城市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英、法、以色列侵略者滚出埃及”的口号声响彻云霄。

以色列军队向埃及发动进攻后，不几天便占领了西奈半岛；英法军队也在11月5日开始进攻苏伊士运河的北口重镇塞德港。

美国出于独霸中东的战略需要，也出面反对英法、以色列的军事行动。

后来，在中美苏三大国一致反对英法以侵略、声援埃及的情况下，埃及的纳赛尔在惨遭失败之后戏剧性地取得了最后胜利，成为埃及的民族英雄。

再说11月4日，以卡达尔为总理的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宣告成立。

这一天，应卡达尔的请求，苏联军队重新回到布达佩斯。布达佩斯和匈牙利全国各地的暴乱很快被平息下来，卡达尔政府重新稳定了国内局势。

后来，纳吉因在匈牙利十月事件期间，公开宣布要苏军立即撤退，匈牙利政府废止华沙条约并实行中立，请求联合国干预，在1958年以推翻匈牙利人民民主国家制度罪和叛国罪，被判处死刑，6月16日在布达佩斯被处决。

11月4日下午，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列席了会议。周恩来说：

“当前西方世界利用匈牙利事件大肆反苏反共，各兄弟党内出现动摇分子以至变节分子。苏共领导人表现软弱无力。我们党应做中流砥柱，力挽狂澜。”

毛泽东说：

“苏共二十大后，我们在4月间曾经写过一篇《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章，回答已经暴露出来的问题。现在，经过半年之后，事实证明我们的观点是正确的。但又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需要做出回答。可以考虑再写一篇文章。”

毛泽东提出问题后，与会者发言活跃，纷纷提出需要回答的问题，有西方宣传机器污蔑攻击的问题，也有属于国际共产主义队伍内部的问题。毛泽东说：

“**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泄露后，各兄弟党先后发表声明和文章，或作出决议。我们已经收集起来出版两本集子。**这些都是正式发表他们的观点的，我们可以仔细研究。还有最近波兰和匈牙利问题发生后，又有许多材料需要研究，看看有哪些主要问题需要回答和如何回答，以后再开会讨论。乔木同志、冷西同志和家英同志可以预先准备，开过二中全会之后再议。”

11月8日，毛泽东的外家亲戚文家兄弟子侄4人在西郊宾馆已经住了一段时间，转眼到了晚秋季节，北京的风变得有些刺人了，他们因未带暖衣，有些抵挡不住了。一天早饭后，文涧泉将侄子文风良叫到跟前，轻声说：

“风良，现在天气冷了，寒气侵人。你能不能给办公厅打个电话，要他们想点办法？”

文风良说：

“试试看吧。”

11月9日，毛泽东为《我们一个社要养猪两万头》一文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请尚昆办。

此文印发八届二中全会各同志阅看。请各省市区负责同志注意：如果你们同意的话，就把这篇文章印发一切农业合作社以供参考，并且仿照办理。要知道，**阳谷县是打虎英雄武松的故乡，可是这一带没有养猪的习惯。这个合作社改变了这种习惯，开始养猪，第一年失败，第二年成功，第三年发展，第四年大发展，平均每人约有两头，共计两万头**。这个合作社可以这样做，为什么别的合作社不可以这样做呢？

毛泽东 1956年11月9日

11月10日，中共中央八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84人，候补中央委员65人；列席会议的有中央和地方的有关负责人147人。

刘少奇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就时局问题作了报告，他详细叙述了代表团与苏共中央关于波兰、匈牙利问题商谈的经过和中共中央采取的方针，分析了波匈事件发生的原因，以及应当吸取的教训。

周恩来作了《1957年度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和财政预算的控制数字》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提出对1957年的基本建设规模作适当的压缩，并调整各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以适应国家的财力和物力的可能性。

11月10日下午，毛泽东秘书处派一辆小车来到西郊宾馆，来人对文风良说：

“主席今晚要接见你们，他老人家吩咐，要你先去一步。”

来人又对文涧泉、文运昌、文梅清3位老人说：

“请你们稍等一会儿，我们少顷就会来接你们。”

文风良来到了中南海，独自步入毛泽东的会客厅，见毛泽全正一个人坐在那里。毛泽全见他来了，忙起身让座。正说话间，毛泽东人未到声已至：

“嗬，风良来了。”

只见毛泽东缓步走来，文风良急步上前，双手握着毛泽东伸过来的手，恭恭敬敬地叫了一声：

“毛主席！”

毛泽全也上前向毛泽东问安。毛泽东用左右手拉着毛泽全和文风良走向他的座位，让二人坐在左右侧，给他们各送一支烟，自己也点上一支，转问文风良：

“你们来了多久？生活过得惯吗？在北京参观了哪些名胜？你涧泉伯伯他们有什么反映？”

文风良一一作了回答，并且说：

“他们说，北京是祖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这几年变化真快，他们每来一次，就有新的感觉。他们初来北京时，这里大都是四合院的平房，是一座地道的消费城市。现在北京已成为一个新型的工业城市。”

毛泽东笑着问道：

“他们还说些什么呢？”

“他们经常谈论的话题，是建国以来祖国各地和首都建设的辉煌成就，除此以外，他们没有说过其它什么了。”

毛泽东“嗯”了一声，以怀疑的口气对文风良说：

“我却不信他们就只谈这些，难道他们就没有谈论别的东西吗？”

文风良正要回答，王季范领着文涧泉、文运昌、文梅清3人进来了，他们同毛泽东一一握手，互致问候。宾主落座后，毛泽东点燃一支烟，吮了吮嘴唇，笑着说：

“听风良说，你们这次来京，游览了北京各处名胜，还有不少感想是吗？”

文涧泉说：

“是的哩，风良没有讲错。俗话说：‘乡里人上趟省，嘴巴都讲穷。’咱们这次上北京的见闻，3天3晚都讲不完呢！”

“那好啊！”毛泽东笑着说：“你们回去向乡下的亲友们演讲演讲，3天讲不完就讲4天嘛！不过，你们可要实事求是地讲。切不可讲大话吹牛皮啰。你们大家知道，解放前全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民不聊生的境地，我们从蒋介石手里接过来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既要医治战争创伤，又要恢复国民经济，一切都是要从头做起。**解放前的中国，连一架缝纫机也要靠进口，一盒火柴加洋字，说成洋火，煤油都要说成洋油，一匹机织布也要说成洋布，一双纱织袜子也要叫它洋袜子。水泥成洋泥，还有什么洋枪洋炮等等。**其实，像指南针、火药以及造纸、印刷、纺织技术都是中国发明的，输出到国外后，便变成了‘洋’的。”

他喝了一口茶，接着说道：

“新中国成立后到今天还只有7年，我们花了3年时间来恢复国民经济，1953年开始了第1个‘五年计划’，到**今年是第1个‘五年计划’的第4年，在这短短的几年中，我们的工农业、国防科技、交通运输、文教卫生等事业都已初具规模，原来靠进口的东西现在也能造了，包括飞机、火车、汽车、轮船等等**。当然我们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根本的差距。不过我们中国地大物博，人才众多，因此，我们完全有信心在不久的将来赶上他们，甚至超过他们。”

他还对文涧泉、文运昌和文梅清说：

“你们都是年逾花甲的人了，有的工作是力不从心了，可是就凭你们的一张嘴，做做宣传工作，还是完全可以胜任的。因此，你们回去后，面向群众，把你们那些3天3夜说不完的事，再加上我刚才说的那些话，向群众宣传宣传。不过，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提醒大家，我们是任重而道远的。**我们的今天来之不易，我们的事业是坚持继续革命。**还有一条，就是我先讲过的，要实事求是地讲，不说大话、空话、假话。”

时针已经指向晚上7点。一位工作人员走到毛泽东跟前说：

“请主席和客人就餐。”

毛泽东笑着说：

“今天，我特意要他们加了个燕窝汤，让大家尝尝。”

于是，大家在餐厅依次入座，毛泽全和文风良依然坐在毛泽东的两侧，负责为各位老人夹菜。

饭后，大家随毛泽东回到客厅，品尝茶点、水果。毛泽东对文风良说：

“我有一笔稿费存在中央特别会计室，我很想对唐家圫各家的老人在生活上给予一些帮助，但不知道他们的实际情况，你给我参谋参谋好吗？”

文风良如实地将文泮香十阿婆、文南松二十阿婆寡居，文涧泉十一阿公老年无伴，文梅清十七阿公和十七阿婆老年膝下无子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详细的汇报。毛泽东说：

“帮助。我看还是平均主义的好，不然他们会有意见的。”

文涧泉插话说：

“主席，你还有表兄暮陶十八老倌，他辛勤一生，现在脚残疾，家境亦不佳哩。”

毛泽东问文风良：

“这情况属实吗？”

文风良说：

“涧伯说的全是实情，暮陶十八叔勤劳节俭，可算是唐家圫的典范。”

毛泽东点头称好。文涧泉又插话说：

“主席，唐家圫的堂屋已是百年的老屋了，年久失修，堂屋中的椽木已有好几根断了，如不及时抢修，将可能酿成大患。可是唐家圫各家目前的经济状况又无力维修。”

毛泽东转向文风良询问道：

“你说呢？是不是要急于抢修？”

文风良本来觉得涧伯不应该提这些问题，见毛泽东问他，只好随声说：

“堂屋椽木多数断了，急于维修，这是实情。”

毛泽东说：

“既然如此，那么经费就由我来支付。你们回去后，好自为之。”

文梅清乘着酒兴，也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

“主席，你刚才讲到飞机，这家伙飞在天上，我们看是看见过，可硬是没有坐过哩。”

毛泽东听了，说：

“嗬！看来你们还想坐飞机啰。”

在一旁的秘书叶子龙趁机说：

“主席，正好明天有架飞机去武汉。”

毛泽东说：

“那好，明天就让他们坐飞机回去嘛！”

叶子龙又向毛泽东报告说：

“照相的来了。”

“来了就照吧。”

毛泽东说罢，起身与各位客人合影留念。他对文涧泉说：

“从乡下到我这里来的人，不要东西的还只有风良。”

他转对叶子龙吩咐：分别给文涧泉、文运昌、文梅清3位表兄每人人民币各300元；给文泮香、文南松二十阿婆和文暮陶十八阿公各200元；给文风良150元；再给堂屋维修费200元。由叶子龙点交给文风良，再由文风良转交各位老人。

此时已经将近晚上9点钟了，秘书提醒毛泽东该休息一会儿。毛泽东就对各位表兄说：

“好吧，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

客人们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和毛泽东握手告别。

次日清晨，文风良护送3位老人离开宾馆，由叶子龙陪同去机场。由于昨晚下了一场小雪，飞机不能按时起飞。叶子龙领着众人步入候机室。约一个小时后，天气转晴。忽听得机场上人声喧哗，大家临窗一看，只见周恩来站在一架大型客机的舱口，正在向为他送行的刘少奇、朱德、陈云等中央领导人挥手告别。叶子龙告诉大家说：

“今天是周总理出访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各国。”

周恩来的座机启航后不到5分钟，叶子龙把毛泽东的客人送上一架小型飞机，飞向南方。

11月12日，北京各界举行盛大的纪念孙中山诞辰90周年大会。

由于邵力子等人在筹备活动中出了很大的力，使这次纪念大会和整个纪念活动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产生了很大影响。毛泽东对邵力子做出了很高的评价。

11月12日这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参看《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毛泽东在文章中对孙中山先生的历史功绩进行了客观公正的评价，同时又写道：

“**事物总是发展的。1911年的革命，即辛亥革命，到今年，不过45年，中国的面目完全变了。再过45年，就是2001年，也就是进到21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这样。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960万平方公里土地和6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但是要谦虚。不但现在应当这样，45年之后也应当这样，永远应当这样。**中国人在国际交往方面，应当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大国主义。”**

11月13日，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小组长会议上作了简短讲话。讲话记录如下：

一、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的生产都有所增长。

二、1956年的国家建设事业是有成绩的。**1956年的基本建设投资和其他事业开支，大部分是正确的，一部分不正确。在308亿元（旧价）的预算开支中，有20亿元到30亿元用得不恰当或者用多了，**其中基本建设投资约占15亿元左右。

三、**1956年的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就业有所增加，人民是高兴的。但是，人民生活的改善，必须是渐进的，支票不可开得过多。过高的要求和暂时办不到的事情，要向人民公开的反复的解释。**

四、1957年的预算，收支各为308.65亿元（其中包括自筹资金2.15亿元。308.65亿元折合旧价为317.65亿元）。在预算支出中，经济建设支出为157.26亿元，社会文教支出为39.3亿元，国防支出为57亿元，行政支出为25亿元，债务支出为8.42亿元，援外和其他支出为6.41亿元，国家物资储备支出为5亿元，信贷资金为5亿元，总预备费为5.26亿元。在经济、文教、国防、行政支出中，基本建设投资合计为126.73亿元（折合旧价约为135.73亿元），其中自筹资金2.15亿元。1957年度预算是平衡的，但是打得较紧，并且应该使它与现金平衡相结合。

五、**钱和材料只有这样多，1957年的年度计划，在某些方面必须比1956年作适当压缩，以便既能保证重点建设，又能照顾人民生活需要。**压缩的重点在中央，地方也应尽可能地压缩。虽然如此，总的说来，我们的建设事业还是前进的，因为1957年的收支均比今年有所增加，收入增加22.5亿元，即增长8.2％；支出增加9.53亿元，即增长3.2％。**关于压缩问题，必须做到合理安排，不出乱子。物资不足，应该首先支持必要的生产，同时注意平衡。**

六、**要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发动一个增产节约运动**。增产必须在原料有保证和社会需要的条件下进行，同时必须保证质量和减少工伤事故。节约是有希望的，必须在不降低质量和减少工伤事故的条件下讲求节约。**在企业、事业和行政开支方面，必须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艰苦朴素作风，厉行节约。在生产和基本建设方面，必须节约原材料，适当降低成本和造价，厉行节约。**

七、国内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但是应该注意仍然存在的一部分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对于资产阶级分子和知识分子的旧思想和旧习惯的改造，要在巩固团结他们的方针下，继续进行长期的教育。**人民内部的问题和党内问题的解决的方法，不是采用大民主而是采用小民主。要知道，在人民方面来说，历史上一切大的民主运动，都是用来反对阶级敌人的。

在会议休息时，吴冷西走进政治局常委休息室，见毛泽东正和常委们议论铁托11月11日在南斯拉夫西部海滨城市普拉的演说。铁托在这次演说中，从匈牙利事件讲起，攻击所谓的“斯大林主义”和所谓的“斯大林主义分子”。他还说：“问题不仅仅是个人崇拜，问题是使得个人崇拜得以产生的制度”，“在于官僚主义的组织机构”。他号召把各国党内的斯大林主义分子赶下台。

毛泽东见吴冷西来了，就说要他让新华社把铁托讲话的全文译出来，还说让在座的胡乔木和吴冷西一起，研究起草文章回答铁托。

11月14日，周恩来将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小组长会议上讲话的数字核对后，退还给毛泽东。毛泽东在稿件上写了一个批语：

“即刻印发明天到会全体人员。”

11月15日，八届二中全会就要结束了，毛泽东发表了重要总结讲话，他说：

“我讲4个问题，经济问题，国际形势问题，中苏关系问题，大民主小民主问题（参看《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关于经济问题，他在谈到第1个“五年计划”和国家预算时说：

“我们对问题要做全面的分析，才能解决得妥当。进还是退，上马还是下马，都要按照辩证法。”“看电影，银幕上那些人净是那么活动，但是拿电影拷贝一看，每一小片都是不动的。《庄子》的《天下篇》说：‘飞鸟之景，未尝动也。’世界上就是这样一个辩证法：又动又不动。净是不动没有，净是动也没有。动是绝对的，静是暂时的，有条件的。”

“青年要犯错误，老年就不犯错误呀？孔夫子说，他70岁干什么都合乎客观规律了，我就不相信，那是吹牛皮。”“犯一点错误也并不坏。成绩有两重性，错误也有两重性。成绩能够鼓励人，同时会使人骄傲；错误使人倒霉，使人着急，是个敌人，同时也是我们很好的教员。”

关于中苏关系问题，毛泽东说：

“关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我想讲一点。**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哥穆尔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反所谓斯大林主义。**欧洲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也批评苏联，这个领袖就是陶里亚蒂。帝国主义也拿这把刀子杀人，杜勒斯就拿起来耍了一顿。这把刀子不是借出去的，是丢出去的。我们中国没有丢。我们第一条是保护斯大林，第二条也批评斯大林的错误，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篇文章。我们不像有些人那样，丑化斯大林，毁灭斯大林，而是按照实际情况办事。

**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大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

“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现在呢，自食其果，烧到自己头上来了。”

关于大民主小民主问题，毛泽东说：

“有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主张要大民主，说小民主不过瘾。他们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他们这种主张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缺乏阶级观点，是错误的。”

“现在再搞大民主，我也赞成。你们怕群众上街，我不怕，来他几十万也不怕。‘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是古人有言，其人叫王熙凤，又叫凤姐儿，就是她说的。无产阶级发动的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

“世界充满着矛盾。民主革命解决了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一套矛盾。现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别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来了，新的矛盾又发生了。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搞不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么，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

“这里再讲个达赖的问题。**佛菩萨死了2500年，现在达赖他们想去印度朝佛。**让他去，还是不让他去？中央认为，还是让他去好，不让他去不好。过几天他就要动身了。**劝他坐飞机，他不坐，要坐汽车，通过噶伦堡，而噶伦堡有各国的侦探，有国民党的特务。要估计到达赖可能不回来，不仅不回来，而且天天骂娘，说‘共产党侵略西藏’等等，甚至在印度宣布‘西藏独立’；他也可能指使西藏上层反动分子来一个号召，大闹起事，要把我们轰走，而他自己却说他不在那里，不负责任**。这种可能，是从坏的方面着想。出现这种坏的情况，我也高兴。**我们的西藏工委和军队要准备着，把堡垒修起来，把粮食、水多搞一点。我们就是那几个兵，横直各有各的自由，你要打，我就防，你要攻，我就守。我们总是不要先攻，先让他们攻，然后来它一个反攻，把那些进攻者狠狠打垮。跑掉一个达赖，我就伤心？再加9个，跑掉10个，我也不伤心。**我们有经验一条，就是张国焘跑了并不坏。**捆绑不成夫妻。他不爱你这个地方了，他想跑，就让他跑。**跑出去对我们有什么坏处呢？没有什么坏处，无非是骂人。我们共产党是被人家骂了35年的，无非是骂共产党‘穷凶极恶’、‘共产共妻’、‘惨无人道’那一套。加一个达赖，再加一个什么人，有什么要紧。再骂35年，还只有70年。一个人怕挨骂，我看不好。**有人怕泄露机密，张国焘还不是有那么多机密，但是没有听见因为张国焘泄露机密，我们的事情办坏了。**”

“我们党有成百万有经验的干部。我们这些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是土生土长，联系群众，经过长期斗争考验的。我们有这么一套干部：有建党时期的，有北伐战争时期的，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有抗日战争时期的，有解放战争时期的，有全国解放以后的，他们都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产。东欧一些国家不很稳，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没有这样一套干部。**我们有在不同革命时期经过考验的这样一套干部，就可以‘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要有这个信心。”**

“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

“**我赞成在和平时期逐步缩小军队干部跟军队以外干部的薪水差额，但不是完全平均主义。我是历来主张军队要艰苦奋斗，要成为模范的**。1949年在这个地方开会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将军主张军队要增加薪水，有许多同志赞成，我就反对。他举的例子是资本家吃饭5个碗，解放军吃饭是盐水加一点酸菜，他说这不行。我说这恰恰是好事。你是5个碗，我们吃酸菜。这个酸菜里面就出政治，就出模范。解放军得人心就是这个酸菜，当然，还有别的。现在部队的伙食改善了，已经比专吃酸菜有所不同了。但根本的是我们要提倡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辽西战役的时候，正是秋天，老百姓家里很多苹果，我们战士一个都不去拿。我看了那个消息很感动。**在这个问题上，战士们自觉地认为：不吃是很高尚的，而吃了是很卑鄙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苹果。我们的纪律就建筑在这个自觉性上边。这是我们党的领导和教育的结果。**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是由这里头出来的。**一个苹果不吃，饿死人没有呢？没有饿死，还有小米加酸菜。**在必要的时候，在座的同志们要住棚子。在过草地的时候，没有棚子都可以住，现在有棚子为什么不可以住？军队这几天开会，他们慷慨激昂，愿意克己节省。军队这样，其他的人更要艰苦奋斗。**不然，军队就将你的军了。在座的有文有武，我们拿武来将文。解放军是一个好军队，我是很喜欢这个军队的。”

八届二中全会决定：增补黄克诚、粟裕、陈赓、谭政、萧劲光、王树声、许光达、萧华、刘亚楼、洪学智为中共中央军委委员。

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确定从1957年下半年起，开展党内整风运动：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

这次全会未作正式决议，会后发表了公报。

欲知八届二中全会后毛泽东如何继续处理国际关系？请看下一章详细叙述。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说到“军队要艰苦奋斗，要成为模范的”话题时，强调“**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这个真理一万年也不会过时！而反对他的人，看重的基本上都是物质刺激的作用。二者相较，的确有天壤之别！如果认真地将毛泽东时代人人比奉献的社会新风尚，与**资本主义社会物欲横流**的丑恶现象做一比对，就不难明白这个道理。

**第29章**

**“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方法竟在你们党内，在全国各地工商业者之**

**间，在高级知识分子之间行通了，并且做得日益健全，真是好消息。”**

话说1956年11月16日，全国人大第51次常委会决定，任命聂荣臻为国务院副总理，主管科学技术工作。

在全国人大开会期间，毛泽东约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邓宝珊到寓所吃饭长谈。邓宝珊自建国后每到北京开会，毛泽东总要在中南海约见他。这一次，毛泽东还是以老朋友相待，两人从中苏关系、高饶事件到甘肃省的工作，一直谈到深夜。邓宝珊就苏共20大全面否定斯大林一事问毛泽东说：

“您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

毛泽东说：

“斯大林功大于过，应该三七开，全面否定是错误的。”

邓宝珊点点头表示赞赏。毛泽东喝了一口酒，问道：

“听说邓先生对镇反运动中镇压了国民党甘肃省教育厅厅长宋恪有意见？”

邓宝珊坦率地说：

“这个人本来是可杀可不杀的。”

毛泽东说：

“邓先生，你应该提前给我说，就能把这个人留下了。”

邓宝珊说：

“我不在兰州，未能及时得知啊。”

毛泽东说：

“人的脑袋只有一个，现在已经人头落地，无法弥补了。以后有事，提前直接跟我讲。”

11月24日晚，毛泽东在颐年堂西边的小会议厅里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对国际形势的估计，分析铁托11月11日的演说和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对它的评论。

此后，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差不多每天晚上都要召开，只隔了26日、28日两个晚上，直到30日，一共开了5次常委扩大会议。这几次会议大多是在菊香书屋毛泽东的卧室里开的。毛泽东在他的卧室里开会时，通常都是穿着睡衣靠着床头，半躺在床上，其他常委在他的床前围成半圆形。参加会议的人包括列席人员，一般在10人左右，他们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张闻天、王稼祥、陈伯达、胡乔木、吴冷西。这些会议，朱德因年纪大，一般不参加；陈云和林彪也没有参加。毛泽东在会议上针对南斯拉夫铁托的观点分析说：

“所谓斯大林主义，无非是斯大林的思想和观点。所谓斯大林主义分子，也无非是指赞同斯大林的人。那么请问，斯大林的思想和观点怎样？我们认为斯大林的思想和观点基本上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虽然其中有些错误，但主要方面是正确的。斯大林的错误是次要的。因此，**所谓斯大林主义，基本上是正确的；所谓斯大林主义分子，基本上也是正确的，他们是有缺点有错误的共产党人，是犯错误的好人。必须把铁托的观点彻底驳倒，否则共产主义队伍就要分裂，自家人打自家人。**斯大林主义非保持不可，纠正他的缺点和错误，就是好东西。这把刀子不能丢掉。”

在大家广泛地讨论后，毛泽东提出了一些意见，他说：

“第一、十月革命的道路是各国革命的共同道路，它不是个别民族现象，而是具有时代特征的国际现象。谁不走十月革命道路，谁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第二、各国有不同的具体情况，因此，各国要用不同方法解决各自的问题。这正如每个人的面目不一样，每棵树长得也不一样。要有个性，没有个性，此路不通。但**条条道路通莫斯科。所有道路都有它们的共性，这就是苏联的基本经验，即十月革命的道路。**

第三、**苏联建设时期，斯大林的基本路线、方针是正确的，应加以明确的肯定。**他有缺点错误是难免的，可以理解的。斯大林过分强调专政，破坏了一部分法制，但他没有破坏全部法制，破坏了部分宪法，但没有破坏全部宪法，民法、刑法也没有全部破坏，专政基本上还是对的。民主不够，但也有苏维埃民主。有缺点，有官僚主义，但**他终究把苏联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国家，毕竟打败了希特勒**。如果都是官僚主义，都是官僚机构，能够取得这么大的成功吗？说苏联都是官僚阶层是不能说服人的。

第四、区别敌我矛盾，不能用对待敌人的方法对待自己的同志。斯大林过去对南斯拉夫犯了错误，把对待敌人的方法对待铁托同志。但后来苏共改正了，用对待自己同志的方法对待铁托同志，改善了苏南关系。**现在铁托同志不能采取过去斯大林对他的方法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在我们共产党人之间，在社会主义社会内部，存在着矛盾，这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处理敌对矛盾的方法处理。**

我们下一篇文章的题目，可以考虑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口号，现在仍有重大现实意义。我们的目的是加强全世界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人的团结。现在还是离不开斯大林问题。”

毛泽东越说语调越深沉，他说：

“我一生写过3篇歌颂斯大林的文章。头两篇都是祝寿的，第1篇在延安，1939年斯大林60寿辰时写的；第2篇在莫斯科，是1949年他70大寿时的祝辞。第3篇是斯大林去世之后写的，发表在苏联真理报上，是悼辞。这3篇文章，老实说，我都不愿意写。从感情上来说我不愿意写，但从理智上来说，又不能不写，而且不能不那样写。我这个人不愿意人家向我祝寿，也不愿意向别人祝寿。

第1篇我抛弃个人感情，向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祝寿。如果讲个人感情，我想起第1次王明‘左’倾路线和第2次王明右倾路线，都是斯大林制定和支持的，想起来就有气。但我以大局为重，因为那时欧战已经爆发，苏联为和缓苏德关系而同希特勒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受到西方国家舆论的攻击，很需要我们支持。因此那篇文章写得有生气。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发动内战，斯大林要我们不要自卫反击，否则中华民族会毁灭。新中国成立之后，斯大林还怀疑我们是不是第二个铁托。1949年我去莫斯科祝贺斯大林70大寿，不歌颂他难道骂他吗？我致了祝词，但斯大林仍对我们很冷淡。后来我生气了，大发了一顿脾气，他才同意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

斯大林去世以后，苏联需要我们支持，我们也需要苏联支持，于是我写了一篇歌功颂德的悼文。**斯大林一生，当然是丰功伟绩，这是主要的一面，但还有次要的一面，他有缺点和错误。但在当时情况下，我们不宜大讲他的错误，因为这不仅是对斯大林个人的问题，更主要的是对苏联人民和苏联党的问题，所以还是理智地那样写了。**

现在情况不同了，赫鲁晓夫已经揭了盖子，我们在4月间的文章，就不单是歌功颂德，而是既肯定了斯大林主要的正确的方面，又批评他次要的错误方面，但并没有展开讲。现在要写第2篇文章，就是进一步把问题讲透，既肯定他的功绩，也分析他的错误，但又不是和盘托出，而是留有余地。以上意见请大家考虑。过几天再来讨论。请乔木同志先起草一个提纲给我看看。”

11月30日，毛泽东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他说：

“斯大林同志执政时期的根本方针和路线是正确的，不能用对待敌人的方法对待自己的同志。”

毛泽东在谈到中苏关系时，吟咏了清朝人张英写给家人的那首诗中的后两句：

“万里长城今尚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张英在这首诗中，劝解家人不要与邻家争地界，诗中前两句是：“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

毛泽东吟罢未作解释，翻译也是直译。恐怕尤金大使未必能够真正理解毛泽东的意思。

1956年12月2日晚上，毛泽东在颐年堂西边小会议厅召集刘少奇、陈云、陆定一、王稼祥、杨尚昆、胡乔木、吴冷西开会，他一开始就准备要写的第2篇文章发表了意见，他说：

“文章的题目可以仍然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也可以考虑同4月间写的文章衔接，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表明我们的观点是一贯的，是4月间文章的续篇。乔木同志拟的提纲使我的想法进了一步，整篇文章可以更富理论色彩，但政论的形式不变。

1、要讲世界革命的基本规律、共同道路。先讲一定要遵循十月革命的基本规律，然后讲各国革命的具体道路，讲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各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二者不可偏废，但十月革命的基本规律是共同的。

2、讲清楚什么是‘斯大林主义’，为什么把共产党人分为‘斯大林分子’和‘非斯大林分子’是错误的。**应明确指出，如果要讲‘斯大林主义’，那他就是马克思主义，确切地说是有缺点的马克思主义**。**所谓‘非斯大林主义化’就是非马克思主义化，就是搞修正主义。**

3、**讲清沙文主义。大国有沙文主义，小国也有沙文主义。**大国有大国的沙文主义，小国对比自己小的国家也有大国沙文主义。要提倡国际主义，反对民族主义。

4、首先要分清敌我，然后在自己内部分清是非。整篇文章可以从国际形势讲起，讲苏波关系、匈牙利事件，也讲英法侵略埃及事件。要分清两种事件的性质根本不同，说明当前反苏、反共浪潮是国际范围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的表现。要区别敌我矛盾和我们内部是非这两者性质的不同，要采取不同的方针和不同的解决方法。

5、**既要反对教条主义，也要反对修正主义**。要指出，斯大林的著作仍然要学，苏联的先进经验还要学，但不能用教条主义的方法学。可以讲中国共产党吃过教条主义的大亏，不讲别人如何。**我们党一贯反对教条主义，同时也反对修正主义**。**苏共二十大，大反斯大林的某些观点和做法，助长了国际范围内修正主义的泛滥。**

6、文章从团结讲起，以团结结束。没有理由不团结，没有理由不克服妨碍团结的混乱思想。

整篇文章包含着肯定与否定这两个方面，肯定正确的，否定错误的。**对敌对营垒好办，问题是内部是非，要讲究方法。比如对斯大林和铁托，都要加以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我们的批评要合乎实际，有分析，还要留有余地。**这里用得着中国古人做文章的方法，一个叫作‘欲抑先扬’，一个叫作‘欲扬先抑’。所谓‘欲抑先扬’，就是说，你要批评他的错误时，先肯定他的正确方面，因为批评的目的还是要他变好，达到团结的目的。对铁托适宜采取这个方法。对于斯大林，现在世界上都骂斯大林，我们要维护他，方法宜于‘先抑后扬’，即在论述他的功绩以回答对他的全盘否定时，先要讲斯大林有哪些错误，这样才能说服人，使人易于接受。**”

毛泽东讲完了，征求大家的意见，与会者无不赞成毛泽东的思路。于是，毛泽东说：

“那好！就由乔木同志和冷西同志负责起草这篇文章，家英同志也参加。在12月12日以前写出初稿。”

这是冬季的一个星期天，天刚刚下过大雪。李敏正在复习功课，江青把她叫到自己的房间里，对她说：

“娇娇，我想让工作人员给你爸爸做个丝绵背心。刚才征求你爸爸的意见，你爸爸生气了，发脾气了，说不让做，你去劝劝他吧。”

李敏说：

“您们间的事儿，我怎么能管呀！”

江青说：

“你爸爸听你的，还是你去劝劝好。”

李敏点点头出了房间，心想：我去劝也准会碰钉子。平时，李敏到爸爸的房间，都是爸爸叫她去的；她要找爸爸，都要经过卫士通报一声，得到允许后，才能进爸爸的房间。这一次，李敏是江青叫她来的，所以就直接进了爸爸的房间。

“爸爸，您好！您……”

“哪个要你来的？”

毛泽东坐在沙发上，生气地说。

“是江妈妈叫我来的。她说……”

“她叫你来干什么？”毛泽东站起来说：“走。你跟我走。”

李敏不知道爸爸要干什么去，赶忙帮助爸爸把棉大衣穿上，把帽子递给爸爸。毛泽东顺手把长长的灰色围巾拿来，折叠一下，用左手一撑 ，右手一套，左手一拽，在脖子上套好，拉着李敏就往外走。父女俩并排走出院子，漫步在南海的岸边，雪在他们的脚下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

“你看，我穿着毛衣毛裤，又穿着棉大衣，冷吗？还做什么衣服！你莫听她的。**莫要把自己搞得那么富嘛。能吃饱能穿暖就满不错了嘛。莫搞特殊！”**

李敏见爸爸已经知道自己的来意，也就没有再劝他。她陪着爸爸慢慢地走着。毛泽东最喜欢雪，此时，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望着茫茫雪海，心情舒畅了。李敏回头看见卫士站在离她和爸爸不远的地方，就指着卫士说：

“爸爸，他们还在那儿等着哩。”

“走，我们该打道回府了。”毛泽东说罢拉着李敏，笑着向卫士们走去，还关切地说：“我的娇娃受冻了。”

他伸出右臂，揽着李敏往前走。

此后，毛泽东在散步时问卫士长李银桥：

“你的感觉是李敏好，还是李讷好呢？”

李银桥说：

“都很好，她们没有某些高干子女那种容易表现出的优越感，她们要求自己严格，有上进心。”

毛泽东摇了摇头说：

“我看她们不如你们有出息，也不如你们有前途。她们比你们吃的苦少，能吃苦的人才能有出息。”

李银桥说：

“主席，你还想叫孩子们怎么吃苦？她们可是比普通人家的子女吃苦多多了！”

毛泽东又摇摇头，说：

“你说得不对。**你讲吃苦的时候思想不对头，因为你首先想到她们是我的女儿，所以你给她们定了一个不同于一般人家子女的标准。**她们不就是吃大食堂吗？大食堂的伙食要比多数农民家的伙食好，难道不是这样吗？”

李银桥说：

“主席，你总找低的比，这不公平。城里人家大多数未必比学校食堂伙食差，我家里就比大食堂的伙食好。”

毛泽东笑着说：

“你为革命作了贡献嘛，吃好点人民没意见。她们还没有作贡献呢。**人哪，生活上还是跟低的比有好处。不比贡献比享受，那就是没出息了。”**

12月初，毛泽东接到黄炎培一封来信。黄炎培在信中汇报说，中国民主建国会在11月5日至16日召开了一届二中全会，他在会议上号召工商界和民建，以亲密的伙伴关系，帮助、团结、教育民族工商业者，认真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与会者在讨论中，对一些原则问题辩论得很热烈，进行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最后在思想上取得了一致。

12月4日。毛泽东给黄炎培复了一封信，他写道：

任之先生：

惠书敬悉。你们的会议开得很好，谨致祝贺之忱！

**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方法竟在你们党内，在全国各地工商业者之间，在高级知识分子之间行通了，并且做得日益健全，真是好消息。**社会总是充满着矛盾。即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不过矛盾的性质和阶级社会有所不同罢了。既有矛盾就要求揭露和解决。有两种揭露和解决的方法：一种是对敌（这说的是特务破坏分子）我之间的，一种是对人民内部的（包括党派内部的，党派与党派之间的）。前者是用镇压的方法，后者是用说服的方法，即批评的方法。**我们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即是说还没完全解决，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还将在一个长时期内存在。另外，还有少数特务分子也将在一个长时期内存在）**，所有人民应当团结起来。但是人民内部的问题仍将层出不穷，解决的方法，就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这样一种方法。我高兴地听到民建会这样开会法，我希望凡有问题的地方都用这样方法。

国际间麻烦问题不少，但是总有办法解决的。我是乐观主义者，我想先生也会是这样的。

顺致敬意！

毛泽东 1956年12月4日

毛泽东又附笔道：去年（应为前年，即1954年——笔者注）和今年各填了一首词，录陈审正，以答先生历次赠诗的雅意。（以下略）

毛泽东书赠黄炎培的两首词，一是《浪淘沙·北戴河》，一是《水调歌头·长江》。

12月5日凌晨，毛泽东给周世钊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惇元兄：

两次惠书均已收到。情意拳拳，极为高兴。告知我省察情形，尤为有益。校牌仍未写，因提不起这个心情，但却时常在念，总有一天要交账的。时常记得秋风过许昌之句（指周世钊在1950年赴京途中所作的《五律·过许昌》——笔者注），无以为答。今年游长江，填了一首《水调歌头》，录陈审正。

（诗词内容不再赘述，故略去——笔者注）

暂时不会出国门，你们的意见是正确的。问好！

毛泽东 1956年12月5日

现存的《水调歌头·长江》的手稿，就是毛泽东在这封信中书写的。后来在1957年1月由《诗刊》发表该词时，毛泽东将题目改为《水调歌头·游泳》。

12月5日晚8时，毛远耀、胡觉民夫妇和儿子毛臻及毛远耀的胞弟毛远翔一行人来到了中南海颐年堂，等候毛泽东接见。

毛远翔是赴京参加全国工商企业公私合营代表大会的。毛臻则是由沈阳黎明机械厂派到北京航空学院进修的。

晚9时许，毛远耀等人走进大厅，毛泽东刚送走陈叔通，正在那里等候他们。

“主席！”“三叔！”

毛远耀等人喊道。毛泽东身穿棕色呢大衣，满面笑容，神采奕奕地向他们走来，同他们亲切握手。毛远翔自我介绍说：

“三叔，我是远翔。”

毛泽东欣喜地笑道：

“呵，你是远翔，我看到了你的照片和信，好，好！”

毛泽东和客人离开大厅，走进一间简朴的小客厅，毛远耀、毛臻坐在毛泽东身边的沙发上，胡觉民和毛远翔侧坐在毛泽东的对面。毛泽东向在座的杨得志将军作了介绍后，又对毛臻说：

“世美啊，你怎么几年了才到北京来一次？怎么不来看我呀？”

毛泽东又询问了他们的工作情况，说：

“你们几个人都很年轻，世美才28岁，远翔才20出头，远耀和觉民才40多岁。你们正值年富力强精力充沛的时期，应该好好学习，增长知识才干，为祖国的建设多出力。你们可以学学外文。目前，我正在学习英语哩。”

毛泽东指着刚进屋的秘书林克说：

“这是我请来的英语老师！”

林克听毛泽东这样说，连忙向客人们点头致意。毛臻说：

“我也在学外语。”

毛泽东说：

“好，好。”

毛泽东听说毛臻在大连工农速成中学读书时，与杨开英过从甚多，就询问了杨开英的情况。毛臻说：杨开英已经调任大连第三中学副教导主任，现在病情不轻，经济拮据，生活艰难。

原来，杨开英自从离开北京后，因为不愿打扰毛泽东，就很少给毛泽东写信。毛泽东对杨开慧、杨开明的这位妹妹很是牵挂。听说她现在是如此境遇，非常挂念。

毛泽东又问起了家乡的情况。他对毛远翔说：

“你父亲我还有印象，智珠兄1951年来北京住过一个时期，还去过秦皇岛。你母亲是什么样子，我记不太清楚了。后来，接到你寄来的照片，我才记起来了，她是一个非常忠厚的人。我很想回去看看，我去了一定请乡亲们的客。不过，请客没有那么大的地方摆宴席啰。”

毛泽东说完，发出了爽朗的笑声。他又问道：

“你们去过乡下不？”

毛远翔说：

“去过。”

毛泽东问：

“那里的情况到底如何？”

毛远耀说：

“农民生产搞得不错，生活水平也有了提高。”

毛泽东问：

“那么，合作化要不要搞？猪和鸡是分散喂好，还是集中喂好？”

时间已到了晚上11点，工作人员说饭菜做好了，毛泽东就请大家吃饭。他拿起一瓶葡萄酒为大家敬酒，举杯祝几个晚辈工作好，身体好。毛远翔不会喝酒，还是勉强喝了。几个晚辈端起酒杯，齐声祝毛泽东健康长寿。毛远翔一边吃饭，一边说：

“主席，您老人家说话，还是韶山腔。”

毛泽东幽默地说：

“我是个老顽固分子，保守党人。”

饭后，毛泽东让大家吃蜜桔，他逗着几位晚辈说：

**“我们是穷人出身，过去吃不到水果，现在翻了身，也要讲究饮食卫生。吃点水果，好助消化。”**

毛泽东的谈兴正浓，他兴奋地说：

“如今城里搞了公私合营，资本家翻不起来了；农村里搞了合作化，地主富农也翻不起来了。这种做法的结果，就是消灭阶级，使大家共同富裕。经济问题要全面分析。有人提出：我们是上马还是下马？我说：走路总是一脚在前，一脚在后，绝无两脚一并前进，是有进有退的，但主要的是前进，波浪式的。上马多，下马少……”

他还说：

“任何事物都有统一性和独立性，……成绩也有两重性，好的一面是做出了成绩，不好的一面是做出了成绩会使人骄傲。缺点也有两重性，好的一面是总结了教训，能使人进步；不好的一面是弄坏了事情。”

他最后好像是要告诫几位晚辈，他说：

“**一个人要有帮助人的思想，缺乏帮助人的思想，是不正派的人**。别人犯了错误，你不去帮助，还去幸灾乐祸，是错误的！没有犯过错误的人，倒是容易犯错误，因为他的尾巴翘得太高了。我们要注意。**对犯错误的人，不要整得太过分，否则会整到自己头上来。好意对待犯错误的人，可以得人心，可以团结人。**对犯错误的人，究竟采取什么态度？是敌视还是帮助？这是区别一个人是好心还是坏心的标志。

孔夫子说七十不逾矩，我说，不一定。因为一个人的经验总是不足的。孔夫子又说，三十而立，我说，也靠不住，一些年轻人，三十几岁还吊儿郎当。你们要好好学习，努力工作。**人在世上要多做点有益的事情，有益于社会和人民，要懂得，每个人天天都在写着自己的历史，这历史的好坏，全在于自己而不在于他人。”**

时间已到了凌晨3点，秘书进来提醒毛泽东休息。毛远耀等人只好起身告辞。毛泽东披了件大衣，笑着和大家道别，一直送到大门口，直到毛远耀等人上了车。

12月7日下午，毛泽东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进行了座谈。

原来，在私营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政府对资本家们的资产和负债，根据“公平合理，实事求是”原则，进行了清理和估价，将其核定为资本家的私股股额，并按年息5%的利率发给他们这些股东们定息。此时，资本家心存顾虑，不知定息能拿几年。毛泽东在12月5日已经召见了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听取了他们的意见。所以他在7日的谈话中，开门见山，一开始便说：

“大家提了一些问题，现在我讲一讲。

在1955年10月的工商界座谈会上，我曾说：《打渔杀家》中的萧桂英临走时还爱惜家具是有道理的。后来我去济南、徐州调查，还到曲阜、宿县、蚌埠、南京、苏州、上海、松江、杭州等地调查，他们说，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部完成，不是到1962年的问题，几个月就差不多了。上海的马天水说，工商界两头小，中间大，先进的、中间的、落后的各占20%、60%、20%。苏州的一位女副市长，她先讲工商界有4条优点，再说缺点，先鼓励后批评，又鼓励又批评，很好。据山东济南对2600个工商户的统计，先进的占25%，中间的占50%，落后的占25%。当地的同志还很不满意，说中间的、落后的这么多。我就很满意，落后的只有25%嘛。今年1月杭州会议上，发现了‘三反’、‘五反’以后大家心里有些害怕。”

“定息拿多长的时间？这个问题，应当说‘八大’已经解决了。七年之病，三年之艾。原则是要解决问题，时间服从原则。这问题处理得好坏，影响资产阶级、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宗教界、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在国际上也有影响。**共产党不想在这上面省几个钱，要说服工人，向他们说明定息的时间长比短好。可以虎头蛇尾，七年虎头，五年蛇尾，到第3个‘五年计划’。如果还需要延长，到第4个‘五年计划’还可以拖下去。”**

12月8日下午，毛泽东第3次召见全国工商联代表人士座谈，他在谈话中说：

“今天你们提出的许多问题，很好，对我帮助很大。你们要解决的问题，政府会和你们商量，协商一个办法。凡是能够解决的总要解决。有些问题我没有研究，不能答复。你们把问题都提出来，政府来研究，陈云副总理来考虑，解决一些能够解决的问题。

我看公私合营以来，工商界有很大进步，我们感觉比过去更加熟悉了，更加靠拢了。公私合营以后，资本家只剩下了定息问题，在社会上的名誉也不同了，并且学习的热情很高，学习政治，学习本事，学习技术和管理方法。听说各地都办了学习班，每个城市一期有几百人，上海一期有9000人，10期就有90000人，学习班里大中小资本家都有。这表现出很大的爱国主义，愿意为新的国家做工作。**我对资本家的看法比过去有了进步，从前认为改造很困难，你们自己也可能没料到变化会这样快，学习中还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去年工商联开会时，许多人作了自我检讨。自我批评是我们共产党的办法，后来想在民主党派中试行。现在民主党派内搞开了，民建最近的一次会议，也用了这个办法，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人民内部解决问题的方法。**共产党、政府、民主党派、工人、农民、工商界，**包括恢复了选举权的地主，都属于人民内部**。在人民内部，有缺点，有问题，要从团结出发，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提出意见，提出要求，解决问题，达到团结。”

“**关于定息的时间问题，大家很关心。解决这个问题有一个原则，就是要解决问题，不要损害资本家的利益，特别是不要损害大资本家的利益。**”

**“定息到底搞多长时间，中共中央讨论过，认为时间太短了不好，赎买就要真正地赎买，不是欺骗的。花不了多少钱。有人问究竟还有多少年？大家都很关心。我们以7年为期。”**

毛泽东掰着指头一个一个数：

“即今年、明年、加上第2个‘五年计划’共计7年。”“我说还可以拖一个尾巴，拖到第3个‘五年计划’，你们看怎么样？7年是虎头虎身，如果还没有解决问题，还可以拖长一点，**总要天理人情讲得过去。**”

后来，据1956年底统计，领取定息的私股股东共有114万人，国家共为定息支付1亿2千万元。毛泽东高兴地说：

**“出这么一点钱，就买了这样一个阶级。”**

**7年过后，国务院又宣布说，从1963年起，延长3年，到期再议。后来到1969年9月，终于停止了支付定息。**此是后事。

欲知此后毛泽东的注意力转向了哪里？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56年12月上旬一连召开3次民建和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座谈会，认真地听取他们的意见，解决大、中、小资本家在社会主义改造后拿年息5%利率方面的顾虑。他一再说：“**共产党不想在这上面省几个钱，要说服工人，向他们说明定息的时间长比短好。”“**今年、明年、加上第二个‘五年计划’共计7年。”“我说还可以**拖一个尾巴，拖到第3个‘五年计划’**。”后来，在原定的**7年付息后，国务院宣布说，从1963年起，延长3年，到期再议。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又再次延期。两次延期又是7年。直到1969年9月**（前后共计14年）**，最终停止了支付定息。**这的确是一个讲诚信的好榜样！**人无信无以立身，党无信无以立业。**后人应当好好学习老前辈！

**第30章**

“**由于对斯大林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并提出了反对‘斯大林主义’的错误**

**口号，从而助长了修正主义思潮的发展。这种修正主义思潮，是有利于帝国**

**主义对于共产主义运动的进攻的。帝国主义也正是利用这种思潮向社会主义**

**进攻。我们在坚决反对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坚决反对修正主义。**”

话说1956年12月10日上午，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里来了两位客人，一位是来自湖南的老年学者、毛泽东在湖南一师读书时的同学、现任南京师范学院教授熊子容；另一位是周文楠后来的丈夫王英樵。

王英樵在1940年任延安保育院小学部教导主任，后任校长。保育院小学是一所干部子弟学校，毛泽东为保育院小学题写了一个很有趣的词，他写的是：“又学习，又玩耍”。朱德、张闻天、任弼时也都为保育院小学题了词。中央领导、部队领导和烈士的子女，像毛泽东的侄儿毛华初、侄女毛远志，刘少奇的儿子刘允斌、女儿刘爱琴，李维汉的儿子李铁映，方志敏的儿子方宁柏、方宁竹等人，均在这里学习过。

王英樵后来在1942年春天与边区政府干休所党支部书记周文楠结婚。1945年9月，王英樵、周文楠携女儿王肯随西北局和抗大干部队伍奔赴东北。1954年，王英樵任哈尔滨城市建设局局长兼党组书记。他这次是在1956年11月来北京参加全国城市建设工作会议的。行前，他的岳母周陈轩和妻子周文楠、还有到哈尔滨作客的毛泽民遗孀王淑兰商量，一起联名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她们在信中说：王英樵系周文楠的丈夫，现在哈尔滨市城建局工作，他过去在延安工作过，主席的侄儿毛华初、侄女毛远志都跟他念过书。现在来北京开会，特托他带上几斤东北兴凯湖特产烟熏马哈鱼，让主席尝尝。主席如有时间，希望能接见他一下。

王英樵到北京后，住在西郊宾馆，他先去拜访王季范，王季范去海南视察去了，王季范的儿媳萧凤林接待了他，并将王英樵带来的信及礼物转送到中南海菊香书屋。12月8日，城建会议一结束，中南海即给王季范家里打电话说，毛泽东9日接见王英樵。王英樵因外出，未接到电话。12月9日上午，中南海又给王季范家里打来电话，王英樵又外出了。9日晚，中南海第3次打来电话，要王英樵于10日上午11点在宾馆等候，有车来接。在西郊宾馆住着的还有前边说过的熊子容教授，他是专程来看望老同学的。就这样，王英樵和熊子容一起来到了菊香书屋。毛泽东的秘书看了看表，说：

“主席现在有事，大约等15分钟，就可以出来接见你们。主席的时间安排得很紧，往往过了20分钟就接见不上了。”

王英樵打量着会客厅里的陈设，只见靠后墙摆着一张条几，两边摆了6把椅子，两头各放了一盆君子兰，靠西侧还放了两套沙发。整个屋子显得简单朴素。

过了十几分钟，毛泽东从会客厅后边的房子里出来了，他一见王英樵和熊子容，就亲切地和他们握手，满面笑容地说：

“你们来了，坐下，坐下。”

二人有些拘谨，说：

“请主席先坐。”

毛泽东说：

“你们还是些知识分子的习气，坐下吧。”

宾主落座后，毛泽东问王英樵：

“你在延安工作过，那时干什么工作呀？”

王英樵说：

“在延安保育小学当教员。”

“那我们还是同行哩！”

“您是主席，怎么和我是同行呢？”

毛泽东笑了，他说：

“你不知道，熊教授可知道哩。当年我在长沙工作时，在湖南第一师范附小当过教员。不过，那是几十年前的事了，比你在延安保小当教员的时候，要早得多啰。”

毛泽东又问起王英樵家人的情况：

“你岳母周外婆身体还好吗？生活有困难没有？”

王英樵说：

“周外婆今年90岁了，身体无大病，精神很好。我和周文楠工资收入不低，也只有一个女孩，没有什么困难。”

毛泽东听了，满意地点点头，转身对熊子容介绍说：

“周外婆叫周陈轩，是周文楠的母亲。她带着毛泽覃的儿子毛楚雄，在韶山住过十多年。1950年我写信给周文楠，赞成她接老人到东北去住。老人抚育革命后代呕心沥血，历尽苦辛，生活很艰苦，在韶山人民中很有威望，韶山人民都称赞她是一位很好的老人。”

毛泽东又嘱咐王英樵，好好照顾周外婆的生活，让她安度晚年。接着问熊子容说：

“你是留学美国的，在美国学什么？”

熊子容说：

“我在美国学的是资产阶级形式逻辑——哲学。”

毛泽东幽默地说：

“我是搞唯物主义——辩证法的。那咱们两个还是对立面的呀！最近，国际上发生了些变化，在匈牙利发生了暴乱。对这一事件，你们怎么看呀？”

毛泽东见对方没有回答，就接着说：

“你们一定认为是坏事。我认为是好事。因为坏事可以变好事嘛。我们也可借鉴，从中吸取教训。”

熊子容没有接毛泽东的话茬，而是提出另一个话题。他说：

“中国人口增长太快，应该提倡晚婚，修改婚姻法。因为建国初期婚姻法规定，结婚年龄是男20、女18，这不利于节制人口的增长。”

毛泽东笑了笑，指着身边的秘书说：

“你问他同意不同意？他今年24岁，已经结婚有小孩了。”

熊子容仍坚持自己的见解，他说：

“最好提倡晚婚，男的二十五六结婚，女的二十三四结婚为好。”

毛泽东因为话不投机，就没有吱声。王英樵为了打破尴尬，就说：

“我从哈尔滨来时，给主席带了点东北特产马哈鱼，不知主席看到没有？”

毛泽东点点头，问：

“是不是日本向苏联出口的那种鱼呀？”

“是的。”王英樵回答后又说：“我给主席带了一本关于哈尔滨新修的儿童铁路的画册，不知主席看到没有？”

毛泽东说：

“看到了，这是全国第一条儿童铁路呀。你们是不是学习苏联的？”

“是的，是利用林区作废的小铁路改造的。”

接见时间已经过了半个小时，快到12点了。王英樵就说：

“主席很忙，耽误了主席的时间，我们告辞了。”

毛泽东挽留道：

“不要走了，午间就在这里吃饭。”

中央办公厅秘书处长叶子龙也说：

“主席请你们在这里吃午饭，已经准备好了，不要走了。”

王英樵、熊子容跟着毛泽东来到了小餐厅，毛泽东让两位客人坐上座，两人让毛泽东坐上座，毛泽东说什么也不坐上座，两位客人也不好意思坐上座。叶子龙说：

“你们是客人，主席让你们坐，就坐下吧。”

宾主这才在餐桌边坐下来。餐厅坐东朝西，四方餐桌摆在餐厅正中，熊子容坐在东边，毛泽东坐南边，王英樵坐北边，叶子龙坐西边。桌子上摆着4菜1汤：一碗红烧肉，一碗清蒸鱼，两碗素菜和一碗汤；还有一碟辣椒，两盘桔子、苹果，每人一杯葡萄酒；饭是两样，1盘大米饭，1盘馒头。

毛泽东一边吃饭，一边不断地向客人让菜、敬酒。他的口味不错，大块的肉和鱼，吃得津津有味。还兴致勃勃地问叶子龙：

“带来的马哈鱼怎么没有吃呀？”

叶子龙说：

“马哈鱼是熏成的，所以没有吃。”

饭罢，宾主洗了手，王英樵、熊子容请毛泽东休息，毛泽东也不推辞，把二人送出了会客厅门外，嘱咐秘书把客人送回宾馆。

12月10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由胡乔木、吴冷西和田家英写出的第2篇文章初稿。

12月13日，毛泽东在给杨开智的复信中写道：

子珍兄：

历次惠书并寄照片均已收到，甚谢。敬问老太太及阖家安吉。

毛泽东 1956年12月13日

12月13日下午，毛泽东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再次讨论由胡乔木、吴冷西和田家英写出的第2篇文章初稿，与会者提出不少意见，主要是正面阐述不充分，辩解过多。

后来胡乔木、吴冷西和田家英根据大家的意见，又用了四五天的时间才拿出了修改稿。

12月16日，毛泽东给杨开慧的堂妹杨开英写了一封信，同时寄去200元钱。他在信中写道：

开英同志：

很久以前接你一信，甚为高兴，拖延未复，以后查不到你的地址了。近日毛世美他们来看我，知道你在大连的育英中学做教务长，又说你患肺病，甚为系念。寄上一点钱以供医药之用。如有所需，希望告我。我的情况尚好。杨老太太及杨子珍夫妇和我仍有联系。便时望以你的情况见告。

祝好！

毛泽东 1956年12月16日

12月16日，毛泽东在修改中央给西藏工委的复电中加写了一段话，他写的是：

“改革一定要得到达赖、班禅和僧侣领导人的同意，要各方条件成熟，方能实行。**现在无论上层和人民条件都不成熟，所以目前几年都不能实行改革，中央认为第2个‘五年计划’时期是不能实行的，第3个‘五年计划’时期也还要看情况如何才能决定。**”“目前应把在6年内不改革的方针在党内在西藏上层普遍加以宣传。”

毛泽东鉴于这一年平息的康区叛乱情况，又写道：

“如果受外国指挥的反革命分子不通过协商而一定要通过反叛和战争破坏十七条协议，把西藏情况打烂，那就有可能激起劳动人民起来推翻封建制度，建立人民民主的西藏。”

12月19日和20日这两天的下午及晚上，毛泽东连续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第2篇文章的修改稿。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大多数成员都参加了会议，提出了不少修改意见。毛泽东说：

“**文章的主要锋芒是反对修正主义，捍卫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捍卫十月革命的共同道路。”**

“4月间的文章中，讲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现在的文章要进一步分清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应当采取不同的方法解决，指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和共产党之间的矛盾，应当采取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解决，以便协同一致地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文章的出发点是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上，向帝国主义斗争，在这个大前提下，讨论各国共产党之间的内部是非问题。”

“**对斯大林要做认真分析。第一，先讲他的错误，强调必须纠正。第二，再讲他的正确方面，不能抹煞。然后，第三讲实事求是，不能全盘否定，这叫作‘三娘教子’，三段论法。**对他犯错误的社会原因，如搞社会主义没有先例，国内外情况复杂等等，但不宜过分强调。因为列宁在世时的社会条件不比斯大林好，但他没有犯斯大林那样的错误。同样的社会条件下，有人可能多犯错误，有人可能少犯错误。这里，个人的因素，个人主观是否符合客观，起着重大作用。

**赫鲁晓夫一棍子把斯大林打死，结果他搬起石头打了自己的脚，帝国主义趁机打他一棍子，无产阶级又从另一边打他一棍子，还有铁托和陶里亚蒂也从中间打他一棍子。**斯大林这把刀子，赫鲁晓夫丢了，别人就捡起来打他，闹得四面楚歌。

我们现在写这篇文章，是为他解围，方法是把斯大林这把刀子捡起来，给帝国主义一刀，给修正主义一刀，因为这把刀子虽然有缺口，但基本上还是锋利的。”

12月22日，毛泽东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对又修改了一遍的稿子再次提出了一些意见，认为基本可以，决定再提交政治局讨论。

12月23日和24日，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对修改稿采取读一段讨论一段的方法。毛泽东又发表了一些重要见解，他说：

“不能照搬苏联那些具有民族特色的做法，更不能照搬那些已经证明为错误的做法。人家犯了的错误你还要犯吗？人家丢掉不要的坏东西你还要捡起来吗？今后不要迷信苏联一切都是正确的了，凡事都要开动自己的脑筋想一想了。别人有无教条主义，我们不讲，只讲我们自己要吸收我党历史上犯教条主义错误的教训。”

毛泽东还说：

“上篇文章讲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现在的文章要进一步讲这些矛盾不仅存在，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可能从非对抗性矛盾转化为对抗性矛盾，苏波关系和匈牙利事件都证明了这一点。**二是我们要为苏联两个阶段的历史辩护，不仅要维护苏联革命阶段的伟绩，还要维护苏联建设阶段的伟绩。**苏联的革命和建设，不仅是一国的民族现象，而且是具有时代特点的国际现象。它的伟大意义远远超出了一国范围，是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运的财富。**既然苏联的革命和建设取得伟大的成就，如果说它是斯大林主义的，那么，这个斯大林主义就是好的主义，斯大林主义分子就是好的共产党人。”

在修改稿中，有一段文字专门讲和平过渡问题。毛泽东考虑再三，认为这个问题是中苏两党的重要分歧之一，在目前情况下，中苏要共同对敌，不宜向全世界公开这个分歧，最后还是决定删去了这一段。毛泽东说：

“要留有余地，以后还有机会提出来。”

政治局会议原则上通过了这篇文章，还同意毛泽东的建议，将题目定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会后，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在胡乔木家中，进一步修改稿子。

12月27日下午，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康生、张闻天、王稼祥、陆定一、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开会，讨论再度修改的稿子。大家又提了一些文字上的意见。毛泽东说：

“这两篇文章都是围绕斯大林问题。这个问题的争论还没有完，估计本世纪内，甚至21世纪还有争论，因为这是关系到马列主义基本原理问题，我们要准备长期论战。”

毛泽东要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马上动手修改，他说：

“修改一段送我一段，今晚要定稿，明日登报，今年的事今年了。”

散会后，吴冷西3人在中南海食堂吃了饭，来到毛泽东住所背后的居仁堂开始工作，修改完一段，就由田家英给毛泽东送一段。毛泽东一直在卧室等着，随到随看随改随定稿。就这样，胡乔木他们紧张地工作了一个通宵，一直到28日上午9点多才把最后一部分改完，3人一起来见毛泽东。毛泽东看完后吩咐说：

“马上将修改的地方，告诉翻译的同志，中文已定稿，译文也可定稿。新华社于28日晚发稿，中英文广播也同时播出，《人民日报》在12月29日见报。”

12月29日，《人民日报》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了由毛泽东组织起草、并亲自主持反复修改、八易其稿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再论》和《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样，在标题的下面注明：

这篇文章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长达2万字的《再论》，驳斥了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攻击，答复了人民群众和党内由于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引起的某些不理解和怀疑，维护了十月革命胜利的道路及其基本经验，分析了斯大林犯错误的原因和社会历史条件，正确评价了斯大林的一生功过是非问题。

毛泽东在文章的引言中第一次比较完整地论述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他写的是：

“在我们面前有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第一种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在帝国主义阵营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帝国主义同全世界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之间，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等等）。这是根本的矛盾，它的基础是敌对阶级之间的利害冲突。第二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在这一部分人民和那一部分人民之间，共产党党内这一部分同志和那一部分同志之间，**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和人民之间，社会主义国家相互之间，共产党和共产党之间**，等等）。这是非根本的矛盾，它的发生不是由于阶级利害的根本冲突，而是由于正确意见和错误意见的矛盾，或者由于局部性质的利害矛盾。它的解决首先必须服从于对敌斗争的总的利益。**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而且应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获得解决，从而在新的条件下得到新的团结。**当然，**实际生活的情况是复杂的。有时为了对付主要的共同的敌人，利害根本冲突的阶级也可以联合起来。反之，在特定情况下，人民内部的某种矛盾，由于矛盾的一方逐步转到敌人方面，也可以逐步转化成为对抗性的矛盾。**到了最后，这种矛盾也就完全变质，不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而成为敌我矛盾的一部分了。这种现象，在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都曾经出现过。总之，一个人只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就决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同敌我之间的矛盾等量齐观，或者互相混淆，更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放在敌我矛盾之上。”

毛泽东还第一次敏锐而明确地提出了反对修正主义的问题，他在文章中加写了这样一段文字：

“斯大林错误的一个严重后果是导致教条主义的发展。各国共产党的队伍在批评斯大林错误的同时，展开了克服教条主义的斗争。这个斗争是完全必要的。**由于对斯大林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并提出了反对‘斯大林主义’的错误口号，从而助长了修正主义思潮的发展。这种修正主义思潮，是有利于帝国主义对于共产主义运动的进攻的。帝国主义也正是利用这种思潮向社会主义进攻。我们在坚决反对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坚决反对修正主义。**”

12月29日，毛泽东给周世钊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东园兄：

信及诗收读，甚快。我尚好。某先生楚辞，甚想一读。请你代候蒋竹如兄。又请你代候曹子谷先生，谢谢他赠诗及赠南岳志。

顺祝平安

毛泽东 12月29日

有书家刘锡山曾评论这一封信的草书艺术成就说：“**毛泽东的草书已经很好了，草势放纵，遒美流畅，枯笔尤为精彩，云烟满纸。字的结构，中锋行笔，已有张旭、怀素的气息。而且一上手，就是自家面目，不承习旧路，‘读’、‘蒋竹如’、‘南岳志’尤为动人。”**

12月31日，苏联政府在克里姆林宫举行迎新年宴会，赫鲁晓夫在和中国驻苏大使刘晓的谈话中，高度评价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他说：

“我读了中国发表的文章，它写得好极了，我同意里面的每句话和每个字。”

接着，赫鲁晓夫亲自把刘晓请上主席台，安排在他和莫洛托夫之间就座。

赫鲁晓夫在宴会上发表了长篇祝酒词，他说：

“斯大林犯了严重的错误，但他仍然是一个伟大的马列主义者，他同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对待敌人方面，我们同斯大林是完全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都是斯大林主义者！”

关于匈牙利事件问题，赫鲁晓夫说：

“现在有人想逼我们后撤，不，我们决不后撤，社会主义阵营的边界只能向前推进，决不后撤。”

1957年1月7日，彭德怀主持召开中央军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一直开到至27日才结束。

会议最后通过了《关于裁减军队数量加强质量的决定》和全军组织编制调整方案。确定“在裁减军队数量加强质量的原则下，将人民解放军员额裁减三分之一，即从383万人中裁减130万左右，保持250万或者再少一些的常备军队”。同时调整全军的组织编制，把原来的陆军、海军、空军、防空军、公安军5个军种改为陆军、海军、空军3个军种，八总部领导体制改为三总部领导体制。

1月7日这一天，毛泽东因受赫鲁晓夫之托，决定由周恩来和国务院副总理贺龙、中联部部长王稼祥率领中国代表团，赴莫斯科参与调处苏、波、匈矛盾。周恩来临行前，毛泽东特别交代说：

“只要苏联共产党内部稳定，我们的事情就好办了，但还是要好好地批评一下赫鲁晓夫。”

周恩来说：

“我也是这么想的，对兄弟国家战略上是联合，但在战术上不能没有批评。”

周恩来一行人在莫斯科机场，受到了苏联党政领导人赫鲁晓夫、伏罗希洛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米高扬、莫洛托夫、萨布洛夫、苏斯洛夫、勃列日涅夫等全班人马的热烈欢迎。

周恩来在从机场到克里姆林宫去的汽车上，劝赫鲁晓夫做一些自我批评。赫鲁晓夫无可奈何地说：

“我们不像你们那样做自我批评。如果那样做，我们现在的领导就成问题了。”

周恩来等人在苏联进行了一系列的说服工作后，赫鲁晓夫建议周恩来和铁托一起去做匈牙利的工作，周恩来立即发电请示毛泽东，毛泽东回电说：

“你和铁托一起去的时机尚未成熟，还是由你们单独前往为好。”

于是，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单独率领中国代表团去访问波兰和匈牙利。

1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经济五人小组的通知》，通知说：由陈云、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黄克诚组成5人小组，陈云任组长，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统一领导国家的经济工作。

1月11日，毛泽东为刘胡兰烈士第二次题词。

原来在1956年12月，山西省在筹备纪念刘胡兰烈士就义10周年的时候，才知道毛泽东在1947年为刘胡兰题写的“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手稿已在解放战争中遗失了，便恳请毛泽东重新为刘胡兰烈士题词。

毛泽东挥笔在宣纸上自右而左写下了3竖行题词：“生的伟大 死的光荣 毛泽东题”。这一亲笔题词被送往烈士故乡，刻在刘胡兰纪念馆纪念碑上。

1月12日，毛泽东复信给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诗刊》主编臧克家和《诗刊》副主编及全体编委，他写道：

克家同志和各位同志：

惠书早已收到，迟复为歉！遵嘱将记得起来的旧体诗词，连同你们寄来的8首，一共18首，抄寄如另纸，请加审处。

这些东西，我历来不愿意正式发表，因为是旧体，怕谬种流传，遗误青年。再则诗味不多，没有什么特色。既然你们以为可以刊载，又可为已经传抄的几首改正错字，那么，就照你们的意见办吧。

《诗刊》出版，很好，祝它成长发展。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且不易学。这些话仅供你们参考。

同志的敬礼！

毛泽东 1957年1月12日

1月12日晚，毛泽东在书房里对李银桥说：

“银桥啊，诗刊来信要求发表我的一些诗词，盛情难却，我让子龙抄写了18首，准备给他们送过去。小韩也很喜欢诗，你也受些感染么？”

李银桥不好意思地说：

“我和小韩都非常喜欢主席的诗，我也想学着写一写，可就是不会写。”

毛泽东说：

“写诗是件费脑子的事，尤其是**旧体诗词更不容易掌握，又是平仄格律，又是韵脚对仗，还不得犯孤平，掌握了这些还要讲究诗意和诗的境界,很难哩！**你们年轻人最好莫学写旧体诗，学就学作新诗，歌颂我们的新中国，歌颂工农兵！”

李银桥嘿嘿一笑说：

“主席，我也试着写了一首，可不敢说叫诗。”

毛泽东眼睛一亮，鼓励他：

“念来听听！”

李银桥就背诵道：

“我是工农兵，革命打先锋，哪里需要哪里去，党的安排我服从。

为了建设新中国，哪里艰苦哪里冲！

上边疆，下海洋，闯大漠，攀高峰，革命红旗飘扬处，处处有我工农兵！”

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连声夸奖说：

“好诗，好诗！银桥啊，不晓得你还会作诗呀？”

李银桥红了脸说：

“这是我老婆帮我写的。”

毛泽东笑得更厉害了，说道：

“不错么，敢写就不错！真是一首好诗呢！以后多练多写，会更进步呢。”

1月14日上午11时，《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袁水拍打电话给臧克家，他说：

“毛主席要召见我们，下午3时我坐车去接你。”

这天下午3时许，臧克家、袁水拍乘车驶入中南海，直达勤政殿门前。他们进入殿门，只见空阔的房间里寂无一人，对面有一副屏风，别的没有任何摆设，长长的沙发，一个又一个，十分简朴。不一会儿，一个高大的身影从东边门里出来，一步一步向他们走来。臧克家、袁水拍一见毛泽东，赶忙起身迎上前去。毛泽东安祥和蔼地和他们一一握手，让座，从烟盒里抽出香烟让他们抽。臧克家说：

“我不会吸。”

毛泽东笑着问：  
“诗人不会吸烟？你在北大教书？”

臧克家回答说：

“不是，我在作家协会工作。”

毛泽东说：

“你在《中国青年报》上评论我的‘咏雪’词的文章，我读过了。”

臧克家趁机问道：

“词中‘原驰腊象’的‘腊’字怎么解释？”

毛泽东反问道：

“你看应该怎样？”

臧克家说：

“改成‘蜡’字比较好，可以与上面“山舞银蛇”的‘银’字相对。”

毛泽东频频点头，说：

“好，你就替我改过来吧。”

毛泽东的神态和谈话，使臧克家的心平静怡然了，心和心贴近了，于是便向毛泽东提出了《诗刊》创刊后的印数问题，他说：

“现在纸张困难，经我们一再要求，文化部负责人只答应印1万份。同样是作家协会的刊物，《人民文学》印20万，《诗刊》仅仅印1万，太不合理了。”

“你说印多少？”

臧克家说：

“公公道道，5万份。”

毛泽东想了一下，说：

“好，5万份。”

臧克家说：

“请主席给黄洛峰同志打个电话。”

袁水拍赶忙给臧克家递了个眼色，又对毛泽东说：

“不用了，不用了。”

接下来，毛泽东谈到了一些国际重大事件，臧克家和袁水拍都知之甚少，只能静静地听着，无法插嘴，可没想到毛泽东突然向他们提出了一个问题：

“几百年后，全世界实现了共产主义，还有没有斗争？”

“不知道。”

“主席看呢？”

毛泽东吸了一口烟，看了臧克家、袁水拍一眼，慢慢地说道：

“我看，还是有斗争的，但不在战场上，而在墙壁上。”

臧克家、袁水拍会意地点着头。毛泽东把话又转入到主题上，他说：

“《诗经》是以四言为主体的。后来的民歌是五言，现在七言的多了，这是顺着时代演变而来的。**现在的新诗，太散漫，我以为新诗应该在古典诗歌和民歌的基础上求发展。我个人喜欢用词的形式写作，习惯了，用起来得心应手。**”

他还说：

**“杜甫诗写得不少，好的不多。**他们给我弄了部《明诗综》，我看李攀龙有几首诗写得不错。”

毛泽东的湖南口音太重，李攀龙这名字臧克家没听明白，袁水拍给他重复了一下，他才明白了。眼看已经到了下午5点钟了，臧克家、袁水拍起身告退。毛泽东把他们送出殿门，站在那里向他们招手，高声嘱咐道：

“把你们的诗集送我一份呵！”

后来，毛泽东的信在《诗刊》上发表后，北京大学一位学生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说毛泽东信中“遗误青年”的“遗”字欠妥，应改为“贻”。毛泽东虚心地接受了这一意见，马上给《诗刊》编辑部打招呼，请予以更正。

再说1月17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受赫鲁晓夫之托，率领中国代表团先后访问了波兰和匈牙利，取得了可喜的成果，顺利返回莫斯科。

周恩来在向赫鲁晓夫介绍了访问波兰和匈牙利的情况后，真诚地说希望赫鲁晓夫能够克服某些缺点。赫鲁晓夫闻言跳了起来，粗鲁地咒骂东欧国家领导人。周恩来一见他如此暴躁，忍不住说：

“赫鲁晓夫同志，对兄弟党的领导人不能这样。有什么话当面讲，不能在背后随便怀疑别人，这不利于兄弟国家的团结。”

赫鲁晓夫没想到周恩来也教训起自己来，立时涨红了脸，他说：

“你不能这样跟我说话。无论如何，我出身于工人阶级，而你却是资产阶级出身！”

周恩来也没有想到赫鲁晓夫竟会说出这样的话来，便不动声色地反唇相讥：

“是的，赫鲁晓夫同志，你出身工人阶级，我出身资产阶级，但是，你我有共同的地方，我们都背叛了自己的阶级！”

赫鲁晓夫受到当头棒喝，也转个话题发起进攻，他说：

“据说在越南、柬埔寨、老挝，中国人多。”

周恩来知道赫鲁晓夫另有用意，就平静地说：

“不少，国王的父亲也是中国血统的。访华的代表团中也有几个人是中国血统的。”

赫鲁晓夫说：

“西哈努克说，他们那里中国人很多，他担心中国的影响太大。”

周恩来这才明白，赫鲁晓夫转来转去是要攻击中国也有大国沙文主义，马上含讽带刺地说：

“所以，我们强调反对大国沙文主义，使他们安心。五项原则加上一条反对大国沙文主义。我们对各兄弟党、各兄弟国家是平等的，没有把自己的东西强加给别人。”

欲知此后中苏关系如何发展？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做文章的人要学写政论文，应首先读一读毛泽东在1956年12月2日晚上关于如何撰写《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那一篇讲话，再看一看本章叙述的毛泽东为了写好这篇文章是如何反复修改的整个过程。即使不是做文章的人，在教孩子说话的策略与技巧时，也应该读一读毛泽东那段讲话的后半部分，他说：“**这里用得着中国古人做文章的方法，一个叫作‘欲抑先扬’，一个叫作‘欲扬先抑’。所谓‘欲抑先扬’，就是说，你要批评他的错误时，先肯定他的正确方面，因为批评的目的还是要他变好，达到团结的目的。对铁托适宜采取这个方法。对于斯大林，现在世界上都骂斯大林，我们要维护他，方法宜于‘先抑后扬’，即在论述他的功绩以回答对他的全盘否定时，先要讲斯大林有哪些错误，这样才能说服人，使人易于接受。**”你看，这是不是很妙啊！

毛泽东是写文章的大师，他在创办《湘江评论》时已经充分表现出来了。此一时期，他不厌其烦地和那些不怎么会写文章的政治局常委们一起开会，不厌其烦地向他们及秀才们讲解如何写好这篇《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应该说，一是因为事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事，二是也要借着写文章和修改文章的机会，对他的伙伴们进行一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和反对修正主义的教育。

**第31章**

“**我们的部长、副部长、司局长和省一级的干部中，相当一部分人，出身于地**

**主、富农和富裕中农家庭，有些人的老太爷是地主，现在还没有选举权。这些**

**干部回到家里去，家里人就讲那么一些坏话，无非是合作社不行，长不了。**”

话说1957年1月18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后人把这次历时10天的会议称作“一月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参看《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他说：

“这次会议，要讨论的问题主要是3个：思想动向问题，农村问题，经济问题。今天我讲一讲思想动向问题。”

“**现在有些干部争名夺利，唯利是图**。在评级过程中，有那样的人，升了一级不够，甚至升了两级还躺在床上哭鼻子，大概要升3级才起床。”“他们不是比艰苦，比多做工作少得享受，而是比阔气，比级别，比地位。这种思想在党内现在有很大的发展，值得我们注意。”

“农业合作化究竟是有希望，还是没有希望？是合作社好，还是个体经济好？这个问题也重新提出来了。”“**前年反右倾，去年反‘冒进’，反‘冒进’的结果又出了个右倾。”**“我们的干部中间刮起了这么一股风，像台风一样，特别值得注意。**我们的部长、副部长、司局长和省一级的干部中，相当一部分人，出身于地主、富农和富裕中农家庭，有些人的老太爷是地主，现在还没有选举权。这些干部回到家里去，家里人就讲那么一些坏话，无非是合作社不行，长不了。”**

“在学校里头也出了问题，好些地方学生闹事。”“**我们高等学校的学生，据北京市的调查，大多数是地主、富农、资产阶级以及富裕中农的子弟，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出身的还不到20%。全国恐怕也差不多。”“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议论，不要共产党呀，共产党领导不了他呀，社会主义不好呀，如此等等。**”

“去年这一年，国际上闹了几次大风潮。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大反斯大林，这以后，帝国主义搞了两次反共大风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有两次大的辩论风潮。在这几次风潮中，欧洲、美洲有些党受的影响和损失相当大，东方各国的党受的影响和损失比较小。苏共‘二十大’以来，**有些从前拥护斯大林非常积极的人，这时候也反得很积极。我看这些人不讲马克思列宁主义，对问题不作分析，也缺乏革命道德。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包括无产阶级的革命道德。**你从前那么拥护，现在总要讲一点理由，才能转过这个弯来吧！理由一点不讲，忽然转这么180度，好像老子从来就是不拥护斯大林的，其实从前是很拥护的。斯大林问题牵涉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各国党都牵涉到了。

对苏共‘二十大’，我们党内绝大多数干部是不满意的，认为整斯大林整得太过了。这是一种正常的情绪，正常的反应。但是，也有少数人起了波动。**每逢台风一来，下雨之前，蚂蚁就要出洞，它们‘鼻子’很灵，懂得气象学。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这是党内的动摇分子，一有机会他们就要动摇**。他们听了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舒服得很，就摇过去，喊万岁，说赫鲁晓夫一切都对，老子从前就是这个主张。”“墙上一蔸草，风吹两边倒。”“**这一下就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台风一刮，动摇分子挡不住，就要摇摆，这是规律。”“他们中间有相当多的人，虽然艰苦奋斗多少年，有所锻炼，但是马克思主义学得不多，在思想方面，精神方面，还是跟稻子一样，风一吹就要摇。”

毛泽东最后说：

“在匈牙利，大民主一来，把党政军都搞垮了。在中国，这一条是不会发生的。几个学生娃娃一冲，党政军就全部瓦解，那除非我们这些人完全是饭桶。所以，不要怕大民主。出了乱子，那个脓包就好解决了，这是好事。帝国主义，我们从前不怕，现在也不怕。我们也从来不怕蒋介石。现在怕大民主？我看不要怕。**如果有人用什么大民主来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就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总而言之，**去年这一年是多事之秋，国际上是赫鲁晓夫、哥穆尔卡闹风潮的一年，国内是社会主义改造很激烈的一年。现在还是多事之秋，各种思想还要继续暴露出来**，希望同志们注意。”

陈云在1月18日的会议上作了《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讲话，提出了3条措施：一、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二、适当压缩基本建设的投资额；三、有计划地控制社会购买力增长的速度。

此后，会议进行分组讨论。

1月27日，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就要结束了，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了长篇总结讲话（参看《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他一共讲了7点意见：要足够的估计成绩；统筹兼顾，各得其所；国际问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闹事问题；法治问题；农业问题。

关于国际问题，毛泽东在谈到中美关系时说：

“我还是这样看，迟几年跟美国建立外交关系为好。这比较有利。苏联跟美国建交，是在十月革命之后17年。1929年爆发世界经济危机，持续到1933年。这一年，德国是希特勒上台，美国是罗斯福上台，这个时候，苏美才建交。我们跟美国建交，可能要在第3个‘五年计划’完成以后，也就是说，要经过18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我们也不急于进联合国，就同我们不急于跟美国建交一样。我们采取这个方针，是为了尽量剥夺美国的政治资本，使它处于没有道理和孤立的地位。不要我们进联合国，不跟我们建交，那么好吧，你拖的时间越长，欠我们的账就越多。越拖越没有道理，在美国国内，在国际舆论上，你就越孤立。我在延安就跟一个美国人讲过，你美国100年不承认我们这个政府，101年你还不承认，我就不信。**总有一天，美国要跟我们建交。那时美国人跑进中国来一看，就会感到后悔无及。因为，中国这个地方变了，房子打扫干净了，‘四害’也除了，他们再找不到多少朋友了，散布一点细菌也没有多大作用了。”**

毛泽东在谈到中苏关系时说：

“**我看总是要扯皮的，不要设想共产党之间就没有皮扯。世界上哪有不扯皮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个扯皮的主义，就是讲矛盾讲斗争的**。矛盾是经常有的，有矛盾就有斗争。现在中苏之间就有那么一些矛盾。他们想问题做事情的方法，他们的历史习惯，跟我们不同。因此，要对他们做工作。”

“依我看，形势比一些人强，甚至比大官强。在形势的压迫下，苏联那些顽固分子还要搞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行不通了。我们目前的方针，还是帮助他们，办法就是同他们当面直接讲。这次我们的代表团到苏联去，就给他们捅穿了一些问题。我在电话里跟恩来同志说，这些人利令智昏，对他们的办法，最好是臭骂一顿。什么叫利呢？无非是5000万吨钢，4亿吨煤，8000万吨石油。这算什么？这叫不算数。看见这么一点东西，就居然胀满了一脑壳，这叫什么共产党员，什么马克思主义者！我说再加10倍，加100倍，也不算数。**你无非是在地球上挖了那么一点东西，变成钢材，做成汽车飞机之类，这有什么了不起！可是你把它当作那么大的包袱背在背上，什么革命原则都不顾了，这还不叫利令智昏！**官做大了也可以利令智昏。当了第一书记，也是一种利，也容易使头脑发昏。昏得厉害的时候，就得用一种什么办法去臭骂他一顿。这回恩来同志在莫斯科就不客气了，跟他们抬杠子了，搞得他们也抬了。这样好，当面扯清楚。他们想影响我们，我们也想影响他们。我们也没有一切都捅穿，法宝不一次使用干净，手里还留了一把。矛盾总是有的，目前只要大体过得去，可以求同存异，那些不同的将来再讲。如果他们硬是这样走下去，总有一天统统捅出来。”

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毛泽东说：

“这个方针，是在批判了胡风反革命集团之后提出来的，我看还是对的，是合乎辩证法的。”“真理是跟谬误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香花是跟毒草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禁止人们跟谬误、丑恶、敌对的东西见面，跟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见面，跟孔子、老子、蒋介石的东西见面，这样的政策是危险的政策。它将引导人们思想衰退，单打一，见不得世面，唱不得对台戏。”**“我劝在座的同志，你们如果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那就需要补学一点它的对立面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康德和黑格尔的书，孔子和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需要读一读。不懂得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没有同这些反面的东西做过斗争，你那个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不巩固的。**”

毛泽东还谈到了扩大《参考消息》的发行范围，准备从过去的2000份扩大到40万份，并且赞成出蒋介石全集。他说：

**“要见世面，要经风雨，不要藏在暖室里头，暖室里头长大的东西是不牢固的。”**

1月29日，毛泽东在公安部党组就处理在押病残战犯问题的报告上作了一个批示。

报告中说，考虑到刘焕东等12名蒋介石集团的战犯在关押期间患有重病，有的因病致残，而表现一般较好，公安部与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商妥，拟准予保外就医。

毛泽东批示道：

“不但这些人应当处理，其他战犯凡犯罪较轻、表现较好的，都应考虑判决释放，因为已关了七八年了，只留下犯罪较重的和最重的两类，待后处理。请公安部将战犯全体审查一下，定出一个方案送中央审阅。”

1957年2月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转发中央组织部《关于县、区、乡的组织形式和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的报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

现将中央组织部关于县、区、乡的组织形式和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发给你们，供参考。

关于现有乡干部的工薪待遇问题，中央不作统一规定，由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根据当地具体情况作出决定，报告中央备案。一般说来，大乡应具有区级领导能力（人数应少于原来的区级），大多数干部应该是原有的区级各种干部，他们的待遇一般应该是原来的区级各种干部的待遇。**小乡则应按原有乡干部待遇，这种乡干部的待遇应当比照当地农民经济情况去规定，不可超出当地农民收入过多，以免使乡干部脱离群众。各地应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对于乡干部的成份和待遇进行适当的调整，并教育乡干部在实际生活上与群众打成一片，同甘共苦，在工作方法上注意克服命令主义，密切联系群众，警戒脱离群众的危险。**

**撤销区级机构，扩大乡的范围，是为了减少领导层次，加强乡级领导能力，充实农业生产合作社领导骨干。**因此，**凡撤销区级机构的县，应将区干部下放到乡，乡干部下放到社，而不是上提，在必要时应从县、地两级抽出适合到乡工作的干部放到乡去，使乡一级至少具有原来区级的领导能力。**

撤区后，县直接领导的单位增多，县委和县人民委员会如何领导乡级工作，这是一个新问题，目前尚无成熟的经验，希望各地随时注意总结这一方面的经验，报告中央。

中央 1957年2月7日

2月11日，毛泽东给黄炎培先生写了一封回信。

此前，毛泽东在1956年12月间将《水调歌头·游泳》书赠黄炎培，黄炎培收阅后，在给毛泽东的信中问及何以用“极目楚天舒”一词，还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

毛泽东在复信中写道：

任之先生：

惠书盛意可感！那些东西，既已发表，不改也可。游长江两小时飘30多里才达彼岸，可见水流之急。都是仰游侧游，故用“极目楚天舒”为宜。顺致敬意！

毛泽东 2月11日

2月14日晚，毛泽东由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陪同，在勤政殿接见了全国学联第16届委员会主席胡启立和田海亭、叶绍宾、伍慧莲、孙寿珠、黄绍康、傅杰6位副主席，同他们交谈了40多分钟。接着，他又接见了参加全国学联第16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全体学联委员。他同大家一一握手，并合影留念，尔后坐下来同大家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

2月16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中央报刊、作家协会、科学院和青年团的负责人座谈文艺思想问题。在参加会议的28人中，有几位是党外人士。周恩来、邓小平也参加了座谈。毛泽东在谈话中一开始就说：

“王蒙最近写了一篇《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这篇小说有缺点，需要帮助他。对待起义将领也要帮助，为什么对青年人不采取帮助的态度呢？王蒙写正面人物无力，写反面人物比较生动，原因是生活不丰富，也有观点的原因。**有些同志批评王蒙，说他写得不真实，中央附近不该有官僚主义。我认为这个观点不对。我要反过来问，为什么中央附近就不会产生官僚主义呢？中央内部也产生坏人嘛！**用教条主义来批评人家的文章，是没有力量的。”

“我们对人民中的错误采取如何处理的方针，有大量的人是没有弄清楚的。”“**属于精神世界的问题，属于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只能用说理的方法和争鸣的方法来解决，决不能用压制的方法来解决。**列宁是怎么写《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他是以大量的材料充分说理的。”

关于批判胡适的问题，毛泽东说：

“开始批判胡适的时候很好，但后来就有点片面性了，把胡适的一切全部抹煞了，以后要写一两篇文章补救一下。对康有为、梁启超也不能抹煞。”

他又说：

“**对思想上有严重错误的人，有敌对思想的人，也要团结他们，改造他们**。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贯彻‘统筹兼顾，各得其所’。应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以便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应该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笔下也是如此。”“片面的打，不能锻炼出真正好的文学艺术。只允许香花，不允许毒草，这种观念是不对的。**香花是从和毒草作斗争中出来的。香花和毒草齐放，‘落霞与孤鹜齐飞’。**斯大林的教条主义不是两点论，而是一点论，我们的同志看事物应该是两点论。同时，一点里面又有两点。”

“我们要充分收集材料，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要有准备才有说服力。有这么多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我们要靠少数人教育多数人。开除很简单，但这绝不是好办法。**应该懂得坏分子里面也有两重性。一是不好，一是可以当‘教员’。**一切事物都有它的产生、发展和灭亡，都有始有终。如果马列主义叫永恒的真理，就不叫马列主义。马克思没有看到社会主义，列宁也看得不久。苏联有成绩，也有问题。社会主义的时间不长，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许多问题要创造，要发展。**不要怕交锋，真理是越斗越明**。我们的同志应该记住，我们要警惕采用简单化。”

毛泽东在谈话中还批评了当年的“小人物”李希凡，他说：

“过去当小媳妇时兢兢业业，到了高级机关当了婆婆后就板起面孔了，吃党的饭，说党的话，写文章也不讲理了。”

原来早在1954年，领导上为安排李希凡的工作问题征求他的意见，李希凡向邓拓和周扬表示，愿去文学研究所。毛泽东说，那不是战斗的岗位。于是李希凡就在1955年被调到了《人民日报》社文学艺术部，担任了编辑工作。在不久前的2月9日，他写了一篇棒杀文章《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发表在《文汇报》上，毛泽东看了很不满意，由此引出了毛泽东上面的批评。

接着，毛泽东在谈话中表扬了姚文元，他说：

“最近姚篷子的儿子叫姚文元，写了一篇文章，登在2月6日的《文汇报》上，题目是《教条与原则》，我看是不错的。”

姚文元，祖籍浙江省诸暨县姚公埠，父名姚梦生，笔名姚篷子，母名周修文。姚文元1931年出生于上海，姚篷子用祖父姚宝槐当年秀才匾上“文元”两字为自己的儿子取名叫姚文元，意思是希望儿子将来也能成为“文中魁元”。

2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夜已经很深了，卫士封耀松还陪伴在正在工作的毛泽东身旁。

一个时期以来，毛泽东一直在忙于思考、整理一个有关“就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和解决问题、敌我矛盾与是非问题”（即后来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方面的讲话提纲，早先已经修改了4遍，又经过7次征求意见，也都一一作了修改，现在依然还在继续修改着。

每临大事，他总是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工作。特别是在进行像这一类重大理论创作的时候，他的生活更是毫无规律可言了。卫士长李银桥交代封耀松说：

“你得想个办法让主席休息一会儿，老人家又是两天两夜没睡觉了。这两天两夜只吃了一顿正经饭，喝过两茶缸麦片粥。”

封耀松嘴里答应着，却不敢去打扰毛泽东。过了许久，封耀松见毛泽东放下笔，身子靠着椅背，将头往后一仰，两只手在额头上揉了揉，捏了几下，又打了个哈欠，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便抓住时机赶紧走上前去，问道：

“主席，你已经很长时间没吃饭了，给你搞点吃的来吧？”

毛泽东又作了一个深呼吸，先是摇摇头，后来又点点头，勉强说：

“不用搞别的了，你给我烤几个芋头来就行。”

说完，他又埋头写起来。封耀松赶紧来到厨房，向侯师傅说明了情况。侯师傅一听就不高兴了，嚷道：

“你胡闹！主席一天没吃饭了，你怎么烤几个芋头？”

封耀松说：

“主席说让烤几个芋头么。你不胡闹，你做饭你送。”

侯师傅没办法，只好烤熟了6个小芋头，放在一个小碟子里。封耀松端着碟子回来了，谁知一进门，就听见了响亮的鼾声，近前一看，毛泽东斜靠在床垫上，左手拿文件，右手抓着笔，就那么睡着了。封耀松不敢打扰，便把碟子轻轻地放在暖气片上，退到门口坐下等候。十几分钟后，毛泽东咳嗽了一声。封耀松忙进屋去，手捧碟子小声说：

“主席，芋头烤好了。”

毛泽东放下笔和文件，双手搓搓脸，说：

“噢，想吃了，拿来吧。”

他拿起一个芋头认真地剥着皮，自得其乐地吟诵起他很早以前写的一首诗：“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

大约过了十几分钟，封耀松在外边隐隐约约听到了呼噜声，他蹑手蹑脚地进屋，见碟子里只剩一个芋头了，毛泽东头歪在右肩上睡着了。封耀松踮着脚走过去，端起盘子准备退出，突然感觉到毛泽东的呼噜声与往常不一样，就探过头去打量了一下，揉揉眼睛仔细一瞧，不由得大吃一惊：天哪！毛泽东嘴里竟然含着半个芋头！那半个芋头随着呼噜声在不住的颤抖着！另外半个芋头还拿在他的手里。封耀松鼻子一酸，眼泪就出来了。他赶紧放下碟子，轻轻地去抠毛泽东嘴里的芋头，芋头抠出来了，毛泽东也被惊醒了。他那一双熬得通红的眼睛盯着封耀松，气冲冲地大声问：

“怎么回事？”

封耀松叫了一声“主席”，就哭了，手里捧着那抠出来的半个芋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唉——”毛泽东看着封耀松，叹了一口气，说：“我不该跟你发火。”

“不，不是的，主席，不是因为你……这芋头是从你嘴里抠出来的。你必须睡觉，必须休息了，我求求你了。”

毛泽东勉强笑笑，抬起右手，手指在头顶上划两个圈，说：

“天翻地覆，天翻地覆。”

他又望着封耀松，说：

“好吧，小封，我听你的，我休息吧。”

后来，封耀松在回忆毛泽东的生活情况时说：“毛主席多数时间是一个人吃饭，或在书房，或在卧室。由我用饭盒提来，2菜1汤，1碗二米饭（大米小米蒸在一起），两个小碟，辣椒和酱豆腐。除非有客，毛主席吃饭总是手不离卷。有一天，毛主席在吃饭时，他斜坐在木椅上，左手拿着一张报纸，两眼紧紧盯着报纸，右手像一只机械手，在盘子和嘴之间来回运动，筷子始终落到盘子的一个位置上。那是一盘空心菜，他已经夹走了半边的菜，另一半的菜眼看就夹不住了。我悄悄转动盘子，让他的筷子能落在有菜的位置上。毛主席全然没有感觉到菜盘的变化。停了一会儿，我又将荤素两个盘子调一个位置，毛主席依然没有察觉到饭桌上的变化。‘嗯？’毛主席嚼了几口，突然一怔，说：‘味道不对呀？’说着，他想吐掉嘴里的菜。我赶紧说：‘是我把两盘菜调个过儿。’‘嗯！’毛主席咽下嘴里的菜，说：‘我说不对劲儿。刚才还咯吱咯吱的，一下子变得那么软绵呢。’人们都知道，毛主席的饮食既随便又艰苦，简直太苦了。好了么，4菜1汤；差了么，1碗面条。很多时候只是用搪瓷缸子在电炉上烧一缸麦片粥，就着生活秘书叶子龙做的酱豆腐喝下去。这情况如今讲给周围人听，他们多数不信。他们习惯拿身边的某局长、某书记或某某县太爷作比较，真是不可同日而语。毛主席当时情况确实完全如此。我们在毛主席身边，他老人家入口的东西是必经我们之手的，我跟毛主席身边的十几年中，他老人家没吃过任何补品，若一定说他吃了什么补品也可以，当他脑力消耗过度、饥饿感强烈时，必定吩咐一声：‘来碗红烧肉吧，肥点的，补补脑子。’卫士中有个小李，现在某公司任副经理，与外商少不了饭桌上的交道，他曾感叹道：**‘唉，我经常一顿饭吃掉主席一年半的伙食费哟，我是没有脸去见他老人家啦！’**”

关于毛泽东的生活情况，李家骥也曾回忆说：老人家的饮食非常简单，他对我们说过：“**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为了吃世界，而是为了改造世界。这才是人，人跟其它动物就有这个区别。”**

且说2月26日下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0次会议上将他整理好的“就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和解决问题、敌我矛盾与是非问题”的讲话提纲先讲了一遍。参加这次会议的有37人。

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出席会议的各方面人士共有1800多人。

这天下午从3点到7点，毛泽东在会议上正式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长篇讲话，提出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除刘少奇外，都出席了这次会议。

毛泽东的讲话共分为12个部分：1、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2、肃反问题。3、农业合作化问题。4、工商业者问题。5、知识分子问题。6、少数民族问题。7、统筹兼顾、适当安排。8、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9、关于少数人闹事问题。10、坏事能否变成好事？11、关于节约。12、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参看《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在讲到第7部分“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时，专门讲到了计划生育问题，他说：

“我们这个国家有这么多的人，这一点是世界各国都没有的。它有这么多的人，6亿人口！这里头**要提倡节育，少生一点就好了。要有计划地生产**。我看人类自己最不会管理自己。对于工厂的生产，生产布匹，生产桌椅板凳，生产钢铁，他有计划。**对于生产人类自己就是没有计划，就是无政府主义，无政府，无组织，无纪律。**（全场大笑）这个政府可能要设一个部门，设一个生育计划部好不好？（又是一阵大笑）或者设一个委员会吧，节育委员会，作为政府的机关。人民团体也可以组织一个，组织个人民团体来提倡。因为要解决一些技术问题，要拨一笔经费，要想办法，要做宣传。”

此后，毛泽东又谈到了解决失业问题，适龄儿童的入学问题，毕业学生的就业问题等，说这些都需要统筹兼顾，适当安排。讲到这里，毛泽东提议休息。15分钟后，会议继续进行。

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讲话时，一些高级领导人起身离开会场，以示抗议。

《人民日报》报道这次会议所发的照片，既没有刘少奇的，也没有朱德等5位政治局委员的。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毛主席的这个讲话，虽然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了，但是对我这个当年在现场的聆听者来说，却是言犹在耳。毛主席讲话激情洋溢，风趣幽默，各种典故，信手拈来，随便什么问题，他借典故一点就通彻透亮。整个讲话气势非凡，高屋建瓴，振奋人心。大家都全神贯注，生怕少听了一个字。这个讲话，在我看来，不但在当时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导作用，就是在今天和将来的相当长的时间里，还是具有伟大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著名作家、翻译家傅雷当年也在现场听了主席的原始讲话，他也对主席的讲话佩服得五体投地，后来还在一封家信中说到当时激动的心情。他说毛主席‘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信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讲话的逻辑都是隐而不露，真是艺术高手；毛主席胸襟博大，思想自由，当然国家大事掌握得好了；毛主席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会贯通的人’。”“1957 年 6 月 19日，《人民日报》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题，发表出来了毛主席的这篇讲话。但是，它不是原始讲话，它是由胡乔木、田家英和陈伯达等人根据毛主席的原始讲话文件修改而来的，与原始讲话有很大的不同。”“主席当时提的是应该在全国搞民主，没有什么反右派，没有什么六条，没有什么钓鱼，都没有。反右派是后来根据整风运动中右派的乘机进攻的情况加上去的，是主席在这个问题上，同意吸收不同意见补充上去的。主席是真诚地希望大家帮助党整风。主席说了，人们总是会有些不同的意见，就是有些不对的，也不要紧，不用怕。”“傅雷看到正式发表的文章就大失所望了。这个翻译家很是可惜，他真心爱人民，真心拥护毛主席，但他不知道中央上层有那么复杂的情况。社会上确有右派进攻，主席受到他上下左右人的影响，要平衡各种力量和意见，包括他的那些老战友、老部下和他们的意见，所以才同意修改他的原始讲话，违心放弃一些本来合理的主张。傅雷若是了解和理解了这些情况，或许就不会自杀（在文革初期自杀的——笔者注）了。”

再说2月28日，出席扩大会议的全体人员分组讨论毛泽东的重要讲话。

1957年3月1日，是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的最后一天。

上午，各组继续讨论毛泽东的长篇讲话。

下午，进行大会发言。发言的人有李济深、章伯钧、黄炎培、马叙伦、陈嘉庚、陈叔通、郭沫若、程潜、马寅初、许德珩、达浦生、刘文辉、车向忱、盛丕华、孙蔚如、黄琪翔，共16人。

会议结束前，毛泽东作了45分钟的总结讲话，其内容有的是对2月27日讲话的补充，有的则是对讨论中提出的问题的答复。兹将他的总结讲话提纲抄录如下：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要普及，要提高，京戏原来是地方戏，将来也可能转化。**

散花野草也有用处，其中有些可能转化为香花，香花也可能变得不香了。

共产党也总有一天变得无用了。

马克思主义应当宣传，不能强迫人们相信。**以工人阶级、共产党、马列主义（指导思想）为领导，是否不妥？**

匈牙利要2年至3年才能恢复。错误：官僚主义，脱离群众，工业方针错误，工人减薪，资本家简单地被打倒，知识分子未被改造，反革命分子没有镇压。

批评问题。不要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马克思主义是不怕批评的，应允许互相批评，批评政府不犯罪。老干部不怕批评。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没有安排，安排不够。

**大民主，小民主，一般适用小民主，局部（不实行小民主地方）允许大民主**。

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

在法律范围内（不允许行凶，毁物）。

纪律，为了增进纪律，我们人民是很守纪律的。

以军队民主为例。

**遵师爱生。**

局部的，个别的，不是一般提倡。

作为克服人民内部矛盾、调整社会秩序的一种方法，因为官僚主义存在。

发至县级（指将他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发至县级——笔者注），还要研究。

官僚主义。

曲折、波浪式、螺旋形的前进。

科学。橡胶50一60年。

对唯心主义是否可以批评？问题是要有说服力。

发行参考消息40万份（2000—30万）（即准备由2000份扩充到30万份，发到县一级——笔者注），**蒋介石选集**（他赞成出蒋介石选集，但不公开发行——笔者注）。

不要泼科学家的冷水。参观科学院。

**控制在六亿人口**（控制一个时期少增长，以待条件具备，再作适当增长）。

单纯技术观点抬头。

美国经济危机，美国同各国的矛盾。

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耻!

毛泽东在讲话中针对有人在讨论时提出马克思主义能不能批评的问题，答复说：

**“马克思主义是不怕批评的，马克思主义如果能够批评倒，能够证明马克思主义不是真理，那么这个东西就不行了。所以，不存在马克思主义可不可以批评的问题。”**

针对老干部可不可以批评的问题，毛泽东说：

“**老干部如果批评倒了，那就是该批评的**。怕批评，总是有弱点就是了。我看，老干部、新干部都有弱点，弱点方面都应该批评，并且要成为一种习惯。人们范围之内的事，人民是有批评的权力的。我们只是不把这个权力给反革命。批评对了当然很好，批评不对也没有事，这就是言者无罪。”

针对有人提出2月27日的讲话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讲得不够，毛泽东说：

“这讲得对，这也是一种批评。前天没有大讲这个问题。什么叫‘长期’？就是共产党的寿命有多长，民主党派的寿命就有多长。如何监督？就是属于批评、建议。主要的方法就是批评，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达到团结，把工作改善。”

接着，毛泽东讲到了小民主和大民主，他说：

“现在工作方法已经改了，是小民主。但有些地方不实行小民主，任何民主都没有，横直是官僚主义。这样逼出一个大民主来了，于是乎罢工、罢课。我们不提倡罢工、罢课，提倡在人民范围之内的问题使用批评的方法来解决。**如果个别地方官僚主义十分严重，在这样一种范围内允许罢工、罢课。我们把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等，看做是克服人民内部矛盾、调整社会秩序的一种补充方法。**”

针对有人提出的单纯技术观点抬头的问题，毛泽东说：

“技术观点是好的，就是要发展科学技术，要有科学技术观点，要发展到大家都热心。但是，**不要搞单纯技术观点**。希望我们的同志们关心新的政治，关心新的大局。我们有些所谓的思想工作、政治工作、教育工作使人不能接受，无非是一种教条主义的，没有说服力，引不起他们的兴趣。所以，应该改善我们这个政治工作。”

在会议结束几天后，李立三由于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把他和陈独秀、张国焘、王明等同而论，而且还把他作为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中典型的坏例子，告诫全体党员要加强学习，加强改造，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当然是错误的，任何时候都可以当成坏的例子来教育全体党员引以为戒。但是，作为党员的李立三，不能因为犯了路线错误就永远是一个坏党员，永远是一个反面教员。允许一个同志犯错误，更允许一个同志改正错误，这是您的一贯思想。我现在是一个服从党中央领导的党员，我更争取做一个忠于党的事业的好党员。为了表达我对党的忠诚，今天我有这么一个想法，就如实向您汇报，不对请批评指正。”

毛泽东看了李立三的信，接受了他的意见，当即修改了其中一些欠妥的有关段落。

后来，毛泽东又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稿子寄给老朋友李达征求意见，李达十分感动地说：

“毛主席真是谦虚极了！这样的著作，我只能好好学习，哪里还能谈得上提意见呵！”

3月6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破例邀请科学、教育、文学艺术、新闻、出版等方面的党外人士160多人参加。会议主要议题是传达贯彻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

与会者首先听了毛泽东的讲话录音，然后分组讨论。

毛泽东在讨论期间先后召开了6个座谈会，这实际上是他又一次大规模的调查活动。

6日晚，毛泽东召集9省市宣传文教部长座谈会，康生在座。关于思想工作问题，毛泽东说：

**“第一书记要抓思想，回去告诉他们，希望第一书记把思想工作抓起来。第一书记才行，第二也不行。**光是宣传部，孤单单的不好办。管业务管得很好，不管思想工作，结果来了大民主，就会把你搞掉。各部门、各党组一定要管思想工作。省委要抓好思想工作，特别是第一书记，各司局都要管思想工作。”

康生插话说：

“团结，批评，团结，但往往一批之后，没达到新的团结，是批回去了，急得很，主要是仓促应战。”

毛泽东说：

“领导要对问题进行研究分析，才能解决问题。”

上海反映，党员与党员在报上斗。毛泽东说：

“党内思想也很混乱，不要害怕，要放手，怕什么，难道地球会炸了！”

康生插话说：

“党外也怕，怕宗派主义，不让人争鸣。”

有人反映老教授对“争鸣”还有顾虑，写文章不容易，第一天文章一登，第二天给人一批，学生对自己也不尊敬了。毛泽东说：

“那第三天再写一篇批回去就是了。”

关于闹事问题，毛泽东说：

**“特殊的、个别的犯法分子当然要按法律处理。一般闹事的不要开除，总开除不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外去，他总要有个立脚点，还不是到学校、机关、工厂、合作社去。**西安抓了100多个流氓，社会很高兴，但学生中‘流氓’跟社会流氓不同，知识分子不是社会那样‘流氓’法，如不犯法，仍不要开除。”

有人提出，兰州原要开除几十个学生，现在不开除了，又有点草率收兵。毛泽东说：

**“开除几十个学生是国民党办法，事情结束如不解决问题，将来还是要闹事的，如讲到兰州林业学校、护士学校招生骗人家，学生闹事，我是站在学生这方面的。你欺骗人家么！**（康生等：欺骗就是犯法，可以告到法院，有罪的。）像这样学校，你说是什么问题？这两校都是官僚主义，欺骗，又有官僚主义。”“我们要向党内外宣布，在人民内部无所谓专政，在人民内部讲专政是错误的！马克思什么时候说过人民自己专自己的政？个别犯法是例外，不犯刑法就不能法律制裁！”

有人说，有些教师认为不需要继续改造了。毛泽东说：

“**不要改造？我60多岁了，还要改造，一万年还要改造。人要前进，就要改造，这是合乎规律的。**如果还是老一套，像过去骑在马上打蒋介石那样，就不行，就要改。共产党还是有点人情，是做事的。说到学术，人家说我们‘不学无术’，我们这方面的确也是不多，所以很需要学习研究。”

3月7日晚8时40分，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普通教育工作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钱俊瑞、张际春、董纯才、罗承烈、曲乃生、何启君、刘建飞、古楳、周世钊、吴江声。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各省教育厅的负责人。彭真、康生、胡乔木也参加了座谈会。毛泽东在谈话中提出了不少问题，他说：

“我们的教学计划、教科书都是全国一致的。这种做法是不是有问题？各省是不是可以增加一些教材？各省是不是感到受限制？各省是不是还有私立中学？私立中学还是可以办的，办了之后政府不要去接收。私人办了，又被接收，私人办学的积极性就高不起来了。办戴帽中学还是一种好办法。**中学办在农村是先进经验，农民子弟可以就近上学，毕业后可以回家生产。”**

会议一直开到晚12时零5分才结束。

3月8日晚8时，毛泽东在颐年堂邀集沈雁冰、老舍、巴金、周信芳、徐平羽、方纪、于黑丁、周钢鸣、常苏民、蔡楚生、路坎、胡采、赵丹，座谈文艺界的问题。彭真、康生、陆定一、胡乔木、周扬、钱俊瑞在座。毛泽东在谈话中说：

“《新观察》上有一篇《在惠泉吃茶记》的文章，你们看过没有？”

沈雁冰看了看周扬说：

“我们没有注意到。”

毛泽东说：

“就在1月份第2期上，我建议你们去找来看看，作者叫姚雪垠。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很讲求艺术技巧。作者姚雪垠，你们知道不？”

周扬说：

“他在30年代就是作家，现在的政治态度为中间偏左！”

沈雁冰补充说：

“他在抗日战争时期，曾经写过轰动一时的小说。”

毛泽东说：

“看来，姚雪垠很会写文章。但他的文章也有毛病，阅后给人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感觉。恐怕作者有知识分子的清高吧。他轻视那些喝茶的群众是不对的，这就是‘君子’、‘小人’的观点。‘君子’在那里喝茶，‘小人’也来了，文章就显得这个作家在群众中落落寡合的样子。驳他的文章，我也看了一些，有个姚文元，写得还是比较有说服力的，我还得看下去。还是要帮助姚雪垠。”

他还说：

“中国自觉的文学批评的历史是从哪里开始的呢？从曹丕的《典论·论文》和曹植的《与杨德祖书》开始的吧？以后有《文心雕龙》等。韩愈是提倡古文的，其实他那个古文是新古文，道理是没有什么的，只要文章是新的。人家说好的，他说坏，人家说坏的，他说好。《昭明文选》里也有批评，昭明太子萧统的那篇序言里就讲‘事出于沈思’，这是思想性；又讲‘义归乎翰藻’，这是艺术性。单是理论，他不要，要有思想性，也要有艺术性。”

“**放一下就大惊小怪，这是不相信人民，不相信人民有鉴别的力量。不要怕。出一些《草木篇》**（流沙河的一组散文诗——笔者注），**就那样惊慌？你说《诗经》、《楚辞》是不是也有草木篇？《诗经》第一篇是不是《吻》这类的作品**（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 诗经》中的第一首诗《关雎》，通常认为是一首描写男女恋爱的情歌。十九世纪奥地利画家克里姆特的代表作《吻》，是一幅抽象主题的寓意画。画面表现的不是某个人的爱，而是人类普遍的对异性的爱——笔者注）**？不过现在发表不得吧？那《诗经》第一篇，我看也没有什么诗味。不要因为有些《草木篇》，有些牛鬼蛇神，就害怕得不得了。**”

整个座谈会充满着宽松活跃的气氛，开到晚11时55分就结束了。

3月9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由总理西罗基率领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代表团，他在谈话中说：

“**匈牙利事件证明，我们每个国家把工作做好是多么重要。**中国的群众很好，就是很穷，经济落后，文化落后，还要几十年才能改变这种情况。政治情况较好，这就是说人民是团结的。在团结方面也还有些问题，人民内部不是没有矛盾的，工作中也有缺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也还存在，有些地方影响了党和群众的关系。这些缺点要整，我们准备在全党整顿作风，准备在几个月或更长一些时间，一面工作，一面学习、批评，把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整一整。我们的党很大，掌握权力，做了许多好事，人民就拍掌，毛病就产生了，官僚主义就出来了。”

3月10日下午3时，毛泽东在颐年堂邀集邓拓、金仲华、徐铸成、赵超构、杨永直、范瑾、吴象、李超、常芝青、朱穆之、舒新城、曾彦修、黄洛峰、王芸生，座谈新闻出版方面的问题。康生、陆定一、胡乔木、周扬、钱俊瑞在座。毛泽东在谈话中说：

“前年年底，北京几天就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宣布进入社会主义，本来对这样的消息就要好好考虑，后来一广播，各地不顾本身具体条件，一下子都干起来，就很被动。”

有人反映，现在报纸编出来群众不爱看。毛泽东说：

“报纸是要有领导的，但是领导要适合客观情况。群众爱看，证明领导得好；群众不爱看，领导就不那么高明吧！”

毛泽东联想到主持上海《新民晚报》的赵超构提出的“软些，软些，再软些”的办报方针，就说：

“报上文章，‘短些，短些，再短些’，是对的；‘软些，软些，再软些’，就要考虑一下，软到哪里去呢？不要太硬了，太硬了人家不爱看，可以把软和硬两个东西统一起来，要软中有硬。**文章写得通俗、亲切，平等待人，不摆架子，由小讲到大，由近讲到远，引人入胜，这就很好。**板起面孔办报不好。你们赞成不赞成鲁迅？鲁迅的文章就不太软，但也不太硬，不难看。有人说杂文难写，难就难在这里。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样？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更多的可能是会写。俗话说得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会写。现在有些作家不敢写，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我们没有为他们创造敢写的环境，他们怕挨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本身唯物论没有学通。是彻底的唯物论者就敢写。鲁迅的时代，挨整就是坐班房和杀头，但是鲁迅也不怕。现在的杂文怎样写，还没有经验，我看把鲁迅搬出来，大家向他学习，好好研究一下。他的杂文写的方面很多，政治、文学、艺术等等都讲，特别是后期，政治讲得最多，只是缺少讲经济的。**鲁迅的东西，都是逼出来的。他的马克思主义也是逼着学的。他是书香门第出身，人家说他是封建余孽，说他不行。我的同乡成仿吾他们，对他就不好。国民党压他，我们上海的共产党员也整他，两面夹攻，但鲁迅还是写。”**

关于在报纸上如何开展批评？毛泽东说：

“**对人民内部问题进行批评，锋芒也可以尖锐**。我也想替报纸写些文章，但是要把主席这个职务辞了才成。我可以在报上辟一个专栏，当专栏作家。**文章要尖锐，刀利才能裁纸，但是尖锐得要是帮了人而不是伤了人。**在报纸上开展批评的时候要为人家准备楼梯，否则群众包围起来，他就下不了楼。反对官僚主义也是这样。‘三反’的时候，有许多部长就是中央给他们端了梯子接下楼来的。**过去搞运动是必要的，不搞不行，但是一搞又伤人太多，我们应当接受教训**。现在搞大民主不适合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有些人对别人总想用大民主，想整人，到了整自己，民主就越小越好**。我看在文学、新闻等方面，解决问题要用小小民主，小民主之上再加上一个‘小’字，就是毛毛雨，下个不停。”

这次会议开到傍晚6时40分结束。

3月11日晚8时30分，毛泽东在颐年堂邀集部分大学负责人座谈。参加的人员有：杨秀峰、陈望道、彭康、匡亚明、彭迪先、冯乃超、杨献珍、冯友兰、胡锡奎。彭真、康生、陆定一、陈伯达、张际春、胡乔木、周扬、钱俊瑞在座。

冯友兰来到会议厅，毛泽东微笑着对他吟诵道：

“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

在场的人见毛泽东如此幽默，全都被逗笑了，冯友兰也笑了。原来在不久前，冯友兰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论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一文，其中对孔子的“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发表了一些新议论。显然毛泽东是看过了冯友兰的文章。冯友兰见毛泽东在百忙中还这样关注他的研究成果，倍感荣幸。

这次座谈会开到晚上11时25分才结束。毛泽东送冯友兰到门口，握着他的手说：

“友兰先生，百家争鸣，你就是一家嘛，好好地鸣吧，你写的东西我都看。”

欲知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将要发表什么远见卓识，请往下看。

东方翁曰：《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毛泽东在新中国建立后的又一部重要文献。正像以前一样，在研究重大理论问题的时候，他是极其慎重的。他反复地征求了各方面的意见，反复地修改提纲。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会议传达《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期间，他又召开了6次座谈会，广泛地调查研究，征求意见。会议结束后不久，他又乘车南下，一路宣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收集反馈意见，继续修改，直到6月19日才在《人民日报》上正式发表。其良苦用心，你越往下看才会越明白。

**第32章**

**“修正主义者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

**阶级专政的区别。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

**本主义路线。在现在的情况下，修正主义是比教条主义更有害的东西。我**

**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话说1957年3月12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参看《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摘要如下：

“这次会议开得很好。会议中间提出了很多问题，使我们知道了很多事情。我现在就同志们所讨论的问题讲几点意见。

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期。中国社会很久以来就处在大变动中间了。抗日战争时期是大变动，解放战争时期也是大变动。但是就性质说来，现在的变动比过去的变动深刻得多。**我们正在建设社会主义。有几亿人口进入社会主义的改造运动。全国各个阶级的相互关系都在起变化。农业和手工业方面的小资产阶级和工商业资产阶级，都发生了变化。社会经济制度变化了，个体经济变为集体经济，资本主义私有制正在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样的大变动当然要反映到人们的思想上来。存在决定意识。在不同的阶级、阶层、社会集团的人们中间，对于这个社会制度的大变动，有各种不同的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热烈地拥护这个大变动，因为现实生活证明，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唯一的出路。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一场伟大的斗争，是社会制度和人的相互关系的一场大变动。**应该说，情况基本上是健康的。但是，新的社会制度还刚刚建立，还需要有一个巩固的时间。不能认为新制度一旦建立起来就完全巩固了，那是不可能的。需要逐步地巩固。**要使它最后巩固起来，必须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坚持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经常的、艰苦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除了这些以外，还要有各种国际条件的配合。**在我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还要经过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但是，我们大家都应该看到，这个社会主义的新制度是一定会巩固起来的。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

第二点：关于我国知识分子的情况。中国究竟有多少知识分子，没有精确的统计。有人估计，各类知识分子，包括高级知识分子和普通知识分子在内，大约有500万左右。**这500万左右的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人都是爱国的，爱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服务。**有少数知识分子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是不那么欢迎、不那么高兴的。他们对社会主义还有怀疑，但是在帝国主义面前，他们还是爱国的。**对于我们的国家抱着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这种人不喜欢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他们留恋旧社会。一遇机会，他们就会兴风作浪，想要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这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路线、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中间，顽固地要走后一条路线的人。这后一条路线，在实际上是不能实现的，所以他们实际上是准备投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这种人在政治界、工商界、文化教育界、科学技术界、宗教界里都有，这是一些极端反动的人。”**“**有一些人虽然不公开表示不赞成马克思主义，但是实际上不赞成。这种人在很长的时间内都会有的，我们应该允许他们不赞成。”**“如果在今后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在我们的知识分子中间能够有比较多的人接受马克思主义，能够有比较多的人通过工作和生活的实践，通过阶级斗争的实践、生产的实践、科学的实践，懂得比较多的马克思主义，这样就好了。这是我们的希望。

第三点：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文化不发达的国家。500万左右的知识分子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来说，是太少了。**没有知识分子，我们的事情就不能做好，所以我们要好好地团结他们。**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主要的社会成员是3部分人，就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他们的工作是为人民服务的，也就是为工人农民服务的。**知识分子，就大多数来说，可以为旧中国服务，也可以为新中国服务，可以为资产阶级服务，也可以为无产阶级服务。在为旧中国服务的时候，知识分子中的左翼是反抗的，中间派是摇摆的，只有右翼是坚定的。现在转到为新社会服务，就反过来了。左翼是坚定的，中间派是摇摆的（这种摇摆和过去不同，是在新社会里的摇摆），右翼是反抗的。知识分子又是教育者。我们的报纸每天都在教育人民。我们的文学艺术家，我们的科学技术人员，我们的教授、教员，都在教人民，教学生。因为他们是教育者，是当先生的，他们就有一个先受教育的任务。在这个社会制度大变动的时期，尤其要先受教育。过去几年，他们受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有些人并且很用功，比以前大有进步。但是就多数人来说，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完全代替资产阶级世界观，那就还相差很远。有些人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自以为有学问了，但是并没有读进去，并没有在头脑里生根，不会应用，阶级感情还是旧的。还有一些人很骄傲，读了几句书，自以为了不起，尾巴望到天上去了，可是一遇风浪，他们的立场，比起工人和大多数劳动农民来，就显得大不相同。前者动摇，后者坚定，前者暖昧，后者明朗。因此，**如果认为教人者不需要再受教育了，不需要再学习了，如果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只是要改造别人，改造地主、资本家，改造个体生产者，不要改造知识分子，那就错误了。知识分子也要改造，不仅那些基本立场还没有转过来的人要改造，而且所有的人都应该学习，都应该改造。我说所有的人，我们这些人也在内。情况是在不断地变化，要使自己的思想适应新的情况，就得学习。即使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已经了解得比较多的人，无产阶级立场比较坚定的人，也还是要再学习，要接受新事物，要研究新问题。**知识分子如果不把自己头脑里的不恰当的东西去掉，就不能担负起教育别人的任务。我们当然只能是一面教，一面学，一面当先生，一面当学生。要作好先生首先要作好学生。**许多东西单从书本上学是不成的，要向生产者学习，向工人学习，向贫农下中农学习，在学校则要向学生学习，向自己教育的对象学习。**据我看，在我们的知识分子中间，多数人是愿意学习的。我们的任务是，在他们自愿学习的基础上，好心地帮助他们学习，通过适当的方式来帮助他们学习，而不要用强制的方法勉强他们学习。

第四点：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结合的问题。知识分子既然要为工农群众服务，那就首先必须懂得工人农民，熟悉他们的生活、工作和思想。**我们提倡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如果一辈子都不同工人农民见面，这就很不好。我们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文学家、艺术家、教员和科学研究人员，都应该尽可能地利用各种机会去接近工人农民。有些人可以到工厂农村去看一看，转一转，这叫‘走马看花’，总比不走不看好。另外一些人可以在工厂农村里住几个月，在那里作调查，交朋友，这叫‘下马看花’。还有些人可以长期住下去，比如两年、三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就在那里生活，叫作‘安家落户’。”**“让知识分子直接接触工人农民，过去在延安时期曾经这样做过。那时候，延安的许多知识分子思想很乱，有各种怪议论。我们开了一次会，劝大家到群众里面去。后来许多人去了，得到很好的效果。知识分子从书本上得来的知识在没有同实践结合的时候，他们的知识是不完全的，或者是很不完全的。知识分子接受前人的经验，主要是靠读书。书当然不可不读，但是光读书，还不能解决问题。一定要研究当前的情况，研究实际的经验和材料，要和工人农民交朋友。”“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如果不把过去的一套去掉，换一个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就和工人农民的观点不同，立场不同，感情不同，就会同工人农民格格不入，工人农民也不会把心里的话向他们讲。**知识分子如果同工农群众结合，和他们做了朋友，就可以把他们从书本上学来的马克思主义变成自己的东西。学习马克思主义，不但要从书本上学，主要地还要通过阶级斗争、工作实践和接近工农群众，才能真正学到。**如果我们的知识分子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又在同工农群众的接近中，在自己的工作实践中有所了解，那么，我们大家就有了共同的语言，不仅有爱国主义方面的共同语言、社会主义制度方面的共同语言，而且还可以有共产主义世界观方面的共同语言。如果这样，大家的工作就一定会做得好得多。

第五点：关于整风。整风就是整顿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共产党内的整风，在抗日时期进行过一次，以后在解放战争时期进行过一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又进行过一次。现在共产党中央作出决定，准备党内在今年开始整风。”“这一次整风，主要是要批评几种错误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一个是主观主义，一个是官僚主义，还有一个是宗派主义。”“我们的党是一个伟大的党，光荣的党，正确的党。这是必须肯定的。但是我们还有缺点，这个事实也要肯定。不应该肯定我们的一切，只应该肯定正确的东西；同时，也不应该否定我们的一切，只应该否定错误的东西。”“一个共产党，一个国民党，这两个党比较起来，谁怕批评呢？国民党害怕批评。它禁止批评，结果并没有能够挽救它的失败。共产党是不怕批评的，因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真理是在我们方面，工农基本群众是在我们方面。我们过去说过，整风运动是一个‘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整风就是全党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学习马克思主义。”“我们国家要有很多诚心为人民服务、诚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立志改革的人。我们共产党员都应该是这样的人。”“我们的政权的建立还不过短短几年，人们可以看到，不论在经济方面，在文化、教育、科学方面，都已经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为了达到建设新中国的目的，对于什么困难我们共产党人也是无所畏惧的。但是仅仅依靠我们还不够。我们还需要有一批党外的志士仁人，他们能够按照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方向，同我们一起来为改革和建设我们的社会而无所畏惧地奋斗。**要使几亿人口的中国人生活得好，要把我们这个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富裕的、强盛的、具有高度文化的国家，这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我们所以要整风，现在要整风，将来还要整风，要不断地把我们身上的错误东西整掉，就是为了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担负起这项任务，更好地同党外的一切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共同工作。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我们希望一切同我们共同奋斗的人能够勇敢地负起责任，克服困难，不要怕挫折，不要怕有人议论讥笑，也不要怕向我们共产党人提批评建议。‘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们在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时候，必须有这种大无畏的精神。”**

**“**第六点：片面性问题。片面性就是思想上的绝对化，就是形而上学地看问题。对于我们的工作的看法，肯定一切或者否定一切，都是片面性的。这样看问题的人，现在在共产党里面还是不少，党外也有很多。肯定一切，就是只看到好的，看不到坏的，只能赞扬，不能批评。说我们的工作似乎一切都好，这不合乎事实。不是一切都好，还有缺点和错误。但是也不是一切都坏，这也不合乎事实。要加以分析。否定一切，就是不加分析地认为事情都做得不好，社会主义建设这样一个伟大事业，几亿人口所进行的这个伟大斗争，似乎没有什么好处可说，一团糟。许多具有这种看法的人，虽然和那些对社会主义制度心怀敌意的人还不相同，但是这种看法是很错误的，很有害的，它只会使人丧失信心。**不论是用肯定一切的观点或者否定一切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工作，都是错误的。对于这些片面地看问题的人，应该进行批评，当然要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去批评，要帮助他们。”**

“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列宁有一部分文章也可以说是杂文，也有讽刺，写得也很尖锐，但是那里面就没有片面性。鲁迅的杂文绝大部分是对敌人的，列宁的杂文既有对敌人的，也有对同志的。**鲁迅式的杂文可不可以用来对付人民内部的错误和缺点呢？我看也可以。当然要分清敌我，不能站在敌对的立场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来对待同志。必须是满腔热情地用保护人民事业和提高人民觉悟的态度来说话，而不能用嘲笑和攻击的态度来说话。”**

**“在我们的社会里，革命的战斗的批评和反批评，是揭露矛盾，解决矛盾，发展科学、艺术，做好各项工作的好方法。**

第七点：‘放’还是‘收’？这是个方针问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同志们在讨论中间是不赞成收的，我看这个意见很对。党中央的意见就是不能收，只能放。

领导我们的国家可以采用两种不同的办法，或者说两种不同的方针，这就是放和收。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不怕错误的议论，不怕有毒素的东西；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批评批评者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不是压服，而是说服，以理服人。收，就是不许人家说不同的意见，不许人家发表错误的意见，发表了就‘一棍子打死’。这不是解决矛盾的办法，而是扩大矛盾的办法。”

“百花齐放是一种发展艺术的方法，百家争鸣是一种发展科学的方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好方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人们历来不是讲真善美吗？真善美的反面是假恶丑。没有假恶丑就没有真善美。真理是同谬误对立的。在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统一体总要分解为不同的部分，只是在不同的具体条件下，内容不同，形式不同罢了。任何时候，总会有错误的东西存在，总会有丑恶的现象存在。任何时候，好同坏，善同恶，美同丑这样的对立，总会有的。香花同毒草也是这样。它们之间的关系都是对立的统一，对立的斗争。有比较才能鉴别。有鉴别，有斗争，才能发展。真理是在同谬误作斗争中间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在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作斗争中发展起来，而且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

我们主张放的方针，现在还是放得不够，不是放得过多。不要怕放，不要怕批评，也不要怕毒草。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不怕批评，它是批评不倒的。共产党、人民政府也是这样，也不怕批评，也批评不倒。错误的东西总会有的，并不可怕。**最近一个时期，有一些牛鬼蛇神被搬上舞台了。有些同志看到这个情况，心里很着急。我说，有一点也可以，过几十年，现在舞台上这样的牛鬼蛇神都没有了，想看也看不成了。我们要提倡正确的东西，反对错误的东西，但是不要害怕人们接触错误的东西。单靠行政命令的办法，禁止人接触不正常的现象，禁止人接触丑恶的现象，禁止人接触错误思想，禁止人看牛鬼蛇神，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当然我并不提倡发展牛鬼蛇神，我是说‘有一点也可以’。某些错误东西的存在是并不奇怪的，也是用不着害怕的，这可以使人们更好地学会同它作斗争。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

**在我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还会长期存在。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我们已经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方面，取得了基本胜利，但是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方面，我们还没有完全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不了解这种情况，放弃思想斗争，那就是错误的。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但是，这种批判，应该是充分说理的，有分析的，有说服力的，而不应该是粗暴的，官僚主义的，或者是形而上学的、教条主义的。

**长时间以来，人们对于教条主义作过很多批判。这是应该的。但是，人们往往忽略了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都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滞不前。停止了，老是那么一套，它就没有生命了。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是不能违背的，违背了就要犯错误。用形而上学的观点来看待马克思主义，把它看成僵死的东西，这是教条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这就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者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在现在的情况下，修正主义是比教条主义更有害的东西。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正如前面《戚本禹回忆录》中提到的，曾经多次聆听毛泽东讲话的著名作家和翻译家傅雷在一封家书中写道：“毛主席的讲话，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富于幽默感；而且没有教训口气，速度恰当，间以适当的pause（停顿），笔记无法传达。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讲话的逻辑都是隐而不露，真是艺术高手。沪上文艺界半年来有些苦闷，地方领导抓得紧，仿佛一批评机关缺点，便会煽动群众；报纸上越来越强调‘肯定’，老谈一套‘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等等（这话并不错，可是老挂在嘴上，就成了八股）。毛主席大概早已嗅到这股味儿，所以从1月18日至27日就在全国省市委书记大会上提到百家争鸣问题，2月底的最高国务会议更明确的提出，这次3月12日对我们的讲话，更为具体，可见他的思考也在逐渐往深处发展。他再三说人民内部矛盾如何处理对党也是一个新问题，需要与党外人士共同研究；党内党外合在一起谈，有好处；今后三五年内，每年要举行一次。他又嘱咐各省市委也要召集党外人士共同商量党内的事。他的胸襟博大，思想自由，当然国家大事掌握得好了。毛主席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会贯通了的人。”

3月13日，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闭幕。

这天晚上8时许，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自然科学界和社会科学界的部分知名人士座谈。参加的人员有：郭沫若、童第周、钱三强、谈家桢、潘梓年、向达、费孝通、沈志远、翦伯赞、张劲夫、于光远。另有彭真、康生、陆定一、陈伯达、张际春、胡乔木、周扬、钱俊瑞、杨秀峰、黄松龄在座。毛泽东问北京大学副校长兼历史系主任翦伯赞：

“在高等院校做领导，有什么问题和意见？”

翦伯赞反映说：

“现在是重理轻文。”

毛泽东说：

“从我们的历史和现状来看，重理有道理，但轻文就不对了。”

著名遗传学家谈家桢到会比较晚，一走进接见厅，他就看见毛泽东正满面春风地同早已来到的人们交谈着，于是就怀着崇敬的心情，走到毛泽东面前问好。陆定一起身介绍说：

“这位是谈家桢先生。”

“哦，”毛泽东站起来，微笑着握住谈家桢的手，不住地摇着说：“你就是遗传学家谈家桢先生啊！”

说罢，请大家坐下，他问谈家桢：

“谈先生对贯彻双百方针，和对遗传学研究工作有什么意见？”

谈家桢说：

“在1956年青岛遗传学工作座谈会上，大家都认为，主席提出的双百方针，挽救了中国的遗传学，使遗传学和遗传学工作者获得了新生。”

原来，谈家桢是世界生物遗传学和基因工程的基因学说创始人摩尔根的入室弟子。他提出的“异色瓢虫斑嵌镶显性遗传理论”，受到国际遗传学界高度重视，被认为是对摩尔根遗传学说的一大贡献，成为中国在世界上最负盛名的遗传学家。可是就在谈家桢即将归国的1948年，刚刚结束的苏联农科院大会，宣布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基因理论是“反动唯心主义”的遗传学说。新中国建立后，苏联以“米丘林生物学”倡导者自居的李森科的理论在中国大行其道。1950年，苏联遗传所副所长努日金教授来华讲学，指名道姓要与在1948年底归国的谈家桢讨论，要谈家桢“从反动的遗传学圈子里跳出来”。国内也有人写文章，对摩尔根遗传学进行公开批判，谈家桢感到了沉重的压力。苏共二十大召开之后，李森科的理论才开始遭到科学界的反对和清算。1956年8月，毛泽东促成了由中宣部和中科院及高教部共同主持召开的青岛遗传学座谈会。此前，毛泽东在一份有关反映东欧共产党内对遗传学问题看法的报告上，批示道：“此件值得注意。请中宣部讨论一下这个问题。讨论时，邀请科学院及其有关负责同志参加。陆定一同志回来，请将此件给他一阅。”这一天，毛泽东还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就这样，有116位专家教授参加的青岛遗传学座谈会，一开就是15天，谈家桢心情特别舒畅，以至举杯痛饮，酩酊大醉。所以，这一次，谈家桢见到毛泽东，就说是双百方针挽救了中国的遗传学。

毛泽东鼓励谈家桢说：

“谈先生，你们青岛会议开得好嘛！过去我们学习苏联，有些地方很不对头，现在让大家搞嘛！你一定要把遗传学研究工作搞起来，要坚持真理，可不要怕。”

他还问：

“把遗传学研究搞上去，有什么困难吗？”

“没有。”

谈家桢显然很有信心。毛泽东高兴地说：

“那好。希望你继续努力，在遗传学研究工作中做出新成绩。”

坐在旁边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建议说：

“为了尽快把中国遗传学研究搞上去，我们是不是把谈先生调来北京，主持中科院遗传所的筹备工作？”

此时的谈家桢是复旦大学生物系的主任。毛泽东尚未表态，在座的高教部部长杨秀峰立即表示反对，他说：

“你们把高校的名教授都挖走了，我们的大学还怎么办？”

众人见郭沫若和杨秀峰这两个耳背的人争了起来，便戏言他们是“二龙抢珠”。毛泽东见双方争执不下，也笑着向他们摆摆手，风趣地说：

“我看还是这样，从现在开始划一条‘三八线’，到此为止，以后科学院不得再从高校中挖人。”

不久，谈家桢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复旦大学重新开设了遗传学课。

3月15日，毛泽东起草了一个《中共中央关于民主办社几个事项的通知》，他写道：

为着继续巩固农业合作社制度，争取今年农业的大丰收，中央认为坚持民主办社的方针是很重要的。就现在的情况来看，应该注意以下3个主要事项。

第一，**农业合作社要按时公开财政收支。其中包括产品的分配、在银行的存款、国家的预购款、国家的贷款和它的用途、生产资料和用具的购置、干部的补贴、社员的预支、国家救济款的处理，等等。**所有这一切财政收支，都同全体社员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因此，都必须按时公布（有的随时公布，有的定期公布），让全体社员知道，由群众参预评议，而**不能由少数干部独揽支配的大权，以便避免各种营私舞弊的行为，保证社干部的廉洁，消除社员对于财政问题的疑虑。**必须知道，凡是没有这样做的合作社，社员们对于财政问题是存在着很大疑虑的。

第二，**社和队决定问题要同群众商量。例如关于生产的布置。农业技术的改进，耕作制度的改变，新种子的采用，合作社的基本建设，经营管理，等等问题，都应该由干部和群众共同讨论，既要照顾国家的计划和政策，又要因地制宜，按照当地的土地条件、季节条件以及其他经济条件，反复研究几次，稳步前进。**凡是当地已经行之有效的办法，必须采取积极的态度，继续加以支持和推广。但凡是还没有经过实地典型试验的，则应该采取很慎重的态度，充分注意老农的意见。**老农虽然有些保守的缺点，但他们有很多的经验，如果有些办法是多数老农不同意的，不要草率从事。**各农业合作社可以考虑组织一个技术顾问委员会，吸收有经验的老农参加，各生产队也可以考虑请本队中一个有经验的老农当顾问，以便充分利用老农的有益的合理的经验，特别是关于精耕细作、细打细收的经验。

第三，**干部要参加生产。农业合作社的社长、副社长以及其他干部都应该利用一切可能的时间做到这点。**大社的事情多些，但干部们争取一部分甚至大部分的时间参加生产，也还是可能的。最近有些地方的合作社在作了多少程度不等的整顿之后，干部纷纷下地参加生产，在社员群众中引起了很好的影响，大大地刺激了社员们的生产积极性。这个经验有普遍性的意义，很值得各地注意。这种作法使社干部的生活不必完全由社补贴，可以只由社补贴那些因公误工的部分，因而能够减少社员的负担，同时也**使干部们能够联系生产的实践，了解生产中的具体问题，对于领导社和队的生产有很大好处。**为此，县、区、乡各级党委在领导方法上也应该相应地有所改进，例如减少一些不必要的会议，不要时常调集社干部到县区开会，有问题时，由县区干部分头下去传达和解决，以便减少或避免社干部在时间上和经济上的浪费。

中央认为实现上述3项措施，将会大大地改善各农业合作社干部同群众的关系，加强干部同群众的团结，促进今年农业生产的高潮。希望省、市、县、区、乡各级党委根据各地合作社的具体情况，加以适当处理，并使这些措施长期坚持下去，成为习惯。

（此件发到乡支部。）

1957年3月15日

3月16日凌晨，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传达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指示》，他写道：

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解放军总政治部、中直党委、国家机关党委：

中央在1957年3月6日至13日召开了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这次会议吸收了党外科学、教育、文学、艺术、新闻、出版等文化人士约160人参加（占全体参加人数的五分之一）。会议首先听取了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扩大会议上所作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录音。在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志分别和宣传、教育、文艺、新闻出版、高等学校、科学等方面的几十位党内外代表人物举行了6次座谈，并亲自向大会作了讲话。

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胜利，使我国的社会性质和社会面貌发生大变动。**几万万人口进入社会主义这件事实，必然会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引起反映。**现在，大规模的群众行动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人民内部的矛盾开始表露出来。**我国有大约500万知识分子，他们在教育、文艺、科学、技术、新闻、出版等事业中和党、政、军的机关中工作，他们是人民之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人，是教育人民的人，离开了他们就不能建设社会主义。**他们可以分为3个部分：极少数是反对社会主义的，他们之所以反对社会主义，是因为他们受剥削阶级的影响甚深；有少数人（大约10%左右），包括党内党外，是不但很积极地赞成社会主义制度，而且掌握了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是先进人物；最大部分的人，即80%以上，是愿意接受社会主义的制度，但是他们的世界观还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在上述的80%以上的这部分的知识分子中，有的是唯心主义者，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的；有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抱着怀疑态度的；有很多是略为知道些马克思主义，也想学习马克思主义，但是他们只愿意在自愿的基础上，在别人善意的帮助之下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对于用粗暴态度强制学习则抱有反感。知识分子的这种情况，将会长期存在。各种不同的知识分子，表露自己不同的观点，是很自然的事情。

在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的时候，党中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这个政策的目的，是用说服的方法，用自由辩论的方法，而不是用粗暴的方法，向知识分子进行长期的、耐心的、细致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促进我国的科学文艺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迅速地繁荣起来。**党认识到，必须把在敌我问题上和是非问题上两种不同的矛盾加以严格的区别。人民内部的矛盾，特别是思想上的问题，只能根据“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以便在新的基础上达到团结”的原则。**我们必须采取正确的方法，帮助知识分子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接近工农群众。我们要做到在一个长时期（比如说15年）内，使全国的知识分子，从学习和实践中，从同工农群众的接触中，有更多的人（比如说三分之一）能够领会和掌握马克思主义。

现在，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中，存在着一些不正常的状态。这种不正常状态的原因，是**党内存在着两种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就是教条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教条主义用粗暴的而不是说服的办法，用斥责而不是说理的办法，用强迫而不是自愿的办法，来对待知识分子，对待思想问题，对待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有教条主义思想的同志，他们对于我们过去的工作肯定一切，只看到成绩，没有看到缺点，骄傲自满，害怕批评，懒于说理，对于不同的意见，要求采取简单的压服的办法。**很多的同志实际上不赞成或不完全赞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策。右倾机会主义则对于我们过去的工作否定一切，只看到缺点，没有看到成绩，因而丧失信心，把伟大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描写为漆黑一团。右倾机会主义者实际上做了资产阶级的应声虫**。必须在党内党外，反对这两种错误思想，反对这两种片面性，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策。

这次宣传工作会议的一个重要经验，是党员和党外人士一起开会，这不但对于密切党员与非党员的团结有好处，对于了解情况，听取意见，讨论和研究问题，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也是很有好处的。

中央认为这次会议对今后的思想工作有极重要的意义，各地必须组织深入的传达和讨论。各省（市）应该同样召开宣传工作会议，并且像中央召开的这次宣传工作会议一样，吸收党外的教育、文艺、科学、技术、新闻、出版界人士参加，开会时间一周左右即可。此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各方提出的问题有一百数十条之多，这些问题，都由到会的人带回各地，以便继续讨论。你们的宣传工作会议，除了继续讨论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中提出的问题以外，还应继续收集和讨论新提出来的宣传工作中的问题。并且应当充分发扬民主，特别要让党外人士讲出内心的话。中央认为，各省（市）委的第一书记必须亲自领导思想工作，并指导会议的进行。这种党内党外一起参加的宣传工作会议，今后每年在中央和省市均应举行一次或两次。各省（市）应该尽量吸收地县（市）委书记听取关于毛泽东同志讲话的传达报告。

中央 1957年3月16日

此时已是凌晨4时，毛泽东又写了一个批示，他写道：

“即送周、陈、彭真、定一阅，尚昆用电报发去，另印发如前示。”

3月17日上午10时，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南下，此行的目的是向一些地方党员干部宣讲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以及双百方针。

中午时分，专列到了天津，毛泽东在专列上召见天津市委负责人黄火青、吴砚农、万晓塘、李耕涛、李华生。他说，他计划在天津接见党员干部并讲话。黄火青等赶紧回去四处找人，通知会议，安排会场。

毛泽东在专列上为加强学校思想政治工作问题给周恩来等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恩来、陈云、彭真、定一同志：

大学、中学都要求加强思想、政治领导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要削减课程，要恢复中学方面的政治课，取消宪法课，要编新的思想、政治课本，**要下决心从党政两系统抽调几批得力而又适宜于学校工作的干部去大、中学校工作，要赋予高等教育部和教育部以领导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务**。以上各点，请中央讨论一次，并作出决定。我已到天津。

毛泽东 1957年3月17日

下午，毛泽东在天津干部俱乐部游泳池游泳。

是日晚，毛泽东在市委几位书记黄火青、吴砚农、万晓塘、李耕涛陪同下，在天津人民礼堂与近千余名干部见了面，并发表了讲话，他一开始就说：

“**讲‘双百’方针吧！这是全党关心的问题。党内有赞成的，有不舒服的，有怀疑的。”**

接着，毛泽东说：

“过去几十年，从有我们这个党以来，一直到去年上半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我们党的精力主要是放在阶级斗争上。现在有些人说，共产党搞科学不行，大学里头教书不行，医院里头当医生不行，工厂里头当工程师、当技术人员不行。我说这个话讲得对，讲得合乎事实，就是我们没有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医生、大学教授。这是我们不行的方面。但是他们这个话也是不全面的，讲对了一半，还有一半是不对的。就具体的业务、具体的技术来说，我们是不能领导；就整个科学的前进这方面，我们能够领导，就是以政治去领导，以国家计划去领导。我们只有一个出路，就是向他们学习。有10年到15年，就可以学到。不仅在政治上领导他们，而且在业务上、在技术上领导他们。

现在，阶级斗争这件工作基本上结束。所谓基本上结束，就不是完全结束。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党的‘八大’说了。我们全党要来搞建设，要学科学，要学会在大学里头当教授，在科学研究机关里头做实验、研究科学。要学会当工程师，当技术人员，当医生。要率领整个社会跟自然界作斗争。要把中国的面貌加以改变。为了改变中国的政治面貌，我们花了几十年时间。要大体改变经济面貌，也要有几十年时间。我们过去不会搞阶级斗争，经过许多失败，经过许多变化，我们学会了，善于搞阶级斗争了。现在我们搞建设也要几十年，是不是可以比我们在学习阶级斗争时所付出的代价少一点？如果我们不重复从前的错误，那么我们在建设的时候就可以付出比较少的代价，可以避免匈牙利事件那样的事情。

因为阶级斗争基本结束而显露出来的各种东西，各种不满意，许多错误的议论，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方针？我们应该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讨论中、在辩论中去解决。只有这个方法，别的方法都不妥。**而现在党内有一种情绪，就是继续过去那种简单的方法，你不听话，就‘军法从事’。那是对付敌人的，那个方法不行了。凡是科学方面的问题，思想方面的问题，精神方面的问题，都不能用粗暴的方法。**有两个方法，一个叫压服，一个叫说服。是采取压服的方法，还是采取说服的方法？现在我们有一些同志等不及了，大有要压一下的想法。压是压不服人的，只会使我们处于不利的地位。如果用压服的方法，我们就没有理，就站不住脚，我们就输了。我们要学会说理，学会写说理的文章，学会作说理的报告。曾经有个同志跟我讲：‘搞那么多道理，老子就搞不惯。老子就是一冲。’我说你一冲呀，不能解决问题，要加以分析，要研究，写出有说服力的文章才行。**至于各种错误的意见在报纸上、刊物上发表，开座谈会评论，会不会把我们的天下搞乱，把人民政府搞倒？我说完全不会。因为他们不是反革命，不是特务，他们中的大多数愿意跟我们合作，只有极少数人是敌视我们的。**”

毛泽东又从扩大《参考消息》发行范围问题，讲到了党内党外都应该受锻炼，见世面。他还强调说：

“不要把自己关在房子里，把眼睛封起来，把耳朵封起来，那很危险。马克思主义是同它的敌对力量作斗争中创造出来的，发展起来的。现在还要发展。比如我们中国办事情，如果我们不发展马克思主义，那么事情就办不好。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原则到中国来实行的时候，就要带有中国的色彩，就要按照具体情况解决问题。如采取压服的方法，不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那就会使我们的民族不活泼，简单化，不讲道理，使我们的党不去研究说理，不去学会说理。马克思主义要跟非马克思主义作斗争才能发展起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所以需要，就是这个道理。”

这天晚上，毛泽东离开了天津，继续南行，六下济南。

3月18日清晨，毛泽东到了济南。他不住宾馆，而是与山东省委书记、济南军区第一政委舒同住进了临铁路线的一幢房子里。毛泽东说：

**“我在北京不愉快。**”

他们在一起除了谈工作，就是谈诗词，谈书法。**关于乾隆的书法，毛泽东说：**

**“他的字有筋无骨，到处写，我不怎么喜欢。”**

他说舒同的字有风度，有出处，好看。他们有时还谈中医。毛泽东说：

“我看中医少说也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西医有多少年？就算100年吧，那1900多年老百姓怎么过的？还不是靠中医中药，应该说中医中药是有功的。中医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对中医中药要用现代科学知识去整理、研究、提高。取长补短。要发展中国的新医学派。**阴阳五行为什么不能拿现代术语表达？一代人搞不清两代人行不行？10代人行不行？

他还说：

“鲁迅的父亲病了，请中医看，可是药引子难找，像经霜3年的甘蔗；要吃破鼓皮丸，用打破的鼓皮制成的；还要蟋蟀一双，要原配。”

说罢，他自己先笑了，点着一支烟，吸了一口，接着说：

“后来他父亲病死了，鲁迅对中医很有看法，不信中医。他的这个观点不大对。他找的是庸医，不要受这个影响。**中西医要很好地结合。**”

是日晚7时50分，毛泽东来到山东省政府大礼堂，对省级机关处级以上党员干部讲话。他说：

“去年下半年以来，我们党里头，社会上，人们的思想有一些乱，比如批评共产党的人多了，党外人士敢于讲话了，敢于讲我们党的缺点了。有人说共产党能不能领导科学？对社会主义有没有优越性也发生怀疑了。有一些人讲没有优越性，合作社办得不好。**有一些知识分子讲，美国比中国好，比苏联好**。去年这一年，特别是下半年，人民内部闹事也发生了不少。报纸上，小品文、讽刺文章多起来了，批评缺点、冷风热嘲多起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就跟着资产阶级走，否定一切，不加分析，把情况看得比较坏。**另外一些共产党员就不服气，说：‘都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条闹出来的’。**所以，**我们党里头有两种人。一种人，外面讲什么，他们也跟着讲；另一种人就想收，谁不听话的时候就想压一下子。**这是现在的情况。”

对于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毛泽东分析说：

“外国的事情对我们有影响，比如苏共二十大把斯大林批评了，后头发生波兰、匈牙利的事件，国际上有反苏反共的风潮。还有我们工作中的错误，无论是肃反、土改、合作化、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中间，都有主观主义的错误，有官僚主义的错误，也有宗派主义的错误。这些引起一些人的思想混乱。有外国的影响，但主要还是我们国内的原因。我们现在处在这么一个时代，就是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第8次代表大会作了结论的，这个结论是合乎情况的。我们过去反对蒋介石，解放战争，是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土改，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是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改造，也是阶级斗争。这么一场大斗争到去年上半年基本上结束了，人民内部的问题就显出来了。基本的原因是这个原因。人民内部的问题多起来了，就暴露出来许多思想问题，就有一些乱了。过去是不是有思想问题呢？过去有的，实际上我们刚进城那几年更乱一些。但是，那些不同的意见，那些意见分歧，被大规模的阶级斗争所掩盖了。”

关于“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这一结论，毛泽东解释说：

“所谓基本上结束，就是说还有阶级斗争，特别是表现在意识形态这一方面。只说基本结束，不说全部结束。这一点要讲清楚，不要误会。这个尾巴要吊很长时间。特别是意识形态这一方面的阶级斗争，就是无产阶级思想跟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我们是把它当作内部矛盾来处理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我们的任务转到什么地方？转到搞建设，率领整个社会，率领6亿人民，同自然界作斗争，把中国兴盛起来，变成一个工业国。”

关于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斗争谁胜谁负的问题，毛泽东说：

“按照八次大会所说的，基本上分了胜负的，就是资本主义失败了，社会主义胜利了。是不是最后胜利了呢？那还没有。最后胜利还要有一个时期，大概要3个‘五年计划’。至于两种思想的斗争，资产阶级思想同无产阶级思想，马克思主义同非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那就要更长一点了。我今天讲的总题目叫作思想问题，这是有理由的。尽管社会制度起了变化，但是那个思想还相当顽固地保存着。特别是在世界观这方面。是资产阶级世界观，还是无产阶级世界观；是唯心论，还是唯物论；是形而上学的唯物论或者是形而上学的唯心论，还是辩证唯物论。这样两种思想方面的斗争，时间还要更长一些。”

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毛泽东说：

“在我们这个国家，知识分子是相当值钱的，我们一天也离不开他们。所以，我们要争取他们，在世界观这个问题上，要使他们变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这大约需要经过3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到那个时候，马克思主义就可以取得决定性胜利。”

毛泽东最后讲到了整风问题，他说：

“我们要争取知识分子，要争取党外人士，先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先把自己的作风整顿一下。**今年准备，明年一年，后年一年，下点毛毛雨，吹点微微风，把我们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些东西吹掉。**我们是从保护同志出发，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适当的批评，达到新的团结。”

**“因为革命胜利了，有一部分同志，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热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少了，过去跟敌人打仗时的那种拼命精神少了，而闹地位、闹名誉、讲究吃、讲究穿，比薪水高低，争名夺利，这些东西多起来了。听说去年评级的时候，就有些人闹得不像样子，痛哭流涕。人不是长着两只眼睛吗？两只眼睛里有水，叫眼泪。评级评得跟他不对头的时候，就双泪长流。在打蒋介石的时候，抗美援朝的时候，土地改革的时候，镇压反革命的时候，他一滴眼泪也不出，搞社会主义他一滴眼泪也不出，一触动到他个人的利益，就双泪长流。**听说还有3天不吃饭的事情。我说，3天不吃饭，没有什么要紧，一个星期不吃饭就有点危险了。总而言之，争名誉，争地位，比较薪水，比较吃穿，比较享受，这么一种思想出来了。为了个人的利益而绝食，而流泪，这也算是一种人民内部的矛盾。有一出戏，叫《林冲夜奔》，唱词里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我们现在有些同志，他们也是男儿（也许还有女儿），他们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评级时。这个风也要整一下吧。”

毛泽东在他讲话结束1个小时以后，于晚12点改乘空军专机飞到了“其山嵯峨，其土颖多”的古城徐州，专列也到徐州机场。

欲知毛泽东在徐州的重要活动，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毛泽东到了济南，一见到老部下、马背书法家舒同就说：“**我在北京不愉快。**”他为什么会这么说呢？细心的读者可能从前面的叙述中已经觉察到了党内的某种不协调。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上发表演说的时候，党内一些重要领导人中途退场，便是一个明显的征兆。他此次南下，既是宣传，也是调查研究，结果又发现了令他更不愉快的事情。您如不信，请继续往下看。

**第33章**

“**我们国家还是一个穷国，还是一个农业国，还是一个手工业、手工技术的**

**国家。为了这个，我们就要进行一个技术革命。同时，我们又是一个文盲国**

**家，有80%的文盲，全国人民都要提高文化，这就要进行一个文化革命。**”

话说1957年3月19日清晨，毛泽东在徐州机场的专列上接见了地委书记胡宏、市委书记陶有亮、市长张洪范，向他们了解徐州工业生产方面的情况。陶有亮介绍了徐州的煤矿和利国铁矿的情况。毛泽东问：

“利国铁矿的矿石品位如何？”

陶有亮回答说：

“质量很好，可以直接炼钢。”

毛泽东又问：

“含硫量怎样？”

张洪范回答说：

“含硫量很高。”

毛泽东马上纠正说，应该是含硫量很低。他还说：

“徐州的煤和铁在江苏省地位很重要。你们要做好工作，大力发展煤炭工业、钢铁工业。有了煤炭、钢铁，其它工业就好发展了。”

谈到发展工业要合理布局，毛泽东说：

“徐州要发展重工业，也要发展轻工业，照顾市场，不要畸形发展。”

他问道：

“徐州离周围大城市有多远？”

陶有亮说：

“徐州离南京、济南、郑州3地都是700里左右。”

毛泽东强调说：

“你们要发展轻工业、日用品工业，满足人民生活需要。这样，城市就业问题也好解决了。”

谈到徐州的交通，毛泽东说：

“徐州除了是铁路交通枢纽外，还有运河、有湖。”

他问徐州北面是哪几个湖？陶有亮回答说：

“是微山湖、独山湖、南阳湖、昭阳湖。”

毛泽东还问到下四湖，即骆马湖、成子湖、洪泽湖和白马湖，问及徐州辖区内的刘邦故乡沛县。胡宏向毛泽东汇报了新沂、宿迁两县之间的骆马湖的一些情况。毛泽东说：

“徐州也要相应地发展水路交通。”

这次谈话有一个多小时。谈话结束后，毛泽东与他们一起吃早饭，一个炒鸡蛋，一个炒肉片。

早饭后，毛泽东登上专机飞往南京，徐州古城的风物人情，依然在他的意念中盘桓。他看见秘书林克在看书，就问道：

“你读没读过萨都剌的《彭城怀古》？”

林克说：

“没有读过。”

毛泽东就把林克手中的书拿过来，在书的扉页和窄窄的书边上，写下了元朝人萨都剌的《彭城怀古》一词的全文：

古徐州形胜，消磨尽，几英雄。想铁甲重瞳，乌骓汗血，玉帐连空。楚歌八千子弟兵散，料梦魂，应不到江东。空有黄河如带，乱山回合云龙。

汉家陵阙起秋风，禾黍满关中。更戏马台荒，画眉人远，燕子楼空。人生百年如寄，且开怀，一饮尽千盅。回首荒城斜日，倚栏目送飞鸿。

毛泽东写完了，停下笔，对林克说：

“萨都剌是蒙古人，出生在现在的山西雁门一带。他的词写得不错，有英雄豪迈、博大苍凉之气。这首词牌叫木兰花慢，原题是彭城怀古。彭城就是徐州，就是那个传说活到800岁的彭祖的家乡。重瞳指的是西楚霸王项羽，司马迁《史记》中提及项羽其貌不凡，铁马重瞳。他的坐骑叫乌骓，起初兵多势大，可惜有勇无谋，不讲政策，丧失人心。最后，兵败垓下，自刎乌江。”

毛泽东说到这里，又在林克的书上写道：

“项羽重瞳，犹有乌江之败；湘东一目，宁为赤县所归。”

他放下笔，又说：

“湘东一目，指的是梁武帝年间的湘东王萧绎，幼年时瞎了一只眼。他后来好学成才，平定侯景，即位江陵。‘戏马台’原是项羽阅兵的地方，刘裕北伐时也曾在此大会将校宾客，横槊赋诗，气势如澜。‘画眉人’用的是西汉张敞的故事。此人直言敢谏。‘燕子楼’为唐朝驻徐州节度使张焙所建。张焙袭父职驻节徐州，结识彭城名姬关盼盼，收娶为妾。她歌舞双绝，犹工诗文。张死后归葬洛阳，盼盼恋张旧情，独守空楼10余年。小楼多燕子，故名燕子楼。诗人白居易过徐州，因此故事写了一首七绝：‘满窗明月满帘霜，被冷灯残拂卧床。燕子楼中霜月夜，秋来只为一人长。’萨都剌写了这些有关徐州的典故，吊古伤今，感慨人生，大有英雄一去不复返，此地空余乱山川的情调。初一略看，好似低沉颓唐，实际上他的感情很激烈深沉。”

毛泽东说完了，吸了一口烟，又说：

“请老师教English。”

此时，摄影师趁毛泽东在学英语时，为他拍摄了一张照片，后来被称作是《飞机上的工作照》。

3月19日中午12时，毛泽东飞抵南京，住在原美国驻华使馆。稍事休息后，他立即召集江苏、安徽两省和上海市的负责人座谈，了解情况。座谈会结束后，他细心地写下了一个《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的提纲》，还特别在提纲的下面注明是：“1957年3月19日于南京”。

3月20日上午8点，坐落在南京市中心长江路中段的大会堂里，身着清一色蓝制服的江苏、安徽省市党政机关党员干部和身着戎装的南京军区的领导人，济济一堂，可以容纳3000多人的大会堂，楼上楼下，座无虚席。

毛泽东在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等人的陪同下，缓步来到主席台上，微笑着频频挥手。会场里顿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也经久不息。毛泽东落座后，江渭清走到台前，激情地说：

“今天召开党员干部大会，请毛主席来给我们作重要讲话。”

江渭清的话音一落，台下又爆发出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毛泽东摆摆手，习惯地擦根火柴，点燃了一支香烟，吸了一口，开口便说：

“我变成了一个游说先生，一路来到处讲一点话。”

这开头第一句话就使得整个会场显得轻松、活泼，顿了一下，他接着说：

“南京这个地方，我看是个好地方：龙蟠虎踞。但有一位先生，他叫章太炎，他说这龙蟠虎踞是‘古人之虚言’，是古人讲的假话。看起来，这在国民党是一个虚言，国民党在这里搞了20多年，就被人民赶走了。现在在人民手里，我看南京还是个好地方。”

毛泽东又吸了一口烟，环视了一下全场，说：

“现在，我们处在一个转变时期，就是过去的一种斗争——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了，基本上完毕了。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是阶级斗争，对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的斗争，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也是阶级斗争。后来呢，我们又搞社会主义运动、社会主义改造，但它的性质也是阶级斗争的性质。从总的来说，**过去我们几十年就干了个阶级斗争，改变了一个上层建筑，旧的政府，蒋介石的政府，我们把它打倒了，建立了人民政府；改变了生产关系，改变了社会经济制度。**从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来说，我们的社会面貌改变了。”

毛泽东说到这里，环顾了一下这个曾经是国民政府召开“国民大会”的场所，说道：

“你看，我们这个会场在座的人，不是国民党而是共产党。从前，我们这些人，这个地方是不能来的，哪一个大城市都不许我们去的。如此看来，是改变了，而且改变好几年了。**阶级斗争不仅仅改变了上层建筑和社会经济制度，它也能为改变另外一件事开辟道路，就是为发展生产、为建设开辟道路，为人民生活的改善、为由农业国到工业国的开辟道路。**

我们现在是处在这么一个变革的时期：由阶级斗争到了向自然界作斗争。要改变生活，要搞建设，就要向自然界作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我们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和后头的社会主义革命，到技术革命，到文化革命。这个方面，我们过去使用手工，用手使用的工具来做桌椅板凳的，用手去种粮食种棉花的，一切都是用手。现在要改为用机器，使用机器那么一种技术，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革命。没有这样一种革命，我们这个国家单是政治改变了，社会制度改变了，**我们国家还是一个穷国，还是一个农业国，还是一个手工业、手工技术的国家。为了这个，我们就要进行一个技术革命。同时，我们又是一个文盲国家，有80%的文盲，全国人民都要提高文化，这就要进行一个文化革命。**现在，似乎还有一些人不认识这么一种变化。

有些人讲，到了社会主义，大概是要过好生活了。这就是不懂什么叫社会主义。现在，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这种新的生产关系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立好。至于用主要力量搞生产，我们才刚刚开始。没有生产就没有生活，没有多的生产就没有好的生活。”

毛泽东扫视着全场，满怀豪情地说：

**“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要多少年呢？我看大概要100年吧。**要分几步来走，大致说来，有十几年要稍微好一点；有个二三十年就更好一点；有个50年可以勉强像个样子；有100年那就了不起，那就和现在大不相同了。要100年，我就不在这个世界上了，就不能享福了。要进行艰苦奋斗、白手起家的教育。**我们现在是白手起家，祖宗给我们的很少。让我们跟全国人民一道，跟国家一道，跟青年们一道，干它个几十年。这个世纪，上半个世纪搞革命，下半个世纪搞建设。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建设。”**

毛泽东讲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人民闹事如何处理。他说：

“对人民闹事，要采取完全新的方法。对犯了法的人，应该按照法律程序处理。其他的人，应该说服教育，不要开除。你这里开除，是以邻为壑。许多同志对于人民跟我们闹事没有精神准备。因为**过去我们跟人民一道反对敌人，现在敌人不在了，看不见敌人了，就剩下我们跟人民，他有事情，不向你闹，向谁去闹呢**？对于人民闹事，有主张用老办法对付的，就有几个地方叫警察抓人。我说，学生罢课叫警察抓人，这是国民党的办法。也有束手无策的，完全是没有办法。不怕帝国主义，不怕国民党，就是怕老百姓。过去那一套，他是好手。要讲对付人民闹事，他没有学好，这一课没有上过。要跟党内党外公开地提出这个问题，展开讨论，办法就出来了。”

他还说：

“现在存在的两种观点都不妥当。一种是右的观点，认为世界上太平无事了，对于一些应该处理的反动分子和坏人不依法处理。这方面，现在各省都有发生，应该注意。另一种是夸大的观点，‘左’的观点，说现在还有很多反革命。现在还有暗藏的反革命，这一点要肯定。但是过去肃反根本上是正确的，我们中国不会出匈牙利那样的事情，其中有一条原因，就是我们肃清了反革命。”

毛泽东讲的第三个问题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加强思想教育的方针。关于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问题，他对面前的这几千个跟着他出生入死的工农出身的大老粗部下，谆谆告诫说：

**“对这几百万知识分子，我们如果看不起他们，如果以为可以不要他们，这种观点是不妥当的。我们离不开他们。我们离开这几百万知识分子，可以说一步都不能走。这几百万知识分子，是有用之人，是我们的财产，是人民的教员。对这些人不能搞唯成份论，对他们的进步应该肯定。”**

毛泽东讲的第四个问题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他说：

“现在党外人士深怕我们‘收’，说我们‘放’的不够。我们的同志则有一点想‘收’。中央的意见是应该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应该‘放’，而不是‘收’。高压政策不能解决问题，人民内部的问题不能采取高压政策。这样做会不会‘天下大乱’？会不会像匈牙利事件那样把人民政府打倒？不会！中国的情形跟匈牙利不同，共产党有很高的威信，人民政府有很高的威信。马克思主义是真理，这是批评不倒的。”

毛泽东最后讲的是整风问题，他说：

“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有些同志缺乏这种热情，缺乏这种精神，停滞下来了。这种现象不好，应该对这些同志进行教育。”

毛泽东讲话结束了，暴风雨般的掌声经久不息。他离开座位，缓步走到台前，向他的基层指挥员们挥手告别。

3月20日下午1时，毛泽东乘飞机由南京飞往上海，途经镇江上空时，他触景生情，想起了宋朝人辛弃疾的词作，情之所至，奋笔手书了《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

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

一幅酣畅淋漓的毛体书法作品写出来了，他又兴致勃勃地给身边的工作人员解说了辛弃疾这首词的典故。他说：

“京口北固亭在镇江东北，京口曾是三国时吴国孙权建都的地方。这首词里的‘不尽长江滚滚流’，是借引杜甫诗的句子。‘生子当如孙仲谋’，是借引曹操的语言。《三国演义》中曹操和刘备煮酒论英雄，曹操说：‘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刘备问：‘谁能当之？’曹操以手指刘备后自指说：‘当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

毛泽东顿了一下，又说：

“刘备比曹操所见略迟，但刘备这个人会用人，能团结人，终成大事。”

不少工作人员以前多次听毛泽东讲过三国故事，但这一次看着他又是龙飞凤舞的书写，又是绘声绘色的评说，仍然是百听不厌，感奋不已。

飞抵上海后，毛泽东没有休息，而是驱车到海边游了一会儿泳，算是放松。

下午5时，毛泽东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向1000多名处以上干部宣讲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这是他此次南下的第4次讲话，其内容和在南京的讲话大致相同，但相比较更为系统一些。关于当前阶段的基本特点，他又强调说：

“**在我们目前的新的任务，就是建设，建设也是一种革命，就是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要团结整个社会的成员、全国人民，向自然界作斗争。当然，在建设过程中还是离不了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在目前的过渡时期中，人与人之间的斗争还包括着阶级斗争**。我们说阶级斗争基本完结，就是说还有些没有完结，特别是在思想方面，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还要延长一个相当长久的时间。这样一种形势，我们党是看到了的。在党的第8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同志的报告和大会的决议都说到，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了。随着敌我矛盾在国内基本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开始比过去显露了。但是至今还有许多同志对于这种形势不很清楚，还用过去一些老的方法来对待新的问题。

应该说在过去一个时期内，中央对这个问题也没有做详细说明，这是因为，这个变化还是在不久以前才成熟的。比如我在去年4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了十条关系，其中有两条，一条是敌我问题，一条是是非问题。在那个时候，还没有说到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了，到了去年下半年党召开代表大会的时候，才可以肯定地讲这一点。现在情况更明白了，就需要更加明白地告诉全党：不要使用老的方法来对待新的问题，要分清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必须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我们今天应该公开讲这个问题，不但在内部，在党内，而且在报纸上讲清楚这个问题，作出适当的结论。”

上海是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毛泽东在讲话中又强调说：

“我们的任务就是争取他们，要在比如3个‘五年计划’之内（还有11年），使整个知识分子在学习马克思主义、跟工人农民结合的问题上，前进一步。其中大概要有三分之一的知识分子或者入了党，或者是党外积极分子。然后再进一步，争取其余的知识分子。我们要这样分步骤地改变知识界的状况，改变他们的世界观。”

关于文艺的工农兵方向问题，毛泽东又强调说：

“文艺当然是工农兵方向，没有别的方向。你还能搞那个地主方向，资产阶级方向，帝国主义方向？”“现在怀疑工农兵方向的知识分子，还是反映了资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的富裕阶层的思想。”“我们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团结争取过来，条件是完全充分的。但是也还需要时间，要有十几年二十几年那么长的时间，不能快，不能忙。马克思主义只能逐渐说服人，不能强迫灌进去，灌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关于中央的“放”的方针，他强调说：

**“不但在纯粹科学艺术的问题上，而且在涉及政治性的是非问题上，只要不属于反革命一类，也应该让他们自由讲话。”“一般人民说错了话，或者闹了事，不能对他们使用专政的方法，只能采取民主的方法。”**

关于整风问题，毛泽东强调说：

“我们跟党外人士的关系，应该比过去进一步，这也是整风的任务之一。现在是隔着一层。党与非党有一点界限是必要的，没有区别是不好的。应该有区别，这是第一；第二，就是不要有一条深沟。**现在的情况就是有许多地方党内党外这个沟太深了，应该把这个沟填起来。要跟他们讲真心话，这样，他们会进步得更快些。不要讲一半，还留一半在家里。”**

毛泽东最后满怀信心地说：

“我们采取上面所说的这些方针，会不会妨害党的领导？”“我们希望造成这样一个中国，希望把我们国家变成这样一个活泼的国家，使人们敢于批评，敢于说话，有意见敢于说，不要使人不敢说。”“我们采取这样的方针，我相信，人民的政治情况，人民跟政府的关系，领导者跟被领导者的关系，人民跟人民之间的关系，就将是一种合理的活泼的关系。这样我们的文化、科学、经济、政治，我们整个国家，就一定可以比较快地繁荣发展起来。我们国家就会变成一个有近代农业的、工业化的国家，人民的生活会要好起来，我们的希望就一定可以实现。”

3月21日下午，毛泽东在上海约见了周谷城、金岳霖、郑昕、贺麟、王方铭几位学者。

周谷城家居上海，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史学会会长。毛泽东对上海市副市长许建国等人说：

“周谷城是我的老朋友，我认识他比认识你们还早得多。”

周谷城受宠若惊，赶紧申明说：

“许副市长，我是个不争气的人。我怕死。”

毛泽东不以为然，他说：

“不要紧，没有人怪你。”

周谷城所说的怕死，是指他在大革命失败后，跑到上海以译书、卖文为生的那段经历。毛泽东谈到了中国革命的实践，他说：

“中国革命开始是很困难，陈独秀、王明、李立三、瞿秋白、张国焘等人跟着别人跑，使中国革命遭受了一个又一个的失败。直到1949年，我们眼看就要过长江的时候，还有人阻止，据说千万不能过长江，过了，就会引起美国出兵，中国就可能出现南北朝。”

毛泽东点着烟，接着说：

“我没有听他们的。我们过了长江，美国并没有出兵，中国也没有出现南北朝。如果我们听了他的话，中国倒真可能出现南北朝。后来，我会见了阻止我们过长江的人，他的第一句话就说：‘胜利者是不应该受责备的。’我没有听他的话，他并不责怪，反而肯定了我们是胜利者。”“可见实事求是、独立思考是非常重要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可以说是实事求是、独立思考的胜利。陈独秀、王明、李立三、瞿秋白、张国焘，都不能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却盲目地跟着别人的指挥棒转，所以，他们只能把中国革命引向失败。搞科学研究，也必须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千万不能把自己的脑袋长在别人的脖子上。对老师不要迷信。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老师的成绩和优点，应该学习，应该继承发扬；老师的缺点和错误，要善意地批评指出。”

晚上9时10分，毛泽东乘专列离开上海，于子夜时分到达终点站杭州。

此时，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先念、黄克诚都在杭州。

3月22日晚，毛泽东在杭州饭店会见在杭州访问的捷克斯洛伐克总理威廉·西罗基。

以西罗基总理为首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及随行人员，是在3月21日抵达杭州的，由在杭州的周恩来负责接待。22日下午，周恩来和西罗基等进行第3次会谈，继续讨论经济互助问题。会谈结束后，周恩来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毛泽东决定晚上在杭州饭店会见西罗基总理。

是日晚，毛泽东在会见西罗基时说：

“美国、英国这些国家要搞‘两个中国’的阴谋，它们想一方面承认我们，一方面又承认台湾。我们的方针是：承认我们就不能承认台湾。我们不怕它们不承认。”

此后，毛泽东一边休息，一边办公。他听取了薄一波关于1957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汇报。

3月24日晚，毛泽东召集开会，听取李先念关于1956年财政收支情况和1957年财政预算问题的汇报。

3月2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处理罢工、罢课问题的指示》，他写道：

“在最近半年内，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群众性的游行请愿和其它类似事件，比以前有了显著的增加。**全国各地，大大小小，大约共有1万多工人罢工，1万多学生罢课。**这种现象值得我们严重地注意。这类事件在最近时期发生得比过去为多，有一些临时性的原因，但是这种现象决不应该认为只是暂时的。从根本上说来，在人民推翻了共同敌人，消灭了剥削制度以后，我国人民已经形成了新的伟大的团结。党和人民政府同人民群众之间，整个地说来，存在着广泛的密切的联系。人民群众从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和各项建树中，认识到党和人民政府是人民利益的代表者，是人民群众前进的向导。人民群众和领导者的根本的利害关系是一致的，因此，在正常情况下，人民群众一般是拥护他们的领导者的。但是这不是说人民群众和他们的领导者之间没有矛盾。必须了解，社会主义社会虽然消灭了过去的矛盾，但是它本身又包含着新的矛盾。**由于国内的敌我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人民群众和他们的领导者之间的矛盾，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显露出来了。人民群众是直接参加生产劳动（主要是体力劳动）而一般地难于直接行使管理权力的，他们容易着重于从当时当地的局部情况去观察问题，容易重视目前利益和局部利益，而比较难于了解建设中的困难；人民群众的领导者直接行使管理权力而一般地难于参加体力劳动，他们一般地比较能够看到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而比较容易疏忽各部分人民群众的具体情况和切身要求。**这两部分人之间是必然有矛盾的，但是**这种矛盾是根本一致中的矛盾**。人民群众的领导者愈是注意联系群众，保持和发扬实事求是的群众路线作风，随时发现和解决人民群众中的问题，这种矛盾就愈小；如果脱离群众，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不解决或者不正确地解决人民群众中的问题，这种矛盾就愈大。但是从根本的性质说来，人民群众和他们的领导者之间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非对抗性的矛盾，而不属于敌我之间的对抗性的矛盾。经验证明，**人民内部的矛盾一般地都可以和应该在民主集中制的范围内，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解决，也就是说，应当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因此，一般地说，为了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不需要采取罢工罢课游行请愿一类的方式，采取这种方式，一般地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因此，我们不但不提倡这类事件，而且应该力求防止这类事件。事实上，凡是我们的工作作得较好、对群众的联系较好、群众的觉悟较高的地方，这类事件就很少发生。这类事件的发生，首先是由于我们的工作没有作好，特别是由于领导者的官僚主义。**在某些特殊情形下，如果领导者的官僚主义极端严重，群众几乎没有任何民主权利，因而无法通过“团结——批评——团结”的正常方式解决问题，那么，群众采取罢工罢课游行请愿等类非常方式就会成为不可避免的，甚至是必要的。**党对于这种现象，必须从全面的认识出发，采取正确的方针和办法。**从最近情况看来，不少地方和部门对待这类事件的方针和办法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也有许多地方和部门的领导者对待这类事件的方针和办法却是错误的。他们不了解或者不愿意承认官僚主义和工作中的错误是造成这些事件的主要原因，而且往往混淆了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用类似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以至造成了一些不好的结果。**为了从根本上避免这类事件的发生，而在发生事件后避免采取错误的方针和办法，中央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有引起全党注意和统一全党认识的必要。”

**“为了防止罢工罢课一类事件的发生，根本办法是随时注意调整社会主义社会内部关系中存在的问题，首先是克服官僚主义，扩大民主。”**

**“克服官僚主义需要加强由上而下的领导，同时需要动员群众的力量，实行由下而上的监督。在工厂和学校中扩大民主，是依靠群众克服官僚主义的有效的步骤。”**

**“职工和学生为了促进问题的解决，推派小型的代表团到任何上级组织去请愿，或者向上级组织派来的人员请愿，应该认为是完全合法、完全正常的行动，不得作为‘闹事’看待。”**

**“**为了防止罢工罢课一类事件的发生，除了扩大民主以外，还必须加强群众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这也是反官僚主义的任务之一。”

**“由于我们在工人群众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薄弱，而工人队伍又增长很快，一部分工人忽视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倾向有了发展。在学生和知识分子中，埋头业务不问政治、斤斤计较个人生活地位和其他不正确的倾向也逐渐抬头。**应该针对这种情况对群众进行教育，使群众深刻了解我们的工作和学习都是为了一个崇高的目的——建设社会主义和准备实现共产主义，而为了达到这个远大的目的，就必须经过一个艰苦奋斗的过程。应该通过生动的事实教育群众，使群众觉悟到我们现在的生活比过去一般地说来已有相当大的改善。但是由于我国长期落后，不可能在短期间把一切问题都解决，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求得解决。本单位的领导人员和高级机关的领导人员都必须经常向群众作报告，同群众谈话，讲解为群众所关心的当前问题。在这些讲话中，**必须采取老实态度，对群众说真话，不要夸大事情的有利方面而隐瞒事情的不利方面。不要随便许愿，使群众在诺言不能兑现时感觉失望受骗。应该把困难的情况、原因、性质和解决办法告诉群众，领导和动员他们共同克服困难，使他们对困难有准备，对前途有信心。应该使群众了解，我国目前还处在由落后的农业国逐步变为先进的工业国的过渡时期，国家财力有限，干部经验有限，人民生活中的许多困难和建设工作中的许多错误缺点是不可避免的。如果认为在全国解放后的短短几年内，什么事情就都可以做得十全十美，社会和个人的各种需要就都可以完全满足，这纯粹是一种没有根据的幻想。**而且就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后，生活也仍然会有困难，工作也仍然会有缺点，人民内部也仍然会有矛盾。但是这种困难和缺点本质上不同于剥削制度，它们是完全能够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克服的，人民内部矛盾本质上不同于敌我矛盾，也应该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为了便于教育和动员群众，为了加强同群众的团结，领导人员必须认真注意同群众同甘共苦，在艰苦奋斗方面起模范作用。”

“在全国的领导人员中，不愿意接受教训改变作风的官僚主义分子总是有的。他们既不联系群众，又不给群众以享受民主权利、按照正常方式提出批评建议的机会；**群众中有了问题，他们既不解决，又不解释，甚至采取种种错误办法对待群众。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会把群众逼到非闹事不可的地步。”**

“在发生这类事件的时候，党的方针应该是：

1. 允许群众这样作，而不是禁止群众这样作。因为第一，群众这样作并不违反宪法，没有理由加以禁止；第二，用禁止的办法不能解决问题；第三，**有些理由不充足、有违法行为的群众闹事，固然是坏事，同时也是好事，因为党可以利用闹事的过程教育干部，克服官僚主义，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并且帮助群众分清是非，提高觉悟，从而使人民内部矛盾得到一种调节。**如果群众中有坏分子从中煽动，也可以使这种坏分子在斗争中暴露和孤立。”

“2、因此，**群众既然要闹，就应该让他们闹够，不要强迫中止，以便使群众在闹事的过程中受到充分的教育，作为补偿平时思想政治教育缺乏的一种手段。但是必须劝告群众不可采取违法行动（如打人、关人、破坏公共财物等）。如果发生违法行为，应该采取适当方法加以制止，防止扩大。但是除非发生重大破坏行动或者其他严重违反刑法的行为，不得捕人，不得以军警包围或者以其他方法使用暴力。**

3、对群众在事件中提出的要求，应该同群众按正常方式提出的要求同样对待，即是接受其中正确的可行的部分，对目前作不到的要求进行解释，对不正确的要求加以批评。”“**对行为极端恶劣、引起公愤的官僚主义分子，应该给予应得的惩戒。**

4、在事件平息以后，应该认真地对干部和群众进行教育，一面健全民主生活，一面提高群众觉悟，以达在新的基础上增强人民内部团结的目的。”**“对于闹事群众中的领导分子，如果行动合理合法，当然不应该加以歧视，即使犯有严重错误，一般也不应该采取开除办法，而应该将他们留下，在工作和学习中教育他们。对于抱着恶意煽动群众反对人民政府的坏分子，应该加以揭露，使群众彻底认识他们的面目。对这些分子中犯了严重错误的人应该给以适当的处罚，但是不应该开除他们，而应该不怕麻烦地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改正错误。**至于确实查明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和严重违犯刑法的凶犯，则应该分别情况，依法办理。”

3月28日，毛泽东前往钱塘江上游的果园视察，在途中察看了庄稼的长势。

1957年4月3日中午，毛泽东驱车来到杭州市郊解放军某部营房。指导员王宝善以为是哪位首长来检查工作的，就跑上前去迎接。待他见到来人是毛泽东，心里猛地一跳，就愣住了。毛泽东握着王宝善的手，亲切地问：

“同志们正在开饭，是吗？”

“是，刚刚开午饭。”

王宝善立刻回答。毛泽东让他领着查看了士兵的宿舍，看看床铺和褥子。战士们听说毛泽东来了，都端着饭碗拥到食堂门口。毛泽东一路向战士们招着手，走进了食堂，端起一盘菜，看了看，问身边的战士：

“每顿的菜够吃吗？”

战士们争着说，够吃了！毛泽东又问：

“每天的伙食费多少钱？是4角2分吗？”

“是4角2分。”

毛泽东向战士们招招手说：

“同志们吃饭，吃饭吧。”

说罢，便向食堂外走去，在伙房门口正好碰上了炊事员顾炳甫，他握着顾炳甫的手说：

“啊，你是大师傅，辛苦了！”

顾炳甫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含着热泪笑了。此时已经12点多了，毛泽东和战士们挥手告别，战士们热烈鼓掌，欢送毛泽东。

此后，毛泽东登了将军山，并去高甲外马家坞村看农作物，又去视察了浙江省军区的一个油库。

4月4日至6日，毛泽东连续3天在南屏游泳池召开有江苏、浙江、福建、安徽、上海4省1市有关负责人参加的关于思想动态的座谈会。参加座谈的有：陆定一、谭震林、柯庆施、魏文伯、曹荻秋、刘季平、石西民、江渭清、刘顺元、刘子见、陈书同、余克、方乙、江华、林乎加、吕志先、叶飞、许彧青、杨文蔚、曾希圣、黄岩、吴文瑞、李彬、李继祥。现将座谈会的记录抄录如次：

石西民（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少数人说，共产党放长线钓大鱼，要看看市委的态度。

毛泽东：要让人家批评，一点不生气，然后去分析。现在知识分子像惊弓之鸟，怕得厉害。他们要看一看，他们是一定要看的，可能看上一二十年，20年以后也还是要看的。我们党内同志也是要看一看的。如“治病救人”一条，过去犯错误的同志也是不相信，经过“七大”到“八大”，做了许多具体工作才相信。**“三反”反出那么多“老虎”，后来80%都降下来了，100元以下的就不算贪污了，太多了嘛。一个人搞百把块钱，一世就完了。“五反”开始也到处是坏人，后来五类一分，打击面就小了。总之，共产党的政策要让大家来考验，领导者也要受被领导者考验。**

石西民：党内有一些干部说，现在搞百家争鸣不是时候。有的认为百家争鸣与千百倍的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相矛盾，重大政策的传达要求先党内后党外，一下推开感到难办。

毛泽东：“八大”已做了结论，大规模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正是时候。党与非党之间有堵墙，墙不拆，如何争取群众？什么叫政治思想工作？政治思想工作是为了争取群众嘛。不考虑争取群众，谈不上政治思想工作。现在党与非党之间有条沟，而且很深。我并不是说党与非党不要有界限，应该有条线，混起来不好，但是不应该变成鸿沟，脱离群众。党内党外一起来好，这样快，就把许多人推上政治斗争舞台，不然两三年也不得解决。**现在党外传达很快，党内反而迟，报上也很少反映。回去就要批评《人民日报》，是什么人的报纸？**

石西民：有人提出报上开展百家争鸣要有5个条件：必须有领导、有选择，有准备，有说服力，有利。有人不同意这种说法。

毛泽东：这么多条件，叫我也难办。领导要有，搞方向就叫领导了，但不要干涉过多。有领导是肯定的，但毛病一点不出，难。有选择，也会选错的，准备它有错。有准备是对的，也不能准备得那样周到。有说服力很对，这条比较具体。有利，看怎样讲，什么叫有利？百花齐放有利，还是一家独放有利？这几个条件都很难办，但是不要教条主义。

石西民：有人说电影要“力争香花，避免毒草”。有人认为这个口号不妥当。

毛泽东：**毒草怎么能够避免？我们是不怕毒草，而且也难得分辨香花毒草。人们不是以毒草面目出现的，谁会说自己是毒草？**其实，毒草也不那么多，似毒非毒的多一些，这是中间人物占多数的缘故。对片面性问题，只能要求逐步有比较多的人使用辩证法，比较能全面一些看问题，少一些片面性，而不是立即要求党内党外人士都避免片面性。凡政策性问题，党内讲的都向他们讲，缺点也向他们讲。我们讲了自己，这样就好讲他们的缺点了。人总有懂得与不懂得的矛盾，马克思也是如此。已知与未知的矛盾，工作做好与做不好的矛盾，永远存在。我在上海是第4次讲，已经比较完整了，你们上海还提出这么多批评嘛。话也难讲啊！你们在省里，不要认为讲一下，人家就举双手。哪有这样简单！

李彬（安徽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有的干部听了传达后说，现在事情难办了，不好好学习干不下去了。

毛泽东：不能靠历史吃饭，不能靠威势吃饭。要以理服人，不能以力服人。理不足，不能服人，势力大也不能解决问题。以力只能服敌。敌人是不和你讲理的，你跟他讲理他不听，他只讲力。对人民只有说理，只要没理，不管势力多大，资格多老，也输了。因此给我们一个任务，要研究，要学习，要教育我们的干部和党员靠道理，靠学问，别的都不靠。这一点要进行广泛的教育，干部靠资格、靠势力是很危险的。

李彬：现在民主党派在学校中发展成员很积极。机关中有的党外副厅长想参加共产党，民主党派拉得紧，自己不愿参加，叫老婆参加应付应付。

毛泽东：知识分子应吸收一批进党内来训练。争取三分之一的知识分子入党，已加入民主党派的也可以跨党。只有民主党派的主要骨干应劝他不进党。知识分子入党条件不能太高。现在指定谭震林、陆定一、安子文3人负责，最近开一个会，总结一下知识分子入党的经验，定出发展要求。这里有个政策问题。如不争取一批人入党，将来无人去做争取知识分子的工作，对我们党团结大多数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工作的总方针不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争取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开放的政策，而组织上是关门的，这不行，不协调。当然，也要稳步地吸收他们参加。

李彬：高等学校里传达了主席的报告以后，有的党外教授反映，想向院里党员领导干部提一下意见，好改变一下过去有些距离的情况。

毛泽东：**要改善共产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与知识分子不能共事，这是什么作风？不与知识分子接近是宗派主义的作风。**主要原因不是他们，是我们，是第一书记。第一书记不仅要抓思想，而且要看各种文章，要看哲学、历史、经济、文学、逻辑、艺术方面的文章，自己这方面的知识要逐步增长起来，兴趣要养成。（有人插话：工作太忙。）忙，就应该把其它事情让旁人多搞一些，多抽出些时间抓思想工作，思想工作是灵魂嘛，这就抓起纲领来了。

刘子见（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扬州地委政法部长说，不久以前泰兴有人闹事，捕了6个人，开始准备分别判处半年到两年徒刑，现在看判得不当。

毛泽东：我的讲话有这么大的影响！你讲的这个材料很好，看来还是要讲一讲。一听到闹事，就想到敌人，就实行专政。阶级斗争搞惯了，将对付反革命的办法用到闹事的人民身上。**过去在革命的时候，我们和人民一起，向封建势力要民主。现在我们胜利了，自己掌握政权，很容易强调专政，忽略民主的一面。**

刘子见：**有些人听了人民内部有矛盾以后大吃一惊**。

毛泽东：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不是讲过了吗？为什么要大吃一惊呢？贫农、下中农、中农、富农不是有矛盾吗？

刘子见：总的看来，目前干部中“左”的情绪是主要的。

毛泽东：“左”的倾向是历史上留下来的影响。因为过去几十年来都是搞阶级斗争嘛。

刘子见：民主党派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很满意，认为这样加重了自己的责任。只是觉得共产党对他们提意见少，成了单方面的监督了。

毛泽东：**对民主党派要讲真话，对民主人士要更积极一点。要说的就说，有缺点就向他们提出来。这样比若即若离好。**当民主人士也有一大苦楚，不是愿意当的。要看到的看不到，要听到的听不到，共产党的底摸不到，又是有职无权。所以我说党与非党要有一条线，不要有一条沟，要打通它。6亿人口同舟共济嘛。开会让他们一起听，他们就放心了，更加靠拢了。见了面也可以讲一点党内的缺点。打破党内宗派主义的状态，克服不学习的现象，克服不虚心的现象，我看很有必要。

刘子见：在学习主席讲话中，有人反映，“八大”决议指出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社会制度同落后生产力的矛盾，现在又讲人民内部的矛盾，对这几种矛盾的关系，不知怎样才是完整的认识？

毛泽东：**“八大”决议关于先进生产关系与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说法，是犯了个错误，理论上是不正确的。**有的同志说，所谓落后的生产力是与外国比较的，是与将来比较的。为什么要与外国比呢？与外国比有什么意义呢？有矛盾，是指生产力本身由落后到先进。生产力怎能与外国比呢？我们的生产力与苏联、美国比是落后。比中国，怎么能说是落后呢？比蒋介石，比1950年，不是先进了吗？有些同志说这是与将来比的，将来有1万万吨钢。那是将来的事情嘛。如老柯（指柯庆施——笔者注）十几岁的时候衣服很小，现在穿就发生问题了，在当时穿起来是合身的。所以不能这样比。这样比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这个错误如何纠正，请大家想办法。

刘子见：主席说的一千年、一万年以后还有革命，这如何解释？

毛泽东：这个问题我说过，但还没有肯定。

陆定一：有两种革命：一种是改变生产关系的革命，一种是一个社会制度内部的革命，如中国封建制度内部多次革命，但生产关系并没根本变化。主席讲的将来的革命，可能是指后一种革命。

毛泽东：不！**我讲的革命不是你讲的那种，是讲的改变生产关系的革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有矛盾的。现在的生产关系是集体所有制，是国家所有制。一万年后生产关系总要改变，最后要以地球为单位，不是国有化，而是“球有化”。**当然，总不会回到剥削关系。剥削是生产不足的表现。

吕志先（浙江省委宣传部长）：党外的人士听了主席的报告之后都很兴奋。

毛泽东：党外兴奋，党内呢？

吕志先：我们准备5月开宣传工作会议。

毛泽东：有没有党外人士参加？县里来不来人？**（对陆定一）我们的宣传工作会议为什么不报道？有党内外人士都参加的会议为什么不报道？最高国务会议一声不响，宣传工作会议还不响。《人民日报》对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一声不响。**

吕志先：我们检讨过去对陈其通等同志的文章（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于1957年1月7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批评了他们认为是违反党的文艺政策的倾向——笔者注）有同感。

毛泽东：陈其通的思想，恐怕代表了党内大多数，90%。所以，**我这个报告毫无物质基础，与大多数同志的想法抵触嘛。**

吕志先：我们思想上总想极力避免毒草。

毛泽东：这是不可能的。

柯庆施：毒草和错误的东西，批评不批评？

毛泽东：你们不是已经批评了吗？毒草要让它放出来，批评要有说服力，看清楚了就驳，看不清楚的就等一下，不要慌。但是不要等太久。

吕志先：党外人士对我们的肃反有意见。

毛泽东：领导要经得起考验。现在党外情绪高，党内大概会先低后高。任何一个方针、政策，都不是哪个人一讲就行的，灵不灵，要经过考验。到解决了一些问题，取得了经验，看到这个方针灵了，情绪才能高起来。过去教条主义者说自己是100%的马克思主义，当时俘虏了一些人，经过考验就搞清楚了。应该让干部在工作中试验试验。党的任何一条方针都要拿到群众中去考验。

江华（浙江省委书记）：党外人士问，从最低干部到最高领袖，最高决策，能不能批评？

毛泽东：宪法有规定嘛，让他批评嘛。6亿人口中所有有缺点的人，不管官有多大，都可以批评。讲对了就接受。讲得不对，如果没有害处就算了。

许彧青（福建省委宣传部长）：报社组长以下要求“放”，编委会有顾虑。

毛泽东：我的讲话还是有群众嘛，组长以下还是主张“放”嘛。

许彧青：报纸工作，群众的要求与党委的要求有矛盾。

毛泽东：怕人家批评怎么能办好报纸？人家提提意见有什么不好？文教、报纸、刊物、戏剧，都是教育人民的工具，要经常教。不要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报纸、学校、戏剧，各地无人管，这种现象不能再继续下去。你们（书记）管得太少了。

许彧青：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批评我们的大学有3个缺点：1、行政机构太大，工作效率太小。2、用领导机关的办法来领导学校。3、党员干部水平不高，党员的优越性在大学里看不出来。

毛泽东：是嘛，在大学里我们就是没有优越性嘛。要把接管大学的人调出来。要真正配备一个队伍，包括中学在内。我们有些同志靠摆架子，不摆又没有办法。没学问，要做官，就要摆架子，吓唬人。大学中原来去的干部只能留下一部分，留下有用的部分，主要靠重新配备队伍，办法是把教授吸收入党，重新配备队伍。现在要早做准备，多吸收些教授入党，不然外行不能领导内行。

叶飞（福建省委书记）：大家对主席的报告反映很好，都觉得启发很大，但许多问题一接触实际就又不通了，如对人民闹事让他闹够，很多人就想不通。

毛泽东：对于党外党内人的意见都不能采取一下子顶回去的办法，要采取分析的态度，不然会犯错误。**有人说，赵超构的《新民晚报》是黄色报纸，我在北京就看了一下，我看不能说是黄色报纸，我看还不错嘛。**有人说我们不能领导科学，也不能一下子顶回去，要分析。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一装，人家就说你水平不高，进步不快了。自己不讲人家还是要讲的，自己主动讲不是更好。相当多的党外话是对的，他们讲话是考虑过的。有的讲的不对，是不了解情况。有一部分要分析，有一部分要接受，决不可一下子顶回去。如果采取一下子顶回去，就会处于被动。

有人提出培养年轻人的问题。

毛泽东：赤壁之战，程普40多岁，周瑜20多岁，程普虽是老将，但不如周瑜能干。大敌当前，谁人挂帅？还是后起之秀周瑜挂了大都督的帅印。

4月7日下午1时，毛泽东要返京，出发前，他乘直升机鸟瞰古越（杭州）大地，后来提笔书写柳永的《望海潮》词。

从直升机下来，毛泽东登上专机飞离杭州。

4月9日，毛泽东回到了北京，他找来胡乔木谈话，问道：

“《人民日报》为什么不宣传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只发了两行字的新闻，没发社论，以后又不宣传。为什么连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新闻也没有发？结果，《文汇报》、《新民晚报》和《光明日报》把旗帜抓了过去，大鸣大放。真是百家争鸣，唯独马克思这一家不鸣。”

毛泽东说：

“我在南下视察时发现了这个问题，感觉很不妙。”

欲知如何处理《人民日报》的问题，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57年4月4日至6日南屏游泳池召开的江苏、浙江、福建、安徽、上海4省1市有关负责人参加的关于思想动态的座谈会上说：“**回去就要批评《人民日报》，是什么人的报纸？”**他还质问**陆定一：“我们的宣传工作会议为什么不报道？有党内外人士都参加的会议为什么不报道？最高国务会议一声不响，宣传工作会议还不响。《人民日报》对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一声不响。”**4月9日回到北京后，毛泽东又对胡乔木说：**“《人民日报》为什么不宣传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只发了两行字的新闻，没发社论，以后又不宣传。为什么连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新闻也没有发？结果，《文汇报》、《新民晚报》和《光明日报》把旗帜抓了过去，大鸣大放。真是百家争鸣，唯独马克思这一家不鸣。”**“我在南下视察时发现了这个问题，**感觉很不妙。**”事实上，自从进京以后（出现剥削有功论），特别是在新中国建立以后，党内高层在前进中的不协调步子，在大合唱中的不协调音符，就时常出现了。究其原因，除了认识问题以外，最根本的还是由于他们搞革命的初衷是不尽相同的！因此，这种不协调以前经常有，以后还会继续出现，甚至是愈演愈烈。不信你就往下看吧！

**第34章**

“**你们在4月6日《教育者必须受教育》的社论和今天的《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

**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社论里，为什么连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会议提都不提？你们**

**多半是对中央的方针唱反调，是抵触、反对中央的方针，不赞成中央的方针。”**

话说1957年4月10日中午12时35分，毛泽东召集陈伯达、胡乔木、周扬和《人民日报》社总编辑邓拓，还有副总编辑胡绩伟、王揖、林淡秋、黄操良、袁水拍、王若水谈话，他说：

“睡不着，找你们来谈谈。看了今天的社论，虽然发得晚了一些，总算对陈其通4人的文章表了态。**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已经开过一个多月了，共产党的报纸没有声音。**陈其通4人的文章发表以后，《人民日报》长期以来也没有批评。你们按兵不动，反而让非党的报纸拿去了我们的旗帜整我们。**过去我说你们是书生办报，不是政治家办报。不对，你们不仅不是政治家办报，也不是书生办报，应当说是死人办报。**你们到底是有动于衷，还是无动于衷？我看是无动于衷。**你们在4月6日《教育者必须受教育》的社论和今天的《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社论里，为什么连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会议提都不提？你们多半是对中央的方针唱反调，是抵触、反对中央的方针，不赞成中央的方针。”**

邓拓解释说：

“过去中央曾有规定，党的会议不发消息，主席讲话未公布前，也不引用。我对这件事没有抓紧。”

毛泽东说：

**“中央什么时候有这个规定？最高国务会议发了消息，为什么不发社论？消息也只有两行。为什么把党的政策秘密起来？宣传会议不发消息是个错误。这次会议有党外人士参加，为什么不发消息？**党的报纸对党的政策要及时宣传。最高国务会议以后，《人民日报》没有声音，非党报纸在起领导作用，党报被动，党的领导也被动。党报在非党报纸面前丢脸。**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目前还不能发表，但可以根据讲话的意思写文章。**对党的政策的宣传，《人民日报》不是没有抓紧，而是没有抓。”

他在询问了4月10日社论的写作过程以后，接着说：

“写文章要联系当前政治，**这篇社论和那篇《教育者必须受教育》的社论，都没有提到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好像世界上没有发生这回事**。中央开的很多会议你们都参加了，参加了会回去不写文章，这是白坐板凳。以后谁写文章，让谁来开会。**是不是邓拓会团结人，你们的意见都那么一致？几个副总编辑像铁板一块，不敢批评他，不敢起来革邓拓的命？有意见可以争论嘛，为什么不和邓拓争论？**要民主集中，但内部可以争吵，拍桌子。你们只要不到马路上去闹，什么意见都可以讲。”

胡乔木解释说：

“《人民日报》曾经搞了个计划，组织过几篇文章，我因为没有把握，压下来了。这事不能全怪报社，我也有责任。”

毛泽东说：

“现在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究竟是什么？百家者，两家而已：资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一家。知识分子百分之七八十是处在中间状态的。争鸣，就是两家争取这中间状态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有人说，资本主义私有制正在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哪里还会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知识分子的毛可以附在资产阶级的皮上，也可以附在无产阶级的皮上。现在应该附在无产阶级的皮上。**

要接近党外知识分子，了解他们。要跟非党知识分子交朋友。我愿意同民主人士、中间派谈，比如李鼎铭。党员的党话太多。近来我在找党外的教授、工程师谈。

**现在的知识分子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他们的灵魂依旧在资产阶级那方面。**小说上说曹操是奸雄。不要相信那些演义，其实，曹操不坏，当时曹操是代表进步一方的，汉是没落的。知识分子要解决这个‘身在曹营’的问题，要在无产阶级的皮上粘得很好，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

争取知识分子，用什么办法？一种办法是压，这不会使人心服，口服心不服。1953年统购统销时，党和农民的关系很紧张。现在，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相当紧张，知识分子魂魄不安。党内也紧张。还要继续紧吗？另一种办法是松，我主张松，这样他们就靠拢我们了，有利于改造。不能紧，越紧他们就和我们的距离越远。过去太紧，现在要松一点，使他们靠拢我们一点。

知识分子大多数是爱国的。反革命有，不多。要允许他们自由发表意见。我们的政策是‘放’，还是‘收’？不能收。很多同志不了解这一点。

《光明日报》接连发表几篇文章，都是讨论当前重大政治情况的。这些情况《人民日报》编辑部也应该讨论。

《新民晚报》赵超构问我，过去提过‘短些，短些，再短些’，可不可以再加一个‘软些，软些，再软些’。我说，有两个‘软些’就够了嘛！当时是怕他们搞黄色的东西。**这次出去又看了看《新民晚报》，觉得那个报纸还是严肃的，没有什么黄色的东西。**有些东西还硬了些，不敢放开讲。《光明日报》有几个副刊也还好。《文汇报》，《中国青年报》，《新民晚报》或者《大公报》，《光明日报》，最后是《人民日报》和各地党报，这样一个名次。《人民日报》标题就不吸引人，有些文章开头一段就不吸引人。《人民日报》社论《教育者必须受教育》，讲了知识分子的问题。文章一开始就引用恩格斯的一段话。从引文讲起，总是先讲死人、外国人，这不好，应当从当前形势讲起。马克思的文章较深，不好懂。斯大林的文章通俗，但斯大林的文章有教训人的味道，不平等，动辄‘由此可见’，‘这就是说’，论述不够，说服力不强。从马克思到列宁，越来越通俗。今后写文章要通俗，使工农都能接受。”

有人提出，希望有位中央委员、最好是一位政治局委员来《人民日报》坐镇。毛泽东说：

“编辑工作困难是有的，但在现在条件下，还可以改进。《人民日报》树大招风嘛！需要有一个政治局委员主持工作，内外都能顶住，但现在还没有适当人选。”

有人提出杂文难写。毛泽东说：

“杂文要有，整个报纸的文风要改进。杂文也可以写得全面一些。鲁迅的杂文就很全面。我辞去国家主席职务以后，可以给你们写些文章。”

在谈话结束前，毛泽东提出了6点总结意见，他说：

“1、报纸的宣传，要联系当前的政治，写新闻、文章要这样，写社论更要这样。如2月间最高国务会议和3月间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及其以后的发展，报纸的宣传要围绕这个当前最重要的政治来做。

2、中央的每一重要决策，报纸都要有具体布置，要订出写哪些社论、文章和新闻的计划，并贯彻执行。**2月间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当时来不及整理发表，但可以根据讲话要点写文章、社论来宣传，在这方面，《人民日报》有充分的条件可以得风气之先。**现在这个讲话已作了多次修改，差不多了，只有几个地方还要斟酌一下，再过几天就可以发表。《人民日报》就要准备做系统的宣传。

3、《人民日报》要在现有条件下努力改进工作，包括领导工作。编委会可以扩大些，开会要讨论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实质问题，可以争论。报纸的编排和文风，不要刻板，要生动活泼。文章要写得短些、通顺些，标题要醒目些，使读者爱看。

4、要吸收报社以外的专家、学者、作家参加报纸编辑工作，要团结好他们。理论版和文艺版请了一些顾问，这办法很好。这两个版要设专门的编委会，请报社外的人参加，属半独立性。

5、将来可以考虑，中央调一个政治局委员到《人民日报》工作，从根本上解决领导问题。

6、公报等等肯定要登。已经出了8个版，也不要轻易减少，这牵涉很大，大家还要多写东西。”

这次谈话进行了4个多小时，一直到下午5时10分才结束。

4月10日傍晚，刘媛英等人正在王季范家里拉家常，王季范的秘书走过来说：

“请先生去接电话，是中南海打来的。”

王季范连忙起身离去，不一会儿，他回到客厅，兴奋地对大家说：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主席回来了，昨天下午回来的，请你们今晚去吃晚饭。”

几位客人听了，极为高兴。他们来京已经两个月了，就是盼着毛泽东回来。

原来早在2月份，春节刚过，毛泽东的又一批客人就从唐家圫出发了。她们是文泮香的老伴十阿婆黄桔香，文梅清的老伴十七阿婆文赵氏，十阿婆的儿媳刘媛英、女婿王先槐，刘媛英的小儿子文泽湘，还有十七阿婆的长女文凯元。

此前，文凯元也想到北京看看毛泽东和她的老师兼表伯的王季范，因为她嫁到了一个地主家庭，便遭到了大家的一致反对。文凯元一直追到了长沙，人们还在劝她回去。文凯元说：

“地主又怎么样？如果主席不见我，我就去见老师，那总可以吧！”

大家无奈，只好让她一起同行。在这一行人中，除了王先槐和文泽湘是男人外，其余的都是乡下老太太，就连刘媛英、文凯元也都是50岁上下的人了。他们大多没出过远门，只有刘媛英去过一次北京。

刘媛英一行6人到北京后，王季范派车到车站把他们接到了头发胡同7号王宅里。王家小院里一下来了6位客人，热闹非常，王季范一边接待客人，一边安排他们的住处，忙得不亦乐乎。由于人太多，只好分住3处：文十七阿婆母女俩住王季范家；刘媛英陪婆婆住表妹章淼洪在头发胡同9号的家里；王先槐和文泽湘则住他儿子王文章处。

那时候，大家不便打听毛泽东的行踪，只好先游览京华名胜。闲暇时，王季范就告诉大家见到毛泽东时，应注意的一些事项，他说：称呼要先称“君”后称“亲”，平辈要称“泽东同志”或“泽东主席”；侄辈要称“主席三叔”；侄孙辈要称“主席三公”。谈话时，要先问“主席身体好吗？”然后问“江青夫人好吗？”其余就不用多问了。如此这般训练了好几天，直到客人们都运用自如时，王季范方才罢休。

现在，终于等到这一天了。中南海开来了3辆小车，从车上走下来一位身着中山装的干部，跟王季范和章淼洪打了招呼，他就是毛泽东的秘书高智。

“你们好！”高智热情地对客人们说：“主席派我来，今天请你们吃晚饭。”

他掏出小册子，对照上面的名单清点人数。乡下来的6位客人，均在邀请之列。还有王季范、章淼洪作陪。由于毛泽东请客是有严格规定的，没有邀请的人不能去。王季范另外两位客人和章淼洪的孩子也想去看看毛泽东，被高智拒绝了。

轿车进了新华门，放慢了车速，在丰泽园门口停了下来。高智领着客人们穿过草坪，来到北房客厅，叫大家坐在沙发上休息。大家刚落座，毛泽东从侧面的书房掀开布帘走了出来。客人们一齐站了起来，向他致意。毛泽东缓步走过来，满面笑容地说：

“欢迎欢迎！”

王季范向毛泽东一一介绍客人：

“这是十表嫂。”

“十嫂。”

毛泽东喊了一声，握着文十阿婆的手，端详着，分别数十年，已经认不出这位表嫂了。

“这是十七表嫂。”

文十七阿婆是小脚，由女儿搀扶着走过来，喊了声：

“主席三表弟！”

“十七嫂。”

毛泽东握着了她的手。

“这是她的女儿，叫八妹子。”

“噢，八妹子。”

“这是赐生二嫂。”毛泽东握着刘媛英的手，说：“认识认识。”

毛泽东对大家说：

“请坐请坐。”

宾主落座后，毛泽东说：

“听说你们来了很长时间了，我又不在家,你们一直等着。昨天我才回来。今天请你们来，见见面，说说话，一起吃顿饭。”

王季范向毛泽东介绍了客人来京的经过和住所。毛泽东说：

“这可委屈了你们啰！”

刘媛英说：

“主席，我们到北京来，心里多高兴呀！别说是分开住，就是住在低等的饭店、旅社，我们也都满足了。”

毛泽东问：

“你们来北京生活习惯吗？”

两位年纪大的老太太初次见到毛泽东，不免有些拘谨，加上王季范事先叮嘱她们不要多讲话，所以，她们也就一直不说话。毛泽东倒是很愿意和她们说话，总是问长问短，想打开她们的话匣子。还是十七阿婆先开了口，她说：

“主席，您不晓得呢，农村条件艰苦，没有钱用，连饭都没得吃啊！”

“噢？”毛泽东脸上露出惊讶。他点点头，示意她继续讲下去。文凯元却接着母亲的话说：

“三叔，农村世道艰难啊！我们每年只能吃到半年的粮食，吃不饱，就靠红薯充饥。还有，乡下那些干部恶得很。”

“照你们讲的，乡下的日子苦得很啰！”

毛泽东说完，起身给大家递烟。王季范说：

“我不抽烟。”

“你还是只知道发财啰。”

毛泽东还是非常风趣。王季范扶了扶深度近视眼镜，也笑着说：

“你看我发了什么财呀？”

这时候，秘书走了进来，对毛泽东说：

“主席，吃饭了。”

“好。”毛泽东站了起来说：“今天晚上，请大家吃顿便饭。”

从客厅到餐厅仅有一墙之隔，中间垂着绿绒布。客人们掀开绒幕，来到小餐厅，围坐了一大桌。桌子上摆着一些酒菜，酒是白酒和葡萄酒，菜是湖南风味，有扣肉、腊肉、火烙鱼、炒粉丝等等。毛泽东先给客人们敬酒，只有王季范、章淼洪、刘媛英能喝几盅白酒，其余的人全喝葡萄酒。乡里人不懂城里敬酒的规矩，不等碰杯就一口干了。毛泽东也不介意，他和王季范、章淼洪碰杯、干杯。他又给客人敬菜，先是给每个客人夹了一块扣肉，叫他们多吃菜，又给每个人夹了一个大辣椒，说：

“湖南人喜欢辣椒，我就最喜欢吃这个。可在北京很难吃到。这是北京的炸辣椒，味好，就是只能给你们每人吃一个。”

文十阿婆、文十七阿婆一边吃菜，一边想着刚才杯子里那橘红橘红的液体，不觉有些醉意，就问毛泽东：

“主席，你给我们喝的是不是糖水？”

王季范闻言连忙朝她俩眨眼睛，示意她们不要多讲话。来前就交代过她们，见了毛泽东不要多讲话，谁知还是说出了这样的话来。毛泽东并不介意，一边往嘴里扒饭，一边回答说：

“十嫂，十七嫂，这是葡萄酒，你们在乡里没喝过吗？”

“没喝过。”

“那就多喝一杯吧。”

“不喝了，谢谢主席。”

文十七阿婆说话时，似乎没有注意到王季范的表情，她仍然说：

“三哥，台湾怎么不拿回来算了？”

毛泽东笑了，他耐心地说：

“十七嫂，台湾是要拿来的，只是要等待时机。”

毛泽东吃完饭，又端起杯子对大家说：

“吃过饭，都喝一杯酒。这样好，饭上加酒，哪里都有！”

说罢，他喝完了杯中的白酒。大家也都跟着喝了一杯红酒或白酒，回到客厅，工作人员已经在桌子上摆上了香烟和新鲜的水果。

“你们吃吧。”

毛泽东指着香蕉、苹果让客人。秘书走过来和他耳语了几句，他便站起来说：

“摄影师已经准备好了，跟你们一起照个相。”

于是，众人就在客厅垂下的绿绒布前分成两排，前排坐着毛泽东、王季范、文十阿婆、文十七阿婆；后排依次站着刘媛英、章淼洪、文凯元、文泽湘、王先槐。照完相，王季范对大家说：

“主席很忙，不要耽误他太多时间。”

客人们闻言，开始向毛泽东告辞。毛泽东也不再挽留，把他们送到大门口。他想起文桂香之妻和文涧泉的娘还没有来过北京，就笑着对刘媛英说：

“赐生二嫂，这次你的任务完成得不错，明年你再来，再带几个人来北京看看，一个是九阿婆，一个是瑞人阿婆。”

刘媛英一行6人又住了一段时间。过了五一劳动节，中南海又派来两辆小车把她们接去看电影。仍旧是在毛泽东的客厅里，毛泽东同她们一一握手，请她们就座，还未来得及寒暄，窗帘便拉下来了。这天放的是一部苏联电影，根据高尔基同名小说改编的《母亲》。

看完电影，毛泽东送她们从后门出来，等她们上了车，毛泽东还在向她们挥手。

再说4月11日中午，毛泽东召见来京的老朋友周谷城，就《形式逻辑与辩证法》一文与他进行了讨论。

原来早在1956年，周谷城因为不赞成苏联方面一些有关逻辑的著作，就撰写出了一篇题目为《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的文章，发表在《新建设》杂志上，没想到文章一发表，立即引起了学术界一片哗然。《新建设》杂志编辑告诉周谷城说：“反对你的文章太多了，怎么办？”周谷城起初对这种学术争论并不以为然，他说：“只要杂志给我篇幅，我可以辩论到底。”后来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多了，他这才慌了手脚。

毛泽东非常赞赏周谷城的文章，鼓励他在学术讨论中要坚持自己的原则立场。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要田家英把冯友兰和另外一些在京的哲学家王方铭、贺麟、金岳霖、费孝通接到颐年堂，共同探讨关于形式逻辑在争鸣中提出的一些问题。

尔后，毛泽东与大家共进午餐，他指着服务人员端来的饭菜，风趣地对众人说：

“我这饭叫四面八方人马饭，其中有各种的米，还有许多豆类，人、马都可以吃，所以叫人马饭。”

大家边吃边谈，无拘无束。毛泽东对周谷城和王方铭说：

“你们两个人的观点很接近，可以做学术上志同道合的朋友。”

他还对大家说：

“搞科学研究，必须实事求是，独立思考，不能让自己的脖子上长别人的脑袋。即使对老师，也不要迷信。”

饭后，毛泽东像老朋友一样，一直把客人们送出丰泽园的大门，看着他们乘车而去。

冯友兰不禁想起当年与蒋介石一起吃饭时的情景，那时的自己是何等的小心谨慎，如履薄冰，心中顿时生出了无限的感慨。

4月15日下午，艳阳当空，和风轻拂，春意盎然。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党政军领导人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负责人以及数万群众，在北京南苑机场迎候来访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克·叶·伏罗希洛夫。

下午3时许，一架图-104喷气式专机徐徐降落在跑道上，76岁的伏罗希洛夫出现在机舱门口。只见他白发银须，神采奕奕，挥动着手中的帽子向欢迎的人群致意，尔后缓步走下舷梯。毛泽东迎了上去，和伏罗希洛夫热烈握手，并热情地说：

“你的身体真好啊！欢迎你，全中国人民欢迎你，今天的天气也在欢迎你。”

伏罗希洛夫也风趣地回答道：

“从我们乘飞机飞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候起，美好的天气一直伴随着我们。所以我的身体更加健康了。”

说罢，他与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一一握手问好。

在毛泽东陪同下，伏罗希洛夫检阅了三军仪仗队。毛泽东在欢迎仪式上致欢迎词，伏罗希洛夫也致词答谢。简短的欢迎仪式结束后，毛泽东和伏罗希洛夫同乘一辆绿色敞篷车驶向中南海，沿途受到近百万群众的夹道欢迎。在天安门广场，数万群众围绕着领袖的车辆热烈欢呼，时间长达近一刻钟。

下午5时10分，毛泽东、伏罗希洛夫乘坐的车辆进入新华门，到达伏罗希洛夫的下榻处勤政殿。

是日晚，毛泽东在勤政殿会见了伏罗希洛夫和苏联代表团其他成员。

“亲爱的毛泽东同志，我有几个问题，可以提吗？”伏罗希洛夫露出一脸的关切和隐忧，他看到毛泽东笑容可掬，就接着说：“你们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是什么意思？”

毛泽东说：

**“‘万马齐喑究可哀’么！”**

会见结束后，毛泽东提议明天晚上在欢迎宴会结束后让苏联客人观看由昆曲演员侯永奎演出的《林冲夜奔》。有人说：昆曲难懂。毛泽东说：

“昆曲听不懂，难道京剧听得懂么？昆曲载歌载舞，而且这出戏有积极的政治意义。”

4月16日晚，毛泽东在怀仁堂举行盛大国宴，欢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访华。参加宴会的有所有在京的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和全国政协委员会、政府各部门的负责人，中共中央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领导人，以及各国驻华使节和经济代表团团长等270多人。

晚上6时30分左右，伏罗希洛夫及其随行人员在朱德的陪同下，从勤政殿漫步来到怀仁堂，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在门前迎接。周恩来向伏罗希洛夫介绍陈毅说：

“这是陈毅同志，最近从华东调进中央，今后准备由他来主持外交工作方面。”

毛泽东接着说：

“他是多年同我一道工作很好的同志。”

周恩来还向伏罗希洛夫介绍了卫立煌。伏罗希洛夫笑着对卫立煌说：

“只要我们团结一致，我们就是无敌的。”

周恩来说：

“国共两党过去已经合作了两次。”

毛泽东接着说：

**“我们还要准备进行第3次国共合作。”**

毛泽东陪同客人们步入宴会大厅，乐队立刻奏起了欢快的乐曲，大厅里的人们全部起立鼓掌，欢迎苏联贵宾。毛泽东首先致词，他说：

亲爱的伏罗希洛夫主席，亲爱的苏联同志们，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同我们伟大的盟邦的代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同志和其他苏联来宾们欢聚一堂，感到非常高兴。

伏罗希洛夫同志是苏维埃国家和苏联共产党的杰出领导人之一。几十年来，他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为苏联国防力量的增强和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并且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伏罗希洛夫同志是中国人民最亲密的同志和朋友，他这次来到我国访问，给我们带来了伟大苏联人民的兄弟友谊，我代表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向我们的贵宾们表示热烈的欢迎。

40年前，苏联人民在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和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作为新世界的开路先锋，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人类历史的转折点。**40年来，苏联人民不但在国内进行辉煌的社会主义建设，而且对整个世界和平和进步事业做出了无可比拟的贡献。全世界劳动人民从苏联人民身上看见了自己解放和建立人类幸福社会的光明道路。我们中国人民正是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取得今天的胜利和成就的。中国人民一贯把中国革命看做是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并且以此为莫大的光荣。**

中国人民在争取民族解放的过程中，获得了苏联人民兄弟般的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胜利之后，苏联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又给予全面的、巨大的援助。这些都是中国人民永远不能忘记的。我愿意在这里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再一次向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表示衷心的感谢。

苏联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长期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建设过程中，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是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巨大财富，中国人民在过去的革命斗争中和目前的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都从苏联学到许多宝贵东西，今后，中国人民还要继续加强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以加速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伟大的中苏两国人民是最亲密的兄弟和最可靠的朋友。在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的崇高事业中，我们中国人民同苏联人民是坚决地站在一起的。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总是想尽一切办法挑拨和破坏我们两国之间的团结友好关系。但是事实证明，他们这些阴谋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得逞的。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把我们分开。中苏8亿人民的友谊是永恒的，牢不可破的。

让我们举杯，为中苏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兄弟友谊，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伟大团结的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为一切爱好和平和自由的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日益发展，为世界和平，为苏联共产主义建设的更辉煌的成就，为伏罗希洛夫主席的健康和长寿，干杯！

大厅里立刻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毛泽东端起酒杯，走到伏罗希洛夫面前。伏罗希洛夫微笑着说：

**“你这样夸奖我，将来不是要成个人崇拜吗？”**

毛泽东说：

**“个人崇拜是什么？不能没有，也不可多有。”**

**“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譬如，我就尊敬毛泽东，我没有什么理由说毛泽东不好嘛。”**

伏罗希洛夫说着有些动情了。毛泽东说：

**“有时不能不崇拜，如对马克思、列宁等，就不能不崇拜。”**

**“对呀，不能不崇拜。”**

伏罗希洛夫挥动了一下手臂，重复了一句。二人会心地笑了起来，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

宴会结束后，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陪同伏罗希洛夫观看了演出。当侯永奎唱到【折桂令】中的“……管叫你海沸山摇”一句时，他那几个漂亮的鹞子翻身，快、脆、帅，一下子把观众带入了特定的悲壮氛围之中，为林冲的悲愤心情所震颤。毛泽东带头起立鼓掌，偌大怀仁堂里，热烈的掌声顿时响了起来。

4月17日，《人民日报》在发表的关于这次欢迎伏罗希洛夫酒会的电讯中，以明显的题目标出：“毛主席说：我们还准备进行第3次国共合作”。

这是毛泽东关于第3次国共合作的第2次公开谈话（第1次见毛泽东和苏加诺的谈话），《人民日报》却是首次将这一信息公诸于世。

后来，正当卫立煌决心为国共新的统一战线做贡献的时候，不幸因病医治无效，于1960年1月17日在北京逝世，1月20日，首都各界举行会议，公祭卫立煌。由周恩来主祭，张治中致悼词。毛泽东送了花圈。

且说4月19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行文极其特殊的党内指示**，他写道：

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门和国家机关各党组：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各地正在讨论。请将党内党外赞成、反对两方面的意见，你们自己的意见，你们对整个形势的估计，地县两级态度如何，你们委员会和书记处或党组是否深刻地多次地讨论了这个问题；第一书记和中央一级党员部长或副部长（指党外人士当部长的那些部）是否自己将这个极重要的思想政治工作问题认真抓起来了，还是依然委托二、三把手去管，自己仍和过去那样不大去动脑筋；第一书记和各书记和各党员部长或副部长将报纸刊物和学校管起来没有，看过报纸刊物上有关这类问题的文章没有，重要社论在发表之前你们看过没有，动笔修改过没有；党和党外人士（主要是知识界）间的不正常的紧张气氛是否有了一些缓和，你们对人民闹事采取了什么态度；党内某些人中存在的国民党作风（即把人民当敌人，采取打击压迫方法，所谓人民民主，所谓群众路线，所谓和群众打成一片，所谓关心群众疾苦，对于这些人说来，只是骗人的空话，即是说党内有一部分人存在着反动的反人民的思想作风）是否开始有所变化；你们向学校学生和工厂工人做过讲演没有，做过几次，效果如何；以上各项问题，请即写成报告，在接此电报以后15天内用电报发来。北京各部门的报告，用书面送来。

中央 1957年4月19日

4月20日，毛泽东给袁水拍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水拍同志：

你的《摇头》写得好（陈毅的六言诗也好），你应该多写些。我感到你做编辑不如出外旅行。可以请人代理你的职务，出外跑几个月回来，做几个月的编辑再出去。是否可行，请加斟酌，并和领导同志商量。**李希凡宜于回到学校边教书，边研究。一到报社他就脱离群众了，平心说理的态度就不足了。请你和他商量一下。**

同志的敬礼！

毛泽东 1957年4月20日

袁水拍拿着毛泽东的信给李希凡看，征求他的意见。李希凡说：

“我不会教书，也不愿意去教书，我自己给主席写信。”

他立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对毛泽东的批评作了检讨，表示愿意经常到生活中去，克服脱离群众的缺点，同时表明不想去教书的愿望。过后李希凡问袁水拍：

“主席看过我的信后表示了什么意见？”

袁水拍苦笑着说：

“你不想去，主席还能怎么办，不是说和你‘商量一下’么？”

李希凡闻言，沉默了许久，依然留在了《人民日报》社。

4月21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接见日本社会党以浅沼稻次郎书记长为首的访华亲善使节团全体成员，他握着浅沼稻次郎的手说：

“久仰大名，欢迎你们。”

浅沼稻次郎是日本卓越的爱国政治家，是在战后日本人民反对美国对日本的占领、争取日本独立、民主、和平与中立斗争中的一位积极的战士。同时，他非常重视同中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为促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争取两国邦交正常化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今日一见毛泽东如此亲切随和，坦诚友好，激动不已，他说，自己对过去未能阻止日本的侵华战争表示非常抱歉，对日本现在仍然处在美国的统治下不能完全自己做主，甚为遗憾。

毛泽东对浅沼稻次郎的自责精神表示赞赏，他说：

“我们可以说是朋友。两国要友好，这是重要的。要恢复邦交，中国只有一个，没有两个，亚非国家的团结是非常重要的。”

浅沼稻次郎认为，两国邦交不是不能恢复，但由于两国的现状，这条路可能长一些。他还说：

“比如我今天去八达岭，路很难走，我脱了鞋，费了很大的劲，终于爬上去了。这说明只要做下去就一定能成功。”

“我赞成你的意见，” 毛泽东说：**“穿着鞋子上不去的地方，脱了鞋就能上去。台湾问题是一个困难，可能时间会长一些，是两国之间的障碍。因为这不是蒋介石的问题，而是美国的问题。”**

他还说：

“美国在日本遍设军事基地，不仅在日本有，在世界上许多地方都有。日本是很有力量的，取消军事基地有可能首先从日本冲破。日本是世界上10个工业化的大国之一，这样一个国家，不可能长期受外国控制的。现在中国很穷，拿什么和你们交换？再过7年、8年、10年，我们才可能和你们多做些生意。”

浅沼稻次郎说：

“日本经济是靠美国的，贸易是单方面的。我认为没有经济的独立就没有民族的独立。值得我们考虑的是，中国有丰富的大米、大豆、煤、盐，但我们还要从美国买。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

“日本有先进的工农业技术，中国有丰富的资源，如果能合作交流，一定能使两国繁荣，希望这一天能早日到来。”讲到这里，毛泽东又加重语气说：“但也不是说日本和美国就不做生意，中国只是一方面，应该和很多国家做。”

“您对日本侵略如何看法？”

坐在浅沼稻次郎身边的胜间田清一向毛泽东提问道。毛泽东回答说：

“世界变大了，进行侵略也不容易。日本扩张的结果，对日本人民也是不利的。但是，没有这个扩张，日本人民得不到教训，中国、世界人民也得不到教训。所以我和日本朋友说，**你们占领了半个中国，当然对我们是不利的，但也有另外的一面，也对中国有利，帮助了我们，这就是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政治觉悟。你们和我们所共同反对的军国主义，有促进中国人民觉醒的作用，也有促使日本人民觉醒的作用。”**

4月24日，毛泽东从这一天开始，着手修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稿，只要没有其它重大活动，他就专心致志地做这个工作。整个修改工作，历时近两个月。

欲知毛泽东如何修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接见日本社会党的浅沼稻次郎时说：“日本扩张的结果，对日本人民也是不利的。但是，没有这个扩张，日本人民得不到教训，中国、世界人民也得不到教训。所以我和日本朋友说，**你们占领了半个中国，当然对我们是不利的，但也有另外的一面，也对中国有利，帮助了我们，这就是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政治觉悟。你们和我们所共同反对的军国主义，有促进中国人民觉醒的作用，也有促使日本人民觉醒的作用。**”他的这些话和此前曾对日本前陆军中将远藤三郎所说的“**你们也是我们的先生，我们要感谢你们。正是你们打了这一仗，教育了中国人民，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打得团结起来了”**是一个意思，是用哲学的语言、辩证的观点把日本帝国主义当作反面教员。如同把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当做反面教员一样，**说明了反面教员是在客观上产生了对中国人民的教育作用，从而促使中国人民觉醒、团结和奋起抗争。**而那些“国粉”一类人却罔顾历史事实，断章取义地刻意歪曲毛泽东的本意，炮制出了所谓的“毛泽东感谢日本侵略”说。他们说什么“毛泽东讲话没有什么顾忌，口无遮拦地道出了事实”，“没有日本鬼子打到中国，他们是没有机会发展壮大的，只因为有了鬼子的侵略，他们才赢得时间，赢得发展壮大的机会，就凭这一点他就要感谢日本鬼子”。此论荒谬之极矣！人们常以“燕雀安知鸿鹄之志”比喻小人与伟人的差异，由上述情况可以看出，那些“燕雀”压根就不懂得“鸿鹄”的语言，所以就更谈不上知其志啦！

**第35章**

**“一切共产党员，不论职位高低，资格新老，都应当把自己放在同普**

**通劳动者的一样的、同等的地位；除了年龄太大、身体有病的以外，**

**都应当准备将来参加能够胜任的一部分体力劳动。”**

话说1957年4月25日凌晨，毛泽东在游泳池同彭真谈了他对已经起草出来的中共中央关于整风指示稿的修改意见。

4月26日，毛泽东在4月24日的《大公报》报头上写了一个批示：

乔木阅：

《大公报》、《中国青年报》的理论水平高于《人民日报》及其它京津沪各报，值得深省改进。**《人民日报》社论不涉及理论（辩证法、唯物论），足见头脑里没有理论的影子，所以该报只能算是第二流报纸**。

毛泽东 4月26日

4月27日凌晨，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关于整风和党政主要干部参加劳动》的指示，全文如下：

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部委及党组：

现在正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重大问题的公开讨论，这个讨论可能延长几个月。**党的整风指示，日内即可发出，**即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发扬正确的思想作风，纠正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的思想作风。党的另一通知日内也可发出（后来推迟到5月10日——笔者注），这个通知提倡县区乡3级党政主要干部，凡能劳动的，每年抽一部分时间下田参加生产，从事一小部分体力劳动。县以上各级党政军主要干部（不是一般干部），凡能劳动的，也要这样做，每年以一部分时间，分别下田、下工厂、下矿山、下工地或者到其它场所，和工人农民一道从事可能胜任的一小部分体力劳动（哪怕是很少一点）。**这样一来，党和群众就打成一片了，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老爷作风，就可以大为减少，面目一新**。此外，请你们注意，对党与（1）工人、（2）农民、（3）学生、（4）解放军战士、（5）知识分子、（6）民主党派、（7）少数民族等7个方面之间所存在的各项具体矛盾，分别召集会议，加以分析研究，使自己心中有数，由盲目到自觉，以便有根据地说服干部和群众。现将湖北省委关于农村人民内部矛盾材料一件发给你们阅读，以为参考。本件及4月19日电报均请转发县级、军队的团、城市工厂和学校的党委。

中央 1957年4月27日

4月27日这一天，中共中央在《人民日报》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摘要如下：

“现在，我们的国家已经从革命的时期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正处在一个新的剧烈的伟大的变革中。社会的关系根本变化了，人们的思想意识也在随着变化。**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要能够进一步地更好地领导全社会的改造和新社会的建设，要能够更好地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将消极力量转化为积极力量，为着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而奋斗，必需同时改造自己**。但是，党内有许多同志，并不了解或者不很了解这种新情况和党的新任务。同时，又因为党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处在执政的地位，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有许多同志就容易采取单纯的行政命令的办法去处理问题，而**有一部分立场不坚定的分子，就容易沾染旧社会国民党作风的残余，形成一种特权思想，**甚至用打击压迫的方法对待群众。**几年以来，在我们党内，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有了新的滋长。因此，中央认为有必要按照“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方针，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水平，改进作风，以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这次整风运动应当以毛泽东同志今年2月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和3月在中央召开的宣传会议上代表中央所作的两个报告为思想的指导，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作为当前整风的主题。毛泽东同志的这两个报告已经在广大的干部和知识分子中传达，以后还要继续在全体党员和人民群众中传达。这两个报告的传达引起了党内党外的热烈讨论，就我们党来说，实际上，这就是整风运动的开始。”

“**对于各级领导机关和干部，**主要的是要检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情况，检查对于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和“勤俭建国”方针的执行情况，检查那些脱离工人群众、农民群众、士兵群众、学生和知识分子群众的官僚主义现象，检查那些不从团结6亿人民出发、不从团结各民族各党派和广大的党外群众出发、不从团结全党出发的宗派主义现象，检查那些不从实际情况出发的主观主义现象。”“**对于一般党员，主要的是要求他们懂得：为人民服务；有事和群众商量；吃苦在前，得利在后；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对于知识分子党员，除了上述各项要求以外，还要着重要求他们联系工农群众，分清无产阶级立场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立场，克服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倾向，加强党性。为了克服思想方法上的主观性和片面性，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党员还必须在今后的适当时期进行唯物辩证法的学习**。”

“**这次整风运动，应该是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应该是一个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运动。”**“**不论在座谈会、小组会上，进行批评的时候，或者个别交谈的时候，都应该放手鼓励批评，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不应该肯定自己的一切，拒绝别人的批评。同时，对于批评者要提倡实事求是，具体分析，以免抹杀别人的一切，使批评变成片面的过火的批评。每个人都应该虚心地听取别人的意见，积极地向别人提意见，但是不得强迫被批评者接受他所不同意的批评。”**

**“为了加强党同广大劳动人民的联系，彻底改变许多领导人员脱离群众的现象，在进行整风运动的同时，应该在全党提倡各级党政军有劳动力的主要领导人员以一部分时间同工人农民一起参加体力劳动的办法，并且使这个办法逐步地形成为一种永久的制度。”**“**建立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人员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根本制度，使领导者同群众打成一片，使人民内部的关系面貌一新，使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老爷架子，大大减少。”**

4月30日晨，毛泽东看了《光明日报》29日刊载的北京大学教授李汝祺撰写的《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一文，给胡乔木写了一封信。

李汝祺在文章中畅谈了参加青岛遗传学座谈会后的收获和意见。毛泽东鉴于这一时期中国还有一些人跟着苏联批判摩尔根，决定让《人民日报》转载这篇文章，他在给胡乔木的信中写道：

乔木同志：

此篇有用，请在《人民日报》上转载。南京一篇，上海一篇，尚未转载，请给我，写上按语。

毛泽东 4月30日

接着，他把李汝祺这篇文章的题目改为《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原题作为副题；并代《人民日报》拟了一个编者按语，他写道：

“本报编者按：这篇文章载在4月29日的《光明日报》，我们将原题改为副题，替作者换了一个肯定的题目，表示我们赞成这篇文章。我们欢迎对错误作彻底的批判（一切真正错误的思想和措施都应批判干净），同时提出恰当的建设性的意见来。”

4月30日下午，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12次扩大会议，议题是关于全党的整风运动。出席会议的有党和国家领导人、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共计44人。毛泽东在讲话中说：

“几年来都想整风，但找不到机会，现在找到了。**凡是涉及到许多人的事情，不搞运动，搞不起来。**需要造成空气，没有一种空气是不行的。现在已经造成批评的空气，这种空气应继续下去，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题目，分析各个方面的矛盾。”

“这时提整风比较自然。整风总的题目是要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反对三个主义（指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下同——笔者注）。中共中央指示中有一条特别的规定，就是要参加生产劳动。这并不是提倡在座的人都去耕田，扫扫街总可以。主要是表明一种态度，要砍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加上一个参加劳动的办法。总的要同工人农民混在一起，多少参加一点劳动。”**“群众对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讲的话，不会全是真话。尤其我们都是知识分子，同劳动人民格格不入。有种办法可以同他们一起，即多少参加一些劳动。”**

“整风会影响党外。规定非党员自愿参加，自由退出。最近两个月就是这个方式，就是整风的办法。我攻你，你攻我，有意见就说，党内外打成一片，此即整风。已经整了两个月。统战工作中的矛盾几年不得解决，如有职无权等，过去很难解决，现在可能解决了。过去不好解决的原因主要是思想不通。过去是共产党员有职有权有责，民主人士只有职而无权无责。现在应是大家有职有权有责。”“现在党内外应改变成平等关系，不是形式上的而是真正的有职有权。以后无论哪个方面，谁当长的就归他管。”

毛泽东说罢，问北大校长马寅初：

“你那里怎么样？”

马寅初回答说：

“过去好在有组织，我的一切都是旧的，如果真管，不能有现在。”

毛泽东又问：

“他们要不要你管？”

马寅初说：

“矛盾是有的。”

毛泽东见马寅初回答得很委婉，便直截了当地挑明说：

“你讲话不彻底，矛盾存在，敷衍过去不能解决。”

他又问了一些情况后，继续说道：

“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是否分两个组织，一个校务委员会管行政，一个教授会议管教学。”“这些问题要研究。由邓小平同志负责找党外人士和民盟、九三学社等开座谈会，对有职有权和学校党委制的问题征求意见。”

“现在不要搞唯物辩证法，要搞政治关系，反对三个主义。不要钻到世界观思想方法里头去，以免把政治关系冲淡，唯物辩证法以后再搞。这个问题会影响到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我们不能企图很多人一下子都接受唯物辩证法、马列主义世界观。**”“解决世界观问题是一个长期的问题。”

“社会大变动时期，使知识分子吃了苦头，主要是社会科学方面的，这里有个经济基础的问题。过去500万知识分子所依附的经济基础，现在垮了。”“有人说，私有制没有了，还有什么两面性呢？这是不对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旧皮不存，毛要附在新皮上，不能吊在空中。要附在工人阶级的皮上**。现在500万知识分子是吃工农的饭，吃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饭。”“现在知识分子有些不自觉，他们的墙角（经济基础）早已挖空了，”“旧的经济基础没有了，但他们的头脑还没有变过来。思想是多少年钻进来的。现在毛已经附在新皮上，但思想还是认为马列主义不好。马列主义世界观不要强迫人家相信，要人家相信，要有过程。”

“北京是个好地方，又是不好的地方。共产党的负责人每年要有4个月在外，8个月在北京。你们也可以这样做。中央机关的特点，一是空，二是全面。缺点就是空，一离开北京就舒服了。”

毛泽东最后说到了他不当国家主席的问题，他说：

“明年二届人大，一定辞去国家主席，减少一部分工作，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问题。瑞士有7人委员会，总统是轮流当的。我们几年的一次总可以，采取逐步脱身政策。不赞成也没办法，不能强加于人。如赞成，要透点消息出去，否则老百姓不了解。”

陈叔通和黄炎培都是第一次听毛泽东说要辞去国家主席职务，不由得吃了一惊，二人商量着要写一封信，表明他们的反对意见。于是，二人便在第二天联名给全国人大委员长刘少奇和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写了一封信。他们认为，现在形势“不可以说国家已经稳固了，况台湾尚未解放，国际两大阵营尚在剧烈斗争”，“在短期过程中全国人民还认识不清楚，”因此，“集体领导中突出个人威信，仍是维系全国人民的重要一环”，否则，“可能因国内人心的震动，而给以国际间推波助澜的造谣的机会”。最后，他们干脆“披沥直陈”，建议刘少奇、周恩来“及时邀请人大政协同志，就这一问题，交换意见，如大家都有上面所陈感想，即请转呈毛主席”。他们希望通过刘、周力劝毛泽东收回成命。

刘少奇、周恩来阅信后立即直接转呈毛泽东。

1957年5月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继续组织党外人士对党政所犯错误缺点展开批评的指示》，他写道：

上海局，各省委、直属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组：

最近两个月以来，在各种有党外人士参加的会议上和报纸刊物上所展开的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分析和对于党政所犯错误缺点的批评，对于党与人民政府改正错误，提高威信，极为有益，应当继续展开，深入批判，不要停顿或间断。**其中有一些批评得不正确，或者在一篇批评中有些观点不正确，当然应当予以反批评，不应当听任错误思想流行，而不予回答（要研究回答的时机并采取分析的态度，要有充分说服力），但是大多数的批评是说得中肯的，对于加强团结，改善工作，极为有益。即使是错误的批评，也暴露了一部分人的面貌，利于我们在将来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改造。**

现在整风开始，中央已同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领导人士商好，他们暂时（至少几个月内）不要表示态度，不要在各民主党派内和社会上号召整风，而要继续展开对我党缺点错误的批判，以利于我党整风，否则对于我党整风是不利的（没有社会压力，整风不易收效）。他们同意此种做法。只要我党整风成功，我党就会取得完全的主动，那时就可以推动社会各界整风了（这里首先指知识界）。此点请你们注意。**党外人士参加我党整风座谈会和整风小组，是请他们向我们提意见，做批评，而不是要他们批评他们自己，此点也请你们注意。**如有不便之处，则以不请党外人士参加整风，而由党邀请党外人士开座谈会，请他们畅所欲言地对工作上缺点错误提出意见为妥。请你们按当地情况斟酌处理。

中央 1957年5月4日

这个指示下达后，各地党组织都采取各种形式，请党外人士对党政工作提意见。党外人士热情高涨，与党员一起踊跃参加各种座谈会、讨论会、鸣放会，对中国共产党党内的缺点和错误提出了严肃的批评意见和积极的建议。可没曾想，不久便有一些心怀叵测的人为逞一己之私，竟趁机向共产党发起了猖狂进攻，最终惹出了一场天大的祸事。

正是：毛公虚怀若谷，肝胆相照，天日可证；

浑人包藏祸心，琵琶另弹，奈何奈何？

且说5月4日晚上，清华大学500多名师生参加了中山公园的“五·四”青年节游园晚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陪同来访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走进了中山堂前清华师生环绕的舞场里，周恩来绕场招呼学生们坐下。毛泽东笑容可掬地对一位身着大红色蒙古民族服装的女生说：

“跟伏老跳舞吧。”

那女生便大大方方地和伏罗希洛夫下了舞场。另一位女生跑到毛泽东跟前，说道：

“毛主席，您好！”

毛泽东也说了一声：

“你好。”

便应邀下了舞场。一曲舞罢，毛泽东和伏罗希洛夫进入中山堂休息。不一会儿，学生们由刘少奇带着，再度请毛泽东和伏罗希洛夫跳舞。毛泽东说：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就来。”

不多一会儿，毛泽东和伏罗希洛夫一块儿来到舞场，毛泽东微笑着对学生们说：

“怎么样？我们真的来了吧！”

毛泽东又跳了一会儿，临走的时候，还对学生们说：

“你们满足了吗？”

5月5日，毛泽东在陈叔通、黄炎培反对他辞去国家主席职务的信中写了几段批语。他心里很清楚，陈叔通、黄炎培表达的意图很有代表性，不仅党外人士，连全国人民一时都接受不了，就是党内也有相当部分人不赞同。如果解释工作不做好，会引起人们思想上不必要的混乱，甚至误会，好事反而办成了坏事，于党于国不利。于是，他便在来信中“集体领导中突出的个人威信，仍是维系全国人民的重要一环”一句后面批道：

“我仍存在，维系人心的个人威信不会因不连任而有所减损。”

来信中建议毛泽东再连任一届，“可以解除全国人民的种种惶惑”。毛泽东批道：

“事前在人民中展开讨论，说明理由，可以减少惶惑。那时我将公开声明理由。”

来信中说，毛主席辞去国家主席职务将引起国内人心震动、国际间造谣。毛泽东批道：

“造一阵谣言，真相自明，谣言便息。”

来信中还提出了修改宪法问题，建议在国家主席“任期4年”下面，加一句“连选不得超过两任”。毛泽东批道：

“可以考虑修改宪法，主席、副主席连选时可以再任一期，即在今年人代大会修改宪法，请小平同志准备。第一任主席有两个理由说清楚可以不连选：1、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加上人民共和国主席任期已满8年，可不连选。2、按宪法制定时算起，可连选一次，但不连选，留下4年，待将来如有卫国战争一类重大事件需要我出任时，再选一次，而从1958年起让我暂时摆脱此任务，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要问题（例如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以中共主席或政治局委员资格，在必要时，我仍可以做主题报告）。这样，比较做主席对国家利益更大。现在杂事太多，极端妨碍研究问题。现在党内高级领导同志对此事想通了的多起来了，而党外人士因为交换意见太少，想不通的还多，因此，有提出来从容交换意见的必要。”

为慎重起见，毛泽东没有把批语直接送交陈叔通、黄炎培，而是转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等人，并特别指示他们：

“**此件需经政治局同意，然后发出。**请少奇同志召集一次有100人左右参加的政治局会议，展开讨论一次，取得同意。此事去年在北戴河已在几十人的会上谈过，大家认为可行。并且谈到党的主席，也认为将来适当时机可行，只是暂时还不可行。请小平同志将此件印发给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八大’代表、各省市区党委、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此事应展开讨论，才能打通思想，取得同意。修改宪法，值得注意。”

5月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已经在中国访问了20天，即将离开中国去印度尼西亚访问。

这天凌晨3时25分左右，勤政殿里灯光明亮，伏罗希洛夫已经起了床。他身着灰色西服，梳洗得整整齐齐，两手插在裤兜里，在前厅里来回走动着，等待着毛泽东的到来。

4时30分，门外响起了脚步声，伏罗希洛夫整理了一下领带，迎了出去。毛泽东见伏罗希洛夫走了出来，连忙上前紧紧握着他的手，关切地问候道：

“睡得怎么样，休息好了没有？”

伏罗希洛夫说：

“休息得很好。这个时候还打搅你，真有些过意不去，你早应该休息了。”

“我应该来看看你。”

毛泽东一边说着，一边拉着伏罗希洛夫的手，并肩向客厅走去。到了客厅门口，伏罗希洛夫伸出左手做了一个请的手势，说：

“你到我这里来是客人，请吧。”

毛泽东微笑着谦让道：

“咱们一块儿进去吧。”

伏罗希洛夫把茶桌上的烟灰缸拿过来，放在毛泽东坐的沙发扶手上，亲切地说：

“茶桌离你远了些，这样你就方便了，不用再起来去磕烟灰。”

毛泽东道了一声“谢谢”，关切地问道：

“20天来你累了吧？节目可能紧了一些，你是不是没有休息好？”

伏罗希洛夫高兴地说：

“我最亲近的朋友，毛泽东同志，我一点也不累，一切都好极了。偶尔由于太阳晒，有些头昏。在广州吃了点蛇肉，也许肚子里展开了龙虎斗，刚回北京稍稍感到不舒适，很快就过去了。每当我想到热情好客的中国人民对我们的动人的欢迎和款待，就是有点疲劳也都忘了。我听说你每天熬夜，我真心疼啊！你无论如何也别熬夜了。过去我也曾通宵工作，结果身体受了不少损失。希望你这样做：太阳一出来你就向它问好，太阳一落你就向它告别，去休息。”

“好，要按太阳的规律办事。”毛泽东微笑着回答，接着他又说道：“不过不要紧，我已经习惯了夜里工作，我是按月亮规律办事哩。”

“不行不行，你不能这样做。”

伏罗希洛夫连连摇着大手。他起身从茶桌上端起一杯泡好的龙井茶，递给毛泽东，又问毛泽东每天吸几支烟，毛泽东说：

“不多，有时把烟拿在手里不抽，或者是燃着了不吸，看着它冒烟，在精神上好像是吸了。”

卫士们为了限制毛泽东吸烟的量，曾经把一支烟折为两节，使他吸完后有所间隔。伏罗希洛夫听毛泽东如此说，摇摇头，真诚地说道：

“我亲爱的毛泽东同志，你如果想休息，随时都可以到我们那儿去，你想到哪里就到哪里，如像南俄的索奇和黑海岸上的克里米亚等地。”

毛泽东说：

“我深深感谢你，你这是很好的意思。”

此时，天边已渐渐现出晨曦。刘少奇、周恩来走了进来，准备一道去机场为伏罗希洛夫送行。该出发了，毛泽东陪着伏罗希洛夫走到门口，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说：

“我不同你告别，我只暂时说同你再见，祝你一路平安！”

他把伏罗希洛夫送上汽车，目送着车队渐渐远去。

5月7日，刘少奇在听取杨献珍等人的汇报时，说道：

“整风就是要强调同一性。处理的方针可以着重它的同一性。因为原来是有同一性，我们没有必要先强调斗争性，故意地人为地使斗争激烈化，使斗争紧张起来，似乎要创造斗争的样子，我们才舒服。好像我们就有那么一种嗜好，不斗一下不过瘾。可以采取妥协的办法嘛。这样一种方针，我们不少同志是不晓得的。”

5月7日这一天，毛泽东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修改写出了第一个修改稿，他称为“自修稿第1次稿”。

5月8日上午，毛泽东改出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自修稿第2次稿”。

5月8日这一天，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陈叔通和黄炎培的联名信以及毛泽东对这封信的批示。

政治局扩大会议经过充分讨论，除了个别人有不同意见外，绝大多数人都赞成毛泽东辞去国家主席职务的意见。

是日晚10时，毛泽东改出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自修稿第3次稿”。

5月9日、10日这两天，毛泽东改出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自修稿第4次稿”。他把整个修改稿注明为“草稿第1稿”，批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陈伯达、胡乔木、陆定一、田家英、胡绳、邓力群、康生、李维汉，并且写道：

“请收到此件的同志提出修改意见，交陈伯达同志汇总修改。”

5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此前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各级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摘要如下：

**“今春以来，许多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干部纷纷参加田间劳动，若干地方的县区干部，有些省、市、自治区的负责同志和高级中级军官，也开始这样做。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个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干部们参加生产劳动之后，并没有减弱领导工作，相反地，由于领导者参加生产劳动，同群众打成一片，有利于及时地、具体地发现和处理问题，有利于改进领导工作，从而可以比较容易地避免和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许多错误，并且有利于改变社会上所存在的那种轻视体力劳动的观念。”**“中央认为：不仅县、区、乡的干部，而且**县级以上的各级党委的主要领导人员、在政府和人民团体中工作的党的主要干部，包括党的中央委员在内，凡是能够参加体力劳动的，都应该每年抽出一部分时间参加一部分体力劳动。”“年老体弱的干部都不要勉强地参加这些劳动。”**

**“党的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活动，必须注意不致影响本机关的日常领导工作，不致拥挤在一时一地，不致增加基层单位的麻烦，不致增加国家财政的支出。”“力求避免形式主义和时冷时热的现象。**”

“关于机关的一般干部、军队的干部和战士、学校的教职人员和学生参加体力劳动的问题，因为人数很多，牵涉较宽，须由行政部门、军队政治部和教育机关加以研究，拟出办法，但不要盲目地、无计划地推广，而是应当经过一部分人首先试行，取得经验，继续在自愿的基础上，逐步开展。

党中央委员会唤起全党同志注意：我们的党在30多年中，同群众在一起，艰苦奋斗，赢得了伟大革命的胜利。现在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我们面前的艰巨的任务，是要把我国建成为一个伟大社会主义的具有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的国家。要实现这个任务，就必须继续发扬我们党联系群众、艰苦奋斗的传统。各级的领导干部参加一部分体力劳动，使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逐步结合，就是发扬这个优良传统的一个制度，也是当前整风运动要求达到的一个目的。”“**现在有不少同志受旧社会剥削阶级的思想影响，忘记过去的这种优良传统，看不起体力劳动，滋长了一种贪图名利地位的习气，并且有一部分人只希望脱离生产，而在脱离生产以后即不愿意再回到生产中去。这是非常危险的倾向。党必须同这种倾向进行坚决的斗争。”“一切共产党员，不论职位高低，资格新老，都应当把自己放在同普通劳动者的一样的、同等的地位；**除了年龄太大、身体有病的以外，都应当准备将来参加能够胜任的一部分体力劳动。”“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共产党员能否为党的总任务而奋斗的一种重大的考验。党中央委员会相信全党同志是能够经得起这种考验的。”

5月11日，毛泽东给在湖南长沙第10中学教书的语文教师李淑一写了一封回信。

此前，李淑一看了毛泽东于1957年1月发表在《诗刊》上的18首诗词后，在2月7日把自己记忆起来的、过去毛泽东赠给她丈夫柳直荀一首诗中的几句，抄寄给毛泽东。她在信中附上了自己1933年所作的怀念丈夫柳直荀的一首《菩萨蛮·惊梦》：兰闺索寞翻身早，夜来触动愁多少。底事太难堪，惊侬晓梦残！征人何处觅？六载无消息。醒忆别伊时，满衫清泪滋。李淑一还在信中索取毛泽东在1920年送给杨开慧的那首《虞美人》。

毛泽东在回信中是这样写的：

淑一同志：

惠书收到。过于谦让了。我们是一辈的人，不是前辈后辈关系，你所取的态度不适当，要改。已指出“巫峡”，读者已知所指何处，似不必再出现“三峡”字面。大作读毕，感慨系之。开慧所述那一首不好，不要写了罢。有《游仙》一首为赠。这种游仙，作者自己不在内，别于古之游仙诗。但词里有之，如咏七夕之类。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暑假或寒假你如有可能，请到板仓代我看一看开慧的墓。之外，你如去看直荀的墓的时候，请为我代致悼意。你如见到柳午亭先生时，请为我代致问候。午亭先生和你有何困难，请告。

为国珍摄！

毛泽东 1957年5月11日

毛泽东赠给李淑一的这首游仙词，就是人们所熟知的堪称千古绝唱的《蝶恋花·答李淑一》。李淑一读罢毛泽东这封来信，激动得热泪涌流。

还须说明的是，毛泽东后来在1961年把曾经婉拒李淑一请求的《虞美人》一词写了出来，送给了他的卫士张仙朋。

且说5月12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接见马尔科率领的阿尔巴尼亚议会代表团。

一身灰色中山装的毛泽东微笑着挥手欢迎客人。他听着陌生的译员范承祚讲的外语也是陌生的，便转身问范承祚：

“你说的是什么外国话呀？”

范承祚答道：

“我讲的是阿尔巴尼亚语。”

毛泽东好奇地问：

“你的阿语是在哪里学的？”

范承祚指着阿尔巴尼亚人民议会主席马尔科报告说：

“我是在他们国家学的。”

毛泽东听后很高兴，郑重地向马尔科说：

“谢谢你们为我们国家培养了人才。”

毛泽东在会谈中说：

“殖民地人民要敢于打倒新老殖民主义，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不在乎玉皇大帝。”

范承祚听了愣了一下，不知如何翻译才好。他对毛泽东说：

“翻译‘孙悟空’，我没有把握。”

毛泽东微笑着对他说：

“你就说孙悟空是中国神话里的猴王，足智多谋、力大无比，玉帝及其派去镇压的天兵天将对他亦无可奈何。”

当话题转向有关上帝的问题时，毛泽东说：

“中国也有上帝，就是玉皇大帝。他官僚主义很厉害。有个最革命的孙猴子反对过他的专制。这个猴王虽经历了不少困难，像列宁被抓了去一样被玉皇大帝抓了去，后来他又逃了出来，大闹一番。玉皇大帝是很专制的，像蒋介石一样，像帝国主义一样。帝国主义一定会被打倒。孙行者很多的，就是人民。”

5月14日凌晨，毛泽东在5月10日的《解放日报》第二版上给刘少奇等人写了一个批示，他写道：

“少奇、恩来、陈云、小平、彭真同志阅。这一整版值得过细一看，不整风党就会毁了。”

毛泽东所说的“这一整版”是以“大胆揭露矛盾，帮助党内整风”为题，刊登的该报前两天邀请一批中小学教师开座谈会的发言摘要。他还写道：

“请你们注意看上海《解放日报》，南京《新华日报》，上海《文汇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集中看人民内部矛盾和我党整风消息，这是天下第一大事。”

原来在5月8日下午，中央统战部受中共中央委托，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了第1次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到5月13日，座谈会已经举行了5次。在前4次座谈会上，与会者的发言和书面发言，大多是建设性的。有一些意见尽管尖锐，但也比较中肯，与人为善。但在13日的第5次座谈会上，一些人的发言就越来越偏激了。

**有人提出了要与共产党“平起平坐”的意见，他们说：“现在民主党派同共产党只是在政治、法律上的平等，离事实上的真正的平等还遥远得很，因为事实上平等的条件还不存在，还没有物质基础。平等的权利是宣布了，民主党派却没有资格去享受这项权利。”**

有人甚至**针对“党委（党组）负责制”说：“能做主角的，就让他做主角，否则就让他跑龙套或者干脆不要他在台上。”“用不着再把那些小脚放在台上跳加官。”**

毛泽东在批示中所列举的那些报纸都对上述情况作了详细报道。

5月14日，毛泽东签发了中共中央《关于报道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指示中说：

“**对于党外人士的错误的批评，特别是对右倾分子的言论，目前不要反驳，以便使他们畅所欲言。我们各地的报纸应该继续充分报道党外人士的言论，特别是对右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论，必须原样的、不加粉饰的报道出来，使群众明了他们的面目，这对于教育群众、教育中间分子，有很大的好处。**”

是日晚9时，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李维汉、康生、陆定一，讨论整风座谈会上发生的情况。会议开到次日凌晨1时结束。

5月15日，毛泽东开始写一篇文章，原来的题目是《走向反面（未定稿）》，署名是“本报评论员”。看来是要公开发表的。可他在审阅第一次清样时，改变了初衷，又把文章题目改为《事情正在起变化》，署名改为“中央政治研究室”，并且注明：“内部文件，注意保存。”

5月15日下午，中央统战部召开第6次座谈会，无党派民主人士、北大校长马寅初，民革中央常委陈铭枢，无党派民主人士沈雁冰，民盟中央常委兼妇委主任刘清扬，民革中央秘书长梅龚彬，无党派民主人士张奚若，先后在会上发言。

马寅初说：“目前有些批评不够实事求是，有否定一切的现象。”“如现在对北京大学的批评，坏的地方说得很详细，好的地方一点也不说，这是无法令人心服的。”“单纯批评党委制不好是不对的，党委制好的地方也要表扬。‘墙’必须从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两方面拆，单靠一方面拆是不成的。”

有人则说，他那个党派没有“墙”可拆。他主张取消学校中的党委制。

**张奚若最后一个发言，他批评有4种偏差：第一，好大喜功。第二，急功近利。第三，鄙视既往。第四，迷信将来。**

**张奚若的这4句话，后来给毛泽东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5月1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

各省委、直属市委、自治区党委，各中央直属部委首长，各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的负责同志：

自从展开人民内部矛盾的党内外公开讨论以来，异常迅速地揭露了各方面的矛盾。这些矛盾的详细情况，我们过去几乎完全不知道。现在如实地揭露出来，很好。**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包括北京大学化学教授傅鹰在内，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这类批评占90%以上，对于我党整风，改正缺点错误，大有利益。**从揭露出来的事实看来，不正确地甚至是完全不合理地对党外人士发号施令，完全不信任和不尊重党外人士，以致造成深沟高墙，不讲真话，没有友情，隔阂得很，党员评级、评薪、提拔和待遇等事均有特权，党员高一等，党外低一等。党员盛气凌人，非党员做小媳妇。学校我党干部教员助教讲师教授资历低，学问少，不向资历高学问多的教员教授诚恳学习，反而向他们摆架子。以上情况，虽非全部，但甚普遍。**这种错误方向，必须完全扭转过来，而且越快越好。无论文教界和其他方面，凡态度十分恶劣，已为多数群众所不信任的同志应当迅速调动工作，以党外资历深信誉好的人员充任，或以胜任的党员充任，以利团结党内外，改进工作。**最近一些天以来，社会上有少数带有反共情绪的人跃跃欲试，发表一些带有煽动性的言论，企图将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以利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引导到错误方向去，此点请你们注意，放手让他们发表，并且暂时（几个星期内）不要批驳，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过一个时期再研究反驳的问题。**这一点，5月14日我们已告诉你们了。为了研究问题，请你们多看几种报纸。有些地方例如上海党外批评相当紧张，应当好好掌握形势，设法团结多数中间力量，**逐步孤立右派，争取胜利**。

　 　 中央 1957年5月16日

5月16日晚9时，毛泽东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李维汉、康生、陆定一、吴冷西，讨论整风运动中所发生的情况。会议开到次日1时20分结束。

欲知整风运动中的新动向如何发展？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自从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提出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以后，又不辞辛劳地为之宣传，并呼吁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本传在前面已经讲得很详细了。由此可以看出，毛公其意也善，其心也诚，读者诸君是不难看明白的。奈何党内高层一些人反对在前，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中的一些不良分子捣乱于后，如他们在5月13日第5次座谈会、5月15日第6次座谈会上的种种表现，这大概就是毛泽东常说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于是乎，反右斗争便势在必行了。

**第36章**

**“他们企图乘此时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打**

**翻，拉着历史向后倒退，退到资产阶级专政，实际是退到革命胜利以前的**

**半殖民地地位，把中国人民重新放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动统治之下。”**

话说1957年5月18日晚上，毛泽东在菊香书屋的卧室里，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胡乔木、吴冷西开会。他右手拿着香烟，左手扬起一张报纸，冲着吴冷西问道：

“你看过5月13日的《新民晚报》没有？报上有一篇文章，题目叫作《先锋何在？》，署名林放，即赵超构，内容相当尖锐，但文笔比较客气。”

吴冷西说：

“没有看，这几天又是布置机关内整风，又是报道全国大鸣大放。”

毛泽东说：

“搞新闻工作的再忙，也要每天浏览全国报纸。上海的《文汇报》、《新民报》，北京的《光明日报》，尤其非看不可，而且要仔细看，看他们有什么议论，有什么独家新闻，编排怎样，从中可以看出政治思想动向。你们新闻工作者协会正在开座谈会，昨天《人民日报》报道了。现在新闻界有许多议论：

1、他们说，新闻要新。现在新闻太少，旧闻太多。

新闻要新，这应当不成问题，因为不是写历史。但是不能没有‘旧闻’，也还要有‘无闻’。这个问题，我在3月份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谈过，说要做具体分析。一般讲新闻要新、要快是对的，但**有的事情发表太快副作用就很大。比如1955年底，北京市几天时间就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宣布进入社会主义，在天安门开庆祝大会。这样的新闻本来要慎重考虑，但当天就广播了，以至全国各地一拥而上，照北京的办，工作草率、粗糙。所以，新闻太快了有时就出毛病，**不如慢一点好。这个问题看来思想上未解决。

2、他们说，现在新闻自由太少，统制太多。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包办一切。

我们的新闻统制，是否比国民党更厉害？很难说。我们在全国解放后的头几年，新闻统制比较严，很有必要，因为政权刚拿过来，还不稳固，既搞土改、镇反，又要抗美援朝，死板一点好，就是一家独鸣。现在社会主义改造已基本完成，情况有了变化，应当研究一下，统制太多、太严，要有所改变。

3、他们说，记者应当是先锋，‘先天下之放而放，先天下之鸣而鸣’。过去出过许多名记者，现在没有，个个都是廖化。

《先锋何在》一文中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记者是先锋，这在原则上不能说不对，问题是怎么样的先锋。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说现在没有真正的先锋，个个都是滥竽充数，这恐怕不好说。

4、他们说，现在报纸文风不好，教条主义，党八股，引不起读者兴趣。

教条主义很讨厌，我也不喜欢。我在延安整风开始时，就数了党八股的八大罪状。我在3月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跟新闻出版界人士座谈时也说到，报纸要搞得生动活泼，登些琴棋书画之类，我也爱看。当时《新民报》赵超构提出，要‘软些、软些、再软些’。我也反对太硬，太硬了读者不爱看。但是，我也担心太软了不好，黄色的东西会出来，所以说两个‘软些’就行了。上个月去上海，看了几天《新民晚报》，办得还是比较严肃的。赵超构是有见解而又诚实的人，他1944年访问延安，我同他谈过话，他回去后写了一篇《延安一月》，在国民党统治区影响很大。”

毛泽东说着，从斜躺着的床上直起腰，坐在木床上，用右手扳着左手的指头说：

“看来现在新闻界有3条路线，一条是教条主义，一条是修正主义，一条是马克思主义。**现在教条主义吃不开，修正主义神气起来，马克思主义还没有真正确立领导地位。**许多人不懂得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新闻学。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立足点是新闻学有阶级性、党派性。资产阶级新闻学是以资本主义经济为基础。自由竞争，你死我活，无政府状态，是资产阶级新闻学的特点，但它们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对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有害的东西，他们都不发表。**现在许多人都说解放前的报纸如何好。其实，《大公报》、《申报》从清朝、北洋军阀到国民党统治时期，都是适应当时政权的需要。**当然，资产阶级报纸有些东西还是要学习的，不能根本割断传统，像电影那样，有些好东西还要继承和发扬。共产党是把人类有史以来的优秀文化遗产都继承下来，加以发扬光大。但是，我们无产阶级新闻学是以社会主义经济为基础的，这同资产阶级新闻学根本不同。在学习资产阶级报纸的好东西时，只讲一致，不讲区别，忘记了无产阶级的新闻政策，那是不对的。无产阶级的新闻政策，同资产阶级的自由竞争、无政府状态不同。在我们国家里，无论哪一种报纸，都纳入国家计划，都要服从无产阶级利益，都要接受无产阶级领导。这是宪法规定的，因为无产阶级最能代表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

**无产阶级的新闻政策和资产阶级的新闻政策，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新闻有阶级性、党派性。**资产阶级报纸只登对他们有利的东西，不登对他们不利的东西。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报纸也不登对我们有害的东西。这都是阶级利害关系，是普遍规律。赫鲁晓夫的反斯大林秘密报告，资产阶级报纸大登特登，我们报纸就一字不登。西方通讯社有些消息，我们就不采用。它们也不采用我们的东西。倒是我们办了一个《参考消息》，登了许多西方官方和报刊骂我们的东西，可以说天天替帝国主义做义务宣传，目的是使我们的干部接触细菌，增强免疫力。中央决定《参考消息》扩大发行40万份，过一段时间，总结一下经验，加以改进，进一步扩大发行。这是‘有闻’、‘无闻’的问题，涉及阶级利益的问题。”

毛泽东说罢，与会者都很关心《参考消息》扩大发行的情况，议论纷纷。吴冷西作了简要汇报，他还介绍了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有类似《参考消息》的内部刊物，不过发行量很小，一般干部和大学生看不到。毛泽东接着说：

“有些消息，是我们自己做的事情，不登报、不广播。如禁止鸦片烟，又如轰轰烈烈的新区土地改革，我们就没有发消息，这也是一种‘无闻’。我的一些讲话，当时并没有公开发表。1955年关于农业合作化的讲话，过了3个月才发表；今年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已经过了3个月，还在修改，也许下个月才能发表。这不是‘旧闻’吗？还有去年4月讲的‘十大关系’，已经1年多了，也还不准备发表，将来发表也是‘旧闻’。我这个人就是不想冒险，先讲一讲，看一看反应，再做修改，然后发表。有时修改多次还不满意，只好不发表。

只是因为新闻观点不同，每个阶级都有自己的新闻观点和新闻政策。有‘新闻’，有‘旧闻’，有‘无闻’。第一有自由，凡是符合人民利益的都有自由；第二无自由，凡是不符合人民利益的都无自由，即有限制。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新闻自由，只有相对的新闻自由，不自由的情况依据不同的阶级利害关系而不同。因为有自由，先锋总是要出的，不会只是出廖化。有新闻，就可以出先锋，旧闻也不是不可以出先锋。发表《先锋何在》一文的作者本人就起了先锋作用。根本问题是新闻本来就是有阶级性的。新闻的形式并没有阶级性，正同话剧的形式也并没有阶级性一样，汉奸也可以演话剧。白话题材国民党用，我们也用。我有时也写些旧体诗。但是，问题在于内容，表现什么思想、什么主题、什么倾向，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这就有阶级性了。报纸同政治关系密切，甚至有些形式，有些编排，就表现记者、编辑的倾向，就有阶级性、党派性了。

现在新闻界议论很多，把教条主义攻一下有好处，不攻一下就只能出廖化，不能出先锋。我们要接受正确的批评，认真改进新闻工作。”

5月19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转发李富春、薄一波《关于解决目前经济建设和文化建筑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的意见》写了一个批语，全文如下：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国家机关各党组，军事各部门：

现将李富春、薄一波同志《关于解决目前经济建设和文化建筑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的意见》的报告，发给你们，请你们认真地加以研究。中央认为这些意见很重要。我们要在今年完成第1个“五年计划”，并且为第2个“五年计划”作好准备。过去4年中，在经济建设和文化建筑方面，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暴露的严重问题也很多。**报告中所揭发的各种不合理现象，在全国带有普遍性，如建设用地过大，建设标准过高，各搞一套，等等。这些巨大浪费的现象，必须坚决加以纠正。请你们在目前展开的整风运动中，发动各地方、各企业、事业基层单位的职工群众和党内外的技术人员，彻底揭发各种不合理的和严重浪费的现象；**同时，还应组织力量，抓住重点，进行系统的检查，改变当前大多数单位迟疑不决、不敢动手的状态。报告中所提出的各项建议，都可参考。有些意见应立即实行，如退还多余建设用地，降低建筑标准，停止扩大中等技术学校等。有些意见，需要慎重研究以后，才能定出办法，如训练工人办法，工人休假制度，加强基层领导力量等问题。请你们将检查的结果，作出总结，报告我们。

中央 1957年5月19日

5月20日，毛泽东给德·达姆巴（今译达希·丹巴）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亲爱的德·达姆巴同志：

　　我收到你在1957年4月26日给我的来信。在我国内蒙古自治区成立10周年的时候，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派来政府代表团参加庆祝盛典，我们感到非常高兴，谨致谢意。

　　我们研究了你在来信中提到的由中国供给蒙古人民共和国劳动力的问题。我们认为，这件事情是应该做的。但是，如你们所设想的，**大量迁移我国内蒙古自治区的蒙族居民去蒙古人民共和国定居，是有困难的。因为我国内蒙古自治区的居民有870万人，其中700多万人是汉族，而蒙族同胞仅有100多万人**。其次，我们考虑，如果从中国动员劳动力去蒙古人民共和国从事生产建设，我们也只能够动员从事工业和农业的劳动力前往，而动员从事牧畜业的劳动力是有困难的。所以，我们设想，只能动员汉族人去蒙古人民共和国参加工、农业方面需要劳动力的部门的工作。即便如此，我们每年能够派去的人数也不能很多。因为人数过多，在语言方面，在生活习惯方面，在行政管理方面，都会有困难的。我们设想，在派往蒙古人民共和国参加工业建设的劳动力中，主要应该是些技术工人，以便帮助蒙古居民学会某些生产操作的技能。我们意见，当这些从事工、农业生产的中国技术工人，在双方规定的期限之内教会蒙古居民生产操作的技能以后，他们就可以回国了。根据我们的计算，在最近几年内，每年供给数千人是可能的。为了使前往蒙古人民共和国工作的汉族人便于工作，便于同蒙古人民团结合作，我们准备每年在派去的劳动力中调配几十名懂蒙、汉两种语言的蒙族人，以便同蒙古人民共和国有关管理机构联系，从而减少管理工作中的困难。我们建议关于供给劳动力问题，可以由我们两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办理。**如果你们认为汉族人不熟悉蒙古语言和生活习惯因而有困难的话，我们可以少派一些，或者不派。**总之，一切都应该根据你们的需要，并且对于你们方便，作出决定。

　　目前，我们已经派有8000多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从事各方面的劳动。根据我们所知道的情况，他们之中有不少人违犯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我们对于这些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有关机关的协助之下，已经作了一些处理，其中有些人已经调回中国，另一些人，则根据他们违犯法律的情节按照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处理了。我们设想，今后这类事情还是会发生的。我们今后也将本着这个原则，凡是违犯蒙古人民共和国法律的中国员工都应该按照蒙古的法律法办。如果你们认为有不宜于留下工作的人员，可以通知我们，我们准备随时调动他们回来，以免增加你们管理中的困难。

　　谨致兄弟的敬礼!

　　 毛泽东 1957年5月20日

5月21日下午，毛泽东在书案边学习了一会儿英语，休息时和他的英语老师林克谈起了《沁园春·雪》的主题，和关于这首词注家解释错误的问题。毛泽东问：

“你喜欢我的哪一首诗词？”

林克想了一想，说：

“我最爱读的要数《沁园春·雪》。”

毛泽东说：

“《沁园春·雪》这首词是反封建的，批判2000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文采、风骚、大雕，是从一个侧面来批判封建主义制度的，只能这样写，须知这是写诗啊！否则就不是写词，而是写历史了。难道可以谩骂这些人们吗？别的解释是错的。末两句，是指无产阶级。”**

毛泽东说罢，立刻挥毫书写了《沁园春·雪》全文，送给林克作纪念。

林克得到毛泽东的书作，自然是如获至宝，喜不自胜。可是后来这幅字被田家英看见了，田家英自称是“爱书爱字不爱名”的人，他说他非常喜欢这幅字，一再向林克索要，林克无奈，只好送给他了。

5月22日，北京大学校园里的大字报由几十张激增到几百张。

北京大学学生在大饭厅里贴出的第一张大字报是在5月19日，此后，大字报便越来越多。**这些大字报的内容很多是要求取消党委负责制，要求言论集会结社绝对自由，彻底开放一切禁书，反对必修政治课等等。学生们的这些举动，被一些人称为“五一九运动”。《光明日报》和上海的《文汇报》在他们的报道中，称其为“北京大学‘民主墙’”。**

毛泽东在一连几天的时间里，几乎天天派人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看大字报。他问身边的工作人员说：

“你看共产党的江山能不能坐得稳？”

5月22日下午，中央统战部召开第9次座谈会，罗隆基在发言中提出建国初的“三反、五反”镇反运动搞过头了，在党的领导以外设立一个负责平反的领导机构。他说：

“有人提出要党提出保证，在他们对党进行批评以后，不致在将来受到打击报复。要毛主席出来讲话保证，那是笑话。”

罗隆基提出由人大和政协成立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但要检查过去“三反”、“五反”、镇反运动中的偏差，它还将公开声明，鼓励大家有什么委屈都来申诉。

章伯钧提出要搞“政治设计院”，这个政治设计院还要有权，像美国的参议院一样，要像美国那样搞多党派的“轮流坐庄”。这实际就是要求共产党下台。

5月23日，“人大”法律系学生林希翎在“北大”作演讲，歌颂和散布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把批判的矛头指向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她说：

**“我认为个人崇拜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我管这个社会叫作封建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我们要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而奋斗”，“让每一个人过真正的人一样的生活”，“**不要以为共产党用整风的方法，采取改良主义的办法，向人民让步就够了。匈牙利人民的血没有白流。我们今天争取到的一点点民主，是和他们分不开的。”**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后来在“反右派运动开始后，林希翎的演讲内容通过党内渠道反映到刘少奇那里，刘少奇就批示：‘请公安部门注意。’后来是罗瑞卿亲自抓的她。按照当时的标准，林希翎打成右派，没有什么冤屈（但是，实事求是讲，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走的正是林希翎要的‘特色社会主义’，却不给林希翎平反，那就的确是冤屈了她。**林希翎后来也得不到平反这个事实，正好也能说明反右派不是主席一个人的意思，不给右派平反阻力也的确不是来自毛主席。**）我从秦城出来后，读到有文章说，**1973 年毛主席问吴德，林希翎在哪里工作，一听说是被公安局关起来了，就马上要求‘立即释放，安排工作’。毛主席一贯主张治病救人，不管什么人犯了错误，都要给予出路的。**我想，这个事该是真的。这就说明，即使在对待按照当时的标准确定的毫无疑问的大右派林希翎的问题上，毛主席都比其他中央领袖人开明。那么，毛主席又怎么可能去仇恨其他知识分子，去‘引蛇出洞’，还去搞反右派扩大化呢？”

且说5月23日下午，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邓小平关于最近整风鸣放情况和工作部署。邓小平在汇报中说：

“现在的问题是：这个运动可不可怕？现在我们确实有些担心，比如我们党校有相当多的高级干部，都是省委、地委的同志，他们在那里很担心。这个担心是有理由的。你说共产党看到那个骂娘的事情心里不着急，我看也难设想，我就有点着急。开始几天，人心里面有点急。后来看到那个反动的东西愈多，心里就安定了，舒服了。有些人担心是不是会出乱子。总的估计是出不了乱子。”

邓小平接着谈到了工作部署。此后，周恩来、朱德、陈云、康生也通报了一些情况。刘少奇最后作了总结，他说：

“小平同志的报告很好，这是在主席那里中央常委确定的，要根据这样的方针、步骤来领导当前的运动。”

5月23日晚，**人民大学的一名学生来到北京大学，公开发表煽动性的演说，他称现在的社会是“封建的社会主义”。**

5月24日，毛泽东改出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征求意见“第二稿”，他要求在更大的范围内征求意见，包括在京的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还有田家英、胡绳、邓力群。他在批示中写道：

“各同志：此件请即看，在你们认为应当修改的地方动笔加以修改，于5月26日退回中央办公厅杨尚昆同志，为盼。”

5月25日，毛泽东改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征求意见“第三稿”，他要求立即印发给在京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还有田家英、胡绳、邓力群及当天到京参加会议的各省市区负责人。他在批语中写道：

各位同志：

这是第三稿，还要修改。请你们在收到后，在你们认为应当修改的地方即动笔加以修改，于6月5日以前将原件退还杨尚昆同志为盼。

毛泽东 5月25日

又，我在百花齐放部分有一些重要修改。

5月25日下午，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其他常委及在京的政治局成员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3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体代表，他在简短的讲话中说：

“你们的会议开得很好。希望你们团结起来，作为全国青年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

你们这个会议是一个团结的会议，对全中国青年会有很大的影响。我对你们表示祝贺。同志们，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

5月26日，《人民日报》和其它各大报刊都刊登了毛泽东的这一段重要讲话。

5月27日，毛泽东改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征求意见“第四稿”。他在通知中写道：

“这是第四稿。请看‘百花齐放’那一节，有一段重要的修改。”

5月28日，毛泽东改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征求意见稿“第五稿”。他要求在3个小时内，印发给各省市区党委书记，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另发田家英、邓力群、胡绳。

是日下午，毛泽东邀约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修改问题。

1957年6月1日，毛泽东改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征求意见“第六稿”。

6月1日下午，中央统战部召开第12次座谈会。各民主党派机关报《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以“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为题发言，他说：

**“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依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今天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些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的领导有没有关系？**”

6月2日，上海《文汇报》在头版全文刊登了储安平的发言。

6月3日，李维汉在中央统战部举行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结束后，准备在下一次会议上讲话。他来请示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问要不要反击？周恩来说：

“柯庆施在上海已经有所表示，你可以讲。”

毛泽东一边审阅着李维汉的发言稿，一边说：

“座谈会上提出的批评和意见，有相当一部分是错误的。”

6月初，毛泽东在书房里接待了20年代曾给他和杨开慧当过保姆的孙嫂陈玉英。毛泽东握着陈玉英的手，微笑着说：

“隔了30年了，你还是这个样子，你还好健康啊！”

他帮助陈玉英入座，情不自禁地说：

“你和开慧在反动派的监狱中很坚强，没有被敌人的严刑拷打所屈服，你们受了很多苦啊！你苦了一辈子，该好好休息一下。你同杨开慧同甘共苦，我今天看见你就像看见了杨开慧一样。你以后可以每年到北京来一次，来看看这里的发展变化也好嘛。你女儿要来，让她来一次，你们就是我家里的人一样。”

毛泽东问起杨开慧在狱中的情况。他听着听着就流下了眼泪，他说：

“开慧是个好人哩，你也是个好人哩，岸英是个好伢子哩。革命胜利来之不易，我家就牺牲了6个，有的全家都牺牲了。”

毛泽东留陈玉英吃了午饭。饭后，陈玉英要走了，毛泽东扶着她起身，扶着她下台阶，还温和地嘱咐她说：

“小心点。”

陈玉英视这种特殊礼遇为理所当然，还像过去一样，把毛泽东看作是一家人。她对扶着她的毛泽东说：

“放松点，我老了，走不稳了，你晓得的。”

时隔4天，毛泽东第2次接见了陈玉英，说以后要给陈玉英寄一些钱去，好让她生活过得好一些。

毛泽东将自己的两张照片送给陈玉英和她的女儿孙燕，并提笔在照片上签了字，又在陈玉英的笔记本上写下了“毛泽东”3个字。

陈玉英这次在北京住了20多天才回去。此后，毛泽东多次寄钱补助陈玉英的生活，还供养她的女儿孙燕上大学。

后来到了1958年春节前夕，毛泽东又把她的女儿孙燕接到北京住了半个月，并给孙燕买了一套衣服。1958年6月，毛泽东第2次接陈玉英到北京住了20多天，先后两次接见她。这是后事。

再说6月5日晚，毛泽东约请陈叔通、黄炎培在颐年堂谈鸣放情况。

此前，陈叔通和黄炎培分别参加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和工商界人士座谈会。

6月6日，毛泽东看了陆定一6月5日送来的6月4日《高等学校整风情况简报》。

简报中说：北京大学有一学生写了一篇题为《我的忧虑和呼吁》的文章，在校内外散发，**造谣说党中央已开始分裂，毛主席的“鸣”、“放”方针遭到了党内百分之九十的人反对和党内保守势力的反击，有人想逼迫毛主席下台。**

毛泽东在《简报》上批示道**：**

**尚昆印发在京各中委一阅。完全造谣，但值得注意。**

毛泽东 6月6日

6月6日这一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并批示：

“即送刘、周、陈、朱阅，尚昆用电报于今日发出。另印如前示。”“不发新疆、西藏。发后留交小平阅。”

毛泽东在《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中写道：

“根据北京的经验，在机关及高等学校内部出大字报，一可以揭露官僚主义等错误缺点，二可以暴露一部分有反动思想和错误思想的人的面貌，三可以锻炼党团员及中间派群众（他们应当在大字报上批评错误思想和反动思想），故利多害少，毫不足怕。”“将来中等学校及工厂整风时是否允许出大字报，那时再考虑。至于各民主党派及社会人士大放大鸣，使建设性的批评与牛鬼蛇神（即破坏性批评）都放出来，以便分别处理，大有好处。”

“必须注意争取中间派，团结左派，以便时机一成熟，即动员他们反击右派和反动分子。这是一场大规模的思想战争和政治战争，我们必须打胜仗，也完全有条件打胜仗。**党内团内一部分右倾分子叛变出去，是极好的事，切记不要可惜。对于工厂和中等学校，目前不要整风，但要主动下楼，改善作风，广交朋友，深入群众。**不可乱许愿，乱答应，又要避免出乱子，以便上层中层整好，腾出手来，再整好下层。北京的情况证明，各民主党派、高等学校和许多机关中暴露出一大批反动思想和错误思想，反动分子乘机活跃，但是他们只占各单位人数的百分之几，最反动的分子不过百分之一，百分之九十几是中间派和左派。”

“请你们注意将你们的单位人数，在运动中，按左中右标准，排一下队，使自己心中有数。暑假将届，京沪及各地大学生将回家，其中有些人将到处活动，你们应争取主动，并准备适当应付。最后请你们注意一点，在各高等学校和各机关，凡不合理的事而又现在能解决的，应当尽快解决一批，以利争取中间派，孤立右派。”

6月6日下午，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召集党外人士举行了一个座谈会。民革中央委员、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卢郁文当众宣读了一封他收到的匿名信。

原来，**卢郁文在5月25日的民革中央扩大会议上发了言，他说一些人提的意见有摆脱共产党领导的意思。他还说，党和非党之间的墙应由双方共同来拆。他又批评了民盟中央副主席章伯钧提出的“政治设计院”的主张。**不久，卢郁文就收到了这封匿名信，信中说他是“为虎作伥”，辱骂他是“无耻之尤”，恫吓他如不“及早回头”，就“不会饶恕你的”。匿名信中还说：“共产党如果只认你这班人的话”，“总有一天会走向灭亡”。

卢郁文读罢这封恫吓信，说道：

“我不理解有人为什么只许说反面话不许说正面话，对讲了正面话的人就这样仇视。”“我们应当深思，我们对共产党的批评究竟是从什么地方出发？要到什么地方去呢？”

他还说，他不怕辱骂，不怕威胁，他还要讲话。

接着，国务院参事李仲公在发言中说，他因为批评了对中国共产党提意见的人，也收到了一封对他进行威胁的匿名信。

6月7日上午，胡乔木通知新华社社长吴冷西说，毛泽东要和他们二人谈话。胡乔木叫吴冷西下午先到他的住处去，然后二人一起去见毛泽东。

在这个初夏的下午，中南海显得特别幽静。胡乔木和吴冷西沿着小路走过居仁堂，来到勤政殿后面的一个小门旁，走进菊香书屋，到了毛泽东的卧室里。毛泽东似乎是刚睡醒不久，他斜躺在用两张单人木床合并而成的大床上，正翻看着这一天的《文汇报》，那些已经看过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放在左手一边的木板床上，那里还堆满了近期看过和将要看的书，有古籍，也有新书。右边的床头桌上还放着好些其它报纸。

毛泽东见二人进了屋，就放下手中的报纸，招呼他们在床前的椅子上坐下，问道：

“你们看过今天的报纸没有？现在报纸很吸引人，许多人高谈阔论，说要帮助共产党整风。”

胡乔木、吴冷西刚坐下，毛泽东不等他们回答，便又兴高采烈地说：

“今天报上登了卢郁文在座谈会上的发言，他说他收到了一封匿名信，信中对他进行攻击、辱骂和恫吓。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发动反击右派的好机会。**这封恫吓信好就好在他攻击的是党外人士，而且是民革成员；好就好在它是匿名的，不是某个有名有姓的人署名。当然署名也可以作为一股势力的代表，但不署名就更可以使人们广泛地联想到一种倾向，一股势力。**本来，这样的恫吓信在旧社会也为人所不齿，现在我们邀请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这样的恫吓信就显得很不正常。过去几天我就一直考虑什么时候抓住什么机会发动反击。现在机会来了，马上抓住它，用《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发动反击右派的斗争。社论的题目是《这是为什么？》，在读者面前提出这样的问题，让大家来思考。虽然社论把我们的观点摆明了，但还是要让读者有个思想转弯的余地。鲁迅写文章常常就是这样，总是给读者留有余地。写文章尤其是社论，一定要从政治上总揽全局，紧密结合政治形势。这叫政治家办报。”

毛泽东将话题一转，对吴冷西说：

“今天找你来，主要不是谈这些，而是商量一件事，就是想调你去《人民日报》主持编辑工作，不知道你是不是愿意去。”

此时的《人民日报》社社长和总编辑是邓拓。吴冷西一听说是要自己去代替邓拓，就说：

“我毫无思想准备。”

毛泽东看看吴冷西，又看看胡乔木，说：

“两个月前，我批评《人民日报》没有宣传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的精神，批评《人民日报》对最高国务会议无动于衷，只发了两行字的新闻，没有发社论，以后又不宣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甚至连新闻也没有发。结果《文汇报》、《新民晚报》和《光明日报》把旗帜抓了过去，大鸣大放，真是百家争鸣，唯独马家不鸣。我在上海发现这个情况，就回北京来查此事。先找乔木谈，第二天又找《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和副总编辑谈。我当时说得严厉了一些，说他们不仅不是政治家办报，甚至也不是书生办报，而是死人办报。这样猛击一掌，为的使他们警醒过来。我当时列举几个例子证明我的看法：《人民日报》当天的社论和几天前的社论，都没有提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好像世界上根本没有发生这回事。”

毛泽东对着胡乔木严厉地说：

**“中央党报办成这个样子怎么行？写社论不联系当前政治，这哪里像政治家办报？”**

胡乔木解释说：

“这件事情我也有责任。《人民日报》在最高国务会议后订了宣传计划，也起草了几篇社论，但我感到写得不好，修改了几次，仍然没有把握，所以就耽误下来了。”

毛泽东对吴冷西说：

“《人民日报》任务很繁重，很需要增加领导力量，经过再三研究才考虑让你去。”

吴冷西说：

“我虽然在延安马列学院学习和研究了2年，又在抗大和陕北公学讲过马列主义课，但十多年来一直搞新闻工作，没有搞过理论，学术问题、文艺问题懂得更少，不适合到《人民日报》去。”

毛泽东说：

“我们党内许多负责党员怕教授，这很不妥当。中央想调你到《人民日报》，可以同时兼着新华社社长，你再考虑考虑，给你10天时间，最多不能超过半个月，时间很紧，工作很需要。10天以后再谈。”

毛泽东又在他起草的《这是为什么？》社论稿上改了几个字，交给吴冷西和胡乔木，要新华社当晚向全国广播，要胡乔木在6月8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

6月8日，《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全文如下：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卢郁文因为5月25日在“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上讨论怎样帮助共产党整风的时候，发表了一些与别人不同的意见，就有人写了匿名来信恐吓他。这封信说：“在报上看到你在民革中央扩大会议上的发言，我们十分气愤。我们反对你的意见，我们完全同意谭惕吾先生的意见。我们觉得：你就是谭先生所指的那些**无耻之徒的‘典型’**。你现在已经爬到国务院秘书长助理的宝座了。你在过去，在制造共产党与党外人士的墙和沟上是出了不少力量的，现在还敢**为虎作伥，真是无耻之尤。**我们警告你，**及早回头**吧！不然人民**不会饶恕你**的！”

在共产党的整风运动中，竟发生这样的事件，它的意义十分严重。每个人都应该想一想：这究竟是为什么？

卢郁文在5月25日的发言中讲了些什么呢？归纳起来，一是**告诉人们不要混淆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不要削弱和取消共产党的领导**；二是说国务院开会时应该有事先准备好的文件，以便讨论，免得像资产阶级国家的议会一样每天争吵，议而不决，不能说就是形式主义，就是不让大家讨论；三是说他自己同共产党员相处得很融洽，中间没有墙和沟；如果有些人和党员中间有了墙和沟，应该“从两面拆、填”，双方都要主动，四是**说共产党人对某些批评可以辩驳，这种辩驳不能认为是报复打击**；五是**对党外人士如何实现有职有权的问题提供了一些具体意见**。我们和许多读者一样不能不问：**发表这样实事求是、平易近人的意见，为什么就是“为虎作伥”，“无耻之尤”？为什么要“及早回头”，否则就“不会饶恕你”？**

把卢郁文的发言说成“为虎作伥”，共产党当然就是写信者们心目中的“老虎”了。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死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作战的时候，的确和老虎一样勇猛，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使它畏惧，屈服。但对中国人民来说，共产党却是最好的朋友：它帮助人民推翻了压着人民身上的反革命势力，帮助人民收回了土地、工厂等生产资料，使人民摆脱了剥削阶级的残酷压榨，把自己的历史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现在正朝着人民富裕、人民幸福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迈进。**最广大的人民从来没有像在共产党领导的时代这样充满光明的希望和生的乐趣。**共产党也犯过错误，也有缺点，共产党的整风运动正是要整掉这些错误和缺点。一切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抱有善意的人们，都在积极地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以便加强社会主义事业，巩固党对于人民群众的领导。在这样的时候，却**有人把维护社会主义民主、维护共产党的领导权的言论称为“无耻之尤”，“为虎作伥”，把共产党人比作可怕的吃人的“老虎”。这种人的政治面目，难道还能不引起人们的警惕么？这些人警告卢郁文“及早回头”，请想想他们所说的，究竟是向什么地方“回头”？**当然，这些人在另外的地方，口头上也会说他们怎样才是真正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云云。但是，**难道还能相信对劳动人民的先锋队如此仇视的人们，是在那里帮助共产党整风，是在那里拥护社会主义事业么？**

我们所以认为这封恐吓信是当前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因为这封信的确是对于广大人民的一个警告，是某些人利用党的整风运动进行尖锐的阶级斗争的信号。**这封信告诉我们：国内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在思想战线上尤其是如此。**革命的老前辈何香凝先生说得好：“今天是新时代了，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走上社会主义。难道在这个时代，也就一切都是清一色，再也不会有左、中、右了吗？不会的。”她指出，**有极少数人对社会主义是口是心非，心里向往的其实是资本主义，脑子里憧憬的是欧美式的政治，这些人就是今天的右派。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之下，少数的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然叫嚣要共产党“下台”。他们企图乘此时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打翻，拉着历史向后倒退，退到资产阶级专政，实际是退到革命胜利以前的半殖民地地位，把中国人民重新放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动统治之下。**可是他们忘记了，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以前的中国，要想使历史倒退，最广大的人民是决不许可的。在全国一切进行整风运动的地方，这些右派分子都想利用整风运动使共产党孤立，想使拥护社会主义的人孤立，结果真正孤立的却是他们自己。在各民主党派和高级知识分子中，有少数右派分子像卢郁文所说，还想利用辱骂，威胁，“装出‘公正’的态度来钳制”人们的言论，甚至采取写恐吓信的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这一切岂不是做得太过分了吗？物极必反，他们难道不懂得这个真理吗？

非常明显，尽管有人叫共产党“下台”，有人向拥护共产党的人写恐吓信，这些决不会使共产党和人民群众发生任何动摇。共产党仍然要整风，仍然要倾听党外人士的一切善意批评，而人民群众也仍然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的道路。**那些威胁和辱骂，只是提醒我们，在我们的国家里，阶级斗争还在进行着，我们还必须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当前的种种现象，并且得出正确的结论。**

除《光明日报》和上海《文汇报》以外，各主要报纸都转载了这篇社论。

欲知毛泽东下一步如何组织反击右派进攻的斗争，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撰写的《这是为什么？》一文短小精悍，以理服人，不失为一篇政论文的范文。他在文章中写道：“共产党也犯过错误，也有缺点，共产党的整风运动正是要整掉这些错误和缺点。一切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抱有善意的人们，都在积极地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以便加强社会主义事业，巩固党对于人民群众的领导。**在这样的时候，却有人把维护社会主义民主、维护共产党的领导权的言论称为‘无耻之尤’，‘为虎作伥’，把共产党人比作可怕的吃人的‘老虎’。这种人的政治面目，难道还能不引起人们的警惕么？”“难道还能相信对劳动人民的先锋队如此仇视的人们，是在那里帮助共产党整风，是在那里拥护社会主义事业么？”**在这里，毛泽东把整风运动与反右斗争的因果关系说得明明白白的了，可是后来有人却故意颠倒这一因果关系，说什么“双百方针”和让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是**“引蛇出洞”**。此论岂不谬哉！

**第37章**

**“有一部分人有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这些人比较危险，因为**

**他们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他们向往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否**

**定一切，他们与社会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话说1957年6月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他写道：

上海局，各省委、市委，内蒙自治区党委：

省市级机关和高等学校大放大鸣的时间，大约15天左右即足。**反动分子猖狂进攻。党团动摇分子或者叛变出去，或者动摇思叛。广大党团积极分子及中间群众起而对抗。以大字报为战斗武器，双方在斗争中取得经验，锻炼人才。反动分子人数不过百分之几，最积极疯狂分子不过1%，故不足怕。不要为一时好似天昏地暗而被吓倒。**反动分子将到本机关本学校以外的工厂学校去活动，要预作布置，实行挡驾。**要召集工厂主要干部及老工人开会，说明有一些不好的资本家，不好的知识分子及社会上的反动分子正在向工人阶级及共产党猖狂进攻，要推倒工人阶级领导的政权，切记不要上他们的当，有人煽动，实行挡驾。**街上贴反动标语，动员群众撕毁，**工人要看清大局，不要闹事情**。在此期间，不要提出福利工资等问题，一致对付反动派。**请你们注意各民主党派中反动分子的猖狂进攻。**要组织每个党派自己开座谈会，左中右的人都参加，正反两面意见都让其暴露，派记者予以报道。**我们巧妙地推动左中分子发言，反击右派。此事很有效。**每个党报均要准备几十篇文章，从当地高潮开始跌落时起，即陆续发表。注意组织中左派写文章。但在高潮未落前，党报正面文章少登（可以登些中间派文章）。**大字报必须要让群众反驳**。高等学校组织教授座谈，向党提意见，尽量使右派吐出一切毒素来，登在报上。可以让他们向学生讲演，让学生自由表示态度。**最好让反动的教授、讲师、助教及学生大吐毒素，畅所欲言。他们是最好的教员。**到了适当时机，则立即要组织党团员分组开会，分别哪些是建设性的批评，加以接受，并改正自己的错误缺点。哪些是破坏性批评，予以反驳。同时**组织一些党外人士讲演，讲正面话。然后由较有威信的党的负责人做一个有分析有说服力的总结性演说，将空气完全转变过来。整个过程，做得好，有一个月左右就够了，然后转入和风细雨的党内整风。这是一个伟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只有这样做，我党才能掌握主动，锻炼人才，教育群众，孤立反动派，使反动派陷入被动。**过去7年，我们形式有主动，实际上至少有一半是假主动。**反动派是假投降，中间派的许多人也不心悦诚服。**现在形势开始改变，我们形式上处于被动，实际上开始有了主动，因为我们认真整风。**反动派头脑发胀，极为猖狂，好似极主动，但因他们做得过分，开始丧失人心，开始处于被动。**各地情况不同，你们可以灵活运用策略，灵活做出部署。总之，**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而且党政基本上不溃乱，只溃乱一小部分（这部分溃乱正好，挤出了浓疱），利益极大。**这是不可避免的，**社会上既有反动派存在，中间分子又未受到现在这样的教训，党又未受到现在这样的锻炼，乱子总有一天要发生**。现在国内形势很好，我们能够巩固地掌握工农党政军及大多数学生。国际形势很好，美国处在困难地位。

中央 1957年6月8日

6月9日凌晨2时，毛泽东改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征求意见稿第七稿。他把这一稿称作“6月8日修正稿”，并批示道：

“即打清样35份，于本日上午9时交杨尚昆同志，即分送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及田家英。另即刻付翻译。”

6月9日晚，毛泽东在颐年堂约请原中共“一大”代表李达谈话，就发动反击右派分子斗争问题给他打招呼。

6月1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反击右派分子斗争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全文如下：

上海局，各省委、市委、内蒙古自治区党委：

一、北京条件已成熟，人民日报已于6月8日开始反击反动派。但建设性的批评将永远继续登载。也将继续登载一些突出的反动言论，使人民得到警惕，以利批判。各地情况不同，何时开始反击，要看当地情况决定。目前应着重组织各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开座谈会，推动左中右3派人物展开争论，最为重要。北京正在广泛开座谈会，极有效益。

二、一个月后，学校将放暑假，许多学生将回家乡。你们应当立即通知地县区乡4级，特别是乡级，预作准备。原则是：1、善意欢迎；2、向回乡学生解释合作化的优越性，解释二类社三类社现在所以还没有办好的理由，过几年就会办好的。**回乡学生可能有许多地富子弟，你们要对地富做好工作，要他们善于教育子弟。学生如果煽动农民反对政府，就要批评他们的错误，给以坚决的教训，但不可骂人打人，讲理为上，以理服人。**此点甚重要，请即办。城市也要注意。

三、在此次浪潮中，**资产阶级大多数人表现很好，没有起哄。你们要注意召集公方代表、党委书记、工会主席等人开会，迅即改善与私方的关系，有鼓励，有批评，拆墙，交朋友。**现在工商联、民建会正在向章乃器、李康年等作批判，所以我们不要大搞，以便团结资产阶级大多数，孤立民主党派中知识分子中和学生中的右派和反动分子。

四、无论民主党派、大学教授、大学生，均有一部分右派和反动分子，**在此次运动中闹得最凶的就是他们，他们历史复杂，或是叛徒，或是在过去三反肃反中被整的人，或是地富资本家子弟，或是有家属亲戚被镇压的。**但他们人数不多，一时可以把空气闹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但是急风暴雨，不崇朝而息。就北京而论，闹了几个星期，现在劲头已不大了，有些动摇恐慌了。**各党派中，民革、民建、九三、民进等颇好，民盟、农工最坏。章伯钧、罗隆基拼命做颠覆活动，野心很大，党要扩大，政要平权，积极夺取教育权，说半年或一年，天下就将大乱。毛泽东混不下去了，所以想辞职。共产党内部分裂，不久将被推翻。他们的野心极大。完全是资本主义路线，承认社会主义是假的。民盟右派和反动派的比例较大，大约有百分之十以上，霸占许多领导职位。**我们任务是揭露和孤立他们。**他们的臭屁越放得多，对我们越有利**。但民盟的多数仍然是好的，或者有希望改造好的。你们也要作具体的人物分析，实事求是，看得准，打得准。在这次运动中，一定要使反动派分子在公众面前扫脸出丑。我们一定要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给扫脸的更是极少数。

中央 1957年6月10日

毛泽东又批示道：“即送刘、周、陈、朱阅。尚昆用电报发出。新、藏不发。”

6月12日，毛泽东将5月15日撰写并经过多次修改的《事情正在起变化》（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一文，印发给党内干部阅读。他在文章中写道：

“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是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斗争的结果，走向自己的反面，建立新的统一，社会生活就前进了一步。共产党整风，是一个统一体两种作风之间的斗争。在共产党内部如此，在整个人民的内部也是如此。

**在共产党内部，有各种人。有马克思主义者，**这是大多数。他们也有缺点，但不严重。**有一部分人有教条主义错误思想**。这些人大都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就是看问题的方法有‘左’的片面性。克服了这种片面性，他们就会大进一步。又**有一部分人有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这些人比较危险，因为他们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他们向往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否定一切，他们与社会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几个月以来，人们都在批评教条主义，却放过了修正主义。教条主义应当受到批判，不批判教条主义，许多错事不能改正。**现在应当开始注意批判修正主义**。教条主义走向反面，或者是马克思主义，或者是修正主义。”“批判教条主义的有各种人。有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有括弧里面的‘共产党人’，即共产党的右派——修正主义者。有社会上的左派、中间派和右派。社会上的中间派是大量的，他们大约占全体党外知识分子的70%左右，而左派大约占20%左右，右派大约占1%、3%、5%，依情况而不同。

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他们以为中间派是他们的人，不会跟共产党走了，其实是做梦。”“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党内党外的右派都不懂辩证法：物极必反。**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这种鱼不是普通的鱼，大概是鲨鱼吧，具有利牙，喜欢吃人。”“我们和右派的斗争集中在争夺中间派，中间派是可以争取过来的。”“右派的企图，先争局部，后争全部。先争新闻界、教育界、文艺界、科技界的领导权。他们知道，共产党在这方面不如他们，情况也正是如此。”“新闻界的右派还有号召工农群众反对政府的迹象。”

**“这一次批评运动和整风运动是共产党发动的。毒草共香花同生，牛鬼蛇神与麟凤龟龙并长，这是我们所料到的，也是我们所希望的。毕竟好的是多数，坏的是少数。”**“有反共情绪的右派分子为了达到他们的企图，他们不顾一切，想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刮起一阵害禾稼、毁房屋的7级以上的台风。**他们越做得不合理，就会越快地把他们抛到过去假装合作、假装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反面，让人民认识他们不过是一小撮反共反人民的牛鬼蛇神而已。**那时他们就会把自己埋葬起来。这有什么不好呢？

右派有两条出路。一条，夹紧尾巴，改邪归正。一条，继续胡闹，自取灭亡。右派先生们，何去何从，主动权（一个短期内）在你们手里。

在我们的国家里，鉴别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真假善恶，有几个标准。主要是看人们是否真正要社会主义和真正要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这两条，他们早就承认了，现在有些人想翻案，那不行。只要他们翻这两条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没有他们的位置。那是西方世界（一名自由国家）的理想，还是请你们到那里去吧！”

6月13日凌晨，毛泽东看了姚文元发表在6月10日《文汇报》上的《录以备考》一文，决定在6月14日的《人民日报》上全文转载。他又亲自为14日的《人民日报》写了一篇社论：题目叫《<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

6月13日晚，毛泽东的秘书高智打电话通知吴冷西说：

“主席要找你谈话，要你马上就去。”

吴冷西不敢怠慢，马上从颐年堂进去，向东走过一段回廊，来到菊香书屋的西门，走进毛泽东的卧室，见胡乔木已经在座。毛泽东见吴冷西来了，开门见山地说：

“你这几天考虑得怎么样？去不去《人民日报》？”

吴冷西说：

“从我本身的条件看，我认为我去《人民日报》是不适宜的。但我是一个党员，中央如果作出决定，我只有服从。我希望中央在做出决定之前能考虑我的个人意见。”

毛泽东说：

“没有那么多好考虑的了，中央已经决定调你去《人民日报》，担任报社总编辑，仍兼任新华社社长，而且今天就要去。”

接着，他对吴冷西谈起4月10日他与《人民日报》负责人的谈话，重述了他那次谈话提出的4点意见。说罢，他背诵了《汉书》卷九《元帝纪》中的一段话：

“前汉自元帝始即每况愈下。元帝好儒学，摒弃名、法，抛弃他父亲的一套统治方法，但优柔寡断，是非不分，贤佞并进，君权旁落。他父亲骂他：‘乱我家者，太子也。’”

毛泽东还说：

“汉高祖刘邦比西楚霸王项羽强，他得天下一因决策对头，二因用人得当。据《史记》载，刘邦称帝之初，曾问群臣：何以他得天下而项羽失天下？群臣应对不一。刘邦均不以为然。”

他又抑扬顿挫地背诵出刘邦的一段话：

“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

诵罢，毛泽东接着说：

“高祖之后，史家誉为文景之治，其实，文、景二帝乃守旧之君，无能之辈，所谓‘萧规曹随’，没有什么可称道的。倒是汉武帝雄才大略，开拓刘邦的业绩，晚年自知奢侈、黩武、方士之弊，下了罪己诏，不失为鼎盛之世。”

“新闻工作，要看是政治家办，还是书生办。有些人是书生，最大的缺点是多谋寡断。刘备、孙权、袁绍都有这个缺点，曹操就多谋善断。”

毛泽东说刘备属于寡断的人，是在他读卢弼的《三国志集解·陆逊传》时，看到卢弼引用清代学者钱振锽的评论，说陆逊破刘备的办法，不过是用火攻，如果刘备不用山木扎营，以土石垒营，陆逊又有什么办法破蜀军呢？毛泽东看到此处，甚不以为然，于是就写下了一段批注，道是：

“土石为之，亦不能久，粮不足也。宜出澧水流域，直出湘水以西，因粮于敌，打运动战，使敌分散，应接不暇，可以各个击破。”

毛泽东以为，刘备在彝陵之战的失败，正是他寡断缺点的表现。

“南唐后主虽多才多艺，但不抓政治，终于亡国。”毛泽东对吴冷西说：“领导的任务不外决策和用人，治理国家是这样，办报纸也是这样。你先作为乔木同志的助手去试试看，帮他看大样。你看了他再看，由他签发。这样工作一段时间，中央将正式宣布任命你当总编辑，同时还继续兼任新华社社长，把两个单位的宣传统一起来。今晚就同乔木一道去上班，拿这篇文章去。”

说着，他递给吴冷西一篇打字稿，吴冷西接过一看，是一篇用《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写的社论，题目是《<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毛泽东还交代说，这篇社论在明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连同姚文元6月10日发表在《文汇报》上的《录以备考》一文，在《人民日报》上全文转载。

毛泽东接着说：

“上次批评《人民日报》时，我曾许下诺言，说我辞去国家主席职务后，可以有空闲给《人民日报》写点文章，现在我还没有辞掉国家主席，就给《人民日报》写文章了。

要政治家办报，不是书生办报，就得担风险。你到《人民日报》社工作，会碰到不少困难，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准备遇到最坏的情况，要有‘五不怕’的精神准备。”

他扳着指头一个一个数着：

“这五不怕就是：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有了这‘五不怕’的准备，就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了。”

毛泽东还说：

“撤职和开除党籍并不罕见，要准备着。杀头在正确路线领导下大概不至于，现在的中央不同于王明‘左’倾路线领导，也不同于张国焘。但坐牢得有精神准备，共产党内一时受冤屈的事还是有的，不过，在正确路线领导下，终究会平反纠正的。一个共产党员要经得起受到错误的处分，可能这样对自己反而有益处。屈原流放而后有《离骚》，司马迁受宫刑乃发奋著《史记》。我在讲打游击战的十六字诀时，并没有看过《孙子兵法》。后来王明‘左’倾路线领导讥讽说，十六字诀来自过时的《孙子兵法》，而反围剿打的是现代战争。这时我才找到《孙子兵法》来看。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也是这时看的。那时我被解除指挥中央红军的职务，就利用空闲看了不少从红军走过的县城中弄来的书籍。”

他笑着问吴冷西：

“你怕不怕老婆离婚？”

吴冷西说：

“不怕，我想不至于，如果我是受冤屈的话。”

毛泽东说：

“不怕老婆离婚是对男的说的，对女同志就应该不怕丈夫离婚。总之，这五不怕总得准备着。”

自这天晚上开始，吴冷西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就到《人民日报》社上班了。后来，也就是在这次谈话的半个月以后，邓小平召集《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两个编委会开会，宣布仍由邓拓任《人民日报》社社长，由吴冷西任《人民日报》社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他还说，希望大家团结一致，努力把《人民日报》办得更好。此后，邓拓分工主管《人民日报》评论、理论和文艺，吴冷西分工主管《人民日报》新闻和版面。

再说6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一则转发姚文元的文章的新闻导语，和毛泽东撰写的署名为“本报编辑部”的《<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一文，二者照录如下：

【新华社14日北京电】《人民日报》编辑部就姚文元的文章发表批评《文汇报》和《光明日报》的资产阶级政治方向，《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意见和姚文元的文章如下。

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

本报编辑部

下面转载的这篇文章见于6月10日文汇报，题为“录以备考”。**上海《文汇报》和北京《光明日报》在过去一个时间内，登了大量的好报道和好文章。但是，这两个报纸的基本政治方向，却在一个短时期内，变成了资产阶级报纸的方向。**

**这两个报纸在一个时间内利用“百家争鸣”这个口号和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发表了大量表现资产阶级观点而并不准备批判的文章和带煽动性的报道，**这是有报可查的。这两个报纸的一部分人对于报纸的观点犯了一个大错误。他们混淆资本主义国家的报纸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报纸的原则区别。在这一点上，其他有些报纸的一些编辑和记者也有这种情形，一些大学的一些新闻系教师也有这种情形，不只文汇、光明两报如此，不过这两报特别显得突出罢了。错误观点是可以经过研究、考虑和批判加以改变的，我们对他们期待着。

从最近几天这两个报纸的情况看来，方针似乎已有所改变。党外报纸当然不应当办得和党报一模一样，应有它们自己的特色。但是，它们的基本方向，应当是和其它报纸一致的。这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国家，报纸是社会主义经济即在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和资本主义国家报纸是无政府状态的和集团竞争的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不相同。在世界上存在着阶级区分的时期，报纸又总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我们希望在这个问题上展开辩论，以求大家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一致的认识。

新闻记者中，有一部分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也有资产阶级新闻观点，也应当考虑、研究、批评这个错误观点。教条主义的新闻观点和八股文风，也是应当批判的。这一方面的东西是很讨厌的。**党报，包括本报在内，在这一方面犯有错误。这一方面的错误，在辩论中也必须展开批判。**这样一来，在新闻问题上就要作反“左”反右的两条战线上的斗争。

**姚文元的文章只是含蓄地指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看到了文汇报的一些人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向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这个明显的和有害的倾向，是一篇好文章，故转载于此。并且借这个由头，向我们的同业——《文汇报》和《光明日报》说出我们的观点，以供考虑。**

这一天，毛泽东改出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征求意见第八稿，他注明是“6月14日修正稿”。

6月16日，毛泽东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只做了少量的文字修改，形成了第九稿。他注明“6月16日定稿”。

6月17日，毛泽东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又做了一次修改，成为第十稿。他注明是“最后定稿”。至此，毛泽东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修改工作全部结束。从他最初的3个“自修稿”到这一天的第十稿，共有13稿。

6月19日，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

这一天，苏联《真理报》全文刊载了这篇文章，苏联其它几家重要报纸刊载了文章的摘要。后来，美国《纽约时报》也全文刊载并发表了社论。美国的《纽约先驱论坛报》、《纽约世界电讯—太阳报》、《华盛顿邮报》等都刊载了关于这篇文章的消息。

6月22日，《人民日报》为庆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正式刊发问世发表了由胡乔木起草经毛泽东修改的社论《不平常的春天》，摘要如下：

“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演。这篇讲演虽然到现在才发表，但是它的内容早已在社会各界人士中间传布了。这篇讲演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阐明了我国在所有制方面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以后所面临的一系列根本问题。它对于提高我国人民的觉悟，巩固我国人民的团结，推进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的发展，无疑将产生深刻的久远的影响。”

“由于系统地提出了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由于透彻地说明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由于在这个基础上开始了党的整风运动，我国的政治生活在过去一个时期内进行得特别活泼起来了。在一方面，人民群众对于党和政府的工作，提出了大量的积极的批评和建议，促使党和政府积极地采取步骤改进自己的工作，加强自己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在另一方面，**某些对社会主义事业心怀不满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也竭力利用党所提出的口号，来扩张自己的影响，争取自己的地位。3个多月的发展，比平常状态下的3年还快，3个多月给予人们的教训，比平常状态下的3年还丰富。”**

“对于毛主席代表党中央所提出的方针，各种人的反映是不同的。”“**党内也有一部分人曾经怀疑甚至反对这个方针，他们害怕这将要引起天下大乱，或者因为他们沾染着比较浓厚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习气，害怕受到群众的攻击。**这一部分人落到了客观事物运动的后面，只是依靠党的教育改正了自己的错误观点，才能跟上历史的脚步。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是另一种情形。他们对于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不甘心的。匈牙利事件加强了他们的一种想像：在所有制方面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基础的国家，仍然可以推翻，可以变质。同人民群众相反，他们不但不把毛主席的讲演看作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武器，而且想入非非，以为可以利用它来作为削弱社会主义制度的工具。为了削弱社会主义制度，他们的第一个步骤是削弱共产党对于国家工作的领导。因此，他们要求共同领导，或者要求共产党在某些范围内退出领导。他们竭力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口号解释得适合于他们的目的，并且积极地在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工商业者和青年学生中收集他们的支持者。**5月间，共产党开始整风，而且要求党外人士帮助党的整风。他们认为机会来了。**他们在帮助党整风的名义之下，不但夸大党的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造成一种只许讲缺点错误、不许讲优点成绩的空气，而且把官僚主义说成是社会主义的产物和代名词，把宗派主义说成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产物和代名词，把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产物和代名词，向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展开了猖狂地进攻。”“在他们看来，简直到处都在反对党！简直就是匈牙利事件的前夕！简直非请他们出来挽救危局或者收拾残局不可！”“资产阶级右派先生们，你们把中国人民几十年的革命史看作儿戏，把中国人民8年的建设史看作儿戏，把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和党在人民群众中的高度威信看作儿戏，而且在估计力量对比的时候，连人口中占1％的人和占99％的人究竟哪一边人多力量大，都算不清。你们这样怎么能不犯错误呢？”**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右派“鸣放”，意在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推翻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既然如此，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就不能不坚决地进行反攻。有人说，党不是在请别人帮助自己整风吗，怎么整到别人头上来了呢？不错，党还将继续请广大群众帮助自己整风，这是毫无疑义，必须坚持到底，也必然会坚持到底的。但是难道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也可以受到保护，不受批判吗？如果各界革命领导人物对于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不管它们假借什么神圣的名义）不知道警惕和识别，不知道迎头痛击，这样的革命者对于人民的事业还有什么责任心？”**

**“**历史是在斗争中前进的，人们的思想是在争论中前进的。整风是不可避免的争论，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批判也是不可避免的争论。现在有争论，将来还会有争论。毛主席的报告是提倡团结的报告。他所提倡的团结不是貌合神离、同床异梦的假团结，而是经过争论达到的真团结。因此，毛主席的报告也是提倡争论的报告。所谓百家争鸣，正是要争。**在目前的争论中，有些人难免又会想到天气的寒暖。虽然立场之说还不能人人同意，但是立场不同，政治气候的寒暖之感也不同，这却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在我们社会主义者看来，目前的天气确确实实是一个大好春光的艳阳天。是的，这是一个不平常的春天，它之所以不平常，就是因为广大的工人阶级、劳动人民、革命知识分子和一切真正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社会人士的政治觉悟，广大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政治觉悟，都将在争论中迅速地成长着，成熟着，用一种不平常的速度。”**

6月22日傍晚6时30分，高智带许志行来到菊香书屋，在宽敞的书房里等候毛泽东。

许志行是在6月21日下午到了北京。他按照毛泽东信中的指点，到中南海找到了叶子龙，叶子龙派高智将他安排在了前门的招待所里。

许志行在书房里刚坐下不一会儿，见一位身材高大的人走了进来，便站起身来激动得叫了一声：

“毛主席！”

“志行兄，我们见面太晚了！太晚了！”毛泽东走上前去，一把抱住分别了整整30年的许志行的双肩，注视着许志行，感慨地说：“接到信后应该早点来嘛！等你好长时间了，我多么想见见旧时的朋友啊！”

许志行拘谨地说：

“您日理万机，我担心影响您的工作，所以就迟迟没有敢来打扰您。”

毛泽东拉着许志行坐在他身旁，许志行望着满架满架的书，颇有感触地说：

“毛主席，您还是这样喜欢书！”

“不要叫主席啰！还是叫我润之，或者叫毛泽东吧！”毛泽东爽朗地笑着，又望着桌上的一些线装书叹了一口气，说：“我工作太忙了，只得抽空读一点书。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读书的机会还多些哩。”

他问及老朋友在武汉分手后的经历，许志行感慨万千，向眼前这位中国人民领袖诉说了自己曲折的经历，倾吐了对毛泽东的思念之情。毛泽东问他在北京还想探望些什么人，许志行说准备看望一下在长沙一师附小教过他的老师谢觉哉谢老。毛泽东说：

“好，那就请他来聚聚。”

半个小时后，谢觉哉果然来了。许志行紧紧握住谢觉哉的手问候道：

“谢老，您好！”

谢觉哉对眼前这个35年前的学生印象很深，回忆起在长沙一师附小的一些趣事，说到高兴之处，禁不住哈哈大笑。

吃饭时间到了，工作人员端上来4菜1汤，有炒青椒、韭菜炒肉丝、番茄炒蛋、红烧肉。毛泽东要许志行不要客气，多吃菜，并亲自给他夹菜。还说要许志行在北京多住些日子，看一看故宫、颐和园，游一游香山、长城。

6月26日至7月15日，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恩来在会议上作了经过毛泽东审阅修改的政府工作报告。报告中肯定了社会主义改造的成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批驳了在整风运动中出现的有代表性的错误言论。

6月间的一天晚上，9点多钟，毛泽东派两辆车接冒广生先生到了中南海。

冒广生，清朝同治十二年（1873年）生于广州，字鹤亭，光绪甲午（1894年）举人。他在戊戌变法时主张革新，列名保国会中。清末，冒广生任农工商部郎中，以不趋附权贵著称。民国期间，冒广生曾任农商部全国经济调查会长，国民政府考试院委员，广州勅勤大学、上海太炎文学院等文科教授及国史馆纂修。

新中国建立后，陈毅聘冒广生为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特约顾问，上海文史馆馆员。1957年初春，冒广生来到北京探望儿子冒舒湮。他致书陈毅，以叙旧情。陈毅即派秘书持一封亲笔信，诚邀冒广生参观故宫博物院，并在御花园品茗。冒氏欣然应允前往，同行者有多年的好友程潜和谢无量。6月间，冒广生应陈毅之请，撰写了《对目前整风的一点意见》，文章见报后，《人民日报》记者又采访他，写了一篇专访《八五老人一席话——访冒广生先生》，也登载在《人民日报》上。

转眼已是夏天，一天上午，冒广生在儿子家中接到国务院来的一个电话，说午后有位中央领导人来探望他。不久，陈毅来电话告诉他说，是周总理要来看望他。下午3时，身穿浅灰色中山服的周恩来到访，冒舒湮忙迎上去。周恩来握着冒舒湮的手端详着说：“我们在重庆见过面，当时还不晓得你是鹤老的公子。”冒广生也跟着迎上来。周恩来笑盈盈地说：“我听陈毅同志说鹤老来了，早就想来探望的，政协正在开会脱不了身，昨天刚闭幕，今天才有空。抱歉，抱歉!”冒广生说：“你是大忙人，我怎敢惊动呀？”谈话中，周恩来首先提到了与冒广生有交往的六叔父周嵩尧，他说：“峋芝叔父和鹤老是多年同事。他自从李纯（民国时期北洋军阀，陆军上将，1917年调任江苏督军，在任期间横征暴敛，1920年10月12日夜晚，突然离奇死于督署内——笔者注）死后就不再当官，晚年信佛，穷困潦倒。解放后，我接他上北京住，前几年才去世。鹤老来迟一步，可惜缘悭一面了。”

周嵩尧字峋芝，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考中丁酉科举人，晚冒广生一科。冒广生听周恩来提到当年老友，不禁感喟道：“峋翁为人颇重节概。我曾在他手下当淮安关监督，一别数十年了。我是光绪甲午举人，他是丁酉举人，相隔一科。他的著作《晚香斋诗存》和笔记刻本都还在吗?”周恩来说：“我早年学写旧体诗，也可能受家叔的影响。鹤老的诗词，我也拜读过。您在淮安时，好像还刻过《楚州丛书》，保存了地方文献。”冒广生笑道：“这算不得什么！我每到一个地方，总爱搜集当地文献刻印集子，也算是对地方的报答吧。在瓯海关任内，我刻过《永嘉诗人祠堂丛刻》，搜罗了自谢灵运以来迄至二黄先生的集子。在镇江关时，也刻过《至顺镇江志》。”周恩来问：“二黄先生指的谁？”冒广生说：“晚清著名瑞安学者黄绍箕，字仲韬，和绍第，字叔颂，是昆仲。叔颂先生是我岳丈，**是宗江、宗英的祖父。**”周恩来说：“原来冒、黄二家还是至亲。”说罢，他顺手取过茶几上冒广生的折扇，欣赏着张大千的画，说：“张大千的画确实有功夫。”他又指着扇面上的题诗问：“马叙伦先生好像说过，冒氏的祖先是蒙古色目人。这个姓，跟匈奴单于冒顿有关么?”冒广生说，**依据家谱记载，先世系出元世祖忽必烈第九子镇南王胱欢的后裔，与冒顿无干。**“那你们是‘黄带子’了。”周恩来风趣地说。他还说：“今天太难得了，我有这样两小时的休息。能见到鹤老，我更高兴。毛主席委托我捎个口信，他看到您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想见面谈谈，希望鹤老多住几天。”

果然，不几天后，毛泽东便派来两辆小车来接冒广生去中南海。冒广生在儿子冒舒湮陪同下，来到中南海，毛泽东趋步亲迎，与冒广生握手问好。李维汉、吴冷西、胡乔木也早已等候在那里，众人寒暄过后，毛泽东引领客人步入客厅落座。

毛泽东从《人民日报》上的《对目前整风的一点意见》一文说起，他说：

“老先生讲得好啊！你讲，如果说共产党员没有偏差，那何必整风？批评是帮助党员纠正错误。我们这次整风，正如你所说，是‘爱人以德，相见以诚’。”“你们过去提倡革新，我们后来号召革命，大家都是为了救中国，是一条道路上的人。”

冒广生说：

“我对主席提出的‘双百’方针，起初怀疑会不会把思想搞乱。后来一想，由于各人的立场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自不能强人以苟同。国家有道，则庶人不议。**人民敢说话是好事，不因其语近偏激而以为忤。只要以国家为前提，而不是以个人为目的，那就叫争鸣也好，叫和鸣也可。”**

毛泽东以肯定的语气郑重地说：

“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个方针一定不变。”

说话间，朱德也信步踱入客厅，毛泽东向他介绍了冒广生。冒广生指着冒舒湮说：

“我儿子访问山西八路军总部时，总司令曾款待过他。他后来在上海写了个话剧《精忠报国》，把秦桧影射汪精卫。汪精卫向我要人，幸亏他早跑了。”

毛泽东看着冒舒湮说：

“南宋主和的责任不全在秦桧，幕后是宋高宗。秦桧不过是执行皇帝的旨意。高宗不想打，要先‘安内’，不能不投降金人。文徵明有首词，可以读一读。**是赵构自己承认‘讲和之策，断自朕意，秦桧但能赞朕而已。’**后来的史家是为‘圣君讳耳’，并非文徵明独排众议，他的《满江红》：‘慨当初，倚飞何重，后来何酷！果是功成身合死，可怜事去言难赎。’一似丘浚的《沁园春》所说“‘何须苦把长城自坏，柱石潜摧。’”

毛泽东引用文徵明的《满江红·拂拭残碑》一词，全文是：

“拂拭残碑，敕飞字，依稀堪读。慨当初，倚飞何重，后来何酷！果是功成身合死，可怜事去言难赎。最无辜堪恨更堪怜，风波狱！

岂不念，中原蹙；岂不惜，徽钦辱。**但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古休夸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

冒舒湮听毛泽东如此一说，对他的旁征博引和他那超凡脱俗的真知灼见，佩服到了极点。由此，大家的话题又转到了诗词方面的一些问题时，冒广生借机将他所著的《疚斋词论》、《四声钩沉》、《宋曲章句》、《倾杯考》4大册稿本，赠送给了毛泽东。

冒广生告辞时，毛泽东送到走廊上，边走边问：

“冒老先生今天来，可有一言相赠？”

冒广生说：

**“现在党内正在整风，我是经历了几个朝代的人，共产党能把中国搞得这样强大，譬如一头雄狮，身上也不免长几只虱子。古人云：‘虮虱虽小，为害亦大焉’。可得提防呀！**”

毛泽东连声说：

“讲得好，讲得好，我一定记在心里。”

毛泽东一直把冒广生送上汽车，还亲自用手遮住车门的上沿，生怕冒广生碰到车顶。

欲知毛泽东在此后的整风中有何重要指示，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耄耋老人冒广生寄语毛泽东：**“现在党内正在整风，我是经历了几个朝代的人，共产党能把中国搞得这样强大，譬如一头雄狮，身上也不免长几只虱子。古人云：‘虮虱虽小，为害亦大焉’。可得提防呀！**”此话堪称至理名言。后来的历史走向竟然不幸被冒老先生言中了！

**第38章**

“**我就是这么一个人，要办什么事，要决定什么大计，就非问问工农**

**群众不可，跟他们谈一谈，跟他们商量，跟接近他们的干部商量，看**

**能行不能行。这就要到各地方跑一跑。”**

话说1957年6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在一两个月后吸收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入党的通知》，全文如下：

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中直党委、国家机关党委：

过去几年来，我们对于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工作注意得不够，特别是对于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工作更注意得不够。现在看来，这种情况已经被资产阶级右派野心分子所利用。**右派野心分子企图在教育、科学、文艺、卫生、技术、新闻等工作中夺取领导权，作为夺取全国领导权的第一步，因而他们在知识分子中特别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大量发展组织，并把反动分子和不满我党的分子放在领导地位，利用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提出推翻党的领导的主张，提出资产阶级的路线来同党的路线对抗。**这些情况在最近的“大放大鸣”的过程中暴露得极为突出。我们为着加强对于教育、文化、科学、卫生等部门的党的领导，为着进一步团结和教育知识分子，同时给反共派一个有力地答复，就必须继续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必须唤起各级党委充分的认识到党的组织工作的方针应该同党的团结知识分子的政治方针相符合，应该是向知识分子开门，而不是向他们关门。**经过这次“大放大鸣”，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已经大致分清了左、中、右，这是发展党员工作的极为有利的条件。**因此，中央认为有必要在一两个月之后，首先接收一批在这次运动中表现好的左派高级知识分子入党。对于那些已经参加了其他民主党派的高级知识分子，在吸收入党时，除了极个别的关系全国的重要分子须报请中央批准以外，一般按照普通党员入党手续办理，不须报请中央批准。**他们入党以后，不要退出原来的民主党派，不要改变他们的社会地位（例如，原为人民代表的，仍为人民代表），并且要保证他们仍有充分的时间进行自己的业务工作，而不是入党之后就荒疏了自己的业务。**他们入党时，不必一个一个地登报，但可在征收告一段落的时候，作一次综合的报道。

你们接到这一通知以后，应立即进行准备工作，并在半月内把你们的具体计划上报。

中央 1957年6月28日

是日晚9点，毛泽东派人把许志行接到的办公室里来谈话。一见面，毛泽东就笑盈盈地问他：

“这几天你玩了些什么地方？玩得痛快吗？”

毛泽东在谈话中向许志行了解了上海知识界的一些情况，最后又告诉许志行说：

“过几天我要到外地走走。你有什么困难，有什么要求提出来。”

许志行说想去韶山看看。毛泽东说：

“好，到那里去看看，代我问候家乡的亲人们。”

说罢，提起毛笔，给韶山乡人民政府写了一封信，请他们“以朋友的态度接待他，告诉他一些事情”。

许志行临走时，毛泽东要秘书拿出500元给他作路费，并说还可以买一些纪念品。许志行执意不收。毛泽东说：

**“这是我的稿费，是我以个人名义送给你的。我决不慷国家之慨！放心收下吧。”**

6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指示》：

1. 对于那些仅有右派言论，但并无右派行动的那些人，应把他们和既有言论又有行动（许多人还有历史上劣迹）的那些极右派加以区别，在对前者进行批评的时候，要完全采取说理和与人为善的态度，不要轻率地扣以右派的帽子。这样做，对于安定和争取、团结中间分子，对于打击、孤立和分化极右派，都是十分必要的。

二、右派和极右派的人数，以北京34个高等学校及几十个机关中，需要在各种范围点名批判的，大约有400人左右，全国大约有4000人左右，你们应当排个队，使自己心中有数。

6月29日上午9点，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畔召见了上海《新民晚报》总编辑赵超构。

早在3月份，毛泽东在谈话中曾批评赵超构办报要“软些”的方针，他提出办报的方针要“软中有硬”。赵超构没有理解毛泽东的意思，写了一些杂文，毛泽东并不满意。

这一次，赵超构在早上接到毛泽东召见的通知后，心想，自己犯有错误，再也不能做新闻工作了，没想到两人一见面，毛泽东就和颜悦色地和他握手寒暄。赵超构说，他想辞去《新民晚报》总编辑的职务。毛泽东毫无责备之意，笑道：

“那你干什么呢？”

赵超构回答说：

“听从组织安排。”

“最好还是回去当总编辑吧！” 毛泽东说罢，又关心地问他：“你当总编辑，是不是有职有权哪？”

赵超构回答说：

“我如果没有权，就不会犯错误了。”

毛泽东很风趣地说：

“恐怕还有点‘形格势禁’吧！”

毛泽东的宽厚和理解，使赵超构感动得流出了热泪。毛泽东既亲切又严肃地对赵超构说，办报要分清无产阶级办报路线和资产阶级办报路线，还勉励他以后要改正自己的缺点。赵超构主动谈起了他最近两个月在报纸上发表的杂文。毛泽东说：

“我很喜欢杂文，也想经常为报纸写杂文。如果让我选择职业的话，我愿意做一个杂文家。可惜我现在无此选择的自由。写杂文不容易呀！”

他停顿了一下，又说：

“因此，我想保护几个杂文家。”

在送别的时候，毛泽东叮嘱赵超构说：

“听说你平时常常到城隍庙去坐茶馆，这个，我倒并不反对，但总不能整天泡在茶馆里吧！希望在你有空的时候，多接触接触工农群众。”

1957年7月1日清晨，毛泽东乘专机飞往杭州。

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为该报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社论中写道：

“自本报编辑部6月14日发表《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以来，《文汇报》、《光明日报》对于这个问题均有所检讨。

**《光明日报》工作人员开了几次会议，严肃地批判了社长章伯钧、总编辑储安平的方向错误，这种批判态度明朗，立场根本转过来了，由章伯钧、储安平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路线转到了革命的社会主义的路线**。由此恢复了读者的信任，像一张社会主义的报纸了。”

**“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呼风唤雨，推涛作浪，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上下串联，八方呼应，以天下大乱、取而代之、逐步实行、终成大业为时局估计和最终目的者，到底只有极少人数，就是所谓资产阶级右派人物。**一些人清醒，多数被蒙蔽，少数是右翼骨干。因为他们是右翼骨干，人数虽少，神通却是相当大的。**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

7月5日上午，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乘飞机到杭州来见毛泽东。同时到达杭州的还有苏共中央特使米高扬。

是日下午，刘少奇等人向毛泽东汇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关于讨论苏共中央特使米高扬通报问题）的情况。

晚上，刘少奇等人陪同毛泽东会见专程来中国通报苏共中央全会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反党阴谋集团”情况的米高扬。

原来在赫鲁晓夫掌权后，他在政治、经济、对外政策等方面推行一套新的政策。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等苏联领导人强烈反对，认为赫鲁晓夫犯有右倾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错误。1957年6月18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召开特别会议，多数成员主张撤销赫鲁晓夫第一书记的职务**。赫鲁晓夫坚持反对，要求召开中央全会决定他的去留问题。6月22日，苏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经过激烈的辩论，中央全会于6月29日通过了《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谴责他们在一切重要问题上反对党中央的路线，反对苏共20大制定的反对个人崇拜的方针，走上了反党的派别斗争的道路。全会决定把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等人开除出中央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

毛泽东听完米高扬的情况通报后，即向他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已经决定支持苏共中央的决定。

7月6日，毛泽东到达上海。市委负责人要为毛泽东安排一场京剧演出，问他看什么剧目？毛泽东想了想，说：

“还是看《白蛇传》吧。”

这天晚上，毛泽东来到上海干部俱乐部礼堂。观众们一见毛泽东来了，纷纷立起身来热烈鼓掌。毛泽东一边招手一边由工作人员引导着走向前排的领导席，在自己的座位前站定，转身向后面的观众招一下手，便坐了下来。因为肚子太大，一坐下他就感觉到皮带勒得有些不好受，李银桥照例帮他松开了裤带，并为他点上了一支烟。

大幕拉开了，毛泽东目不转睛地盯着舞台上的演出。他入戏很快，一支烟还没有吸完就悄悄地掐灭了。他每每看到精彩处就忍不住要鼓掌，他一鼓掌，观众们也跟着他一起鼓掌。

随着老和尚法海的上场，毛泽东的脸色渐渐地沉了下来。他的嘴唇微微张开，随着剧情的深入，下唇时而轻轻地抽动一下，齿间还发出了咯吱咯吱的声响。

许仙和白娘子生死离别的时刻终于到了，毛泽东已经完全进入了这古老而感人的神话故事中，他的鼻翼开始翕动，泪花开始在眼圈里聚集，瞬间变成大颗大颗的泪珠，扑簌扑簌地顺着脸颊滚落。李银桥急忙轻轻地咳了两声，提醒他这是在演戏。可此刻的毛泽东，任何提醒已经失去了意义。他的动静越来越大了，泪水已经不是一颗一颗往下滴，而是一道一道往下淌，鼻子也堵塞了，呼吸受阻，嘶嘶有声。李银桥只得又轻咳了一声。没想到毛泽东竟忘乎所以地哭出了声。那是一种颤抖的抽泣声。他还毫无顾忌地擦眼泪，擤鼻涕。看到这种情景，身边的卫士们也只得顺其自然了，只盼着这场戏早些演完。就在老法海将要把白娘子压到雷锋塔下的那一刻，毛泽东的惊人之举再度发生了，他将大手重重地拍在沙发扶手上，一下子立起了身，吼道：

“不革命行吗？不造反行吗？”

这猝不及防的举动，顿时惊动了周围的观众。更要命的是，就在他起身的一刹那，裤子一下子脱落了下来。亏得李银桥眼疾手快，纵身向前，抓住毛泽东的裤子，一把提了起来，双手颤抖着帮他系上了腰带。而此时的毛泽东却浑然不知，依然沉浸在剧情中。

演出结束了，全场热烈的掌声终于将毛泽东从戏中唤了回来，他鼓着掌，大踏步向舞台走去。毛泽东毫不掩饰自己的好恶，他将两只手同时伸向嫉恶如仇的“青蛇”，尔后又和“白蛇”与“许仙”握了手，而对于那个倒霉的老和尚“法海”，他却是始终不予理睬。

7月9日下午，毛泽东出席上海市干部会议，发表了《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的长篇讲话（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他在讲话中说：

“3月间，我在这个地方同党内的一些干部讲过一次话。从那个时候到现在，100天了。这100天，时局有很大变化。我们同资产阶级右派打了一仗，人民的觉悟有所提高，而且是相当大的提高。当时我们就料到这些事情了。比如，我在这里说过，人家批评起来，就是说火一烧起来，岂不是疼吗？要硬着头皮顶住。”

毛泽东指了一下自己的脑袋，说：

“人这个地方叫头，头有一张皮，叫头皮。硬着头皮顶住，就是你批评我，我就硬着头皮听，听一个时期，然后加以分析，加以答复，说得对的就接受，说得不对的加以批评。

我们总要相信，全世界也好，我们中国也好，多数人是好人。所谓多数人，不是51%的人，而是90%以上的人。**在我国6亿人口中，工人、农民是我们的基本群众。共产党里，青年团里，民主党派里，学生和知识分子里，多数人总是好人。他们的心总是善良的，是诚实的，不是狡猾的，不是别有用心的。**”

“**大字报是个好东西，我看要传下去。**孔夫子的《论语》传下来了，‘五经’、‘十三经’传下来了，‘二十四史’都传下来了。这个大字报不传下去呀？我看一定要传下去。**比如将来工厂里头整风要不要大字报呀？我看用大字报好，越多越好。**”

“智慧都是从群众那里来的。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这是讲得透底。知识分子把尾巴一翘，比孙行者的尾巴还长。孙行者七十二变，最后把尾巴变成个旗杆，那么长。**知识分子翘起尾巴来可不得了呀！‘老子就是不算天下第一，也算天下第二’。‘工人、农民算什么呀？你们就是阿斗，又不认得几个字’。**但是，大局问题，不是知识分子决定的，最后是劳动者决定的，而且是劳动者中最先进的部分，就是无产阶级决定的。”

“**我就是这么一个人，要办什么事，要决定什么大计，就非问问工农群众不可，跟他们谈一谈，跟他们商量，跟接近他们的干部商量，看能行不能行。这就要到各地方跑一跑。”**“知识来源于群众。”

毛泽东最后说：

“对右派是不是要一棍子打死？打他几棍子是很有必要的。你不打他几棍子他就装死。对这种人，你不攻一下，不追一下？攻是必要的。**但是我们的目的是攻得他回头。我们用各种方法切实攻，使他们完全孤立，那就有可能争取他们，不说全部，总是可以争取一些人变过来。他们是知识分子，有些是大知识分子，争取过来是有用的。争取过来，让他们多少做一点事。而且这一回他们帮了大忙，当了反面教员，从反面教育了人民。**我们并不准备把他们抛到黄浦江里头去，还是用治病救人这样的态度。也许有一些人是不愿意过来的。像孙大雨这种人，如果他顽固得很，不愿意改，也就算了。我们现在有许多事情要办，如果天天攻，攻他50年，那怎么得了呀！有那么一些人不肯改，那你就带到棺材里头去见阎王。你对阎王说，我是五张皮的维护者，我很有‘骨气’，共产党、人民群众斗争我，我都不屈服，我都抵抗过来了。但是你晓得，现在的阎王也换了。这个阎王，第一是马克思，第二是恩格斯，第三是列宁。现在分两个地狱，资本主义世界的阎王大概还是老的，社会主义世界就是这些人当阎王。我看顽固不化的右派，一百年以后也是要受整的。”

7月9日晚，毛泽东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接见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各界代表。毛泽东一见到谈家桢，就亲切地说：

“老朋友啦，谈先生！”

谈家桢为自己在整风运动中曾经说了一些错话而感到很惭愧。毛泽东见他满脸汗水，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又风趣地说：

“辛苦啦，天气这么热，弦不要拉得太紧嘛，咱们可是老朋友喽！”

此时，谈家桢已经被内定为“右派”，他怎么也想不到毛泽东会接见他。如今听到毛泽东如此幽默的话语，这才如释重负。此后，他被“内定右派”的问题也随之烟消云散了。

毛泽东在谈话中鼓励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各界代表，在反右派斗争中要站稳立场，坚决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

是年夏，章士钊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政协批判他，他不服气。

原来，在一次政协召开的征求民主党派意见的座谈会上，章士钊诚恳地说：“希望中国共产党永远保持廉洁奉公、不谋私利的优良传统。古语云：‘物必自腐而后虫生’。譬如一个水果，表皮坏一些不很要紧，削去一些并无损果子味道。惟果子自核心处腐烂生虫，虽表面光泽尚存，但从里往外逐渐腐蚀，最终此果不可食……所以，社会其他方面有些毛病较易纠正，惟共产党核心之健全最重要。”不料在数日后，政协一部分人猛烈地批判他的发言，逼令他写检查。批判的调子越来越高，章士钊的检讨书总通不过。他百思不得其解。一天晚上，他忽然拍案而起，大声说：“这么搞不对头，我要给毛泽东写信！”女儿章含之一听，吓了一跳，便劝道：“爸爸，千万别写，也许再写一遍检讨可以通过。”“不！”怒气冲天的章士钊主意已定，立刻挥毫疾书，向毛泽东陈述他给党提意见的初衷和目前对他批判之不公。

毛泽东阅信后，立刻对政协作出批示：

“章士钊先生虽然在座谈会上用了一些过激言词，然用意是好的，不要再批判他了。”

有了这道批示，章士钊当然也就“过关”了。章士钊十分感激地说：

“只有毛主席才了解我的一片真心。”

7月15日，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闭幕。

会议通过了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1956年国家决算和1957年国家预算的决议；关于1957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关于1956年以来检察工作情况报告的决议。

会议还通过了关于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问题的决议，关于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决议。会议决定，今后一切死刑案件，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或核准。

根据大会主席团的提名，会议补选陈其尤、季方为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7月17日至21日，毛泽东在青岛市主持召开部分省市委书记会议，进一步部署反右斗争。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谭震林、陈伯达、胡乔木、李维汉、徐冰、田家英、李井泉、张仲良、张德生、陶鲁笳、陶铸、周惠、王任重、张平化、马国瑞、潘复生、舒同。

毛泽东在讲话中说：

“不要怕群众，要跟群众在一起。打个比喻，人民就像水一样，各级领导者，就像游水的一样，你不要离开水，你要顺那个水，不要逆那个水。”

“不要脱离群众，等于我们游水一样不要脱离水。刘备得了孔明，说是如鱼得水，确有其事，不仅小说上那么写，历史上也那么写，也像鱼跟水的关系一样。群众就是孔明，领导者就是刘备，一个领导者，一个被领导者。”

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确定整风分为4个阶段：大鸣大放阶段；反击右派阶段；着重整改阶段；研究文件，批评反省，提高自己阶段。

毛泽东在会议上印发了他在会议期间撰写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摘要如下：

**“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

**向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举行猖狂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反革命派。不这样叫，而叫右派，一是为了便于争取中间派；二是为了便于分化右派，使一部分右派分子有可能转变过来。**

**最后不能转变的那一部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是死硬派，只要他们不当特务，不再进行破坏活动，也给他们一点事做，也不剥夺他们的公民权。”**

**“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

**“整风的方法是批评和自我批评，摆事实，讲道理。整风的目的是把斗争方向引导到端正政治方向，提高思想水平，改正工作缺点，团结广大群众，孤立和分化资产阶级右派和一切反对社会主义的分子。”**

“在农村中，必须注意阶级路线，必须使原来的贫雇农在领导机关占优势，同时注意联合中农。我赞成迅即由中央发一个指示，**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批判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批判某些干部的本位主义思想，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和个人主义思想，打击地富的反革命行为。**其中的主要锋芒是向着动摇的富裕中农，对他们的资本主义思想进行一次说理斗争。”

**“和城市一样，在农村中，仍然有或者是社会主义或者是资本主义，这样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个斗争，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取得彻底胜利。”“**今年秋收以前，必须在农村中进行一次反对不顾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的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的斗争。

**有反必肃。杀人要少，但是决不废除死刑，决不大赦。**对刑满释放再犯罪者，再捉再判。社会上流氓、阿飞、盗窃、凶杀、强奸犯、贪污犯、破坏公共秩序、严重违法乱纪等严重罪犯以及公众公认为坏人的人，必须惩办。”

“再说一遍，所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就是我党从来经常说的走群众路线的问题。**共产党员要善于同群众商量办事，任何时候也不要离开群众。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

“帝国主义都不怕，**为什么反而怕老百姓呢？怕老百姓，认为人民群众不讲道理，只能压服，不能说服，这样的人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除了叛徒和严重违法乱纪分子这两种人，在整风中保护一切党团员，用大力用诚心帮助他们改正错误缺点，改善工作方法，提高工作能力，提高政治水平，提高思想水平。**共产党员一定要有朝气，一定要有坚强的革命意志，一定要有不怕困难和用百折不挠的意志去克服任何困难的精神，一定要克服个人主义、本位主义、绝对平均主义和自由主义，否则就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有一些丧失朝气、丧失革命意志和坚持错误的人，在累戒不改的情况下，党委应当予以正当处理，重者绳之以纪律。”

**“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共产党不心服，他们中的右派分子决心要同我们较量一下。较量了，他们失败了，他们才懂得他们的大势已去，没有希望了。只有在这时，他们中的多数人（中间派及一部分右派）才会逐渐老实起来，把自己的资产阶级立场逐渐抛弃，站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下决心依靠无产阶级吃饭。少数人至死不改，只好让他们把他们的反动观点带到棺材里去。但是我们应当提高警惕。要知道，他们一遇机会，又会要兴风作浪的。**这个斗争，从现在起，可能还要延长10年至15年之久。做得好，可能缩短时间。当然不是说，10年至15年之后，阶级斗争就熄灭了。**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我国的反革命分子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活动，不但总是带着阶级斗争的性质，并且总是同国际上的反动派互相呼应的。”**

**“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的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

**“批判右派这件事，整个民主党派，知识界，工商界，震动极大。应当看到他们中的多数人（中间派）是倾向于接受社会主义道路和无产阶级领导的。这种倾向，各类人程度深浅不同。应当看到，现在他们对于真正接受社会主义道路和真正接受无产阶级领导这些基本点虽然还只是一种倾向，但是，只要有了这种倾向，他们就从资产阶级立场到工人阶级立场的长距离路程中开动了第一步。”**

**“大字报，除商店的门市部、农村（区乡）、小学、军队的营和连队以外，都可以用。在我国条件下，这是一个有利于无产阶级而不利于资产阶级的斗争形式。怕大字报，是没有根据的。在高等学校，在中央、省市、地、县的机关和城市的大企业，大字报、座谈会和辩论会，是揭露和克服矛盾、推动人们进步的三种很好的形式。”**

“不要怕惊涛骇浪，硬着头皮顶住。就一个单位来讲，大约两三个星期，洪峰就过去了，就可以转到反击右派的新阶段。**在两三个星期内，各单位的领导者对于右派的猖狂进攻，硬着头皮，只听不驳，聚精会神，分析研究，聚集力量，准备反攻，团结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右派，这是一套很好的马克思主义的策略。”**

此时，毛泽东在青岛患了感冒，久治不愈。山东省委书记舒同请来了山东著名的老中医刘惠民，为他诊治。毛泽东见了刘惠民，一问他的名字，就说：

“你是施惠于民啊！”

刘老先生给毛泽东开了方子，舒同和夫人亲自抓药，煎药，送到毛泽东床前，直到毛泽东服完药入睡了，他们才悄悄离开。山东省委另一位领导人对舒同说：

“你胆子太大了……”

结果，毛泽东一连服了几天药，病情终于好转了。

7月26日至30日，毛泽东在青岛主持召开另一部分省市委书记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陈云、李先念、邓子恢、张鼎丞、陈伯达、陈正人、田家英、柯庆施、江华、江渭清、曾希圣、舒同、欧阳钦、黄欧东、吴德、乌兰夫。

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讨论《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和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

7月31日下午3时，家在青岛的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到毛泽东的住处汇报工作。毛泽东听了汇报后很高兴，说：

“劲光同志，你怎么不请我吃饭呢？”

萧劲光说：

“主席日理万机，工作那么忙，我怎么好请你吃饭呀？”

毛泽东笑着说：

“我今晚就到你家吃饭。”

萧劲光出来就对秘书张志文说：

“毛主席今晚要到家中吃饭，你回去准备一下，要清淡简单。”

张志文回到萧劲光家中，赶紧与萧夫人、厨师韩成顺研究菜谱。张志文还不放心，打电话给叶子龙，问毛泽东在饮食上有什么习惯。叶子龙说：

“越简单越好，主席是很随便的。”

萧劲光回到家里，到伙房又关照说：

“不要到街上买菜，家里有什么就吃什么。”

韩成顺师傅作了6菜1汤，加上毛泽东的工作人员送来的一捆小油菜和一点海参及1碗熬好的小米粥，凑成了8个菜和一个紫菜汤，没有备酒水。

傍晚7点，毛泽东偕江青、李讷来到萧家，萧劲光和夫人在门前迎接，子女们也在客厅里欢迎客人。毛泽东亲热地和他们握手寒暄，问孩子们的名字、年龄，鼓励他们要好好学习。

毛泽东、江青、李讷和作陪的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及夫人，在萧劲光一家的簇拥下，来到2楼就餐。大家边吃边谈，江青说：

“主席真有意思，在延安靠萧司令吃饭，现在又向萧司令要饭吃。”

饭后，萧劲光说：

“海军的领导同志大都在青岛，请主席接见。”

毛泽东愉快地答应了。

1957年8月1日凌晨，毛泽东读范仲淹的《苏幕遮·碧云天》（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和《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两首词后，在后边写了一个评注，他写道：

**词有婉约、豪放两派，各有兴会，应当兼读。**读婉约派久了，厌倦了，要改读豪放派。豪放派读久了，又厌倦了，应当改读婉约派。**我的兴趣偏于豪放，不废婉约**。婉约派中有许多意境苍凉而又优美的词。范仲淹的上两首，介于婉约与豪放两派之间，可算中间派吧；但基本上仍属婉约，既苍凉又优美，使人不厌读。**婉约派中的一味儿女情长，豪放派中的一味铜琶铁板，读久了，都令人厌倦的。**人的心情是复杂的，有所偏但仍是复杂的。所谓复杂，就是对立统一。人的心情，经常有对立的成份，不是单一的，是可以分析的。词的婉约、豪放两派，在一个人读起来，有时喜欢前者，有时喜欢后者，就是一例。睡不着，哼范词，写了这些。江青看后，给李讷看一看。

1957年8月1日

8月3日，毛泽东将在青岛会议期间撰写并修改了11稿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作为党内文件印发给各地领导干部阅读。

8月4日，毛泽东给林克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林克：

请找列宁《做什么》、《四月提纲》（1917年）两文给我一阅。我这几天感冒未好，心绪不宁，尚不想读英文，你不感到寂寞吧！你可看点理论书，你需要学习理论。兴趣有，似不甚浓厚，应当培养，慢慢读一点，引起兴趣，如倒啖甘蔗，渐入佳境，就好了。供参考。

毛泽东 8月4日

列宁的《做什么》一文，写于1907年，后来译为《怎么办？》。列宁在文章中特别强调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行动。”“只有受先进理论指导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

接着，毛泽东给刘思齐写了一封回信。

原来，刘思齐是从苏联回到国内度暑假的，她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要求从苏联转回到国内的大学学习。毛泽东在回信中写道：

思齐儿：

信收到。回来了，很高兴。转学事是好的，自己做主，向组织申请，得允即可。如不得允，仍去苏联，改学文科，时间长一点也不要紧。不论怎样，都要自己做主，不要用家长的名义去申请，注意为盼。

祝你进步

父亲 8月4日

8月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刊登在8月10日《人民日报》上），全文如下：

**在目前农村中，有必要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教育的中心题目是：第一，合作社优越性问题；第二，粮食和其它农产品统购统销问题；第三，工农关系问题；第四，肃反和遵守法制问题，等等。教育的方式是：利用生产间隙和休息时间，在全体农村人口中就这些中心题目举行大辩论，提问题，提意见，摆事实，讲道理，回忆、对比解放前后和合作化前后农民生活的变化。**为着辩论的方便和通俗化起见，各合作社还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分别提出一些具体的对比问题。秋收以前的辩论，要着重统购统销问题，适当地结合当时当地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辩论，实质上是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辩论。**这种辩论在不少乡村已经开始进行。**辩论的结果是：帮助了广大农民群众和乡社干部进一步地弄清国家和农村中的大是大非，说明了当前国家所实行的各项根本政策的正确性，说明了资本主义道路只能使极少数人发财，使大多数人贫困和破产，而社会主义才是劳动农民共同发展和共同富裕的唯一出路。**部分富裕中农留恋资本主义道路，不满意国家所实行的某些根本政策，但在辩论中，也觉悟到他们中间如果在旧社会里面靠投机倒把、能够侥幸发财的人也不过百分之一、二，而大多数还是不可能成为富人。**曾经有不少人怀疑粮食的统购统销政策，但群众辩论的结论却是：这个政策好得很，不这样，就得有很多人在粮食商的操纵下挨饿以至家破人亡**。那些继续从事破坏活动的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在辩论中，进一步地被揭穿，受到群众的打击。对于那些游手好闲、不务劳动的人，群众也主张给以必要的约束。总之，**这种辩论大大地提高了农民群众和乡社干部的社会主义觉悟，纠正了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发扬了正气，压倒了邪气。我们要巩固合作社制度，加强贫农中农的团结，提高农民群众的更大的生产积极性，改进合作社的工作，巩固工农的联盟，完成国家购粮的任务，保证整个国家经济计划的顺利进行，除了必须在城市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动言行以外，在农村中展开这样一场大辩论是完全必要的。**

中央认为：**凡是还没有展开这种辩论的地方，各级党委都必须有准备地、有次序地、自上而下地派遣工作组协助乡社的党组织主持这种辩论，以便有力地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反对一切不顾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的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使爱国、爱社和管家的观念在群众中统一起来，并普遍地养成勤俭办社和勤俭持家的风气。**辩论会必须吸收全体农村居民（包括单干户）参加，组织可小可大。一般的在小组或小队的范围内，可以辩论得较为充分和较为深入。但在必要时，也可以举行全体社员或全村农民的辩论大会。辩论时，要让各人畅所欲言，让群众在辩论中，在交换意见中，辨别出哪些是正确的和哪些是错误的。**除了对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反动的煽动言论必须即时地有力地给以反击之外，对于群众的误解或错误意见，都必须采取很好的态度加以解释和说服，对于富裕中农的错误言论的态度，也应该这样。**

**这些关系农村两条道路的根本问题的大辩论，是农民群众和乡社干部的社会主义自我教育，是农村的整风。**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地委、县委对于农村中的这场大辩论，必须很好地掌握领导。群众在大辩论中，对于乡社干部作风所提出的批评，各级党委必须认真研究，适当处理，以便改进工作，团结群众。

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内外关系的调整、经营管理的改善等问题，中央准备在研究各地整社的经验之后，再发指示。

8月9日，毛泽东复信给刘思齐，他在信中写道：

思齐儿：

信收到。我在此间有事，又病，不要来。你应当遵照医生、党支部、大使馆的意见，下决心在国内转学文科。一切浮言讥笑，不要管它。全部精力应当集中在转学后几年的功课上，学成为国服务。

此嘱

父亲 8月9日

8月11日，毛泽东从青岛返回北京。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1957年夏天，中央召开青岛会议，江青陪同毛主席去的。青岛风光好，主席有江青陪同，江青请主席到她故乡游玩，主席一路本该是高兴的。可是，江青后来对我说过：‘主席这一个夏天都是闷闷不乐，我给他讲青岛的事，他都没有心情听。’我问，因为什么事？她说，**还不是因为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放了一炮，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结果弄得党外进攻，党内不满意。**我在现场听过主席的那次讲话，也看到了那之后党内和社会上发生的种种事情，非常理解主席为什么心情不好。一方面，正是因为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了话，让大家畅所欲言，才出现一个全国性的大鸣大放的宽松的政治气候。等这个气候出来了，党又要把它消灭，还要毛主席用自己的原始报告来做成枪炮把它消灭。这不等于是让毛主席自食其言吗？何况党内的官僚主义作风还没有解决！另一方面，他那个时候也派人下去看了一些事情，也了解到在自己的讲话出来后，社会上的确是出来各种言论，有好的，也有不好的，‘裴多菲俱乐部’中国的确也是有的。主席也是不希望右派翻天的。但是，弄得不好，就要把好不容易出来的民主气氛压制下去。这是一种党内外夹击的复杂局面。**群众意见、民主党派友好人士的意见以及右派的攻击，其实还是好处理的，难的是党内高层的批评意见不好处理。**那时，刘少奇是党内已经认可的接班人，邓小平是毛主席自己亲自点将到北京后不两年就担任党的总书记的，彭真虽然在延安时期就是很左的，但对于党在延安时期的拨乱反正贡献是很大的，自那时以来党内地位也很高。还有大批同志跟在他们后面，也一样对毛主席的讲话有这样那样的埋怨。这些能都不管吗？这样一来，主席自然就没有心思只顾游览青岛的风光了。**党外是右派发动进攻，反社会主义的东西纷纷出笼，党内是一致要求反击右派的进攻。毛主席在党内外夹击这样一种情形下，同意发起反右派运动。**《人民日报》先在 1957 年 6 月 8 日发表社论，后又连续发了几个社论，反右派运动就这么在党的集体意志下，在 1957 年 6 月中旬发动起来了。”“江青还曾告诉过我，说主席在青岛的时候对她还说过这样的一番话：‘别人说我引蛇出动。我没有引蛇出洞，我搞的是阳谋。毒草出来了不要紧，大鸣大放，百花齐放，总会有些问题，不要紧。我都说了，农民种地也有毒草的嘛。花点药，除了就是了。我不是阴谋，我是阳谋。’主席这个意思是说是人家强加给他的，实际上是莫须有的‘引蛇出洞’。可后来写历史的人，就说主席是自己都承认搞‘引蛇出洞’、搞‘阳谋’。”

再说1957年8月18日，毛泽东致信达赖喇嘛，他在信中写道：

亲爱的达赖喇嘛：

你托阿沛·阿旺晋美带给我的信收到了。我很高兴。阿沛我也见到了，并且由周总理和他谈了话。

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在你领导下工作是做得好的，有成绩的。**去年对实行民主改革提得早了，工作机构也太大了，这是缺点。现在决定在第2个“五年计划”期内不改革，并且把过大的机构作了精简，这就改正了缺点。**

工作中发生缺点总是难以完全避免的。对缺点，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正确分析，积极改正，记取经验，继续前进。我们改掉了缺点以后，工作就会做得更好一些。

**你在访问印度期间，拒绝了那些逃亡国外的反动分子出的坏主意，是做得很对的。他们大概还要找机会进行反动活动，要教育僧俗官员对他们保持警惕。**

西藏地方政府和堪厅间的关系问题，希望都能从团结愿望出发，双方好好协商加以解决。

很惦念你，希望你多注意健康，并多来信。

祝你愉快！

毛泽东 1957年8月18日

8月18日至2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召集陈伯达、田家英等人研究修改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为即将召开的中共中央八届三中全会做准备。

8月28日，毛泽东在修改《中央统战部关于在工商界全面开展整风运动的意见》稿上，加写了一句话，他写道：

“知识分子居多，有些人是有用人才，应大力争取过来。”

欲知毛泽东此后有什么重大活动，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青岛病了一场，且久治不愈，这和他在红四军“七大”以后以及在长征开始前那两场要命的大病一样，都是因为革命受到挫折、心情抑郁所致。江青解释说：“主席这一个夏天都是闷闷不乐”，“**是因为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放了一炮，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结果弄得党外进攻，党内不满意。”**关于这一点，本传在前面已经从最高国务会议11次扩大会议有5位政治局委员退场抗议，到《人民日报》长时间拒绝宣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毛泽东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把党内的巨大阻力说清楚了。毛泽东明白，**党内的阻力主要是讳疾忌医、反对给人民群众以充分的话语权。**对此，他不但没有退缩，反而走上了一条**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探索之路，而且很快便发现了进行继续革命的一件重要武器——大字报。这就是很多人还不了解的毛泽东！

**第39章**

**“我们提出反对教条主义也反对修正主义。有了右派，**

**就不得不使我们把反对修正主义作为斗争的中心。”**

话说1957年9月3日，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在农业合作社内部贯彻执行互利政策的指示》（后来在9月14日发出）稿，他批示道：

“此件可用。略有修改。”

是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林伯渠、董必武、彭真、彭德怀、陆定一、康生开会。

会后，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深入农村、工厂进行调查研究。他的第一站是河北省，下午6时半到达保定。

9月4日晚上，毛泽东到达郑州。他在专列上同中共河南省委负责人吴芝圃、潘复生、史向生、杨珏谈农业生产和反右派等情况。

9月5日下午1时半，毛泽东在武昌东湖宾馆听取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处关于农村情况的汇报。王任重在汇报中谈到，黄冈有一个干部，三代当雇工，讨过米，解放后，翻了身，当了干部，在这次鸣放中放出一些反动意见。毛泽东问：

“刚才说的那个干部叫什么名字？”

王任重报告说：

“叫刘介梅。”

是日下午4时40分，毛泽东视察裕华纱厂，看了厂内的大字报。

9月6日傍晚，从汉口方向驶来20多辆轿车，沿龟山山腰公路一直开到汉阳桥头凉亭旁。毛泽东身穿一套灰色的中山装，脚上穿着一双布鞋，走下汽车。他的后边跟着王任重。等候在桥头的武汉大桥工程局副局长杨在田和政治部主任杜景云，急忙迎上前去。毛泽东与他们一一握手，神采奕奕地走上公路桥，俯瞰武汉三镇。杨在田汇报说：

“武汉长江大桥为公路铁路两用桥，全长1670米，正桥长1156米，8墩9孔，每孔跨度为128米。”

毛泽东问：

“修这个桥用了多少钢，多少混凝土，花了多少钱？”

杨在田说：

“一共用了5万吨钢，一亿三千万元钱。”

“不太多。”毛泽东说着往前走，往上游指着江中问：“鹦鹉洲不是在江中间吗？”

王任重说：

“从前在江中间，现在汉阳江边就叫鹦鹉洲了。”

“啊？那看不到鹦鹉洲了，黄鹤楼呢？”

“古代的黄鹤楼早已经毁了，现在所谓的黄鹤楼，实际上是在晚清时期所建的奥略楼，建筑简陋，因修大桥已经拆了，现在正计划重修，恢复古黄鹤楼的雄姿。”

“应当修，这是历史古迹。”毛泽东走到大桥中间，看着栏杆旁漆着灰、黑、天蓝3种不同的颜色，问道：“怎么还漆3种不同颜色？这是让谁看的呀？”

杜景云回答说：

“这是让群众看的，我们征求群众意见，看漆哪种颜色好。”

毛泽东笑了笑，称赞道：

“好啊，你们搞建设还走群众路线！”

他问王任重：

“你是湖北的主人，你看漆什么颜色好？”

王任重说：

“我还没想好呢！”

毛泽东说他赞成灰色，还说灰色与江水比较协调。接着，他转移话题，问杨在田：

“你们工人最多的时候有多少？”

杨在田说：

“有13000人。”

“技术人员有多少？”

“300多人。”

“修建武汉长江大桥，来了多少苏联专家？”

“24个。”

“有苏联专家在这里，可以修这样的桥，如果没有苏联专家，现在可以修吗？”

“可以修。”

“可以修了吗？”

毛泽东又重复地问，杨在田非常肯定地说：

“能修，能修。我们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

此时夜幕已经降临，武汉三镇闪烁着初上的灯光。毛泽东走到栏杆旁边，看着汉口方向说：

“灯火辉煌，灯火辉煌，好啊！”

他又问杨在田：

“这里从水面到桥面有多高？”

杨在田说：

“有40公尺高。”

有人插话说：

“40公尺高，游泳时可以当跳板。”

王任重说：

“当跳板太高了。”

毛泽东说：

“对，不行，跳下去要落到岩层上了。”

众人听他这么一说，都笑了。毛泽东来到武昌桥头堡的凉亭处，问道：

“从这里可以下去吗？”

杨在田说：

“梯子上的电灯还没有安好？”

毛泽东说：

“好，这次不下去了，以后再说吧。”

杨在田将一本《武汉长江大桥工程》画册，递给毛泽东，毛泽东接过画册，说：

“这是给我的呀？你们还有吗？你们不够就留着自己用。”

杨在田说：

“这本书里还有一封信，是全体职工写给主席的。”

杨在田又拿出笔和纸，请毛泽东题词，毛泽东认真地说：

“这可要好好想想。”

王任重说：

“主席，你就把‘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写上吧。”

毛泽东说：

“到东湖考虑考虑再写。”

几天后，毛泽东派人给大桥工地送来了一幅“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的题词。

9月7日下午1时，毛泽东在武昌东湖宾馆同湖北省部分地委书记座谈。有人问：在社会主义教育中，对痛改前非的人怎么处理，如对刘介梅怎么办？毛泽东说：

“不要处分他。这个人很典型，可以写小说，写电影。他的那些东西，可以在汉口展览，也可以在北京展览，这个人是个很好的教员。”

9月10日中午，毛泽东同湖北省部分地委书记的座谈会继续进行。座谈会结束后，毛泽东到江西省政府看大字报。

9月11日上午10时许，毛泽东从杭州住地驱车到浙江海宁县七星庙，观赏著名的钱塘江大潮。此时的潮水不是很大，但还可以看。毛泽东看了一会儿，便来到七星庙临时休息之所，赋《七绝·观潮》一首：

千里波涛滚滚来，雪花飞向钓鱼台。人山纷赞阵容阔，铁马从容杀敌回。

下午2时，毛泽东离开七星庙，在返回的路上要到钱塘江游泳。一行人便来到了大桥警卫部队驻地。毛泽东乘上船到了江心，立即脱衣下水，逆流而上。王芳等人不敢怠慢，也纷纷下水，尾随其后。毛泽东游过了钱江大桥桥孔。此时浪高水急，水又很凉，王芳等人都为他的安全担心。毛泽东一面游，一面笑着说：

“潮急一点，水凉一点，没关系嘛，这样才能锻炼人的意志呢！”

他一直游了将近两个小时，到了闻家堰才回到船上。

后来毛泽东又去游过三、四次，其中有一次还是陈毅在汇报外事工作后陪他一起去游的。这几次游泳，毛泽东每次都是游过钱江大桥到六和塔才上船的。

9月12日，毛泽东审阅修改《人民日报》社论稿《为什么说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

9月1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指示》，他写道：

**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大辩论，已经在全国农村中逐步展开。**中央认为：各地农业合作社应该在上级党委工作组的帮助下，接着这个大辩论，继续进行一系列的整顿工作。

1. 整顿干部作风。**农业合作社绝大多数的干部基本上是好的，他们在工作上是积极的，有成绩的，但是在他们中间，有不少的人，在联系群众、经手财政、管理生产、处理人事等问题上存在着某些缺点或错误。至于违法乱纪、错误严重的，则只占极少数。**整顿干部作风，就是要帮助他们改正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改善工作方法，提高工作能力，提高政治水平和思想水平，并把那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带有某些缺点和错误的多数干部，同那些违法乱纪、严重错误的极少数人分别开来。各地合作社对于这个整风的部署，可以按照自己的具体情况拟定，但大体上要依序采取如下的做法：

**第一，先在合作社干部中，在党团支部中，充分说明整风的必要性，说明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使干部们和党团员在精神上有所准备。第二，放手让社员群众在社员代表大会上，生产队全体会议上，或全体社员会议上，对干部的缺点或错误提出批评。第三，组织有群众代表参加的小型会议，查清事实，分别缺点错误的大小轻重，分清责任，然后由犯错误的人在一定的群众会议上作自我检讨。属于群众误会的事，应该解释清楚。如果有地主、富农、投机商、反革命分子和流氓分子乘机进行破坏活动，必须依靠群众，在适当场合加以揭穿。第四，党支部和上级工作组要按照惩前毖后（戒于前而慎于后）、治病救人的原则，同群众在一起研究处理的方案。在群众的谅解之下，对错误并不严重而又表示决心改正的干部，不必给予处分，对于错误严重的，处分也要适当，使他们得有改正的机会。第五，合作社干部的改选，应该由社员群众自下而上地层层酝酿，充分协商，提出候选人名单。党支部在选举方面的领导，不能采取指定的做法，但必须注意使合作社的领导成份保持原来贫雇农和下中农的优势，同时注意使上中农也有适当的代表人，以利合作社的巩固和团结。**

二、调整社和队的组织。合作社和生产队的组织，要力求便于经营管理和发挥社员集体劳动的积极性。为此，它们的组织规模大小，应该照顾地区条件、经济条件、居住条件和历史条件，容许有各种差别，而不应该千篇一律。根据一年多的经验看来，在多数的情况下，一村一社是比较适当的。有些大村可以一村数社，有些距离较近的小村也可以数村一社。**现在各地合作社的组织（包括某些大社在内），凡是业已经过考验，确实办好，而为群众所满意的，就应该稳定下来，不要轻易变动。**但是，**有一部分合作社的组织规模是过大的，不适当的，应该根据群众的要求，进行合理的调整，或者把社划小，或者保持联社的形式，由分社（有的叫大队）自负盈亏。生产队是合作社的基本生产单位，一般以二十户左右为适宜，按照各地方的特点，可以有所伸缩，过大不便管理，过小会损害集体劳动的优越性。**在调整社和队的组织的时候，必须注意各部分群众的意见和利益，经过充分地协商，提倡互助互让，调解分歧，恰当处理土地、农具、耕畜、水利、林木等等经济问题。在慎重地调整社和队的组织之后，就都应当长期稳定下来，以利生产和建设。

**在社、队关系的问题上，应该实行统一经营、分级管理的原则，既要克服某些合作社过分集权的弊病，也要防止生产队权限过大、形成分散主义的偏向。**

三、统筹安排，使全体社员各得其所。合作化后，除了灾区以外，大多数社员在不同程度上增加了收入，有一部分社员还只保持原来收入的水平，但是，也有一小部分社员因为劳动力不足或其他原因而暂时减少收入。对于其中缺乏劳动力的困难户，应该根据互助原则，适当安排他们在社内的劳动，或者适当帮助他们发展家庭副业。对于五保户，也应该根据他们的能力，分配一些可能的轻便的工作，使他们能够得到一定的劳动收入，只在劳动收入不足的情况下，才由社用公益金给予照顾。对于极少数坚决要求退社的富裕中农，可以在适当批评之后允许退社以外，应该根据互利原则，按期归还他们入社生产资料（例如农具、耕畜、果木，等）折价的款项；或者经过协商和群众讨论，按照不同情况，在不损害贫农、下中农基本利益的条件下，采取比例分红或其他可以妥协的办法，处理他们入社生产资料的遗留问题，使他们得到适当的收入。对于有丰富劳动经验和较高生产技术的老农，要发挥他们的特长，按照他们在生产上的贡献，给以合理的报酬。对于从事手工业、运输业、渔业和其他非农业劳动的社员，应该照顾他们的劳动特点，适当处理有关的各种问题，使他们得到合理的收入。

四、**改善生产管理，拟定生产规划。全体社员生活的改善和提高，只有依靠自己的辛勤劳动，依靠合作社不断地扩大再生产**。整社工作必须不误生产。在正确处理内部各种矛盾的基础上，各地合作社应该总结本社的经验，参考其他合作社的经验，根据民主办社和勤俭办社的方针，认真执行中央关于民主办社几个事项的通知，并根据中央关于做好合作社生产管理工作的指示，结合具体情况改进生产管理工作，克服缺点。同时，要发动全体社员，讨论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并且根据本地本社的特点，研究增加农业生产和发展多种经济的措施，实事求是地拟定下年度和长期的生产规划，作为全体社员努力奋斗的目标。合作社拟定生产规划，必须服从国家经济计划和政策的指导，尊重其他合作社的利益，避免本位主义。**生产规划应着重利用本社的劳动力，进行农业的基本建设，例如兴修水利，保持水土，改良土壤，植树造林等等，为扩大再生产准备必要的条件。**

以上的整社工作，应该从现在起到明年春耕以前，逐步进行。这是巩固合作制度的重大关键。各地党委必须加强领导，完成这个任务。

9月15日，毛泽东审阅修改《人民日报》社论稿《这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这一天，毛泽东阅9月14日《杭州日报》刊登的反右派论文摘要《哲学思想中有哪些修正主义观点》，给林克写了一个批示：

“请在杭州找一本《哲学研究》本年第4期。”

9月16日，95岁的著名画家齐白石病逝于北京。

齐白石晚年唯一的愿望是要活到120岁，他要用自己在艺术上的辛勤耕耘，来报答人民和领袖毛泽东。毛泽东在齐白石病重期间，写信劝他说：

“从心所欲，静屋休养，要节劳，少见客。”

毛泽东还多次派秘书田家英代为探望齐白石。齐白石对田家英说：

“希望在身体恢复健康之后，能够有机会到毛主席身边，照一张合影像。”

然而，遗憾的是齐白石的这一愿望最终没有能够实现。他在弥留之际，留下遗言说：要将自己珍藏的字画、作品和用过的东西，献给毛泽东。

9月中旬，毛泽东在徐特立、林伯渠几位老人及刘伯承、贺龙、陈毅、叶剑英陪同下，从杭州到上海视察。上海市委在展览馆电影院楼下西厅设宴为毛泽东等人洗尘。

9月17日晚7时，毛泽东请陈毅邀集新民报社社长赵超构、出版界人士舒新城、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束世澂等30余位教授、学者、专家在他的住处座谈，周谷城也在被邀之列。毛泽东和赵超构一见面，就指着他诙谐地对在座的人介绍说：

“宋高宗的哥哥来了。”

一句话消除了赵超构的拘谨。毛泽东对他说：

“你写了两篇检查，我看过了，大家认为你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这就很好。”

他又问赵超构：

“写检查的心情怎样啊？”

赵超构坦率地回答：

“写了两次检讨，花了两个礼拜时间，那两个礼拜的日子很难受，连晚上也是睡不好啊！”

毛泽东听了，笑起来了。他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说：

“好啊，紧张一下好。好就好在晚上睡不着，那就可以多想想嘛。狗肉是很香的，但没有吃过狗肉的人总是怕吃，当吃过一次之后，才感到其味无穷，常想再吃。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也有点像吃狗肉一样，从不习惯到习惯有一个过程，等到习惯了，就会领略到它的好处了，应当养成自我批评的习惯啊！”

毛泽东再一次提出，希望赵超构到群众中去呼吸新鲜空气，更好地改造自己，为人民服务。他用自己的体会告诉赵超构说：

**“我一到下面去跟群众接触，就感到有了生命。”**

周谷城来得比较晚，他刚一进屋，毛泽东就招手要他到近前。陈毅向毛泽东介绍说：

“这位是历史学家周谷城教授。”

“老朋友，老朋友。”毛泽东微笑着拉周谷城在他身边坐下，又关切地问周谷城：“你还在复旦吗？怎么样？身体吃得消吗？”

周谷城回答说：

“还在复旦，身体倒还好，只是书不易教好。尤其在解放以后，不易教好。”

“不要紧，慢慢来，总要有一个过程，书总是会教好的。”他见周谷城点点头，又问道：“材料呢，地下的，还是……”

周谷城知道毛泽东是问他用不用考古发掘的地下材料，便说：

“我教世界史。除了从外文书上找一些图片，供自己参考外，很少用其它地下材料。”

毛泽东拿出一本《新建设》杂志，对周谷城晃了晃，说道：

“关于逻辑，我看你的论文说得最明确，要继续争鸣下去。”

周谷城见毛泽东还是像以前那样鼓励他，便苦笑着摇着头说：

“不得了，火箭炮似地批评，都冲过来，我可真有些受不啦。”

毛泽东把手按在周谷城的肩头上，说道：

“有什么受不了的，辩论就是嘛！”

周谷城说：

“我的意见赞成者很少，我很孤立，成了众矢之的。”

毛泽东笑笑说：

“你不孤立，你的意见有人赞成。”

周谷城半信半疑地说：

“怕不见得。如果有人赞成，那当然可以鼓励我继续下去。”

毛泽东说：

“人民大学里有一个刊物，好像叫《教学与研究》的杂志上，有人写文章，引了你的意见，可见你是不孤立的。”

周谷城既惊讶又佩服，毛泽东每天要处理许多国家大事，对于一个知识分子，对于学术界的一些争论情况，还是这样了如指掌，便惋惜地说：

“我没有看见。”

毛泽东说：

“我可以叫人寄给你看看。”

周谷城说：

“意见虽然有人赞成，但火箭炮冲起来总不好受。”

毛泽东说：

“有什么了不起，不要害怕，要积极地写。”

说话之间已到了吃饭的时间，毛泽东请众人共进晚餐。他起身对工作人员说：

“周先生同我坐一起。”

周谷城随着毛泽东来到餐厅，坐在毛泽东右边，两人一边用饭，一边交谈。提起青年时代，周谷城说：

“在五四运动时，我曾同清华大学的学生开过一次两小时的辩论会，我主张人类社会中不应有单独的知识阶级存在。”

毛泽东沉默了一会儿，望着周谷城说：

“嗳，几十年马克思主义的训练呵。”

是日晚9时，毛泽东在上海住处同中共黄浦区委书记陆文才、上海动力学校校长仇启琴、上海锅炉厂党委书记刘东海和厂长王伟光座谈，了解机关、学校、工厂的鸣放等情况。

9月18日上午10时，毛泽东在柯庆施陪同下来到了上海国棉一厂。厂长黄宗林和厂党委书记迎上前去，紧紧地握着毛泽东的手，连声说：

“毛主席，您好！”

毛泽东说要看看工人们的大字报，黄宗林领着毛泽东一行人来到大字报区。毛泽东首先看到的是一位老工人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批驳了整风中的错误言论，还提出要对这些错误言论进行讨论。毛泽东认真看了这些内容，他说：

“好啊，老工人讲得对！”

他问身边的黄宗林：

“鸣放已经一个多月了，现在全厂还在展开争鸣吗？”

黄宗林作答后，毛泽东又停在一张题为《百丑图》的漫画前面，边看边问漫画中几个人物的错误言论。

此时，毛泽东来厂视察的消息已经传开了，下了早班的工人们纷纷拥来，围在毛泽东周围，热烈鼓掌，“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也响了起来。毛泽东微笑着向人群招手。他继续看大字报，在一张批评黄宗林和党委书记的大字报前仔细地看着。黄宗林介绍说：

“我平时接近群众不够，待人接物方面比较生硬，因此有一部分职工反映，看见我就害怕，甚至在我下车间巡视时，他们有意躲避我。这大字报就是批评我这种作风的。”

毛泽东说：

“我们应当更多的接触群众。”

在食堂门口有一张大字报，内容是批评食堂管理不善，卫生不好的。黄宗林告诉毛泽东说：

“我们已经组织了21个人的食堂检查组，正在处理群众提出的意见。”

毛泽东一行经过托儿所、医务室，走向南纺工场的走廊。正在那里排队等候的工人们立刻鼓起掌来，队伍里也响起了“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毛泽东缓缓地走着，举起右手，微笑着向欢迎的群众挥手致意。

这天下午，毛泽东乘专机回到北京，准备召开中共八届三中全会。

9月19日下午，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他在讲话中说：

“这次全会如何开？整风是一个纲。其它问题，工业、农业、商业、学校、机关，不仅是作风问题，而且是制度问题，要花几天功夫讨论。”

接着，毛泽东讲了几个问题。他说：

“一、整风决心和整风方式。**小鸣小放、中鸣中放，还是大鸣大放？小鸣小放天下大乱，中鸣中放天下中乱，真鸣真放天下不乱。鸣放要有决心，很多人怕放。**各种经验证明，不应该怕。

1. 两类矛盾。矛盾历来是提两个，敌我矛盾与是非问题。**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但在斗争中把他们划出去一部分（右派）为敌我矛盾。过一时期，要拿回来一部分（经过分化），现在是右派，过几年又摘掉右派的帽子。整个过渡时期，总的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即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我们过去一个时期，主要是提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没有提。甘肃省委去年提出两个矛盾究竟哪个矛盾为主？当时没有答复，要看一看。现在看来，两个矛盾都同时存在。去年所有制是改变了，但人并没有改造。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整个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中，包含两类矛盾。‘八大’讲当前敌我矛盾基本上解决了，现在看来也对，但只能是在经济方面的，如从政治方面、思想方面看，就不能这样说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有两种：一为敌我，一为思想。**

三、第2个‘五年计划’赶上富裕中农的问题。过去只提要赶上中农，现在看大多数合作社要赶上和超过富裕中农的生产水平。富裕中农在农村中各方面是先生，要向他们学习，他们勤劳、节约、有计划。要想赶上他们只有勤和俭。但在政治上，富裕中农要向贫农学习。

四、农业机械化问题。很多地方要抽水机、拖拉机、运输和加工的机器。中央与省这几年没有认真地研究这个问题，要彻底研究一下。合作化以后，劳动力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水利、肥料我谈了很多，大家注意了，但机械问题都未注意，只靠两只手。

五、粮食问题。大有可为。真正缺粮的不太多。我调查了一个村，400多户中有300多户叫缺粮，这次大鸣大放，真缺的只有6户。过去我们没有底，现在有了底了。

六、积累问题。现在要提留积累，国家、合作社、个人都要有积累。去年讲积累不要多，要多分。今年要转变一下。当然留得太多也不行。

七、宣传。几年来偏重于工业的宣传，这在当时也对。好处是把工业搞起来了。现在要宣传农业。农业是工业的基础，没有农业就没有基础。许多轻工业大部甚至全部都要依靠农业。宣传工业的偏向使我们很被动，许多人只愿进城，不愿意下乡找工作。在一个时期要把农村宣传得高一点，要偏一下才能平衡。两只手，一只抓工业，一只抓农业，现在要好好搞农业，要有近代工业和近代农业。”

9月20日晨，毛泽东审阅修改邓小平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稿后，批示：

“即送小平同志：此件很好。有若干小的修改，请酌定。此件最好今天晚上能印发到到会人手里。”

9月20日，毛泽东在召开八届三中全会前夕同省市委书记谈话，回忆了反右斗争的情况，他说：

“4个大学没有底之前，天天派人看大字报。匈牙利事件究竟有多大影响，5月20号后摸到底了，才真不怕。”

9月20日下午，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了扩大的八届三中全会。各省的地委书记和直辖市的区委书记也列席了会议。与会人数共计416人。

会议听取了3个报告：邓小平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陈云关于改进行政管理体制和农业增产的报告，周恩来关于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的报告。

9月21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出席中共八届三中全会的黄欧东、欧阳钦、吴德、林铁、陶鲁笳、舒同谈话。

9月22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出席中共八届三中全会的张德生、张仲良、李井泉、谢富治、陶铸、柯庆施、曾希圣、刘建勋、叶飞进行了非常重要的谈话，要点如下：

1. **反右派今后会不会纠偏、翻案？**审批时要注意。这次都登了报，许多话都是他们自己说的，都不是孤立的几句话。北京也有人说过不好的话，没有划成右派。反右派斗争不搞好，社会主义建设不成，他们会搅乱人心。要教育中间派和左派。这次斗争，他们受到很大的教育和锻炼。**大鸣大放、大字报，都是学来的，有的是群众创造的，有的是右派创造的。名词和形式没有阶级性，左、中、右都可以利用。**

二、**究竟有多少人反对社会主义**？要调查几个合作社、工厂、基层单位，加以研究。河南说，一类社没有人反对合作化，可见，有些东西是工作问题、教育问题。**大鸣大放是最好的教育方式。**

三、**党员中反对社会主义的有多少？要当作一个问题好好研究一下。大概也是百分之二到三。**过去教育不够，今后要加强教育。教育好就会起变化，比例就少了。

四、**放与改要同时并进。人家帮助整风，不改就不得人心，人家不佩服。**当然，改要抓住重点。

五、鸣放的方式，各地可以不同，不一定千篇一律。整风有两个方面，一是解决作风问题，二是解决思想问题。有右倾思想的要改正，没有右倾思想的要提高。

六、南北干部的团结问题。中国有几次北伐，只有一次南伐，带了成套的干部南下。南下的北方干部有个很重要的任务，培养本地干部，把他们带在身边做工作。地县两级要有南方人参加，否则不好做工作。

七、在延安打仗时很艰苦，许多人挤在一个窑洞里，只有两个炕，也不闹病。现在住了那么多房子还闹病。

八、化学肥料、机械，各省都要自己搞。**农业生产主要靠水利、肥料、深耕细作。**这次会议对农业四十条要搜集些意见，搞一个修改稿。

九、关于大会发言。我最喜欢听典型，各地委要多讲典型，如石家庄讲合作社生产如何赶上富裕中农。

9月24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印度尼西亚前副总统哈达和夫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张闻天在座。毛泽东回答了哈达的提问。哈达问：

“你们将来怎样解决人多土地少的问题？”

毛泽东说：

“办法是增加单位面积产量。**增产的办法是改良土壤和种子，增加肥料，兴修水利，深耕细作等。现在还有一种新办法，即密植法。**这都需要进行很大量的组织工作。我们没有化学肥料，现在才开始建立化学肥料工业。”

哈达问：

“中国是否有可能在西部开垦？是否能向西部移民？”

毛泽东说：

“西部还可以开垦，但可耕地很少，要开垦投资很大。我们西部地方大，但不容易长粮食。**在中国，60%的土地只住了6%的人口，40%的土地却住了94%的人口。我们的方针，首先是增产，开垦、移民放在第二位。”**

哈达问：

“中国过去纪律差，现在纪律良好。你们的纪律是如何培养的？”

毛泽东说：

“我们的纪律不能算好，只是比较以前好一些。纪律好基本上是依靠群众的觉悟和认识，还要靠组织，如通过合作社把农民组织起来。现在我们正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经过教育，工厂里的纪律提高了，出勤率也提高了。”

哈达问：

“中国建设着重在哪一方面？”

周恩来说：

“第1个‘五年计划’着重重工业。第一是钢铁；第二是动力工业，如电力、石油、煤等；第三是交通事业；第四是机器工业，要自己能够装备工厂。第1个‘五年计划’因为有抗美援朝战争，所以建设了一些国防工业。在第1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对化学工业注意不够。我们是农业国，应发展肥料工业，也要发展人造纤维。还有一些大型的和精密的机器我们不能制造，无线电工业也比较落后。所以，第2个‘五年计划’的方针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工农业并举。工农业并举很重要，如果农业减产，粮食和原料供应不上，发展工业也困难。”

9月25日，毛泽东阅9月22日上海《新民报》晚刊登载的题为《摆事实，讲道理，比过去，看现在——工商界舌战右派高方》的报道，他批示道：

“乔木、冷西同志：批评高方，写得很好，请转载在《人民日报》上。毛泽东”

9月下旬，毛泽东让工作人员给老朋友周谷城寄去了《教学与研究》等几本刊物。周谷城翻开一看，凡是引用了他的意见的文章，毛泽东不但都替他折了角，还做上了记号。周谷城捧着杂志，自言自语地说：“有毛主席支持我，我不怕。”

9月29日晚7时半，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由主席斯坦鲍利奇率领的南斯拉夫国民议会代表团，彭真等在座。毛泽东说：

“**像我们这样的国家，粮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吃饭和穿衣是大问题。**人多，吃得多，穿得多，生活水平不高。在这方面有进步，需要时间。革命成功是一个好条件，但还要有一个条件，这就是技术革命。我们还是农业国，工业化要很长时间，要半个世纪。要吃饭，要穿衣，工业缺乏积累，不解决这些问题，不可能迅速发展工业。建钢铁厂，我们的同志很喜欢大的，现在已经转过来了。大的要一些，小的也得要。总起来说，应作长期打算。要有几十年的努力才能作出这些成绩来。当然，更需要和平环境，打仗就不好办事。**我们需要有朋友。不仅社会主义国家要团结，而且要团结世界上一切可能团结的国家。”**

是日晚9时，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由主席费林格率领的捷克斯洛伐克国民议会代表团和市长斯沃波达率领的布拉格市中央人民委员会代表团，彭真等在座。毛泽东说：

**“我们的政治革命、经济基础的革命已经花了几十年，技术革命恐怕也得几十年，才能达到你们的水平。我们的外交政策原则是：首先是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团结；第二是和亚、非、拉丁美洲及北欧的一部分国家建立关系；第三是对西方主要国家，现在主要是和他们斗争，不忙于建交。**所以这和杜勒斯的方针相同，他们怕我们去闹事，不同我们建交。”

9月30日，毛泽东致信邓小平说：

“办公厅印发的《全会各小组活动情况》，只发给‘各组长’，使多数人不知道别组的意见。似宜发给到会的一切同志。第一星期的，应重印补发。如你认为可行，请即办。”

是日晚8时半，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由阿里斯托夫率领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团，彭真等在座。阿里斯托夫说，准备盛大欢迎毛泽东访问苏联。毛泽东说：

“就是不想让你们这般欢迎。我本想在辞去共和国主席职务之后再出国访问。党中央主席、共和国主席有些繁重，身体吃不消。我不能承受这种欢迎，希望迎接搞小一点。”

他还说：

“我们的政策不同于苏联当年对资产阶级采取的政策。**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时期有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产阶级的一面，在经济上、文化上我们现在也离不开他们。经济上同他们进行合作，文化上离开他们我们就没有这些人。**这一次，**我们提出反对教条主义也反对修正主义。有了右派，就不得不使我们把反对修正主义作为斗争的中心。**党确实有错误有缺点。没有群众参加，是不能克服错误和缺点的。不能简单化、公式化，采取教条主义方式去克服缺点。**你们能否帮忙使中国少生人口？不打仗，又讲卫生，人口不断增多起来。这件事人不能控制它，是无政府主义。要搞一个计划生育。”**

是日晚10时45分，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由部长会议主席于哥夫率领的保加利亚政府代表团，周恩来、邓小平等在座。毛泽东说：

“事情都有好的一面、成功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失败的一面。所以我们需要分析。一万年以后也还是这个样子。我们中国有很多落后的东西、黑暗的东西，有很多错误，但这些都是可以克服的。这一年当中我们变化很大，这主要是讲在政治方面。最近我们在整风，以克服党的错误和缺点，让人们批评我们的错误和缺点，同时在反右派。我们过去会打仗，搞阶级斗争，但不会搞工业、搞农业，不会当大学教授，不会当工程师，所以我们要利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再有10年、15年，我们就可以造就出大批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同时还要把大多数旧知识分子化为新知识分子。脑子也是一种物质，但是它转变起来比钢铁还要难，思想改造是更困难的。**经过这次辩论，方向比较清楚了。”

1957年10月1日，首都各界群众50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国庆庆典，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8周年。

上午10时，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及党和国家的其他领导人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检阅了盛大的阅兵式和群众游行方队。

参加受阅的部队共有29个方队，各种坦克车辆226台，飞机81架。阅兵历时50分钟。我国自行生产的伊尔—28型喷气式轰炸机、歼5型歼击机首次参加国庆阅兵。

应邀来我国访问的匈牙利、保加利亚、印度尼西亚、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缅甸等50多个国家的外宾、各国驻华使节和外交官员，以及在华外国专家等也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观看了阅兵式。

晚上，毛泽东和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在天安门城楼会见外宾，观看焰火，和广场的群众联欢。

10月2日，毛泽东给林克写了一封信：

林克：

多日不见，有些寂寞吧？钻到看书看报看刊物中去，广收博览，于你我都有益。略为偏重一点理论文章，逐步培养这一方面的兴趣，是我的希望，年纪大起来了，是下苦功学习的时候了，但以不损害健康为原则。请你找一部《六朝文絜》及其他六朝人各种文集给我为盼！

毛泽东 10月2日

10月2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由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斯多夫率领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军事代表团，彭德怀、李达、萧向荣等在座。毛泽东说：

“**我们的国家，在政治、经济方面的革命都没有完成**。经济上要建立社会主义基础，没有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就只是空名。我国已过了8年，往后至少还得10至15年，才能为社会主义打下基础。**现在90%的人拥护社会主义，10%的人反对社会主义，其中坚决反对社会主义的人只有2%，但这也有1200万人。他们想搞资本主义复辟，**高兴匈牙利事件，我们正在批评他们，进行思想教育。这便是整风和反右派，划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限。**在目前，谁战胜谁的问题尚未最后解决，但我们有信心，在中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苏联经过17年，从1917年到1934年，解决了谁战胜谁的问题。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这些国家都要很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认为已经胜利了，其实还没有最后胜利。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两边都怕战争。究竟是哪边怕得更多呢？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我看帝国主义也怕战争。社会主义国家的军事家应同时是政治家，军队是阶级斗争的工具。”

欲知毛泽东此后的重要活动，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会见斯多夫率领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军事代表团时说：“**我们的国家，在政治、经济方面的革命都没有完成**。经济上要建立社会主义基础，没有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就只是空名。”“**现在90%的人拥护社会主义，10%的人反对社会主义，其中坚决反对社会主义的人只有2%，但这也有1200万人。他们想搞资本主义复辟。”**斯言极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都不会过时！

**第40章**

**“今年这一年，群众创造了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就是**

**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我们找到了这个形式，适合现在这**

**个群众斗争的内容，适合现在阶级斗争的内容，适合正确处理人民**

**内部矛盾的问题。抓住了这个形式，今后的事情就好办得多了。大**

**是大非也好，小是小非也好，革命的问题也好，建设的问题也好，**

**都可以用这个鸣放辩论的形式去解决，而且会解决得比较快。”**

话说1957年10月3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由国防部部长斯彼哈尔斯基率领的波兰军事代表团，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在座。毛泽东说：

“斯大林在后期犯了一些错误，那是局部的、暂时的现象。应把局部的、暂时的现象与整体的、长远的现象区别开。错误和缺点，当然会引起不愉快。不愉快的事我们也遇到过。但十月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打垮法西斯、帮助全世界无产阶级等是主要的，从这方面看，就可以想得通了。尽管苏联有缺点，它是反对帝国主义、保卫和平的主要力量。**我们也有机械搬用苏联经验的问题并曾受到损失。我们不把此事归罪于第三国际和斯大林，我们把此事看作应由自己负的责任。**第三国际后期的那种生硬作风是错误的，但谁叫你中国人听呢？我劝波兰同志也自己负起责任来。我们在1942年进行整风批评了教条主义以后，一方面反对硬搬，另一方面强调学习。近15年来我们得了很大好处。在此期间硬搬的情况也还有，但只是局部的，已没有大危险了。苏联的经验有两种，正确的和错误的，正确的是主要的、大量的，错误的是局部的、暂时的。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错误经验，也可以教育我们。那些错误已经犯过了，只仇恨是不行的，应该以科学的态度客观地对待错误，取得经验。波兰同志们可能气还未完全消，我劝同志们让过去的问题慢慢过去，气慢慢消下来，把错误当成教训，自己担起担子来。要解决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需要时间。**资产阶级是我国文化最高的阶级，他们在社会上还造成了一种习惯，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影响很深。但是，我们不能不要他们，否则就没有教授、工程师、科学家、艺术家，所以对他们是改造的问题。**我们认为，大部分知识分子、富裕中农、地主、资本家是可以改造的。我们相信社会主义一定胜利，这是不可动摇的，但可能性和现实性这是两个问题。我们需要争取和平时间，如果20年内无战争，事情就好办了。中国是在一片落后的基地上开辟了道路，落后的尚未扫清，基本道路已开辟了。我们的经济计划搞得是否对，还要10年到15年后才能断定。”

10月7日下午1时半，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各组组长会议。他在讲话中说：

“我们有两次革命。一次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集中打倒国民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和个体经济采取保护的方针，财产不动，**只是在党内反资本主义思想**。第二次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在理论上是没有问题的。1953年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到现在4年半，基本上改变了私有制。反映到‘八大’文件上是肯定基本上解决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现在看，这也没有错。基本上解决，并不是说完全解决。所有制解决了，政治上、思想上还没有解决。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富裕中农中有一部分人不服。**‘八大’没有完全看清楚。那时对阶级斗争强调得不够，因为他们表现服服帖帖。现在他们又造反，所以又要强调，青岛会议文件是一个补充。过渡时期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阶级斗争，10年、15年以后还会有。**只要世界上还有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活动，不但总是带着阶级斗争的性质，而且总是同国际上的反动派互相呼应的**。现在按青岛会议的文件去讲，但不要登报，不要广播。**我们确有三个主义，现在大讲阶级矛盾是主要的，就容易把党内的三个主义都挂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的账上。实际上不完全都是这个矛盾，还有领导与被领导、这一部分与那一部分、老工人与新工人、群众与官僚主义的矛盾。**否则，只把主要矛盾集中到资产阶级与富裕中农身上，容易放松了对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阶级矛盾与敌我矛盾有区别。资产阶级同我们的矛盾，有对抗性的和非对抗性的两面。一般说来，资产阶级、富裕农民同我们的矛盾仍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是非对抗性的，但处理得不好也会转化成敌我矛盾。阶级矛盾，重要的是在同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及他们的知识分子这3部分人民之间，有的不对抗，有的对抗。**人民内部矛盾包括着阶级矛盾（因为资产阶级还有选举权）。敌我矛盾是阶级矛盾，但阶级矛盾不一定就是敌我矛盾。阶级矛盾内有敌我矛盾，但不是主要的，大部分是人民内部矛盾**。总起来讲，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八大’文件上只讲所有制、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关系，没有讲人与人的关系。‘八大’反映那时的情况，现在反映现在的情况。‘**八大’决议说，目前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将来还会有，因此这句话从长远讲也对，但现在看则不适当。现在我们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基本上还是适合的，现在我们经过价值法则来管理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是比较好的。**但也有不完善的地方，如三个主义。为什么说现在的社会主义制度基本适合？如搞水利，不搞不能增产，但没有合作社，搞水利是搞不起来的。如搞工业，那么多项重点建设，没有社会主义制度不行。印度第1个‘五年计划’只发展了几十万吨钢，证明我们的社会制度是优越的。所以说，我们的社会制度基本上是适合的，但不是完全适合，与斯大林的提法不一样。**‘八大’决议的那句话是不适当的，但也没有坏处，它不妨碍生产，不妨碍反右派等**。同时它也反映了一个要求，要求加强物质基础（和外国比较，我们是很落后），那句话并非专门从矛盾这个范畴来讲的。既没有害处，现在就不必去改它，否则引起麻烦和争论，将来再作适当的解释。”

10月9日，是中共中央扩大的八届三中全会的最后一天。会议通过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有关工人、职员的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的规定（草案）》。

这天下午3时，毛泽东在闭幕式上作了重要讲话。他的讲话提纲是这样写的：

这次会议的评价：明确方针，交流经验，统一意志。

我们的革命如此丰富，工作进展异常迅速。不论革命工作、建设工作都是如此。

最好每年开一次这样的会议。

整风：大胆地放，彻底地放，坚决地放。大胆地改，彻底地改，坚决地改。

1957年中国革命创造了**一个最革命最生动最民主的群众斗争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和大字报。**革命的内容找到了适合自己发展的形式。从此无论大是大非、小是小非的问题，无论是革命的问题、建设的问题，都可以用辩论的形式去迅速地解决。发挥群众的主动性、责任心，克服领导者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领导与群众就容易打成一片了。**从此形成传统，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民主，在此基础上建立巩固的集中制，建立巩固的对反动派和坏人的专政。**

农业：四十条大约几天之后，即可改好发出，请你们在农村中组织一次很好的鸣放辩论，发扬正气，驳倒歪风。

省、地、县、区、乡、社都要搞农业规划。“全面规划，加强领导，书记动手，全党办社”。

整风生产两不误。又要领导整风，又要领导生产，生产就要有规划。

何时可以做好一个长远规划？已有几年经验了，今冬明春是否可以做好？明年五一以前做好？或者明年做好？只有10年了，要完成“四、五、八”。

6级规划都要在农村中鸣放辩论，是否要分期分批，不然恐农民吃不消。

粮食有了底了，以后将好办得多，准备对付大荒年。

国家积累外，合作社积累和家庭积累，均很重要。湖南办法：总产值（30亿元）扣20％为生产费（6亿元），其中以20％为基建费（1.2亿元），按照社章抽5％的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在外。管理费必须缩小到1％。

积累丰歉不同，以丰补歉。

全国每个人都要有大志，远大理想目标。

**要将大吃大喝、不善持家的风气转变过来，经过大鸣大辩的方法。**

**红白喜事中的陋习和浪费，也要经过鸣辩逐步解决，10年改革完毕，是否可能？**

振起精神，一定要灭掉4害，乐昌县岐乐社的经验立即推广到全国。两年试点，5年突击，3年扫尾，全国基本上变成4无国。

**人口问题：3年试点，3年推广，4年普及，达到计划生育，是否可能？**

工农商学的综合计划，完全必要，浙江文件，值得一阅。

红安县的经验值得注意，各级领导办试验田。我们不但政治要摸底，技术必须摸底，业务必须摸底。

也是10年计划，10年内必须精通工业、农业各种技术业务，将自己和许多人都交得“又红又专”，基本上完成建立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的伟大任务。对此，各级均要有计划。**“十年树人”极为必要，非此不能建立社会主义。加上过去8年，18年树人，估计可以基本造成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的专家队伍。**往后是扩大加深，再有10年，到第5个“五年计划”，形势就更不同了，争取以28年基本上达到苏联40年的水平，是否可能？

在以重工业为中心任务的条件下，实行工业与农业同时并举，逐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与现代化的农业。

两种方法：都可达到目的，一种慢一点、差一点，一种快一点、好一点。

实事求是的合乎实际的多快好省，反对主观主义的所谓多快好省。

党委还是促进委员会，不是促退委员会。有些暂时地局部地促退正是为了促进。

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主要矛盾。

千方百计，想尽一切办法。

厉家寨（被毛泽东称为“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一个典型——笔者注），每一社。

省、县、地的规划。

每年开1次3级干部会。

黄敬、彭真（只改一个字）、韶关三发言。

军队要整风。

**将来农业粮食生产要亩产800斤，1000斤，2000斤。21世纪初。**

苏联、东欧、中国，主要矛盾。

振作精神，下苦功学习，10年学会马列、技术科学、哲学、文学、艺术学、新闻学、教育学。**打纸牌、下棋、看电影、跳舞也要一点，但不可着迷，把主要精力放在工作、学习二件上，玩是需要的，但是第三位。**人的脑力能够有很大的发展。萧楚女、齐白石、高尔基、玄奘、惠能、梁鸿、富兰克林为例。

毛泽东这个讲话全文后来被收录在《毛泽东选集》第5卷中，题目是《做革命的促进派》，摘要如下：

“这次会议开得很好。这样扩大的中央全会，有省委和地委的同志参加，实际是3级干部会，对于明确方针，交流经验，统一意志，有好处。

这样的会，恐怕是有必要一年开一次。因为我们这么一个大国，工作复杂得很。去年这一年没有开，就吃亏，来了一个右倾。前年来了一个高涨，去年就来了一个松劲。当然，去年开‘八大’了，也没有时间。再开这样的会议，可以掺少数县委书记和一些大城市的若干区委书记，比如再加百把人是可以的。我建议各省也开一次全省性的3级或者4级干部会议，掺一部分合作社的干部，把问题扯清楚。”

“**讲一讲整风。要大胆地放，彻底地放，坚决地放；要大胆地改，彻底地改，坚决地改。我们要有这样的决心。**那么，还要不要加一个反右派，大大的反？可以不加。因为反右派是上了轨道的，有些地方已经结束了。现在的重点是基层的放，基层的改，就是县、区、乡3级的鸣放和整改。中央和省市一级，有些部门放还是要放，但重心是改的问题。

今年这一年，**群众创造了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现在我们革命的内容找到了它的很适合的形式。这种形式，在过去是不能出现的。因为过去是打仗，五大运动，三大改造，这样从容辩论的形式不能产生。那个时候，从容辩论，摆事实，讲道理，搞它一年，不许可。现在许可了。**我们找到了这个形式，适合现在这个群众斗争的内容，适合现在阶级斗争的内容，适合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抓住了这个形式，今后的事情好办得多了。大是大非也好，小是小非也好，革命的问题也好，建设的问题也好，都可以用这个鸣放辩论的形式去解决，而且会解决得比较快。左派不仅同中间派一道鸣放辩论，而且完全公开地同右派一道鸣放辩论，在农村里头同地主、富农一道鸣放辩论。公开登报，不怕出‘丑’，什么‘党天下’呀，什么‘共产党要让位’呀，‘下轿’呀。刚刚‘上轿’，右派要我们‘下轿’。这种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形式，最适合发挥群众的主动性，提高群众的责任心。**

我们党有民主的传统。没有民主的传统，不可能接受这样的大鸣大放，大争大辩，大字报。**延安整风的时候，写笔记，自己反省，互相帮助，七、八个人一个小组，搞了几个月。我接触的人都感谢那一次整风，说改变主观主义就是那一次开始。**土地改革的时候，有事同群众一道商量，打通思想。我们军队里头，连长给战士们盖被子，同战士很平等地友谊地谈话。延安整风，土地改革，军队里头的民主生活，还有‘三查三整’，后头的‘三反’‘五反’，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等，这中间都有丰富的民主形式。但是，**这样的大鸣、大放、大争、大辩，然后还要搞和风细雨，商量，启发，这种形式只有现在这个时候才能产生。找到了这种形式，对于我们的事业会有很大的好处，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所谓命令主义，就是打人骂人，强迫执行），领导干部同群众打成一片，就容易做到了。**

我们的民主传统今年是一个很大的发展，**以后要把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形式传下去。这种形式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民主。这种民主，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有，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有。**在这样的民主基础上，不是削弱集中，而是更加巩固了集中制，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因为无产阶级专政要靠广大的同盟军，单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不行。中国无产阶级数量少，只有一千多万人，它要靠几亿人口的贫农、下中农、城市贫民、贫苦的手工业者和革命知识分子，才能实行专政，不然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发动了他们的积极性，无产阶级专政就巩固起来了。”

“我看中国就是靠精耕细作吃饭。**将来，中国要变成世界第一个高产的国家**。有的县现在已经是亩产千斤了，半个世纪搞到亩产两千斤行不行呀？**将来是不是黄河以北亩产800斤，淮河以北亩产1000斤，淮河以南亩产2000斤？到21世纪初达到这个指标，还有几十年，也许不要那么多时间。”**

“中国人要有志气。我们应当教育全国城市、乡村的每一个人，要有远大的目标，有志气。大吃、大喝，统统吃光、喝光，算不算一种志气呢？这不算什么志气。要勤俭持家，作长远打算。**什么红白喜事，讨媳妇，死了人，大办其酒席，实在可以不必。应当在这些地方节省，不要浪费。这是改革旧习惯。把这个习惯改过来，要通过大鸣大放，也许是小鸣小放，争一番。还有赌博，这样的问题过去是没有法子禁止的，只有大鸣大放，经过辩论，才能改过来。我看，改革旧习惯也要列入规划。”**

**“计划生育，也来个10年规划。少数民族地区不要去推广，人少的地方也不要去推广。就是在人口多的地方，也要进行试点，逐步推广，逐步达到普遍计划生育。计划生育，要公开作教育，无非也是来个大鸣大放、大辩论。人类在生育上头完全是无政府状态，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将来要做到完全有计划的生育，没有一个社会力量，不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来做，那是不行的。”**

“我们要摸农业技术的底。搞农业不学技术不行了。政治和业务是对立统一的，政治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一定要反对不问政治的倾向；但是，专搞政治，不懂技术，不懂业务，也不行。我们的同志，无论搞工业的，搞农业的，搞商业的，搞文教的，都要学一点技术和业务。我看也要搞一个10年规划。**我们各行各业的干部都要努力精通技术和业务，使自己成为内行，又红又专。所谓先专后红就是先白后红，是错误的。因为那种人实在想白下去，后红不过是一句空话。现在，有些干部红也不红了，是富农思想了。有一些人是白的，比如党内的右派，政治上是白的，技术上又不专。有一些人是灰色的，还有一些人是桃红色的。真正大红，像我们的五星红旗那样的红，那是左派。但是单有红还不行，还要懂得业务，懂得技术。现在有许多干部就是一个红，就不专，不懂业务，不懂技术。右派说我们不能领导，‘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我们驳右派说，我们能领导。我们能者是政治上能。至于技术，我们有许多还不懂，但那个技术是可以学懂的。**

**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庞大的技术队伍和理论队伍，社会主义是不能建成的。**我们要在这10年内（科学规划也是12年，还有10年），建立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我们的党员和党外积极分子都要努力争取变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各级特别是省、地、县这3级要有培养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计划，不然，时间过去了，人还没有培养出来，中国有句古话：‘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百年树人，减少九十年，十年树人。十年树木是不对的，在南方要25年，在北方要更多的时间。十年树人倒是可以的。我们已经过了8年，加上10年，是18年，估计可能基本上造成工人阶级的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专家队伍。10年以后就扩大这个队伍，提高这个队伍。”

**“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于好、省，也附带扫掉了。好、省我看没有哪个人反对，就是一个多、一个快，人家不喜欢，有些同志叫‘冒’了。本来，好、省是限制多、快的。好者，就是质量好；省者，就是少用钱；多者，就是多办事；快者，也是多办事。这个口号本身就限制了它自己，因为有好、省，既要质量好，又要少用钱，那个不切实际的多，不切实际的快，就不可能了。**我高兴的就是在这个会议上有个把同志讲到这个问题。还有，在报纸上我也看见那么一篇文章，提到这个问题。我们讲的是实事求是的合乎实际的多、快、好、省，不是主观主义的多、快、好、省。我们总是要尽可能争取多一点，争取快一点，只是反对主观主义的所谓多、快。去年下半年一股风，把这个口号扫掉了，我还想恢复。”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们现在的任务跟过去不同了。过去主要是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那个任务已经完结了。那么，现在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锋芒是对着资产阶级，同时变更小生产制度即实现合作化，主要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概括地说，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八大’的决议没有提这个问题。‘八大’决议上有那么一段，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种提法是不对的。我们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全国胜利以后，国内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国外是中国和帝国主义的矛盾。后头没有公开提，但是事实上在那里做了，革命已经转到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干的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这件事。三大改造是社会主义革命，主要是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已基本完成。这是尖锐的阶级斗争。

去年下半年，阶级斗争有过缓和，那是有意识地要缓和一下。但是，你一缓和，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主、富农以及一部分富裕中农，就向我们进攻，这是今年的事。我们缓和一下，他进攻，那也好，我们取得主动。正像人民日报一篇社论说的，‘树欲静而风不止’。他要吹风嘛！他要吹几级台风。那么好，我们就搞‘防护林带’。这就是反右派，就是整风。

整风有两个任务：一个任务是反右派，包括反资产阶级思想，一个任务是整改，整改里头也包含两条路线斗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我们党内存在这3个东西，这个账要挂在资产阶级身上。一两百年以后，还可不可以挂呢？那个时候恐怕不好挂了。那个时候有没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还是有的，那就挂在落后账上。**社会上总有左、中、右，总有先进的、中间的、落后的。**那时你犯了官僚主义、主观主义，那你就是落后。”

10月13日上午，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13次会议，并在会议上发表了长篇讲话，后来以《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摘要如下：

“**现在整风找出了一种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是群众创造的一种新形式，跟我们党历史上采取过的形式是有区别的。**延安那一次整风，也出了一点大字报，但是那个时候我们没有提倡。后来‘三查三整’，也没有采取这种形式。在革命战争时期，没有人给我们发饷，没有制造枪炮的工厂，我们的党和军队就是依靠战士，依靠当地人民，依靠群众。所以，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民主作风。但是，那个时候，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是什么理由？就是那个时候金鼓齐鸣，在打仗，阶级斗争那么尖锐，如果内部这么大闹，那就不好了。现在不同了，战争结束了，全国除台湾省外都解放了。所以，就出现了这种新形式。新的革命内容，它要找到新的形式。现在的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它找到了这种新形式。这种形式，可以很快普及，很快学会，几个月就可以学会。

**对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主要有两怕：一个是怕乱。你们怕不怕乱？我看有许多人是怕乱的。还有一个是怕下不得台。**当工厂厂长的，当合作社主任的，当学校校长的，当党委书记的，怕一放出来，火一烧，怎么下台呀？”**“为什么可以不怕？为什么放有利？大鸣大放有利，还是小鸣小放有利？或者不鸣不放有利？不鸣不放是不利的，小鸣小放不能解决问题，还是要大鸣大放。大鸣大放，一不会乱，二不会下不得台**。当然，个别的人除外，比如丁玲，她就下不得台。还有冯雪峰，他在那里放火，目的是要烧共产党，就下不得台。那是少数人，是右派。其他的人就不要怕下不得台，可以下台的。无非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之类的毛病，有则改之，不应当怕。基础就是要相信群众的大多数，相信人民中间的大多数是好人。**工人的大多数是好人，农民的大多数是好人。共产党里，青年团里，大多数是好人。他们不是想要把我们国家搞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本家、民主党派成员的多数，是可以改造的。所以我们不要怕乱，不会乱，乱不了**。应当相信多数，这里所谓多数，是不是51%呢？不是的，是90%到98%。”

“现在是过社会主义的关，有些人就难过。比如，湖北有那么一个雇农出身的党员，他家是三代要饭，解放后翻身了，发家了，当了区一级干部。这回他非常不满意社会主义，非常不赞成合作化，要搞‘自由’，反对统购统销。现在开了他的展览会，进行阶级教育，他痛哭流涕，表示愿意改正错误。为什么社会主义这个关难过呢？因为这一关是**要破资本主义所有制，使它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要破个体所有制，使它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当然，这个斗争要搞很多年的，究竟多长时间叫过渡时期，现在也还很难定。今年是斗争的一个洪峰。以后是不是年年要来一个洪峰？像每年黄河的洪峰要来一样，我看恐怕不是那样。但是，这样的洪峰，以后也还会有的。

现在，**全国究竟有多少人不赞成社会主义？我和许多地方同志摸了这个底。在全国总人口中间，大概有10%的人，是不赞成或者反对社会主义的。这里包括地主阶级，富农，一部分富裕中农，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部分城市上层小资产阶级，甚至个别的工人、贫下中农。6亿人口的10%是多少呢？是6000万人。这个数目不小，不要把它看小了。**

我们说要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有两个出发点：第一，我们有90%的人赞成社会主义。这里包括无产阶级，农村里头半无产阶级的贫农，下中农，还有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多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多数，以及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第二，**在不赞成或者反对社会主义的人里边，最顽固的分子，包括极右派，反革命，搞破坏的，还有不搞破坏但很顽固的，可能要带着顽固头脑到棺材里面去的，这样的人有多少呢？大概只有2%左右。全国人口的2%是多少呢？就是1200万。1200万人，如果集合起来，手里拿了枪，那是个很大的军队。但是，为什么天下又不会大乱呢？因为他们是分散在这个合作社，那个合作社；这个农村，那个农村；这个工厂，那个工厂；这个学校，那个学校；这个共产党支部，那个共产党支部；这个青年团支部，那个青年团支部；这个民主党派的支部，那个民主党派的支部；是分散在各处，不能集合，所以天下不会大乱。**”

“**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他们里头的右派和中间派，对于共产党、无产阶级的领导是不服气的。讲拥护共产党，拥护宪法，那也是拥护的，手也是举的，但是心里是不那么服气的。这里头就要分别了，右派是对抗的，中间派是半服半不服的。**不是有人讲共产党这样也不能领导，那样也不能领导吗？不仅右派有这个思想，中间派有些人也有。总而言之，**照他们的说法，差不多就完了，共产党非搬到外国不可，无产阶级非上别的星球不可。因为你这样也不行，那样也不行嘛！无论讲那一行，右派都说你不行。**这一次辩论的主要目的，就是争取半服半不服的中间派，使他们懂得这个社会发展规律究竟是一件什么事，还是要听文化不高的无产阶级的话，在农村里头要听贫农、下中农的话。讲文化，无产阶级、贫农、下中农不如他们，但是讲革命，就是无产阶级、贫农、下中农行。这可不可以说服多数人？可以说服多数人。资产阶级的多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多数，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多数，是可以说服的。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员、艺术家、文学家、科学家、工程师中的多数，是可以说服的。不大服气的，过若干年，慢慢就会服气了。

在多数人拥护社会主义这个基础上，在现在这个时候，出现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形式，很有益处。这种形式是没有阶级性的。什么大鸣、大放、大字报，右派也可以搞。感谢右派，‘大’字是他们发明的。我在今年2月27日的讲话中， 并没有讲什么大鸣， 大放，大辩论，没有这个‘大’字。去年5月，我们在这里开会讲百花齐放，那是一个‘放’，百家争鸣，那是一个‘鸣’，就没有这个‘大’字，并且是限于文学艺术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后来右派要涉及政治，就是什么问题都要鸣放，叫作鸣放时期，而且要搞大鸣大放。可见，这个口号无产阶级可以用，资产阶级也可以用，左派可以用，中间派可以用，右派也可以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究竟对哪个阶级有利？归根结底，对无产阶级有利，对资产阶级右派不利。原因是，90%的人不愿意国家乱，而愿意建成社会主义，10%不赞成或者反对社会主义的人中间，有许多人是动摇的，至于坚决反社会主义的分子，只有2%。你乱得了呀？所以，大鸣大放的口号，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方式和方法，归根结底有利于多数人，有利于多数人的自我改造。两条道路，一条社会主义，一条资本主义，归根结底有利于社会主义。

我们不要怕乱，也不要怕下不得台。右派是下不了台的，但也还是可以下台。按照辩证法，我看右派会一分为二。**可能有相当多的右派分子，大势所趋，他们想通了，转好了，比较老实，比较不十分顽固了，那个时候把帽子一摘，就不要叫右派了，并且还要安排工作。少数极顽固的，可能死不改悔，戴着右派帽子进棺材，那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这样的人总是会有的。**

右派这么闹一下，使我们摸了一个底：一方面，赞成社会主义的，是90%，可能争取到98%；另一方面，不赞成或者反对社会主义的，是10%，其中坚决反社会主义的死硬派只有2%。摸了这样的底，就心中有数了。**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在多数人拥护社会主义的基础上，用我们这个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办法，可以避免匈牙利那样的事件，也可以避免现在波兰发生的那样的事件。**我们不需要象波兰那样封一个刊物，我们只要党报发一两篇社论就行了。对文汇报，我们写了两篇社论批评它，头一篇不彻底，没有讲透问题，再发第二篇社论，它就自己改。新民报也是它自己改。在波兰就不行，他们那里反革命的问题没有解决，右派的问题没有解决，走哪条道路的问题没有解决，又不抓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所以封一个刊物就惹起事来了。我看中国的事情好办，我是从来不悲观的。我不是说过，乱不了，不怕乱吗？乱子可以变成好事。凡是放得彻底的地方，鬼叫一个时候，大乱一阵，事情就更好办了。”

“资产阶级要灭掉。不是讲把人灭掉，是把这个阶级灭掉，人要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改造，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要改造，可以逐步地改造过来，改造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我讲过，‘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知识分子如果不附在无产阶级身上，就有作‘梁上君子’的危险。现在许多人进了工会，有人说进了工会岂不就变成工人阶级了吗？不。**有的人进了共产党，他还反共，**丁玲、冯雪峰不就是共产党员反共吗？进了工会不等于就是工人阶级，还要有一个改造过程。”

“一个工厂，大字报一贴，几千张，那个工厂领导人也是很难受的。有那么10天左右的时间，有些人就不干了，想辞职，说是受不了，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北京那些大学的党委书记就吃不下饭，睡不着觉。那时候右派他们说，你们不能驳，只能他们鸣放。我们也讲，要让他们放，不要驳。所以，5月我们不驳，6月8日以前，我们一概不驳，这样就充分鸣放出来了。鸣放出来的东西，大概90%以上是正确的，有百分之几是右派言论。在那个时候，就是要硬着头皮听，听了再反击。”

“**世界上有些事就是那么怪，3年不整风，共产党、青年团、民主党派、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员、新闻记者、工程师、科学家里头，又要出许多怪议论，资本主义思想又要抬头。比如房子每天要打扫，脸每天要洗一样，整风我看以后大体上一年搞一次，一次个把月就行了。”**

“**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承认有改造的必要。右派就不承认自己有改造的必要，而且影响其他一些人也不大愿意改造，说自己已经改造好了。章乃器说，改造那怎么得了，那叫作抽筋剥皮。我们说要脱胎换骨，他说脱胎换骨就会抽筋剥皮。这位先生，谁人去抽他的筋，剥他的皮？**许多人忘记了我们的目的是干什么，为什么要这么搞，社会主义有什么好处。为什么要思想改造？就是为了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建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那些老知识分子会要逼得非变不可，因为新知识分子起来了。讲学问，你说他现在不行，他将来是会行的。这批新的人出来了，就对老科学家、老工程师、老教授、老教员将了一军，逼得他们非前进不可。我们估计，大多数人是能够前进的，一部分是能够改造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

无产阶级必须造就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这跟资产阶级要造就它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一样。一个阶级的政权，没有自己的知识分子那是不行的。美国没有那样一些知识分子，它资产阶级专政怎么能行？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一定要造就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包括从旧社会来的经过改造真正站稳工人阶级立场的一切知识分子。**右派中间那些不愿意变的，大概章乃器算一个。你要他变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他就不干，他说他早已变好了，是‘红色资产阶级’。自报公议嘛，你自报可以，大家还要公议。我们说，你还不行，你章乃器是白色资产阶级。**有人说，要先专后红。所谓先专后红，就是先白后红。他在这个时候不红，要到将来再红，这个时候不红，他是什么颜色呀？还不是白色的。知识分子要同时是红的，又是专的。要红，就要下一个决心，彻底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这并不是要读很多书，而是要真正弄懂什么叫无产阶级，什么叫无产阶级专政，为什么只有无产阶级有前途，其他阶级都是过渡的阶级，为什么我们这个国家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为什么一定要共产党领导等等问题。”

“反击右派总要告一个段落嘛！这一点，有的右派估计到了。他说，这个风潮总要过去就是了。很正确呀，你不能老反右派，天天反，年年反。比如，现在北京这个反右派的空气，就比较不那么浓厚了，因为反得差不多了，不过还没有完结，不要松劲。**现在有些右派死不投降，象罗隆基、章乃器就是死不投降。我看还要说服他，说几次，他硬是不服，你还能天天同他开会呀？一部分死硬派，他永远不肯改，那也就算了。他们人数很少，摆到那里，摆他几十年，听他怎么办。多数人总是要向前进的。**

**是不是要把右派分子丢到海里头去呢？我们一个也不丢。右派，因为他们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所以是一种敌对的力量。但是，现在我们不把他们当作地主、反革命分子那么对待，其基本标志，就是不取消他们的选举权。**也许有个别的人，要取消他的选举权，让他劳动改造。我们采取不提人，又不剥夺选举权的办法，给他们一个转弯的余地，以利于分化他们。不是刚才讲分两种人吗？一种是改正了以后，可以把右派分子帽子摘掉，归到人民的队伍；一种就是顽固到底，一直到见阎王。他说，我是不投降的，阎王老爷你看我多么有‘骨气’呀！他是资产阶级的忠臣。右派跟封建残余、反革命是有联系的，通气的，彼此呼应的。那个文汇报，地主看了非常高兴，他就买来对农民读，吓唬农民说，你看报纸上载了的呀！他想倒算。还有帝国主义、蒋介石跟右派也是通气的。比如台湾、香港的反动派，对储安平的‘党天下’，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是很拥护的。美帝国主义也很同情右派。我曾经跟各位讲过，假如美国人打到北京，你们怎么样？采取什么态度？准备怎么做？是跟美国一起组织维持会？还是跟我们上山？我说，我的主意是上山，第一步到张家口，第二步就到延安。说这个话是极而言之，把问题讲透，不怕乱。你美国占领半个中国我也不怕。日本不是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吗？后来我们不是打出一个新中国来了吗？我跟日本人谈过，要感谢日本帝国主义，他们这个侵略对于我们很有好处，激发了我们全民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提高了我国人民的觉悟。

右派不讲老实话，他不老实，瞒着我们干坏事。谁晓得章伯钧搞了那么多坏事？我看这种人是官越做得高，反就越造得大。**章罗同盟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个口号最喜欢了。他们利用这两个口号反对我们。**我们说要长期共存，他们搞短期共存；我们说要互相监督，他们不接受监督。一个时期他们疯狂得很，结果走到反面，长期共存变成短期共存。**章伯钧的部长怎么样呀？部长恐怕当不成了。右派当部长，人民恐怕不赞成吧！还有一些著名的右派，原来是人民代表，现在怎么办？恐怕难安排了。比如丁玲，就不能当人民代表了。有些人，一点职务不安排，一点工作不给做，恐怕也不好。比如钱伟长，恐怕教授还可以当，副校长就当不成了。**还有一些人，教授恐怕暂时也不能当，学生不听。那么干什么事呢？可以在学校里头分配一点别的工作，让他有所改造，过几年再教书。这些问题都要考虑，是一个麻烦的问题。革命这个事情就是一个麻烦的事情。对右派如何处理，如何安排，这个问题请诸位去议一下。”

“我们预计，经过3个‘五年计划’，钢的年产量可以搞到2000万吨。今年是520万吨，再有10年大概就可以达到这个目标了。印度1952年钢产量是160万吨，现在是170几万吨，它搞了5年只增加十几万吨。我们呢？1949年只有19万吨，3年恢复时期搞到100多万吨，又搞了5年，达到520万吨，5年就增加300多万吨。再搞5年，就可以超过1000万吨，或者稍微多一点，达到1150万吨。然后，搞第3个‘五年计划’，是不是可以达到2000万吨呢？是可能的。”

这天下午，毛泽东乘专机从北京到达杭州。

原来在前些时候，苏共中央提议利用各国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庆祝活动的机会，召开一次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毛泽东来杭州就是为下个月访问苏联做准备工作的。

欲知毛泽东后来访苏情况如何？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1957年10月9日在中共八届扩大的三中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做革命的促进派》和10月13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3次会议上的讲话《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是两篇非常重要的历史文献。凡是对那个时期开展党内整风运动和反右斗争不理解或不明白的人，都应该好好读一读。只有了解了历史真相，才能够看清楚在这两个问题上向毛泽东泼污水的人是多么的荒唐！

**第41章**

**“建立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曾经是世界上劳动人民和进步**

**人类千百年来的梦想。十月革命破天荒地第一次在世界上五分之**

**一的土地上，把这个梦想变成了现实。”**

话说195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全文如下：

上海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各党组，中直党委，国家机关党委，总政治部（此件可发至县委和相当于县级的党组织）：

自反右派斗争开始以来，不少地方和部门分别拟定了一些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并要求中央予以审查批准。考虑到斗争中的实际需要，中央认为有必要制定一个统一的标准，以免各单位在划分右派分子的时候有轻有重的地方。现在将经过中央讨论通过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发给你们，请即下达到一切进行反右派斗争的单位，予以认真研究，在划分右派分子的时候即以此件为标准。同时望注意：

一、全国反右派斗争一般是进行得健康的，所划的右派分子，一般是适当的，但是也有划多了和划少了的情况。而在运动进到深入阶段，在切实纠正了温情主义右倾情绪以后，一些单位把右派的标准放得宽了一些，以至多划了一部分右派的情况，比较更需要引起注意。无论划多了或者划少了，都应该按照正确的标准及时地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但是在右派划得多了需要改正的单位，必须注意保护群众和积极分子的热情和正义感，不要使人产生“反右派斗争过火了”的错误印象。有些中右分子有过不利于社会主义的言行，但是不够右派，如果当作右派斗争了，现在不要当众宣布对他的批判是错了，因为既有错误言行就应该批判。但是应在内部改划为中右分子，按照中右分子对待，并注意多加教育争取，到适当时机可以宣布因情节轻微已有悔改，脱掉他们的右派帽子。

二、为了正确地划分右派分子，达到既不多划又不少划的目的，除了要有适当的标准，还要有适当的审查批准手续。凡是各单位确定为右派分子的名单，必须报告县一级或县一级以上的党的领导机关审查批准。高级知识分子、重要民主人士中的右派分子和其他有特殊情况的右派分子的名单，必须报告省一级或省一级以上的党的领导机关审查批准。

三、上级领导机关除必须认真地审查所属单位上报的右派分子的名单外，还必须教育党员和群众十分重视对于实际情况的认真研究和具体分析，力戒浮夸和片面性。同时，还必须经常主动地细心地抽查和调阅所属单位右派分子的详细材料，及时纠正其中偏宽偏严的错误，并且对于极右分子、一般右派分子和中右分子的界限举出具体的人物和材料作为实例，切实帮助下级掌握正确划分的标准。

中央 1957年10月15日

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

一、凡言论、行动属于下列性质者，应划为右派分子：

1、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城市和农村中的社会主义革命，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关于社会经济的基本政策（如工业化、统购统销等）；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坚持资本主义立场，宣扬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剥削。

2、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民主集中制。攻击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和人民政府的外交政策；攻击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否定“五大运动”的成就；反对对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人事制度和干部政策；要求用资产阶级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代替社会主义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

3、反对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反对共产党对于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的领导；以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为目的而恶意地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污蔑工农干部和革命积极分子、污蔑共产党的革命活动和组织原则。

4、以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共产党为目的而分裂人民的团结。煽动群众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煽动工人和农民的分裂；煽动各民族之间的分裂；污蔑社会主义阵营，煽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之间的分裂。

5、组织和积极参加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小集团；蓄谋推翻某一部门或者某一基层单位的共产党的领导；煽动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政府的骚乱。

6、为犯有上述罪行的右派分子出主意，拉关系，通情报，向他们报告革命组织的机密。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应划为极右分子：

1、右派活动中的野心家、为首分子、主谋分子和骨干分子。

2、提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意见，并积极鼓吹这种意见的分子。

3、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特别恶劣、特别坚决的分子。

4、在历史上一贯反共反人民，在这次右派进攻中又积极进行反动活动的分子。

三、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错误应于批评纠正，但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1、在根本立场上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而只是对于局部性的工作制度，局部性的不属于根本原则的政策，工作中的问题，学术性的问题，共产党的个别组织，个别工作人员表示不满，提出批评的人，即使意见错误，措词尖锐，也不应划为右派分子；同样，在根本立场上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而只是在思想意识上有某些错误的人，也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2、有过类似右派的思想，但是并未发表过或散布过，而且已经认为错误、自动检讨出来的人，或者偶然讲过类似右派的话，现在已经承认错误，而在历史上一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3、对于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或共产党的领导发表了错误的言论，但是并未积极宣传，事实证明不是出于敌意，经过指正表示愿意转变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4、一度盲目地附和了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或者一度被蒙蔽参加了右派小集团，或者一度被右派利用，在了解右派错误以后，迅速地站在正确立场，同右派决裂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5、历史上曾经站在反动立场，现在也没有显著的转变，但是在右派进攻时期并未进行反动活动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6、凡是界乎右派分子和中右分子之间的疑似分子，在尚未查出足以确定为右派分子的充分材料之前，一概不划为右派分子，并且不用斗争右派分子的方法来对对待他们。

10月15日这一天，苏中双方在莫斯科签订了《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协定规定：由苏方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

10月间，刘思齐在毛泽东的关怀下，办好了转学手续，进入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学习。

毛泽东一直为刘思齐的婚事操心，可是劝儿媳改嫁的话又很难说出口，于是就在刘思齐转学后，趁着她和李敏、李讷等几个小姐妹在一起玩的时候，故意提醒她们说：

“你们可要考虑找对象啰！”

“没人要呀！”

“上哪儿去找啊！”

“我们找不着哇！”

几个女孩子害羞地乱嚷了一通。毛泽东就笑着说：

“那你们就主动点嘛！”

“怎么主动呀？”

“那你们闭着眼睛上街抓一个呗！”

毛泽东依然笑眯眯的。刘思齐也开玩笑说：

“那抓个麻子怎么办？”

大家一阵哈哈大笑；毛泽东却说：

“只要人品好，有点麻子又有什么不好！”

10月下旬的一天，毛泽东在散步时问身边的俄文翻译李越然：

“李银桥呢？”

“我在这儿。”

卫士长李银桥闻声跑过来。毛泽东站住脚，指着李越然和李银桥说：

“你们这二李，一个管说话，一个管安全，这次跟我一道出去，我看你们俩也算得上哼哈二将了。”

李越然和李银桥忍不住都笑了。此时，毛泽东即将去苏联参加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杨尚昆为了使李越然能够更好地完成翻译任务，特意安排他来到毛泽东身边，让他进一步熟悉领袖的言谈特色和日常生活习惯。毛泽东望了二人一眼，又对李越然说：

“今年5月，伏老（指伏罗希洛夫——笔者注）来的时候，我看到大半个翻译都是你，你帮了我好多忙啊。”

李越然赶紧说：

“主席，这是我应该做的，只是水平还不够。”

毛泽东说：

“你看，我说的许多事，如果你翻译不过去，那伏老也不能理解，而伏老究竟什么心情，你不翻给我，我也不知道，可不是你帮了我的大忙了！”

10月29日，毛泽东约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参加了会见。

此前，苏共中央预先为将要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起草了一份会议宣言草案，先征求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意见，在遭到南斯拉夫的反对后，又于10月28日向中共中央征求意见。毛泽东就这份宣言草案表明了中共中央的态度，他告诉尤金说：

“我们讨论了一次，有些初步意见。就宣言本身来讲，对这个宣言草案，大部分意见我们是同意的，文件本身应当缩短。一些不同的看法，我们准备到莫斯科和赫鲁晓夫同志交换意见。现在就其中几个问题和你谈谈，请你转告苏共中央。”

关于和平过渡问题，毛泽东说：

“一般说来，在资本主义国家是存在着两种可能性的。第一，是和平过渡的可能性。我们提出这种可能性，表示我们并不提倡战争，并不提倡要用暴力来推翻政府。第二种可能性就是如果资产阶级要用暴力来镇压无产阶级，要发动内战来反对无产阶级，那么无产阶级就将被迫以内战来回答。这样就使无产阶级一只手争取和平过渡，另一只手准备对付资产阶级的暴力镇压，不致没有准备而推迟了革命。”“这两个可能性要同时提出。”

关于对社会民主党的估价问题，毛泽东说：

“这个问题要讲得恰当。对社会民主党的工作是一定要做的，要争取社会民主党和他们影响下的工人阶级中的大多数，这样革命才有希望。同社会民主党建立统一战线很重要，很必要。还有，是否可以笼统地提出和资产阶级各种还有民主性的党派进行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关于在宣言中是否要提及苏共宣布为反党集团的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的名字，毛泽东说：

“有反党集团，是一件不愉快的事。既然不愉快，是否就不提他们的名字了，只提反党集团。不提名字，一般干部和群众容易接受。就我们党内来说，许多同志不了解：这样一个老党员，几十年一直为革命斗争，怎么会反党？”

毛泽东最后说：

“在各国党的会议上要不要提出这个文件（指宣言草案——笔者注），值得考虑。现在看来，南斯拉夫是不同意发表这个文件的，波兰也可能不同意。这次庆祝大会，到会的人很多，全世界各国的党都会派人来参加。根据这些情况，我们提出一些想法，请你转告赫鲁晓夫同志考虑。我们认为有两种方式，从中选择一种。第一是求同。要使得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铁托在内，都能接受，要使这次庆祝会和会议表示出我们的团结，搞一个简短的公报，写上几点大家都能接受的东西，比如：1、要团结；2、要和平，反对战争；3、支持民族解放运动，支持各国的正义斗争，支持进步事业；4、如果有可能的话，写上‘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按照各国的民族特点进行工作’。至于其它的大家意见一致的问题，当然也可以写在公报上。第二种方案，就是把原来的文件（即宣言草案）加以修改和缩短后，让大家讨论。大多数同志同意，一两个国家不同意。发表这个文件就会告诉全世界，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大多数是团结的，有一两个国家在这个问题上和我们是有分歧的。”

他又强调说：

“如果这个文件提出讨论，大家意见不一致，不能通过，帝国主义一定会大肆宣传。所以，需要考虑是否不提出来为好。”

1957年11月2日清晨，毛泽东和宋庆龄分任正、副团长，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离开北京，乘专机飞往莫斯科，参加庆祝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庆祝活动；同时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及工人党代表大会和64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代表团的其他成员有邓小平、彭德怀、郭沫若、李先念、乌兰夫、陆定一、陈伯达、沈雁冰、王稼祥、杨尚昆、胡乔木、刘晓、赛福鼎。

此前，毛泽东还点名要山东的老中医刘惠民随行，刘惠民带了一大堆中药来到了北京。

莫斯科派了两架图-104飞机来接中国代表团。毛泽东穿着工作人员为他此次出国费了好大的劲才说服他做的一套衣服，脚上穿的却还是1948年那一双橡胶底皮鞋。他和宋庆龄、翻译李越然、李银桥等卫士及医务人员同乘一架飞机，邓小平、杨尚昆等人则乘另一架飞机。

毛泽东的专机降落在莫斯科伏努科沃机场，赫鲁晓夫快步上前，与毛泽东热烈握手，又是拥抱，又是吻面颊，似乎没有什么隔阂，场面依旧感人。

迎接中国党政代表团的还有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等苏联党政领导人以及胡志明等其它国家领导人。毛泽东把宋庆龄、郭沫若、沈雁冰介绍给他们，说道：

“他们现在虽然不是党员，但我们是把他们当成我们党的同志一样看待的。”

初冬的莫斯科已是寒气逼人。赫鲁晓夫告诉毛泽东说，苏联方面组织了200万人上街欢迎他。毛泽东谢绝了，他说：

“能省的节目最好都省去，最多只能让300人欢迎我，再加上仪仗队。”

赫鲁晓夫表示尊重毛泽东的意愿。苏联方面在机场举行了简朴的欢迎仪式。毛泽东发表了简短的演讲，对苏联的盛情邀请表示感谢。他还说：

“**40年前，苏联人民在伟大的列宁和伟大的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所取得的这个胜利，创始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在40年的建设过程中，苏联异常迅速地获得了辉煌的成就，许多方面都站在世界各国的最前列，为追求进步和幸福的人民树立了卓越的榜样。**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不是一个简单事件，人类进一步征服自然界的新纪元从此开始了。美国人吹得神乎其神，天花乱坠，为什么连个山药蛋都没有抛上去呢？**”

毛泽东所说的人造地球卫星是在1957年10月4日发射的。他说着伸手指指头顶，在场的赫鲁晓夫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听到翻译的话，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后来，就在毛泽东说过此话不久，美国人在1957年12月6日发射“先锋号”卫星，果然就地爆炸。1958年1月，苏联又把重达1120磅的第2颗卫星送上了轨道。美国在这一年的2月1日成功发射的“探险者一号”卫星，也仅仅只有8.2公斤。闲话打住，再说毛泽东在演讲中又说：

“以伟大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是保证世界和平的坚强堡垒，是一切不愿意受帝国主义压迫和奴役的人民的忠实朋友。”

赫鲁晓夫陪同毛泽东在机场检阅了苏联三军仪仗队，尔后，二人同乘一辆轿车，驶向克里姆林宫。

毛泽东和中国代表团的主要成员，被安排在捷列姆诺伊宫，这原是过去沙皇的住处。宋庆龄被安排在过去公主住的房间里。毛泽东则被特意安排在沙皇的寝宫下榻。他拒绝使用盥洗室，坚持用自己从北京携带来的马桶。

苏联人因为有了1949年12月毛泽东访苏时不吃死鱼的教训，这一次早早准备好了活鲤鱼。即使这样，毛泽东看了为他的下属安排的房间后，还是以不喜欢豪华为由发了火。他叫来翻译李越然，说：

“你去告诉苏联同志，说这间房子太大。请他们给调一下。”

李越然没有办法，只得去找杨尚昆，让杨尚昆好好去劝劝毛泽东。

晚上，毛泽东与郭沫若、胡乔木及十来个工作人员一道吃饭，大家议论到了三国时打仗死了多少人的问题，郭沫若说：

“史书载，黄河流域，‘户口骤减，十不存一’。三国合计，人口大约有六七百万。”

毛泽东说：

“‘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曹操回到原籍，他所见到的情景是：‘旧土人民，死丧殆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现在有人害怕战争，这一点不奇怪。打仗这东西实在把人害苦了。第1次世界大战死了多少人？第2次世界大战死了多少人？比比么，三国又死了多少人？原子弹和关云长的大刀究竟哪个死人多？**为什么要打仗哟！应该防止它，打不起来再好不过。可是光顾怕，也不行。你越怕，它就越要落在你头上。我们要着重反对它，但不要怕它，这就是辩证法。**”

此后，毛泽东便全力投入到了外事工作，尽管工作很紧张，但他仍然坚持学习英语，往往在天色未明时，邀秘书林克到他的寝室帮他学英文。有时在休息时间，也把林克叫来，帮助他学习。他对林克说：

“决心学习，至死方休。”

11月3日晚，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进行会谈。赫鲁晓夫说：

“尤金同志已经把你们的意见转告给我们，我们正在根据你们提的意见修改原来的草案。我们同意你们提出的意见，比如说，不要提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的名字，把文件搞短一些等。各国共产党都同意在会议上通过这样一个文件，而且哥穆尔卡已表示同意在文件上签字。”

毛泽东说：

“现在的稿子可以压缩一半。从内容上来说，原来文件中90%或更多一些，我们都同意。我建议，由我们的小平同志，还有陆定一、陈伯达、胡乔木同志，和苏联同志一起研究修改这个宣言。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党，可否在文件的适当地方或者在末尾提这么一段话：**文件中的各点，对12个执政党（不包括南斯拉夫）来说，是必须执行的，它们对文件负有责任。而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兄弟党来说，所提到的事情只作为建议提出。**因为资本主义世界的情况很复杂。这样提一句，会使这些国家的党能机动一些，更多的让他们自己去考虑自己的问题。”

毛泽东还建议推迟会议召开的时间，使修改宣言的时间更加充裕。赫鲁晓夫表示同意。

赫鲁晓夫又提出要办一个指导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刊物，要成立一个统一的组织。毛泽东说：

“这样的刊物用处不大，而且也不容易办好，评论其他国家的情况很难，评论也不容易恰当，过去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

他还说：

“我们在原则上不反对成立组织。我们又考虑，暂时不搞组织，可以使一些国家安心一些。我不是指帝国主义，而是指亚非国家。”

他建议用定期召开会议的方式交换意见，由苏共作为会议召集者。赫鲁晓夫考虑到波兰同苏联的关系比较紧张，他说希望由毛泽东出面同他们谈谈。他还说：

“你们的处境好，你们的意见波兰同志能听得进去。”

赫鲁晓夫又说意大利、法国、英国共产党领导人也都提出想见见毛泽东。毛泽东欣然同意了。

毛泽东初到莫斯科，赫鲁晓夫殷勤招待他，与他交谈，并多次陪同他进餐，联络感情。俄语翻译李越然后来回忆说：“赫鲁晓夫向毛主席谈起了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情况，说斯大林当年对南方前线的指挥有错误，使得某次战役惨遭失败；又说某某元帅胆小如鼠，一见到斯大林，两条腿像麻杆，吃败仗就是由于只会报告和俯首听命。而他自己又是如何如何的勇敢，向斯大林提出过正确的作战方案，遭到了拒绝。每当他津津乐道这些事情的时候，毛主席不是吃饭不做表示，就是把话题引开。当年只是一名中将的赫鲁晓夫自吹他比斯大林还高明，竟在指挥过千百次战役的毛主席面前显示他个人的军事才能，确实很不得体。”

毛泽东在和赫鲁晓夫谈话时，不断劝说赫鲁晓夫，敦促他不要与西方进行裁军谈判。他还说：

“如果苏联遭到西方的袭击，你们不应当抵抗，而应该后撤。”

毛泽东的观点使赫鲁晓夫大为惊讶，他问道：

“你说的‘后撤’是什么意思？”

毛泽东平静地解释说：

“就是有目的地撤退，准备打1年、2年甚至3年的持久战。如果你们后退到乌拉尔，到那时，我们中国就可以参战。”

在谈到中国国内事务时，毛泽东说：

“我准备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了。”

赫鲁晓夫问道：

“有人接替吗？”

“有。我们党内有几位同志，他们都不比我差，完全有条件。第一个是刘少奇。这个人在北京和保定参加了五四运动。后来到你们这里学习。1921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无论能力、经验，还是声望，都完全具备条件了。**他的长处是原则性强，弱点是灵活性不够。”**

毛泽东搬动第2个手指头，指着邓小平对赫鲁晓夫继续说：

“第二个是邓小平。你看到那位小个子了吗？这个人政治性强，思圆行方，**既有原则性，又有高度的灵活性**；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很有发展前途。”

赫鲁晓夫说：

“是啊，我也感觉到这个人很厉害，不好打交道。他观察问题很敏锐。”

毛泽东说：

“今后他到这里来，同我到这里来一个样，你们怎么对待我，就怎么对待他。”

说罢，他扳下第3个指头，接着说：

“第三个是周恩来。这个同志在大的国际活动方面比我强，**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的矛盾。**但是周恩来**在政治上的弱点是原则性不够强。**但他是个好人。

朱德同志年龄大了，他德高望重，威望很高。但你不能指望他主持工作办大事了，年龄不饶人。总之，这些人不管谁到这里来，希望你们都要把他们像我一样来对待，都看做是你们的朋友。”

赫鲁晓夫告诉毛泽东说：

“那好，我们一定会这样做。实际上他们也是我们的朋友。我们都是6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里布尔加宁现在工作不得力。”

毛泽东问：

“谁可以代替他？”

赫鲁晓夫说：

“将由柯西金取代他。米高扬也是政治上原则性不够强，拿掉谁他都难过。但他是个好人。不过大家还是希望由我来管全局。”

11月5日，毛泽东率中国党政代表团拜谒了坐落在莫斯科红场的列宁墓和斯大林墓。

11月6日上午，毛泽东率领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和由彭德怀率领的中国军事友好访苏代表团以及中国劳动人民代表团，应邀出席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举行的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大会。赫鲁晓夫在大会上作了长篇报告。

中午，苏共中央在克里姆林宫的大厅里举行午宴。毛泽东举杯向各国代表团团长祝酒。他走到南斯拉夫的卡德尔面前时，说道：

“我们同你们的区别，只是你们有胡子，我们没有胡子。”

他还说：

**“你们不断地攻击斯大林，我们就不攻击他。我可以告诉你们，斯大林给我们造成的危害比给你们造成的危害大得多。但今天，他在世界上是说明一点东西的偶像。你们又何必使这样一个偶像同自己作对呢？”**

毛泽东利用午间休息的半个小时，第一次会见了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哥穆尔卡。

下午，毛泽东在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大会上作为外宾第一个发表了演说，他说：

**“建立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曾经是世界上劳动人民和进步人类千百年来的梦想。十月革命破天荒地第一次在世界上五分之一的土地上，把这个梦想变成了现实。”**

“苏联的道路，十月革命的道路，从根本上说来，是全人类发展的共同的光明大道。”“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从来就是十月革命所开始的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革命有自己民族的特点，估计到这些特点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不论在革命事业中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我们都充分地利用了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的丰富经验。”

关于如何对待苏联的经验问题，毛泽东说：

“事情很明显，**在十月革命以后，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如果忽视或者不认真研究俄国革命的经验，不认真研究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并且按照本国的具体条件，有分析地、创造性地利用这些经验，那么，他就不能通晓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新阶段的列宁主义，就不能正确地解决本国的革命和建设的问题。那么，他就会或者陷入教条主义的错误，或者陷入修正主义的错误。我们需要同时反对这两种错误倾向，而在目前，反对修正主义的倾向尤其是迫切的任务。”**

毛泽东最后说：

“亲爱的同志们！从世界各国来的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的代表今天在这里参加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的盛会，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了世界人民力量的伟大团结，就象征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兴旺发达。让我们继续努力增强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增强全世界劳动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团结，去迎接新的伟大的胜利！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万岁！

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和友谊万岁！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的国际主义旗帜万岁！

全世界无产者和爱好和平的人民联合起来！”

毛泽东的演讲先后赢得了全场23次暴风雨般的掌声。当他从讲台上回到座位上的时候，赫鲁晓夫立刻激动地上前与他握手、拥抱，感谢他的夸奖。

杨尚昆在日记中记载了这一天纪念会议上的一些情景，他写道：“今天主席出现在纪念会上，大受欢迎。主席一出场，全体即起立致敬。下午大会时，主席第一个讲话，全场起立，在他讲话中不断地鼓掌，讲完了全场又起立，为纪念会致最高敬意的表现。其余各兄弟党代表讲话，都是鼓掌没有起立。”

这天晚上，毛泽东同波兰的哥穆尔卡继续会谈。关于苏共起草的宣言草案问题，哥穆尔卡说，草案中一些措词可能会刺激美国等西方大国，使国际形势更加尖锐化。毛泽东说：

**“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方面互相都怕，但总的说来，他们怕我们怕得多一些。第2次世界大战以后，有些时候美国占上风，有时又是势均力敌，现在是我们占上风，是东风压倒西风。”**

哥穆尔卡担心这次会议通过共同宣言，会使共产国际或情报局复活。毛泽东解释说：

“这个共同宣言实际就是我们的纲领，它不涉及具体事，提的都是原则问题，并不管波兰和中国具体怎么做法。这次开会实质上就是成立一个新的国际，但是没有机构，由各国的领导人参加，一切事情都需要经过大家同意，不能强迫接受，每国的党也并不是其支部。”

11月7日上午，毛泽东参加了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典礼活动。

毛泽东被安排在检阅台极为显眼的位置上，他的左边是赫鲁晓夫，右边是主持阅兵典礼的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宋庆龄、邓小平也站在检阅台上。而在其他国家的代表团里，只有一人被安排在检阅台上。

苏联的群众游行队伍，在行进到中国代表团面前时，都情不自禁地高呼：

“苏中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友谊万岁！”

11月7日下午，毛泽东第一次会见了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陶里亚蒂就苏共要法、意两党在共同宣言上签字的问题发表了意见，他说：这样会造成一个印象，在资本主义世界里从事共产主义运动的只有这两个国家的党。他表示不愿意在宣言上签字，但可以单独发表声明，对宣言表示原则上赞同。

陶里亚蒂的意见，与毛泽东3日与赫鲁晓夫谈话时提出的关于对待资本主义国家党的态度的主张不谋而合。毛泽东表示赞同陶里亚蒂的意见，他又说：

“关于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进行革命的问题，原来的文件比较强调和平过渡。我们和苏联交换了意见，最好两个可能性并提：一个是和平过渡的可能性，一个是用战争的方法。”“我很关心这个问题。一年以来，我们没有表示态度，因为没有机会与苏共中央交换意见。”“和平过渡包括激烈的阶级斗争。或许到一定的国内和国际条件下，可以通过群众斗争逼得资产阶级无法使用暴力。但是，我们不大相信。现在的资产阶级都是武装起来的。还是两个并提：我们要和平，被迫的时候也要使用暴力。关于后者谈上几句，不会解除我们武装，我们就有两只手。要用战争的一只手，是从防御出发的。”

陶里亚蒂表示，基本上同意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接着说：

“现在的形势正处在转折点。社会主义力量走在前面了，资本主义力量后退了。这包括亚非国家反对殖民主义的因素，也包括法、意、英、美等西方国家的人民与政府、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不一致或不完全一致的因素，还包括资本主义世界不一致的因素，这些因素是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的。我在1946年就注意这个问题。社会主义力量与资本主义力量彼此都怕，我怕你，你怕我，问题是谁怕谁多一点。我觉得是资本主义怕社会主义多一点。”

陶里亚蒂赞同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正处在转折点的判断，但他又说：不能低估帝国主义国家克服自己一部分失败的努力。

毛泽东和陶里亚蒂虽然没有在所有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但在主要问题上已经达成了共识。

11月7日晚上，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参加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苏共中央委员会、苏联部长会议在克里姆林宫联合举行的招待会。

毛泽东在招待会上成为一位最受大家尊敬的领袖人物。他的言谈举止，使与会者们无不倾倒。

11月8日，毛泽东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参加了由苏联各界劳动人民举行的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大会。宋庆龄在大会上作了热情洋溢的演讲，博得了阵阵掌声。

是日下午，毛泽东和法国共产党总书记多列士举行了会谈。双方在主要问题上达成了共识。毛泽东最后说：

“我们的心是一致的，我们和苏联、你们的心是一致的，现在和意大利也一致了。”

这一天，毛泽东还会见了英国共产党主席波立特、总书记高兰。

11月9日下午，毛泽东同英国共产党主席波立特、总书记高兰继续会谈。他在会谈中还谈到了中、苏、美、英关于钢产量和其它主要工业产品产量的问题，他说：

**“苏联在15年后，将会在总产量方面和按人口平均的产量方面超过美国。中国在15年后将超过英国。我们今年的钢产量是520万吨，第2个‘五年计划’之后将是1200万吨，第3个‘五年计划’之后将是2000到2500万吨，第4个‘五年计划’之后，也就是15年之后，将是4000到4500万吨。英国现在的钢产量是2000万吨。你们看，15年后能增加到多少？顶多3500万吨吧！”**

高兰回答说：

“15年后，顶多增加到3000万吨。”

11月10日，中苏双方对起草的宣言草案达成一致意见，作为苏中两党共同提出的草案，于次日印发各代表团征求意见。

11月13日，中方会同苏方讨论修改后的宣言草案。

杨尚昆在他的日记中记述了讨论时的情况，他写道：“5时，小平、伯达、乔木、我去苏共中央大楼会商，苏方出席的以苏斯洛夫为首，其余人员与10日会议相同。大家态度都很认真，每页每页的讨论。到9时左右，主席来电话，要我与伯达回去。”“与主席谈话后，再返回会场，开到10时，因有些问题需与主席商量，我方提出休会1小时，经苏方同意后，我们大家返回。”“11时再到会场，开到12时半才散。”“回来后向主席汇报。”

11月13日这一天，《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高潮》的社论。社论中说：

“**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象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这是符合于客观规律的。1956年的成绩充分反映了这种**跃进式发展**的正确性。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因为不懂得这个道理，不了解合作化以后农民群众的伟大的创造性，所以他们认为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是‘冒进了’。他们**把正确的跃进看成了‘冒进’**。”

后来，邓小平看到《人民日报》这篇社论，对毛泽东说：

“主席，现在谭震林（当时主管农业的副总理——笔者注）他们提出个大跃进口号，我看这个提法很好。”

然后，他扬了一下手中的报纸说：

“《人民日报》上登了。”

毛泽东说：

“拿来给我看看。”

邓小平把报纸递给毛泽东。毛泽东认真地看了一遍社论，点点头说：

“嗯，这个提法很好。”

欲知毛泽东此后在莫斯科的重要活动，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与赫鲁晓夫谈到接班人选时说：刘少奇的“**长处是原则性强，弱点是灵活性不够”。**邓小平是“**政治性强，思圆行方，既有原则性，又有高度的灵活性**；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周恩来是“**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的矛盾”，“在政治上的弱点是原则性不够强”。**这些评语的确恰如其分，且耐人寻味。但毋庸置疑，毛公看人也有看走眼的时候，例如华国锋、汪东兴等人。否则就不会有后来的覆舟沉船事件了。

**第42章**

**“问题是不能用钢铁数量多少来做决定，而是首先由人心的向**

**背来做决定的。历史上从来就是如此。历史上从来就是弱者战**

**胜强者，没有枪的人战胜全副武装的人。”**

话说1957年11月14日，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开幕。参加会议的有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越南、民主德国、中国、朝鲜、蒙古、波兰、罗马尼亚、苏联、捷克斯洛伐克12国党的代表团。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言说：

“我们这里这么多人，这么多党，总要有一个首。就我们阵营的内部事务说，互相调节，合作互助，召集会议，需要一个首。就我们阵营的外部情况说，更需要一个首。我们面前有相当强大的帝国主义阵营，它们是有一个首的。如果我们是散的，我们就没有力量。即使党的一个小组，如果不举出一个小组长，那么这个小组也就开不成会。我们面前摆着强大的敌人。世界范围内的谁胜谁负的问题没有解决。还有严重的斗争，还有战争的危险。要防备疯子。当然，**世界上常人多，疯子少，但是有疯子。偶然出那么一个疯子，他用原子弹打来了你怎么办？**所以，我们必须有那么一个国家，有那么一个党，它随时可以召集会议。为首同召集会议差不多是一件事。既然需要一个首，那么，谁为首呢？苏联不为首哪一个为首？按照字母？阿尔巴尼亚？越南，胡志明同志？其他国家？我们中国是为不了首的，没有这个资格。我们经验少。我们有革命的经验，没有建设的经验。我们在人口上是个大国，在经济上是个小国。我们半个卫星都也没有抛上去。这样为首就很困难，召集会议人家不听。**苏联共产党是一个有40年经验的党，它的经验最完全。苏联共产党在几十年来，总的说来，是正确的，这甚至连敌人也不能不承认。**它的经验分两部分：最大的基本的部分是正确的；一部分是错误的。这两部分都算经验，都有益于全人类。有人说，只有好的经验就好，坏的经验就无用。我觉得这样看不妥。缺点作为教训对各国也很有帮助。有些同志因为苏联在斯大林时期犯了一些错误，对苏联同志的印象就不大好。我看这恐怕不妥。有些错误现在没有害处了。从前是有害的，但现在它的性质转变了，转变得有益于我们了。它使我们引以为戒。至于大量的正确的经验，大家都知道，我就不需要多讲了。

各国共产党过去相互关系中间有些不愉快的事，不仅别的国家有，中国也有。但是我建议我们要看大局。**要讲心里有气，我也有一肚子，主要是对斯大林。**但是我没有讲过，我今天也只是讲有气就是了，什么气我也不准备讲。实际上现在我也没有气了，至少是气不多了，时间过去了，斯大林死了。应该承认，现在苏联同志的作风有很大改变，并且还会改变，还会进步。苏联的发展是一个曲线，它是按照辩证法走路的。列宁的辩证法，斯大林的形而上学（若干部分，相当大一部分），现在又回到辩证法。我很高兴，看见苏联同志们的一些辩证法文章，讨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社会主义国家相互间的矛盾。斯大林时代就不敢讲。**我到莫斯科来了两次，头一次使人不愉快。‘兄弟党’那是一句话，讲得好听，实际上不平等。现在我感觉到有一种平等气氛。**不知同志们有这么一种感觉没有？譬如我们讨论文件，征求过意见，现在还要征求意见。刚才赫鲁晓夫同志不是提出组织起草委员会吗？没有采纳的意见可以提出第2次，第3次。最后如果大多数认为不能采纳，还可以保留，在实践中间来看究竟那个对。如果实践证明提意见的对，而我们错了，比如讲，苏联、中国两党共同提出的这个草案错了，那么，我们就承认错误。这就是一种平等的关系。”

11月15日，由12个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成员及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代表组成的宣言起草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宣言草案。在此次会议上，大家争论了一天，在几个问题上始终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波兰方面认为，宣言草案对美国的一些提法说得太过分，调子太高，他们不主张提“美帝国主义”，不要讲它“称霸世界”，不要讲它是“反动中心”。

下午5时，中方代表向毛泽东汇报了会议上讨论的情况。

下午6时半，毛泽东在杨尚昆陪同下来到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哥穆尔卡的住处，与他进行第2次会谈。毛泽东说：

“今天，天上地上随便谈，参加的人由你们定。”

哥穆尔卡也直截了当地说：

“今天我想谈谈关于宣言的事。”

毛泽东问道：

“起草委员会开得有成绩吗？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大吗？”

哥穆尔卡没有直接回答毛泽东的提问，而是说：

“我们提出了4个有原则性的修正意见，有一个被采纳了，还有3个存在分歧。关于修正主义问题取得了协议，因为都作了些让步，提出主要的危险在于修正主义，但也须反对教条主义，各国的主要问题由各自决定。”

哥穆尔卡接着说，波方不同意宣言草案中“美国侵略集团依靠实力政策企图独霸世界”的说法。他认为一个国家不可能独霸；侵略集团不只是美国，还有别的国家。毛泽东说：

“其它国家，如英法可以分开提，突出美国是合乎事实的。讲美国是指问题实质，因为美国是他们中最强的，其次才是英、法、葡萄牙。可以把‘独霸世界’改为‘独霸世界大部分’。”

哥穆尔卡发牢骚说：

“我们认为在起草委员会的情况是：全体反对一国。”

毛泽东说：

“也可以说是一国反对全体。”

哥穆尔卡说：

“是这回事。”

毛泽东耐心地劝道：

“还是应该进行协商。”

哥穆尔卡说，波方不同意宣言草案中所写的“企图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复辟资本主义”这句话，他认为，要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复辟资本主义非通过战争方式不可，波兰有部分反动分子正是想通过战争在波兰复辟资本主义。他建议将这句话改为“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进行反对这些国家的敌对行为”。毛泽东说：

“这话不是对帝国主义及反动分子说的，而是对那些不愿使资本主义复辟的人民讲的。如果不说‘复辟’，也可改为‘颠覆活动’。”

哥穆尔卡表示同意。他又说，波方不同意说“美帝所采取的侵略政策使它成为世界反动中心”。毛泽东解释说：

“敌人虽多，但最大的敌人是美国。这符合事实。现在世界局势已经紧张，讲出了这点会更形成紧张，我们的意见正是这样，你紧我也紧，结果倒有可能不紧张。”

哥穆尔卡说：

“刚才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应该用强硬回答强硬，这才能促使国际局势的缓和。”

毛泽东说：

“不是用炮弹而是用口。”

哥穆尔卡说：

“美国统治集团对人们宣传说，共产党和苏联要消灭美国，他们不说要消灭帝国主义，而是说要消灭美国这个国家。”

毛泽东说：

“我们说不说，反正他们都会这样宣传的，还得靠打文字仗。你来我去，决不能对英美不还枪，这叫唇枪舌战。”“我们如果说出来，那会更好地争取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

关于‘美帝所采取的侵略政策使它成为世界反动中心’这句话，毛泽东建议，可以改为‘美帝所采取的侵略政策企图使它成为世界反动中心’。哥穆尔卡表示同意。就这样，双方在3个有分歧问题上的修改，基本上都接受了波方的意见。毛泽东说：

“这样提对你们可能接近些，我们是退了一步，这表示我们是想妥协的。这次应创造一种有事能商量的气氛。都需要让些步，需要大家取得一致。我们和苏联也都互相让了步。我感到这次苏联同志有很大进步，也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他们和我们都放弃了一些自己的观点，都接受了一些对方的观点，这才拟出了双方的共同草案。我已与哥穆尔卡同志谈过两次，你感觉到我想对你施加压力吗？”

哥穆尔卡笑着回答说：没有。毛泽东接着说：

**“我只是想说服你，你也想说服我，我们都没想施加压力。”**

哥穆尔卡说：

“我没有这种感觉。”

毛泽东最后申明说：

“今天谈的是我个人的意见，我还要与赫鲁晓夫同志谈一下。”

哥穆尔卡真诚地说：

“什么时候你有空我想来看你一次，可以吗？”

毛泽东说：

“我准备见你一次。”

此时已经是晚上10点了，3个半小时的会谈取得了重要进展。

11月16日上午，12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会议举行最后一次会议。赫鲁晓夫宣布开会。毛泽东第一个发言，他说：

“我认为我们的宣言是好的。我们用了一个很好的方法达到目的，这就是协商的方法。**坚持了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是原则性、灵活性的统一**。这么一种进行协商的气氛现在形成了。在斯大林的后期不可能。”“我们现在用说服的方法代替了压服的方法。费的时间不算少，但是这点时间是需要的。我们采取协商的方法并不是主张无政府主义，我们不是辩论的俱乐部。我们的方法是又有中心，又有大家，中心与大家的统一。没有中心，比如没有苏联共产党，那么就会变成无政府主义；没有大家提意见，只是一家提意见，那么就总不会完全。现在是又有中心，又有我们大家；在一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又有集中，又有民主。不能说我们这一次会议没有民主。我认为有充分的民主。”

毛泽东又说：

“这个宣言是正确的，是一篇马克思列宁主义性质的宣言。它没有修正主义或者机会主义的因素，也没有冒险主义的倾向。这个宣言总结了几十年的经验，尤其是最近几年的经验。有些经验是从痛苦中得来的。这些痛苦教育了我们。我们不要对于这些痛苦生气。相反，我们要感谢这些痛苦。因为它使我们开动脑筋，想一想，努力去避免那些痛苦。果然，我们就避免了那些痛苦。”

会议在结束前通过了宣言草案。这个宣言又被称之为《莫斯科宣言》。

这天下午，64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隆重开幕。

11月17日，这一天是星期日，头天刚下过大雪，太阳高高升起，天气格外晴朗。

这天下午，毛泽东同法国共产党书记杜克洛举行第2次会谈。双方的会谈记录如下：

毛泽东：法国国内以共产党为中心的革命力量现在是扩大了，还是缩小了，还是不大不小？

杜克洛：现在已经开始有所发展。

毛泽东：据你们看，法国的革命单独胜利的可能性如何？是不是一定要等世界形势的巨大震动？

杜克洛：这很难说。

毛泽东：比利时、荷兰、卢森堡这3个国家是更倾向于英国，还是更倾向于法国，还是更倾向于美国？

杜克洛：对这3个国家，法国已经没有什么作用了，主要是英、美之间的斗争。

毛泽东：关于英国，它倾向于美国，还是倾向于法国？英、法资产阶级之间有没有共同点？是不是都不要战争？

杜克洛：他们都怕战争。

毛泽东：这就好。英法资产阶级有共同点。德国军国主义现在是想打仗呢，还是不敢打仗？

杜克洛：不一定想发动战争，但它正在扩张自己的势力，这表现在共同市场上，它的经济力量非常雄厚。

毛泽东：欧洲共同市场形成了没有？有没有实现的可能性？

杜克洛：需看情况的发展。

毛泽东：西德的侵略矛头是指向东方还是指向西方？

杜克洛：如果西德向东方发动战争，首先就得打德国人自己。

毛泽东：归根到底就是一条，能不能有10年到15年的和平。我觉得西方资产阶级心里很不安，也恐慌，包括美国在内。这次会议有六十几个国家参加，表现大家的信心很高。一个国家的党不自己形成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有理论基础的核心骨干是不行的。**在这次会议的宣言上，我们提出加上一句话，各国党的事情由他们自己决定，这样对各党就没有束缚了。各个党都会自己坚持原则。不要为别人起草决议，马列主义原则比什么决议都好。**

下午6时，毛泽东在邓小平、彭德怀、乌兰夫、陈伯达、杨尚昆、胡乔木及驻苏大使刘晓的陪同下，来到莫斯科大学大礼堂，受到了在莫斯科及其它城市读书的3500多名中国留学生和实习生的热烈欢迎。一名留学生记录了现场的详细情况和毛泽东讲话的内容，节录如下：

“下午6点钟，大礼堂中各个角落的水银灯一起放光，在人们还没有来得及注意的时候，毛主席第一个安祥地从主席台左手的小门中走了出来，紧跟着的是其他的同志，这时我们只顾欢腾。大礼堂中一下子充满了这样的欢腾，以至大家只顾一个劲地看哪，笑哪，鼓掌，却没有一个人像在走过天安门时那样的高呼‘毛主席万岁！’我自己是笑得合不拢嘴，所以没法打招呼，也没法喊。毛主席一下就走到主席台的最边缘上来和大家亲切招手。这时我只觉得毛主席的步伐稳重而矫健，水银灯光映着毛主席的面孔红喷喷的，原来毛主席也是笑得合不拢嘴，他老人家多高兴啊！

毛主席从广阔的台上由左边一直走到右边，这才绕到桌子后边，却还没有就坐下来，轻轻地拿起水瓶来，向玻璃杯中倒了一杯水，端起来慢慢地喝。这时在最前边的人就一边鼓掌一边喊：‘毛主席！您好！’毛主席听见了就故意把杯子举向前面，高高的，好像要和大家碰杯的样子。这时我们真是想跳起来奔向前去，当然，没有一个人实际上这样做。等着毛主席喝了这杯水，安祥地把双手在胸前一握，站到了扩音器旁边时，我们马上安静下来。

首先是由毛主席向大家介绍代表团的全体成员。等全体都介绍过后，大家依次坐下来，只有毛主席仍旧安祥地站在扩音器旁。这时我们有多激动啊！生平第一次当面就要听到毛主席给我们讲话了！毛主席好像也了解了我们这一点，所以第一句话就亲切地说：

‘同志们！我问你们好！’

接着，毛主席右手轻轻一抬，向前推动了一下，说：

‘世界是你们的！’

好像用他那巨大的手掌把这样一个深湛的鼓励与期望稳稳地送给了我们似的。毛主席接着又补充了一句说：

‘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稍停了一下，毛主席自问自答地说：

**‘为什么说世界归根结底是你们的，而不是我们的呢？你们看，像我们这些人都老得不成个样子了嘛！’**

这一下子我们可就哄嚷起来了，高声说：‘毛主席不老！不老！不老！’毛主席轻轻摇了摇头说：

‘不然，各人有各人的想法。我们这些人老了，也有我们的长处，那就是富有经验，老于世故！’

这一下我们才又连笑带鼓起掌来。毛主席看到这么热烈的情形，又说：

**‘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毛主席接着又半开玩笑地说：

‘你们有朝气，我们有暮气，这叫各有长短。’

一句话惹得大家又笑起来了！毛主席这时像谈家常似地向大家说：

‘最近几天在莫斯科开了个会，你们知道吗？’

其实我们只是几小时以前才听代表团同志讲的，这时就连声答应说：‘知道，知道！’毛主席说：

‘这次会开得很好，苏联同志很能够和各国同志商量问题，会议开得生动活泼，和8年前我那次来时很不相同，既有集中，又有民主，这就是列宁的民主集中制。’”

“‘现在世界上的风向变了，去年的气候对我们很不利，今年的气候好了。**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斗争，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这两句话是谁说的呀？你们读过《红楼梦》吗？（有人说读过）这两句话是《红楼梦》里的一个人说的。一个社会主义阵营，一个资本主义阵营，当中还有一个中间地带。据联合国的统计，全世界共有27亿人口，我们社会主义阵营约有10亿，帝国主义阵营约有4亿，剩下的该是多少呢？（台下有人说，13亿）对！你们都是数学家，一下就算出来了。这13亿基本分布在3个洲：亚洲、非洲，拉丁美洲。13亿当中已经有7亿多取得了民族独立。像印度、印尼、巴基斯坦、缅甸、埃及、苏丹、突尼斯、摩洛哥，还有个黄金海岸等等。剩下的还有6亿，像日本、伊朗、南朝鲜、南越、土耳其等。帝国主义阵营中间德、意现在不想打仗，也打不起来。英、美、法不合作。**中间地带这13亿人口，两个阵营都在争夺。现在看起来，他们大多数是倾向我们的，我们的影响比帝国主义的影响还是大一些。因为英法有老殖民主义，美国有新殖民主义，我们却什么殖民主义也没有。’”**

“‘我们中国现在是6亿4千万人口。我们中国是个大国，又是个小国。在政治上我们是个大国，在经济上我们是个小国，和比利时一比较，我们还比不上呢！同志们，你们听了不高兴吗？’

真的有人说：不高兴！这时毛主席大声说：

‘我们说，比得上就比得上，比不上就比不上，有什么可以高兴不高兴的？’

这样我们才又大鼓掌了！

‘同志们！**这次庆祝十月革命节40周年，一共有64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派代表来参加。这是自从马克思、恩格斯以来的共产主义运动中最盛大的一次集会**。这几天，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在开会，商量了很多事情，决定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你们不反对吧？（当然，我们就大声嚷：不反对！）这两天在开64个国家共产党的会议，今天是星期日，休息一天，估计明后天就能结束。’”

“‘同志们！目前是世界局势的一个转折点。在人类历史上，十月革命是一个伟大的转折点，此外还有很多转折点，像斯大林格勒战役是第2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现在，苏联有两个人造卫星上天，64个国家的共产党开会，又是一个大的转折点，这是世界上两个阵营力量对比的转折点。从今以后，西风压不倒东风，东风一定要压倒西风。’

听了这样振奋人心的语句，怎能让人不尽力欢呼和使劲鼓掌呢？

‘你们年轻人应该具备两点：一是朝气蓬勃，二是谦虚谨慎。’

我们就使劲鼓掌，表示我们一定要照着毛主席的话去做。

‘今年在我们国内5月到6月间是乌云满天，右派分子骂我们共产党不行，什么都搞糟了。那时我们有一招，叫作硬起头皮顶住。’

说着说着，毛主席用自己的手指向宽阔的前额上一指，而且用力向前顶了顶，大家体会了中央这一英明的方针，不由得又会心地大笑了。

‘右派的进攻被我们打垮了，但是我们工作中的缺点还是存在的。8年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是有的。这次整风就是要改正这些错误和缺点，所以是一件大事，我们要认真地改。同志们，**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

“‘**我们的目的就是让全国6亿4千万人一起动手，人人振奋，移风易俗，改造我们的国家。**要做到这一点，当然不是很轻易的，问题很复杂。你们看过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没有？（回答：看过！）现在新的四十条出来了。我们要在第2个‘五年计划’内使全部合作社在生产和消费上都超过富裕中农。我曾和不少的省委书记、地委书记谈过话，问他们能否做得到？他们都说完全可能，有的还说能超过。我们现在生产力还很低，钢只有520万吨。过了第2个‘五年计划’后，将有1200万吨。再过一个‘五年计划’，钢的产量可以到2200到2400万吨。到第4个‘五年计划’完成时，就会有4000多万吨。我问过波立特同志，再过15年英国的钢产量可以到多少？他说现在是2000万吨，再过15年顶多达到3000万吨。那么，再过15年，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那时候世界的面貌就要大大改变了。要完成这个任务还需要15年，或者为了保险起见，再加一个小尾巴，说：**再经过3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点的时间，我们要在钢产量上超过英国。这个责任就落在你们身上了，你们要好好地完成‘五年计划’。**我也有个‘五年计划’：再工作5年；如果能再活15年那我就心满意足了。’

这下子我们可就喊起毛主席万岁来了，喊得毛主席也笑起来了。他老人家说：

‘如果能超额完成任务，那当然更好。可是还得估计到：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也是自然辩证法。’

这时我们不少人还接着喊毛主席万岁！等稍微平静一点，不知哪个小伙子直着脖子猛喊了一声‘毛主席万岁！’声音真响，毛主席听了又笑了，他好像是向着这个小伙子似地大声说道：

‘什么？**假如孔夫子到现在还不死，两千多年前的人到现在还都活着，那还得了啊！那你们可怎么活着呢？那不就不成一个世界了吗？所以我一开头就说了，世界是你们的，现在我再说一遍：祝贺你们！世界是你们的！！’**

这时我们又不由得从心底涌起来无限的欢欣，的确，世界是我们的！还有什么比这更高兴的令人无限振奋的展望呢？

毛主席离开了扩音器，安祥地坐下来，又和前排的同志们聊起家常来了。虽然没有扩音器广播，但是大家都极安静，所以声音仍是清晰得很。毛主席问：

‘你们怎样锻炼身体的呀？你们喜欢爬山运动吗？我今年登过黄山，还有别的山，一共5次。’

又问：

‘你们有湖南人吗？在湘江里游泳过吗？我去年游过3次，还横渡过长江两次。’

说着，毛主席用他的大手轻轻比划了两下，好像横渡长江丝毫也不费力似的。这时前排有几个同学齐声说：‘祝毛主席身体健康！’毛主席又问：

‘你们和苏联同志相处得怎么样呀？’

又嘱咐说：

‘你们一定要和苏联同志结成亲密的朋友！’

终于，毛主席向左右环顾了一下，说：

‘怎样？咱们走吧！’

说着，其他同志也都依次站起来，我们也跟着一起站起来，为了再多看毛主席一眼，多留一个幸福的印象，礼堂后边的人索性就站到椅子上去。我们目送着毛主席离开我们，所有水银灯光又都集中到主席台，仿佛主席台上留下了一片五彩的云锦。”

在莫斯科大学读书的研究生王蕙菁则详细地记录了毛泽东此后的活动：

“由于莫斯科大学大礼堂容纳不下而在楼下俱乐部剧场里坐着的几百名留学生，只是通过麦克风听了毛主席的讲话，并未亲眼见到毛主席和中国代表团的其他同志，同时，毛主席和其他领导同志也想见见他们，于是毛主席在大礼堂讲完话后，便专门从大礼堂走向俱乐部剧场。在那里，他微笑着向留学生们说：

‘我只给你们讲3句话，第一，青年人既要勇敢又要谦虚；第二，祝你们身体好、学习好，将来工作好；第三，和苏联朋友要亲密团结。’

之后，毛主席一行从俱乐部出来，上楼到位于大礼堂楼上的莫斯科大学学生宿舍参观。而我是从大礼堂出来向楼上自己的宿舍走去。这时，我发现他们显然正朝着我的宿舍方向走来，顿时，我的心又一次激动起来，我立即跑步迎上前去，向中央领导同志们问好，我伸出手先向毛主席问好：

‘毛主席您好，欢迎您！’

他用那宽大的手与我握手，并说：

‘你好！’

随后，他们便陆续走进我的房间。一进屋，毛主席先看了看我书桌上放着的书，然后看到沙发上放着的11月14日的《人民日报》，他关心地问：

‘你们这里能看到哪些中国报纸？’

我一一作了回答，并说：

‘从北京来的报纸最快的只要两三天，很及时，这张《人民日报》就是11月14日的报纸。’

他老人家听后很满意。之后，他便坐在沙发上，乌兰夫、彭德怀、杨尚昆等同志也先后入座。我的房间不大，十多位领导同志已坐得满满的。这时，我发现邓小平同志还在站着，而长沙发上毛主席右侧身旁还有一个空位，我便请邓小平同志入座。他示意自己不坐，让我坐。可我怎能让中央领导同志站着，而我却坐着呢，所以，我还是请他就座。这时，毛主席风趣地说：

‘你坐这里吧！他是总书记，就站着吧！你们还是先后同学呢！’

这句话使大家都笑了起来。于是，我就幸运地坐在毛主席身旁右侧。”“看到他真是红光满面、神采奕奕，像是一位长期在阳光下劳动的工人、农民那样的红润、健康，并带有光泽，只是两鬓略有少许白霜。看到这，我非常高兴。这时，他问我：

‘你是哪里人？’

我说：

‘祖籍是河北省。’

然后，他又指着代表团的同志们问我：

‘这些同志你都认识吗？’

我笑着回答说：

‘认识，是从报纸上见过。’

于是，他从自己的左侧坐着的同志一一向我介绍，说：

‘这是我们党蒙古族的优秀党员乌兰夫同志’，‘这是彭德怀同志’，‘这是杨尚昆同志’……

接着，他又关心地问起我的生活，毛主席风趣的谈话时而引起我们大笑，气氛轻松。后来，我想为领导同志们备茶，毛主席说：

‘不喝了，看看你的邻居。’

于是便走向与我同在一个单元的苏联研究生谢斯卡科娃的房间，并同她亲切谈话。

当毛主席和其他领导同志走出来的时候，走廊里已经站满了闻讯前来的苏联和其他外国留学生。宽敞的走廊通道挤得水泄不通，他们把毛主席围起来，争着伸出友谊的手，问候着，毛主席和他们握手，问好。聪明的保加利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留学生手里拿着俄文版的《毛泽东选集》，请毛主席签名留念，毛主席满足了他们的要求。

在晚上8点钟左右，当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代表团的同志们走向莫斯科大学正面大门时，人们越集越多，纷纷向他们致意，欢送毛主席一行，待他们的车队渐渐远去，直到消失，大家才从门口返回楼内。”

11月18日，毛泽东在64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坐在他的位置上发表了即席讲话，全文如下：

同志们：

我讲几句话。请同志们允许我即席讲话。因为我在几年前害过一次脑贫血症，最近一两年好一些，站起来讲话还有些不方便。

我想讲两个问题：形势问题，团结问题。

现在我感觉到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世界上现在有两股风：东风，西风。中国有句成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

40年前的十月革命是整个人类历史的转折点，怎么现在又有转折点呢？还是有的。打希特勒，在一个时期，有一二年时间，希特勒占了上风。那时，希特勒不但占领大半个欧洲，而且打进苏联，苏联让出了一大块土地，可见希特勒一时占了上风。斯大林格勒一战成为转折点，从此希特勒就走下坡路，苏联就势如破竹一直打到柏林。这不是一个转折点吗？据我看来，斯大林格勒一仗，是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

去年，最近这几年，西方世界非常猖狂，利用我们阵营中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匈牙利事件，在我们阵营的脸上擦黑，我们的天上飞起许多乌云。但是匈牙利反革命被镇压下去了。在苏伊士运河事件中，苏联的警告也起了制止侵略战争的作用。西方擦黑我们的脸的目的，依我看，主要是想“整”各国共产党。在这一方面，他们也达到了一部分目的。例如美国的法斯特，共产主义的可耻的叛徒，就跑出党去了。还有一些共产党也跑出去了一些人。帝国主义对此大为高兴。我想我们也应该高兴。叛徒跑出去了，有什么不好？

今年，1957年，形势大为不同了。我们的天上是一片光明，西方的天上是一片乌云。我们很乐观，而他们呢，却是惶惶不安。两个卫星上天，使他们睡不着觉。六十几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开会是从来没有过的事，从来也没有这样大的规模。但是**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中，在各国共产党中，特别是在各国人民中，还有相当多的人总是相信美国了不起**。你看，他们还有那么多钢，有那么多飞机大炮。我们的比他们的少。**西方国家无数的报纸、广播电台天天吹，美国之音、自由欧洲电台等等吹得神乎其神，于是乎造成一种假象，欺骗了相当多的一部分人。**我们就要揭穿这种欺骗。我有10件证据来说明这个问题：究竟是他们行还是我们行，究竟是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

第一件，打希特勒的时候，罗斯福和丘吉尔的手里有多少钢呢？大约有7000万吨。可是吃不下希特勒，毫无办法。总要想个办法吧，于是采用了旅行的办法，一走就走到雅尔塔，请求苏联帮助。那时，斯大林手中有多少钢呢？在战前有1800万吨。因为在战争中损失了许多地方，据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钢产量打了个对折，剩下900万吨。有7000万吨钢的人，来请求有900万吨钢的人。条件是什么呢？**易北河以东划为红军的进攻区，就是说，他们忍痛下决心让这一大块区域脱离他们的体系，让这一大块区域有可能转变为社会主义体系。这件事很有说服力，说明物质力量多少不完全决定问题，人是主要的，制度是主要的。**在雅尔塔又谈到打日本。又是美国人吃不下日本，又是要请共产主义帮助。中国的满洲，朝鲜的一部分，作为红军的攻击区，并且决定让日本退还半个库页岛、一个千岛群岛。这也是忍痛让步啊！为了吃掉他们的同伴——日本帝国主义。

第二件，中国革命。1949年初国民党被我们打得呜呼哀哉的时候，向杜鲁门大喊救命，说：美国老爷呀，你出几个兵吧！杜鲁门说：我一个兵也不能出！于是国民党又说：你可以不可以讲几句话呢？说长江以南这块地方，如果共产党到了那里的时候，美国就不能坐视。杜鲁门说：这个不行，讲不得的，共产党很厉害。于是乎蒋介石只好开跑。他现在在台湾。

第三件，朝鲜战争。在开始的时候，美国一个师有800门炮，中国志愿军3个师才有50多门炮。但是一打就像赶鸭子一样，几个星期就把美国人赶了几百公里，从鸭绿江赶到三八线以南去了。后来美国人集中了力量进行反攻，我们和金日成同志商量，退到了三八线相持，构筑阵地。一打，整个朝鲜战争差不多打了3年。美国的飞机就像黄蜂一样，我们在第一线一架飞机也没有。**双方同意讲和。在什么地点？他们说在一条丹麦的船上，我们说在开城，在我们的地方。他们说：好。因为会址在我们的地方，他们每天开会得打着白旗子来，开完会打着白旗子回去。后来，他们感到不好意思了——天天打白旗子。**说改一个地方吧，改到双方战线的中间，地名叫板门店。我们说也可以。但是又谈了年把，美国总是不甘心签字，拖。最后，**在1953年，我们在三八线上突破了21公里的防线，美国人吓倒了，马上签字。那么厉害、有那么多钢的美国人，也只得如此。这个战争，实际上是3国打的，朝鲜、中国、苏联，苏联出了武器。但是敌人方面呢，有16个国家。**

第四件，越南战争。法国人被胡志明打得呜呼哀哉，屁滚尿流。有人可以作证，胡志明同志在座。法国人不想干了，美国人一定要干，因为他的钢多。但是美国人也只是出武器，维持紧张局势，出兵就不来。于是乎有日内瓦会议，把大半个越南划给越南民主共和国。

第五件，苏伊士运河事件。两个帝国主义进攻，打了几天，苏联人讲了几句话，就缩回去了。当然还有第二个因素，就是全世界在讲话，反对英法侵略。

第六件事是叙利亚。美国作好了计划要打，又是苏联人讲了几句话，还任命了一个将军，叫作罗科索夫斯基。做了这两件事，他们说不好打了。这件事还没有完结，还要警惕，可能将来还闹乱子。但是现在总算没有打。

第七件是**苏联抛上了两个卫星。抛卫星的国家有多少钢？5100万吨。不是讲美国非常厉害吗？你为什么到现在连一个山药蛋还没有抛上去？你有一万万吨钢，**牛皮吹得那么大呀，做出了先锋计划。先锋计划要改名了，得改成落后计划。

由这七件事，**我想可以得出一个概念：西方世界被抛到我们后面去了。抛得很近还是抛得很远？照我讲——也许我这个人有些冒险主义，我说，永远地抛下去了。在苏联发射人造卫星以前，社会主义国家在人心归向、人口众多方面已经对于帝国主义国家占了压倒的优势；而在苏联发射人造卫星以后，就在最重要的科学技术部门方面也占了压倒的优势。**人们说，美国也会赶上来的，它也会抛卫星的。这是真的。赫鲁晓夫同志的报告就讲了美国会抛卫星的。但是他们现在正在争论究竟是1年、2年还是5年才能赶上苏联。我不管你是1年、2年还是5年，你总是被抛到后面去了。我们的苏联同志，赫鲁晓夫同志，大概只是晚上睡觉，白天不会睡觉。所有苏联人不会白天晚上，1年、2年、5年总是睡觉吧？你1年、2年、5年赶上苏联，但是苏联又前进啦。

同志们，我讲讲我们国家的事情吧。我国今年有了520万吨钢，再过5年，可以有1000万到1500万吨钢；再过5年，可以有2000万到2500万吨钢；再过5年，可以有3500万到4000万吨钢。当然，也许我在这里说了大话，将来国际会议再开会的时候，你们可能批评我是主观主义。但是我是有相当根据的。我们有很多苏联专家帮助我们。中国人是想努力的。中国从政治上、人口上说是个大国，从经济上说现在还是个小国。他们想努力，他们非常热心工作，要把中国变成一个真正的大国。**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15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因为**我和波立特、高兰同志谈过两次话，我问过他们国家的情况，他们说现在英国年产2000万吨钢，再过15年，可能爬到年产3000万吨钢。中国呢，再过15年可能是4000万吨，岂不超过了英国吗？**那么，在15年后，在我们阵营中间，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

归根结底，**我们要争取15年和平。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无敌于天下了，没有人敢同我们打了，世界也就可以得到持久和平了。**

**现在还要估计一种情况，就是想发动战争的疯子，他们可能把原子弹、氢弹到处摔。他们摔，我们也摔，这就打得一塌糊涂，这就要损失人。问题要放在最坏的基点上来考虑。**我们党的政治局开过几次会，讲过这个问题。现在要打，中国只有手榴弹，没有原子弹，但是苏联有。要设想一下，如果爆发战争要死多少人。全世界27亿人口，可能损失三分之一；再多一点，可能损失一半。不是我们要打，是他们要打，一打就要摔原子弹、氢弹。**我和一位外国政治家辩论过这个问题。他认为如果打原子战争，人会死绝的。我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27亿，一定还要多。**我们中国还没有建设好，我们希望和平。但是如果帝国主义硬要打仗，我们也只好横下一条心，打了仗再建设。每天怕战争，战争来了你有什么办法呢？我先是说东风压倒西风，战争打不起来，现在再就如果发生了战争的情况，作了这些补充的说明，这样两种可能性都估计到了。

我讲10件证据，刚才讲了7件，下面再讲3件。

第八件是英国退出亚洲、非洲很大一片土地。

第九件是荷兰退出印尼。

第十件是法国退出叙利亚、黎巴嫩、摩洛哥、突尼斯，在阿尔及利亚没有办法。

落后国家强些，还是先进国家强些？印度强些，还是英国强些？印尼强些，还是荷兰强些？阿尔及利亚强些，还是法国强些？**我看所有帝国主义国家都是下午6点钟的太阳，而我们呢，是早上6点钟的太阳。**于是乎转折点就来了。就是说，西方国家抛到后边了，我们大大占了上风了。**一定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因为西风是那么微弱。一定是东风压倒西风，因为我们强大。**

**问题是不能用钢铁数量多少来作决定，而是首先由人心的向背来作决定的。历史上从来就是如此。历史上从来就是弱者战胜强者，没有枪的人战胜全副武装的人。**布尔什维克曾经一支枪也没有。苏联同志告诉我，二月革命的时候，只有4万党员；十月革命的时候，也只有24万党员。《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那本书上的第一页第一段写了一个辩证法：从小组到全国。开头是稀稀拉拉的几十个人的小组，后来变成整个国家的领导者。苏联同志，你们修改《联共党史》的时候，我希望不要把这几句话修改掉了。我们中国也是如此，开头是稀稀拉拉几十个人的共产主义者的小组，现在也是领导着整个国家，领导着六亿四千万人口的大党。几十个共产主义者的小组，现在发展成1200万党员。我这话是特别想同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同志们交换意见的，因为他们现在还处在困难中，有些党很小，有些党有成批党员退出党。我说这不足为怪，也许是好事。**我们的道路是曲折的，是按照螺旋形上升的。**

还要讲个纸老虎问题。1946年蒋介石开始向我们进攻的时候，我们许多同志，全国人民，都很忧虑：战争是不是能够打赢？我本人也忧虑这件事。但是我们有一条信心。那时有一个美国记者到了延安，名字叫**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这个人就是在苏联住了二三十年，后来被斯大林赶走，以后又被赫鲁晓夫同志恢复了名誉的那位女作家**。我同她谈话的时候谈了许多问题，蒋介石、希特勒、日本、美国、原子弹等等。**我说一切所有号称强大的反动派统统不过是纸老虎，原因是他们脱离人民。你看，希特勒是不是纸老虎？希特勒不是被打倒了吗？我也谈到沙皇是纸老虎，中国皇帝是纸老虎，日本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你看，都倒了。美帝国主义没有倒，还有原子弹，我看也是要倒的，也是纸老虎。**蒋介石很强大，有400多万正规军。那时我们在延安。延安这个地方有多少人？有7000人。我们有多少军队呢？我们有90万游击队，统统被蒋介石分割成几十个根据地。但是我们说，蒋介石不过是一个纸老虎，我们一定会打赢他。**为了同敌人作斗争，我们在一个长时间内形成了一个概念，就是说，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也就是说在整体上我们一定要藐视他，在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上我们一定要重视他。如果不是在整体上藐视敌人，我们就要犯机会主义的错误。**马克思、恩格斯只有两个人，那时他们就说全世界资本主义要被打倒。但是在具体问题上，在一个一个敌人的问题上，如果我们不重视他，我们就要犯冒险主义的错误。打仗只能一仗一仗地打，敌人只能一部分一部分地消灭。工厂只能一个一个地盖，农民犁田只能一块一块地犁。就是吃饭也是如此。**我们在战略上藐视吃饭：这顿饭我们能够吃下去。但是具体地吃，却是一口口地吃的，你不可能把一桌酒席一口吞下去。这叫作各个解决，军事书上叫作各个击破。**

第一个问题讲完了。现在就第二个问题，团结问题，讲几句。

我非常高兴，非常庆幸我们的会议开得很团结。这次大会反映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人民的上升的朝气、东风压倒西风这么一种形势。我们有很多缺点和错误，但是我们的成绩是主要的，是年年见成效的。于是乎反映在我们六十几国共产党大会上一股朝气，并且一致承认要有一个头，这个头就是苏联，就是苏共中央。中国有句俗话，蛇无头而不行。你看，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头。每个国家的党也有一个头，有集体的头和个人的头。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是集体，第一书记是个人，两者都要，不然就是无政府主义。

我高兴哥穆尔卡同志昨天的演说，他说，承认苏联为首是一个真理，不是人为的，是历史上自然形成的。不过他那个国家的有些人在感情上还有问题，暂时不想讲这个话，要换一个形式讲，比如讲第一个和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他那个国家存在这样一个矛盾，先进分子同相当多的其他人之间还不调和。因此，他们还要做工作。我相信哥穆尔卡同志是好人。赫鲁晓夫同志两次向我表示：哥穆尔卡同志是可以信任的。我希望波兰、苏联、中国、其他国家完全团结起来，逐步地改进我们之间的关系。

我又高兴南斯拉夫的同志们在第二个宣言上准备签字。他们在六十几个党的和平宣言上签字表示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表示团结。他们没有在12国宣言上签字，使13国缺少了1国。他们说有困难，我们想也可以，我们不能强加于人，南斯拉夫不愿意签字就不签字好了。将来若干年后，我想他们是可以在另外一个宣言上签字的。

在团结问题上我想讲一点方法问题。**我说对同志不管他是什么人，只要不是敌对分子、破坏分子，那就要采取团结的态度。**对他们要采取辩证的方法，而不应采取形而上学的方法。什么叫辩证的方法？就是对一切加以分析，承认人总是要犯错误的，不因为一个人犯了错误就否定他的一切。列宁曾讲过，不犯错误的人全世界一个也没有。我就是犯过许多错误的，这些错误对我很有益处，这些错误教育了我。任何一个人都要人支持。一个好汉也要三个帮，一个篱笆也要三个桩。这是中国的成语。中国还有一句成语，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你赫鲁晓夫同志这朵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我毛泽东这朵荷花不好，更要绿叶扶持。我们中国还有一句成语，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这合乎我们赫鲁晓夫同志的口号：集体领导。单独的一个诸葛亮总是不完全的，总是有缺陷的。你看我们这12国宣言，已有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次草稿，现在文字上的修正还没有完结。我看要是自称全智全能，像上帝一样，那种思想是不妥当的。因此，对犯错误的同志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应该有分析，采取辩证的方法，而不采取形而上学的方法。我们党曾经陷入形而上学——教条主义，对自己不喜欢的人就全部毁灭他。后来我们批判了教条主义，逐步地多学会了一点辩证法。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就是对立面的统一。承认这个观点，**对犯错误的同志怎么办呢？对犯错误的同志第一是要斗争，要把错误思想彻底肃清；第二，还要帮助他。一曰斗，二曰帮。从善意出发帮助他改正错误，使他有一条出路。**

对待另一种人就不同了。像托洛茨基那种人，像中国的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那种人，对他们无法采取帮助态度，因为他们不可救药。还有像希特勒、蒋介石、沙皇，也都是无可救药，只能打倒，因为他们对于我们说来，是绝对地互相排斥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没有两重性，只有一重性。对于帝国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在最后说来也是如此，它们最后必然要被社会主义制度所代替。意识形态也是一样，要用唯物论代替唯心论，用无神论代替有神论。这是在战略目的上说的。在策略阶段上就不同了，就有妥协了。在朝鲜三八线上我们不是同美国人妥协了吗？在越南不是同法国人妥协了吗？**在各个策略阶段上，要善于斗争，又善于妥协。**

现在回到同志关系。我提议同志之间有隔阂要开谈判。有些人似乎以为，一进了共产党都是圣人，没有分歧，没有误会，不能分析，就是说铁板一块，整齐划一，就不需要讲谈判了。好像一进了共产党，就要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才行。其实有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九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八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七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六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五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的人只有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可不可以在小房间里头两个人或者几个人谈谈呢？可不可以从团结出发，用帮助的精神开谈判呢？这当然不是同帝国主义开谈判（对于帝国主义，我们也是要同他们开谈判的），这是共产主义内部的谈判。举一个例子。我们这回12国是不是开谈判？六十几个党是不是开谈判？实际上是在开谈判。也就是说，**在不损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下，接受人家一些可以接受的意见，放弃自己一些可以放弃的意见。这样我们就有两只手，对犯错误的同志，一只手跟他作斗争，一只手跟他讲团结。斗争的目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这叫原则性，这是一只手。另一只手讲团结，团结的目的是给他一条出路，跟他讲妥协，这叫作灵活性。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这是一种对立面的统一。**

无论什么世界，当然特别是阶级社会，都是充满着矛盾的。有些人说社会主义社会可以“找到”矛盾，我看这个提法不对。不是什么找到或者找不到矛盾，而是充满着矛盾。没有一处不存在矛盾，没有一个人是不可以加以分析的。如果承认一个人是不可加以分析的，就是形而上学。**你看在原子里头，就充满矛盾的统一。有原子核和电子两个对立面的统一。原子核里头又有质子和中子的对立统一。质子里又有质子、反质子，中子里又有中子、反中子。总之，对立面的统一是无往不在的。**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观念，关于辩证法，需要作广泛的宣传。**我说辩证法应该从哲学家的圈子走到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去。**我建议，要在各国党的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全会上谈这个问题，要在党的各级地方委员会上谈这个问题。其实我们的支部书记是懂得辩证法的，当他准备在支部大会上作报告的时候，往往在小本子上写上两点，第一点是优点，第二点是缺点。一分为二，这是个普遍的现象，这就是辩证法。

斯大林领导苏联党做了伟大的工作，他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但是他在一个长时间内发展了形而上学，损害了辩证法。个人崇拜就是形而上学，任何人不能批评他。我看苏联的40年是一个辩证法的过程。列宁的辩证法，斯大林有许多形而上学观点，这些观点见之行动，达于极点，势必走到它的反面，再来一个辩证法。我很高兴赫鲁晓夫同志在十月革命40周年纪念会上讲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矛盾。我很高兴苏联哲学界产生了许多篇文章谈社会主义社会的内部矛盾问题。有些文章还谈到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问题。这是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问题。

我的讲话就此结束吧。最后，再讲一句：我赞成两个宣言。

毛泽东的演讲结束了，会场里立刻爆发出长时间的热烈的掌声。

11月18日晚上，毛泽东在他的住地与陶里亚蒂举行第2次会谈，毛泽东问道：

“你们有多少党员？意大利有多少人口，城乡人口的比例如何？意大利还有封建势力吗？意大利有多少钢？可不可以说你们的社会主义革命有广大的农民同盟军？”

陶里亚蒂一一作了回答。毛泽东说：

“我觉得意大利革命的希望很大。”

陶里亚蒂说：

“是的。有两个因素促成：资产阶级力量弱，有广大的农民同盟军。”

毛泽东问：

“社会党在工人中的力量怎样？社会党左派和中间派的力量对比如何？天主教党有没有派别？有没有开明的民主派？意大利有没有保皇党？力量怎样？你们对教廷的态度怎样？”

他听了陶里亚蒂对最后一个问题的回答后说：

“你们一面反对教廷干涉政治，主张政教分离，一面不提出打倒宗教的口号。好，灵活。宗教既已存在，提出打倒的口号就会脱离群众。

你是否认为现在局势的特点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我所指的是革命的暴雨。西方国家的心理状态是有把握呢，是无把握呢，还是有些把握但信心不足？你觉得有没有世界震动，例如战争的震动？能不能在意大利实现革命？”

毛泽东听了陶里亚蒂的回答后，又说：

“世界是一定要爆炸的。有两种爆炸的方法：一个是战争的方法。如果苏联、中国发展很快，这种爆炸的可能性就不大了。可能性不是没有，但是大大减少了。第二种爆炸是革命的爆炸。美国虽然也会出来干涉，但是这种爆炸的可能性最大。欧洲会不会有这种爆炸性矛盾呢？”

陶里亚蒂说：

“不是不可能的。殖民主义制度将继续受到打击。殖民主义制度的瓦解和革命爆炸的可能性有密切的联系。”

谈话就要结束了，毛泽东又问道：

“你觉得这次会议怎样？”

陶里亚蒂说：

“会议的结果很好。虽然仍有些分歧，但是不可怕。主要的是团结。会议的宣言也使我满意，里面吸收了我们的一些修正意见。”

毛泽东说：

“会议宣言没有涉及各国的具体问题，宣言一般谈的是原则问题，这样灵活性就大了。”

陶里亚蒂说：

“我完全同意。”

欲知毛泽东此后的活动情况，请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接见留苏大学生时说：“今年在我们国内5月到6月间是乌云满天，右派分子骂我们共产党不行，什么都搞糟了。那时我们有一招，叫作硬起头皮顶住。”“**我们的目的就是让全国6亿4千万人一起动手，人人振奋，移风易俗，改造我们的国家。”**

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的成就和计划经济的影响，刘日新在《中国要坚持社会主义，就必须恢复计划经济——答某某周刊记者问》中是这样说的：“‘一五’计划规定，1957年粮食产量计划为3856亿斤，实际完成3901亿斤，超过计划45亿斤，超额1.2%完成计划；棉花产量计划为3270万担，实际完成3280万担，超过计划10万担，超额0.3%完成计划。计划制定的精确度如此之高，真是不可多得，对经济发展起了多么重要的作用！”

刘日新在这次答记者问中还说：“计划经济对世界的影响是巨大的。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他们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33）。由于苏联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积极性高，‘五年计划’4年提前完成（1928—1932）。当时资本主义世界正爆发三十年代经济大危机，美、英、德、法、日等大国的生产力倒退几十年，而苏联‘五年计划’4年完成，实现了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苏联由一个经济落后的沙皇俄国，逐步变成了一个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先进大国，钢产量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这些伟大成就，吸引了全世界的劳动人民和进步人类，深信只有社会主义才有光明前途。同时，苏联及后来中国的计划经济也影响了若干资本主义国家，他们的市场经济陆续向计划经济学习。美国总统罗斯福为挽救三十年代经济危机，实行新政，在不改变私有制的基础上，学习苏联计划经济的某些做法，由实行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变成了**实行国家干预的市场经济**，甚至开辟田纳西州作为计划的实验区。这一切对美国的经济复苏起了很好的作用。二战后，法国的戴高乐总统走第三条道路，也学苏联的计划经济的某些做法……搞计划的法国，比不搞计划的英国、美国的经济速度要快很多。1951年—1955年平均每年工业增长速度法国为6.6%，美国为4.4%，英国为3.8%。**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日本也学苏联、中国计划经济的某些做法，搞国民收入倍增等国民经济‘五年计划’。**日本的计划对二战后经济的迅速恢复，促进他们的经济在不太长的时间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起了重要作用。**六十年代，韩国的经济企划厅也学苏联、中国计划经济的某些做法，编制和实行国民经济计划**。经过6个‘五年计划’，韩国即由一个农业地区变成了一个新兴的工业化国家……由此可见，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影响是巨大的。”

刘日新所说的这一些事实，是任何人都不能掩盖、不能抹煞的。后人读一读这掷地有声的文字，听一听这铿锵有力的声音，能不振聋发聩吗？

**第43章**

**“要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

**时，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

话说1957年11月19日，64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结束。除了南斯拉夫以外的12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团在《莫斯科宣言》上签了字；64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团在《和平宣言》上签了字。那时，宋庆龄就坐在毛泽东的旁边。

是日下午，毛泽东在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时说：

“中国在经济上还受束缚，政治上已经消灭了束缚。至少要有15年的和平时间，我们才能消灭经济上的束缚。”

11月20日，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哥穆尔卡率领代表团来看望毛泽东。这是双方的第3次会谈。哥穆尔卡一开始提到了毛泽东18日的演讲。毛泽东解释说，他曾经害过一次脑贫血症，站着讲话不方便，只好坐着讲。他还说：

“这样坐着吹牛可以吹几个钟头，站着说就要倒了，尤其不能念稿子，那要死了。”

哥穆尔卡说：

“我们就是照稿子读，这是个缺陷。”

毛泽东说：

“我在国内也是这样，紧张得要命，人是死的。这次来莫斯科不读稿子了，这才活过来。今后我不愿读稿子了。”

哥穆尔卡又直截了当地说，他不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原子弹是纸老虎”观点。他认为：毛泽东提出的“原子弹是纸老虎”观点，“这意味着对帝国主义的力量估计不足”。他还抱怨说：

“**你们中国人多，可我们波兰呢？我们只有5000万人口，叫我们怎么个死法？**”

毛泽东耐心地解释说：

**“谢谢你对我的批评。不过你的批评还不够。对于帝国主义我不是什么估计不足的问题，而是根本就把它踏在脚下。”**

他又坦率地对哥穆尔卡说：

“**我们是讲人们的精神状态。帝国主义天天在那里张牙舞爪，你怕它，它就老实了吗？所以我们说，在战略上要藐视它，它没什么了不起。但是，在一个个的具体问题上，必须认真对待，不容轻率，这就是要在战术上重视它。哪个讲它就是个纸糊的玩艺儿，一捏就碎？这样，还叫马克思主义吗？”**

赫鲁晓夫同哥穆尔卡一样没有听懂毛泽东18日关于原子弹的论断。后来，他说毛泽东是“疯子”，是“战争狂人”。与赫鲁晓夫和哥穆尔卡不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听懂了毛泽东的意思。他曾叹息着对白宫办公厅主任帕森斯将军说：

“原子弹的最大威力是在发射架上，而不是飞出去之后。毛泽东是一个极难对付的人物，恐吓、威吓对他没有用。”

再说毛泽东在会谈中将话题转到了这次会议上，他问哥穆尔卡：

“你们对这次会议的看法怎样？是否感到受了委屈？你们有没有感到苏联同志在协商作风和与各国党的关系上有进步？还是认为没有进步？”

哥穆尔卡说：

“我们感觉到这种进步。”

毛泽东说：

“在走以前，我还要与赫鲁晓夫同志谈对外国党进行批评的问题。一般地讲，我们是不赞成公开批评的，各个党及民族都很敏感，如批评得不对固然坏，如批评对了也不好。假如有错误的话，那为什么不通过本国的党出来批评呢？”

毛泽东又说到了共产国际，他说：

“第三国际头和尾巴好。头是列宁，他对各国共产党的建立起了作用。尾巴是季米特洛夫。但头和尾巴都不长，而身子却有这么长。”

哥穆尔卡说：

“在我们也难说尾巴是好的，因为解散了我国共产党。”

毛泽东说：

“共产国际解散了，这应感谢上帝。历史也很怪，社会主义国家的成立都是没有国际的。去年3月米高扬到北京，来解释为什么要批判斯大林时，我同时也向他提出问题。他们建议成立社会主义国家的联络局来代替情报局，并且要出个刊物。我建议不要成立联络局，也别出刊物。我说，你们召集会就是了。你们苏共中央有事召开会议，我们来参加，谈些必须讨论的事，有事则开，无事则散，不要有像共产国际和情报局这样的固定机构，成立了会害死人的。”

毛泽东还谈到了中国共产党的经验，他说：

“我们是犯了‘左’倾及右倾机会主义这两个错误后才教会了我们这个党，才教会了领导干部。结果使这两个阶段的革命有很大损失，这当然不好，但这只是一个侧面。第二个侧面是很好的，有益的，它成了教员。没有这两次的失败，我们教育不过来，没有比较，在人们的脑子中不会引起很大震动，就不可能找出不‘左’又不右的道路。

我是吃过苦的，你们也吃过苦，一定知道时间是不能短的。我们党现在这个核心领导是经过多少年才形成的？从1935年遵义会议开始，到1957年共23年，这么久的时间。现在要动摇它是很难的。”

毛泽东最后说：

“今天谈得很有兴趣。我们的心是相通的，互不损害。我没有损害你的意思，你也没有损害我的意思。我们是互相支持的，这很需要。”

哥穆尔卡说：

“我们特别需要你们的支持。”

毛泽东说：

“自力更生为主，外国支持为辅。虽然为辅助，但还是要支持，这并非依赖。要分别依赖及依靠。我们是互相依靠嘛，决不依赖。今天谈话的缺点是我讲多了，下一次吧。”

11月20日中午，苏共中央主席团为毛泽东和中国代表团举行了隆重的送别宴会。毛泽东在告别讲话中，再一次号召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他说：

“我们开了两个很好的会，大家要团结起来，这是历史的需要。”

他还对前来送行的60多个国家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说：

“中国有个古语：两个泥菩萨，一起打碎，用水调和，再做两个。我身上有你，你身上有我。”“**任何一个人都要人支持，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也要三个桩。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这是中国的成语。**赫鲁晓夫同志这朵花比我毛泽东好看。我看赫鲁晓夫同志这朵花是需要绿叶扶持的。中国还有一句成语，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单独的一个诸葛亮总是不完全的，总是有缺陷的。”

是日晚，苏共中央还在克里姆林宫的叶卡捷琳娜大厅安排毛泽东与苏联各界著名人士见面。回到驻地，毛泽东征询赛福鼎的意见说：

“你打算从北京回去呢，还是从这儿直接回去呢？”

赛福鼎回答说：

“我打算从这儿直接回去，顺便去中亚几个加盟共和国看看。”

“也好。”毛泽东点点头，又说：“俄罗斯人过去压迫中亚的各少数民族人民，现在俄罗斯人对这些少数民族人民做了些什么？我们汉族人也压迫过你们新疆的少数民族人民，现在应该给你们做些什么？你去实地看看他们做了些什么，学学他们的经验再回去。新疆人民生活的改善，不仅要赶上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且还要超过他们的生活水平。”

11月21日，毛泽东、宋庆龄率领代表团从莫斯科乘飞机回国。毛泽东让宋庆龄坐头等舱，自己坐二等舱。宋庆龄说：

“你是主席，你坐头等舱。”

毛泽东说：

“你是国母，应该你坐。”

就这样，毛泽东乘坐二等舱回到了北京。

11月25日，毛泽东复信给长沙岳麓山湖南师范学院的学生张明霞。

此前，长沙岳麓山湖南师范学院的学生张明霞和她的几个同学在语文系成立了一个“十月诗社”，她们还创办了一个油印诗刊《鹰之歌》。她们通过长沙市10中的小读者薛守淳及她们在10中实习的同学、诗社成员萧幼艾，抄写了毛泽东写给10中教师李淑一的词，并表示要在《鹰之歌》上发表。李淑一说，最好先请示一下毛泽东。于是，张明霞就在6月1日给毛泽东寄出了有她们诗社9位成员签名的请求信。

毛泽东在复信中写道：

张明霞同志：

来函收到，迟复为歉！“蝶恋花”一阕，同意在你们刊物上登载。游仙改为赠李淑一。

祝你们好！

毛泽东 1957年11月25日

毛泽东随信附寄了张明霞等人抄呈给他请求他校核的原词，并用两种笔在上面加了标点，改正了一个错字。

当张明霞收到毛泽东这一指示信时，她们的《鹰之歌》已经在反右斗争中停刊了。所以，由《鹰之歌》发表毛泽东的《蝶恋花》一词，就成了她们终生的遗憾。

11月底的一天，毛泽东在菊香书屋接见了他幼年上私塾时的老同学毛裕初。

此前，韶山村印山冲农民毛裕初高高兴兴地来到了北京。他是毛泽东幼年时的同学，同在南岸私塾邹春培先生那儿读过书。按照毛氏族谱“祖恩贻泽远”论起，毛裕初属“恩”字辈，比毛泽东长两辈。这两位同窗学友相见时，儿时的记忆已经模糊了。毛泽东握着毛裕初的手，欲言又止。当毛裕初自报家门后，毛泽东的脸上立刻泛起了笑容，并正正经经地叫了声：

“叔祖父。”

毛泽东问起家乡人的衣食住行，得知家乡人的生活仍很艰难时，连连说：

“我这个主席没有当好呀！现在是过渡时期，国家底子薄，今后日子会慢慢地好起来的，只要大家奋发图强，搞好生产，就会有希望的。”

毛裕初和毛泽东回忆起他们一群学生在1903年夏天背着老师去洗澡、塾师邹春培要他们对对子惩罚他们的情形。毛裕初说：

“他出了个上联——‘濯足’，叫同学们对下联。同学们都对不出来，你对的是‘修身’，先生十分满意，才没有处罚同学们。”

毛泽东听到这里，一下子想了起来，高兴地说：

“对了！‘修身’对‘濯足’。这个‘濯足’，就是洗脚，越洗越干净。《孟子·离娄上》讲：‘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矣。’《楚辞·渔父》也说：‘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那个‘修身’就是修身养性，努力提高自己的品德修养。《礼记·大学》上讲：‘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先生批评我们不该玩水，我们说这样既可以锻炼身体，又可以提高修养。先生当然拿我们没有办法。”

中午，毛泽东与毛裕初共进午餐，为他敬酒、夹菜。毛裕初说：

“主席给我敬酒、敬菜，真是不敢！”

毛泽东却笑着说：

“你是我的长辈，敬老尊贤，我是应当的。”

后来，毛裕初在北京住了一个多月，游览了北京的很多地方。临别时，毛泽东让秘书给他添置了棉衣、棉裤、棉鞋、棉帽，又送他200元钱，还特意送了一支长手电筒。毛泽东体贴地说：

“乡下没有电灯，晚上看不见，你回去可以用一用。”

毛裕初有一个多年的愿望，想去飞机场看看飞机。当他把自己的愿望告诉毛泽东时，毛泽东一口答应，并且说让他坐飞机回去，直接体验飞行的感受。

回到韶山后，毛裕初时常给毛泽东写信，表示发自内心的感激之情，并适时地反映家乡的情况。毛泽东虽然忙于国事，无暇回信，却仍然挂念着这位叔祖父，指示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给予回信。

1957年12月1日，宋庆龄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她写道：

敬爱的毛主席：

承惠赠山东大白菜已收领。 这样大的白菜是我出生后头一次看到的。十分感谢！您回来后一定很忙，希望您好好休息。

此致敬礼！

宋庆龄 1957年12月1日

原来在1957年11月底，毛泽东收到了山东胶县农民送来的4棵特别大的白菜，他立即挑选出两棵最好的，让江青分别送给宋庆龄和张治中。江青送给张治中家的那棵大白菜也重达二十七八斤，张治中夫妇舍不得吃，就把它用大花盆栽下，陈列在客厅里。后来，这棵大白菜抽苔开花，高有二三尺，客人见了无不称奇。

12月2日，中国工会第8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领导人出席了开幕式。刘少奇在开幕式上致词说：

“我国工人阶级和我国人民在今后10年到15年内的基本任务，就是要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实行工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把我国建成一个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在15年后，苏联的工业在最重要的产品的产量方面可能赶上或超过美国，我们应当争取在同一时期，在钢铁和其它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

**自此以后，中国要用15年的时间赶超英国的口号，响彻了大江南北**。全国工人阶级热烈拥护这个口号，表现出了高度的政治热情。

12月初，警卫战士马维探家后回到中南海，他写了一份调查报告，还带回一个窝头，又黑又硬，一并交给了毛泽东。他对毛泽东说：

“我们家乡的农民生活还很苦，他们就是吃这样的窝头，我讲的是实话。”

毛泽东接过窝头，手有些发抖，眼圈一下子就红了。他费了好大的劲儿，掰一块放到嘴里，慢慢地咀嚼，嚼着嚼着，泪水便溢满了眼眶，当他咽下那口粗糙的窝头时，豆大的泪珠顺着脸颊流淌下来，鼻子也壅塞了。他一边哭，一边掰了窝头分给李银桥他们几个人，说：

“吃，你们都吃一块。这就是我们农民的口粮，这就是种粮人吃的粮食啊……”

李银桥将窝头放进嘴里，感到确实难吃，嚼了很久才咽下去。这天晚上，毛泽东失眠了，他嘴里喃喃地说：

**“怎么是这样呢？为什么？翻身了，人民当家作主了，不再是为地主种地，是为人民群众自身搞生产，生产力应该获得解放么……”**

**在以后很长的时间里，毛泽东时时思考着这个问题，无论是散步、吃饭或是睡觉，他多次自言自语地说：**

**“我们是社会主义么，不该是这样。要想个办法，想个办法……”**

12月7日，毛泽东会见以国防部长波·洛姆斯基上将为团长的捷克斯洛伐克军事代表团。

12月8日，毛泽东在和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时，介绍了莫斯科会议的情况。关于国际形势，他说：

“基本的情况是帝国主义不敢打。但是，也要估计到有少数疯子闹乱子。”

毛泽东还向他们通报了关于在15年内赶超英国的设想。

12月8日13时，毛泽东乘飞机离开北京去南方，经过一个小时的飞行到达济南。

南下出发前，毛泽东要身边的工作人员把各种版本的《楚辞》，以及有关《楚辞》和屈原的著作尽量搜集给他，大约有50余种。

12月9日上午，毛泽东听取了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等负责人的工作汇报，在珍珠泉礼堂与参加山东一届二次会议的代表们会面谈话，然后看了大字报。

中午，毛泽东乘飞机离开济南抵达南京。

据专机工作人员回忆说：此次飞行的目的地是上海，可毛主席“一时兴起”，改变了计划，发生了一件让机组人员异常紧张的事情。当飞机接近古城南京时，一张飘到手心的纸片给我压上了千斤重担。陪同毛泽东主席的空军副参谋长何廷一，给我带来毛主席的指令，指令写在一张巴掌大的纸上：“马上通知南京，把机场候机楼打扫干净。所有省委领导同志到候机楼开会。”在南京落地？起飞前根本没有在南京落地的计划呀！我心里这么想着，嘴里却说：

“南京马上就到了，编排密码的时间都不够，恐怕来不及吧？”

“能试一试吗？”

听口气，何廷一的态度也并不坚决。我看看仪表板上的时钟，心中计算了一下，说：

“肯定来不及了。”

“那好。”

何廷一转身到后舱去了。不一会儿，他神色严峻地返了回来，说：

“编码来不及就直接用话讲。”

“用话——讲？！”

我惊得瞪大了两只眼睛。用话讲怎么行呢？那不是严重泄密吗？那不是等于公开告诉全世界，毛泽东现在南京机场候机楼开会。那么，毛主席的安全怎么保障？

“发吧！是毛主席坚持这样办，必须这么做！”

何廷一边说边戴上耳机监听，我知道已无法更改，只好照办。

“问地面收到没有。”

按常规，地面电台应主动给予答复，可此时各地电台鸦雀无声。地面通讯员同样是挑了又挑的，政治警惕性都很高。我遵照何廷一的指示，询问地面是否收到刚才的通知。可大约过去了三四分钟，竟无一人回答，耳机里异常的静，静得人透不过气来。

“点名！点南京，北京！”

何廷一沉不住气了，毫不放松的要求进一步催问。地面不回答，无法判断他们收到了还是没有收到，假如毛主席见不到江苏省委一班人的面，耽误和影响了毛主席的工作计划，那可不是小事。

“南京！南京！北京！北京！收到没有？收到没有？”

“南京明白。”

“北京收到。”

“不行！要重复原文。”

何廷一又追加一句。南京只好用非常快的频率匆匆重复了一遍原文。

再说毛泽东在南京期间，接见了出席中共江苏省第三次代表大会第2次会议的全体代表。

12月9日这一天，毛泽东乘飞机离开南京，飞抵杭州。

12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的社论。据他说：这篇社论在访苏前就开始写，因为没有写完，带到莫斯科去了。“闲来无事江边望”，有点闲工夫，就在代表团中间先读一读。回来又经过斟酌，政治局还有一些同志看过才发表的。多、快、好、省，这是代表中央的，是党的一个路线，是我们搞建设的一个路线。社论中写道：

**“在去年秋天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在某些部门、某些单位、某些干部中间刮起了一股风，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针刮掉了。有的人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订得冒进了，行不通；有的人说，1956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全部冒进了，甚至第1个‘五年计划’也冒进了，搞错了；有的人竟说，宁可犯保守的错误，也不要犯冒进的错误，**等等。于是，本来应该和可以多办、快办的事情，也少办、慢办甚至不办了。这种做法，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然不能起积极的促进作用，相反的起了消极的‘促退’作用。”

12月12日这一天，毛泽东在杭州谈到审查全国各地的工农业计划问题，提出搞地方工作的应该管3件事：工业、农业生产、意识形态问题。

12月14日，毛泽东在杭州接见了由缅甸副总理吴巴瑞和吴觉迎率领的缅甸友好代表团和缅甸友好经济考察团的全体人员。

12月16日，毛泽东要叶子龙通知华东地区的5省1市党委第一书记舒同、曾希圣、江渭清、刘顺元、柯庆施、叶飞、江华赶来杭州集中开会。陪同缅甸副总理来杭州的周恩来也参加了会议。

毛泽东在会上讲了主要矛盾、整风重点是抓基层等问题。

12月16日晚上，毛泽东看罢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送来的12月9日的一个讲话《中国共产党浙江省委员会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内中说“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仍然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他十分高兴和重视。

12月17日凌晨2点，毛泽东给叶子龙写信，他写道：

叶子龙同志：

请于今日上午8、9时通知舒同、曾希圣、江渭清、刘顺元、柯庆施、叶飞、周总理等7位同志看《中国共产党浙江省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浙江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这个文件，在下午1时以前看完。其他工作，可以移到明天上午去做。

毛泽东 12月17日上午2时

没有这个文件的，由你立即向浙江省委找到，分发各人。

12月17日下午，毛泽东、周恩来与华东地区的省、市负责人舒同、曾希圣、江渭清、刘顺元、柯庆施、叶飞、江华等人，一起阅读、座谈《中国共产党浙江省委员会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

是日晚，毛泽东在给周世钊的复信中写道：

“惇元同志：来信收到，极为感谢。因忙迟复，幸谅。你好吗？我还可以，勿以为念。祝好！”

他在给李淑一的复信中写道：

“淑一同志：给我的信及祭文，均已收到。迟复为歉。寄上500元，聊佐菽水，勿却。不久可能去你那里，可谋一晤。顺祝教礼！”

他还给孙燕写了一封回信，对孙燕的工作安排谈了自己的意见。他在信中还声明：

“此事应由党作决定。”“我这封信只是建议，不是决定。”

12月18日，毛泽东继续召集舒同、曾希圣、江渭清、刘顺元、柯庆施、叶飞、周恩来等7人开会，讨论江华同志的报告。按他的话说，这次会议是无结果而散，没有议出什么名堂。

12月18日晚，毛泽东在彭德怀转呈的副总参谋长陈赓12月9日关于台湾飞机进入大陆活动情况和加强内地防空作战部署的报告上批示道：

非常必要。请你督促空军全力以赴，务歼入侵之敌。请考虑我空军1958年进入福建的问题。

毛泽东 12月18日

12月23日下午，毛泽东约请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和田家英等谈浙江省委报告的修改问题，并对报告作了进一步的修改。尔后，他指示由《人民日报》全文发表。

后来《人民日报》于12月28日以《坚持党的正确路线争取整风运动在各个战线全胜》为题，发表了浙江省委的报告。

《人民日报》还为这个报告发了“编者按”，按语体现了毛泽东对这一报告的评价：

**“江华同志这个报告，用整风运动作为‘提起一切工作的纲’，系统地讨论了一个省在一年来的各方面的工作，鼓舞了干劲，批判了谬论。”**

关于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在修改后的报告中是这样表述的：**“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完全结束。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仍然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只是这种矛盾主要地不表现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而表现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

12月25日清晨，毛泽东给在北京的胡乔木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乔木同志：

**“除四害”通知尚有缺点，不扎实，轻飘一些。这是因为没有研究各地已经取得的丰富经验，你脑子里对此问题还很不懂的缘故。**现在有大批经验了，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将全国各省市县见于报纸的经验一齐找来仔细看一遍，边看边想，形成成套思想，然后下笔成文。至少改3遍、5遍，找彭真、刘仁及北京有经验的除害干部二三人及科学家二三人开一两次会，发表意见，修正文件，字斟句酌，逻辑清楚，文字兴致勃勃。文件可以长一点，达1000字至2000字左右也可以。总之使人看了感觉解决问题，百倍信心，千钧干劲，行动起来。内容要把人人振奋，改造国家，带动消灭人病、牲口病、作物病的道理讲清楚，这是理论。然后讲方法，也要讲得入情入理，使人觉得切实可行，没有外行话。要写这一部分，也要认真研究，下苦功钻一下。然后讲到书记动手，报纸、刊物、广播、定期扫除、定期检查等事，作为结束。两星期内写好、通过、发出也就好了。送我看一次。

莫斯科讲话，请打字送我再看一次，还觉得有需要修改之处。

毛泽东 12月25日8时

末了，他又加了一句：“到济南时，可歇一宿，认真谈一下。那里的斗争文件，工业、农业计划，找一份带回去，认真看一遍。”

12月25日，卫士张木奇和江苏籍的张相松探家结束回到毛泽东身边，他们一道向毛泽东汇报家乡的情况。张相松说，他家乡的农民每月平均是8元的生活水平。毛泽东扭头问张木奇：

“你们曲阳是多少？”

张木奇说是5元。毛泽东沉思着说：

“差距是有，某些地区差距还很大哟。**现在全国生活水平还普遍都低，我相信慢慢会好起来。5元的也要提高到8元，8元的也要发展，将来都发展到一个较高的水平，而且要逐步消灭差距！”**

他又问张木奇说：

“你父亲已经是近60岁了，还能不能参加劳动？”

张木奇说：

“农村老人闲不住，还干活，算个半劳力。”

毛泽东深深吸了一口气，缓缓点头，然后说：

**“勤劳是中华民族的美德。你们要继承，要代代相传。**”

12月25日这一天，柯庆施在中共上海市一届二次会议上作了《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其中谈到社会主义时期国内的主要矛盾，引起毛泽东的重视，他亲自做了一些修改。

后来，《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一文在1958年1月25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并加了编者按，说柯庆施的文章“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对于国内的主要矛盾，都作了详细的分析和阐明”，“是具有普通意义的”。

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64岁生日，厨师用叶子龙从家乡带来的腊肉、腊鱼等土产品烹制了几道菜，其它还有毛泽东爱吃的带辣味的湖南家乡菜和红豆二米饭。大家把毛泽东请到饭桌上，一起高高兴兴地吃了一顿饭。

12月27日，毛泽东给胡乔木写信，建议《人民日报》转载《浙江日报》刊登的报道《人人动手家家扑打，一年四季坚持不懈，吴兴南浔已成“无蝇镇”》，特写《王阿金老太太积极除四害》，社论《除尽四害》和9张有关照片。并要胡乔木告新华社“注意报导除四害和卫生运动”。

12月31日，毛泽东对从朝鲜撤回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方案作了批示。

1958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元旦社论《乘风破浪》。这篇社论是根据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的多次讲话精神写成的。社论中明确提出：从1958年起，全国人民要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技术革命方面来，用15年时间赶上和超过英国。社论再次强调“多快好省”的方针。并且说，**“目前全国农村已经掀起了空前的生产高潮。各地党委必须积极地妥善地领导这个高潮，争取1958年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和大丰收。”**社论还强调说：“事在人为”，“必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充分发挥革命的积极性、创造性，扫除消极、怀疑、保守的暮气。”

就在元旦这一天，毛泽东书赠李淑一的《蝶恋花·答李淑一》一词，在《湖南师院》特刊上首次发表了。

后来，章士钊看到毛泽东的《蝶恋花·答李淑一》一词后，曾经向他请教词中的“骄杨”一词作何解释，毛泽东沉痛地说：

“女子革命而丧其元，焉能不骄！”

又有一次，毛岸青和邵华请毛泽东为他们写一幅《蝶恋花·答李淑一》，以作纪念。毛泽东欣然提笔，写下了“我失杨花”4个字。岸青、邵华十分不解，以为父亲写错了，忍不住问道：

“爸爸，不是‘骄杨’吗？”

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

“称‘杨花’也很贴切。”

然后，他笔走龙蛇，一挥而就。写完了，十分郑重地交给了毛岸青夫妇。

“骄杨”、“杨花”，是毛泽东对杨开慧的礼赞和怀念。杨开慧忠魂有知，亦当含笑九泉。

1月2日，毛泽东对《江苏红领巾支持四十条》新闻作了批示，他写道：

“乔木：红领巾新闻可阅，并可参看江苏报纸由新华社写一条新闻播发”。

1月2日，周恩来飞杭州与毛泽东商谈接见也门巴德尔王太子事。

是日晚上6时，毛泽东会见并宴请也门王国副首相兼外交、国防大臣巴德尔王太子。

1月3日，毛泽东对1957年12月31日《浙江日报》社论《是促进派，还是促退派》作了批示，他写道：

“乔木：此篇很好，可转载，并可广播”。

毛泽东又看了胡乔木等人修改的关于除四害的通知，仍不满意，便亲自动手，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在全国开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的通知》，他写道：

“今冬必须在全国各地开始大举进行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各地尚未动员的必须立即行动起来。**杭州市已决定在两年内基本肃清四害。上海市亦已行动起来。兹将1958年1月2日收到的《上海市开展冬季爱国卫生运动的情况》一份转发给你们，请你们参照办理。今冬除四害布置，城市一定要到达每一条街道，每一个工厂、商店、机关、学校和每一户人家，乡村一定要到达每一个合作社、每一个耕作队和每一户人家。1958年12月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共27个单位将在北京开评比会议，比较各地成绩的大小。**”

毛泽东写罢，又批示道：

“刘、周、朱、邓阅，尚昆用电报发去。抄卫生部和各部门。”

接着，毛泽东翻阅《光明日报》，看到了王佩琨撰写的《十五年后赶上或超过英国》一文。王佩琨在这篇文章中分析了英国经济的特点，比较了中英两国在钢铁、煤炭、机床、化肥等生产方面的差距，认为中国在15年后赶上或超过英国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是可能的。毛泽东阅罢，对这篇文章批示道：

“江青阅，此件很好，可惜未比电力。”

1月3日和4日，毛泽东在杭州西湖边的大华饭店再次召集华东6省市党委第一书记舒同、曾希圣、江渭清、刘顺元、柯庆施、叶飞、江华开会。陪外宾到杭州的周恩来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此前，毛泽东为这第2次杭州会议起草了一个简单的讲话提纲，他写的是：

两类矛盾：敌我；人民内部

人民内部：阶级矛盾；先进落后矛盾

主要：阶级矛盾（过渡时期）

大量：先进、落后

原因：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劳动人民；主观主义的原因；领导的原因——领导好，形势先进占多数，落后迅速克服

经常把几个问题放在心里想一想，同少数人吹一吹，这是一个重要方法。

1月3日，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主要讲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和关于工作方法的一些问题，提出要抓两个12条。他还谈了干劲和反右倾问题。

1月4日，毛泽东再次在杭州会议上讲话。他对中央部分领导人和华东5省1市的第一书记提出了17个问题。

他在两次讲话中，再一次批评了1956年的“反冒进”，还**第一次点名批评了周恩来等人**。他还说：

“没有1956年的突飞猛进，就不能完成‘五年计划’。”

毛泽东**阐述了“不断革命”的思想，他说：**

**“我们的革命步骤是：一、夺取政权，把敌人打倒，这在1949年完成了。二、土地改革，1950年至1952年3年内基本完成了。三、再一次‘土地革命’，社会主义的，主要是实行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1955年也基本完成，1956年有些尾巴。这3件事是紧跟着的，趁热打铁，不能隔得太久，不能去建立新民主主义秩序；如果建立了，就得再花力气去破坏。四、思想战线上、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整风运动，这一次今年上半年就可完成，以后有问题还要搞。”**

毛泽东认为只有坚持不断革命，不断提出新任务，才能使干部和群众经常保持饱满的革命热情。

他特别强调要开展技术革命。他说：

“要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这是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要革地球的命，现在我们只能革地球表面的命**。在整风以后，要准备把注意力逐渐引到搞技术革命上。”

毛泽东还说：

“整风反右斗争以后，一定要把工业、手工业、农业、副业、林业、渔业、牧业、交通运输业、商业、科学、文教、卫生等行业都抓起来，还要反对严重的浪费现象。”

用毛泽东的话说，与1957年12月16日至18日第一次杭州会议相比，这第二次才积累一点意见。杭州会议为后来的南宁会议拉开了序幕。毛泽东谈到的17个问题，成为他后来起草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的雏形。

1月4日傍晚，毛泽东让工作人员到上海去接周谷城、赵超构和谈家桢3人来谈话。

在上海的周谷城突然接到统战部的电话，说是要他马上去统战部。市公安局长黄志波接待了他，说毛泽东要约他与赵超构、谈家桢一起去杭州聊天。3人聚齐后，在江湾机场上了飞机，连夜飞往杭州。谈家桢在专机上看到机舱里的陈设，如同他见到的毛泽东在飞机上工作的照片背景完全相同，就猜想到是毛泽东派专机来接他们的，一问工作人员，果然是毛泽东的专机。工作人员还告诉客人：

“主席交代说，派我的专机去上海，不要怠慢了老朋友。”

3位客人闻听此言，心情都特别激动。

是日晚，西子湖畔，皓月当空。10点多钟，周谷城3人乘车来到一所水木明瑟的庭院里。毛泽东刚开完了一个会议，已经站在门口等候，他对谈家桢说：

“谈先生，老朋友啰！”

毛泽东把客人们迎进室内，里面陈设十分简朴，只有1张方桌，4把椅子。毛泽东和3位客人各据一席，相向而坐。工作人员上了茶水，转身去了。毛泽东见客人都有些拘谨，便笑着问老朋友历史学家周谷城：

“你知道关公姓什么？”

周谷城见毛泽东突然提出这样的问题，不免一怔，便反问道：

“是姓关吗？”

“你错了，”毛泽东微微一笑，说：“关公本不姓关。他原先在家乡杀了人，逃到了潼关，潼关守将盘问他姓什么，他抬头看见潼关二字，于是灵机一动就说自己姓‘关’，从此也就真的姓关了。”

大家见他如此绘声绘色地将民间传说演绎了一遍，都忍不住大笑起来。毛泽东见气氛缓和了，便问赵超构：

“你是哪里人？”

赵超构回答说：

“温州。”

毛泽东说：

“好，你别老呆在报馆里，你可以到那里去跑跑嘛。”

这已经是毛泽东第3次建议赵超构到群众当中去了。后来赵超构按照毛泽东的建议，回到自己的家乡温州地区，深入群众参观访问，写出了《吾自家乡来》一文，在《新民晚报》上连载，其中写道：“我是一个旧知识分子。从我的身上可以看到，毛泽东重视和爱护知识分子是一贯的，特别是对于犯了错误的知识分子，总是热情帮助，一帮到底毫不嫌弃。”

再说毛泽东见赵超构点头同意，就又对谈家桢说：

“当教师的也不要老关在书房里，也要到群众里面去走一走。”

他还关切地问谈家桢：

“把遗传学搞上去，还有什么困难和障碍？”

谈家桢说：

“感谢主席的支持，我本人已经可以开课讲授了。但是有人把这看成是‘统战需要’，说是‘对高级知识分子的照顾’，在思想上并没有尊重摩尔根遗传学派，进一步开展研究工作，仍然是阻力重重。”

毛泽东沉吟了一下，坚定地说：

**“有困难，我们一起解决嘛。一定要把遗传学搞上去！”**

到了深夜，毛泽东邀3位客人共进晚餐。这时，周谷城他们才知道毛泽东还没有吃晚饭哩。4人边吃边谈，吃完饭又继续谈下去。毛泽东精神极好，侃侃而谈，直到凌晨3点，还兴致勃勃，毫无倦意。他看了看表，煞住了话头，说：

“已经3点了，你们太累了，该休息了。我们明天再谈吧！”

从毛泽东住处到上车的院子门口，有一段几百米长的曲折小径。毛泽东披着大衣，坚持要把周谷城3人送到门口，他兴致勃勃地说：

“今晚的集会，也可以算是一段西湖佳话吧！”

毛泽东一直把客人送到车旁，等他们上了车这才回去。

1月5日早上8时许，毛泽东打来电话，邀请周谷城3人一同吃午饭。

这天中午，毛泽东叫谈家桢坐在他身边，边吃饭边谈问题。毛泽东特别谈到了中国科学技术，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问题。

午后，毛泽东在省委负责人的陪同下，驱车到杭州市郊外的浙江省农业科学研究所及其上千亩试验田视察。研究所里显得格外宁静。值班所长楼宇光接待了毛泽东一行人。毛泽东看到大楼走廊里有一部淡绿色的双轮双铧犁，就弯下腰摸摸，问道：

“这是不是你们改进的那种双轮双铧犁？”

楼宇光说，是的。毛泽东又问：

“改进的犁臂是不是已经装上了？”

楼宇光没想到毛泽东对他们的改革工作这么了解，就说，已经装上了。毛泽东走进休息室，他脱下帽子，落座后，点上一支烟，要楼宇光坐下来谈谈所里的情况。楼宇光便把所里的研究工作作了简要汇报。他说，省农科所规模不大，重点是研究提高水稻的单位面积产量，同时也做一些高产杂粮和经济作物的研究工作。所内共分农艺、土壤肥料、植物保护、畜牧等4个系和一个园艺组。毛泽东注视着楼宇光，对他说的每一项研究工作都很感兴趣，而且对许多作物还很熟悉。楼宇光有点紧张，一时忘记介绍油料作物的研究情况。毛泽东问：

“还有花生、芝麻、油菜等油料作物你们是否研究？”

楼宇光马上作了补充。毛泽东又问：

“你们有没有进行农具方面的研究工作？”

楼宇光回答：

“我们只结合做了一些。”

毛泽东说：

“要做好研究工作，你们设立一个专门机构，开展农具研究工作好不好？”

楼宇光说，好。毛泽东把脸转向坐在一边的省委负责人说：

“他是同意了，你赞成不赞成？”

那位负责人说，赞成。毛泽东说：

“那好，你们就向省委提个建议吧。”

“你是学什么的？”

毛泽东又问楼宇光；楼宇光说：

“我学的是土壤农化。”

毛泽东说：

“我想了解一下，农作物所包含的元素以什么元素的比重最大？”

他和楼宇光谈了各种元素的比重后，还谈到了土壤的团粒结构以及日光、水分与农作物的关系。他说：

“你可以借一本关于土壤学方面的书给我看吗？”

楼宇光立即取来两本土壤科学方面的书，送给他。

毛泽东心里装着一件事，那就是怎样提高土壤的肥力，增加农作物的产量。这种调查研究和虚心地请教，终于使他在这一年里提出了“八字宪法”，即“土、肥、水、种、密（合理密植）、保（植物保护）、管、工（工具）”。

毛泽东离开休息室，来到大楼前的试验田里，要观看工人和技术员们演示双轮双铧犁的操作过程。工人张有根用心调整着调节杆，又吆喝着前面两条耕牛，唯恐出差错。毛泽东走到他面前，问：

“你会耕地吗？”

张有根说：

“我会耕地。”

“好哇，你就耕吧。”

毛泽东看着张有根牵了一下牛绳，两头牛就顺从地拉着双轮双铧犁笔直的前行。毛泽东聚精会神地察看双轮双铧犁翻过的深灰色的土壤，望着张有根和刚刚跑过来的楼宇光，问：

“用双轮双铧犁比用旧式木犁省力吧？”

张有根说：

“省力。比起旧式木犁来，还容易操做。”

“我行吗？”

毛泽东转过脸来对着大家问道。张有根和吕其千立即调转犁头，重新将犁插入土中。毛泽东对站在旁边的楼宇光问：

“你行吗？”

楼宇光红着脸没有说话，因为他没有耕过地。毛泽东走上前去，从张有根手中接过双轮双铧犁扶手和牛绳，开始耕地，周围的人尤其是楼宇光，注视着毛泽东驾驭着双轮双铧犁一直犁到了地头。毛泽东放下农具，又询问了职工的生活情况。省农场农具管理局李安邦副局长向他呈送了有关双轮双铧犁的试验资料。

1月5日下午，毛泽东要离开杭州去长沙。浙江省委的几个负责人来到杭州饭店，看看他还有什么事情要吩咐的。毛泽东突然说，要看看杭州市的卫生状况。浙江省委副书记吴宪就说：

“小营巷的卫生搞得最好。”

毛泽东说：

“去看看吧。”

这时候，毛泽东的一些警卫和工作人员已经提前去了笕桥机场，在他身边的只有叶子龙、王金山、李银桥和浙江省公安厅厅长王芳等人。王芳立即告诉杭州市公安局长易成铸去小营巷部署一下，并通知杭州市委书记王平夷到场等候。他还交代司机说，路上车子要开慢一点。

小营巷居民区住着200多户居民，房屋比较陈旧，大多是太平天国时期建筑的，一个不大宽阔的墙门里往往住着十几户人家。解放前这里卫生条件极差，人们都说那时的日子是“荒年缺柴米，丰年少棺材。”解放后小营巷居民摆脱了贫困和传染病的缠绕，“讲卫生、爱清洁”蔚然成风，成了杭州市卫生先进单位。

车子一到小营巷，身着银灰色大衣的毛泽东下了车，见街头巷尾干干净净，没有垃圾纸屑，也很少痰迹。在那些很陈旧但都擦洗得能辨别出木板纹路的大门上，都贴着写有“清洁”二字的红纸条。他来到太平天国听王陈炳文住过的61号院大门口，见两个正在聚精会神地下着军棋的小姑娘都把棋子仆倒在棋盘上，便问：

“你们怎么下仆棋？”

两个姑娘没听懂毛泽东说的“仆棋”的意思，一边埋头下棋，一边纠正说：

“我们是在下暗棋。”

毛泽东听了，微微地笑了，轻声问道：

“我到这里来看一看你们的卫生工作，好吗？”

两个小姑娘随口应道：

“好，好，欢迎。”

其中一个叫戴桂芳的小姑娘，抬头一看，说话的人竟是毛泽东，她非常惊讶，说：

“你……是……毛主席？”

旁边的李银桥朝戴桂芳点点头。毛泽东向她伸出了宽厚的大手。戴桂芳赶紧站起身，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不知道说什么话好。毛泽东说：

“你们做向导，带我参观参观好吗？”

“好，好。”

戴桂芳与何天瑞使劲地点头。这时，石侣琼、程瑜也走进了61号墙门。毛泽东见到她们，微笑着点点头。石侣琼上前握住毛泽东的手，低声说道：

“毛主席好！毛主席好！”

毛泽东又握着程瑜的手，问：

“这里住了几户人家？”

程瑜连忙回答：

“10户。”

准备去上工的杭州永安丝织厂青年工人郑肇勇刚跨出房门，一眼看到毛泽东，便情不自禁地跑上前去，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

“你们这里卫生工作搞得怎么样？”

毛泽东问郑肇勇。郑肇勇结结巴巴地说：

“我们这里的卫生工作搞得还好。”

毛泽东在大家的簇拥下走进过道，看了放在那里的饭桌，又看了菜橱，都像刚擦洗过一样，他问大家：

“你们这里有没有苍蝇？有没有蚊子？”

“没有苍蝇，也很少有蚊子。”

大伙儿回答。毛泽东满意地点点头，又走进厨房。这厨房是10户居民共享的，虽然光线暗淡，有点潮湿，但是锅盖、碗橱等几乎一尘不染，锅灶、煤球炉和炊事用具，都放得整整齐齐，靠着炉灶的那一面墙虽然被烟熏得黑里发亮，但却见不到成串的灰尘。刚下班的女工游静之正在烧菜。毛泽东问：

“你怎么现在才烧饭？”

“我加班。”

游静之有点紧张地说。

“你烧的是什么菜？”

“豆腐。”

“还有什么吗？”

“有，还有牛肉。”

毛泽东打开锅盖看看，笑着说：

“不错，不错，营养不错嘛。”

他细心地看了看厨房内的一切，然后向郑肇勇家走去。

“里面可以进去看看吗？”

毛泽东站在郑肇勇家门口问。郑肇勇打开房门，高兴地说：

“毛主席，欢迎您进来！”

房间里收拾得整整齐齐。墙上挂着毛泽东的像，桌上放着几摞书。毛泽东坐下来，指着桌上的书问：

“这些书都是你看的吗？”

“是的。”

郑肇勇把自己的日记本交给毛泽东看。毛泽东接过日记本，很仔细地看了几页，笑着说：

“很好。”

他伸出手握了握郑肇勇的手。毛泽东转身看到郑肇勇的哥哥从厂里得来的先进工作者奖品，便问道：

“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我是永安丝织厂的青年工人。”

郑肇勇随手拿了一块永安丝织厂出品的丝绸给毛泽东看。毛泽东称赞地说：

“很好，你们一家都很好！”

他和61号院的男女老少一一握手道别，满意地离开了他检查的第一个院落。

毛泽东来到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整个小营巷，人们带着欢乐和兴奋的心情，愈来愈多地汇集到毛泽东身边。毛泽东一边向大家挥手致意，一边慢慢地向前走。他来到居民俱乐部门口，见墙上贴着墙报，便停下来观看。

“这是谁出的？”

他问站在身边的程瑜。程瑜回答说：

“居委会出的，庆祝元旦的。”

“内容不错嘛。”

毛泽东赞许地点点头。看了墙报，他又走进56号墙门。这座大院的房子比61号的好一些。居民的客厅、卧室窗明几净，箱笼、板壁、盆盆罐罐都擦得很亮，屋子角落看不到蛛网，连窗格子上也摸不到灰尘。毛泽东走过刚擦洗过的地板，来到天井。天井里，一字排开5口大水缸，每口缸上都盖着木盖子，毛泽东走到一口缸前，揭开缸盖，仔细地瞧着。

“这是天雨水。”

站在旁边的程瑜向毛泽东解释。此时，自来水还不是很普及，居民们一般都饮用河水或天雨水。毛泽东指着水缸中游来游去的金鱼好奇地问：

“为什么养鱼？”

“鱼吃孑孓。”

孑孓是蚊子的卵在水中孵化出来的幼虫，身体细长，游动时身体一屈一伸。蚊子最喜欢在天雨水里繁殖孑孓，居民们便想到在水缸里养金鱼的办法。毛泽东听了程瑜的回答，高兴地说：

“这个办法很好，可以推广噢。”

56号里还有一个菜园子。居住密度如此高的院落里竟然还有菜园子，毛泽东很感兴趣，他随着石侣琼、程瑜等来到菜园子。菜园左角上有一口粪缸，贮存着浇菜用的人粪尿。粪缸上加了双层盖子，外面也刷洗得挺干净。所以，站在粪缸边也闻不到臭气。程瑜揭开粪缸盖子，对毛泽东说：

“这个粪缸在夏天也不生蛆。”

毛泽东问：

“怎样才不生蛆呢？”

“用石灰洒在上面。3天洒一次。”

程瑜说着，盖上粪缸盖。毛泽东笑着点点头，说：

“不错。”

看了两个大院落后，毛泽东兴致依然很高，对紧跟着他的王芳说：

“再看看。”

王芳点点头，寸步不离地跟着毛泽东走出56号大院。毛泽东看到巷子里有一棵用草绳包扎得严严实实的树，就问程瑜：

“这树是你包的？”

程瑜说：

“不是。”

“你住哪里啊？”

毛泽东边走边和她聊了起来。程瑜回答说：

“住新开街。”

“你姓什么？”

“程，工程的程。”

“叫什么？”

“程瑜，周瑜的瑜。”

“你干什么工作呀？”

“我是居委会负责卫生工作的。”

“噢。”毛泽东停下脚步，重新打量了一下程瑜，说：

“你们的卫生工作搞得不错。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42号大院是一座太平天国时代建筑的房屋，已相当陈旧，但是，泥地上没有一点垃圾，连高低不平的碎石子路上也找不到一根杂草。看得出来，这里的主人们是非常注意卫生的。毛泽东还未跨进42号院大门，居住在里面的孩子们已飞身奔回院子报信：

“毛主席来检查卫生了！”

院子里的人赶紧从各自的家门奔出。毛泽东微笑着亲切地向居民们伸出手去，还不停地招呼着：

“老太太您好！小朋友好！”

经程瑜介绍，毛泽东来到教师胡澄章家。

“这是你们的房间吗？”

毛泽东问。胡澄章回答说：

“是的，毛主席。”

“你叫什么名字？”

“胡澄章。”

“在哪里工作？”

“杭州铁路中学。”

毛泽东点点头，视线移到挂在板壁上的奖状，逐字逐句地念了起来，念完后，又握住胡澄章的手，说：

“哦！原来是一个先进教育工作者，很好！”

当他看到挂在床前板壁上的一张“拼音字母挂图”时，问胡澄章：

“你们在学习吗？”

“我们在学习，小孩也在学习。”

胡澄章一边回答，一边指了指站在毛泽东身边的自己的孩子。毛泽东低下头看看孩子，用手摸了摸他们的头，说：

“很好！”

他发现一张床上没挂帐子，便问：

“不挂帐子，有没有蚊子？”

胡澄章说：

“没有蚊子。”

毛泽东满意地点点头。从胡澄章家出来，他又来到军属居素吾家，走到那张临窗放着的书桌边坐了下来，看见桌子上有一张《杭州日报》，便拿起来问程瑜：

“是今天的报吗？”

程瑜凑上前看了看说：

“是的。”

“你们都订报吗？”

“都订。”

毛泽东高兴地点点头，打开报纸，看起了头版的新闻。外面的群众越来越多，不少人趴在窗框上向屋里张望。毛泽东朝外看看，笑着站起身。他发现室内两张床也没有挂帐子，关怀地问：

“不挂帐子，没有蚊子吗？”

有人告诉他：就是在夏天，这里蚊子也很少。毛泽东满意地点着头，走出了房门。

此刻，小营巷的男女老少都奔到巷子里来了，大家把42号墙门的里里外外围了个严严实实。毛泽东一出来，大家主动闪出一条道，簇拥着毛泽东向前走。毛泽东在大门口一出现，人群中立刻响起了一片欢呼声：

“毛主席好！毛主席好！”

毛泽东微笑着不断地向大家挥手致意。几个胆大的年轻人把手伸过来要和毛泽东握手，毛泽东立即把手伸过去。这只手还未放下，另一只手又把他握住了，接着几十双手又伸向毛泽东。毛泽东无法前行了。王芳建议毛泽东该走了，毛泽东笑着说：

“还早嘛，不急嘛。”

大家簇拥着毛泽东来到车边。毛泽东看到人群中有一位胡须雪白的老人伸着手，想和他握手，可是总挤不到前面来。毛泽东立刻向前两步，握住了老人微微颤抖的手，说：

“你们这里的卫生搞得不错。”

老人感动得流下了热泪。叶子龙、王芳赶紧拥着毛泽东上了车，他还挥着手向群众告别。人们主动让出道来，不断地高呼：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终于要离开杭州了，毛泽东握着担任警卫处处长伍一的手说：

“杭州的山好、水好、人更好，我每次到这里就像到了自己家里一样，走了，又想着什么时候能再回来。”

欲知毛泽东下一站去向何处？请看下一章便知分晓。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57年12月25日写给胡乔木的信，请认真看一看。他在信中说：你起草的**“‘除四害’通知尚有缺点，不扎实，轻飘一些。这是因为没有研究各地已经取得的丰富经验，你脑子里对此问题还很不懂的缘故。”“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将全国各省、市、县见于报纸的经验一齐找来仔细看一遍，边看边想，形成成套思想，然后下笔成文。至少改3遍、5遍，找彭真、刘仁及北京有经验的除害干部二、三人及科学家二、三人开一两次会，发表意见，修正文件，字斟句酌，逻辑清楚，文字兴致勃勃。**”“**然后讲方法，也要讲得入情入理，使人觉得切实可行，没有外行话。”“然后讲到书记动手，报纸、刊物、广播、定期扫除、定期检查等事**。”可是到了1958年1月3日，毛泽东看了胡乔木的修改稿，还是不满意，便亲自动手为中央写了一个关于“除四害”的通知。不是有人说“毛泽东选集一些文章出自胡乔木之手”吗？自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初，他就跟在毛泽东身边，如今写一个通知还要毛泽东如此仔细地点拨而尚未写成，那些荒诞不经的谣言，还值得认真一驳吗？

**第44章**

**“社论引了我说扫盲‘用急躁冒进的办法是不对的’这些话，用来作为**

**反对急躁冒进的根据。社论表面上既反‘左’也反右，没有重点，实际**

**上重点落在‘反冒进’上面。作者引用我的话来反对我。”**

话说1958年1月5日傍晚，毛泽东乘飞机离开杭州，飞向长沙。

毛泽东一下飞机，就向迎接他的省委书记们介绍了双轮双铧犁，并建议湖南大量生产双轮双铧犁，推广双轮双铧犁。

毛泽东把在杭州起草的17个问题向湖南省委书记作了介绍。他还提出：县以上各级党委要抓社会主义建设工作，包括工业、手工业、农业、农村副业、林业、渔业、畜牧业、交通运输业、商业、财政金融、劳动工资和人口、科学、文教、卫生14项。其中工业又可细分15项：产量指标、产品质量、新产品试制、新技术、先进定额、节约原材料和寻找代用品、劳动组织、劳动保护和工资福利、成本、生产准备和流动资金、企业的分工和协作、供产销平衡、地质勘探、资源综合利用、设计和施工。

在农业方面，毛泽东从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里抽出14个要点，要求各省地县委抓住不放。

在工作方法上，毛泽东提出要掌握时机；计划要有两本账，要推广试验田，抓两头带中间，相互参观学习，开展评比活动，加强检查督促，加强调查研究；领导干部一年要有4个月在下面调查研究，接触工人农民，增加感性知识。领导原则是：“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负责。”

毛泽东特别强调不断革命。他说：

“**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着一个的**。从1949年全国范围内夺取政权开始，接着就是反封建的土地革命、农业合作化、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又是政治战线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革命今年7月可以基本告一段落，但还没有完结。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在15年内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要求各级干部努力学习科学技术，做到红与专、政治与经济、政治与技术、政治与业务的统一。要求重视知识分子，各部、省、地、县都要培养专家‘秀才’，没有知识分子不行，无产阶级一定要有自己的秀才。”

毛泽东对国内形势的看法是非常乐观的，认为是发动“大跃进”的好时机。他说：

“我们现在看见了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人民群众在生产战线上这样高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全国人民为在15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内在钢铁及其他主要工业产品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这个口号所鼓舞。一个新的生产高潮已经和正在形成。”

毛泽东寄希望于湖南省委做促进委员会，不要做促退委员会，要多快好省，不要少慢差费。

湖南省委详细汇报了干部蹲点办试验田及湘江机械厂（株洲331厂），采取“自建公助”解决职工“房荒”等问题，毛泽东很感兴趣，认为可以推广。

5日晚上，毛泽东在长沙观看了木偶戏《追鱼记》和花鼓戏。

1月6日上午10时，毛泽东接见省委、省军区主要负责干部，尔后由省委书记周小舟和省长兼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程潜陪同，在省委办公楼前同军队和地方科、处级以上干部500多人合影留念。合影已毕，程潜对毛泽东说：

“北京与湘相距甚远，不便兼顾，我想辞去省长一职，让年轻一些的同志担任。”

毛泽东微笑着说：

“颂公怎么要提出辞职？是不是以为用了右派而引咎辞职呀？这不要紧嘛，我不是也用了右派吗？以后你可以半年在北京，半年在湖南，夏初秋末在北京住，春冬两季在长沙住。”

他吸了一口烟，又严肃地说：

**“现在大局安定，领导班子不能随意调换。颂公是中央的人，我们没有把你当巡抚看待，您德高望重，还是您担任省长为宜。”**

程潜听毛泽东如此说，便连连点头，说道：

“我听主席的安排，尽力而为，尽力而为。”

1月6日这一天，毛泽东又从长沙飞到了广西南宁，下榻于明园，起草了一个关于召开南宁会议的通知。

1月6日下午，邓小平在北京中南海居仁堂里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主要内容是传达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

居仁堂是一座小巧玲珑的宫殿，坐落在中海和南海的交界处，在丰泽园的北面。相传清末慈禧太后经常在此接见外国使节。中共中央书记处就在这里办公。

吴冷西列席了这次会议，彭真递给他一个召开南宁会议的通知。吴冷西接过一看，乃是毛泽东亲笔所写的通知，不禁大吃一惊，只见上面写的是：

“吴冷西、总理、少奇、李富春、薄一波、黄敬、王鹤寿、李先念、陈云、邓小平、彭真、乔木、陈伯达、田家英、欧阳钦、刘仁、张德生、李井泉、潘复生、王任重、杨尚奎、陶铸、周小舟（已到）、史向生、刘建勋、韦国清、毛泽东，共27人，于11日、12日两天到齐，在南宁开10天会，20号完毕（中间休息2天到3天，实际开会7到8天）。谭震林管中央，总司令挂帅，陈毅管国务院。”

吴冷西怎么也想不到，毛泽东会把自己的名字放在最前面！他心想：我是《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这次会议可能同报纸和通讯社有关：《人民日报》几天前发表的元旦社论《乘风破浪》，只是经过刘少奇和周恩来审阅定稿，因为毛泽东那时在杭州，所以就没有送他审阅，是不是社论内容有什么重大问题？可是，听邓小平传达的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所谈的17个问题，都没有涉及到报纸和通讯社呀！想到此，他就问胡乔木和杨尚昆：

“南宁会议通知名单，主席为什么会这样排列？”

胡乔木和杨尚昆说：

“不了解开会通知的名单排列有什么特殊意义。”

吴冷西从胡乔木的神态上，明显地感觉到他似乎也在担心，可能要发生什么事情。

1月7日下午2点多钟，毛泽东要到邕江里去冬泳。

此时，运动员梁亚华和他的几个青年伙伴，正在南宁市水上游泳池进行冬季训练，只见教练员急匆匆走来，把梁亚华叫上岸，带到一位负责人面前。那人告诉梁亚华说：

“有紧急任务，陪一位首长游泳，你马上做好准备！”

梁亚华不敢怠慢，立即将“205号”小汽艇准备妥当，带上伙伴，开往邕江岸边。他们远远看见有几个警卫员模样的年轻人，正在紧张地测试江水的温度。

20分钟后，几辆轿车来到了江边。毛泽东在省委领导人的陪同下，先后下了车。卫士张木奇向毛泽东报告说：

“主席，水温17度半，有点凉。”

毛泽东笑了笑，说：

“17度半还凉吗？没关系，勇敢些，能游的都去游。”

他更衣后穿着睡衣登上“205号”汽艇，站立船头，一是为浏览两岸景色，二是要适应一下气温。汽艇迅速驶向江心，不一会儿，到了预定地点，早有梁亚华和几个运动员划着舢板来接。毛泽东和卫士们上了舢板，开始做下水的准备。卫士们穿着泳裤不停地搓着身子，尽管如此，浑身还是起满了鸡皮疙瘩。毛泽东则是先用毛巾沾着江水擦抹前胸和脊背，然后又把双脚浸到水中。岸上的人问：

“主席，冷不冷？”

“下决心就不冷。”

毛泽东说罢，就扶着舢板的边沿下了水。梁亚华几个人也随着跃入水中，护卫在毛泽东周围。毛泽东朝卫士们招呼道：

“不要怕嘛，越怕越哆嗦。下来一游就没事了。”

卫士们听他如此说，只得下了水，立时冻得透不过气来。尽管如此，他们个个还都咬着牙坚持着。果然，过了不大一会儿，还真的比较适应了。毛泽东摆动双臂，做了几个轻松自如的动作，朝卫士们看了一眼，脸上泛着孩童般的得意，说道：

“不过如此！”

他时而蛙泳，时而侧泳，时而又踩水，游至酣畅处，还拿出了他的独门绝技：面向蓝天，手脚不动，仰卧在水面上长达几分钟。

半个多小时过去了，卫士们的脸色有些发青，有几个实在耐不住了，缩着身子就往岸上跑，手忙脚乱地往身上套衣服。毛泽东的随身医生对着毛泽东喊道：

“主席，上来吧。”

“再游10分钟。”

毛泽东坚持说。10分钟过去了，他已经游了1000多米，到了沙石公社新码头附近，经大家再三劝说，这才上了船，披着衣服，神态自若地坐在船头晒太阳。张木奇活动着身子问毛泽东：

“冷不冷？”

毛泽东看了他一眼，说：

“下决心就不冷，不下决心就是20度也冷。”

抽了一会儿烟，他转脸问李银桥：

“带酒了没有？”

李银桥摇了摇头，说没带。毛泽东平常不大喝酒，就是喝也只是来点葡萄酒。这次出来游泳，李银桥自然想不到要准备点酒。他知道毛泽东也感到冷，于是就拧一条热毛巾替他擦身子，张木奇也马上拧了一条热毛巾来给毛泽东擦身子。毛泽东朝他们笑了笑，没有吭声。

1月8日凌晨1时，空军雷达部队突然发现国民党的一架飞机正由海上向南宁方向飞来，随毛泽东一同到南宁的空军副参谋长何廷一非常紧张。他首先想到的是，难道国民党探知了毛泽东的行踪？知道了南宁会议的安排？事态紧急，不敢怠慢，他立即要秘书用电话紧急联系柳州军用机场，命令那里的空军歼击机立即起飞，无论如何也要拦住敌机，把他干掉。他又要求南宁市全部断电熄灯，全城立即进入空防状态。

此时，毛泽东正在看书，李银桥和其他卫士急匆匆地进了卧室，简单说明情况，请他速进防空洞。毛泽东把手一挥，说：

“我不去，要去你们去。”

李银桥说：

“我们要对主席的安全负责。”

毛泽东说：

“蒋介石请我去重庆，我去了，怎么样呢？我又回来了，他能把我怎么样？现在还不如那时安全吗？你去把蜡烛给我点着。”

李银桥坚持劝毛泽东去防空洞，他说：

“主席，还是防备万一，去防空洞吧。”

毛泽东显然有些不耐烦了，脱口说道：

“我不去！把蜡烛点着！国民党把炸弹扔到我门口它就不敢响！我什么时候怕过他们？”

蜡烛点燃了，毛泽东继续看书，他看的是《楚辞》，他是那样聚精会神，津津有味，仿佛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似的。

1月9日，毛泽东带着大口罩漫步在邕江北岸，和路旁一家糖果店主人聊天，询问他的生意和生活情况。

尔后，毛泽东到了码头上，和准备渡江的群众交谈。他被群众认出后，便摘下口罩，和围过来的群众握手。

事后，毛泽东对担心他的安全问题的身边身边工作人员说：

“就是不应怕群众，不要害怕群众嘛！”

1月10日下午2点多钟，毛泽东再次游邕江。他这次是从凌铁渡口登上“喷水2号”小汽艇，由南宁航运分局船员周桂南驾着“205号”汽艇护卫。

毛泽东下水后，有10多名随行人员陪游。他们游过了水深流急的母猪湾，到津头渡口上了岸，一行人驱车来到广西军区303医院。

在医院后门西面的两棵大树下，毛泽东接见了一些医护人员和伤病员们。他看到战士们自觉地排起了整齐的长队，非常高兴地和他们一一握手问候。

毛泽东对他在邕江两次冬泳颇为得意。后来，他在和老朋友周谷城谈话时这样说：

“我在南宁时，打算游水。南宁的同志这也怕，那也怕，就是不愿意让我游。其实，凡水皆可游，南宁的水是水，南宁的水也可游。这不是很合乎三段论法吗？当然，在大前提下应该加上下面几个条件：水只有一脚背深的游不得，近沸腾了的游不得，结成冰块了的游不得。”

且说1月11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和部分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性质的“南宁会议”。

在他通知的27人中，陈云、邓小平、潘复生3人因故没有到会。周恩来则是在中途到会的。

毛泽东的住处，离广西自治区政府交际处大楼不远。这栋建筑是经常接待越南胡志明的别墅式的高大平房。南宁会议就是在这间大平房的客厅里举行的。

南宁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和预算问题，以及在社会主义建设出现高潮的形势下，如何改进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的问题。会议印发了22个参考文件，其中有3件是作为多快好省的对立面——反冒进的材料**供与会者批判**的，它们是：**周恩来在1956年11月八届二中全会上关于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报告的节录，李先念在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上关于1956年预算报告中的有关反冒进部分，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摘要。**

毛泽东在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中的摘要材料上加了这样的批语：

**“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庸俗的辩证法。文章好像既反‘左’又反右，但实际上并没有反右，而是专门反‘左’，而且尖锐地针对我的。”**

这3个文件一发，会议的气氛就紧张起来了。

吴冷西见毛泽东如此批评《人民日报》社论，马上找到胡乔木，问毛泽东批评的《人民日报》社论是怎么回事？胡乔木说他也不清楚。两人商量后，当晚打电话回北京，要《人民日报》编辑部把1956年6月20日社论的全部过程稿，送到南宁，还要写一个关于社论起草与修改、定稿过程的简单说明。第二天，吴冷西收到《人民日报》编辑部送来的材料，他和胡乔木一起查看了社论的整个起草过程。原来，**这篇社论最初是由《人民日报》编辑部起草的，中宣部在讨论时，陆定一认为不能用。他请示了刘少奇，刘少奇要他根据政治局会议精神组织中宣部起草。后来，中宣部的初稿由王宗一起草，中宣部讨论修改后，由陆定一送刘少奇和周恩来审阅。刘少奇和周恩来分别作了一些修改，还提出了一些意见。陆定一又做了一些修改，再送刘少奇。刘少奇在个别地方修改后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后，未改一字，只在最后定稿的清样上圈了他的名字，批上了3个字：“不看了。”**

1月11日晚，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发表了讲话，着重讲反对分散主义和关于反冒进两个问题。关于反对分散主义，毛泽东说：

“国务院向全国人大的报告，我有两年没看了。章伯钧说国务院只给成品，不让参加设计，我很同情。不过他是搞资产阶级政治设计院，我们是无产阶级政治设计院。只给成品，不给原料，不行。你们平时就不跟我们通气，不拿一点半成品、原材料来，一定要等到你们把什么都搞好了，才拿给我们，这实际上对我们是一种封锁。财经部门不向政治局通情报，没有共同语言。农业纲要四十条，最初是8条，后来是17条，同地方的同志多次交谈议论，最后才形成四十条。这回先到杭州，同华东同志谈了十几条；在这里又谈了二十多条。”

他还说：

“中央只揽了一个革命，一个农业，其他实权在国务院。有人反对党政不分，想把大权揽过去，让党委搞点小权，最好的好意也是想将一半大权揽过来，这样就没有集中了。”“集中，只能集中于党委、政治局、书记处、常委，只能有一个核心。”“为了反对分散主义，我编了一个口诀：‘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

毛泽东批评分散主义是针对国务院的。参加会议的王任重在日记中写道：“晚上和先念、富春、一波同志谈了主席的讲话，对于这样尖锐地批评分散主义感到一些突然。”

接着，毛泽东又批评反冒进。他说：

“我们是搞‘虚业’的，你们是搞‘实业’的，‘实业’和‘虚业’应当结合起来。搞‘实业’的，要搞点政治；搞‘虚业’的，要研究点‘实业’。”“管‘实业’的人当了大官、中官、小官，自以为早已红了，钻到里面出不来。**1956年冒进，1957年反冒进，1958年又冒进。看是冒进好，还是反冒进好？**”

他举了治淮河的例子。说治淮河，解放以后七八年花了12亿人民币，只搞了12亿土方。安徽今年已经搞了八亿土方，再搞八亿土方，不过花几千万元。

毛泽东用带有警告的口气说：

“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首先没有把指头认清楚，10个指头，只有一个长了疮，多用了一些人（工人、学生），多花了一些钱，这些东西要反。当时不提反冒进，就不会搞成一股风。**吹掉了3条，一为多快好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这是属于政治，不属于业务。一个指头有毛病，整一下就好了。”“没有搞清楚6亿人口的问题，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泄气？”**“破破烂烂的一个中国，蒋委员长20年只搞了4万吨钢，理应失败。”**

1月12日清晨，毛泽东在翻看新到的全国各地报纸后，挑了几份送给广西省党委第一书记刘建勋、书记处书记韦国清，并给他们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刘建勋、韦国清二同志：

送上几份报纸，各有特点，是比较编得好的，较为引人看，内容也不错，供你们参考。

省报问题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值得认真研究，同《广西日报》的编辑们一道，包括版面、新闻、社论、理论、文艺等项，钻进去，想了又想，分析又分析，同各省报纸比较又比较，几个月时间就可以找出一条道路来的。精心写作社论是一项极重要任务，你们自己、宣传部长、秘书长、报社总编辑，要共同研究。第一书记挂帅，动手修改一些最重要的社论，是必要的。一张省报，对于全省工作，全体人民，有极大的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的作用。请你们想一想这个问题，以为如何？

毛泽东 1958年1月12日上午7时

1月12日上午，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发表第2次讲话，他一开头就说：

“8年来我们为这样一个工作方法而奋斗。”

他所说的工作方法是指多快好省。接着，他继续批评反冒进，说道：

“在杭州会议上，我当着恩来发了一通牢骚。**1955年12月，我写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对全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是‘个人崇拜’，‘崇拜偶像’？不管什么原因，全国各地的报纸、大小刊物都登了，发生了很大影响。这样，我就成了‘冒进的罪魁祸首’。”**“**后来又心血来潮，找了34个部长谈话，谈了十大关系，就头脑发胀了，‘冒进’了，我就不敢接近部长了。**”“财经工作有很大成绩，10个指头只有1个不好，讲过一万次不灵。工作方法希望改良一下子。这一次，**千里迢迢请同志们来一趟，是总理建议的。本来我不想多谈，有点灰心丧志。”**

毛泽东接着说：

“反冒进使6亿人民泄了气，是方针性错误，是政治问题。6亿人民一泄了气不得了，这一点被右派抓住了，来了一个全面反‘冒进’。**右派一攻，把我们一些同志抛到距离右派只有50米远了，慌起来了。什么‘今不如昔’，‘冒进的损失比保守的损失大’**。”

谈到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毛泽东说：

“这里一篇反‘冒进’的社论，既要反右倾保守，又要反急躁冒进，好像‘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实际重点是反‘冒进’的。**社论针对谁？是针对我的‘序言’提出批评。又引用了我在‘序言’中讲的一段话。我的文章重点不在此，而在反右倾保守，要引就应引用全文。文章把我撇开，又要利用我。**廖鲁言向我反映，40条被吹掉了，似乎并不可惜。对此可惜的人有多少？叹一口气的人有多少？一下吹掉了3个东西。反‘冒进’的人为党为国，忧虑无穷，脱离了大多数部长和省委书记，脱离了6亿人民。”

毛泽东讲了宋玉写《登徒子好色赋》的故事，又说：

“他们用的都是一个方法，叫作‘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我们打了20多年仗，打仗必须发动群众。土改也是要发动群众，历来反对恩赐观点。社会主义发动群众应当更充分些。大鸣大放，发动群众。为搞水利，不发动群众不行。冒进是全国人民热潮冲起来的，是好事。**搞工业，搞农业，难道比打仗还厉害些？我就不相信，搞经济就那么复杂，那么多学问？**”“一个时期搞得快一点，多一点，调整一下是可以的，但不要提出‘反冒进’的口号。‘反冒进’挫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特别是农民的积极性，是错误的方针，是反对多快好省的方针的。”“最怕的是6亿人民没有劲，抬不起头来。”

毛泽东再次批评了分散主义，他说：

“我对付分散主义的办法是消极抵抗，还要小会批评，当着众人批评。**事先要通一点情报，总是说没有搞好，实际上是封锁。开会前10分钟把文件拿出来，要人家通过，不考虑别人的心理状态。**”“**我不是攻击所有的人，是攻击部长以上的干部，攻击下倾盆大雨的人。**”

这时候，周恩来因为工作关系，留在北京，没有参加会议，没有直接听到毛泽东上面的那些讲话。

1月12日晚，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信中写道：

“我今晚我又读了一遍《离骚》，有所领会，心中喜悦。”

1月13日，周恩来乘飞机来到南宁。

是日晚，毛泽东同刘少奇、周恩来谈话，直到深夜。

1月14日，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第3次讲话，主要内容是工作方法问题，共有24条，比杭州会议的17条更为系统化。毛泽东批评反冒进和国务院的工作仍然很尖锐。这次，他用平衡与不平衡的哲学观点来批评反冒进，他说：

“我们的工作计划，又平衡又不平衡。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净讲平衡，不打破平衡是不行的。反冒进就是讲平衡，却不知道反冒进伤了许多人的心，兴修水利、办社、扫盲、除四害都没劲了。”“要注意9个指头与1个指头的区别，一定要抓住主流，抓错了就不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种做法，历史上吃过大亏。教条主义这样搞过，因小失大。”

从1月15日开始，各省市党委第一书记和国务院分管经济工作的负责人在会上作1958年工作安排的汇报，毛泽东每天都出席会议，并不断插话，有时还讲得很长。

1月15日这一天，毛泽东在听取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汇报时插话说：

“真理在湖北，为什么不在别处？他们10年计划能6年完成，农业如此，工业为何做不到？问题是过去没有抓。”

他还表扬了柯庆施1957年12月25日在上海市党代表会上的报告，他说：

“这个报告把中央许多同志比下去了，中央工作的同志不用脑筋，不下去跑跑，光在那里罗列事实。”

毛泽东说：

“大家都要学习柯老。”

他说：

“上海对内部矛盾问题的讲法有所发展，他们搞了两个月。浙江对此也有创造。各省理论怎样？没有理论，领导困难。”

毛泽东在谈到“什么时候都要鼓干劲、力争上游”时，提到了《人民日报》。他说：

“《人民日报》今年的元旦社论写得好，因为它的主要精神是鼓起干劲，力争上游，乘风破浪，这也是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问题。”

这天晚上，毛泽东找胡乔木和吴冷西到他的住处谈话。他一开始就问：

“今年的元旦社论是谁写的？”

胡乔木说：

“是《人民日报》的同志写的。”

吴冷西说：

“这篇社论经乔木同志作了较多的修改，并经少奇同志和周总理定稿。”

胡乔木说：

“当时主席不在北京，少奇同志说定稿时已打电话报告了主席。”

毛泽东说：

“社论写得好，题目用《乘风破浪》也很醒目。南北朝宋人宗悫就说过‘愿乘长风破万里浪’。我们现在是要乘东风压倒西风，15年赶上英国。你们办报的不但要会写文章，而且要选好题目，吸引人看你的文章。新闻也得有醒目的标题。”

毛泽东又重提1957年春天《人民日报》不宣传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精神。他说：

“《人民日报》能结合形势写出这样好的元旦社论，为什么去年就成了死人办报？”

他对着胡乔木说：

“**我当时很生你的气。我先一天批评你，第二天批评总编辑邓拓和副总编辑。**当时在气头上，说话有些过重，很不温文尔雅。因为不这样就不能使你们大吃一惊，3天睡不着觉。**去年4、5、6月，实际上是我当《人民日报》的总编辑。你也上夜班，看大样，累得不行。后来我想，这也不是办法，才找个人给你做助手。找不到别人，就派吴冷西去。”**

毛泽东又转对吴冷西说：

“当时我对你说过，如果在《人民日报》呆不下去，就回到我这里当秘书。看来派你到《人民日报》去没有错。现在大家对《人民日报》反映比较好，认为有进步。评论、新闻都比较活泼。但是还要努力，不要翘尾巴，还是要夹着尾巴做人。”

吴冷西说：

“现在《人民日报》采取各编辑部包干写评论的办法。”

毛泽东说：

“《人民日报》的评论要大家来写，各编辑部在他们分工的范围内包干的办法是好的。但包干也要有个统帅，你这个总编辑就是统帅。你的任务是组织大家写，自己也写。有一些重要的评论你要亲自主持写，像我们前年起草《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两篇编辑部文章那样，是我亲自主持写的。”

说到这里，毛泽东提起他在12日写给刘建勋、韦国清的那一封谈要办好省报问题的信。他说：

“我之所以写这封信，是鉴于《人民日报》的经验教训，不仅中央报纸，而且省级报纸，也要认真办好，关键是党委要抓紧。

你们采取包干的办法写社论，可以避免一个人独揽一切，既有分散，又有独揽，这也是一种生产关系，一种工作方法。总编辑同各编辑部主任的关系应该这样，有统有分。各编辑部和各版可以展开竞赛，半年或一年评比一次，看谁搞得好。

写评论要结合形势，结合当时的政治气候。要看得准，抓得快，抓得紧，转得快。要像今年元旦社论这样，**不要像去年2、3、4月那样，对我在最高国务会议的讲话毫无反应，闻风不动。**评论要写得中国化，有中国气派，不要欧化，不要洋八股，不要刻板，要生动活泼。形式要多样化，有编者按语，有短评、时评，有专论、社论，有评论员文章，有观察家文章，编辑部文章，等等。评论是说理的，但不排斥抒情，最好是理情并茂。”

毛泽东说罢，问吴冷西：

“最近有没有到地方上走走？”

吴冷西说：

“我到《人民日报》后一直忙于内部工作，还没有到地方上调查研究。”

毛泽东严肃地说：

“《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头头，一定要经常到地方上去，呼吸新鲜空气，了解下面的实际情况，搞好同省委的关系。你2月份就下去，到两广和福建跑一跑，既当记者，又做地方工作，你不要老呆在北京。**北京官气重，只能做加工厂，没有原料，原料来自下面。**你的位置应该活动一下，经常到各地跑跑。2月份下去一个月或两个月都可以，八大二次会议时再回来。《人民日报》是中央一个部门，有任务经常联系地方，还有任务经常转载地方报纸上的好东西。这对地方报纸是鼓励，也使地方上的同志非看《人民日报》不可，而且还可以把一个地方上的好东西向全国推荐。你们前些日子介绍上海梅林食品厂和浙江桐庐县的经验就很好。上海、广东和浙江省委的3个报告，要《人民日报》考虑转载。这3个报告也不是都写得很好，报纸可以摘要发表。”

吴冷西报告说：

“《人民日报》准备有计划地在第5版发表一些思想评论。”

毛泽东说：

“《人民日报》是中央机关报，不能简单地报道各项具体工作、具体业务，它的主要任务是从思想上、政治上影响全国。我赞成你们写思想评论，而且要当作一项重要的思想政治工作来做，认真做好。比方说，红与专的关系是一个重大问题，你们可以就这个问题展开议论，要号召全国各地、中央各部门、党政军民学都来注意红与专的问题。”

他又询问了《人民日报》的内部情况，吴冷西汇报了报社内干部的基本状况。毛泽东说：

“要学会用人。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每个人都有长处和短处。要善于用他的长处，帮助他克服短处。你不要搞一言堂，要让不同的意见能充分发表。古人就提倡‘兼听’，共产党人应该更能‘兼听’。‘兼听则明’，听到各方面的反映，就能够从中吸取各方面的营养，减少工作中的失误。”

胡乔木插话说：

“我在去年初没有抓紧宣传主席讲话，主席批评我浅、软、少，是对的。”

他趁机汇报了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那篇社论起草的整个过程，并说他那时正在起草“八大”政治报告，无暇顾及此事。毛泽东说：

**“这不关你的事。那篇社论写好后曾经送给我看。我在清样上写了‘不看了’几个字。骂我的东西我为什么要看。”**

这次谈话已经进行了近2个小时，毛泽东毫无倦意，他说他还要准备明天的讲话，胡乔木和吴冷西就起身告辞了。

1月16日上午，南宁会议听取柯庆施的汇报。毛泽东在插话中先从柯庆施1957年12月25日在上海市一届二次党代会上的报告讲起。他说：

“这一篇文章把我们都压下去了。”

本传前面已经说过，柯庆施的报告题目是《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此文后来曾经毛泽东亲笔修改过，刊登在《人民日报》上。毛泽东接着说：

“上海的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五分之一，有100万无产阶级，又是资产阶级最集中的地方，资产阶级首先在上海产生，历史最久，阶级斗争最尖锐，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这样一篇文章。这样的文章，北京不是没有也，是不多也。”

他转向周恩来问道：

“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

周恩来说：

“我写不出来。”

毛泽东说：

**“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

他又转向大家说：

“周恩来的报告（指周恩来1957年6月26日在一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笔者注），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问题是如何说成绩与缺点。省委书记要研究理论，培养秀才，要研究文法、考据、词章，一人每年搞个把篇文章，事情就好办了。苏联文件不重视理论，没有理论兴趣，不讲哲学，文法也不对，光说些事务上的事情。领导干部也要研究文法，什么叫介词、连接词；因为，所以，虽然，但是等，都是连接词。研究词章之学，这是文法。不讲这些东西，于革命事业不利。要学理论，读点书，还要学习一点外文。没有理论，凭什么做领导工作？领导干部要自己动手，集体创作，开动脑筋，不搞出点理论不行。”

“任何一个部门，任何一个省委，任何一个军委，特别是报纸，一定要学理论，做理论工作。各个部门、党委和报纸的主要负责人，要经常挤出时间来学习理论，学习各方面的知识。

**这次我特意指定吴冷西来参加会议，因为他是党中央机关报的总编辑，他应该了解全面的情况。**报纸是新闻纸，对许多事情的反应要快，但勉强求快就会出错。现在《人民日报》反应中央的意见比较快，比较好，但还要进步。有些重大问题自己没有把握，就应多加斟酌，不可草率从事。不仅报纸的重要文章要多加斟酌，中央各部门、各地方党委给中央的文件，应该像中央前年写《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两篇文章那样认真讨论，认真修改。如果不这样认真，那么你这个部长，你这个省委书记，早晚有一天要垮台。

现在大家都说很忙，为党为国，夜以继日。但是，只搞些数字，不搞理论，不搞辞章学，不搞考据学，不搞逻辑学，写出来的东西就是一大堆数字、材料，没有把心思放在理论方面，这种情况很不好。《人民日报》总编辑更要重视理论，不要被日常流水一般的新闻报道淹没了。”

“要破暮气，讲朝气。暮气，就是官气，我们都相当地有一些。世界大发明家，往往不是大知识分子，都是青年。王弼22岁死，颜回活了32岁，‘后生可畏’。周瑜二十几岁、李世民十几岁当‘总司令’。现在我们这一班人，容易压制新生力量。要讲革命朝气，保持旺盛的斗志。”

毛泽东在1月16日的讲话提纲中说，学《楚辞》，要先学《离骚》。后来，他批示将《离骚》印发给与会者们。

正是：一生惟恐知音少，高山流水谁与闻？耳提面命人不倦，和者盖寡是阳春。

1月17日将近午时，毛泽东的情绪仍然处于亢奋之中。两年前横渡长江后，他在《水调歌头》中描绘的那个宏伟蓝图，也就是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设想，还能够实现吗？

此前，薄一波曾反映说，关于此项水利工程，还有一些人表示反对；而且在水电、水利两个部门之间，也有许多矛盾难以协调。看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是把争论的双方即长江水利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水利专家林一山和主管水电建设的李锐找来，让他们当面鼓对面锣，各抒己见，说个清楚。于是，毛泽东决定，派飞机去北京、武汉接李锐、林一山来南宁，开一个专题会议。

1月17日下午，南宁会议听取李先念汇报。毛泽东插话又一次批评反冒进。他拿着《人民日报》那篇反冒进的社论，念一段，批驳一段。他说：

“**《人民日报》的社论是6月20日发表的，距离李先念同志在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3次会议上的报告只有5天。那个报告是反冒进的，社论发挥了‘反冒进’的思想。**”

他接着念了社论中的一段话：

“急躁情绪成为当前的严重问题，因为它不但存在于下面的干部中间，而且首先存在于上面的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间，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是上面逼出来的。全国农业纲要40条一出来，各系统都不愿别人说自己右倾保守，都争先恐后地用过高的标准向下布置工作，条条下达，而且都要求很急。各部门都希望自己的工作很快做出成绩。中央几十个部，每个部一条，层层下达，甚至层层加重，下面便受不了。现在中央已经采取一系列措施，纠正这种不分轻重缓急、不顾具体情况的急躁情绪。”

他念完了这段话，说道：

“**这是说，中央已经下决心反冒进了。**”

说罢，他继续念社论中的另一段话：

“现在，中央已经采取措施纠正这种情况了，各部门、各地方工作中的冒进倾向，有些已经纠正了，有些还没有纠正，或者纠正的不彻底，但作为一种思想倾向不是一下子所能彻底克服的，需要我们今后经常注意。”

他读完了这一段，又边评边读边议论：

“这些话的意思是说，还要继续‘反冒进’。急躁冒进究竟从何而来？《人民日报》的社论说：‘**在反对保守主义之后，特别是中央提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方针和发布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后，在许多同志头脑中就产生了一种片面性（急躁冒进）。’这一段话是尖锐地针对我的。**

这篇社论说的是既反右又反‘左’。你不能说它一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好像有一点。社论说：‘右倾保守思想对我们的事业是有害的，急躁冒进思想对我们的事业也是有害的，所以两种倾向都要加以反对。今后我们当然还要继续注意批判和克服右倾保守思想的各种表现，以保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受阻碍地向前发展。’你说这些话不对？这是对的啊！但是，这是庸俗的马克思主义。你看，这篇社论下面接着就说：‘但是在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时候，我们也不应当忽略或放松了对急躁冒进倾向的反对。只有既反对了右倾保守思想，又反对了急躁冒进思想，我们才能正确地前进。’**这篇社论的落脚点是落在反对急躁冒进，反‘左’而不是反右上面。社论的作者把文章做在了‘但是’后面。**

社论引用了我在《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序言中的一些话。看来作者的用意一来不要冒犯我，二来是借刀杀人。但引用时又砍头去尾，只要中间一段，不引用全文，因为，一引用全文就否定作者的观点了。我写的序言全文的主要锋芒是对着右倾保守的。**社论引了我说扫盲‘用急躁冒进的办法是不对的’这些话，用来作为反对急躁冒进的根据。社论表面上既反‘左’也反右，没有重点，实际上重点落在‘反冒进’上面。作者引用我的话来反对我。”**

“我并不反对对某些搞过了头的东西加以纠正，但反对把1个指头的东西当作10个指头的东西来反。对过急过多的东西加以调整是必要的，但在全国范围内把急躁冒进当作主要倾向来反对就错了，这实际上是反对多快好省的方针。**《人民日报》的社论反冒进，使用的是战国时代楚国一位文学家宋玉攻击登徒子大夫的手法，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这个故事的起因是，登徒子大夫在楚襄王面前说：宋玉此人‘体貌闲丽，口多微词，又性好色’，希望楚襄王不要让宋玉出入后宫。有一天楚襄王对宋玉说：登徒子大夫说你怎么样怎么样。宋玉回答说：‘体貌闲丽，所受于天也。口多微词，所学于师也。至于好色，臣无有也。’楚襄王问：‘你说自己不好色，有什么理由呢？’宋玉回答说：‘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国，楚国之丽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东家之子。东家之子，增至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束如素，齿如含贝，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然此女登墙窥臣三年，至今未许也。’宋玉说这样一个绝代佳丽勾引他3年，他都没有上当，可见他并非好色之徒。接着，宋玉攻击登徒子说：‘登徒子则不然，其妻蓬头挛耳，齞（yan）唇历齿，旁行踽偻，又疥且痔。’意思是说登徒子的老婆头发蓬蓬松松，额头前突，耳朵也有毛病，不用张嘴就牙齿外漏，走路不成样子而且驼背，身上长疥疮还有痔疮。宋玉问楚襄王：登徒子的老婆丑陋得无以复加，登徒子却那么喜欢她，同她生了5个孩子。请大王仔细想想，究竟是谁好色呢？宋玉终于打赢了官司。他采取的方法就是攻其一点，尽量扩大，不及其余的方法。整个故事见宋玉写的《登徒子好色赋》。昭明太子把这篇东西收入《文选》，从此，登徒子成了好色之徒的代名词，至今不得翻身。”

散会后，毛泽东指示把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印发（18日）给与会者。

据薄一波回忆说：“当时，大家心里在纳闷，这到底是批评谁？少奇同志说，主席的批评是针对管经济工作的几个人的。1月17日晚上，毛主席约富春、先念同志和我谈话，明确讲到批评主要是对陈云同志的。”

1月18日中午，林一山和李锐被专机接到南宁。

这天晚饭后，毛泽东在离明园不远的一间会议室里，主持召开专门研究三峡问题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陈伯达、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还有各大区和中南各省的负责人及中央各部主要负责人。

林一山、李锐像应试的考生一样，都坐在毛泽东面前长条桌的对面。毛泽东要林一山、李锐二人先发表意见，他问林一山：

“你要讲多长时间？”

林一山说：

“要2个小时。”

他又问李锐：

“你要讲多少时间？”

李锐说要半个小时。之后，林一山、李锐两人之间免不了要推让一番，于是，林一山就先发言了。

搞三峡工程是林一山朝思暮想的宏大志愿，他在来南宁之前，就在文件箱里满满地装上了有关三峡的勘察资料。林一山又是一个博学的人，他侃侃而谈，先从汉朝的贾让治水说起，历数长江的洪水灾害，又讲到长江流域也有旱灾；讲到水力发电是工业的主要资源，以及为了15年赶上英国，钢铁工业的发展要求与电力增长要求之间的比例；讲到国内航运事业的落后以及以三峡枢纽为主体的长江流域规划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最后，他又讲了三峡工程投资的可行性及三峡工程在技术上的可能性，讲的时间超过了两小时。

李锐在发言中则是首先对黄河与长江两者不同的洪水、泥沙最大与最小流量之差做了比较，说明长江自古以来就是一条好河。他说三峡工程只能控制长江流域50%的面积，而对湖南4水及赣江、汉江则无能为力，对宜昌以下中下游平原地区的涝灾，更是望洋兴叹。他又说，堤防是中国自古以来也是世界各国行之有效的最好的防洪措施，既不可贬低它的作用，也不可放松它的作用。防洪标准只能随着国力的增长逐渐提高，长江防洪最重要的措施，在于加固堤防和分蓄洪水，想以一个三峡工程一下子解决百年、千年一遇洪水，是不现实的。他还说，修建三峡工程需要移民100多万人，是个极其严重极为困难的问题。国家应利用水力资源极其优越的条件，尽力开发水力，电力工业长远方针应该是“水主火辅”的道路。

李锐把随身带来的全国水电开发示意图，摊在桌子上让大家看。他说，国家财力的许可和经济发展的需要，是左右三峡工程修建时间的重要因素。现在我们需要的是电力而不是防洪，像三峡这样大的工程，要在几十年后才可能有此需要。另外，还有地质情况及工程技术等很复杂的问题，不容有任何忽视。三峡工程同国防与世界形势，也有不容忽视的关系。

争论双方的理由陈述完了，该毛泽东表态了。因为李锐的最后一句话，深深地触动了他，于是，他就点点头说：

“**三峡这样的工程当然会吸引敌人的注意，绝不能遭到破坏。那可是下游几千万人民生命安全问题。今天讲了还不算数，你们两人各写一篇文章，不怕长，3天交卷。第3天晚上，我们再来开三峡的会。”**

1月19日，毛泽东在一份关于王实味、丁玲写的《野百合花》、《三八节有感》的报告材料上写了一个按语，他写道：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许多人想读这一批‘奇文’。我们把这些东西搜集起来全部重读一遍，果然有些奇处。奇就奇在以革命者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

原来，**丁玲在1955年被作家协会定为“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在1957年又被定为“丁玲、冯雪峰反党集团”，打成右派，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送往北大荒农场劳动。**后来，丁玲在毛泽东逝世后曾经回忆起这些往事，她非常冷静地写道：

“我的案子，当然是文艺界的一些人捏造出来的，汇报上去的。但是，不经上边，也就是毛主席的‘御笔’，他们打不倒我。”“毛泽东统帅革命大军，创业维艰，需要知识分子，也需要作家。他看出这群人的弱点、缺点，从个人角度，可能他并不喜欢这些人，但革命需要人，需要大批知识分子，需要有才华的人。他从革命的需要出发，和这些人交朋友，帮助这些人靠近无产阶级，把原有的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立场，自觉地转变过来。”

再说1月19日晚，毛泽东单独与周恩来谈了一次话。尔后召开全体会议，周恩来和刘少奇都在会上发言，对反冒进承担了责任。周恩来说：

“主席是从战略上看问题的，而我往往从战术上看问题。”

刘少奇说：

“**《人民日报》反冒进的社论，基本方针上是错误的，经过我发表的，我负主要责任。**对于当时社会主义建设方针有所动摇，没有感到是方针问题。有这个错误感到沉重，对主席的意图体会不深，感到很难过。沉重又高兴，看到群众高潮高兴了。解放以来，我们党领导革命领导建设，右倾是我们的主要危险。”

这次会议开到次日凌晨1时结束。

1月20日，南宁会议听取分管计划、财政和经济的3位副总理李富春、李先念和薄一波的工作汇报。毛泽东在插话中继续提出一些严厉批评，他还说：

“要采取使中央和地方的意见相结合的开会方法。北京是一种空气，地方又是一种空气，要使这两种文章，中央的和地方的相配合。”

1月21日，毛泽东在会议上作总结讲话。事前他写好了提纲，主要谈工作方法，杭州会议的17条在这里已成了42条，这就是工作方法六十条的前身。

毛泽东在讲话中借用了《离骚》的词句，说明文件写作中的“概念”和“判断”的问题。这一部分可以说是一篇很好的哲学短文。

他在会上提出辞去共和国主席的问题，要求在今年9月以前，用征求各级干部意见的方式讨论，然后在工厂、合作社、学校、机关，凡是有群众的地方，讨论，求得多数人同意。

1月21日晚上，毛泽东主持的关于三峡工程的会议继续进行，会议室里坐满了人。

此时，林一山、李锐的文章，早已印发给各位与会者。林一山的文章洋洋洒洒2万多字，题目是：《关于长江流域规划的初步意见》。内容是：1、长江概况。2、综合开发长江水利资源的迫切性和对我国经济建设的重大作用。3、以长江三峡水利枢纽为主体的流域规划。4、有关兴建三峡枢纽若干重要问题的研究。而李锐的文章则只有3000字，题目为《大力发展水电以保证电力工业十五年赶上英国和修建三峡水电站的问题》。他在文章中除了论述电力工业赶上英国的4个问题外，着重对三峡工程提出了6点看法：1、控制三峡工程修建时间的主要因素是什么？2、投资问题。3、105万人的搬迁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4、三峡与国防的关系。5、三峡的技术问题。6、关于“围堰发电”问题。

这次会议的结果，正像李锐在1992年发表的《关于三峡问题的“御前”争论——忆毛泽东亲自主持的1958年南宁会议》一文中洋洋得意地描写的那样：“大概有点像围棋什么名人战、天元战的结局一样，胜负已分，只待主持者宣布结果，会议不到半个小时就散了。”

毛泽东最后做了总结，他说：

“**中央并没有要修建的决定**。对三峡我还是有兴趣的，如果今后15年能够建成，那是赶上美国的问题。**还有原子弹问题，太集中了也不好，还得有别的电站。**水力用之不竭，应当多搞水电，加快发展水电。‘水主火辅’嘛，没有水力的地方，当然要搞火电。”

李富春、薄一波插话都赞成只要有条件，应当尽量多发展水电，现在赶不上，第3个“五年计划”总可以做到水主火辅。毛泽东指着李锐说：

“我们要有这样的秀才，大家都要注意培养秀才。”

他又转向李锐说：

“你当我的秘书，我需要你这样的秀才。”

李锐忙说：

“我当不了，水电业务忙得很。”

毛泽东说：

“你是兼职嘛。”

散会后，周小舟对李锐说：

“你中了状元了！”

1月22日，是南宁会议的最后一天。

这天下午，毛泽东要去南宁人民公园接见4万名各族群众。说来也是天不凑巧，接见活动安排在下午4点开始，可是还不到2点钟，天上就下起雨来。南方雨水勤雨量多，一下起来就淅淅沥沥没完没了。毛泽东望望屋外，让卫士把刘建勋、韦国清叫来，对他们说：

“这雨老是不停，别让群众淋坏了，我们还是早点去吧。”

安排4万多人的聚会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公园里早就披上了盛装，接受检阅的4万名群众，也早已按照指定位置排好了队伍，此时尽管风吹雨淋，他们依然是翘首以待，期盼着毛泽东的出现。

下午2点多，毛泽东冒雨提前来到公园，4万名群众顿时沸腾了，他们欢呼着，跳跃着，一遍又一遍地高呼：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毛泽东穿着风衣，脸上滴着水珠，接过青年们敬献的鲜花，迎着人群走去，不住地向群众挥手致意。

接见很快就结束了，毛泽东对刘建勋、韦国清说：

“天还在下雨，别让群众淋着了，快叫他们先回去吧！”

欲知毛泽东在南宁会议后有何重要活动，请看下一章叙述。

东方翁曰：关于毛泽东在南宁会议期间就三峡工程所做的结论，李锐后来曾经评价说：“由此可见，在当时那样紧张地批判‘反冒进’的形势下，三峡这样具体问题争论的结局，同这种形势完全不协调，可见只要言之成理，毛泽东那时还是很听得进反面意见的，尤其是小人物的反面意见。”应该说，李锐并不了解毛泽东的全部历史，他也不可能知道毛泽东一贯是喜欢兼听的。在毛泽东的一生中，从进入湖南一师的时候开始，后来一直到暮年，到逝世前，都喜欢同别人讨论问题，甚至是争论问题，谁说得对就照谁的办。李锐可能还不清楚，在三峡工程这个问题上，他之所以能够“取胜”，并不是他的理由有多么充分，而仅仅是在于他那个“国防问题”的一点提示，使毛泽东开始顾虑导弹和原子弹的破坏问题了。毛泽东在第一次论证会上就说了：“那可是下游几千万人民生命安全问题。”那时的中国尚不具备对付导弹、原子弹的防御能力。否则的话，论证会的结果就不会如李锐所愿了。

**第45章**

**“现在我们是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地球开战，工作重**

**心转到技术革命，要革地球的命。”**

话说1958年初，毛泽东在读《旧唐书·刘蕡传》时读到刘蕡的策论，批道：“起特奇。”并作诗一首赞之：

千载长天起大云，中唐俊伟有刘蕡。孤鸿铩羽悲鸣镝，万马齐喑叫一声。

这首诗最早发表在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版的《毛泽东诗词集》中，是根据毛泽东审定的抄件刊印的。由此可见，毛泽东当时对在“万马齐喑”中“叫一声”的精神，是十分赞赏的。

1月23日，毛泽东乘专机离开南宁，飞往广州，住小岛一号楼。

这一天，毛泽东会见了奉调回国的印度驻华大使拉·库·尼赫鲁及其夫人。

1月24日，毛泽东给金日成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金日成首相同志：

1957年12月16日和25日两次来信都已经收到了。来信中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出朝鲜的问题所提出的两个方案，我们已经仔细地研究过。**我们觉得，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动提出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的要求，然后由中国政府响应朝鲜政府的要求，是比较适宜的。**因此，我们认为采用12月16日来信中所提出的方案较好。对于这个方案，我们提出一些具体意见。这些意见，我们已经同苏联政府商量过，他们表示完全同意。现将这些意见函告如下，请你和朝鲜劳动党中央考虑是否妥当。

一、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写信给联合国，要求联合国军撤出朝鲜，的确是有一定的好处的，因为这样可以便于苏联作为联合国的一个成员国在联合国内提出主张，推动联合国采取行动。但是，这个方式也有缺点，那就是把整个联合国作为同我们敌对的一方，而实际上派出侵略军队组成联合国军的，只是少数联合国的成员国。因此，**我们建议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一个公开声明。声明中根据朝中方面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关于朝鲜问题的基本主张，提出以下的建议：**

1、联合国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时撤出朝鲜。

2、由朝鲜南北双方在对等的基础上进行协商，以建立和发展南北朝鲜之间的经济和文化关系，并且筹备全朝鲜的自由选举。

3、在外国军队完全撤出南北朝鲜以后的一定时期内，在中立国机构监督之下举行全朝鲜的自由选举。

二、**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了公开声明以后，中国政府接着发表声明，支持朝鲜政府的主张，并且正式表示准备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协商分批定期撤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问题，同时要求联合国军方面有关各国政府采取同样的步骤。**

三、**苏联政府接着也发表声明，支持朝中政府的声明，强调联合国军方面各国政府应该像中国政府那样响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要求，并且建议召开有关国家的会议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

四、今年2月中，周恩来同志代表中国政府访问朝鲜期间，朝中两国政府可以在联合公报中宣布，中国政府已经商得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同意，中国人民志愿军决定在1958年年底以前分批撤出朝鲜。在联合公报中，朝中两国政府可以声明，中国人民志愿军在联合国军之前撤出朝鲜，是为了和缓紧张局势，便于朝鲜南北双方在对等的基础上协商朝鲜的和平统一。因此，联合国军应该采取同样的行动。同时，中国人民志愿军发表声明表示：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是唇齿相依、患难与共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出朝鲜决不是对朝中人民休戚相关的利益置之不理。**如果李承晚和美国重新进行挑衅，越过停战线，那么，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政府提出要求的情况下，将毫不犹豫的再一次同朝鲜人民军并肩击退侵略。**

五、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出朝鲜的时间表，我们初步拟定如下：

1、1958年3月至4月，在朝中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公报以后，撤回三分之一，其余的三分之二均放在第2道防线，由朝鲜人民军全部接防第一线。

2、1958年7月至9月，撤回第二个三分之一。

3、1958年年底以前撤回最后的三分之一。

六、在朝中两国政府联合公报发表后，中立国监察委员会的两瑞（指瑞典、瑞士——笔者注）方面很可能再次提出撤销监察委员会的要求，届时，我们可以根据联合国军尚未撤走的理由，请他们留一最小限度的人数在板门店执行监察任务，但是也要准备他们会不顾而去。

以上各点意见，请你们研究后答复。

此致敬礼

毛泽东 1958年1月24日。

1月26日，毛泽东乘专机离开广州，飞抵北京。

1月2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14次会议，讨论1958年的预算和经济计划，为一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做准备。他在会议上的讲话提纲如下：

民族发扬蹈厉，大有希望，伟大的觉醒。15年，5年，3年，头年，头月。原子核释放热能。

15年赶上英国，可能不可能？

4千万吨钢，现在是520万吨

5亿吨煤，现在是1亿吨多一点

4千万启罗瓦特发电容量，现在是400多万……

5年到8年完成四十条

鼓起干劲，力争上游

　　“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

“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喜怒无常，轻视古董”

又穷又白，又富又文

人多好，少吃一点，东方风味，身体健康

西方人肉食者鄙

工作方法：两种领导方法，两种作风，打掉官风，以一个普通劳动者姿态

民主党派也可以这样做

士希贤

4个月外出，与工农打成一片

北京没有任何东西（原料），但有加工，这是理论，劲可鼓而不可泄，鼓励士气，还是士气败坏？缺点用鸣放改正。

认真学习：试验田，当工人（每周一天），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技术科学，文学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每年检查4次，有些12次

技术革命与社会革命

右派，开右派大会，一感谢，二帮助，三七开，都有利共产党准备大改革

民主党派、无党派，怎么样？不可以吗？可以的。

把心交给别人，不可隔一层纸，罗隆基等人不听

不断革命

帮助同志，去掉疑心

莫斯科宣言，会议，转折点

1956年反共高潮（批判斯大林），有些人心动，有反响

9个指头与1个指头

毛泽东在讲话中说：

“七八年来，都看出我们这个民族是一个大有希望的民族，特别是在去年一年，使得广大群众感觉到光明的前途。几亿人口，精神发扬起来。经过大鸣、大放、大辩论，把一些问题搞清楚，任务也提得适当了，比如15年赶上英国，又多、又快、又好、又省之类。四十条农业纲要重新发布，给群众很大的鼓励。许多认为做不到的事情，现在群众觉得做得到。”

“我们这个民族在觉醒起来，好像我们大家今天早晨醒来一样，在逐步觉醒。因为觉醒了，才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打掉；因为觉醒了，才把私有财产制度废除；因为觉醒了，才进行整风，批评右派。现在还要革掉一个东西：我们是又穷又白。白纸好写字，穷就要革命，要干，就有一股干劲。现在的生产节约，各种社会风气的改革，就是希望我们的国家成为一个大国，一个强国。**现在的情况完全不相称，还比不上比利时，比利时有700万吨钢，我们只有500多万吨，粮食水平很低，不识字的人很多**。因此，现在这个觉醒，群众这个热潮，我们要好好注意。我看，我们这个民族现在好比打破原子核释放出热能来。”

“有群众这么大的热潮，15年赶上英国是完全可能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要有一股干劲。”

毛泽东特别赞扬了元旦社论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这一口号。他还重提了在1957年整风座谈会上时任教育部长张奚若所说的“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这4句话，他说：

“**我很欣赏这几句话。这几句话是好人说的，说这个话的人并非右派，我很喜欢这一位，这个人是个有正义感的人。”**

“不好大喜功不行。但是要革命派的好大喜功，要合乎实际的好大喜功。不急功近利不行。《易经》上讲：‘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曾子也说：‘夏禹惜寸阴，吾辈当惜分阴’。这都是圣人之言。我们要的是革命的、合乎实际的平均先进定额（指标）。过去的东西不轻视不能活下去。历史是要的，但对过去不能过于重视。人类历史是50万年。拿现在来比，倒数上去，总是一代不如一代，这才叫进化，才叫进步。所以，轻视过去，在这一点意义上讲完全必要。还有一个迷信将来。人类就是希望有个将来，希望也总是寄托在将来。所以说，‘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这4句话，恰好是正确的。”

他还说：

“**现在我们是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地球开战，工作重心转到技术革命，要革地球的命。**15年赶上英国，这个事情要变成一个主要的事情。”

毛泽东又谈到了反对官气的问题，他说：

“明朝那个江苏人，写《徐霞客游记》的，那个人没有官气，他跑了那么多路，找出了金沙江与长江的源头。‘岷山导江’，这是经书上讲的，他说这是错误的，他说是‘金沙江导江’。我看《水经注》作者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他不到处跑怎么能写得那么好？这不仅是科学作品，也是文学作品。”

1月31日，毛泽东在他所主持完成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前加写了一个序言。兹将“六十条”及序言全部抄录如下：

我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1956年在社会主义所有制方面取得了基本的胜利，1957年发动整风运动，又在思想战线和政治战线方面取得了基本的胜利，就在这一年，又超额地完成了第1个五年建设计划。**这样，我国6亿多人民就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认清了自己的前途，自己的责任，打击了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方面刮起来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妖风，同时也纠正了和正在继续**纠正党和人民自己从旧社会带来的和由于主观主义造成的一些缺点和错误**。党是更加团结了，人民的精神状态是更加奋发了。党群关系大为改善。**我们现在看见了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人民群众在生产战线上这样高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全国人民为在15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内在钢铁及其它主要工业生产品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这个口号所鼓舞。一个新的生产高潮已经和正在形成。**为了适应这种情况, 中央和地方党委的工作方法, 有作某些改变的需要。这里所说的几十条，并不都是新的。有一些是多年积累下来的，有一些是新提出的。这是中央和地方同志1958年1月先后在杭州会议和南宁会议上共同商量的结果。这几十条，大部分是会议上同志们的发言启发了我。由我想了一想写成的；一部分是直接记录同志们的意见；有一个重要条文（关于规章制度）是由刘少奇同志和地方同志商定而由他起草的；由我直接提出的只占一部分。这里讲的也不完全是工作方法，有一些是工作任务，有一些是理论原则，但是工作方法占了主要地位。我们现在的主要目的，是想在工作方法方面求得一个进步，以适应已经改变了的政治情况的需要。这几十条现在只是建议，还待征求意见。条文或者要减少，或者要增加，都还未定。请同志们加以研究，提出意见，以便修改，然后提交政治局批准，方能成为一个正式的内部文件。

　 　 毛泽东 1958年1月31日

一、县以上各级党委要抓社会主义建设工作。这里有14项：1、工业，2、手工业，3、农业，4、农村副业，5，林业，6、渔业，7、畜牧业，8、交通运输业，9、商业，10、财政和金融，11、劳动、工资和人口，12、科学，13、文教，14、卫生。

二、县以上各级党委要抓社会主义工业工作。这里也有14项：1、产量指标，2、产品质量，3、新产品试制，4、新技术，5、先进定额，6、节约原材料，找寻和使用代用品，7、劳动组织、劳动保护和工资福利，8、成本，9、生产准备和流动资金，10、企业的分工和协作，11、供产销平衡，12、地质勘探，13、资源综合利用，14、设计和施工。这是初步拟定的项目，以后应该逐步形成“工业发展纲要四十条”。

三、各级党委要抓社会主义农业工作。这里也有14项：1、产量指标，2、水利，3、肥料，4、土壤，5、种子，6、改制（改变耕作制度，如扩大复种面积，晚改早，旱改水等），7、病虫害，8、机械化（新式农具，双轮双铧犁，抽水机、适合中国各个不同区域的拖拉机及用摩托开动的运输工具等），9、精耕细作，10、畜牧，11、副业，12、绿化，13、除四害，14、治疾病讲卫生。这是从“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中抽出来的14个要点。“四十条”必须全部施行。抽出一些要点，目的在于有所侧重。纲举目张，全网自然提起来了。

四、全面规划，几次检查，年终评比。这是3个重要方法。这样一来，全局和细节都被掌握了；可以**及时总结经验，发扬成绩，纠正错误；又可以激励人心，大家奋进。**

五、5年看3年，3年看头年，每年看前冬。这是一个掌握时机的方法。时机上有所侧重，把握就更大了。

六、一年至少检查4次。中央和省一级，每季要检查一次；下面各级按情形办理。重要的任务在没有走上轨道之前，要每月检查一次。这也是掌握时机的方法，是就一年内说的。

七、如何评比？省和省比, 市和市比, 县和县比, 社和社比，厂和厂比，矿和矿比，工地和工地比。可以订评比公约，也可以不订。农业比较易于评比。工业可以根据可比的条件评比，按产业系统评比。

八、什么时候交计划？省、自治区、直属市、专区、县都要按照3个14项订出计划。订计划时要有重点，不可在同一时间内百废俱兴。区、乡、社的计划内容主要就是农业14项。项目可以根据当地情况有所增减。先订5年的计划，可以是粗线条的。1958年7月1日以前交卷。计划要逐级审查。**为了便于比较，省委要在县、区、乡、社的计划中选一些最好的和少数最坏的送给中央审查。省和专区的计划都要按期交中央，一个也不能少。**

九、生产计划3本账。中央2本账，一本是必成的计划，这一本公布；第二本是期成的计划，这一本不公布。地方也有2本账。地方的第一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这在地方是必成的；第二本在地方是期成的。评比以中央的第二本账为标准。

十、从今年起，中央和省、市、自治区党委要着重抓工业，抓财贸。一年要抓4次，主要是7月（或8月）、11月、1月（上旬）3次。再不抓，15年赶上英国的口号可能落空。要把工业部门和财贸部门的若干主要负责干部带到讨论地方工作的会场上去，中央的带到地方去，省、直属市和自治区的带到专区、市属区和县里去，许多在中央工作的同志和在地方工作的同志都有这种要求。

十一、各地方的工业产值（包括中央下放的厂矿、原来的地方国营工业和手工业的产值，不包括中央直属厂矿的产值），争取在5年内，或者7年内，或者10年内，超过当地的农业产值。各省市对于这件事要立即着手订计划，今年7月1日以前订出来。**主要的任务是使工业认真地为农业服务。大家要切实摸一下工业，做到心中有数。**

十二、在今后5年内, 或者6年内, 或者7年内, 或者8年内，完成“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规定。各省委、直属市委、自治区党委对于这个问题应当研究一下。就全国范围来看，5年完成“四十条”不能普遍作到，6年或者7年可能普遍作到，8年就更加有可能普遍作到。

十三、10年决于3年。争取在3年内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基本改观。其他地区的时间可以略为延长。**口号是：苦战3年。方法是：放手发动群众，一切经过试验。**

十四、反对浪费。在整风中，每个单位要以若干天功夫，来一次反浪费的鸣放整改。每个工厂、每个合作社、每个商店、每个机关、每个学校、每个部队都要进行一次认真地反浪费斗争。**今后每年都要反一次浪费。**

十五、在我国的国民经济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怎样才算恰当，这是一个关系我国经济发展速度的大问题，希望大家研究。

十六、关于农业合作社的积累和消费的比例问题也需要研究。湖北同志有这样的意见：以1957年生产和分配的数字为基础，以后的**增产部分四六分（即以四成分配给社员，六成作为合作社积累）、对半分、倒四六分（即以四成作为合作社积累，六成分配给社员）。如果生产和收入已经达到当地富裕中农的水平的，可以在经过鸣放辩论取得群众同意以后，增产的部分三七分（即以三成分配给社员，七成作为合作社积累），或者一两年内暂时不分，以便增加积累，准备生产大跃进。**这个意见是否适当，请各地讨论。

十七、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矛盾需要解决，需要定出一个适当的比例。现在的情况是，有的地方，有些农家的收入中个体经济和集体经济的比例是倒四六、倒三七（即是家庭副业和经营自留地的收入，占到总收入的60%至70%）。这种情况必然影响农民对于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积极性。这种情况应当改变。各省可以经过鸣放辩论，研究出控制的办法，对经济关系作适当调整，在鼓励农民生产积极性和全面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使农家的收入中个体经济和集体经济的比例，在几年内逐步达到3比7或者2比8（即是农民从合作社得到的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70%或者80%）。

十八、**普遍推广试验田。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领导方法。这样一来，我党在领导经济方面的工作作风将迅速改观。**在乡村是试验田，**在城市可以抓先进的厂矿、车 间、工区和工段。突破一点就可以推动全面。**

十九、**抓两头带中间。这是一个很好的领导方法。任何一种情况都有两头，即是有先进和落后，中间的状态又总是占多数。抓住两头就把中间带动起来了。这是一个辩证的方法，抓两头，抓先进和落后，就是抓住了两个对立面。**

二十、**组织干部和群众对先进经验的参观和集中地展览先进的产品和作法，是两项很好的领导方法。**用这些方法可以提高技术水平，推广先进经验，鼓励互相竞赛。许多问题到实地一看就解决了。社和社、乡和乡、县和县、省和省之间，都可以组织互相参观。中央、省、市、专区和县都可以举办生产建设展览会。

二十一、**不断革命。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从1949年在全国范围内夺取政权开始，接着就是反封建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一完成就开始农业合作化，接着又是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即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在1956年基本完成，接着又在去年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革命在今年7月1日以前可以基本上告一段落。但是问题没有完结，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每年都要用鸣放整改的方法继续解决这一方面的问题。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在15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感到还是受束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得到解放。要鼓一把劲。再过5年，就可以比较主动一些了；10年后将会更加主动一些；15年后，粮食多了，钢铁多了，我们的主动就更多了。我们的革命和打仗一样，在打了一个胜仗之后，马上就要提出新任务。这样就可以使干部和群众经常保持饱满的革命热情，减少骄傲情绪，想骄傲也没有骄傲的时间。新任务压来了，大家的心思都用在如何完成新任务的问题上面去了。提出技术革命，就是要大家学技术，学科学。右派说我们是小知识分子，不能领导大知识分子。还有人说要对老干部实行“赎买”，给点钱，叫他们退休，因为老干部不懂科学，不懂技术，只会打仗、搞土改。我们一定要鼓一把劲，一定要学习并且完成这个历史所赋予我们的伟大的技术革命。这个问题要在干部中议一议，开个干部大会，议一议我们还有什么本领。过去我们有本领，会打仗，会搞土改，现在仅仅有这些本领就不够了，要学新本领，要真正懂得业务，懂得科学和技术，不然就不可能领导好。我在1949年所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里曾经说过：“严重的经济建设的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时间过去了8年。这8年中，革命一个接着一个，大家的思想都集中在那些问题上，很多人来不及学科学，学技术。从今年起，要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这个问题必须引起全党注意。各级党委可以在党内事先酝酿，向干部讲清楚，但是暂时不要在报上宣传，到7月1日以后我们再大讲特讲, 因为那时候基层整风已经差不多了，可以把全党的主要注意力移到技术革命上面去了。注意力移到技术方面，又可能忽略政治，因此必须注意把技术和政治结合起来。

二十二、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是两个对立物的统一。**一定要批判不问政治的倾向。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

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这就是又红又专。将来政治这个名词还是会有的，但是内容变了。不注意思想和政治，成天忙于事务，那会成为迷失方向的经济家和技术家，很危险。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

**现在一方面有社会主义世界同帝国主义世界的严重的阶级斗争；另一方面，就我国内部来说，阶级还没有最后消灭，阶级斗争还是存在的。这两点必须充分估计到。**同阶级敌人作斗争，这是过去政治的基本内容。但是，在人民有了自己的政权以后，这个政权同人民的关系，就基本上是人民内部的关系了，采用的方法不是压服而是说服。这是一种新的政治关系。**这个政权只对人民中破坏正常社会秩序的犯法分子采取暂时的程度不同的压服手段，作为说服的辅助手段。**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人民中还隐藏一部分反社会主义的敌对分子，例如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这种人，我们基本上也是采取由群众鸣放辩论的方法去解决问题。只对严重反革命破坏分子采取镇压的手段。过渡时期完结、彻底消灭了阶级以后，单就国内情况来说，政治就完全是人民内部的关系。那时候，人和人之间的思想斗争、政治斗争和革命一定还是会有的，并且不可能没有。**对立统一的规律，量变质变的规律，肯定否定的规律，永远地普遍地存在。**但是斗争和革命的性质和过去不同，不是阶级斗争，而是人民内部的先进和落后之间的斗争，社会制度的先进和落后之间的斗争，科学技术的先进和落后之间的斗争。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场斗争，是一个革命。**进到共产主义时代了, 又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发展阶段，从这个阶段到那个阶段的关系必然是一种从量变到质变的关系。各种突变、飞跃都是一种革命, 都要通过斗争,“无冲突论”是形而上学的。**

政治家要懂些业务。懂得太多有困难，懂得太少也不行，一定要懂得一些。不懂得实际的是假红，是空头政治家。要把政治和技术结合起来，农业方面是搞试验田，工业方面是抓先进典型、试用新技术、试制新产品。这些都是用的“比较”法，在相同的条件下，拿先进和落后比，促使落后赶上先进。**先进和落后是矛盾的两个极端，“比较”是对立的统一。**企业和企业之间，企业内部车间和车间、小组和小组、个人和个人之间，都是不平衡的。**不平衡是普遍的客观规律。从不平衡到平衡，又从平衡到不平衡，循环不已，永远如此，但是每一循环都进到高的一级。不平衡是经常的，绝对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 我国现在经济上的平衡和不平衡的变化，是在总的量变过程中许多部分的质变。若干年后，中国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那时候将完成一个飞跃，然后再继续量变的过程。**

评比不仅比经济、比生产、比技术，还要比政治，就是比领导艺术。看谁领导得比较好些。

二十三、**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和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政府各部门所制订的各种规章制度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8年来积累起来的规章制度许多还是适用的，但是有相当一部分已经成为进一步提高群众积极性和发展生产力的障碍，必须加以修改，或者废除。在修改或者废除这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方面，最近一个时期，在群众中间，已经创造了许多先进经验，例如石景山发电厂改进职工福利待遇的办法，湘江机械制造厂改进职工宿舍制度的办法，江苏戚墅堰发电厂改进奖金的办法，广西省一级几个商业机关合并为一个机关，由总数2400人缩减为350人、即减少七分之六的人员等。**应该作出这样一个总的规定，即是在多快好省地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前提下，在群众觉悟提高的基础上，允许并且鼓励群众的那些打破限制生产力发展的规章制度的创举。**

中央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应该派遣负责同志到各地的基层单位去，总结群众中的这一类先进经验，发展下层单位和群众的这一类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创举，建议主管机关给以批准，停止原有的规章制度中某些规定在这个单位实行，并且把这个单位的先进经验推广到其他单位试行。

中央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还应当派遣负责同志到各地的基层单位去，发现那里有些什么规章制度已经限制了群众积极性的提高和生产力的发展，根据那里的实际情况，通过基层党委和群众的鸣放辩论，保存现有规章制度中的合理部分，修改或者废除其中的不合理部分，并且拟定一些新的适合需要的规章制度，在这个单位实行，也可以推广到其他单位试行。

中央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应该系统地总结这方面的典型的成熟的先进经验。重大的和全国性的，经过党中央和国务院批准。地方性的，经过相应的地方党委和政府批准。技术性的和专业性的，经过主管部门批准，然后在全国或者全省的相同的所有单位中普遍推行。经过一段时间实行以后，在必要的时候，再根据新的经验修改或者重新制定各种规章制度。

**这是制定和修改各种规章制度的群众路线的方法。**

二十四、**一定要把整风坚持到底。全党要鼓起干劲，打掉官风，实事求是，同人民打成一片，尽可能地纠正一切工作上、作风上、制度上的缺点和错误。**

二十五、**中央和省、直属市、自治区两级党委的委员，除了生病的和年老的以外，一年一定要有4个月的时间轮流离开办公室，到下面去作调查研究，开会，到处跑。**应当采取走马看花、下马看花两种方法。哪怕到一个地方谈3、4小时就走也好。**要和工人、农民接触，要增加感性知识。**中央的有些会议可以到北京以外的地方去开，省委的有些会议可以到省会以外的地方去开。

二十六、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干部和群众。必须使人感到人们互相间的关系确实是平等的，使人感到你的心是交给他的。学习鲁迅。**鲁迅的思想是和他的读者交流的，是和他的读者共鸣的。人们的工作有所不同，职务有所不同，但是任何人不论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间都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决不许可摆架子。一定要打掉官风。**

**对于下级所提出的不同意见，要能够耐心听完，并且加以考虑，不要一听到和自己不同的意见就生气，认为是不尊重自己。**这是以平等态度待人的条件之一。

二十七、各级党委，特别是坚决站在中央正确路线方面的负责同志，要随时准备挨骂。人们骂得对的，我们应当接受和改正。骂得不对的，特别是歪风，一定要硬着头皮顶住，然后加以考查，进行批判。在这种情况下，决不可以随风倒，**要有反潮流的大无畏的精神**。这一点，我们已经在1957年受到了考验。

二十八、在省、地、县3级或者在省、地、县、乡4级的干部会议上，讨论一次党的领导原则问题。**讨论一下这些原则是否正确：“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这几句话里，关于党委的责任，是说大事由它首先作出决定，并且在执行过程中加以检查。**“大权独揽，是一句成语，习惯上往往指的是个人独断。我们借用这句话，指的却是主要权力应当集中于中央和地方党委的集体，用以反对分散主义。难道大权可以分揽吗？这8句歌诀，产生于1953年，就是为了反对那时的分散主义而想出来的。所谓“各方去办”，不是说由党员径直去办，而是一定要经过党员在国家机关中、在企业中、在合作社中、在人民团体中、在文化教育机关中，同非党员接触、商量、研究，对不妥当的部分加以修改，然后大家通过，方才去办。第3句话里所说的“原则”，指的是：党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和个人作用的统一（党委和第一书记的统一），中央和上级的决议。

二十九、是否事事都要问过第一书记？可以不必。大事一定要问。要有二把手、三把手，第一书记不在家的时候，要另外有人挂帅。

三十、党委要抓军事。军队必须放在党委的领导和监督之下，现在基本上也正是这样做的，这是我军的优良传统。作军事工作的同志是要求中央和地方党委抓这项工作的。只是因为忙于社会改革和经济建设工作，近几年来我们抓得少了一些。现在应当改善这种情况。办法也是一年抓几次。

三十一、大型会议、中型会议和小型会议，都是必需的，各地和各部门要好好安排一下。小型会议，参加的几个人，一二十人，便于发现问题和讨论问题。上千人参加的大型会议，只能采取先作报告后加讨论的方法，这种会不能太多，每年两次左右。小型和中型会议每年至少要开4次。这种会最好到下面去开。省委可以到地委召开一个地区或者相近几个地区的县委书记会议。中央同志和国务院各部门可以轮番到地方开些小型会议。各个经济协作区有事就开会，每年至少开4次。

三十二、开会的方法应当是材料和观点的统一。如果材料和观点割断，讲材料的时候没有观点，讲观点的时候没有材料，材料和观点互不联系，这是很坏的方法。只提出一大堆材料，不提出自己的观点，不说明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这种方法更坏。**要学会用材料说明自己的观点。必须要有材料，但是一定要有明确的观点去统率这些材料，材料不要多，能够说明问题就行，解剖一个或者几个麻雀就够了，不需要很多。自己应当掌握丰富的材料，但是在会上只需要拿出典型性的。必须懂得，开会同写大著作是有区别的。**

三十三、一般说来，不要在几小时内使人接受一大堆材料，一大堆观点，而这些材料和观点又是人们平素不大接触的。一年要找几次机会，让那些平素不大接触本行事务的人们，接触本行事务，给以适合需要的原始材料或者半成品。不要在一个早上突如其来地把完成品摆在别人面前。要下些毛毛雨，不要在几小时内下几百公厘的倾盆大雨。“强迫受训”的制度必须尽可能废除，“强迫签字”的办法必须尽可能减少。要彼此有共同的语言，必须先有必要的共同的情报知识。

三十四、 10个指头的问题。人有10个指头，要使干部学会善于区别9个指头和1个指头，或者多数指头和少数指头。**9个指头和1个指头有区别，这件事看来简单，许多人却不懂得。要宣传这种观点。这是大局和小局、一般和个别、主流和支流的区别。我们要注意抓住主流，抓错了一定翻跟斗。这是认识问题，也是逻辑问题。说1个和9个指头，这种说法比较生动，也比较合于我们工作的情况。我们的工作，除非发生了根本路线上的错误，成绩总是主要的。**但是这种说法对于某些人却不适用，例如右派分子。许多极右分子，那是几乎10个指头都烂了，学生中的大部分普通右派分子也不只烂了1个指头，但又不足全烂了，所以还可以留在学校里。

三十五、**“攻其一点或几点，尽量夸大，不及其余。”这是一种脱离实际情况的形而上学的方法。1957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他们用的就是这种方法。**我党在历史上吃过这种方法的大亏，这就是教条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期。立三路线也是如此。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也用这种方法。陈独秀路线和抗日时期的王明路线，就是如此。1934年，张国焘也用过这种方法。1953年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用的也是这种方法。我们应当总结过去的经验，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加以批判，使干部觉醒起来，以免再吃大亏。好人犯个别错误的时候，也会不自觉地采用这种方法，所以好人也要研究方法论。

三十六、**概念的形成过程，判断的形成过程，推理的过程，就是调查和研究的过程，就是思维的过程。人脑是能够反映客观世界的，但是要反映得正确很不容易。要经过反复的考察，才能反映得比较正确，比较接近客观实际。有了正确的观点和正确的思想，还要有比较恰当的表达方式告诉别人。概念、判断的形成过程，推理的过程，就是“从群众中来”的过程；把自己的观点和思想传达给别人的过程，就是“到群众中去”的过程。**在我们的干部中，大概还有不少的人，不明白这样一个简单的真理：**任何英雄豪杰，他的思想、意见、计划、办法，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者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或者自己的科学试验中，他的头脑只能作为一个加工工厂而起制成完成品的作用，否则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人们制成的这种完成品，究竟合用不合用，正确不正确，还得交由人民群众去考验。**如果我们的同志不懂得这一点，那就一定会到处碰钉子。

三十七、**文章和文件都应当具有这样3种性质：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准确性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问题，这些都是逻辑问题。鲜明性和生动性，除了逻辑问题以外，还有词章问题。现在许多文件的缺点是：第一，概念不明确；第二，判断不恰当；第三，使用概念和判断进行推理的时候又缺乏逻辑性；第四，不讲究词章。看这种文件是一场大灾难，耗费精力又少有所得。一定要改变这种不良的风气。作经济工作的同志在起草文件的时候，不但要注意准确性，还要注意鲜明性和生动性。不要以为这只是语文教师的事情，大老爷用不着去管。**重要的文件不要委托二把手、三把手写，要自己动手，或者合作起来做。**

三十八、**不可以一切依赖秘书，或者“二排议员”。要以自己动手为主，别人帮助为辅。不要让秘书制度成为一般制度，不应当设秘书的人不许设秘书。一切依赖秘书，这是革命意志衰退的一种表现。**

三十九、学点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

四十、**学点哲学和政治经济学。**

四十一、**学点历史和法学。**

四十二、学点文学。

四十三、学点文法和逻辑。

四十四、建议在自愿的原则下，中央和省市的负责同志，学一种外国文。争取在5年到10年的时间内达到中等程度。

四十五、中央和省的主要负责人，可以设置一名学习秘书。

四十六、**外来干部要学本地话，一切干部要学普通话。**先订一个“五年计划”，争取学好，或者大体学好，至少学会一部分。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汉族干部，必须学当地民族的语言。少数民族的干部，也应当学习汉语。

四十七、中央各部，省、专区、县3级，**都要比培养“秀才”。没有知识分子不行，无产阶级一定要有自己的秀才。这些人要较多地懂得马克思主义，又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科学知识、词章修养。**

四十八、**一切中等技术学校和技工学校，凡是可能的，一律试办工厂或者农场，进行生产，作到自给或者半自给。学生实行半工半读。**在条件许可的情况行，这些学校可以多招些学生，但是不要国家增加经费。**一切高等工业学校要建立实验室和附属工场，除了保证教学和科学研究的需要以外，都应当尽可能地进行生产。此外，还可以由学生和教师同当地的工厂订立参加劳动的合同。**

四十九、**一切农业学校除了在自己的农场进行生产，还可以同当地的农业合作社订立参加劳动的合同，并且派教师住到合作社去，使理论和实际结合。**农业学校应当由合作社保送一部分合于条件的人入学。**农村里的中小学，都要同当地的农业合作社订立合同，参加农、副业生产劳动。农村学生还应当利用假期、假日或者课余时间回到本村参加生产。**

五十、**大学校和城市里的中等学校，在可能条件下，可以又由几个学校联合设立附属工厂或者作坊，也可以同工厂、工地或者服务行业订立参加劳动的合同。一切有土地的大中小学，应当设立附属农场，没有土地而邻近郊区的学校，可以到农业合作社参加劳动。**

五十一、开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今年要每月检查一次，以便打下基础。各地可以根据当地的情况，增加4害以外的其他内容。

五十二、**化肥工厂，中央、省、专区3级都可以设立。**中央化工部门要帮助地方搞中小型化肥工厂的设计，中央机械部门要帮助地方搞中小型化肥工厂的设备。

五十三、**省、自治区、直属市，应当设立农具研究所，专门负责研究各种改良农具和中小型机械农具，同农具制造厂密切联系，研究好了就交付制造。**

五十四、湖北孝感县的联盟农业社，一部分土地每年种一季，亩产2130斤，四川仁寿县的前进农业社，一部分土地一季亩产1680斤，陕西宜君县的清河农业社，这个社在山区，一部分土地一季亩产1654斤；广西百色县的拿坡农业社，一部分土地一季亩产1600斤。这些单季高产的经验，各地可以研究试行。

五十五、种子配搭的问题（即是在一个地域内，一种作物要有几种品种，同时种植），各地可以进行研究。

五十六、薯类大有用处。人吃，猪吃，牛吃，造酒，造糖，造粉。各地可以试制薯类粉，有控制地适当的推广薯类种植。

五十七、绿化。凡能4季种树的地方，4季都种。能种3季的种3季。能种两季的种两季。

五十八、陕西商洛专区每户种一升核桃。这个经验值得各地研究。可以经过鸣放辩论取得群众同意以后，将这个经验推广到种植果木、桑、柞、茶、漆、油料等经济林木方面去。

五十九、林业要计算覆盖面积，算出各省、各专区、各县的覆盖面积比例，作出森林覆盖面积规划。

六十、**今年9月以前，要酝酿一下我不作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问题。**先在各级干部中间，然后在工厂和合作社中间，组织一次鸣放辩论，征求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取得多数人的同意。这是因为去掉共和国主席这个职务，专做党中央主席，可以节省许多时间做一些党所要求我做的事情。这样，对于我的身体状况也较为适宜，如果在辩论中群众发生抵触情绪，不赞成这个建议，可以向他们说明，在将来国家有紧急需要的时候，只要党有决定，我还是可以出任这种国家领导职务的。现在和平时期，以去掉一个主席职务较为有利。**关于这个请求，已经得到中央政治局以及中央和地方许多同志的同意，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所有这些，请向干部和群众解释清楚，免除误会。

毛泽东在第60条中提出的这个意见，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向全党传达，更没有放到群众中去辩论。

欲知毛泽东此后的工作情况，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工作方法六十条》体现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思想，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文献。其中的方法论，尤其奥妙，不细心研读，是决难领会得到的。

**第46章**

**“要把干部参加劳动作为一件大事，坚持下去才好。”**

话说1958年2月1日，第一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听取了李先念关于1957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1958年国家预算的报告，听取了薄一波关于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还听取了周恩来关于目前国际形势和我国外交政策的报告。

2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目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社论，社论中写道：

“**正因为我国又穷又白，我国人民特别迫切要求革命，要求改变我国经济上和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要求建设繁荣、富强、幸福的生活，而具有这样强烈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的六亿人民，勇敢勤劳，正是一股无穷无尽的力量。在这股伟大的力量面前，高山也要让路，河水也要低头。”**

2月3日中午，毛泽东给他的小女儿李讷写了一封信。

此前，李讷得了急性阑尾炎，疼痛难忍，需要尽快住院治疗。以往李敏、李讷看病都是由江青负责安排的。这一次，江青恰巧不在北京，她到广州去了，这就需要毛泽东亲自联系处理。他**为了避免医院对李讷特殊照顾，就告诉工作人员说，不许李讷在医院报真名，更不许提她是毛泽东的女儿，就对医院讲是他身边工作人员沈同的女儿沈娟**。就这样，李讷以沈娟的名字住进了北京医院，由院长计苏华和外科大夫王历耕、内科大夫吴洁一起为她做手术。

李讷小时候因病打针，医生不小心把针头弄断在她的肉里头，当时因种种原因未能及时取出。这次需要动手术，医生们经过商量，决定两个手术一块儿做。

李讷的阑尾手术做得非常顺利，可是，在医生为她寻取断针头时，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麻烦。医生开刀后，发现那根断针头已经移动了位置，花了很长时间也没有找到，只好又把她抬进X光透视室。最后，好不容易才把那根已经生了锈的针头取了出来。

李讷的手术是在无菌室外进行的，因此，又引起了感染，她发烧了。毛泽东知道后，十分挂念。这一天，他忙得通宵未睡，到中午了，吃了几片安眠药，还是不能入睡，就给李讷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李讷：

念你。害病严重时，心旌摇摇，悲观袭来，信心动荡。这是意志不坚定，我也常常如此。病情好转，心情也好转，世界观又改变了，豁然开朗。意志可以克服病情。一定要锻炼意志。你以为如何？妈妈很着急，我也有些。找了小员、院长计苏华、主治大夫王历耕、内科大夫吴洁诸同志，今天上午开了一会，一致认为大有好转。你昨夜睡了9小时，你跑出房门在走廊上看画报。白血球降下来了，特别是中性血球，已恢复正常，他们说不成问题，确有把握，你可以放心。这点发烧，应当有的，完全正常。妈妈很不放心，打了电话给她，她放心了。

李讷，再熬几天，就可以完全痊愈，怕什么？我的话是有根据的。为你的事，我此刻尚未睡，现在我想睡了，心情舒畅了。诗一首：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斩楼兰誓不还。这里有意志。你知道吗？你大概10天后准备去广东，过春节。愿意吧。到那里休息十几天，又陪伴妈妈。亲你，祝贺你胜利，我的娃！

爸爸 2月3日上午12时

半睡状态执笔，字迹草率，不要见怪。有话叫小员来告我。

2月5日上午8时，毛泽东利用人大会议的间隙，乘专列到了济南。他在住地召集山东省委书记、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莱阳和聊城的地委书记、泰安县委书记、历城县的一个农业合作社社长、寿张县的一个农业合作社的驻社干部座谈农业问题。

2月6日上午，毛泽东在住地同省委、莱阳地委和济南市委的负责人谈话。

下午，毛泽东乘专列返回北京。

2月6日这一天，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地区性的协作会议的决定》：

上海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各党组，团中央：

一、为着更加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和配合国民经济计划的进行，全国需要划分为7个协作地区，由有关省、市、自治区党委举行定期性的和不定期性的会议，通过这种会议，可以使各省、市、自治区互通情报，交流经验，互相协作，彼此支援，调节矛盾，互相评比，以便在中央方针政策和统一规划的领导下，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共同发展。

二、全国7个协作地区分列如下，每区指定一位省、市委书记为会议召集人：

1、辽宁、吉林、黑龙江、东蒙为东北协作区，以欧阳钦同志为会议召集人；

2、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山西、内蒙古、河南为华北协作区，以林铁同志为会议召集人；

3、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山东、江西为华东协作区，以柯庆施同志为会议召集人；

4、广东、广西、湖南、福建、江西为华南协作区，以陶铸同志为会议召集人；

5、湖北、湖南、江西、河南、安徽为华中协作区，以王任重同志为会议召集人；

6、云南、贵州、四川、西藏、陕西为西南协作区，以李井泉同志为会议召集人；

7、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宁夏为西北协作区，以张德生同志为会议召集人。

有些省、自治区划分在几个协作区内，这种省、区可以按照经济关系密切的程度，以参加一个协作区为主。东蒙古主要参加东北区，山东主要参加华东或者华北区，福建、江西、安徽主要参加华东区，湖南、河南主要参加华中区，陕西主要参加西北区。

三、各区的协作会议每年至少召开4次，还可以按照需要召开一些省际会议或者由各省专业部门参加的专业会议。各区协作会议可以在本区内的各省轮流召开。

四、为了便于进行协作和交流经验起见，全国各市委如北京、上海、哈尔滨、沈阳、天津、广州、武汉、成都、西安9个市委可以轮流召开各大城市会议。

五、为了便于情况的沟通和问题的解决，各区的协作会议和各大城市会议，在有必要的时候可以邀请党中央有关部门、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其他中央有关部门同志参加，人数不宜过多。

中央 1958年2月6日

2月10日上午，毛泽东给刘少奇写了一封信。

此前，毛泽东在和刘少奇等人的谈话中，**刘少奇说：他在南方巡视中，遇到了职工夫妇分居两地的问题，于是，他就在一次讲话中引用了贺知章的《回乡偶书》一诗：“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以此说明唐朝像贺知章这样当大官的人，进京做官都不带家属，因此断定古代官吏禁带家属。自古以来就是那样，我们把家属接进城里不容易马上办到。毛泽东听了刘少奇的说法，总觉得不甚妥当，但一时又没有论据可以说服对方。他一回到家里，就查找了资料，写信帮助刘少奇纠正这一说法。**他在信中写道：

少奇同志：

前读笔记小说或别的诗话，有说贺知章事者。今日偶翻《全唐诗话》，说贺事较详，可供一阅。**他从长安辞归会稽（绍兴），年已86岁，可能妻已早死。其子被命为会稽司马，也可能六七十岁了。“儿童相见不相识”，此儿童我认为不是他自己的儿女，而是他的孙儿女或曾孙儿女，或第4代儿女，也当有别户人家的小孩子。**贺知章在长安做了数十年太子宾客等官，同明皇有君臣而兼友好之遇。他曾推荐李白于明皇，可见彼此惬洽。在长安几十年，不会没有眷属。这是我的看法。他的夫人中年逝世，他就变成独处，也未可知。他是信道教的，也有可能摒弃眷属。但一个90多岁像齐白石这样高年的人，没有亲属共处，是不可想象的。他是诗人，又是书家（他的草书《孝经》，至今犹存）。他是一个胸襟洒脱的人，不是一个清教徒式的人物。**唐朝未闻官吏禁带家眷事，整个历史也未闻此事。所以，不可以“少小离家”一诗，便作为断定古代官吏禁带家眷的充分证明。复寻《唐书·文苑·贺知章传》（《旧唐书·列传一百四十》，页24），亦无不带家属之记载。**近年文学选本注家，有说‘儿童’是贺之儿女者，纯属臆测，毫无确据。自从听了那次你谈到此事以后，总觉不甚妥当。请你再考一考，可能你是对的，我的想法不对。睡不着觉，偶触及此事，故写了这些，以供参考。

毛泽东 1958年2月10日上午10时

正是：改造中国为子任，事关主义细考论。民生从来无小事，谁人先辈不是民？

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闭幕。毛泽东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任命陈毅以副总理兼任外交部长。

此前，陈毅对毛泽东说：

“我这个人干外交恐怕不行。”“我这个陈毅，有时候说话很有破坏性，有时好感情用事，感情一上来说话就冲口而出，不管轻重的。在我们内部，对同志有什么伤害，可以对同志解释，在外交上这么一来可就砸锅了。”

毛泽东鼓励他说：

“你临事而惧正是优点。”

2月11日下午，毛泽东接见了从外地来中南海作客的原保姆孙嫂陈玉英的女儿孙燕，他问孙燕，在音乐专科学校爱好什么课？孙燕说，爱好音乐、美术、体育、文学，还说她曾经演过几个戏中的一些角色。毛泽东笑着说：

“你还蛮爱好艺术，从全面发展来看，你是有几项行的啰！很好，我们国家各方面的人才都需要。”

孙燕说：

“在初中毕业前夕，我写了封信给您，希望您写封信到中南音专去了解一下学校的情况，我接到了您的回信，您说不宜向学校写信，还给我寄了钱。”

毛泽东说：

“是的，我不好向学校写信，我写信去，人家会说是我推荐你去的，违反了学生要凭考试入学的原则，所以我写信去安慰你。”

孙燕说在音专学音乐，就是离家远。毛泽东鼓励她说：

“要离开妈妈，这对你是个锻炼。要学本事，就不要怕离开家。”

毛泽东又问了一些学校的文艺活动、老师讲课的情况和体育锻炼问题，接着问道：

“你会不会游泳？”

孙燕说不会。毛泽东说：

“是怕？还是妈妈不让游？游泳其实很简单，只要掌握了本领，下水不要怕，很容易学会的。”

他最后还语重心长地对孙燕说：

“一个人要懂得多方面的知识，要全面发展，就要大胆学习。我们国家有演戏的，唱歌的，写历史的，写剧本的，写小说的，画画的，研究科学的，这些人都是国家的财富。”

2月11日晚，毛泽东在给杨开智的回信中写道：

子珍同志：

几次来信，均已收到。听说贵体有些毛病，望好好养息。两位老太太高寿健康，甚为高兴，敬致问候之意。

并问尊夫人好！

毛泽东 2月11日

毛泽东信中所说的两位老太太，是指杨老太太和她的姐姐。

2月12日下午5时，毛泽东乘飞机离开北京到东北视察。

下午5时，辽宁省省委的黄欧东、沈阳市委的焦若愚等领导人，冒着天上飘落的雪花，在沈阳机场等候毛泽东的到来。

专机出现在机场上空，滑向跑道。黄欧东一行人急忙迎上前去。毛泽东身穿大衣，精神饱满地走下飞机，与黄欧东等人一一握手。他吩咐说：

“先到黎明机械厂去看看。”

按照预先的安排，毛泽东一行是先到宾馆去休息。黄欧东说：

“主席旅途疲劳，还是休息吧，再说工厂事先又没做安排。”

毛泽东说：

“先去工厂，没安排也可以看嘛！”

焦若愚也过来劝道：

“天黑了，都下班了。”

毛泽东不高兴了，反问道：

“工人不是三班倒吗？”

黄欧东、焦若愚眼见毛泽东执意要去，只好陪同他直接从机场乘车到了东塔黎明机械厂。

黎明机械厂是解放后才兴建起来的飞机发动机制造厂，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先进的大型工厂了。这个厂在兴建前，工厂的筹建者们曾经将沙盘模型送到了中南海，让毛泽东亲自过目并给予指导。

毛泽东对陪同在侧的黎明机械厂总工程师程华明说：

“总工程师管很多的事情哟，像总理一样，什么都得管。”

他在总装车间的光荣榜前，看了一会儿。程华明说：

“这光荣榜上的下放人员，有些是到农村定期锻炼，有些则轮流到一线当工人。”

毛泽东满意地点点头，说：

**“要把干部参加劳动作为一件大事，坚持下去才好。”**

车间里贴着不少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大字报。毛泽东指着大字报问：

“你们这里也有浪费现象吗？”

程华明说：

“有时也出废品的。”

“有停工现象吗？”

“有的时候由于原材料、零件供不上，出现局部的停工。厂里还有一部分剩余生产能力。”

“我看你们最大的浪费就是开工不足，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

“我们打算生产一些供农村做动力用的机械。”

毛泽东高兴地说：

“这样很好，生产农业机械是个方向，像你们这样的大厂，不支援农业是没有道理的。”

这一天晚上，毛泽东在宾馆里和黄欧东、焦若愚及鞍山市委书记等人谈了话，尔后，他一直工作到午夜1点多还没有休息。负责安全工作的辽宁省公安厅副厅长张铁军看看手表，轻轻地走进毛泽东的房间，催他休息。毛泽东说：

“我有些事情还没办完，你们辛苦了，先休息吧。”

2月13日清晨4点多，毛泽东还在看书，张铁军再一次催他休息，他却说：

“天快亮了，安排今天的活动吧。”

毛泽东这一天的日程是视察松陵机械厂和抚顺，然后去长春。

天气放晴了。毛泽东简单用过早点，于7点半到达松陵机械厂。厂长牛荫冠资历比较老，毛泽东在抗战时就听说过他的名字，于是握着他的手，端详片刻，说：

“噢，你就是牛荫冠，是山西人吧？今年多大年纪了？”

牛荫冠说：

“47岁。”

毛泽东笑着说：

“还是青年团员嘛。”

毛泽东在总装车间看到黑板报上的时事专栏，就伸出一个指头，点点说：

“应该注意时事。”

他又指着板报上一个“关于7003号废品卡片”的标题问：

“这写的是什么？”

车间干部说：

“是批评官僚主义的。”

毛泽东说：

“官僚主义应该批判。群众没贴你们的大字报？要充分相信工人群众，依靠工人群众，才能管好企业。”

他又问车间主任：

“你出国学习过没有？”

车间主任说：

“没有，是在厂里学习的。”

“那么，有没有工程师帮助你呢？”

“有一个助理工程师，是车间副主任。”

牛荫冠说：

“我们的办法是让一个工人固定一门技术，这样学得快，但有一个缺点，就是占用的人多。”

毛泽东问：

“那你们下一步怎么办呢？”

“叫工人再学会第二套本领。”

“对，每个工人学会两套本领就可以少用人嘛。”

随行人员提醒毛泽东，时间已经不早了。于是，毛泽东就离开了松陵机械厂。他听说沈阳小型开关厂是在设备非常简陋的条件下，由几百个工人硬是靠牛头刨、皮带床、老虎钳子等工具，造出了供机床控制用的电器开关，就说：

“我要去看看。”

于是，他的视察活动，在计划外又到了这个小工厂。小型开关厂接到通知，准备得匆忙、仓促。猜测会是哪位首长来。这时，毛泽东已经进了厂。他十分详细地询问电器开关的制造工序。特别问到车间是否有通风设备，关心工人劳动条件的改善。他拿着机床自动控制电器开关，翻来覆去地看。

车队离开开关厂，朝抚顺方向奔去，到了高坎乡旧站村，毛泽东叫停车。他下了车，直奔村里。

高坎乡旧站村的饲养员老王头屋里屋外忙活着，端一簸箕苞谷，套上车准备去拉料，刚推门出来，就看见几辆汽车开进村饲养场院里。车上下来几个穿大衣的人，当中有一个是毛泽东！老王头呆呆地站在那儿，也不敢上前去和毛泽东打招呼。生产队长赵文泉见毛泽东来了，赶紧迎上前去。毛泽东问赵文泉：

“大牲畜是分槽饲养还是集体饲养？”

赵文泉一个劲地重复：

“是集体饲养，是集体饲养。”

毛泽东询问生产队的土地、劳力、产量、社员收入等情况，特别关心农田基本建设、实现农业机械化、水利化等问题。赵文泉一一作了回答，并介绍去年入冬后农业社社员在冰天雪地里破土动工打了高坎乡第一眼电井，毛泽东拉住赵文泉的手说：

“走，你领我们看看电井去！”

一行人踏着积雪，来到了工地。毛泽东探身望着挖了9米多深的井筒，问道：

“你们为什么要打机井？”

赵文泉说：

“因为机井坚固，用水泥灌的。井打得深，水量大。”

“能浇多少亩地呀？”

“能浇300多亩呢。”

“电力从哪里来？”

赵文泉指指远处高压线的大铁架子说：

“就从那里引来，电柱子都开埋了。”

毛泽东高兴地说：

“这就叫集体化！机械化！”

他又转对省委领导说：

“辽宁的工业比重大，还要再把农业搞上去。”

从电井工地往回走，毛泽东又向赵文泉询问了队里积肥的情况，问壮劳力一年干多少劳动日？每个劳动日的分值是多少？男女劳力各占多少？种多少旱田，种多少水田？今年能完成多少水浇地？

离开旧站村，毛泽东又风尘仆仆地去了抚顺。抚顺市委负责人立即驱车前往迎接。没多远，毛泽东的车队就迎面而来。

9点刚过，毛泽东一行来到了抚顺煤矿的西露天矿。煤矿负责人迎上前来，毛泽东一边和他们亲切握手，一边询问他们的名字，还向煤矿党委书记葛玄吾、矿长王齐芳了解生产情况。矿长王齐芳介绍了露天矿解放前后的变化和目前的状况，讲到厂矿在总体改建设计施工中，常常因为进口材料、设备不能按时到达，影响生产。毛泽东说：

“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自力更生，发动群众。群众发动起来了，什么事情都好办了。”

王齐芳说矿工们跃跃欲试，要在1958年增产60万吨煤。毛泽东问：

“要不要增加人？”

王齐芳说：

“不增人，也不增加投资。”

毛泽东问：

“那用什么办法来增产呢？”

葛玄吾回答说：

“靠发动群众，搞老矿挖潜。”

毛泽东点点头说：

“这样做好。我赞成。”

他还说：

“各级领导干部要懂马列，还要学习自然科学知识，使自己逐步由外行变为内行。”

他拿起一块带有树叶、昆虫的叶岩，讲到了煤的生成过程，又说：

“抚顺的主要产品煤、油、电、钢、铝中，电是动力，是为其它工业服务的。”

毛泽东还举出十多种特殊钢含有的化学元素，谈到了什么是特殊钢。他说：

“抚顺是个以燃料为主的综合性重工业城市。煤的埋藏，量多质好，油的产量在逐年增加。煤和油含的成分很多，要研究如何把煤和油的原料提炼出来。综合利用很重要，价值很大，要把综合利用的问题好好研究，这是今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中央支持你们搞。”

谈到抚顺农业的发展，毛泽东说：

“应当很好贯彻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争取超过四十条。郊区应当很好地发展副食生产，建立副食基地，郊区生产要为城市服务。蔬菜供应要做到自给，肉蛋供应要逐步做到多解决一些。养猪就看你们干不干了，要干，肉食就能自给。”

尔后，毛泽东踏着很陡的梯蹬，登上观望台，俯视露天矿全景，远眺抚顺市景，对露天矿的生产资源及过程，对180多公尺厚煤层及丰富的人造石油的资源——油母叶岩，发生很大的兴趣。他问得很详细，从大问题到小细节；他看得也详细，从远到近，从南到北。看台风大，寒冷，陪同人员几次劝他下来，他都表示再等一会儿。看到老远有几个工人沿着大卷下盘铁道一步步向坑上爬，便问：

“那是工人吗？他们为什么不坐在上下坑道的车上来呢？”

王齐芳说：

“他们是大卷扬机铁道检修工，在那里工作。”

毛泽东点点头，他的视线停在远处冒着的几股烟上，问：

“那是什么？”

王齐芳回答：

“伪满时，日本侵略者乱掘乱挖，造成不少暗洞自燃发火。”

“能解决吗？”

“能有办法。”

毛泽东说：

“要加紧灭火，不要把国家的资源白白烧掉了。”

11点10分，毛泽东乘车来到抚顺电解铝厂，当他出现在第二车间门口时，人们惊讶又激动。正在检查铝锭质量的常桂荣放下小锤，摘下手套，想和毛泽东握手，伸出一半却迟疑地缩了回去。毛泽东主动伸出手去握常桂荣的手，问厂里的负责人：

“是自己培养的工人吗？”

负责人回答说：

“都是本厂自己培养的。”

电解车间里弥漫着烟尘和怪味，车间干部送给毛泽东两个口罩，毛泽东接过来，却不经意地拿着向电炉跟前走去，看工人操作，了解炉体结构和生产过程，还看了炉头上的电压表，直到离开车间，那两个口罩还在他的手里拎着。

参观完抚顺铝厂，毛泽东到抚顺宾馆休息。

中午，毛泽东接见了市委机关部委以上的领导干部，照了相。尔后，他乘车赶往沈阳机场。在机场，他同辽宁省、沈阳市、沈阳部队和辽宁省军区的两千多名干部一起合影留念。有人说：

“欢迎主席再来辽宁视察！”

毛泽东微微一笑，说：

“你们辽宁的粮食什么时候过了关，我再来！”

说罢，他向众人挥手告别，登上专机离开沈阳去长春。

这一天，长春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

下午1点30分，毛泽东乘坐的伊尔—14型4204号专机来到了长春，他走下飞机，没有休息，便驱车直奔汽车厂。

此前，毛泽东亲自主持会议，研究长春汽车厂的建设工作，决心结束中国不能生产汽车的历史。他批了力争1年建成长春汽车厂的文件，亲笔题写了“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纪念”11个大字。

3点多钟，毛泽东来到汽车厂。他戴了一顶单帽，穿着灰色的呢大衣，脚上是黄皮鞋，红光满面，神采奕奕，向工人们频频招手。工人们簇拥着领袖，掌声、欢呼声经久不息。

毛泽东在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和汽车厂党委书记、厂长的陪同下，首先视察铸造车间。他在走廊里看到墙壁上贴满了墙报，有反浪费、反保守的内容，有对领导干部善意的批评，有对整改的合理化建议，有对新人新事的赞扬，还有诗歌、漫画、数字图表，便从头到尾看了几分钟，兴奋地说：

“又有理论又有实物，这好！”

青年工人万国忠见毛泽东来了，激动得不知说啥好，只是一步一步地跟着往前走，就想多看领袖几眼。在毛泽东停下脚步的一瞬间，摄影师按下了快门。万国忠怎么也想不到，他竟然能够和毛泽东在一起，留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

毛泽东视察了底盘车间齿轮工部，他在一台机床旁边停下来，微笑着观看操作工人李文学的操作，又用手摸摸李文学加工的齿轮，他鼓励工人们说：

“好好干！”

毛泽东又来到总装配车间，年轻的装配工人们纷纷向他问好：

“毛主席，你好！”

“毛主席，你好！”

毛泽东也向大家挥手致意，亲切地说：

“同志们好！”

他转向厂领导问道：

“这里的工人都是多大年龄？”

厂领导说：

“大多数是青年工人，20岁左右。”

毛泽东说：

“青年人很多，要好好教育。”

他走到21岁的装配工萧荣刚身边，同萧荣刚握手。萧荣刚激动地说：

“毛主席，您好！”

毛泽东观看了一辆辆刚装配好的解放牌汽车，非常高兴。

是日晚，毛泽东在住处与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等人谈了话。

2月14日上午，毛泽东吃过早饭，在住所接见了吉林省和长春市党政负责人，和大家一一握手，询问每个人的名字，是哪个地方的人，做什么工作？他高兴地说：

“好啊，你们是五湖四海呀，哪个省来的都有。做革命工作嘛，不一定都在家门口，可以多跑几个地方，可以多做些工作嘛。”

毛泽东这次来长春时，随身带了不少农业书，他还让吉林省委的人帮助借了一批关于土壤学的著作阅读。所以，在这次谈话中，他主要是谈农业问题，他说：

**“你们要把农业搞上去。农业搞不上去，其它工作都会受到影响。用小农经济的办法不行，要搞大农业，要改善生产条件，要实行科学种田。”**

毛泽东问大家有没有看过土壤学方面的书籍，他还向大家推荐了中外土壤学的几个版本。他又说：

**“我赞成一位土壤学家的观点：‘没有瘠薄的土地，只有拙劣的耕作技术’。地薄不打粮，人可以改良土壤嘛。”**

毛泽东给大家讲了土壤的团粒结构，接着说：

“要加强对农业的研究，破坏了土壤的团粒结构，土壤就会变得板结，要注意研究土和水的关系。”

他询问吉林省有哪些肥源，他对大家提出的草炭很感兴趣，又询问草炭的形成和效用。他说：

“要多搞农家肥。”

毛泽东又讲到肥料被农作物吸收的道理，说这是细菌帮助的结果。他顺便又提出一个问题：1斤土壤里有多少细菌？在场的所有人都没有回答上来。他又问：

“东北地冻天寒，冬季搞不搞农田基本建设？怎么个搞法？”

一位负责人介绍了吉林省常用的“拉刀切土”法：即头一天在挖开的暖土上划出深格，第二天表层虽然冻实了，但沿着格印，就很容易把冻土一大块一大块的撬起来，露出下面的暖土。他一听就打听：附近有搞的吗？他还打算前去看看。

此时的吉林省，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比较低，有人主张放弃一部分土地，集中力量提高单产，但这样总产量就会有所下降。省委负责人问毛泽东怎么办好。毛泽东说：

“还是根据你们的具体情况决定。你们要实事求是，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确定我们的农业发展方针。要苦战三年五载，一定把农业搞上去。”

上午11点40分，毛泽东在吴德等人陪同下来到了长春电影制片厂办公大楼前，他和亚马厂长握手寒暄。他一边走一边问亚马：一年生产多少片子，全国各个制片厂一共拍多少片子？亚马说：全国共计划拍50多部。亚马建议说：

“请主席看看我们拍片的情况。”

毛泽东问：

“拍什么片子？”

“红孩子。”

“什么内容？”

亚马介绍了影片的内容。他说，这部故事片《红孩子》的内容是红军主力部队撤离中央苏区后，列宁小学的几个学生组织起来，夜晚机智地勒死了敌人的哨兵，获得了武器。

毛泽东来到第6摄影棚，亚马向毛泽东介绍了导演苏里、摄影师李光惠。他又指着小演员们问毛泽东：

“这些就是我们的红色儿童团员，请毛主席看看，像不像当年瑞金根据地的红孩子？”

毛泽东笑了。他亲切地问小演员是哪里人，在哪个学校上学？孩子们把毛泽东团团围住，有的拉着他的手，有的使劲鼓掌。扮演细妹和冬伢子的两个最小的演员，紧紧地靠在毛泽东身边。这时，新闻纪录片的摄影师开动了机器，毛泽东发现后，风趣地笑着说：

“不要把我当戏拍了进去呀！”

毛泽东在摄影棚内沿着布景里的小路转了一圈，指着一些人工制做的树叶和青草问：

“这些是什么东西？”

亚马说是拆下来的旧布景片。毛泽东问：

“能不能再用？”

“能用。有些要改做别的布景用。”

“在保证艺术质量的前提下，注意节约。我们要勤俭办一切事业。”

毛泽东来到影片《悬崖》的拍摄现场，和导演、演员们握手后，询问了影片的内容。

此时片场表演的场景是：一个青年渔民得了重病，医生正在为他看病，渔民的老妈妈无比忧愁。毛泽东一出现，演医生的演员竟然忘了看病，眼睛直瞪瞪地望着毛泽东，片场里顿时一片欢腾。毛泽东笑着说：

“医生把儿子的病治好了，老太太高兴了哇！”

众人都哄笑起来。扮演渔民的演员，光着脚从床上跳下来，紧紧握着毛泽东的手，笑着说：

“是毛主席来了，我的病好了。”

毛泽东也笑着说：

“噢，我还有这么大的本领！”

毛泽东又到第一录音室，看了秦腔戏曲片《火焰驹》的录音，他对秦腔演员们说：

“你们是从陕西来拍电影的，很好！”

此时，录音室外已经挤满了人，厂里的演员、职工听说毛泽东来了，都想看看他。毛泽东手拉着秦腔剧团一个带红领巾的小演员，从录音室出来，向大家招手致意，穿过狂欢的人群，走到汽车旁，又环顾四周，向人们挥手告别。

这天下午，毛泽东乘飞机返回了北京。

欲知毛泽东在东北考察后又有何重大决策？请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58年2月10日上午10时写给刘少奇的考证信，就其认真、负责、坦诚、友好而言，与本传第二卷中所述的他在1921年1月28日晚写给老朋友彭璜的劝诫信，何其相似也。更可贵的是，他在写给刘少奇的信中，从贺知章的年龄到贺知章儿子的年龄（旧时代人们婚育早，几乎是20年甚至不到20年就是一代人）到贺知章的官职及其与唐明皇的关系，从贺知章的性格特征及其所处的时代惯例，一一辨析，又以多种史料佐为旁证，并联系到当代齐白石老人的事例，令人信服地推翻了刘“断定”“禁带家属”古已有之的“臆测”。毛泽东以近乎职业史家的治学方式，层层分析、推论，有理有据。细细读来，令人叫绝。他所论证的虽然仅仅是一处诗句、一项古代官制的小事，但其批评态度之严谨，批评方法之科学，关心群众生活之立场，却是为后人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

**第47章**

**“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

**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

话说1958年2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普遍推行种试验田的经验的通知》，全文如下：

中共中央决定把湖北省委关于各级干部种试验田的报告在报纸上公布，并且要求全党各级组织加以讨论，根据这个经验改变自己的领导作风。

这个报告是1957年11月写的，说的也只是同时种试验田的若干县中的一个县即红安县的经验。现在种试验田的方法在湖北省已经比较盛行，其他省也有一些地方开始推广这个方法，某些工业企业中的干部也开始学习类似的工作方法。但是从整个来看，这个方法还远远没有在全国普及，全党认真讨论一次红安县的经验还有重大的迫切的意义。**种试验田是一种彻底克服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方法。它可以打掉官风，使干部真正到群众中间去领导群众。它可以使干部走上“又红又专”的道路，实现政治和技术的统一。我们全党的干部必须实现政治和技术的统一，既不要做迷失方向的实际家，又不要做空头政治家。**因此，在全国各地区各方面普遍推行种试验田的经验，是完成党的整风任务的基本关键之一。除了从事农业工作的干部应该普遍种试验田以外，从事工业工作、交通运输工作、财政贸易工作、文化教育工作以及其他领导工作的同志，也应该认真研究种试验田的方法，联系本身工作特点，得出必要结论，以便打掉官风，逐步达到又红又专的目的。

中共中央 1958年2月14日

2月18日，即旧历年的大年初一。《人民日报》发表了经毛泽东审定的《反浪费反保守是当前整风运动中的中心任务》的社论。社论中说：

“整风运动在全国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国家机关里，目前出现了一个新的洪峰。这就是以反浪费反保守为中心，掀起了一个新的鸣放高潮和整改高潮。在反浪费反保守的大鸣大放中，中央各国家机关贴出了25万张大字报；北京市31个企业20天的统计，职工们就贴出了20万张大字报，提出43万条意见。**运动声势浩大，锋芒集中在一个方向：贯彻多快好省勤俭建国的方针，促进生产和工作的大跃进。”“灿烂的思想政治之花，必然结成丰满的经济之果。**这是完全合乎规律的发展。”

2月18日下午，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在京的政治局成员、中央委员，还有中央各部党员部长或副部长，共计119人。

会议的主要内容是传达南宁会议精神和讨论《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此前，毛泽东在2月17日给刘少奇的信中曾说：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中央内部的整风”。

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一开始就说：

“今天的会议就叫团拜会。”

接着，他说：

“我们在南宁开会，有华东、中南、华南3个地区的人参加。东北找了个欧阳钦，华北找了个刘仁，西北是张德生，西南是李井泉。下一次我们准备到成都，大概是3月上旬，去谈一谈。因为《六十条》里有一条，一年要抓4次。东北我没去过，就是有一年路过，那不算去。华北的山西也没有去过，绥远也没有去过，河北的事情我也过问不多，西北根本没有去过，西南没有去过。所以我这几天又到了济南，又到了沈阳，又到了抚顺，又到了长春，这就多了一点了。等几天我还要跑。”

“今年是一个很大的生产高潮。以前没有解放，一部分上层建筑，一些环节，有错误、缺点，生产关系上不完善。因为整风，就改善了，攻破了，破坏了不好的，建立了比较好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较平等了，能讲话了，可以贴大字报了，老爷气少了，这样，群众就高兴了，就来了一个生产高潮。**现在这个高涨的群众情绪，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没有见过。**1956年春季是有一个高涨，但是没有现在这一次高涨。”“我赞成这个冒进。这个冒进好嘛！这使农民的水利多了嘛！工人的气刚刚上来，1956年夏季就来一巴掌。11月二中全会以后就好一些了，因为二中全会也算挡了挡。没有几个月情况就改变了。冒是有点冒，而不应该提什么反冒进的口号。有一点冒是难免的。

同志们，今年下半年，你们就会看到，要有一个大冒就是了。我看是比哪一年冒进还要厉害，为了对付这个情况，我们怎么办？处在这个大的群众高潮面前，中共中央，共产党要采取态度。”“**以后反冒进的口号不要提，反右倾保守的口号要提。反冒进这个口号不好，吃亏，打击群众。反右倾这个口号为什么不会打击群众呢？反右倾所打击的就是一部分人的那些气（官气、暮气、骄气、娇气），一些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这些东西应该加以打击。”**

接下来，毛泽东着重讲了打掉官气、以平等的态度待人、改进领导方法的问题，他说：

**“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不论你官多大，无非是当主席，当总理，当部长，当省长，那么大的官，但是你只能以一个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样，你的官更好做，更多得到人民拥护。”

他还说：

**“在北京做官，官气比较重，下去的时候很要注意，不要学‘巡按出朝，地动山摇’那一套。”“要消灭官僚主义，消除资产阶级作风，**要使得大家感到，现在是真正的解放了，建立起真正的平等关系。以前，我们的相互关系，如在基层，厂长、党委书记、工会主席和职工中间，并不平等，群众把他们称为‘官’，党、政、工、团是‘四大领袖’。而现在，经过大鸣大放大辩论，情况就改变了。群众看到，这些人可以批评，他们也真改正缺点。于是群众也纷纷起来改进工作，**落后的职工批判了自己过去只为人民币服务、只为‘五大件’服务的错误态度。经过运动，他们认识到应该为人民服务了**。于是劳动热情高涨，干劲十足。这样，我们解决‘相互关系’这个中间问题，就进一步巩固了所有制，同时也使得分配问题容易得到解决。”

毛泽东最后说：

“群众中间有一个很大的革命热情。所以，我们中央委员会、政治局要适应这种情况。工作方法要改变，不改变就不能继续前进。”

毛泽东讲话结束后，大家对《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发表了意见，同意下发征求各省和各部门的意见。

陈云在发言中就反冒进中财贸工作的问题作了自我批评。他说，在财贸工作中，对毛主席和政治局采取了“倾盆大雨”和“本本主义”的办法。

会议结束前，毛泽东再次讲话，回顾了《农业四十条》的形成过程，他说：

“四十条，开头无所谓四十条，不晓得怎么在杭州一次会上七议八议提出十五条，然后天津一次会加了两条，十七条。在1956年1月知识分子会议上讲了一下，然后，再到第2次杭州会议（指毛泽东1956年1月3日至9日在杭州召开的会议——笔者注。）才形成四十条。一年半以后，到去年夏季，在青岛会议上有各省同志参加，中央也有同志参加，提出修改意见。然后经过去年9月三中全会，大家觉得可以，也提了些意见，加以修改，就形成现在这个草案。”

据陶鲁笳回忆，毛泽东还说：

“写一个文件没有实际工作经验是写不出来的。《农业四十条》是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七议八议议出来的。其中只有1条‘除四害’是我的，其余都是别人的。”

毛泽东又谈到了《论十大关系》，他说：

“那个十大关系怎么出来的呢？我在北京经过1个半月，每天谈一个部，找了34个部的同志谈话，逐渐形成了那个十条。如果没有那些人谈话，那个十大关系怎么会形成呢？不可能形成。”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是个大事。我是历来主张虚君共和的，中央要办一些事，但是不要办多了，大批的事放在省同市去办，他们比我们办得好，要相信他们。现在的情况是下面比较活泼，中央部门中的官气、暮气、骄气、娇气就多些。我就有这么个企图，在南宁会议上，觉得要把这些气革一下，要老百姓化，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资格出现。”

他还谈到了1957年12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的起草过程，他说：

“那个东西在访苏前就开始写了，因为没有写完，带到莫斯科去了。‘闲来无事江边望’，有点闲工夫，就在我们代表团中间先读一读。回来又经过斟酌，政治局还有一些同志看过才发表的。多快好省，这是代表中央的，是党的一个路线，是我们搞建设的一个路线。”

毛泽东再一次提到了周恩来1957年6月26日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他说：

“虽然总理有那篇报告，但是这个问题人们还不那么了解，所以南宁会议还是要放一炮的。这个炮，我看不过是小炮而已，害得一些同志紧张。何必那么十分紧张。南宁会议我们就讲了的，就是这么一件事，一个时期，一个问题。**1956年反冒进，这是个什么事情呢？这是大家在正确的路线之下，在个别问题上意见不一致，这么一种性质。**”

2月20日，也就是在正月初三这一天，毛泽东给杨开英写了一封回信。

此前，43岁的杨开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上说，经人介绍，她与化工部橡胶工艺设计院工程师李辉由相识到相爱，已经结为伴侣，由大连调来北京，在第69中学任教务主任。她的病情也有所好转。毛泽东看罢信十分高兴，提笔在回信中写道：

友妹：

来信收到，很高兴。结婚了，病也好了，为你祝贺。好像是在1956年，听了胡觉民同志说你又穷又病，曾付一信，并寄了一点钱给你，不知收到否？我还好。江青有一点病。谢谢你的问候。祝你努力为人民服务，同时注意身体。并问李同志好！

毛泽东 1958年2月20日

2月23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说：

“一股风一来，本来是基本上好的一件事，可以说成不好的；本来是基本上一个好的人，可以说他是坏人。比如我们对于秦始皇，他的名誉也是又好又不好。搞了两千多年封建社会，没有人讲他好的，自从资本主义兴起来，秦始皇又有名誉了。但是，**共产主义者不是每个人都说秦始皇有点什么好处，不是每个人都估计得那么恰当**。这个人大概缺点甚多，有3个指头。主要骂他的一条是焚书坑儒。我跟好多人说过，跟章士钊也说过，我说：你们讲共产党等于秦始皇，不对，超过一百倍。所以，**一个古人，几千年评价不下来，当作教训谈谈这个问题，同志们可以想一想。**”

1958年初，毛泽东一直惦记着西柏坡乡亲们种稻子直播的事，他给西柏坡村党支部写了一封信，说他们村种稻技术落后，让农业部邀请他们派人去涿县参观学习，秋后把收成情况直接给他汇报。

西柏坡村党支部看了毛泽东的来信，后来派两个人去学习了一个星期，回到西柏坡后全村所种稻子都改成了插秧。

1958年3月3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发表在3月4日的《人民日报》上），全文如下：

**现在反浪费、反保守的群众运动，已经在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商业、文教卫生、政法等部门、国家机关、党群机关和军队等方面开展起来。这是一个社会主义的生产大跃进和文化大跃进的运动，是在全民整风运动中改进整个国家工作和促进全民大干劲的一个带有决定性的运动。**在运动中展开了关于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方针的全民大辩论，并且证明党中央的这个方针是完全正确的。这个运动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在很多地方、很多单位已经形成了很大规模的群众运动高潮，但是另有很多单位还没有开始发动或者还没有充分把群众发动起来。也有不少单位还没有把反浪费、反保守运动同思想作风上的系统整改很好地结合起来。有些同志甚至觉得生产和整风这两项紧迫任务，是互相矛盾、很难同时并举的。这种想法是不妥当的。大量的事实证明，只要我们抓紧反浪费、反保守运动这条纲，领导得好，安排得好，群众发动得好，完全可以把现阶段的整风运动和生产等工作统一的抓起来，而且，**只要发动起群众性的反浪费，反保守运动，就可以有力地揭露出一些干部思想作风上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危害性，就可以迅速地打掉官气、暮气、阔气、骄气和娇气，就可以进一步密切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提高群众的觉悟和积极性，使干部和群众真正打成一片，就可以用同样的人数和同样的财力、物力，办出比原定计划多百分之几十以至数以倍计的事业。**

因此，中央决定以两个月到3个月的时间，在全国进一步普遍地开展反浪费、反保守、比先进、比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运动。各级党委，各部门和各单位的一切党的组织，必须抓紧对这一运动的领导，并且注意下列各点：

一、**领导上要心中有数，一方面，必须放手发动群众，采用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开现场会议和展览会等等形式，揭露和批判浪费、保守的现象和它们的危害性；另一方面，还必须注意，不管过去的浪费和保守现象如何严重，成绩总还是主要的，缺点和错误只不过是10个指头中的1个指头。因此，应该适时地引导干部和群众把最大的注意力和干劲放在积极的改进工作、发展生产方面，用比先进、比多快好省的具体措施，在实际上清除浪费、保守的现象和思想。**

二、在运动中，要防止“见物不见人”的偏向，即只看到现有的物质条件，看不到伟大的群众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要防止只片面地注意业务，而忽视思想政治工作。同时，也要防止离开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实践，抽象地空谈整改。

三、凡是没有经过群众鸣放、干部整改过程的地方，在这个运动中间，应该选择适当的时机，认真补课，即首先让群众批评干部和工作中的缺点，并且雷厉风行地加以改正，以消除群众和干部间的隔阂，解除群众的顾虑。

四、在运动过程中，会不断出现惊人的奇迹，出现各种平日难以达到的先进的速度和先进的指标，树立起各种先进的典型和旗帜。原来设想和安排好的平衡，也会不断地被万马奔腾的群众运动所突破。我们应该欢迎和赞扬群众在各个战线上的跃进，促进落后的部分赶上去，力求在先进的基础上达到新的运动的平衡，并且审订原来的规划。

五、原来一些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规章制度，会在运动中不断地为群众的创举所打破。我们必须对于群众的创造，虚心地加以研究，按照发展的需要和群众在实践中的考验，重新审订原来的规章制度。凡是真正束缚生产力发展而又可以迅速修改的，应该立即修改。

六、现在已经有些群众自动要求取消或者改变那些不合理的工资福利制度。我们对于群众这种社会主义的大公无私的表现和热情，应该欢迎和爱护。但是在实际处理工资福利问题的时候，必须采取谨慎的态度。对于那些真正妨碍工农团结、妨害职工内部团结和其他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工资福利制度，应该经过细心的研究，经过省、市、自治区党委批准（全国性的要经过中央批准），作恰当的调整，除此以外，**不要降低工人的实际工资。**

关于运动的具体部署和工作步骤，由各地各级党委自行安排。关于运动的经验应该及时地加以总结和交流。

1958年3月3日

3月4日，毛泽东乘专机离开北京，经西安，于下午飞抵成都。这是他第一次到成都来，准备在这里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

毛泽东有个习惯，在外出时总是喜欢随身携带几大箱子的书籍，而且每到一地，还要借一些地方志之类的书籍来看。如果时间允许的话，他还要兴之所至地下去走一走，看一看，而不喜欢刻意安排的视察活动。这不仅是出于他那无拘无束的个性，更主要的是他相信只有这样，才能看到真实的情况。毛泽东这次到了成都，立即借来了《四川省志》、《蜀本记》、《华阳国志》等书籍，以后他又要来《都江堰水利述要》、《灌县志》等地方志书籍，边读边在书上批、画、圈、点。

3月5日下午，毛泽东兴致勃勃地去郊区农村察看了庄稼的长势。他听说成都量具刃具厂就在附近，提出要去看看，还交代说：

“不要告诉工厂党委了，他们很忙，请一位工人带路就行，只看一个车间就走。”

此时已经是下午4点多，量具刃具厂备料车间主任王站明，正趴在那儿写材料，一个工人跑来说：毛主席已经到了车间门口。王站明不相信，他说：毛主席怎么可能到我们这儿来？工人说：这是千真万确！王站明这才慌了，急忙跑出门去，只见几辆小汽车果然停在车间门口，毛泽东穿一身银灰色制服站在那里。王站明迎上前去，毛泽东握着他的手，含笑问道：

“你是车间主任吗？”

王站明说是。毛泽东说：

“我看看你们的车间，可以吗？”

王站明被毛泽东谦虚和气的话感动了，激动得说不出话，只是点头微笑。毛泽东进了车间，指着正在操作的锻工，比划着问：

“你会干这个吗？”

王站明说：我是车工。毛泽东看着锻工谢钦荣操作着150公斤空气锤，一起一落，火红的锻件迸发出火花，四处飞溅。**王站明介绍说：这台机床是沈阳制造的，边上那一台大的是太原的产品，都是国产，效率很高**。毛泽东听了很高兴，不住地点头。他来到调直台前，问：

“这是什么？怎么用？”

王站明一边介绍，一边上台示范操作，旋转上边的把手，把一根微微弯曲的铁棒压直。工人们渐渐围拢上来，毛泽东握着一位青年工人的手，问他叫什么名字，多大年纪？这位工人激动地说：

“我叫吴朝武，今年19岁了。”

毛泽东看完了备料车间，走到铣刀车间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此时，厂党委书记和厂长闻讯赶来了，毛泽东向他们解释说，怕影响他们工作才没有通知他们。毛泽东看着车间黑板报上的生产跃进保证书，回头问道：

“什么是文明生产？”

厂长回答说：

“文明生产就是要贯彻对机器的维护保养，做到安全、清洁、卫生和生产有秩序。”

毛泽东称赞道：

“很好。”

3月7日下午4时，杜甫草堂的工作人员突然跑来对负责人林延年说：

“快去接待吧，有客人来草堂参观，已经从草堂寺进来了。”

“是哪一位客人，没从大门进而从草堂这边过来了？”

林延年一边猜想，一边走向浣花祠甬道，见有一群人已经穿过了花径，为首一人，身材高大魁伟，踏过小桥，步上柴门的台阶，往工部祠而去。林延年仔细一看，那人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不由得为之一愣，赶紧往工部祠迎候。

毛泽东看了杜甫草堂题咏的诗句石刻，看了题壁，浏览了祠内杜甫的泥塑、石刻像，然后来到诗史堂。他问林延年：

“这是什么地方？”

林延年说：

“这是诗史堂，是后人为纪念杜甫而修的。”

毛泽东站在诗史堂正中一尊古铜色的杜甫全身塑像前，一面端详着，一面点燃一支烟，慢慢地吸着。他又走进杜诗版本展览室，仔细地观看一部用雪白的宣纸影印的宋本杜工部集。林延年告诉毛泽东说：

“这是最近上海收集到的版本，发行到成都来的。”

毛泽东问：

“有多少本？”

“发行到成都来的约有10多部。”

“太少了。”毛泽东看了诸多版本后，自言自语地说：“是政治诗。”

他又来到“大廨”前面，在一排栏杆前找了一个带有靠背的“飞来椅”，坐下来休息。他吐着烟，四下环顾，突然又站起身，走到通堂式的敞厅前，看悬挂的一副对联，以轻微的声音念着上联：

“异代不同时，问如此江山，龙蜷虎卧几诗客；”

他自言自语地说：

“是集杜句。”

接着又看下联，看完了，指着对联，微笑着说：

“好联！”

毛泽东想到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忍不住诵道：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他还笑着说：

“看来，高级知识分子的住宿困难问题，是古已有之的。”

第二天，毛泽东派人到杜甫草堂借了楹联书10余种。

后来在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还借阅了各种版本杜甫诗集共12部108本，还编印了唐宋诗人有关四川的诗词集拟题，并亲自校勘稿样。编入的诗词里，有杜甫诗14首。

3月9日，毛泽东在成都郊外金牛坝宾馆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即成都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1958年经济发展计划及发展地方工业、实现农业发展纲要问题。

参加成都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大部分常委，政治局部分委员和候补委员，书记处的个别书记，还有东北、华北、西北、西南各省的第一书记，中南和华东个别省委书记，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他们是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李富春、罗荣桓、陈伯达、薄一波、谭震林、胡乔木、田家英、黄欧东、吴德、欧阳钦、张德生、张仲良、汪锋、王恩茂、林铁、陶鲁笳、乌兰夫、刘仁、黄火青、李井泉、周林、谢富治、柯庆施、王任重、陶铸、阎红彦。后来又增加了王鹤寿、彭涛、滕代远。

中央政治局常委住在各个小别墅里，其他人员住在4层楼的宾馆里。毛泽东想起到会的中央候补委员阎红彦，曾在“七大”期间为反对高岗篡改个人历史，混进中央，受到了刘少奇、任弼时的批评，就专门把阎红彦叫到身边，向他道歉：

“阎红彦同志，很对不起，把你冤枉了10多年，当时只怪我看错了人。”

他还对身边的人说：

“阎红彦是一位好同志。在陕北苏区、陕北红军、陕北党的建立过程中，除了刘志丹、谢子长，数阎红彦的贡献大。”

次年，阎红彦便被任命为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昆明军区第一政委。

在3月9日这一天，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提出了25个问题让大家讨论。这25个问题，可以说是从政治到经济、从理论原则到工作方法都谈到了。但他讲话的重点，仍是放在对1956年反冒进的批判上。毛泽东说：

“**现在有两种方法，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在南宁会议上批判了反冒进的错误。究竟采用哪一种？我看应采用‘冒进’，很多问题都可以这样提。**也就是采用1958年‘大跃进’这个方法好**。执行计划，一种方法是10年计划20年搞完，一种方法是10年计划二三年搞完，哪种方法好？是1956年的‘马克思主义’好，还是1958年的‘冒进’好？”

他批评了经济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他说：

“少奇同志在南宁会议谈了规章制度问题。规章制度从苏联搬来了一大批，如搬苏联的警卫制度，害死人，限制了负责同志的活动，前呼后拥，不许参观，不许上馆子，不许上街买鞋。陈云同志让他亲戚煮饭，警卫部门认为不得了。”“搬苏联的很多，害人不浅。那些规章制度束缚生产力，制造浪费，制造官僚主义。”“搬，要有分析，不要硬搬，硬搬就是不独立思考，忘记了历史上的教条主义的教训。”“**苏联的经验只能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不从之。把苏联经验孤立起来，不看中国实际，就是不择其善者而从之。”**

由于毛泽东定的调子很高，成都会议一开始就比较紧张。

鉴于通县1956年农业生产高指标的教训，毛泽东在讲话中告诫与会者们说：

**“要跃进，但不要空喊，指标很高，实现不了。通县原来亩产150斤，1956年提出要在一年内跃为800斤，没有实现，是主观主义。**这也无大害处，屁股不要打那么重。**现在跃进，有无虚报和不切实际的毛病？**现在不要去泼冷水，而是要提倡实报、喊实，要有具体措施，保证口号的实现。”

毛泽东针对河南省要苦战1年，实现458、水利化、“除四害”和消灭文盲的计划，还有辽宁省要在1年内实现3自给，即粮、菜、肉本省自给的计划，说道：

**“也许你辽宁是对的，我怀疑是错误的，你是马克思主义，我是机会主义**。**河南今年办4件大事，有些可能做到，有些可能做不到，就算全部能做到，可不可以还是提5年做到。**今年真的全做到了，也不要登报。《人民日报》硬是卡死。否则这个省登报，那个省登报，大家抢先，搞得天下大乱。1年完成不登报，两年完成恐怕也不要登报。各省提口号恐怕时间以长一点为好。我就是有点机会主义，要留有余地。**各省不要一阵风，不要看河南说1年完成，你也说1年完成。就让河南今年试一年，灵了，让它当第一。你明年再搞。只差1年，有什么要紧。此事关系重大，我到武昌时要找吴芝圃谈谈。**1955年合作化高潮时，周小舟看见别的省1年实现高级社，紧张得不得了。其实不要紧。**李井泉就是从容不迫，四川实现高级化，不是1955年，也不是1956年，而是1957年，不是也蛮好吗？**”

“**现在报纸宣传报道上要调整一下，不要尽唱高调，要压缩空气。这不是泼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按实际条件办事。提口号，定指标，要留有余地。”**

毛泽东提倡干部要讲真话，他说：

“屈原是敢讲真话的人，敢为原则而斗争，虽然不得志。”

他还说：

“报纸如何办？中央、省、专区的报纸如何改变面貌，办得生动活泼？《人民日报》提出23条，有跃进的可能。我们组织和指导工作，主要依靠报纸，单是开会，效果有限。”

3月10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中，讲到了坚持原则与独创精神，进一步批评教条主义，他说：

“学习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专门模仿，一种是有独创精神，学习与独创相结合。硬搬苏联的规章制度，就是缺乏独创精神。”“全国解放后，1950年至1957年，在经济工作和文教工作中产生了教条主义，军事工作中搬了一部分教条，但基本原则坚持了，还不能说是教条主义。经济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主要表现在重工业、计划工作、银行工作和统计工作方面，特别是重工业和计划方面，因为我们不懂，完全没有经验，横竖自己不懂得，只好搬。”“商业搬得少些，因中央接触较多，批转文件较多。轻工业中的教条主义也少些。**社会主义革命和农业合作化未受教条主义影响。**”

关于教条主义产生的原因，毛泽东分析说：

“1、重工业的设计、施工、安装，自己都不行，没有经验，没有专家，部长是外行，只好抄外国的，抄了也不会鉴别。2、对苏联和中国的情况都不了解。对苏联的经验、情况、历史发展不甚了解，既然不了解只好盲目地学他们。3、精神上受到压力。1956年斯大林受批判，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揭掉盖子，破除迷信，去掉压力，解放思想，完全必要。**菩萨比人大好多倍，是为了吓人。**戏台上的英雄豪杰一出来，与众不同。斯大林就是那样的人。**中国人当奴隶惯了，似乎还要当下去，中国艺术家画我和斯大林的像，总比斯大林矮一些，盲目地屈服于苏联的精神压力。**马列主义对任何人都是平等的，应该平等待人。但是，**赫鲁晓夫一棍子把斯大林打死，也是一种压力，中国共产党大多数人是不同意的，还有一些人屈服于这种压力，要打倒个人崇拜。我们不赞成，他们不挂像，我们挂像。**批判斯大林后，使那些迷信的人清醒了一些。要使我们的同志认识到，老祖宗也有缺点，要加以分析，不要那样迷信。对苏联的经验，一切好的应接受，不好的应拒绝。现在，我们已学会了一些本领，对苏联有了些了解，对自己也了解了。4、不懂得比较法，不懂得树立对立面。对许多规章制度，我们许多同志不去设想有没有另外一种方案，择其合乎中国情况者应用，不适合者另拟，也不做分析，不动脑筋，不加比较。”

毛泽东还说：

“1956年4月的《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在十大关系中，工业和农业，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国家、集体和个人，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这5条是主要的。”“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讲了工农业同时并举、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农业合作化等问题。这一年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全民整风、反右派、群众性的对我们的批评，对人们思想的启发很大。”“1958年，在杭州、南宁、成都开了3次会。会上大家提了许多意见，开动脑筋，总结8年的经验，对思想有很大启发。南宁会议上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国务院各部门的规章制度，可以改，而且应当改。怎样改呢？一个办法是和群众见面，一个办法是搞大字报。另一个问题是地方分权，现在已经开始实行。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同时存在，能集的则集，能分的则分，这是去年三中全会后定下来的。”

关于个人崇拜问题，他说：

“有些人对反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崇拜，这就不对了。

**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体领导也不成。我们党在历史上就是强调个人作用和集体领导相结合的。打死斯大林，有些人有共鸣，有个人目的，就是为了想让别人崇拜自己。有人反对列宁，说列宁独裁，列宁回答得很干脆：‘与其让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

从这一天开始，成都会议听取各省市区党委负责人汇报，毛泽东在中间有许多插话。在乌兰夫发言时，毛泽东先后插话说：

“蒙汉两族要亲密合作，要相信马克思主义。各族要互相相信，不管什么民族，要看真理在谁方面，马克思是犹太人，斯大林是少数民族。蒋介石是汉人，但很坏，我们要坚决反对。不要一定是本省人执政，不管哪里人——南方或北方，这族或那族，只问那个有没有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有多少？这一点要向少数民族同志讲清楚。”

“汉族开始并非大族，而是由许多民族混合进来的。汉人在历史上征服过少数民族，把他们赶上山。应该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民族问题。究竟是吃民族主义的饭，还是吃共产主义的饭？首先应当吃共产主义的饭，地方要，但不要地方主义。”

3月15日前后，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到总路线时，他提醒吴冷西说：

“《人民日报》2月3日的社论题目叫作《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这两句话很好，但还不够。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干劲，在去年反击右派以后，早就鼓起来了，现在的问题是鼓得够不够，责任在领导。这里有一个数量问题，是鼓起三分、五分还是七分、八分？领导的责任是因势利导，使干部和群众的干劲鼓得足足的。所以，**我们的总路线应该叫作：‘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总路线’，这就比较完全了。**”

欲知此后成都会议如何进行？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一方面继续批评反冒进，一方面又强调：“**现在报纸宣传报道上要调整一下，不要尽唱高调，要压缩空气。这不是泼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按实际条件办事。提口号，定指标，要留有余地。”**这就是他在教育下属的时候一贯提倡的办实事，说真话。很可惜，一些人在评价大跃进运动的时候，往往有意无意地忽视了这一方面的事实。这就不可避免地走上了历史虚无主义的歧途。歪曲历史，抹黑领袖，实在是不应该。

**第48章**

**“我们的总路线的基本点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

**会主义。贯彻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就一定能把事情办好。”**

话说1958年3月16日下午6点10分，一辆小车沿着成都至灌县的公路开到郫县合兴乡，左转弯驶上乡村马路，在距离红光社办公处500米的地方停了下来。从车上下来的有毛泽东和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等人。郫县县委书记刘致台、农村工作部长潘兆清、红光社社长周桂林和副社长刘贤松快步向前迎接。毛泽东和他们一一握手，说道：

“这里是一片青枝绿叶啊！”

李井泉一众人等陪同毛泽东走上一条小路，毛泽东说：

“我们先看一户人家好不好？”

周桂林说：好。于是，毛泽东向着一户人家走去，他指着路边的一堆泥，问道：

“这是肥料吗？”

周桂林说：

“这是社员们最近从成都推回来的塘泥，是很好的肥料。”

毛泽东又指着路边的菜园问：

“这是些什么菜？”

刘贤松回答说：

“这是社员的自留地，种的是莴笋、莲花白。”

一行人来到温老太太家里，围坐在一张方桌四周的板凳上。毛泽东就坐在这位60多岁的老太太对面，他用四川话对老太太说：

“我们摆一摆龙门阵好不好？你家入社没有？”

老太太没有认出毛泽东，她还以为是外省来的干部，就回答说，入了。

“什么时候入的？”

“1954年。”

“你们一个人一年分多少粮食？”

“分几百斤。”

刘贤松补充说：

“分450斤。”

毛泽东对温老太太说：

**“他们说的不算，你们分多少？够吃吗？”**

温老太太说：

“我们1年1人分四五百斤粮食，不浪费就够吃了。”

“你认不认得你们社长？”

“怎么不认得？这是周社长，那是刘社长，还有两个社长。”

“社长欺不欺负你们？”

“我们几个社长见人都是笑眯眯的，欺负啥子哟。”

“你知不知道‘除四害’？”

“知道。我们是除7害。”

“你们除哪7害？”

“麻雀，老鼠，苍蝇，蚊子，跳蚤，臭虫，还有偷油婆。”

“为什么要除7害呢？”

“麻雀、老鼠要偷粮食吃，蚊子、跳蚤、臭虫吸人血，苍蝇腿杆上有细菌。”

“偷油婆呢？偷油婆有什么害处？”

“偷油婆到处爬，脚上也有细菌，它爬过的东西还有臭气，吃了要发呕。”

“你还懂得科学知识哩！”

毛泽东说罢，想看一看偷油婆是个什么样子，几个干部就围着碗柜找了一遍，没有找到。毛泽东也在碗柜前看了一下，他说：

“再看看你的房间好不好？”

这间房子不算大，毛泽东环视了一下，房间里很整洁，家具也齐全。他走出房间，笑着问身边的人：

“这家是地主还是富农啊？”

温老太太接过话头说：

“我们是贫农。”

说得毛泽东和大家都笑了。毛泽东走到院子里，看到猪圈里只有1头猪，就说：

“如果喂两头就好了。”

毛泽东出了温老太太的家，问起灭蚊灭蝇的方法，周桂林介绍说：

“**茅坑里生沙虫子，把打破碗花花铡碎丢到茅坑里，就可以杀死沙虫子，以后用这粪水浇烟，可以治土蚕子，也可以治螟虫。**”

毛泽东问：

“什么叫打破碗花花？现在有没有？”

周桂林让人扯来一株带花的野草，毛泽东看了看说：

“它并没有打破碗，为什么叫打破碗花花？”

潘兆清介绍说：

“这种花有毒，从前为了防止孩子们摘它，农民就对孩子们说，摘了这种花，就要打破碗，打破碗就吃不成饭，打破碗花花就这样得了名。”

毛泽东高兴地说：

**“这是一个重大发现，是群众的一个创造，好办法，要推广。**打破碗花花多不多？”

大家说：

“多得很，沟边、河边、坟地边，到处都有。”

省农业厅驻红光社的处长梁禹久插话说：

**“打破碗花花在书上叫野棉花，有毒，可以杀虫。**”

毛泽东说：

“你这一说，接触了科学道理。**你今天动手写稿，明天写成，后天审稿，再后天登报。**”

他来到麦田边，蹲下身子，左手握着一墩麦苗，右手一根一根地数它的分蘖，问道：

“一棵麦子能发几根？”

周桂林说：

“一般发三四根。”

毛泽东走到马路上，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中华牌香烟，递给同行者每人一支，他自己也点燃了一支，吸了一口，问刘致台：

“你是哪里人？”

“山西人。”

毛泽东又问潘兆清：

“你呢？”

“我是本地人。”

“你们本地人与外地人打架不打架？”

大家都说：不打架！毛泽东高兴地笑了。他又问周桂林：

“你们社里有没有女社长？”

周桂林说，有啊。女社长萧绍群就在附近的人群中，周桂林派人把她叫了来。萧绍群激动地向毛泽东问好。毛泽东又问：

“你们乡里有没有女乡长？”

刘致台说没有，他指着一位女干部介绍说：

“她是乡妇联主任游福群。”

毛泽东问游福群：

“你们三八节开会没有？”

游福群说：

“三八节开了妇女积极分子大会。”

毛泽东又指着刘致台、潘兆清，笑着问游福群：

“斗争他们没有？三八节女人斗争男人。”

下午7点20分，毛泽东与众人一一握手告别，乘车回了成都。

3月19日，毛泽东听完了各地方党委负责人的工作汇报。

是日晚，他在重新选编印发与会者的学习材料上写了一个说明，全文如下：

“这些按语见《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是1955年9月和12月写的，其中有一些现在还没有丧失它们的意义。其中说：1955年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决战取得基本胜利的一年，这样说不妥当。应当说：**1955年是在生产关系的所有制方面取得基本胜利的一年，在生产关系的其它方面以及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即思想战线方面和政治战线方面，则或者还没有基本胜利，或者还没有完全胜利，还有待于尔后的努力。**我们没有预料到1956年国际方面会发生那样大的风浪，也没有预料到1956年国内方面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这两件事，都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由此得到教训：**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应当准备对付国际国内可能发生的许多重大困难。**无论就国际方面说来，或者就国内方面说来，总的形势是有利的，这点是肯定的；但是一定会有许多重大困难发生，我们必须准备去对付。”

3月20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第3次发表讲话。关于地方党委负责人在汇报中提到的改良农具的群众运动，他说：

“这是技术革命的萌芽，是一个伟大的革命。群众性的创造是无穷无尽的，是从下而上搞起来的。我们发现了好的东西，就要加以总结推广。”

他鼓励与会者们说：

“要有创造精神，去掉各种怕的思想，要办刊物，要敢于到中央来工作。”

他还说，陈伯达“过去死也不肯办一个理论刊物，胆子太小，这次才振作精神，下决心办。”

对于河南省提出1年实现“四、五、八”，实现水利化、“除四害”，消灭文盲，毛泽东说：

“可能有些能做到。即使是全部能做到，也不要登报。各省不要一阵风，说河南一年，大家都一年。可以让河南实验一年。如果河南灵了，明年各省再来一个运动，大跃进。如果一年实现‘四、五、八’，消灭文盲，也可能缺点很大，起码是工作粗糙，群众过分紧张。我们的总路线的基本点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贯彻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就一定能把事情办好。只要总路线正确，那么1年、2年、3年乃至5年完成‘四十条’，那也不能算没有面子，不算不荣誉。建设速度是客观的，凡是根据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能办到的，就应当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但**办不到的不勉强，要波浪式地前进。急与缓是对立的统一。**现在有股风，10级台风，不要公开去挡，要在内部讲清楚，把空气压缩一下。**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务实。**有些高指标，没有措施，那就不好。”

他还说：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基本点已经有了，但还在创造中。现在已经使得少数人觉得这条路线是正确的。可能还有很多人是将信将疑，或者说是不自觉的。对于我们来说，从理论上和若干工作的实践上（例如工农业有相当的增产，工作也有相当的成绩，多数人心情舒畅），认为这条路线是正确的。但四十条还没有实现，15年赶上英国还只是口号，一五六项尚未全部建成，‘四、五、八’大部分尚未证实，全国工业化尚未实现。第2个‘五年计划’搞几十万项，**县县都办起工业来，结果如何？会不会生产过剩？**在我的脑筋里存在问题。**是好，还是天下大乱，我现在没有把握**。所以，现在要开会，要每年抓4次，看到有问题就调节一下。这个路线开始形成，由于两个原因，根本的是群众斗争的创造，其次是领导机关反映了这些创造。总路线开始形成了，但是尚待完备，尚待证实，不可以说已经最后完成了。”

毛泽东讲完话从会议厅出来，吴冷西赶上去问：

“主席，这次会议讨论不讨论《人民日报》的23条？”

毛泽东想了一下说：

“这次会议讨论很多问题，光印发的工农商方面文件就有两大堆。文教方面的人没有来，《人民日报》的问题以后有机会再讨论。”

3月21日上午11点，几辆轿车驶进灌县离堆公园，毛泽东穿着一身灰色中山装下了车，李井泉将早已恭候在这里的地委书记宋文彬、县委书记陈彬和都江堰管理处处长张建中介绍给毛泽东，然后，众人一起乘车去都江堰。

车队爬上玉垒山山腰，毛泽东下了车，拿着望远镜，望着山下滚滚的岷江，俯瞰着都江堰的雄姿。这是一座古代水利工程，已有2200多年的历史，规模宏大，闻名中外。毛泽东环顾四周，说：

“灌县是个好地方嘛，山青水秀哟。”

他指着都江堰问李井泉：

“每年维修给不给民工钱？”

李井泉说，要给的。毛泽东说：

“这就好，**共产党是要给人民钱的，做了工不给钱还叫什么共产党**！修一次需要多少民工啊？”

张建中回答说：

“大概要100万民工。”

“今后应该改用机器修，用卷扬机，掘土机，这样就省人力了。” 毛泽东说罢，又指着索桥下的都江鱼嘴对张建中说：“今后还要想办法，用现代化的工程，把泥沙控制起来。”

一行人又乘车回到离堆公园，步行来到公园西头的伏龙观，这是建筑在离堆上的李冰祀祠。毛泽东在伏龙观仔细地观看了都江堰水利工程沙盘模型和都江灌溉区域图。张建中介绍了飞沙堰溢洪排沙的情况，毛泽东指着飞沙堰说：

“在这里修个闸不是更好吗？是不是？”

大家都说：

“毛主席考虑得真周到，很好。”

张建中指着内江对毛泽东介绍说：

“都江堰每年都要修，就在这里挖泥淘沙。”

毛泽东说：

“那100万年以后，成都平原的泥沙就没处堆了。”

一句风趣话，逗得大家都笑了。张建中说：

“将来岷江上游修水库，泥沙就会减少。”

毛泽东点点头，迈步来到伏龙观背后的宝瓶口。宝瓶口就是凿开玉垒山形成的口子，它是内江的咽喉，是都江堰主要水利工程之一。四川之所以成为天府之国，全靠了此水的浇灌。毛泽东手扶木栏杆，俯视着滔滔江水，问道：

“这里有多深？”

张建中回答说：

“这里有8米深。”

“有没有人下去游过？”

“没有。”

毛泽东说：

“我想下去。”

此话一出，大家都吃了一惊。毛泽东看看众人的表情，自信地微微一笑。他知道大家不会让他下去，无奈地吁了一口气。他又指着离堆问：

“这岩石会不会被水冲毁？”

张建中说：

“不会的，这是粒岩，很坚硬。”

毛泽东笑着问道：

“100万年以后，可能要被冲毁吧？”

这一下可把大家问住了。

中午时分，一行人来到井福街一家饭馆用餐。入座后，毛泽东掏出一包香烟，给在座的每人一支，自己也点上一支，吸了一口说：

“今天谁请客？”

李井泉说，我请客。宋文彬也说，我请客。毛泽东哈哈一笑，说：

“还是由我来请吧。”

按照毛泽东的意思，这顿午饭非常简单，主菜是豆花和回锅肉。吃过饭，毛泽东对服务人员和厨师张金良亲切地说：

“谢谢，你们辛苦了。”

毛泽东在灌县视察的消息不胫而走，整个县城传得沸沸扬扬。不少人从四面八方拥向井福街，把井福街堵了个水泄不通。人们高呼着“毛主席万岁”，一个劲地往前挤，都想看一看毛泽东。毛泽东出了饭馆，微笑着向群众频频招手，在保卫人员的簇拥下，上车离开了灌县县城。

车队行至灌县新城乡莲花一社，毛泽东看见公路边在田里劳动的社员，就让车停下来，下了车，跨过路边的小石桥，直奔庄稼地。正在锄草的社员冉贵全第一个看见毛泽东，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毛主席住在北京城里，怎么会来到这里？正疑惑间，毛泽东像一个熟识的乡亲一样和他打招呼了：

“要把草锄干净哩！”

说着，他走进麦田，蹲下去拔杂草，问冉贵全：

“每亩能收多少斤？”

冉贵全还没有反应过来，毛泽东伸出4个手指，说：

“400斤？”

冉贵全这才说：

“差不多，每亩四百二三十斤。”

“割了麦子种什么？”

“种水稻。”

“水稻每亩收多少斤？”

“600多斤。”

毛泽东转向李井泉说：

“400多加600多，就是1000多，这可了不起。”

他又转向冉贵全问：

“粮食多了怎么办？”

冉贵全毫不犹豫地说：

“卖给国家。”

“卖给国家你们赞成不赞成？”

“当然赞成！”

毛泽东哈哈一笑，逗趣地说：

“我看你就有些不大赞成吧？”

冉贵全吭哧吭哧正想说什么，毛泽东已经上了田埂。社员高渤然迎面走来，毛泽东迎上去打招呼，还问他今年多大了，孩子读没读书？高渤然说他今年已经58岁了，两个孩子都上了学。毛泽东高兴地拍着他的肩膀，说：

“好哇！”

他沿着田埂走过去，跨进一块苕菜地，问几个女社员：

“你们摘什么？”

王应岗回答说：

“摘苕菜。”

“我帮你们摘点好不好？”毛泽东说着弯下腰，摘了一些嫩绿的苕菜尖尖递给王应岗，问：“这行不行？”

王应岗忙站起来，双手接过，连声说：行，行！其她几个女社员也停下了手中的活，想和毛泽东说话，可又激动得说不出来。毛泽东走出苕菜地，沿着一条杂草丛生的干沟朝前走，几个孩子嬉笑着跟在他身边跑。毛泽东停下脚步，问一个孩子：

“你认得‘打破碗花花’吗？”

那个孩子叫任国民，他说：认得。毛泽东弯下腰随手摘了一株“打破碗花花”，递给他，说：

“你敢不敢拿？”

“敢拿！”

任国民毫不犹豫地伸手接了去。毛泽东看着这个勇敢的孩子，由衷地笑了。他返回到公路上，准备上车，地里的社员们都拥上来送行。毛泽东很愉快地和大家握手告别。一个社员握着他的手激动地说：

“一辈子也难得这样的机会哩！”

3月22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发给与会者每人一本由他编辑的纪念邹容（四川巴县人）和章太炎的书《苏报案》。此书共收入4篇文章，邹容的《革命军》是其中之一。

毛泽东一生对章太炎、邹容的革命精神和笔锋犀利的文章深为赞佩，在1958年2月、1961年7月、1963年3月和7月间，先后4次阅读过那些文章。他还在自己收藏的《革命军》一书扉页上邹容的肖像旁，亲笔书写着章太炎狱中赠邹容的那首诗：“邹容吾小友，被发下瀛洲。快刀剪除辫，干牛肉作糇。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

再说毛泽东在3月22日的成都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要提高风格，振作精神，要有势如破竹、高屋建瓴的气势。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抓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工作中的基本矛盾。但我们的同志有精神不振的现象，是奴隶状态的表现，像京剧《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站惯了不敢坐。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要尊重，但不要迷信，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创造出来的，不能抄书照搬。一有迷信就把我们脑子镇住了，不敢跳出圈子想问题。”

毛泽东提议将会议延长两三天，专门谈谈思想问题，解放思想，提高风格。他还说：

“不要怕教授。有些同志进城以来相当地怕教授，看人家一大堆学问，自己好像什么都不行。**自古以来，创新思想、新学派的人，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孔子不是二三十岁的时候就搞起来？耶稣开始有什么学问？释迦牟尼19岁创佛教，学问是后来慢慢学来的。孙中山年轻时有什么学问，不过高中程度。马克思开始创立辩证唯物论，年纪也很轻，他的学问也是后来学的。**马克思开始著书的时候，只有20岁，写《共产党宣言》时，不过30岁左右，学派已经形成了。**那时**马克思所批判的人，都是一些当时资产阶级博学家，如李嘉图、亚当·斯密、黑格尔等。历史上总是学问少的人，推翻学问多的人**。四川有个邹容，他写了一本书，叫《革命军》，我临从北京来，还找这本书看了一下。他算是提出了一个民主革命的简单纲领。他只有17岁到日本，写书的时候大概是十八九岁。20岁时跟章太炎在上海一起坐班房，因病而死。章太炎所以坐班房，就是因为他写了一篇文章，叫《驳康有为书》。这篇文章值得一看，其中有两句：‘载湉小丑，不辨菽麦’，直接骂了皇帝。这个时候，章太炎年纪还不大，大概三十几岁。康有为亦如此。刘师培成名时不过20岁，死时也才30岁。王弼注《老子》的时候，不过十几岁，死时才22岁。颜渊死时只32岁。青年人抓住一个真理，就所向披靡，所以老年人是比不过他们的。梁启超青年时也是所向披靡。”

毛泽东又说：

“有话不说，就很危险。**要选择说话的机会，不讲策略也不行。例如明朝反魏忠贤的那些人，不讲策略，自己被消灭，当时落得皇帝不喜欢。**历史上讲真话的如比干、屈原、朱云、贾谊等，这些人都是不得志的，为原则而斗争的。不敢讲话无非是：一怕封为机会主义，二怕撤职，三怕开除党籍，四怕老婆离婚，五怕坐班房，六怕杀头。六怕不好。难道为了这些就不说话了吗？我看只要准备好了这几条，看破红尘，什么都不怕了。我们应当造成一种环境，使人敢于说话。**我的企图是要人们敢说，振奋精神，势如破竹，把顾虑解除，把沉闷的空气冲破。”**

毛泽东讲话结束后，欧阳钦、陶铸、李先念、林铁也先后发了言。

从3月24日起，成都会议的安排是上午召开大组会议，由刘少奇主持，毛泽东不出席。在大组会议上，大家漫谈思想，结果又走向总结1956年反冒进的教训，发言的人差不多都作了自我批评，各大协作区区长都讲了，政治局委员也讲了，周恩来、刘少奇、陈云、邓小平都谈了经验教训，彭德怀也说很受启发。

3月25日下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从思想方法问题谈起，他说：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第一是唯物论，第二是辩证法。**我们许多同志对此并不那么看重。**反冒进不是什么责任问题，不要说得太多了，我也不愿听了。不要老作自我批评，作为方法问题的一个例子来讲是可以的。”**

“唯物论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我们的主观世界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主观反映客观是不容易的，要有大量事实，在实践中反复无数次，才能形成观点。一眼望去，一下抓住一两个观点，并无大量事实作根据，是不巩固的。”“要真真实实地听下级的话，个别交谈，小范围交谈。省委解决问题如此，中央也如此。”

“反冒进也是一种客观反映。反映什么呢？**主持反冒进的同志，是把个别的、特殊的东西，误认为一般的全面的东西。**只听少数人的意见，而不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把特殊当作一般来反。辩证法是研究主流与支流、本质与现象、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过去发生反冒进等错误，即未抓住主流和本质，把支流当主流，把次要矛盾当作主要的矛盾来解决。国务院开会对个别问题解决得多，但有时没有抓住本质问题。**

我们许多同志不注意理论。究竟思想、观点、理论从何而来？就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客观世界所固有的规律，人们反映它，不过是比较的合乎客观情况。任何规律即是事物的一个侧面，是许多个别事物的抽象，离开客观的具体事物，哪还有什么规律？**这次会议把过去许多问题提出商量解决了。也就是说，这次会议抓住了本质和主流，克服了国务院、中央政治局工作中的缺点。”**

毛泽东称赞冶金部党组吸收部分大企业的十几个人开会，谈了几天解决了许多重要问题。他还说：

“两种因素加在一起就起变化，空气就不同了。中央开会，有地方同志参加，除省委书记外，再加若干地、县委书记，就有了新的因素。中央下去的同志，同省委书记谈还不够，还要找地、县委书记，学校、合作社的人谈谈，一竿子到底。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呢？就是要打掉官气。当了‘老爷’不愿向人请教，这种自以为是的态度，各级都有。越是向人请教的多，提出来的东西，就比较有把握些，但还不能说是正确的，因为没有证明。许多事情，我自己就半信半疑。‘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建设路线，究竟对不对？还要看5年。”

“1956年发生的几件事没有料到，就是国际上批判斯大林和波匈事件，国内是反冒进。今后还要准备发生预料不到的事情。**我看要把过高的指标压缩一下，要确实可靠。过高的指标不要登报。**河南今年4件事都想完成，也许能做到，即使能做到，讲也谨慎些，给群众留点余地，也要给下级和自己留有余地。**我们一些同志在热潮下面被冲昏了头脑，提出一些办不到的口号。我并不是想消灭空气，而只是要求压缩空气，把膨胀的脑筋压缩一下，冷静一些；不是想下马，而是要搞措施。”**

正是：金玉良言，唯物辩证。谆谆教诲，耳提面命。惜乎惜哉！对牛弹琴，苦心白用！

再说毛泽东最后又批评卫生部说：

“他们替《人民日报》写的关于‘除四害’的社论，写了很久还是没有写好，替中央起草的‘除四害’指示根本不能用。卫生部不卫生，思想上并不相信4害真的可以除掉。后来还是乔木同地方上的同志合作，才把中央指示写成了，社论也写好了。”

他还批评《人民日报》社的教条主义说：

“《人民日报》过去学真理报，照搬洋教条一套，连标题也模仿，不独立思考，像3岁孩子一样，处处要人扶，否则就丧魂失魄，没有主见，没有独创，连中国人办报的好传统（如讲究版面的编排和标题等）也丢掉了。后来才有所改变。”

毛泽东讲话结束后，张德生、胡乔木、柯庆施、邓小平、陶鲁笳、周恩来、薄一波、滕代远、刘少奇、彭德怀也先后就思想方法和理论问题发了言。

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全文如下：

成都会议大组会议在1958年3月23日讨论了周恩来同志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报告，会议同意这个报告，并且提出以下几点意见：

一、**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个方面考虑，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但是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及何时开始修建，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才能作出决定。估计三峡工程的整个勘测、设计和施工的时间约需15年到20年。现在应当采取积极准备和充分可靠的方针，进行各项有关的工作。**

二、**为了便于今后有关的工业、农业、交通等基本建设的安排，并且尽可能地减少四川地区的淹没损失，三峡大坝正常高水位的高程应当控制在200公尺（吴淞基点以上），不能再高于这个高程；同时，在规划设计中还应当研究190公尺和195公尺两个高程，提出有关的资料和论证。**

三、三峡工程的准备工作时期，对美人沱和南津关两个坝址的继续勘测和研究，对一切主要的技术问题和经济问题的探讨，都应当采用展开争论、全面比较论证的方法，以求作出充分可靠的结论；某些重大的技术问题必须作试验研究。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要点报告应当于1958年第2季度交出，三峡工程的规划性设计应当争取于1959年交出，初步设计应当争取在1962——1963年交出。

四、长江较大洪水一般可能5年发生一次，要抓紧时机分期完成各项防洪工程，其中堤防特别是**荆江大堤的加固，中下游湖泊、洼地蓄洪排渍工程等，决不可放松。在防洪问题上，要防止等待三峡工程和有了三峡工程就万事大吉的思想。**

五、长江流域规划工作的基本原则，应当是统一规划，全面发展，适当分工，分期进行。同时，需要正确地解决以下7种关系：**远景与近景，干流与支流，上中下游，大中小型，防洪、发电、灌溉与航运，水电与火电，发电与用电（即有销路）**；这7种关系必须互相结合，根据实际情况，分别轻重缓急和先后的次序，进行具体安排。三峡工程是长江规划的主体，但是**要防止在规划中集中一点、不及其它和以主体代替一切的思想。**

六、由于条件的比较成熟，**汉水丹江口工程应当争取在1959年作施工准备或者正式开工。**

**洞庭湖水系的规划问题和两湖间的防洪问题，应当于最近期间由王任重同志负责召集有关省份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开会商议，定出方案。四川和贵州水系的规划，鄱阳湖水系的规划，以及安徽和江苏有关长江的防洪、灌溉等问题，都应当分别由地方负责同志召集各有关方面开会研究，定出方案。**

七、为了加强对三峡工程和长江规划的领导，应当正式成立长江规划委员会，委员名单由恩来同志提出，报告中央通过。三峡工程和长江规划中的设计文件，均应经过国家计划委员会会同有关方面审查，报告中央批准。

这个规划意见后来在4月5日政治局会议上被批准。

3月26日，成都会议就要结束了，毛泽东在讲话中说：

“这次会议开得很好，但事先未准备虚实并举，实业多了一点，虚业少了一点。这也有好处，一次解决大批问题，而且是跟地方同志一起谈的，也就比较合乎实际。”“过去我们太实了。要引导各级领导同志关心思想、政治、理论问题，红与专相结合。”

“现在有些问题，还是不摸底，农业比较清楚，工业、商业、文教不清楚。”“煤、电、油、机械、建筑、地质、交通、邮电、轻工业、商业没有接触，财贸还有文教历来没有摸过。林业也没有摸过。今年这些要摸一摸。政治局、书记处都摸一摸。”

“希望各省第一书记，恐怕还要加上一个书记及其他某些同志，从繁忙工作中解放一点出来，做一些研究工作，注意一些重大问题。比如吴冷西同志，我们谈过几次，要他学大公报的张季鸾，到处串门子，打听消息，聊聊天，看看市场，参加这样的会议。中央的报纸也好，省市的报纸也好，总主笔不能每天沉埋在那些事务工作里头，必须解放一点。如何解放法，大家去研究。总而言之，少管一点事，少管一点就能多管一点。”

成都会议先后讨论制定了37个文件，准备提交给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在这些文件中，主要有《关于1958年计划和预算第二本账的意见》、《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的合并为大社的意见》等等。

在成都会议结束的这天晚上，田家英在吃晚饭时告诉吴冷西说：

“主席说，你送给他的《<人民日报>苦战三年工作纲要》23条，这次会议来不及讨论了。主席说他将去武汉，要你随他一道去重庆，下三峡，将在武昌议一议《人民日报》的问题。”

欲知毛泽东后来在武昌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如何召开，且看下一章详细叙述。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再一次强调：“**我看要把过高的指标压缩一下，要确实可靠。”“我们一些同志在热潮下面被冲昏了头脑，提出一些办不到的口号。我并不是想消灭空气，而只是要求压缩空气，把膨胀的脑筋压缩一下，冷静一些。”**说毛公教育部下是耳提面命，一点也不过分。立此存照，昭示后人。

**第49章**

**“要向地、县委书记讲清楚，如果收成不好，计划完不成怎么办？要有**

**精神准备。要看结果，吹牛不算。不要浮而不深，粗而不细，华而不实。”**

话说1958年3月27日中午，毛泽东乘专列从成都驰往重庆，随行人员除了王敬先率领的警卫人员和服务人员外，还有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重庆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人民日报》社总编辑吴冷西，秘书田家英。

毛泽东在专列上看着报纸，侯波就坐在他的对面。侯波举着相机时刻注视着他的表情，准备为他拍照。毛泽东忽然从报纸的上方抬起眼皮，叫了一声：

“侯波。”

侯波“哎”了一声，抬起头。毛泽东皱着眉头说：

“你怎么总是拿一只眼睛看我？”

侯波认真地说：

“我的取景框只能放下一只眼睛。”

“哦，”毛泽东笑着说：“一只眼的照相，两只眼的看报。眼不在多，而在用的是地方。天下一个理。”

列车在飞驰。毛泽东突然叫停车，说是要去隆昌气矿去看看。

此时，天上正下着雨。毛泽东来到隆昌气矿的招待所，矿长刘选伍、党委副书记张惠民闻讯赶到了。毛泽东和他们握了手，就向车间方向走去。他背着手，稳步走下山坡，正要上车，矿党委书记安增彬也赶来了。汽车向槽黑车间的山坡驰去。毛泽东和他熟悉的刘选伍谈论着化学问题。

到了槽黑车间，毛泽东和当班的车间副主任梁锡远打招呼。梁锡远打开一号火房第18格的门，毛泽东弯腰观察了一会儿，因为风刮得太大，无法看清楚里面天然气燃烧的情况。

毛泽东来到车间最后面的21号火房，梁锡远打开中间的门，毛泽东蹲下身，观察着天然气的火焰。他指着火嘴问道：

“一个火房有多少个火嘴？”

梁锡远说：

“按照设计是1728个，现在实际只用了1632个，最后的18格没有点。”

7点20分左右，天渐渐黑下来，雨也越下越大了，毛泽东的衣帽都淋湿了，不断地往下滴水珠。他询问着炭黑生产的情况，又询问了天然气的采气情形，尔后才和人们挥手告别。

3月28日凌晨1时50分，毛泽东一行人的专列抵达重庆，此时依然是万家灯火。

这天下午4点半，毛泽东来到重庆钢铁公司大轧钢车间的停车场，他下了车，微笑着向欢迎他的工人们点头挥手。

毛泽东来到解放后中国人自己生产第一根钢轨的轧钢车间，看着工人们用电焊烧的“十五年赶上英国”的标语，很高兴。他走到钢板段，询问了钢板的生产情况。又到平压机前看了一会儿，就来到轧钢段，询问生产些什么，有多少种类，然后走到中剪机旁，站在开车台上，仔细地观看着工人们把红彤彤的钢坯一节一节的剪断。接着，毛泽东来到冷剪机旁，观看工人们剪钢板。

毛泽东从大轧钢车间出来，向大平炉车间走去。路两旁几千工人欢迎毛泽东，毛泽东一再挥手向工人们致意。

大平炉车间在20多天来，已经实现了生产上的三级跳——接连试制成功了双包出钢、双槽出钢和三槽出钢。毛泽东被工人们拥着走上平台，他拿着蓝色眼镜，接连3次凑近炉口，观察炼钢的情形。

下午5点40分，毛泽东驱车来到重庆建设机床厂，参观了几个车间，直到黄昏才离去。

是日晚23点，毛泽东穿着浅灰色呢制服，来到了重庆市委举办的晚会上。他在众人的欢呼声中，和人们一一握手，在一群年轻人的簇拥下坐了下来。毛泽东问道：

“你们是哪个单位的？”

陈家俊回答说：

“我们在共青团市委工作。”

“全市有多少团员？”

“11万。”

毛泽东回头问黄启在团委哪一部门工作？黄启说在少先队部。毛泽东说：

“右派分子想取消少先队？”

黄启说：

“是的，天津有个叫黄心平的右派分子，就主张取消少先队。”

“你们同不同意？”

“绝不同意。孩子们知道右派分子想取消少先队以后，举行了声讨大会，大家更热爱红领巾了。”

“共青团里有没有右派？”

“有，我们把他们全部都清除了。”

毛泽东听说坐在他身边的女青年刘克莉是川剧《五难新郎》里的女主角，就问刘克莉，川剧有多少曲牌？刘克莉回答着，毛泽东还扳着指头一一数着。他又问身边的另一位女青年：

“你在哪里工作，叫什么名字？”

女青年说：

“我叫王静，是重庆市歌舞团演员。”

“你演过什么节目？”

“我们团把一出川剧传统节目《放裴》改编成歌舞，去年在莫斯科世界青年联欢会上演出，获得了银质奖章。我在其中演了一个角色。”

3月29日清晨5点多钟，毛泽东从重庆出发去武汉。几辆小车驶入重庆朝天门码头。“江峡”号轮船上的客运组长殷正禄，连忙上前迎接客人，可他没想到今天来的客人竟是毛泽东，吃惊不小，一时之间竟然手足无措，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毛泽东和柯庆施、李井泉、王任重被安排在头等舱里。

6时15分，船开了，毛泽东先后同涪陵地委书记、万县地委书记谈了话。

王任重在日记中写道：“今晚要住万县。主席昨晚只睡了一个多小时，到现在未睡，想晚上睡觉，以便白天看三峡。看来主席的精神很愉快。”

是日晚，毛泽东吸着烟，与柯庆施、李井泉，任白戈一起，坐在3楼船尾上眺望两岸夜景。王任重引着船上的大副杨大福和女三副石若仪，来到毛泽东跟前。毛泽东招呼他们坐在自己身边。他问石若仪：

“你看过画报上刊登的一位苏联女船长的故事吗？有没有遇到过那么多的困难呢？”

石若仪说：

“看过，我的情况和她不完全一样。当然，困难是有的。”

“学习驾驶困难吗？”

“开始上船时，一点也不懂，真感到害怕。”

“现在呢？”

“现在懂得了一些，也没有那么害怕了。”

“是啊，当你对一件事物还不了解时，往往是害怕的。正如蛇一样，当人们还不了解它、没有掌握它的特性时，感到十分害怕。但是一旦了解了它，掌握了它的特性和弱点，就不再害怕了，而且可以捉住它。”

毛泽东说罢，吸了一口烟，又问石若仪：

“你在船上工作了多久？”

石若仪说4年了。毛泽东转过脸问杨大福：你呢？杨大福说：30多年了。毛泽东又对石若仪说：

“要好好向他们学习，他们这些老工人是你的好师傅，水上经验都丰富，许多知识是书本上学不到的。”

他问石若仪：

“三峡有个白帝城吧？”

石若仪说，有的。船到奉节航段，石若仪指着北岸小山上一座已经坍塌的古老城垣和庙宇，对毛泽东说：

“那就是白帝城。”

此时，夜色苍茫，毛泽东望着依稀可辨的白帝城，兴奋地背诵起李白的《早发白帝城》：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背诵完了，他又教石若仪学这首诗。他说一句，石若仪学一句，学完了，他说：

“你背诵给我听听。”

石若仪立即背了一遍。毛泽东满意地点点头，说：

“好，很好。”

船上的人们都休息了，吴冷西和田家英问毛泽东的服务员：

“主席休息没有？”

服务员说：

“主席正在填一首词，是用铅笔写的，尚未完成，放在床头上。”

吴冷西问：

“主席写的是什么内容？”

服务员说：

“匆忙间我也没有记住。”

3月30日早晨，“江峡”号轮船进入瞿塘峡。快到三峡时，毛泽东吃过早饭，穿着睡衣来到驾驶室，与船长李吉成、见习船长莫家端和舵工贺理富攀谈起来。他问道：

“三峡这一段开船是不是最危险？”

李吉成回答说：

“枯水季节在这一段开船是困难不小的，有时也会遇到危险，不过走熟了，出危险是很少的。”

毛泽东说：

“如果我开船，我就喜欢走这险要的地方开。**一潭死水好，还是不尽长江滚滚来好？我看还是不尽长江滚滚来好，人的生活平平淡淡没有什么意思。”**

他又问：

“有没有船撞在石头上的情况？”

李吉成告诉他说：

“近几年开展了航道整治工作，通过各种治理，不仅过去一些不能通航的险滩地带能顺利通过，而且由于设立了航标，轮船大都能通夜航行了。”

毛泽东问：

“你们的航标灯是怎么管理的？”

陪同在一旁的长江航运局负责人说：

“我们专门设有航道处，下设航道区、段站。”

毛泽东说：

“为什么航标灯不能用电呢？”

“过去试过。可是干电池容易受潮，亮度没有保证。”

说话间，正面江心中出现一块突兀的大石头，舵手全神贯注，稳操舵把，灵巧避过。毛泽东问：

“这石头能不能炸掉？”

李吉成说：

“要炸。解放后已经炸掉了不少，今后还要炸的。”

毛泽东说：

“有些地方航道仍然很不好，在三峡修一个大水闸，又发电又便利航运，还可以防洪、灌溉，你们赞成吗？”

李吉成说：

“太赞成了，修了水闸，航行就更加便利了。”

轮船快到巫峡时，毛泽东从船长手中接过望远镜，非常留意地从几个侧面观看了神女峰。他对吴冷西等人说：

“宋玉在《神女赋》中说：‘夫何神女之姣丽兮，含阴阳之渥饰。披华藻之可好兮，若翡翠之奋翼。其象无双，其美无极。毛嫱鄣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无色。’其实谁也没有见过神女，但宋玉的浪漫主义描绘，竟成为后世骚人墨客无限的题材。”

轮船要经过计划中的三峡大坝坝址了，船长李吉成奉命让舵工减低航速。毛泽东站在甲板上，对选址默默地看了又看，直到轮船驶出很远。

毛泽东一直到快过完西陵峡时，才回到舱内客厅，同吴冷西、田家英闲谈起来。他说：

“你们都知道，我在成都会议时，收集一些明朝人写的有关四川的诗，选了十几首印发给与会的同志。”

他特别赞赏杨慎的诗，说杨慎是明朝一位很有才学的人，因议论朝政被流放云南30年，以至老死，很可惜。毛泽东又说：

“四川历代人才辈出，我们党内好些将帅是四川人。”

他问吴冷西：

“你们办报的人都知道邹容其人吗？”

吴冷西说：

“有些人知道一些。”

毛泽东说：

“邹容也是四川人，他的日文很好，而且是在四川学的。‘苏报案’是由邹容写的《革命军》引起的。他写这本小册子时只有18岁，署名‘革命军马前卒邹容’。《革命军》一出，上海的《苏报》为之介绍宣传，章太炎为之作序，影响极大。于是，清政府大为恐慌，下令抓人并查封《苏报》。《苏报》是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上海的主要舆论机关，蔡元培、章太炎、邹容、章士钊、柳亚子等都在该报发表文章，抨击封建君主专制，鼓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并同康有为、梁启超等保皇派论战。

资产阶级革命派办报纸，都是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的。章太炎当警察拿着黑名单来抓人时挺身而出，说：‘别人都不在，要抓章太炎，我就是。’从容入狱。邹容本未被抓，待知道章太炎已被捕后，不忍老师单独承担责任，毅然自行投案，终于病死狱中，年仅20岁。《苏报》当时的主编章士钊倒没有被捕。

邹容是青年革命家，他的文章秉笔直书，热情洋溢，而且用的是浅近通俗的文言文，《革命军》就很好读，可惜他英年早逝。

章太炎活了60多岁，前半生革命正气凛然，尤以主笔《民报》时期所写的文章锋芒锐利，所向披靡，令人神往，不愧为革命政论家。后来虽一度涉足北洋官场，但心在治经、治史，以国学家称著。鲁迅先生纵观其一生，评价甚高。但对他文笔古奥，索解为难，颇有微词。他出版一本论文集，偏偏取名《訄书》，使人难读又难解。

至于章士钊，这位老先生是我的同乡，湖南长沙人，也是清末民初的著名政论家，除担任《苏报》主笔外，还给其它许多反清报刊写文章。其后赴欧洲游学，回国后在北洋政府任过教育总长等职。他的文章比章太炎的好读，没有那么古奥、怪僻，也较梁启超严谨而有条理。抗战中一直同我党保持联系，建国后同我党合作，他自己说他‘反动而不反共’。”

3月31日，轮船过荆江，毛泽东把宜昌、沙市的领导人叫到船上，询问了一些情况。

1958年4月1日凌晨2时，毛泽东到达武汉，下榻于东湖宾馆。此时，正下着雨，天气相当冷。

4月1日下午，毛泽东在武昌主持召开华东和中南地区省委书记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李先念、谭震林、柯庆施、李井泉、王任重、吴冷西、田家英。

会议主要内容是听取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广西壮族自治区委第一书记刘建勋、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汇报他们各自的工作计划。

会议首先听取吴芝圃的汇报。吴芝圃说，河南省要苦战1年，实现“四、五、八”，实现水利化、绿化、“除四害”和消灭文盲的工作计划。毛泽东问道：

“你们怎么能一年实现绿化？”

他劝吴芝圃把指标修改一下，把规划调整一下。吴芝圃同意不再提一年实现绿化、一年消灭4害，但仍然坚持要一年实现“四、五、八”。

此后，会议每天只开半天，其余时间让大家看成都会议的文件，或由谭震林、柯庆施和陶铸介绍成都会议的情况。

4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整风问题的指示》，全文如下：

一、一定要把整风坚持到底，不能虎头蛇尾。各地区、各部门，在目前的“双反”运动告一段落后，**应当及时地转入整风的第4阶段，即阅读文件，个人反省，提高自己的阶段。千万不能把这个阶段滑过去。这样，才能进一步鼓起干劲，打掉官风，实事求是，和人民打成一片，纠正工作上、作风上、制度上的缺点和错误。**从目前情况看来，一般地区的整风运动，应当在6月底以前基本结束，如果某些地区、某些部门有必要延长整风时间，也可以适当延长。

二、**整风第4阶段进行的方法，应当是：在党委和政府、人民团体党组的主持下，分别召开二三十人的小型整风会议，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不要采取人人检讨、人人过关的方法。一般地说，这样的小型会议，开个4、5次，即可大体结束。**如果在会议进行当中，发现重点人物，或发现有重大原则性的意见分歧，须要更充分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则需要适当增加会议次数。**召开这种会议的目的，是统一认识，加强团结，提高觉悟，改进工作。**小型整风会议结束以后，凡是能够写的同志，都应当写出本人参加整风运动的思想总结。这种**思想总结可以采用个别交谈互相传阅的方式，不必经过会议的讨论通过。**

三、**整风第4阶段，以揭发和批判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为主要内容。在揭发和批判主观主义的时候，应当着重揭发和批判在执行党的路线、党的政策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和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倾向。在揭发和批判宗派主义的时候，应当联系到个人主义、本位主义、地方主义、大国主义、大民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等错误思想，加以揭发和批判，以便提高全党共产主义的思想水平。**各地区、各部门可以根据上述要求，结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确定本地区、本部门在这个阶段应当着重地揭发和批判哪些方面的问题。

四、在农村，应当紧密结合生产，进行整党、整团、整社。在整党、整团、整社的基础上进行民主选举党、团的委员会和社务管理委员会的成员。农村党员、团员、乡、社干部可以不必写个人的思想总结，但是，要在整风中进行一次鉴定。

五、各地区在统一安排本地区整风工作的时候，**应当把财贸部门和其他分散的基层单位、城镇居民、小商小贩的整风统一安排进去，并且要注意加强领导。不要使这些方面在全民整风运动中漏掉了或者滑过去了。**

六、**无论城市和农村的所有基层单位，无论在整风运动中和今后日常工作中，为了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纠正错误，表扬先进，改进工作，都应该广泛使用鸣放辩论和写大字报的方法。**

七、为了有力地分化右派分子，各地区、各部门应当选择适当时机，召开右派分子会议或者吸收右派分子参加的会议，由负责同志作报告，交代政策，指明出路，并且要组织右派分子加以讨论。对于右派分子还应当注意分别进行工作，以便根据各人的不同情况，有拉有打，争取分化他们，并且督促他们彻底悔改。

（可登党刊。）

4月2日下午，毛泽东在东湖宾馆会见了波兰政府代表团团长、波兰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副主席雅罗谢维奇和代表团全体成员。他在会见中说：

“我们中国赶上英国，可能不要15年，可能只要10年或11年。”“再有20年就赶上美国。”

会见结束后，毛泽东又去参加武昌会议，听取曾希圣的汇报。曾希圣主要讲安徽省大搞水利突击的情况，还拿出水利建设规划图给毛泽东看。毛泽东说：

“你们能3年改变面貌很好，但是我表示怀疑。多搞几年也不要紧，你讲得有道理，我不能完全不信。河南人多，你们恐怕赶不上，不要蛮干。不要过早宣布水利化，要留有余地。宣布完成水利化、绿化、‘四无’是危险的，只能宣布基本完成。”

毛泽东针对这两天在汇报中提出的不切合实际的做法和浮夸现象说：

“现在说苦战3年改变面貌，其实苦战3年之后还要苦战5年，才能完成四十条。**提口号要注意留有余地。**苦战3年只能算是初步改变面貌。对于下面报上来的成绩，不可不信又不可全信**。凡事有真必有假，要打个折扣才稳当一些。对工程师、科学家，要又信又不信，要相信科学，但要破除迷信。**生产要务实，不要搞得不实在。报纸宣传应实际、深入、细致、踏实，不要光宣传指标，华而不实不好。整风挂帅，生产是当前的中心工作，以此带动其它工作。”

4月3日下午，会议听取舒同的汇报，他只说了一些数字，一些材料，证明山东省苦干3年实现40条有把握。毛泽东说：

“只谈情况，不谈观点，是开材料仓库。人的头脑是加工厂，没有材料不行，有了材料要经过加工，要产生观点，用观点统率材料。”

“今年是空前的一年，这样的大跃进在历史上未曾有过，我们没有经验。今年要看一年，明年胆子可能大一点，现在还是要小心谨慎，不要把事情说满了。”**“说苦战3年就水利化了，我是怀疑的。3年基本改变面貌，我看只能初步改变。**《人民日报》不要随便轻易宣布什么‘化’。”“苍蝇、蚊子一年如何能搞得掉？争取明年少一点，5年搞掉就是大胜利。”“粮食到手，树木到眼（看得见），才能算数。要比措施，比实绩。”

4月3日傍晚7点多钟，在武汉素有名气的老通城餐馆里，一个3岁小男孩王熙滨和他的4个哥哥姐姐，还有爸爸妈妈一家7口人，正围着一张桌子用餐。

突然，门外响起了一阵汽车的停车声，首先推门进来的是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后边跟着一位高大魁梧的人。小孩子眼尖，王熙滨用小手指着来人，扯着嗓子喊：“毛主席，毛主席。”他马上跳下椅子向前跑去，姐姐哥哥们一看，也一拥而上。5岁的小姐姐王江，用手扯扯毛泽东的衣角，问：

“毛主席，你是不是从北京来的？”

“是呀。”毛泽东弯下腰，笑着与几个孩子一一握手，抚摸着他们的脑袋。王熙滨的爸爸妈妈也慌忙上前，先后和毛泽东握手问好。毛泽东握着王熙滨妈妈刘燕如的手说：

“你们一家人，真是其乐融融啊！”

前厅里的喧闹，早已惊动了饭店的经理万书明和服务员，他们也都拥到餐厅来看毛泽东。毛泽东正在一条一条地看着墙上贴着的“除四害”和大跃进的标语。他问万书明：

“这是你们写的吗？”

万书明回答说是，毛泽东称赞道：

“好，好。”

他看着这堵墙有些与众不同，就用手敲敲墙壁，满有兴趣地问：

“这墙是用什么东西做的？”

万书明回答说：

“用刨花板做的，很经济。”

毛泽东走进厨房，向厨师们招呼道：

“辛苦了，辛苦了！”

厨师们没有想到是毛主席来了，大家都楞住了。毛泽东问正在做汤包的师傅钟生楚：

“这是什么包子？”

钟生楚激动得手足无措，竟然忘记了回答。毛泽东又问了一句：

“这包子是谁做的？”

钟生楚此时才反应过来，忙说：

“是汤包，是我做的。”

毛泽东走到大师傅曾延龄面前，问：

“那你是做什么的呀？”

曾延龄说：

“我是做豆皮的。我准备专门做点好的豆皮，请您老人家尝尝。”

毛泽东说：

“你太细心了。”

曾延龄说：

“总是愿您老人家健康啊！”

毛泽东走到做菜师傅李汉卿的炉灶前，用手摸了一下灶台，然后看看手指上有没有灰尘。他称赞说：

“这个炉灶很干净嘛。”

毛泽东和李汉卿师傅及其他一些人聊了一会儿，饭菜已经上桌了。这一顿饭菜，老通城最出名的三鲜豆皮和汤包自然是少不了的。毛泽东和随行人员围成一桌，他指着面前的碗碟，对一些外省籍的人员说：

“你们那里可没有这个，这是真正湖北的风味。”

大家吃完饭已经是8点多了，毛泽东站起身，看看表，准备离开。经理和厨师们都围上来送毛泽东，毛泽东和他们握手告别，还问他们：

“你们是合作社，还是公私合营？”

经理万书明说是国营。毛泽东说：

“国营的要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4月4日下午，会议听取江渭清的汇报。毛泽东插话说：

“报纸宣传，不要尽是规划，宣传工作要深入、细致、踏实。现在宣传注意了多、快，但对好、省注意不够。大话不须讲。**好大喜功需要，但华而不实不好。**”

4月5日下午，会议听取周小舟的汇报。他说，湖南也正处于社会主义建设高潮。毛泽东分析了全国出现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原因，他说：

“一是从1955年到1956年上半年有过一个高潮。二是1956年6月起反冒进，又有了反面经验。三是1957年三中全会恢复了40条，有了多快好省和促进会。四是整风、反右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这是最重要的。”

他还说：

“一年要实现几‘化’，不要说是‘过火’了，只是某些口号要调节，登报时要小心。空气还是那么多，一点不少，不过是压缩一下。反冒进把空气砍掉了一半。我们不要砍，只是把空气压缩一下。我现在担心是不是会再来一个反冒进。如果今年得不到丰收，群众会泄气，到那时又要刮台风的。**此事要向地、县委书记讲清楚，如果收成不好，计划完不成怎么办？要有精神准备。要看结果，吹牛不算。不要浮而不深，粗而不细，华而不实。”**

毛泽东又说：

“现在存在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工人和农民）。**一个剥削阶级是国际上的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另一个剥削阶级是国内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它不同于前一个剥削阶级。我们的方针是团结后一个剥削阶级，孤立前一个剥削阶级。**阶级斗争依然存在，还会有反复。”

4月6日上午，武汉地区5000多名科教工作者在武汉体育馆举行科教界大跃进誓师大会。12点42分，大会执行主席向代表们宣布说：

“现在报告大家一个最好的消息，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马上就要来到我们的会场，和大家见面……”

他的话音未落，全场的人都站立了起来，热烈鼓掌。

12点43分，毛泽东应老朋友李达之邀，在李先念、王任重的陪同下，从会场东面入口处进入科教大会会场。毛泽东一出现，会场里再次爆发出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

毛泽东穿着银灰色制服，红光满面，满头黑发，神采奕奕地走上主席台，和主席团成员们一一握手。当毛泽东把手伸向中国建筑学会武汉分会理事长鲍鼎的时候，鲍鼎激动地紧紧握着毛泽东的手，含着泪说：

“我第1次见到您是在1950年，8年后的今天，第2次见到了您。我感到对不起您，8年来我进步很慢，我今天向您保证，一定要飞跃前进。”

毛泽东微笑着说：

“很好，很好。”

他又走到主席台中央，向参加会议的人们招手致意。几个青年女科学工作者走上台来，把一束束鲜花献给他。一时间，会场里全体人员随着扩音器播放的音乐唱起了革命歌曲《东方红》。毛泽东问旁边的李达：

“出席会议的是哪些单位的？”

李达说：

“科学院武汉分院，企业研究单位，大专学校。”

毛泽东高兴地说：

“青年小伙子不少啊！”

李达说：

“他们大都是青年研究人员和助教。”

12点53分，毛泽东在欢呼声中离开会场。他刚走到出口处，70多岁的老教授谭戒甫赶上前来，喊了一声：“主席！”毛泽东马上停住脚步，握着他的手，关切地问道：

“你现在身体还好吗？”

谭戒甫激动地说：

“还好。”

毛泽东又问：

“还可以做研究工作吗？”

谭戒甫回答说：

“可以。”

此时，毛泽东又被青年科教工作者们包围了，工作人员马上分开人群，护卫着毛泽东离开了会场。

这天下午，毛泽东听取刘建勋的汇报，他插话说：

“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形势究竟怎样？**两条道路的斗争，恐怕还有几个回合，还有一个长期的反复，必须估计到。要估计是否还要出大问题，如国际出现什么问题，世界大战，大灾荒，右派可能作乱。**但阶级斗争的基本战役已经打过了，基本胜利已经取得了。”

4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合并农业合作社的指示，指示中说：

“我国农业正在迅速地实现农田水利化，并将在几年内,逐步实现耕地机械化。在这种情况下,把小型农业合作社,有计划地适当地合并为大型合作社是必要的。”

这天下午，会议听取叶飞汇报。毛泽东插话说：

**“大鸣大放，是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都不敢做的事，只有我国才敢实行。不怕发动群众是真正的列宁主义态度。”**

叶飞在汇报中批评了中庸之道、不敢跃进和求稳的思想。毛泽东说：

“所谓求稳可靠，实际上，既不稳当，又不可靠。我们这样大的国家，老是稳、慢，就会出大祸。快一点就会好些。对稳当派有个办法，到一定的时候就提出新的口号，不断提出新口号，使他无法稳。”

4月9日，是武昌会议的最后一天。上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由柯庆施主持中央工作会议，专门讨论《人民日报》23条改进工作纲要。

吴冷西在会议上介绍了起草纲要的目的，说希望各省书记多提意见。到会的8个省和上海市的书记们先后发言，各自提出了他们的看法和建议。

下午，会议照常进行，毛泽东出席了会议。他问身边的柯庆施：

“上午谈《人民日报》的问题谈得怎样？”

柯庆施说：

“大家提了一些意见，冷西同志都记下了。”

毛泽东转对与会者们说：

“《人民日报》要经常注意搞好同全国各省委的关系，多听省委的意见，认真研究和解决他们提出的问题。《人民日报》要办得好，不仅要同中央各部门搞好关系，还要取得各省的支持和帮助。《人民日报》是党中央的机关报，中央自然得管，各省委也有责任帮助它办好。我们的一贯方针是全党办报。

《人民日报》的23条改进工作纲要，可以作为草案先实行起来，到年底再总结经验，加以修改。农业四十条写于1955年，其后经过多次修改，还要再修改，才提到八大二次会议去。”

武昌会议结束后，毛泽东仍留在东湖湖滨别墅休息。东湖对岸是珞珈山，武汉大学就建在山麓。毛泽东每天早晨和傍晚都沿着湖边散步。有一次，卫士张仙朋陪毛泽东散步走到一棵古松下，毛泽东停了下来，问道：

“张仙朋，你这名字有意思。我问你，我们是住在天上还是住在地上？”

张仙朋说：

“我们是住在地上，怎能是天上呢？”

“不，**我们是住在天上。我们从地球上看别的星球是在天上，如果别的星球上也有人，他们一看我们，我们不也就是在天上吗？整个宇宙，到处都是又在天上，又在地上。**”

他稍一停顿，又问道：

“我们算不算神仙？”

“不算。”

“不对。**神仙是住在天上的。我们住在地球上，既然也算住在天上，为什么不算神仙？如果别的星球上有人，他们不是也把我们看成神仙吗？**”

他接着又问道：

“中国人算不算洋人？”

张仙朋笑着说：

“外国人才是洋人呢，我们不是。”

毛泽东说：

“不对。**既然外国人是洋人，我们看外国人是洋人，外国人看中国人不也是洋人吗？**”

正是：层层递问真绝伦，三段论法笑煞人。可怜当今少信仰，善男信女仍拜神。

欲知毛泽东此后还有什么重大活动，请看下一章叙述。

东方翁曰：毛泽东说：“**两条道路的斗争，恐怕还有几个回合，还有一个长期的反复，必须估计到。要估计是否还要出大问题，如国际出现什么问题，世界大战，大灾荒，右派可能作乱。**”呜呼！警示在前，动荡于后；右派作乱，天地翻覆！哀哉！

**第50章**

**“现在全国出现高潮，出现许多新鲜事物，但也鱼龙混杂，泥沙**

**俱下。记者、编辑要提高政治思想水平，能对眼前彩色缤纷的现**

**象做出政治判断，有远见卓识**。”

话说1958年4月11日上午，毛泽东吃罢早饭，散步后回到东湖湖滨别墅，叫来吴冷西和田家英，一起坐在湖边凉棚下闲聊。他的话题围绕着武汉，从长江大桥谈到八七会议、武昌起义、黎元洪以至张之洞，还再一次谈到了章太炎。他说：

“章太炎曾一度应张之洞之请到武昌办报，但因与张之洞的观点不同，不肯就任主笔，终于离开。像章太炎这样的激进革命派，开始也并未同康有为、梁启超等保皇派分清营垒，而是同他们一起办报。章太炎就曾给梁启超主办的《时务报》、《清议报》写文章，共同主张维新，是后来才分道扬镳的。”

他还说：

“在近代史上，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都需要自己的舆论工具，都热心于办报。清末民初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是这样，后来国民党和共产党也是这样。”

说罢，他问吴冷西：

“你是不是广东新会人？”

吴冷西说，是。毛泽东说：

“梁启超一生有点像虎头蛇尾。他最辉煌的时期是办《时务报》和《清议报》的几年。那时他同康有为力主维新变法。他写的《变法通议》在《时务报》上连载，立论锋利，条理分明，感情奔放，痛快淋漓。加上他的文章一反骈体、桐城、八股之弊，清新平易，传诵一时。他是当时最有号召力的政论家。

梁启超是在两次赴京会试落第之后，才同康有为、谭嗣同等一起搞‘公车上书’的。戊戌变法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办《清议报》，其后即逐渐失去革新锋芒，成为顽固的保皇派，拥护君主立宪，反对民主共和。后来，他拥护袁世凯当总统和段祺瑞执政，但也反对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欧战结束后出洋游欧，回国后即退出政坛，专心著作和讲学。

梁启超写政论往往态度不严肃。他讲究文章的气势，但过于铺陈排比。他好纵论古今，但往往似是而非，给人以轻率、粗浅之感。他自己也承认有时是信口开河。

**写文章尤其是政论，最忌以势吓人，强词夺理。梁启超那个时候，写文章的人好卖弄‘西学’，喜欢把数学、化学、物理和政治相提并论，用自然科学技术的术语来写政论，常常闹出许多笑话。**做新闻工作既要知识广博，又要避免肤浅，这不容易做到的。但一定要努力学习做到。

梁启超创办《时务报》，开始确实很辛苦。他自己写评论，又要修改别人来稿，全部编排工作和复校工作，都由他一个人承担，这是很不容易的。后来才增加到七八个人，其中3位主要助手也是广东人。”

毛泽东自然也想起了他创办的《湘江评论》。那时候，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他点了一支烟，又说：

“现在我们的报社，动辄数百人、上千人，是不是太多了？”

毛泽东讲完了，顿了一下，转换了话题，他问吴冷西：

“柯庆施主持的会议，各省委书记谈了些什么意见？”

吴冷西根据自己的记忆，作了简单扼要汇报。他还说：

“《人民日报》同各省委的关系，总的来说还是比较正常的。只有几个省委对《人民日报》在1955—1956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时，批评他们省里的某些工作有意见，一度关系比较紧张，所以在会上还旧事重提。”

毛泽东说：

“对省委提的意见，要做分析。对的要接受，认真改进。你们认为不对的，可以提到小平同志主持的书记处会议上讨论，然后向有关省委做必要的解释。一般人都不太容易接受批评，你们在报纸上公开批评省委的某项工作中的缺点，人家有意见是正常的，何况你们的批评有时不免不够实事求是。因此，你们的批评应当十分慎重，事实力求八九不离十。涉及省委本身的，事前可以听听中央书记处的意见。批评一般工作中的缺点，你们编辑部自己负责，当然也不要鲁莽行事。无论如何，你们要经常告诉记者、编辑，要搞好同各省委的关系，这是按党的原则办事的关系，不是庸俗化的关系。”

毛泽东又谈到了《人民日报》的宣传问题，他说：

“武昌会议，还有成都会议的精神，就是《人民日报》宣传的大纲。有些具体意见，我在这两个会议上都谈到了。还有几点同报纸关系密切的：

1、近来报纸的宣传反映实际不够，但也有不实之处，如指标、计划讲得过头了。现在要调整一下，压缩空气。鼓劲的话要讲，但不要华而不实。江苏提出十分指标、十二分措施、二十四分干劲，这种精神是好的，应当宣传。这次在武昌有些省提出，怕一说调整一下宣传调子就会泄气，这种顾虑要注意。目前总的方针还是鼓足干劲，气可鼓而不可泄。

2、现在各省提出这个‘化’那个‘化’很多。‘化’就是要变，反映群众的愿望。提出‘化’的口号响亮，能动员群众。但是报纸在宣传的时候要慎重。**比如说绿化，不能说种一些树就是绿化，要成活、成片、成林，像在飞机上看到的湘南、粤北那样郁郁葱葱才算绿化**。又如水利化，有说1年实现的，有说3年实现的，其实都不能叫作‘化’，只是改变一些面貌。又如说‘四无’，应当相信可以实现，但不是一两年或三五年可以实现的。一个‘化’，一个‘无’，不要随便宣传已经实现了。即使是讲订规划、提口号，也要留有余地，在时间和空间上说得活一点。否则，说1年或2年完成，那不是以后没有事情干了吗？要留给子孙后代一些事做。现在说苦战3年基本改变面貌，其实只是初步改变面貌，能否做到还得看1年。

3、报纸的宣传要搞深入、踏实、细致。**我们讲多快好省的方针，报纸上不能只讲多快，不讲好省**。我们是要好大喜功的。大而无功，其实不是好大而是好小。不实就是无功而还。报纸对一些具体问题，要由小见大，要把许多杂乱无章的事情加以概括，从理论上把事情说清楚。报纸的评论，应带理论色彩，这就是深入事情的本质，抓住了规律。这样把纲提起来，才能使干部和群众方向明确。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重要性就在这里。

4、**现在全国出现高潮，出现许多新鲜事物，但也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记者、编辑要提高政治思想水平，能对眼前彩色缤纷的现象做出政治判断，有远见卓识**。这不容易，但应努力做到。目前大跃进的形势正是锻炼的好机会。可以按照各省委提出的意见，编辑一些新闻和评论供记者、编辑学习。

5、报纸的问题带有普遍性，不仅《人民日报》存在，省报也存在。今年夏天要召开全国报纸的总编辑会议，讨论新闻宣传如何改进。此事要告诉陆定一同志并报告中央书记处。”

毛泽东最后对吴冷西说：

“你要离开北京到外地走走看看，在八大二次会议后就下去一两个月，回来就开全国报纸总编辑会议。”

后来，吴冷西把毛泽东说要召开全国报纸总编辑会议的意见，告诉了宣传部长陆定一。陆定一说：

“夏天太忙，秋天再说。”

4月11日傍晚，毛泽东冒着蒙蒙细雨，参观东湖畔的武汉市地方工业产品展览会。

展览会上展出的都是在大跃进中的新创造和新产品。毛泽东在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书记处书记张平化、武汉市委第一书记宋侃夫的陪同下，走进了机电工业和农产品展览馆。他看到工作人员用火柴一点，沼气灯就像60支光的电灯一样亮了，高兴地笑了，说道：

“这要好好地推广。”

他看到“X光传片箱”卡片上面写着：“武汉首创”的字样，很感兴趣，问道：

“这是手工业合作社的产品吗？”

展览馆的人员说，这是第5五金生产合作社的产品，毛泽东赞许地说：

“很好。”

他看见手工业合作社生产的改良农具，有五用耕种器，有手握喷雾车，还有竹节点头喷粉器和水田除草器，一样一样拿起来细细察看。

市供销社所属各厂利用鸡毛、废电池、废铁末、废蚌壳、废胶和牛马骨头制成的新产品，引起毛泽东的极大兴趣。他看到武汉电池厂利用花生壳、棉籽壳制成的空气灯，详细询问了这种灯的制造方法，高兴地说：

“这种灯可以推广。”

毛泽东又看了纺织工业馆利用野生纤维脱胶后与棉花混纺的棉纱，织成的棉布，以及烈军属工厂生产的代替铁纱的棉纱窗布，尔后来到休息室，他说：

“这些新产品，有很多都不是由工程师和专家发明创造的。要鼓励大家好好干。”

稍微休息了一会儿，毛泽东又看了万能拖拉机，看了消防机械厂制造的方向云梯消防车，这才离开了展览会。

4月12日，毛泽东一行离开武汉，乘专机到了长沙。

这一天，长沙的天气格外晴朗。毛泽东要去视察解放军驻湖南部队某部独立营1连。他为了能够看到连队日常生活的真实情况，不让通知连队，也不坐车，和湖南省委的领导人及其他随行人员一起，步行来到了营房。

这天是星期六，连队的干部战士有的在读书看报，有的在自学文化，有的打篮球，有的在挖菜地。毛泽东径直来到了正在挖地种瓜的副连长身边。那位副连长不经意间抬头看到毛泽东来到了自己身边，急忙放下锄头，向毛泽东立正敬礼。毛泽东亲切地握着副连长那沾满了泥土的手，副连长激动得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就喊了一声：

“毛主席来啦！”

干部战士们闻声而至，大家一起鼓掌，向毛泽东问好。毛泽东扬起大手，也向战士们问候道：

“同志们好！”

毛泽东与干部战士们亲切握手。他在大家的簇拥下，一边走，一边和身边的战士谈话，问他们叫什么名字？何时入伍？来到一个宿舍门口，毛泽东看到小凳子上放着一本打开着的书，拿起来一看是《论列宁主义基础》，很高兴，就问这本书是谁读的？政治教育上什么课，有多少人能自学马列的书？**几位老战士说：他们是入伍那年速成识字扫的盲，后来又在连队业余文化学校读了两年课本，现在可以看报，可以读毛主席的书和马列的书。**毛泽东非常赞成战士学马列，他说，连队要把理论教育搞好，办好夜校。

毛泽东来到一个班的宿舍里，战士们搬凳子让他坐，他没有坐，径直走到一个战士的床前，伸手摸摸床上的垫子，看看有多厚，问战士们铺的够不够？又拿起棉被在手上掂了掂，问有几斤重，够不够暖？

毛泽东又来到3班，要看看战士们的武器。他走到枪架前，看了看说：

“光看表面不行，要看里面擦得净不净。”

他拿起一支五三式步枪，拉开枪机检查了一遍，又检查了一支冲锋枪，没有发现油泥和锈蚀，满意地说：

“你们的枪械保养得很好。”

毛泽东又检查了3班的内务，他说：

“3班的内务整洁，什物放置有序。”

他用手指点着床位一个一个地数，一共是12张，问战士们：

“你们一个房子里12张床，睡着挤不挤？”

战士们说，不挤。他点点头，看看地面，说：

“就是地潮湿了些。”

毛泽东出了宿舍，要离开军营了。他走到院门口，问连长：

“连里查铺查哨的制度还有没有？”

连长说还有。毛泽东笑着问战士们：

“你们连长晚上还给不给你们盖被子？”

有的战士说：

“过去盖，现在不经常盖了。”

毛泽东说：

“要经常盖才好。干部要爱护战士，战士要尊重干部。”

连长说：

“今后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办。”

毛泽东又对连队的干部们说：

“要经常进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连队要种菜、养猪，搞好战士们的伙食。现在可以种苋菜，长沙人有句话说，六月苋菜胜过鸡。”

一句话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战士们在笑声中，送走了自己的领袖。

下午5时，毛泽东要去看看火宫殿，他说：

“坡子街有个火宫殿，是长沙拉水拉车的劳动人民吃饭的地方。”

毛泽东身穿银灰色大衣，脚上是一双半旧的黄皮鞋，神采奕奕地来到了火宫殿李合记饭馆。他一走进营业厅，店里服务人员立刻认出了他，都非常激动地向他问候：

“毛主席，您老人家好！”

毛泽东和他们一一握手，尔后坐下来和他们亲切交谈。他问火宫殿这房子是什么时候建筑的？以前的老工人还在这里不，生活好不好？还问米多少钱1斤，肉多少钱1斤？站在毛泽东身边的当地干部一一作了回答。

饮食店里不少服务人员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他们听着毛泽东的话语，倍感亲切。回想旧社会，饮食工人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被称作“茶房”、“饭拐子”，每日两头不见天，劳累不顾命，俗语说：“养崽莫学饮食行，乞讨小费养儿郎。三年没睡年半觉，一世冒睡有边床。”如今，伟大领袖来了，还问寒问暖，连柴米油盐问题都十分关心，心里无比激动。他们提出要给毛泽东做顿家乡饭菜，让老人家尝尝。毛泽东也不推辞，还亲自伸出手和大家一起铺桌布。

两个钟头过去了，毛泽东让随行人员付了饭钱，遂起身告辞，又一次和工人们一一握手，嘴里不住地说着：

“谢谢，辛苦了！”

人们望着毛泽东的身影，目送他上车，车子开动了，越走越远，直到看不见了，大家才回到店里。

4月13日，毛泽东离开长沙，乘专机去了广州。

4月15日，毛泽东在广州写出了《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

此前，中共河南封丘县委在3月20日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介绍了封丘县应举农业生产合作社依靠集体力量战胜自然灾害、改变落后面貌的事迹。应举合作社的事迹深深地感动了毛泽东，他异常兴奋，欣然命笔，写出了一篇文采飞扬的短文：

介绍一个合作社

毛泽东

《一个苦战二年改变了面貌的合作社》，这篇文章值得一读。**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蓬勃发展。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群众中的落后阶层奋发起来努力赶上先进阶层，这个事实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革命（生产关系方面尚未完成改造的部分）、政治革命、思想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正在向前奋进。**由此看来，**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除了党的领导之外，6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过去的剥削阶级完全陷落在劳动群众的汪洋大海中，他们不想变也得变，至死不变、愿意带着花岗岩头脑去见上帝的人，肯定有的，那也无关大局。一切腐朽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其他不适用的部分，一天一天地土崩瓦解了。彻底扫除这些垃圾，仍然需要时间；这些东西崩溃之势已成，则是确定无疑的了。除了别的特点之外，**中国6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大字报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城市、乡村、工厂、合作社、商店、机关、学校、部队、街道，总之一切有群众的地方，都可以使用。已经普遍使用起来了，应当永远使用下去。清人龚自珍诗云：“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大字报把“万马齐喑”的沉闷空气冲破了。**我现在向全国七十几万个合作社的同志们，以及城市里的同志们推荐一个合作社。这个合作社位于河南省封丘县，叫作应举社，很有些发人深省的东西。**中国劳动人民还有过去那一副奴隶相么？没有了，他们做了主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960万平方公里上面的劳动人民，现在真正开始统治这块地方了。**

1958年4月15日，于广州

写罢此文，毛泽东又给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陈云、胡乔木、吴冷西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刘、邓、周、陈、乔木、吴冷西各同志：

此件请审阅。如同意，请冷西同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毛泽东 4月15日

10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10年可以赶上美国，说“25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赶上英美”是留了5年到7年的余地的。“15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仍不变。

4月22日，**位于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中央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正式**落成。

始建于1952年8月1日的人民英雄纪念碑，采用的是由梁思成和林徽因提供的设计方案，由两层月台、两层须弥座和碑身及碑顶组成，**通高37.94米，东西宽50.44米，南北长61.54米，占地面积3000平方米，使用花岗岩和汉白玉1.7万多块。**

人民英雄纪念碑镶嵌着8个历史题材10个主题的汉白玉大浮雕，展现了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浴血奋斗的艰辛历程。

人民英雄纪念碑正面（北面）镌刻的是毛泽东主席的亲笔题词：

“**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毛泽东 1955年6月9日**”

纪念碑的背面（南面）镌刻的是由毛泽东主席在1949年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前夕撰写的碑文：

“**3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30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1840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人民英雄纪念碑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纪念碑，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解放、人民自由幸福和国家繁荣富强精神的象征，**是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和革命人民纪念、缅怀英雄烈士的永久性纪念设施。**

再说4月22日这一天，刘少奇、邓小平、陈伯达、康生、陆定一、胡乔木、田家英、胡绳、邓力群一行人到达广州。

是日晚，毛泽东主持召开会议，讨论由刘少奇主持起草的八大二次会议的报告稿。

4月23日，毛泽东在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临时通信》中写道：

“请你们立即将第2个‘五年计划’期内关于你们省市区的地方工业指标大体研究一下，到1962年你地方重工业、轻工业产值可能达到何等高度，做成一个表，在5月5日前开党大会期间带来北京，以便谈一谈。”“1957年工业和农业的产值比例如何，1962年工农业产值可能的比例如何，这两项也请你们研究一下，连同前项列在一张表内。表之外，请你们做一个二至三千字的文字说明，附在表后。”“你们（代表）到京后，谆嘱留守干部（有能力者）继续研究工业，不要间断。4、5、6这3个月内省市自治区党委的工作应当依照成都会议、武昌会议商定的，把注意力的重点放在工业、运输业、财金贸、文教、军事几项过去被忽视了的方面。”“农业方面在目前几个月内可以委托管农业的一位书记主持，第一书记注意方向，讲几句话安排一下也就可以了，因为去冬今春已经做了大力安排。”

4月25日，毛泽东给周恩来、陈云、彭德怀、李富春、薄一波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想在这几天内谈一下工业问题，除富春已答应来此以外，你们几位是否有时间，是否愿意来此谈一下。如果可以来的话，请于25日或26日南来。又想邀王鹤寿，彭涛，滕代远，张霖之（煤炭部长），刘澜波（电力工业部长），石油部长余秋里，地质部刘景范，水利部李葆华来此一谈，并请带李锐同志一道来。”

4月27日凌晨，毛泽东给他的秘书田家英写了一个便函，他写道：

家英同志：

如有时间，可一读班固的《贾谊传》。可略去《吊屈》、《鵩鸟》二赋不阅。贾谊文章大半亡失，只存见于《史记》的二赋二文，班书略去其《过秦论》，存二赋一文。《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贾谊于南放归来著此，除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以外，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如伯达、乔木有兴趣，可给一阅。

毛泽东 4月27日

毛泽东在读《贾谊传》时，称赞贾谊是“英俊天才”。他对贾谊33岁郁郁而死，深表惋惜。他在书上批道：

“贾生才调世无伦，哭泣情怀吊屈文，梁王坠马寻常事，何用哀伤付一生？”

毛泽东把《贾谊传》推荐给自己身边工作的人看，意在鼓励他们也要解放思想，勇于作为，要向历史上年轻有为的贾谊学习。

4月27日下午2时40分，毛泽东在广州主持召开会议，讨论工业问题。6时15分，他和与会者们来到珠江边上了船，继续开会。6时50分，会议休息，毛泽东下水游泳，7时10分上船，7时30分就餐。8时，会议在船上继续进行，10时25分回到住地，会议一直开到12时30分才结束。

此后，毛泽东每天除了开会，还要到珠江游一次水。

4月29日，广州会议结束。

4月30日下午，毛泽东在文冲至莲花山一带的江面上游了泳，通体舒泰，由于日晒的缘故，脸上呈现出黑红色，显得格外健康。他决定去郊区的棠下农业社看看。

3点45分，毛泽东一行3辆轿车由西而东来到棠下村口南边的公路上。早已聚集在路边的村民纷纷喊着：“来了，来了！”

毛泽东身穿白衬衫，灰色长裤，坐在第二辆车上。他人未下车，脚上的浅口黑色布鞋已伸了出来。他平日里最喜欢穿的是两双合脚的鞋，一双是这个布鞋，另一双是已经很旧了的棕色皮鞋。他不论是去哪儿，都是两双轮流着穿。卫士们几次要他换新鞋，他都谢绝了，再说多了，他就要发脾气。

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和广州市市长朱光，正待要把农业社的干部介绍给毛泽东，可几百名社员呼啦一下子就围了上来。村干部费了很大劲才开出一条小道，让毛泽东等人走在前面，众人紧随其后，一起簇拥着往村里走去。农业社支部书记梁富、社主任钟叙本把毛泽东让进办公室，室内室外的人已经挤得满满的了。毛泽东问道：

“你们今年的生产还可以吧？”

钟叙本回答说：

“今年比去年好多了。”

“社里养了多少头猪？”

“3800多头。”

毛泽东点点头，说：

“那样好，我赞成。合作社应该多养些。”

陶铸对干部和社员们说：

“你们今天能够见到毛主席，今后生产要搞得更好啊！”

毛泽东又问：

“你们合作社会散伙吗？”

村支部书记梁富说：

“散不了。铁打江山！”

“散不了？为什么？”

钟叙本说：

“第一，我们社的收入增加，比单干户好。入社前，按照上中农水平，大小人口平均计算每人1年纯收入107元4角。”

“现在呢？”

“去年我们每人平均纯收入164元。”

“啊，从107，增加到164！”

毛泽东显然感到很满意。陶铸问钟叙本：

“还有第二呢？”

钟叙本清清嗓子，说：

“第二就是有共产党，有毛主席的正确领导。”

大家都笑了。毛泽东注意到桌子另一边有几个干部一直没吭声，就问朱光：

“这几位同志是谁呀？”

朱光忙介绍说，他们是广州市郊区党委书记、乡党委书记。陶铸打趣说：

“现在是4级干部在一起。”

毛泽东也笑着说：

“哪里是4级？连你，我，我们是6级干部在一起了。”

他要去看看干部试验田，众人便拥着他向村西北角走去，社里的群众也尾随而至。毛泽东来到一棵榕树不远处的稻田前，问道：

“这禾长得不错嘛，每亩能收多少斤？”

负责试验田的钟文炳回答说：

“大约700斤吧。”

“会倒伏吗？收成有没有保证？”

“只要搞好排灌，倒伏不了的。”

毛泽东沿着田埂往前走。此时的广州已经是火一般的炎热了。乡党委书记潘湛递给毛泽东一顶遮阳帽。这是一顶极普通的南方常用的竹编帽，农民们下田都戴着它。毛泽东接过帽子，端详片刻，戴在头上，细心地系上带子，环视了一下众人，说：

“你们看，我也像个农民了。”

他指着菜地边上的一种植物问：

“这是什么？”

社干部说，这是一种菜，叫藿香。他们又介绍了田里种的黄瓜、豆角、生姜。毛泽东说：

“好，这样，土地的利用率就很高了。”

毛泽东来到干部试验田边，农业社副主任钟礼向他介绍说：这试验田一造计划收1600斤。毛泽东反问道：

“一造也可以收获这么多吗？”

钟礼正要回答，突然，人群中一阵骚动，一个妇女满头大汗地使劲拨开人群，挤到毛泽东身后，将一把布伞撑开，小心地遮在毛泽东头上。毛泽东向她道谢，她并不开口，只是笑笑。毛泽东发现不远处的田埂上站着20多个红领巾，乌溜溜的眼睛盯着他，却不敢靠近。毛泽东乐了，走上前去，拉着一个叫任溥华的学生的手，问道：

“你们是哪里来的娃娃？来这里做什么？”

任溥华告诉毛泽东，他们是广州市第30中学的学生，是到棠下社参加勤工俭学来的。毛泽东又问：

“你们劳动得好吧？每天能赚多少工分？”

学生们笑笑，不好意思回答。毛泽东又问农业社干部：

“你们欢迎他们吗？”

大家都笑了，一个人说：

“社里的劳动力不够，我们双方订好了合同的。”

太阳已经西沉，毛泽东结束了近1个小时的视察，离开棠下社，又顺道视察了广东省农具改革展览会，看完了耕耘、水利、土壤肥料和水产4个馆。他在水产馆前，对陶铸、朱光等人说：

“南海水产资源很丰富，大有可为，应很好地开发利用。”

至此，毛泽东结束了广州之行，连夜乘飞机北返。

1958年5月1日凌晨，毛泽东乘专机飞抵武汉。这一天，他为回京后解决中南海的“八司马事件”，就找来林克谈话。

关于“八司马事件”，《戚本禹回忆录》中是这样说的：“毛主席当时在广州要找他的英文秘书林克，找来找去找不到，再找，就有人说这个人犯了错误，是‘反党小集团’分子，正在接受隔离审查。主席大吃一惊。他信任的英文秘书成了‘反党小集团’分子，在受审查，还隔离了，连他都不知道，他能不吃惊吗？主席一直和林克谈得很多很好，对林克很了解，说林克反党，主席当然不能相信。主席叫人把林克找到广州去。这样林克就在隔离中被放出来，赶到广州。林克见到主席后嚎啕大哭，把中南海发生的事情，自己被打成‘反党小集团’分子，要下放新疆劳改的事情都给主席说了。毛主席熟通历史。我们受到工作组打击的人正好是8个科级干部（林克、戚本禹、李公绰、朱固、马芷荪、吕澄、王象乾、沈栋年——笔者注），田家英和彭达彰两个人级别比我们高得多，在观点上又是支持我们的。所以，毛主席在听了林克的申诉后就联想到唐朝的‘二王八司马事件’，还说：‘现在我们这个中南海又出现了新的二王八司马事件，我不允许这种历史上的反动事件在我身边重演’。这是林克后来跟我说的。‘中南海的（二王）八司马事件’也因此得名。主席在通过林克的汇报了解到秘书室存在两派的争论和我们这些人遭到斗争的具体情况之后，就让秘书徐业夫、高智，去把两派的大字报抄写来看看，凡是说林克他们是反党的和林克他们申辩的都抄来。徐业夫、高智连夜就来抄了，抄得很认真。主席身边的秘书来抄大字报了，这是一个特别的信号。工作组本来已经准备要宣布我们为反党集团了，还给在新疆的王震打好了招呼，让他准备接收我们去新疆劳动改造，一看主席过问这件事了，就马上停下来看风向，连开会斗争也暂时不搞了，都等着毛主席那里的消息。”

再说毛泽东在和林克谈话时问道：

“世界上有许多鬼，也有许多人怕鬼。鬼是怕它好呢？还是不怕它好呢？”

林克没有理解毛泽东的话，随口说道：

“我不相信鬼神，所以不怕鬼。”

“鬼是怕不得的，越怕鬼，就越有鬼，不怕鬼就没有鬼了。《聊斋》上有一个故事，”

毛泽东仍然沿着自己的思路说下去，他还边说边比划着：

“一个狂生夜坐，有个鬼披头散发，面黑似漆，很难看，瞪着眼睛，吓唬狂生，舌头伸得这么长。狂生怎么办呢？他笑着研墨，把墨涂在脸上，涂得像鬼一样黑，也伸出舌头，目光如炬，和鬼互相瞪视着。就这样对视了1小时、2小时、3小时，那个鬼见吓不倒狂生，就跑掉了。作者蒲松龄是在告诉我们，不要怕鬼，越怕越不能活，鬼就要出来把你吃掉。狂生不怕鬼，就把鬼征服了。”

毛泽东把这个故事讲完了，意犹未尽，又问林克：

“《席方平》的故事你看过没有？”

林克说：

“我看过《聊斋志异》，但不记得这个故事。”

毛泽东吸了一口烟，接着讲故事：

“席方平的父亲席廉为人憨直，得罪了邻里羊姓富翁。羊某早死几年，贿赂了阴司官吏，使席廉忽然暴死。席方平悲痛欲绝，决心到阴间为父亲伸冤。席方平来到阴间一牢狱门口，远远看见他父亲望着他哭诉：狱吏全受贿赂，日夜拷打他。席方平就向城隍、郡司告状。因城隍、郡司都受了贿赂，不仅案子不受理，而且还使席方平受尽了拷打，又将他押回阳间。席方平又溜回阴间，告到阎王那儿，阎王不容他诉说，就责令打席方平几十大板。席方平大喊：

‘谁叫我无钱，应该挨打！’

阎王恼羞成怒，教鬼卒把席方平放到烧得通红的铁床上去烤。阎王问席方平：

‘还敢告吗？’

席方平说：

‘大冤未伸，寸心不死，一定要告。’

阎王大怒，叫两个鬼卒把席方平的身体锯成两半。席方平痛不可忍，但硬是一声不吭。鬼卒说：

‘真是条硬汉子！’

拿锯的小鬼同情他是个孝子，不忍锯到他的心，锯子曲折而下，保存了他的心，身子被锯成两半。阎王叫鬼卒把席方平的身体合起来去见他。阎王问席方平：

‘还告吗？’

席方平恐再遭到毒刑，谎说：

‘不告了。’

席方平又被押回阳间。席方平想告到玉皇大帝那里，他听说二郎神是玉帝的贵戚，聪明正直，便又回到阴间找二郎神。谁想又被阎王抓住，把他强行投胎为婴儿。席方平愤怒啼哭不吃奶，活了3天就夭折了。他的灵魂又跑到阴间告状，结果碰上玉帝殿下的九王，九王叫二郎神赶快判决。最后，二郎神判决，将贪赃枉法的阎王、郡司、城隍、助纣为虐的鬼役以及为富不仁的羊某，分别治罪。同时表彰了席廉父子的善良、孝义，并增加席廉阳寿3纪。”

故事讲完了，毛泽东喝了口水，点着烟，又说：

“**老实人，虽然历经磨难，只要敢于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原则，敢于斗争，问题终会弄清，冤案终能昭雪。**共产党人要有坚持原则的勇气，在大是大非面前要旗帜鲜明。要有‘六不怕’的精神，即不怕撤职、不怕劳改、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坐班房，不怕杀头。只要准备了这几条，就什么都不怕了。”

5月3日，毛泽东从武汉飞回北京，当晚便着手解决中南海“八司马事件”。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记载：“他在回来之前，就已经看了所有抄去的材料了，回来后也不马上表态，而是亲自作调查，当晚就在他居住的菊香书屋亲自召开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直机关党委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副书记曾三、刘华峰，中直机关人事处处长晓岚；秘书室领导田家英、彭达彰；林克、李公绰等涉事的8个科长；还有邓力群（中央办公厅政治研究室主任）和李东冶（中南海党总支书记）、王刚、阎草等人。那是我第一次以会议成员的身份参加主席亲自召开的会议，加上知道已被工作组定为‘反党小集团’的成员，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很紧张。正式开会之前，毛主席对事件中一些不熟的人问一下情况。他先问李公绰是哪里来的？什么学校毕业？李公绰说他是东北大学毕业的。然后就问我。我有点不好意思，回答说：‘我没上过大学，是个中学生’。不料，主席竟高兴地说：‘我和你一样，也是中学生。师范毕业，还当过小学教员呢！’听了主席的话，我原本七上八下的心一下子就平稳下来了，就觉得事情可能没有那么严重了。因为主席不会跟一个反党集团的人这么说话的。

主席让工作组的人先讲，王刚不吭声，晓岚就出来说话，她讲述了我们如何进行非组织活动，如何揪住老干部不放，如何写大字报攻击党的领导等等。她讲完了，主席接下来就叫我们讲。我知道他们在抓李公绰历史上的把柄，李公绰讲话可能底气不硬，田家英、彭达彰又不便讲，林克已经都跟主席讲过了，不用再讲了，剩下只有我讲了。我就站起来说，我们是响应主席的号召，主席的2月讲话（指毛主席 1957 年 2 月底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是怎么怎么讲的。毛主席一边听一边点头说：‘我是这么讲的。’这样一来，我就更有勇气申辩了。我说，我们是响应党的号召才给领导提意见的，目的是帮助领导改进作风，搞好工作。秘书室和中央办公厅的一些领导高高在上，不肯接见群众，就是官僚主义，肯接见群众的是彭达彰，田家英那么忙，可也接见过群众（这时，田家英接过话头，说自己也是有官僚主义的）。我们给他们提意见，他们就把我们说成是右派，是反党，而真正的右派，像林希翎，他们倒不反对，还说她是‘大胆、勇敢、有才华’，支持她。林希翎在北大作演讲，他们还派了王文去参加。林希翎当场就讲，中央办公厅今天派了人来听我的报告。这不是长右派志气，灭左派威风么（主席听了频频点头）。所以说，右派他们不反对，反右派的人他们倒说是右派，是反党小集团。

主席听了我讲的这些，就问他们：‘那么，他们（指我们这些人）还有什么反党的事吗？’杨尚昆、王刚他们都没有说什么。这时，晓岚又讲话了：‘他们攻击中直党委，他们的大字报就是对着杨尚昆同志的，反对中央办公厅杨尚昆主任。这还不是反党吗？”主席一听，就说：‘噢，反对杨尚昆就是反党？’杨尚昆连忙说：‘不对，不能这么说，我是在主席领导下的，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才叫反党。’

主席接着说：‘你们是两派，代表对立的两派，左派和右派，一派打的是红旗，一派打的是黑旗。我是站在左派一边，是支持左派，反对右派的，主张拔黑旗，插红旗。’毛主席又问：‘谁是王刚？’王刚站起来，主席看了看他说‘久仰大名’，紧接着就毫不客气批评说：‘你是一派的领袖，包庇右派，打击左派，干尽了坏事。上边还有人支持你，总支、中直党委都支持你嘛！不然你也兴不起那么大的风浪。你们的错误，不是一般性错误，而是方针路线的错误。你们继续执行了何载的路线，按照何载的《建议书》办事。你们插的是什么旗？是红旗、灰旗还是黑旗？我看不是红旗，也不是灰旗，而是黑旗，道道地地的黑旗。我的意见，今天立即召开秘书室全体工作人员大会，把我的意见传达下去，展开讨论，揭盖子。’——‘八司马事件’又叫作‘黑旗事件’，就是根据主席这一番讲话来的。主席这里所说的何载建议书，是指前面交代过的何载（1957年3月，戚本禹最先贴了何载的小字报，之后他和林克等人贴了何载的大字报，又不点杨尚昆的名贴了办公厅的大字报。反右开始后，何载和他背后的杨尚昆开始追查大字报的问题。是年秋，全国反右接近尾声，中南海的问题还没有解决。1958年初，中央办公厅派王刚接替了何载的工作，经杨尚昆同意，又组成以王刚、晓岚为正负组长的工作组，从3月到4月份，批斗戚本禹、林克8人，直至定性——笔者注）曾向王刚、晓岚工作组建议，说他自己是有错误，但不是反党，而我们这些人则是反党。我们这些人是利用他的认识上的错误来企图打倒老干部，反对党的领导。所以建议王刚、晓岚对我们开展斗争。

主席还问杨尚昆知不知情。杨尚昆这个人相当有经验，一看到这个架势，知道气候不对，就说‘这个事情，我一直忙于工作，没有时间，所以也没抓，没有很好了解’。彭达彰把方世郁盯梢的事说了，主席听了勃然大怒，说：‘把对付敌人的手段拿来对付人民群众，在中南海搞法西斯、贝利亚，决不允许。’说完他拿眼睛看着杨尚昆，杨尚昆低头不语。

看到局面有些僵，邓力群就出来打圆场。他先说了把青年积极分子打成反党集团是不对的，接着又说青年人容易偏激，贴大字报，有点类似延安时代的轻骑队。他认为两方面都有缺点，两方面应该团结起来搞好整风和反右派。主席听了后说：‘哦，各打50大板。青年人给领导提意见有什么错？如果给领导提意见就要挨板子，那么这样，他们都还年轻，我老了，那就先打我的板子好了。因为是我号召开展整风的。’听主席这么讲，邓力群就马上起来作检讨（后来我调到《红旗》杂志社时，已在《红旗》杂志社担任副总编的他还热情地对我说：‘当年八司马事件，我说应该各打50大板，挨了主席的批评，那是我错了。青年人响应党的号召参加整风，何错之有！’）。

当晚8时多，秘书室召开全体人员大会，杨尚昆这次还是很实事求是、原原本本、一字不漏地把毛主席的讲话向全体人员作了传达。许多人听了以后热泪盈眶，有的甚至痛哭失声，直至午夜仍不肯离去。这情形和文革初期的一幕是很相似的。文革初期，刘少奇、邓小平他们在北京搞了‘50多天的白色恐怖’，很多群众和学生被打成右派和反革命，毛主席得知后，就返回北京主抓了给群众和学生的平反。在全国各地平反会上，很多人也是在获得平反后痛哭流泪，齐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主席’的歌曲，久久不离开会场。”

5月3日晚，毛泽东解决了“八司马事件”后，在颐年堂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董必武、彭真、陈伯达、胡乔木、杨尚昆开会，讨论即将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的有关问题。

欲知八大二次会议如何召开，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毛泽东周围的中直机关、中央办公厅这些小圈子，实际上也是社会的一个个缩影。社会上出现的现象，在这些小圈子里也都应有尽有。“八司马事件”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几个小青年在整风运动中贴了领导的大字报，就成了“反党小集团”，要发配到新疆进行劳动改造。毛泽东把这种灯下黑现象称之为“把对付敌人的手段拿来对付人民群众，在中南海搞法西斯”，一点也不过分。毛泽东健在尚且如此，他**不在了又会怎么样呢？那时候的一些人不作如是想，终于酿成了一个历史的错误**。

**第51章**

**“谁有真理就服从谁，不管是挑大粪的也好，挖煤炭的也好，扫街的也**

**好，贫苦的农民也好，只要真理在他们手里，就要服从他们**。**如果你的**

**官很大，可是真理不在你手里，也不能服从你。”**

话说1958年5月4日，毛泽东在给埃及总统的复信中写道：

“不管帝国主义者怎样敌视贵国和整个阿拉伯人民，它们也决不能阻止贵国和整个阿拉伯人民的前进。”“我的心向着阁下和贵国人民，向着整个阿拉伯民族的全体人民。”

5月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八大二次会议。出席大会的有**正式代表977人，列席代表389人（其中有各省、市、自治区选派的部分县委书记、大城市区委书记、省辖市委书记、企业党委或基层党委书记、军队负责干部）**。会议的主要议题是：1、关于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2、关于莫斯科会议的报告。3、通过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

这一天，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在会议上作了工作报告。

在会议休息时，毛泽东邀请河南省林县县委书记杨贵和一些基层代表在休息室里谈话。杨贵是作为新中国山区建设的标兵列席会议的。毛泽东一再告诫大家说：

“要搞好经营管理，要去做艰苦的工作。浮而不深，粗而不细，华而不实，怎么能搞好工作呢？”

毛泽东还说：

“我们搞合作社，搞水利建设，深翻土地，水、土、肥、密植、科学种田都要搞，有这个艰苦才能换来幸福。”

5月8日，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发表讲话。他说：

“我讲一个破除迷信。刚才不是有的同志讲破除迷信嘛。我们有些同志有好些怕，其中有的怕大学教授，整风以后慢慢就不那么怕了，或者怕的没有那样厉害了，有的人已经接受了大学教授的聘书，**我在报上看到柯庆施同志接受了复旦大学的聘书去当教授。**这就是不怕的表现。还有的也准备去当教授。这是讲怕资产阶级教授，是否也怕无产阶级教授？我看有的。譬如说怕马克思，他住在很高的楼上，要搭好几层梯子才能爬上去，我这一辈子没有希望了。**我在成都会议上讲过，不要怕，原因马克思也是人，他也是两只眼睛，两只手，一个脑子，跟我们差不多。不过他脑子里有一大堆马克思主义。**他写了不少的书给我们看。我不一定都要看完。杨献珍同志在不在？（杨答：在）。你看完了没有？你看完了，你上到楼上去了，我没有看完，还在楼底下。我们没有看完他的著作都是楼下人，但不怕。**马克思的东西，不一定都要看完，读一部分基本东西就够了，但我们做的，超过了马克思。列宁说的做的许多地方都超过了马克思。马克思没有做十月革命，列宁做了，所以在实际方面是超过了。他那时有那时的条件。马克思没有做中国这样大革命。我们的实践也超过了马克思。**在实践中就会产生出道理来。马克思革命没有革成，我们革成了。这种革命的实践，反映到意识形态上，就成为理论。”

“**不要妄自菲薄，不要看不起自己**。我常常和一些同志谈，中国被帝国主义压迫了100多年，帝国主义宣传那一套，要服从洋人。服从外国100多年，吓怕了什么都怕，封建主义宣传那一套：要服从孔子。总觉得自己不行，对孔子来说我们也不行。”

“从古以来，很多学者、发明家，在开始都是年青的，都是没人看得起的，学问比较少的人，被压迫的人。这些人在后来才变成壮年、老年，学问多的人。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这是不是一个普遍的规律？不能完全肯定，还要调查研究。但是，可以说大部分如此。他们为什么能变成发明家、学者、英雄呢？是因为他们方向对。学问再多，方向不对等于无用。”

“青年人打倒老年人，学问少的人，打倒学问多的人，这种例子多得很。”

“中国战国时期秦国有个甘罗，大概是甘茂的孙子，他12岁当丞相，还才是个少先队员，红领巾，童子军。当时吕不韦是个大政治家，但没有主意，甘罗给他出了个主意，叫他亲自出马到赵国去，后来事情果然成功，才成了丞相。

汉朝有个贾谊，17岁就被汉文帝找去了，一天升了3次官，后来贬到长沙，他写了两篇赋，《吊屈原赋》和《鵩鸟赋》，又回到朝廷，写了两本书，叫《治安策》和《过秦论》。我看他是古时的秦汉历史专家。范文澜同志在场不在场？对不对，请你去考证一下。他写了几十篇作品，留下来的是两篇文学作品（两篇赋）和两篇政治作品——《治安策》和《过秦论》。死时才只有33岁。”

“韩信也是一个被人看不起的人，他在年轻的时候，曾经受过‘胯下之辱’。人家让他钻‘胯裆’，他一看没办法，只好钻。”

“孔明27岁当军师。周瑜也是青年人，孙权的老将程普不行，孙权打曹操不用他，而用周瑜做都督。程普先不服气，但后来周瑜打了胜仗，周瑜死时才36岁。”

“最近出名的那两个发明家杨振宁、李政道也是年轻人，年龄不过30岁。台湾成立了一个科学院，胡适当院长，把他俩弄去当院士。”

“现在的许多优秀的乡干部、社干部，有很多是青年人。总之，有为的青年多得很。

到此为止，举这么多的例子，目的就是说明青年人胜过老年人，没有学问的胜过有学问的。不要被大学问家、名人、权威者吓倒。要敢想、敢说、敢做。不要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被这种东西所束缚，要从这种束缚手脚的状态中解放出来，**要发挥人的创造性，劳动人民的创造性、积极性，从来就是很丰富的，要把劳动人民中蕴藏着的无穷无尽的丰富的智慧、创造能力解放出来。**”

“我不晓得什么工业，一窍不通，可是我不相信工业就是高不可攀。我和几个搞工业的同志谈过，我说不要把它看得那样严重。开始不懂，学过几年也就懂了，有什么了不起。把它看得那么严重，这种心理状态是不正常的。”“我看只要15年就可以赶上或超过英国，甚至美国，照李富春同志的说法，至多20年也就够了。”

**“今天《人民日报》上登的‘让高山低头，河水让路’，我看这个话很好，高山嘛，我们要你低头，你还敢不低头，河水嘛，我们要你让路，你还敢不让路。这样说说是不是狂妄呢？不是，我们不是狂人，马列主义者是实事求是的革命者，我们主张俄国的革命热情和美国的求是精神的统一。**在文学上，就是要革命的浪漫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的统一。”

“中国应当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大国，因为人口多嘛！过去林彪同志在延安曾谈过，将来中国比苏联强，那时我还有点不大相信。我想苏联也在进步呀！现在我相信了，完全有可能。”

毛泽东对范文澜说：

“范文澜同志，你的文章我看了，写得很好。我看可以补充一下，秦始皇是厚今薄古的专家，他主张‘以古非今者族’。”

他接着对与会者们说：

“范文澜同志最近写的一篇文章，叫《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4月28日《人民日报》），我看了很高兴。”

毛泽东说到这里，站起来讲话了，他说：

“这篇文章引用了很多事实，证明了厚今薄古是我国的传统。敢于站起来讲话了，这才像个样子。文章引用了司马迁、司马光……可惜没有引用秦始皇。秦始皇是个厚今薄古的专家。他有‘以古非今者’杀全家的禁令。”

林彪插话说：

“秦始皇焚书坑儒。”

毛泽东说：

“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460多人，我们坑了46000人。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有人骂我们是个独裁统治者，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合乎事实，可惜的是他们说的还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

毛泽东说罢哈哈大笑。

从这一天开始，大会进入讨论和发言阶段。先后发言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恩来、朱德、陈云、陈毅、李先念，政治局候补委员乌兰夫、张闻天、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薄一波，中央书记处书记王稼祥、李雪峰等。在大会上发言的还有中央国家机关的部门负责人、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全国总工会、共青团和全国妇联等群众团体负责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省（市、自治区）、地（市）、县等各级党委机关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工矿企业的党委书记、工厂厂长和技师，乡、镇、合作社的支部书记，农业合作社主任和供销合作社主任，学校校长和党委书记等共计117人。另外还有145人作了书面发言。

毛泽东对与会者的发言很重视，几乎每一次都出席，而且听得很有兴趣。

5月16日，毛泽东在第2机械工业部党组5月14日的报告上作了一个批示。

报告中说：在争取时间、加快核工业建设速度的问题上，中方人员与苏联科学家之间曾有过争论，出现了两股劲，但经过双方努力，最终实现了两股劲拧成一股劲。毛泽东在批示中写道：

“这是一个好文件，值得一读。请小平同志立即印发大会同志们。凡有苏联专家的地方，均应照此办理，不许有任何例外。苏联专家都是好同志，有理总是讲得通的。不讲理，或者讲得不高明，因而双方隔阂不通，责任在我们方面。就共产主义者队伍说来，四海之内皆兄弟，一定要把苏联同志看做自己人。大会之后，根据总路线同他们多谈，政治挂帅，尊重苏联同志，刻苦虚心学习。但又一定要破除迷信，打倒贾桂（京剧《法门寺》中一身奴才气的人物——笔者注）！贾桂是谁也看不起的。”

5月17日，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作了第2次重要讲话，主要内容是讲国内外形势和当前的任务。他说：

“国际上乱子很多，帝国主义内部吵架，世界不太平，似乎形势不好，天上有乌云。但我们要有远见，不要被暂时的黑暗所迷惑。中国是国际形势的重要部分。中国形势好，是一片光明，过去思想不统一，现在统一了，过去对多快好省没有信心，现在转变了。只有把中国的形势搞好了，国际形势才会好。但是，也要准备有最大的灾难。赤地千里，大旱大涝，还要准备打大仗。帝国主义的存在，就有战争的可能性。当然现在和平的可能性大于战争。但要准备，要打就打，把帝国主义扫光，然后再来建设，从此就不会有世界大战了。作了准备，打起来也就不会大惊小怪，打仗无非是死人，这我们见过，人口消灭一半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好几次。”

5月17日，一位领导人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中，提到了中国的人造卫星问题，会议的气氛顿时热烈起来。

“我们也要搞一点人造卫星！”毛泽东说：“当然啦，我们应该从小的搞起。但是，像美国鸡蛋那样大的，我们不放。要放我们就放他个2万公斤的！”

毛泽东似乎也被自己的话感染了，他的话音刚落，便忽地一下子站了起来。代表们更是情不自禁，站起来长时间的热烈鼓掌。

5月18日，毛泽东提议将安东机器厂关于试制成功30马力拖拉机的报告印发给大会代表们。

安东机器厂是一个小修理厂，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都很低。工人们土法上马，失败一次再试一次，终于成功地研制出了30马力单缸轮胎式拖拉机。

毛泽东为印发这个报告写了一个批语，题目叫作《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此件印发大会各同志阅读。请中央各工业交通部门各自收集材料，编印一本近300年世界各国（包括中国）科学、技术发明家的通俗简明小传（小册子）。看一看是否能够证明：**科学、技术发明大都出于被压迫阶级，即是说，出于那些社会地位较低、学问较少、条件较差、在开始时总是被人看不起、甚至受打击、受折磨、受刑戮的那些人**。这个工作，科学院和大学也应当做，各省市自治区也应当做。各方面同时并举。如果能够有系统地证明这一点，那就将鼓舞很多小知识分子、很多工人和农民，很多新老干部打掉自卑感，砍去妄自菲薄，破除迷信，振奋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创造精神，对于我国7年赶上英国、再加8年或者10年赶上美国的任务，必然会有重大的帮助。卞和献璞，两刖其足；“函关月落听鸡度”，出于鸡鸣狗盗之辈。自古已然，于今为烈。难道不是的吗？

　　 毛泽东 1958年5月18日

5月20日，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作了第3次重要讲话。他严厉地批评了党内存在的官气，他说：

“讲一讲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的问题。这个问题所以要特别提出来，是因为**我们有些干部是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靠资格吃饭，做了官，特别是做了大官，就不愿意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是一种很恶劣的现象。**如果大多数干部能够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那么这少数干部就会被孤立，就可以改变官僚主义的习气。靠做大官吃饭，靠资格吃饭，妨碍了创造性的发挥。因此，要破除官气，要扫掉官气，要在干部当中扫掉这种官气。**谁有真理就服从谁，不管是挑大粪的也好，挖煤炭的也好，扫街的也好，贫苦的农民也好，只要真理在他们手里，就要服从他们**。如果你的官很大，可是真理不在你手里，也不能服从你。再说一遍，要是大多数干部扫掉了官气，剩下来的人就是有官气，也容易扫掉了，因为他们孤立了，不敢作怪了。**应该说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摆架子、摆资格、不平等待人、看不起人，这是最低级的趣味，这不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则是一种高级趣味，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

毛泽东提出了外行领导内行的观点。他说：

“为什么说外行领导内行是一般规律呢？因为人人是内行，人人又是外行。世界上一万个行业，一万门科学技术，每人只能精通一行。如梅兰芳会唱戏，但他只会唱青衣，而旦角就有青衣、花旦、武旦、老旦、丑旦五行。五行，梅兰芳只会一行，唱老旦不行，他唱老旦就不如李多奎。”“一个人精通二三行或四五行就很厉害了，就算十八般武艺俱全，和薛仁贵一样，对一万行讲还是九千九百八十二行是外行。”

“政治家是搞人与人的相互关系的，是搞群众路线的。这个问题我们要很好研究一下。因为有许多工程师、学者看我们不起，我们有些人也看自己不起，硬说外行领导内行很难。要有点道理驳他。我说外行领导内行是一般规律。如梅兰芳叫他当总统就不行，他只会唱戏。”

毛泽东还讲到了插旗子、辨别风向的问题。他说：

“插什么旗子？插红旗还是插白旗？世界上任何地方都要插旗子的，从地球的南极到北极都是要插旗子的。凡是有人的地方，都要插旗子，不是插红旗子就是插白旗子，或者还有插灰旗子，不是无产阶级的旗子，就是资产阶级的旗子。去年五、六月间机关、学校工厂究竟插什么旗，双方都在争夺，现在还有少数落后的工厂或工厂的一个车间、合作社、机关、车间、连队、学校或其中的一部分，那里边插的还不是红旗，是白旗或者灰旗。我们要在这些地方做工作，发动群众，大鸣大放，贴大字报，把白旗拔掉，插上红旗。任何一个地方都要插红旗，让人家插了白旗的地方，要把他的白旗拔掉。”

“唐朝有个刘知几，是个历史学家。他主张学历史的人要有3个条件：才、学、识。这里讲的是识，他说的识，就是辨别风向的问题。我现在特别提醒同志们注意的是，我们应该有识别风向的能力，这一点有极端的重要性。一个人尽管有才有学，如果不善于识别风向，那还是很迟钝的。”“**斯大林讲要有预见性，预见性是指的辨明风向，刮小风时就知道要刮大风。”**

“不要怕插红旗，凡应该插红旗的地方赶快去插，每一个山头、村落，都要把红旗插起来。每个党委、机关、部队、工厂、合作社，都应该把红旗插起来，哪里没有红旗，哪里就要插。”

5月22日晨，毛泽东给张治中写了一封回信。

原来，张治中在5月3日将他的《自我检查书》和他在1949年冬口授的一份自述《六十岁总结》送给毛泽东，说是请毛泽东指教。毛泽东在回信中写道：

文白先生：

5月3日的信早已收到。原封不动，直到今天，打开一看，一口气读完了《六十岁总结》，感到高兴。我的高兴，不是在你的世界观方面。在这方面，我们是有距离的。高兴是在作品的气氛方面，是在使人能看到作者的心的若干点方面，是在你还有向前进取的意愿方面。我猜想，这一年多的时间内，害苦了你，一个老人遇到这样的大风浪。这种心情，我是理解的。觅暇当约大驾一谈。这几天尚不可能。

祝安好！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

毛泽东 5月22日上午7时

5月23日上午，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通过了15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目标，通过了提前5年完成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还通过了“苦干3年，基本改变面貌”等口号。

会议决定由中央主办出版理论刊物《红旗》杂志。

经毛泽东提名，会议增选柯庆施、李井泉、谭震林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增选李富春、李先念为书记处书记；增选林彪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

大会增选25位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他们是：王任重、张仲良、陶鲁笳、彭涛、刘建勋、赵毅敏、孔原、唐亮、刘子厚、张苏、杨易辰、汪锋、周小舟、方毅、王尚荣、刘震、张平化、张劲夫、韩先楚、李颉伯、廖志高、赵伯平、孙志远、张爱萍、姚依林。

下午，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第4次重要讲话，他说：

“我们大会是有成绩的，开得好，做了认真的工作，制定了我们的总路线。世界上的事情就怕认真，一认真不管什么困难，都可以打开局面。”

“大会的总路线的制定不可能是某些个人突然想出来，不管地位多高，官多大，多么有名，如果不注意下去联系人民，或者与同人民有联系的干部同志们接触，不与人民中的积极分子接触，只要你半年不与人民接触联系，什么也不会知道，就贫乏了。所以规定每年4个月下去是很必要的，下去联系人民，与同人民有联系的干部、人民中的积极分子接触，了解他们想些什么，做些什么，经过什么艰苦，总结上来。”

毛泽东又谈到了辨别风向的问题，他说：

“以后注意辨别风向。大风一来，12级风，屋倒、人倒，这样好辨别，小风就不易辨别，领导干部要特别注意这种小风。宋玉写了一篇《风赋》，有阶级斗争的意思，值得看。宋玉说风有两种，一种是贵族之风，一种是贫民之风，所谓‘大王之风’与‘庶人之风’。风有小风、中风、大风。宋玉说：‘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蘋之末，侵淫谿谷，盛怒于土囊之口。’这里写了一个辩证法。‘起于青蘋之末’，他说风就是从那个浅水中小草的尖端起的。‘侵淫’就是慢慢的，逐步的。‘谿’就是河川，‘谷’就是河谷。‘谿谷’就是在那两个高山中间的山谷。‘盛怒’就是生了大气了。‘土囊之口’大概是三峡那个地方。从四川刮起一股风，通过三峡，叫‘土囊之口’。有书为证，你们去翻那个《昭明文选》第45卷，我昨天还翻了一遍。问题是这个风‘起于青蘋之末’的时候最不容易辨别，我们这些人在一个时候也很难免。‘起于青蘋之末’大概是成都的那个地方。‘侵淫溪谷’大概是隆昌、重庆那个地方。然后到三峡这么一吹，就生了大气。这次我从那里过了一下，我想大概是那个地方。他说的那个‘溪谷’究竟在哪里？可能就是那个三峡。”

5月24日，毛泽东给主管农业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震林同志：

此件请你一阅，山东有那么多的缺粮户，值得研究一下。如你有时间，请找李宝森等3人（都是干部队队员，给我们守卫的，排长级干部）问一下情况。因我忙，不暇找他们谈。

毛泽东 5月24日

5月25日，是北京少有的一个大热天，烈日高照，没有一丝风。

下午1时，一大批党政军领导人陆续来到中南海怀仁堂集合，差不多每人都是头戴草帽，身着粗布衣。1点40分，大家分乘5辆公共汽车朝着十三陵水库出发了。

与此同时，毛泽东突然来到大女儿李敏的房间，他说：

“走哇，跟爸爸出去走走。”

李敏特别高兴，连忙把桌子上的书、作业本收拾好，跟在爸爸身后出了房门。

原来，毛泽东也是要去视察北京郊区的十三陵水库。他知道李敏周末在家，想让女儿出去换换空气，开开眼界。

李敏跟爸爸单独出去的机会还是很少的，今天可是个难得的机会。父女俩在车上可亲热啦。毛泽东一会儿问女儿在学校的功课怎样？一会儿问她的生活怎样？李敏也不住地向爸爸讲一周在学校发生的新鲜事儿。毛泽东听得特别高兴，样子还很专注。父女俩一路上都是有说有笑。李敏看爸爸心情很好，就说：

“爸爸，我是不是和妈妈一样？妈妈这个人性格开朗……”

毛泽东说：

“当年，你妈妈的组织能力很强，特别擅长做宣传鼓动工作。毛笔字写得娟秀端正。干起工作来风风火火，可有股子泼辣劲头，而坐下来后，还真是一个温柔贤淑的姑娘。我的娇娃温柔俊俏、端庄秀气，很像你妈妈当年，就是小嘴巴笨了些，只会说洋话，讲不来中国话，当不了宣传鼓动家哟！”

李敏知道爸爸还是认为自己的中文水平差，表达能力不强，只好对爸爸一笑了之。毛泽东兴致不减，又和女儿讲起遵义会议结束后的情形，他说：

“那晚，你妈妈等我等了好久。当我回到房子里还未坐稳，她就问。我想给她卖个关子吧，可我的心里也高兴，总也憋不住。人一高兴，话就多起来。我背着手在房子里踱着步，慢慢地说：‘这个会议，大家都觉得我这个菩萨又有用了，把我抬出来，承蒙大家捧场，选我进中央政治局常委。大家看得起我老毛，认为还是有一点本事。惭愧，惭愧！进入中央领导层，滥竽充数而已。’不过，我也没有谦虚。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你妈妈两眼紧巴巴地望着我，听得那么入神。那晚，我们好高兴哟！”

汽车飞驰向前，路边的树木、古建筑从车窗外飞快地向后移动。突然，李敏看到了一个乌龟驮着一座石碑，很诧异地问：

“爸爸，那是什么？”

毛泽东也看到了，他让司机停下车，领着李敏绕着石碑转了好几圈，就驻足仔细地看那碑文。他看完了，问李敏说：

“小外国人，你知道王八为什么要驮石碑呢？”

李敏仰着脸看看爸爸，摇了摇头。毛泽东说：

“这里有个故事哩，有一支歌子唱的就是这个故事，歌子的名字就叫王八卖烧酒。”

说罢，他就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边走边用手打着节拍唱起来：

“望望东来望望西，望见王八驮石碑。我问王八犯什么罪？王八说，因为我呀上辈子卖酒兑凉水。”

毛泽东唱完先自笑了，李敏也笑了。毛泽东见女儿很开心，就又说：

“娇娃，你这个被你妈掺了凉水的烧酒，将来会不会有人要呢？嫁不嫁得出去呢？将来会不会让你妈把你驮着呢？”

李敏还在思索着爸爸唱的那支歌子里的故事，她不解地问爸爸：

“因为它掺水，就让它驮石碑啦？”

毛泽东看着女儿认真的样子，笑而不答。父女俩回到车子里，毛泽东又开始给李敏讲故事：

“驮石碑的不是王八，也不是乌龟，它的真名叫赑屃（bi xi）。神话里传说，赑屃是龙王的儿子。龙王有9个儿子，9个儿子中就数它的力气大，而且性格好，又能背很重的东西。它的身体形状和其它兄弟也不一样，形体像个龟，可头部又像龙。古人为死者立碑时，就想：怎么才能让石碑经久不倒，保存千秋万代呢？于是就想到了它，就把它请来，把碑立在它的背上，想借助它的力气，让人名传千古。明代十三陵的石碑，是功德碑。就是靠它这龙首龟身的赑屃给驮到现在，它还要继续驮下去。有的石碑上面还盖着亭子，叫碑亭。以后别竖那么多碑，叫它驮得太累了。还是多建些亭子好。人们可以夏季避雨乘凉，冬季可以避风雪嘛！”

说话间，车子已经到了十三陵水库工地。此时的水库工程已经进入紧张的施工阶段。毛泽东头戴草帽，身着布衣，脚踏普通的圆口布鞋，从车子里走了出来。

“毛主席来啦！毛主席来啦！”

工地上顿时沸腾起来。毛泽东一边走，一边向民工们招手致意。在千万人的欢呼声中，他健步登上水库东北角的墩台上，凭高远眺。整个工地都沸腾了起来，大家都来看望毛泽东。水库工地政委赵凡向毛泽东介绍说：

“这条大坝高29米，现在已经筑到23米了。”

毛泽东关切地问：

“是不是能保证在洪水到来以前修成呢？”

赵凡说：

“一定能如期完工。”

“有多少人在工作？”

“有10万人，每天运5万方土到大坝上。”

毛泽东高兴地点着头，又向欢腾的人群挥手致意。他走下高坡，在赵凡等人的引导下，来到一个帐篷里。水库工程指挥部不知道毛泽东要来，只好在指挥所这个十分简易的木板工棚内接待了他。

毛泽东在一个土筐上坐了下来。工地上一个叫王惠兰的干事，看到毛泽东热得满头大汗，赶紧递给他一条凉毛巾。毛泽东一边擦汗一边问：

“你多大了，叫什么名字？”

“我叫王惠兰。”

“你是不是‘九兰’铁姑娘队的？”

毛泽东所说的铁姑娘队，是由9个名字里都带有“兰”字的姑娘组成的“九兰组”，由于她们忘我的劳动而誉满工地。毛泽东听王惠兰说她不是“九兰组”的，就笑着说：

“要是加上你就是‘十兰组’了。你们年轻一代，敢想、敢干、敢闯的精神很好。你们要积极劳动，为建设社会主义多做贡献。”

毛泽东兴致勃勃地观看了十三陵水库沙盘模型，认真地听取了指挥部负责人关于工程进度的汇报。

由于天气燥热，加上工棚里挤了很多人，人们头上都冒出了汗水。毛泽东和大家一样，依然坐在木板钉的凳子上听着，笑着。他高兴地说：

“你们和10万民工同志们都辛苦了！你们是在艰苦的条件下进行施工，这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很好嘛，工程的进度也不错嘛。”

工程负责人在匆忙中还要请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为水库题词。毛泽东欣然命笔，一连写了五六幅“十三陵水库”，并从中选择了他最满意的一幅作为定稿。

刘少奇写的是“劳动万岁”；周恩来写的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朱德写的是“移山造海，众志成城”。

下午5点30分，毛泽东一行人离开工棚，在大家的陪同下，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参加劳动。毛泽东奋力挥动铁锨，一锨一锨地往筐里装土。身边的年轻人劝他说：

“主席，这活我们多干，你指挥就行了。”

毛泽东说：

“今天我不当领导，要做普通劳动者。”

在众人的一再劝说下，毛泽东才放下手中的铁锨。一名叫余秉森的解放军战士，马上用自己的衣服把这张铁锨包了起来。他激动地说：

“看到这张铁锨，我们就想起了毛主席。这样，我们的干劲就会更大。”

欲知毛泽东此后有何重要活动，请诸君慢慢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58年5月20日八大二次会议讲话所说的插红旗还是插白旗的那些话，是指应该在政治思想上占领各个领域、各个地方，不给有右倾思想的人留有任何空间。而不是要那些领导人到各地去插红旗、插白旗，这是显而易见的。可是在八届二次会议结束以后，不少领导人回到地方，立马搞起了一个插红旗、拔白旗运动。河南一些地方就是这样，搞得群众很紧张。这样的歪嘴和尚念经，害人又害己，岂不是蠢而又蠢么？

**第52章**

“**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的干工业，干农业，**

**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

**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

话说1958年5月25日，彭真将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高潮》送毛泽东阅，说明最早使用“跃进”一词自此始。

5月26日上午，毛泽东重阅《人民日报》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高潮》后，写出了一个党内批示，他写道：

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和参加这次会议的其他同志：

重看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觉得有味，主题明确，气度从容，分析正确，任务清楚。以“跃进”一词代替“冒进”一词从此篇起。两词是对立的。自从“跃进”这个口号提出以后，反冒进论者闭口无言了。“冒进”可反（冒进即左倾机会主义的代名词），当然可以振振有词。跃进呢？那就不同，不好反了。要反那就立刻把自己抛到一个很不光彩的地位上去了。**此文发表时，我们一些人在莫斯科，是国内同志主持的，其功不在禹下。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与发明这个伟大口号（即“跃进”）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

毛泽东 5月26日上午7时

这一天，在毛泽东发出这封信后，彭真又把周恩来在全国一届人大四次会议（1957年6月26日至7月15日）上作的报告送给毛泽东，并在上面附言：

“主席：‘跃进’一词，在这个报告中已用了。”

5月26日晚，周恩来致信毛泽东说：

“去年政府工作报告有两处提到了1956年建设是跃进的发展，我又将这个报告读了一次，觉得我当时的中心思想是维护社会主义，反击右派，从建设的实绩上，肯定了1956年的建设是跃进的发展，抛弃了对1956年建设是‘冒进’的错误估计。但是，**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反‘冒进’是方针性的错误，因而也就没有认识多快好省的方针和农业纲要四十条可以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使其成为由量到质的跃进。”**

5月26日，谭震林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上写道：

“已遵示，找了李宝森等3同志开了一个座谈会，他们反映的问题基本上是对的。山东省每人平均口粮360斤，少数山区是200多斤，一般说是够吃的。去冬以来，劳动强度增加，有一部分人不够吃，这是全国的现象。”

谭震林在报告中还提出了解决好粮食问题的要求和办法。

5月27日凌晨，毛泽东将谭震林附有李宝森等3人写的调查材料的报告，批送给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

即送小平同志，即刻印发到会各同志。粮食问题，请各同志注意。

毛泽东 5月27日上午2时

5月29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讲到了1957年反右前的情况，他说：

“我这个人就是常常有忧愁，特别是去年5月底右派进攻，我就在床上吃饭，办公，一天看那些材料，尽是骂我们的。”

1958年6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创刊。

此前，毛泽东为《红旗》杂志题写了刊名。他一共写了4幅，在其中的一幅旁边用小字作了注：“这种写法是从红绸舞来的，画红旗。”后来《红旗》杂志采用的就是毛泽东作注的这一幅字。

《红旗》杂志在第一期上发表了毛泽东4月15日写的《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

6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协作区工作的决定》。决定将全国划分为东北、华北、华东、华南、华中、西南、西北7个协作区，每个协作区成立协作区委员会，作为协作区的领导机构。决定要求各个协作区“根据各个经济区域的资源等条件，按照全国统一的规划，尽快地分别建立大型的工业骨干和经济中心，形成若干个具有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的经济区域。”

6月初的一天上午，王鹤滨从苏联留学回国。他安排好工作后和即将在北京医学院毕业的爱人叶阿莉（叶丹）一起去中南海看望毛泽东。毛泽东留他们在办公室南侧的过厅里共进午餐，他举起一小杯葡萄酒说：

“祝你们学习胜利！”

王鹤滨和叶阿莉马上站起身，双手举起酒杯和毛泽东碰杯，说：

“祝毛主席身体健康！”

毛泽东一边吃着饭，一边微笑着问王鹤滨：

“王医生，你在苏联看到些什么新闻呀？”

王鹤滨说：

“苏联人民对中国，对我们留学生都非常友好，我们回国时，他们都恋恋不舍。可是，苏联领导人在人民群众中则没有威信，大学生们给赫鲁晓夫起了个外号，叫他玉米棒子。”

毛泽东很感兴趣，笑着问：

“为什么叫他玉米棒子呀？”

王鹤滨说：

“赫鲁晓夫去了美国访问，在美国看到了美国人种玉米的好处，他认为找到了发展农业的道路，回国后便在苏联推广种植玉米。可是，因为苏联的多数农业区气温偏低，无霜期短，天寒地冷，致使许多地方的玉米成熟不了，只好做了青饲料。副食品商店里到处都在卖冻嫩玉米棒子，报纸上还宣传说，煮玉米如何如何好。所以，每当赫鲁晓夫发表广播演说时，大学生们就带着讽刺的口吻喊：‘听啊！玉米棒子又讲话了。’嘲弄他在农业上的失败。”

毛泽东两眼一直注视着王鹤滨，很认真地听着。待王鹤滨讲完了，他说：

“他赫鲁晓夫也搞瞎指挥。还有什么新闻？”

王鹤滨说：

“苏联的重工业发展很快，尤其是军事力量增强了。但是轻工业和农业没有得到重视，群众很喜欢中国的轻工业产品，如毛衣、保温瓶。另外，苏联的高级知识分子，如专家、教授、院长，政府的高级官员，薪金高，可以排队买汽车，住房也宽绰，而且在风景区都有别墅，与一般的工人、农民、基层职工，包括一般的工程师、医生，差别很大。工人居住的条件很差，住房紧张。我到一个工人的家里看一位病人，是随着一位苏联医生去的，见一间只有四五十平方米的大房间里，住着3家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每个房角住一家，占去了3个房角，只有临门的那个房角没有住人。每家用一块布挂在床前床侧遮掩，下面可以看到床腿，上面可以看到站在床上穿衣的成年人的胸部。**我曾经问过一个打扫集体宿舍的清洁女工：‘你们为什么对自己国家的领导人那么不尊重呢？’这个女工说：‘你说的是赫鲁晓夫他们吧，那些人是资产阶级！’**”

毛泽东听得津津有味，问：

“还有吗？”

王鹤滨说：

“苏联党的组织生活很松散，不如我们抓得紧。他们党员的组织生活仿佛是俱乐部一样，只要不丢失党证，就算是党员。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不高，年轻人大多数不愿意入党，党内的保密很差，苏共中央一开会，内容很快就在群众中传开了。”

毛泽东又问：

“还有吗？”

王鹤滨说：

**“苏联人民对我们的《人民日报》社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分别在1956年4月5日、12月29日发表——笔者注）**很感兴趣，认为是撑了他们的腰，在大街上见到我们中国人就伸出大拇指头来。”**

毛泽东带着轻蔑和气愤的口气说：

“赫鲁晓夫这个人是很蠢的，中苏论战开始之后，我曾向他打过招呼，请他退到二线作幕后指挥，不要亲自赤膊上阵与我们对骂，以后也好有个转弯的余地，他不听！”

毛泽东有点激动了，饭菜也停止吃了，说：

“赫鲁晓夫曾经向我们提出，要在中国开辟一块地方，由他们办水果园。我对他们说了，你们要想吃水果，可以花钱来买嘛！通过国家的贸易渠道来解决。中国的水果多得很，卖给你们就是了。”

说罢，他这才又将饭菜送进嘴里。正在这时，陈伯达来了，说是请毛泽东去开会。毛泽东兴奋地说：

“伯达同志，你也来听听王医生讲的苏联的情况。”

陈伯达白了王鹤滨一眼，看了看手表，对毛泽东说：

“与会人员都到齐了。”

毛泽东赶紧又吃了两口饭，一边嚼着，一边站了起来，用手示意江青招呼王鹤滨等人继续吃饭，他要开会去了。

6月7日，毛泽东就苏联请求在中国建立用于潜艇舰队海上通讯的长波发报无线电中心，和一座远程通讯特种收报无线电中心问题，做出了批示，他在这一批示中写道：

“钱一定要由中国出，不能由苏方出。使用共同。”“如苏方以高压加人，则不要回答，拖一时期再说。或者中央谈一下再答复。此事须由两国政府签订协定。”

原来早在1958年4月18日，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在赫鲁晓夫的授意下，致函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提出在中国建立用于潜艇舰队海上通讯的长波发报无线电中心和一座远程通讯特种收报无线电中心，所需费用1亿卢布，苏联出费用7000万卢布，中国出3000万卢布，建成后，归苏联控制。这种要求和条件自然是毛泽东所绝对不能接受的。

6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小组的通知》。通知中说：这些小组直属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各小组组长是：财经小组陈云，政法小组彭真，外事小组陈毅，科学小组聂荣臻，文教小组陆定一。

6月12日，彭德怀奉毛泽东之命，就苏联4月18日来函复电马利诺夫斯基说，中共中央讨论了苏联在中国建立用于潜艇舰队海上通讯的长波发报无线电中心和一座远程通讯特种收报无线电中心问题，我们认为，既然苏联认为有必要，我们同意建设长波电台，一切费用由中国负担，可以共同使用，但所有权归中国，否则政治上不好。

此后，苏方又致函中国，提出全部费用由苏方负担，所有权归苏联所有。这依然是严重侵犯中国主权的问题，毛泽东坚决不让步。

**6月14日，刘少奇在同全国妇联党组负责人谈话时，谈到了妇女解放问题，建议普遍建立公共食堂。他举了一个例子，说：**

**“河南有一个农业社，有500多户人家，其中200多户搞公共食堂，家庭不再作饭了。组织起来之后，出工人数增加了三分之一，从前200多人作饭，现在只要40多人作饭，而且还吃得饱些，好些，还节省了粮食。”**

他并且预言道：

**“到将来，我们到共产主义不要多远，15年可以赶上美国，再有15年，等于三、四个美国。再有40年、50年中国可以进入共产主义。”**

刘少奇还说：

“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想法，在那时没有实现的条件。现在，马克思主义者抓住了阶级斗争，已经消灭阶级或正在消灭阶级的过程中，这样，把空想社会主义者不能实现的空想实现了。”

6月14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河南省封丘县应举农业社社长崔希彦、内务部农村救济司司长熊天荆、河南省民政厅厅长施德生、封丘县县长张剑南。毛泽东首先问封丘县县长张剑南：

“应举社的那篇报告是谁写的？”

张剑南回答说：

“是中共封丘县委第一书记韩洪绪同志写的。”

“那篇报告写得很好。”毛泽东又问：“韩洪绪同志读了多少书？”

张剑南说：

“战前在高小毕业。”

毛泽东称赞说：

“不容易，不容易，高小程度就能写出这样好的报告，真不容易！”

他又问了韩洪绪工作的情况，张剑南都一一作了介绍。毛泽东问崔希彦：

“你们的合作社，为什么叫应举社？”

崔希彦回答说：

“我们村里过去出了一名文举，这个举人，同一般的举人不一样，他不剥削人，靠自力更生维持生活。我们的合作社也是依靠自力更生进行生产渡荒的，所以就叫应举社。”

“很有意思！”毛泽东听了笑了起来，又说：“你们过去是一个穷社，经过几年的努力就改变了面貌，再过几年你们还会更好！”

崔希彦：

“这些成绩都是由于有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才取得的。我们合作社的每一个人都非常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

毛泽东摇摇手说：

“不，不，这是由于你们合作社全体社员的努力，才取得了这样大的成绩。全国的事情要办好，就要依靠全国六亿人民的努力。”

他又问：

“应举社的小麦每亩收了多少斤？”

崔希彦告诉毛泽东说，应举社今年小麦每亩估计有150斤，全年计划平均每亩产粮800斤。毛泽东说：

“你们计划每亩产800斤，小麦每亩只能收150斤，还有600多斤，今年是不是有把握实现亩产800斤？”

崔希彦回答说：

“完全有把握，而且争取超过。”

毛泽东问：

“都有哪些保证增产的有利条件？”

崔希彦回答说：

“第一，我们合作社已经实现水利化；第二，今年积肥大量增加；第三，把低产作物改为高产作物；第四，我们合作社的每一个人干劲都很大；第五，毛主席前不久在《红旗》杂志上向全国人民介绍了我们的社，今天毛主席又亲自接见我们，给了我们宝贵的指示，我们回去一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就会变成我们增产的力量，全体社员的干劲就会更大，产量就会更提高。”

毛泽东说：

“好哇！你们这5条都很对呀！不要很久，全国人民每年就可以平均有粮食1000斤，再过一段时间，每人每年要平均有1500斤，这样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就会大大提高。”

他燃着一支香烟，亲切地对崔希彦说：

“要戒骄戒躁，干部和群众要紧密地团结，要把红旗永远插在你们社里，让红旗越插越高。”

崔希彦说：

“我们一定要牢牢记住毛主席的话，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作。”

毛泽东又问他：

“你们合作社的交通方便不方便？”

崔希彦说：

“交通很方便，在新乡下火车以后，有汽车直通我们的合作社，周围的公路也四通八达。”

“很好，很好。”毛泽东说罢，转向内务部农村救济司司长熊天荆、河南省民政厅厅长施德生，谈起了民政工作。熊天荆和施德生把民政工作的内容一一讲给他听，共有20多种。毛泽东问：

“这么多，能做完吗？”

施德生说：

“在省里，除这些工作外，党交给我们的其它工作，我们同样是完成的。”

熊天荆说：

“过去有人提意见，说民政工作头绪多，不好做。谢觉哉部长批判了这种意见，他说，民政工作就是做人的工作，别的部门不管的事情，我们都要管起来。”

毛泽东问：

“你的意见呢？”

熊天荆说：

“我同意谢部长的意见，只要是党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就应该努力去完成。”

毛泽东高兴地说：

“对了，民政工作就是做人的工作，不要怕麻烦。”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留崔希彦等人一起共进晚餐。这顿饭菜很简单，毛泽东很少吃菜，他吃的是一种比青豆角还细的小辣椒和一盘苦瓜，饭也是极普通的粗米饭。

送走崔希彦等，毛泽东坐在沙发上翻看这一天的《人民日报》，上面刊登有周谷城的一篇文章，题目叫《六论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略答马特》，内容是针对《人民日报》4月15日发表的马特的《关于逻辑问题的讨论》一文进一步展开讨论的。毛泽东读了很感兴趣，他马上让工作人员用长途电话通知上海的周谷城，请他来北京谈话。

6月16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召开会议，讨论外交问题。参加会议的除政治局常委和部分政治局委员外，还有外交部负责人和部分驻外大使。毛泽东说：

“和美国接触的问题，在日内瓦会议时我也说过，可以有所接触。事实上美国也不一定愿意接触。**同美国闹成僵局20年，对我们有利。一定要美国梳妆打扮后送上门来，使他们对中国感到出乎意外。你不承认，总有一天你会承认的。**101年你一定会承认的。”

6月17日，毛泽东将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报送的“二五”计划要点报告批给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印发。

李富春在计划要点报告中提出，第2个“五年计划”的任务是：提前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建成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5年超过英国，10年赶上美国；大大推进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为在10年内赶上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水平打下基础。

毛泽东在批语中写道：

此件即刻印发军委会议各同志。很好一个文件，值得认真一读，可以大开眼界。这是你们自己的事情。没有现代化工业，哪有现代化国防？**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的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经济战线上如此，军事战线上也完全应当如此。**反对这条路线的人们如果不能说服我们，他们就应当接受这条路线。“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绝物也”，走进死胡同，请问有什么出路呢？**

毛泽东 1958年6月17日

6月17日晚，周谷城应邀来到菊香书屋，毛泽东一见他就说：

“问题移到了《人民日报》上，讨论可能展开。”

周谷城说：

“我把形式逻辑与辩证法连在一块儿讲，却又把它们严格划分，恐怕不易有人信。”

毛泽东挥了一下手，用夹杂着英语的话风趣地说：

“formallogic本来就是formal的，要把它同辩证法混同，甚至改成辩证法，是不可能的。它是一门独立学问，大家都要学一学。”

周谷城见毛泽东如此说，连连点头，便倡议道：

“对，中学高年班、大学初年班学一点是很好的。只怕教得不得法，学不到手。”

毛泽东对此表示赞同，他说：

“懂不懂，当然也有人感觉是个问题。但入了门，学了一点，自己在生活实践中要用，总会搞通的。”

6月19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召集了一次会议，讨论钢产量问题。

关于这次会议的情况，陈云在不久后的8月21日是这样说的：“6月19号晚上开各大区协作会议以前，主席在北京游泳池召集中央一些同志，王鹤寿也参加了。主席问他，去年是五百三，今年可不可以翻一番？王鹤寿说，好吧！布置一下看。第二天他就布置了。所以，是6月19号才决定搞一千一。”

6月2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说：

“**我还是希望搞一点海军，空军搞得强一点。还有那个原子弹，听说就这么大一个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我们就搞一点。**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10年功夫是完全可能的。**一年不是抓一次，也不是抓两次，也不是抓4次，而是抓它七八次。”

6月22日，毛泽东将中央冶金部党组6月21日关于华东协作区产钢计划的报告及冶金部关于1962年主要冶金产品的规划批给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印发。

冶金部在这一报告中说，华东协作区（不包括山东）将在1958年产钢400万吨，1959年为800万吨。

毛泽东在批语中写道：

“只要1962年达到6000万吨钢，超过美国就不难了。”

毛泽东又将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6月17日的报告批给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印发。

薄一波在报告中说：1959年我国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除电力外，都将超过英国的生产水平。

毛泽东将报告的题目改成一个十分醒目的标题：《两年超过英国》，并在批语中写道：

“超过英国，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要两年到3年，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1959年达到2500万吨，我们就钢的产量上超过英国了。”

接着，毛泽东还将农业部6月11日的报告批给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印发。他把题目改为《农业大有希望》，并在批语中写道：

**“粮食、钢铁、机械是3件最重要的事。有了这3件，别的也就会有了。3件中，粮食及其它农产品是第一件重要的事，我们应当十分注意农业问题。”**

6月23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小组长座谈会上讲话说：

“十大军事原则，是根据十年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初期的经验，在解放战争进入反攻时期提出来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运用十大原则，取得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当然还有其他原因）。十大原则目前还可以用，今后有许多地方还可以用。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停止的，是向前发展的，十大原则也要根据今后战争的实际情况，加以补充和发展，有的可能要修正。”

6月24日，毛泽东在转发青海省委关于平叛问题报告的批语中写道：

“西藏要准备对付那里的可能的全局叛乱。乱子越大越好。**只要西藏反动派敢于发动全局叛乱，那里的劳动人民就可以早日获得解放，毫无疑义。**”

6月28日，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议小组长座谈会上说：

“海军发展值得研究，……我们要和外国做生意，需要远洋船只，还可造军舰、飞机。我们东边有日本、冲绳、菲律宾，假使敌人在北京、上海扔了原子弹，我们也得报复，要考虑积极防御，也要考虑打垮敌人后的追击问题。还要考虑到抗美援朝问题。目前太平洋实际上是不太平的，将来为我们管了，才算是太平洋。”

6月29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小组长座谈会上讲话说：

“军队训练已经8年多了，连一本战斗条令都没有搞出来，这次要集中一些有丰富工作经验和战斗经验的同志，搞出一本自己的战斗条令来。”

1958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诞生37周年的日子。这天凌晨，毛泽东放下手头的工作，准备休息了。他照例要浏览一下全国各地的主要报纸。6月30日的《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一篇通讯，题目是：《第一面红旗——记江西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的经过》。毛泽东读了这篇通讯，激动得睡意全无，诗兴大发。卫士封耀松看着他全部精力集中在报纸上，嘴里蠕动着，念念有词，发出一串串绵长而又抑扬顿挫的哼哼声，头也不时地轻晃几下。时间长了，封耀松便有些疑惑。只见毛泽东两手伸开报纸，可眼睛并未在报上浏览，他那沉思的目光始终对着一个位置。封耀松觉得奇怪，莫非出了什么大事？他悄悄凑近张望了一下，见那两版上既没有套红，又没有大块黑体字，全是一些“豆腐块”文章啊。此时的毛泽东似乎还不想睡，他将报纸折成两折，起身踱到窗前。东方天际已经露出了鱼白色，毛泽东深吸了一口气，又踱回桌旁的藤椅上坐下来，抬起手中的报纸看，很快又站起来，走到床边，躺下去，上身倚着靠枕，眼望天花板，不久又起来踱步。他显得很激动，时时舒口长气。一会儿，他又回到床上，半躺半坐，又拿起那张报纸看，还要封耀松拿纸笔来。封耀松递给他一张稿纸，一支铅笔。毛泽东将报纸垫在稿纸下边，哼哼两声，便动笔了，可是刚写了四五个字，就划掉了，摇着头又哼，哼过又写。封耀松从未见过他这个模样，大为诧异，却又听不出他哼哼的是些什么。

毛泽东就这样写了涂，涂了哼，哼了又写，涂涂写写，哼来哼去，精神越来越旺盛。封耀松终于听清了两句：“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这才知道他在作诗，心想，今天是党的生日，还有重要会议等着您去参加呢，便提醒说：

“主席，你哼哼啥呀？天快亮了，你还要开会呢！”

“睡不着啊！”毛泽东拿开稿纸，指着报纸说：“**余江人民消灭了血吸虫病，不容易呀，真是天大的好事啊！我看了高兴啊！全国所有的疫区如果都这样那该多好啊！别小看这种小虫子，可害人哩。”**

说罢，他继续涂涂写写，前后用了两个多小时，终于写就了七律二首：《送瘟神》，并在前面写了一个小序。他放下铅笔，轻轻一拍大腿，说：

“小封哪，你听听怎么样——绿水青山枉自多……”

封耀松文化水平不高，实在懂不了多少，但他听毛泽东念诗，总觉得有一种说不出的美感，就诚心诚意地说：

“真好，太好了！”

毛泽东两眼闪闪发光，也高兴地说：

**“告诉你吧，是我们的人民公社好，太好了！”**

他接着给胡乔木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睡不着觉，写了两首宣传诗，为消灭血吸虫病而作。请你同人民日报文艺组同志商量一下，看可用否？如有修改，请告诉我。如可以用，请在明天或后天人民日报上发表，不使冷气。消灭血吸虫是一场恶战。”

后来，因为毛泽东对这两首诗又做了反复修改，所以就没有按时发表。1958年10月3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发表了《送瘟神二首》：

读 6月30日《人民日报》，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

其一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其二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忆神州尽舜尧。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人民日报》同时在第8版刊登了毛泽东关于这两首诗的手迹。

再说7月1日这一天，《红旗》杂志第3期发表了题目为《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这篇重头文章。

原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曾经设想将农村的乡、社两级合而为一，工农商学兵什么都管，使之将来成为共产主义社会的雏形。本来，毛泽东的这个意见，只是一个伟大的浪漫主义者的初步构思，并未形成为一个成熟的意见；也没有提交到中共中央会议上去讨论的意思。可是陈伯达听风就是雨，立即撰写了这篇文章，竟然擅自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这篇文章首次宣称：**中国已经找到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道路**。并明确地提出**“把一个合作社变成一个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的基层组织单位，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

这一天，陈伯达又跑到北京大学,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37周年大会上,发表了题为《在毛泽东的旗帜下》的讲演，再次透露了**毛泽东构想的公社思想**。他说:

“**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农、商、学、兵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

7月1日，毛泽东办公室工作人员持函来到北京图书馆，为毛泽东及他的秘书张经武、田家英3人办理借书证。

原来，北京图书馆决定在1958年夏季换发新借书证，毛泽东知道后，便叫秘书也给他办一个。秘书说：

“您要借书，写个条子叫人家送来不就行了，干嘛非要办借书证呀？”

毛泽东听了很不高兴，严肃地说：

“正因为我的身份不同，所以更要按规矩办事，不能搞特殊。”

秘书见毛泽东这样认真，只得派工作人员来到北京图书馆，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严格履行办证手续，交纳工本费4角5分。他们还说，以后将由专人来借还图书。图书馆职工十分高兴，他们特意把毛泽东的借书证编为第一号。

北京图书馆领导人由此受到启发，他们决定为纪念建党37周年，专门成立了一个由高级人员组成的特别小组，为中央其他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人也办理了借书证。

7月2日，刘少奇在同北京石景山发电厂的工人座谈时说：

“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2年3年就行了，明年后年要超过英国。这不是假的。钢铁、煤炭明年就可以超过，电要慢点，多几年，大概5年，5年不行，7年，其它大都是2年3年。1**5年是超过美国的问题。其实也用不了15年，7、8年就行了。**……中国人口等于3个苏联，4个美国。美国就是多几吨钢和其它工业产品。**15年我们要赶过整个欧洲（包括苏联）。**欧洲共6亿人口，和我们一样，面积也差不多。欧洲几十个国家，不互相帮助，我们几十个省可以互相支援。**发挥地方积极性，15年许多省要超过一个国家，河北要超过英国，河南要超过法国，再一个超意大利，再一个超西德**……我们大有希望，前途好得很！”

7月2日下午4点25分，天气特别热，毛泽东游泳后上了岸，张木奇帮助他擦身子。毛泽东问道：

“听说河北最近旱了？”

张木奇说：

“旱得厉害。”

“前几天不是下雨了吗？”

“零星小雨，不顶事。”

毛泽东望着耀眼的天空，皱起眉头，说：

“雨总是要下的嘛。今天不下，明天不下，一个星期再不下透雨，老天爷就该罢官了！”

张木奇后来回忆起此事，仍然不解地说：“你说神不神？今天不下，明天不下，7月6号一声雷响，把我从床上震起来。好么，整个华北地区下了一场透雨。老天爷也怕毛主席罢他的官呐！”

其实，这件事很简单很正常，物极必反，久旱必雨，只不过是一个偶然的巧合罢了。

7月3日晨，毛泽东在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赵紫阳6月8日给广东省委的信上写了一个批语，全文如下：

广东省委书记赵紫阳同志最近率领北路检查团到从化县，经4天工作，给省委写了一封信，提出了3个问题：一、对早造（即早稻，又叫上造——笔者注）生产的看法问题；二、群众路线问题；三、大字报问题。这些都是全国带普遍性的重要问题，值得一切从中央到基层的领导同志们认真一阅。红旗半月刊应当多登这样的通信。这封信的风格脱去了知识分子腔，使人高兴看下去。近来的文章和新闻报导，知识分子腔还是不少，需要改造。这封信在广东党内刊物上发表，由新华通讯社当作一份党内文件发到北京的。其实，这类通讯或文章，完全可以公开发表，无论对当地同志和全党同志都有极大好处。我同意赵紫阳同志的意见，早造每亩能收300斤已经很好，比去年的200斤增长50%，何况还有350-400斤的希望。原先的800斤指标是高了，肥料和深耕两个条件跟不上去。这是由于缺乏经验，下半年他们就有经验了。对于这件事，从化的同志们感到难受，这种难受将促使他们取得经验，他们一定会大进一步。群众路线问题，仍然是一个值得全党注意的问题。其办法是从全省各县、全县各乡中，经过鉴定，划分为对于群众路线执行得很好的，执行得不很好也不很坏处于中间状态的和执行得很坏的这样3大类，加以比较，引导第二、第三两类都向第一类看齐，到第一类县乡去开现场会议，可以逐步地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不但农村有，城市也有，故是全党性的问题，仍然需要采取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方法去解决。

毛泽东 1958年7月3日

接着，他又给邓小平等人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小平、彭真、震林、伯达同志：

你们看这封信是否可以发表？我看发表毫无害处。请伯达打电话给广东省委，问一下这封信是否已在党内刊物上发表，或者是用单个文件发到各县，或者并没有发去？再则告诉他们，我们拟在红旗上发表，他们意见如何？以其结果告我为盼！

毛泽东 7月3日上午7时

7月6日晚，毛泽东约周谷城谈话，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三四点钟。在告别时，毛泽东勉励周谷城为繁荣学术而努力工作，他说：

“我建议你最好把西方哲学史上哲学家所讲的逻辑，每一个人的，都给写一篇或几篇说明介绍的文章，从古到今，来它个系统地叙述。把所有的逻辑书，不论是新的旧的，过去的现在的，一律搜齐，印成大部丛书，在前面写几句按语式的话，作为导言。”

周谷城当即表示说：

“鼓起干劲，力争上游。”

毛泽东说：

“干劲要鼓足喏！”

周谷城遂将“起”字改为“足”，又重复了一遍说：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

1958年7月的一天，海政歌剧团的刘芙蓉在周末舞会上见到了毛泽东。舞间休息时，刘芙蓉见毛泽东抽烟抽得很凶，一支接一支，就说：

“主席，听说烟里有尼古丁呢！”

“嗯。”毛泽东不在意，又猛吸一口。刘芙蓉又说：

“那，对肺可不好呀，您别抽了，好吗？”

“哈哈哈……”毛泽东收住笑，说：“你这个小鬼头是别有用心呐，我这烟可抽了几十年啦，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嘛。戒不了，戒不了，这辈子戒不了啰！”

也是在这7月初的一天，毛泽东的大女儿李敏第一次把男朋友孔令华领回到菊香书屋。

此前，李敏在寒假到上海时，曾经对妈妈提起过这事。贺子珍说：

“你要跟爸爸商量，他同意的我也同意。”

李敏回到北京后，并没有马上把妈妈的话告诉爸爸，后来时间长了，她也就给忘了。临到快要放暑假了，李敏在一个周末回到家里，才给爸爸讲了她和同学孔令华谈恋爱的事情。毛泽东一听说女儿在恋爱，就关切地问道：

“小孔的父亲是哪个？在哪里工作？”

“这，这，我没有问过。他也没有说过。”

李敏为难地如实回答。毛泽东微笑着说：

“家长干什么你都不知道，怎么跟他交朋友呢？”

“我是跟他交朋友，了解家长干嘛？”

李敏有点不理解。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

“还是要问一问。了解情况嘛！”

此时的孔令华同样也受到了父亲的责备。当他将和李敏谈恋爱的事告诉爸爸孔从洲的时候，孔从洲立即责备儿子说：

“你和毛主席的女儿恋爱，这么大的事情，怎么不事先告诉我们呢？”

孔令华说：

“她姓李叫李敏，我怎么知道她是毛主席的女儿？何况她回家坐的是公共汽车，生活上平平常常，没有什么特殊，更不清楚她的家庭背景。现在关系明确了，知道了这层关系也就告诉你们了。”

后来，李敏见到孔令华，把爸爸的意思告诉了他，两个人都笑了。孔令华就把自己家里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李敏。李敏可记不了那么多，回家就把大概情况告诉了爸爸。毛泽东笑着说：

“噢，小孔的父亲是孔从洲将军。我熟悉，我熟悉。”

“那您……您同意嘛？”

李敏小声问，毛泽东微笑着说：

“好，好。”

再说这一天，毛泽东见孔令华来了，就放下手中的书，示意让两个孩子坐在他身旁。服务员端上茶，就退出去了。毛泽东上下打量着孔令华。孔令华第一次见毛泽东，本来就有些紧张，让毛泽东这么一看，看得他更不自在了。毛泽东看过来，看过去，又扭过头看看自己的女儿，笑了。李敏也会心地笑了。在毛泽东眼里，自己的娇娃是个漂亮的女儿，当然会找一个帅气、漂亮的男友啦！孔令华很帅气，也很漂亮，但似乎眼睛让人觉得小了点。毛泽东这一笑，就像老师改考卷一样：答案全对了，如果字再写得漂亮点，就是十全十美了。

这个暑假，李敏高中已经毕业，马上就要升大学了。江青为了让孔令华帮助李敏复习功课，准备升学考试，让孔令华第一次住进了中南海，住在毛泽东的书房里。毛泽东关照他们，既要好好复习功课，又要注意身体，要劳逸结合，不要为了升学搞垮身体。江青也对孔令华说：

“以后你就是我们家的孩子，跟他们都一样。”

不久，在高考结束之后，李敏被保送到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学习。毛泽东对李敏说：

“你们的事，是个大事，我同意了，还要征得你妈妈的同意。如果你妈妈没得意见，你就跟小孔去见他的父母。俗话说，丑媳妇也要见公婆哩！我的娇娃不丑，更要见公婆。”

于是，李敏就和孔令华乘车到了南昌，把爸爸的话原原本本转告了妈妈。贺子珍说：

“你爸爸同意，我也同意。”

李敏在妈妈那里住了几天，贺子珍尽管舍不得让女儿走，但她知道毛泽东已经为女儿安排了行程，就让他们尽快乘车到沈阳去了。

沈阳高级炮校校长孔从洲和夫人高高兴兴地接待了李敏，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关心她，爱护她。

欲知毛泽东大女儿的婚事如何办理？待以后慢慢向读者诸君交代。

东方翁曰：**关于在农业合作化和社会主义建设方面“跃进”一词的发明权**（在其它领域，毛泽东早就多次使用过“跃进”一词）问题，除了本传叙述的毛泽东1957年11月13日在苏联时看《人民日报》社论的资料外，还有4种不同的说法：

一是李银桥回忆说，“在总路线通过后，有一次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接待客人后回菊香书屋。一位中央负责同志和毛泽东一道走着的时候，说：‘主席，**现在谭震林他们提出个大跃进口号**，我看这个提法很好。’然后又补充说：‘《人民日报》上登了。’毛泽东说：‘拿来给我看看。’于是那位负责同志把报纸找来，请毛泽东看。毛泽东认真看了一遍，点点头说：‘嗯，这个提法很好’。”

二是本章前面提到的毛泽东重读《人民日报》社论及批示，此条记载在《毛泽东年谱》中：1958年5月25日，彭真将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高潮》送毛泽东阅，说明最早使用“跃进”一词自此始。第二天上午，毛泽东重阅此社论后，写信给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和参加这次会议的其他同志：“重看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觉得有味，主题明确，气度从容，分析正确，任务清楚。以‘跃进’一词代替‘冒进’一词从此篇起。两词是对立的。自从‘跃进’这个口号提出以后，反冒进论者闭口无言了”。他在信中还写道，“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与发明这个伟大口号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

三是本章开头部分提到的在毛泽东发出这封信的当天，彭真又把周恩来在全国一届人大四次会议（1957年6月26日至7月15日）上作的报告送给毛泽东，并在上面附言：“主席：‘跃进’一词，在这个报告中已用了。”还有《周恩来年谱》记载：“（1958年）5月26日晚，周恩来致信毛泽东，说去年政府工作报告有两处提到了1956年建设是跃进的发展，我又将这个报告读了一次，觉得我当时的中心思想是维护社会主义，反击右派，从建设的实绩上，肯定了1956年的建设是跃进的发展，抛弃了对1956年建设是‘冒进’的错误估计。但是，**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反‘冒进’是方针性的错误，因而也就没有认识多快好省的方针和农业纲要四十条可以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使其成为由量到质的跃进。**”

四则是薄一波在《领袖·元帅·战友》一书中记载的：“**（在总路线制定的过程中），周恩来还提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可以大跃进。他说，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可以跃进，我们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跃进**？有一次，毛主席见到我们，问我们大跃进是谁发明的？还风趣地说，要颁发奖章。总理笑了笑，没说话。”

在以上四个版本中，李银桥说和《毛泽东年谱》中重读社论说，除了地点不一样外，“跃进”一词出现的时间是一致的，即在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中，与本传原来的记载相同（请读者注意，“**大跃进**”一词首次问世则是在**1957年11月27日《人民日报》第二版《普遍讨论“四十条”推动生产大跃进》**一文中。而在三和四这两个版本中，不但“跃进”一词出现的时间提前了几个月，而且这一口号的发明者也成了周恩来。尽管有这样的差异，但却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跃进”一词不是毛泽东发明的；二是强调毛泽东批评周恩来反冒进批评错了。你看，周恩来不但不反冒进，反而早在《人民日报》社论发表之前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已经提出了“跃进”的口号！诸君：政府工作报告可是有据可查的重要文件，由此看来，后人便没有必要去考证四个版本的差异了，历史还真的应该给周恩来记上一功呢！

另：毛泽东在1958年6月与留苏毕业归国后的王鹤滨的一段对话，很值得一读。在这段对话中，毛泽东4次提问，特别是他那两句像小孩子提问似的“还有吗？还有吗”的话语和神态，表明了他对了解苏联的真实状况是多么的渴望。而王鹤滨的报告也正是毛泽东急切需要知道的重要情报。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毛泽东为什么会在中国提出防修反修这一个继续革命的重大课题了，也不难理解在建国70多年后的强大的苏联为什么会一朝土崩瓦解了。君知否？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苏联和东欧的剧变，是一个多么值得人们深思的沉痛教训啊！

**第53章**

**“1949年中国解放，我是很高兴的，但是，觉得中国问题还没**

**有完全解决，因为中国很落后，很穷，一穷二白。以后对工商**

**业的改造，对抗美援朝的胜利，又愉快又不愉快。只有这次大**

**跃进，我才完全愉快了。按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中国人民的**

**幸福生活完全有指望了。”**

话说1958年7月12日，毛泽东会见了黑非洲青年代表团，他在谈话中说：

“欢迎你们来，非洲的朋友来得很少。我们都是亚非国家，参加万隆会议的国家。我们亚洲、非洲，还有拉丁美洲，这3个地区过去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非洲同亚洲离得非常近，中间只有一条小水，苏伊士运河，一脚就跨过去了。**

**世界是被压迫人民的，压迫者是没有前途的。**西方帝国主义者是压迫人民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也有当地的压迫者，例如土耳其的政府就不是高明的，黎巴嫩的政府也不高明，中国有个蒋介石也不是好人，日本也有坏人。不过压迫者是少数，好人还是占多数的，这是9个指头同1个指头的问题。就是西方的国家里好人也占多数，法国也是好人占多数，压迫者占少数。**少数的压迫者是害怕9个指头的好人去反对他1个指头的坏人的。**

人民与统治者有区别，这一点很重要，这要经过几十年甚至100年的观察才能分别清楚。我们受帝国主义压迫100多年，才认识到这一点。过去好几十年中，中国人认为凡是外国人都是坏的。你们认识到这一点很不容易，要认识到这一点，才能取得胜利。你们认识到了这一点，你们就是接近胜利了。大多数民族是被压迫民族，少数是压迫人的。

西方帝国主义者自以为是文明的，说被压迫者是野蛮的。可是我们没有占领别人的地方，非洲也没有占领过欧洲。是欧洲占领非洲，这就很文明了？欧洲不如非洲，它们占领别人的地方不是很野蛮吗？帝国主义占领我们中国，这就很野蛮。

我们中国过去、现在都没有占领别的国家，将来也不会去占领美国、英国作殖民地，所以我们始终是文明国家。你们也是如此。你们解放后也不会去占领法国、美国、英国、德国。它们喜欢说我们很脏，很不干净，很不卫生。我看也不见得，我们还干净一点。要有自信心，看不起欧美帝国主义，它们不算数。

帝国主义者长期以来散布他们是文明的、高尚的、卫生的。这一点在世界上还有影响，比如存在一种奴隶思想。我们也当过帝国主义的奴隶，当长久了，精神就受影响。现在我国有些人中还有这种精神影响，所以我们在全国人民中广泛宣传破除迷信。**过去中国人中有恐美病，要去掉它的影响。你们有没有人有恐法病？想必会有的，法国一直在宣传那些东西，总会有人跟着它走。我们要在人民中慢慢改掉这种思想。**

欢迎你们到中国各地走一走。中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国家，我们现在正在开始改造这种落后的面貌。过一个时期，我们的工厂会多一些。你们下一次来中国时，可以看看中国有什么进步没有。**解放了的人民是什么都可以创造出来的**。只要你们得到解放，你们也会什么都能创造出来的。刚才外交部长陈毅同志跟我说，摩洛哥向法国、英国买机器买不到，法国、英国不肯把工作母机卖给他们，摩洛哥要向中国买机器，他们很欢迎我们的机器。法国、英国、比利时离摩洛哥很近，但是不卖机器给他们。我们卖机器给他们。

一个国家获得解放后应该有自己的工业，轻工业、重工业都要发展，同时要发展农业、畜牧业，还要发展林业。森林是很宝贵的资源。中国解放后自己发展工业，自己制造机器。你们那些国家怎么样？有没有民族资本？自己能不能制造机器？

**我的著作，中国的情况，仅仅只能作你们的参考，你们办事要按照你们国家的实际情况。**当然中国的情况你们也可以看看，比如上海、北京就可以看看。但是，你们做事一定要根据你们国家自己的情况，一个民族有自己的历史，有自己的环境。在这方面，我们过去是吃过亏的，照搬外国，就是照搬苏联的经验，结果把南方的根据地几乎都丢掉了，只好长征，使革命受了很大损失。**马克思和列宁都曾说过，他们的理论仅仅是行动的指南，是指导方向的，不能当作教条。**但我们有些同志就是不懂得这一点，后来受了损失，吃了苦头，才明白了。长征中我们走了很多路，用两条腿走的，全部路程等于地球的轴心，从中国钻进去，从美国出来，有一万二千五百公里。那时我们犯了错误，蒋介石就逼着我们走这么多路，走到北方来了。这以后我们就得到了教训，知道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是应该相信的，但是要同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后来一结合就灵了，就打胜仗了。”

7月15日，美国政府派遣海军陆战队5000人，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附近登陆，并继续调运步兵和海军陆战队前往中东。同时宣布在远东的陆海空军进入戒备状态。

与此同时，盘踞在台湾的国民党蒋介石，也利用这种紧张的国际形势，依仗着和美国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做保护，以金门、马祖为基地，“加速进行反攻大陆的准备”，并不断对大陆进行骚扰和破坏。

从这一天开始，毛泽东连续两个下午召集会议，分析情况，研究对策。

7月17日，台湾当局下令陆海空三军处于特别戒备状态。金门、马祖与台湾国民党军队先后进行军事演习，同时，加强了空军对大陆的侦察。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各民主党派发表联合声明：要求惩罚蒋军。有的人还写信直截了当地发问：建国这么些年了，连大陆这么大的地方都解放了，近在咫尺的金门、马祖难道就解放不了吗？

毛泽东作为一个战略家，考虑的不是这么简单，他是把金门、马祖与台湾问题联系在一起来考虑的。一旦解放了金门、马祖、澎湖列岛，国民党军全部撤回台湾，台湾问题可能会复杂化。

7月17日下午，毛泽东召集会议，研究台海局势及对策。

7月18日下午，毛泽东召集会议，正式决定：为了反对美国侵略台湾、加剧远东紧张局势的阴谋，为了打击蒋介石的反攻政策，将实施炮击金门，摸一摸美国和蒋介石的底牌，看看他们那个《共同防御条约》到底有多大的效能，美国人对蒋介石的保护到底有多大的限度。

是日晚，毛泽东召集军事部门各有关单位负责人，对炮击金门做出明确指示。他说：

“**金门炮战，意在击美。**支援阿拉伯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不能仅限于道义上的，还要有实际行动的支援。**金门、马祖是中国领土，打金门、马祖，惩罚国民党军，是中国的内政，敌人找不到借口，但对美帝国主义有牵制作用。**”

这一次炮击金门，毛泽东仍然点了刚刚离任的福州军区司令员叶飞的将，由他到前线指挥。

中央军委连夜召开会议，决定调原志愿军空军司令员聂凤智任福州军区空军司令员，指挥大规模的空军转场入闽行动；调东海舰队副司令员彭德清到厦门，指挥海军舰艇部队及海军航空兵、海岸炮兵入闽。

7月中旬的东南沿海，正是台风季节，福州的所有部队、机关、学校一齐出动，帮助农民抢收粮食。

7月19日，正在郊区抢收一线的叶飞，突然接到通知，说是要他立即赶回福州，到军区作战室接听从北京打来的保密电话。叶飞不敢怠慢，立即启程。回到福州，叶飞拿起电话机，听筒里响起了总参作战部长王尚荣的声音：

“叶飞同志，中央决定炮击金门，指定由你来指挥。”

叶飞闻言，有点纳闷，心想：我已经卸去了福州军区司令员职务，虽然是兼职政委，但工作中心已经转到省委这边了。为什么还要我指挥呢？便忍不住问道：

“是不是中央决定要我指挥的？”

“是中央的决定。”

“是不是毛主席的决定？”

王尚荣说：

“刘培善同志在这里，你可以问问他。”

只听刘培善在那头说：

“是的，是毛主席决定要你指挥。”

叶飞只好说：

“既然这样，那行，我接受命令。”

叶飞放下电话，立即召开省委会议，安排工作，决定由江一真代替他主持省委日常工作。叶飞又赶到福州军区组织前线指挥部。此时，军区副司令员皮定均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不在福州。叶飞宣布由军区副司令员张翼翔兼任前线指挥部参谋长。

7月19日这一天，叶飞和军区副司令员张翼翔、副政委刘培善赶往厦门，迅速开展各项准备工作。

7月20日，毛泽东在游泳池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目前国际局势和炮击金门的军事准备问题。到会的有政治局委员和军委成员，共44人。

7月21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在答复中国希望苏联提供原子潜艇时，提出了要搞中苏“共同核潜艇舰队”的意见。尤金首先同刘少奇谈了话。

这天下午，毛泽东在游泳池召见了请求会见的尤金。在座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德怀、陈毅。

尤金向毛泽东提出了搞中苏“共同核潜艇舰队”的意见。苏联的理由是，苏联的黑海会被敌人封锁，波罗的海就不用提了，北面更不宽阔，东面的海面也不能算安全，而中国的海岸线很长，条件很好，所以，中苏建立“共同核潜艇舰队”是最理想的。

毛泽东一听就火了，他生气地问道：

“首先要明确方针，是中国办，苏联帮助，还是只能合办，不合办苏联就不给帮助？”

尤金非常熟悉毛泽东的脾气，他一看毛泽东生气了，口气是那样严厉，看来不答复是不行了，可是要答复，自己又做不了主，只好支支吾吾地说了一番外交辞令。毛泽东火气更大了，他说：

“你们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这么个搞法？”

尤金只能无奈地摇摇头。毛泽东强抑怒火，说道：

“你讲不清楚，请转告赫鲁晓夫同志，让他自己来讲。”

7月22日上午，毛泽东再次召见尤金，中方在座的还有周恩来、彭德怀。毛泽东沉重地说：

“昨天你们走了以后，我一直睡不着，也没有吃饭。今天请你们来谈谈，当个医生，下午就可以吃饭、睡觉了。你们很幸运，能吃饭、睡觉。

我们言归正传，吹一吹昨天交谈的问题。就在这个房间里吹！我们之间没有紧张局势。我们是10个指头中，9个指头相同，1个指头不同。这个问题，我讲了两三次了，你忘了没有？

昨天的问题我又想了一下，可能我有误会，也可能我是正确的，经过辩论可以解决。看来，**关于海军提出的核潜艇的请求可以撤销。这个问题我脑子里没有印象，问了他们才知道，海军司令部里有那么些热心人，就是苏联顾问，他们说苏联已经有了核潜艇，只要打个电话过去，就可以给。**海军核潜艇是一门尖端科学，有秘密，中国人是毛手毛脚的，给了我们，可能发生问题。”

“中国还有资本家，但国家是由共产党领导的。你们就是不相信中国人，只相信俄国人。俄国人是上等人，中国人是下等人，毛手毛脚的，所以才产生了合营的问题。要合营，一切都合营，陆海空军、工业、农业、文化、教育都合营，可不可以？或者把10000多公里长的海岸线都交给你们，我们只搞游击队。你们只搞了一点原子能，就要控制，就要租借权。此外，还有什么理由？”

“你们一直不相信中国人，斯大林很不相信。中国人被看做是第二个铁托，是个落后的民族。你们说欧洲人看不起俄国人，我看俄国人有的看不起中国人。斯大林在最紧要的关头，不让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在这一点上，他犯了很大的错误，与季诺维也夫是一样的。”

毛泽东见尤金很紧张，便放缓了口气，又说起尤金当年帮助他编辑《毛选》的事，他说：

“为什么当时我请斯大林派一个学者来看我的文章？是不是我那样没有信心？连文章都要请你们来看？没有事情干吗？不是的，是请你们来中国看看，看看中国是真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半真半假的马克思主义。你回去以后说了我们的好话。你对斯大林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中国人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斯大林还是怀疑。只是到朝鲜战争时才改变了他的看法，也改变了东欧和其他各国兄弟党对我们的怀疑。”

接下来，毛泽东又严肃地阐述了中国的立场，他说：

“这些话，都是由于搞核潜艇‘合作社’引起的。现在我们决定不搞核潜艇了，撤回我们的请求。要不然就把全部海岸线交给你们，把过去的旅顺、大连加以扩大。但是不要混在一起搞，你们搞你们的，我们搞我们的。我们总要有自己的舰队。两把手不好办。

打起仗来情况就不同了，你们的军队可以到我们这儿来，我们的军队也可以到你们那儿去。如果在我们这儿打，你们的军队也应该听我们的指挥。如果在你们那儿打，我们的军队比你们少的话，也应该听你们指挥。

我这些话很不好听，你们可以说我是民族主义，又出现了第二个铁托。如果你们这样说，我就可以说，你们把俄国的民族主义扩大到了中国的海岸。”

“你们昨天把我气得一宿没有睡觉。他们，”毛泽东指着周恩来等人说：“没有气，我一个人有气。如果犯错误，是我一个人。”

周恩来插话说：

“这是我们政治局的一致意见。”

毛泽东接下来说：

“你们就帮助我们建造核潜艇嘛！你们可以做顾问。为什么要提出所有权各半的问题？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我们打算搞二三百艘这种潜艇。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手指头都不行。你可以告诉赫鲁晓夫同志，如果讲条件，我们双方都不必谈。如果他同意，他就来，不同意，就不要来，没有什么好谈的，有半个小指头的条件也不成。”**

“**你们讲的话，使我感到不愉快。请你照样告诉给赫鲁晓夫同志，我怎么说的，你就怎么讲，不要代我粉饰，好让他听了舒服。**他批评了斯大林，现在又在搞斯大林的东西。”

尤金听了毛泽东这一席话，吓得满头大汗。谈话结束后，他立即把情况如实地报告了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决定亲自来中国和毛泽东谈一谈。

7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目为《今年夏天大丰收说明了什么》的社论。社论中宣布说：“我国小麦总产量已超过美国而居世界第二位。”社论中还说:一切以为农业产量只能按百分之几的速度而不能按百分之几十的速度增长的“悲观论调”，已经完全破产了。现在我国粮食要增产多少，是能够由我国人民按照自己的需要来决定了。

《人民日报》还发表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的宣传报道。

《人民日报》登高一呼，浮夸风立即盛行起来，各地不断地报高产，放卫星，竟然破天荒地出现了小麦亩产7320斤、早稻亩产3600斤、中稻亩产13万斤这样惊人的虚假记录。

7月24日，叶飞向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报告说：福建前线已经完成了一切作战部署。

7月26日凌晨，福建前线参战的30个炮兵营已经全部进入发射阵地。

7月27日上午，毛泽东致信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彭德怀和军委秘书长黄克诚：

德怀、克诚同志：

睡不着觉，想了一下，打金门停止若干天似较适宜。目前不打，看一看形势。彼方换防不打，不换防也不打。等彼方无理进攻，再行反攻。中东解决，要有时间，我们是有时间的，何必急呢？暂时不打，总有打之一日。彼方如攻漳、汕、福州、杭州，那就最妙了。这个主意，你看如何？找几个同志议一议如何？政治挂帅，反复推敲，极为有益。**一鼓作气，往往想得不周，我就往往如此，有时难免失算。**你意如何？如彼来攻，等几天，考虑明白，再作攻击。以上种种，是不是算得运筹帷幄之中、制敌千里之外，我战则克，较有把握呢？不打无把握之仗这个原则，必须坚持。如你同意，请将此信电告叶飞，过细考虑一下，以其意见见告。

晨安！

毛泽东 7月27日上午10时

彭德怀、黄克诚立即将毛泽东的信电传给叶飞，叶飞复电表示：坚决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办。

7月28日下午，毛泽东从游泳池里出来，遇上刚从广西探亲回来的值班员，他问道：

“你们十万大山的农民，今年还有吃那种叫作黄狗头的野菜吗？”

那名卫士说：

“没有了，我们那里的粮食基本上够吃了。”

“你以后再回家对乡亲们说，那种痛苦的生活一去不复返了！在不长的时间内，每人每年平均就能有2000斤粮食，你说这样多的粮食拿到哪里去？”

7月28日，毛泽东阅读外交部新闻司于1958年7月23日编印的《国际时事资料》第141号，上面刊载了《美国的对外贸易、对外‘援助’和私人对外投资情况》一文，他阅后写下了给江青的批语：

江青：

此件看过，有用，由你保存，备我利用。毛泽东

7月28日，毛泽东给老朋友周谷城写了一封回信。

原来在不久前，三联书店准备出版周谷城在毛泽东鼓励下编撰的《形式逻辑与辩证法》丛书，在这部丛书里，按语式的导言还要不要呢？周谷城拿不定主意，而且周谷城还想请毛泽东为该书撰写一篇序言，因此，他便给毛泽东写了两封信。毛泽东便在7月28日给周谷城写了这封回信，他在回信中写道：

谷城兄：

两次热情的信，都已收到，甚谢。大著出版，可资快读。我对逻辑无多研究，不能有所论列；问题还在争论中，由我插入一手，似乎也不适宜。作序的事，不拟应命，可获谅解否？敬复。顺颂

教安！

毛泽东 1958年7月28日

7月31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第2次来到了北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党政军领导人在南苑机场迎接他。机场上没有红地毯，没有仪仗队，也没有献花。毛泽东见到赫鲁晓夫自然会想起赫鲁晓夫曾经说过的“与中国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话，只是和他握了手，并寒暄一番。在候机楼小憩时，毛泽东向赫鲁晓夫通报了中国国内的情况，他说：

“我们现在确实是出现了大跃进，整个农村形势很好。1949年中国解放，我是很高兴的，但是，觉得中国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因为中国很落后，很穷，一穷二白。以后对工商业的改造，对抗美援朝的胜利，又愉快又不愉快。只有这次大跃进，我才完全愉快了。按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完全有指望了。”

赫鲁晓夫耸一下肩，没有做任何评论。刘少奇说：

**“我们现在大跃进，粮食产量特别多，现在发愁的不是粮食不够吃，而是粮食多了怎么办？”**

赫鲁晓夫眯细着眼，不无挖苦地说：

“那不要紧，粮食多了你们不是不好办吗？那就给我们吧，我们有办法。”

赫鲁晓夫一行驱车驶入了中南海。毛泽东在颐年堂同赫鲁晓夫进行了首次会谈。宾主一坐定，毛泽东首先表示欢迎，然后便开门见山地问赫鲁晓夫：

“尤金大使向我们提出的要求是什么意思，你们是出于什么个考虑？”

赫鲁晓夫首先埋怨尤金未把苏方的意思解释清楚，然后又慢悠悠地表白了一番，他说：目前台湾海峡局势紧张，美国第7舰队活动频繁，苏联舰队已经进入太平洋，需要在中国建立一个长波电台和……

毛泽东不等他说完，突然抬手做了一个打断的手势，说：

“请你告诉我，什么叫联合舰队？”

“所谓共同么，就是共同商量的意思……”

赫鲁晓夫显然没有估计到毛泽东会如此不耐烦，他只好支支吾吾，遮遮掩掩。毛泽东却是抓住要害不放，追问道：

“请你说明什么叫共同舰队？”

赫鲁晓夫依然不着边际地解释说：

“毛泽东同志，我们出钱给你们建立这个电台。这个电台属于谁，对我们都无关紧要，我们不过是用它同我们的潜水艇保持无线电联络。我们的舰队现在正在太平洋活动，我们的主要基地……”

毛泽东有点恼火了，他不耐烦地站了起来，以严厉的口气说：

“你讲了大半天，我也听了大半天，说了许多话你还没有进入正题。我问你，什么叫共同舰队？”

赫鲁晓夫立刻涨红了脸，很不自然地说：

“我们只不过是来跟你们共同商量商量。”

毛泽东怒气未息，说：

“还是不切题，什么叫共同商量？我们还有没有主权？你们是不是想把我国的沿海地区都拿去？”

“我们没有这个意思，不要误会。”

“你们都拿去算了！”

“现在是和我们的中国同志商量，如何共同加强防御力量……”

“你这个意思不对，你们明明是搞共同舰队！”

“我们还不过是来跟你们一块儿商量商量，没想到引起你们这么大的误解。”

“打起仗来，苏联军队可以到中国来，中国军队可以到苏联去，苏军可以使用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

毛泽东说完，又回到自己的座位上。赫鲁晓夫见毛泽东如此说，便又建议道：

“毛泽东同志，我们能不能达成某种协议，让我们的潜水艇在你们的国家有个基地，以便加油、修理、短期停留？”

毛泽东做了一个有力的手势，断然说道：

“不行！而且我不想再听到有人提起这件事。”

赫鲁晓夫仍不死心，又厚着脸皮说：

“为了合情合理，假如你愿意的话，毛泽东同志，你们的潜艇也可以使用我们的摩尔曼斯克基地。”

**“不要！”毛泽东不耐烦地说：“我们去摩尔曼斯克干什么？我们不想去你们的摩尔曼斯克，不想在那儿搞什么名堂，也不希望你们来我们这儿搞什么名堂。你们搞你们的，我们搞我们的。英国人、日本人，还有许多别的外国人，已经在我们的国土上呆了很多年，被我们赶走了。赫鲁晓夫同志，我再说一遍，我们再也不想让任何人利用我们的国土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

赫鲁晓夫也恼火了，他说：

“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还在互助合作，北约国家把这看成平常小事，可是，我们却连这样的小事都达不成协议。”

毛泽东说：

“我先后跟你们谈了3次，我得出一个结论：你们不相信中国。搞舰队要搞‘合作社’，这是政治问题，这叫政治条件。这样，**我提出几个方案：第一，你们帮助我们搞，给我们技术资料，派专家帮助我们搞。第二，搞共同舰队，不搞。你们要坚持第二方案，我们不干。第三个方案，撤回我们的请求，没有原子潜艇，没有关系**。不搞了，你们又不同意。第四个方案，所有的海岸线都给你们，我们不要海军，我们打游击。第五个方案……”

赫鲁晓夫一听毛泽东说要上山打游击，也反唇相讥：

“游击战在现代世界里已经没有市场了。”

毛泽东更不客气地说：

“如果你一定要捏住中国人的鼻子，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办法？中国曾多次被征服。但是，中国人把所有的征服者都同化了。”

赫鲁晓夫一看此行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了，心中闷闷不乐。

是日晚，周恩来在欢迎赫鲁晓夫一行的宴会上，举起盛满茅台酒的酒杯提议说：

“为什么我们不来为苏联朋友访问中国这座历史名城北京而干一杯呢？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赫鲁晓夫还在生闷气，他对周恩来的提议不做反应。其他的中苏人员都起身举杯，一饮而尽。毛泽东趁机指着身边的一盘红辣椒，微笑着问苏联客人：

“我们是否应该对共产主义者的红色的党表忠心呢？在党的积极分子周围，是不能没有色彩没有刺激的啊！作为红辣椒的忠实信徒，我要问，谁愿意加入到我的红辣椒党里来？”

说罢，他将一个囫囵辣椒填进嘴里，看看赫鲁晓夫，又环视四座。周恩来明白，毛泽东意在与赫鲁晓夫缓和气氛。可是，赫鲁晓夫小肚鸡肠，并不领情。布尔加宁见赫鲁晓夫如此，只好打破僵局，以身试“辣”。他学着毛泽东的样子，一口吃下了辣椒，直辣得他抓耳挠腮，窘态可掬。

毛泽东又说起了红军长征中在贵州遇到茅台酒的故事。周恩来插话说：

“我们那时把手头上所有的瓶瓶罐罐都装满了茅台，一大早才上路。后来，我们一直怀念内地这一池医疗圣水。”

1958年8月1日，毛泽东在游泳池同苏方举行第2次会谈，赫鲁晓夫再不敢提共同舰队的问题了，他把话题转向斯大林问题上，他说：

“原来你们是支持我们的，现在好像不大支持了，好像是向我们的后院抛石头。”

毛泽东说：

“不对，实际上是抛了一把金子。”

“别人的金子我不要。”

“你要不要是一回事，我要助你一臂之力，因为毕竟在我们共产党国家里你们是头一家。”

在国际形势方面，赫鲁晓夫向毛泽东提议说：中苏两国能否有个分工，苏联多考虑欧洲的事情，中国多考虑亚洲的事情。毛泽东中肯地劝他：

“这样分工不行，各国有各国的实际情况。有些事情你们比我们熟悉些，但各国的事情主要还是靠本国人民去解决，每个国家都有各自的实际情况，别的国家不好去干涉。”

此后，毛泽东在与赫鲁晓夫的会谈中，见好就收，适当地给了苏联人一点面子。双方就经济合作方面，初步达成了协议。

在赫鲁晓夫离京前，毛泽东再一次提醒赫鲁晓夫说：

“中国人是最难同化的。”“过去有多少个国家想打进中国，到我们中国来。结果呢？那么多打进来的外国人最后还是都站不住。”

赫鲁晓夫悻悻然地回了苏联。他一回到国内，就开始骂毛泽东了。

8月3日，中苏双方发表了《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会谈公报》。赫鲁晓夫秘密访华，引起外电议论纷纷。美国当局注意到，中苏两国国防部长参加了这次首脑会谈，同时也注意到《公报》有这样一段话：“双方就目前国际形势下两国所面临的在亚洲方面和欧洲方面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充分地交换了意见，并且对于反对侵略和维护和平所应采取的措施达成了完全一致的协议。”

后来在8月8日，中苏双方在莫斯科签订了苏联在技术上援助中国建设和扩建47个工业企业的协议。

欲知毛泽东此后有何重要活动，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58年7月22日严肃地对尤金说：“**我们打算搞二、三百艘这种潜艇。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手指头都不行。你可以告诉赫鲁晓夫同志，如果讲条件，我们双方都不必谈。如果他同意，他就来，不同意，就不要来，没有什么好谈的，有半个小指头的条件也不成。”**“**请你照样告诉给赫鲁晓夫同志，我怎么说的，你就怎么讲，不要代我粉饰。”**7月31日，毛泽东对来访的赫鲁晓夫不客气地说**：“我们去摩尔曼斯克干什么？我们不想去你们的摩尔曼斯克，不想在那儿搞什么名堂，也不希望你们来我们这儿搞什么名堂。你们搞你们的，我们搞我们的。英国人、日本人，还有许多别的外国人，已经在我们的国土上呆了很多年，被我们赶走了。赫鲁晓夫同志，我再说一遍，我们再也不想让任何人利用我们的国土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这就是中华民族的千古伟人毛泽东！不知道那些主张“救美国就是救中国”和提出中美“夫妻论”的一类人，看到这些话会不会感觉到脸上发烧？

**第54章**

“**给下面打招呼，不要提万斤口号。**”

话说1958年8月4日，毛泽东带着江青和两个女儿李敏、李讷，还有侄子毛远新，到河北省大跃进的典型县保定地区的徐水视察。

据报载：徐水县的粮食产量在全国遥遥领先，不少调查团都到徐水调查取经。有的调查小组问农民的粮食产量和家庭收入，老乡们十分有趣地回答：“我们家的粮食不在屋里，在会计的账上。”

农民没有那么多的粮食，又不敢说真话，也不会说假话，只好说粮食在会计的账上了。

再说8月4日午后，毛泽东来到徐水县，首先听取了县委书记张国忠的汇报。据当时的报道，这位书记在汇报中强调自己把社员组织起来了，特别是将青壮年组成民兵连，这样战斗力强、组织性强，在生产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徐水县的口号是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纪律化。全县如同军营一样，青壮年编为民兵，男女分别居住，老人入敬老院，小孩入幼儿园，全部实行军事化管理。

毛泽东听完汇报，在徐水县领导干部陪同下，来到南梨园乡大寺各庄农业社俱乐部，他看到俱乐部里挂满了各种奖旗，看了几面，问了问每一次得奖的经过，就在长桌旁坐下来，问农业社干部说：

“今年的麦子收得好吗？”

农业社主任说：

“很好，比哪一年都强。”

“每亩平均多少斤？”

农业社党支部书记说：754斤。毛泽东惊讶地“啊”了一声，赞叹道：

“不少啊！”

他又问到秋作物的预计产量，问了社里，又问全县的。县委书记张国忠告诉他说：

“今年全县要争取大丰收。夏秋两季一共计划要拿到12亿斤粮食，**平均每亩产2000斤。主要是山药高产，全县共种了春夏山药35万亩。**”

毛泽东听了，睁大眼睛，看了看屋里的人，奇怪地说：

“要收那么多粮食呀？你们夏季才拿到九千多万斤粮食，秋季要收11亿斤呀？你们全县31万多人口，怎么能吃空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

张国忠说：

“我们粮食多了换机器。”

毛泽东说：

“又不光是你们粮食多，哪一个县粮食都多，你换机器人家不要你的粮食呀？”

县长说：

“我们拿山药造酒精。”

毛泽东呵呵笑着，他环顾大家，说：

“那就得每个县都造酒精！哪里用得了那么多酒精啊？”

县长说：

“我们只是光考虑着怎么多打粮食！”

习惯开玩笑的毛泽东幽默地说：

“也要考虑怎么吃粮食哩！其实粮食多了也还是好！多了，国家不要，谁也不要，农业社员们自己多吃嘛！一天吃5顿也行嘛！”

这本是一句幽默话，没想到后来传达下去以后，许多地方还真的发生了敞开肚皮比赛吃饭的笑话。

毛泽东说罢，要到村子里去看看。他先看了粮食加工厂，看了供销社，看了社里的医院和正在扎针的医生和病人；又看了猪场，看了缝纫工厂；接着来到了幼儿园。幼儿园里有几十个孩子，他们穿着崭新的背心和短裤，都很干净。孩子们鼓掌欢迎毛泽东，嘴里不住地喊着：“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毛泽东摸摸这些可爱的孩子，顺便去看了看他们的宿舍。

幼儿园隔壁是敬老院，住着由社里统一供养的失去劳动能力的老人们。老人们对毛泽东说：

“咱们这真是享了福啦！有了毛主席，咱们可享了福啦！”

毛泽东笑着同老人们告别，尔后来到田间，他看到在地里干活的妇女很多，就说：

“这妇女劳力解放得很彻底哩。”

保定地委书记李悦农说：

“这里的妇女都脱离了炕台、锅台、磨台、碾台这4台。”

毛泽东说：

“是啊，人人都吃食堂，社社都办幼儿园，这个县是11万多劳力，抽出了4万多搞水利、打机井、办工业，只有7万多人搞农业嘛。这又解放女劳力，又搞军事化，全县农业社搞了90多个团，200多个营，他们就是这个办法哩！”

毛泽东来到棉田，察看了棉花的长势，问道：

“这一亩可以收多少棉花呀？”

农业社主任脱口而出：

“100斤皮棉。”

毛泽东算了算，说：

“那就是300斤籽棉呀！”

毛泽东沿途看到丰收的庄稼，就对乡社干部们说：

“粮食多了，以后就少种一些，一天做半天的活儿，另外半天搞文化，学科学，闹文化娱乐，办大学、中学，你们看好吗？”

回到徐水县委，他在谈话中还说：

“这里的干劲不小哩！世界上的事情是不办就不办，一办就办得很多！过去几千年都是亩产一二百斤，你看，如今一下子就是几千斤！”

后来在8月6日，也就是毛泽东视察后的第3天，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来到徐水，传达中央的新意图。陈正人说：

“刘少奇同志指示在徐水搞一下试点，搞共产主义，搞工、农、兵、学、商结成一体。”

他还传达了刘少奇的一些具体指示，如在徐水办两座大工厂，全县可搞一个大联社；并将刘少奇委托他带来的康有为的《大同书》与《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交给徐水县的干部们学习。县委书记张国忠受到了极大的鼓舞，立即宣布“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此后，徐水的浮夸风便越吹越大了。

早在4月开始一直到8月，刘少奇曾先后在北京、天津、山东、河北等地视察指导工作，他说：

“我们到共产主义不要多远”，“我看三四十年以后，可以到共产主义”。

再说8月5日，毛泽东来到河北省安国县视察，听取了地委、县委负责人的汇报。在红星农业社的丰产试验田边，他摸着肥大的高粱叶子，微笑着问：

“这样的高粱，一亩能打多少粮食？”

淤村乡党委书记说：五六千斤。毛泽东问：

“一棵能结几个穗？”

乡党委书记说：

“这是‘八大杈’，能结8个穗。”

毛泽东又指着旁边的矮株高粱问：

“这是什么品种？”

乡党委书记说：

“这是‘小八杈’，试验试验到底哪种收成大。”

毛泽东问：

“是否可以让高的矮的杂交？”

乡党委书记说：

“我们正在试验。”

毛泽东笑着说：

“如果长不高，那就叫矮梁，不能叫高粱。”

一句话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来到甘薯试验田边，一个基层干部说一亩甘薯要产20万斤，毛泽东随口说：

“能产到两万斤就不少了。”

他还就农业合作社规模以多大为宜征询大家的意见。此时各地正在酝酿办大社，有的已经把几个小社连成了一个大社。关于社的规模问题，很多人认为一个乡办一个社就行了。毛泽东风趣地说：

“你们看过《三国演义》吗？你们这里农业社的发展变化就像《三国演义》的头一句：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8月6日，毛泽东一行人乘车来到了河南省新乡县。

新乡县七里营是按照中共中央成都会议精神，第一批把小型农业合作社合并为大社的典型。他们将七里营和周围50多个高级农业合作社合并为一个大社，共有9639户人口，定名为“七里营人民公社”。

这一天，雨过天晴。下午4点22分，毛泽东的车子和其它8辆车子由七里营村东头进了村子，在村子中心的东方红广场停了下来。

七里营的干部按照上级的要求，在街道上布满了岗哨，群众被派到地里干活，五类分子被专人看管，整个村子里鸦雀无声。毛泽东看到此情此景，有点不高兴，就对陪同的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说：

“咋不见群众呢？我就这么脱离群众吗？”

吴芝圃闻言，显得十分尴尬。毛泽东来到公社门口，看了看3天前刚刚挂在大门东边的“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的牌子。吴芝圃介绍说，他们大社没有用“共产主义公社”作名称，而用“人民公社”作名称。**毛泽东闻言，正合己意，随口说道：**

**“好么，好么！”**

七里营人民公社把一些孤寡老人组织在一起，成立了“幸福院”。毛泽东来到幸福院的时候，几十个老人纷纷从屋里跑出来，看望毛泽东。忽然，有一位70多岁的老太太，扑通一声跪在毛泽东面前，一边给毛泽东磕头，一边喃喃自语：

“天高皇帝远，我这老婆子能见到毛主席，死了也甘心。”

毛泽东见状，俯身搀起老人家，又是给她扑打身上的灰尘，又是向老人问好。老太太流着泪说：

“好，好，一切都好。”

毛泽东握着她的手说：

“老人家，不要难过，只要咱们齐心协力，以后的日子会更好。”

老人说：

“不是难过，能见到毛主席，我太高兴了。”

毛泽东来到社办面粉厂，电动小钢磨正在磨面，他仔细观察小钢磨的运转，抓起一把麸皮用手指捻了捻，十分满意。来到幼儿园，几十个天真活泼的孩子围拢在他身边，拉着他，向他问好。毛泽东抚摸着孩子们，慈祥地笑着。老师领着孩子们唱起了歌曲，这支歌的名字叫：《毛主席，我们永远热爱您》。毛泽东夸奖着孩子们，还对老师说：

“谢谢你们！”

毛泽东头戴草帽，身穿白衬衣，穿过茂密的大豆地，跨进满布瓜蔓的菜田，来到村西种植棉花的“红旗试验田”前，察看棉花的长势。他看着茂密茁壮棉桃成串的果枝，连声称赞棉花长得好，大有希望。他问：

“一亩田能产多少棉花？”

七里营的干部说：

“一亩田可以产100斤皮棉。”

毛泽东满意地说：

“全国的棉花都长成这样就好了。”

他走进棉田里，向正在给棉花打顶的社员们招手问好。他还学着社员的样子，给棉花打顶。

毛泽东一行回到了村西口。此时七里营的干部早已撤了岗哨，村民们纷纷站在房上、墙头上、道路两边看望毛泽东。毛泽东走到供销社门市部门口，群众立时欢声四起，热烈的掌声、“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交织在一起。他频频向群众招手致意。供销社营业员小吕，将事先准备好的写着“祝毛主席身体健康”的大玻璃匾，恭恭敬敬地献给毛泽东，毛泽东双手接住，转交给身边人员，和小吕亲切握手致谢。他挥手告别群众，慢慢地上了汽车。

下午6点，毛泽东离开了七里营。在县委招待所里，他和七里营的农民代表进行了座谈。他说：

**“看来‘人民公社’是一个好名字，包括工农兵学商，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人民公社’前面可以加上地名，或者加上群众喜欢的名字。**”

他还说：

“有希望啊！你们河南都像这样就好了。”

吴芝圃说：

“有了这样一个社，就会有好多社。”

毛泽东说：

“对！有一个这样的社，就会有好多这样的社。”

吴芝圃还向毛泽东汇报了长葛县有的中学开展了勤工俭学，搞得很好，升学率也很高，学生不仅学到了书本知识，通过劳动实践，还加深了对书本知识的理解。

看看到了吃晚饭的时候，毛泽东请七里营的农民代表们和他一起吃饭，他向大家介绍他的家人说：

“这是我的两个女儿，这个是我的侄儿毛远新。”

他又指着江青说：

“她是我的爱人。也就是你们说的老婆、婆姨。”

吃饭时，毛泽东和江青直往客人碗里夹菜，亲如一家。农民代表临走时，毛泽东全家5口人把客人送到门外，江青一再说：

“再见，再见。”

是日晚，专列离开新乡，停在郑州车站的叉道上。

据史向生回忆：“毛泽东参观七里营时，我不在郑州，正在嵖岈山公社召开地、县农村工作部长会议。同去参加会议的有农村工作部正副部长赵定远、崔光华、《河南日报》社长丁希凌、地委书记路宪文、办公室主任赵光同志等。红旗杂志记者李友九等同志已先期到达。嵖岈山……成立了一个很大的联社。……农民以部队班、排、连的组织形式进行劳动。远远望去，农田里一片丰收景象，好不喜人。最为新奇的是，联社自办了公共食堂。为了对农村食堂作深入的调查研究，我们亲自去食堂吃饭，还在食堂门外住了一夜，实地考察。红旗杂志社记者李友九为**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草拟了一个简章**，我们参加了研究和修改。简章草稿中提出了：‘吃粮不要钱’的观点。

8月6日早晨，接到了省委电话，让我连夜赶回郑州，向主席作汇报。我立即骑上骡子，到遂平县搭火车，当夜赶回郑州。到郑州时已是深夜，车站接我的同志将我领到主席的专列上，吴芝圃等省委几位书记早已等候在那里。他们告诉我，主席等我到半夜，现已被叶子龙等随行人员劝说去睡觉了。……凌晨4点左右，主席醒了，他听说我等在那里，立即穿了睡衣出来。主席见到我，仿佛遇到了老朋友，高兴地说：

‘正等着你呢，想听你讲讲嵖岈山的情况。’

我感到很意外，主席对我的去向似乎很了解。我向主席汇报了嵖岈山的情况，将简章草稿拿给主席看。主席接过简章草稿边看边说：

‘这东西好，给我吧。’

接着，我向主席讲述了公社办食堂的情况，我告诉主席，农民去食堂统一吃饭，既节省时间，又将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主席听了很高兴，称赞‘食堂’是新事物。主席在听汇报的过程中不断提问，问得很细，如‘锅灶怎么弄到一起？’‘食堂粮食如何统一存放？’‘社员吃饭时秩序怎样？’‘你在那里有没有吃过饭？’等等，我都一一作了回答。然后我向主席介绍了嵖岈山公社的规模和生产组织情况，主席听到农民劳动已经军事化，按班、排、连编制从事生产，又听到一个公社有5万人口时，感慨地说：

‘大的多了，公的多了。’‘这在古代，就是一个诸侯国了。’

但主席又谈道，比之古代诸侯国，公社是又大又公，多了公的特点。是‘一大，二公’。主席又问起群众有纠纷公社如何调解。我告诉主席，由公社民政部门调解处理。主席说：

‘哦，这带政权性质，既是经济组织，又是政治组织，实际上是基层政权，这叫政社合一。’主席说，‘大集体，小自由，不要统得太死。’

我又向主席汇报了嵖岈山公社的组织结构。当主席听到公社采取工、农、商、学、兵结合，实行统一管理，统一规划，统一分配时，饶有兴趣地扳着指头说：

‘工、农、商、学、兵，那么工业、商业、学校都包括了，是五位一体啊。两个招牌换成一个招牌，是政社合一。’

谈到公社的名称，主席说：

‘**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包括工、农、商、学、兵，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

毛主席和我的谈话于8月7日黎明结束。”

再说8月6日晚9时，正在许昌地委办公室开会的专署公安处副处长辛建，突然接到省公安厅打来的电话，只听电话里说：

“有紧急任务，你和刘肃欣赶快到火车站去！”

辛建不敢怠慢，立即叫上刘肃欣科长，骑着自行车赶到车站。省公安厅的朱干副处长告诉他俩说：

“这次是毛主席来我们这里视察，我们要共同搞好保卫工作。”

8月7日黎明时分，一列绿色专列徐徐开进许昌车站，恭候在车站的许昌地委副书记马金铭、专员王延太被通知上车。马金铭、王延太上车后，专列继续前行。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把马金铭、王延太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说：

“地方同志工作辛劳，我来你们这里看看农村形势。”

马金铭说：

“我们的工作搞得不太好，可到襄城县双庙乡郝庄村、三里沟乡的后梁庄、十里铺的小张庄看看，这几处是一条线，近百里，沿途都是庄稼。这些地方，也就代表了许昌地区的农业生产形势。”

毛泽东说：

“很好，明天我们一同去参观。”

专列驶入城西10公里的长店路段，缓缓停下了。

8月7日7点31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和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副书记杨蔚屏陪同下，乘吉普车来到了襄城县双庙乡的郝庄村。毛泽东在村东头公路上下了车，向一大片烟叶地走去。

在这一带负责保卫工作的辛建和刘熙民，看见身材高大魁伟的毛泽东，头戴草帽，身穿白衬衣和灰色半旧军裤，健步向他们走来，急忙迎上前去。毛泽东和他们一一握手。辛建紧紧地握着毛泽东的手，激动得把原先想好的问候之词全忘了，只是说：

“毛主席好，毛主席好……”

刘熙民也是这样，他握着毛泽东的手，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毛泽东见他俩这样紧张，就问刘熙民叫什么名字？刘熙民说：

“我叫刘熙民。”

毛泽东又问：

“哪个民？”

“人民的民。”

毛泽东开玩笑说：

“你是康熙的臣民啊。”

他又问了辛建的姓名，笑着说：

“啊，你是辛辛苦苦地干社会主义呀，干革命就得有这种不怕辛苦的精神。”

毛泽东顺着烟叶地垄沟察看烟叶的长势，露水浸湿了他的衣衫，鞋上也沾满了泥土。看完烟叶，他又来到2队齐胸高的谷子地里，采了几个沉甸甸的谷穗，掂在手里。记者要给他拍照，他说：

“还是照大田里的大谷穗吧，让北京的同志看看。”

毛泽东又来到正在田间吃早饭的社员们中间，亲切地问：

“能吃饱饭吗？”

一个社员说：

“俺这是高级社，吃穿都不愁。”

毛泽东问：

“有休息时间吗？”

社员们说：

“争上游吃点苦有啥。”

毛泽东一行来到三里沟后梁庄村东的地里，正在割草和捉烟虫的大人小孩们认出了毛泽东，活也不干了，都围上来看毛泽东。毛泽东看着这些赤脚赤背老实憨厚的农民群众，微笑着向他们招手致意。他朝着北面边走边看，农民们还是围着他看。他看到地里长着的云南品种的烟，每棵都有一人多高，70多片叶子，高兴地说：

“很好！你们这里一派丰收景象，我还从未见到过这样高大的烟叶子，干得好。”

他走到一个高岗上，举目环视，只见一片接一片的烟叶地，一望无际，听说是连绵数十里，就情不自禁地说：

“你们这里成了烟叶王国了！”

他向村支书张富贵询问了谷子、玉米、红薯、烟叶的管理方法，鼓励他们说：

“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啊！”

毛泽东一行驱车来到襄县（即襄城县）城北小张庄，在村边下了车，走到地头树林下与农民搭话。毛泽东又钻入数十度高温的炕烟房内，观看了农民们炕烟的操作过程。57岁的烟叶技术员梁运祥正在堆砌炕烟的火龙，毛泽东问：

“烟叶不炕，太阳晒行吗？”

梁运祥说：

“日晒的烟叶色差，叶薄，质劣，无味。”

上午11点40分，毛泽东乘吉普回到了襄城，县委领导要请毛泽东一行到县委就餐，毛泽东说：

“谢谢，不给地方添麻烦啦。”

毛泽东一行返回时经过三里沟村，群众送来了一些大西瓜，毛泽东拒绝了。

下午1时许，毛泽东一行回到许昌县长店的专列上，许昌地委唯一的女副书记刘毓敏和组织部长康国蕴给毛泽东送来了3尺长的豆角和硕大的烟叶子，毛泽东说：

“很好。”

8月8日下午，毛泽东前往河南省商丘地区视察。

这一天，烈日炎炎，热浪灼人。商丘火车站由西而来一列专列，早已在车站等候的商丘党政军负责人，马上迎上前去。只见车厢里走下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他同商丘地委书记任秀铎、商丘县委书记刘学勤说了几句话，3人便上了专列。

毛泽东在专列上要先见见东道主们，这是他在视察旅途中，常有的惯例。任秀铎、刘学勤随着史向生来到会客室，远远看见毛泽东身穿一件白衬衣，一条灰色长裤，脚蹬一双深色皮鞋，站在那里等候。史向生向毛泽东介绍说，地委第一书记王培育因病住院，任秀铎是地委第二书记。毛泽东“噢”一声，问道：  
 “任秀铎？你是信任的任，山清水秀的秀，金字旁的铎？”

任秀铎回答说：

“是的，毛主席。”

史向生又介绍了刘学勤。毛泽东与他们一一握手，坐下后，随手从口袋里掏出几支烟，递给任秀铎、刘学勤、史向生，自己也点上一支，轻轻地吸了一口，问道：

“商丘是原归德府，古代在这里建过都。还有些什么古物？”

刘学勤回答说：

“还有文雅台、三陵台、阏伯台、八关斋、壮悔堂。”

毛泽东又问：

“今年夏季收成如何？”

任秀铎说：

“夏粮丰收。”

毛泽东问刘学勤：

“你们县主要农作物有哪些？”

刘学勤说：

“全县150万亩耕地，110万亩种小麦，占总耕面积60%以上。大秋有高粱、谷子、玉米、棉花，晚秋有大豆、红薯、夏玉米。”

毛泽东历来不满足听部下的汇报，总喜欢到实地考察一番。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

“我要下车去附近看看。”

刘学勤连忙介绍说：

“附近道口乡黄楼村有一个中华农业社。”

毛泽东说：

“好，那就去中华农业社看看吧。”

一行人换乘轿车行至包河，毛泽东问坐在身边的刘学勤：

“这是什么河？”

刘学勤回答说：

“这是包河，传说是宋代包拯运粮时挖的河。”

毛泽东问起刘学勤的简历，刘学勤说他在日军占领家乡永城时，被迫失学。毛泽东微笑着说：

“日军侵入中国，占领永城，把你的读书时间也占领了。你现在还有时间学习吗？读的什么书？”

刘学勤说：

“现在工作很紧张，读书不多。”

毛泽东说：

“要挤些时间学习《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他在这一年已经先后把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读了3遍。后来，也就是他同刘学勤说这话3个月后，在第1次郑州会议上，他正式向全党提出了要学习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再说轿车驶入一望无际的田野，毛泽东问刘学勤：

“农民喜欢吃小米吗？”

刘学勤说，喜欢。毛泽东又说：

“我们靠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打垮了蒋介石，农作物改革不要把谷子给改掉了。”

说话间，车队驶入道口乡大院，商丘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苏学诗上前把车门打开，请毛泽东进屋休息。毛泽东同道口乡乡长唐崇举握手后，走进办公室，见墙上挂有几面锦旗，其中有一面是1957年7月湖北省洪湖县文教参观团赠送的，上面写着：“你们是向文化技术革命进军的一面红旗，向你们学习”，他指着锦旗上的字，问道：

“懂不懂这上面写的意思？什么叫文化技术革命？”

刘学勤说：

“学习文化知识，搞技术革命。”

毛泽东听罢，没有吱声，深深地吸了几口烟。这是他思考问题的习惯。稍事休息之后，毛泽东一行向黄楼村走去。刘学勤问道：

“主席是先看食堂，还是先看农业？”

毛泽东说：

“先看农业。”

下午4点，毛泽东来到了黄楼村的试验田旁边，在一道门前停了下来，仔细地看着门上的一行字，只见写的是：“道口乡中华一社七一试验站”。他问刘学勤：

“这是什么门？”

刘学勤说：

“这是跃进门。是欢迎中央军委检查团时搭的，一共搭了4个，一是表示欢迎的意思，再者是表明黄楼村人一个跃进接着一个跃进，一个高潮接着一个高潮。”

毛泽东来到打井工地，问正在打井的小伙子：

“这井能打多深？多长时间能打好？”

苏学诗说：

“这口井打15丈深，要打25天。”

站在一旁的乡长唐崇举插话说：

“这个小伙子是才学习打井的。”

毛泽东对这位充满活力的18岁年轻人颇有好感，握着他的手满意地说：

“很好！”

他来到一块红薯试验田，问道：

“这是谁搞的试验田？”

乡党委书记徐家林说：

“这是社干部的试验田，2亩麦茬红薯，翻地2尺深，每亩种5000棵，计划亩产13000斤。”

地委副书记王林为了证实将来丰产，走进田里，扒出来一个红薯，一看个头却不大。史向生感到不满意，自己也上去扒出一个，也不大。王林又找到了一棵看上去挺壮实的红薯，准备再扒一个。毛泽东平静地说：

“红薯长势很好，不要再扒了。”

说着转身走向另一块红薯地。徐家林介绍说：

“这是我搞的。施肥30万斤，计划亩产13000多斤。”

毛泽东已经开始怀疑了，他说：

“**亩产13000多斤？秋后我再来看！**”

他走到稻田旁边，问道：

“稻田里为什么没有水？”

徐家林立即回答：

“刚断水一晌，现在要拔草呢。”

毛泽东说：

“不要放水拔草，可以用脚把草踩下去做肥料。”

他问起1亩水稻有多少墩苗？亩产多少斤？徐家林说：

“1亩3万墩苗，计划亩产1500斤。”

毛泽东听后不再说话，只是看地头上插着的牌子，上面写的是施肥数字，预计的产量。他又看了社里搞的人造尿池，问问它的结构和人造尿的制作方法及肥料效能，就朝着停放轿车的商单公路走去。

此时，已经是下午5点了，黄楼村的群众早已将车队围了个水泄不通。他们见毛泽东来了，一边喊着“毛主席万岁”，一边往前挤，都想与毛泽东握握手。

汽车已经启动了，小伙子杨邦福拼命地挤了上来，推开已经伸出手的曹效兰，把手伸进车窗里握住了毛泽东的手。车子开走了，曹效兰就埋怨杨邦福，杨邦福却只顾一个劲儿地喊：

“我和毛主席握手啦！我和毛主席握手啦！”

毛泽东在车里听着后边的一片欢闹声，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问刘学勤：

“你相信他那亩产13000多斤的试验田吗？”

刘学勤老老实实地说：

“我不相信。”

毛泽东说：

“**脑子太热，没有科学根据，不符合实际嘛。**过去亩产多少斤？”

刘学勤说：

“也不过2000斤上下。”

毛泽东说：

**“过去2000斤，今年真能搞四五千斤，就翻了番，就很好了。给下面打招呼，不要提万斤口号。”**

**毛泽东觉得刘学勤是一个老实人，**后来他在1959年2月第2次郑州会议期间，还没有忘记刘学勤，专门请刘学勤到郑州去谈试验田的结果。

毛泽东走后，商丘领导人于当天晚上就召开了地、县、乡3级党委会议，传达了毛泽东不要提万斤口号的谈话精神。3级党委会一结束，各级党委又分别召开了干部大会。

后来，商丘人民为了纪念毛泽东在商丘视察工作，在道口乡黄楼村修建了纪念馆，还将道口乡改名为双八镇，将黄楼村改名为双八村。

欲知毛泽东此后到何处视察？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本章末毛泽东和刘学勤的一段对话，很值得注意。关于亩产13000多斤的红薯试验田，他说：“**脑子太热，没有科学根据，不符合实际嘛。**”**“过去2000斤，今年真能搞四五千斤，就翻了番，就很好了。给下面打招呼，不要提万斤口号。”**这是毛泽东在大跃进初期就开始反对浮夸风的一个重要例证！

**第55章**

**“不要搞农场，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和政府合一了，它的好**

**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

话说1958年8月8日下午5时多，毛泽东返回专列，离开河南去山东济南。

下午6时35分，专列途经砀山，毛泽东与砀山县委负责人刘钦鉴、薛兆本、张启明、刘思谈话。他望着面前的这几位县委负责人，亲切地问他们叫什么名字，哪个地方的人？4人介绍了各自的情况。毛泽东说：

“你们两个山东，一个河南，一个江苏，还没有安徽人呀！要注意培养地方干部。”

他又问县委当前抓些什么工作，刘钦鉴等人做了汇报。他接着问：你们这里主要种植什么作物，生产什么东西？刘钦鉴回答说：

“夏季主要生产小麦，秋季生产大豆和杂粮。”

当听到砀山县水果连年丰收，粮食、皮棉当年可望好收成时，毛泽东高兴地打开车窗，望着窗外成片的良田说：

“好，多努力干呀！”

20多分钟过去了，毛泽东最后说：

“很好，就这样吧，今天不准备下车了，谈到这里，以后再来，你们看怎样？”

说着，他起身和大家握手告别。

下午7时许，专列驶离砀山站，途经徐州时，毛泽东在车上接见了徐州地区专员梁如仁、市长张洪范。毛泽东向他们了解有关工农业生产等方面的情况，他说：

“徐州应成为重要的工业城市，成为抚顺。你们要抓煤炭综合利用，抓粮食，抓钢铁，还要抓机械制造。”

毛泽东还说：

“农业要增产。要多养猪，多积农家肥和自然肥。多搞有机肥。徐州地区过去经常多灾，你们要想办法，打它100亿斤粮食！”

他还问道：

“你们那位地委书记，四川人，到哪里去了？”

梁如仁回答说：

“胡宏同志已调南京，在省里工作了，现在正参加全省农业大检查。”

毛泽东说：

“这样很好，一边检查，一边帮助你们干。”

是日晚9时，毛泽东离开徐州。

8月9日凌晨1时，毛泽东的专列经兖州车站，济宁地委书记高逢五、副书记兼滕县县委第一书记王吉德以及滋阳县委书记和两个村支部书记，在山东省委副秘书长谢华的带领下，登上列车。毛泽东分别问了大家的姓名、年龄、籍贯、家庭情况等。他看到王吉德挽着裤腿，腿上还有泥星，便说：

“不用问，你是农民出身。”

他从桌子上抽出一支香烟递给王吉德，问王吉德什么职务。王吉德回答说：

“我是滕县县委第一书记。”

毛泽东幽默地笑着说：

“噢！那你就是滕小国的国王了！”

大家被他的话逗笑了。毛泽东又问：

“滕小国在哪个地方？”

王吉德回答：

“在滕县城西十几里的滕城村。”

“孟子在滕小国的古迹还有没有？”

“还有，滕城有文公台，县城内有铁牌坊。”

毛泽东说：

“铁牌坊与孟子无关系。滕文公请孟子来讲学，孟子馆于上宫嘛！上宫还有没有？”

王吉德说：

“我不知道，没有注意过。”

毛泽东说：

“当地方官，都应该了解地方的历史嘛！滕县离微山湖很近，微山湖的鲤鱼是4个鼻孔知道不知道？”

王吉德说：

“不知道。”

毛泽东笑着说：

“你这个人很实在，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他看王吉德手上的烟快抽完了，就又抽出一支烟递给王吉德，问道：

“你们那里亩产多少？”

王吉德回答说：

“我们的小麦亩产227斤。”

毛泽东问：

“去年亩产多少？”

王吉德说：

“去年亩产126斤”

毛泽东点了点头，随后又问起近两年菏泽、济宁的水灾。王吉德说：

“滕县也发了大水，灾情较为严重。”

毛泽东抽了口烟，望着王吉德说：

“大水也跑到你们那里啦？”

王吉德说：

“今年淹了9万亩，去年灾大一些，淹了81万亩。”

毛泽东又问：

“你们那里有多少地？”

王吉德回答：

“210万亩土地。”

毛泽东又问了济宁地委书记高逢五济宁全区的水灾情况，接着又问王吉德：

“你们那里群众觉得办大社好，还是小社好？”

王吉德说：

“社大好些，有利于抗灾，有利于兴修水利等。我们准备搞5000户的一乡一社。”

**毛泽东对于社大了好，还是社小了好？是叫“联社”、“集体农庄”，还是叫人民公社？一直在调查着，思考着。**他听了王吉德的回答，便说：

“搞大一点好，可以搞五六千户万把户。”

8月9日凌晨3点，毛泽东的专列到达泰安站。泰安地委副书记李元明，地区农村工作部部长张瑞周、泰安县委副书记张海涛、泰安县十区灯塔一社社长尚立祥应召登上专列。毛泽东点着一支香烟，笑着说：

“怎么你们当中我一个也不认识？”

李元明说：

“我们都是第一次见到主席。”

毛泽东说：

“是1955年吧，我来过一趟。”

李元明说：

“那一次见主席的是地委书记刘众前等同志，现在他们都去寿张县参观去了，县委第一书记、乡党委书记也去了，还没有回来。”

毛泽东问：

“你们地区有多少县？多少户？多少人口？”

李元明说：

“共9个县，一个市，105万户，840多万人口。”

毛泽东问：

“你们想谈什么？”

李元明说：

“我们想汇报当前的工作情况，请主席做些指导。”

毛泽东说：

“你们的粮食情况怎么样？”

李元明回答：

“粮食情况比往年好得多。”

“你说说怎么个好法？”

“今年比往年增产，今年小麦亩产162斤，总产8.5亿斤，较去年增产36%多一点。”

“去年小麦产量是多少？”

张瑞周接过去回答说：

“1957年小麦亩产119斤，总产6.2亿多斤。”

毛泽东问：

“秋季怎样？能收多少？”

李元明回答：

“今年原计划全年亩产500斤，争取600斤。最近又修订为保证每亩产600斤，争取700斤，总产达到52亿多斤到60亿斤以上。从目前作物生长情况来看，完全有可能实现这个指标。”

毛泽东问：

“去年粮食产量是多少？”

李元明说：

“亩产230多斤，总产量20亿斤多一点。”

毛泽东带有怀疑的口气问：

“增产一倍以上到二倍，能达到吗？”

他把话锋一转，问起水利问题：

“你们这里有个东平湖，还有一个东平县？”

“是。”李元明回答说：“东平湖在黄河下游，是黄河泄洪的地方。”

毛泽东问：

“位山工程动工了没有？”

李元明说：

“东平湖新堤已经动员21万民工于8月5日动工，何时竣工还不清楚。”

毛泽东问：

“位山坝恐怕不像修堤那样容易，需花费较长时间。位山工程搞起来，你们有受益的没有？”

李元明说：

“东平县有两个区受益。”

毛泽东说：

“受益的还有菏泽、济宁嘛！”

李元明补充说：

“聊城地区也能受益。”

毛泽东又问：

“怎样受益？”

李元明说：

“聊城的虹吸管工程到春季缺水不能满足需要。”

毛泽东说：

“只靠位山不行，黄河要有一系列工程，如三门峡等工程都搞，作用才大。”

他又问：

“你们的水利怎样？”

李元明回答说：

“我区水利化主要靠汶河，去冬今春已在上游山区修了一些中小型水库，今冬准备在中下游再搞些大型水库，将天上落下来的水基本上控制起来。另外和地下水结合，以汶河引黄加上人造河道为骨干，整修各河道，逐渐搞成平原地区的河网化。”

毛泽东把话题转向办社问题，他问：

“合作社怎样？规模多大？”

张瑞周回答说：

“泰安地区有650多个社，平均不到300户。社的规模太小，已不适应生产大跃进的新形势。计划合并到200余个。”

李元明说：

“这是过去的计划，目前看规模仍然小一点。现在酝酿搞成一乡一社，使党、政、社合一。”

毛泽东问：

“一乡多少户？”

张海涛回答说：

“8000至一万户。”

毛泽东沉思了一下问：

“这样多的户一个社好搞吗？是否过大？”

张海涛说：

“还未定案，需要进一步研究。”

毛泽东又问了泰山的情况，他说：

“你们这里有个泰山很大，底下可能有不少铁。”

李元明说：

“泰山的西、北、东3面都已发现铁矿，只是山的前面还没有发现。”

毛泽东又问：

“你们泰安过去有个泰安府，出去不远就是泰山，到山顶有60里路吗？”

李元明说：

“没有这么远，据说约有40华里。”

毛泽东问：

“现在逛泰山的人还很多么？”

李元明说：

“过去不少，生产大跃进以来，逛山的人少多了。”

毛泽东说：

“现在少了，再过两年逛山的人就又多了。”

座谈会结束后，毛泽东的专列开往济南。

8月9日晨，专列抵达济南。山东省委第二书记谭启龙、书记处书记裴孟飞向毛泽东汇报了山东省的各项工作情况。毛泽东在谈话中特别强调部署各项工作必须通过群众鸣放辩论，他说：

“计划、指标不经过群众辩论，主意是你们的，辩论后，群众自己是主人了，干劲自然更足。”

他还强调领导必须多到下面去看，以便帮助基层干部总结经验，就地进行指导。

下午3时，毛泽东在省交际处一号楼会议室召集省委书记处书记夏征农、聊城地委书记朱永顺、寿张县委书记刘传友、寿张台前村支部书记刘秀印座谈。

据朱永顺回忆：“主席面带微笑，同我们一一握手。当主席握住我的手时问：

‘好面熟啊，叫什么名字？’

我说：

‘朱永顺。’

毛主席示意我们坐下。夏征农把我们一一介绍给毛主席。主席把目光先朝向夏征农同志说：‘你是省里的。’又朝向我说，‘你是地委的。’再朝向刘传友同志说，‘你是县委的。’又朝向刘秀印同志说，‘你是村里的。’接着又说，‘我是中央的。’然后主席扳着手指说：

‘中央、省、地、县、村，共5级，叫5级会议。’

大家听了主席这番话都笑了，主席也笑了。我接着对主席说：

‘主席，我这是第二次向您汇报工作了。’

主席说：

‘噢！第一次呢？’

我说第一次是1955年底在德州火车站列车上。主席说：

‘那次我从北京出发，一路上找河北、山东、江苏的几个地委书记谈了话，大家都讲了农业合作化的问题。’

主席问我：

‘你什么时候去的聊城？’

我答：

‘1956年调整区划，撤销德州，我去聊城。’

主席问：

‘聊城过去叫东昌府，是吗？’

我说，是的。主席问：

‘为什么叫东昌府？’

我说不知道。于是主席就讲了为什么叫东昌府的典故。然后又说，‘东昌府是当年梁山好汉活动的地方。’接着给我们讲述了几段梁山好汉在东昌府一带活动的历史传说。主席问刘传友：

‘寿张历史上有个张君义，九世同堂，有没有这回事？’

刘传友回答：

‘有。在寿张城东关，至今还有张公祠遗址。’

主席说：

‘寿张县，原来叫寿阳县，后来为了纪念这位张公，把寿阳县改称寿张县。’

毛主席点燃一支香烟，边抽边向我们说：

‘大家有什么好消息啊？’

我汇报了聊城地区的工作，当我谈到聊城地委在寿张县关门口村召开全地区县、区委书记参加的现场会，学习参观和推广该村大搞‘人造肥’的经验时，他打断我的话问：

‘什么？什么叫人造肥？你详细地讲一讲。’

我告诉主席，‘人造肥’是当地农民自己叫起来的，合作社在村头地边挖一定大小和深浅的土坑，将人畜粪便和田间路边的杂草、农作物秸秆掺在一起，加上一定比例的土和水，密封沤制，经过一定时间，达到变黑、发臭的程度后，便可上地。每亩地施上10多车这样的‘人造肥’，可增产粮食二三十斤，丰产田里增产更多。毛主席问我，这种肥料含些什么成分？我说没有进行过化验，我说不清楚。毛主席就给我们讲了一大段关于有机质肥料的科学知识。讲了人的粪肥含些什么成分，牲畜粪便含些什么成分，鸡鸭粪便含些什么成分，经过沤制后发生哪些变化，产出些什么新成分等等，讲完后主席说：

‘你们可以让农业科学部门化验一下。’

刘传友汇报了寿张县的工作。他‘口吃’较重，主席听得很吃力，但仍坚持倾听。大约10多分钟后，毛主席把目光转向了我，摆摆手说：

‘你！你来，你给我当翻译。’

大家都笑了，刘传友也笑了，毛主席更是笑出了声。刘秀印简单汇报了他们村大搞丰产田的情况。我们3个人汇报的中心都是围绕如何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规定的粮食指标（黄河以北亩产400斤）和棉花指标；如何按照农业八字宪法要求，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改变农业生产条件；如何大搞养猪积肥，以及如何加强防洪确保黄河和漳卫运河安全等等。主席认真地听我们的汇报，有时拿起铅笔作记录，并多次插话和提问。当汇报到打井下泉提取深层水时，主席问下泉用什么材料；当汇报到扩大东阿、齐河两县虹吸引黄灌溉面积时，主席问虹吸引黄能不能代替打井；当汇报到深翻土地、翻淤压沙、翻沙压淤改良土壤时，主席说：

‘淤土掺上沙土，就不板结了。’

当我汇报到集中产棉区临清县老赵庄黎明农业生产合作社粮棉双高产，1957年皮棉亩产73斤，粮食亩产478斤，提前实现《纲要》规定的黄河以北粮食亩产400斤指标，不但向国家贡献大量皮棉，而且做到粮食自给时，毛主席说：

‘粮棉双增产，很好。’

当我汇报到聊城地区计划扩大引黄灌溉面积，除扩大已建成的位山、艾山、官庄、南坦、王家窑、大王庙等处虹吸引黄灌溉面积外，正在突击修建东阿县位山引黄闸工程，争取当年完成第一期工程，扩大灌溉面积200万亩时，主席听了很高兴。我说这样既利用地下水，又充分利用地上水，实现了‘双保险’。主席一边点头、一边说：

‘双保险这个办法好！’

这次向毛主席汇报，共进行了1小时50分钟。”

汇报结束后，毛泽东由谭启龙、裴孟飞和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以及历城县委第一书记吕少泉陪同，视察了历城县北园农业合作社。毛泽东看到路旁的谷子长得秸秆粗壮，叶子墨绿，沉甸甸的谷穗在风中摇曳，高兴地说：

“你们的谷子长得不错嘛，我看群众的干劲不小。”

北园乡有2500多亩藕田和2100多亩稻田。毛泽东和北园乡北园社的干部们一一握手问候后，便开始视察藕田和稻田。他问北园农业社的主任李树成，水稻是什么品种，什么时间收割，亩产多少斤？李树成一一作了回答。他问到计划产量，社主任说：

**“50亩高额丰产田，原来计划亩产两万斤，现在我们要争取产4万斤，**过去每亩只产二三百斤。”

**毛泽东越听越感到社主任的话不靠谱，就说：**

**“你这个人，不干就不干，一干就干大的。”**

他看到路旁一些社员正在一个稻草棚里休息，用手指着问：

“他们是干什么的？”

李树成回答：

“他们就是管理试验田的社员。”

毛泽东兴致勃勃地向草棚走去。首先看见毛泽东的几个社员不约而同地喊出了声：“毛主席来了！”争先恐后从窝棚里跑出来。毛泽东已走到跟前，有些社员还没有来得及出窝棚，毛泽东便弯腰走进矮小的窝棚和社员们一一握手。社员们有些手上沾满了泥，有的忙往自己衣服上搓泥巴，有的还没来得及搓，毛泽东就把手伸过去，一把握住农民沾满泥巴的手。他抚摸着青年韩茂林的头，亲切地问他多大岁数。当韩茂林回答17岁时，毛泽东笑着说：

“你还是个娃娃呢！”

他又握着孙守法的手和蔼地问：

“你今年多大岁数啦？”

孙守法说：

“今年47岁啦。”

毛泽东勉励他说：

“那就是个技术员啰！”

他来到一株大槐树下坐下来。**社主任李树成向他汇报了北园办大社的情况。汇报中，李树成向毛泽东请示规模这样大的社是叫“大社”好，还是叫“农场”或“农庄”好？毛泽东没有回答，**他站起来，继续往前走去，边走边问李树成：

“怎么没有见到妇女参加劳动？”

李树成回答：

“妇女都在菜地里。”

毛泽东说：

“在我们南方，大部分都是妇女插秧。”

**谭启龙向毛泽东汇报说，他们准备把北园办成一个大农场。毛泽东说：**

**“不要搞农场，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和政府合一了，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

离开北园农业社，毛泽东要到山东省农业科学院棉花试验田视察。省委办公厅立即打电话给农科院办公室说：

“中央首长要到农科院棉花试验田视察，你们要安排人向领导介绍情况。”

农科院院长和副院长棉花专家秦杰，马上通知试验田负责人曹伯强，一同到大门口迎候中央首长。

下午6时，5辆轿车一溜烟似的开到了省农业科学院的大门口，先下车的是省委第二书记谭启龙、书记处书记裴孟飞，以及省委办公厅的负责人和摄影记者。毛泽东从中间的车子里走了出来。秦杰等人十分激动地迎上去，欢迎毛泽东。在去看棉花试验田的路上，毛泽东问秦杰：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秦杰。”

“是秦还是陈？”

毛泽东带着浓重的湖南口音问。秦杰说：

“秦始皇的那个秦。”

毛泽东微笑着幽默地说：

“噢，秦始皇时代还留下你呀！”

秦杰和在场的人都被逗笑了，毛泽东又问：

“你是什么专家？”

秦杰说：

“研究棉花的，曾在浙江大学上过学。”

众人来到一块由山东省委和农科院合种的棉花试验田里，见棵棵棉杆都长得有一人高。秦杰向毛泽东汇报说：

“这70亩棉花，是几年来生长最好的一年。”

他又把毛泽东领到一块地前，指着说：

“这一亩是高产试验田，一亩4000株，每株已有五六十个棉蕾了。”

毛泽东问：

“你们估产籽棉多少斤？”

秦杰回答：

“计划是800斤。”

“能达到吗？”

“有希望，长势喜人。”

毛泽东躬下身，拨开棉棵，抓住一株棉花和秦杰一起从根部往上数着棉桃。曹伯强等人也躬身帮着数，顶部还有正开着花的花蕾。当数到64个时，毛泽东手指着上边的花蕾说：

“上边这些就不算了。很好。你们的计划有可能实现。这株棉花，个头不高可棉蕾是满的，和舒同一样，个头不高可很充实呢！”

毛泽东拿他们的省委第一书记开玩笑，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秦杰说：

“过去搞得不好，主要是今年省委负责同志亲自到这里来指导我们，才搞得这样。”

毛泽东诙谐地说：

“是应该压迫你们一下，不压迫，你们就不会上梁山。”

他又问：

“一亩4000株，还能再加密吗？”

秦杰说：

“再密就要影响通风透光，光照不足，不能高产。”

毛泽东问：

“这土地是深翻过的吗？”

秦杰回答：

“是深翻过的，是很肥沃的土地。”

“施多少肥？”

“万斤土肥，化肥120斤，是分期实施的。浇水也适时。”

“棉种呢？什么种子？”

“是培育的品种，岱字棉15号。植保治虫很及时，棉蚜、红蜘蛛也出现过，防治及时都下去了。”

“影响棉花高产的是什么？”

“目前主要是落蕾没解决，棉的花蕾可以长到80多个，落掉的约占20%至30%，如果能控制住落蕾，那产量更高了。”

毛泽东说：

“棉桃脱落是下雨的原因呢？还是其他原因？你们要研究一下为什么落桃的问题，是否研究个办法，叫它少落或不落。”

秦杰表示一定照主席说的去办。毛泽东问他：

“你们行还是农民行？”

秦杰说：

“还是农民行，我们在向农民学习。我们的小麦就没有农民最好的小麦产量高。我们打算明年超过农民。”

毛泽东很满意，说：

“那很好。你们要继续努力，力争上游。”

此时，天阴了下来，还下起了小雨。谭启龙说：

“下雨了，我们走吧。”

毛泽东向农科院众人挥手告别，由随行人员打着伞上了车，向济南市里驶去。

第二天，《人民日报》、《大众日报》均在头版头条位置上登载了毛泽东视察山东农科院的消息。

后来在11月份，毛泽东看过的这一亩试验田棉花，籽棉的实际产量是1000斤，折合皮棉350斤。毛泽东数过棉桃的那一株棉花，研究人员将它移植到温室里，第二年长了一些小的棉桃。后来，他们将这一株棉花移植在玻璃箱里，放在展览室，保存了很久很久。

再说毛泽东回到济南市区后，由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济南部队司令员杨得志上将陪同，和济南部队党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见面并合影留念。长征时期做过毛泽东警卫员的陈昌奉也在场，二人久别重逢，分外亲热，谈了不少话。

毛泽东在济南停留期间，还会见了来济南参观全省小麦丰产评比展览馆的著名劳动模范、农业社的干部吕鸿宾、刘秀印、刘洪章、徐建春、刘廷茂、厉月举、张式瑞等人。毛泽东勉励他们说：

“你们干得很好，都鼓足了干劲。”

欲知毛泽东下一站到何地视察？请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东方翁曰：毛泽东处理国家大事历来是未雨绸缪，经过调查研究，深思熟虑而后行。本章及前边讲到的关于人民公社的思考，便是一个典型的例证。1958年7月1日《红旗》杂志第3期发表的《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一文，概括毛泽东的谈话精神是：**“把一个合作社变成一个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的基层组织单位，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这一天，陈伯达在北京大学发表的《在毛泽东的旗帜下》的讲演，透露了**毛泽东上述关于人民公社的构想**。他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农、商、学、兵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这都说明，毛泽东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是叫“联社”或“集体农庄”，还是叫人民公社？是社大了好，还是社小了好？一直都在调查着、思考着。**当他看到“**余江县人民消灭了血吸虫病”**的消息之时，兴奋得诗兴大发，随即写出了七律二首《送瘟神》。封耀松听他吟诵的诗句，称赞说：“真好，太好了！”毛泽东却脱口而出，说道：**“告诉你吧，是我们的人民公社好，太好了！”**后来在8月4日至13日，他不辞劳苦，乘车南下一路视察，其中一个重要目的仍然是研究“办大社好，还是小社好？”直到他对谭启龙说：**“不要搞农场，还是办人民公社好”，**说明他对人民公社的思考已经成熟了。

**第56章**

**“吹牛，靠不住。我是种过地的，亩产10万斤？堆也堆**

**不起来嘛！娃娃，莫要上去。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

话说1958年8月9日晚，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刘子厚的警卫员小李风风火火地来到刘子厚的秘书李光柏家里，他说：

“有紧急任务，省长要你马上去。”

李光柏马上穿好衣服，和小李立即乘车直驱天津市干部俱乐部去见刘子厚。刘子厚吩咐李光柏说：

“今天晚上，毛主席要来天津视察工作，你要回到办公室值夜班，主席的专列一到，省公安厅有人会来电话通知，你就马上告诉我和李耕涛同志，去迎接毛主席。”

这一夜，李光柏坐在电话机旁，一直等到次日凌晨3点钟，省公安厅领导来电话说：

“毛主席的专列已经到了天津，停在河北区转盘村的叉道上，请刘省长他们去接毛主席。”

李光柏即刻转告了刘子厚和天津市长李耕涛。刘子厚嘱咐李光柏继续守着电话值班，他和李耕涛立即到专列上向毛泽东汇报工作。

8月10日中午，李光柏接到电话，叫他通知主管农业的省委书记处书记阎达开，马上到专列上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李光柏通知了阎达开，并同阎达开一道乘车前往。

中午12点以后，列车上通知工作人员们吃午餐，大家一起进了餐车。这一顿午餐，既有葡萄酒，也有“狗不理包子”。

下午4点多，毛泽东由刘子厚、阎达开、李耕涛陪同，视察天津市东郊四合庄乡新立村农业社。毛泽东头戴一顶草帽，走在新立村的田埂上。东郊区委书记曾国栋、区长张福安、乡总支副书记孟繁兴、社主任徐树清、社支部书记王星元正走出村外，刚好迎上毛泽东。毛泽东同他们一一握手，大家都问候毛泽东说：

“毛主席好！”“毛主席好！”

毛泽东走过小溪上的桥，来到稻田边，指着田埂上插着写有“上游”的红旗，问道：

“上游是什么意思？”

张福安说：

“社里在稻田管理中，10天各队评比一次，评比后，一类苗插上游旗，二类苗插中游旗，三类苗插下游旗。这样做的目的是促使二三类苗赶上一类苗。”

毛泽东说：

“下游了怎么赶？能不能赶呀？”

张福安说：

“能赶，下游苗只要多施肥，加强后期管理，就能赶上上游苗。”

他指着其中一块已插上“上游”旗的稻田说：

“这是4队的稻田，原来都是‘中游’，评比后，社员们管理加上了劲儿，半月工夫，就争到了‘上游’。”

毛泽东听了，点点头笑了。他顺着稻田边走，贴在社员赵益和家后墙上的大字报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拐过几条田埂走过去，看了看，上面写的是第5生产队力争全区第一的内容。他很感兴趣地念了一遍，特别注意其中写的争第一的生产措施。细细地看完了大字报，他才走进5队的稻田，突然侧身问曾国栋：

“这块稻田有多少墩苗？”

曾国栋回答说：

“这块稻田共有300多亩，每亩平均两万墩，每墩合二十七八株。”

毛泽东蹲下身，用手分数着稻株，回头问：

“这片稻田是否都是这样？”

社干部说都是这样。毛泽东站起身来，乡总支副书记孟繁兴说：

“主席，里边还有一块密植22000多墩的试验田呢！”

毛泽东说：

“好，咱们去看一看。”

热辣辣的太阳和地里的蒸气使毛泽东汗流浃背。来到那块试验田前，孟繁兴**向毛泽东汇报说：这块稻子亩产可以达到10万斤。毛泽东摇摇头，表示不相信，他说：**

**“不可能的事！”**

他又指着一位领导干部说：

**“你没有种过地，这不是放卫星，这是放大炮。”**

**那位领导干部解释说：**

**“新立村的同志们用电灯为水稻照明，用鼓风机朝水稻里吹风，说可以亩产10万斤。”**

**毛泽东仍然摇头，说：**

**“吹牛，靠不住。我是种过地的，亩产10万斤？堆也堆不起来嘛！”**

**有人为了证明亩产10万斤的可靠性，让小孩子往水稻上站。毛泽东摇头说：**

**“娃娃，莫要上去。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

后来，报纸上还是登出了天津新立村水稻亩产突破10万斤大关的消息。那些新闻记者们可是没有他们不敢说不敢吹不敢干的事情。

再说这时毛泽东看到稻田旁水沟里漂着许多小草，便停住脚步，问：

“这是一种什么草，有什么用处？”

社员李顺弟跳下水沟捞出一把草，递给毛泽东说：

“这是带子草，可以喂猪喂鸭子。”

毛泽东接过水淋淋的带子草，仔细看看，笑着说：

“哦，可以喂猪喂鸭，这沟里是不是还可以养鱼啊？”

社干部说：

“可以养，将来我们准备要养鱼的。”

此时，这一带的社员们听说毛泽东来了，都纷纷赶了来，不少人高呼：“毛主席万岁！”毛泽东不断地向社员们挥手致意。他问身边的技术员冯维雄：

“你们是哪里来的呀？”

冯维雄说他们是中国科学院的，到这里主要是为了考察稻田试验。毛泽东又指着他手里拿着的网兜问，这是做什么用？冯维雄说，是在稻田里捕捉虫子用的。毛泽东笑着说：

“我看像个打鱼的东西。”

人们“哄”的一声笑了。

8月10日晚，毛泽东从云南路别墅坐车到马场道尽西头的天津干部俱乐部参加晚会。晚会中途，他不声不响下楼，乘车返回杨村附近的专列，继续工作。

8月11日下午3点，毛泽东参观了天津进出口商品陈列馆。他仔细地观看着展品，不时询问展品的质量、性能、产地及出口创汇等情况。他对进出口贸易工作非常关心，指示要搞好进出口贸易，多出口，多创汇。他期望天津作为北方的进出口基地，能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毛泽东在展览馆参观了三四个小时，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奋进，力争各种产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晚上，毛泽东回到专列上工作。

8月12日晚8点，毛泽东在河北省长刘子厚、天津市长李耕涛的陪同下，到天津市第二文化宫参观“工业技术革命展览”。

展览大厅里灯火辉煌，毛泽东来到“东风馆”天津拖拉机制造厂的产品前。厂长刘树英指着一项产品告诉毛泽东说：这是一项新技术，它用高周波电滚，将齿轮毛胚加热以后，就直接用机器轧成齿界限，效率比用机床加工提高10到50倍，可以节省25%的钢材。在国产矽胶的展品前，毛泽东亲切地接见了成功研制矽胶的21岁青年工人孙守纲。他弯腰伏在展台前，一行一行地看各国的矽胶样品和质量比较表，得知孙守纲研制的这种矽胶吸酸能力超过英国和日本的同类产品时，赞扬说，好。接着，他又参观了重工业、机电工业展览。毛泽东看到一幅图表上写着：气筒质量超过美国。他笑着问：

“气筒也在赶？”

讲解员介绍说：

“我国的气筒能打气250磅，美国的只能打150磅。”

李耕涛一语双关地说：

“我们的气要比他们打得足。”

一句话说得毛泽东和周围的人都笑了。一行人来到休息室里，毛泽东关心地询问起天津工业大跃进以来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李耕涛市长说，当前主要问题是原材料供应不足，同其他地区协作也有些困难。毛泽东点燃了一支烟，说道：

“地方应该想办法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首先是协作区，然后是省，只要有条件，都应建立比较独立的但又是情况不同的工业体系。你们应该自己想办法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华北几个省建立联系可以搞一个大的体系。你们能不能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来？3年怎么样？”

刘子厚说：

“现在开始向独立体系搞，三五年能够建立起来。”

天津地委第一书记赵克向毛泽东汇报了在非山区组织群众到山区开矿、大搞钢铁的情况。

这一时期，毛泽东一直关注着党内两种思想：一种是不了解抓粮食和钢铁的重要性；一种是只抓钢铁，看不到抓粮食的重要性，认为只要有了钢铁，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了。毛泽东认为，**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吃饭问题十分严重，客观实际不允许只抓钢铁，不重视粮食，解决吃饭问题只能靠自己解决，别的国家和地区是无法满足中国粮食需求的。**他听了赵克的汇报，高兴地说：

**“一个粮食，一个钢铁，有了这两个东西，就什么都可以搞了。”**

毛泽东问及天津制造大型设备的工作，他认为要抓紧，早些安装使用起来。他听说天津几个发电厂的修配工正在制造发电机，便说：

“这个办法很好。发电厂为什么只能发电而不能制造发电机呢？可以扩大一点，固定一些工人，成为发电厂附带的车间。”

休息一会儿后，毛泽东接着参观化工、纺织和毛麻丝工业、手工业、轻工业展览馆。

他顺着展台边走边看，迎面跑来一个青年人热情地向他伸出手。有人介绍说，这是研究不用染料染丝绸的青年技术员梁树楷。毛泽东问：

“你的发明在哪里？”

梁树楷便引着毛泽东走到排着一匹匹粉、浅黄、棕色丝绸的旁边，说：

“这就是不用染料染成的。”

毛泽东说：

“颜色怎么不太多呀！”

梁树楷解释说：

“这是拿来的一部分，还有色泽更好看的，没拿到展览会上。我们还准备染出更多的色，到北京向您献礼。”

“谢谢你们。”毛泽东说完，便仔细询问观看了染色用的原料，并说：

“我在报上见到过你的名字。”

梁树楷连忙谦虚地说：

“这办法是在党和上级领导的大力支持下试验成功的。”

毛泽东在第二文化宫参观了近3个小时，才与展馆的工作人员一一握手告别。刘子厚将毛泽东送到专列上，已经是午夜时分了。他嘱咐秘书李光柏说：

“你在办公室继续值班，随时准备接毛主席专列上的电话，得到主席去北戴河的消息，及早通知我和李市长，为毛主席送行。”

8月13日早晨7点钟，李光柏接到毛泽东专列上打来的电话，通知说：

“主席今天特别高兴，他改变了原定去北戴河的计划，还要在天津继续参观一天，先参观南开、天津两所大学的科技展览和校办工厂，中午在天津正阳春烤鸭店就餐。参观时间从上午10点开始。”

李光柏不敢怠慢，立即向刘子厚做了汇报，刘子厚说：

“马上通知李市长，要求省公安厅迅速做好参观的严密的保卫工作，通知两所大学和正阳春烤鸭店，充分做好毛主席视察和就餐的准备工作。”

这天上午，毛泽东在专列上起床后喝茶看报，他扫了一眼《人民日报》，忽然拍案叫道：

“哎呀，糟糕！捅出去了！事先没讨论呢，政治局还没有讨论！”

原来，跟随毛泽东的记者未经毛泽东批准，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位置，发表了毛泽东和谭启龙在8月9日的谈话，并加了套红。报道中写道：毛主席称赞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

后来有人向毛泽东提问这个问题，毛泽东说：

“这个话我是讲了，是我没慎重。也不能全怪记者。但是已经捅出去了，怎么办呢？”

从此，这个口号传遍了大江南北，全国许多地方相继效仿。这是毛泽东没有料到的，他深有感触地说：

“以后再也不让新闻记者跟着了。”

后来，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与会者们通过了“人民公社”这一提法，没有人提出不同意见。此是后事。

再说8月13日上午，毛泽东下了专列，前往南开大学参观。

这天上午10点前，天津市委主管文教工作的书记处书记王亢之，先期到达南开大学，与南开大学校长、党委书记一起迎接毛泽东。

毛泽东一下车，就被大学生们认出来了，他们簇拥着毛泽东和省长、市长、校长，进了校门南面的一个院落里，参观化工系办的“敌百虫工厂”，接着又参观了“离子交换器工厂”和“硝酸钍工厂”。毛泽东每到一处，学生们的口号声，都招来了校园里的师生员工和群众，近千人挤在一起，要见毛泽东。毛泽东不仅不能再继续参观下去，而且连院子也出不去了。刘子厚、李耕涛、王亢之、叶子龙、李银桥和校长、书记以及随从人员、保卫人员，只好护卫着毛泽东向院落西面向外挤，朝着停放汽车的地方走。李银桥和天津市警备处长李侃商量，调来了一辆随行的小型华沙车，让毛泽东乘坐。

毛泽东微笑着向群众挥手致意，好不容易才挤到了华沙车旁。华沙车小，他的身材魁梧，不好上车。警卫员们急了，几个人硬是把他推进了车内，向天津大学驶去。

11点零5分，毛泽东在天津大学办公楼前下车，在刘子厚、李耕涛、王亢之陪同下，向党委办公室走去。天津大学校长张国藩、党委书记贾震，没想到毛泽东来得这么快，急忙在门口迎接毛泽东。待毛泽东坐定，张国藩汇报说：

“这个学校有98%的学生参加了勤工俭学，今年下学期准备搞几个班半工半读。学校计划中的半工半读，分几种形式，有的是上午学习，下午劳动；有的是隔日学习，隔日劳动。”

毛泽东说：

“这样很好，本来光读书本上的，没有亲自去做，有的连看也没看过，用的时候，就做不出产品来。一搞勤工俭学、半耕半读，这样有了学问，也就是劳动者了。河南省长葛县有一所中学，勤工俭学搞得好，学生进步快，升学的多。有的中学没有搞勤工俭学，就不好，学生升学的少，考不取，学问不行。他们光念书本，没有学进去，把脑袋学坏了。”

他又问王亢之：

“天津的中学有没有搞勤工俭学？”

王亢之说：

“天津近百所中学都已经搞起了勤工俭学，有60多所中学还办起工厂或生产车间。”

天津大学是一个有着近万名师生员工的新型大学。此时，办公楼前的广场上，已经汇集了几千人，他们不断地鼓掌、欢呼。毛泽东站起来，走到窗口，探着身子向师生们挥手致意，然后又坐了下来。他说：

“教育应抓住3个东西：一是党委领导；二是群众路线；三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刘子厚说：

“前些时河北省开了规模很大的教育会议，有1000多人参加，开了近1个月。在会上着重解决了学校要不要党的领导，教育与劳动相结合，和教育工作的群众路线问题。会议是用整风的方法开的。这个会议规划在15年内，在全省基本普及高等教育，现在30岁以下的人，到那时都能达到高等教育水平。”

毛泽东说：

“我想现在15岁左右的人，都能受到高等教育，使青年一代都能有大学的文化水平。你们想使30岁左右的人，都能受高等教育，你们想的更好。”

王亢之说：

“天津市原有6所高等学校，今年下半年开学后，可以达到18所。全省在今明两年以内，每个专区要搞起工、农、师、医4所高等学校，每县办起1所综合性大学。”

毛泽东说：

“你们办这么多学校，好啊。”

刘子厚说：

“现在工厂和农村办学校的劲头都很大。”

毛泽东说：

“好啊！学校是工厂，学生也是工人。工厂是学校，工人就是学生。农业合作社也是学校，农民也是学生。要好好地办。有些先生也得进步，形势逼着他们进步，他们动动手就行了。50岁以上的教授老师可以不动手了，青年和中年的都要动动手，搞科学研究的人，也应该动动手，换换脑筋。不然一辈子不动手也不好。”

张国藩说：

“现在同学们搞技术革命的劲头很大，有的为了向国庆献礼，昼夜突击。”

毛泽东说：

“连夜搞是否搞瘦了呢？还要注意有节奏地生产，有节奏地休息和劳动。”

11时许，毛泽东结束了谈话，他来到门外的平台上。等候在广场上的师生们此起彼伏地欢呼起来。毛泽东和大家一起鼓掌，从东边走到西边，来回走了几趟。

毛泽东走出办公楼，在人们的夹道欢呼声中，走进学校办起的工厂里进行参观。他观看一个叫郭培叶的学生操作牛头刨床，问他做几个了？熟练了没有？他又走到2年级学生张美珍操作的车床旁。据张美珍回忆说：

“毛主席身材高大、健壮，身穿白色长袖衬衣，灰色西裤，一副和蔼可亲的面容。毛主席一面招手，一面沿着车间的那条主通道缓缓走来……我太兴奋了，心怦怦跳得厉害，当毛主席走近我的机床时，我停住手上的活，上前一步，仰望着毛主席说：

‘毛主席您好！’

毛主席停住脚步答道：‘你好，你好。’

并向我伸出了手，当我双手紧握着毛主席那有力的巨手时，一切紧张的心情已完全消失，站在毛主席面前，就像站在我崇敬的长辈面前一样。我看到毛主席被晒得红黑的面孔非常慈祥。那天，实在太热了，毛主席的白绸衬衣已被汗水湿透了大半截，袖子半卷着，一双棕色的皮鞋，前头已经磨出点点白斑。毛主席站在机床前开始同我谈话，毛主席首先问我：

‘你叫什么名字？’

我说我叫张美珍。毛主席又问：

‘你是工人还是学生？’

我说我是学生，我是机械系二年级的学生。接着毛主席同我进行了下面的对话：

‘你是哪里人？’

‘我是山东人。’

‘家住在哪里？’

‘家住在上海。’

‘你们劳动多少时间了？’

‘我们已经劳动四个月了。’

‘还要劳动多少时间？’

‘可能还要劳动半年呢。’

‘你们现在能达到几级工的水平了？’

‘可能是二三级工的水平吧，我们反正能够独立干活了。’

毛主席又问：

‘你们劳动时，还读书吗？还有老师给你们上课吗？’

我说：

‘我们现在是边劳动，边上课读书，劳动时老师还给我们上3门课。我因为选学的外语课是英语，要和没来劳动的班级合班上课，因此我还去上英语课，一共上4门课呢。’

毛主席边听边点头，看到毛主席仔细听我讲话，我的信心更足了，回答问题更加自如了。毛主席又问：

‘你说是光读书好，还是这样又劳动又读书好啊？’

我立即回答：

‘这样好，又劳动，又读书，既有了理论知识，又有实践知识，还是这样好。’

毛主席一边点头，一边又问：

‘你们的同学都赞成这样参加劳动吗？’

我说，我们都赞成。毛主席饶有兴趣地听着我的回答，就像一位师长在专心听取学生的答题一样，认真、真诚。我被毛主席的平易近人、倾听群众心声的作风深深地感动了。现在回忆起来，还是那么亲切感人。以后每当我读到那些回忆毛主席提到毛主席热爱群众，与群众交谈的内容，都感到特别真实，因为毛主席曾经如此认真地和我这样一个普通青年学生进行过谈话。毛主席谈话时，声音洪亮且缓慢，尽管有浓重的湖南口音，但我依然句句听得清楚，我也用很大的声音说话，以压过机器的响声，使毛主席能够听清我的回答。当时毛主席身边有一名年轻的警卫人员，另有河北省省长刘子厚，天津市市长李耕涛，学校党委书记贾震。我记得，在我回答问题时，贾震书记紧张地注视着我，就像是家长担心孩子答错了问题，当看到我顺利地回答毛主席的问话时，他们又都显现出由衷的欢喜。那次随行的记者中，有新华社老资格的摄影记者侯波，她跑前跑后，敏捷、利落地抢拍下一个个镜头。经过这段谈话后，气氛已经十分亲切、轻松了。这时，毛主席又指着机床前挂着的一张蓝图问道：

‘这张图纸，你会看不会看？’

我说：

‘我会看，看懂了图纸，才能按图纸的要求来加工啊。我们已经学过机械制图课，看图纸就不困难了。’

毛主席听后，很满意地点点头。这次谈话大约持续了半小时。”

毛泽东走到一台旋床旁，2年级学生陈经斗和同学王红玉正在操作，旋一个比较大点的圆形部件。毛泽东看了非常满意，他伸着手要和王红玉握手，王红玉激动地说：

“我这满手油！”

她不敢伸手，怕弄脏了毛泽东的手，毛泽东微笑着说：

“劳动者的手最干净。”

王红玉听毛泽东这么说，就紧紧地握住了他的大手。

毛泽东稍事休息后，又坐车到天津大学最西头离办公楼1公里以外的地方，参观了大学生们正在自己动手兴建的硫酸厂。

下午1点10分，毛泽东离开天津大学。1点半钟，他乘车穿过天津闹市区中心和平路，悄悄驶向劝业商场后面的正阳春。正阳春饭馆的服务员范贵生，正在门前等候客人。他突然看见来的客人竟是毛泽东，惊喜之中，竟然忘了和毛泽东握手问好，只是下意识地推开了门。毛泽东和南开、天津两所大学的校长及刘子厚、李耕涛等人依次进门。

毛泽东首先来到又窄又热的厨房，和厨师们攀谈，问他们每月挣多少工资？师傅说，能挣六七十元。他又问：

“有没有休息时间？”

师傅说：

“每星期都有休息日。”

“你们生活过得好不好？”

“比过去过得强多了。”

毛泽东点点头，很满意。这样聊，他感到很惬意。

毛泽东上2楼的时候，在楼梯中间对着一幅标语念道：

“跨火箭，乘东风，实现七满意，工作为便民。”

2点多钟，饭菜上桌了。毛泽东不用摆上来的象牙筷子，他让服务员换了一双普通的筷子。也许是因为天气闷热，他吃了几口菜，就起身走动，来到窗口，随便朝窗外望了一会儿。不料这一望，却惹来了大麻烦。

饭馆对面的楼上，住着一位妇女，那位妇女偏偏就在这个时候往窗台上晒衣服，她一眼就认出了对面楼上的毛泽东，惊奇得脱口喊道：

“是毛主席！毛主席万岁！”

她这一喊不打紧，立时惊动了家人、邻居和街上的行人，人们听说毛泽东就在正阳春烤鸭店，不由分说潮水般地拥到饭馆门前。毛泽东的卫士们立时紧张起来，上前关上窗户。他们想，也许过一会儿人群就会慢慢散去，没想到，窗户外面“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一阵高过一阵。毛泽东坐不住了，他站起来，打开窗纱，推开玻璃窗，探着身子向人群挥手致意。这一下，立时引起街上一片狂潮。待人们稍稍平静下来，毛泽东又回到桌子边吃饭，还没吃几口，窗下又是经久不息的欢呼声。毛泽东再次放下筷子，逐次走到临街的4个窗口，挨个探着头，向大家又是招手又是鼓掌。他被群众的情绪感染了，来回走了两趟，一边挥着手，一边呼应着人群，连声喊：

“人民万岁！”

负责烤鸭的张师傅上了菜，他拿出钢笔和笔记本请毛泽东签字，毛泽东也不推辞，就在他的笔记本上写下了“毛泽东”3个字。他刚签完字，还没吃多少东西，就再一次被外面的呼声所牵动，走到窗口向群众打招呼。如此循环往复竟有6次之多。这顿不安稳的饭吃了很长时间。

毛泽东把经理叫到跟前，让他坐在自己身边，问道：

“你当了几年的经理啦？”

经理回答说：

“当了一年多。”

“你当经理会炒菜吗？”

“从小学徒，干了20多年了，烤鸭炒菜都会。”

毛泽东笑着说：

“那很好！要好好为人民服务。”

该动身了，可是门外的街上到处都是人，走也走不出去呀。毛泽东也开始担心起来。李耕涛市长走到窗前做工作，让大家回去，说了半天也没人听，人们一个也不动。此时已经是5点多了，人多天热，人人都是汗流浃背。毛泽东担心这样下去，会把人晒坏的。李耕涛再次走到窗前，说：

“毛主席叫我告诉大家，天这样热，怕大家晒病了，大家回去吧！”

“不要紧，不要紧！我们要见毛主席！”

下边一片呼声。李耕涛一遍一遍地重复劝说，嗓子也喊哑了，仍然没有多大效果。没有办法，大家一商量，只好让警备区派来1个排的精壮战士开路，把一辆华沙牌小汽车从人群中推进来，车屁股靠在正阳春烤鸭店的门口，费了好大劲才把毛泽东塞进车子里。警卫排的战士们一部分在前面开路，一部分在后面推车，其他卫士们在左右两旁护卫，一步一步，硬是将车子推出了人群。毛泽东靠在座背上，双目微闭，说道：

“又是一次黄鹤楼噢！”

据当事人回忆说，在毛泽东离开正阳春烤鸭店后，有关人员负责打扫卫生，光群众在现场遗失的鞋帽、钢笔、手表等零碎物品，竟然收集到了好几箩筐。

这天下午，毛泽东观看了天津河北梆子小百花剧团的演出，并亲切地接见了演员，还勉励他们说：

“要好好学、好好练、有前途。”

出了剧院，毛泽东便上了专列，离开天津踏上返途。

傍晚时分，专列缓缓驶入丰台车站。毛泽东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部部长赵凡、副部长王宪、丰台区委第一书记王景铭、书记处书记张宗平陪同，来到永定河畔的岳各庄乡红十月农业生产合作社。

这一带是北京郊区的蔬菜生产基地，9000多亩农田中菜地就有7000多亩，农民们都有多年的种菜经验。毛泽东和前来迎接的乡社干部们见过面后，谢绝大家要他先休息一下喝口水的提议，说：

“天不早了，还是先去地里看一看吧！”

沿着修整后的田间大道，毛泽东往青年生产队的大白菜试验地走去。途中，他专门走进社里的食堂。社员们还没有收工，饭菜都已准备妥当了。毛泽东揭开汤盆看了看冒着热气的冬瓜汤，又望了望刚出屉的馒头，问：“社员们几点钟吃饭？在哪里吃饭？”又问炊事员，“社员们吃得满意不满意？”

正在地头上耙地的青年生产队队长田德顺看见毛泽东走来，急忙放下手里的活计，一边向这边迎过来，一边招呼别人。毛泽东握住他满是泥土的手，问完姓名、年龄与职务，又特别问道：

“你们青年生产队老年人都不参加吗？”

田德顺说：

“有两位五六十岁的老农在队里当技术指导。”

毛泽东点头：

“噢，那么是以青年为主啰！”

在一块白菜地边，毛泽东专心听着队长的汇报。这位年轻的队长说，我们这1亩4分地是大白菜高额丰产试验田，收了上茬菜，深翻2尺，分层施了21万斤混合肥，还上了用牛蹄角皮毛等混合起来的肥料“条货”，用大白菜和菠菜隔畦间作的办法种，一亩从过去的2000多棵密植到5500多棵，能产120万斤。

“120万斤？这是计划啰！”

毛泽东问道。田德顺说：

“是计划指标，我们有信心达到。”

毛泽东微笑着，用手指着刚出土的白菜苗，又问：

“什么时候菜才能长起来呢？”

区委书记王景铭说：

“10月里菜就长起来了。”

看完白菜地，看玉米地，西红柿地。毛泽东走一路，问一路，问产量问措施，还去看了社员们积造的肥料。望着满目的青椒、晚茬茄子和大葱等蔬菜，毛泽东问：

“你们这个菜社，自己种的粮食还不够吃吧？”

乡党委书记答道：

“生产大跃进了，我们不仅要多生产蔬菜，还要多打粮食，我们这儿普遍推广了芸豆、玉米、大白菜3茬交叉套作的三大季种植法。今年我们自己的粮食就够吃了，明年还能向国家卖300多万斤余粮呢！”

晚8时许，毛泽东要去附近的丰台区小屯农业社视察。一路之上，他还在打听菜的问题：

“一亩菜产多少斤？”

区委书记王景铭说，去年1万斤，今年2万斤，明年能到3万斤。去年丰台区供给北京的蔬菜有5亿6千多万斤，今年预计要有14亿斤菜上市。

毛泽东问：

“菜多了怎么办呢？”

王景铭说：

“菜多了价钱便宜些，今年菜价就比去年低一些，消费者都挺高兴。同时，因为产量高了，农民的收入不仅不会减少，还会增加，农民也很高兴。另外，我们还准备进一步采取排开种的办法，分期上市，解决蔬菜旺季供应过剩，淡季供不应求的矛盾。有些菜可以保存过冬，还可以供应其它城市和建设工地的需要。”

毛泽东听了，点头称是。到了小屯农业社4队的玉米试验田旁，负责栽培这块玉米地的生产组长张志向毛泽东介绍了情况，他说，这块三大季玉米，除上茬收了芸豆，下茬种大白菜以外，每亩还能产2000斤玉米。他随手将两个已成熟的玉米棒掰下来送给毛泽东看，说，一个棒子能产12两老玉米哩。毛泽东接过玉米棒，剥开皮，数了数玉米粒，接着往前走，问道：

“今年你们的小麦打多少斤？”

社主任田岐回答说：

“398斤。明年计划亩产2000斤。”

毛泽东停住脚步，转过脸问：

“2000斤，有把握吗？”

田岐说：

“有把握。”

毛泽东问：

“每亩产2000斤的小麦，都要些什么田间管理措施？深翻几尺？每亩地上多少肥料？密植用多少种子？用什么样的种子？”

他一项一项地问着，还特别关心农具的改革，了解队里有多少改革的农具，收庄稼时还用不用肩挑？田岐逐项回答，告诉毛泽东社里运输都用胶轮大车，200多辆大车都滚珠轴承化了。另外，社里还有10台煤气机和电动机，抽水工具都机械化了。社里还有两台拖拉机和两辆汽车，秋后准备再买些拖拉机和汽车。

天已经黑下来了，大家边走边说，到了公路上，随行人员劝毛泽东累了一天该上车休息了，毛泽东听说前面还有不少社员在深翻土地，就要去看一看。他站在深翻地旁，问用这种方法翻地，需要多少个工？田岐说：

“一亩地四五十个工。”

毛泽东问：

“明年种小麦的地都深翻吗？”

田岐说：

“学了总路线干劲更足，我们块块地都要深翻。”

毛泽东向正在田里干活的社员们招呼说：

“天不早了，该收工了吧。”

农民们争先恐后地跑过来，纷纷喊着：

“毛主席！毛主席来啦！”

大家纷纷伸出手，争着和他握手，向他问好。毛泽东和他们聊了一会儿，要走了，有的社员还激动地说：

“毛主席不辞辛劳，这么晚了还来看望我们，我们要挑灯夜战，用优异成绩向毛主席献礼！”

8月13日晚11时，毛泽东回到北京，回到了中南海。他对正在忙碌着收拾东西的李银桥说：

“看来，我们这个国家还是有希望的。”

欲知毛泽东在此次视察后有何重大决定，请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东方翁曰：从1958年8月9日下午毛泽东和棉花专家秦杰在棉花试验田里的对话中可以看出，领袖和以秦杰为带头人的科技人员是务实的，是尊重科学的。诸君不妨细读一下这段对话。

1959年以后，笔者在周末也曾有过参加深翻土地的亲身体验。应该说，深翻土地和密植都是要讲科学、讲合理的。可那时候河南的一些地方领导人，官僚主义瞎指挥，讲深翻，非要将生土翻上来；讲密植，竟然搞成了无限密植。这样的结果可想而知，农业不但不会增产，反而减产了。瞎指挥遗祸匪浅！在战争年代，它能害死人，在和平年代一样能害死人。

**第57章**

**“人们在劳动中的关系，应当是平等的关系，是领导和群众打成一片**

**的关系。苏联在十月革命后没有做好，旧的法权（等级）制度没有彻**

**底破坏，劳力与劳心是分离的，教育与生产是分离的。苏联共产党员**

**多数是干部子弟，普通工人农民提不起来。所以，我们要寻找我们自**

**己的道路。我们一定要把干部子弟赶到群众中去，不能有近水楼台。”**

话说1958年8月14日，中共北京市委就郊区涝灾和抢救情况，给中央并毛泽东写了第2次报告。报告中说：自8月6日暴雨过后，13日北京地区又下了一场大雨，郊区菜地受灾严重，近几天蔬菜上市量日渐减少。目前正在从各方面想办法，力求增加供应。毛泽东阅毕，批示道：

“大问题。江青阅。老下大雨，菜量大减。”

8月16日上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会见柬埔寨王国首相西哈努克。他谈话中说：

“所谓大国小国只是一种心理状态。大国小国应该平等相待。有这样一种论调：大国是不好惹的，小国是可以随便欺侮的。这种论调是绝没有道理的。”“国家大小只是形式。我们两国是完全平等的朋友性质的国家。”

中午12时20分，这次会见结束。12时50分，毛泽东登上专机，于下午2时飞抵北戴河。

下午3时，毛泽东在住所一号楼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协作区主任开会，主管计划和工业工作的李富春、薄一波以及王鹤寿、赵尔陆也参加了会议。

这一次会议实际上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预备会议。

8月17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中直疗养院礼堂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还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和政府部门党组的负责人。

会议的主题是讨论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及当前的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问题，讨论商业工作、教育方针和加强民兵工作的问题。

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了会议需要讨论的17个问题。他说：

“第一个题目，经济计划问题，是重点，这次会议的性质是工业会议，农业也有，商业也有，工业是主题。”“第二个题目，也是工业问题，就是今年要搞1100万吨钢。”

关于农业的粮食产量问题，毛泽东问谭震林：

“明年你们安排怎样？”

谭震林回答说：

“有的地区是人均2500斤，口径不一。”

8月18日凌晨1时，毛泽东在彭德怀转呈的广州军区13日关于在深圳方向进行演习的部署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上批示道：

“准备打金门，直接对蒋，间接对美。因此不要在广东深圳方面进行演习了，不要去惊动英国人。”“请叫空司注意：台湾方面可能出动大编队空军（例如几十架至几百架）向我反击，夺回金、马制空权。因此，我应迅即准备以大编队击败之。追击不要越过金、马线。”

8月19日上午，毛泽东在住所一号楼召开协作区主任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华东区的柯庆施、西南区的李井泉、华南区的陶铸、华北区的林铁、华中区的王任重、西北区的张德生、东北区的欧阳钦。

毛泽东要求第一书记要亲自抓工业。他还提出了“统一计划，分级管理，重点建设，枝叶扶持”的方针。他说：

“**全党办工业，各级办工业，一定要在统一计划下，必须要有重点有枝叶。”“每个合作社不一定都办钢铁。合作社主要搞粮食加工、土化肥、农具修理和制造、挖小煤窑。要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各协作区要有一套，但各省要适当分工，不要样样都搞。”

关于人民公社，毛泽东说：

“名称怎么叫法？可以叫人民公社，也可以不叫人民公社，**我的意见是叫人民公社。这仍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不要过分强调共产主义。人民公社，一曰大二曰公。**人多，地大，生产规模大，各种事业大。政社是合一的。搞公共食堂，取消自留地，鸡、鸭、屋前屋后的小树还是自己的，这些到将来也不存在了。粮食多了，可以搞供给制，还是按劳付酬。工资按各尽所能发给个人，不交给家长，青年、妇女都高兴，这对个性解放有很大好处。”“**不论城乡，应当是社会主义制度加共产主义思想。我们现在搞社会主义，也有共产主义的萌芽。学校、工厂、街道都可以搞人民公社。”**

8月20日，毛泽东指示福建前线总指挥叶飞立即乘专机到北戴河，同他具体商定炮击金门问题。

这一天，吴冷西因事未到北戴河，毛泽东让中央办公厅通知他赶快来。吴冷西于21日乘中办的班机到达北戴河，和胡乔木住同一栋别墅。

8月21日上午，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他说：

“**我看1100万吨有完不成的危险**。6月间，我问王鹤寿，钢是否可能翻一番？问题是**我提出的，实现不了，我要作检讨**。有些人不懂得，完成1100万吨钢，是关系全国人民的大事。”

在谈到人的主观能动性时，毛泽东说：

“唐朝佛教《六祖坛经》记载，慧能和尚，河北人，不识字，很有学问，在广东传经，主张一切皆空。这是彻底的唯心论，但**他突出了主观能动性，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一个大跃进。慧能敢于否定一切。有人问他：死后是否一定升天？他说不一定，都升西天，西方的人怎么办？**他是唐太宗时的人，他的学说盛行于武则天时期，唐朝末年乱世，人民思想无所寄托，大为流行。”

据毛泽东身边的秘书林克说，毛泽东赞赏慧能和尚的改革和创新精神，他曾说：

“慧能主张佛性人人皆有，创立了顿悟成佛说，一方面使烦琐的佛教简易化；一方面使印度传入的佛教中国化。因此，他被视为禅宗的真正创始人，也是真正的中国佛教的始祖。在他的影响下，印度佛教在中国至高无上的地位动摇了，甚至可以‘喝祖骂佛’。”

再说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还说：

“人民的干劲为什么这么大呢？原因就是我们向人民取得少，我们不要义务交售制，和苏联不一样。我们与人民打成一片，人民拥护我们。整风以后，人们更是和我们一条心。”“所有制改变以后，人们的平等关系不会自然出现的。”“整风以来，资产阶级的法权制度，如等级制度，领导与群众的不平等关系，差不多破坏完了，领导干部不靠威风，不靠官架子，而是靠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福利，靠说服。”

他又说：

“马克思主义关于平等、民主、说服和人们的相互关系、打成一片的思想，没有发挥。**人们在劳动中的关系，应当是平等的关系，是领导和群众打成一片的关系。苏联在十月革命后没有做好，旧的法权（等级）制度没有彻底破坏，劳力与劳心是分离的，教育与生产是分离的。”“苏联共产党员多数是干部子弟，普通工人农民提不起来。所以，我们要寻找我们自己的道路。我们一定要把干部子弟赶到群众中去，不能有近水楼台。**”

“进城以后，有人说我们有‘农村作风’、‘游击习气’，这是资产阶级思想侵蚀我们，把我们一些好的东西抛掉了。农村作风吃不开了，城市要求‘正规化’衙门大了，离人民远了。我们历来讲，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对群众要说服而不是压服，这些怎么都成了问题呢？原因就在于脱离群众，在于特殊化。”

毛泽东还讲到了人民解放军的军衔制问题。

原来在1958年2月，昆明军区13军37师政委何云峰大校、副师长张化民中校身着战士服、佩戴列兵衔，分别前往该师红军团（109团）8连1班和4班当兵。他们以普通士兵的身份和战士同吃、同住、同劳动、同操练，一起摸、爬、滚、打两个多月，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密切了相互关系。何云峰和张化民在当兵过程中，也进一步摸索了一些政治工作、军事训练的经验，指导了全师的工作。他们的事迹报道后，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5月27日至7月22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了一个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军委委员、军队系统中的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有各军区、各军兵种的负责人及一些军、师的负责人，共计1400多人。会议内容一是整风，二是整编；目的是解决人民军队的3个问题：一是建军原则，二是建军方针，三是战略方针问题；方法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毛泽东于6月21日、23日、29日在扩大会议上讲了话。**在这次军委扩大会议上有不少人对军衔制提出了质疑，甚至建议取消军衔制。其实早在1955年实行军衔制度后，就有不少人对军衔制度提出了意见，他们认为军衔制是教条主义的产物（指照搬苏联和其它外国的经验），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不符合人民解放军的实际。到了五十年代后期，取消军衔制度的呼声逐渐高了起来。因此在这次军委扩大会议上，大家又提出了军衔制的问题。**一位少将在发言中说：“军衔制度我本身就怀疑。古今中外，新旧式的国家军队都有军衔标志，但这并不能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也必须挂牌子，我们过去的级别不是很好的军衔制度吗？……因此我认为应该把牌子摘下来。”

毛泽东联想到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关于军衔制问题的讨论，就说：

“现在有‘花’（指军官肩章上的军衔标志——笔者注），发薪水都要有等级，分将、校、尉，可有的还没有打过仗，结果是脱离群众，兵不爱官，民不爱干，因为这一点和国民党差不多。”“我们的军官，像云南的一个师长，一年当一个月兵，我看这是好办法。……这样，我们的军队就是永远打不散的军队。”

8月21日下午3时，叶飞来到北戴河毛泽东的住处。

原来，叶飞乘坐的专机因途中遇到了雷雨，误了20日原定的行程。因此，他在这一天中午才赶到了北戴河。

会议室里，一张军用大地图摊在地毯上，毛泽东、彭德怀、林彪、叶飞和军委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等人，或站着或蹲着，围了一圈。

叶飞将福建前线准备炮击金门的炮兵数量、部队部署和实施突然猛袭的打法等情况一一作了详细汇报。毛泽东一面听叶飞汇报，一面看地图，精力非常集中。叶飞汇报完了，毛泽东突然问道：

“你们用这么多的炮打，会不会把美国人打死啊？”

此时，美国在国民党军队中的顾问，一直配备到营一级。叶飞答道：

“哎呀，主席，那是打得到的啊！”

毛泽东闻言，不说话了。他考虑了十几分钟，又问道：

“能不能避免打到美国人？”

叶飞回答得很干脆：

“主席，那无法避免！”

毛泽东听后，再也不问其它问题，也无任何表示，即宣布休息。

晚饭后，王尚荣拿了一张纸条子给叶飞，叶飞一看，是林彪写给毛泽东的一句话：

“是否通过正在华沙同美国进行大使级谈判的王炳南，给美国透漏一点消息。”

告诉美国人，不就等于告诉了台湾吗？叶飞看完纸条子，感到很吃惊。他问王尚荣：

“主席把这交给我看，有没有什么交代？是不是要我表态？”

王尚荣说：

“主席没说什么，只说拿给你看。”

是日晚，调入福建前线的陆海空部队，共有459门大炮、80多艘舰艇和200多架飞机，已经全部进入阵地或指定位置。

8月22日，毛泽东在研究东海地图的时候发现海岸边有一条红线，便找来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问道：

“这图上为什么会出现一根红线，而且离我们的海岸线这么近？”

陶勇回答说：

“这是国际法惯例，规定了沿海3海里算是本国的海域，出了3海里之后就是公海了！”

毛泽东说：

“3海里太近了，这可不行。要是这样划分，我们的内海渤海都要成为公海了。”

陶勇说：

“这是国际法的规定，每个国家都这么设定。”

毛泽东微微一笑，说道：

“那就改改国际法嘛。”

说罢，他打电话通知周恩来，以国务院名义将著名法学家、曾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首席顾问、参与审判日本甲级战犯的中国法官倪徵和外交部部长助理乔冠华，从北京接来北戴河，研究领海问题。

毛泽东对倪徵说：

“最近外国军舰常来闹事，今天把大法官请来，探究一下领海主权问题。”

倪徵便详细地介绍了领海的地位与作用，划分领海的方法以及世界各国采用的领海制度。他还说，在1930年召开的第一次国际法编纂会议上，到会的40个国家中，有33国提出了各自不同的主张，其中美、英、日等12国坚持3海里的领海宽度，而主张采用大于3海里领海宽度的则有21个国家。因此，“历史上还没有一个公认的统一的领海宽度。”

毛泽东问：

“为什么各国采用的领海宽度相差这样大？”

倪徵回答说：

“发达国家凭借经济、军事实力，肆意侵犯其他国家海域，掠夺海洋资源，他们主张领海宽度为3海里。而那些被侵略的国家为保护自己领海主权及国土安全，就主张12海里甚至更多的领海宽度。”

毛泽东又问：

“领海宽了，对商船航运有影响吗？”

倪徵回答：

“不会。海洋法规定，商船的正常商务活动是可以无害通过领海的。”

毛泽东点点头，指着地图上的渤海，提高了声调问道：

“如果定了12海里领海宽度，那渤海里面还会有公海吗？”

倪徵回答：

“渤海中最宽的老铁山水道也不足24海里，这样渤海就成为中国的内海了，我国享有完全的主权。”

毛泽东微微一笑，说道：

“看来，为了国家安全和繁荣，应当有个较宽的领海。”

送走了法学家，毛泽东和彭德怀、林彪、叶飞等人继续开会，研究炮击金门问题。他显然已经下定了决心，说道：

“那好，照你们的计划打。”

毛泽东要叶飞留在北戴河遥控指挥，前线交由张翼翔、刘培善二人具体指挥。他还说要叶飞跟彭德怀住在一起。

叶飞想：我怎好和彭老总一起住呢？主席究竟是什么意思？他虽然是一头雾水，也不便多问。后来，彭德怀也没有派参谋来接叶飞住他那里去。

这天晚上，叶飞散步后回到房间，正在发愁，王尚荣来了。王尚荣说：

“老兄，主席不是交代你住到彭老总那里吗？”

叶飞说：

“我哪好去住啊！”

王尚荣知道叶飞为难，就说：

“我替你想个办法，把专线电话架回到你的房间里。”

叶飞和王尚荣商定：福建前线直接同叶飞通话，再通过王尚荣转告给毛泽东；毛泽东的指示也由王尚荣转告叶飞。叶飞问：

“彭老总那里怎么报告呢？主席交代我同他住一起的呀！”

王尚荣说：

“你不要管了，此事由我办。”

就这样，此后的炮击金门是由叶飞在北戴河遥控指挥的，而叶飞的一切行动和命令，又是由毛泽东直接指挥的，而在前线的部队则是由副司令张翼翔、副政委刘培善共同指挥的。

萧劲光亦在福建前线指挥海军协同陆军、空军炮击金门。

8月23日，金门海域天气晴朗，和风轻拂。毛泽东为了粉碎美帝国主义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和支援中东人民抗击美帝国主义的侵略，亲自策划和指挥了“八·二三”炮击金门、马祖的战略行动。

下午5时30分，福建前线指挥员一声令下：

“开始突击！”

人民解放军集结在福建前线的陆军、海军、空军各部几乎在同一瞬间，以近500门大炮的火力一齐开火，不到1个小时就打了19000多发炮弹，揭开了炮击金门、马祖的序幕。整个金门岛淹没在硝烟之中。

后来有人评论说：此次炮击“与攻击柏林炮火差不多，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此时，金门岛上国民党官兵举行的周末会餐刚刚结束，到处是入浴、打球和游玩的人群。

国民党军上将、“国防部长”俞大维陪同美国总顾问到金门视察，他俩同国民党军上将、金门防卫部司令长官胡琏刚刚走出地下指挥部散步，炮声一响，他们立即缩了回去。炮击要是再晚几分钟开始，他们必死无疑。

国民党军中将副司令长官赵家骧和少将副司令长官章杰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俩正陪同澎湖防卫部中将副司令长官吉星文倚着桥头聊天，铺天盖地的炮弹突然袭来，3位副司令顿时惊慌失措，还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即身负重伤，不治身亡。

此次炮战共击毙击伤国民党军中将以下600余人。在阵地上的两名美国顾问也被打死了，后来美国人对此一直没有吭声。

中国人民解放军大规模炮击金门，是不是要解放金门、马祖？是不是准备解放台湾的前哨战？此战不但使蒋介石和美国人摸不着头脑，而且连中国大陆的自己人，包括在福建前线的指战员们也都搞不清楚。金门的炮战、空战一起，立即引起了各国的严重关切，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美国人的反应尤其强烈，他们立即从中东地区抽调两艘航空母舰支援第7舰队。

这天晚上，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说：

“今天开炮，时机选择得当。联合国大会3天前通过决议，要求美、英军队退出黎巴嫩和约旦。美国人霸占我台湾更显得无理。我们的要求是美军从台湾撤退，蒋军从金门、马祖撤退。你不撤我就打。台湾太远打不到，我就打金、马。这肯定会引起国际震动，不仅美国人震动，亚洲人震动，欧洲人也震动。阿拉伯世界人民会高兴，亚非广大人民会同情我们。”

毛泽东对吴冷西说：

“找你快来参加会，是要你了解这突发事件。**你的任务是，要新华社迅速、广泛收集国际反应，重大反应要用电话传到北戴河来**。**报道和评论暂时不搞，观察几天再说，这是纪律。**要告诉新华社、《人民日报》和广播电台的编辑部。服从命令听指挥，部队如此，新闻宣传单位亦如此。”

毛泽东对与会者们说：

“前几天在工作会议开始时，我讲了8个国际问题，这些问题多年来一直在脑子里转来转去，逐渐形成一些看法、观点，思想就开朗了。但是这些观点，在对外宣传中，不能不分时间、地点，不能和盘托出，要有所区别。比如，**我说大战打不起来，但军事工作中要有打起来的准备，宣传工作中要讲战争危险，号召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维护世界和平**。又如谁怕谁多一点，我说帝国主义比我们多怕一点，但宣传上应讲我一反对战争，二不怕战争。又如我说帝国主义制造紧张局势有刺激世界人民觉醒的有利的一面，但宣传上要强调反对帝国主义制造紧张局势，争取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诸如此类，这个世界上坏事太多，我们如果整天愁眉苦脸，就在精神上被压垮了。我们要学会用分析的方法，看到坏事有两重性，看到紧张局势固然是坏事，但它又可以促使许多人觉醒起来，下决心同帝国主义斗争，这又是好事。这样看问题，我们就可以在思想上获得解放，不至于老是觉得包袱沉重。

**这次炮轰金门，老实说是我们为了支援阿拉伯人民而采取的行动，就是要整美国人一下。美国欺负我们多年，有机会为什么不整它一下。现在我们要观察各方面的反应，首先是美国的反应，再确定下一步的行动。**我们现在处于主动，可进可退，游刃有余。美国人在中东烧了一把火，我们在远东烧一把火，看他怎么办。我们谴责美国在台湾海峡制造紧张局势，这不冤枉他。美国在台湾有几千驻军，还有两个空军基地。美国最大的舰队第7舰队经常在台湾海峡晃来晃去。美国在马尼拉还有一个很大的海军基地。美国海军参谋长帕克不久前（8月6日）就说，美国部队随时准备在台湾海峡登陆作战，像在黎巴嫩那样。这就是证明。”

不久，毛泽东让叶飞回到了厦门前线。

8月24日，福建前线人民解放军又对金门进行了炮兵和海军的联合打击，重创国民党军“中海”号大型运输舰，击沉由大型坦克登陆舰改装的“台生”号货轮。

此后几天，人民解放军的连续炮击，巩固了“万炮轰金门”的战果，基本上实现了对金门的封锁。

再说8月24日这一天，毛泽东在一号楼召开政治局常委和协作区主任会议，他说：

“人民公社决议发下去以后，每一个县搞一、两个试点，不一定一下子都铺开，要有领导有计划地去进行规划。现在不搞不行了，不搞要犯错误。”

此前的扩大会议经过讨论，提出了1958年钢生产1070万吨的新指标。这个时候，到年底只有4个月的时间了，而钢铁生产只完成了450万吨，还有600多万吨的任务尚待完成。

这一天，毛泽东又主持召开了工业书记和钢铁生产基地的市委书记及钢铁生产公司党委书记座谈会。在会议上，与会者们都保证能够完成任务。毛泽东总担心完不成任务，于是便有了他在9月份的南巡之行，此是后话。

8月25日下午，毛泽东下海游泳回来，穿着睡衣，在北戴河海滩游泳场的休息室里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德怀、王尚荣、叶飞、胡乔木和吴冷西开会。他说：

“我们在这里避暑，美国人却紧张得不得了。**从这几天的反应看，美国人很怕我们不仅要登陆金门、马祖，而且准备解放台湾。**其实，我们向金门打了几万发炮弹，是火力侦察。我们不说一定登陆金门，也不说不登陆。我们相机行事，慎之又慎，三思而行。因为登陆金门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关系重大。问题不在于那里有95000名蒋军，这个好办，而在于美国政府的态度。美国同国民党订了共同防御条约，防御范围是否包括金门、马祖在内，没有明确规定。美国人是否把这两个包袱也背上，还得观察。**打炮的主要目的不是要侦察蒋军的防御，而是侦察美国人的决心，考验美国人的决心。**中国人就是敢于在太岁头上动土，何况金马以至台湾一直是中国的领土。

凡事要抓住时机。去年开始反击右派是抓住了卢郁文事件，批判《文汇报》是抓住了《新民报》作了自我批评。这次炮打金门，就是抓住美军登陆黎巴嫩。既可以声援阿拉伯人民，又可以试探美国人。看来美国人左右为难，处于东西难以兼顾的境地。但是**我们宣传上目前暂不直接说金门打炮，而是把主要锋芒对着美国到处侵略，谴责他入侵中东，也谴责他霸占我国领土台湾。最近美国国务院发表一个反华备忘录，我们《人民日报》就可以以此为由头，历数美国侵略中国的罪行，驳斥备忘录对我们的污蔑攻击。**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要求美英军队从黎巴嫩和约旦撤退一事，也可以组织评论，**要求美军从它在全世界许多国家的基地包括我国台湾撤退。**现在宣传上要打外围战，等美国、蒋介石以及世界各国的动向摸清楚之后，再开始就炮打金、马问题发表评论。届时我国政府也要发表声明或文告。现在要养精蓄锐，引而不发。”

正是：与大国争雄，非大英雄谋大略，焉能小试手震惊世界？

惟领袖英明，王顾左右而言他，试看美国佬反应如何。

彭德怀听了毛泽东的一番议论，便说：

“金马前线的官兵艰苦奋斗，英勇作战，可以写些通讯报道，但要注意保密。”

其他人也说：

“前线记者可以先做准备，发表时机另议。”

会议还谈到了领海宽度的问题。毛泽东认为，我国海岸线长，历史上屡受侵略，为维护海上安全和经济利益，并充分考虑到国际上可能遇到的风险，应采用较宽的领海。他要求外交部、解放军总参谋部进行深入研究，提出领海宽度的意见，制定相应的文件，待中央再次开会决定。

这一天，毛泽东见卫士田云玉正在看萧三所著的《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就说：

“这本书写的基本上真实。你们这一代啊，一定要超过我们这一代。”

田云玉说：

“主席，您从小就很有抱负啊。”

毛泽东说：

“你也应当有抱负嘛。现在的形势多好，你们青年人应该大有作为。”

8月27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公开发表声明，他在声明中说，美国要行使《褔摩萨决议案》，他命令美国部队要协助金门、马祖国民党军队的防务。

8月27日下午，毛泽东在北戴河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主要谈国际形势，也谈到了人民公社。

会议休息时，毛泽东把胡乔木和吴冷西叫去，谈了《人民日报》的宣传问题。他说：

“《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对国际问题应该有研究，形成一定看法，不要临时抱佛脚，发表感想式的意见。对许多国际问题都要有基本的看法，应该有比较深刻的评论。现在报刊上有些评论是感想式的，搞新闻工作，光务实不务虚不好。要经常找有关同志吹一吹，有了看法，有了意见，就要找机会、找题目，加以发挥。《人民日报》在一个时期应有一定的方向，宣传要有重点，抓住当前的主要任务。今年年初报纸宣传方向比较明确。《从梅林看全国》的社论写得不错。最近一个时期，宣传上就显得杂一些，编辑条例差，把一些东西堆在一起，看不出方向，缺乏思想的鲜明性和一贯性，评论和消息配合不够。**现在中央已决定今年钢铁产量翻一番，大办人民公社，大办民兵。报纸就要跟上。**《人民日报》的版面要调整，要突出工业，首先是钢铁工业。工业消息放在1版和2版，农业放到3版去。你们二人研究一下，北戴河会议结束后回北京布置。”

此后几天，毛泽东让秘书几次打电话给吴冷西，查问新华社印发的《参考消息》中刊出的美国动向的后续报道。吴冷西每天将收到的外国通讯社的要闻，报告给毛泽东和周恩来。

8月下旬的一天，毛泽东请在北戴河避暑的张治中一家人到他的住处吃饭、谈话、看电影。张治中在告辞时对毛泽东说：

“过两天我要回北京去了，主席有何吩咐？”

毛泽东说：

“不忙，我还有话和你说，稍等一等。”

8月29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先后通过了40个文件，其中最重要的两个，一个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一千零七十万吨钢而奋斗》的决议；一个是《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

《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全文如下：

一、**人民公社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大型的综合性的人民公社不仅已经出现，而且已经在若干地方普遍发展起来，有的地方发展得很快，很可能不久就会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一个发展人民公社的高潮，且有不可阻挡之势。**人民公社发展的主要基础是我国农业生产全面的不断的跃进和5亿农民愈来愈高的政治觉悟。在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基本上战胜了资本主义道路之后，发展了空前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创造了可以基本上免除水旱灾害、使农业生产比较稳定发展的新的基础，在克服右倾保守思想，打破了农业技术措施的常规之后，出现了农业生产飞跃发展的形势，农产品产量成倍、几倍、十几倍、几十倍地增长，更加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和先进的农业技术措施，要求投入更多的劳动力，农村工业的发展也要求从农业生产战线上转移一部分劳动力，我国农村实现机械化、电气化的要求已愈来愈迫切；在农田基本建设和争取丰收的斗争中，打破社界、乡界、县界的大协作，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成为群众性的行动，进一步提高了5亿农民的共产主义觉悟；公共食堂、幼儿园、托儿所、缝衣组、理发室、公共浴堂、幸福院、农业中学、红专学校等等，把农民引向了更幸福的集体生活，进一步培养和锻炼着农民群众的集体主义思想。所有这些，都说明几十户、几百户的单一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在目前形势下，建立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农商学兵互相结合的人民公社，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

二、社的组织规模，就目前说，一般以一乡一社、两千户左右较为合适。某些乡界辽阔、人烟稀少的地方，可以少于两千户，一乡数社。有的地方根据自然地形条件和生产发展的需要，也可以由数乡并为一乡，组成一社，六七千户左右。至于达到万户或两万户以上的，也不要去反对，但在目前也不要主动提倡。

人民公社进一步发展的趋势，有可能以县为单位组成联社。现在就应该对人民公社的分布，以县为单位进行规划，作合理的布局，社的规模扩大以后，由于农林牧副渔、工农商学兵综合性的发展，社的管理机构也必须有适当的分工，要在组织精干和干部不脱离生产的原则下，建立若干分工负责的部门。**并且要实行政社合一，乡党委就是社党委，乡人民委员会就是社务委员会。**

三、小社并大、转为人民公社的做法和步骤。小社并大，转为人民公社，是当前广大群众的共同要求，贫农、下中农是坚决拥护的，大部分上中农也是赞成的，我们要依靠贫农、下中农，充分发动群众，展开鸣放辩论，团结大部分赞成并大社、转公社的上中农，克服另一部分上中农的动摇，揭穿和击退地主富农的造谣破坏，使广大农民在思想解放自觉自愿的基础上**并大社、转公社，防止强迫命令。在步骤上，并大社，转公社，一气呵成当然更好，不能够一气呵成的，也可以分两步走，不要勉强、性急。各县都应先进行试点，然后逐步推广。**

并大社，转公社必须与当前生产密切结合，不仅不能影响当前的生产，而且要使这个运动成为推动生产更大跃进的一个巨大力量。为此，在并社初期可以采取“上动下不动”的方法，首先由原来各小社联合选出大社的管理委员会，搭起架子，统一规划部署工作，把原来的各小社改为耕作区或者生产队，原来的一套生产组织和管理制度暂时不变，照常经营，一切应该合并调整的东西和合并中应该解决的具体问题，以后再逐步合并、逐步清理、逐步解决，以保证生产不受影响。

社规模的大小，并大社，转公社进度的快慢，以及做法和步骤，都由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根据当地的情况自行决定。但是，无论在秋前秋后或者今冬明春合并，都应该从现在起，就把准备合并的一些小社串连起来，共同商量，统一规划秋后的农田基本建设，统一安排为争取明年更大丰收的各项准备工作。

四、并社中的若干经济政策问题。在并社过程中，应该加强教育，防止少数社发展本位主义，在合并前不留或少留公共积累，分多分空。但是，另一方面，又必须了解，由于各个农业社的基础不同，若干社合并成一个大社，他们的公共财产，社内和社外的债务等等，不会是完全相同的，在并社过程中，应该以共产主义的精神去教育干部和群众，承认这种差别，不要采取算细账、找平补齐的办法，不要去斤斤计较小事。

人民公社建立时，对于自留地、零星果树、股份基金等等问题，不必急于处理，也不必来一次明文规定。一般说，自留地可能在并社中变为集体经营，零星果树暂时仍归私有，过些时候再处理，股份基金等可以再拖一、二年，随着生产的发展、收入的增加和人们觉悟的提高，自然地变为公有。

五、关于社的名称、所有制和分配制的问题。**大社统一定名为人民公社，不必搞成国营农场，农场就不好包括工、农、商、学、兵各个方面。**

**人民公社建成以后，不要忙于改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在目前还是以采用集体所有制为好，这可以避免在改变所有制的过程中发生不必要的麻烦。**实际上，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中，就已经包含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份了。这种全民所有制，将在不断发展中继续增长，逐步地代替集体所有制，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3、4年内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5、6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过渡到了全民所有制，如国营工业那样，它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然后再经过多少年，社会产品极大的丰富了，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都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教育普及并且提高了，社会主义时期还不得不保存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都逐步地消失了，反映这些差别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也逐步地消失了，国家职能只是为了对付外部敌人的侵略，对内已经不起作用了，在这种时候，我国社会就将进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时代。**

人民公社建成以后，也不必忙于改变原有的分配制度，以免对生产发生不利的影响。要从具体条件出发，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可以改行工资制；在条件还不成熟的地方，也可以暂时仍然采用原有的三包一奖或者以产定工制等等按劳动日计酬的制度，条件成熟以后再加以改变。

**人民公社虽然所有制仍然是集体所有的，分配制度无论工资制或者按劳动日计酬，也还都是“按劳取酬”，并不是“各取所需”，但是人民公社将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它将发展成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

六、**现阶段我们的任务是建设社会主义。建立人民公社首先是为了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而建设社会主义是为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积极地作好准备。**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

中共中央

此外，政治局扩大会议还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今冬明春在农村中普遍展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全文如下：

一、**近10个月来农业生产高潮一浪高过一浪的形势，夏季大丰收和即将取得的秋季更大的丰收，已充分证明加强党的领导和政治挂帅，是作好一切工作，完成一切任务的基本保证。**五亿农民在全民整风和反右派斗争，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总路线宣传教育运动等基础上所发展起来的政治觉悟愈来愈高。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个人主义或只顾本队、本社、本乡、本县的本位主义，已经大大削弱了，城乡协作，工农业协作，大公无私，互相支援的可歌可颂的共产主义行动，已经大大发展了。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最可珍贵的精神力量和物质基础。为着及时的总结经验，发扬共产主义精神，保证1959年夏季和全年全面的更大丰收；为着就农业社的收入如何分配问题和是否建立人民公社问题进行鸣放辩论，今冬明春在农村中进行一次广泛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教育运动，是必要的。

二、这个运动的内容应当是：总结和宣传一年来农业生产大丰收的成绩，具体生动地宣传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伟大胜利，宣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胜利，总结和宣传从去年冬季以来的农田基本建设、水、肥、土、种、密和田间管理等各项农业增产措施的经验，总结一年来共产主义大协作的经验，以及在生产和生活方面加强组织性和纪律性的经验，广泛宣传这些成功的经验，同时也要宣传工业、文教和其他各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空前大跃进，宣传丰衣足食的规划，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光明幸福的前景。

**在这个运动中，要充分发扬“拔白旗、插红旗”的共产主义风格，以无数大增产的实例，来大讲特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更加坚定广大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彻底批判一部分富裕农民残存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在人们的思想上继续破除个人主义、本位主义，大立共产主义。**并且，引导群众回忆3年来“马鞍形”的历史教训，**彻底批判“靠天吃饭”的“条件论”，和“照着前人脚印走路”的“习惯论”，大破右倾保守、甘居下游的思想，大立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思想，使“观潮派”和“秋后算账派”不仅在大丰收的事实面前哑口无言，而且在思想上彻底破产。**应该把一切“白旗”以至“灰旗”统统拔掉，把红旗普遍插起来，使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更加深入人心。

三、农业社的收入如何合理分配？如何由农业社转为人民公社？是当前农村中人人关心的两大问题。在农村中进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的时候，应该发动所有的农民，就这两个问题展开鸣放辩论，并且引导农民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精神来解决这两个问题。

**今年的农业生产大发展，农业社的收入大增加，社员的个人收入一般也应该略有增加，但是不宜增加过多，主要是增加社的公共积累。公共积累要有一部分用来发展集体的文化、福利事业，但是，首先应该用于农业和社办工业的基本建设，扩大再生产，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社的公共积累，除了用来发展本社的生产事业和福利事业以外，还应该有一部分交由县以上的机关统筹举办地方性的和全民性的生产事业和福利事业。应该通过鸣放辩论，发扬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精神，反对个人主义、本位主义等资产阶级思想。

工农商学兵合一，乡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是现阶段建设社会主义的最好的一种组织形式，也将是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应该通过鸣放辩论，使广大农民充分了解人民公社比原有的农业社具有更伟大的优越性，自觉自愿地把农业社转为人民公社，并且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精神，来解决与转为人民公社有关的各种经济问题，反对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

四、在广泛宣传大跃进、大丰收、大胜利，群情兴奋，干劲冲天的局面中，结合进行党员团员的整风工作和整社工作，扩大农业社和生产队的规模，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坚持干部种试验田、同社员一起劳动、参加生产领导生产的制度，广泛吸收社员参加社务管理，特别是田间作业管理，在办社工作中更加发扬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大大表扬跃进中涌现出来的成批的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积极分子，把其中的优秀人物选拔到各个领导岗位上来，组成一支坚强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骨干队伍，并且吸收其中的先进部分到党内来，增加党的新鲜血液。至于个别地方，少数乡社，整风反右不彻底，“五气”还没有扫除，则必须认真整顿，对屡教不改和有严重右倾保守思想还居于领导地位的，必须坚决撤换，保证全面大跃进。这样做，比孤立地整风整社，更符合客观的实际情况，也更有利于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充分发挥运动的积极作用。

五、运动**自始至终，都应该按照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充分发扬民主，采取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现场会、展览会等等形式，做到真正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使这个运动真正成为广大群众的自我教育行动。**应该在广大农民群众的思想解放、觉悟提高、干劲更足的基础上，在1958年大丰收的基础上，制定出1959年农业生产更大跃进特别是夏季更大丰收的增产计划，以及水、肥、土、种、密、工具改良、田间管理等项增产措施的实施计划，制定出比较长期的包括“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的全面的远景规划。通过这一切，掀起一个比1957年冬季以来更大的冬季生产高潮，争取1959年夏季更大的丰收，争取1959年全年粮、棉、油全面跃进，加速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会议又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肥料问题的指示》，全文如下：

一、1958年，每亩耕地平均施肥（主要指土肥——笔者注）两万斤以上，这是今年农业获得史无前例的大丰收的一个重要因素。今后除了继续增加施肥数量以外，要更多地注意提高肥料的质量。

二、化学肥料在最近几年内还不能满足需要，各地除了积极努力增产化学肥料以外，都很注意发展土法制造的化肥。现在已经收集到的比较成功的方法有30种，按照各省区的规划，1959年全国土化肥的总产量，预计将超过3千万吨。希望各省区认真发动专、县、乡、社，组织土化肥的生产，超额完成3千万吨的规划。**根瘤菌、固氮菌、磷细菌等细菌肥料和植物生长刺激素的生产，并不那么神秘，有的县、乡、社也可以生产，应该积极发展。**

三、**农家积肥、造肥，还是最主要、最大量的肥源。人畜粪尿、绿肥、河泥、塘泥等等，都是有机肥料。化学肥料是无机肥料，中外的经验都已经证明，必须与有机肥料配合施用，才能更好地发挥肥效，避免土壤恶化。**因此，绝不要因为化肥特别是土化肥的增产，而放松了农家积肥、造肥。积肥、造肥应该是经常性的，同时一年又要突击几次。现在正是采集和沤制绿肥的最好季节，应该集中力量，突击一番。1958年冬季，深耕、改良土壤和兴修水利等等任务很重，但是决不可挤掉积肥。

四、1958年用在肥料方面的劳动量很大，三千几百亿担肥料，送到田地里去，是一件大事。今后应该积极研究和推广把农家肥料加以精制的办法，减少运输量，提高肥效；同时，**大力提倡田头积肥，在田头地边修起沤肥池，可以大大节省运输力**，并且平时零星积，用时不紧张。

五、随着粮食的大量增产，单位产量的迅速提高，就不必强调复种，就有可能利用冬季或者麦收以后休闲的田地，种植绿肥作物。

六、**要“按土施肥”，根据不同的土壤，施用不同的肥料，氮、磷、钾等要适当配合。提倡分期施肥，多施基肥，勤施追肥，**摸清各种作物成长的规律，迟效肥和速效肥相配合，施用得当；并且同深耕结合起来，分层施肥。总之，不仅要多施肥，还要从施肥方法上尽力提高肥效，及对总结各种不同土壤使用不同肥料的经验，加以推广。

会议休息时，毛泽东发现摄影组的胡秀云正在看《矛盾论》，他就对小胡说：

“这本书我都不满意，你还看。我还想另外再写一本呢，写给你们年轻人看。”

8月30日，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举行最后一次会议。出席工业书记和市委书记会议的全体人员也参加了这次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讲话，关于军队问题，他说：

**“我看所有的‘长’———军长、师长等，都至少当一个月的兵，头一年最好搞两个月，要服从班长、排长指挥。一年你管人家11个月，人家管你一个月还不行吗？有些过去当过兵的现在多年不当兵了，再去当一下。”**

后来在9月20日，总政治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作出了《关于军队各级干部每年下连当兵一个月的规定》。规定下发后，各级军官积极响应，全军上下迅速掀起了干部下连当兵的热潮。据统计，自1958年8月至1962年底，全军下连队当兵的干部共计77万人次，其中将军250人。

再说在政治局扩大会议最后一次会议上，关于人民公社问题，毛泽东说：

“人民公社这个事情是人民群众自发搞起来的，不是我们提出来的。**因为我们提倡不断革命，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做，群众就干起来了。**不仅南宁会议没有料到，成都会议也没有料到，八大二次会议也没有料到。”“我们的人民在农业合作社的基础上搞起来的人民公社，不是空想的。”“但是把这个问题条理化，说清道理，那就需要我们，需要在座的同志们，需要各级党委，需要中央。现在，我们作了一个决议。”

“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两个：一为大，二为公，叫大公社。人多，几千户，一万户，几万户；地大，地大物博，综合经营，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农林牧副渔，农业合作社原来就有的，工农商学兵，是人民公社才有的。这些就是大。**大，这个东西可了不起，人多势众，办不到的事情就可以办到。公，就是比合作社更要社会主义，把资本主义的残余，比如自留地、自养牲口可以逐步取消。”**

“人民公社是最近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出现的一个新事物。看起来，只要一传播，把章程、道理一讲，发展可能是很快的。今年一个秋，一个冬，明年一个春，可能就差不多了。有个同志提出，可否明年放个‘人造卫星’，全国办个公共食堂，人民在食堂吃饭不要钱。吃饭不要钱还要个过程，明年看看，后年以后再考虑。”

他又说：

“**有人说，平均主义出懒汉，过去22年，出了多少懒汉？我没有看见几个。现在发明一个东西，要给100元，倒是出了懒汉，争吵，不积极。”**

关于他在决议中所写的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时间问题，他说：

“这个决议上有一句话，是不是妥当，请同志们考虑一下。就是讲，快的地方三、四年，慢的地方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

毛泽东还说：

“现在中国刚刚建设，我们要想到怎样建设得更合理，更好一些。要用新的观点好好经营一下，规划一下，搞得很美，是园林化。”

毛泽东最后说：

“明年是带决战性的一年，不论工业、农业都是这样，特别是钢铁、机械，还有粮食。**从8月21日算起，今年还有4个月，钢铁生产任务能否完成，相当危险。为什么我们在这里开会？就是要紧急动员，要搞到那么一点钢。能不能搞到，我总是怀疑，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请同志们努力奋斗，以期贯彻。钢铁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这次会议讨论的问题，工农商学兵什么都有。重点是工业。全党真正要办工业，要第一书记来抓。从现在这个时候起，从北戴河会议起，以后多少年，我们的工作要偏到工业这个方面。农业比较上轨道了，工业还没有完全上轨道。**明年是决战的一年，主要指工业，而工业首先是钢铁和机械。有了这两个东西，百事皆有。所以有人封粮食、钢铁、机械为‘三大元帅’，我看是有道理的。”**

毛泽东讲话结束时，向与会者推荐了一本书：《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他要求公开出版，广为传播，他还说：

“这本书，第一，对我们很有启发；第二，相当不足，许多话是模糊印象，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经验。”

欲知此后毛泽东有什么重大行动，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8月30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的最后一部分，值得认真研究。其中有两句话是这样说的：“**明年是决战的一年，主要指工业，而工业首先是钢铁和机械。有了这两个东西，百事皆有。”“从8月21日算起，今年还有4个月，钢铁生产任务能否完成，相当危险。为什么我们在这里开会？就是要紧急动员，要搞到那么一点钢。能不能搞到，我总是怀疑，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请同志们努力奋斗，以期贯彻。钢铁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这便是他的**建国战略**的一个重要部分。后来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为什么要大炼钢铁不理解，而对大炼钢铁运动中出现的一些偏差更是抓住不放。他们看不到巨大的成就与偏差是**“9个指头和1个指头的关系”。**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不了解毛泽东在经济建设方面的战略部署。笔者相信，只要你读懂了毛泽东的建国战略，便一定会看清楚一些人在大跃进、大炼钢铁问题上散布的那些污蔑不实之词。

**第58章**

“**西方世界的太阳是傍晚的没落的太阳，亚洲、**

**非洲、拉丁美洲的太阳是早晨的上升的太阳。**”

话说1958年9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目为《立即行动起来，完成把钢产量翻一番的伟大任务》的社论，并全文发表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一千零七十万吨钢而奋斗》的决议。

由此，全国掀起了一个空前规模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

9月1日这一天，《人民日报》还以《徐水人民公社颂》为题，报道了刘少奇派人抓的典型。报道称：河北徐水将要发射亩产山药120万斤、一棵白菜500斤、小麦亩产12万、皮棉亩产5000斤的高产卫星。

此时，王观澜曾到河北徐水视察，发现情况很不正常，他说：

“亩产几万斤，不可能的，不符合科学水平的。”

王观澜将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泛滥，使群众吃不饱饭的情况，写信报告了毛泽东，严肃地批评了领导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共产党员要讲真话。几天后，毛泽东听取了他的批评意见，对他表示感谢。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共产风的源头就是在刘少奇这里，跟着他的指挥棒吹拉弹唱的人，上上下下都是一大堆。‘大踏步地提前进入共产主义’是刘少奇的原话，还有什么‘男女分营，到礼拜六住在一起，其它时间都要分开住’。这都是狂热到极点的话，削弱了群众对党的信念。家庭是老百姓根深蒂固的生活支柱，不要家庭了。这种东西谁会拥护？他自己都不拥护，他自己就和王光美分不开。刘少奇说，中南海也要取消家庭，中南海有大屋子住，男的住哪里，女的住哪里。我们都慌了，整天担心小屋会不会收回去啊，收回去了私人东西放在那儿啊。现在领导人说了话，下面可能不当回事，那时候刘少奇讲话，我们必须都得听。”“大跃进中最大的问题还不是共产风，而是浮夸风，后来饿死人就和这个浮夸风密切相关。当时，从中央到地方各省市都有两派：浮夸派和反对浮夸派。浮夸派包括好些中央领导、大区书记和省委书记。中央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谭震林跟在后面瞎说。下面的几个大区的书记、省委书记，包括中南的王任重、华南的陶铸、华北的彭真、西北的刘澜涛、西南的李井泉和华东的柯庆施，都在那里推波助澜。王任重、李井泉、刘澜涛跟着搞浮夸现在是尽人皆知，其实陶铸也很能吹，浮夸得不得了，连彭真也是浮夸的，柯庆施也跟进去了。这些人搞这个浮夸倒不一定是他们商量过一起搞的什么路线，而恐怕是‘你王任重搞了万斤，我要不搞万斤，那不就是我不行’这么一种想法造成的。四川的李井泉和湖北的王任重商量过吗？他们不可能商量的，那已经是个电讯时代，有什么事情一下就都知道了，他们是不约而同。”“浮夸风的一个标志是放粮食高产卫星。‘高产田’、‘亩产万斤’等消息都是在《人民日报》上首先登出来的。邓拓当时是《人民日报》的总编辑，邓小平是党内主管《人民日报》的。刘少奇是怎么讲的，邓小平是怎么讲的，毛主席是怎么讲的，《人民日报》和许多其它报纸都登出来的。刘少奇的讲话还印出书来了，全国发行。亩产几千斤粮食，刘少奇担心粮食多了，没有出路了。刘少奇批判底下人说：‘你们没有志气，现在不是粮食少了怎么办，而是多了怎么办。’这种话也刊登在报纸上的。他这个思想还一时影响到主席，毛主席说，多了怎么办？那就多养猪，养牲口。他们说那还是吃不完，毛主席就说：‘搞酒精燃料。’——那时我们缺石油。**毛主席不是没有发热，毛主席也发热，但比起刘少奇，毛主席说话有个边，刘少奇的讲话一点边都没有。毛主席从来就没有讲过什么‘亩产万斤’，或者相信有‘亩产万斤’这种事，还叮嘱我们这些他身边的人别去跟着瞎说，听听就是了。相反的，刘少奇，邓小平他们都相信亩产万斤的。1958 年邓小平到东北视察，当地的领导汇报第2年计划增产 20%，邓小平就说：‘人家都是好几倍的增产，你们才 20%，简直就像是乌龟爬。’他把当地的领导骂得个灰头灰脸。这在当时也是上了报纸的，查当时的报纸就知道了。”“现在出的《刘少奇文选》、《邓小平文选》都不收录他们这个时期的讲话，这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再说9月1日下午，毛泽东召集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黄克诚、雷英夫，以及乔冠华、著名法学家刘泽荣和周鲠生等开会，研究领海问题。

雷英夫汇报了领海线论证过程和采用12海里领海制的建议，乔冠华对待发的外交部新闻稿作了说明。两位法律专家对各种国际法特别是《海牙协议》作了进一步说明，他们引经据典，主张沿用**民国时期当局颁发过的3海里领海制，**认为如果宣布12海里，可能会引发国际争端，美、英会出来反对，搞不好会打仗。毛泽东说：

“老先生们的意见很好，很可贵，使我们可以从另外的角度多想一想。但是，研究来研究去，《海牙协议》不是圣旨，也不能按照美、英等国的意志办，我们的领海线还是扩大一点有利。从各方面判断，仗一时半会儿打不起来，我们不愿打，帝国主义就那么想打？我看未必。一定要打，我们也不怕。在朝鲜已经较量过了，不过如此，要有这个准备。”

毛泽东从中国的经济、安全利益出发，并考虑到当时我国海岸**火炮有效射程在12海里**以上，最后确定采用12海里的领海宽度（22.224公里），并且决定立即公之于世。

9月1日晚，毛泽东把张治中请到他的住处，说：

“我想到外地视察去，你可愿意同行？”

毛泽东的计划要去各地了解人民公社化运动和钢铁生产的情况，早在几天前，他约好张治中等他，说是有话说，并没有说明要干什么。张治中等了几天，毫无消息，他感到纳闷，又不好去问。现在听毛泽东如此说，真是喜出望外，就非常高兴地说：

“能够有这个难得的机会，那太好了！”

毛泽东又说：

“我今年月月都有会议，这次北戴河又开了半个月紧张的会，有点累了。这次出去要好好地休息几天，什么公事也不谈，什么文件也不看。我还打算到长江、钱塘江游泳，你能不能参加？”

张治中说：

“我不会游，只能戴着救生圈泡一泡，还得有人跟着。”

毛泽东幽默地说：

“那你做个观潮派吧。”

说罢，二人哈哈大笑起来。

张治中回到住处，把毛泽东约他一同南下视察的事情告诉了余湛邦，并嘱咐他说：

“这回你要好好准备。我每天紧跟在毛主席身边，你利用速记把他讲的话每句都记下，并留意环境和采访群众，到晚上我们把材料凑在一起，就可以成为一篇宝贵的日记。”

9月2日，毛泽东会见了巴西记者马罗金和杜特列夫人。他一见客人便客气地说：

“你们等了很久吧？因为我们开会，没有能早见你们。”

马罗金说：

“得到你的接见是一件很光荣的事，等多久都可以。”

杜特列夫人也说：

“等得再久，我们也感谢你的接见。而且，这样可以有时间多看一些材料，也可以在中国多呆一些时间。”

毛泽东问：  
“看了些什么材料？”

杜特列夫人说：

“有你的著作，包括《新民主主义论》。”

毛泽东见客人提到了《新民主主义论》，便说：

“我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讲到，第2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不可能再出现基马尔式的土耳其那样的国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要么是站在帝国主义战线方面，要么就是站在反帝国主义战线方面，没有其它的道路。事实上，这种观点只适合于一部分国家，对于印度、印度尼西亚、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等国家却不适用。它们不是帝国主义国家，也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是民族主义国家。拉丁美洲也有许多这样的国家，将来还会多。”

“民族主义国家采取中立立场，帝国主义国家却不喜欢，因为这些民族主义国家的中立是摆脱了它们的控制而取得的。民族主义国家的这种中立也就是一种独立自主、不受控制的立场。我们社会主义阵营欢迎这些国家的这种中立立场，因为它有利于和平事业，不利于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和战争计划。我们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已经独立的国家看成朋友，把还没有独立、正在争取独立的国家也看成朋友。我们支持它们。”

“只要巴西和其它拉丁美洲国家愿意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我们一律欢迎。不建立外交关系，做生意也好。不做生意，一般往来也好。中国同拉丁美洲国家的社会制度是不同的，但是，在许多观点上是相同的。首先，要求独立这一点是相同的。不仅你们有独立问题，我们也有。我们还有台湾问题，美国还在威胁我们。即使台湾收复了，美国的威胁还会存在。这是我们最大的共同点。其次，我们的经济都不发达。要求发展经济的愿望，在你们那里是迫切的，在我们这里也是迫切的。所有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的共同历史任务，就是争取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和发展民族文化。”

毛泽东还说：

“**西方世界的太阳是傍晚的没落的太阳，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太阳是早晨的上升的太阳。**帝国主义历来就是吓唬人的，有时也动手打人，我们就是不要被它们吓倒，不要怕它们。**对西方的崇拜是一种迷信，这是由历史形成的，现在这种迷信正在逐渐破除。说西方是先进的，这也是一种迷信；恰恰相反，它们是落后的。自然，它们有一点东西，无非是几斤钢铁和几个原子弹；其实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他们在政治上是落后的，是腐败的，是低级趣味的，所以我们看不起它们。列宁说过先进的亚洲、落后的欧洲这样的话。那时候，列宁所指的是中国和亚洲其它国家的民主运动，他看出亚洲要跑在欧洲的前面。**现在，除了社会主义阵营以外，除了亚洲的民族革命运动以外，还要加上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革命运动；这些都是先进的，而西方世界则是落后的。这句话，杜勒斯这些人听起来是不服气的。他们会说：‘这是吹牛，我们有钢铁和原子弹，怎么反而是落后呢？’我说，他们虽然有钢铁和原子弹，但是这些东西是拿在落后的人手里，拿在垄断资本家手里；他们一时耀武扬威，最后总是要跨下去的。

破除对西方的迷信，这是一件大事，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都要进行。在我们国家也要继续破除这种迷信。**我说的是，要在战略上蔑视帝国主义，把帝国主义看成纸老虎，不算数。但是在战术上和在每件具体工作上，却要重视它们，要认真对待它们。帝国主义由真老虎变成半真半假的老虎，再变成完全的假老虎，即纸老虎，这是一个事物走向反面的转化过程，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促进这个过程。**在这个过程结束之前，老虎还可能要活一个时期，还能咬人。因此，打老虎要一拳一拳地打，要讲究拳法，不能大意。

西方国家的人民也不同意他们政府的做法。**我说美国不好，只是说它的统治集团不好，美国人民是很好的。他们中间许多人现在还没有觉醒，但是一定会觉醒的。**”

9月3日，毛泽东从北戴河返回北京。

此时，西柏坡村党支部派人来到北京，向毛泽东汇报水稻产量，他们说：

“听主席的话，村里派人到涿县学习了以后，全村的稻子都把直播改为插秧，这招儿真灵，稻子产量翻了几番。”

毛泽东听罢很高兴，他笑着说：

“怎么样，这下子服了吧，不守旧了吧！要讲究科学种田嘛。”

9月3日这一天，中央军委下发了经毛泽东审阅并修改的《对台湾和沿海蒋占岛屿军事斗争的指示》。

此前，毛泽东在9月1日前后从外电报道中得知，**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在8月27日用福建前线指挥所的名义连续播发的广播稿中，敦促驻防金门的国民党军官兵放下武器，并说“对金门的登陆进攻已经迫在眉睫”。**他严厉地批评了有关人员，说这是违反集中统一原则的，并责成中央军委起草一份《对台湾和沿海蒋占岛屿军事斗争的指示》。

《指示》中说：

“台湾和沿海蒋占岛屿是目前国际阶级斗争中最严重最复杂的焦点之一。”“解放台湾和沿海蒋占岛屿虽然属于我国内政问题，但实际上已变成一种复杂严重的国际斗争，我们不要把这个斗争简单化，而要把它看做是包括军事、政治、外交、经济、宣传上的错综复杂的斗争。台湾和沿海蒋占岛屿问题的全部、彻底解决，不是短时间的事，而是一种持久的斗争，我们必须有长期的打算。”

《指示》对包括炮击金门在内的沿海斗争作了4点规定：1、继续炮击封锁金门，但目前不宜进行登陆作战。2、炮击封锁金门的活动，必须有节奏，打打看看，看看打打。3、海军、空军不得进入公海作战。蒋机不轰炸大陆，我也不轰炸金、马；蒋军轰炸大陆，我轰炸金、马，但不轰炸台湾。4、我军不准主动攻击美军。如果美军侵入我领海、领空，我必须坚决打击。

《指示》中还告诫说：一切重要的行动和宣传（文告、谈话、口号、社论、新闻、广播）都必须遵守集中统一的原则，不得自作主张。

9月3日晚，毛泽东命令已经回到福建前线的叶飞：福建前线自9月4日起，暂停止炮击金门3昼夜，以观各方动态。

叶飞为防止意外，严令各炮群严格执行毛泽东的命令，前线所有大炮的炮弹，都退出了炮膛。

此时，美国政府应蒋介石的要求，已调集太平洋第7舰队主力和地中海第6舰队一部分兵力，集结于台湾海峡地区。

毛泽东命令暂停炮击，显然是静观其变，看美国人如何反应。他又让章士钊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章士钊的信中有这样几句话：“台澎金马，唇齿相依，遥望南天，希诸珍重。”毛泽东看了很欣赏，但认为把台湾看作“南天”不恰当，便改为“南云”。

9月4日，《人民日报》、党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根据毛泽东的要求，刊登了河南省遂平县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

卫星人民公社是由嵖岈山附近27个农业合作社在1958年4月间合并而成的。全社共有9369户。此后，由于中共中央和省县各级领导一直都没有对合并后的大社提出详细的组织要求和章程，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便在8月7日拟定了这个简章。简章规定：

**人民公社的宗旨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积极地创造条件，准备逐步地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

“各个农业合作社合并为公社，根据共产主义大协作的精神，应该将一切共有财产交给公社，多者不退，少则不补。原来的债务，除了用于当年度生产周转的，应当各自清理外，其余都转归公社负责偿还。”

“在已经基本上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基础上，社员转入公社，应该交出全部的自留地，并且将所有的房屋、牲畜、林木等生产资料，转归全社公有。单干户加入公社，应该把全部的土地、牲畜、林木、大农具等生产资料，转归公社所有。”

“**公社实行集体领导，分级管理，全社划分为若干生产大队。**生产大队是管理生产、进行经济核算的单位，盈亏由社统一负责。公社在收入稳定、社员能够自觉地遵守劳动纪律的情况下，实行工资制。按照每个劳动力所参加的工作的繁重和复杂程度，以及本人的体力强弱、技术高低和劳动态度好坏，由群众评定工资级别，按月发给工资。在粮食生产高度发展、全体社员一致同意的条件下，实行粮食供给制。全体社员，不论家中劳动力多少，都可以得到免费的粮食供应。因此，公社要组织公共食堂、托儿所和缝纫组织，使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

毛泽东在《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上作出的批示是：

**“美妙如一首诗！我们的秀才伯达、春桥，可否去看一看？”**

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虽然只是草稿，但是，一经报刊作为办社的样板加以推荐，自然就成了人们仿效的榜样，全国各地都纷纷照抄照搬了。

9月4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授权下发表声明，公然声称要在台湾海峡地区为台湾军舰护航。同时，杜勒斯还提出在华沙恢复中美之间的会谈。

9月4日晚，毛泽东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台湾海峡局势以及对美关系的问题。与会者分析说：美国人还是怕打仗，未必敢在金、马同我们干起来。毛泽东说：

“美舰侵入我领海，我有权自卫，但也不一定马上打炮，可以先发出警告，相机行事。我们还准备另一手，通过即将在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以外交斗争配合福建前线的斗争。有武戏又有文戏。”

他让特意被召回北京的驻波兰大使王炳南汇报一下中美大使级会谈的情况。王炳南在汇报中说：

“由于我们掌握了真理，对美国无所惧，无所求，因此在会谈中处于主动地位。”

毛泽东笑着插话说：

“我们要台湾回归祖国，怎么就无求于美国呢？”

王炳南说：

“台湾自古就是我们中国的领土，是我们的地方，美国无权霸占，它本该交还给我们，而不是我们去求它。”

“你讲得好，有骨气！”毛泽东说：“我们还有一手，就是宣传斗争。”

他转向胡乔木和吴冷西，说道：

**“现在要大张旗鼓地谴责美国在台湾海峡制造紧张局势，要求美国军事力量撤出台湾和台湾海峡；强调台湾及沿海岛屿是中国领土，炮打金马是惩罚蒋军，是中国内政，任何外国不得干涉。《人民日报》、新华社、广播电台是舆论机关，评论可以讲得激烈一点，当然也要适当，不要说过头话。”**

毛泽东对大家说：

“以上这些关于宣传工作的意见，我都向《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作了布置。”

接着，他让周恩来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领海的声明》草稿。被邀请来参加会议的张奚若教授听了草稿的内容，建议说：

“周总理对美声明的草稿中，‘立即’二字能否改得缓和些？”

毛泽东说：

“可以研究。‘立即’的英文怎样讲？”

周恩来说：

“quickly。”

毛泽东用英文反复念了三遍，说道：

“可以改。”

会后，周恩来修改并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领海的声明》。

9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领海的声明》，全文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海宽度为12海里（浬）。这项规定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领土，包括中国大陆及其沿海岛屿，和同大陆及其沿海岛屿隔有公海的台湾及其周围各岛、澎湖列岛、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以及其他属于中国的岛屿。

二、中国大陆及其沿海岛屿的领海以连接大陆岸上和沿海岸外缘岛屿上各基点之间的各直线为基线，从基线向外延伸12海里（浬）的水域是中国的领海。在基线以内的水域，包括渤海湾、琼州海峡在内，都是中国的内海；在基线以内的岛屿，包括东引岛、高登岛、马祖列岛、白犬列岛、乌岳岛、大小金门岛、大担岛、二担岛、东碇岛在内，都是中国的内海。

三、一切外国飞机和军用船舶，未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许可，不得进入中国的领海和领海上空。

任何外国船舶在中国领海航行，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有关法令。

四、以上二、三两项规定的原则同样适用于台湾及其周围各岛、澎湖列岛、东沙群岛、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以及其它属于中国的岛屿。

台湾和澎湖地区现在仍然被美国武力侵占，这是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完整的和主权的非法行为。台湾和澎湖等地尚待收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有权采取一切适当的方法在适当的时候，收复这些地区，这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国干涉。

1958年9月4日于北京

后来在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最终采用了毛泽东提出的12海里领海制度，规定：“各国有权确定不超过12海里的领海。”

9月5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15次会议。会议主要议程是讨论第2个“五年计划”，特别是1958年钢铁产量翻一番的指标，以及人民公社问题。

台盟总部的徐萌山也被邀请参加了会议。

毛泽东在讲话中谈到了中美关系问题，他说：

“我们炮打金马，美国人紧张起来。美国现在在我们这里来了个‘大包干’制度，索性把金门、马祖，还有些什么大担岛、二担岛、东碇岛一切包过去，我看它就舒服了。这也好，它上了我们的绞索，给套住了。美国的颈吊在我们中国的铁的绞索上面。台湾也是个绞索，不过要隔得远一点。它要把金门这一套包括进去，那他的头更接近我们。我们什么时候要踢他一脚就踢他一脚，它走不掉，因为它被一根索子绞住了。我们主动，美国人被动。**蒋介石过去给我们捣乱，主要是从福建这个缺口来的。金、马在蒋军手里，实在讨厌。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但是，我们现在并不要登那个什么金门、马祖。你登它干什么？它的工事相当坚固。只是试试美国人，吓吓美国人。但是金门、马祖并不是一定不打，一有机会，为什么不相机而行，把金、马拿回来。**其实，美国人心里也怕打仗，所以艾森豪威尔公开讲话时，没有说死要‘共同防御’金、马，有点想脱身的味道。他们想采取脱身政策也可以，把金、马11万蒋军撤走就是。赖着不走，就让蒋军呆在那里，也无碍大局，美国人给套住就是了。”

他的这个讲话，后来就成为人们常常提到或引用的著名的“绞索政策”。

毛泽东又谈到了已经发表的《关于领海的声明》，他说：

“这个文件是相当复杂的。那里头要想一想才想到这个道理的。为了这个文件，准备了好几个月，去年就起草了，这回又准备了一个多月。总要有法有天吧。不然，搞得无法无天就不好办了。”

毛泽东还提出要准备作战，他说：

“最后一条，就是准备反侵略的战争。头一条讲了双方怕打，仗打不起来，但世界上的事情还是要搞一个保险系数。因为世界上有个垄断资产阶级，恐怕他们冒里冒失乱搞，所以，要准备作战。这一条要在干部里头讲通。第一，我们不要打，而且反对打，苏联也是，要打就是他们先打，逼着我们不能不打。第二，但是我们不怕打。要打就打。我们现在只有手榴弹跟山药蛋。**氢弹、原子弹的战争当然是可怕的，是要死人的，因此我们反对打。但是这个决定权不操在我们手中，帝国主义一定要打，那么我们就得准备一切，要打就打。就是说，死了一半人也没有什么可怕。这是极而言之。在整个宇宙史上来说，我就不相信要那么悲观。**我跟尼赫鲁总理辩论过这个问题，他说，那个时候没有政府了，统统打光了，想要讲和也找不到政府了。我说，哪有那个事，你这个政府被原子弹消灭了，老百姓又起一个政府，又可以议和。世界上的事情你不想到那个极点，你就睡不着觉。无非是打死人，无非是一个怕打。但是它一定要打，是它先打，它打原子弹，这个时候，怕，它也打，不怕，它也打。**既然是怕也打，不怕也打，二者选哪一个呢？还是怕好，还是不怕好？每天总是怕，在干部和人民里头不鼓起一点劲，这是很危险的。我看，还是横了一条心，要打就打，打了再建设**。因此，我们现在搞民兵。**人民公社里头都搞民兵，全民皆兵，要发枪，开头发几百万支，将来要发几千万支。**由各省造轻武器，造步枪，机关枪，手榴弹，小迫击炮，轻迫击炮。人民公社有军事部，到处练习。在座的有文化人，你们也要号召一下，单拿笔杆不行，一手拿笔杆，一手拿枪杆，又是文化，又是武化。”

9月5日深夜，赫鲁晓夫指示苏联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苏达利柯夫求见周恩来，说明赫鲁晓夫对台湾海峡局势极其担心。

原来赫鲁晓夫在福建前线炮击金门后，非常担心害怕，在他看来，炮击金、马，会闯下大祸，可能引发世界大战。

苏达利柯夫问周恩来，可否让苏联外长葛罗米柯来华访问？周恩来说，欢迎葛罗米柯同志来华访问。

9月6日，赫鲁晓夫急忙派外长葛罗米柯来到中国，探寻究竟。一是要葛罗米柯转告中国政府，苏联对台湾海峡局势的估计，二是商谈赫鲁晓夫给艾森豪威尔写信的问题。周恩来和毛泽东先后向葛罗米柯介绍了中国对局势的分析和估计，说明了中国的立场、原则和斗争策略。毛泽东说：

**“中国炮击金门马祖，并不是就要用武力解放台湾，只是要惩罚国民党部队，阻止美国搞‘两个中国’。估计美国不会采取大的引起世界大战的军事行动，不会打大仗，万一中美之间打起来，打出乱子，中国也决心单独承担后果，不会拖苏联下水。”**

葛罗米柯对中国的立场和策略表示赞同，周恩来也对苏联《真理报》支持中国的3篇文章表示感谢。赫鲁晓夫听了葛罗米柯的报告，这才放下心来，决定给予中国必要的支持。

9月6日下午，最高国务会议第15次会议继续进行，讨论针对杜勒斯4日声明将要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台湾海峡地区局势的声明》。周恩来首先发言说：

“我看不要多讲，就是把这个念一念，全部的立场、方针、政策、策略都在上头了。前天晚上不是发表了一个领海声明吗？也是抢先一步。这是主席昨天说的，我们的行动是调动世界上一切方面的力量，各方面都表示了态度。”

毛泽东说：

“公开支持它的，只有一个南朝鲜李承晚。”

周恩来说：

“连菲律宾都是有条件的，要打它那个军事基地，它才参加。我们怎么能打它那个军事基地呀！”

毛泽东说：

“连菲律宾都不参加，除非我们打了它，它才参加。”

周恩来说：

“英国也是很担心，表示沿海岛屿是属于中国的。日本这回态度也不同一点，藤山说这个沿海岛屿是中国的内政，他一直把台湾看做是中国内政，希望一个中国。所以美国很孤立。我们是后发制人，毛主席的方针，后发制人总是有利的。”

毛泽东说：

**“打炮是先发，说话是后发。”**

周恩来说：

“打炮就是试验他，这回试验出来了，杜勒斯这张牌出来了。杜勒斯这张牌有4点可以说一下。第一，他还是艾森豪威尔从前那个声明，没有前进一步，强调而已。就是说沿海岛屿到底与台湾有没有关系，现在关系更增加了。是不是马上行动，他还没有说，还没有判断。所以，杜勒斯发表声明后，美国国务院马上接着说，他自己也在参议院里说，这个方针并没有改变。证明他还是原来的立场，没有改变，不过强调而已。第二，他就想试一试，如果蒋介石不行，他就顺着溜来，就是保护运输，到公海边上。然后蒋介石自己拿小船运上去，自己防守。他相信还可以守，还是要靠蒋介石自己守。第三，**他表示，如果我们正式登陆，他难免要采取行动。但是他这个话说得没有劲儿。他说他真诚地希望中共大概也不会这样想。这不是话松了吗？**第四，**他表示还要谈判。这个是他露了底的**。我们不是限期他答复吗？他晚了12天，为了面子，结果还是答复了。说他派出驻华沙的大使跟我们的王炳南见面，或者跟他继续会谈。这封信我们还没有答复他，我们压了一压，他这回漏出来了。他这个牌4点都漏出来了。所以，我们炮轰金门，把杜勒斯、艾森豪威尔的牌就亮了底，然后我们再将这张牌打出去。我们就可以动员世界舆论和全国人民。”

毛泽东见周恩来介绍完了，就说：

“至少美国是被动的。他仓促调兵，有一个航空母舰，是从菲律宾调来的，还没有到，有些是从夏威夷调来的，有些是从日本调来的。他真诚地希望我们不去登金门，他是被那个索子把他套住了，使他难办。台湾是一根大索子把他套住，金门、马祖也算一个索子。我们这个蒋委员长，就是有那么多兵，他搞三分之一的兵力11万人在两个岛上，其中95000人在金门岛，15000人在马祖岛。而金门岛三面在我们炮火包围中。**金门距我们只有3公里。金门岛把厦门变成一个死港，马祖岛就把我们福州的闽江海口塞住了。这个东西得整他一下。我们整金门，我们是整家法，这是我们国内的事（**笑声）。当然，整台湾也是整家法了，不过那个地方有你美国兵，我还是暂时不去，你过去谈判又那么冷淡，中断了好几个月。现在你想谈，那好，可以谈。**你不打他就不想谈，要把这个绞索捏紧一下，他感觉到痛了，他说，好好好，我们来谈吧。你不捏他就不谈。**

他说他们已经决定了，要撤退金门、马祖，但是他又不撤。你不撤我就打，你一撤出我就可以不打了，你全部撤走我可以一炮不打。这对蒋介石也是一个难事，他怕一撤，影响人心士气，又丧失了这两块土地，他的土地也就不大了（笑声）。听说美国人也劝过他撤，不晓得是真的是假的。你现在不撤，我们反正老是打，我可以隔几个星期或者隔几天打那么一次，或者隔个把两个月打一次，一打就是几万发炮弹，或者每天打点零炮，打个100发200发炮弹。

他要拿沿海岛屿交换台湾，我们是原则上不能交换台湾。你这个沿海岛屿交我们，台湾就成为独立国，这个东西总不可以吧？！在座诸公，可不可以？原则上总不行吧。至于解放，哪一年解放，我们又没有定期，人民代表大会，人大常委会都没有作决议，一定要在哪一年哪一月解放。但是原则上台湾一定要解放。”

谈到《关于台湾海峡地区局势的声明》，毛泽东说：

“这是经过斟酌了的，有些观点是一路过来的，几年以来我们就是这样的观点。现在好处就是我们这一打，打出美国想谈了，他敞开了这张门了。看样子他现在不谈，也是不得已的，他每天紧张，他不晓得我们要怎么样干。那好，就谈吧。**跟美国的事，就大局上说，还是谈判解决，还是和平解决，我们都是爱好和平的人嘛。他前天那个东西，前面很硬，后面就软了（笑声），就是雷声大，雨点小。”**

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台湾海峡地区局势的声明》。会后，周恩来便发表了这一声明。

9月7日凌晨，毛泽东给周恩来写了一个便函，他写道：

“本日上午，约五、六人对赫鲁晓夫致艾森豪威尔的文件草件认真研究一次，如可能的话，写出一个意见书交葛外长带去。肯定正确部分占90%，可商量部分只占少数，你看如何？赫文中应对中美新声明有所评论。”

周恩来接到毛泽东的信后，很快约邓小平和张闻天研究落实。

9月7日上午，北京各界人士举行百万人大游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纷纷发表谈话，支持周恩来代表政府发表的《关于台湾海峡地区局势的声明》。

同时，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致信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呼吁美国政府要慎重行事，否则会带来不可收拾的后果。赫鲁晓夫还在信中声明说：中国不是孤立的，有忠实的朋友，一旦中国遭到侵略，这些朋友会随时予以援助。

9月7日这一天，国民党海军副司令黎玉玺及美国顾问率2艘运输舰、5艘作战舰艇，在美国2艘巡洋舰、5艘驱逐舰的掩护下，驶向金门海域，向金门输送兵源和给养。

下午2时45分到19时，美国4艘军舰侵入中国近海领域。

晚7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黄克诚写信报告毛泽东说：

“今日福建前线在料罗湾发现有美军舰，另有蒋军军舰4艘，敌我双方均未开炮。6日24时，曾电令福建前线指挥部，选择有利目标于8日或迟一二日还击蒋4、5、6三天向我的炮击。鉴于美舰在金门附近活动，拟暂停止，是否妥当，请指示。”

毛泽东连夜在中南海勤政殿为炮击金门专门召集会议，周恩来、陈毅、张闻天、黄克诚、乔冠华、雷英夫参加了会议。雷英夫汇报了美蒋海军编队及其往返于台湾和金门的活动情况。

恰在此时，负责与福建前线直接联系的作战部长王尚荣，将福建前线总指挥叶飞的急电，交给了毛泽东。叶飞在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说：

“美军已直接介入，打不打？请毛主席指示。”

晚12时，毛泽东决定于9月8日对金门再进行一次惩罚性打击。

这天晚上，作战部长王尚荣和雷英夫往返转达了毛泽东和叶飞的问答。毛泽东答复叶飞说：

“照打不误！”

叶飞请示说：

“是不是连美舰一起打！”

毛泽东答复说：

“只打蒋舰，不打美舰。要等美蒋联合编队抵达金门料罗湾港口才打，要1小时向北京报告一次美蒋编队的位置、队形及航行情况，到达金门料罗湾时，要等北京的命令才能开火。”

叶飞又请示说：

“我们不打美舰，但如果美舰向我开火，我们是否还击？”

毛泽东马上答复说：

“如果美舰开炮，不准还炮！”

叶飞接到电话后，很是吃惊，他惟恐王尚荣和雷英夫转达毛泽东的命令和答复有误，铸成大错，就又问王尚荣：

“如果美舰向我开火，我是不是也不还击？”

王尚荣说：

“是毛主席命令不准还击，清清楚楚。”

叶飞说：

“明白了，我严格执行毛主席的命令。”

于是，他立即亲自给部队下达命令说：

“待美蒋联合编队抵达金门料罗湾港口后才开炮。各炮群只打蒋舰，不准打美舰。如美舰向我开火，我不予还击！”

前线阵地上各炮群接到叶飞的命令后，纷纷追问为什么？叶飞又把毛泽东的命令复述了一次，又问：

“听清楚没有？明白了？”

各炮群回答说：

“听清楚了，明白了，按毛主席的命令严格执行。”

叶飞又将毛泽东的命令通报给前线的空军和海军。

9月8日一早，美国人又来了。这次是美国第7舰队的旗舰重巡洋舰“海伦娜”号亲自出马，率领由6艘驱逐舰组成的海军特混舰队，掩护国民党军的运输编队向料罗湾大摇大摆地驶来。

这天上午，最高国务会议第15次会议举行最后一天的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

**“我们前天发表了声明，美国跳起来欢迎。他们是4号声明，我们是6号声明。”**

周恩来插话说：

“他回答也是6号。”

毛泽东说：

“他6号是第二个，是回答我们的。**跳起来欢迎，可见如获至宝，就是说可以不打了。**在黎巴嫩，他是带着紧张的心情登陆的，生怕苏联闯祸。7月14号到18号，15个吊桶打水。19号一块石头落地，大为欢迎。因为苏联19号发表最高会议要开会。我们呢？8月23号打炮，他忍不住了，就在第13天把底牌打出来了。到9月6号，我们把底牌打出去，中间隔了一天。华盛顿那些人老奸巨猾，一看就跳起来了。艾森豪威尔马上回华盛顿，开了个‘五三’会议，实际上是最高国务会议，他叫作国防安全委员会会议，发表一个声明，立即恢复谈判（我们叫准备恢复谈判）。你看他之急若何？”

毛泽东讲到这里，突然停了下来，问道：

“今天我们总是要打几万发炮弹吧？”

周恩来回答说：

“30000发，20分钟就解决了。”

“20分钟打30000发炮弹。什么时候打？”

“12点。”

毛泽东看了一下表，说：

“现在是11点半，快到了。”

他接着说：

“美国人不整是不行的。但是所谓‘整’，请同志们放心，双方都是谨慎小心的。我们已经公布了12海里，你到了7海里我都不打。我专打国民党军，我就不打你那个美国军舰，七打八打，你也得跑。”**“目前世界形势是东风压倒西风，美国力量有限，对社会主义阵营取守势，所以，中美之间战争是打不起来的。”**

毛泽东还说：

“台湾是套在美帝国主义脖子上的绞索。”“黎巴嫩是最近套住的，也是美国自己制造的一条绞索，自己套上去的，绞索的一端就丢在阿拉伯民族手里。不但如此，而且是丢到全世界大多数人民手里，大家都骂它，不同情它，大多数国家的人民、政府手里拿着这个绞索。比如中东、联合国开了会，但主要是在阿拉伯人民手里套住了，不得脱身。它现在进退两难，早退好，还是迟退好？早退，那么所为何来呢？迟退，越套越紧，可能成为死结，那怎么得了呀？”

“8月23日这一天，我们打了19000发炮弹，他们讲打了四五万发，那是夸大其词。没有那么多，时间只有十几分钟，没有什么很久很久。”“这自然说明我们有力量，不怕打，更重要的是，这是我们祖国的土地，别人管不着。所以我看要奋斗下去，什么威胁我们都不怕。”

毛泽东还引用了《聊斋志异·青凤》中关于不怕鬼的故事，他风趣地说：

“《聊斋志异》里有个狂生，晚上坐着读书，有个鬼吓他，从窗户口那个地方伸一个舌头出来，”

他说着还用两手一比划：

“这么长，它以为这个书生就会吓倒了。这个书生不慌不忙，拿起笔把自己画成张飞的样子，画得像我们现在戏台上的袁世海的样子，然后也把舌头伸出来，没有那么长就是了。两个就这么顶着，你望着我，我望着你，那个鬼只好走了。《聊斋志异》的作者告诉我们，不要怕鬼，你越怕鬼，你就不能活，他就要跑进来把你吃掉。我们不怕鬼，所以炮击金门。这一仗打下去之后，现在台湾海峡风平浪静，通行无阻，所有的船只不干涉了。”

毛泽东突然问：

“吴冷西同志到会了没有？”

吴冷西马上站起来说：

“我来了。”

毛泽东说：

“今天的讲话要发新闻，你先做准备。”

他还建议把“绞索政策”发表一下，他说：

“讲清楚这个问题，对人民有益处，对世界各国也有益处，对美国人也有益处。**我说过，美国军队在黎巴嫩、约旦，早一点退好，还是晚一点退好呢？它把军队退了，一身干净，又是好人了。它不退，还不是侵略者？众矢之的。**金门、马祖这11万人，你不退，我就有文章可做。今天打一炮，明天打一炮，有时打几万发，总是使得你不安宁就是了。”

说话间，已经到了中午12时，在福建前线的指挥员叶飞拿起电话向北京请示说：

“敌人已进入料罗湾，现正在卸载。”

“开火！”

北京传来了毛泽东的命令。

“各炮群注意，按预定方案开炮！”叶飞立即向前线部队下达了命令，他又加重语气强调说：“注意只打蒋舰，先不打美国佬。”

霎时间，人民解放军万炮齐发，料罗湾一带一片火海。这一战美舰不但没有向人民解放军还击，反而掉头溜走了。它们在旗舰的指挥下，向外海驶去。结果，蒋军军舰3艘被击沉，数艘被击伤。报话机里传来了国民党将军向台湾告急的声音，台湾方面问：朋友呢？蒋舰说：什么朋友不朋友，早就逃跑了！他们互相指责，还大骂美国人不够朋友，一打炮便逃之夭夭。显然，国民党将军是急了，他们急得连密码都顾不得用了。叶飞向毛泽东汇报了战况，毛泽东笑了，他说：

“别看他美国人叫得凶，一动真格的他就成了缩头乌龟了。”

叶飞后来在1984年答记者问中说：“事后我才明白，毛主席这个动作很高明。主席的意图是要摸美国人的底。美国人表面上气势汹汹，究竟敢不敢和我们打？原来美国是只纸老虎，一打起来就跑了。金门炮战，是我们与美国互相摸底的一出戏，一出很紧张很有意思的戏。”

再说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接着讲到了国内经济建设问题。他说：

“**鉴于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方面已经有了比较稳固的基础和比较成熟的经验，我们的领导工作重心需要适时地从农业和农村工作方面转移到工业建设方面来，中央和省一级的领导机关，必须一手抓工业，一手抓农业，而从现在开始，要把重点放到工业方面。在工业方面首先要抓钢铁工业和机械工业，因为这是实现我国工业化、农业机械化和加强国防力量的基础。**”

毛泽东讲话结束后，吴冷西和胡乔木根据他的指示，商量着如何起草新闻稿。他们感到发表什么内容很费斟酌，最后确定先写有关绞索的部分，由吴冷西负责起草。吴冷西起草后，交给胡乔木看了。

散会之后，毛泽东和其他政治局常委还在勤政殿的休息室里，吴冷西把新闻稿交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边看边改。他说：

“可以只发表关于绞索部分，其它问题只是内部交换意见，至少目前不宜公开发表。绞索问题也不宜联系金马来谈。用国家主席身份讲话，不宜直接联系金马，不同于写社论、做文章。当然也不能写我们对金马的方针，这是军事机密。但对即将恢复的中美会谈，要表个态，可以说寄于希望，不管将来结果如何。我们现在一手打炮、一手谈判，一武一文。打炮是火力侦察，今天打了3万发，配合天安门群众大会，大造声势。谈判是外交侦察，摸清底细。两手比一手好，保持谈判渠道是必要的。”

毛泽东将新闻稿审改已毕，交给吴冷西说：

“新华社今晚发，《人民日报》明天见报。”

欲知毛泽东在炮击金门和中美关系方面还有什么高招？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到了国内经济建设问题，他说：“**鉴于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方面已经有了比较稳固的基础和比较成熟的经验，我们的领导工作重心需要适时地从农业和农村工作方面转移到工业建设方面来。中央和省一级的领导机关，必须一手抓工业，一手抓农业，而从现在开始，要把重点放到工业方面。在工业方面首先要抓钢铁工业和机械工业，因为这是实现我国工业化、农业机械化和加强国防力量的基础。**”毋庸置疑，这是他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提出的一个了不起的伟大战略！除了毛公，在同一代领导人中谁还有这样的远见卓识？有人说毛泽东只会打仗，不懂经济，建国有功，建设有罪，这一类胡说八道可以休矣！

**第59章**

**“政治挂了帅，什么都好办了。”**

话说1958年9月8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张闻天、黄克诚、王炳南、乔冠华等人，听取王炳南关于前一段中美会谈情况的汇报，商谈关于缓和台湾海峡地区紧张局势的方案。

9月9日，《人民日报》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论目前形势，美国侵略者把绞索套在自己脖子上”为题，摘要发表了毛泽东的讲话内容。

后来，美国在世界舆论的压力下，果然于10月间被迫同意从中东撤军。

9月9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张闻天、黄克诚、王炳南、乔冠华等人，继续商谈关于缓和台湾海峡地区紧张局势的方案。

会议结束时，毛泽东把台湾海峡的斗争委托给周恩来等人处理。他还交代说，在王炳南返回华沙时，由新华社发一条消息，就说王炳南回国述职完毕。随后，毛泽东又向王炳南面授机宜。

据王炳南回忆说：“在返回华沙前，毛主席特意接见了我，指出了在会谈中应该注意的事项。他说：**在同美国人的会谈中，你要多用一种劝说的方法，譬如说，你们美国是一个大国，我们中国也不小，你们何必为了仅仅不到一千万人口的台湾岛屿与6亿中国人民为敌呢？你们现在的做法究竟对美国有什么好处呢？他还说：在会谈中要多用脑子，谦虚谨慎，说话时不要对美国人使用像板门店谈判那样过分刺激的语言，不要伤害美国民族的感情。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民族，应该和好。”**

9月10日凌晨，毛泽东接到了胡志明9月8日的来信。胡志明在信中说：“鉴于台湾情况之紧张，美帝态度之顽固，请您告诉我们：（甲）可能不可能发生美华战争？（乙）我们越南应该有什么准备？”毛泽东随即复信给胡志明，他写道：

“9月8日来信收到，谢谢你。我认为：（甲）美国人怕打仗，就目前说，很少可能大打起来。（乙）贵国似可以照常工作。”

天就要亮了，毛泽东提笔为湘潭大学题写了校名，写了“东山学校”校名二纸，并写了一封回信，接着，又给毛宇居写了一个短信，还在印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字样的信封上写上“湘乡县东山学校”、“毛泽东”两行字，把题字、书信装入信封，让秘书送给毛宇居。

原来毛宇居在几天前再次来到北京，下榻于和平宾馆。毛泽东派人把他接到家中叙谈，毛宇居说起湘潭县委决定创办湘潭大学，目前正在筹备之中。毛泽东关切地问：

“大学办在哪里？”

毛宇居回答说：

“办在杨家桥原湘江煤矿旧址。”

“那是一个山冲里。哪来的学生呢？”

“如今不同了，那里交通比较方便，学生都是从全县高中、初中里选送来的。教师主要是从县内中学抽调出来的优秀教师，还聘请了一部分工农业技术人员担任兼职教员，只是没有教授。”

毛泽东很是赞成这种办学方式，点点头，说道：

“教授也是可以培养锻炼的。”

毛泽东问起办学经费问题，毛宇居说：

“在全县财政经费内统筹解决，学生半工半读，还能自己解决一部分。”

毛泽东表示赞同。毛宇居见时机到了，马上说明了来意，他说：

“主席，你的翰墨写得好，家乡人民都很喜爱。我这次来，是受湘潭县委的委托，特意来请你为湘潭大学题写校牌的，请主席一定答应我这个要求。”

毛泽东微微一笑说：

“近年来许多人找我写字，我都未写，我的字写得并不好。我小时候读书的那个东山学校，几次来信要我写校牌，我也未写。假如我给你们写了，那他们不会有意见？”

毛宇居赶紧说：

“这个问题好办，你写两张，一张由我带给湘潭大学，另一张给湘乡东山学校，我替你送去。这样两县人民不就都满意了吗？”

毛泽东笑着点点头，答应就这么办。可他的事情太多太忙，一直拖了几天，直到现在才写好了。他派秘书到和平宾馆，将信件送给毛宇居。毛宇居打开一看，见里面不但有毛泽东亲笔题写的“湘潭大学”、“东山学校”校名，还有写给东山学校和他的二纸便信。只见毛泽东在给东山学校的信中写道：

东山学校各同志：

你们的大字报早已收到，甚谢。现遵嘱写了校名二纸，请选用，未知适当否？

毛泽东 1958年9月10日

毛泽东在给他的信上写着：

禹居兄：

遵嘱写了湘潭大学校名二纸，请转致选用为盼！另致东山学校一纸，亦请转致。

毛泽东 1958年9月10日

秘书见毛宇居非常高兴地收好了便函，便告辞说：

“主席还交代说，请您老转嘱有关人员：‘一定要把湘潭大学办好。’”

9月10日上午8时，毛泽东偕同江青来到北京飞机场，他对张治中说：

“第一站去武汉，看出铁去！”

尔后他们分别登上两架飞机，缓缓升上天空。

原来，武汉方面根据毛泽东“钢铁要过关，钢铁要过江”的指示，建在武汉青山的第二钢都——武汉钢铁公司一号高炉，计划在1958年国庆节后出铁。这个消息一公布，英国的《泰晤士报》就撰文说，中国是吹牛皮说大话，根本实现不了。

9月10日11时40分，毛泽东一行人飞抵武汉。张治中一下飞机就问毛泽东：

“您昨晚恐怕又没睡觉吧？”

毛泽东说：

“昨晚开了5个会，今天清晨又接见新疆参观团，没有睡。”

张治中说：

“那您好好地先睡一觉吧。”

毛泽东抬头看了看阳光明媚的天空，说：

“不，天气热，我们马上到长江去。”

毛泽东说着就去登车，张治中、曾希圣、王任重、江青等人同车随行。来到船上，毛泽东与准备陪他游泳的武汉体委游泳指导赵锦清、北京体院学员陈嫣屏和四川自贡二中体育教师陈廷杰谈了话。他提出了一个让众人意想不到的问题，他说：

**“全国的江河这样多，能不能都利用起来游泳呢？全国6亿人口，能不能有3亿人口都来游泳呢？**”

毛泽东看着3个非常惊讶的运动员，又说：

“我看是可以的，完全可以。在江河游泳，有逆流，可以锻炼意志和勇气！要走出游泳池。”

在谈话中，他了解到有些体育工作者不安心工作，就问赵锦清说：

“你终身做这个工作高兴吗？”

赵锦清回答说：

“高兴，我愿意终身做这个工作。”

“你们知道吴传玉吗？”这3个运动员当然知道吴传玉，因为吴传玉是100米仰泳世界记录创造者，第四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得过奖，在为吴传玉授奖的仪式上，第一次升起了中国的五星红旗，奏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毛泽东又问：

“现在是否有人赶上了他?”

“没有。”

毛泽东屈指算着：

“55年，56年，57年，58年，3年多了，怎么还没有赶上他呢？”

运动员们说：

“我们一定能赶过吴传玉。”

毛泽东问了几人的学历，说：

“你们是学出来的，可是要好好工作啊。你们是年轻人啊，时间是你们的。”

运动员们激动地表示：

“我们要向毛主席学习，一定要努力工作，把青春献给党，献给党的体育事业。”

毛泽东笑着说：

“还要向群众学习啊。”

说罢，他和江青、张治中、曾希圣、王任重一共5个人，在船上吃了很简单的中午饭：一碟炒青菜，一碟肉片黄瓜，一碟炒小鸡，一碗冬瓜汤。饭后，毛泽东忙着要下江游泳，他笑着问张治中和曾希圣：

“你们可下水？”

张治中、曾希圣二人抱歉地说：

“不能奉陪了。”

“好吧，”毛泽东不失时机地幽默了一把：“你们都当‘观潮派’吧！”

这天下午，毛泽东听取了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关于全省钢铁生产情况的汇报。汇报结束后，王任重又说，为了活跃一下主席和大家的文化生活，今天晚上搞一个舞会。毛泽东转对张治中等人说：

“好，今晚大家都跳舞去。”

张治中说：

“我不会。”

毛泽东笑了笑，开玩笑说：

“看来你的文化程度很低，连舞都不会跳！”

是日晚，张治中在舞厅里坐在一旁看众人跳舞。江青见他不下场，就主动上前邀请他跳一曲。张治中感觉盛情难却，只好上场了。一曲终了，毛泽东微笑着对他说：

“你也下海了，可见你的文化程度有所提高了。”

张治中也笑着说：

“我跳舞是三不管：不管音乐，不管舞伴，不管步子。”

9月12日上午，毛泽东接见了在武汉军区参加党代表大会的党代表们以后，乘车到大操场和大家照相。张治中对同车的曾希圣说：

“这是党代表大会，我不是党员，不必参加了吧？”

曾希圣说：

“我也不准备参加。”

说话间，车队来到了大操场。毛泽东下了车，站在那里等候众人。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和叶子龙跑到依然站在车前等候的张治中、曾希圣面前，说：

“主席等你们一起照相呢。”

张治中、曾希圣赶快走到毛泽东面前，张治中说：

“我不要照了吧？”

毛泽东说：

“为什么？1956年‘八大’时，我们不是邀请了许多党外朋友参加照相了吗？”

张治中一想，觉得也对，他当时不但参加了，照相了，而且还作了书面发言。这时，陈再道也补上了一句：

“你是国防委员会的副主席呀！”

张治中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毛泽东离开大操场，再次来到长江边上，面江而立，准备下水游泳。张治中将余湛邦介绍给他说：

“这是我的秘书余湛邦同志。”

毛泽东“噢”了一声，向余湛邦伸出了手。余湛邦赶紧上前，双手紧紧地握着毛泽东的手，显得紧张而拘谨。他怕毛泽东在轮船的机器轰鸣中听不清他的名字，就补充说：

“我叫余湛邦，是湛江的湛，联邦的邦。”

毛泽东问道：

“是干勾于吗？”

余湛邦心里暗暗责备自己，多疏忽，怎么只提名不道姓呢？就赶紧说：

“是人禾余。”

毛泽东看着余湛邦紧张的样子，故意温和而幽默地说：

“yu姓很多，有干勾于，有人禾余，有人则俞，有口人则喻，有虞姬的虞。”

他用手指指江水，又说道：

“还有水里的鱼。其鱼甚多咧！”

9月12日下午，毛泽东来到武汉大学，接见了集聚在大操场上的4个高等学校13000余名大学生和教职工。此后，毛泽东在和学校领导人的谈话中说：

“青年人，就是要有志气。”“学生自觉地要求实行半工半读，这是好事情，是学校大办工厂的必然趋势。对这种要求可以批准，并应给他们以积极的支持和鼓励，在教学改革中应该注意发挥广大师生的积极性，多方面的集中群众的智慧。”

傍晚7点20分，毛泽东在湖北第一书记王任重、武汉大学党委第一书记刘仰峤陪同下，来到珞珈山北麓武汉大学物理系创办的工厂区。在炼焦厂，副厂长盛蓉生代表炼焦厂的同学们向毛泽东问好。毛泽东看着正在炼焦的烘炉问道：

“你这个工厂有多少人？”

盛蓉生回答说：

“三十几个人。”

“你们是一班干吗？”

“是分两班干。”

“那不是要停火吗？”

“不停火。”

“不停火？那一班不是要工作12小时吗？是不是要工作12小时呢？”

盛蓉生回答说：

“现在还没有正式生产，正式生产以后是要做些调整的。”

毛泽东这才放心地点了点头，说：

“你们要有节奏地生产，要劳动好，学习好，也要休息好呵！。”

他来到锅炉厂，看到照明条件不好，光线很暗，工人们都在砸石子，便关切地说：

“为什么灯光这样暗呢？可不要砸着手啊！”

毛泽东在走向学校卡普隆厂的路上，化学系党支部书记罗鸿运汇报了系里办厂的情况。他问道：

“你们办这么多工厂，你是内行还是外行？”

罗鸿运说：

“我是外行。”

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

“外行要变成内行了！”

罗鸿运马上说：

“我一定要变成内行！”

毛泽东来到电池厂，徐茜利代表电池厂的同学向他问好。徐茜利汇报说：

“我们这个电池厂是白手起家的，经过全体同学大胆设想，大胆革新，利用废物造出了土机器，许多部件是用木头代替钢铁，产品质量却完全合乎国内的先进水平。”

毛泽东高兴地笑着说：

“好！完全合规格，合乎国内先进水平。”

毛泽东来到硫酸厂，看到厂长方优龄一身工人打扮的样子，笑着说：

“你像个工人样子了。”

在硅胶厂，厂长谢能咏操着一口湘潭话向毛泽东报告说：

“这个厂房，是我们同学们自己动手盖的，没用一个工人。”

毛泽东问她：

“你是几年级学生，工厂有多少人？”

谢能咏说：

“我是2年级的，这个工厂一共有26个人。”

毛泽东看着眼前这个个子不高年纪不大的湘潭姑娘，觉得十分有趣，问道：

“26个人，你能么管得了？”

谢能咏说：

“全凭同学们一起干。”

“对！对！一起干。”

毛泽东满意地笑了。王任重看看时间不早了，就建议说，主席应该吃饭了。毛泽东坚持要去看物理系的炼矽钢片厂。一直到7点45分，毛泽东才在大学生们的欢呼声中，离开了珞珈山。

这天晚上，王任重邀请毛泽东、江青、张治中、曾希圣、陈再道和3名女游泳运动员到著名的豆皮店“老通城”吃饭。毛泽东到了老通城，对王任重等人戏言道：

“你们可不要告诉人说到‘老通城’来吃豆皮，不然别的馆子会贴我的大字报，说我偏心了！”

他还说：

“湖南湘潭东山中学给我寄来一叠子大字报。原来他们曾写信来请我为他们学校题名，我向来对请我题字是能拖就拖的；但是另外一个韶山中学要求我题字我很快就题了，因为韶山中学派人到北京来‘坐索’，我没法拖。于是东山中学的大字报就给我提出批评：为什么韶山中学要求题字就题了，东山中学要求就不题？这是偏心。这时刚好湘潭大学也派人到北京来请我题名。我就连东山中学一起写了交他们带回去。并且附给东山中学一封信，表示接受他们的批评。”

毛泽东这是第2次来“老通城”，他一进门，服务员、厨师、干部都拥上来打招呼。毛泽东是个好记性的人，他和已经熟悉的饭店人员一一亲切握手，还说：

“又来麻烦你们了。”

毛泽东坐下后，服务员送上毛巾，毛泽东非常客气地说：

“谢谢。”

这一餐饭菜，除了豆皮，另有4个菜，1个汤，服务员还端来了馒头。毛泽东一看馒头上来了，又说了一个陕北的笑话，他说：

“一位著名法学家是南方人，吃惯了大米。他后来到陕北来工作，也入了党。陕北不产大米，我们让他吃小米和馒头，他很不高兴地说：‘我进了党，连饭都没得吃了！’”

毛泽东说得绘声绘色，逗得大家笑了起来。由于天气太热，大家出汗很多，服务员送上的毛巾需要在顾客用后再洗上一次，再用再洗。毛泽东似乎不习惯这种服务，一个老师傅想为他换毛巾，被他拦住了。如此数次，毛泽东都一一谢绝。

大家都快吃完了，桌子上还剩有一些菜。**已经放下筷子的毛泽东又举起筷子，要同桌的人把饭菜都打扫干净。他用筷子指着墙上“炮打保守，火烧浪费”的标语说：**

**“你们不吃完，就要火烧浪费。”**

饭后，毛泽东在前厅和全体服务人员合影留念。他在上车离去时，还频频向老通城的工作人员挥手，说：

“谢谢大家的服务。”

是日晚，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应邀来到毛泽东的住处，两个老朋友进行了交谈。他对李达说：

“你写的《社会学大纲》很好，我看了好几遍，我认为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教科书，值得一读。我们年纪都大了，你比我还要大3岁。人老了思想不能老。你现在写的东西就不如过去写的有生气了，是不是因为年纪老了？你那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净是抄书本上老生常谈的东西，没什么创造性，缺少自己的新见解。”

此后，李达将毛泽东的这个意见一直记在心里，每逢写文章时，他总要征求旁人的意见，问火力是否不足？

9月13日，毛泽东读了周恩来关于福建前线的战况报告，致电周恩来、黄克诚：

周总理、黄克诚同志：

送来连日金门情况2件及我军命令1件，收到。除照你们命令规定路线执行以外，白天黑夜打零炮，每天24小时，特别是黑夜，特别是对料罗湾3海里以内，打零炮（每天二三百发），使敌昼夜惊慌，不得安宁，似有大利，至少有中利小利。你们意见如何？大打之日，不打零炮。小打之日，即是打零炮。特别黑夜对料罗湾打，白天精确地校准炮位，黑夜如法炮制，似较有利。请征询前线研究，看可行否？

**华沙谈判，三四天或者一周以内，实行侦察战，不要和盘托出。彼方亦似不会和盘托出，**先要对我们进行侦察。周彭张乔（冠华）诸位意见如何？顺祝旗开得胜！

毛泽东 9月13日于武昌

9月13日午饭后，毛泽东和张治中、江青在王任重陪同下，从东湖宾馆驱车来到长江边，登上船驶入江心。毛泽东在护卫人员的陪同下，顺着船舷的扶手下到水中，一口气游了十几公里。

下午2点，毛泽东在蒋家墩码头回到轮船甲板上更衣，同张治中、王任重、江青等人上岸。武钢的李一清、韩宁夫等人早在码头等候。众人上了车，向武钢厂区驶去。

今天是武汉钢铁公司第一号高炉正式投入生产。这个日产生铁2000吨的高炉的投产，将会给1958年的全民炼钢运动带来极大的鼓舞。

这天下午，艳阳当空，提前竣工的武钢1号高炉直插晴空，炉前贴着巨幅标语，3000多名群众和武钢工人聚集在高炉右侧，等待高炉出铁，等待毛泽东的到来。

毛泽东在厂区一排低矮的简易活动房前下了车，李一清请毛泽东在经理办公室稍事休息。韩宁夫正要展开厂区总平面图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指着他问道：

“我们两年前见过一面，你叫什么？”

“主席，我叫韩宁夫。”

毛泽东笑着说：

“你取了一个苏联人的名字喽，又是‘宁’又是‘夫’嘛。”

他看着厂区平面图听韩宁夫汇报，听说1号高炉有70多米高，直径12米粗，日产生铁2000吨，他满意地说：

“你们的高炉不同一般，应该叫大大高炉。”

他又问：

“几时能够出铁呀？”

韩宁夫说3时左右出铁。他问：

“有没有把握？”

韩宁夫说：

“有99%的把握。但也可能有预计不到的1%。”

毛泽东高兴地说：

“好哇！今天看不到，我明天再来看，明天看不到，我后天再来。总而言之，我三顾茅庐也要看到你们出铁。”

下午2点59分，毛泽东、张治中、江青在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第二书记张平化、武钢钢铁公司总经理李一清等人的陪同下，乘车来到武钢1号高炉前。守候在那里的人们顿时欢呼起来，“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彻云霄。毛泽东在欢乐的人群簇拥中，攀上高炉平台，凭栏向群众招手致意。接着，他转向炉台中部，和等待在那里的14名为武钢建设立下功劳的先进模范人物一一握手。工人们高喊着：

“主席，您好！”“感谢您，主席！”

毛泽东也喊道：

“你好！你好！”

毛泽东来到炉工休息室的平台上，坐下来，了解高炉系统各个组成部分的情况，问道：

“各种设备是不是全是国内制造的？”

公司一位副经理答道：

“大部分设备是国内制造的，一些主要设备是苏联供给的。”

3点10分，1号高炉的炼铁工人打开出铁的眼，快要出铁了。毛泽东忙站起来看出铁。他问道：

“出铁需要多长时间？”

旁边的人尚未答话，只见炉前红光冲天，铁水奔流而出。炉台上下顿时响起阵阵掌声和欢呼声。毛泽东居高临下，向炉台上的工人鼓掌致意。他高兴地说：

“到前边去看看吧。”

毛泽东在炉前询问了一些出铁的情况。他又来到高炉操作室，接见了苏联专家。苏联专家组长巴杜洛夫向毛泽东道贺，他说：

**“这么大的高炉，武钢要建4座。目前，苏联也只有3座，美国1座。这是你们的巨大胜利！”**

毛泽东说：

“这是我们共同的胜利！”

王任重建议说：

“主席，是不是去看看炼焦炉？”

毛泽东说：

“去看看吧。”

3点40分，毛泽东离开了1号高炉，乘车来到炼焦厂。他向党委书记、厂长询问了生产情况。看了第一炉出焦后，他说：

“再看一炉。”

他还询问了煤气处理的情况，就回收废气制造化肥问题指示说：

“硫胺应该多生产一些。”

下午4点钟，毛泽东看完第二炉出焦后，在炼焦工人的欢呼声中，离开了武钢工地。武汉钢铁公司党委书记兼总经理李一清向毛泽东汇报了工作后，毛泽东说：

“像武钢这样大的企业，可以逐步地办成为综合性的联合企业，除生产多种钢铁产品外，还要办点机械工业、化学工业和建筑工业等。这样的大型企业，除工业外，农、商、学、兵都要有。”

接下来，长江流域规划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林一山要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泽东见时间已经不早了，天气又很闷热，就对林一山说：

“你谈的是长江的事，我们到长江去谈吧。”

一众人等马上转移到船上，毛泽东让林一山谈谈长江的泥沙问题，也就是未来的三峡工程的寿命问题。林一山说：

“长江的含沙量远比黄河的少，相对量少。但由于长江全年来水量比黄河大20倍，所以泥沙的绝对量还很大。根据计算，三峡入库泥沙，每年约5万吨。三峡水库寿命可以用400年，至少也可以用200年。这是假定三峡以上不修其它水库的话。”

毛泽东说：

“这不是百年大计，而是千年大计，只200年太可惜了。”

谈完了工作，毛泽东就下水游泳。

9月14日，毛泽东视察了武汉第一纱厂、武汉重型机床厂等。

按照事先的安排，毛泽东视察了湖北就要去安徽，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需要先回合肥进行准备工作。张治中是安徽人，自然对家乡多一份偏爱，这次能陪毛泽东回到家乡安徽，当然也是一件十分荣耀的事。他找到曾希圣说：

“毛主席是第一次到安徽，怎么能使广大群众一睹毛主席的风采？这可是安徽人民多年来所渴望的机会。我们能不能事先把群众组织好，站在大道两边，请毛主席坐在敞篷车上，就可以使群众都能看到他。”

曾希圣当然也愿意这么做，可他知道毛泽东外出，一向喜欢轻车简从，更不喜欢夹道迎送之类的安排，就说：

“主席恐怕不会答应吧？主席无论到什么地方，像我们这些负责人都不让迎接。当然，毛主席这次到安徽，对全省人民是一个很大的鼓舞，能够这样做更好。”

张治中说：

“让我去和主席讲，试试看嘛。”

曾希圣说：

“好吧，听你的回音。主席能答应最好。”

在吃晚饭的时候，张治中便把这件事提了出来，他对毛泽东说：

“主席10年来才第一次到安徽去，安徽人民一定非常渴望能够见到你，你到合肥时，让人民站在道路两旁一睹风采吧？你不反对吧？”

毛泽东没有马上表态，他夹起一点菜，慢慢地放进嘴里咀嚼着。负责保安的罗瑞卿听张治中这么一说，不免吃了一惊，忍不住问道：

“你说要夹道欢迎？”

毛泽东每次外出，每每陷入群众的包围之中，难以脱身，这时候是他们保卫人员最紧张最担心的时刻。况且人一多，秩序难免混乱，也是他们最关心的事情。毛泽东觉得罗瑞卿的担心不无道理，但他还是接受了张治中的建议，他说：

“我已经受到你们许多批评了，说我没到安徽去。安徽省委同志们也是多次这样说。这次你们怎么办我都不管了。”

张治中闻言，可真是喜出望外，吃过饭就告诉曾希圣说：

“毛主席批准了！”

曾希圣要先回合肥了，他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合肥群众欢迎毛泽东后，必然会有许多人跟随到毛泽东的住处，他们会在毛泽东的住处附近等候他出来，不断地欢呼和喧嚷，会影响毛泽东的工作和休息，保安工作也不好做。于是，他就去找张治中商量，能不能在毛泽东进合肥时，仍然采取保密的办法，而在毛泽东离开合肥时，搞一个夹道欢送。张治中说，这个办法好，就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自然也没有什么意见。

是日晚，武汉市11位妇女代表早早来到了省委会议室里，等候毛泽东接见。毛泽东来了，他面带微笑注视着在场的人，伸出手和站在最前面的劳动模范朱玫握手。后边的詹淑权握着毛泽东的手，久久不肯放开。周春枝也赶紧凑近毛泽东身边。萧慧纳介绍说：

“她就是我们在‘八大’介绍过的五好积极分子。”

毛泽东和周春枝、杨菊玲等代表们握了手，招呼大家坐在会议室正中的大桌子旁。他问穿着一身白制服的丘益英说：

“你是做什么的？”

丘益英站起身，举手向毛泽东敬了一个礼，说：

“我是人民警察。”

“你的工作有困难吗？”

“没有什么困难。”

毛泽东微笑着称赞说：

“也不容易啰！”

他看了大桌子上摆着的武汉妇女们制造的化学标本，有硫酸亚铁、硝酸、硫酸、硫酸钠、氯化铵等。他拿着一块焦炭看了看。这块优质焦炭就是站在他身边的喻望香亲手炼出来的。喻望香和20多个妇女苦战了两个多月，已经炼出了200多吨焦炭了。毛泽东望望喻望香，说：

“妇女也能炼焦了，这是怎么炼出来的？”

喻望香说，她们是用土法炼的。接着她将用什么方法，有几个人工作，需要几天炼成，一一向毛泽东做了汇报。

9月15日，毛泽东从武汉动身，经鄂城前往武钢大冶炼铁矿区、大冶钢厂视察。

上午10时，毛泽东在王任重、张平化和黄石市委第一书记杨锐陪同下，来到大冶铁山的尖山矿区，在铁山党委书记张品、矿长陈明江引领下，朝矿区走去。毛泽东问：

“整个大冶铁山矿石蕴藏量是多少？”

陈明江回答说：

“是1亿1千万吨。”

“多不多？少不少？”

张平化插话说：

“这个1亿1千万吨是近期勘探报告材料，有些情况还没查明。”

王任重递给毛泽东一块矿石，毛泽东翻来覆去地看着，又掂了掂，问：

“矿石含铁量怎样？除铁之外，还含什么成份？你们是不是光要铁？”

陈明江说：

“这里矿石的含铁量是50%—60%，矿石中除铁之外，还含有铜的成份。”

看了一段矿区，张品、陈明江请毛泽东等人来到休息室。陈明江汇报说：

“这里是露天采矿，剥离工程很大，基建费用也比地下开采要多得多。比如，地下开采，可以不修铁路，不搞电机车，也不用电铲。但地下开采没有露天开采量大。”

毛泽东问：

“花了多少钱？”

“基本建设原来计划的费用是1亿5千万元，经过工人们想点子，找窍门，千方百计实行节约，结果只花了1亿2千万元，省下了3千万元。”

“你们是包干？”

陈明江回答说是。毛泽东说：

“好！包干好。搞基本建设还是采用大包干的办法好，这样可以大大降低建设成本。”

陈明江说：

“早搞大包干，省的还要多，有1亿就够了。”

张平化说：

“窍门和潜力到处都是，关键是发动群众。这里的电机车设计能力是拖8个车皮，工人们打破迷信，大大发挥了机车牵引能力，前几天拖到13个，现在拖到14个。工人说完全可以拖16个，比设计能力提高200%。”

毛泽东走出休息室，循着弯曲的山道，登上大冶铁矿露天采场尖山180水平处，察看掌子面上穿孔机、电铲、电机车、汽车、风钻的作业情况。他怀着极大的兴趣和喜悦，久久地望着工地上穿梭往来的繁忙景象。

吃过午饭，毛泽东乘车去大冶钢厂。他始终惦记着全民大炼钢铁的指标问题，在车上问杨锐：

“你看，今年1070万吨钢能不能完成？你们地方怎么样？”

杨锐表示有信心。他介绍说，大冶钢厂的职工干劲很大，这个厂去年还只能生产十几万吨，今年已经跃进到50万吨。毛泽东说：

“这很好，跃得很快。干什么事情都要有干劲。”

下午1点多钟，毛泽东一行人来到大冶钢厂，这是毛泽东第2次来大冶钢厂。厂长江敏、炼钢部党总支书记丁振江、主任王全治，马上出迎。毛泽东来到新建的平炉炼钢厂，顺着一条窄小的楼梯，要爬上离地面有五六米高的平炉操作台。丁振江和王全治一前一后要扶毛泽东，被他谢绝了。毛泽东来到4号平炉前，问：

“这是什么炉子？”

江敏说：

“这是平炉，又叫马丁炉。”

“有多大？”

“90吨的。”

丁振江介绍说：

“这是3座新近建起来的平炉，都是最近投入生产的。”

毛泽东从炼钢老工人、平炉工段党支部书记张开先手中接过蓝色的炼钢镜，迎着炙热火光，走到炉前观察钢水。他看了一会儿，又看了3号平炉，再走到2号平炉前。2号炉前不久大放卫星，称每炉炼钢产量超过设计能力将近1倍。毛泽东拿起炼钢镜看了一会儿，问道：

“现在你们一炉可以出多少钢？”

丁振江说：

“现在可以出到150吨以上。”

毛泽东的衬衫已经被汗水湿透了，可是他的兴致依然很好，下了2号平炉，又看了电炉、转炉车间。他称赞说：

“你们建设得很快，建设得好。”

毛泽东来到新建的轧钢厂，特别注意观察了国产轧机。他还仔细地询问了厂里整风反右的情况。他说：

**“政治挂了帅，什么都好办了。”**

下午2点多钟，毛泽东结束了对大冶钢厂车间生产的视察，在厂区却陷入了欢呼的人海。他由王任重陪同走在前面，张治中由张平化陪同走在后面。不一会儿，张治中、张平化被挤到远离了毛泽东的地方，毛泽东成了人潮的漩涡中心。张治中、张平化费了好大劲儿，才挤到毛泽东跟前，见毛泽东虽然汗流浃背，却依然是欢心从容。

尔后，毛泽东一行乘车到了黄石港特殊钢厂，同工人们见了面，谈了话。毛泽东沿途还看到了农业丰收的景象。接着，他们一行乘车来到黄石市委驻地，和市委机关的干部职工见面并合影留念。

下午3点多，毛泽东在沈家营码头刚登上“江峡”号轮船不久，天气突变，一霎时黑云笼罩，狂风大作，暴雨倾盆，江水白浪滔天。毛泽东看着咆哮的长江，兴奋不已。他说：

“你们会不会游泳？敢不敢在长江里游啊？”

3点42分，毛泽东更衣走下舷梯，第一个跃入巨浪之中。护游人员一见，不敢怠慢，一个个“噗嗵！噗嗵！”跳入水中。

一刻钟后，雨越下越大，豆大的雨点打得人睁不开眼。轮船上的人十分担心毛泽东的安全。王任重扯着嗓子喊道：

“主席，雨太大了，是不是上船算了？”

毛泽东眯着眼笑道：

“雨大好嘛……”

他的话被雨声和涛声淹没了。他继续在风雨中搏击，又游了10分钟，已经到了上窑河段，才被大家力劝上船。

5点30分，毛泽东举起手，向黄石告别，乘船顺江东下。此次武汉之行，他与4万多名职工见了面，群众热情之高，生产场面之热烈，无不使他深受鼓舞。

是日晚，毛泽东一直工作到9月16日凌晨3点，方才休息。

欲知毛泽东在安徽省内的视察情形如何？且看下一章分解。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向王炳南面授机宜的时候说：“**在同美国人的会谈中，你要多用一种劝说的方法，譬如说，你们美国是一个大国，我们中国也不小，你们何必为了仅仅不到一千万人口的台湾岛屿与6亿中国人民为敌呢？你们现在的做法究竟对美国有什么好处呢？”**他还说：**“在会谈中要多用脑子，谦虚谨慎，说话时不要对美国人使用像板门店谈判那样过分刺激的语言，不要伤害美国民族的感情。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民族，应该和好。”**这一同美国人会谈的方针，和本传前面所讲到的毛泽东提出的所有的那些对美事务的政策和策略，构成了一整套的、后人应该遵循的处理中美关系的行为准则。可有些人一反祖宗的成规，干了不少惧美亲美的事情，比蒋介石有过之而无不及，到头来自食恶果的报应，自然是难以避免的了！

**第60章**

**“发展钢铁工业一定要搞群众运动，什么工作都要**

**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

话说1958年9月16日凌晨3点，毛泽东放下手中的工作，简单吃了点东西，站在甲板上眺望江面。这时，天仍未晴，7级大风把长江搅得波浪翻滚，气势逼人。就这样，毛泽东还是提出要下水游泳，被工作人员婉言劝阻了。

4时30分，轮船到了安徽省安庆市。

上午11点多，毛泽东来到杨家套准备游泳，安庆市的七八个运动员都是第一次陪游，他们先行跳入江中看看水势，立刻被江水冲出100多米远。

11点25分，毛泽东下了水，也一下子被冲得远离轮船。调来做保护工作的大木船在狂风巨浪中操作失灵，忽然“哗哗哗”地横着向毛泽东所在的方向压了过去，人们顿时面如土色，高声惊叫起来，船上、江口乱成一片。

朱汉雄大声呼叫保卫人员随时准备下水。轮船上的人恨不得自己能一下子拽住大木船。叶子龙急了，叫武汉市的护游人员：

“快！快下！”

不等他的话音落下，早已暗中穿着游泳裤的五六个大小伙子，“叭叭”纵身入江，飞速游到毛泽东身边，护卫着他偏离了大木船冲击的方向。此时，他们还处在“三角浪”中，三角浪前后左右都是浪峰，浪尖离浪窝有一米多高，人落在浪窝中，根本无法游泳，只能踩水。

突然，一位陪游的女运动员因体力不支，手忙脚乱起来。毛泽东见她有险，忙踩水靠近，将她扶送上船，而他自己却仍在三角浪中。多次护游的邓明德忙对战友说：

“快叫小船靠拢。”

他说着，踩水靠向毛泽东，说：

“主席，您老人家赶快上船。”

毛泽东见大家神情紧张，忙摆动着双手说：

“不要慌，你们不要慌。”

两位干警拉过一只小船，紧紧抓住船舷，撑着小船。邓明德右臂搀扶毛泽东，左手拉着船舷，将他送上小船。毛泽东尚未站稳，就兴致勃勃地对情绪紧张的邓明德说：

“这次游泳真痛快，碰到这么大风浪。”

小船在风浪中前后左右摇晃，毛泽东却叉着腰稳稳地站在船板上悠然自得。小船艰难地向轮船划去，可是风浪太大，根本无法靠近。轮船上的人急中生智，将一段5米长、1米宽的白布抛向江中，护游人员接过白布，拦住小船，人们这才将毛泽东拉上轮船。惊心动魄的一幕终于结束了。

9月16日12时50分，毛泽东在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省长黄岩、安庆地委第一书记许少林陪同下，乘车来到了安庆市一中门口。毛泽东缓步下车。安庆市委第一书记为让毛泽东尽快到达学校的小高炉区，建议他绕开集聚在校门右边的学生们。毛泽东说：

“不，还是走人多的地方吧。”

说着便向前走去。一个学生发现毛泽东来了，不觉惊叫起来：

“啊！毛主席！”

学生们闻讯围了上来，热烈鼓掌，一边跳跃一边欢呼：

“毛主席万岁！”

毛泽东微笑着向学生们频频招手。一中校长鹿钟毓急忙迎上前去。毛泽东握着鹿钟毓的手说：

“你好。”

毛泽东一行人在鹿钟毓的引领下，来到学校办的8座小高炉区。毛泽东在两块黑板报前看了一会儿，一块是有关钢铁工业的剪报，一块是学生们表示决心和干劲的材料。他说：

“这个黑板报办得不错。”

此时，小高炉边的鼓风机隆隆响着，烟囱上空不断地冒着黑烟，穿着钢铁工人服装的学生们，满面灰尘，来来往往，忙着炼钢。毛泽东走到一座1.04立方米的小高炉前，学生们激动得喊起了“毛主席万岁！”毛泽东频频向他们招手。他问身边陪同人员：

“这个炉子一天能出多少铁？”

鹿钟毓回答说：

“一吨左右。”

毛泽东见身旁的学生王新民和王德福都穿着工作服，和工人没有什么两样，便问道：

“你们是工人还是学生？”

学生们争着回答说：

“我们都是学生。”

“你们都学会炼钢啦？”

“学会啦。”

“你们是几年级的？”

“我们是高三三班。”

毛泽东正要离开这座小高炉，一个学生突然喊了一声：

“要出铁了！”

他闻声又停了下来，只见几个学生拿起通条，使劲通炉塞，嘴里不住“嗨嗨”地喊着号子。一会儿，铁水从炉口流出来了，人群中爆发出一片欢呼声。毛泽东也高兴得连声说：

“好！好！”

他又参观了学校的电机厂。从电机厂出来，他问鹿钟毓：

“你们有半工半读的班吗？”

鹿钟毓回答说：

“有一个班。”

“其他同学的劳动怎样安排？劳动有多少时间？”

鹿钟毓回答说：

“一中是一个全日制学校，学生每周也要参加一天半的劳动。”

毛泽东微笑着点点头，又去机械车间参观了学生们制造滚珠轴承的情况。他就要走了，几百名学生簇拥着他走向大门。此时的街道上已经挤满了群众，毛泽东在学生和群众的欢呼声中，离开了一中。

9月16日午饭后，完成了护送任务的王任重就要回武汉了，他请毛泽东为武汉二七烈士纪念碑题词。毛泽东也不推辞，挥笔而就。他写的是：

谨向烈士们致以敬意 毛泽东

下午3时许，毛泽东乘车离开安庆前往合肥。带队的驾驶员也许由于太激动，竟然转了向，朝着岳西方向开出了一公里多。毛泽东趁车队调头的机会，站在路边望了望遍野成熟的庄稼。车队又往前走了，毛泽东看到公路两侧许多农民都在“烧包子”，到处烟雾弥漫，就问身边的曾希圣：

“这种‘烧包子’是不是很普遍？”

曾希圣说是的。毛泽东又问：

“有什么作用呢？”

“主要是积肥，杀虫，还可以改良土壤。”

毛泽东看到一路上有不少跃进门，就说：

“你们的宣传工作做得很好嘛。”

下午4点，毛泽东一行到达舒茶人民公社。这个社是舒城县内在1958年9月9日成立的第一个人民公社，以种植茶树为主业。

毛泽东在公社党委书记徐自长的引领下，参观了制茶厂，又到公社远景规划室观看了远景规划模型。他说：

**“人民公社将来也要集中种蔬菜，种蔬菜也要专业化。”**

**他听说舒茶人民公社实行了吃饭不要钱，就说：**

**“既然一个社能办到，其他有条件的社也能办到。既然吃饭可以不要钱，将来穿衣服，也就可以不要钱了。”**

毛泽东认为，**人民公社实行工资制、供给制，工资发给每个人，而不发给家长，妇女、青年一定很高兴，这样就破除了家长制，破除了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他认为这种制度应当提倡。**

毛泽东在经过桐城、舒城、肥西等县时，沿途看到了不少人群，有的推着小车，有的背着行李，为了大炼钢铁，走几十里或几百里路到山上去找铁矿。**他似乎又看到了解放战争时期人民群众支前的情景。人民，只有人民，才能改变一切，创造一切！人民真正地行动起来了！年过6旬的毛泽东看着这样的场面，十分高兴。**

毛泽东的车经常被人群挡住。成群结队的农民群众不知道这辆吉普车里坐的是毛泽东，否则，他们会发出震天的欢呼声，甚至会把车堵住，要围着自己的领袖看个够、问个够的。所以，司机尽量把车开得快一点。毛泽东到合肥后，十分高兴地说：

**“沿途一望，生气勃勃，肯定是有希望的，有大希望的。”**

此时已近傍晚时分。毛泽东稍事休息，与江青一起接见了来合肥的全国妇联干部和省妇联干部。他说：

“我看沿途晚稻长得好，宣传工作也不错，你们看怎么样？”

全国妇联负责人说，她们已经看了三八社和东方红一社妇女卫星棉田。毛泽东逗趣地说：

“不要光看女的，男的也要看一看嘛。”

曾希圣说起无为县响山大队有一个复员军人叫陈广夏，原来在部队上做过供给工作，当了大队干部后，在大队试行了供给制。毛泽东听了，称赞陈广夏是一个人才。他还不无幽默地笑着说：

“无为不单出了个《水浒》人物黄文炳，还能出这个陈广夏。**搞供给制，好嘛！如果每年每人没有1000斤、2000斤粮食，没有公共食堂，没有幸福院、托儿所，没有扫除文盲，没有进小学、中学、大学，妇女还不可能彻底解放。”**

毛泽东了解到妇联干部中有几个曾在新四军待过，还有部队培养的作家，高兴地说：

“好啊，你们都是新四军！**共产主义的传统都是从部队下来的。**从前是红军，后来编为八路军、新四军，现在变成一个军——人民解放军。**部队多好啊，就是有战争年代那样的革命热情和拼命精神。官兵平等，军民一致，多好啊！”**

晚上8点半，毛泽东、江青、张治中等人兴致勃勃地观看了庐剧团新编的一个喜剧《牛郎织女笑开颜》。剧中表现出人民公社要管天、管地、管神仙。演出结束了，毛泽东笑着说：

**“跟王母娘娘和龙王没有一场恶战，还管不了他们。我们的农业队长穆桂英、罗成、黄忠、赵云，都是会打仗的嘛，应该好好打一仗哩！”**

这天晚上，毛泽东派人借阅了《安徽省志》、朱熹的《楚辞集注》。他翻了一会儿书，还是很兴奋，就给王任重写了一封信，称赞这几天在湖北“谈得好，看得好，虽是走马，热情已经看出来了。”

接着，他又为新建的“安徽大学”题写了校名，并就不同意把省会迁到芜湖的事，给曾希圣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曾希圣同志：

校名遵嘱写了4张，请选用。沿途一望，生气蓬勃，肯定是有希望的，有大希望的，但不要骄傲。合肥不错，为皖之中，为何要搬芜湖呢？从长考虑，似较适宜，以为如何？

毛泽东 1958年9月16日

这一夜，毛泽东通宵没有睡，一直到17日早上8点才上床休息。

9月17日下午，毛泽东参观安徽省博物馆，他在矿产馆观察了矿石标本和安徽矿藏分布图。在机械馆和轻工业馆新产品展台前，他笑着对曾希圣说：

“看来你们有一支侦察队，把别人的好东西都偷来了，你是存心抢上海的生意吧？”

农业馆陈列的巢县复兴乡的棉花标本，棉杆有一人高。毛泽东用手摸摸棉杆和棉桃，说：

“这株棉花的桃子不少。”

从凤阳县烟草试验田采集的两株烟叶标本，也有1人多高，叶子像水芭蕉一样。毛泽东说：

“这两株烟叶很好！”

他在小麦和水稻丰收的图片前，看着图片上的新民歌，忍不住朗声念道：

**“端起巢湖当水瓢，哪里干旱哪里浇！”**

水利馆里挂有一幅淮北实行河网化成就和规划示意图，以及濉溪县河网化示意图。毛泽东认真地看了后对曾希圣说：

**“啊，大工程！明年开全国党代表大会时，你们应该把这张图挂到北京去。”**

**他在“除四害”展馆前，念了一遍“除四害”成就的文字说明，说道：**

**“你们消灭的老鼠、麻雀真不少呢。消灭这么多鼠雀可以节省多少粮食？”**

**省“除四害”指挥部副指挥杨杰说：**

**“节约的粮食以每人每年500斤计算，可供600万人吃一年。”**

毛泽东又观看了展馆里陈列的多种捕鼠器具操作表演，他笑着说：

“这对老鼠真是大为不利咧！”

他看了卫生陈列馆，对安徽省已有14个县100多个乡消灭血吸虫病表示高兴。在历史文物馆，他对清朝顺治、康熙年间芜湖铁画家汤鹏的作品很感兴趣。

汤鹏，号天池，安徽芜湖人，少为铁工，与画室为邻，每天看人作画，受到启发，便大胆地融汇笔墨艺术于炉锤焊接之中，创立铁画，因而名噪一时。以铁作画，以铁书联，是中国独特的书画品种。

毛泽东读着汤鹏的草书对联，很有兴味：

“晴窗流竹露；夜雨长兰芽。”

读完了，他盯着“露”字，又仔细端详了一下，说：

“露字脱掉了末尾一笔，应当添起来。”

毛泽东在休息的时候，很满意地说：

“相当丰富，看不完。**每个省的主要城市，都应该有这样的博物馆，人民要认识自己的历史和创造历史的力量。”**

他在博物馆一连看了2个半小时，这是他在安徽视察中在一个地方待的时间最长的一次。

是日晚，张治中、曾希圣、罗瑞卿在毛泽东的住处聊天，说到群众的习俗问题，毛泽东讲了一个笑话，他说：

“有两个人为了意见不合，大抬其杠，乃至动武，正打得不可开交，来了一个过路人，手上提着一大捆雪白的大葱。这两个人马上停了手，迎着过路人走去。”

在座的人见毛泽东住了口，故意卖关子，就不懈地问：

“为什么？”

毛泽东说：

“原来他们是山东人，酷爱吃大葱，兴趣比打架还要大。”

众人闻言，忍俊不禁，哈哈大笑起来。毛泽东又谈起《三国演义》中的吕蒙，他说：

“吕蒙是行伍出身的，没有文化，很感不便。后来孙权劝他读书，他接受了劝告，勤读苦读，以后当了东吴的统帅。现在我们的高级军官中，百分之八九十都是行伍出身，参加革命后才学文化的，他们不可不读《三国志》的《吕蒙传》。”

他又谈到陆机、陆云兄弟，他说：

“陆机、陆云，都是晋代的文学家。陆机的《文赋》是很有名的，具有朴素的唯物观点，可惜太冗长了些。”

毛泽东指着《楚辞集注》，问张治中：

“你读过《楚辞》吗？”

张治中说：

“未读过。”

毛泽东说：

“这是好书，我介绍你有空看看。”

他又说：

“朱夫子是你们安徽人。”

张治中说：

“朱夫子被江西抢去了，婺源县现在划归江西。”

毛泽东说：

“婺源虽然划归江西，但不能因此改变朱夫子的籍贯，七八百年来他一向被认为是安徽人嘛。”

接下来，他谈到了《论语》，谈到了《论语》的朱注，谈到了朱熹的思想。又由朱熹谈到了程颢、程颐，谈到周敦颐，谈到宋、明理学的4个学派，谈到客观唯心主义，谈到中国古代具有朴素、原始的唯物主义思想的人物。

9月18日下午4点多，毛泽东视察省委办的钢铁厂，看了两座13立方米高炉的出铁情况。省委书记处书记李任之介绍说：

“这是省委的钢铁试验田，每天出铁20多吨。”

毛泽东说：

“对啊，省委应该带头办嘛。参加劳动的是不是都是工人？”

曾希圣说：

“除少数技术工人外，绝大多数是机关干部。”

毛泽东看了2号炉出铁后，说：

“铁不少啊！”

车间副主任曾传火笑着说：

“毛主席来了，铁也多了。”

毛泽东微笑着看看他，问：

“你们有没有休息时间？”

曾传火说有。毛泽东打量着他的小胡子，做了一个手势，说：

“你的胡子也该剃一剃了。”

从这个厂出来，毛泽东又去视察了合肥钢铁厂，观看了转炉出铁的情况。

傍晚时分，毛泽东到了设在西郊野外的新式农具展览馆，观看了各种改进和发明的农具。看了人力绞车和改良深耕犁的表演，他说：

“**深耕是个大水库，大肥料库，否则水肥再多也不行。北方要深耕1尺多，南方要深耕七八寸。分层施肥使土壤团粒结构增多，每个团粒又是一个小水库，小肥料库**。**深耕使地上水与地下水接起来。**密植的基础是深耕，否则密植也无用。深耕有利于除草，把根挖掉又有利于除虫。这样一来1亩当3亩。总之，我们向下边跑，就可高产。”

天已经黑了，毛泽东才离开展览馆。按照视察计划的行程，9月19日毛泽东要离开合肥去芜湖。张治中再一次动员毛泽东去游黄山，毛泽东不屑地说：

“你们那个偏僻的地方，谁去？”

张治中怎么也想不明白，毛泽东何以说出这样的话来。

原来，张治中曾对毛泽东夸耀黄山风景之美，他说：

“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

他动员毛泽东去安徽游黄山。毛泽东问：

“上山有路吗？汽车能上去吗？”

张治中答道：

“当然有路，汽车到不了的地方，可以坐滑竿。”

**毛泽东闻言不快，正色道：**

**“我不能坐滑竿！”**

**当时，张治中就不理解毛泽东为什么不能坐滑竿。这一次，毛泽东的话，更使张治中如入五里雾中。**

9月18日晚，毛泽东在合肥得知，美国在华沙的谈判代表提出了要中国“放弃对金门和马祖群岛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的所谓“停火”方案。同时，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联合国大会发言中也提出要尽快“停火”。他立即用电话传信给周恩来，对谈判提出建议。

周恩来收到毛泽东的来信，立刻召集陈云、彭真、张闻天、黄克诚、廖承志、章汉夫、乔冠华开会研究，并连夜以周恩来的名义用电话将研究结果报告给毛泽东。

9月19日凌晨，毛泽东接到了周恩来的报告，只见报告中写道：

“我方方案提得过早，给了对方一个错觉，以为我们急于求成，因而杜勒斯今日在联大讲话便强调停火，但也提到了消除挑衅行为。同时，彼此都露了底，美国知道我们目前不会扩大战事到台湾，我们知道美国不愿卷入金、马战事。蒋介石希望金门战争扩大，拖美国下水；美国想压我们停火，摆脱它的被动地位。根据这些情况，我们认为，针对美国的停火要求，我们应该从各方面扩大要求美军停止挑衅和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退的活动。”

报告中提出了5项具体措施：1、准备一个驳斥杜勒斯在联大演说的外长声明。2、声明发表后，动员各地报纸、各党派、各人民团体广泛响应。3、将我们的斗争策略分告苏联驻华代办和刘晓转告赫鲁晓夫和葛罗米柯，以便苏联和兄弟国家配合我们的行动。4、以我名义致电西哈努克，感谢他支持我们，向他解释美国所谓的停火的阴谋，说明我国收复沿海岛屿的决心和解放台湾的神圣权利，这些不容美国干涉。5、将上述同样内容以外交备忘录形式递交社会主义国家、亚非和北欧国家政府，唤起他们注意。

凌晨4时，毛泽东在周恩来的这份报告上批道：

“18日夜来信收到，极好，有了主动了，读完后很高兴，即照办。你来信及我这封复信，请即转发王炳南、叶飞二同志，使他们明白我们这种新方针，新策略，是主动的、攻势的和有理的。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是我们外交斗争的必然形态。”

9月19日，美国声称在台湾海峡地区已集结了战后以来美国在海外最大的原子打击力量。

苏联赫鲁晓夫致信美国总统表示，如果美国对中国实施核攻击，那么，美国将立即遭到应有的同类武器的反击。

9月19日这一天，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指示中说：  
 **“培养出一支数以千万计的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巨大的历史任务之一”“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指示要求各大协作区建立起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要求“各省、市、自治区也应该逐渐建立起这种比较完整的教育体系，然后，每个专区、每个县也应该这样做”，“全国应在3年到5年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扫除文盲、普及小学教育。”“我们将以15年左右的时间来普及高等教育，然后再以15年左右的时间来从事提高的工作。”

9月19日午后，毛泽东要离开合肥了，曾希圣按照原来的计划，组织群众欢送毛泽东的安排也已经就绪。原计划人数为15万，可是消息传开后，邻近几个县的群众也闻风而至，竟多达二三十万之众，从省委到火车站，长达数公里的道路两旁，布满了密密麻麻的人群。天上飘着雨点，脚下一片泥泞，人们却没有丝毫感觉，纷纷议论着，翘首以待。

下午2点15分，毛泽东由曾希圣陪同，乘坐第一辆绿色敞篷车，由金寨路缓缓驶进市区；后面跟着的是张治中、江青、罗瑞卿和安徽省长黄岩乘坐的吉普车及其它车辆。

毛泽东站在车上，冒着霏霏细雨，频频向两边的群众挥动着手臂，所到之处，“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和掌声响成一片，车队走了半个小时才到火车站。毛泽东进了站台，群众跟进站台，拥到车厢旁欢呼万岁。毛泽东几次从车厢里走出来，向大家招手，每一次都激起更热烈的欢腾。

将近3点钟，列车徐徐开动了，人们还恋恋不舍地站在那里。罗瑞卿对张治中说：

“今天这种夹道欢送的做法，是毛主席出来视察的第一次。”

张治中说：

**“今天群众情绪这样狂热，他们对领袖拥戴敬爱的情景，实在令人感动。”**

毛泽东则说：

**“这是他们感到自己已经当家作主了，他们是国家的主人了。”**

张治中说：

**“这话对。不过要是没有党和毛主席正确英明的领导，国家不能这么快强大，人民生活不能这么快改善，他们也不会有今天这样热烈欢乐的表现。过去人们都是愁眉苦脸，而今人人喜笑颜开，这就是最大的转变。”**

毛泽东笑了，他说：

“是的，他们都已经看到我们社会主义的光明前途，看到自己的美好远景了。”

停了一会儿，张治中当着罗瑞卿、曾希圣的面，又提到了5月22日毛泽东在给他的信中所说的世界观的问题。他问毛泽东：

“你在5月22日给我的信中说，我们在世界观方面有距离，指的是哪些方面？”

毛泽东坦率地说：

“你在《六十岁总结》曾说，自己对阶级斗争的观点是模糊的，而在今年所写的《自我检查书》上，怎么没有提到？你对阶级斗争没有搞清楚吧？”

张治中解释道：

“**《六十岁总结》上所说的是1924年—1948年时期的思想，我当时虽然主张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但对阶级斗争的观念是模糊的。不过从1949年我留居北京住了9个月，报上看到的，报告会上听到的，又读了《干部必读》一些书，包括马、恩、列的著作和您的好些著述，我已初步地认识到阶级斗争的必要性，所以，才能把过去的错误、缺点检查出来。如果对阶级斗争的必要性毫无认识，我就检查不出来了。**”

毛泽东一边点头，一边轻轻地“噢”了一声，脸上露出满意的微笑，他说：

“你在《六十岁总结》中说：你‘从1949年起就已经感到高兴了，舒服了’，我不相信。”

“可能是彼此处境不同，感觉上就会有差别吧？”

张治中既是回答，也是询问。毛泽东却说：

“我就没有感到高兴过，舒服过。**我1955年走了几个省份，看到农业合作化已经超过半数户口了，我才有点高兴。可是1956年刮起一阵歪风，说是冒进了，赶快后退，我又不高兴了。到今年，看到工农业发展的情况，我才真正感到高兴。**”

“我不能完全同意您的意见，这是你我所处地位不同之故。”张治中解释说：**“您说在1955年之前并不感到高兴和舒服，这是因为共产党建立了政权，您就要考虑怎样把国家搞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千斤重担落在您的肩上，您自然不容易感到高兴而舒服了。而我，是从旧社会来的，在反动统治下，勾心斗角，尔虞我诈，贪污腐化，昏庸无能，眼看国家这样败坏下去，怎么得了！所以一直在苦闷中生活，感到无能为力。但是，到了1949年，眼看在共产党和您的英明领导下，一切都有了办法，我就如同在黑暗中看到光明，在精神上得到解放，心情自然高兴而舒服了。”**

毛泽东和张治中还谈到了文学、历史、科学技术、工农业生产等方面，彼此都感到很轻松愉快。

专列抵达芜湖时，适逢天上下着毛毛细雨。

下午6点时分，毛泽东一行人分乘几辆小轿车来到芜湖市铁山宾馆。毛泽东下了车子，微笑着向欢迎他的宾馆工作人员挥手致意，嘴里还不停地说着：

“你们辛苦了。”

来到下榻的二楼一个房间门口，他随手脱下雨帽和雨衣，服务员小翟赶忙伸手去接。毛泽东摆摆手说：

“我自己来。”

说着走过去把衣帽挂在右侧的衣架上，还对小翟和另一个服务员小王说：

“你们辛苦了。”

小翟说：

“毛主席辛苦了。”

毛泽东询问了小翟和小王的姓名和年龄，鼓励她们要好好学习，接着问：

“有没有今天的《芜湖日报》？”

小翟说声“有”，转身去取来报纸，递给了毛泽东。毛泽东边翻看报纸边说：

“读书看报，每天都不能少。”

不一会儿，小王告诉毛泽东说：

“毛主席，晚饭好了，请您到小餐厅用饭。”

毛泽东问：

“其他同志在哪儿吃饭？”

“在外边的大餐厅里。”

“我也到大餐厅里去吃。”

毛泽东说罢，起身就往门外走。下了楼，外边还在下着小雨，小王撑起了一把伞，竭力想罩着毛泽东那高大的身材，踮着脚顺着小山坡跟在他身后往下跑。毛泽东回头看了她一眼，微笑着说：

“我自己来吧。”

说着，他接过伞，大步朝餐厅走去，就餐的人们立起身热烈鼓掌。毛泽东在餐厅里走了一圈，和大家打招呼，然后在一张餐桌旁坐下，招呼大家说：

“开饭了！来，坐，坐。”

餐厅中间小桌上摆了一个大饭桶，每人面前放了一个空碗。女服务员跑过来要为毛泽东盛饭，毛泽东不肯，他说：

“我自己来。”

说着端起碗就去盛饭，却发现饭桶里没有饭勺。服务员顿时慌了，急忙去找饭勺。毛泽东环顾了一下，伸手从餐桌上抄起一把长柄汤勺，笑着说：

“这个不能盛饭吗？”

说罢从饭桶里盛了大半碗饭。张治中也自己去盛，却盛了个满碗，鼓得高高的。毛泽东对大家说：

“你们看他盛的。”

曾希圣说：

“真像个窝窝头。”

毛泽东要来了一小碟生腌辣椒，尝了尝说：

“很好，大家来尝尝。”

张治中说：

“我怕辣，不敢吃。”

毛泽东说：

“我见了辣椒就想吃。”

吃过晚饭，毛泽东出席了两个集会，还接见了芜湖地、市1000多名工人、农民和解放军代表。回到住地，已经11点多了。他要小王找张桌子来。小王把走廊里的一个两屉桌子搬了来，毛泽东和她一起抬着放到床前。小王转身去找椅子，毛泽东说：

“不要找了，坐在床上就行。”

他把床头柜上的台灯移到桌子上，见台灯太矮，顺手把一个方形茶叶筒放倒垫在下面，就开始批阅起文件来。

9月20日凌晨1点，毛泽东给周恩来通了一次电话。此时的厨师们正张罗着准备夜餐，他们问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

“毛主席什么时候吃夜饭？”

工作人员说：

“毛主席不吃夜饭。”

“毛主席这么大年纪了，工作到深夜，不吃夜饭怎么行呢？”

工作人员解释说：

“毛主席夜间工作，一般是不吃夜餐的。毛主席要我们告诉大家，辛苦一天了，你们早点休息吧。”

9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介绍河南、湖南、贵州等省大搞群众运动的经验。这就是：

“组织大辩论，成立指挥部，书记亲自上前线，组织战役，全党全民、各行各业编成钢铁师、运输营、采矿队等各种野战军、后勤部，彻夜突击，突破一点，创造高产记录，开现场会议，推动大面积丰收等等”。

社论进一步从思想上、组织上为掀起大炼钢铁运动的高潮作了准备。

9月20日下午，毛泽东由曾希圣等人陪同乘车来到芜湖造船厂考察。

这芜湖造船厂是在**1954年兴建的一个新型工厂**，全场干部职工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成功**制造出新中国第一艘军舰和水翼客艇，打破了中国历史上不能研制生产舰艇和远洋航船的记录。**

毛泽东在船厂门口下了车。船厂负责人立即迎上前去。毛泽东和大家一一握手，问道：

“船在哪里做？”

曾希圣说：

“去装配车间吧。”

船厂负责人引领着毛泽东来到装配车间，毛泽东兴致很高，仔细地观察着正在装配的鱼雷快艇，问站在他身边的副厂长张云璋：

“这是什么艇？”

张云璋回答说：

“远航鱼雷快艇。”

“是铁制的吗？”

“是木制的，主要材料是红松、柏木和落叶松。”

“你们能不能造更大的船？”

“能造。”

毛泽东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自豪地对身边的人大声说：

**“我们有自己制造的军舰和快艇了。”**

他接着问张云璋：

“这艇有多重？”

“标准排水量62吨。”

毛泽东很满意，连连点头说：

“好，好。”

毛泽东走出装配车间，又来到了金工车间，仔细观看了船舶推进器的生产情况。他问船厂负责人：厂里有多少职工，多少大学生，多少技术员？张云璋一一做了汇报。毛泽东又关切地问：

“有什么困难吗？”

张云璋说：

“厂里缺少技术人员，有的技术问题一时解决不了。”

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嘱咐他说：

“你们要注意培养自己的工程技术人员。”

从金工车间出来，毛泽东意犹未尽，问道：

“还有什么可以看的？”

海军驻厂总代表王玉璋说：

“请主席到码头看看水上的鱼雷快艇。”

“好啊，”毛泽东笑着问：“我们可以坐坐快艇吗？”

“我们就是给主席准备的。”

毛泽东乘车来到码头，下了车，健步跨上了一艘快艇。马达一声轰鸣，快艇像离弦的箭一样飞快地驶向辽阔的江面，刺破碧波。毛泽东站在驾驶台上，望着大浪滔滔的江面，不时发出朗朗的笑声。快艇在水面上“飞”了大约10分钟，毛泽东还觉得不过瘾，兴致勃勃地问：

“能不能开快些？”

“能！”

艇长回答。快艇在一瞬间就加到了每小时33海里的速度。可毛泽东还感觉不过瘾，又问：

“能不能再开快些？”

艇长又把速度加到每小时35海里。快艇两舷顿时激起几丈长的浪花长堤，艇尾汇合着汹涌的波涛，留下一条闪光的水带。电航工很担心毛泽东的安全。毛泽东却风趣地说：

“站在这儿，比坐在轿车里还要稳哩。”

快艇“飞”到四褐山附近江面，开始施放烟幕弹。随着几声巨响，江面上浓烟冲天，烟幕升起，如同置身黄山云际。毛泽东非常高兴，乐呵呵地笑着，大声说：

**“我们要自己造出大船来啊！”**

半个小时后，快艇返航靠近码头，毛泽东走到后船舱甲板，俯下身察看鱼雷艇发射管，问道：

“鱼雷发射出去，能不能把敌舰打一个洞？”

“能打一个很大的洞。”

王玉璋用手比划着说。毛泽东开心地笑了，说：

“好哇，那好得很！”

他走上码头，同大家一一握手告别，又说：

“要自力更生，我们需要自己的轮船。‘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绝物也’，走进死胡同，请问有什么出路呢？”

“请主席放心。我们一定努力。”

张云璋等人一齐表示。毛泽东说：

**“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的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要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

他深情望着远处的江面，又大声说：

“老话说，不怕路长，只怕心老。只要我们努力，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的！”

此后，毛泽东离开芜湖到了马鞍山。他头戴柳条帽，视察了钢铁厂。尔后，他又会见了马鞍山的市民和干部群众，他说：

“马鞍山条件很好，可以发展成为中型的钢铁联合企业。发展中型的联合企业比较快。”

视察完马鞍山，毛泽东又赶往南京。在由马鞍山到南京去的专列上，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前来迎接。江渭清刚坐下，毛泽东就笑着问他：

“你借文白先生的3000元到底还了没有？”

在座的还有罗瑞卿、曾希圣等人，大家闻言都觉得很奇怪。

原来，张治中在抗战时期曾任湖南省政府主席，江渭清当时还是一个青年，他写信给张治中说，我是共产党人，要抗日打游击，没有钱，请你资助。张治中一想，此人真有胆识，而且对我如此信任，就批给他3000元。这个故事还是毛泽东从张治中的谈话中听到的。

毛泽东又指着张治中问大家：

“你们可知道他为什么字文白？”

大家都说不知道。毛泽东说：

“他年轻时当过警察，取字警魄。后来警察不当了，警魄的字也不用了，遂从‘警’字中取一个‘文’字，从‘魄’字中取一个‘白’字，故字‘文白’，看来他还是简化汉字的创始人呢！”

一句话把大家都逗乐了。接着，江渭清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在谈了1957年的台风给江苏带来的巨大损失后，毛泽东为了缓和气氛，插话说：

“你们要知道，台风有时也有好处呢。楚汉相争时，刘邦从关中出兵，一路上很顺利，一直打到徐州，正在和文武官员置酒高歌的时候，项羽突然率领3万精骑来袭，刘邦措手不及，大败，落荒而逃。项羽尾追不舍，正在万分危急的的时候，忽然阵前刮起一阵巨大的台风，顿时飞沙走石，天日无光，刘邦才得侥幸保全性命，逃回洛阳去了。”

这一席话使在座的人深受启发：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要学会辩证地看问题，辩证地分析事物。毛泽东在江渭清汇报了工作以后，谈到了军队的改革问题，他说：

“当官不当兵，不到连上来，怎能知道兵的情形？基层的情形？怎能指挥他们？”

专列到了南京，正在主持召开军区代表大会的许世友前来迎接毛泽东。毛泽东问：

“你们对于各级军官每年下连当兵怎么看？”

许世友说：

“我们一定这样办。”

毛泽东又问：

“你们正在开会，好不好对此做出决议？”

许世友说：

“当然可以，我们也正准备这样做。”

9月21日晚，毛泽东边吃晚饭边听汇报，他对血吸虫的防治问得最详细。最后他说：

“这种病对人民群众的危害非常大，一定要从根本消灭它。如果1000万人患了，就有9000万人受威胁，如同我们现在10个人一桌吃饭，其中1人得病，其余9个人也会受到威胁一样！”

是日晚，毛泽东一行人由南京坐专列经上海去此次视察的终点站杭州。

张治中在南京时经过一整天的紧张活动，在11时就睡了，睡梦正酣，叶子龙来说：

“主席有请。”

张治中忙连披衣到毛泽东的车厢里去。毛泽东正在看书，连张治中走进来都没有察觉。张治中站在毛泽东身后问：

“你这样聚精会神地看，是什么书？”

毛泽东说：

**“这是有关炼钢铁的书。”**

**“连这种技术性的书你也要看么？”**

**“是呀！人的知识面要宽些。我的知识面还太窄，必须时常补补课。你是人大代表，也该看。”**

毛泽东看着张治中睡眼朦胧的样子，问道：

“你大概是大梦初醒吧？”

“刚睡不久。”

张治中说着，一看手表，快凌晨1时了。

原来，毛泽东是要利用经过上海的机会，约张治中一同去视察上钢一厂。

毛泽东在视察中，谈到了钢铁生产问题。他说：

**“发展钢铁工业一定要搞群众运动，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

9月22日凌晨3时，周恩来用电话将一份关于金门作战方针的报告及他的请示传给毛泽东。周恩来在报告上写的是：

“在目前形势下，对金门的作战方针，仍以打而不登、断而不死，使敌昼夜惊慌、不得安宁为妥。海、空、炮联合作战，确不易配合很好，且有触及美舰美空军的可能。我实施对金门轰炸更不适宜，因为这样做，恰好给蒋介石空军以轰炸我大陆的机会。目前，美军还在控制蒋帮空军不许其轰炸我大陆，其原因是摸不透我空军会炸何地：金门还是台湾？既然美方还摸不清我方轰炸动向，我就以不促成蒋空军向我大陆轰炸为有利。如蒋轰炸大陆，而我只炸金门，反而示弱，所见对否，请示。”

毛泽东看罢周恩来传来的信，立即回复道：

“你9月22日3时对金门作战方针问题上的批语是很对的，即照此办理，使我们完全立于不败之地，完全立于主动地位。”

9月22日上午，毛泽东的专列即将到达杭州站了，他对张治中说：

“杭州是大家多次到过的，你的观感如何？”

张治中说：

“建国后经过整顿当然不错。”

毛泽东说：

“杭州有两大缺点：一是湖水太浅，水草太多。二是坟墓太多，与鬼为邻。不过，我虽然批评它，还是喜欢它。”

他还对张治中叙述了过去如何游北高峰、南高峰，风景如何美好。张治中闻之动容，不经意间，又问道：

“有滑竿上山吗？”

毛泽东想起他们二人谈到上黄山张治中说坐滑竿的事，心中有些不快，但他还是微微一笑，用手指着自己的双腿说：

“我有这一副滑竿！”

张治中话题一转，对毛泽东说：

“您经年累月没有很好休息，这次到杭州多休息几个星期吧。”

毛泽东说：

“看情况吧。我只要睡3天就可以恢复过来，最多5天。”

停了一会儿，他又笑着说：

“这几天怎样活动，你自己安排，我们暂时‘分道扬镳’吧。”

欲知毛泽东在杭州的活动情况，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关于坐滑竿的话题，毛泽东每次听了都不高兴，张治中很不理解。**在张治中看来，坐汽车、骑马与坐滑竿都是代步，共产党人为什么能坐汽车、能骑马，就不能坐滑竿？**应该说，单从形式上看，坐滑竿与坐汽车、骑马都是代步。但从本质上说，两者是有差别的。张治中作为一位资产阶级革命家，一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毛泽东眼里，坐滑竿是骑在人民头上。人家汗流浃背，你却安静悠然地欣赏风景，这是不人道的，良心上是说不过去的。**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与资产阶级革命家在认识和对待劳动人民方面的不同之处。

**第61章**

**“儿童时期需要发展共产主义的情操、风格和集体**

**英雄主义的气概，就是我们时代的德育。”**

话说毛泽东到了杭州站，浙江省党政领导人都来看望他。毛泽东为张治中一一作了介绍。第一个是书记江华，毛泽东说：

“他不姓江，原名黄春浦，江华是干革命时取的。”

他介绍书记霍士廉时说：

“是霍去病的霍，霍去病在汉代名声功劳最大，不幸27岁上就死了。霍书记大概是霍去病的后裔吧？”

在介绍到副省长吴宪时，毛泽东不无认真地说：

“此人口气真大，口衔天宪！”

一句话把大家逗笑了。

1958年9月22日，刚刚于9月19日宣告成立的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阿巴斯总理致电周恩来，请求中国承认他们。

周恩来接到这个电报非常高兴，但考虑到中国与苏联的微妙关系，认为必须妥善处理，便与彭真、陈毅、张闻天、廖承志、刘宁一和章汉夫商量一番，写信向毛泽东请示说：

“拟先由陈毅同志约苏联代办安东诺夫一谈，告以我国决定承认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但不去询问苏联政府的态度。”

毛泽东看过周恩来的来信，当即挥毫复函：

“同意对承认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的处理，我国必须早日宣布承认它，并着手商谈建立外交关系问题。”

9月23日，刘少奇在与南通干部的座谈会上说：

“**搞土高炉能出铁就好**。这是出的师傅钱，不要算成本，这半年主要是熟悉技术，我们学会了本领，一年就能出几万个炼铁的人。1万人开矿，1万人运输，1万人炼铁，有3万人真了不起，这办法好，每个县都要出人支援炼钢炼铁。”

9月23日晚，刘少奇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发表了讲话，关于土高炉问题，他说：

“**现在困难很多，花了很多力量炼那么一点铁，按照成本算起来，成本也是很高的，化不来。但是，有一个很大的好处，把人锻炼了，将来可以炼钢炼铁，将来我们就有成百万、成千万的钢铁技术人材。**这个时候化点钱学习，很有必要，不算浪费。现在建成一个小炉子，炼几个月扳掉了，这不是白炼的。再扳掉，再盖大的，再扳掉，再盖很大的。这算是什么浪费呢？不算浪费。从这样发展起来，我们国家精神很好。”

9月24日，毛泽东看到了中宣部长、中央文教小组组长陆定一发表在9月1日《红旗》第7期上的《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文，随手在《红旗》封面上给江青写了一个批示，他写道：

江青：

陆定一的文章很好，必须看，至少看2遍。

毛泽东

早在8月下旬的时候，毛泽东在审阅这篇文章时曾在其中加写了两段文字，他写的是：

“**中国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孔子的有教无类，孟子的民贵君轻，荀子的人定胜天，屈原的批判君恶，司马迁的颂扬反抗，王充、范缜、柳宗元、张载、王夫之的古代唯物论，关汉卿、施耐庵、吴承恩、曹雪芹的民主文学，孙中山的民主革命，诸人情况不同，许多人并无教育专著，然而上举那些，不能不影响对人民的教育，谈中国教育史，应当提到他们。**但是就教育史的主要侧面说来，几千年的教育，却是剥削阶级手中的工具，而社会主义教育乃是工人阶级手中的工具。”

“儿童时期需要发展身体，这种发展是要健全的。**儿童时期需要发展共产主义的情操、风格和集体英雄主义的气概，就是我们时代的德育。**这二者同智育是连结一道的。二者都同从事劳动有关，所以教育与劳动结合的原则是不可移易的。总结以上所说，我们所主张的全面发展，是要使学生得到比较全面的和比较广博的知识，发展健全的身体，发展共产主义的道德。”

9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经毛泽东批准的《关于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决定》，全文如下：

自中共中央1957年5月10日发布关于各级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和1958年2月28日发布关于下放干部进行劳动锻炼的指示以后，全国有近百万干部下放到农村和工矿企业参加体力劳动，同时，全国广大在职干部利用业余时间积极地参加了各项体力劳动，这样，大大地增强了党、政府、军队、人民团体以及很多企业、事业机关同劳动群众的联系，有效地改进了干部的思想作风。**由于干部参加体力劳动，以普通劳动者的面貌在群众中出现，因而进一步改善了干部和群众之间的关系，提高了广大劳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加强了他们对于干部的信任和爱戴。**这是形成我国今年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一个重要因素。**一年多以来的事实证明，干部和群众、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必须打成一片，也能够打成一片，对于这一点的任何忽视和怀疑都是错误的和危险的。**目前国家干部队伍有几百万人，加上他们的家属有几千万人，他们的思想、生活作风影响着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使这个队伍完全同劳动群众打成一片就具有非常重大的政治意义，因此，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认为除了一部分干部已经下放到农村和工矿企业进行劳动锻炼以外，今后主要应当使全体在职干部每年都分出一定时间去参加工农业劳动生产。现在决定：

一、各机关、部队和各企业、事业单位的全体工作人员，除年老有病不能参加体力劳动或者只能参加轻微的体力劳动的以外，每人每年必须用至少一个月的时间参加体力劳动。

二、各单位对于所属工作人员怎样参加体力劳动和怎样保证做满至少一个月，应当根据各单位的具体情况，定出计划，做好安排，以便在不影响工作的条件下迅速执行上述决定。

三、**中共各级党委和各级人民委员会应当在每年的6月和12月分别对本级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情况作两次全面的检查，以便保证这一决定的完满实施。**

9月25日这一天，中共中央召开电话会议，要求今后每天日产6万吨钢，10万吨铁，日运输35000车，并计划在9月29日放钢铁“卫星”，争取全国日产万吨铁的省有10个，千吨铁的县有40至50个，以迎接国庆，鼓舞士气。

再说张治中和毛泽东的活动分开后，他以为毛泽东真的要睡个3天5天了，可事后一问叶子龙、徐光禄，才知道毛泽东还是每天只睡4、5个小时，只有两天睡到6个小时。他每天批阅的文件，并不比在北京时少。

张治中则是在这几天里，梳理了跟随毛泽东视察的整个过程和比较详细的情况。

毛泽东出行，不喜欢乘飞机，他一般都是乘坐自己的专列。毛泽东的车厢内，有他自己的大木床和许多书。江青也有她自己的包厢。4节车厢供警卫员和工作人员使用，此外还有一个医疗室，一个餐厅和一个厨房。6部保密电话连接到中南海保安局。密电码每一个汉字编为一个号码——改变迅速——由一位精明的年轻职员全靠记忆处理密电，绝不留下片纸只字。所有的交通路线，毛泽东都可以随时停车。

毛泽东在此次视察过程中，往往是白天到工厂、农村、学校视察，夜间还要听汇报、开会、看文件，在旅途中又要读书学习，一天只能休息三四个小时，给张治中留下了“励精图治、宵旰辛勤”的深刻印象。

毛泽东习惯在夜间工作，他白天活动频繁，到深夜12时才开始审阅文件、开会、研究问题。毛泽东特别好学。9月10日在北京上飞机时，张治中就留心看到毛泽东的两箱书被搬上了飞机。一路上，毛泽东还沿线借书看。

在这几天里，张治中把自己从毛泽东视察以来每天的所见所闻，特别是根据毛泽东的言论行动，写成的日记，整理成册，约4万余字，题名为《真挚、亲切、爽快、率直、英明、伟大的人民领袖》。眼看此次视察活动就要结束了，张治中将他的日记送请毛泽东审阅。毛泽东说：

“你的日记我是不看的，尽在吹我。”

张治中说：

“我的日记还是想请您看看，我想发表。”

毛泽东笑着说：

“我不看你就不能发表。”

“我有言论自由权。”

张治中振振有词。

“你写的是我的事情，我不答应，当然不能发表。”毛泽东稍稍停顿一下，又说：“萧三也写过一篇东西，我也曾不让他发表。”

张治中说：

“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说一说，希望你不要存在怕造成个人崇拜的戒心。你是中国的列宁，不是斯大林。你和列宁领导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推翻反动统治，取得了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胜利。为什么说您不是斯大林，是因为斯大林在继承列宁之后，由个人专断而发展到个人崇拜，越到晚年越发展，以致犯了严重错误。为了避免个人崇拜，应该注意采取民主的作风，经常保持谦虚、谨慎，应强调群众路线，应强调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在制定方针政策时，不能有独断专行的思想。**看看今天中国的建设成就，的确是非常吸引人的，人民生活水平已经有了相当的改善，人民群众自然也就流露出对领袖的厚爱之情。**我写的都是亲身见闻，是实事求是的，有一句说一句，没有一点夸大。你看了之后能不能发表再说，如果既不看又不让发表，那我不服。”

毛泽东见他如此坚持，只好说：

“好，我再考虑考虑，但是你只能说服，不能压服！”

9月29日，毛泽东、江青和张治中一行回到了北京。张治中在与人讲起他陪同毛泽东视察的感受时，连声称赞：

“如处春风化雨之中。”

9月30日，《人民日报》以《刘少奇同志视察江苏城乡》为题，报道了刘少奇9月19日至28日在江苏视察的情形，报道中说，刘少奇在具体阐述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5个条件时，其中说道：“第四，改善社会劳动组织。例如，规模较小的农业合作社转变成规模较大的人民公社，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农村劳动组织大进一步的改进，这种改进，大大有利于农村劳动力的调配，大大有利于农村生产的发展。又例如，实行郑州提出的‘男女换班，老少换班’，即：女人能做的事不再由男人去做，老人能做的事不再由青年和壮年去做，以使男女老少能够各自担任自己力能胜任的工作。”

报道中还说，刘少奇在江苏常熟视察时说：“实行粮食供给制以后，将提高人民共产主义觉悟。”他问和平公社党委书记：“秋后，即将实行粮食供给制，群众拥护不拥护？”公社党委书记说：“大家一听说吃饭不要钱，都高兴得跳了起来，有个老头说，过去提心受苦一辈子，怕吃不饱肚子，这下子可好了。”苏州地委第一书记皓江在汇报中说：“群众都非常赞成实行粮食供给制，他们说，‘一个心思丢下了，一个心思又来了，丢下的是几千年愁吃愁穿的苦心思，又来的心思是怎样把生产搞得更好，不然就对不起共产党。’”刘少奇听后说：“这两句话，两个心思，很值得我们深思。有人担心，实行粮食供给制，会不会增加懒人？苏州农民的这两句话，给我们作了最有力的回答。这说明他们不是变懒了，而是情绪更加高了，生产更加积极了。这就是人民共产主义觉悟提高的表现，是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更加提高的标志。”

9月30日下午，毛泽东的秘书通知吴冷西说：

“主席找你有事。”

吴冷西马上赶到中南海丰泽园，走进菊香书屋院内的东厢房。毛泽东一个人正在书房里看字帖，见吴冷西来了，便招呼他坐下，说：

“我此次考察，看到了各地人民群众很大的干劲，尤其是大办钢铁、大办民兵，各项任务都是可以完成的。”

“帝国主义如此欺负我们，这是需要认真对付的。我们不但要有强大的正规军，我们还要大办民兵师。这样，在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时候，就会使他们寸步难行。”

毛泽东对那种以为工业方面搞大规模群众运动是不正规、农村习气和游击作风的意见进行了批评。他还说：

“我为新华社写了一篇我巡视大江南北的新闻稿，稿子正在打字，稍等一会儿就好。”

“这次特别请张治中将军一起视察。张治中将军原是蒋介石的亲信，1949年国共和谈破裂后站到我们这边来的。张治中在沿途视察时除了关心工农业飞跃发展外，还特别关切台湾海峡的形势。他对我们迟迟不登陆金门很不理解，主张这次解放台湾，即使做不到，也无论如何要把金门、马祖拿回来。他说：这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其实，我们也不是不想拿下金门、马祖，但这个问题不单是同蒋介石有关，特别是要考虑美国的态度，切不可以鲁莽从事。**美国人也害怕跟我们打仗。我们宣布12海里领海后，美国军舰开始不承认，多次侵入我领海线，但不敢驶过他们承认的8海里领海线。后来经我多次警告，美舰也不敢入侵我12海里线了。**美国空军虽然有时也飞到大陆内地侦察，但在台湾海峡，美国飞机开始时经常侵入我领空，后来也不敢越过海峡的中线。有一次，美舰为国民党运输船队护航，向金门运送弹药、给养。当这个联合舰队抵达金门港口时，我下令猛烈炮击，美舰马上掉头逃跑，国民党船队遭殃。可见美国也是纸老虎。但是，它又是真老虎。**目前美国在台湾海峡集中了美国所有12只航空母舰中的6只，重巡洋舰3只，驱逐舰40只，航空队2个，实力相当强大，不可轻视，需要认真对待。因此我们现在的方针是打而不登，断而不死。**

在华沙恢复的中美会谈，经过几个回合的互相侦察，大体上可以判断美国人要保台湾，但不一定保金门，而且有迹象显示，美国人企图以放弃金马换取我承认其霸占台湾。这需要研究对策。张治中将军的主张恐怕不宜采纳。《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现在要在宣传上来个暂停，待中央决策后再说。”

毛泽东话头一转，说：

“你们办报的要经常下去呼吸新鲜空气，记者、编辑要这样做，总编辑也要经常下去。”

他扳着指头说：

“今年你已经去过南宁、成都、武昌、北戴河，虽然都是去开会的，但总算下去了，以后还要下去调查研究。”

吴冷西说：

“我在5月间去河北、河南走了一趟，很有收获。当然还是走马看花。”

毛泽东说：

“要下马看花，不能老是走马看花。在北京当然也很重要，这是中国的政治中心，是议政多的地方。办报要听到各方面的议论，写评论才能有所为而发。这方面你要学张季鸾。《大公报》从天津起家时，是由3个人的‘合作社’从别人手里接办的，这3人‘合作社’是吴鼎昌出钱，胡政之经理，张季鸾主笔。抗战前虽然不断有所发展，但在整个中国局势中没有多大分量。抗日战争是《大公报》的鼎盛时期，国共两党合作的局面给《大公报》发挥其作用提供了条件。张季鸾以及继任的王芸生，在这方面的作用值得重视。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3人合办《大公报》时，相约只办报不做官，但后来吴鼎昌、胡政之都做官了，只有张季鸾没有官职，他却是蒋介石的‘国士’。张季鸾本人年轻时在日本留学，虽然许多留学生都参加党派，但他始终以超党派自居。此后，特别是在国共合作时期，他更是以第三者标榜。他在重庆经常来往于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他同陈布雷交往甚深，同时也常到曾家岩走走，到处打听消息，然后从中做他的文章。他办报素以客观、公正自夸，平常确也对国民党腐败加以揭露批判，但每到紧要关头，如皖南事变发生后，他就帮蒋介石骂周恩来了。王芸生后来接他的班，在国民党发动内战前后，也是给蒋介石帮忙的，直到国民党崩溃前夕，才转而向我们靠拢。**人们把《大公报》对国民党的作用叫作‘小骂大帮忙’，一点也不错。**但张季鸾摇着鹅毛扇，到处做座上客。这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观察形势的方法，却是当总编辑的应该学习的。

张季鸾这些人办报很有一些办法。例如《大公报》的星期论坛，原来只有报社内的人写稿，后来张季鸾约请许多名流学者写文章，很有些内容。我在延安时就经常看。《大公报》还培养了一批青年记者，范长江是大家知道的，杨刚的美国通讯也很有见地。这两位同志都在《人民日报》工作过。

我们报纸有自己的传统，要保持和发扬优良的传统，但别人的报纸，如解放前的《大公报》，也有他们的好经验，我们也一定要把对我们有益的东西学过来。”

说话间，毛泽东写的新闻稿子打出来了，他要吴冷西看看有什么意见。吴冷西看到稿子的题目是《毛泽东同志向新华社记者的重要谈话》，稿子末尾还专门提到张治中将军陪同视察。吴冷西看完了稿子，说没什么意见。毛泽东便交代他说：

“今晚由新华社广播，《人民日报》在国庆节的头版头条登出。”

1958年10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卫星齐上天，跃进再跃进》的社论。社论中提出，要求全国日产钢6万吨。还说，只有这样才能完成1070万吨的任务。

10月1日上午，首都各界群众60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盛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庆典。

72岁高龄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应邀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斯特朗是在9月22日第6次（新中国建国后首次）来到中国的。她一下飞机就被接到北京饭店的一套高级房间里。9月24日，周恩来为她举行了招待会。

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人与斯特朗亲切握手。毛泽东询问了斯特朗的健康情况，对她的到来表示欢迎。毛泽东还说：

“如果我们当时知道需要这么长时间你才能回到中国，就不会叫你离开延安了。”

说话间，阅兵式开始了。受阅部队有军事学院、步兵学校、工程兵学校、坦克兵学校、航空兵学校、海军学校、水兵、摩托车、伞兵、炮兵、坦克、空军、民兵等，共有7856人，分为35个方（梯）队，其中29个地面方队，6个空中梯队，93架飞机。

在基干民兵队伍中，许多人是来自太行山、白洋淀等革命老根据地的民兵杀敌英雄，曾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用土枪、土炮、“铁西瓜”打败过敌人。他们行进在天安门前，全部装备着新式步枪，精神焕发，步伐整齐。

此次阅兵历时50分钟。全民皆兵的“战争火药味”和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化的“大跃进”气氛都很浓。

10月2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毛泽东与斯特朗在天安门城楼上握手的大幅照片。自此以后，斯特朗便定居在中国。

10月2日下午，毛泽东会见了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蒙古、苏联、波兰6国共产党代表团，他在谈话中说：

“**今年我们才知道以钢为纲这一条。你把钢铁搞起来，其它东西都可以跟上来。**”

毛泽东还谈到了反面教员的问题，他风趣而又辛辣地说：

“有一个蒋介石比较好，是不是？你们觉得有一个好还是没有好？没有蒋介石中国人民就不能进步，就不能团结起来，也不能武装起来。**单是马克思主义是不能把中国人民教育过来的，所以我们除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教员以外，请了另外一个教员，这就是蒋介石**。噢！这个人在中国可做了很有益的事情，一直到现在还在尽他的历史责任。他的历史任务现在还没有完结，他还在当教员，他很有益处呀！不拿薪水，美国人发薪水给他，我们一个钱都不花，可是他给我们当教员。”

他又说：

“杜勒斯现在很不好办，他搞得很被动。人们责问他，为什么管到金门去呢？”“全世界除了杜勒斯，都说金门是中国的岛屿，金门问题是中国的内政。所以他现在搞得很不好办事啦！我们还要继续使他难办，使他继续处于困难地位。不要轻易饶他！不要轻易让他溜掉！在这个地方大概他一时也相当难溜。”

在国庆节期间，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还接见了各地参加国庆观礼的代表。新疆和田的农民劳动模范库尔班·吐鲁木老人紧紧握着毛泽东的手，激动地说：

“毛主席，您好，新疆人民都想念您！”

毛泽东微笑着也向库尔班问好，并嘱咐他回去后向新疆人民问好。

不久前，库尔班曾准备骑着小毛驴，带着两个精心培育的大甜瓜，到北京来看望毛泽东。他对村干部说：

“毛主席是我们维吾尔族的大恩人，我有件心事，想骑着小毛驴去看望毛主席。”

村干部对他说：

“毛主席远在北京，你骑着小毛驴恐怕不行，我们把你的想法反映给自治区领导吧。”

那时候自治区正要组团去北京参加国庆观礼，王恩茂、陶峙岳等自治区领导人闻知此事，便决定让库尔班一起去北京看望毛泽东。消息很快传遍了家家户户，大家都来向库尔班老人表示祝贺。库尔班老人被接到乌鲁木齐，登上了飞机。老人家带着两个大甜瓜，手里还拿着一个小布包，始终不肯放手，里边装着他准备送给毛泽东的杏干、葡萄干。库尔班坐在飞机上，心急火燎地问旁边的人：

“飞机怎么这么慢？还没有我的毛驴跑得快么！”

10月3日、4日两个晚上，毛泽东连续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与会者们重点分析了美国国务卿杜勒斯9月30日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谈话及蒋介石10月2日对美联社记者的谈话。

杜勒斯在9月30日的谈话中，要求中国共产党和台湾当局“双方放弃使用武力”。他说，如果在台湾地区“有了可靠的停火”，在金门、马祖保持大量部队就是“愚蠢的”，“不明智的”，“也是不慎重的”。他还说，美国“没有保卫沿海岛屿的任何法律义务”。记者问他：“如果中共方面做出某些让步，那么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是否会有所改变？”杜勒斯说：“我们在这方面是灵活的。”“如果我们必须应付的局势有所改变，我们的政策也会随之改变。”

而蒋介石在对美联社记者谈话中则宣布：杜勒斯的谈话只是“美国单方面的声明”，国民党当局“没有任何义务来遵守它”。

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会上首先说道：

“侦察任务已经完成，问题是下一步棋该怎么走，请同志们发表看法。”

周恩来分析说：

“杜勒斯的讲话，表明美国想趁目前这个机会制造两个中国，要我们承认不用武力的义务。以此为条件，美国可能要台湾放弃所谓‘反攻大陆’的计划，并且从金马撤退。杜勒斯这个政策，一句话就是以金、马换台、澎，这同我们最近在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中侦察美方底牌的情况是一致的。美方在会谈中说的甚至比杜勒斯更露骨。”

刘少奇、邓小平认为，在台湾海峡对峙中，双方都比较谨慎。我们在八九月间的火力侦察是对的，迫使美国人不得不考虑怎么办。同时，我们只打蒋舰，不打美舰，海空军都严格遵守对美舰、美机不开火的命令，这也是谨慎的，克制得当的。在宣传上我们大张旗鼓地谴责美国侵略我国领土台湾，抗议美舰美机侵犯我领海领空，不仅动员了全国人民，而且动员了国际舆论，支持了阿拉伯人民，也对美国当局造成强大压力，这是做得对的。

毛泽东说：

“对于杜勒斯的政策，我们同蒋介石有共同点，都反对两个中国，他自然坚持他是正统，我是匪；都不会放弃使用武力，他念念不忘反攻大陆，我也绝不答应放弃台湾。但目前情况是，我们在一个相当时期内不能解放台湾，蒋介石‘反攻大陆’连杜勒斯也说‘假设成份很大’。剩下的问题是对金、马如何处理？蒋介石是不愿撤出金、马的，我们也不是非登陆金、马不可。**可以设想，让金、马留在蒋介石手里如何？这样做的好处是，金、马离大陆很近，我们可以通过这里同国民党保持接触，什么时候需要就什么时候打炮，什么时候需要紧张一点就把绞索拉紧一点，什么时候需要缓和一下就把绞索放松一下，不死不活的吊在那里，可以作为对付美国人的一个手段。**我们一打炮，蒋介石就要求美国人救援，美国人就紧张，担心蒋介石给他闯祸。对于我们来说，不收复金、马，并不影响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光是金、马蒋军，也不至于对福建造成多大的危害。反之，**如果我们收复金、马，或者让美国人迫使蒋介石从金、马撤退，我们就少了一个对付美、蒋的凭借，事实上形成两个中国。**”

大家同意毛泽东提出的设想，让蒋军继续留在金、马，使美国当局背上这个包袱，时不时踢他一脚，让他提心吊胆。周恩来说：

“美国可能在中美会谈中提出3个方案：第一，要我们停止打炮，蒋方减少金、马兵力，美方声明金、马在美、蒋共同防御范围之内。第二，要我们停止打炮，蒋方减少金、马兵力，美方声明共同防御限于台澎。第三，要我方停止打炮，蒋方从金、马撤退，双方承担互相不使用武力的义务。3个方案都不能同意，因为三者的实质都是制造两个中国，使美国霸占台湾合法化。中美会谈继续下去有利，可以拖住美国人，力求避免美方或其他西方国家把台湾海峡问题提到联合国去。对亚非朋友也要把问题讲清楚，免得他们不明真相，给我们帮倒忙。”

毛泽东说：

“**方针已定，还是打而不登，断而不死，让蒋军留在金、马**。但打也不是天天打，更不是每次都打几万发炮弹，**可以打打停停，一时大打，一时小打，一天只零零落落的打几百发。但我们在宣传上仍要大张旗鼓，坚持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金、马打炮是中国内战的继续，任何外国和国际组织都不能干涉。美国在台湾驻扎陆空军是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美舰云集台湾海峡是蓄意制造紧张局势，都必须完全撤退。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反对美国霸占台湾合法化。**我们和蒋介石通过谈判解决金、马以至台、澎问题。

以上这些原则，在舆论宣传上可以鲜明提出，在华沙会谈中可以外交辞令些，但也不离原则。所有这些，都要在我政府发表正式声明之后才公开宣传。《人民日报》目前可以‘停火’几天，准备充足弹药，一声令下就排炮轰击。”

10月5日早上8时，毛泽东写信告诉彭德怀、黄克诚，暂停炮击金门。

此时，金门在福建前线炮火封锁一个多月后，海上补给线已经完全切断，粮食供应已经发生危机，弹药也耗费得差不多了。所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黄克诚的信中写道：

德怀、克诚同志：

**不管有无美机美舰护航，10月6、7两日，我军一炮不发。敌方向我炮击，我也一炮不还。偃旗息鼓，观察两天，再做道理。空军必须防卫，但不出海。**还有一事：两天中，不要发表公开声明，因为情况如何，尚待看清。以上请即令行。或者即以此信转发叶飞、韩先楚。此件处理后，送总理一阅。

毛泽东 10月5日上午8时

10月6日凌晨1时，毛泽东写出了一篇策略性、政策性极强的绝妙文章：《告台湾同胞书》。

凌晨2时，毛泽东给彭德怀、黄克诚等人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昨天我说不发声明，看两天再说。随后想了一下，还是先做声明为好，所以有告台湾同胞书。此件即将发出，请福建前线广播电台多播几次，为盼！”

这一天，由毛泽东起草的《告台湾同胞书》，以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义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同时由福建前线广播电台对外广播。毛泽东在《告台湾同胞书》中写道：

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军民同胞们：

**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金门战斗，属于惩罚性质。**你们的领导者们过去长时期内太猖狂了，命令飞机向大陆乱钻，远及云、贵、川、康、青海，发传单，丢特务，炸福州，扰江浙。是可忍，孰不可忍？因此打一些炮，引起你们注意。

台、澎、金、马是中国领土，这一点你们是同意的，见之于你们领导人的文告，确实不是美国人的领土。台、澎、金、马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是另一个国家。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这一点，也是你们同意的，见之于你们领导人的文告。你们领导人与美国人订立军事协定，是片面的，我们不承认，应予废除。**美国人总有一天肯定要抛弃你们的。你们不信吗？历史巨人会要出来作证明的。**杜勒斯9月30日的谈话，端倪已见。站在你们的地位，能不寒心？归根到底，美帝国主义是我们的共同敌人。

13万金门军民，供应缺乏，饥寒交迫，难为久计。为了人道主义，我已命令福建前线，从10月6日起，暂以7天为期，停止炮击，你们可以充分地自由地输送供应品，但以没有美国人护航为条件。如有护航，不在此例。

你们与我们之间的战争，30年了，尚未结束。这是不好的。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这一点，周恩来总理在几年前已经告诉你们了。这是中国内部贵我两方有关的问题，不是中美两国有关的问题。美国侵占台澎与台湾海峡，这是中美两方有关的问题，应当由两国举行谈判解决，目前正在华沙举行。美国人总是要走的，不走是不行的。早走于美国有利，因为它可以取得主动。迟走不利，因为它老是被动。一个东太平洋国家，为什么跑到西太平洋来了呢？西太平洋是西太平洋人的西太平洋，正如东太平洋是东太平洋人的东太平洋一样。这一点是常识，美国人应当懂得。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之间并无战争，无所谓停火。无火而谈停火，岂非笑话？

台湾的朋友们，我们之间是有战火的，应当停止，并予熄灭。这就需要谈判。当然，再打30年，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但是究竟以早日和平解决较为妥善。何去何从，请你们酌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部长 彭德怀 1958年10月6日中午1时

这份文告一发表，台湾当局和美国人一时乱了手脚，他们都摸不清中国共产党的意图，一会儿说是骗局，一会儿说是心理战，是要挑拨美蒋关系。

10月7日，杜勒斯说：

“中国共产党人在经过6个多星期的残酷和不停顿地炮轰之后，现在说，他们将保持一个多星期的人道主义的和平。对这个声明作出评价是不容易的。这是美国一直极力祈求的，而且如果他们又要恢复战斗，这个事态发展肯定会使中国共产党人受到全世界的谴责。”

美国政府除了对这一文告公开表示欢迎外，同时又要挟中国必须接受他们的所谓“永久停火”。

10月8日下午，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召集政治局常委开会。与会者都说，告台湾同胞书发表以后反应强烈，有些西方报刊甚至说，这是台湾海峡两方关系以至中美关系发生戏剧性变化的预兆。美舰已停止护航，也不再入侵我金门领海。只有国民党国防部认为这是共产党的诡计。毛泽东问吴冷西：

“《人民日报》的社论准备得怎么样？”

吴冷西说：

“已写好一篇专攻美国人的。”

毛泽东说：

“先要做国民党的工作，**要写一篇着重对蒋介石说话，同时也给美国人出难题。可以说明并非诡计，阐述我对台的一贯政策，这次是又一次伸出手来。还可以挑一下美蒋关系，说寄人篱下不好受，搭美国船不可靠。**然后批杜勒斯的所谓停火，要美国人过五关：停止护航，停止侵犯中国领海领空，停止军事挑衅和战争威胁，停止干涉中国内政，从台澎撤退美国全部武装力量。

你今天晚上写好，我夜里等着看。你不必等散会，现在就去写。”

吴冷西在午夜过后赶出了社论初稿，排出清样送给毛泽东时，已经是9日凌晨3点了。毛泽东立即审阅和修改了社论，他将社论的最后一段改写为：

“看来，问题尚有待于观察和考验，离解决之期尚很远。帝国主义到底是帝国主义，反动派到底是反动派。且看一看他们究竟怎样动作吧！”

改写完了，他又在清样上批道：

“不算好，勉强可用。毛泽东 10月9日6时”

吴冷西在9日上午收到毛泽东退回来的社论稿，又接到毛泽东的秘书林克打来的电话说：

“主席交代，要把杜勒斯8日宣布美舰停止护航加进社论中。并说发表时间可以推迟一天。”

他看了毛泽东的修改稿，感到社论原来的题目很不醒目，就依据毛泽东改写的最后一段最后一句，把题目改为：《且看他们怎样动作》。

由于这篇社论题目特别，吴冷西又是用了接近毛泽东那篇《告台湾同胞书》的文体风格，所以社论在10月11日发表后，曾被人们误认为是毛泽东的大手笔。

10月10日，毛泽东看了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张春桥9月15日发表在上海《解放》半月刊第6期上的《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写信给《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要求《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张春桥的文章。

吴冷西对张春桥的文章有不同意见，便组织人进行了讨论，尔后写信给毛泽东，请毛泽东考虑《人民日报》在转载时可否将编者按写得留有余地。

10月11日上午10时，毛泽东复信给吴冷西，他写道：

冷西同志：

信收到。既然有那么多意见，发表时，序言应略为改一点文字，如下：

《人民日报》编者按：张春桥同志此文，见之于上海《解放》半月刊第6期，现在转载于此，以供同志们讨论。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因为它是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就是说，对历史过程解释得不完全。但它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引人注意。文章又通俗易懂，很好读。**

请你看后，加以斟酌。如有不妥，告我再改。再则，请你拿此给陈伯达同志一阅，问他意见如何；并将你们讨论的详情给他谈一下。

毛泽东 10月11日上午10时

关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问题，毛泽东此前曾多次讲过，所以他对张春桥的文章非常重视。后来在10月13日，《人民日报》以醒目的位置发表了毛泽东11日上午撰写的编者按和张春桥的文章。

戚本禹在《回忆录》中曾记载了他在1966年4月和张春桥会见的情形，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作了比较好的注释。《回忆录》中是这样写的：“他那时住在康平路，房子不错，但**他家里摆设却很简朴，空空荡荡的，除了书，就是一个旧桌子。他那时已经是市委书记处书记了，没有想到还是很朴素。我问，你们华东局这么艰苦？其他领导的家里也是这样？他说，马天水家里更破旧，还不如我。**不过，他告诉我，**陈丕显他们家里就不一样了**。我虽然没去看过陈丕显的家，但我可以想象。在中南海，我知道主席那里破旧，董老(必武)家也破旧，总理家里不旧，但也不豪华。**刘少奇的家里就豪华了。陈伯达家里也很讲究；田家英家里宝贝很多；胡乔木家里也比较阔气。**说实话，当时，我心里是比较反感那些家中摆设富丽堂皇的干部的，觉得家里朴素的干部一般都是好干部。我们在一起谈了很多问题。谈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我比较能够理解他的思想。**他说的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并不是从法律意义上讲的，主要是讲如何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限制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主席也最怕产生一个新的资产阶级，最怕党内产生一个新生的特权官僚阶级。**怎么限制？只能从经济上加以限制，从权力上加以限制，从制度上加以限制。一些旧的东西，像工资差别，八级工资制，如果处理不当，不加适当限制，任其扩大的话，就会成为一种资产阶级法权。**级别本身就是一种法权。我是上级，是领导；你是下级，是被领导，我就该比你多拿，这就是法权。**当然，共产党是承认有一定级差的，根据各人贡献的大小，有一定的收入差别，有人多拿一点，有人少拿一点。但是**不允许过度扩大这种差别，不允许产生一个特权阶级。**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有这么一条，**要从工资待遇上防止人民公仆变成人民的主人**。我跟他讲，我是这么来理解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他说，你理解得对，我就是这个意思。我也找不到多少能理解我的人，只有主席、柯老等能理解。”

10月11日，毛泽东就卫生部党组9月25日向“毛主席并中央”报送的关于组织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的学习班的总结报告，给杨尚昆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尚昆同志：

此件很好。卫生部党组的建议在最后一段，即今后举办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的学习班，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领导负责办理。我看**如能在1958年每个省、市、自治区各办一个70至80人的西医离职学习班，以两年为期，则在1960年冬或1961年春，我们就有大约2000名这样的中西结合的高级医生，其中可能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此事请与徐运北同志（卫生部党组书记、卫生部副部长——笔者注）一商，替中央写一个简短的指示，将卫生部的报告转发给地方党委，请他们加以研究，遵照办理。**指示中要指出这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闲视之。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指示和附件发出后，可在《人民日报》发表。

毛泽东 10月11日

10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以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义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命令》，全文如下：

福建前线人民解放军同志们：

金门炮击，从本日起，再停两星期，借以观察敌方动态，并使金门军民同胞得到充分补给，包括粮食和军事装备在内，以利他们固守。**兵不厌诈，这不是诈。这是为了对付美国人的。这是民族大义，必须把中美界限分得清清楚楚。**我们这样做，就全局说来，无损于己，有益于人。有益于什么人呢？有益于台、澎、金、马一千万中国人，有益于全民族6亿5千万人，就是不利于美国人。有些共产党人可能暂时还不理解这个道理。怎么打出这样一个主意呢？不懂，不懂！同志们，过一会儿，你们会懂的。

**呆在台湾和台湾海峡的美国人，必须滚回去。他们赖在这里是没有理由的，不走是不行的。台、澎、金、马的中国人中，爱国的多，卖国的少。**因此要做政治工作，使那里大多数的中国人逐步觉悟过来，孤立少数卖国贼。积以时日，成效自见。在台湾国民党没有同我们举行和平谈判并且获得合理解决以前，内战依然存在。台湾的发言人说：停停打打，打打停停，不过是共产党的一条诡计。**停停打打，确是如此，但非诡计。你们不要和谈，打是免不了的。**在你们采取现在这种顽固态度期间，我们是有自由权的，要打就打，要停就停。美国人想在我国的内战问题上插进一只手来，他们叫作停火，令人忍俊不禁。美国人有什么资格谈这个问题呢？请问他们代表什么人？什么也不代表。他们代表美国人吗？中美两国没有开战，无火可停。他们代表台湾人吗？台湾当局没有发给他们委任状，国民党领袖根本反对中美会谈。**美国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其人民是善良的。他们不要战争，欢迎和平。但是美国政府的工作人员，有一部分，例如杜勒斯之流，实在不大高明。**即如所谓停火一说，岂非缺乏常识？台、澎、金、马整个的收复回来，完成祖国统一，这是我们6亿5千万人民的神圣任务。这是中国内政，外人无权过问，联合国也无权过问。世界上一切侵略者及其走狗，统统都要被埋葬掉，为期不会很远。他们一定逃不掉的。他们想躲到月球里去也不行。寇能往，我亦能往，总是可以抓回来的。一句话，胜利是全世界人民的。**金门海域，美国人不得护航。如有护航，立即开炮。**切切此令！

国防部长 彭德怀 1958年10月13日上午1时

此前，毛泽东在起草《命令》的同时还起草了一个《再告台湾同胞书》，因他改变了思路而没有发出。《再告》中是这样写的：

“自从美帝国主义占据台湾以来，形势已经改变了。美帝国主义成了我们的共同敌人。国民党已经不是我们的主要敌人。我们和你们还是敌对的，但这种敌对，较之民族矛盾，已经降到第二位。几年前，周恩来总理即向你们建议谈和，就是这个道理。如果和谈胜利妥洽成功，则我们两党又可以化敌为友。我们建议：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全体军民同胞团结起来，采取坚定而又灵活的政策，减少你们的内部摩擦，一致对付民族敌人。

你们的一位军事发言人说，停火7天太短，没有码头，全靠手搬，供应不了许多东西。这是实情。”

“请你们读一读《鲁仲连传》好吧。美国就像那个齐湣王。说到齐湣王，风烛残年，摇摇欲坠，他对鲁卫小国还要那样横行霸道。六朝人有言：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现在是向帝国主义造反的时候了。”

再说10月13日下午，毛泽东会见了定居在香港的新加坡《南洋商报》撰稿人曹聚仁。

曹聚仁是于10月11日到京的，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短信中说：“曹聚仁到，冷他几天，不要立即谈。我是否见他，待酌。”

毛泽东在会见曹聚仁时，作陪的有周恩来、李济深、程潜、张治中、章士钊、童小鹏等人。他与曹聚仁之间的部分谈话内容如下：

毛：“**只要蒋氏父子能抵制美国，我们可以同他合作**。我们赞成蒋保住金门、马祖的方针，如果蒋介石撤退金、马，大势已去，人心动摇，很可能垮。**只要不同美国搞到一起，台、澎、金、马都可由蒋管，可管多少年，但要让通航，不要来大陆搞特务。”**“台、澎、金、马要整个回来，金、马部队不要起义。没有吃的时候，我们就不打炮，让他备足粮弹。但以后还有可能打一点，只不让它损失太大，不打蒋介石也是不好办的。”

曹：“台湾有人问，将来生活方式怎么样？”

毛：“照他们自己的方式生活。水里的鱼都有地区性的。毛儿盖的鱼到别的地方就不行。但是**美国不要他时，蒋可以来大陆，来了就是大贡献，就是美国的失败。**吴佩孚失败后不出国，不住租界，就是好的。**我们的方针是孤立美国。它只有走路一条，不走只有被动。”**

此时，蒋介石的“总统”任期已将届满。毛泽东说：“蒋介石为什么不再做‘总统’？我们都是‘拥蒋派’，问题是美国要整他。我们不同美国谈台湾、澎湖，只谈要美国人走路。蒋不要怕我们同美国人一起整他。大陆这么大，台、澎、金、马只是一大点点几小点点，让他们在那里搞他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天天吹反共，我们也天天吹收复，商量好。他们同美国的连理枝解散，同大陆连起来。枝连起来，根还是你的，可以活下去，可以搞你那一套。一不要整风，二不要反右，不同美国搞在一起，就是伟大胜利。”

周恩来插话：“美国企图以金门、马祖换台湾、澎湖，我们根本不同他谈。台湾抗美就是立功。希望台湾的小三角团结起来，最好是一个当‘总统’，一个当‘行政院长’，一个将来当‘副院长’。”

章士钊插话：“如果这样，美国对台湾的援助会断绝。”

毛泽东马上说：“**我们全部供应，那有几个大钱？他的军队可以保存。我们不压迫他们裁兵，不要他简政，让他搞三民主义。**要等到美国踢开他们的时候，才有可能同我们结合。现在公开谈判也不利，只能吓唬美国人。”

最后，毛对曹说：“你还是做个自由主义者好，不要红了，要有点保护色。”

10月14日下午，毛泽东到达天津，同天津市委和河北省委负责人谈话，调研钢铁生产和人民公社问题。随同毛泽东调查的还有张春桥。

10月15日下午，毛泽东同天津市委、河北省委负责人继续谈钢铁生产和人民公社问题。

此一时期，全国大炼钢铁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10月7日至9日，冶金工业部在天津召开全国地方炼钢现场促进会。会议介绍了天津新兴钢厂土法炼钢的基本措施和操作经验，研究解决了转炉炼钢的若干技术关键问题和操作方法。会议提出了保证炼钢翻一番，必须一手抓铁、一手抓钢的口号。10月11日至16日，冶金工业部在河南商城县召开全国土法炼钢现场会，介绍了河南商城地区和郑州地区的土法炼钢经验。10月15日至21日，全国各地开展钢铁生产周，把炼钢生产的群众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钢的日产量达到10万多吨，生铁的日产量达到37万多吨。

10月16日凌晨，毛泽东写信给田家英说：

田家英同志：

请将已存各种草字字帖清出给我，包括若干拓本（王羲之等），于右任千字文及草诀歌。此外，请向故宫博物院负责人（是否郑振铎？）一询，可否借阅那里的各种草书手迹若干，如可，应开单据，以便按时清还。

毛泽东 10月16日

10月16日下午及17日下午，毛泽东召见天津地委、保定地委负责人及徐水、安国、唐县、正定4个县委的负责人，听取汇报。

毛泽东还把河北省省长刘子厚从邯郸叫到天津，问他：

“你到徐水去了没有？”

刘子厚回答说还没有。毛泽东笑着对他说：

“你去徐水调查一下吧。”

“调查什么问题？”

“你想调查什么就调查什么。”

“用一个星期行不行？”

“用不了，3天足够了。调查完了到北京向我汇报。”

10月17日下午6时，毛泽东回到了北京。

10月19日清晨7时，毛泽东给陈伯达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伯达同志：

想了一下，你和张春桥同志似以早3天去河南卫星公社进行调查工作为适宜，不必听21日刘子厚同志的报告。集中精力在卫星公社调查7天至10天，为杭州会议准备意见，很有必要。可带李友九去帮忙。如同意，请告叶子龙同志，为你们调1架专机即飞郑州。

毛泽东 10月19日上午7时

过了半个小时，毛泽东又给陈伯达写了一封信，嘱咐他带上《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书，调查组每人一本，边调查，边读书，白天调查，晚上读书。并建议把胡绳带去，“练习去向劳动人民做调查工作的方法和态度，善于看问题和提问题。”

此时，陈伯达正在山东范县蹲点，制定了一个两年进入共产主义的规划，规划提出要取消商品生产，实行无偿调拨物资。后来，陈伯达接到毛泽东的指示，就和张春桥去了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

欲知毛泽东此后的工作情形，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告台湾同胞书》中写道：“**美国人总有一天肯定要抛弃你们的。你们不信吗？历史巨人会要出来作证明的。”**后来到了七十年代初，美国总统尼克松抛弃台湾蒋氏集团，亟不可待地访问中国，拜会了毛泽东，在中美联合公报中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用实际行动证明了毛公的预言是完全正确的。

还有，毛泽东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命令》也堪称妙文！这道命令，不仅发给了福建前线部队，而且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这种做法，与其说是发给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命令，倒不如说是故意说给台湾人民、台湾当局和美国人听的。命令中说：“**兵不厌诈，这不是诈。这是为了对付美国人的。这是民族大义，必须把中美界限分得清清楚楚。”“呆在台湾和台湾海峡的美国人，必须滚回去。他们赖在这里是没有理由的，不走是不行的。”“停停打打，确是如此，但非诡计。你们不要和谈，打是免不了的。”“金门海域，美国人不得护航。如有护航，立即开炮。切切此令！”**你看，这样的妙言妙语，真叫人百读不厌！

另：叶永烈在其《四人帮全传》一书中，论及1958年10月19日上午7时毛泽东在给陈伯达的信中，要陈伯达和张春桥一块去河南卫星公社进行调查工作时曾断言：“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在文件批示中，提到张春桥的大名——显然，那是因为张春桥的‘成名作’（指张春桥的《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给他留下了印象”。其实，叶永烈还不知道，毛泽东在此之前，就曾在河南省遂平县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上作过一个批示，他写的是：**“美妙如一首诗！我们的秀才伯达、春桥可否去看一看？”**由此可见，对于历史问题也应该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决不可妄加臆断的。史学工作者能不慎乎？

**第62章**

**“大跃进和公社化，搞得好可以互相促进，使中国的**

**落后面貌大为改观。搞得不好，也可能变成灾难。”**

话说1958年10月19日夜，美国海军船坞登陆舰“橡树山”号、驱逐舰“麦克凯恩”号、“汤马逊”号、“科格斯威尔”号，竟然放肆地侵入金门海域，为国民党军护航，时间长达5个小时。

毛泽东为了表明中国人民反对侵略的坚强意志和说话算数的严正立场，决定提前于10月20日16时在福建前线恢复炮击。

10月20日中午，周恩来给毛泽东送来一份书面报告，报告中说：

“警告美国在金门海域护航的新闻，已于今日12时半起广播，连续两次，中外文相同。新闻稿附后。国防部命令稿已写好，现送上请批阅后即退我，再以打字稿分送邓、陈、黄3同志核阅。厦门前线，一切准备好了，已分别以电话和文字命令下达，由克诚签发，并告以炮击只限于金门各岛的工事、阵地和滩头船只，不打民村、兵房和指挥机关，更不要误击美国船只。我空海军均不出动。国防部命令拟于3时广播，中外文语同时广播。以口头广播读完后，立即开炮。”

毛泽东读完了周恩来的报告，认真研究了《关于台湾当局在金门海域引进美舰护航必须恢复炮击以示惩罚的命令》。他在上面批示道：

“照办。”“口头广播后，隔一小时，或半小时，开始炮击，较为适宜。”

下午3时，《关于台湾当局在金门海域引进美舰护航必须恢复炮击以示惩罚的命令》以彭德怀的名义下达给福建前线部队。

下午4时，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以32个炮兵营又5个海岸炮兵连的火力，准时对金门实施了第5次大规模炮击。沉寂了14天的福建前线，顿时地动山摇，8800余发炮弹呼啸着直袭金门，击中国民党军“中”字号运输舰3艘、大型货船1艘、C-46型运输机1架、阵地及观察所10余处。国民党军被打得晕头转向，他们在70分钟后才开始还击。

10月21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到达台北访问。

《人民日报》编辑部就此写了一篇《咎由自取》的社论稿，评论说美蒋是在唱“双簧戏”。

毛泽东看了社论稿，批评说，这篇社论不适当地强调了美蒋一致。他要周恩来专门找吴冷西谈一次，然后另写一篇社论，重新评论蒋、杜会谈。

这天上午，周恩来打电话约吴冷西和乔冠华谈话，批评《人民日报》说的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中央的方针。他列举杜勒斯与蒋介石几次谈话的区别，对比台湾与美国报纸评论的明显不同，说杜勒斯访台是对蒋介石施加压力，要《人民日报》再写一篇社论，着重说明美国的阴谋和美蒋的争吵，可以点明蒋介石也不赞成搞两个中国。

下午，毛泽东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在讲话中说：

“《人民日报》的社论完全是书生气，对中央的方针理解片面，摇摇摆摆，不适当地强调了美蒋一致。**这次杜勒斯到台湾去，是要从金马撤兵，以换取我承诺不解放台湾，让美国把台湾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蒋介石不答应，反而要美国承担‘共同防御’金马的义务。两人吵了起来，结果各说各的理，不欢而散。**这完全不是唱双簧戏。”

毛泽东还说：

“美蒋关系存在着矛盾，美国人力图把蒋介石的‘中华民国’变成附庸国甚至托管地，蒋介石拼死也要自己的半独立性，这就发生矛盾。蒋介石和他的儿子蒋经国还有一点反美积极性。美国逼得急了，他们还是要反抗的。过去大骂胡适，罢黜孙立人，就是例证。因为他们捣乱的靠山是美国人。最近台北发生群众打砸美国大使馆更是例证。美国在台湾的驻军，蒋介石只同意美国派出团一级单位的兵力，不同意派师一级单位的兵力。我们炮打金门开始后，蒋介石只同意美国增加海军陆战队3000多人，而且驻在台南。

我前几天说过，我们同蒋介石有一些共同点。这次杜勒斯同蒋介石吵了一顿，说明我们可以在一定意义上联蒋抗美。**我们暂不解放台湾，可以使蒋介石放心同美国人闹独立性。我们不登陆金门，但又不答应美国人的所谓‘停火’，这更可以使美蒋吵起架来**。过去一个多月中我们的方针是打而不登，断而不死，现在仍然是打而不登，断而不死，更可以宽一些，以利于支持蒋介石抗美。”

与会者都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说：

“‘断’和‘打’是相关的，既然‘断’要放宽些，那么‘打’也得放松。”

毛泽东说：

**“我们索性宣布，只是单日打炮，双日不打炮。而且单日只打码头、机场，不打岛上工事、民房，打也是小打小闹，甚至连小打也不一定打。从军事上看，这似乎是开玩笑，中外战史上从未有过，但这是政治仗，政治仗就得这样打。**

现在我们手里只有手榴弹，没有原子弹，打金马蒋军好办，但跟手里有原子弹的美国人打仗，就不是好办法。**将来大家都有原子弹了，也很可能都不打原子弹。**”

刘少奇、邓小平提出，是否发表一个正式声明，宣布双日不打、单日打。毛泽东说：

“恐怕有这个必要。”

他又对吴冷西说：

“前边说的那篇社论，要在正式文告后才发表。”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又在中南海颐年堂听取刘子厚关于徐水调查的汇报。**刘子厚说，他在徐水县的调查中发现的问题主要是浮夸风和共产风：1亩白薯产量不过2000斤，却虚报成8000斤；把几个村的肥猪集中起来，让人参观，弄虚作假。**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他说：

“对虚报的人要进行教育，进行辩论，不要讲假话，有多少就是多少。要实事求是。把猪都并到一起，就不实事求是了。丰收有成绩，容易骄傲起来，铺张起来，不实事求是了。初看可以，经不起细看，经不起分析。要告诉县里，叫他们不要搞这一套，不要弄得好像什么都好。”

刘子厚汇报说，徐水把所有个人财产和私人债务统统“共了产”，在分配上实行完全的供给制。他们已经宣布徐水为全民所有制。毛泽东说：

“**徐水县实际上是集体所有，是扩大了范围的集体所有**。你们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了好，是徐水全民所有，不是全国的全民所有。它有两种不同，一是和过去合作社不同，一是和国营工业也还不同。”

他还说：

“交换问题要两个方向发展，一方面大范围的内部调拨要发展，另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商业要发展，一部分是调拨性质，一部分是商品交换性质，还是货币交易。**在分配问题上，不要把什么都包起来，多劳多得还是社会主义原则。**要把劳动力多的农户积极性调动起来，使他们收入多点，工资多点，不要平均主义。**家具可以不归公，这是一部分生活资料。吃饭集体，衣服、床、桌、凳等等不要集体嘛。对私人间的债务问题，一风吹，又一次‘共产’哩。这是劳动人民的劳动所得，把你的拿过来，这不是租借是侵略了。废除了，两方面不舒服，借钱的觉得对不起人，外借的也不舒服。这些账，我看还是以还为好。**”

刘子厚汇报到徐水的家庭生活问题，毛泽东深情地说：

“要大中小结合，阴阳五行还要讲嘛！**幸福院不幸福，老人们住在一起，见不到自己的儿女，没有中小，只有阴阳，就没有五行了。**”

毛泽东听说一些基层干部工作方法简单粗暴，捆人、打人的事情时有发生，十分生气，他批评说：

“**有捆人，打人，就是还有封建残余，是对敌我界限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相互关系没有搞清楚。一捆，二打，三骂，四斗，不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

10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大企业必须大搞群众运动》的社论。社论提出钢铁生产要展翅高飞，有两个翅膀，一个是大洋群，一个是小土群。必须反对唯条件论，大企业必须开展群众运动，**必须推行两参（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一改（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三结合（在党委的领导下，实行行政人员、技术人员和工人群众的密切结合）的经验。**

10月23日这一天，杜勒斯访台结束。经过多次争吵，美蒋双方签订了《蒋杜会谈公报》。《公报》中宣称：“在目前情况下，金门连同马祖的防务，是同台湾和澎湖的防务密切相关的。”杜勒斯的阴谋计划就此破产。

是日下午，毛泽东问身边的秘书林克：

“你知道人体内有多少重要的化学元素吗？”

林克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对于国际国内的问题，敢于毫无忌讳地直陈己见，但他没有想到毛泽东今天提出的这个与自己密切相关的生理问题却被难住了，弄得他一时木讷。毛泽东见林克答不出来，就掰着指头，把十几种主要元素一一道来，言毕，竟流露出孩童般的得意笑容。他吸了一口烟，又把话题转到细菌上。他说：

**“你看细菌是多么小啊，但它就是有那么一种从容不迫、坚决进攻、毫不在乎的精神。在任何庞然大物面前，它都无所畏惧。不管是厚厚的陶瓷、坚硬的钢铁，还是在沸水中、在零下几十度的低温下，它都不死，能够生存。我们是人，是万物之灵，难道还不如这小小的生物吗？**”

10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办好公共食堂》的社论。

社论根据刘少奇提出的“实现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这一口号说：办好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实现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和生活集体化的有效措施，是培养农民集体生活习惯和集体主义、共产主义思想觉悟的一个关键问题。

社论还强调说：公共食堂要在全国农村和城市普遍建立起来，使之成为人民的新的生活方式。

10月25日这一天，毛泽东给周世钊写了一封回信。

原来，周世钊在7月间当选为湖南省副省长，受任新职，思绪万千，于是他在10月17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陈述了自己的心理。毛泽东在复信中写道：

惇元兄：

赐书收到，10月17日的，读了高兴。受任新职，不要拈轻怕重，而要拈重鄙轻。古人有云：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二者不可得而兼。我看你这个人是可以兼的。年年月月日日时时感觉自己能力不行，实则是因为一不甚认识自己；二不甚理解客观事物——**那些留学生们，大教授们，人事纠纷，复杂心理，看不起你，口中不说，目笑存之，如此等类。这些社会常态，几乎人人要经历的。**此外，自己缺乏从政经验，临事而惧，陈力而后就列，这是好的。这些都是事实，可以理解的。**我认为聪明、老实二义，足以解决一切困难问题。**这些似乎同你谈过。**聪谓多问多思，实谓实事求是。持之以恒，行之有素，总是比较能够做好事情的。**你的勇气，看来比过去大有增加。士别三日，应当刮目相看了。我又讲了这一大篇，无非加一点油，添一点醋而已。

坐地日行八万里，蒋竹如讲得不对，是有数据的。地球直径约12500公里，以圆周率3.1416乘之，得约4万公里，即8万华里。这是地球的自转（即一天时间）里程。坐火车、轮船、汽车，要付代价，叫作旅行。坐地球，不付代价（即不买车票），日行8万华里，问人这是旅行吗？答曰不是，我一动也没有动。真是岂有此理！囿于习俗，迷信未除。完全的日常生活，许多人却以为怪。巡天，即谓我们这个太阳系（地球在内）每日每时都在银河系里穿来穿去。银河一河也，河则无限，“一千”言其多则已。我们人类只是“巡”在一条河中，“看”则可以无数。牛郎晋人，血吸虫病，蛊病，俗名鼓胀病，周秦汉累见书传。牛郎自然关心他的乡人，要问瘟神情况如何了。大熊星座，俗名牛郎星（是否记错了？），属银河系。这些解释，请向竹如道之。有不同意见，可以辩论。

11月我不一定在京，不见也可吧！

毛泽东 1958年10月25日

这天晚上，毛泽东又以彭德怀的名义起草了第3个文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再告台湾同胞书》，他写道：

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军民同胞们：

**我们完全明白，你们绝大多数都是爱国的，甘心做美国人奴隶的只有极少数。**同胞们，中国人的事只能由我们中国人自己解决。一时难以解决，可以从长商议。美国的政治掮客杜勒斯，爱管闲事，想从国共两党的历史纠纷这件事情中间插进一只手来，命令中国人做这样，做那样，损害中国人的利益，适合美国人的利益。就是说，第一步，孤立台湾；第二步，托管台湾。如不遂意，最毒辣的手段，都可以拿出来。**你们知道张作霖将军是怎样死去的吗？东北有一个皇姑屯，他就是在那里被人治死的。世界上的帝国主义分子都没有良心。美帝国主义者尤为凶恶，至少不下于治死张作霖的日本人。同胞们，我劝你们当心一点儿。我劝你们不要过于依人篱下，让人家把一切权柄都拿了去。我们两党间的事情很好办。**我已经命令福建前线，逢双日不打金门的飞机场、料罗湾的码头、海滩和船只，使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大小岛屿上的军民同胞都得到充分的供应，包括粮食、蔬菜、食油、燃料和军事装备在内，以利你们长期固守。**如有不足，只要你们开口，我们可以供应。化敌为友，此其时矣**。逢单日，你们的船只、飞机不要来。逢单日我们也不一定打炮，但是你们不要来，以免受到可能的损失。这样，一个月中有半月可以运输，供应可以无缺。**你们有些人怀疑，我们要瓦解你们军民之间官兵之间的团结。同胞们，不，我们希望你们加强团结，以便一致对外。打打停停，半打半停，不是诡计，而是当前具体情况下的正常产物。不打飞机场、码头、海滩、船只，仍以不引进美国人护航为条件。如有护航，不在此例。**

蒋杜会谈，你们吃了一点亏，你们只有代表“自由中国”发言的权力了；再加上小部分华侨，还许你们代表他们。美国人把你们封为一个小中国。10月23日，美国国务院发表10月16日杜勒斯预制的同英国一家广播公司所派记者的谈话，杜勒斯从台湾一起飞，谈话就发出来。他说，他看见了一个共产党人的中国，并且说，这个国家确实存在，愿意同它打交道，云云。谢天谢地，我们这个国家，算是被一位美国老爷看见了。这是一个大中国。**美国人迫于形势，改变了政策，把你们当作一个“事实上存在的政治单位”，其实并非当作一个国家。这种“事实上存在的政治单位”，在目前开始的第一个阶段，美国人还是需要的。这就是孤立台湾。第二个阶段，就要托管台湾了。国民党朋友们，难道你们还不感觉这种危险吗？出路何在？请你们想一想吧。**此次蒋杜会谈文告不过是个公报，没有法律效力，要摆脱是容易的，就看你们有无决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这一点我们是一致的。美国人强迫制造两个中国的伎俩，全中国人民，包括你们和海外侨胞在内，是绝对不容许其实现的。**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一切爱国者都有出路，不要怕什么帝国主义者。当然，我们并不劝你们马上同美国人决裂，这样想，是不现实的。**我们只是希望你们不要屈服于美国人的压力，随人俯仰，丧失主权，最后走到存身无地，被人丢到大海里去。我们这些话是好心，非恶意，将来你们会慢慢理解的。**

国防部长 彭德怀 1958年10月25日

10月26日，毛泽东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再告台湾同胞书》全文刊登在《人民日报》上。

后来，杜勒斯在华盛顿举行记者招待会，他对毛泽东起草的《再告台湾同胞书》发表了一通议论，说什么打打停停、半打半停的做法，是“离奇的”，也是“不文明的”。

10月26日上午，毛泽东找吴冷西、田家英谈话。吴冷西来到菊香书屋毛泽东的卧室，见田家英已经在座。他手里拿着吴冷西编辑好的毛泽东关于纸老虎言论的大样和按语。

原来在一个星期以前，毛泽东写信给吴冷西，要他将发表在《世界知识》上的《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一文在《人民日报》上予以转载，转载时可以另写编者按语，还要他就此与陆定一商量。吴冷西和陆定一商量后认为，毛泽东的论述还可以再增加一些，重写按语。于是，吴冷西就找田家英帮忙，增加一些毛泽东的有关论述，并一起草拟了《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按语，排出清样后，送毛泽东审定。

田家英将毛泽东修改过的按语交给吴冷西看。吴冷西看到毛泽东主要是对按语最后一段作了修改，还要求对其中的几段论述做一些调整。毛泽东见吴冷西看完了，就说：

“今天找你们来，是谈另一件事。我想派你们到地方上去做一次短期的调查研究。地点我已经选好了，就是河南新乡地区的一个县和一个公社。你们各带几个助手，分别先后去修武县和新乡县的七里营公社，了解公社化后的情况，时间一个星期。我将在11月初离京去郑州，在那里开一个小会，作为12月初在武昌召开八届六中全会的准备。你们11月5日在新乡搭乘我的专列去郑州。”

他还说：

“**中国今年出了两件大事，一是大跃进，一是公社化。其实还有第3件大事，这就是炮打金门。大跃进是我发动的，公社化是我提倡的。**这两件大事到8月间北戴河会议时达到高潮，但那时我的心思并没有全花在这两件大事上，很大一部分精力被国际问题吸引去了。早先是同赫鲁晓夫大吵了一顿，不久又炮打金门。我在这段时间想了许多国际问题，如戴高乐上台、黎巴嫩事件、紧张局势、封锁禁运，等等，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

毛泽东转对吴冷西说：

“你们办报的要经常研究国际问题，多同一些有见解的人交换看法，慢慢形成比较符合实际的观点。遇到国际上突发事件，就不致惶惶无主或临时抱佛脚，就可以抓住时机阐明我们的观点。

现在来谈国内问题，你们办报的也要心中有数。这就要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北戴河会议迄今已有两个月。国庆节前我去大江南北走马看花，除了给你们新华社写了一条新闻外，感到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认真研究。

**大跃进和公社化，搞得好可以互相促进，使中国的落后面貌大为改观。搞得不好，也可能变成灾难。**你们这次下去，主要是了解公社化后的情况。北戴河会议时我说过公社的优点是一大二公。**现在看来，人们的头脑发热，似乎越大越好，越公越好。你们要去的修武县，全县已成了一个公社。我还要派人去了解山东寿张县，听说那里准备苦战3年进入共产主义。**

我们共产党人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是没有问题的。现在的问题在于：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现在并不是人人认识一致，甚至在高级干部中也各说各的，其中有不少胡话。因此公社化过程中的具体做法，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你们这次下去调查，要带两本书，一本是中国人民大学编辑的《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本是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出发前要把这两本小册子通读一遍，至少把人民大学编的那一本看一遍，要你们的助手也这么办。”

毛泽东吸了一口烟，郑重地说：

“我的意思不是要你们搞本本主义，按图索骥，对号入座，也不是要你们照本本去宣传，而是想使你们对马恩列斯关于共产主义说过什么话有个大致的了解，下去调查中面对眼花缭乱的实际情况能够保持冷静的头脑。**特别当记者的，不能道听途说，人云亦云，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心中有数，头脑清醒，**做冷静的促进派。**报纸宣传影响大，人家头脑发热，搞报纸宣传的也头脑发热，那就坏事了。”**

毛泽东说罢，停顿了一会儿又转换了话题，他说：

“在炮打金马过程中，我们和美国人都搞边缘政策。美国集中了那么多的军舰，而且侵入我领海，给蒋介石船队护航，但又从不开炮。我们也是1万、2万发炮弹那么打，美舰护航时更大打，但只打蒋船队，不打美舰队，不过炮弹就落在美舰附近，吓得他们掉头就跑。双方在台湾海峡对峙，同时又在华沙会谈。美国人在这个战争边缘，我们在另一个战争边缘，双方都在战争的边缘，都不越过这边缘。我们用战争边缘政策对付美国人的战争边缘政策。

《聊斋志异》中写了很多不怕鬼的故事，其中有一篇名《青凤》，说的是狂生耿去病夜读于荒宅，‘一鬼披发入，面黑如漆，张目视生。生笑，染指砚墨自涂，灼灼然相与对视。鬼惭而去’。你不怕鬼，鬼也无可奈何。炮打金门的经过也是如此。”

毛泽东对吴冷西说：

“你们要善于抓动向。看来现在还不大懂。美国人想从金马脱身，杜勒斯谈话就显露了这个动向，你们没有抓住。你们编辑部也不大会写文章。”

他拿出这一天《人民日报》发表的《再告台湾同胞书》，以此为例，谈了如何写文章的意见。他说：

“1、**文章要有中心思想，最好是在文章的开头就提出来，也可以说是破题。**文告一开头就提出绝大多数人爱国，中国人的事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这个思想贯穿全篇。整个文告，从表面上看，似乎写得很拉杂，不连贯，但重在有内在联系，全篇抓住这个问题不放，中间虽然有穿插，但贯穿这个中心思想。《红楼梦》中描写刘姥姥进大观园就是这样写的。

2、**文章要形象化。**文告中不说‘沿海岛屿’，而说‘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大小岛屿’，不仅仅说‘供应’，而具体说‘包括粮食、蔬菜、食油、燃料和军事装备在内’，这就形象地给人深刻印象。你们写文章偏于抽象，一般化，缺乏生动性，看了留不下具体印象。

3、**文章要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两篇告台湾同胞书的文体就是这样。中国文字有自己独特的文法，不一定像西洋文字那样严格要求有主词、谓语、宾词。其实西洋人说话，也经常省去主词或宾词的。你们的文章洋腔洋调，中国人写文章没有中国味道，硬搬西洋文字的文法。这可能是看惯了翻译过来的西方文章。其实翻译也有各种译法，严复的译文就是中国古文式的，林琴南的译文完全是意译，都和现在的白话文译文大不相同。”

说话间，已经时过中午，毛泽东留吴冷西和田家英吃午饭。餐厅就在北房5开间的中间堂屋，大师傅加了两个菜，一个是小砂锅炖狗肉，一个是红烧狮子头，其它4个菜是湖南腊肉，豆豉炒辣椒，西红柿炒鸡蛋，麻婆豆腐，都是毛泽东常吃的。比较特别的是一个莼菜汤，每人一个烤得半焦的玉米。毛泽东端起一杯茅台酒，请吴冷西和田家英共同干杯。之后吴冷西和田家英也端起第2杯酒，一同祝毛泽东身体健康。

吴冷西因为工作原因，很少到基层去。田家英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也是难得下去走走。早在1958年中共中央号召干部下放时，有的省市负责人向毛泽东要求把田家英放到他们那里去，毛泽东说：“我是主张干部下放的，但田家英不能下放。在这个问题上，我是理论与实践不一致的。”因此，他们二人都缺乏调查研究的经验。所以毛泽东一边吃饭，一边向他们传授下基层搞调查研究的经验。他交代说：

“**你们下去调查不要各级领导作陪，要找生产队长就只找生产队长，不要公社书记、大队长参加。要找群众谈话就不要找干部参加。要找县委书记也只请他本人来谈。**因为人多了谈话就有顾虑。同级干部如此，上级干部更如此。**找群众谈话要有各个阶层的人物，尤其要注意中农的态度。还可以找下放干部谈话，他们可能顾虑较少。**总之，要了解各种人的真实想法。**助手中可以选一两位女同志，那样同农村妇女谈话比较方便**。你们下去不要张扬，冷西带的一组用新华社记者的名义，家英带的一组用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的名义。”

吴冷西和田家英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于10月28日带领调查组乘车南下，第二天就到了新乡。

10月27日下午，毛泽东由郭沫若、张劲夫陪同，在中关村参观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成果展览。竺可桢在他的日记中记载了毛泽东这次参观的大致过程：

“3时40分，**毛主席来，先到3楼看人造卫星和自动控制等**。至5点多始至2楼，限于时间故极匆促。由郭院长、张副院长等陪同环视生物学部、地学部和综考会展出部分一周。见地学部展出的广西喀斯特模型云，问传说桂林山水甲天下，但模型却不好看。见大地构造模型，问了许多问题。见综合考察的吐鲁番模型，问火焰山是什么？6点半看毕回。”

毛泽东在参观中肯定了展出的科研大搞群众运动的成绩，他鼓励钱学森说：

**“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

10月29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转发陈毅、李富春《关于加强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工作领导的请示报告》的批示，全文如下：

中央各部、委，国务院各办、各部、委党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中央同意陈毅同志和李富春同志《关于加强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工作领导的请示报告》，现在转发给你们，请各有关地区和部门研究执行。

**认真做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工作，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也是我国人民对兄弟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的人民应尽的国际义务。这对于增进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繁荣，发展我国同民族主义国家的友好关系，和打击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的侵略和扩张活动，具有重大的意义。**随着我国经济、技术力量的增长和国际影响的扩大，我国援外任务势必日趋繁重，担负援外任务的部门和地区将会越来越多。中央要求凡是担负援外任务的部门和地区都必须本着大跃进的精神，认真、切实、按期地完成自己所担负的任务，决不应该借口国内任务紧迫而放松甚至挤掉援外工作。因为援外工作中的任何一点差错，都可能造成政治上的不良影响。此点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我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主要对象，应该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经济还不够发达的兄弟国家和亚非地区已经取得民族独立或者正在争取民族独立的和平中立国家。**对于这些国家，我们应该根据对方的要求和我国在经济、技术方面的可能，给予他们适当的援助，加强他们的经济力量，为了使我国给予的经济、技术援助，能够迅速地显示功效，今后我们的援外工作，必须按照这些国家的具体情况，采取因地制宜，以中、小为主和土洋结合的方法，帮助他们建立起自己的工业基础。**我们援助他们的目的，不是造成他们对我们的依赖，而是帮助和推动他们自力更生。**

援外工作是一项复杂和艰巨的组织工作。每一项援外任务完成的全部过程，不仅涉及援助国内许多部门和地区，而且同受援国家人力物力的动员，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只有坚决贯彻援外工作在国内、国外的统一领导，充分发扬分工负责和密切协作的精神，才能有效地、准确地保证每一项援外任务的完成。

关于我国援外工作的体制，即按报告中提出的原则进行调整。原有的援蒙委员会、援柬委员会和各援外工作的领导小组应该根据援助工作的情况，逐步移交有关部委，逐步取消。

中央 1958年10月29日

10月31日凌晨，毛泽东写信给周恩来、陈毅、黄克诚，他写道：

恩来、陈毅、克诚同志：

应将逢双日不打的地方加以推广，就是说，逢双日一律不打炮，使蒋军可以出来活动，晒晒太阳，以利持久。只在单日略为打一点炮。由内部通知福建实行，暂不再发声明。待有必要，再考虑发一声明。此事，请你们商量酌定。

我今日下午南下。

毛泽东 10月31日上午2时

10月31日傍晚，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南下。

1958年11月1日下午，毛泽东的专列在新乡火车站稍作停留。

吴冷西和田家英一起上了毛泽东的专列，见到毛泽东正在听取新乡地委和几位县委干部的汇报。毛泽东叫他俩先行休息，待到郑州后再听他们的汇报。二人去后，毛泽东在河南省委书记史向生陪同下，继续同新乡地委书记耿起昌和几位县委书记谈话，他对林县县委书记杨贵说：

“林县的杨贵，我知道你，听说你治水很有一套嘛！”

杨贵谦虚地说：

“我做得很不够，目前林县还有一些人吃不上水呀！”

毛泽东问杨贵：

“你们一天能炼多少吨钢铁？”

杨贵说：

“大约二三百吨，但绝大多数是硫铁，铁渣也不少。”

毛泽东又问：

“灰生铁有多少？”

杨贵如实地说：

“不到10吨，而且大部分是用回收的废铁和砸碎的铁锅投炉的。”

史向生、耿其昌见杨贵如此说，都捏着一把冷汗：眼下正是党中央发动全民炼钢运动的高潮，省里又在反右倾，杨贵实话实说，嘴上也不把着点门儿。毛泽东把目光投向四座，问道：

“杨贵同志刚才讲的情况，是不是带有普遍性啊？”

史向生见毛泽东发问，不敢再隐瞒了，只好说：

“据了解，各个钢铁基地现在炼出的铁大体都是这样。”

毛泽东轻轻地点了点头，问杨贵：

“林县有多少人？”

“60多万。”

“林县有林吗？”

杨贵回答说：

“山上土薄石厚，原有一部分自然林，这次大办钢铁砍了不少。”

毛泽东又问：

“办钢铁你们上了多少人？”

“地委让我们上15万人，我们目前只上了五六万。”

“五六万人怎么住啊？”

“都住在野地里。”

毛泽东的表情立刻严肃起来，他说：

“五六万人住在野地里，生病的多不多？”

杨贵说：

“现在还不多，但已经有了苗头。”

毛泽东做了一个不赞成的手势说：

“天冷了，那么多人睡在野地里，冻病了怎么办？”

杨贵又趁机汇报说：

“林县兴修了水利工程，今年的秋粮作物获得了大丰产，可惜不能全部收回来……”

“这是怎么回事儿啊？”

毛泽东追问道。杨贵说：

“精壮劳力出来办钢铁，庄稼顾不上收，棉花顾不上摘。群众住在野地里，大便都用棉花擦屁股，眼看着雪白的棉花被糟蹋了。”

毛泽东的目光扫视了一下史向生、耿其昌等人，严肃地指示道：

“**好不容易修了水渠和水库，长了好庄稼，却没有人收。这怎么能行呢？大炼钢铁不能再上人了，已经上去的留下少数人建设小高炉，其他人马上撤下来！一部分人收庄稼，一部分人搞水利，要知道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要把农业搞上去，必须大兴水利。**”

11月2日，毛泽东到了郑州。

是日下午，毛泽东找河北的林铁，河南的吴芝圃，山西的陶鲁笳，陕西的张德生，甘肃的张仲良这5个省委第一书记，还有陈伯达等人，到专列上开会。一见面，他就面带笑容地说：

“噢，还是老人手。你们有什么新闻？”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议论了一番。陈伯达则汇报了他在河南调查的情况，讲到了要废除商品生产，以劳动券代替人民币等一些奇谈怪论。毛泽东听后沉默不语。

这一天，周恩来在北京接到毛泽东的秘书打来的电话，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说：

“建议明日（逢单）大打1天，打1万发以上，对一切军事目标都打，以影响美国选举，争取民主党获胜，挫败共和党。同时使蒋军得到拒绝撤兵的口实，是否适宜，请加酌定。”

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亲自起草了广播稿，与有关人员商量后，确定了广播稿的内容如下：

金门群岛军民同胞们注意：

今日11月2日，是个双日，我们一炮不打，你们得到补给。明日，11月3日，是个单日，你们千万不要出来。注意，注意！

福建前线部队司令部奉命向金门同胞反复作了广播预告。

11月3日，福建前线部队集中33个营又1个连，对金门实施了第6次大规模炮击。

不久，毛泽东又起草了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三告台湾同胞书》，全文如下：

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军民同胞们：

鉴于金门群岛国民党军队广大官兵的良好反映，**本部关于双日停止炮击金门飞机场、料罗湾的码头、海滩和船只这4种军事目标的规定，现在宣告推广到其它一切地区的军事目标，逢双日都不打炮，打炮一律于单日行之。有些目标，例如飞机场、料罗湾的码头、海滩和船只，单日也不一定打炮，但你们的飞机、船只以不来为宜，免受可能的损失。禁止美国人护航，仍如历次文告所规定。**周恩来总理两年以前即向你们建议举行和谈，合理解决国共两党历史纠纷，和平解放台湾地区，未获你们积极响应。美国人下死劲钳制台湾当局，不许他们和我们举行和谈，一心一意要干涉中国内政。美国人非常惧怕和平，非常惧怕国共两党重新接近，谈出一个和平局面来，妨碍他们孤立台湾和托管台湾的阴谋计划。我们必须击破这个计划。**我们希望台湾当局有一天甩掉美国人那只钳制魔手，派出代表，举行和谈。我们的和谈是真和谈，谈成了，内战就可以宣告结束，全体中国人团结起来，一致对付外来的威胁，岂不是一件好事吗？**美国人同国民党之间的所谓团结、互信云云，讲讲而已，归根到底是靠不住的。尽管申明一千次，连你们自己也不相信。同胞们，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相信，在美国人要把国民党置之死地的时候，国民党就会觉悟过来，和谈就有可能成功，对于这件事悲观是没有根据的。亲美派散布出来的一切悲观言论，希望你们最好不要听。

国防部长 彭德怀 1958年11月

后来由于形势的发展变化，毛泽东改变了主意，这个《三告台湾同胞书》就没有发出。

再说11月3日下午，毛泽东在专列上召集9个省委第一书记开会，听取他们关于人民公社问题的汇报。这9个第一书记除了河北、山西、陕西、甘肃、河南5省外，还有：湖北的王任重，山东的舒同，安徽的曾希圣，湖南的周小舟。吴芝圃汇报说：

“关于交换的问题，有些东西是调拨，交换的范围缩小了。”

陈伯达说：

“现金结算减少了。遂平县现金结算，去年占70%，今年倒过来，非现金结算占70%。”

毛泽东说：

“现金结算，非现金结算，是一回事嘛！”

陈伯达说：

“是一件事，但不用货币来往了，有性质上的不同，没有货币流通了。”

毛泽东说：

“外国资本家每天数钞票，谁去数呀？还不是银行里头算一算账。资本家交换货物，哪一个见现金？我们现在也是这样，就是不数票子。当然，性质不同。我也没有学过货币学。”

曾希圣说：

“我们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单是生产粮食的地区，货币很少，没有货币流通了。经济作物地区货币多，货币比较容易流通。”

毛泽东说：

“必须使每个公社，并且使每个生产队，除了生产粮食以外，都要生产商品作物。西安会议没有提倡这个事，他们一心一意要取消商业。”

毛泽东所说的西安会议，是指10月份在西安召开的农业协作会议，有人在会议上提出要取消商业、消灭货币的意见。他接着说道：

**“每一个人民公社除生产粮食以外，必须大量生产经济作物，能够赚钱的，能够交换的，有农业品，有工业品，总之是生产商品。这个问题不提倡，以为人民公社就是个国家，完全都自给，哪有这个事？**生产总是分工的。大的分工就是工业、农业。既有分工，搞工业的就不能生产粮食、棉花、油料，他就没有吃的，只好交换。”

“三国时候，张鲁的‘社会主义’是行不长的。因为他不搞工业，农业也不发达。曹操把他灭了。他也搞过吃饭不要钱，凡是过路的人，在饭铺里头吃饭、吃肉都不要钱。他不是在整个社会都搞，只在饭铺里头搞。他统治了30年，人们都高兴那个制度，那里有一种社会主义作风。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由来已久了。”

吴芝圃在汇报家庭问题时反映说：有人提出，在共产主义实现以前就消灭家庭。毛泽东说：

**“现在不是消灭家庭，而是废除家长制。废除家长制，肯定不是废除家庭制度。**”

有人提出，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已经过时了，应该搞一个新的四十条。毛泽东同意了，他指定由吴芝圃负总责，下分工业、农业、教育科学文化、公社体制4个小组，分别由王任重、曾希圣、舒同、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负责。从4日起开始讨论，7日拿出初稿。

11月4日下午，毛泽东同9个省委第一书记及陈伯达等人在专列上继续开会，听取新四十条起草情况的汇报。吴芝圃汇报说：议了一个题目，叫“人民公社发展纲要四十条”，第二个题目叫“共产主义建设十年规划纲要”。毛泽东说：

“你现在涉及到共产主义，这个问题就大了，全世界都不理解了。现在的题目，我看还是社会主义。不要一扯就扯到共产主义。”

吴芝圃接受毛泽东的意见，把“共产主义建设十年规划纲要”这个题目改成为“全国的十年建设规划”。

吴芝圃在汇报他们议定的工业、农业发展指标说：十年内，钢产量达到4亿吨，机床1千万台，煤40亿吨，粮食亩产由原定的400斤、500斤、800斤，分别提高到4000斤、5000斤、8000斤，叫“新四、五、八”。

毛泽东听了这些吓人的高指标，说道：

“我看这个文件要发表，要过了苦战3年之后。你这是内部盘子吧，不写在文件上吧？”

他又说：

“我们要研究公社的性质、交换、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这些问题，可以参考的材料还是斯大林那本《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我大体看了一下，可以找几十本在这里发一下。我们现在看，跟发表的时候看不同了。发表的时候，我们谁也不想这些问题。”“我看，他那个东西是有些问题，但是还是可以值得研究，不要轻易否定那个东西。”

毛泽东又说，因为要搞全国的十年建设规划，可以进一步扩大会议规模，请上海的柯庆施、广东的陶铸、东北的欧阳钦、四川的李井泉，还有中央分管农业和工业的谭震林、李富春等参加会议。

11月5日，毛泽东在专列上主持会议继续进行，新参加的人员有李富春、柯庆施、欧阳钦、吴冷西等人。柯庆施反映说：城市里有些混乱，市民提银行存款，抢购商品，怕废除票子。毛泽东说：

“陈伯达就有这个倾向。”

史向生提到了“共产风”的问题，毛泽东说：

“修武一县一社，它的东西在县的范围可以调拨，但河南省去调就不行，国家调更不行。修武的粮，七里营的棉，是要交换的，不能调拨。不要把修武、徐水、遂平与鞍钢、上钢、上海国棉一厂混同了。”

史向生问道：

**“人民公社到底是什么所有制？”**

毛泽东说：

**“总不能说全民所有制。可以说县全民所有制，小全民所有制，大集体所有制。把全民、集体混起来，恐怕不利。**好像我们现在差不多了，共产主义已经来了。这么快，太快了！奋斗太容易了！把它们提得过高，跟鞍钢一样，而实际上不是，就不好了。这是客观规律。

**我现在顾虑，我们在北戴河开那个口子，说少者三四年，多者五六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即由集体所有制搞成全民所有制，像工厂那样，是不是开了海口？讲快了？北戴河决议要有点修改才好。**”

11月6日，毛泽东在专列上听了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和中央办公厅干部下放到荥阳的工作团的领导汇报后，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问题放心不下，反复问：

“有什么问题没有？不要只说成绩，我想知道有什么问题没有？”

大家没有反映问题，只是说好。毛泽东只好决定召开一个座谈会，说是要和基层的同志直接谈谈。于是，叶子龙就到了荥阳，把正在田野里弄土高炉、炼钢铁的十几个工作队员接到了郑州。这些干部带着一身煤黑和矿灰，上了专列。毛泽东、谭震林、廖鲁言同他们进行了座谈，没有想到，他们也是一片声的说好。毛泽东扭头看见了胡秀云，他盯着胡秀云问：

“小胡，你说说，有什么问题没有？”

胡秀云说：

“反正我看妇女挺高兴的。原来围着锅台转，现在吃大食堂，解放了。”

毛泽东笑着说：

**“你是不是吹牛呢？大锅菜炒出来就是不如小锅菜炒出来香嘛。”**

大家一听都楞住了。胡秀云可能是受到了毛泽东的影响，忽然也冒出来一句，她说：

**“我就是纳闷，怎么晚上还说是亩产400斤，到了早上就变成了1000斤了？有些干部一个比一个能吹。”**

许多人一听此言，脸色都变了。毛泽东仍然是一脸微笑，他望望吴芝圃，又望望谭震林和廖鲁言，说：

**“你们到底是放卫星啊，还是在放大炮？”**

众人都有些尴尬，谁也没有正面回答问题。正在此时，有人拿来了大食堂的面包，说是请毛泽东和大家尝尝。面包是用白面玉米面混合做成的，大家都说不错。送面包的人还说：

“社员们就是吃这种面包。”

11月6日晚上，毛泽东要吴冷西和田家英在他的专列上汇报调查的情况。吴冷西说：

“我先到的修武县，那里的县委书记提出了一些问题，他认为修武县虽说一县一社是全民所有制，但公社和国家的关系，不同于国营工厂和国家的关系，公社的产品不能全部由国家调拨，国家也不能供给公社需要的所有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他提出：如果公社实行同国营工厂一样的全民所有制，那么，有两个问题他担心不易解决：一是遇到灾年，国家能否跟平年一样拨给公社所需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二是遇到丰年，国家能否全部收购公社的产品。这位县委书记既怕灾年饥荒，又怕丰年谷贱伤农。他还怀疑他们施行的低标准的供给制度，能否叫作按需分配。我说这只能算是勉强的温饱。”

毛泽东问道：

“县里同国家的经济关系，互相间进行哪些交换？”

吴冷西说：

“修武县同国家的经济往来主要有两种，一是纳税，主要是农业税即公粮，工商税不多。二是交换，主要是向国家交售统购的粮棉油等农产品，和向国家购买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这两种交换都是商品交换，现金结算。”

毛泽东说：

**“一县一社恐怕太大了，县委管不了那么多具体的事，而且全县各地生产水平很不平衡，平均分配会损害富队的积极性。我们现在还是搞社会主义，还是要按劳分配。**凡是有利于发展生产的就干，一切不利于发展生产的就不要干。**供给制只能搞公共食堂，而且要加强管理，粗细粮搭配，干稀搭配，农忙农闲不同，要学会勤俭过日子，不能放开肚皮大吃大喝，那样肯定维持不下去。**其它只搞些公共福利事业，不要采取包的办法，量力而为。**延安时期的供给制，是属于战时共产主义的办法，是不得已而为之，不能作为分配方式的榜样，所以全国解放后就改行工资制了。**

**修武不同于鞍钢，产品不能调拨，只能进行商品交换，不能称为全民所有制只能叫作集体所有制，千万不能把两者混同起来**。修武县委书记提出的问题，表明他实际上是不赞成搞全民所有制的。县里的产品不能全部调拨给国家，不可能也不必要。他作为一县之长，不能不慎重考虑。尤其是国家对于县，在平常年景也不能完全按照县里的需要调给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遇到灾年更加不能保证，这也是明摆着的。他提出的问题使我们想到：**如果生产力没有高度发展，像北戴河会议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中指出的，产品极为丰富，工业和农业都高度机械化，那么，生产关系上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分配方式从按劳分配过渡到按需分配，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两种所有制的接近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

毛泽东对供给制很关心，在田家英汇报时，他询问了七里营公社的十六包的具体内容，还说这样的低标准的平均分配，是否必要和能否持久。田家英说：

“七里营的十六包，是新乡地区包得最多的，但标准仍然很低。‘食’是吃饭不要钱，都吃公共食堂，菜肉不计，估计一年每人需42元。‘衣’一项是1年每人21尺布、2斤棉花、2双布鞋，共18元钱。医药费每人每年以2元为限。产妇补助1斤红糖、20个鸡蛋。殡葬和结婚各补助10元。看戏不要钱，今年只看了1次戏、6次电影。”

**吴冷西和田家英都汇报说：有些公社实行军事化管理，搞集体住宿，男女老幼分开住，夫妻实行礼拜六回原来的家度周末制度，河南许多地方都这样做，并说这是因为中央负责人就说过：共产主义社会也要革家庭的命。毛泽东听了非常生气，他说：**

**“那种搞法不是给国民党对我们的污蔑帮了忙吗？凡是这样胡搞的地方，我都支持群众起来造反。这些干部头脑发昏了，怎么共产党不要家庭呢？要禁止拆散家庭，还是一家人大中小结合为好。”**

毛泽东听说群众大炼钢铁干劲很大，地里庄稼没有人收，就说：

**“1070万吨的指标可能闹得天下大乱。从北戴河会议到年底只有4个月，几千万人上山，农业可能丰产不丰收，食堂又放开肚皮吃，这怎么得了？这次郑州会议要叫大家冷静下来。**

你们这次下乡调查才一个星期，但发现了坐在北京办公室里想都想不出的问题，是不是头脑比一个星期前冷静一些了？是不是发现许多实际做法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群众运动发动起来以后，一定要注意保持冷静头脑，善于看出运动中过激的苗头。

**这次我派陈伯达到遂平去，他回来却向我宣传要取消商品交换，实行产品调拨。他过去到过寿张，很欣赏那里苦战3年向共产主义过渡。我们有些同志读了不少马列主义的书，但临到实际问题，马列主义就不知道哪里去了。**

看来很有必要读一点书，我打算在郑州会议上同到会的同志一起读一本书，就是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面读书，一面联系当前我国的经济问题，边读边议，使大家头脑清醒起来。”

毛泽东又对吴冷西说：

“《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天天做报道，发议论，尤其要注意头脑冷静。要当促进派，但要当冷静的促进派，不能做冒失的促进派。我对报纸宣传还有一些意见，过几天有空时再谈。”

欲知此后的会议如何进行，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58年不知开了多少次会议，作了多少次报告？写了多少篇文章，跑过多少地方？多少次和部下促膝谈心，花费了多少心血？这一切努力，无非都是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制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不断地促进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毋庸置疑，**他确实是把大跃进作为一次前所未有的大战役指挥的。如果他的战友们都能脚踏实地、实事求是，不邀功，不浮夸，做好每一个战术配合，那么大跃进将是一个多么辉煌的战役啊！**可惜的是历史上从来没有那么多如果。**阳春白雪，和者盖寡。毛泽东走得太快了，结果大跃进变成了他一个人指挥的战役，甚至可以说他是在和他的一些部下作战（你若不信，请继续往下看）。**可是在毛公身后，却有人闭口不谈大跃进的伟大成就，而对于大跃进中某些方面的失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甚而至于把他们自己的错误强加在毛公身上，处心积虑地制造了一个人类历史上的最大冤案！

**第63章**

**“现在有几十万以至几百万干部头脑发热，有必要组织大家学习这**

**本书和另一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以澄清许多糊涂观念，**

**保持头脑清醒，否则，急于过渡，搞产品调拨，农民会起来造反的。**”

再说毛泽东和吴冷西、田家英谈话结束后，将这天晚上的中央工作会议从专列上移到了河南省委招待所继续进行。刘少奇、陈云、邓小平、谭震林、杨尚昆等人都来了，参加了会议。

毛泽东在会议上提议由邓小平代替吴芝圃主持新四十条的起草工作。并提议搞一个《郑州会议纪要》。他认为，四十条纲要，问题甚大，建议把时间拉长，将十年改为十五年，将文件定名为《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

他提出3个问题要大家研究：第一、什么叫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什么叫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实现这些过渡需要什么条件，要多长时间？第二、研究钢生产的指标。第三、城市人民公社如何搞？

1958年11月7日晚上，郑州会议在省委招待所继续进行。

11月8日，邓小平主持补充、修改过的《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略作修改后，送还邓小平阅。

11月9日上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就《纲要四十条》有关内容发表了意见，提出了几个重要问题。

第一、关于家庭问题，毛泽东主张在纲要里写进这样的话：“**废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不合理的家长制。在住宅方面，注意使住房适宜于每个家庭的男女老幼的团聚。**”

第二、关于商品问题，毛泽东说：

“许多人避而不谈商品和商业问题，好像不如此就不是共产主义似的。**人民公社必须生产适宜于交换的社会主义商品，以便逐步提高每个人的工资。在生活资料方面，发展社会主义的商业，并且利用价值法则的形式，在过渡时期内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以利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

“列宁曾经大力提倡发展商业，因为苏联那时城乡商品流通有断流的危险。我们在1950年也曾有过这种危险。现在运输情况不好，出现半断流的状态。我看要向两方面发展：一是扩大调拨，一是扩大商品生产。不如此，就不能发工资，不能提高生活。”

第三、关于资产阶级法权问题，毛泽东说：

“**有一些资产阶级法权必须破除，例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这些方面，必须天天破除。破了又生，生了又破。干群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猫鼠关系和父子关系，这些东西都必须破除，彻底破除。**但有一部分，则是应该保留的，如保留适当的工资制和一些必要的差别，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等。**”

第四、关于高指标问题，纲要中提出到1967年要达到年产4亿吨钢。毛泽东问：

“许多问题，我不清楚你们是根据什么这样提的。工业方面为什么搞4亿吨钢？到1962年搞多少吨？”

有人回答说：1亿吨。毛泽东说：

**“5年就增长3亿吨，怎么增法？”“现在有些问题相当混乱。不仅在公社方面，就是在中央、省、地这3级里头，都相当混乱。钢、机床、煤、电4项高指标吓人，**四十条发到哪一级，要做政治考虑。”

第五、关于工作方法问题，毛泽东说：

“第四十条，一大堆观点，使人看了不满意。**中心是要解决实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不要捆人、打人、骂人、辩论人、罚苦工，动不动‘辩你一家伙’。要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人民日报》最好要冷一点。**要把解决工作方法问题当成重点，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实事求是。”

尔后，毛泽东把话题转到了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上，他要求省委常委、地委常委以上干部都要研究其中的第一、二、三章。他还说：

**“必须肯定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有积极作用。调拨的产品只是一部分，多数产品是通过买卖进行商品交换。”**

**“现在有一种偏向，好像共产主义越快越好。实现共产主义是要有步骤的。山东范县提出两年实现共产主义，要派人去调查一下。现在有些人总是想在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我看还是慢一点好。”**

毛泽东批评河南省提出的要4年过渡到共产主义，说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太多”了。

11月9日这一天，毛泽东还写了一封关于读书问题的建议信。他在信中写道：

同志们：

此信送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这4级党的委员会的委员同志们。

不为别的，单为一件事：向同志们建议读两本书。一本，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每人每本用心读3遍，随读随想，加以分析，哪些是正确的（我以为这是主要的）；哪些说得不正确，或者不大正确，或者模糊影响。作者对于所要说的问题，在某些点上，自己并不甚清楚。读时，三五个人为一组，逐章逐节加以讨论，有两至三个月，也就可能读通了。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现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的思想，读这两本书就有可能给予澄清。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同志，在最近几个月内，就是如此。他们在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候是马克思主义者，一临到目前经济实践中某些具体问题，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就打了折扣了。**现在需要读书和辩论，以期对一切同志有益。为此目的，我建议你们读这两本书。将来有时间，可以再读一本，就是苏联同志们编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乡级同志如有兴趣，也可以读。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读这类书最有兴趣，同志们觉得如何呢？

毛泽东 1958年11月9日于郑州

原先毛泽东提议起草的《郑州会议纪要》已经在11月7日形成了初稿，毛泽东连续改过了两遍，并把文件名称改成了《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

11月10日，毛泽东先后在上午和下午发表了两次讲话，谈他对《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修改意见及对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的看法，批评了混淆集体所有制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和取消商品的错误观点。这些讲话实际上是对第1次郑州会议的总结。关于所有制，毛泽东说：

“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形式的界限，必须分清，不能混淆。听说徐水县已经把人民公社宣布为全民所有制，实际上最多也只是大集体所有制，同全民所有制还是根本不同的。**我们决不能把集体所有制同全民所有制混同起来，把人民公社与国营工厂混同起来。不要像徐水县委书记那样急急忙忙往前闯。**不愿划这条线的人，认为现在时间已到，已经上了天，集体所有制可以立即宣布为全民所有制，可以立即进入共产主义，谁不赞成，就说谁是右倾。事实上，我们现在只是一部分是全民所有制，农村大部分还是集体所有制。即使将来把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搞成了单一的全民所有制，如国有工业那样，它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也还不能马上过渡到共产主义。”

**“现在的人民公社仍然是集体所有制，还不是全民所有制。我国现阶段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而不是共产主义社会。即使将来全国实现全民所有制，也不等于实行共产主义。”**

毛泽东针对不要商品生产的错误思想，说道：

“现在仍然是农民问题。有些同志忽然把农民的觉悟看得很高，以为农民是第一，工人是第二了，农民甚至比工人还高，是老大哥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是农民唯一可以接受的形式。我们没有宣布土地国有，而是宣布土地、种子、牲畜、大小农具社有。这一段时期内，只有经过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才能引导农民发展生产，进入全民所有制。

**我们的商品生产制度，不是为了利润，而是为了发展生产，为了巩固工农联盟。如果废除商业，实行调拨，那就是剥夺农民。中国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一个国家，商品生产不是要消灭，而是要大大发展。”**

**“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为什么怕商品生产？无非是怕资本主义。现在是国家同人民公社做生意，早已排除资本主义，怕商品生产做什么？不要怕，我看要大大发展商品生产。”

“有的同志读马克思主义教科书时是马克思主义者，一碰到实际问题即要打折扣。”“于是小心谨慎，避开使用还有积极意义的资本主义范畴——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第三十六条的写法就是证据，尽量用不明显的词句，来蒙混过关，以便显得农民进入共产主义了。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不彻底、不严肃的态度。这是关系到几亿农民的事。”

“只要存在两种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商品生产就必然存在，并且极其有用。所谓商品，不光包括个人消费品，而且包括一部分生产资料。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消灭商品之势，一提商品就发愁，就觉得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分清社会主义商品和资本主义商品的区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生产的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是不认识5亿农民的问题。在社会主义时期，应当利用商品生产来团结几亿农民。**我以为有了人民公社以后，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更要发展，要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例如畜产品、大豆、黄麻、肠衣、果木、皮毛。**

现在有人向往共产主义，倾向不要商业了，至少有几十万人不要商业了。这个观点是错误的，这是违背客观法则的。我们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表现得更‘左’，主张现在就消灭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这种观点是违反客观规律的。如果不实行商品交换，把陕西的核桃拿来吃，陕西的农民干吗？把七里营的棉花无代价的调出来行吗？你如果这样做，马上就要打破脑袋。有些同志虽然没有像苏联那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那样直截了当地说，要剥夺农村中的中小生产者，而他们说的却是要废除商品实行调拨。如果这样做，实质上就是剥夺农民。如果照他们的意见去办，在政策上犯了错误，就有脱离农民的危险。”

毛泽东带领与会者们逐段逐章的读斯大林撰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小册子，上午和下午都是边读边议。他还说：

“这本书，省委、地委的同志都要好好地读，都要研究，过去大家看了印象不深，现在应当结合中国的实际加以研究。**现在有几十万以至几百万干部头脑发热，有必要组织大家学习这本书和另一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以澄清许多糊涂观念，保持头脑清醒，否则，急于过渡，搞产品调拨，农民会起来造反的。**”

毛泽东根据斯大林小册子的章节，发表了不少评论。斯大林在这本书里说，生产资料不是商品。这是斯大林的一个重要观点。毛泽东提出了与斯大林相反的观点，他说：

“这个观点是值得研究的。在中国农业生产上，有很多生产资料还应是商品。只要有两种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存在，生产资料不可能不作为商品。”

他在谈到斯大林关于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必须具备3个基本先决条件这一观点时，说道：

“缺点是没有讲一个政治条件，没有讲用一套什么办法来实现这3个条件。”“只谈经济关系，不谈政治挂帅，不讲群众运动。不讲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不对资产阶级法权进行分析，哪些应当破除，如何破除，哪些应当限制，如何限制。”

“如果没有政治挂帅，没有定期的整风运动，没有逐步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没有办工业、办农业、办文化的群众运动，没有几个同时并举，斯大林这3个先决条件是不容易达到的。”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认为，生产关系包括所有制、劳动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分配形式3个方面。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解决了所有制问题以后，人们在劳动生产中的平等关系是不会自然出现的。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一定要从各方面妨碍这种平等关系的形成和发展。”

毛泽东认为对书本还有个鉴别的问题，他在谈到对待书本的态度问题时说：

“把纣王、秦始皇、曹操看做坏人是错误的，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纣王伐徐州之役，打了胜仗，但损失很大，俘虏太多，消化不了，周武王乘虚进攻，大批俘虏倒戈，结果使商朝亡了国。史书说：周武王伐纣，‘血流漂杵’，这是夸张的说法。孟子不相信这个说法，他说：‘尽信书，不如无书。’”

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评论，无不使与会者和党内外干部们大吃一惊，而且是耳目一新。

11月10日，秘书将新华社编印的第2504期《参考资料》，送到了毛泽东手上。毛泽东认真地阅读着。资料中有两篇题目为《美官员竭力污蔑我人民公社运动，但承认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南十分注意这一发展》。这两篇资料引用了合众国际社的电讯内容，其一是说：

“毛泽东已经使他的国家野心勃勃地执行过去从来没有执行的共产主义原则。这比苏联曾试过的任何办法要厉害得多，而中国的统治者们的成败，取决于这个办法是否成功。”

毛泽东一边看，一边在这些话下面划了横线，有的还画了着重号。他又在这则电讯的开头和旁边，写下了唐朝诗人刘禹锡的一首诗：

高髻云鬟宫样妆，春风一曲杜韦娘。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苏州刺史肠。

郑州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对陈伯达说：

“你马列主义没学好，你到广州去向陶铸同志学习！”

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人在会议结束后返回北京，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通报会议精神。

11月11日，毛泽东在河南省委第2招待所召集新乡、许昌、开封、洛阳地委书记，还有商丘、登封、南阳等县县委书记，举行座谈会。

南阳县县委书记魏兆铭参加了座谈会。此前，魏兆铭曾精心准备了两本有关大跃进方面的汇报材料，没想到毛泽东一见到他就想起了京剧中诸葛亮的一段唱词：“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提出了一个让魏兆铭意想不到的在历史上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毛泽东说：

“南阳有个卧龙岗，襄阳有个古隆中。诸葛亮早年隐居处究竟是在南阳卧龙岗，还是在湖北古隆中，从明朝时候开始，持这两种不同看法的人就争论不休。**顾嘉衡有一幅对联，评价了诸葛亮隐居处是在南阳或是在襄阳之争，他说：‘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你是南阳的父母官，你怎么看呀？”

魏兆铭虽然在南阳县工作多年，却从来没有关心过这方面的问题。他只好老老实实地回答说：

“我没有研究过，搞不清楚。”

毛泽东把话题转向了老百姓的生活方面，问道：

“现在社员们每个月能吃到多少油呵？”

魏兆铭回答说，每人半斤。毛泽东又问：

“能保证吗？”

魏兆铭一时语塞。毛泽东见他如此，就问道：

“你是南下干部吧，家中有几口人啊？”

魏兆铭一一作了回答。毛泽东笑着批评他说：

“你这个同志啊！不知古不知今，只知家中几口人。”

11月11日晚上，毛泽东专门同遂平县委书记谈话，对公社的供给制询问得很详细。县委书记说：

“现在最苦恼的是全国来参观的人太多，每天少则500多人，多则3000多人，难以应付。”

11月12日，毛泽东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想了一下，那个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还是稍等一下（大约两个星期左右），带到武昌会议上再谈一下，得到更多同志的同意（可能有好的意见提出，须做若干修改，也说不定），然后作为正式文件发出，较为妥当。这并不妨碍各省同志按照他们带去的草案立即在干部中传达、讨论和实行。是否如此，请你和北京同志们商量酌定。既然如此，郑州会议就是一个为武昌会议准备文件的会议，因此不要发公报。”

11月12日下午2时30分，河南省的7位县委书记提前赶到省委第二招待所会议室，等待毛泽东接见。会议室里的摆设非常简单，中间是一排木制长桌，桌上铺着白色桌布，放着几个茶杯和茶叶筒，桌子一边及两端放着方木凳，另一边放着两把藤椅。7位县委书记并排坐在方凳上。等待接见的还有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戴苏理和史向生。

3点时分，毛泽东身着浅灰色中山装在吴芝圃陪同下来到会议室，跟在后面的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谭震林和农业部长廖鲁言。众人起立相迎，毛泽东微笑着挥手让大家坐下，自己也从容地在县委书记们对面的藤椅上落了座。他见这些县委书记都有点拘谨，便指着廖鲁言开玩笑说：

“农业部长来了，可有粮食吃啰!”

说得大家都笑了，会议室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毛泽东拿起吴芝圃事先准备好的名单点名，并同他们一一握手。毛泽东说：

“你们来自基层，工作很艰苦。你们直接和群众打交道，政策要通过你们去贯彻执行。你们最了解群众，最了解实际，最了解人民的生产生活。今天咱们在一块谈谈。”

他在座谈中第5个问到的是孟津县县委书记卫乃如。据记者范兴运等对卫乃如的访谈记载，毛泽东问卫乃如：

“你是哪里人？”

卫乃如回答说：

“济源县人。”

“干县委书记几年了？”

“5年。”

“孟津的历史你知道吗？”

“知道一些，说不很清楚。”

毛泽东转向众人说：

“孟津是个古县，历史上就是军事战略要地，中国历史上几次大统一，军队在孟津过河的次数最多。武王伐纣，就是从孟津过河的。历史上有‘八百诸侯会孟津’一事。”

他又饶有风趣地说起伯夷、叔齐叩马而谏的故事。接着，他问卫乃如，孟津县的人民公社有多大？卫乃如汇报说：

“以乡为单位，平均4万人，下设管理区、生产队。”

毛泽东又问：

“公社以什么为基础？哪一级为核算单位？穷队富队关系怎样处理？如何分配？”

卫乃如说：

“公社就是以公社为基础，不分穷队富队，平均分配。”

毛泽东说：

“**你们不要以为公社越大越好，不要把社会主义误认为是共产主义，不要把集体所有制误认为是全民所有制。人民公社还是集体所有制。**修武县委书记说：‘丰收了，国家把粮食调走，欠收了，再把我们包起来。’国家这么大，这么多人，怎么能包起来呢？**目前不是全民所有制，穷队富队拉平是不对的，要按劳分配，要有合理差别，不要急于过渡，不要急于改变生产关系。**”

他又问：

“孟津的公社这么大，一个公社4万来人，生产是怎么进行的？”

卫乃如说：

“群众都很听话，指向哪里就干到哪里，具体**以生产队为单位来领导生产**。”

毛泽东说：

“不要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不要违背群众的生产和生活规律，不要随便打乱原来高级社的生产基础，要有利于生产，有利于生活，方便群众。要贯彻自愿互利的政策，不能剥夺群众的利益。还要注意群众的劳逸结合，每天工作时间不要超过8小时。有人提出工作6个小时，我还不敢执行6小时工作制，那只是设想。”

他问到孟津县的粮食生产情况，卫乃如说：

“按农业发展纲要达不到，但是亩产有400斤（事实上那年孟津粮食产量亩产只有300来斤——原注）。”

毛泽东说：

“**粮食产量一定要实事求是。**”

卫乃如又汇报说，他们调动2万名劳力，修建了70华里长的黄河渠，同时在丘陵区修建了8个中小型水库，打成20多眼大口机井，还兴建了中州渠，可浇地9万多亩。毛泽东满意地点点头，又关切地问起群众生活情况，问大食堂里每人每天吃多少粮、多少油？老人、小孩、病人、孕妇都能吃好吗？能合口味吗？他听了卫乃如的回答，强调说：

“**一定要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人民以食为天，要保证每人每天吃到1斤4两粮食，少了不行。要执行8小时工作制，确保人民群众有足够的休息时间和睡眠时间。**历史上，**几千年来一家一户吃饭，老百姓能做到粗细搭配，好坏搭配，粗粮细吃，过年过节饭菜调剂。现在几百人一个大食堂，不是小事，人命关天，吃饭第一。**食堂要养猪、养鸡，要种些菜。注意群众的生活规律，不断调剂改善生活，达到群众满意。”

谈话一直进行到下午6点多，吴芝圃请示毛泽东后，宣布散会吃饭。7位县委书记同毛泽东在一个食堂就餐，没有省委领导陪同，也没有特殊照顾，6个菜，3荤3素，没有鸡、鸭、鱼之类，主食是大米饭、馍。

是日晚，7位县委书记在省军区礼堂同毛泽东一起看了一场地方戏。

11月13日，毛泽东在专列上找信阳地委负责人、信阳县委书记谈话，特别称赞他们没有拆散家庭，又关照他们说，要保证社员有8小时睡眠，4小时吃饭时间。

这一天，毛泽东写信给刘少奇、邓小平，提出在北京召开的政治局通报会议还要讨论两个问题，他写道：

“1、讨论郑州起草的两个文件，当作问题提出，征求意见。2、讨论斯大林苏联经济问题‘意见书’部分的第一第二第三章。这样做，是为了对武昌会议先做精神准备。所谓当作问题提出，即对每一个问题，都提出正反两面。例如对划一条线弄清界限问题，提出划线好，还是不划线好？对商品问题，提出现阶段要商品好，还是不要商品好？”

11月13日下午，毛泽东乘专列离开郑州，继续南下，吴冷西和田家英跟随前往。毛泽东在去武昌途中，继续向一些地委、县委、公社的负责人做调查。

专列进入湖北境内，停在湖北孝感车站外。毛泽东要对中央向湖北提出的年产600亿斤粮食的事摸摸底。

王任重、谢滋群及负责警卫工作的负责人提前赶到了孝感地委，和地委书记王家吉、县委书记王振明一起安排了参加座谈会的人员。毛泽东的专列一到，王任重便带领孝感地委、县委部分干部和农民代表们上了专列。代表中有一个县级特等劳动模范叫晏桃香，她正患感冒打喷嚏，保卫人员怕她传染给毛泽东，就不让她进毛泽东的车厢。毛泽东说：

**“怕什么，少奇肝炎多年也没有传染给我。请她进来。”**

身材高大的毛泽东用双手和晏桃香等代表紧紧握手，还不住地说：

“你好，你好！”

待众人落座，毛泽东还微笑着对晏桃香说：

**“我是60多岁的老头子，不怕死。人家说身经百战，我也是身经百战不死，你一个喷嚏打得死我吗？你比美帝国主义厉害？比日本侵略者厉害呀？比蒋委员长厉害吗？”**

毛泽东如此一说，气氛顿时缓和了。他接着问晏桃香：

“你为什么感冒的啊？”

晏桃香说：

“报告毛主席……”

毛泽东马上打断她的话说：

“不要报告。大家平起平坐，随便谈心。”

晏桃香说：

“昨晚我通宵开夜车锄棉埂，天亮才通知我开座谈会。一直打喷嚏，来这儿之前我先吃了药的。”

“你们开夜车点灯吗？”

“点灯，300瓦电灯，20盏汽灯。”

“你赞成开夜车吗？”

“说实话不赞成。但上面要我们开夜车，我是妇联主任，不能不开。我认为开夜车划不来，花钱很多，费力很大，第二天还打不起精神，大家都不愿意。”

毛泽东转对王任重说：

**“我今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就讲过，要劳逸结合，有张有弛。一说搞大跃进了，人们就拼命干，这是不能持久的，还会因过分疲劳使人害病。”**

王任重向毛泽东汇报说：

“我们这里朋兴乡有一块高产田，亩产万斤稻谷。”

毛泽东摇摇头，说：

“我不相信。”

王任重言之凿凿地说：

“这是农村工作部部长王良来验收的。”

毛泽东还是不相信，他说：

**“验收的也靠不住，除非派解放军站岗放哨，单打单收，才能算数。**”

**他问晏桃香说：**

**“你认为你所在的生产队粮食产量能达到指标吗？”**

**晏桃香说：**

**“差十万八千里。”**

参加座谈会的其他农民代表感到晏桃香说的话很不简单，大家都鼓了掌。毛泽东又问晏桃香：

“妇女的4期（月经期、怀孕期、产期、哺乳期——笔者注）照顾，你们是怎么做的？”

晏桃香回答得很干脆：

“月经来了，不做下水的活，怀孕不做弯腰的活，产期休息一个月。”

毛泽东听了很高兴，忍不住笑了起来。晏桃香和众人也都跟着笑了起来。

11月14日，毛泽东看到一个消息，反映河北邯郸地区伤寒疫病流行，主要原因是：领导干部只注意生产，忽视了群众生活，致使社员过度劳累，身体抵抗力下降。毛泽东立即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很值得注意，是一个带全国性的问题，注意工作，忽视生活，必须立即引起全党各级负责同志，首先是省、地、县3级的负责同志的注意，方针是：工作、生活同时并重。**”

11月15日凌晨1时许，毛泽东到达武昌，住在东湖宾馆。

毛泽东要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和张平化召集和主持了一个座谈会。要吴冷西和田家英也参加这个座谈会。毛泽东在座谈会上先后听取了王任重及恩施、孝感、沔阳、襄阳等县公社化情况的汇报。

这个座谈会一直开到11月20日，麻城、鄂城、黄冈、枣阳等县的县委书记，以及一些公社书记和钢铁厂厂长、下放干部，先后做了汇报。毛泽东有时不出席，吴冷西、田家英就将会议上的情况向他汇报。他俩汇报的情况大致是：在办大社中富队和贫队之间出现了矛盾；群众对“军事化”、“食堂化”抵触情绪很大；群众在大办钢铁中生产的好铁只有两三成；干部作风浮夸、粗暴等等。

11月1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转发卫生部党组《关于组织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的总结报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上海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中央卫生部党组关于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的经验的意见很好。现在转发给你们。请你们研究执行。

**中国医药学是我国人民几千年来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它包含着中国人民同疾病作斗争的丰富经验和理论知识，它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必需继续努力发掘，并加以提高。我们必须组织力量认真地学习、研究，加以整理。**根据中央的方针，卫生部曾经举办了少数西医离职学习中国医药学的学习班，经验证明这种办法很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凡是有条件的，都应该办一个70人到80人的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的学习班，以两年为期。学生的条件，应该有大学毕业水平和二三年的临床经验，最好能有看中医书籍的中文水平。这样，在1960年冬或1961年春，全国大约就可以有2000名中西结合的高级医生，其中可能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这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闲视之。**请你们积极办理。

中央 1958年11月18日

11月19日，毛泽东在谭震林、廖鲁言关于农业生产和农村人民公社情况报告上批示道：

“生产和生活两方面，必须同时抓起来。**不抓生活，要搞好生产是困难的**。**生产好，生活好，孩子带得好，这就是我们的口号。**”

11月21日上午，毛泽东在武昌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武昌会议”。参加会议的除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一部分部长外，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也参加了会议。

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

“睡不着觉，心里有事。翻一番，作为第一本账，出点题目，请大家研究，你们写文章。我有我的一些想法。**我们现在是破落户，一穷二白，还有一穷二弱。**我们之穷，全国每人平均收入不到80元，大概在60到80元之间。全国工人平均每月60元（包括家属）。农民究竟有多少？河南讲74元，有那么多？工人是月薪，农民是年薪。5亿多人口，平均年薪不到80元，穷得要命。

我们说强大，还没有什么根据。**现在我们吹得太大了，不合乎事实，我看没有反映客观事实。苏联41年，我们只有9年，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经验，我看要过渡到共产主义，一定要让苏联先过，我们后过。**这是不是机会主义？**他是12年只有1亿吨钢。我们不能先过，也有理由。**我们10年4亿吨钢，160万台机器，25亿吨煤，3亿吨石油，我国有天下第一田，到那个时候，地球上有天下第一国。搞不搞得到是另一个问题。

**郑州会议的东西，我又高兴又怀疑。搞4亿吨钢好不好？搞40亿吨更好。问题是有没有需要？有没有可能？今年到现在，11月17日统计，只搞了890万吨钢，已经有六千万人上阵。你说搞4亿吨要多少人？**当然条件不同，鞍钢现有10万人，搞了400万吨。让苏联先过，免得个人突出。**我担心，我们的建设有点像白杨树。有一种钻天杨，长得很快，就是不结实。钻的太快，不平衡。可能搞得天下大乱，我总是担心。什么路线正确不正确，到天下大乱，你还说你正确啊？**

有计划按比例，钢铁上去各方面都上去？什么叫比例？现在我们谁也不知道什么叫比例，我是不知道，你们可能高明一点。什么是有计划按比例，要慢慢摸索。恩格斯说，要认识客观规律，掌握它，熟练地运用它。我看斯大林认识也不完全，运用也不灵活，至于熟练地运用就更差，对工、农、轻、重工业都不那么正确，重工业太重，是长腿，农业是短腿，是铁拐李。现在赫鲁晓夫大有两条腿走路之势。我们现在摸了一点比例，是两条腿走路，三个并举，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我们按三个并举，就是两条腿走路。几个比例，大中小也是个比例，世界上的事总有大中小的。现在12个报告，我看了，大多数写得好，有些特别好。口语与科学名词结合也是土洋结合。过去我们常说经济科学文章写得不好，你自己看得懂，别人看不懂。希望大家都看一遍，我们有这么多天，一天看一个就容易看完了。似乎我们有点按比例，三个并举，有个重点，重工业为纲，但真正掌握客观规律，熟练地运用它还有问题。

我们也有缺点。北戴河会议讲三、四年或五、六年或更多一点时间，搞成全民所有制。好在**过渡到共产主义还有5个条件：1、产品极为丰富；2、共产主义思想觉悟道德提高；3、文化教育普及和提高；4、3种差别和资产阶级法权残余消灭；5、国家除对外作用外，其它作用逐渐消失。**3个差别、资产阶级法权消灭没有一、二十年不行，我并不着急，还是青年人急。**5个条件不完备，不过是社会主义而已，这个问题请大家想一想。**这不是说我们要慢腾腾的，多快好省是客观的东西，能速则速，不能勉强。图101飞机高到一万多公尺，我们飞机只几千公尺。速度是客观规律。**今年粮食九千亿，我不信，七千四百亿已经翻了番，是可能的，我就很满意了。我不相信八千亿斤，九千亿斤，一万亿斤。**

四十条这个问题，如果传出去，很不好。**你们搞那么多，而苏联搞多少？叫作务虚名而受实祸，虚名也得不到，谁也不相信，说中国人吹牛。**说受实祸，美国人可能打原子弹，把你打乱，当然也不一定。我看还是谨慎一点。粮食多一点没关系，但每人1万斤也不好。**听说有几个姑娘说，不搞亩产8万斤不结婚，我看她们是想独身主义的，把这个作挡箭牌。**据伯达调查，她们还是想结婚的，八万斤是不行的。

四十条纲要要有两种办法，一是认真议一下，作为全会草案讨论通过；另一种办法是根本不讨论，不通过，只交待一下，说明郑州会议的数字没有把握，但有积极意义。

划线问题。要不要划线？如何划法？郑州会议有5个标准，山西有意见。建成社会主义的集中表现为全民所有制，也与斯大林在1938年宣布的不一致。什么叫完成全民所有制？什么叫建设社会主义？斯大林在1936年、1938年两个报告提出两个标志：一是消灭阶级，一是工业比重已占70%。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照他们的办，我们讲5个标准，我们以完成全民所有制为第一标准。另外一个办法，是不这样讲，像北戴河会议一样，只讲几个条件，什么时候建成不说，可能主动一些。

苏联生活水平比我们高，还未过渡。**北京大学有个教授，到徐水一看，他说‘一块钱的共产主义，老子不干’。徐水发薪也不过二、三元。现在就是吃穷的饭，什么公共食堂，现在就是太快。**向共产主义过渡少者三、四年，多者五、六年，我有点恐慌，怕犯什么冒险主义的错误。刘少奇脑子也活动了，认为长一点也可以。还有完成‘三化’：机械化、电气化、园林化，要5年到10年。占压倒优势才叫化。”

刘少奇插话说：

“**达到150元到200元的消费水平，就可以转一批。**将来分批转，这样有利。否则，等到更高了，转起来困难多，反而不利。就是三化不容易做到，尤其园林化。”

彭真插话说：

“我们搞了土改，就搞大合作，又搞公社，只要到每人150元到200元就可以过渡。太多了，如罗马尼亚那样，农民比工人收入多时，就不好转了。**把三化压低，趁热打铁，早转比晚转好，三四年即可过渡。**”

“照你的说法，18年建成社会主义大有希望？”毛泽东看着彭真，显然有点不高兴。他扫了一眼会场，说：“**按照少奇、彭真的意见，是趁穷之时来过渡，趁穷过渡可能有利些？不然就难过渡？**我的意见会不会泼冷水？要人家吃饱饭，睡好觉。特别人家正在鼓足干劲，苦战几昼夜，干出来了。除特殊外，还是要睡一点觉。现在要减轻任务，水利任务。去冬今春全国搞五百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全国还要搞一千九百亿土石方，多了3倍多。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人很多。这样一来，**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

**广西死了人，陈漫远不是撤了吗？！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安徽要搞那么多，你搞多了也可以，但以不死人为原则。一千九百多亿土石方总是多了，你们议一下，**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要比去年再加一点，搞六、七百亿，不要太多，希望你们讨论一下。此外，还有什么别的任务，实在压得透不过气来的，也可以考虑减轻些。任务不可不加，但也不可多加。要从反面考虑一下，翻一番可以，翻几十番就要考虑。**钢三千万吨，究竟要不要这么多？搞不搞得到？要多少人上阵？会不会死人？**虽然你们说要搞基点（钢、煤），但要几个月才能搞成？河北说半年，这还要包括炼铁、煤炭、运输、轧钢等等，这要议一议。**我看还是稳一点，水利照五百亿土石方，一点也不翻，搞他10年，不就是五千亿了吗？我说还是留一点儿给儿子去做，我们还能都搞完啊？**此外，各项工作的安排，煤、电、化学、森林、建筑材料、造纸，这次会议要唱个低调，把空气压缩一下。明天搞个上半年计划，如果行有余力，情况顺利，那时还可起点野心，7月1日再加一点。**不要像唱戏拉胡琴，弦拉的太紧了，有断弦的危险**。这可能有一点泼冷水的味道。下面干部搞公社，有些听不进去，无非骂我们右倾，不要怕，硬着头皮让下面骂。翻一番，自从盘古开天地，全世界都没有，还有什么右倾啊？！农业指标搞多少？”

刘少奇说：

“对外面说搞一万亿斤差不多，每人有两千斤就差不多了。”

毛泽东说：

“北戴河会议的东西还要议一下。机床8万台，明年翻4番，搞32万台，有那么厉害？我看非亩产8万斤不结婚，也是非现实的可能性。

人民公社要整顿4个月，12、1、2、3月要搞万人检查团，主要是看每天是否睡了8小时，如只睡7小时是未完成任务。我是从未完成任务的，你们也可以检查，贴大字报。食堂如何，要有个章程。人民公社要议一下，搞个指示。4个月能不能整顿好？是不是少了，要半年。**现在据湖北说，有百分之七八十的公社搞得比较好了，我是怀疑派，我看10个公社，有1个真正搞好了的就算成功。**省、地委集中力量去帮助搞好1个公社，时间4个月。到那时候要搞万人检查团，不然就有亡国的危险。杜勒斯、蒋介石就骂我们搞人民公社，都这样说，你们不搞公社不会亡，搞会亡。我看不能说他没有一点道理。总有两种可能，一亡，一不亡。食堂会亡，托儿所也会亡，湖北省谷城县有个食堂就是如此。托儿所一定要亡掉一批，只要死了几个孩子，父母一定会带回的。**既然托儿所、幸福院会垮，人民公社不会垮？**我看什么事都有两种可能性：垮与不垮。合作社过去就垮过的，河南、浙江都垮过，我就不相信你四川那么大的一个省，一个社也没有垮？无非是没有报告而已。

我是提问题，把题目提出来。去讨论，哪样为好？各个同志都可以提问题。这些时候，这些问题在我的脑子里，总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究竟哪个方法好？这次会议是今年这一年的总结性会议，已快到12月了嘛，安排明年，主要是第一季度。”

11月22日凌晨1时，毛泽东夜不能寐，对1959年钢生产指标放心不下，又把李富春、薄一波、王鹤寿、赵尔陆叫到一起，征询意见。他最后提出：**不是3000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而是1800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

11月22日，主管计划工作的负责人在工业会议上提出，1959年的钢生产必须完成2200万吨，争取2500万吨。

11月22日晚上，毛泽东与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人召集7个协作区组长谈话。毛泽东力图要说服各大区组长，把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确定的1959年钢产量指标，由3000万吨减为1800万吨，还反复问他们：

**“1800万吨靠不靠得住？”**

没想到反而是各大协作区组长力图说服毛泽东维持原来的指标。与协作区组长的谈话结束后，毛泽东又找吴冷西和田家英谈话。刘少奇、彭真等人也在座。毛泽东对吴冷西说：

“办报的，做记者的，凡事要有分析，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正确态度。”

毛泽东说到他和各大协作区组长的谈话，他说：

“**他们都想打通我的思想，我硬是想不通，因为他们缺乏根据。他们有的大区明年要增加钢产2倍，有的省要增加4倍，有的省要增加十几倍，有的省竟然要增加30倍。这怎么能叫人相信？**

中央已有12个部长写了报告，指标高得吓人，似乎要立军令状。但我看完不成也不要杀头。铁道部长说，1959年要修2万公里铁路。周总理制订的第2个‘五年计划’草案，规定5年内才修2万公里。他夸下海口要1年完成，怎么完成得了呢？如果真的完成了，我甘愿当机会主义者。

其实1800万吨钢的指标不是机会主义，能否完成还是个问题。**因为今年预计炼出1000万吨出头的钢产量中，好钢只有850万吨。**看来郑州会议读了几天书并没有解决问题，大家头脑还是发热。**1958年钢铁翻一番就使得6000万人上山，闹得天下大乱。明年再来个翻一番以至翻几番怎么得了？**

一定要压缩空气。空气还是那么多，只不过压缩得体积小些，不要虚胖子，要结实些。我看明年要减任务，工业这样，农业也这样。去冬今春就不要再搞500亿土方了，要减下来。

我这次找你们来，是为的把压缩空气的精神，**赶快告诉《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记者、编辑。现在宣传上要压缩空气，不要再鼓虚劲，要鼓实劲，自己不要头脑发热，更不要鼓动人家头脑发热。**

做新闻宣传工作的，记者和编辑，看问题要全面。要看到正面，又要看到侧面。要看到主要方面，又要看到次要方面。要看到成绩，又要看到缺点。这叫辩证法，两点论。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不让讲缺点，不让讲怪话，不让讲坏话。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好的事情不是一切都好，也还有坏的一面。反之，坏的事情也不是一切都坏，也有好的一面，只不过主次不同罢了。听到人家都说好，你就得问一问是否一点坏处也没有？听到人家都说坏，你就得问一问是否一点好处也没有？大跃进当然是好事，但浮夸成风就不好。”

毛泽东问道：

“你们看虚报好还是瞒产好？**我看瞒产比虚报好。**没有打那么多粮食，你硬是充胖子，虚报了产量，结果国家按报的产量征购，多购了过头粮，受害的是农民。瞒产少报，当然也不好，但我很同情。粮食丰收，干部要实报，**农民想少报一点，无非想多留点，多吃点。多少年来，中国农民不得温饱，想多吃点不算犯罪。瞒产了粮食还在，虚报了没有粮食。虚夸危害很大。**

天下事有真必有假。虚夸古已有之。赤壁之战，曹营号称83万人马，其实只有二三十万，又不熟水性，败在孙权手下，不单是因为孔明借东风。**安徽有个口号，说：‘端起巢湖当水瓢，哪里缺水哪里浇’，那是作诗，搞水利工程不能那样浪漫主义。**

**大跃进中有些虚报是上面压任务压出来的，问题的危险性在于我们竟然完全相信下面的报告。**有位县委书记强迫农民浇麦，下令苦战3昼夜，结果农民夜里在地头挂起灯笼，让小孩子放哨，大人睡觉。那位县委书记看见点亮了灯笼，就以为已经浇麦了。鉴于虚夸作假成风，我们对下面送来的报表不能全信，要打折扣，恐怕还要打它3分虚假，比较妥当。否则，按虚报的数字来订生产计划很危险，订供应计划更危险。

做新闻工作，无论记者或编辑，都要头脑冷静，要实事求是。下去采访，不要人家说什么你就报道什么，要自己动脑筋想想，是否真实，是否有理。据一些省委反映，《人民日报》在大跃进中搞各省进度表，如水利工程完成土石方进度表，放‘卫星’，粮食和钢铁的高产‘卫星’，对各地压力很大，结果你追我赶，大搞虚夸。这要引以为戒。第一，要实事求是，报道时要弄清事实真相。不是新闻必须真实吗？一定要查清虚与实，是虚夸作假还是真实确实。**新闻报道不是作诗写小说，不能凭想象虚构，不能搞浪漫主义**。第二，现在要下明矾，把混乱的思想加以澄清。**听说《人民日报》有一篇社论，讲到人民公社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时，把时间缩短了，说三四年五六年就行了，不要北戴河决议上写的‘或者更长一些时间’那半句话了。那半句话是我特意加上的，当时想法是谨慎一点好。现在看来还是太急了。你们删去那半句话就更急了，不知是听了哪一位政治局委员的意见。”**

**毛泽东所说的这篇社论，就是刘少奇、邓小平审定的《人民日报》社论《高举人民公社的旗帜前进》，他们把决议中关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时间中“或者更长一些时间”的话删去了，并且在决议公布的前一周，提前将这篇社论发表了。**

毛泽东又说：

“**这半年大家头脑都发热，包括我在内。所以要下明矾，要压缩空气，说泼点冷水也可以，但要保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有错误领导上承担责任就是，不要责怪下面。第三，要考虑国际影响。今年我们宣传上吹得太厉害，不但在国内搞得大家头昏脑胀，而且国际影响也不利。我在成都会议上就曾经说过，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就有这个危险。杜勒斯天天骂我们，表明他恐慌，害怕我们很快强大起来。美国人会想到是不是对中国发动预防性战争。这对我们不利。何必引人枪打出头鸟呢？何况我们的成就中还有虚夸成份呢。即使真的有那么大成绩，也不要大吹大擂，还是谦虚一点好。中国是个大国，但是个大穷国。今年大跃进，即使根据现在汇报的数字，全国农民年平均收入也只有70元上下，全国工人每月平均工资也只有60元左右。**现在有些县委不知天高地厚，说什么苦战3年就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这不是发昏说胡话？说是‘穷过渡’，马恩列斯哪里说过共产主义社会还是很穷的呢？他们都说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必要条件是产品极为丰富，否则怎么能实行按需分配呢？有些同志要‘穷过渡’，这样的‘穷共产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和吸引力呢？**

现在人民公社搞的供给制，不是按需分配，而是平均主义。中国农民很早就有平均主义思想，东汉末年张鲁搞的‘太平道’，也叫‘五斗米道’，农民交五斗米入道，就可以天天吃饱饭。这恐怕是中国最早的农民空想社会主义。

我们现在有些同志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这非常危险。北戴河会议规定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的5个条件，哪一条也不能少，缺一条就不能向共产主义过渡。”

刘少奇、彭真插话说：

**“穷过渡比富过渡容易。”**

毛泽东情绪激动地说：

“**反正我不准备急急忙忙过渡。我今年65岁，即使将来快要死的时候，也不急急忙忙过渡。**过渡要有物质条件、精神条件，还要有国际条件，不具备条件宣布过渡也没有用。要画两条线：一条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区别；一条是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区别。不要轻易宣布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更不要轻易宣布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

我们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不仅把杜勒斯吓了一跳，也把赫鲁晓夫吓了一跳。不过看来赫鲁晓夫还比较谨慎，他现在只讲12年内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并没有说到时就要过渡。我们有些同志头脑发热，想抢在苏联前头过渡，这很不好。苏联同志建设社会主义已搞了41年，我们才搞9年，就想当先锋，还不是头脑发昏？人有少青中老，水有溪河湖海。事情都有一定的量度，有相对的规定性，从量变到质变有一个过程，不能随意想过渡就过渡。

**我在郑州批评了陈伯达主张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批评起草新40条的同志想入非非，要生产2亿吨到4亿吨钢。**现在有些同志说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实际上把科学也破除了。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当作迷信破掉。比如，人是要吃饭的，这是科学，不能废除。人是要睡觉的，这也是科学。破除这两条，就要死人。自然界有个抵抗力，这是一条科学，你不承认，它就把你砸死。破除迷信以来，有一小部分破得过分了，把科学真理也破了。这是不能破的。凡是迷信一定要破除，凡是真理，凡是科学，一定要保护。**资产阶级法权，一部分要破除，如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等级森严、娇骄二气，非破不可。但还有相当一部分不能破除，如工资制度、国家强制、上下级关系，还得保持。如果把这些现在必要的、有用的东西也破得体无完肤，就会天下大乱，总有一天要承认错误，还要赔礼道歉。**

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记者和编辑，头脑都要冷静，多开动自己的脑筋，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随声附和。要调查，追根问底。要比较，同周围比较，同前后左右比较，同古今中外比较。唐朝有位太守，他审理案件，先不问原告和被告，而是先要了解原告和被告周围的人和环境，调查好了才去审问原告和被告。这叫作勾推法，也就是比较法。记者和编辑要学会这种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其实也就是思想方法，实事求是的方法。记者，特别是记者头子——”

毛泽东指着吴冷西说：

“像你这样的人，头脑要清醒，要实事求是。你要尽快把这个精神告诉记者，你看用什么办法可以快些？”

吴冷西说：

“新华社正在北京召开全国分社会议，主席的意见可以向会议传达。”

毛泽东说：

“可否把会议搬到武汉来开？不过临时安排不便，而且中央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接着要开六中全会，要来很多人。”

田家英说：

“中央办公厅每天有专机来往京汉之间，可以明天回去传达，后天回来开会。”

吴冷西认为可行，毛泽东也同意这么办。于是，吴冷西就在23日回到北京，传达了毛泽东的部分讲话精神。

欲知武昌会议后来的情况如何？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内容虽然多，但读起来并不枯燥。这些话揭开了一些历史真相，告诉人们在大跃进时期到底是哪些人要消灭家庭？哪些人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甚至提出要“穷过渡”？弄清楚了这些问题，就可以明白后来一些人在毛泽东生前（如七千人大会）和身后往他身上泼脏水的真实意图了！

**第64章**

**“千钧重担压下去，县、乡干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干，少干一点就**

**被叫作‘右倾’，把人们的心思引到片面性上去了，顾了生产，忘了生活。”**

**“现在的严重问题是，不仅下面作假，而且是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

**县都相信，主要是前3级相信，这就危险。”**

话说1958年11月23日，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发表讲话，他说：1959年的钢产量究竟以什么指标为好？北戴河会议定的2700万吨到3000万吨，那是个建议性的，这次要决定下来。今年翻一番，是个冒险的倡议，搞了6000万人上阵。

毛泽东又说：

“北戴河会议后这两个月的经验，对于我们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就想到，恐怕明年搞2700万吨到3000万吨，难于办到。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另外一种办法，把指标降低，只翻一番，不翻两番，有没有把握？”

“前天晚上，富春、一波、王鹤寿、赵尔陆他们已经睡着了，我从被窝里头把这几位同志拖出来，就是讲，不是什么3000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而是1800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昨天晚上，我跟大区和中央几个同志吹了一下，究竟1800万吨有无把握，我们所得到的根据不足。**从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

关于弄虚作假问题，毛泽东建议在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里，把反对作假的问题专门写一条，他说：

“现在是横竖要放‘卫星’，争名誉，管它假不假。有一个公社，自己只有100头猪，为了应付参观，借来了200头大猪，参观后又送回去。有100头就是100头，没有就是没有，搞假干什么？”

“**建议跟县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切实谈一下，要老老实实，不要作假。**本来不行，就让人家骂，脸上无光，也不要紧。不要去争虚荣。**比如扫盲，说什么半年、一年扫光，两年扫光我就不太相信，第2个‘五年计划’扫除了就不错。绿化，年年化，年年没有化，越化越见不到树。**说消灭了四害，是‘四无’村，实际上是‘四有’村。上面规定的任务，他总说完成了，没有完成就造假。**现在的严重问题是，不仅下面作假，而且是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3级相信，这就危险。**如果样样都不相信，那就变成机会主义了。群众确实做出了成绩，为什么要抹煞群众的成绩，但相信作假也要犯错误。”

“经济事业要越搞越细密，越搞越实际越科学，这跟作诗不一样，要懂得作诗和办经济事业的区别。‘端起巢湖当水瓢’，这是诗，我没有端过，大概你们安徽人端过。巢湖怎么端得起来？”“有些假的，你查也查不出来，人家开了会，事先都布置好了。希望中央、省、地这3级都懂得这个问题，有个清醒头脑，打个折扣。”

关于破除迷信，毛泽东说：

“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当迷信破除了。比如，人是要吃饭的，这是科学，不能破除。张良辟谷，但他吃肉。现在，不放手让群众吃饭，大概是产量报多了。人是要睡觉的，这也是科学。动物总是要休息，细菌也要休息，人的心脏1分钟跳72次，1天跳10万多次。一要吃饭，二要睡觉，破除了这两条，就不好办事，就要死人。”“破除迷信以来，效力极大，敢想敢说敢做，但有一小部分破得过头了，把科学真理也破了。”“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一定要保护。”

关于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毛泽东再次说道：

“资产阶级法权只能破除一部分，例如三风五风，等级过分悬殊，老爷态度，猫鼠关系，一定要破除，而且破得越彻底越好。另一部分，例如工资等级，上下级关系，国家一定的强制，还不能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有一部分在社会主义时代是有用的，必须保护，使之为社会主义服务。把它打得体无完肤，会有一天我们要陷于被动。”

11月25日，金日成率朝鲜代表团飞抵武汉，受到武汉20万市民的热烈欢迎。

此前，为庆贺《中朝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签订5周年，金日成应邀于22日抵达北京访问。周恩来举行盛大宴会欢迎金日成一行。尔后，北京市民1万多人隆重集会，与金日成及其代表团成员一道，共同庆祝中朝经济文化合作所取得的丰硕成果。

11月25日下午，毛泽东亲切会见了金日成一行，金日成握着毛泽东的手激动地说：

“欢迎太热烈了，我们实在不敢当！”

“你们是贵宾，我们欢迎你们。”毛泽东看着面带微笑的金日成，亲切而又真诚地说：“越搞越熟了。对于一个党，一个民族，互相之间认识都要有一个过程，个人之间也不是一下子就认识清楚的。我们对你们有一个认识过程，也同你们对我们有一个认识过程一样。我们对朝鲜有三个尊重：尊重朝鲜民族，尊重朝鲜党，尊重朝鲜的领导人。”

他还说：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看问题要看本质，看路线，就是在国内是不是搞社会主义，在国际上是不是反对帝国主义，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是不是搞国际主义。**这三点就构成一条路线。”

毛泽东又谈到了中朝两国国内的情况，他还说：

“一穷二白有两重性：第一方面是不好：第二方面是可以变为动力，革命的动力。我们亚洲、非洲、拉丁美洲都有这两个条件。欧洲不同，它一不穷，二不白。”

金日成说：

“我们也是一穷二白，这是我们革命的动力。”

双方的会谈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着，不知不觉间到了吃饭的时间，毛泽东设便宴招待金日成一行，他们边吃边谈，兴致极高，并约定明天接着谈。

11月25日晚，毛泽东看到了《宣教动态》145期上刊登的云南省委的一份报告。报告中反映：春夏之交云南发生因浮肿病引起死亡的情况，主要原因是紧张持续的苦战，对群众生活缺乏注意。他立即写了一个批语印发给武昌会议的与会者，全文如下：

这是一个有益的报告，是云南省委写的，见《宣教动态》145期。云南省委犯了一个错误，如他们在报告中所说的那样，没有及时觉察一部分地方发生的肿病问题。报告对问题作了恰当的分析，处理也是正确的。云南工作可能因为这件事，取得教训，得到免疫力，他们再也不犯同类错误了。坏事变好事，祸兮福所倚。别的省份，则可能有一些地方要犯云南那样的错误。因为他们还没有犯过云南所犯的那样一种错误，没有取得深刻的教训，没有取得免疫力。因而，如果他们不善于教育干部（主要是县级，云南这个错误就是主要出于县级干部），**不善于分析情况，不善于及时用鼻子嗅出干部中群众中关于人民生活方面的不良空气的话，那他们就一定要犯别人犯过的同类错误。**在我们对于人民生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缺少关心，注意不足，照顾不周（这在现实是几乎普遍存在）的时候，不能专门责怪别人，同我们对于工作任务提得太重，密切有关。**千钧重担压下去，县、乡干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干，少干一点就被叫作“右倾”，把人们的心思引到片面性上去了，顾了生产，忘了生活。解决办法：1、任务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过群众精力负担的可能性，要为群众留点余地。2、生产、生活同时抓，两条腿走路，不要片面性。**

毛泽东 11月25日

毛泽东还指示，把他在11月14日赴武昌途中写的那个内容相同的批语，同时印发给与会者。

这一天，毛泽东还在驻英代办宦乡给外交部并中央的报告《帝国主义矛盾重重，主动权操我们手里》上批示道：

“宦乡的论点是正确的。四分五裂，这就是西方世界的形势。目前正在逐步地破裂过程中，还没有最后破裂，但是向着最后破裂前进，最后破裂是不可避免的。过程时间，可能有相当长，非一朝一夕。所谓西方团结是一句空话。**团结也是有的，杜勒斯正在努力。但是要求‘团结’在美国的控制之下，在原子弹下要求他的大小伙伴们向美国靠拢，交纳贡物，磕响头称臣，这就是美国人所谓的团结**。**这种形势，势必走向团结的反面：四分五裂。同志们，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

11月26日下午，毛泽东第2次会见了金日成一行。

是日晚，毛泽东举行盛大宴会招待朝鲜贵宾。尔后他又和金日成等人一起观看了富有地方特色的文艺演出。

11月28日，也就是武昌会议结束的第2天，毛泽东在武昌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八届六中全会。这次全会一直开到12月10日才结束。

八届六中全会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和修改《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讨论和修改《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草案）》以及毛泽东提出他不做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问题。

11月30日，毛泽东在各大协作区主任会议上讲话说：

“杜勒斯比较有章程，是美国掌舵的。这个人是个想问题的人，要看他的讲话，一个字一个字地看，要翻英文字典。杜勒斯是真正掌舵的，省委要指定专人看《参考消息》。”

1958年12月1日下午，毛泽东游泳后坐在游艇上休息，曾志带着粤剧著名演员红线女来了。红线女是随团应邀给八届六中全会演出的。毛泽东一见红线女来了，很是高兴，就请红线女和曾志一起吃晚饭。

毛泽东边吃饭边说到了一些对艺术的意见，有批评也有赞赏。曾志见红线女认真地聆听着毛泽东的话，几乎不怎么吃东西，就一个劲儿地给她夹菜。毛泽东见曾志如此殷勤，就笑着对她说：

“你都不懂，她晚上要演出，演出前是不能多吃的。”

一句话说得全桌的人都笑了起来，弄得曾志很不好意思。

晚饭结束了，曾志拿了个芒果，剥了皮递给毛泽东，不料毛泽东没有接，反而问她：

“剥了皮怎么个吃法呢？”

曾志一听就弄不明白了，她心里说：芒果不剥皮怎么吃啊？这些年我都是这么吃的！毛泽东见曾志不说话，就笑着说：

“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他拿起一个芒果，用刀从两边剖开，然后划几条小格子，再翻过来吃。曾志这才第一次知道了吃芒果的方法。

晚上的粤剧演出结束后，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上台接见演员们，红线女请求毛泽东给她写几个字，毛泽东高兴地答应了。

夜深了，毛泽东还在奋笔疾书，他在赶写一篇2000来字的《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要印发给八届六中全会的与会者们。他写道：

“这里我想回答帝国主义及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我的回答是，既是真的，又是纸的，这是一个由真变纸的过程的问题。变即转化，真老虎转化为纸老虎，走向反面。一切事物都是如此，不独社会现象而已。我在几年前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战略上藐视它，战术上重视它。不是真老虎，为什么要重视它呢？看来还有一些人不通，我们还得做些解释工作。

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即对立统一规律）一样，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也有两重性，它们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它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在随后的一段时间，由于它们的对立面，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逐步壮大，并同它们进行斗争，越来越厉害，它们就逐步向反面转化，化为反动派，化为落后的人们，化为纸老虎，终究被或者将被人民所推翻。**反动的落后的腐朽的阶级，在面临人民的决死斗争的时候，也还有这样的两重性。一面，真老虎，吃人，成百万人成千万人的吃。人民斗争事业处在艰难困苦的时代，出现许多弯弯曲曲的道路。**中国人民为了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花了一百多年时间，死了大概几千万人之多，才取得了1949年的胜利。你看，这不是活老虎、铁老虎、真老虎吗？但是，它们终究转化成了纸老虎、死老虎、豆腐老虎。这是历史的事实。人们难道没有看见听见过这些吗？**真是成千成万！成千成万！所以，**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的老虎。它们会吃人的。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向阶级敌人作斗争是如此，向自然界作斗争也是如此。**我们在1956年发表的‘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和‘十二年科学发展纲要’，这些都是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宇宙发展的两重性，关于事物发展的两重性，关于事物总是当作过程出现、而任何一个过程无不包括两重性，这样一个基本观点，对立统一的观点出发的。一方面，藐视它，轻而易举，不算数，不在乎，可以完成，能打胜仗。一方面，重视它，并非轻而易举，算数的，千万不可以掉以轻心，不经艰苦奋斗，不苦战，就不能胜利。怕与不怕，是一个对立统一法则。一点不怕，无忧无虑，真正单纯的乐神，从来没有。**每一个人都是忧患与生俱来。**学生们怕考试，儿童怕父母有偏爱，三灾八难，五痨七伤，发烧四十一度，以及‘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之类，不可胜数。阶级斗争，向自然的斗争，所遇到的困难，更不可胜数。但是，大多数的人类，首先是无产阶级，首先是共产党人，除掉怕死鬼以及机会主义的先生们以外，总是将藐视一切、乐观主义，放在他们心目中的首位的。然后才是重视事物，重视每件工作，重视科学研究，分析事物的每一个矛盾侧面，钻进去，逐步地认识自然运动的法则和社会运动的法则。然后就有可能掌握这些法则，比较自由地运用这些法则，一个一个地解决人们面临的问题，处理矛盾，完成任务，使困难向顺利转化，使真老虎向纸老虎转化，使革命的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转化，使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化，使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转化，使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向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转化，使年产几百万吨钢向年产几千万吨钢乃至几万万吨钢转化，使亩产一百多斤或者几百斤粮食向亩产几千斤粮食转化。同志们，我们就是做这些转化工作的。”“**在我国，在目前，有些人太热了一点。他们不想使自己的头脑有一段冷的时间，不愿意做分析，只爱热。同志们，这种态度是不利于做领导工作的，他们可能跌筋斗，这些人应当注意提醒一下自己的头脑。另有一些人爱冷不爱热，他们对一些事，看不惯，跟不上。观潮派，算账派，属于一类。对于这些人，应当使他们的头脑慢慢热起来。”**

**“人民公社的出现，在成都会议和八大二次会议上是没有料到的。其实，4月的时候，河南已经出现，5、6、7月中，我们不知道，到8月才发现。**北戴河会议做了决议。这是一件大事。因为找到了一种建设社会主义的形式，便于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便于工、农、商、学、兵相结合，规模大，人多，便于办很多事。”

“**犯错误的干部，主要是强迫命令，讲假话，以少报多，这是很危险的。**对一部分违法乱纪的干部，经过辩论，区分情节，给予不同轻重的处分。如果不这样做，会挫伤群众的热情。有的情节很恶劣，如打人、骂人、押人、捆人，要给与处分。湖北已撤了一个县委第一书记的职务。此人在旱情严重时，没有抗旱，而谎报抗旱。”

“苦战3年基本改变全国面貌，这个口号提得是否适当，3年办得到还是办不到？这个口号首先是河南的同志提出来的，后来在南宁会议上接受了这个口号，那时指的是农村，后来推广为3年改变全国面貌。农村也许能办到，至于全国，到底提几年，要好好考虑。

1958年12月1日，在武昌”

毛泽东写罢《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一文，稍加休息，又提笔给红线女写了一幅字。他写的是：

一九五八年，在武昌，红线女同志对我说，写几个字给我，我希望。我说：好吧。因写如右。横眉冷对千夫指 俯首甘为孺子牛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一日

12月6日，毛泽东在武汉同访问越南归来的金日成进行了第3次会谈，双方探讨了国际形势，交流了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发展两国友好合作的意见。

12月7日，毛泽东为中央转发轻工业部党组《关于人民公社大办工业问题的报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上海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并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党组：

轻工业部党组关于人民公社大办工业的报告很好，现将这个报告转发给你们，请你们注意抓紧人民公社办工业的领导工作。

人民公社和县联社必须贯彻执行工农商学兵结合和农林牧副渔结合，特别是工农业并举的方针，在切实抓紧农业的同时，还要大力举办工业。**人民公社要大力举办：肥料、农药、农具、工具制造、修理，农产品加工和各种满足自身需要的工业，举办确有销路而本社或者附近又有原料的工业。**凡属投资较多、规模较大、原料销路等等都非一个公社所能解决的工业，以由县联社举办为好。人民公社办工业，可以先从小土群入手，逐步向半土半洋和小洋群发展。所需主要原料，一般也要就地取材。**无论公社或者联社举办的工业，凡是原料、设备需要向外地采购，产品需要向外地销售的，都必须纳入国家（中央、地方）的统一计划。**

中央 1958年12月7日

12月7日晚，毛泽东夜读《三国志》卷八《魏书·张鲁传》，尔后他写下了一大段批语：

晋 陈寿三国志张鲁传

**这里所说的群众性医疗运动，有点像我们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道**，不过那时是神道的，也好，那时只好用神道。**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大约有1600年的时间了。贫农、下中农的生产、消费和人们的心情还是大体相同的，都是一穷二白。不同的是生产力于今进步许多了。解放以后，人们自己掌握了这块天地，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但一穷二白古今是接近的。所以，这个《张鲁传》值得一看。

张鲁的祖父创教人张陵，一名张道陵，就是江西龙虎山反动透顶的那个张天师的祖宗，《水浒传》第一回描写了龙虎山的场面。三国时代的道教是遍于全国的，群众运动的，他们的口号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苍天，汉朝统治阶级。黄天，农民阶级。于吉在东吴也有极大的群众运动，是那时道教的一派。张道陵、张鲁是梁、益派。史称这派与北方派的路线基本相同。

其后，历代都有大小规模不同的众多的农民革命斗争，其性质当然与现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根本不相同。但有相同的一点，就是极端贫穷农民广大阶层梦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在这一方面，带有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的性质。另一方面，则带有原始社会主义性质，表现在相互关系上。**第三方面，带有封建性质，表现在小农的私有制、上层建筑的封建制——从天公将军张角到天王洪秀全。宋朝的摩尼教，杨幺，钟相，元末的明教，红军，明朝的徐鸿儒，唐赛儿，李自成，清朝的白莲教，上帝教（太平天国），义和团，乃其最著者。**

我对我国历史没有研究，只是一些零星感触。对上述性质的分析，可能有错误。但带有不自觉的原始社会主义色彩这一点就最贫苦的群众来说，而不是就他们的领袖们（张角、张鲁、黄巢、方腊、刘福通、韩林儿、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等等）来说，则是可以确定的。

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来得及将农民中的上层和中层造成资本主义化，但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反动联盟，却在几十年中将大多数农民造成了一支半无产阶级的革命军，就是说，替无产阶级造成了一支最伟大最可靠最坚决的同盟军。

毛泽东 1958年12月7日，在武昌

12月8日，从武汉返回北京的金日成与周恩来共同签署了两国政府联合公报。

是日晚，金日成在北京饭店举行了盛大的告别宴会。

12月9日，毛泽东在八届六中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全文如下：

讲些意见，不是结论，决议就是这次会议的结论。

一、人民公社的出现，这是4月成都会议、5月党代表大会没有料到的。其实4月已在河南出现，5、6、7月都不知道，一直到8月才发现，北戴河会议作了决议。这是一件大事。**找到了一种建设社会主义的形式，便于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也便于由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便于工农商学兵，规模大，人多，便于办很多事。**我们曾经说过，准备发生不吉利的事情，最大的莫过于战争和党的分裂。但也有些好事没料到。如人民公社4月就没料到，8月才作出决议。**4个月的时间在全国搭起了架子，现在整顿组织。**

二、保护劳动热情问题。**犯错误的干部，主要是强迫命令，讲假话，以少报多，以多报少。**以多报少危险不大，以少报多就很危险，100斤报50斤，不怕，本来是50斤报100斤就危险。**主要的毛病在于不关心人民的生活，只注意生产**。怎么处理？犯错误的人在干部中是少数，对于犯错误的人，90%以上采取耐心说服的方法，一次、二次……不予处分，作自我批评就够了。大家议一议。不能以我一个人的意见，就作为结论。**对于严重违法乱纪，脱离群众的干部，**约占县、区、乡干部的百分之一、二、三、四、五到此为止。各地情况不同，应加以区别。**对这一些人，应该予以处罚，因为他们脱离群众，群众很不喜欢他们**。没有对90%以上犯错误的干部采取不处分的方针，就不能保护干部。就会挫伤干部的热情，也会挫伤劳动者的热情。没有对严重违法乱纪的一部分人经过辩论，区分情节，给以轻重不同的处分，也会挫伤群众的热情，有些特别严重的要做刑事处理。总之，要有分析，其中有些是阶级异己分子，有些不是阶级异己分子，**但情节恶劣的，如打人、骂人、押人、捆人，要给予处分。湖北已经撤了一个县委第一书记，他在旱情严重时，没有抗旱，而谎报抗旱。**总之处罚的要极少，教育的要极多，这就是能保护干部的热情。也就保护了劳动者的热情。对群众中间犯错误的人。方针也是如此。

三、苦战3年基本改变全国面貌问题。这个口号是否适当？3年办得到办不到？这个口号首先是河南同志提出来的。开始在南宁会议上我们采取了这一口号，那时是指农村讲的。后来不知那一天，推广为“苦战3年。改变全国面貌”。曾希圣想说服我，拿出3张河网化地图，说农村可以基本改变。农村也许能够办到，至于全国，我看还要考虑一下。3年之内，大概能够搞到三千到四千万吨钢，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搞三、四千万吨钢能说基本改变了面貌？这个标准，我看提得低了一点，不然，以后就没有什么改头了。以后五千万、六千万、一亿、二亿，算什么呢？我看大改还在后头呢！因此3年内还不能说基本改变了全国面貌。到1962年大概有五、六千万吨钢。那时也许说基本改变了全国面貌。那时就有英美今天的水平了，是不是到那时还不说基本改变。因为六亿多人口的国家，面貌改得这样快，化装都化好了？到底怎么说好，值得商量一下，因为报纸已在大宣传。或者提5年基本改变，10年到15年彻底改变，如何最好，请同志们考虑，或者超过英国叫基本改变，超过美国叫彻底改变。**勉强去超，累得要死，不如稍微从容一点。**假如不要这么多年，3年、4年就完成了怎么办？能提前实现也好嘛！提前的时间长一点，结果时间缩短了，我看也不吃亏，曾希圣有一个办法，无非是当“机会主义”。安徽去冬今春水利开始搞八亿土石方。以后翻了一番，变成十六亿。八亿是机会主义，十六亿是马克思主义。没有几天又搞了三十二亿，十六亿就有点“机会主义”了。后来提高到六十四亿了。**我们把改变面貌的时间说长一点，无非是当“机会主义”者。这样的机会主义，很有味道，我愿意当，马克思赏识这种机会主义，不会批评我。**

四、党内外某些争论问题：围绕人民公社。党内党外有各种议论，大概有几十万、几百万干部在议论，有一大堆问题搞不清楚，一人一说，十人十说，没有作全面分析，深入分析。国际上也有议论，大体上有几说：一说是性急一点，他们有冲天干劲，革命热情很高，非常宝贵，但未作历史分析，形势分析，国际分析，这些人好处是热情高，缺点是太急了，纷纷宣布进入全民所有制，两三年进入共产主义。**这次决议的主要锋芒，是对着这一方面讲的。就是说不要太急了。太急了没有好处。**有了这个决议，经过这个决议，经过几个星期，几个月，他们在实践中、辩论中可以大体上搞清楚。

五、研究政治经济问题。在这几个月内。读一读斯大林的《论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拿出几个月时间，各省要组织一下。为了我们的事业，联系实际研究经济理论问题。目前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郑州会议我曾经提过这个建议．我写了一封信建议大家研究。

六、研究辩证法问题。郑州会议时，不知是哪位同志提出“大集体，小自由”，这个提法很好。

**要抓生产，又要抓生活。**两条腿走路是对立统一的学说，都是属于辩证法范畴的。马克思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1958年在我国有很大的发展。例如，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工农业同时并举，重工业与轻工业同时并举，中央工业与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中小企业同时并举。小土群与大洋群，土法与洋法，几个并举。还有管理体制——中央统一领导和地方各级分级管理，从中央、省、地、县、公社一直到生产队，都给他一点权，完全无权是不利的。这几种思想，在我们党内已经确立了，这很好。小土群，大洋群也是并举的，还有中洋群，例如唐山、黄石港不是中吗？有没有小洋群？也有，还有洋土结合群。总之，复杂得很，这些事在社会主义阵营，有些国家认为是不合法的，不许可的，我们许可，在我们这里是合法的。许可好还是不许可好？还要看几年。但**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啥也没有，穷得要命，搞些小土群也好嘛！专搞大的太单调。**在农业中也是很复杂的，有高产、中产、低产同时存在。实行耕作“三三制”是群众的创造，北戴河会议抓着了提出了三分之一种粮食，三分之一休闲、三分之一种树。这可能是农业革命的方向。**又提出“八字宪法”：水肥土种密保工管。**人不喝不行。植物不喝也不行。

在社会主义制度方面。在社会主义阶段，有两种所有制同时存在。是对立又是结合，是对立的统一。集体所有制中包含了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核心因素。它的根本性质是集体所有制，并且包含有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因素。**尤金最近说，中国提出集体所有制中包含有共产主义因素是对的。**说苏联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中，也包含着共产主义因素。资本主义社会不允许组织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中，应该也可以允许共产主义因素的增长。斯大林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把3种所有制，即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绝对化，截然分开，是不对的。

以上这些可否都讲成辩证法的发展。

郑州会议提出“大集体，小自由”，现在又提出抓革命又抓生活。这都是辩证法的推广。**武昌会议又提出实事求是，订计划又热又冷，要雄心很大，但又要有相当的科学分析。**当然这个决议，想解决一切问题也不可能。我看这个决议慢一点发表为好。只发表一个公报，明年3月人代会上发表，这和我们的雄心大志相符，避免了由1958年大跃进而产生的某些不切合实际的想法，比较有根据，比较有科学分析了。对于钢的问题。明年搞三千万吨钢，我也赞成过。到武昌后，感到不妙。过去我也想过1962年搞到一亿或者一亿二千万吨，那时只担心需要不需要的问题。忧虑这些钢谁用，没有考虑到可能性的问题。后来又考虑到可能性的问题。一是可能，一是需要，今年1070万吨累得要死，因而对可能性发生问题。明年三千万吨，后年六千万吨，1962年一亿二千万吨，是虚假的可能性，不是现实的可能性。现在，要把空气压缩一下。把盘子放小——一千八百至二千万吨。是否不能超过呢？到明年再看，二千二百至二千三百万吨都可以，行有余力则超过嘛，现在要压缩一下，不一定订那么高。**留有余地，让群众的实践去超过我们的计划，这也是一个辩证法的问题。**实践，包括我们领导干部的努力和群众的实践在内。提得低，由实践把它提高，这并不是机会主义。从一千一百万吨到二千万吨，成倍的增长，全世界从古以来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主义”。这里也要联系到国际主义，要和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联系起来。要和整个世界工人阶级的国际团体联系起来，在这个问题上不要抢先。现在有些县总是好抢先，要先进入共产主义。其实要先进入共产主义的，应该是鞍钢、抚顺、辽宁、上海、天津。中国先进入共产主义跑到苏联前头，看起来不像样子。有没有可能也是问题。**苏联的科学家有150万，高等知识分子几百万，工程师50万，比美国多。**苏联有五千五百万吨钢，我们还只有这么一点。他积蓄的力量大，干部多，我们才开始。所以可能性也是成问题的。赫鲁晓夫提出的七年计划，还是准备进入共产主义，提出两种所有制，逐步合一，这是很好的事。一个不应该，一个不可能。即使我们可能先进也不应该先进。十月革命是列宁的事业，我们都不是学习列宁吗？急急忙忙有何意思！无非是到马克思那里去请赏。如果那样搞，可能在国际问题犯错误，要讲辩证法。要注意互相有利，辩证法有很大的发展，就涉及到这个问题。

七、郑州会议搞的十五年纲要，这次搁下没有谈，可能不可能，需要不需要，都缺乏根据，不仅缺乏充分的根据，而且缺乏初步的根据，苏联和美国的经验，都不能证明搞那么多，是不是可能？就是可能了，也找不到买主。因此目前不定这个纲要，我们可以每年到冬季拿出来谈一次。明年，后年，大后年都不作这种长期计划。大概到1962年可以作一个长期计划，再早是不行的，全党全民办工业搞了几年，可能和需要的问题也许到那时可以看出一点。这次会议没有谈，收起来了，有些同志失望了。

八、1958年军事工作有相当大的发展，一是大整风，二是官长下连队当兵，三是参加生产，四是大办民兵。自从6月在北京开整风会议后，各级一直开下来，到现在可能已经开得差不多了。训练，这件事，也不能丢，如果全去整风、生产、炼钢、搞公社、搞水利，那也不行，军队总是军队，训练是经常任务。

九、关于教育制度的改变。实行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的制度这也是一件大事，当然也发生了一点问题。例如，有的学生不想读书，劳动搞出味道了，如果很多人不想读书就成了问题。成了问题就开会，开了会又会读书。

十、两种可能性问题。一种事物总有两种对立的东西。我们的党也有两种可能，一是巩固，一是分裂。在上海时，一个中央分裂为两个中央，在长征中与张国焘分裂，高饶事件是部分分裂。部分的分裂是经常的。去年以来，全国有一半的省份在领导集团内发生了分裂。**人身上每天都要脱发、脱皮，这就是灭亡一部分细胞。从小孩起就要灭亡一部分细胞，这才有利于生长。如果没有灭亡，人就不能生存。**自从孔夫子以来，人要不灭亡那不得了。灭亡有好处，可以做肥料，你说不做，实际做了。精神上要有准备。部分的分裂每天都存在。分裂灭亡总会有的。没有分裂，不利于发展。整个的灭亡，也是历史的必然。整个讲，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党和国家，是要灭亡的。但在它的历史任务未完成前，是要巩固它，不希望分裂，但要准备分裂。没有准备，就要分裂。有准备，就可避免大分裂。大型、中型的分裂是暂时的。匈牙利事件是大型的，高饶事件、莫洛托夫事件是中型的。每个支部都在起变化，有些开除，有些进来，有些工作很好，有些犯错误。永远不起变化是不可能的。列宁经常说：国家总有两种可能，或者胜利，或者灭亡。**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有两种可能，胜利下去，或者灭亡。列宁是不隐讳灭亡这种可能性的，我们人民共和国也有两种可能性，不要否定这种可能性。**我们手里没有原子弹，打起来，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他占北京、上海、武汉，我们打游击，倒退十几年，二十年，回到延安时代。所以一方面我们要积极准备，大搞钢铁，搞机器，搞铁路，争取三四年内搞几千万吨钢，建立起工业基础，使我们比现在更巩固。**我们现在在全世界名声很大，一个是金门打炮，一个是人民公社，还有钢1070万吨这几件大事。**我看名声很大，而实力不强。还是“一穷二白”，手无寸铁，一事无成。现在不过有一寸铁而已，国家实际上是弱的，在政治上我们是强国，在军事装备上和经济上是弱国。因此我们目前的任务是由弱变强。苦战3年能否改变？3年恐怕不行。苦战3年，只能改变一部分，不能基本改变。再有4年，共7年时间，就比较好了，就名符其实了。现在名声很大，实力很小，这一点要看清楚。现在外国人吹的很大，许多报纸尽是大话，不要外国人一吹，就神乎其神，飘飘然了。其实今年好钢只有900万吨，轧成钢材要打7折，只有600多万吨。不要自己骗自己。粮食是不少，各地打了折扣以后是八千六百亿斤，我们讲七千三百亿斤，即翻一番多点，那一千一百亿斤不算，真有而不算，也不吃亏。东西还存在。我们只怕没有，有没有，没有查过，在座诸公都没有查过。就算有八千六百亿斤，四分之一是薯类。要估计到不高兴的这一面，索性讲清楚，把这些倒霉的事，在省，地、县开个会，吹一吹，有什么不可以，别人讲不爱听，我就到处讲讲倒霉的事，无非是公共食堂、公社垮台，党分裂，脱离群众，被美国占领，国家灭掉，打游击。我们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规律管着，不管怎样，这些倒霉的事总是暂时的、局部的。我们历史上多少次的失败，都证明了这一点。匈牙利事件，万里长征，30万军队变成两万几，30万党员变成几万，都是暂时的、局部的。资产阶级的灭亡、帝国主义的灭亡，则是永久的。**社会主义的挫折、失败、灭亡是暂时的，不久就要恢复。即使完全失败，也是暂时的，总要恢复的。**人皆有死。个别的人总是要死的，而整个人类总是要发展下去的。两种可能性都谈，没有坏处。

十一、关于我不担任共和国主席问题。这次要做个正式决议，希望同志们赞成。要求3天之内，省里开一次电话会议。通知到地、县和人民公社，3天之后发表公报，以免下边感到突如其来。世界上的事就这么怪，能上不能下。估计到可能有一部分人赞成，一部分人不赞成。群众不了解，说大家干劲冲天，你临阵退却。要讲清楚，不是这样。我不退却，要争取超美后才去见马克思嘛！

十二、国际形势。今年这一年有很大的发展。**敌人方面乱下去，一天天乱下去，我们方面好起来，一天天好起来。**每天的报纸都证明这一点。真正丧气的是帝国主义。他们烂、乱、矛盾重重，四分五裂。他们的日子不好过，好过的日子过去了。他们没有变成帝国主义之前，只有资本主义时代是他们的好日子。现在的时代是帝国主义灭亡的时代，我们的情况会一天比一天好起来。当然，也要估计到还有长期的、曲折的、复杂的斗争．并且要估计到战争的可能性。有那么一些人想冒险，最反动的是垄断资产阶级，大多数是不愿打的。

12月10日晨，毛泽东关于《张鲁传》又写了一个批语，全文如下：

张鲁传

**我国从汉末到今1000多年，情况如天地悬隔。但是，从某几点看起来，例如贫农、下中农的一穷二白，还有某些相似。**汉末北方的黄巾运动，规模极大，称为太平道。在南方，有于吉领导的群众运动，也是道教。在西方（以汉中为中心的陕南川北区域），有五斗米道。史称，五斗米道与太平道‘大都相似’，是一条路线的运动。又称，张鲁等行五斗米道，‘民夷便乐’，可见大受群众欢迎。**张陵，一称张道陵，其流风余裔经千年转化为江西龙虎山为地主阶级服务的极端反人民的张天师，《水浒传》第一回有洪太尉误走魔鬼极神气地描写，一看使人神往，同志们看过了吧？**张道陵、张衡、张鲁祖孙3世行五斗米道。其法，信教者出五斗米，以神道治病；**置义舍（大路上的公共宿舍）；吃饭不要钱（目的似乎是招徕关中区域的流民）**；修治道路（以犯轻微错误的人修路）；‘犯法者三原而后行刑’（以说服为主要方法）；‘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祭酒‘各领群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这几条，就是五斗米道的经济、政治纲领。

**中国从秦末陈涉大泽乡（徐州附近）群众暴动起，到清末义和拳运动止，2000年中，大规模的农民革命运动，几乎没有停止过。同全世界一样，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

毛泽东 1958年12月10日，于武昌

他批示将《张鲁传》印发给与会者阅读。为了帮助与会者阅读，他又把7日写的批语划去，指示将10日写的这个批语印在《张鲁传》的前面，一同发给与会者。

12月10日上午，八届六中全会讨论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决议》中说：

**共产主义者从来都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劳动将沉重的负担变为愉快，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将来每天劳动的时间无疑将大大缩短。随着机械化、电气化的发展，我们必须争取在今后若干年内开始实行每天劳动6小时的制度。

现阶段的人民公社，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要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需要经过更长得多的时间。

实现两个过渡，必须以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发展为基础，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农村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那样做，不仅是一种轻率的表示，而且将大大降低共产主义在人民心目中的标准，使共产主义伟大理想受到歪曲和庸俗化，助长小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倾向，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在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上，我们不能在社会阶段上停步不前，但是也不能陷入超越社会主义阶段而跳入共产主义阶段的空想。

在今后一个历史时期内，人民公社仍应保留按劳分配制度，人民公社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必须有一个很大的发展。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过早地否定按劳分配原则，企图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勉强进入了共产主义，这无疑是一个不可能成功的空想。

《决议》中还明确宣布说：

“社员个人所有的房屋、农具、家具等生活资料和存款，仍归社员所有，而且永远归社员所有。社员可以保留宅旁的零星树木、小农具、小家畜和家禽等，也可以继续经营一些家庭小副业。”

八届六中全会还通过了《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草案中将钢产量由北戴河会议确定的2700至3000万吨降为1800万吨，生铁从4000万吨调整为2900万吨，基本建设投资从500亿元调整为360亿元等。其中关于钢生产的计划指标1800万吨，在内部的提法是，要好钢1650万吨。

毛泽东对于这个经济计划是有不同意见的，他仍然认为属于高指标的。但是，他也没有坚决地阻止这个计划的通过。以他的话说，搞大计划的人占多数。所以，他作了让步。

全会同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六中全会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做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的决定》。全文如下：

几年以来，毛泽东同志曾经多次向中央提出，希望不再继续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职务。中央全会在经过了充分的、多方面的考虑以后，决定同意毛泽东同志这个提议，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不再提他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候选人。中央全会认为，这完全是一个积极的建议。因为**毛泽东同志不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专做党中央的主席，可以使他更能够集中精力来处理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路线的问题，也有可能使他腾出较多的时间，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工作，而并不妨碍他对于国家工作继续发挥领导作用。**这样，对于全党和全国人民都更为有利。**毛泽东同志是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的久经考验的领袖，在他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以后，他仍然是全国各族人民的领袖。在将来，如果出现某种特殊情况需要他再担任这种工作的时候，仍然可以根据人民的意见和党的决定，再提他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各级党委应当根据这些理由，在党的适当会议上，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在工矿企业工人的集会上，在人民公社的集会上，在机关、学校、部队的集会上，向党内党外的干部和群众进行充分的解释，以便大家了解这件事的理由，而不致有所误解。

全会最后通过了中共中央八届六中全会会议公报，公报中说：

“全体会议经过充分的讨论，通过了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八届六中全会决定，1959年我国的钢产量为1800万吨、煤产量3亿8千万吨，粮食产量为10500亿斤，棉花产量1亿担。这4大指标是根据今年第一季度生产和建设情况编制的。这个计划草案的编制，对于我国物质技术条件的客观可能性和人民群众的革命干劲的主观能动性都作了认真的考虑。这是一个能够实现国民经济继续大跃进的宏伟计划。”

12月10日这一天，美国在中国的沉重打击和世界舆论的压力下，被迫宣布从台湾海峡地区撤出部分海、空军。

12月12日，周恩来和外交部长陈毅邀请7日来访的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社会事务部长优素福·本·赫达和军备供应部长谢里夫率领的代表团，到武汉参观访问。

12月13日，毛泽东在武汉会见了优素福·本·赫达、谢里夫和代表团成员，他在谈话中说：

“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承认法国，不承认你们，在这些多数国家面前你们是非法的，但是，这是暂时的因素，我国在大多数国家面前也是非法的，81个国家中只在31个国家面前是合法的。我们不承认英国完全合法，是半合法（中英之间是代办级关系——笔者注），而承认你们是合法。我们看你们同看英国完全不同，因为你们是革命的。”

“你们正在斗争着，在反帝国主义的形势下，我们这里也算是一条前线，是东方的前线，是在太平洋的西边。你们是西方的前线。”

“我们应该支持你们，因为你们在反对帝国主义，跟我们的斗争一样。这是我们的国际义务。”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与客人共进晚餐。晚餐结束后，他还与阿尔及利亚来宾及湖北省、武汉市各界人士，一起观看了精彩的文艺演出。

12月19日，中共中央宣布说：经过全国人民3个半月的奋战，“1958年我国人民夺取1070万吨钢的大战已经告捷”（蒋介石统治中国22年，年钢产量最多在5万吨左右）。

后来到1958年12月底，全国超额完成了炼钢任务，**钢产量达到了1100万吨。其中合格的钢材有810万吨，不合格的钢材即土钢近300万吨**（请注意，这些土钢以后还可以继续冶炼成合格的钢材）。

在这一年的群众性炼钢运动中，一些小土群高炉冶炼的钢几乎不能用。有的地方和单位为了追求数字，放卫星，把不少铁制品，甚至把老百姓的铁锅都拿来，砸碎了炼钢。上述近300万吨土钢基本上都是这样炼出来的。更为严重的是在这次群众运动中，很大一部分领导干部包括基层干部滋长了浮夸风，虚假现象十分严重，强迫命令盛行，给人民群众造成了一些灾难和损失。

正是：一年炼钢八百万，开天辟地数毛公。若无邀功浮夸者，哪个哈儿能唧声。

欲知毛泽东此后的活动情况，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是毛泽东在探索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深思熟虑的结晶。本传前面把这三件大事的探索过程都交代清楚了，历史将永远证明，这三大探索及其结果是人类历史上了不起的创举，是任何人都无法抹煞的。本章后半部分，又不厌其烦地将毛泽东在八届六中全会上的总结讲话全文抄录，也是为了证明毛泽东在这个探索过程中是十分慎重的。特别是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他是党内第一个察觉到共产风、浮夸风的严重性和危害性的最高领导人，从郑州会议开始，一直到武昌会议，在党内高层不间断地进行了说服教育，竭力纠正那些“左”的倾向。即使在八届六中全会结束以后，毛泽东也毅然决然地同党内的“左”的错误倾向做着不懈的斗争，1959年又同党内出现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做了坚决的斗争。这就是历史真相！

**第65章**

“**六中全会到现在，两个半月，根本没有实行。人民公社**

**没有阻止一平、二调、三收款这股风。”**

话说1958年12月21日上午，毛泽东在广州看了《文物》第9期刊登的《毛主席诗词十九首》及有关人员的注释，在书眉上批注道：

我的几首歪诗，发表以后，注家蜂起，全是好心。一部分说对了，一部分说的不对，我有说明的责任。1958年12月，在广州，见文物出版社9月刊本，天头甚宽，因而写了下面的一些字，谢注家，兼谢读者。

鲁迅1927年在广州，修改他的《古小说钩沉》，然后说道：于是云海沉沉，星月澄碧，饕蚊遥叹，予在广州。从那时到今天，31年了，大陆上的饕蚊灭得差不多了，当然，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港台一带，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阵。**安得起全世界各民族千百万愚公，用他们自己的移山办法，把蚊阵一扫而空，岂不伟哉！试仿陆放翁曰：

**人类今闻上太空，但悲不见五洲同。愚公尽扫饕蚊日，公祭无忘告马翁。**

毛泽东 1958年12月21日上午10时

毛泽东又在《沁园春·雪》这首词旁批注道：

“雪：反封建主义，批判两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文采、风骚、大雕，只能如是，须知这是写诗啊！难道可以谩骂这一些人吗？别的解释是错的。末3句，是指无产阶级。”

还在他所写的“才饮长沙水”中的“长沙水”3字旁批注道：

“民谣：常德德山山有德，长沙沙水水无沙。所谓长沙水，地在长沙城东，有一个有名的‘白沙井’。据说井水很甜，名叫沙水。”

他在《沁园春·长沙》中的“击水”批注道：

“击水:游泳。那时初学，盛夏水涨，几死者数。一群人终于坚持，直到隆冬，犹在江中。当时有一篇诗，都忘记了，只记得两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

12月22日，毛泽东为中宣部12月19日编印的《宣教动态》第165期上刊载的《清华大学物理教研组对待教师宁“左”勿右》一文给陆定一写了一个批语。

文章中说：“最近清华大学公共教研组党总支检查了物理教研组支部的工作，并组织党员讨论了对知识分子的政策。讨论中暴露出以下问题，”“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知识分子是革命对象，过共产主义关更是革命对象，因为他们绝大多数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剥削阶级，连团员助教也被认为是革命对象。”“认为高级知识分子都是从根本上反对党的教育方针，他们摆开了阵势向我们进攻，必须还击；所有的统战对象都是促退派，把他们摆在这里，只是为了树立对立面。”“认为从工人阶级的利益出发，应当走阶级路线，在学校中提群众路线是不妥当的。**为了划清界限，宁可左一些。**认为提‘发挥老教师的作用’就会模糊阶级界限，放松斗争。由于这些错误的认识，他们在工作中采取了一些错误的作法。该教研组主任刘绍唐（中左），一贯表现较好, 但支部却认为他只能起反面教员的作用。编教学大纲时, 让他带了几个落后助教编，党团员背着他又另编了一个, 准备唱对台戏。刘表现非常积极，开夜车将教材编出来了, 无可批判，党员却将他编的大纲丢在一边，只把党团员编的大纲交给群众讨论。清华大学党委最近已检查纠正了这种错误作法。”

毛泽东在给陆定一的批语中写道：

陆定一同志：

建议将此件印发全国一切大专院校、科学研究机关的党委、总支、支委阅读，并讨论一次，端正方向，**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教授、讲师、助教、研究人员，为无产阶级教育事业和文化科学事业服务。**你看如何？文学艺术团体、报社、杂志社和出版机关的党委、党支，也应发去，也应讨论一次。请酌定。

毛泽东 1958年12月22日

后来在12月27日，中共中央将毛泽东对《清华大学物理教研组对待教师宁“左”勿右》一文的批示作为文件和原件一起，发给“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西藏、宁夏工委”，“望印发教育部门、文化部门、卫生部门，各大专学校、科学研究机关、医院、文学艺术团体、报社、杂志社和出版机关的党委、总支委、支委阅读并讨论，端正对知识分子的工作方向。”

12月23日，毛泽东在广州军区接见参加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代表，并同与会的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各院校的负责人共50余人谈话。在谈到看问题要看到有两种可能性时，毛泽东说：

“坏事无非是打世界大战，扔原子弹，原子弹我们一个也没有。再有，中国共产党分裂，分成两个中央、3个中央。我们国家还有灭亡的危险没有？有。我们就是灭亡，也是暂时的、局部的。人民公社也会崩溃一部分，这没有坏处，可以得到教训。你有垮台的准备，就不会垮，至少是垮得少，你可以整顿教育。你如果没有垮台的准备，那就危险。这样讲，与东风压倒西风、纸老虎等论点，似乎不符合了，其实还是符合的，什么事情都有两个可能性，巩固或者崩溃。所谓纸老虎，并不是说它现在已经死了，不打是不会死的。帝国主义还活着，还是要斗争，到最后它就死了。要经过斗争，中间有曲折，不会没有风浪的。”

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65周岁寿辰，广州的负责人和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在中午特地为他加了几个菜，一来是为他祝寿，二来是为他饯行。可惜毛泽东正在睡觉，未能吃上这顿饭。他起床后听说了此事，就把有关人员狠狠地训了一顿。

12月30日，毛泽东回到了北京。

1959年1月3日，大金门岛上的国民党军炮兵突然向南安县大嶝岛实施炮击，造成山头村托儿所31名儿童死亡，17人受伤。

毛泽东闻讯，决定于1月7日向金门实施第7次大规模炮击。为了表示惩罚少数作恶分子和利于国民党继续固守金门，毛泽东指示说：

“此次炮击目标只限于炮兵阵地。”

1月4日晚，毛泽东给杨开英写了一封回信。

原来，杨开英自从调到北京工作后，虽然与毛泽东同在一个城市，近在咫尺，可她不常去见毛泽东。即使有什么事，也只是写写信，或捎口信向他表示问候。不久前，毛泽东收到杨开英寄来的一封信，得知她近期身体有所好转，病已痊愈，便写了这一封回信，他写道：

友妹：

信收到，很高兴。我尚好，勿念。

兄 字 1月4日

1月7日下午2点钟，福建前线指挥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组织了28个营又8个连的炮手们，以26000多发炮弹，向大金门岛上的国民党军炮兵阵地发动了大规模的炮击。此后，金门国民党军的气焰大为收敛。

1月9日，福建前线部队依照毛泽东“今后逢单日不一定都打炮”的指示，炮击次数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减少。

后来有历史学家曾经评论说：“毛泽东在炮击金马问题上，既有强硬的原则立场，又有机动灵活的斗争策略，他以卓越的政治远见和高超的斗争艺术，打击了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企图，既没有引起大规模的战争，也从没有给自己造成被动。”此言不虚。

1959年1月间，毛泽东对秘书林克说起了他学习英语的烦恼，他说：

“到处碰石头，很麻烦。”

他还说，要给自己定一个5年计划的目标，要通过学习，能够看英文的政治、经济、哲学方面的文章。

林克考虑到毛泽东要务缠身，日理万机，为了节约他的时间，从此以后就对他未学过的单词，事先代替他查好字典，注明轻重音。可是，毛泽东往往还要亲自翻翻字典，看看音标和注解。

毛泽东的湖南乡音浓重，在湖南的方言中“N”“L”不分，因而在读英语时，常常把night(夜晚)误念成light(光、亮)。每当此时，他就像个谦恭的学生，听林克讲解发音要领，随着林克的领读，反复练习。

毛泽东不像有些人学外语，念错几次便羞得张不开口。他始终是爽爽朗朗地大声念，坦坦然然地大声改。他学英语的方法也与众不同，不是从初级课本到中级课本这样的顺序读，而是从新闻、时评、政论入手，逐步学习理论文章和经典著作。如《矛盾论》、《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4卷、《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等英译本。《矛盾论》英译本，他学过3遍，《共产党宣言》英文本也读过不止1遍。他在《矛盾论》、《共产党宣言》的英文本每页的空白处，都用行草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注解。他每读1遍，便又注解一遍。

1月18日，毛泽东召集陈云、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彭德怀、谭震林讨论经济问题和工业问题。

1月19日，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1月26日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讨论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轻工业和市场、农业、劳动力调配等问题。

1月21日，毛泽东会见了墨西哥前总统卡德纳斯将军，他在谈话中说：

“我认为古巴事件是当前一个重大事件，亚洲人民应该支援他们反抗美国。”

1月22日，毛泽东在审阅邓小平报送的中央关于动员两千青壮年入藏屯垦生产的指示稿时，加写了一段话，他写的是：

“在西藏地区，现在及今后几年内，是敌我双方争夺群众和锻炼武装能力的时间。几年之后，例如三四年，五六年，或者七八年之后，总要来一次总决战，才能彻底解决问题。西藏统治者原有兵力很弱，现在他们有了一支斗志较强的万人叛乱武装，这是我们的严重敌人。但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反而是一件好事，因为有可能最后用战争解决问题。但是（一）必须在几年中将基本群众争取过来，孤立反动派；（二）把我军锻炼得很能打。这两件事，都要在我军同叛乱武装的斗争中予以完成。”

接着，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转发山东省委《关于馆陶县停伙、逃荒问题的检查报告》写了一个批示，全文如下：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并转地、县及人民公社党委：

山东省委关于馆陶县停伙逃荒问题的检查报告转发各地，希望认真注意这个问题。**去年馆陶县粮食比1957年增产，但仍有25%的耕地受到水灾，完全失收的即占16%，加上虚报浮夸和反瞒产的错误作法，造成了目前比1957年更严重的现象。**

**1958年全国受到水旱灾害耕地面积是4亿亩，成灾面积是1亿亩，其中80%是旱灾。**经过几年来水利工程，旱灾规律已经发生变化，老规律的旱灾是成片，易于发现，新规律的旱灾是插花，容易忽视。在丰收地区中，往往有一些减产、平产或者增产不多的地方，如果不认真注意，就容易在这部分地方发生严重问题，**1956年广西饿死人的事件，在平乐、荔浦等县，也是在一般丰收中的插花灾区发生的，**如果加上作风上的虚报浮夸，为了怕失面子，不许群众向上级反映真相，秋收中的粗糙，秋后有一段多吃了一些，等等因素，就更容易发生问题。**据湖南攸县黄土岭人民公社党委书记谈，1958年比1957年每人粮食由4百斤增加到近1200斤，1958年是平安过去了，1959年如果不认真做工作，粮食这样多的地方也可能发生粮食不够吃的问题。由此可以说明，粮食虽然大增产了，如果抓不紧，处理不当，发生问题的可能性也同样很大。这个问题，中央在电话会议中，已经一再要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抓紧检查、解决，并且发过指示。但有的地方，似乎至今还麻痹大意，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希望各地党委认真抓这个问题，在春节前把受灾地区，减产、平产或者增产不多地区，和虚报较大地区，进行认真地检查和安排，千万不可疏忽大意。

中央 1959年1月22日

1月28日，毛泽东给远在北大荒的吴凤君写了一封回信。

吴凤君原是中南海文工团的一名战士，这位16岁的姑娘在毛泽东面前就像对自己的老父亲一样，口无遮拦，而且话特别多。有一次，她对毛泽东说：

“主席，我们今天又上安东市场玩去了。今天的饺子真香啊，馅里搁了好多香油呢！”她还劝毛泽东也去市场看看。毛泽东说：

“我哪有这种自由，他们都管着我。想吃的东西不能吃，想去的地方不让去，我一点自由都没有。”

吴凤君不解地问：

“哟，主席还有牢骚呐？”

毛泽东认真地说：

“主席也是人嘛。”

1958年，人民解放军10万大军高唱着“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歌儿，打起背包开往北大荒垦荒。中南海文工团本来只有一个名额，可姑娘小伙子们全都报了名，坚决要求到北大荒干革命。在他们的强烈要求下，公安军政治部就批准了吴凤君、李艾、熊乃雄、胡敏英、蒋自重、梁小芳等二十几名战士加入垦荒大军。吴凤君马上去报告毛泽东说：

“主席，我要上北大荒去了。”

毛泽东看了吴凤君一眼，没吭声，过了一会儿，他很动感情地说：

“我是很舍不得你们走的。但不能因为我而耽误你们的前途，你们应该远走高飞。到了北大荒，别忘了给我写信，报告你们那儿的新闻。”

去北大荒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中央办公厅在春藕斋为战士们举行了一个送别舞会。毛泽东看着身边这批马上就要开往北大荒的小姑娘和小伙子们，问道：

“你们是自愿去的吗？”

年轻人纷纷回答：

“是自愿的。”

“主席，我们是响应党的号召，去建设和保卫北大荒！”

在《浏阳河》的乐曲声中，舞会开始了。李艾邀请毛泽东跳舞。毛泽东边舞边说：

“嗯，不怕鬼的姑娘，你也要远走高飞啰。”

李艾告诉毛泽东，她打算提前两天走，去哈军工看望男朋友。毛泽东热心地出主意说：

“你们就结婚好啰，还等什么？”

“主席，我们还没有谈到结婚的事呢。”

毛泽东见李艾羞红了脸，又打趣说：

“好嘛，有什么喜事写信告诉一声，让老头也高兴高兴。”

旁边的吴凤君嬉笑着插话说：

“主席，您那么忙，哪有时间看我们的信呀？”

毛泽东却认真地说：

“哎，你们的信实在太宝贵了。你想，我不可能接触到那么多的老百姓啊，你们把下面的情况及时告诉我，有什么困难也可以来信讲嘛。”

吴凤君等人就要出发了，毛泽东又一次接见了他们，语重心长地鼓励他们说：

“一个人年轻的时候吃点苦是好事，你们去北大荒肯定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无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要保持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主席，我们记住了！”

“再见了，主席。”

……

后来，身在北大荒的吴凤君得知自己的好友小刘和毛泽东的卫士张仙朋结婚了，住在中南海里，就常常通过小刘打听毛泽东的健康状况。毛泽东知道后对小刘说：

“你告诉小吴，再不给写信，我就生她的气了。”

吴凤君收到小刘的劝告信后，激动得热泪盈眶，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她就接连给毛泽东写了两封信。毛泽东在给她的回信中写道：

小吴同志：

两信都收到了，感谢你。你的文化、政治都提高了，劳动和技术想必也学了很多，为你祝贺！还有一件事要向你祝贺的，你的婚事解决了，向你们两人致祝贺！承致好意，极为感谢。我也时常想念你，大概永不能忘记。是我主张你们远走高飞的，是我主张你们改行的，你们远飞到千里之遥，改业为生产者了，多么好啊！文工团何必要占那么多的生产力呢？现在还是多了些，还应有一部分人远飞改业，于人民事业有利。你们去北大荒的一群人，听说不全在一起，她们在何处？寄小胡一信，劳神转交为荷。

祝好！

毛泽东 1959年1月28日

1959年春节前夕，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提议说，要给他拜年。毛泽东说：

“算了吧。”

可大家都不依，毛泽东只好同意找个机会一起团拜一次。

2月8日是农历的大年初一，这天晚上，毛泽东身边的一批工作人员，都带着自己的爱人和孩子，一起到丰泽园颐年堂举行团拜会。毛泽东问罗光禄的爱人说：

“你叫什么名字？”

罗光禄的爱人回答说：

“我叫刘若风。”

毛泽东说：

“这名字好！你是不是知识分子？”

刘若风说：

“我不是知识分子，是工农分子，在建设部工作。”

毛泽东说：

“工农分子也好，知识分子也好，总之知识分子要工农化，工农分子要知识化，两者要结合起来啰！”

大家簇拥着毛泽东，要照个合影像。众人都很客气地把年纪较大的刘若风和管理员张国玺的爱人两个人推到前面，紧靠在毛泽东身边，而秘书们则习惯地靠边站着，拍摄了一张珍贵的合影照。

团拜会结束时，毛泽东又兴致勃勃地和工作人员的孩子们一起照相留念。

2月上旬，毛泽东为调查农业生产的真实情况，嘱咐田家英带着秘书室的工作人员到农村去亲自种植试验田。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田家英向我们传达了主席的指示，他说，主席讲，岸英当年从苏联回来的时候，我就让他去向农民学习，拜农民为师。你们也要亲自下去，要跟农民一起劳动，拜农民为师。你们下去以后，要找一块最好的地，量好面积，用最好的种子，用农民最好的办法，自己种，自己管理，不要别人插手，从下种到收割，全部自己来，看到底能打多少斤粮食。打下的粮食，你们也要自己去称，是多少就是多少，不准多一斤，也不准少一斤，回来把结果告诉我。1959年刚过完春节，田家英、逄先知、李学谦（女）、骆文惠（女）和我5个人组成了一个小组，田家英当组长，我担任临时支部的支部书记。”“我们一行来到了四川省新繁县的大丰人民公社。”

2月14日，毛泽东会见了智利《最后一点钟》报社社长阿图罗·马特·阿历山德里，他们在这次会见中的谈话内容节录如次：

马特：我有些理论问题不清楚，想在这里提一提。主席先生是世界上第一流的理论家，不知有无时间解答？

毛泽东：你这个说法不对。

马特：理论著作我看过很多。我认为只有列宁和您的著作最好。

毛泽东：忙于工作，没有充分的时间研究理论问题。

马特：我认为，所谓马列主义是指马克思和列宁两人的著作。其中属于认识论的唯物主义是普遍的真理，还有一部分是属于具体实用的而必须在实践中加以考察的学说。就此而言，马列主义中属于后一部分的学说是否需要不断改进？

毛泽东：你这个讲法不合适，马列主义至今未变。唯物主义并不等于马列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就已经有唯物主义，资产阶级曾经发挥了唯物主义，例如法国的唯物主义。辩证法也不是马克思发现的，例如德国过去有唯心辩证法。马克思是改造了这两种东西。他把唯物主义改造成为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是联系的、发展的。为什么会有发展呢？因为有矛盾存在。他把辩证法改造成为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是正确反映客观世界的辩证法，这与德国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不同。至于马克思、列宁关于个别问题的结论做得不合适，这种情况是可能的，因为受当时条件的限制，例如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在西方几个国家同时取得胜利的结论。

马特：这正是我要提的问题。

毛泽东：列宁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

马特：列宁改变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说，说无产阶级革命可以在单独一个国家内取得胜利。

毛泽东：马克思、恩格斯说过无产阶级革命将在几个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国家同时发生，现在改变了这个结论。例如，俄国经济比西欧落后，却首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这就证明，无产阶级革命是可以首先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的。

马特：这本来是没有预料到的，即使是列宁，也是事后才看出来的。

毛泽东：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前就已经发现。

马特：但是在二月革命之后。

毛泽东：列宁在从事研究工作的后期，指出了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看出了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有可能引起世界大战，有可能首先在一国或几国爆发革命，在东方国家中也有这种可能。

马特：列宁是在以后才看出的。

毛泽东：列宁在第1次世界大战期间研究了这个问题，并且得出结论：无产阶级革命可以首先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当然，他没有预料到在什么国家首先取得胜利。

马特：列宁说专政只能由一个政党执行，而主席先生说无产阶级专政可以由几个政党联合执行，这是不是离开了马列主义？

毛泽东：不能说离开了马列主义。中国的民主革命，可以说是几个政党联合进行的，但是以共产党为首。**中国有两次革命，1949年以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解决反帝、反封建、反国民党统治的问题，那时我们没有触动民族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后一次革命，想必你也知道，就触及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以及个体手工业与个体农业的所有制。**对这些所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经过了几个步骤。后一次革命经过几年，已基本完成。这两次革命，都是以共产党为领导进行的。

我们先动买办资产，而对民族资本我们好几年未动。至于个体农民，我们首先分配土地为农民所有，第二步才将他们组织起来，搞合作化。对于民族资本，我们分几个步骤进行改造，最后一个步骤就是公私合营。国家采取了和平赎买政策，分好几年赎买。现在，原属民族资本的那些企业都是由国家管理。

**中国过去的资本主义，主要是官僚资本和帝国主义资本，占80%，民族资本只占20%。官僚资本和帝国主义资本归国家所有以后，资本的主要部分就已归国家所有了。**对民族资本我们采取和缓的政策。资本家现在同我们合作。

马特：还有一个理论问题，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先在东方经济落后的国家取得胜利？

毛泽东：这个道理很简单。东方国家的统治者不能解决他们国家的问题，东方国家人民首要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这些国家被西方国家剥削得很贫困。这里讲的东方，包括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即所谓帝国主义的后方。

马特：马列主义有关实用的部分，现在有些已不适用了。比如西方国家，社会经济是垄断的，但政治上并不尽然，因为还有自由，这个自由并不影响社会的发展。所以，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上的专制这两个东西，是否可以分开？

毛泽东：这首先要对专政作分析，**西方国家的所谓自由，实际上是资本家有剥削的自由。西方国家的政权不可能由多数人掌握，而只能由资本家统治，这就是独裁。**

马特：如果把今天谈话的内容发表出去，会不会有人认为主席先生背叛了马列主义？

毛泽东：我不认为中国背叛了马列主义。中国的党一贯遵守马列主义的原则，因为它是普遍的真理。这是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情况的统一的问题。

2月17日下午，毛泽东在会见摩洛哥共产党代表团时说：

**“现在，我们又讲跟蒋介石合作，他说不干。我们说要合作共同反美，他不干。我们说，总有一天美国要整他，总有一天美国要承认我们，丢掉他。蒋介石不懂得这一点。我们搞第3次合作，他通过秘密的间接的方法跟我们联系，公开不敢，怕美国，而我们不怕。”**

2月21日下午，毛泽东在接见喀麦隆人民联盟代表和几内亚、肯尼亚、马达加斯加青年代表时说：

**“整个非洲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跟着帝国主义走的人，而不是反对资本主义，不是建立社会主义。在非洲提出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要犯错误。**事实是帝国主义依靠它的走狗，联合非洲的一部分人压迫非洲。**目前非洲这种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一般说来，整个非洲的斗争还是长期的。一不要以为马上可以胜利，明天早上就胜利，要准备长期斗争。如不做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而帝国主义那么强大，就要失望。二要以依靠自己力量为主，争取外国援助为辅。我有两个建议，请你们考虑。我不熟悉非洲的情形，我又不是非洲人。我讲我的意见，供你们参考。

非洲当前的革命是反对帝国主义，搞民族解放运动，不是共产主义问题，而是民族解放问题。这点我们的意见都是一致的。另外两点：一是胜利的快慢问题。可能胜利快，也可能胜利慢，无非这两种。两头都准备，就不至于失望。二是依靠什么力量的问题。是依靠外国来解放非洲，还是依靠非洲人自己解放非洲？要依靠非洲人自己解放非洲。非洲的事情非洲人自己去办，依靠非洲人自己的力量。同时也要在世界上找朋友，包括中国在内。至于中国，一定支持你们。这两点是否对，请你们考虑。

看来，现在的非洲与过去的非洲有所不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8年非洲反帝运动有很大的发展。可以料到，今后非洲的反帝运动会比过去发展得更快。至于各国要帮助你们，那毫无问题。各国人民，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已经独立了的国家，一定要帮助、支持你们。你们需要支持，我们也需要支持，而且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需要支持。谁来支持我们？还不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这是支持我们的最主要的力量。支持我们的还有西欧的工人阶级。所以是相互的支持。你们那里的反帝运动就是支持我们。苏联、中国把工作做好一点，也就是支持你们。你们可以考虑，中国可以当做你们的一个朋友。我们能牵制帝国主义，使它力量分散，不能集中力量去压迫非洲。”

2月22日，毛泽东看了广东省委转发的省委书记处书记赵紫阳2月19日关于雷南县干部大会解决粮食问题的报告，为中央写了一个批语，并拟了一个醒目的标题：《中央批转一个重要文件》，他写道：

各省、市、区党委：

赵紫阳同志给广东省委关于解决粮食问题的信件及广东省委的批语，极为重要，现在转发你们。公社、大队长、小队长瞒产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造成人心不安，影响广大基层干部的共产主义品德，影响春耕和1959年大跃进的积极性，影响人民公社的巩固，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各地、各县凡是对于这个问题尚未正确解决的，必须立即动手照赵紫阳同志在雷南县所采取的政策和方法，迅速予以解决。瞒产私分是公社成立后，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惧怕集体所有制马上变成国有制，“拿走他们的粮食”，所造成的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肯定了公社在现阶段仍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这一点使群众放心了。但公社很大，各大队、小队仍怕公社拿走队上的粮食，并且在秋收后已经瞒产私分了，故必须照雷南县那样宣布粮食和干部两条正确的政策，并举行一个坚决的教育运动，才能解决问题。只要政策和方法正确，解决问题的时间只需10天或者半个月就够了。此件可登报，并可转发各地、县。

中央 1959年2月22日

2月23日，毛泽东开始乘专列南下调查研究。是日晚，到达天津，毛泽东在专列上召见河北省负责人刘子厚、解学恭、张明河及天津市负责人万晓塘、李耕涛等人，谈话进行了3个小时。

2月24日晚，毛泽东抵达济南，在专列上同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秘书长吴建谈话。随后，毛泽东前往山东省委交际处会议室，同山东省和济南市的负责人谈话。李先念参加了这两次谈话。

尔后，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转发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关于市场情况和轻工业生产问题的报告》写了一个批语，全文如下：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国务院财经各部党组，国家计委、经委、建委党组：

中央同意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3同志《关于市场情况和轻工业生产问题的报告》，现在转发给你们，请认真执行。

**市场问题，实质上是农副产品和轻工业产品的生产问题**。中央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切实加强对市场的领导，力争在第一、第二季度内，把市场供应基本上调整好，某些在第二季度还不能调整好的商品，也应当力争尽快地好转，以实际的效果来迎接国庆10周年。农副产品的收购任务，应当保证在2月底以前完成，3月份进行检查总结；主要日用工业品的生产计划，应当彻底落实，各省、市、自治区和有关部门应当抓紧组织，保证实现，轻工业生产所需要的原材料，应当按计划保证供应，不得挪作别用；外贸出口任务，应当按照规定的品种、数量、质量和时间，切实保证完成。

**各地区、各部门必须在商业工作中，切实贯彻“全国一盘棋”的精神，严格服从国家统一的调拨计划。**关于适当地改进商品管理办法的问题，中央同意报告中所提的各项原则。**商业部门应当掌握必要的物资，统筹分配，稳定物价，打击黑市。**商业部门对规定的商品，有权按照计划进行调拨。中央责成商业部门迅速提出改进商品管理办法的具体方案，报告中央批准后执行。

中央 1959年2月24日

2月25日，毛泽东为了掌握更多的第一手材料，召集历城县委第一书记和东郊公社党委书记郑松，还有一个管理区党总支书记、一个生产队长，继续谈话。

据郑松回忆说：“2月25日下午5点多钟,我和东郊公社大辛庄管理区总支书记李兰生、大辛第二生产队支部书记张印水、历城县委第一书记王任之,随同舒同和省委秘书长吴建,登上了停在济南西郊机场专车线上的主席专列。主席用铅笔逐一记下了我们每个人的名字、年龄、职务、家庭情况。下午5点半,座谈会正式开始。毛主席掰着手指头幽默地说：

‘我们这次座谈会参加的人数虽然不多,但实际上是包括中央、省、县、社、管理区、生产大队6级党的书记、就叫6级书记座谈会吧’。”

“主席的平易近人让人备感亲切,主席知识的渊博更让人敬佩。”“主席问道：

‘东郊公社在什么地方？’

舒同回答后，又说：

‘东郊公社驻地大辛庄还有商朝的古迹呢。’

毛泽东马上又问，都出土些什么文物？他借机讲了龙山文化和殷纣王的故事,他说：

‘龙山文化很有名啊！殷纣王是很有本领的人,周武王把他说得很坏。他的俘虏政策做的不太好,所以失败了。他抓着俘虏就杀,我们的俘虏政策和他不一样,是进行思想教育和思想改造工作的。’

我们听了感到非常新鲜,受到教育,增加了历史知识,同时也活跃了座谈会的气氛。”

在这次6级书记座谈会上,毛泽东办公室和身边工作人员一个也没有参加的,连个帮助做记录的秘书工作人员也没有,自始至终都是毛泽东自己亲自拟定调查的纲要,提出问题,这个问题座谈完了,就提出下一个问题。他自己口问、耳听、眼看、手写,亲自作记录,把调查的重要情况记下来。大家汇报的重要问题,毛泽东就一条一条地记下来,有时汇报人说得太快,毛泽东就说：

“慢点,慢点,我记一记。”

有些重要的情况,他还要求汇报人再说一遍,有些地方方言,一时未听明白,他就问：

“这是什么意思啊？”

毛泽东向郑松他们详细地了解了东郊公社的基本情况和整社当中遇到的一系列问题,并请他们在专列上吃了一顿便饭,边吃边聊,然后接着开。等座谈会开完，已是晚上8点半了。

是日晚11时，毛泽东乘专列离开了济南。

2月26日，毛泽东来到郑州，当晚同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等人谈话。

2月27日上午，毛泽东和吴芝圃及新乡、洛阳、许昌、信阳4个地委负责人谈话说：

“公社有穷队、中等队、富队3种。现在的公社所有制，基本上是队的所有制，即原来老社的所有制。现在的公社，实际上是‘联邦政府’。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是要逐步形成的。调多了产品，瞒产私分，又对又不对，本位主义基本合法。一个公社，有那么多管理区、生产队，有经营好坏、收入多少不同，粮食产量多少不同，吃的多少不同。生产水平不同，分配不能一样。穷队挖富队不好，他们都是劳动者。人为的抽肥补瘦，就是无偿地剥夺一部分劳动者的劳动产品给穷队。多劳的多得，少劳的少得，就都积极起来了。”

毛泽东提出了反对平调和不赞成瞒产私分的意见。他说：

**“现在，我们对穷队富队、穷村富村采取拉平是无理由的，这‘是掠夺，是抢劫’。”**

他还说：

“包括桌椅板凳都要打借条，10年偿还。评工记分、包工包产都应该坚持。评工记分是表现人与人劳动结果的关系，包工包产是表现村与村、队与队的关系，这个经验我们没有记取。积累上光搞国家积累和社里积累不行，积累上真正一盘棋，第一是农民，第二是公社，第三是国家。要认识部分是社所有，基本是队所有。”

毛泽东进一步强调说：

“瞒产是有原因的，怕‘共产’，怕外调。农民拼命瞒产是个所有制问题。本位主义是怕调，这种本位基本上是对的。”

2月27日晚，毛泽东在专列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就是第2次郑州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李先念、胡乔木，还有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毛泽东首先说：

“‘右倾’不是我一个人，山西同志也相当‘右倾’。山西我没去。我一到天津，天津同志也‘右倾’，刘子厚跟我差不多。到了山东，就听说吕鸿宾先‘左’倾，后来‘右倾’了。还有李先念，他也觉得过去‘右倾’不够。我一到河南，河南同志赞成我这个‘右倾’。我26号晚上就见了他们，跟他们一吹，我就有劲了，我才敢于下决心召集这次会议。”

他接着说道：

“现在，我来说一点人民公社的问题。我认为人民公社现在有一个矛盾，一个可以说相当严重的矛盾，还没有被许多同志所认识，它的性质还没有被揭露，因而还没有被解决。而这个矛盾我认为必须迅速地加以解决，才有利于调动广大人民群众更高的积极性，才有利于改善我们和基层干部的关系。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矛盾呢？大家看到，**目前，我们跟农民的关系在一些事情上存在着一种相当紧张的状态，突出的现象是在1958年农业大丰收以后，粮食、棉花、油料等农产品的收购任务，至今还有一部分没有完成。再则全国（除少数灾区外）几乎普遍地发生瞒产私分，大闹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其规模之大，较之1953年和1955年那两次粮食风潮都有过之无不及。**

同志们，请你们想一想，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认为，我们应当透过这种现象，看出问题的本质，即主要矛盾在什么地方。这里面有几方面原因。但是我以为主要的应当从我们对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认识和我们所采取的政策方面去寻找答案。”

毛泽东在批评一些领导干部时说：

“**他们误认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人力、产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领导机关直接支配。他们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他们在许多地方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因此，他们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代价的上调，银行方面也把许多农村中的贷款一律收回。**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这就是我们目前同农民关系中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公社在1958年秋季成立之后，刮起了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3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即是说，在某种范围内，实际上造成了一部分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情况。”

2月28日晚，毛泽东召集另一批省市委第一书记开会，他们是上海的柯庆施、广东的陶铸、湖北的王任重、湖南的周小舟、安徽的曾希圣、江苏的江渭清、四川的李井泉、甘肃的张仲良等。毛泽东在讲话中除了昨天的内容外，有些话讲得更尖锐了，他说：

“**据我看瞒产私分不是错误，我的意见是应该打埋伏。这几个月一股‘共产’风潮，引起他们瞒产私分。**中央、省、地、县、公社为一方，几亿农民跟他们的领袖队长、小队长为一方，两方面顶牛，普遍全国，绝无例外。我们要想一想这个问题。去年9月起，10月、11月、12月，我们的手伸得太长了，我们有个很大的冒进主义。去年12月我们不感觉到这个问题，谁料到大丰收还闹粮食风潮呢？”“总而言之，我现在是支持保守主义，我站在‘右派’这一方面，我反对平均主义同‘左’倾冒险主义。”

“我没有出北京以前，也赞成反本位主义，但我走了3个省就基本上不赞成反本位主义了。不是本位主义，而是他维护正当权利。**产品是他生产的，是他所有，他是以瞒产私分的方式来抵抗你。幸得有此一举，如果不瞒产私分，那多危险，那不就拿走了？**我基本的意思，就是想把我们拼命反对的这个本位主义帽子揭掉。我们现在是反对拿多了一点，凡是手伸长了，你得收回来，这种性质是一种冒险主义。”

这一天的与会者不少人没有思想准备，他们对毛泽东这些话想不通，一时转不过弯来。王任重在他的日记中是这样记载的：“主席的谈话像丢了一个炸弹，使人一惊，思想一时转不过弯来。”“这次主席谈话，我们几个人跟他唱反调，再一次证明我们自己的思想水平低，相差太远。”

1959年3月1日上午8时，毛泽东给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听了昨天10位同志的意见，我感觉有一些同志对我讲的那一套道理，似乎颇有些不通，觉得有些不对头，对他们那里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感觉我的道理有些不妥。当然还待商量。我可以这样说，同志们的思想有些是正确的，但是我觉得我的观察和根本思想是不错的，但是还不完善。有些观点需要同志们给我以帮助，加以补充、修正及发展。”

毛泽东在信中建议会议再延长两天。

3月1日上午，由邓小平主持与会者讨论，大家还有相当大的抵触情绪，怕变来变去影响生产。

下午4时，毛泽东召集前两次会议的与会者共同开会，他在讲话中说：

“**六中全会到现在，两个半月，根本没有实行。人民公社没有阻止一平、二调、三收款这股风。**开头我放炮，一定要那样做，要紧张一天半，不然扳不过来。原先心里想共产多了，想个人少了，就是这个弯子。”

李先念插话说：

“27号以前是反对本位主义。”

毛泽东说：

“要去掉本位主义的帽子，要恢复农民的名誉。现在我们是取消本位主义的帽子，反对平均主义思想、过分集中思想。这两个东西是很冒险的，它的性质是冒险主义。”“瞒产私分不是本位主义，瞒产私分极其正确，那股风一来，他幸得瞒产。”

王任重插话说：

“省委的责任就是政策不明确。”

毛泽东说：

“我的思想就不明确。主要责任中央担，没有说清楚这个事，以为一篇决议就可以解决了。”

这次会议一直进行到晚上9点多。

3月2日凌晨4时半，毛泽东写信给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他写道：

“鉴于河南6级干部会的开法有极大利益，不集中开一次，领导不会很强，全省、区不能迅速做出一个统一的决定，而这种统一的决定是十分必要的。已是3月了，春耕在即，这个大问题不在3月上半月解决，将遇到大损失，我担心苏联合作化时期大破坏现象可能在我国到来。我国过去几年合作化讲步骤，无破坏。这次公社化，仍然必需讲步骤，避免破坏。”

上午八时，毛泽东又给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我已请恩来、陈云、陈毅、德怀、富春、一波、萧华、定一、康生9同志于今日到此，到即参加你们今日下午和晚上的会议，共同审定我的讲话稿和你们议定的12句话，以昭慎重。”

信中所说的12句话，是与会者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议定的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

3月2日晚，周恩来等新到的9人都参加了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他首先讲了一个在大革命时期的故事，他说：

“我在湖北省农民协会和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同雅声同志多次接触，我们谈中国革命，谈农民运动，都很合拍。谈旧体诗词，也很投机。他和我一样喜欢唐代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他还喜欢杜牧、王维。我们交换过各自写的诗，他的名句我至今还记得：‘范叔一寒何至此？梁鸿余热不因人。’这两句用典，很融洽，很活。我看比李商隐的好。用这种诗的语言，表现诗人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中硬骨头精神，我很欣赏他的这类诗句，他长于七言，律绝俱佳。”

他接着讲了“梁鸿余热不因人”的典故。他说：

“东汉有个梁鸿，少孤家贫，经常独坐，不与人同食。‘举案齐眉’就是讲他的故事。他有个老婆叫孟光，他们穷得要死，给人舂米度日。有一个人对他说：‘我这里有火，你用它来烧饭吧。’他说：我‘小子鸿，不因人热者也’。你有热，我不沾光。这个人后来到了无锡，成了经学家。这个人是硬汉。”

毛泽东由“梁鸿余热不因人”这一典故引申到“共产风”问题上，他说：

“头一天我把炮一放，他们一晚不睡觉，心里硬是扭不转，第二天就开始转过来了。河南这些干部也是这样，头一天放炮，大吃一惊，弯子转得太陡了。‘倒退’、‘右倾’、‘不要共产主义’、‘富农路线’这些帽子都给我安上了。”

刘少奇插话说：

“他们今天的心情转变过来了，昨天还有抵触情绪。”

毛泽东又说：

“目前，公社所有制除了有公社直接所有的部分以外，还存在着生产大队所有制和生产队所有制。而生产队所有制，在几年内，还是整个所有制的基础。”

“六中全会的决议，写明了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经过的发展阶段。但是，没有写明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也需要有一个发展过程，这是一个缺点。因为，那时我们还不认识这个问题。这样，**下面的同志，也就把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制之间的区别模糊了，实际上否认了。目前还存在着一个在公社中具有极大重要性的生产队（或者生产大队，大体上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的所有制问题。而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引起广大农民的不满和反对。”**

毛泽东用一个三国故事说明了工作方法问题，他说：郭嘉是曹操的一名谋士，给曹操出了一个计策：先打吕布，后打袁绍。郭嘉说，袁绍这个人多端寡要，多谋寡断，见事迟，得计迟。讲到这里，他解释道：

“所谓见事迟，得计迟，就是形势已经出来了，他还不能判断，得出一个方针来，就处于被动。”

他继续讲道：曹操听了郭嘉的话，结果先打败了吕布，又打败了袁绍。

故事讲完了，毛泽东总结说：

**“我借这个故事来讲，人民公社党委书记及县委书记、地委书记，要告诉他们，不要多端寡要，多谋寡断。谋是要多，但是不要寡断，要能够当机立断；端可以多，但是要抓住要点，一个时候有一个时候的要点。**这是个方法问题。这个方法不解决，每天在混混沌沌之中，什么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什么当驴狗子，什么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特别是对外斗争，得计迟是很危险的。”

王任重在他的日记中记载道：“2号晚上主席又找大家去，当面宣布几项结论，征求大家意见。大家都同意了，是真同意了。他为了察言观色，让我们坐在他的对面。在这两天主席写了3封信，申诉了他的主张，要各省开6级干部大会，看来主席抓得很紧。”

毛泽东为了纠正“共产风”，他指定几个人起草一个通俗、简明的条文。在起草条文的过程中，负责人向毛泽东汇报说，条文中应该写上：“公社要实行三级管理、三级核算、各计盈亏。”

毛泽东说：

“你没有讲等价交换、价值法则嘛。”

毛泽东还说：

**“在社与社、队与队、社与国家之间，在经济上只能是买卖关系，必须遵守等价交换原则。”**

3月3日，毛泽东会见了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共产党的领导人，他在谈话中说：

“中国刚刚开辟了建设的道路。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如拉丁美洲一些国家那样高。我们人口那么多，只有那么一点钢铁。我们在工业化中刚走了第一步。我国人民还很穷，需要继续努力，要有许多年时间才能发展起来。我们每年都有一些进步。你们要监督我们，看到我们不好的地方要说，看到我们进步得慢也要说。你们要监督我们向前进步。中国人民同社会主义阵营其它国家的人民一样，也是世界劳动人民的一部分。中国的事业是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的一部分。我们要团结成一体，全世界人民要大团结。你们的事业也是我们共同事业的一部分，你们每有一个胜利，我们就高兴。我们很高兴看到拉丁美洲的斗争在不断发展。

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大部分。这3个洲的国家是西方世界的后方。这个后方现在已经不稳定了，它的空气比较稀薄，比较容易冲破帝国主义的统治。当然，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现在还在统治这些地方，好像过去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统治中国一样。为什么说它的空气比较稀薄呢？因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经济落后，资本主义不发达，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占主要地位。过去俄国就是这样，它的空气也比较稀薄。在这些地区，无产阶级有广大的同盟军，社会民主党的影响不如在西方国家那么厉害，工人阶级受资产阶级的影响不那么深。因此，这些地区的革命斗争特别旺盛。现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蓬勃的开展起反帝斗争了。非洲人口有两亿多，他们处在反帝斗争的前线。拉丁美洲也是处在反帝斗争的前线。

帝国主义已经为这3个洲的国家造就了强大的无产阶级，帝国主义也在这些国家造就了知识分子队伍。**帝国主义为了它自己的目的，造就了工人阶级，造就了知识分子，结果将是由它造就出来的人把它自己推翻。这是社会发展的规律，旧社会总是会创造新社会的因素的。”**

3月4日，毛泽东在会见美国共产党中央书记杰克逊时说：

“美帝国主义看来好像很强，实际上也是帝国主义中最强的，但也很弱。它的兵力分散得很薄，它在欧洲要驻兵，在亚洲也要驻兵，如此分散，到处都有，结果是到处不顶事。无论从军事、政治、经济方面来看，美国都是扩张得非常大的。它越扩张得大，力量就越分散，反对的人也越多，这样，事情就会向它的意愿的反面发展了。美国就好像一个用双手抱着一堆鸡蛋的人一样，鸡蛋堆的满满的，可是一动都动不得，稍一动鸡蛋就掉下来了。”

3月5日凌晨，毛泽东起草了一个《郑州会议纪要》草稿，全文如下：

1959年2月27日，在郑州举行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进行了7天，3月5日结束。到会者，中央20人，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27人，共47人。会议的主题是人民公社问题。首先由毛泽东同志讲了他的意见，然后进行了几次讨论。结果如下：

1、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意见。

2、规定了如下14句话作为当前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这14句话是：

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

3、起草一个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

欲知毛泽东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还有什么重要讲话，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毛泽东主持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重点是解决共产风问题。其原因是他在南下视察中发现，“**六中全会到现在，两个半月，根本没有实行。人民公社没有阻止一平、二调、三收款这股风。**”可没想到他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讲话以后，与会者的反应竟是“主席的谈话像丢了一个炸弹，使人一惊，思想一时转不过弯来”，以至于“几个人跟他唱反调”。正如毛泽东在给刘少奇、邓小平的信中所说：“听了昨天10位同志的意见，我感觉有一些同志对我讲的那一套道理，似乎颇有些不通，觉得有些不对头”，“感觉我的道理有些不妥。”因此，他不得不再次扩大参加会议的人数，再做进一步的努力！由此可见，党内“左”倾冒险主义者对于纠正共产风错误的阻力，是多么的巨大！

**第66章**

**“共产主义没有饭吃，天天搞共产，实际上是‘抢产’，向富**

**队共产。旧社会谓之贼，红帮谓之抢，青帮叫偷。对下面不**

**要去讲抢，抢和偷的科学名词，叫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

话说1959年3月5日下午，毛泽东主持郑州会议最后一次会议，出席会议的又增加了一些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他们有：北京的刘仁、内蒙古的乌兰夫、黑龙江的欧阳钦、吉林的吴德、辽宁的黄火青、福建的叶飞、浙江的江华、江西的邵式平、广西的刘建勋、云南的谢富治、新疆的王恩茂等。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了长篇讲话，全文如下：

放一大炮是否灵，放对了没有？

要拿王国藩穷棒子社对穷户、穷队、穷社，解决穷社、穷队、穷户问题。一是贷款，二是公共积累。国家每年拿出10亿解决这一问题，社工业少办，主要是解决这问题。**共产主义没有饭吃，天天搞共产，实际是“抢产”，向富队共产。旧社会谓之贼，红帮为抢，青帮叫偷，对下面不要去讲抢，抢和偷的科学名词叫作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地主叫超经济剥削，资本家叫剩余劳动，也就是剩余价值。**我们不是要推翻地主、资本家吗？富队里有富人，吃饭不要钱就侵占了一部分，这个问题要想办法解决。**一平、二调、三收款，就是根本否定价值法则和等价交换，是不能持久的。**过去汉族同少数民族是不等价交换，剥削他们。那时不等价还出了一点价，现在一点价也不给，有一点就拿走，这是个大事，民心不安，军心也就不安。**甚至征购粮款也被公社拿走，国家出了钱，公社拦腰就抢**。这些人为什么这样不聪明呢？他们的政治水平哪里去了？问题是省、地、县委没有教育他们。整社3个月没有整到痛处，隔靴抓痒。在武昌会议时，不感到这个问题，回到北京感到了，睡不着觉。9月就充分暴露了，大丰收，国家征购粮完不成，城市油吃不到了。**赵紫阳的报告**（2月19日关于雷南县干部大会解决粮食问题给省委的信，见上一章毛泽东2月22日为中央写的批语——笔者注）**和内部参考中的材料**（笔者注：杜导正在《坎坷的记者之路》中说：1959年初，广州市100多万人口，国家粮库里只有供应7天的粮食了。广东省处处粮食告急。广东省委和我还怀疑是不是农民把粮食藏起来不卖给国家，省委便在东莞县搞反瞒产运动试点,在东莞召开反瞒产现场会，我去看“搜粮”。其实是事先专藏下的。我又发了几篇长篇文章，说广东城乡缺粮是假相，1958年粮食大丰收，是农民将粮食藏起来了。所以陶铸、赵紫阳同志领导的反瞒产运动是正确的。）**你们看到没有？**我就不相信长江、珠江流域马克思主义就那样多？**我抓住赵紫阳把陶铸的辫子抓到了**（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在1958年《红旗》杂志第8期发表了他写于7月15日的文章《驳“粮食增产有限论”》——笔者注）。

**我们要看到农民确有共产主义精神，但不要只看到这一面，还要看到人民公社的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他们生产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都还是集体所有。**修武县委书记的考虑是正确的，**他不敢宣布人民公社为全民所有制，他担心宣布全民所有制实行供给制以后，灾荒发生时，国家是否发工资；丰收时，国家把粮食调走，也发不起工资。灾荒、丰收都有苦闷。他是代表农民考虑这个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考虑这个问题。**是轻率地对待这个问题好呢？还是谨慎地对待这个问题好呢？**我认为还是应该像修武县委书记那样，谨慎地对待这个问题好，不要像徐水县委书记那样急急忙忙往前闯**。**我劝吴芝圃同志不要同陈伯达搞在一起，他的“马克思主义太多了”。**

听说徐水已经把人民公社宣布为全民所有制。他们那里的人力、物力、财力，都还不能像鞍钢那样由国家来调拨。尽管他们宣布了全民所有制，实际上最多也只是大集体所有制，同全民所有制还是根本不同的。**我们决不能把集体所有制同全民所有制混同起来，把人民公社同国营工厂混同起来。**如果混同起来，就没有一个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任务了，就没有奋斗目标了。**现在有不少干部，对这个界限分不清楚，认识模糊。如果有人说徐水还不是全民所有制，就被批评是“右倾”。**

瞒产私分很久了，开始在襄阳发现。刘子厚谈话对我有很大启发，河北1月开党代会，开始搞共产主义，倾向于一曰大、二曰公，2月13日就感到有问题，决心改变主意，但还没有接触到所有制问题。到山东谈了吕鸿宾合作社，开条子调东西调不动，就让许多人拿秤去秤粮食，群众普遍抵制，于是翻箱倒柜；进而进行神经战，一顶帽子“本位主义”一框，你框农民就看出你没有办法了，他也不在乎，这一着神经战也不灵。一张条子，一杆秤，一顶帽子，三不灵后才受到了教育，才用一把钥匙解决思想问题，但也没有接触到所有制。河南说“虽有本位主义，情有可原，不予处分，不再上调”。安徽说“错是错了，但不算错”。什么叫情，情者情况也，等价交换也。**不是人家本位主义，而是我们上级犯了冒险主义。翻箱倒柜，“一平、二调、三收款”，一张条子，一杆秤，一顶帽子，这是什么主义？**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四方”，那里有钱就往那里跑。你不等价交换，人家人财两空。吕鸿宾改变主意，一张安民布告，一个楼梯下楼。要下楼，首先要下楼的是我们，就是解决所有制问题。

**土地属谁所有，劳动力属谁所有，产品就属谁所有。**农民历来知道土地是搬不走的，不怕，但劳动力、产品是可以搬得走的，这就怕了。**拿共产主义的招牌，实际实行抢产，如不愿不等价交换，就叫没有共产主义风格。**什么叫共产主义，还不是公开抢？没有钱嘛！不是抢是什么？什么叫一曰大、二曰公？一曰大是指地多，二曰公是指自留地归公。现在什么公？猪、鸭、鸡、萝卜、白菜都归公了，这样调人都跑了。河北定县一个公社有七、八万人，二、三万个劳动力，跑掉一万多。这样的共产主义政策，人都走光了。劳动力走掉根本原因是什么，要研究。吕鸿宾的办法，还是一个改良主义的办法，现在要解决根本问题——所有制问题。

整了3个月社，只做了一些改良主义工作，修修补补，办好公共食堂，睡好觉，一个楼梯，一张布告之类，但未搞出根本性办法。**要承认3级所有制，重点是生产队所有制，**“有人斯有土，有土斯有财”。所有人、土、财都在生产队，5亿农民都在生产队，上面只有几个工作人员。如不承认所有制，就立即破坏。我是事后诸葛亮，以前还未看到这个问题，在批转赵紫阳的报告，就有此思想。六中全会有好处，农民不怕中央了，认为中央好讲价钱，中央雇工是拿钱的，购粮油是拿钱的，征购不多，注意生活福利，八小时工作等。仇恨集中在公社，第二在县，县也调了些人，调了些东西，县、社办那么多事干啥？所以，要对公社同志讲清楚，公社不要搞太多，十大任务做不完。你们有经验，**你们过去不是骂中央统死统多吗？现在你们当了婆婆就打媳妇，就忘记了**。现在中央已经改了。去年权力下放，说了不算，拿出一张表来你们才放心。现在你们领导之下的公社，就实行“一平、二调，三收款”，调，一曰物、二曰人。当然出卖劳动力，不是出卖给资本家，而是出卖给中央、省、县、公社，但也要等价交换。过去长沙建筑工人罢工，我们叫增加工资，他们叫涨价，那是1921年的事，到现在38年了，我们还不懂涨价这个道理吗？劳动力到处流动，磨洋工，对这点我甚为欣赏，王任重很紧张无心跳舞，一夜才转过来，放一炮。瞒产私分，劳动力外逃，磨洋工，这是在座诸公政策错误的结果。**上千万队长级的干部很坚决，几万万社员拥护他们的领袖，所以立即下决心瞒产私分。**我们许多政策引起他们下决心这样做，这是合法的。我们领导是没有群众支持的。当然也包括桌椅板凳，刀锅碗筷，去年工业抗旱，大闹钢铁，献工献料，什么代价也没有。此外，还要拿人工，专业队都要青年，还有文工团都是青年，队长实在痛心，生产队稀稀拉拉。这样下去一定垮台，垮了也好，垮了再建。无非是天下大笑。**我代表一千万队长级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搞右倾机会主义，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来贯彻，我一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也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严格按照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办事。……要穷队赶上来，穷队变富队。穷变富每个省都可以找到例子，像王国藩那样，最大的希望是穷队。不能把苏联的钢砍给我们二千万吨，如果这样，苏联也要造反。世界上的事没有不交换的，人同自然界作斗争，也有交换，如人吃东西，吸空气，但要拉屎拉尿，新陈代谢。吃空气，1分钟18次，有吸必有呼，你交还自然多少二氧化碳、皮肤散热，这也是等价交换。大鱼吃小鱼，小鱼吃大鱼的屎。重工业各部门之间也要等价交换。赵尔陆造机器要原材料，就是粮食，机器就是他拉的屎。纺织工业出纱要棉。基建也是如此，吃投资就能出工厂，总要相等就是。王鹤寿不给他交换焦炭、矿石，就拉不出钢铁。物质不灭，能量转化。要科学。夏热冬寒，一切都等价交换。国家给钱，就是公社不给钱，犯了个大错误。谢富治同志讲，云南提出供给与工资比例是三比七。这个原则在武昌会议是讲了的。**六中全会的东西现在有许多没有执行，就是否定价值法则，所谓拥护中央是句空话，起码暂时还难说，其实是不通。**无代价的上调是违反中央的，要搞工业，不搞农业，未到期的贷款都收回了，是不是中央不两条腿走路？相反，今年要增加10亿，一部分是可以收的，贫农贷款是4年，60年才到期，现在就收回了。我看这可以给人民银行行长戴一顶帽子，叫作破坏农业生产，破坏人民公社，也不撤职。全部退回，到期不到期的都退，你们可以打个折扣，到期的可以不退。我为了对付你的全部收回，我就来个全部退回，你要左倾，我要右倾，就是到期还可以延长。

人民公社正在发展，需要支持，不能拦路抢。李逵的办法，文明的说法叫作“剪径”。绿林豪杰叫“剪径”，现在绿林豪杰可多了，你们是否在内。对付剥削者无罪，绿林的理由叫“不义之财，取之无碍”，如生辰纲。我们也干过，叫打土豪。后来者文明一点收税。成吉思汗，占了中国，不会收税，叫“打草谷”，无代价抢劫人民，结果打走了他们自己。辽金也如此。蒙古是世界第一个大帝国，除了日本、印尼外，占了整个亚洲和大半个欧洲。第二是英国，日不落国。第三是希特勒，占了整个欧洲，半个苏联，还有北非。现在是艾森豪威尔最大，实际控制整个西欧，整个美欧、澳洲、新西兰、东南亚、印度，对印尼也在天天增加投资，科伦坡国家也在旧金山开会，可厉害了。美国控制的地区超过成吉思汗。伊拉克7月14日革命成功，美国15日占领黎巴嫩。我们8月23日打炮，他立即调部队集中太平洋，杜勒斯说是最大一次集中。他的战争边缘政策主要是对付我们。我们也可以学一点，你边缘我也边缘。打了3个月，他失败了。我宣布领海12海里，他只承认3海里，我警告30多次，他国内外都不满意，我说一千次也不打，记一笔账，这是对付流氓的办法。后来挂了30几笔账，他就不来了，手忙脚乱，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干。我们是10个指头按1个跳蚤，美国是10个指头按100个跳蚤，因此都按不住。中国、伊拉克都按不住。中国是一个“大跳蚤”。

打土豪大概从打草谷学来的。蒙古统治时，有人建议打草谷不如收税，收税才能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不知比打草谷强多少倍。现在公社党委实际上是恢复蒙古打草谷的办法，落后的抢劫办法。过去打土豪是正确的，“不义之财，取之无碍”，和宋江一样。现在对农民能这样吗？唯一的办法只能等价交换，3级之间要有买卖关系，劳动必须出工资，义务劳动切不可太多。

王安石创始免役法，把服劳役改为征税，由政府雇人，出工资，做各种服役的事业，这是很进步的办法。我们退到王安石以前，退到司马光的办法了。司马光是代表大地主，反对王安石的办法的。公社可办对社有利的工业，但雇人要出工资。一种是固定工人；另一种非固定工人，这部分人不能太多，技术工人要有较高工资。**亦工亦农的，待遇应与农民不同。**工业、教育、体育只能一年一年地发展，量变有一个过程。**写诗不能每人都写，要有诗意才能写诗，如何写呢？叫每人写一篇诗，这违反辩证法。**专业体育、放体育卫星、诗歌卫星，通通取消，遍地放就没有卫星了，苏联才有3个卫星呢。

你们认为怎样才能巩固人民公社？一平、二调、三收款，还是改变？我看这样下去公社非垮台不可。……斯大林30年之久实际没有实行集体所有制，还是地主超经济剥削，拿走农民的70％，因此，30年还是只能进行单纯的再生产。俄皇时代，无机械化和集体所有制。斯大林搞了这两点，粮食产量和沙皇时代相等。那时可能是为了搞重工业，留的只够农民吃，无力扩大再生产。当然不是斯大林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有一批热心于搞重工业、搞共产主义。我们是办公社工业，如果这样搞下去，非搞翻农民不可。任何大跃进、中跃进、小跃进也不可能，生产就会停滞。

搞3、5、7年，来个过程，基本上以原来的高级社为基础，等价交换，不能乱开条子。**队与队是买卖关系，若干调剂要协商。灾队、穷队没有饭吃由省解决。**

一个是瞒产私分，一个是劳动力外逃，一个是磨磨洋工，一个是粮食伸手向上要，白天吃萝卜，晚上吃好的，我很赞成，这样做非常正确。你不等价交换，我就坚决抵制。河南分配给农民30％，瞒产私分15％，共45％，否则就过不了生活，这是保卫他们的神圣权利，极为正确。还反对人家本位主义，相反应该批评我们的冒险主义。真正本位主义，只有一部分，主要是冒险主义。钱交给公社不交队，他们抵制，这不叫本位主义。给他钱，他不缴，才是本位主义。

**安排时应把人民的生活安排在前面，要占百之几十。**人民生活，公社积累（15—18％）国家税收（7％—10％），应同时安排。义务劳动要减少，公共积累要减少。多给一些社员看到的东西，减少供给部分，增加工资部分。粮食供给要坚持下来，“无竹令人俗，无肉令人瘦，若要不俗又不瘦，除非冬笋炒肥肉”。多种经营，副业生产都要归队办。

大问题是把6级干部会开好，公社党委来一个书记，管理区来二人，生产队来二人，都要一穷一富。河南简报要看两遍，这是现场会议。**对穷队要讲王国藩。河北省遵化县鸡鸣村区，穷棒子王国藩社现在是一个大社，很富了**。开始只有23人，3条驴腿，无车无粮，他的章程就是不要国家贷款，不要救济，砍柴卖，从此出了名，变为几十户，几百户。现在多少户了？各省都可以找出这样例子来。**自力更生为主，外援为辅，由贫到富的社，各省都有。**国家投资，第一是扶助工业，第二是扶助穷队。四六开或三七开，穷队占六到七。10亿人民币，3亿交公社，7亿交穷队。一是靠本身，二是靠公社，三是靠国家。穷人要有志气，送给我，我也不要。穷队有依赖思想。何应钦不发钱，我不搞生产如何行。

我们党过去有很多山头，逐步联合成为统一的党。军队也有几个山头，1方面军有两个山头，2方面军两个山头，陕北两个山头，4方面军4个山头。**在延安党校，夕阳西下，散步时也分山头。上馆子吃饭也分山头。山头之内无话不讲，话不好给别的山头讲。在陕北甚至躲飞机时，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也分两条路走，要命时也不混杂**。我们采取什么政策呢？要认识山头、承认山头、照顾山头、消灭山头。山头是历史原因和地区不同造成的。现在看山头消灭得差不多了。当时的共产党有个共同纲领，中央实际上是联合会。这些人都是好人，不是什么托洛斯基。教条主义者到处整人，苏区、白区都怕钦差大臣。批评人家为机会主义，夺取了党、政、军、财权，他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不准说敌强我弱，不准说泄气话，只能讲壮气的话，曾几何时（三年半）长征了。整得人人自危，怎么能有积极性呢？斯大林搞托洛斯基，反复几次，赫鲁晓夫不敢让莫洛托夫当中央委员，我们对待教条主义，采取治病救人，团结同志的方针。“七大”之前七中全会决议，会前搞清问题，大会是开团结大会，错误让他自己讲。除了王明是个未知数，其余信任他们。

现在讲的是生产队山头。每个生产队是一个山头，不认识，不承认，不照顾，就不能基本消灭山头。英国是第一个帝国主义，现在美国超过了它。世界在变化。穷队也会变化，穷的搞得好，大多数会过富的。公共积累办的事业一年一年增多，将来可变为基本的社所有制，部分队的所有制永远会有的。做为一个过程来看，过去我们没有分析，武汉时没有分析，1、2月才分析。谢谢几亿农民瞒产私分，使我来想这个问题。要使公社一般懂得这个问题，这是客观法则，违反它就会碰得头破血流。如果我们不能真正说服他们，还是这样犹犹豫豫，公社就会垮，人就会跑。供给部分要少，工资部分要多，不要一县一社（修武除外）。一社统一集中分配，任意调人调东西，很危险。要迅速讲清楚；办法是开6级干部会。有人说富队会搞资本主义，我不信，他能离开地球吗？如欲取之，必先予之。现在他就跑了，这还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没有动刀枪，会不会离心离德？照现在的情况有脱离太阳系的危险。现在我赞成跑，这样可以使我们警觉，将来就不会跑了。

已发文件作为初稿，我在河南取得经验，然后到武汉去，你们不要等，放手去作，基本观点不会变的。六中全会，缺少3级管理，队为基础，社与国家、社内队与队等价交换，这是认识问题。发现矛盾，分析矛盾，才能解决矛盾。发现是感觉，分析是理性，要有个过程，开头是接触，所谓分析就是揭露，解决是综合阶段。

一盘棋要三照顾。生产队有5亿人口，千万干部（队长、会计），得罪他们不得了。过去70万个小社，一社50个干部，则是三千万干部。瞒产私分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劲，决心那么大，因为有5亿农民支持他们，我们则脱离了群众。认识这个问题，时间有5个月之久，相当迟，客现实际反映到主观，有个过程。

文件还要修改，但基本观点就是这样，你们可以照办。里面供给和工资问题没讲，劳动力盲目流入城市也未讲。

工人寄钱问题，中心是说服公社，不能拦路劫抢。军官寄钱回去，公社扣了，军官有很大反映。**财产权利必须神圣不可侵犯，这样反而建设得快。**要说服公社，懂得发展过程，懂得等价交换。邵大哥3支钢笔，将来不只3支，共产主义可能有10支。

**城市办公社，我就想不通。**天津人说，要办就办一个，人民代表大会就是人民公社嘛。**企业、学校都是全民所有制，至于要办食堂随你办，至于家属就业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已经是国有制还办人民公社干什么？**小城市和县城还可以办。

有些东西，不要什么民族风格，如火车、飞机、大炮，政治、艺术可以有民族风格。干部下放，军官当兵，5项并举，蚂蚁啃骨头，是中国香肠，不输出，自己吃，这是马列主义，没有修正主义。**公社倒是有修正主义，拦路劫抢、不等价交换。一平二调三提，不是马列主义，违反客观规律，是向“左”的修正主义。**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想快反慢。**武昌会议时，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已弄清，但根本未执行，等于放屁。**

第2次郑州会议结束后，各省、市、自治区都准备召开5级或6级干部会议，传达和贯彻会议的精神及其所规定的方针、政策。

毛泽东还是不放心，为了直接掌握和指导这一工作的进行，便以党内通信的方式，随时提出指导性的意见，解决各地提出的重要问题。

3月9日清晨，毛泽东写出了第1个党内通讯，他写道：

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们：

中央决定在3月25日在上海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你们都要到会。**各省市区党委根据此次郑州会议决定精神，以讨论人民公社为主题而召开的下级干部大会，约需要开10天左右，因此应当立即召开。例如湖北省委定于3月11日开会是适当的。开迟了，不利。**时间太短，问题的分析，揭露和讨论，势必不充分，解决得不会很适当，很彻底，就是说，不深不透。各省、市、区大会应当通过一个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和若干具体政策问题的决议，第一书记要做一个总结性的讲话，以便又深又透的解释人民公社当前遇到的主要矛盾和诸项政策问题。将这两个文件立即发下去，使下面获得明确的根据。而这两个文件的思想形成和文字起草，需要时间。**假如3月11日大会开幕，可能要开到3月20日或者22日才能结束，各第一书记才有可能抽出空来，于3月25日到上海开会，这样就从容些，不至于太迫促。**河南的6级干部大会，3月10日可以结束。他们的一个决议，一个总结性讲话，3月9日可以最后定稿。这两个文件，中央将在3月14日以前用飞机送到你们手里以供参考。河南的下一步，是开县的4级干部大会，传达和讨论省的6级干部会议的出席人是：（一）县级若干人；（二）公社级若干人；（三）生产大队每队1人至2人；（四）生产队每队1人。外加着若干观潮派，算账派。共计少者千余人，多者二千人。会期7天至10天。河南各县定于3月13日或14日同时开会，3月20日或24日以前结束，3月份还剩下一星期，各级公社、大队、生产队去开会。总之，**3月份可以基本上澄清和解决人民公社问题中一大堆糊涂思想和矛盾抵触问题。4月起，全党全民就可以一个方向地展开今年的大跃进了。**我希望各省、市、区也这样办。各省、市、区的6级干部大会，如果能像湖北那样在3月11日召开，3月20日或22日以前可以结束，3月底可以结束县的4级干部会议，4月10日以前可以结束社和队的讨论，比河南的也只迟10天左右。有些同志或者认为仓促，无准备，大会召开的时间应当推迟。我认为不宜如此。我们已经有了明确的方针，把6级干部迅速找来，把方针即刻放下去，3、4天内就会将大小矛盾轰开，就会获得多数人的拥护。我们取得主动，观潮派、算账派无话可讲。当然会有一部分人想不通，骂我们开倒车。这些人会有几天睡不好觉，吃不好饭，但也不过几天而已。三几天后，就会想通的。总之，慢了不好，要快。可以做些准备工作，首先稍稍打通地县两级思想，不必全通，有3天时间也就可以了。拖长反而不好。

**以上是我的建议。是否可行，还是由你们根据你们自己的情况去决定**。

毛泽东 1959年3月9日上午4时于郑州

3月9日下午，毛泽东在湖南省委关于执行郑州会议指示的报告上写了一个批语：

湖南省委3月8日的报告，9日上午12时收到。**6级干部大会宜早不宜迟。先布置生产，很对。县、社、大队和队，都有一两个强的领导者留在当地指挥生产，农时决不能误。**但全省大会宜早开，分两批到省，第1批4级，第2批两级，一开始就是大会，河南就是这样开的。大会有公社3级干部，把方针一放，立即轰开，情况暴露，就是最好的调查。不必事先做调查，以省时间。**很多同志作了几个月的调查，开过不少的大会小会，结果对于存在的事物，却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原因是方法不对，找不到主要矛盾在什么地方。大家都读过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办起事来却在长时间内不认识公社的集体所有制要有一个由小到大、由量到质的变化过程，几乎普遍否认价值、价格和等价交换的经济法则。这不是很奇怪吗？但却是事实**。现在已有了郑州会议的方针，只须将6级几千人召集在一起，把方针一放，几天工夫，情况就会明白了，思想就会弄通了。会议早开早结，于农时也有利。

毛泽东 1959年3月9日下午1时于郑州

3月10日，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了以拉萨为中心的大规模的武装叛乱，叛乱分子宣称：“同中央决裂，为争取西藏独立而干到底。”

3月11日，谭冠三政委鉴于中央驻藏代表、工委书记张经武与军区司令员、工委第一副书记张国华均在北京，便写信给达赖喇嘛，他写道：

达赖喇嘛：

现在反动分子竟敢肆无忌惮，公开地狂妄地进行军事挑衅，在国防公路沿线（罗布林卡北面的公路）修了工事，布置了大量机枪和武装反动分子，已经十分严重地破坏了国防交通安全。过去我们曾多次向噶厦谈过，人民解放军负有保卫国防、保卫国防交通安全的责任，对于这种严重的军事挑衅行为，实难置之不理。因此，西藏军区已去信通知索康、柳霞、夏苏、帕拉等，请他们通知反动分子，立即拆除一切工事，并撤离公路。否则由此引起恶果，完全由他们自己负责。特此报告，您有何意见，亦请尽快告知。

此致敬礼并祝保重

谭冠三 1959年3月11日

3月11日这一天，毛泽东到了武昌，下榻于东湖宾馆。就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公开叛乱问题，他致电中央说：

“**照此形势发展下去，西藏问题有被迫早日解决的可能。目前策略，应是军事上采守势，政治上采攻势。**目的是分化上层，争取尽可能多的人站在我们一边，包括一部分活佛、喇嘛在内，使他们两派决裂；教育下层，准备群众条件。”“**如果达赖及其一群逃走，我军一概不要阻拦，无论去山南，去印度，让他们去。”**

毛泽东提出两种处置办法：

“1、宣布为叛国者，以后只有在他悔过认罪之后，才可以回来。2、宣布为被人挟持者，仍然希望他设法脱离叛众，早日回来，罗布林卡位置及人大位置，仍给他留着。”

据此，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在给西藏军区的指示电中也说：

“在敌人向我进攻之前，应严守自卫立场，不先打第一枪，以争取政治主动。”

3月13日，毛泽东在武昌东胡宾馆会见了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和她的黑人朋友杜波依斯夫妇。关于这次会见的情形，斯特朗是这样描述的：

“1958年10月，我曾向毛泽东请求过与他们进行一次会见，但没有得到回音。1959年3月，突然来了一个电话，问我是否能与杜波依斯夫妇去南方，与毛进行一次会见。我们离开北京前往毛泽东所在的武汉市。

到达武汉的第3天，正好是3月13日，星期五。这天早晨，我们在早饭时被告知：‘主席将在10点钟接见你们。’饭后，一辆小车把我们载到了东湖毛泽东的住地。毛泽东身穿一套缝制得很好的灰色毛料衣服，走下别墅的台阶欢迎我们。

毛泽东精力充沛，他看上去不但非常健康，而且还无忧无虑，几乎处于一个开玩笑时的情绪状态。他对杜波依斯的肤色表示惊奇，并用自己的手去比较杜的肤色，说：‘谁能告诉我，我们俩谁更黑一些？’杜回答毛泽东：‘你不比我黑。’确实，毛泽东的手由于太阳照晒，与杜波依斯的由于年龄而变得苍白的手一样黑。他在与我握手时，用英语说了句：‘你好’，而我在同时却用汉语说了‘你好’，他大笑了起来。

当我们走上台阶进入别墅时，毛泽东提醒我，自从我们在延安的最后一次谈话以后，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未曾见面了，前后大体有22年。毛泽东告诉我说，10月份，他收到了我的来信，本打算回复，但却没有时间。这是他答应给予美国人的第一次会见。

我们走进了一个不大而明亮、三面有窗、可以看湖的房间。毛泽东在一个狭长、盖着紫色毛毯的桌旁坐下，杜波依斯坐在了毛泽东的对面，我则坐在杜的身边。毛泽东坐直了身子对我说：你是老朋友了，你在中国已经很长时间，现在已成了中国人。毛泽东接着说，杜是新朋友，是客人，按照中国的习俗，客人应受到更加热情的接待。为此毛泽东十分礼貌地告诉我，杜波依斯享有谈话和提问的优先权利。

谈话是在半严肃半开玩笑的气氛中进行的。毛泽东问起了我的年龄，得知我73岁，而他自己是66岁，杜波依斯是91岁。‘3代人’，毛泽东评论道。我接着说，只不过是两代或两代半。毛泽东抛开了他的评论，说杜波依斯大概足可以做他的父亲。

毛泽东接着说道，‘虽然我感到上了年纪，但我仍然很有精力和体力。由于精力体力充沛，我每年仍然可以畅游长江。我自小就喜欢游泳，我已游过了许多江河，还希望游得更多。如果你们不反对，我愿意去游密西西比河。但是我想另外3个人可能会反对：杜勒斯先生、尼克松先生和艾森豪威尔总统。’毛泽东说着向杜波依斯投去了询问的一瞥。

‘相反，’杜波依斯回答说，表情有点严肃，‘他们可能愿意看见你在密西西比河游泳，特别是靠近它的河口。’

毛泽东对杜波依斯的回答持半信半疑的态度，他高兴地说：‘如果真的那样，我可以在几天以后就去，完全像一个游泳者。我不谈任何政治，只是在密西西比河游泳。然后，如果艾森豪威尔总统允许，我将看他打高尔夫球。也许去医院拜访杜勒斯先生。’

杜波依斯一本正经地回答说：‘那一定会给杜勒斯一个打击。’毛泽东马上纠正说：‘这不是我的本来愿望。我希望杜勒斯先生健康，作为国务卿，他对我们很有用处，对美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同样有用处。确实如此。杜勒斯之所以有用，是因为他坚持自己的原则。他反对共产主义，反对苏联，反对中国。为了这一目的，他压迫人民，在全世界各地派驻军队，建立军事基地。所有这一切，对整个世界都是有用的，你们不这样以为吗？’毛泽东盯住杜波依斯问道。

杜波依斯回答说，这取决于多少人的觉悟，能够理解杜勒斯的所作所为。他认为，觉悟的人民对杜勒斯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麻烦。我不希望这种形势继续太长的时间。

毛泽东不同意杜波依斯的看法，说这一阶段不是太长，而是太短。他希望杜勒斯再将他的政策继续10年，美国军队现在占据着中国的台湾，但他们终将不得不离开。美国第7舰队在中国沿海时间越长，就越能教育中国和世界人民。

毛泽东继续评论杜勒斯，用半严肃的嘲弄口气说，杜勒斯制造的国际紧张局势，对我们是有利的。他把局势弄得越紧张，我们就越容易动员世界人民。每一个人都被迫面对战争问题。杜勒斯本人已经开始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且怀疑他所制造的紧张局势，究竟是对他有利，还是对东方有利。

毛泽东列举了由于杜勒斯制造的紧张局势而引起的12起世界性事件。首先是委内瑞拉的反叛；其次是尼克松副总统对8个拉美国家的访问，所到之处，人民用鸡蛋和痰来欢迎他；第三是伊拉克的革命；第四是美国军队在黎巴嫩的登陆；第五是中国对金门的炮击。

毛泽东接着说道，我们与蒋介石的战争，已经持续30年了，但因为我们炮击金门，美国派出了其半数的军用飞机。不管怎样，这是我们的地方。杜勒斯坚持其‘战争边缘’的政策，他们护送蒋介石的船只，但在我们追击时，他们总是在3英里以外的地方观看。他们停止在边缘，所以，我们把杜勒斯当作老师，我们也是停在边缘。我们炮轰蒋介石的舰船，美国的舰船挂着巨大的国旗，因此我们能够容易与蒋的舰船区分开来。我们不炸美国的军舰，我们向杜勒斯学习，也把战争避免在边缘。为了把他的意思表达清楚，毛泽东用茶杯、烟灰缸和烟盒在桌上摆了一个‘沙盘’，标出了金门外面美国军舰和蒋介石军舰的位置。

毛泽东继续列举了因杜勒斯造成的紧张局势而产生的各个世界性事件。毛泽东提到了美国共和党在选举中的大败和美国的经济危机，提到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内部摩擦的增加，”他说：“北约四分五裂，主要是由于美国、英国、法国、西德之间的利害冲突，这种冲突在年底明朗化了。我们对戴高乐有两方面的感觉：第一，他还不错；第二，他有缺点。说他不错是因为他有勇气同美国闹独立性。他不完全听美国的指挥棒，他不准美国在法国建立空军基地，他的陆军也由他而不由美国指挥。法国在地中海的舰队原由美国指挥，现在他也把指挥权收回来了。这几点我们都很欣赏。另一方面他的缺点很大，他把他的军队的一半放在阿尔及利亚，进行战争，使他的手脚被捆住。”毛泽东还“提到了赫鲁晓夫将西柏林变成自由城市的建议，提到了苏联的卫星发射和第7个‘五年计划’。毛泽东特别强调了‘古巴革命’的重要意义，‘古巴，是一个很小的国家，只有600万人民，相当于美国黑人的三分之一。古巴离美国很近，恰好在它的脚边，但古巴并不畏惧原子弹和氢弹。对古巴人来说，它们并不能说明什么。’

毛泽东接着说：‘过去，我们的人民害怕美帝国主义，这是一种疾病。他们羡慕美帝国主义，也是一种疾病。当恐惧和羡慕联系起来时，就成了崇拜。在中国，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被这种崇拜所击垮，甚至于中国的工人阶级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影响。在过去的9年中，我们已经能够改变人们的这种心理。’”

这正是：大师最善抛气球，亦庄亦谐巧筹谋。老朋新友作媒介，可惜杜勒斯如牛。

毛泽东谈到此处，提议大家一起出去散散步。大家同意了，走出别墅，来到了东湖边，沿着湖边曲折的小道缓行。尔后，他们回到餐厅，毛泽东与客人共进午餐。

席间，毛泽东向斯特朗推荐了“葱爆海参”这道菜，被斯特朗谢绝了，因为她不喜欢海参，看起来就恶心，更不用说吃它了。饭后，斯特朗在谈话中问毛泽东：

“为什么西方人不管是反动的还是进步的，都害怕第3次世界大战？科学家们说，已经有了足可以毁灭全人类的原子弹，而这些原子弹有可能会被错误的或被事故引发，而中国好像一点也不受这种威胁的困扰。”

毛泽东笑着说：

“**如果西方人对世界大战的恐惧使他们力求阻止帝国主义者发动战争，那么这种恐惧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中国无人想发动战争。我不相信会有第3次世界大战，尽管战争可能会继续存在多年，而且在有些战争中可能使用核武器。我不相信会因为偶然事件而使用全部核武器，也不相信它们能毁灭全人类。即使核战争发生，全部热核武器也不能毁灭地球上的全部生命。而且，如果人类全被毁灭，进化将会再次产生出人类。**不管怎样，由于人民要求和平力量的增强，这种战争不可能发生。社会主义阵营不会发动战争。因此不应该害怕。害怕帝国主义，只会促使他们行动。必须反对他们，但要认真。”

谈话就要结束了，毛泽东说他钦佩杜波依斯年高而身轻体健。他还说：

“我已经66岁了，我可能死于疾病，也可能死于飞机失事，也可能会被蒋介石派来的特务杀死。但是光怕死是没有用的。**害怕不能避免死亡，反而会导致死亡。我不想死，我仍然认为，我是有可能活着看见帝国主义的末日的，那正是我所欲求和希望的。**但如果我一定得死，我也不害怕。”

杜波依斯担心他死后的处境。他说，因为我的朋友和敌人，都认为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在座的都知道，我实际上并不是共产党员。毛泽东笑着对他说：

“你不要担心，你现在91岁，当你见到马克思时，他会承认你是他的同志。当然喽，也可能我比你先去那里，如果那样，我将很高兴地作你的介绍人。”

毛泽东送走客人后，就西藏局势致电中央，他写道：

“拉萨上层反动集团可能认为我们软弱可欺，闹事可能扩大，我们不得不准备提前实行民主改革。我们在西藏军事上采取守势，政治上采取攻势，分化上层，教育下层，准备爆发叛乱，请中央考虑对达赖可能出走采取何种措施。中央以中央驻藏代表谭冠三将军名义，写信答复达赖在3月10日以后的3次来信，宽大为怀，希望达赖实践历次诺言，与中央同心。”

3月15日，西藏军区政委谭冠三将中央以他的名义写的“第3次”致达赖信，送给达赖喇嘛，规劝他“改变错误态度，立即负起责任，平息叛乱，严惩叛乱分子。”

3月15日下午，毛泽东致电中央，他写道：

“要准备一封信，历述几年以来中央对诸大事件宽大、忍耐的目的，无非等待叛国分子、分裂分子悔悟回头，希望达赖本着十七条及历次诺言，与中央同心，平息叛乱，杜绝分裂分子，归于民族团结，则西藏便有光明前途，否则将贻害西藏人民，终遭人民弃绝。”

这一天，毛泽东还写出了第2个党内通讯。他写道：

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们：

我到武昌已经5天，看了湖北6级干部大会的材料，同时收到一些省市区的材料，觉得有一个问题需要同你们商量一下。河南文件（指《中共河南省委关于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和若干政策的规定》和《中共河南省委六级干部会议总结提纲》——笔者注）已经送给你们，那里主张以生产大队为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和分配单位。我在郑州就收到湖北省委3月8日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问题和粮食问题规定（**指中共湖北省委《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和若干具体政策问题的决议（草案）》——笔者注），其中主张“坚决以原来的高级社即现在的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原高级社已经分为若干生产队的，应该合为一个基本核算单位，不得再分。**少数原高级社规模很小，经济条件大体相同，已经合为一个生产队的，只要是这些社的干部和社员愿意合为一个基本核算单位，可以经过公社党委审查决定，并报县委批准。”我到武昌，即找周小舟同志来此，和王任重同志一起，谈了一下。我问小舟，你们赞成河南办法，还是赞成湖北办法？他说赞成河南办法，即以生产大队（管理区）为基本核算单位。因为他们那里一个生产大队大体上只管6个生产队。而这6个生产队，大体上是由3个原来的高级社划成的，即一个社分为两个队。后来又收到广东省委3月11报告，他们主张实行“三定五放”。“三定”中的头一定是“定基本核算单位，一律以原来的高级社（广东全省原有23000个高级社，平均每社320户左右）为基础，有些即大体相当于现在的生产队（或大队），有些在公社化后分成两三个生产队的，可以立即合并，成为一个新的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原有的高级社如果过小，一个自然村有几个社的，及虽不在一个村，而经济条件悬殊不大，经群众同意，也可以合并，做为社的基本核算单位”。这样**，河南、湖南两省均主张以生产大队（管理区）为基本核算单位，湖北、广东两省均主张以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究竟哪一种主张好呢？或者二者可以并行呢？据王任重同志说，湖北大会这几天正辩论这个问题，两派意见斗争激烈。大体上，县委、公社党委、大队（管理区）多主张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即原高级社）支书绝大多数或者全体主张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我感到这个问题关系重大，关系到3000多万生产队长、小队长等基层干部和几亿农民的直接利益问题。**采取河南、湖南的办法，一定要得到基层干部的真正同意。如果他们觉得勉强，则宁可采用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不致使我们脱离群众，而在目前这个时期脱离群众，是很危险的。今年的生产将不能达到目的。河南虽然已经做了决定，但是，仍请省委同志在目前正在召开的4级干部会议上征求基层干部的意见。如果他们同意省的决定，就照那样办，否则不妨改一改。**《郑州会议记录》上所谓‘队为基础’，指的是生产队，即原高级社，而不是生产大队（管理区）。总之，要按照群众意见办事。无论什么办法，只有适合群众的要求，才行得通，否则终究是行不通的。**究竟如何办，请你们酌定。

毛泽东 1959年3月15日，于武昌

3月17日清晨，毛泽东写出了第3个党内通讯，他写道：

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们：

关于县和公社的会议问题。各省市区6级干部大会即将结束，是否应开县的4级或5级干部大会呢？我的意见应当开，并且应当大张旗鼓地开，只是一律不要登报。河南各县正在开4级干部大会，开得很热闹很有益。河南省级负责同志正在直接领导几个县，以其经验，指导各县。湖北、广东、江苏，均已布置全省各县一律开会。江苏省的江阴县委，已经布置开万人大会。河南有两个县是万人大会，多数县是四五千人的。**我建议县应召开5级干部大会，即县委一级，公社党委一级，生产大队（或管理区）一级，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一级，生产小队（即生产组，又称作业组）一级，每级都要有代表参加，使公社的所有小队长，所有支部书记和生产队长，所有管理区的总支书记和生产大队长以及公社一级的若干干部都参加会议。一定要有思想不通的人、观潮派、算账派的人参加，最好占十分之一。社员中的积极分子，也可以找少数人到会。使所有这些人，都听到县委第一书记的讲话。因为他的讲话，比一般公社第一书记的水平要高一些。**然后展开讨论，言者无罪，大大鸣放，有几天时间，将思想统一起来。**要使3种对立面在会上交锋：一种，基层干部与他们上级（公社或县）之间交锋；一种，思想不通的人与思想已通的人之间交锋；一种，十分之一的观潮派、算账派（有许多被认为观潮派、算账派的人，其实并不是观潮派、算账派，他们被人看错了）与十分之九的正面人物之间交锋。**辩论有3天至4天的时间就够了。然后，再以3天至4天时间解决具体问题，共有七、八天时间就够了。县的5级大会一定会比省的6级大会开得更生动，更活跃。**要告诉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和县委第一书记如何做工作。在会中，专门召集这些同志讲一次，使他们从过去几个月中因为某些措施失当，吹“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收款，暂时脱离了群众，这样一个尖锐的教训中，得到经验。以后要善于想问题，善于做工作，就可以与群众打成一片**。应当讨论除公社、管理区（即生产大队）、生产队（即原高级社）3级所有、3级管理、3级核算之外，生产小队（生产小组或作业组）的部分所有制的问题，这个问题是王任重、陶鲁笳两位同志提出来的。我认为有理，值得讨论。县的大会在3月下旬即可完结，4月一个整月可以不开公社的代表大会了，忙一个月生产，开些小会，解决些具体问题，由各生产队在工作余暇，召开党员大会，再开群众大会，形成全民讨论。因为每个公社都有几百人在县里开过会了，问题已讲透了，可以直接进行工暇全民讨论。湖北已有些县在进行全民讨论。到5月间，全国各公社抽出3天时间（3天尽够了），开人民公社第一次社员代表大会，代表要有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正面的、反面的（不要地富反坏，但要有富裕中农），讨论一些问题，选举公社管理委员会。这种代表大会，建议一年开4次，每次1天、2天至多3天。公社第一书记要学会善于领导这种会议。**我们的公社党委书记同志们，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凡是违背这两条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败。县委和地委都要注意加强公社的领导，要派政治上强的同志，去帮助政治上较弱的公社同志。地委要注意派人帮助领导较弱的县委。县委和公社都要注意加强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生产队（一般指原来的高级社）的领导骨干。

以上只是当作建议，究竟如何处理较为适宜，请你们考虑决定，迅即实行。县开会时，公社各级都要留人领导生产，或交替到会，不误农时。

毛泽东 1959年3月17日上午7时，于武昌

欲知毛泽东此后的工作重心是什么？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本章中抄录的3篇党内通讯，充分体现了毛泽东一贯的工作方法和民主作风，如今已经成为探索中国农村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十分难得的里程碑性质的重要史料。不知读者在认真研读以后，能从中看出多少在毛泽东身后出现的那些人身攻击属于无稽之谈？

**第67章**

**“有时候一个人胜过多数，因为真理往往在他一个人手里。如马克思，**

**真理就是在他一个人手里。列宁讲，要有反潮流精神。各级党委要考**

**虑多方面的意见。要听多数人的意见，也要听少数人的意见或个别人**

**的意见。因为，真理往往不在多数人手里，而在少数人手里。”**

话说1959年3月17日，刘少奇在北京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西藏时局和毛泽东的建议。与会者都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并一致认为：最好设法使达赖留在拉萨，如果做不到，他硬是要走，就让他走。周恩来说：

“这次事件同印度当局有关，英国和美国政府在幕后很积极，支持印度当局，把印度推到第一线。叛乱的指挥中心在印度的噶伦堡。”

会议正在进行时，突然传来达赖已经暗暗离开拉萨的消息。会议当即决定增调部队入藏，准备对付可能发生的武装叛乱，方针是绝不打第一枪。

3月18日下午，毛泽东在东湖接见了中午刚刚飞抵武汉的以浅沼稻次郎委员长为首的日本社会党访华团。

浅沼稻次郎一行是在3月7日飞抵北京的。3月12日，浅沼稻次郎在演讲会上发表了“美国占领了日本的冲绳，占领了中国的台湾，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的著名讲话。3月17日，中方和日本社会党发表了共同声明。

浅沼稻次郎一行走进临湖不远处的一幢别墅式楼房的客厅里，毛泽东便迎了上去，和客人们亲切握手。他请客人入座后，高兴地说：

“欢迎你们，你们作了很好的工作。”

浅沼稻次郎说：

“两年前，在北京见过毛主席。从那以后，日中关系比较顺利，我们曾进行了努力。但是，日本的保守政党对中国采取了不友好政策。因此，经过很大努力签订的第4次日中贸易协定也破坏了，接着又发生了长崎侮辱中国国旗事件，感到对不起。以后日中关系陷于中断状态。上次访华时曾和毛主席说过，中国只有一个，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日本应早日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由于日本政府方针的错误，使日中关系中断。社会党为打开这种局面，今年1月，中央执委扩大会议决定派代表团访华。”

“讲得好，讲得很好。”毛泽东赞许地说：“你在北京的演说，这次的共同声明，我都看到了。只要有远见的人就知道我们的方针是正确的。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所作所为，日本当局追随美国，都是暂时的，总有一天要起变化。当前的中日关系，也是暂时的。一时的中断是不好，但这是暂时的。现在我们不是又在来往了吗？社会党的做法很对，打开这条往来的道路。”

他拿起一支烟，点燃后吸了一口，凝视着冉冉的轻烟，沉思片刻，又说道：

“贸易总有一天要重开的，不能一万年不做生意。但是在日本政府这样做之下，我们只好如此。这是我们唯一能够走的路。你一定要政经分开，一定要和蒋介石打交道，好，那就按照他的办法办。让他们去和蒋介石打交道吧，我可以等你多少年的，要等多少年就等多少年。”

说罢，他忍不住爽朗地哈哈一笑。这笑声充满了自信，同时也感染了客人。浅沼稻次郎笑着说：

“您说的大家都明白了，不管亚洲的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但亚洲是一个。日本的外交需要大加修改，日本外交最大的坏处是远交近攻。”

毛泽东说：

“跟中国战国时代一样，是秦始皇的做法。”

浅沼稻次郎说：

“这是日本外交最大的坏处，这给中国和东南亚各国造成了很大损失。**上次毛主席讲，中国有丰富的资源，日本是工业发达的有技术的国家，如果日本的科学技术同中国的丰富资源相结合起来就很好。**”

毛泽东说：

“我们两个国家的事情是互相有影响的。你们搞得好一点，我们高兴；中国工作做得好一点，对你们也有益。**将来总要做生意，不仅和日本，和美国也要做生意。杜勒斯总不能活一万年吧？假如活一万年，一万年以后中国和美国还要讲和。我们和日本总有一天也要讲和的。**要把暂时的现象和将来的发展区别来看，有时是暂时的悲观，但前途总是光明的。”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把客人们送到门口，才依依惜别。浅沼稻次郎也未曾想到，这竟是他和毛泽东最后一次的会见。壮志未酬的浅沼稻次郎于1960年10月12日下午被日本右翼分子刺杀身亡。

3月19日晚，西藏叛国集团公然撕毁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坚持分裂祖国，维护农奴制的反动立场。

3月20日凌晨，西藏叛乱分子发动了以拉萨为中心的全区性武装叛乱，向驻藏的人民解放军发动全面进攻。

3月20日上午10时，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部队对拉萨叛乱进行武装反击。

中央驻西藏代表和工作委员会立即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布告》，揭露西藏地方政府与上层反动集团勾结帝国主义和国外反动分子残害人民、背叛祖国、破坏统一的罪行，号召全藏僧俗人民积极协助解放军进行平叛。

3月22日拂晓，大昭寺和布达拉宫的叛乱武装缴械投降，拉萨市的叛乱基本平息。平叛部队继续向其它地区的叛乱武装发动进攻。后来，达赖于3月31日匆忙逃入印度。

黄克诚、张经武、张国华及总参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等人，来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平叛情况。毛泽东非常高兴，在饭桌上给黄克诚4人敬了酒。此时，他正患感冒，自己也干了一杯，然后乘着酒兴，对雷英夫说：

“英夫啊，你是洛阳人，我问你个问题。”

雷英夫赶紧解释说：

“主席，我在洛阳上过学，其实我是孟津人。”

“噢，孟津人。那我换一个问题问你，武王伐纣时，到孟津几次？每次干些什么事？”

雷英夫还是被毛泽东问住了。他虽然看过《封神演义》，却没读过有关史书。于是，他就老老实实地说：

“主席，我看过《封神演义》，听过民间传说和唱戏，都是七零八碎的，也没留心您提的问题。我只有交白卷了，请主席给我们讲讲吧。”

“洛阳才子回了孟津就交白卷啊？”

毛泽东笑着说。其他几个人也笑着望望雷英夫，雷英夫也笑了，他说：

“其实我文化程度很低。”

毛泽东左手伸出两个指头，晃了晃，说：

“武王去过两次。一次是在公元前1029年，这是第一次去。八百诸侯齐聚孟津，商量伐纣，大家基本都同意。武王很能干，想了想，条件不够成熟。首先，商纣内部腐败了，但还没烂透，还不到马上垮台的时候。其次，他的兵力还不十分强大。再次，过黄河的准备工作还没搞好。最后，争取人心还需要多做一做。直到要出兵了，伯夷、叔齐不是仍然反对，出走了么，所以，武王下决心回去做准备。做哪些准备？有文有武，有精神有物质。要造舆论，统一思想，要搞统一战线，他也是讲究师出有名哩。还要广收人才，集聚粮草，打造兵甲，练兵布阵，准备舟船，用两年时间做了充分准备。这样，到了公元前1027年，武王从潼关出兵到孟津，发宣言，搞突然袭击，打歼灭战，瓦解敌军士气，在朝歌南的牧野打败了商纣。你们都是搞军事的，中国历史上这么大的事还是要研究的。”

雷英夫忙说：

“我这个孟津人实在是不够格，是不学无术。”

毛泽东说：

“太过谦了，这不是老实话。”

他望了一眼大家，又说：

“才子也不能事事都知道，所以都要学习，活到老，学到老。”

饭后，雷英夫借毛泽东兴致很高之机，试探着请求说：

“主席谈到学习，我想提高一些文化。什么时候您写的不要的字，给我几张好吗？”

毛泽东痛快地说：

“别说那不要的呀，要就要那能要的。那好吧，我给你写一个。”

第二天，毛泽东果然叫人送给雷英夫一幅很大的中堂，写的内容是《水调歌头·游泳》。

尔后，毛泽东从武昌来到了上海，准备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这天下午，秦怡与沈浮、金焰、上官云珠、黄宗英等上海电影界人士，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由于被接见的人较多，秦怡与毛泽东没有交谈，只是一次礼节性的握手，彼此印象都不深刻。据秦怡回忆，给她印象较深的倒是陪毛泽东跳舞的那一次。

那是几天后的一个晚上，秦怡和其他女演员接到邀请，到上海文化俱乐部陪毛泽东等领导人跳舞。当时，周恩来也在场，他与秦怡很熟，一见到她，便马上把她介绍给毛泽东：

“这位是上海电影界的著名演员秦怡同志，曾演过《铁道游击队》等许多电影。”

毛泽东一听，立刻与秦怡亲切握手，随后就邀请她跳舞。两人开头都未说话，秦怡觉得过于沉闷不太好，便问毛泽东：

“主席，不知您看过我们的电影没有？有些什么意见，请指导指导。”

毛泽东坦率地回答：

“我看电影不多，看戏曲多，对电影提不出什么意见。”

秦怡没想到毛泽东这么爽快，简直是不假思索，拘束的心情一下放松了许多，于是她接着又说：

“今后您就多看一些电影，这样好多给我们一些指导。”

“你说得对，我接受你的意见。”毛泽东说：“我在这方面太偏，你提醒了我，今后要多看电影。以后看了，再来找你。”

秦怡没想到毛泽东会立刻做自我检查，有点不好意思，便又补充解释道：

“我只是想得到您的指导。”

毛泽东一点也不介意，说：

“你说得对。我是有这个缺点。”

有了毛泽东的这番鼓励，秦怡的心里踏实了许多，和毛泽东一直跳到舞曲终止。

3月23日，吴冷西也到达了上海，将要列席政治局扩大会议。

3月23日晚，毛泽东在中共桐城县委给安庆地委并安徽省委的报告上写了一个批注，他拟的题目是《介绍桐城县的经验》，他批注道：

**至少在20年内，不是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不可能这样快**。**在大约5年至10年内，也还不是在整个国家内就能完成由集体所有到全民所有的过渡问题，而是只能看情况，逐步地完成由基本的小集体所有制首先过渡到以一个乡为范围的大集体所有制。**然后经过若干年的发展，情况表示确有可能又有必要的时候，才可再考虑实行过渡到以一个区为范围的更大的集体所有制。**过渡的时候，一定要使每一个小集体都不吃亏，而且都感到比较不过渡对于每一个小集体每一个个人都更为有利些，要是出于各个小集体和大多数社员的要求，否则谈不到这种过渡**。**不管过渡到乡或区的大集体，目前生产队这种小集体总还是一级核算单位。**

　 　 毛泽东 3月23日

3月25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工业问题、人民公社问题、国家机构的组成问题（即国家主席、副主席、总理、副总理各部部长的人选）。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宣布说：

“这次会议着重讨论人民公社和1959年工农业生产计划指标问题。在讨论之前，先请邓小平同志把中央常委对西藏叛乱和中印关系的意见向会议通报一下。”

邓小平在通报中说：

“第一、要理直气壮，坚持平息叛乱。因为8年来中央和入藏部队执行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而西藏上层叛乱集团却撕毁了协议，背叛祖国，武装反抗中央，进攻人民解放军。

第二、要声讨西藏上层叛乱集团，但对达赖还要留有余地，还是用‘叛乱集团劫持达赖’的说法，同时，因为原主任达赖出走，宣布由班禅出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代理主任。

第三、**现在我们的口号是建设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新西藏。要重新起草西藏自治区章程，要进行民主改革，要建设社会主义，这些都要理直气壮地宣传。**

第四、**现在暂不公开点以尼赫鲁为代表的印度当局的名。毛主席说让他多行不义。**中国古语说：‘多行不义必自毙’，现在让印度当局多行不义，到一定时候我们再跟他算账。尼赫鲁关于西藏叛乱的一些讲话，也暂不报道。因为报道了就要反驳，现在还不到跟他辩论的时候。要看一看再说，这是留有余地。与此相关，印度噶伦堡是这次叛乱的指挥中心，也暂且不提。这同样也是因为提了就要同印度政府交涉。”

邓小平传达中央政治局常委意见后，毛泽东指定由吴冷西和有关人员，起草新华社关于西藏叛乱的新闻公报。

此后，上海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检查了八届六中全会以来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讨论了在公社整顿中提出来的若干问题。

3月27日，毛泽东在吴冷西呈送的关于西藏叛乱的新闻公报上，作了多处修改，并请其他政治局常委及胡乔木和吴冷西本人在文字上再加斟酌。

3月28日晚，新华社全文广播了关于西藏叛乱的新闻公报。

3月29日，毛泽东写出了第4个党内通讯，发给中央各部党委或党组书记、各市委书记、省（自治区）委书记，他写道：

上海几个县的材料可阅。

**城市，无论工矿企业、交通运输业，财政金融贸易事业，教育事业及其他事业，凡属大政方针的制定和执行，一定要征求基层干部（支部书记、车间主任、工段长）、群众中的积极分子等人的意见，一定要有他们占压倒多数的人到会发表意见，对立面才能树立，矛盾才能揭露，真理才能找到，运动才能展开。**总支书记、厂矿党委书记、城市委书记、市委市府所属各机关负责人和党组书记、中央一级的司局长同志们，**我们对于这些人的话，切忌不可过分相信。他们中的很多人几乎完全脱离群众，独断专行。上面的指示不合他们胃口的，他们即阳奉阴违，或者简直置之不理。他们在许多问题上，仅仅相信他们自己，不相信群众，根本无所谓群众路线。**有鉴于此，**尔后每年一定要召开两次5级或者6级、或者7级的干部大会，每次会期10天，上层，中层，基层干部的错误观点才能改正，他们的僵死头脑才能松劲，他们才有可能进步，否则是毫无办法的。**听他们的话多了，我们也会同化，犯错误，情况不明，下情不能上达，上情不能下达，危险之至。每年这样的大会开两次，对于我们也极有益处，可以使我们明了情况，改正错误。这里说的是城市问题，农村问题同样如此。我在前次通讯中，已经大体说过了。

毛泽东 1959年3月29日

3月30日，毛泽东在批转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的《关于五级干部会议情况的报告》时，加了一个《介绍山西经验》的标题，并在标题下面写了一个按语：

“此件很好，很容易看。如有头昏病，还可以愈头昏。”

他根据各地整社中群众普遍提出清算旧账，即清算公社化和大炼钢铁中平调生产队的物资、劳力等项账目的要求，批示说：

**“旧账一般不算这句话，是写到了郑州讲话里面去了的，不对，应改为旧账一般要算。算账才能实现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对群众不能解怨气，对干部，他们将被我们毁坏掉。有百害而无一利。**一个公社竟可以将原高级社的现金收入400多万元退还原主，为什么别的社不可以退还呢？**不要‘善财难舍’，须知这是劫财，不是善财。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是不许可的。”**

在上海会议期间，毛泽东召集6个大区的负责人到他的住处座谈，陶鲁笳接到通知晚了，待他赶到时大家正吃午饭，他就坐在毛泽东的对面，他说：

“主席，我感到这次会议定的4大指标（钢、煤、粮、棉——笔者注）都过高了，特别是钢和粮两大指标，我已和在家的常委们通过电话，大家一致认为这样高的指标是无法完成的。”

毛泽东闻言，笑着对王任重说：

“你有同情者了。”

柯庆施却对陶鲁笳说：

“要有雄心壮志嘛，共产党员不说三分大话不算数，有三分大话、七分可靠就行了嘛。”

陶鲁笳当即争辩道：

“不能把雄心壮志和说大话混为一谈。我们山西农民有句话，‘说大话，放空炮，亩产千斤办不到’，可见群众对我们那些没有根据、办不到的大话是很不满意的。”

李井泉说：

“要跳起来摘果子嘛，不要站在那里就想把果子摘到手。”

陶鲁笳说：

“现在的问题是，跳得再高也摘不到果子呀。”

曾希圣说：

“分配给我们安徽的指标，只要鼓足干劲，是能够实现的。因此，我们接受。指标低了，不利于调动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

陶鲁笳说：

“我们山西武乡县有一个党支部开党员大会，支书根据上面的意见，提出亩产要搞800斤。党员们说‘200斤低，400斤高，800斤你自己背起来好了’，说罢，党员们都走散了，只剩下支书孤家寡人。”

在大家的争论中，毛泽东一直捂着嘴在一边笑。他见都不讲了，这才说了一句：

“有不同意见，可以再讨论讨论嘛！”

1959年4月1日，上海会议结束。在毛泽东的干预下，上海会议对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的指标进行了一些调整。会议对人民公社管理体制问题作了若干原则规定。会议形成了《关于人民公社的十三个问题（修正稿）》的会议纪要，准备提交给党的八届七中全会讨论。

4月2日，中共中央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锦江饭店举行。

4月2日晚，毛泽东对《麻城县万人大会的情况》等几个报告写了一个批示：

“这几个文件都值得看。特别是《麻城县万人大会的情况》，值得看，办法很好，**县社两级该退还的，迅速地退还给生产队了，一身清净，然后进而解决队与社员的矛盾，公社就可以大大发展起来。”**

4月3日，吴冷西根据毛泽东指示，在《人民日报》上对印度尼赫鲁3月30日的讲话做了详细报道，并着手写相关的评论文章。

4月3日，毛泽东对《麻城县万人大会第二次报告》作了批示，他在批语中写道：

此件极好，每一个县社都应这样做。**算账才能团结。算账才能帮助干部从贪污浪费的海洋中拔出身来，一身清净。算账才能教会干部学会经营管理方法。算账才能教会5亿农民自己管理自己的公社，监督公社的各级干部只许办好事，不许办坏事，实现群众的监督，实现真正的民主集中制。**

毛泽东 1959年4月3日

4月3日下午傍晚，毛泽东在谭震林来信的批示中写道：

各县、社4月不开大会。原定5月开社、队代表大会，可以考虑在5月上旬或中旬到县里开，彻底解决3月会议没有彻底解决的权力下放、算清账目、包产指标3个问题，然后选举公社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和社、队管理机关。就算账这个问题来说，3月省、县大会我们缺乏精神准备。郑州说的是一般不算，应翻过来，一般要算。有些省已经翻过来了。如湖北，但也没有翻透。说的是县、社要向生产队算清过去几个月大调大抓的账，解决大集体与小集体间的矛盾，这当然是要首先解决的。**还有一个必须随着解决的矛盾，生产队干部与生产小队干部、全体社员群众间的矛盾，小集体与社员的矛盾。**这个问题，如麻城县那样大规模解决，是最近几天才提出来的，才进入我们的认识领域。**这是一个以贪污形式无偿占有别人劳动的问题，是一个普遍的问题，也是一个历史的问题，并非最近才发生，但只有在1959年才能解决，只有在现在才能建立真正的群众监督。**像这样一个群众性的大问题，没有省的决心、县的直接领导，我看是不能解决的，因此我建议5月的会到县里开。是否如此，请你们委员会讨论一下。

　　 毛泽东 4月3日下午6时

毛泽东在八届七中全会会议期间看了湘剧《生死牌》，剧中海瑞刚直不阿的形象，使他感触颇多。于是他借来《明史》，看了《海瑞传》。

4月4日上午，毛泽东在八届七中全会上首先说起了海瑞的故事，他说：

“海瑞这个人对皇帝骂得很厉害，骂嘉靖是‘家家皆净’，还把这话写在给皇帝的上疏里，很不客气。皇帝看了，几次丢在地下，又几次拾起来看一看，想一想，觉得海瑞这个人还是好人。但终究把他关起来，准备杀掉。有一天，看监人忽然拿酒菜给海瑞吃，海瑞很奇怪，便问看监的老头，才知道嘉靖皇帝死了。他大哭，把吃的东西都吐了出来。尽管海瑞攻击皇帝很厉害，对皇帝还是忠心耿耿的。

明朝皇帝对臣下严酷，廷杖致死，还是堵塞不了言路。无非是五不怕：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因此，要学习海瑞精神，海瑞敢说真话。”

毛泽东讲完了海瑞的故事，接着又讲了一个卞和献玉的故事，他说：

“楚国有个卞和，得到一块很好的玉石，献给楚王。楚王不识货，说他骗人，把他的左脚砍掉了。第2次又献上去，还说他骗人，右脚也砍掉了。卞和坚信真理，坚信自己献的是一块好玉，第3次再献上去，剖开后证明确实是一块好玉。他由此取得了楚王的信任。”

毛泽东由故事引入正题，要求党内干部为了党的事业，要敢于讲真话，不要怕这怕那。他还说：

“我同一位女同志跳舞，问她：上海的情况如何？她说：我是大学教授，不能讲。我说：你不问政治？她答：不是不问，而是不敢问。我问柯庆施怎么样？她说：更不敢讲。又问她：我怎么样？她说：你英明伟大。看来，这位大学教授对我们的信任，是很有限度的。”

他又说：

“少奇等是在我身边多年的战友，在我面前都不敢讲话。”

中共中央八届七中全会讨论通过了《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草案中对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经济计划指标进行了一些调整，原指标再次被压缩，将1959年的钢产量指标降为1300万吨，原煤产量指标降为3.4亿吨，其他工业品指标也大幅度降低。

会议还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

4月5日上午，毛泽东在全会上讲了十几个问题。他在讲到工作方法问题时说：

“现在有些同志不多谋，也不善断，是少谋武断。要多谋善断，重点在谋字上。要多谋，少谋不行。要与多方面商量。要反对少谋武断。多谋，过去往往与相同意见谋得多，与相反意见谋得少；与干部谋得多，与生产人员谋得少。商量又少，又武断，那事情就办不好。谋是基础，只有多谋，才能善断。**多谋的方法很多，如开调查会、座谈会。谋的目的是为了断。”**

“要多谋善断，要多听人家的不同意见，善于观察形势，当机立断，在党内，要造成有话就讲，有缺点就改进的空气。”

毛泽东还说：

“**有时候一个人胜过多数，因为真理往往在他一个人手里。如马克思，真理就是在他一个人手里。**列宁讲，要有反潮流精神。各级党委要考虑多方面的意见。要听多数人的意见，也要听少数人的意见或个别人的意见。因为，真理往往不在多数人手里，而在少数人手里。”

毛泽东强调党内民主、反对家长制。他以自己和弟弟毛泽覃的关系为例，作了自我批评。毛泽东说：

“我这个人也有旧的东西，比如有一次，我的弟弟毛泽覃同志和我争论一个问题。这个同志已经在江西牺牲了。他说他对，我说我正确，他不听我的，我也没有说服他，就要打他。他当场质问我：‘你怎么打人？’事后，他还在一些人面前讲我的闲话，说：‘共产党实行的是家法、还是党法？难道我不同意他的意见就打人？如果实行家法，父母亲不在，他是哥哥，也可以打我。”

毛泽东又说：

“对人民、对同志，不能压服，只能说服，要以理服人，我们都是平等的同志关系。”

毛泽东鉴于不少人在全会上仍然坚持生产高指标，不愿意压低1959年工农业生产的指标，而且，持这种意见的人还占了上风。他们认为，纠“左”已有半年多了，再纠下去会给群众泼冷水，会给大跃进运动抹黑，而且，右倾大有抬头之势。对此，他说道：

“不能每天高潮，要波浪式前行。1959年不搞‘马鞍形’是不行的。‘马鞍形’将来还会有，做计划要留有余地，给下面留点积极性。不给下面留有余地，也就是不给自己留有余地。留有余地上下都有好处。**如农村包产，指标定为2000斤，这就没有余地了。过去打仗留预备队，现在搞生产忘掉了。工作计划一定要留有余地，不能满打满算。**保证重点是重要的，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我们要按政策办事情。”

“要善于观察形势，脑筋不要硬化。形势不对了，就要有点嗅觉，嗅政治形势，嗅经济空气，嗅思想动态。北戴河会议以后，我们的经济计划一直被动，自己毫无主动。武昌会议被迫由3000万吨钢搞成2000万吨。

北戴河会议决议是大会通过的，通过之后，我看了一下，我也有责任，我没有提出意见，因为我那个时候也在高潮，越多越好，3000万吨。但到武汉，我就改了，我说不行了。我经过河北，经过河南，特别是经过河南郑州会议，形势不对了，我就提出降低1000万吨，只搞2000万吨，或者还少一点。”

毛泽东很不满意几个会议文件的起草工作，他说：

“凡是看不懂的文件禁止拿出来。**你写文章干什么？你是要人家懂**。你写古文，许多问题不交代给人家，人家怎么会懂呢？今天交代了，明天又不交代，结果忘记了，不懂心理状态。我是赞成朱自清的风格的。朱自清是清华大学一个教授，他的文章写得好，另一个侧面不好，就是不神气。第一个神气的是鲁迅，他的话是口语。鲁迅的杂感，你看那个《阿Q正传》不是口语？‘和尚动得，我动不得？’什么‘儿子打老子’之类都是口语。对这个问题，我讲了一万次了，但是许多同志没有改过来。也许从今天起还是改不过来，但是我有生之年，没有见阎王，我就要整这件事。**6亿人民，1300万党员，你要给他们阅读，你写古文，你写半文半白结合的文，又不交代问题，又不使人看了通顺，懂得你的意思，不行。**所以，凡是看不懂的文件，一定要禁止，不要拿出来。你拿出来，我就要反对，立即顶回去。一望之下，你这个东西不行，就要顶回去。”

毛泽东最后说：

“一个人没有人恨，是不堪设想的。我这个人是许多人恨的，特别是彭德怀同志，他是恨死了我的。是不是这样呢？不恨死了，也有若干恨。因为我跟他闹别扭闹得相当多。会理会议、延安会议，中央苏区江口会议，我们俩个人斗。但是我们俩个人我看是好的，有什么不好呢？都是革命党。我是寸步不让，你一炮来，我一炮去。我跟彭德怀同志的政策是这样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不仅跟彭德怀同志一个人的问题，跟其他同志也是这样。”

“我的缺点，你们也要批评。现在搞成一种形势，不大批评我的缺点，你用旁敲侧击的办法来批评也可以嘛。我送了《明史》的《海瑞传》给彭德怀同志看了。你看海瑞那么尖锐，他写给皇帝的那封信，那是很不客气，非常不客气，皇帝看了这封信丢到地下，然后又拣起来看一看，又丢到地下，然后又捡起来，想一想觉得这个人还是个好人，但是终归把他捉到班房里头，恨透了，准备把他杀掉。”

“我们的同志哪有海瑞那样的勇敢，海瑞比包文正不知要高明多少。我把这个《明史》给彭德怀同志看，同时我也劝你（指周恩来）看，你看了没有？（周恩来：看了。）我讲我跟一些同志的冲突，冲突过后我也过去了，我也不记仇，绝不报复。我们这些老同志没有打过架的相当少，不打不成相识。你打过来，我打过去。我跟恩来打过架没有？跟彭德怀打过架没有？跟朱德打过架没有？跟你（指刘少奇）也打过架，就是合作化问题。跟陈云我们打过架。跟林彪也打架，我们在闽西一路合作得很好，遵义会议以后我跟你们两位（一个林、一个彭）都分裂了，搞了一个会理会议整你们。”

“刘伯承同志我们两个不是斗得厉害？我还写了书，战略问题，那就是批评你的，你也没有答复。后来你在军事学院大概是想答复一下，没有尖锐地提出那些问题来批评，因为我那篇《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不能驳的，是驳不了的。那个里头批评了刘伯承，批评了任弼时，没有指名字。任弼时封我一个‘狭隘经验论’；刘伯承封我一个‘怕打烂坛坛罐罐’，军事上不行。”

“至于跟粟裕同志，萧克同志，还有陈伯钧、还有郭化若同志我们几个是历来斗的，他们是我的反对派，但是你们是反对派，你们的官还可以做，我不报复。去年报复一次，不是我的报复。去年报复是开军委扩大会议，四五百人，是你们犯了错误，把你们这一批评，我就开心了。”

4月5日下午，毛泽东从上海到了杭州西湖西南岸的刘庄，他办公、休息都住在南屏游泳池。

是日晚，毛泽东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

“如果有可能，我就游历黄河、长江。从黄河口子沿河而上。搞一班人，地质学家、生物学家、文学家，只准骑马，不准坐车，骑马对身体实在好，一直往昆仑山，然后到猪八戒的那个通天河，翻过长江上游，然后沿江而下，从金沙江到崇明岛。我有这个志向，现在开支票，但哪一年兑现不晓得。我很想学徐霞客。徐霞客是明末崇祯时江苏江阴人，他就是走路，一辈子就是这么走遍了，主要力量用在长江。《徐霞客游记》可以看。”

毛泽东为了实现这个愿望，让中央警卫局在北京西山组建了一支秘密骑兵大队，以备考察之用。由于形势很快就发生了重大变化，他的这一愿望就没有能够实现。

4月6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谭震林、陈伯达、胡乔木、杨尚昆，还有田家英、吴冷西、李友九，也来到了杭州，参加毛泽东主持的会议，讨论、修改周恩来准备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及李先念副总理的预算报告。

4月7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汪锋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汪锋同志：

我想研究一下整个藏族现在的情况。1、金沙以西，构成西藏本部昌都、前藏、后藏（包括阿里），人口据说有120万人，是不是？2、面积有多少平方公里？3、农奴制度的内容，农奴与农奴主（贵族）的关系，产品双方各得多少？有人说二八开，有人说形式上全部归贵族，实际上农奴则瞒产私分度日，对不对？4、共有多少喇嘛，有人说8万，对否？5、贵族对农奴的政治关系，贵族是否有杀人权？是否私立审判，使用私刑？6、喇嘛庙对所属农奴的剥削压迫情形。7、喇嘛庙内部的剥削压迫情形，有人说对反抗的喇嘛剥皮、抽筋，有无其事？8、西藏地方各级政府及藏军每年的广大经费从何而来？从农奴，还是从贵族来的？9、叛乱者占总人口的百分比，有无5%？或者还要多些，或者少些，只有百分之一、二、三，何者为是？10、整个剥削阶级中，左中右分子的百分比各有多少？左派有无三分之一，或者还要少些？中间派有多少？11、云南、四川、甘肃、青海4省各有藏人多少，共有藏人多少？有人说，4省共有200多万至300万，对否？12、这4个省藏人住地共有面积多少平方公里？13、青海、甘肃、四川喇嘛庙诉苦运动所表现的情况如何？有人说搜出人皮不少，是否属实？

以上各项问题，请在一星期至两星期内大略调查一次，以其结果写成内部新闻告我，并登新华社的《内部参考》。如北京材料少，请分电西藏工委，青海、甘肃、四川、云南4个省委加以搜集。可以动员新华社驻当地的记者帮助搜集，并给新华总社以长期调查研究藏族情况的任务。

毛泽东 4月7日

4月8日，毛泽东在刘庄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通过了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毛泽东又谈到了西藏叛乱事件，他说：

“此事国内国外都很关心，估计这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中大家要议论。《人民日报》要着手准备一篇比较充分的、把问题展开来讲的社论。现在英国、美国和印度都在吵吵嚷嚷，搞反华大合唱，支持西藏叛乱集团，反对我们平叛。我们要沉着迎战，要准备在宣传上加以反击。你们回北京后就着手准备。”

在常委扩大会议期间，王芳有一次陪毛泽东游泳之后和他一起吃饭，毛泽东知道王芳喜欢京戏，曾在山东根据地演过《黄鹤楼》中的周瑜，就问道：

“周瑜是怎么死的？”

王芳说：

“是被诸葛亮气死的。”

“不对。**周瑜不是被诸葛亮气死的，而是被孙权气死的。**”毛泽东笑了笑，又说：“孙策死后，他的老婆大乔年纪很轻，住在后宫很寂寞，因此大乔经常请小乔去陪她，有时周瑜也陪小乔去后宫看大乔。他去的次数多了，在后宫留的时间又长，孙权因此对周瑜很有意见，但又不能当面讲，就处处刁难他，给他脸色看。再加上军事上不断失利，一再败给诸葛亮，孙权对周瑜的看法更大了，脸色更难看。周瑜是个十分高傲而器量又小的人，哪里受得起这种屈辱，忧郁成疾，不久就病死了。”

4月12日，毛泽东离开杭州。

4月13日,毛泽东的专列抵达山东兖州车站，他听取了舒同的汇报,决定到东郊公社考察小麦生长情况。

是日下午，专列到达济南。东郊公社书记郑松随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白如冰到济南火车站迎接毛泽东,毛泽东一眼就认出了郑松,微笑着说：

“郑松,今天到你们公社看看小麦可以吧？”

听到毛泽东喊自己的名字,郑松为之一惊,没想到2月25日座谈会至今已近50天了,主席还记得自己的名字,“顿生一种幸福感”。

毛泽东首先察看了公社党委的试验田。这片试验田有20亩,地头上插着一块木牌,上面除了写着面积、品种、管理措施之外,还写着“计划亩产1000斤”字样。毛泽东一字一句地读下来,有些怀疑地问郑松：

“一亩能收1000斤吗？”

郑松说：

“计划亩产1000斤,如果不出现特殊情况,一亩收这些斤问题不大。”

毛泽东说：

“现在我不相信,打出来的时候我才相信哩！”

他俯下身子拨开麦苗，亲手拔起一墩反复察看,仔细询问了麦田的深翻整平和下种量、施肥、浇水等情况，尔后离开这片试验田，又看了大辛庄的小麦长势，便乘专列经天津回到了北京。

后来在小麦收获后,东郊公社党委写信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视察过的大辛庄1700亩小麦,平均亩产400.6斤,比上一年增产254.31%；而他视察的20亩试验田平均亩产742斤。

再说4月中旬的一天，毛泽东乘车从中南海出来，突然看见表哥文涧泉正在路上徘徊，就示意秘书停下来，把文涧泉接到车上，拉回家中。毛泽东问道：

“十一哥，你来了多久了？”

文涧泉怏怏不乐地说：

“来了几个月了。”

毛泽东又问：

“住在哪里？”

文涧泉有些生气地说：

“人还没死，就摊了门板。”

文涧泉说摊了门板，是指乡下有个习俗，死了人之后，尸体要在门板上摊1天，然后再入棺。这显然是气话，埋怨他住的地方不好。毛泽东笑着说：

“火气还不小嘛。我从武汉回来刚几天，前天才知道你来了。”

原来，文涧泉这位老农在家乡种了几十年的田，对水稻的栽培和管理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他认为水稻要合理的密植，才能增产。可是，他的观点在大跃进高潮中遭到了批判，说他是经验主义，是保守，大门上还被插了白旗。文涧泉一气之下，在1959年初来到了北京，要找表弟讨个说法。他住在一个条件较差的招待所里，要见毛泽东，可是每次都被挡了驾，回答是：“主席外出视察，不在家。”就这样，他在北京一直等了几个月。

这一天，文涧泉在《人民日报》上看到毛泽东在北京会见了一位外宾，就知道他已经回来了，于是就向中南海走去，结果还是被挡了驾。正在他不知所措时，被毛泽东看到了。毛泽东听了表兄受冷落的经过，就说：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住宿差，好吧，马上给你换个地方。看样子，十一哥有什么不称心的事啊？”

文涧泉说：

“能称心得起来么？我挨了批，还插了白旗。”

毛泽东不胜惊讶，问道：

“你为什么挨批插白旗了？”

文涧泉说：

“开头是为队里密植。后来是为大炼钢铁，砍了黄土岭的油茶林。你不是说过，油茶是个好东西么？”

毛泽东叹息着说：

“黄土岭的油茶林也砍啦，可惜，可惜！你顶住了瞎指挥，是功臣嘛！怎么还插白旗呢？应该戴大红花才对！”

毛泽东看着文涧泉掏出手帕擦眼泪，长长地嘘了一口气，说：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看来你的怨气不小。我向你赔不是，给你戴大红花。”

文涧泉说：

“我这次来的目的，是要解决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文涧泉便把为密植挨批的事情说了一遍。毛泽东认真地听着。文涧泉似乎还没有消气，他说：

“我认为政府的政策不行，种田不能搞密植，要合理密植。我作了一辈子的田了，还没有看到如今这么个‘密法’。政府有人说我是保守派。我说，人虽然老了，但还可以看水，这么密植会要减产的。”

毛泽东只好以好言相劝。文涧泉说：

“没用。县官不如现管。政府的政策不改变，我回去还得挨批。我要在北京住下去，等政府改变了态度，等我的孙子写信来，我才回去。”

毛泽东知道表哥心直口快的脾气，也难怪他为密植问题如此恼火，就留他吃晚饭，安慰了几句，说：

“‘忠言逆耳利于行’，难得你有这番好意啊！十一哥熄熄火，在北京住几天，再回家去。”

文涧泉经毛泽东这么一劝说，气消了，心平了，在北京饭店呆了几天，便又回到乡下继续种田。

4月15日，《人民日报》以观察家名义，发表了吴冷西修改好的、经周恩来审定的评论文章，题目是《不能允许中印友好关系受到损害》。评论披露了帝国主义和印度非官方攻击中国平叛的言论。评论中说，对尼赫鲁演说中所说的“不可让中印关系恶化”，表示欢迎。评论中引用了《印度快报》对尼赫鲁演说的评论，说尼赫鲁“在送鲜花方面非常慷慨，右手向西藏大扔鲜花，左手向中国大扔鲜花”，说尼赫鲁要“保持这两方面的微妙的平衡，那显然是他最为难的时刻”。

4月15日下午，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16次会议。会议主要讨论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和第三届人民政协第1次会议的议程。

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长篇讲话，他说：

“从去年8月起，出了两件事，都跟我们有关。一个是台湾问题，一个是西藏问题。”

在讲了炮击金门以后，毛泽东又说：

“我们要奋斗下去，什么威胁我们都不怕。《聊斋志异》有一个故事，说有一个书生，晚上坐着看书，有个鬼吓他，从窗户口伸进舌头来，这么长，它以为这个书生就吓倒了。这个书生不慌不忙，拿起笔把自己的脸画成张飞的样子，画得像我们现在戏台上的袁世海的样子，然后把舌头伸出去，没有那么长就是了。两个人就这样顶着，你望着我，我望着你。最后那个鬼只好悻悻地走了。《聊斋志异》的作者告诉我们，不要怕鬼，你越怕鬼，你就不能活，它就要跑进来把你吃掉。我们不怕鬼，所以炮击金门、马祖。这一仗打下去之后，现在台湾海峡风平浪静，通行无阻，所有的船只不干涉了。”

关于西藏叛乱问题，他说：

“有些人对于西藏寄予同情，但是他们只同情少数人，不同情多数人，100个人里头，同情几个人，就是那些叛乱分子，而不同情百分之九十几的人。在外国，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对西藏就是只同情一两万人，顶多三四万人。**西藏本部（只讲昌都、前藏、后藏这3个区域）大概是120万人。120万人，用减法去掉几万人，还有一百一十几万人，世界上有些人对他们不同情。我们则相反，我们同情这一百一十几万人，而不同情那少数人。**

那少数人是一些什么人呢？就是剥削、压迫分子。**讲贵族，班禅和阿沛两位也算贵族，但是贵族有两种，一种是进步的贵族，一种是反动的贵族，他们两位属于进步的贵族。**进步分子主张改革，旧制度不要了，舍掉它算了。旧制度不好，对西藏人民不利，一不人兴，二不财旺。西藏地方大，现在人口太少了，要发展起来。这个事情，我跟达赖讲过。我说，你们要发展人口。**我还说，你们的佛教，就是喇嘛教，我是不信的，我赞成你们信**。但是，有些规矩可不可以稍微改一下子？**你们120万人里头，有8万喇嘛，这8万喇嘛是不生产的，一不生产物质，二不生产人**。你看，**就神职人员来说，基督教是允许结婚的，回教是允许结婚的，天主教是不允许结婚的。西藏的喇嘛也不能结婚，不生产人**。同时，喇嘛要从事生产，搞农业，搞工业，这样才可以维持长久。**你们不是要天长地久、永远信佛教吗？我是不赞成永远信佛教，但是你们要信，那有什么办法！我们是毫无办法的，信不信宗教，只能各人自己决定。**

至于贵族，对那些站在进步方面主张改革的革命的贵族，以及还不那么革命、站在中间动动摇摇但不站在反革命方面的中间派，我们采取什么态度呢？我个人的意见是：**对于他们的土地、他们的庄园，是不是可以用我们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办法，即实行赎买政策，使他们不吃亏。比如我们中央人民政府把他们的生活包下来，你横直剥削农奴也是得到那么一点，中央政府也给你那么一点，你为什么一定要剥削农奴才舒服呢？**

我看，**西藏的农奴制度，就像我们春秋战国时代那个庄园制度，说奴隶不是奴隶，说自由农民不是自由农民，是介乎这两者之间的一种农奴制度。**贵族坐在农奴制度的火山上是不稳固的，每天都觉得要地震，何不舍掉算了，不要那个农奴制度了，不要那个庄园制度了，那一点土地不要了，送给农民。但是吃什么呢？我看，**对革命的贵族，革命的庄园主，还有中间派的贵族，中间派的庄园主，只要他不站在反革命那方面，就用赎买政策。**我跟大家商量一下，看是不是可以。现在是平叛，还谈不上改革，将来改革的时候，凡是革命的贵族，以及中间派动动摇摇的，总而言之，只要是不站在反革命那边的，我们不使他吃亏，就是照我们现在对待资本家的办法。并且，**他这一辈子我们都包到底。资本家也是一辈子包到底**。几年定息过后，你得包下去，你得给他工作，你得给他薪水，你得给他就业，一辈子都包下去。这样一来，农民（占人口的95%以上）得到了土地，农民就不恨这些贵族了，仇恨就逐渐解开了。

日本有个报纸哇哇叫，讲了一篇，它说，共产党在西藏问题上打了一个大败仗，全世界都反对共产党。说我们打了大败仗，谁人打了大胜仗呢？总有一个打了大胜仗的吧。只有人打了大败仗，又没有人打了大胜仗，哪有那种事？你们讲，究竟胜负如何？假定我们中国人在西藏问题上打了大败仗，那么，**谁人打了大胜仗呢？是不是可以说印度干涉者打了大胜仗？我看也很难说。他打了大胜仗，为什么那么痛哭流涕，如丧考妣呢？**你们看我这个话有一点道理没有？

还有个美国人，名字叫艾尔索普，写专栏文章的。他隔那么远，认真地写一篇文章，说西藏这个地方没有20万军队是平定不了的，而这20万军队，每天要一万吨物资，不可能运这么多去，西藏那个山高得不得了，共产党的军队难得去。因此，**他断定叛乱分子灭不了。叛乱分子灭得了灭不了呀？我看大家都有这个疑问。因为究竟灭得了灭不了，没有亲临其境，没有打过游击战争的人，是不会知道的。我这里回答：平叛不要20万军队，只要5万军队，20万的四分之一**。1956年以前我们就5万人（包括干部）在那里，1956年那一年我们撤了3万多，剩下1万多。那个时候我们确实认真地宣布6年不改革，6年以后，如果还不赞成，我们还可以推迟，是这样讲的。你们晓得，整个藏族不是120万人，而是300万人。刚才讲的西藏本部（昌都、前藏、后藏）是120万人，其他在哪里呢？主要是在四川西部，就是原来西康区域，以及川西北，就是毛儿盖、松潘、阿坝那些地方。这些地方藏族最多。第二是青海，有50万人。第三是甘肃南部。第四是云南西北部。**这4个区域合计180万人。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开会，商量在藏族地区搞点民主改革，听了一点风，立即就传到原西康这个区域，一些人就举行武装叛乱**。现在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的藏族地区都改革了，人民武装起来了。藏人扛起枪来，组织自卫武装，非常勇敢。这4个区域能够把叛乱分子肃清，为什么西藏不能肃清呢？你讲复杂，原西康这个区域是非常复杂的。原西康的叛乱分子打败了，跑到西藏去了。他们跑到那里，奸淫虏掠，抢得一塌糊涂。他要吃饭，就得抢，于是同藏人就发生矛盾。原西康跑去的，青海跑去的，有1万多人。1万多人要不要吃呢？要吃，从哪里来呢？就在120万人中间吃过来吃过去，从去年7月算起，差不多已经吃了一年了。这回我们把叛乱分子打下来，把他们那些枪收缴了。比如在日喀则，把那个地方政府武装的枪收缴了，江孜也收缴了，亚东也收缴了。收缴了枪的地方，群众非常高兴。老百姓怕他们3个东西：第一是怕他那个印，就是怕那个图章；第二是怕他那个枪；第三，还有一条法鞭，老百姓很怕。把这三者一收，群众皆大欢喜，非常高兴，帮助我们搬枪支弹药。**西藏的老百姓痛苦得不得了。那里的反动农奴主对老百姓硬是挖眼，硬是抽筋，甚至把十几岁女孩子的脚骨拿来作乐器，还有拿人的头骨作饮器喝酒。这样野蛮透顶的叛乱分子完全能够灭掉，不需要20万军队，只需要5万军队，可以灭得干干净净**。灭掉是不是都杀掉呢？不是。**所谓灭掉，并不是把他们杀掉，而是把他们捉起来教育改造，包括反动派，比如索康那种人。这样的人，跑出去的，如果他回来，悔过自新，我们不杀他。**

再讲一个中国人的议论。此人在台湾，名为胡适。他讲，据他看，这个‘革命军’（就是叛乱分子）灭不了。他说，他是徽州人，日本人打中国的时候，占领了安徽，但是没有去徽州。什么道理呢？徽州山太多了，地形复杂。日本人连徽州的山都不敢去，西藏那个山共产党敢去？我说，胡适这个方法论就不对，他那个“大胆假设”是危险的。他大胆假设，他推理，说徽州山小，日本人尚且不敢去，那么西藏的山大得多、高得多，共产党难道敢去吗？因此结论:共产党一定不敢去，共产党灭不了那个地方的叛乱武装。**现在要批评胡适这个方法论，我看他是要输的，他并不‘小心求证’，只有‘大胆假设’。**

有些人，像印度资产阶级中的一些人，又不同一点，他们有两面性。他们一方面非常不高兴，非常反对我们3月20日以后开始的坚决镇压叛乱，非常反对我们这种政策，他们同情叛乱分子。另一方面，又不愿意跟我们闹翻，他们想到过去几千年中国跟印度都没有闹翻过，没有战争，同时，他们看到无可奈何花落去，花已经落去了。1954年中印两国订了条约，就是声明五项原则的那个条约，他们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中国的领土。他们留了一手，不做绝。英国人最鬼，英国外交大臣劳埃德，工党议员这个一问，那个一问，他总是一问三不知，说：没有消息，我们英国跟西藏没有接触，在那里没有人员，因此我无可奉告。老是这么讲。他还说，要等西藏那个人出来以后，看他怎么样，我们才说话。他的意思就是达赖出来后，看他说什么话。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关死门，说达赖是被挟持走的，又发表了他的3封信。这次人民代表大会，周总理的报告里头要讲这件事。**我们希望达赖回来，还建议这次选举不仅选班禅，而且要选达赖。他是个年轻人，现在还只有25岁。假如他活到85岁，从现在算起还有60年，那个时候21世纪了，世界会怎么样呀？要变的。那个时候，我相信他会回来的。他59年不回来，第60年他有可能回来。那时候世界都变了。这里是他的父母之邦，生于斯，长于斯，现在到外国，仰人鼻息，几根枪都缴了。我们采取这个态度比较主动，不做绝了。**

总理的报告里头要讲希望达赖回国。如果他愿意回国，能够摆脱那些反动分子，我们希望他回国。但是，事实上看来他现在难于回国。他脱离不了那一堆人。同时，他本人那个情绪，上一次到印度他就不想回来的，而班禅是要回来的。那时，总理劝解，可能还有尼赫鲁劝解，与其不回不如回。那个时候就跟他这么讲：你到印度有什么作用？不过是当一个寓公，就在那里吃饭，脱离群众，脱离祖国的土地和人民。现在，还看不见他有改革的决心。说他要改革，站在人民这方面，站在劳动人民这方面，看来不是的。他那个世界观是不是能改变？60年以后也许能改，也许不要60年。而现在看来，一下子要他回来也难。他如果是想回来，明天回来都可以，但是他得进行改革，得平息叛乱，就是要完全站在我们这方面来。看来，他事实上一下子也很难。但是，我们文章不做绝了。”

关于国家领导人的调整问题，毛泽东说：

“为什么国家主席候选人是刘少奇同志，而不是朱德同志？朱德同志是很有威望的，刘少奇同志也是很有威望的。为什么是这个，不是那个？因为我们共产党主持工作，我算一个，但是我是不管日常事务的。有时候管一点，有时候不管。经常管的是谁呢？是少奇同志。我一离开北京，都是他代理我的工作。这已经是多年了。在延安开始就是如此，现在到北京已经又10年了。在延安，比如我到重庆去，代理我的工作就是少奇同志。以他担任主席比较适合。同时，朱德同志极力推荐少奇同志。我说，你们对调一下，把少奇同志过去的工作（委员长）请你做，他很高兴。在上海会议，在七中全会，就决定这样做。宋副委员长改任国家副主席，还有董必武同志担任副主席，一正两副。”

欲知毛泽东此后的工作情况，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59年3月29日发给中央各部党委或党组书记、各市委书记、省（自治区）委书记的第4个党内通讯，是一篇极富辩证法的短文。他说：“**城市，无论工矿企业、交通运输业，财政金融贸易事业，教育事业及其他事业，凡属大政方针的制定和执行，一定要征求基层干部（支部书记、车间主任、工段长）、群众中的积极分子等人的意见，一定要有他们占压倒多数的人到会发表意见”。**但他又告诫**“**总支书记、厂矿党委书记、城市委书记、市委市府所属各机关负责人和党组书记、中央一级的司局长”，“**我们对于这些人的话，切忌不可过分相信。他们中的很多人几乎完全脱离群众，独断专行。”“**听他们的话多了，我们也会同化，犯错误，”“危险之至。”你看，这不是极高明的两分法么！为了避免犯错误，他提出每年“**召开两次5级或者6级、或者7级的干部大会”。**只有这样，“**上层，中层，基层干部的错误观点才能改正。”**这的确是明智之举！

**第68章**

**“‘帝国主义、蒋匪帮及外国反动派策动西藏叛乱，干涉中国内政’，这**

**个说法，讲了很久，全不适当，要立即改过来。改为‘英国帝国主义分**

**子与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狼狈为奸，公开干涉中国内政，妄图把西藏拿**

**了过去’。直指英印，不要躲闪。”**

话说1959年4月15日这一天，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和外交部副部长尼·费德林到达北京访问，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热烈欢迎。

中共中央在先农坛体育场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欢迎伏罗希洛夫一行的大会。先期到达会场门口的周恩来对伏罗希洛夫一行表示欢迎。毛泽东在大会上领导全场群众高呼口号：

“苏联中国团结万岁！”

4月17日，周恩来将反映山东、江苏、河南、河北、安徽5省春荒缺粮的报告和中央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关于15省春荒情况统计表送到了毛泽东那里。毛泽东立即将这两份材料批示给周恩来，作为中央文件下发。他在批示中写道：

总理：

此件我已全部看了。建议：一、将此件（实为两件，一件是15省的表，一件是5省缺粮情况及处理办法）立刻印30份，**以15份，在3日内，用飞机送到15省委第一书记手收，请他们迅即处理，以救2517万人的暂时（两个月）紧急危机。**我相信，有些地方已经或正在处理，例如山东济宁、聊城两专区；有些可能当地领导人还不知道情况，因而还未处理。二、由你找人大代表中15省在京开会代表谈一次（着重5省），每人分发文件1份，如同意，请即办。**文件可安一个总题目：《十五省二千五百一十七万人无饭吃大问题》**。

毛泽东 1959年4月17日下午11时

4月18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在北京开幕。周恩来作了《政府工作报告》，李富春作了《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李先念作了《关于一九五八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九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

与全国人大开幕的同时，全国政协第三届1次会议也在京举行。来自苏州的现代作家、文学翻译家、园林艺术家周瘦鹃也参加了政协会议。周恩来在180多位老年委员团聚的茶话会上说：

“毛主席非常关怀各位老人，他说下次开会时，你们可以带着老伴同来，好照顾得更周到一些。如果没有老伴而有必要的话，就是带一个儿子或一个女儿也好。”

毛泽东设想这样周全，这样无微不至的关怀，使老委员们非常感动。

4月19日，这一天是个星期日。吴冷西和家人一起到香山郊游，中午在香山饭店吃过饭，正准备午休，服务员来说让他接电话。吴冷西心中有些纳闷：什么人打电话到香山来找我呢？他一接电话才知道是中南海总机打来的，说是毛泽东的秘书罗光禄找他说话。罗光禄的电话很快就接通了，他对吴冷西说：

“毛主席要你马上回城参加会议。”

吴冷西不敢怠慢，立即带领家人坐车回城。他来到中南海已经是下午3点多了，一走进颐年堂，毛泽东就冲着他说：

“一说曹操，曹操就到。你到哪里去了？上午通知下午3点开会，找了半天才找到你。”

吴冷西赶紧解释说：

“我一清早上香山去了，刚才接到开会的通知就马上回来。”

毛泽东说：

“昨天印度官员散发了一个达赖喇嘛关于西藏叛乱的《声明》，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开始反击。找你来是要你立即起草一篇评论。”

吴冷西问：

“评论着重讲哪些观点？”

毛泽东说：

“刚才同总理他们议了议，可以着重从3个方面批驳所谓‘达赖喇嘛声明’：第一，《声明》从‘西藏独立’说起，反映了英帝国主义历来的梦想，要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第二、《声明》说人民解放军在西藏违反1951年关于西藏和平解放的十七条协议，但又举不出任何事实。我们要指出，过去8年中，西藏地区的一切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和宗教制度，仍然同和平解放以前一样，没有任何改变。西藏的内部事务，几乎没有一件不是经由原西藏地区政府负责进行的。中央人民政府还宣布1962年以前不进行民主改革。第三、《声明》歪曲了3月10日至19日发动叛乱的经过，我们可以根据达赖喇嘛3月10日以后给中央驻藏代表谭冠三将军的3封信来说明：达赖喇嘛是被反动分子包围，并在3月17日被劫持走的。《声明》中也说是‘顾问们认识到’达赖喇嘛以及家属和官员‘离开拉萨成为十分紧迫’。”

周恩来补充说：

“《声明》行文不是用第一人称‘我’，而是用第三人称‘他’，完全不是西藏文体，而是像英皇诰示那样的文体。《声明》用的某些观念和词句也是外国的。散发这声明的又是印度官员。我们要指出，这些都表明《声明》不是达赖喇嘛本人的，而是别人强加于他的。评论中可以揭露这一点。”

刘少奇说：

“评论要提出质问：现在发表这个声明，究竟想干什么？可以点出他们这样做是下决心同中国对抗。”

与会者还谈到了有关西藏叛乱和中印关系的一些其它意见。毛泽东说：

“时间不早了，会议到此结束。你要在今天晚上把评论起草出来，我夜里等着看。”

4月20日凌晨3点多，吴冷西将评论稿打出清样送到了中南海。

这天下午，毛泽东把吴冷西和胡乔木叫到他家里，将他修改过的评论清样给吴冷西二人看。毛泽东主要是在上面加上了这样一段话：

“现在西藏的这一个叛乱班子，完全是英国人培养起来的。印度的扩张主义分子继承了英国的这一份不光彩的遗产，所以这个班子中的人们的心思，是里通外国，向着印度，背着祖国的。你看，他们双方是何等的亲热呵！简直是卿卿我我，难舍难分。”

他要吴冷西和胡乔木对评论中的某些措词再行斟酌修改。胡乔木和吴冷西当场做了一些修改，就请毛泽东审定。毛泽东看了一遍，就说：

“这篇评论要今天马上发表，可以署名为‘新华社政治记者评论’，这样的形式会引起人们的重视。**题目仍然是《评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由新华社今晚先发，《人民日报》明天登在第一版头条位置。**以达赖名义发表的《声明》也全文发表。**”

吴冷西立即回新华社布置翻译和发稿。

4月22日，毛泽东召集几个常委在他家里开会，吴冷西也列席会议。毛泽东说：

“现在宣传上集中反击印度的反华言行。《人民日报》的版面要调整，集中反映有关西藏叛乱的问题，宣传我们迅速平定叛乱以及目前正在采取的民主改革措施。**印度官方的和非官方的在西藏叛乱问题上的反华言行，都要陆续发表。国际上支持我们的言论也要发表。从3月17日起，尼赫鲁仅在议会上就发表了五六次讲话，我们一直保持沉默，为的是看看他要走多远，有意后发制人。现在可以回答他了。”**

毛泽东又提到了他在4月初杭州政治局常委会上，交代吴冷西准备写文章的事，他说：

“《人民日报》要抓紧写出评论尼赫鲁讲话的文章，经中央讨论后发表。”

4月24日，毛泽东在周恩来报送的李先念关于福建吕泗洋风暴渔民沉船事故的最新情况报告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退总理。唐人诗云：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再接再厉，视死如归，在同地球开战中，要有此种气概。气象预报及收音机，要认真解决。**

毛泽东 4月24日

4月25日，毛泽东给胡乔木、吴冷西和彭真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乔木、冷西、彭真同志：

**“帝国主义、蒋匪帮及外国反动派策动西藏叛乱，干涉中国内政”，这个说法，讲了很久，全不适当，要立即改过来。改为“英国帝国主义分子与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狼狈为奸，公开干涉中国内政，妄图把西藏拿了过去”。直指英印，不要躲闪。**全国一律照20日政治记者评论的路线说话。今日请乔木、冷西召集北京各报及新华社干部开一次会，讲清道理，统一规格。请彭真招呼人大、政协发言者照此统一规格，理直气壮。前昨两天报纸好了，声势甚大。也有缺点：印度、锡兰、挪威3国向我使领馆示威，特别是侮辱元首这样极好的新闻，不摆到显著地位，标题也不甚有力。4月24日两篇短评好，不用“本报评论员”署名，则是缺点。昨天评论，《人民日报》的评论《予诽谤者以打击》，不如光明日报评论《清醒点，印度扩张主义者》有力。一个是女孩子，一个是青壮年，我有这种感觉。请注意：**不要直接臭骂尼赫鲁，一定要留有余地，千万千万**。但尼赫鲁24日与达赖会面后放出些什么东西，我们如何评论，你们今天就要研究。可以缓一二天发表。

毛泽东 1959年4月25日上午6时

彭真、胡乔木、吴冷西在上午读到毛泽东的信后，立即分头行动。胡乔木、吴冷西召开了宣传干部会议，统一宣传口径。胡乔木、吴冷西还研究了达赖和尼赫鲁的谈话内容。据印度报业托拉斯报道：达赖告诉尼赫鲁说，他写给谭冠三的3封信是真的。尼赫鲁说，印度仍然实行和平共处原则。

4月25日晚，毛泽东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反击印度反华言行问题。胡乔木、吴冷西列席了会议。毛泽东一开始就问吴冷西：

“文章写得怎么样啦？”

吴冷西回答说：

“正在修改。”

毛泽东说：

“我们反击印度的反华活动，着重同尼赫鲁大辩论。现在我们对尼赫鲁要尖锐地批评他，不怕刺激他，不怕跟他闹翻，要斗争到底。其实也不会完全闹翻。**我们的方针是以斗争求团结。现在形势对我们有利，叛乱已迅速平定，他再闹也闹不到哪里去，他对西藏的局势无能为力。**

这次斗争只是笔战、舌战，但对澄清是非极为重要，对内对外都是如此，大辩论有极大好处。但是，**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有理，就是对尼赫鲁的几次讲话要加以分析，反驳他时要充分讲道理，把西藏叛乱的原因、我平叛和改革的性质、印方过去的干涉、我们为维护中印友好关系的努力等等，都讲得清清楚楚。有利，就是有利于印度人民弄清事实真相，有利于围绕西藏叛乱事件的国际斗争，有利于我在西藏平定叛乱和民主改革，也要有利于维护中印友好关系和争取尼赫鲁同我们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有节，就是要留有余地，对尼赫鲁要有分析，好的要肯定，只批评他不好的，不要把话说绝。还要讲究必要的礼貌，既尖锐又委婉，不谩骂，要给尼赫鲁下楼的台阶。**为了表明我们的忍耐和后发制人，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要充分发表印方的反华谬论，也要充分反映西藏人民对平叛和改革的热烈拥护。要发表读者来信和历史资料，充分说明我平叛、改革的正确和外国干涉的无理。

尼赫鲁原来对形势估计错误，误以为我们对叛乱没有办法，有求于他。确实，我们驻藏部队数量很少，入藏时连地方干部共有5万人。1956年撤出3万多人，只留下1万多人。西藏地方很大，边境线很长，没有那么多军队驻守，也很难全都守住，叛乱分子自由进出。但人民解放军还是顶用的，这次驻藏部队稍微增加一点，很快就把叛乱平息了。所以现在印度当局很被动，我们很主动，是反击的好时机。人大、政协正在开会，会上发言理直气壮，声讨西藏上层叛乱集团，反对英帝国主义分子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干涉中国内政。但**我们不是执意要跟印度闹翻，不怕闹翻不等于以闹翻为目的，我们是以斗争求团结**。**对达赖也不是当作叛国者，还是采取争取他回来的方针，人大还要选他当副委员长，跟班禅一样。**他是否回来，那是他自己的事。但我们表示这样的态度对国内国外都有必要。因此《人民日报》的文章还是要高举团结的旗帜，这样对内对外都有利无害。”

常委们都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大家要求抓紧时间把文章写出来。

毛泽东决定，起草小组加以扩大，由胡乔木领头，要吴冷西先修改出一个稿子，然后交胡乔木修改，再提交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

4月26日，吴冷西、乔冠华领导的国际宣传小组在讨论毛泽东写于25日上午6时的信时，大家都说：

“在形势转换的关键时刻，我们的思想总赶不上毛主席。《人民日报》如此，外事部门也未能例外。”

4月26日，毛泽东接到了救灾委员会的一个报告，报告中说：河南、河北的春荒已经停止发展，山东的农民外流现象大部分已经停止，浮肿病现象开始下降，但少数地区春荒仍在发展。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此件发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请你们对这个问题务必要采取措施，妥善安排，度过春荒，安全地接上麦收和早稻，多种瓜菜，注意有吃而又省吃，闲时少吃，忙时多吃。千万不可大意。

毛泽东 4月26日

4月27日，《人民日报》根据尼赫鲁会见达赖前后的几次谈话，以“本报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了题为《读尼赫鲁总理的谈话》的评论。

在全国人大二届1次会议结束前夕，毛泽东审阅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名单，他突然问道：

“常委里怎么没有曾志呀？曾志工作得不错嘛！她可以参加人大常委。”

说着，他大笔一挥，将曾志的名字加了上去，还自言自语地说：

“曾志是一个善良的同志，善马任人骑，善人任人欺呀。”

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参加了这次人大常委名单审定会议，他回到家里问曾志说：

“主席推荐了你当人大常委，还说什么‘善马任人骑，善人任人欺’，这话是什么意思呀？”

曾志说：

“我怎么知道！”

4月2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届第1次会议举行闭幕式。会议同意毛泽东辞去国家主席职务。选举刘少奇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宋庆龄、董必武为副主席。选举朱德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林伯渠、李济深等16人为副委员长。

会议决定：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

这天下午，风和日丽，花明柳翠。来自全国各地的1000多位人大代表和1000多位政协委员，兴高采烈地聚集在中南海怀仁堂前草坪上的一架照相机前，将要与国家领导人一起合影留念。

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依次走来，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全体起立，掌声雷动。毛泽东微笑着挥手示意大家坐下来照相。一照完相，大家就争先恐后地和领导人们握手。周瘦鹃挤不上去，眼看就要失去这个幸福的机会，他灵机一动，转身疾步去了毛泽东进怀仁堂的必经之路。不一会儿，毛泽东果然笑吟吟地走过来了，周瘦鹃鼓起勇气，抢步迎了上去，向毛泽东伸出了手。毛泽东握着他的手，端详着他，却叫不出他的名字。周瘦鹃激动地报出了自己的姓名。毛泽东点点头，微笑着说：

“啊，原来是周瘦鹃先生！你的气色很好啊！今年高寿？”

周瘦鹃回答说：

“今年65岁了，可是精神还好，这几天也很兴奋。”

毛泽东和蔼地说：

“我读了你的很多文章，很想和你谈谈。”

周瘦鹃说：

“请主席多加指教。”

毛泽东想起还有很多事要做，无奈地摊开右手，朝周瘦鹃摆了两摆，只是问道：

“有什么新的东西给我看看？”

周瘦鹃兴奋得连声说：

“好，好！”

后来周瘦鹃回到苏州，常常扪心自问：“我将拿什么新的东西给毛主席看呢？”过去的文章吧，被人看做是“鸳鸯蝴蝶派”的东西，已大不合时宜，谈园艺盆景的，又不知毛泽东有无兴趣，思来想去，便步毛泽东诗词原韵，作了21首诗词，题名为《学步集》，寄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完后又寄还给了他。

且说在4月29日，毛泽东写出了第5个《党内通讯》，他写道：

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

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示，不要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300斤的，今年能增产100斤、200斤，也就很好了。**吹上800斤、1000斤、1200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际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500斤的，今年增产200斤、300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农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3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的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给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之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3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10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6亿5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扩种面积要多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10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10年以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3年以内，大部不可行。**3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高额丰产田）同时实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10年时间。**4年以内小解决，7年以内中解决，10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大后年这4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搜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试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到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肥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6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10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认识。

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毛泽东 1959年4曰29日

毛泽东写好后，先征求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林彪、朱德、谭震林、彭真的意见，又征求了在京参加人代会的几位地方负责人柯庆施、曾希圣、周林、刘仁的意见。

正是：党内通讯世少有，同志部下似朋友。娓娓道出心里话，细细思量为民谋。

良师良友良配方，谁听谁信谁接受？可怜毛公披肝胆，高山流水对蠢牛。

再说1959年5月2日下午，毛泽东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吴冷西和胡乔木先后修改过的稿子。毛泽东提出了6点意见，他说：

“1、文章应以评论尼赫鲁4月27日的讲话为主，他此前在议会中发表的6次讲话可不涉及，以免分散力量。2、**要高屋建瓴，从西藏人民早已盼望改革农奴制讲起，一下子把尼赫鲁置于反对社会进步的地位。**因此要用相当文字分析西藏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野蛮和落后。3、要揭穿尼赫鲁打着“民族感情”和“宗教感情”的幌子干涉中国内政，说明我国政府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以及在西藏和平解放8年来执行十七条协议。4、要指出印度历来对中国地区的野心和干涉，着重揭露1950年我们进军西藏时和这次叛乱事件中印度政府的所作所为，并联系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的历史以及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继承了英国人的衣钵。5、**要指出尼赫鲁本人前后自相矛盾，肯定他说过的好话，批评他的坏话，指出他一时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一时又把西藏变为中印缓冲区；一方面同中国一起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另一方面又以种种借口干涉中国内政。**6、评论全篇贯彻维护中印友好，并以此收尾。”

周恩来见毛泽东说完了，就补充了一句：

“要引用尼赫鲁1954年访华时说的好话。”

毛泽东最后说：

“我同意大家对文章题目提出的意见，把题目改为《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乔木和冷西今晚好好想想大家的意见，明天用一天的时间修改，4日再送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

5月4日下午，毛泽东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再次讨论由胡乔木、吴冷西和浦寿昌修改的《人民日报》评论尼赫鲁讲话的文章。与会者只是提了一些有关个别提法和词句的意见。毛泽东最后宣布：

“政治局原则上通过这篇文章，署名仍同1956年两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章一样，写明是‘《人民日报》编辑部根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写成的文章’。为慎重起见，你们明天再认真从头到尾通改一遍，随修改随送我看。”

5月5日，胡乔木、吴冷西和浦寿昌经过一天的通改，随改随送毛泽东审阅。一直到晚饭前，毛泽东最后审定了全文。

这一天晚上，《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这篇文章由新华社用中、英文同时播出。第二天上了《人民日报》。

《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一文的发表，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应。

一位外国报纸驻北京记者在报道中评论说：“这是一篇马列主义的杰作，它抓住了问题的本质，态度鲜明而坚定，又始终贯彻中印友好的方针。”

印度《政治家报》的社论评论这篇文章说：“大部分是以温和的和相当说理的态度来说明中国在西藏问题上的立场。”

印度《国民先驱报》的社论说：“《人民日报》文章要求停止印度人和中国人在西藏问题上的争论，它的语气是友好的。”“中国人保证说，民主、繁荣的西藏自治区，必然会成为巩固和加强中印友谊的一个因素，而不会成为、也不可能成为对印度共和国的任何威胁。这种保证将会为人们所接受。”

英国《泰晤士报》的社论说：“尼赫鲁不会再来反驳，而会注意中国方面关于恢复友好关系的说法。”

香港一家报纸评论这篇文章说：“说情又说理，委婉又强硬，确是使尼赫鲁颇难回答的。”

5月6日下午，毛泽东、周恩来、陈毅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苏联、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朝鲜、越南和蒙古11个国家的访华代表团和这些国家的驻华使节。周恩来、陈毅在谈话中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政府对西藏叛乱和中印关系的态度。毛泽东在谈话中说：

“世界上有人怕鬼，也有人不怕鬼。鬼是怕它好呢，还是不怕它好？中国的小说里有一些不怕鬼的故事。我想你们的小说里也会有的。我想把不怕鬼的故事、小说编成一本小册子。经验证明鬼是怕不得的。**越怕鬼就越有鬼，不怕鬼就没有鬼了。**”

“**今天世界上鬼不少。西方世界有一大群鬼，就是帝国主义。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也有一大群鬼，就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反动派。**尼赫鲁是个什么人呢？他是印度资产阶级的中间派，同右派有区别。整个印度的局势，我估计是好的。那里有4亿人民，尼赫鲁不能不反映4亿人民的意志。**西藏问题是很大的事，要大闹一场，要闹久些，闹半年也好，闹一年更好。可惜印度不敢干了。我们的策略是使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劳动人民得到一次教育，使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也学会不怕鬼。**”

后来，中央书记处的一位领导人根据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提出的要编写一本《不怕鬼的故事》的小册子，就找到了文学研究所的何其芳，向他交代了这个任务。何其芳立即组织文学所的有关人员进行编写，到这一年的夏季就基本编成了《不怕鬼的故事》。

且说5月6日夜，毛泽东的秘书打电话对吴冷西说：

“毛主席指示：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从5月7日起，一律暂停发表印度和其他外国对西藏问题的言论，也一律暂停发表批评印度、英国等的反华言行的评论，看看印度及其它方面的反应再说。全国各报也照办，由你告诉中宣部发出通知。”

从5月7日起，国内舆论界一片风平浪静，外交部则开始了一连串的中印之间的“照会战”。

5月7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发出了《关于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毛泽东在这个指示中加写了一句话，他写的是：“**没有自留地不能大量发展私人喂养的猪鸡鹅鸭，不能实行公养私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中共中央同时发出《关于分配私人自留地以利发展猪鸡鹅鸭问题的指示》，指示中说：

“**最近几个月以来，养猪头数大量减少，这对于积肥、猪肉的供应和私人零用钱的取得这样3件大事，都是非常不利的，要迅速改变这种局面，必须采取公社各级集体养猪和社员家庭私养并重的方针，两条腿走路。鸡、鸭、鹅也是如此。要社员私养猪、鸡、鹅、鸭，就要给社员一定数量的自留地。**自留地的多少，应当按照原高级合作社章程的规定，按人口计算，不超过每人平均占有土地的5%，也可以按猪计算，每头猪拨给一分或者二分饲料地，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自行决定。此事要快，请你们早作决定，下达执行。”

5月7日下午，毛泽东接见了来京参加全国人大二届1次会议的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阿沛·阿旺晋美和詹东·计晋美等人，详细询问了西藏叛乱的情况。他在谈话中说：

“本来我们要根据和谈协议逐步改变西藏的落后面貌。1956年底我们就说过，从1957年起6年内，西藏可以不进行民主改革，连试点也不搞，6年后改不改革，要根据那时的情况，由西藏上层和人民群众共同协商解决。可是达赖不高兴，叛逃了，这件事是我们所不希望的。反动派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既然叛乱已经发生，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但只要他们回心转意，我们还是欢迎的。你们站在维护中国统一方面，站在人民方面，这很好。希望你们进一步维护民族团结和中国的统一。”

毛泽东就今后一边平叛、一边改革的方针政策，征求了班禅额尔德尼、阿沛·阿旺晋美的意见，他问道：

“现在你们同意不同意进行民主改革呀？”

阿沛·阿旺晋美说：

“我们来开会前，西藏党组织的领导同志曾征求过我们的意见，我们完全拥护中央关于边平叛边改革的方针，请毛主席放心。”

毛泽东连连点头，高兴地说：

“**虽然发生了叛乱，和平民主改革的方针仍要坚持，不管参加叛乱的是什么人，我们仍旧是一个不杀。**你们站在爱国、进步方面，是左派，不要怕丧失你们的庄园以后没有饭吃。对左派和中间派，要采取赎买的政策，保证改革以后生活水平不会降低。**对你们要同对上海、北京、天津、武汉、广州、西安、兰州、成都等全国所有大城市的资本家一样，同对荣毅仁一样。只要同西藏人民合作，讲民主，一定有你们的政治地位，生活上不降低，同过去一样，这一点由中央来保证。**过去同薪巴（农民——笔者注）关系不好的，要改好一点，像刘文辉，工人、农民就不斗他了。**这是第一步，走民主的道路。第二步是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汉族地区和内蒙古、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都走了这两步。**你们那里先走民主的道路，打完仗以后，就搞和平改革。”

毛泽东还说：

“民主改革要根据西藏的具体特点逐步进行，在改革中要严格执行政策，要团结各阶层僧侣人民，要区别对待没有参加叛乱的、被裹胁叛乱但又迅速投诚的与坚决参加叛乱的奴隶主，要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和文物古迹。

关于宗教，我们的政策很明白，就是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看来宗教寺庙也需要进行改革。寺庙中有些人参加了叛乱，同叛乱分子合作，西藏、青海、甘肃、四川等地都有这样的情况。

**西藏要发展，人口、文化、经济和政治都要发展。藏族人民是聪明、勤劳的。社会制度改革之后，西藏可能很快发展。你们的事业是有希望、有前途的。**跑到印度去的人，是没有希望，没有前途的。”

5月10日上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批转湖北、河北、广东省委《关于人民公社和农村工作情况的报告》，他在批语中写道：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现将湖北、广东、河北3个省委向中央和主席的报告，转发各地参考。正确总结1958年农业生产大跃进中的经验和教训，发扬优点，克服缺点，力求在今年把工作做得更好一些，这对于今年的大跃进更有保证。**农业生产指标必须实事求是，经过一切努力能够达到的，必须力争达到；经过一切努力还达不到的，就应当修改，不要硬性地往下派。春荒尚有一个多月至两个月的时间才能基本上过去，决不要再忽视，还应当十分警惕可能发生夏荒。**湖北省委对人民公社18个问题的若干补充规定很好，各地可以参照执行。

中央 1959年5月10日

接着，毛泽东给周世钊写了一封短信，他写道：

东园兄：

上次谈话未畅，历史唯物论观点讲得不透，可以再来一谈否？如愿意来，予企望之，不胜欢迎之至！

祝好！

毛泽东 1959年5月10日上午9时倚枕书

尚未睡觉，心血来潮，写此数语。

5月10日下午，毛泽东会见了民主德国人民议院访华代表团，他在会见中的谈话记录如下：

我们有两个问题没有解决，西藏问题和台湾问题。现在开始解决西藏问题。**西藏面积不小，12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12个民主德国。可是西藏地区的人口只有120万。**有人问中国共产党为什么长久不解决西藏问题，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党过去很少与藏族接触，我们有意地把西藏的社会改革推迟。**过去我们和达赖喇嘛达成的口头协议是，在1962年以后再对西藏进行民主改革。**过早了条件不成熟，这也和西藏的农奴制有关。**西藏劳动群众占95%，剥削者占5%，也就是说有6万人是剥削者。我们要分化他们，争取一部分。现在条件成熟了，不要等到1963年了。这就要谢谢尼赫鲁和西藏叛乱分子。他们的武装叛乱为我们提供了现在就在西藏进行改革的理由**。叛乱分子拿起枪来打我们，这样就可以看清，他们谁是站在我们这边的，谁是搞叛乱的。

全部藏族人口不是120万，而是300万。120万在西藏，180万分布在川西、甘南、云南及青海北部。这180万人中也有过叛乱，我们进行了平叛，现在已经基本上解决了问题。外国人武装了藏族反动统治者，很多喇嘛庙都曾经是叛乱者的根据地。**现在在这180万藏民聚居的地区建立了党组织，进行了土地改革，解放了农奴，建立了农业生产合作社。过去喇嘛不参加生产，现在90%的喇嘛都参加生产了。人民组织了武装自卫队。**

现在西藏问题好解决了，第一步是民主革命，把农奴主的土地分给农奴，第二步再组织合作社。6万农奴主中约有1万人逃到印度了，其余没有走的可分为左、中、右3派，我们将根据他们不同的政治态度来区别对待。对有些人，还要看他们究竟如何，我们可以在斗争中观察他们。总之，我们要争取多数人，使他们赞成改革。

我们在西藏的农村和城市中建立了党组织。**藏族人民很好，很勤劳，和人民解放军一起同叛乱分子斗争，很快就能组织起来。我们已培养了近万名藏族干部。过去10年中，我们培养了青年藏族干部，他们学了汉语。在西藏工作的汉族的干部也学了藏语。在西藏，马列主义者和劳动者可以合作，而且合作得很好。**

再谈谈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暂时不能解决，问题是美国霸占着。台湾人民很不喜欢美国人，也不喜欢蒋介石。但是要蒋介石好呢，还是不要他好？现在要他好，**他是亲美派，但他还想自己统治。另外一批人也是亲美派，但想完全投降美国。**

现在的一个具体问题是，蒋介石明年还做不做总统。美国不想让他做，但我们认为他应该做。他想要有自己的军队。你们知道，**1957年5月24日台湾人民打烂了美国“使馆”。美国人怀疑是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搞的，他们认为蒋经国不可相信，因为他去苏联住了十来年，娶了苏联老婆。**

去年打金门，那里没有美国军队，只有美国一个工作组，十几个人。这个地方和美国没有条约关系，而台湾却和美国有条约关系。**我们打金门是内战问题。杜勒斯的方针是叫我们和蒋介石都不打。我们说，你们管不着，这是我们中国的地方，我们打不打是我们的事，你们不要多管；我们和你们美国只在一点上有关系，就是要求你们从台湾撤军**。正因为这样，我们才在日内瓦、华沙同美国谈判。**美国要签订一个声明，要蒋介石不打我们，要我们也不打蒋介石。我们说不行，金、马、台、澎问题是我们的内政，你们管不着，唯一的问题就是请你们搬家。**

看来我们和美国还得谈下去。它不赞成我们，我们也不赞成它，**谈多久我们不知道。已经谈了3年半，恐怕还会谈10年，这是世界上最长的谈判**。**你们不要怕我们会打台湾。我们打金、马是为了帮助蒋介石，因为美国想把金、马让给我们，自己占据台湾。我们放弃金、马，都给蒋介石。蒋介石一困难，我们就打金、马，美国就可以让蒋介石继续做总统。**

美国有“战争边缘政策”，主要是为台湾问题而想出来的。去年我们也采取“边缘政策”。我们打金、马和蒋介石的增援船只，蒋介石就请美国帮助。**美国人来了，但只在12海里以外。我们光打蒋介石的船，不打美国船。美国船升起国旗，叫我们不要打它。美国一炮也没有打我们，我们也没有打它。**所以大家都在战争边缘上。

**美国空军很守规矩，它总是和我们的海岸保持一定的距离。有一次我们打下一架美国飞机，因为它越了境，但美国不做声，不要我们赔。美国是强国，霸占的地区太宽，它的十个指头按着十个跳蚤动不了啦，一个跳蚤也都抓不住。**力量一分散，事情就难办了。

5月11日上午，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他说：

“对尼赫鲁应该有一个正确的方针。尼赫鲁是中间派，不同于右派。他像任何人一样，是可以分析的。他有两面性，有好的一面，又有坏的一面。《人民日报》的文章肯定了他好的一面，但着重批评他坏的一面。这是因为他在前一个时期放了很多毒，我们这样做是必要的。但是，要记住，经过这样一次批评之后，我们还是要看到他还有好的一面，他做过好事的一面，所以还应该争取他，给他个下楼的机会，不要把事情做绝。

对达赖目前宜采取不予理睬的方针。不管他发表什么声明，我们都暂不理睬，看一个时期再说，这也是留有余地。因为他毕竟是一位宗教领袖，毕竟在西藏和平解放时期表现还可以，后来到北京当人大副委员长，表现也可以。就是说，**达赖有过好的一面。因此，将来他如果想回来，我们还是采取欢迎的态度。只有一个条件，就是他回来之前要发表一个声明，宣布他过去在噶伦堡和其它什么地方说过‘西藏独立’之类的话是不对的，一律作废，这样就可以回来。这个条件不算苛刻。**我们既往不咎，是够宽大的了。”

毛泽东转对列席的吴冷西说：

“今后关于西藏问题的宣传，数量要减少，正面的和反面的各占一半，不要说一切都好，也不要说一切都坏，总的分量要减少。”

5月11日下午，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厅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听取陈云关于钢产量指标的说明。陈云说，已经听取了冶金部的6次汇报，“财经小组经常参加这次汇报会议的几个同志，富春、一波、赵尔陆同志和我，都同意钢材的可靠指标可以初步定为900万吨，钢的生产指标就是1300万吨。”刘少奇说：

“定高了，做不到，反而会泄气。”

周恩来说：

“一年时间已经过去了近半年，整个经济计划由于钢产量指标一变再变，一直落实不了，整个工业生产非常混乱。现在是‘人心思定，生产思常’，希望赶快把钢的指标定下来。此事关系重大，我建议，先由我同国务院各位副总理分头到各个重点产铁地区去调查，然后再向毛主席汇报，并由政治局最后确定。”

会后，周恩来和8个副总理分头到9个地区去调查。

5月15日，陈云给毛泽东写信，汇报对钢生产指标的调查情况，信中说：“冶金部参加会议的同志，认为钢材数量定为900万吨（即钢的数量定为1300万吨）太少了，会使下面泄气。”他向毛泽东提出：“我希望同财经小组的几个同志，包括鹤寿同志，一起向你汇报一次。请你有空时找我们。”

欲知此后毛泽东的工作重心转向了哪里？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由毛泽东主导起草并亲自修改的《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一文，是平定西藏叛乱和反对英帝国主义、印度扩张主义者的伟大斗争的收官之作，赢得了国内和国际上的一片喝彩之声。从西藏叛乱开始，直至同国内外一切反动派斗争的最后胜利，毛泽东提出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策略都妙不可言。请再好好读一读他在这一过程中的一系列讲话吧。从中不难看出，此役的完美程度与他以往指挥的任何一场斗争相比都毫不逊色，堪称当代对敌斗争的典范！

**第69章**

**“大跃进本来是好事，但4大指标（钢、铁、粮食和棉花）订**

**高了，结果天天被动。”“过去一年头脑发热，现在冷静下来就**

**是了。人不要不如猪，撞了墙就要拐弯。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

**没有经验，一定会出现许多新问题，应当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话说毛泽东不再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职务，退居二线，轻松多了。他在休息时就练练书法，与民主人士的往来也更多了。

黄炎培珍藏有一本王羲之的真迹摹本，毛泽东借来看，说好借一个月。此后，他一有闲暇便翻开摹本看，爱不释手。李银桥去倒茶时，常常见他看着字迹琢磨，有时，又抓起笔来对照着练。毛泽东练笔不同于别人，不是照着摹仿，而是取其所长，取其神韵，消化吸收，将前人的精华变成自己的东西。每每练到兴头上，连吃饭都叫不应他。

大约是真迹摹本太珍贵了，黄炎培借出去以后很不放心。刚借出去一个星期，他便频频打电话询问毛泽东看摹本的情况。电话往往是打到办公室里，问主席看完了没有？什么时候还？还有一次，黄炎培那边竟然把电话直接打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慢条斯理地问道：

“不是讲好借一个月吗？”

电话那边马上说：

“对，对、对。”

可是不足一个月，黄炎培那边又把催着还书的电话打到了菊香书屋的卫士值班室里。卫士尹荆山来到毛泽东的书房，见毛泽东正在看那本书法摹本。他的头照着书上的笔画晃动，好像下巴就是一支笔。尹荆山借倒茶机会，向毛泽东报告说：

“主席，黄炎培先生那边又来电话了，他们……又催呢。”

毛泽东一听，非常生气，将手中的烟嘴摔在桌子上，说道：

“怎么也学着逼债了？不是讲好一个月的？还差7天，我是给他数着呢。”

尹荆山见毛泽东真的生了气，连忙解释说：

“主席，他们……他们不是催要，是问问。就是问问主席还看不看？”

“我看!”毛泽东喝口茶，重新拿起烟嘴，语气缓和多了，说:“到一个月不还，我失信。不到一个月催讨，他们失信。谁失信都不好。”

可是不久，黄炎培亲自来电话了，这次电话直接打给了毛泽东。他先谈了一些别的事情，末了，还是问那本真迹摹本。毛泽东问：

“任之先生，一个月的气你也沉不住吗？”

李银桥在一边嘟哝着说：

“跟向主席讨债似的，没深浅。”

毛泽东听了，却微笑着说：

“不够朋友够英雄。”

等到了一个月期满，毛泽东将王羲之那本真迹摹本用木板小心翼翼地夹好，交给卫士尹荆山，说：

“送还吧，零点前必须送到。”

尹荆山说：

“黄老那边已经说过，主席只要还在看，尽管多看几天没关系。”

毛泽东摆摆手说：

“送去吧，讲好一个月就是一个月，好借好还，再借不难。朋友交往要重信义。”

1959年5月2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采取非常措施解决当前食油供应问题的紧急指示》，全文如下：

**目前食用植物油供应四处告急，国家无法面面兼顾，大有顾此失彼之势。**

哪四处告急呢？第一，出口情况很不好，1至9月出口计划3.48亿斤，到4月底只完成6千万斤，按照这个进度，预计只能完成1亿几千万斤，有2亿多斤出口计划要落空；第二，城镇居民食油供应每月7千万斤，货源没有保证，现在京、津、沪和其他若干大、中城市都是随调随销，不少城镇食油时有脱销；第三，工业用油和行业用油供应很紧，目前月销4千万斤的水平不能维持，影响的方面很大，特别是肥皂生产无法正常进行；第四，农村食油供应每月9千万斤，所占供应比重虽然很大，但是供应面广、点多，难以保证供应，脱销的现象在很大的地区内已经发生。**这些情况如果继续发展，国家在政治上将会处于非常被动和十分不利的境地。**

现在的问题十分明显，解决目前食油供应问题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方针，一种方针是，继续被动的维持现状，上述4方面都想照顾，让全面紧张的情况自流发展下去，它的结果必然是到处受挤，顾此失彼，出口计划根本不能完成，城市居民食油到处脱销，工业、行业用油大量减少，农村供应也是七零八落，**国际政治信誉和国内市场秩序都将受到极其不利的影响。**另一种方针是，在今后6月至9月的4个月内，基本上停止农村供应；就是说，除了出产油菜籽的地区可以适当供应，除了病号孕妇等特殊需要、大车用油、农业机械用油和侨汇地区可以适当供应以外，**其他所有的农村供应一律暂时停止4个月**；以便把缩减下来的食油用来坚决保证出口需要，适当保证城镇和工业、行业的必不可少的供应。这样做，就可以使我们变被动为主动，闯过目前食油供应紧张的关口，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权衡利害得失，中央认为，在目前情况下，四处脱销不如一处脱销，多头紧不如一头紧，必须当机立断，坚决采取后一种方针。**事实上，不少地方特别是很大一部分农村已经脱销了，今后几个月不管怎样总还有不少地方要脱销，既然这样，倒不如有计划地停止农村供应反而较为有利，反而可以避免经济生活发生更大的混乱。**这是万不得已的临时措施，望各地党委向全党解释清楚，**并且立即根据这个方针，妥为安排当前的食油工作。

为了实现这种方针，中央决定，各省（区）在今年5月至9月，必须保证调给国家食油5.4亿斤，不得减少。宁可农村暂时停销，减少食油库存，也要坚决调油支援国家建设。各省（区）只能在按期完成中央调出任务的条件下，根据本省（区）的实际可能，具体安排自己地区的食油供应；并且还要狠狠地抓住油菜籽和其他油脂油料的收购工作。**中央要求所有的城镇，适当缩减居民的食油供应标准，大中城市少减一些，小城镇多减一些，这也是完全必要的。**

**中央估计到，采取上述这些措施，可能在人民群众中间，特别是在农民中间，引起很大的反应，因此要求各级党委实行政治挂帅，加强领导，充分作好说服解释工作，以保证这项措施能够顺利地贯彻执行，保证在执行过程中不出乱子或不出大乱子。**

1959年6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大力紧缩社会购买力和在群众中解释当前经济情况的紧急指示》，全文如下：

1959年1月以来的工农业生产发展状况，基本上是良好的。**今年1至4月份全国工业总产值566亿元，比去年同期的283亿元，增长了96.5%。重要的工业品产量与去年同期相比，钢增长68%，煤增长119.6%，发电设备增长361.4%，棉纱增长68%。许多产品的质量也开始好转，铁路货运量比去年同期增长53.4%。农业方面，虽然主要产麦区受了旱灾，小麦、夏杂粮、早稻3项合计，初步预计仍将同去年夏季特大丰收的实际产量相当，或者还有所增加，比1957年夏收则将增加约一倍。在市场供应方面，1至4月份社会商品零售额199.5亿元，比去年同期的151亿元增长了32%。在财政方面，收入超过支出33亿元，也比去年同期收入超过支出的部分为多。**这些情况说明，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为实现1959年的大跃进所作的努力，正在取得十分巨大的成就。1959年一定能够成为继续跃进的一年。

但是在经济工作和经济生活方面，还有许多迫切问题，需要迅速加以解决。除工农业生产方面的问题中央已另有指示和安排以外，**目前还有一个严重问题，即市场供需关系方面的紧张现象。**由于1958年各地使用预算外资金和挪用企业流动资金，扩大了计划外的基本建设，**多招了大量的职工**（1958年年底县以上各类职工总数达到4532万人，比1957年年底的2450万人增加了2082万人，新招收的职工虽然工资一般较低，今年又减少了一部分，但今年1至4月份全国工资总额仍然达到88亿4千万元，比去年同期增加29亿8千万元），**在商业中实行了预付货款和赊销商品的办法，这一切都过多地扩大了社会购买力，过多地消耗了储备物资。国家财政对1958年群众炼铁亏损部分的补助23亿元，在今年1至4月份陆续拨发，这也是增加目前社会购买力的一个临时性的因素。社会购买力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了商品生产的增长速度，目前两者的差额据估算已达50亿元左右**。这就造成了今年市场淡季商品库存反而下降、货币流通量反而上升的不正常现象。此外，**粮食由于在去年农村夏收后和秋收后一段时间内吃得过多，油料由于农村消耗量大增和收购不及时而没有完成收购计划，猪和鸡鸭的生产在公社化初期有一个时间下降，某些农副产品、手工业品和轻工业品的生产由于劳力和原料安排中的疏忽也有些下降，还有些产品由于片面地追求数量以致降低了质量，这就加重了目前市场的紧张状态。**这种不正常的紧张状态必须迅速扭转，以便保证1959年的国民经济能够继续跃进。

**为了缓和目前的市场紧张状态，除了必须继续努力增加工农业生产、积极安排副食品和其他日用必需品的生产以外，必须大力控制城乡消费量的增长。**鉴于工农业生产的增长需要有一定时间和一定条件，并且在一定期间内有一定限度，不可能赶上目前过分膨胀的社会购买力的需要，又鉴于城乡生活必需品的供应水平目前一般已经压得很低，因此，**中央认为，解决目前的市场问题，必须采取一系列措施，压缩社会购买力。**

一、**坚决压缩公用开支，紧缩集团购买力**。一切机关、部队、企业、事业单位，必须厉行节约。所有办公杂支、器具购置等费用，必须大大节省（非商品支出而工作需要的费用如邮电费等不要勉强压缩）。**中央决定从本年6月起3个月内，除了特殊情况以外，暂时停止拨发这方面的行政经费。**一切开支较宽裕的机关，应当向开支较节省的机关看齐，企业事业单位应当向行政机关看齐，坚决削减可以削减的开支，坚决减少和停止可有可无的购置。**一切请客送礼、讲排场、讲阔气、铺张浪费、开会提高伙食标准等恶劣风气，最近又有抬头，必须从上而下地坚决纠正和制止。1957**年全国公用开支只有46亿元，1958年增加到56亿元，1959年预计将达到70亿元左右。中央要求减缩到一般不超过1958年的水平，从6月份起到年底共7个月，要求至少节约8亿元。

二、**控制企业职工人数和工资总额。**按照今年经过调整了的生产建设计划，全国县以上企业职工人数，必须在去年职工增加过多的基础上，减少800万到1000万人（包括第一季度已经减少的300万人），能够减到1000万人以上更好。社办工业也应当按照具体情况，加以调整和收缩。工资今年已经决定不增加，工资级别的某些必要的调整也必须严格控制。只有这样作，才可能减轻市场物资供应的压力，才可能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和管理水平，才可能增加农业劳动力，因此应当坚决执行。**减少人员首先是减那些来自农村的临时工、合同工，使他们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其次减那些多余的学徒工，特别是年龄过小的学徒，使他们回去重新上学；其次减那些新吸收的有家务负担的女工。**各省市县必须根据当地工业生产和建设的具体情况，经过通盘考虑，迅速定出减少职工的具体计划和具体办法，并监督执行。一般地说，**从城市吸收的职工可以少减，以免造成失业**。没有原料材料而停办的基本建设和缺少原料材料燃料而停工窝工的企业，应当多减先减。县办企业和生产技术落后的企业应当多减。**有技术的工人，应当调剂使用，不要减退**；城市服务行业职工去年已经减得很多的地方，今年也不要再减（减得太多的地方还要适当恢复）。估计这样裁减的结果，大体上国家今年在工资方面的支出可以减少15亿至18亿元。减少800万到1000万职工，这是一项繁重而艰巨的任务，工作中必然会遇到一些困难。但是不这样作，就会造成更大的困难。各地方各部门必须按照中央在1959年5月27日发出的指示，在认真进行动员和安置工作的基础上，把这项工作做好。

三、**按照国家计划严格控制农村货币投放。中央决定，各地农业贷款指标一律不再增加。农产品预购定金必须控制在指标的范围以内，不许超过。国家对人民公社的财政补助，应当主要用于扩大生产方面，不要用于生活开支方面。商品赊销和预付货款的办法，必须坚决停止（必要的生产资料赊销要经中央批准）。**公社和生产队算账当中，有钱退钱，有物退物，无钱无物应当交代清楚在以后退还，决不能由银行贷款退还。去年银行从公社收回的贷款中，未到期不应收回的坚决退还，已到期应当收回的，只要查对账目，办理手续，不应再去退款。去年公社向国家交纳的税款和其他财政收入，一律不要再去算账退款。夏收较多的地区，夏收以后还应当收回一部分到期农贷、预购定金和其他欠款。

四、**大力开展储蓄工作，动员城乡居民积极参加存款储蓄。这是把一部分社会购买力推迟实现的有效办法之一。**今年国家停止了公债的发行，城乡储蓄应当有所增加，但是1至4月储蓄总数反而比去年年底减少了2亿元。应当在人民群众中大力开展勤俭持家、储蓄爱国的教育，暂时不十分必要的东西不要买，把钱存入银行帮助国家建设**（但是娱乐性、服务性等消费，可以回收货币而不需要付出商品，对于这类消费切勿向群众去提倡节约）。**应当经过一切努力，力争城乡储蓄数字能够随着经济的发展而逐步增加，并且把相当于过去认购公债的数额，通过储蓄的方式吸收回来，增加国家手中可以运用的资金，减少社会购买力。**在开展储蓄的工作中，一定要注意贯彻执行存款自愿、取款自由的原则，防止强迫命令和摊派现象发生。**

在采取上述措施的同时，**必须立即在全体党内外干部中，在城乡广大群众特别是城市各阶层人民中，由各级主要负责同志报告目前全国经济情况和党所采取的各项措施，动员广大干部和群众团结起来，为克服暂时困难，实现1959年的伟大跃进而奋斗。**在宣传解释中，应当首先肯定成绩，同时作适当的自我批评，并且一定要注意把9个指头和1个指头的关系摆得正确，要鼓舞而不要打击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应当举出具体事实和数字，**着重说明目前市场的紧张并不是由于工农业生产没有跃进，而是由于城乡消费量和社会购买力的增长太快。**应当向城市人民说明目前农村中粮食油料等供应困难的情况和原因，并且把今年2月郑州会议以来中央对人民公社和农村工作的各项指示告诉城市人民，使他们消除疑虑和误解，获得力量和信心。应当说明，有些日用工业品和副食品，如油料、肉类、蛋类等，需要有一个时间才能有较大的增产，所以在这些方面我们还得忍受一个时期的困难。其他有关工业、交通运输业、对外贸易等方面的情况，也应当向城乡人民作适当的说明。**向群众说真话，依靠群众解决问题，在这一点上不应有任何动摇。**事实证明，凡是由负责同志作了这样的报告的地方和单位，**广大群众是完全能够体谅我们和支持我们的，群众的情绪可以迅速稳定下来并且努力增产节约，排队现象可以设法减少，抢购套购等类现象可以基本停止。**即使有少数人说怪话捣乱，也决不可怕。因此，这种报告应当认真地做，迅速地做，广泛地做（但是在做报告以后市场方面仍应有一定准备，报纸上的宣传仍应控制，并且由中央统一掌握）。**要使所有群众了解，像中国这样一个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大国，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在经济文化上翻过身来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条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一定可以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建成高度发展的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彻底改变现在的面貌。1958**年我国已经打开了一个跃进的局面，1959年的计划现在看来虽然有若干指标可能偏高一些，但是总的形势是好的，无论如何，我们必然能够继续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目前工作中遇到一些问题，根本上由于缺乏跃进的经验（这种经验本来是历史上所没有过的），有些步子迈得大了一些，只要在得到经验以后，把步子放稳了，许多暂时性质的现象就会过去，我们就会走上稳步跃进的道路。**现在党在工业、农业方面已经采取许多措施，使生产在可靠的基础上增长，在市场方面采取了上述各项措施以后，情况也必然会逐步地好转。总之，我们的一切措施的性质是积极的，我们应当通过这些措施和大规模有系统地宣传解释工作，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动员全党全民更加紧密团结，继续鼓足干劲，战胜一切困难，为取得1959年继续跃进的伟大胜利而奋斗。

各地执行本指示的情况，望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迅速报告中央。

6月3日，毛泽东刚刚起床，就给林克又讲起了他曾经在第2次郑州会议上以及跟他的孩子们讲过的“梁鸿余热不因人”的故事。讲完了，他又说：

“过去，我跟孩子们讲过这个故事，但他们年幼，没有懂得我的意思。”

林克明白，毛泽东是借这个故事，鼓励自己的子女和年轻人，要有志气，不仰仗他人，不人云亦云，要有独立性格，自立自强，靠自己艰苦创业。

6月7日上午，毛泽东给章士钊写了一封回信。

早在解放初，毛泽东知道章士钊有一部旧作《逻辑指要》，便在和章士钊的一次谈话中问道：

“听说您在逻辑方面有著述，可否让我一阅？”

章士钊闻言，面露愧色。他的《逻辑指要》在1943年出版时，序言中多有逢迎蒋介石的话，因此，蒋介石才让他到国民党陆军大学及警官学校去演讲。他踌躇了一会儿，不好意思地说：

“此书印于重庆，与叛党有关。我以此上呈一览，是侮公也，这怎么可以呢？”

毛泽东笑呵呵地说：

“此学问之事，有何妨！”

此后，章士钊便派人把《逻辑指要》送给毛泽东看。毛泽东读后，认为这本专著能够运用西方逻辑学的框架，使用中国古籍材料，系统地阐述中国古代的逻辑思想，在同类书中是独树一帜，便对章士钊说：

“我看此书足为今日参考资料，宜于印行。”

毛泽东为了普及逻辑学的基本知识，在1959年上半年指示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安排编辑出版“中国近几年和数十年关于逻辑的文章、小册子和某些专著（不管内容如何）”。于是，研究室便计划出版一套《逻辑丛书》，章士钊的旧作《逻辑指要》自然也在其中。章士钊为重印《逻辑指要》，下大功夫对全书作了大量删补修改，尔后多次写信给毛泽东，陈述自己的观点。毛泽东便在6月7日给章士钊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行严先生：

各书都收，读悉，甚谢！实事求是，用力甚勤，读金著而增感，欲幡然而变计，垂老之年，有此心境，敬为公贺。既有颇多删补，宜为几句说明。即借先生之著，为之筹策：

《逻辑指要》一书是一九某某年旧作。1959年，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政治研究室有编辑逻辑丛书之举，拙作在征求之列。于是以一个月工夫，躬自校勘一遍。因原稿不在手边，臆核颇为吃力。全稿计削去不合时宜者大约二十分之一，增补者略多一点，都只限于古籍例证，能使读者稍感兴趣而已。近年以来，逻辑一学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兴趣，于逻辑学的范围及其与唯物辩证法的关系，争论繁兴，甚盛事也。鄙人对此，未能参战，然亦不是没有兴趣的。旧作重印，不敢说对于方今各派争论有所裨益，作为参考材料之一，或者竟能引起读者对拙作有所批判，保卫正确论点，指出纰缪地方，导致真理之日益明白，则不胜馨香祷祝之至！

章士钊 1959年6月某日

这样一来，我看有很大好处，尊意以为如何？先生如果不高兴这样办，我的建议作罢。我害了一个月感冒，前书未复，方以为歉。忽得6日信，极为高兴，倚枕奉复，敬颂

教安。

毛泽东 1959年6月7日上午8时

章士钊读了毛泽东的复信，十分感动。后来三联书店再版《逻辑指要》时，章士钊就以毛泽东为他撰写的说明文字替代了自己早已拟好的再版序言。

毛泽东与章士钊之间还有一个趣事，笔者不得不在此补叙如下。

有一次，毛泽东看罢章士钊的来信，手指在桌上轻轻地敲了两下，转向卫士李银桥吩咐：

“你赶紧上街，买两只鸡，给章士钊先生送去。”

此时已经是晚上七八点钟了，李银桥匆匆赶到街上，跑了几家副食店，总算买到了鸡，送到章士钊家里。李银桥记得章士钊老先生是住在一个四合院里，房子不怎么样，很破烂。他拎着两只鸡说：

“主席送您两只鸡。”

章士钊连连点头说：

“谢谢，谢谢。”

李银桥说：

“主席看到您的信了。”

章士钊举举那两只鸡：

“知道了，这是回话。主席身体怎么样？”

李银桥说，很好。可他有些纳闷，这两只鸡怎么是回话呢？章士钊在信上说了什么，他不知道，当然也无法猜到。他回去给毛泽东学说了一遍，毛泽东也笑而不语。这就给李银桥留下了一个终生猜不透的迷。

6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社员私养家禽、家畜、自留地等四个问题的指示》，全文如下：

省委、直辖市委、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公社党委、生产大队总支委、生产队支部委员会：

中央5月7日关于农业生产的5条紧急指示曾经指出，发展猪、鸡、鸭、鹅的生产，要公养私养并重，两条腿走路，要给社员一定数量的自留地。为了迅速切实地贯彻执行这个指示，也为了把零星土地充分利用起来，为了保护屋前屋后的零星树木，鼓励私人植树，中央建议各县，用县人民委员会的名义出一张布告，把下面4件事向群众公布：

第一，允许社员私人喂养家禽家畜，包括猪、羊、鸡、鸭、鹅、兔等在内，这些家畜家禽养大了，卖得价款和平时的粪肥收入，私有私养的完全归社员个人所得，公有私养的一定要给社员以合理的报酬。但是，**私养家畜家禽的社员要保证不耽误对集体生产应该担负的出工数。**为了经营自留地和喂养家畜家禽起见，除家有老幼辅助劳力者外，要给全劳动力每月放假3天至5天。家庭自办伙食者，还要给妇女劳动力每天二、三小时的时间。

第二，**恢复自留地制度，不管社员喂猪不喂猪，在食堂吃饭或在家吃饭，只要他愿意要，都应该给他。**自留地数量仍按原来高级社章程规定，以不超过每人分地的5%，也不少于5%为原则。自留地质量应尽可能将各社员原领的自留地发还，如土地已经过平整不能发还原地的，也应该给予相等于原来的土地，**不应随便将远地坏地抵充**。社员在自留地里可以种蔬菜、饲料，也可以种瓜果或小杂粮，不要过分限制。自留地所生产的产品，也由社员自由支配。**应该肯定这种自留地长期归社员自由使用，不征公粮，不派统购任务。但是不准社员出卖、出租或私自转让。**

第三，**鼓励社员利用零星空闲的时间，把屋旁、村旁、水旁，路旁的零星闲散土地充分利用起来。这些土地上长的庄稼，谁种谁收，不征公粮，不派统购任务，愿吃、愿存、愿卖，完全由社员个人自由支配。**

第四，**屋前屋后的零星树木（包括竹木果树）仍然归还社员私有，由社员负责经营培护，其收益也完全归社员自由处理。**并且奖励社员利用屋前屋后和其他废弃土地种竹木，种水果，谁种谁有。

**把这4件事，用布告的形式向群众公布，并且认真实行，取信于民，对于农业、林业和畜牧业的发展将大有好处。**这种大集体当中的小私有，在一个长时期内是必要的，有利于生产的发展，也有利于人民生活的安排。**允许这种小私有，实际是保护社员在集体劳动时间以外的劳动果实，并不是什么“发展资本主义”。**这些家庭副业搞起来了，可能同集体生产发生某些矛盾，同国家的市场管理发生某些矛盾，这应该从加强对社员的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思想教育，正确地加强市场管理和公社经营管理工作来加以解决。经验证明，禁止搞这些家庭副业、一切归公的简单办法，是有害的，也是行不通的。

中央 1959年6月11日

6月11日下午，毛泽东会见了秘鲁议员代表团，他在谈话中说：

“**中国是个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工农业水平不高，有许多人是文盲。**我们现在正在积极组织自己的经济，积极做提高人民文化水平的工作，发展我们的工业，使农业用机器装备起来。现在工作才开始做，仅仅是开始。至于做出成绩来，那需要时间，需要朋友的帮助，不是很短时间内所能做到的。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要提高经济、文化水平，建设现代化的工业、农业和文化教育，需要一个过程。**我们现在提出了‘多快好省’这个建设经济、文化的口号。可以快一点，但不可能很快，想很快是吹牛皮，你们不会相信，我也不相信。**比如走路，总要花些时间。我们已经干了10年了，但是如你们所知道的，我们工业才这么一点，农业还是手工业式的，也许再有10年才会有些进步。中国不仅要自己料理自己，自己过生活，还应该对别的国家和民族进行帮助，对世界有些益处。同别的国家一样，不仅要为自己而且还要对世界做些贡献。和别的国家互相帮助，发展经济关系，尤其是我们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之间互相了解、交流经验，很有必要。**搞经济关门是不行的，需要交换。中美、南美有20个国家，同亚洲的国家例如中国发生经济联系是可能的，文化上的联系也是可能的，互相交换有益的东西。**日本是亚洲国家，是我们的邻国，我们同他们打过仗，最近关系也不大好，但是人民间的交往还是有的，现在还有日本民间代表团在中国访问。虽然中国和日本没有外交关系，日本政府对我们不友好，但两国人民还是互相往来，人民间互相来往很自由、很自然。有可能的话，我们还会派代表团去南美洲访问你们国家的。

过去干的一件事叫革命，现在干的叫建设，是新的事，没有经验。**怎么搞工业，比如炼铁、炼钢，过去就不大知道。这是科学技术，是向地球开战，当然这只是向地球上的中国部分开战，不会向你们那里开战。**如果对自然界没有认识，或者认识不清楚，就会碰钉子，自然界就会处罚我们，会抵抗。比如水坝，如修得不好，质量不好，就会被水冲垮，将房屋、土地都淹没，这不是惩罚吗？”

6月12日至1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工农业生产和市场问题。毛泽东说：

“1959年的计划指标曾多次开会调整。**这次会议还要决定降低指标。大家可以各抒己见，左思右想。不管过去说过什么大话，都允许翻来覆去。**”

周恩来、李富春、李先念、廖鲁言等人汇报了有关情况。周恩来根据他和各位副总理下去调查的情况，详细分析了经济形势，认为八届七中全会把钢产量指标降为1300万吨是可行的。接着，李富春、李先念就计划和财政、市场问题作了说明。廖鲁言则提出1959年粮食指标从8000亿斤降到6000亿斤。

毛泽东在会上讲了两次话，还曾经多次插话。

6月13日，他在会议上讲话说：

“去年的大跃进，对破除迷信起了很大作用。但是，不讲时间、空间和条件，主观主义大为发展，没有把主观的能动性和客观可能性结合起来，只讲主观能动性，而且无限扩大，这点必须坚决纠正。我过去没有摸工业，只抓了农业。去年才接触工业。在这种情况下，犯错误可以说是必然的。人的认识要经过多次反复才能找到比较正确的道路。要总结去年的经验，去年的经验对于今后搞经济建设是十分宝贵的。

去年我们至少有3大错误：第一，计划过大，指标过高，勉强去完成，必然破坏比例关系，经济失调。第二，权力下放过多，结果各自为政，政策也乱了，钱也花多了。第三，公社化过快，没有经过试验，一下子推开。**大刮共产风，干部也不会当家。现在粮食供应紧张，主要是虚报产量。还有是吃饭不要钱，敞开肚皮，吃多了。**

多快好省还是可以做到的，但太多太快就不行。去年我们只注意多快，不注意好省。什么是多快也不甚了了。**现在钢的指标降到1300万吨，仍然是多快。因为去年只有810万吨好钢，今年增长60%，这样的速度在苏联也从未有过。**综合平衡我们讲过多次，但还是不容易做到。**事非经过不知难啊。**权力下放过多的情况要扭转过来。人权、工权、财权、商权，都应该收过来，由中央和省市两级专政，不能再往下放了，否则就乱了，没有办法控制了。今年粮食生产可以订6000亿斤的计划，能收到5000亿斤就很好，因为估计去年只有4800亿斤。但粮食消费计划只能按4000—4500亿斤的收成来安排。

**大跃进本来是好事，但4大指标（钢、铁、粮食和棉花）订高了，结果天天被动。经济工作我们究竟有没有经验，群众路线究竟怎么样，都值得我们重新考虑。过去一年头脑发热，现在冷静下来就是了。人不要不如猪，撞了墙就要拐弯。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经验，一定会出现许多新问题，应当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我过去只注意人和人的关系，没有注意人和自然的关系。过去搞民主革命，忙不过来，打仗占了大部分时间。后来搞社会主义革命，主要精力是搞阶级斗争。去年北戴河会议才开始搞经济建设，特别是抓工业。看来，**我第一次抓工业，像我1927年搞秋收起义时那样，第一仗打了败仗。不仅我碰了钉子，在座的也碰了钉子。现在不是互相指责、互相埋怨的时候，而是要认真吸取经验教训，赶快把过高的指标降下来，尽快把生产计划落实。**”

毛泽东还说：

“现在我们宣传上遇到困难。去年是那样讲的，今天又这样讲。现在《人民日报》和《内部参考》是两本经。**《人民日报》和新华社搞两面派。公开报道尽讲好的，《内部参考》讲不好的。当然，《内部参考》还是要办，不好的事情还是有个地方讲。**但公开报道老是这样只讲好的，不是办法。去年说了许多大话、假话，应该逐步转过来。自己过去立的菩萨，现在自己不要再拜了。现在计划已经确定，方针已经明确。宣传有准绳了。过去报纸上说的虚夸的数字，过高的指标，现在根本不去理它，转过来就是。关于如何转，这个问题请中央书记处研究。”

6月13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转发上海市委《关于当前副食品、日用工业品问题的报告》写了一个批语，全文如下：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并告中央各部、国务院各部党组、党委，军委各部、工、青、妇各党组：

上海市委6月6日关于副食品、日用工业品两大问题的情况分析和处理意见，是一个好文件。现在发给你们，请你们认真读一读，想一想，好好讨论一下，并且一律仿效上海的作法，就自己地区的实际情况，定出切实有效的办法，付诸实行。

**副食品和日用工业品供应紧张，是目前经济生活中一个最突出的问题，是有关党群关系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经济问题，也是重大的政治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不外乎是增加生产，增加商品供应；厉行节约，压缩社会购买力；并且做好商品购销工作，改善经营管理。中央已经决定，把钢材、煤炭、铜、铝、木材、水泥等主要物资分配计划按照实际的生产可能调整下来，把生产重新作了安排，把基本建设的规模加以收缩，以便在劳动力分配方面和原料材料分配方面适当照顾农业和轻工业发展的需要，保证农业（包括农林牧副渔）有必要的劳动力和运输力，保证轻工业和手工业有必要的原料和材料。中央已经决定，大力压缩社会购买力，并且在群众中解释当前经济情况，应当认真贯彻执行。应当认真地吸取去年以来的经验，即是**既要很好地领导生产，又要很好地组织人民生活，要会过日子，要把富日子当穷日子过，留有余地。**财贸工作方面，这个时期管理权限“放”得多了，机构削弱了，商品摆布和经营管理上也有缺点，应当加强这方面的工作。下放到专区、县、公社和企业的权力，应该收回的坚决收回，由中央和省、市、自治区两级集中管理，统一调度。要求足够地重视商业工作和市场领导，真正做到工农商业并举。商业工作做得不好，工农两业也不能发展。上海市委的报告，有情况，有分析，有解决问题的措施，是中央方针的具体化，使人看了，觉得切实具体，能解决问题，不是漆黑一团，毫无办法。

**中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大力抓副食品、日用工业品的生产，抓压缩社会购买力的措施，上下一齐动手，解决这个问题。无数次经验说明，只要向群众说明当前的情况，相信和依靠他们，没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大家想一想，**难道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连副食品、日用工业品这样的问题都不能解决么？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和农民，不仅能够省吃俭用，克服一时的困难，而且能够大力增加副食品、日用工业品的生产，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应当有这样的信心和志气。**

　 　 中央 1959年6月13日

6月14日，由于邓小平在5月间摔伤了腿，住在医院里，彭真就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召开了书记处会议，研究《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在宣传上怎样转的问题。

这里有必要先说一说邓小平的一段轶事。

在整个大跃进年代，不管是真左派、假左派或是右派、中间派，无不忙得不亦乐乎，唯有一位常常在北京值班的大员——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倒显得十分悠闲自得，他经常到养蜂夹道高干俱乐部打桥牌。几年间，邓小平除了出差、开会以外，每周3、周6晚上，每周日下午、晚上，都要和他的座上常客——万里和被称为“教授”的吴晗一类人打桥牌。待他们玩到午夜时分，北京饭店都要送饭菜、茶点侍候。邓小平每每打到兴奋处，便高声叫道：“打桥牌也要鼓足干劲。”他的话无不引起一阵满堂哄笑。

闲话少叙，再说彭真等人商定，在宣传上应该转，但要逐步地转，不能急转弯，而且报纸公开宣传也不能把工作中的问题和盘托出，还要内外有别。彭真拿出中宣部起草的文件，要胡乔木、周扬和吴冷西修改一下，书记处再讨论决定。

这样，胡乔木、周扬、吴冷西3人在15日和16日一起讨论和修改了中宣部起草的关于宣传上如何转的问题的通报草案。

6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根据胡乔木建议所撰写的《海瑞骂皇帝》一文。

6月17日，彭真召开书记处会议，讨论胡乔木3人修改过的中宣部起草的关于宣传上如何转问题的通报草案，又略略作了修改，准备报请刘少奇审批后，以中共中央名义下发各地。刘少奇看了这一草案后说：

“通报本身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此事关系重大，需要由毛主席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

6月20日凌晨，毛泽东读到了新华社编印的第2801期《内部参考》上关于广东东江流域暴雨成灾的消息后，给胡乔木、吴冷西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乔木、冷西同志：

**广东大雨，要如实公开报道。全国灾情，照样公开报道，唤起人民全力抗争。一点也不要隐瞒。政府救济，人民生产自救，要大力报道提倡。**工业方面重大事故灾害，也要报道，讲究对策。此件阅后退回。

毛泽东 6月20日上午4时

6月20日下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中宣部关于宣传上如何转问题的通报草案。刘少奇说：

“报纸上去年放了许多卫星，失信于人。我们去年浮夸风刮得厉害，下面怎么讲我们就怎么报道，表面上似乎‘密切联系实际’，其实是跟着下面走，犯了尾巴主义错误，结果走向反面，完全脱离实际。《人民日报》宣传虚夸，基本上是反映了中央一些同志那个时候的思想和作风，所以不能完全怪报纸。

**目前宣传要转变过去一个时期的状况，但也不能马上转，不能全面地转，而是要逐步地转。这里有两条战线斗争的问题。**所以，宣传上既要防‘左’，又要防右。我们在宣传上只能逐步地转，逐步地讲，不能一下子和盘托出。从对外宣传上说，还要考虑一些兄弟党过去一直为我们说了许多好话，如果我们一下子来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会使兄弟党很被动。1956年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的做法，使兄弟党被动，又被敌人利用，我们不能那样干。

关于工作中的缺点，在宣传上应该讲这些缺点已经或者正在怎样改正，从这样的角度去宣传。**不能把所有的缺点都讲出来，只能讲1%，**讲典型的、有教育意义的。因为我们的工作中主流是好的，缺点只是支流。比方说产品的数量和质量的关系，过去强调数量是必要的，没有数量，质量也无从谈起。我们从无到有，开始只能着重数量，有了数量以后就要抓好质量。过去我们的缺点是只抓数量不抓质量。报道缺点不能用纠偏的态度，不能泄气，不能给群众泼冷水。

去年大跃进是史无前例的，我们没有这样的经验。经过去年的大跃进及其后的大失调，我们就可以认真研究所谓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速度究竟怎样才适当。**去年的经验教训是全民性的，**是非常丰富也非常深刻的，因而是十分宝贵的。总结这些经验教训就是最大的成绩，没有理由悲观失望。”

会议结束后，彭真、胡乔木、吴冷西来到毛泽东的住处，向他汇报这次会议的情况。

毛泽东说：

“现在我们名声不大好，别人不大看得起我们，这也有好处。去年大吹大擂，不但敌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而且还有我们的一些朋友，都对我们有些害怕，现在不大怕了。还是不叫别人害怕为好。**我们不能务虚名而得实祸**。我的感觉，去年北戴河会议后，从9月到今年5月，一直是被动的。一些指标定得那么高，使我们每天处于被动地位。工业也好，农业也好，指标都是我们同意了的，都有一部分主观主义，对客观必然性不认识。**讲了多少年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就是不注意，就是不讲综合平衡。工业各个部门的联系，工业与农业的联系，重、轻、农的联系，都没有兼顾到。**去年11月开始发现问题。**这是在郑州会议的时候，一些同志起草了一个15年（1958—1972）建设纲要，目标是年产4亿吨钢。我当时就问，要那么多钢干什么，有什么用，能不能生产那么多？那个时期就发现大家喜欢高指标。**后来又发现陈伯达起草的一个文件，绝口不讲商品交换，甚至连商品二字也不提。我感到一些同志思想中对社会主义经济究竟要不要商品经济，是只搞产品交换还是有商品交换，都糊涂了。于是建议大家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目的是想使大家对社会主义经济有一个比较符合实际的看法，知道社会主义经济还是商品经济。但是，当时许多同志思想并没有转过来。武昌会议还是高指标，还没有认识平调农民是剥削农民。第2次郑州会议才解决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问题。**高指标从武昌会议、北京会议到上海会议，一降再降，都没有降到实处。可见认识错误不是那么容易可以做到的。**人们的思想符合实际要有一个过程。现在人家说我们去年成绩没有公布的那么大，这不要紧。我们现在不要同人家争论成绩的大小，明年再看。去年讲了大话，也可能有七分是真的，三分是假的，也可能是二八开，究竟如何，现在不必争论。

**现在宣传上要转，非转不可**。总的说，从反右斗争起，《人民日报》比过去好，老气没有了。但去年吹得太凶、太多、太大。现在的问题是改正错误。**如果不改，《人民日报》就有变成《中央日报》的危险，新华社也有变成中央社的危险。**

我看《人民日报》，只看一些新闻和一些学术文章，对其它的东西不大有兴趣，它们吸引不了我。不过《参考资料》和《内部参考》我每天必看。这两种刊物，应该让更多的人看到。记者协会办的《新闻工作动态》也不错，反映了新闻界的一些思想动向，可以看。但**公开的宣传，不管新华社或《人民日报》或广播电台，都要来一个转变，不能像目前这样王顾左右而言他。**

关于当前报刊宣传的通报，可以不用中央通报的形式，而用乔木、周扬、冷西他们3个人的意见的形式，再加上一个中央通知，说明中央同意他们的意见，并且提出6月底以前召开一次报纸宣传工作会议，要各省报总编辑、新华分社社长和中央一级报刊、新华总社、广播事业局的负责人参加。大家说好不好？”

毛泽东最后说：

“报纸办得好坏，要看你是政治家办报还是书生办报。我是提倡政治家办报的，但有些同志是书生，最大的缺点是优柔寡断。**袁绍、刘备、孙权都有这个缺点，都是优柔寡断，而曹操则是多谋善断。**我们做事情不要独断，要多谋。但多谋还要善断，不要多谋寡断，也不要多谋寡要，没有抓住要点，言不及义，这都不好。听了许多意见之后，要一下子抓住问题的要害。**曹操批评袁绍，说他志大智少，色厉而内荏。就是说没有头脑。**办报也要多谋善断，要一眼看准，立即抓住、抓紧，形势一变，要转得快。”

谈话结束时已经是晚上8点30分，毛泽东叫吴冷西留下，又招呼刘少奇过来一起谈话。毛泽东对刘少奇说：

“《人民日报》去年出了很多乱子，要加以改进，是不是请你抓一抓《人民日报》？”

刘少奇不高兴地说：

“现在我管的事情很杂，也很少接触《人民日报》，管不了。还是请主席直接管好。”

毛泽东见刘少奇这样说，只好对吴冷西说：

“以后有事情要请示，你可以找少奇同志，也可以找总理，也可以找我。但多找他们两位，日常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的中央书记处管。”

刘少奇和吴冷西离开毛泽东住处后，他在门口对吴冷西说：

“《人民日报》要办好，要多听各方面的意见。毛主席说的多谋善断，你们首先要多谋，然后也要善断。对于比较重要的问题，你们可以而且应该提出自己的意见，但最后还是中央来断。这样可以避免至少可以少犯错误。”

正所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遗憾的是，毛泽东的谈话精神以及将要召开的全国报刊宣传会议，由于不久在庐山会议中出现的突兀情况，全都无疾而终了。

6月20日这天晚上，毛泽东、周恩来、陈毅在北京中南海听取聂荣臻、钱三强等人关于核研究方面的情况汇报。

正在此时，中共中央收到了赫鲁晓夫和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的来函。于是，大家就聚在一起听着翻译念那份刚刚收到的苏联政府的正式函件。函件中说，苏美等国正在日内瓦谈判禁止核实验的协议，苏联怕西方国家获悉他们在新技术方面援华，而“有可能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国家为争取和平、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所作的努力”。陈毅一拍桌子，大声吼道：

“胡说八道！”

“念下去——”

毛泽东不动声色，点着了一支香烟。翻译又接着往下念：为此，苏共中央决定：提前中止1957年10月15日苏中双方在莫斯科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中断若干援助项目，不再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两年以后看形势发展再说。周恩来眉宇紧锁，神情严峻，愤然说：

“片面撕毁，背信弃义！”

屋子里一阵沉默。

“算了。”毛泽东掐灭烟头，大声说道：“还是那么一句老话，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们去吧。”

“主席，那我们下一步怎么办？”

钱三强用焦灼的目光望着毛泽东问。毛泽东没有回答，轻轻地拿起那支红蓝铅笔，仔细地在那份呈报给他的原子弹研制报告上不停地写着，划着，一下，又一下……

“59.6”、“59.6”、“59.6”……

从此，以“596”这个不寻常的日子为代号命名的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计划，就这样确定了下来。

欲知后来原子弹的研制结果如何？请慢慢往后看。

东方翁曰：1959年6月11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社员私养家禽、家畜、自留地等四个问题的指示》中明确规定：“**把这4件事，用布告的形式向群众公布，并且认真实行，取信于民，对于农业、林业和畜牧业的发展将大有好处。**这种大集体当中的小私有，在一个长时期内是必要的，有利于生产的发展，也有利于人民生活的安排。**允许这种小私有，实际是保护社员在集体劳动时间以外的劳动果实，并不是什么‘发展资本主义’。”**此后，这一项重要政策一直持续了下去，始终都“**允许”**社员私养家禽、家畜、自留地等**“这种小私有”**的存在**。**可是后来却有人污蔑毛泽东时代“将农民从事的饲养，编织，采集，渔猎等家庭副业统统说成是资本主义的尾巴，强制性地割掉；将农民的自留地、宅边地说成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土壤，统统收走”。这种颠倒历史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

**第70章**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15年内赶上英国，这是人民群众的**

**意志和愿望。要爱护群众的积极性。有缺点错误，用大字报，**

**用大鸣大放的方法来纠正，不要泼冷水。搞建设像打仗一样，**

**杀敌1万，损兵3千，有缴获，有损失。有所得，有所失，**

**不能泄气，6亿人泄气可不得了。”**

话说1959年6月20日深夜，高智应召来到毛泽东书房，毛泽东正坐在椅子上看书。卫士轻轻地叫了他一声，他抬头看见了高智，说：

“高智，我明天要出去。”

高智问：

“到哪儿去？”

“湖南，江西。”毛泽东作了个手势：“以后出门，你们两个秘书轮流去，不用都跟着走。这次就是你跟着去吧。”

6月21日零时30分，毛泽东登上南下的专列离开北京，下午到达郑州。他打电话给北京，提议在庐山召开省市委书记座谈会，征求政治局常委意见。

这天晚上，刘少奇召开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提议。

6月22日，毛泽东在专列上同吴芝圃等人谈了话，他说：

“为什么纣王灭了呢？主要是比干反对他，还有箕子反对他，微子反对他。纣王去打徐夷（那是个大国，就是现在的徐州附近），打了好几年，把那个国家灭掉了。

纣王是很有才干的，后头那些坏话都是周朝人讲的，就是不要听。

他这个国家为什么分裂？就是因为这3个人都是反对派。而微子最坏，是个汉奸，他派两个人做代表到周朝请兵。武王头一次到孟津观兵回去了，然后又搞了两年，他说可以打了，因为有内应了。纣王把比干杀了，把箕子关起来了，但是对微子没有防备，只晓得他是个反对派，不晓得他通外国。给纣王翻案的就讲这个道理。

纣王那个时候很有名声，商朝的老百姓很拥护他。纣王自杀了，他不投降。微子是汉奸，周应该封他，但是不敢封，而封了纣王的儿子武庚。后来武庚造反了，才封微子，**把微子封为宋，就是商丘。**”

6月23日，毛泽东在武汉要去长沙，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来武汉接毛泽东。

在专列去长沙途中，毛泽东与陪同他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谈话，他给王任重讲了春秋时期秦穆公的一个故事：秦穆公用大将孟明伐郑失败，他主动承担责任，继续重用孟明，后来在讨伐晋国的战争中取得了胜利。故事讲完了，毛泽东说：

“决策错了，领导人要承担责任，不能片面地责备下面，领导者替被领导者承担责任，这是取得下级信任的一个重要的条件。”

毛泽东对一些人封锁消息表示极大不满，他说：

“有的部门、有的部长，不大向我反映情况。”

王任重说：

“大概他们怕主席太累。”

毛泽东说：

“不向我反映情况，我才最累。你把湖北的真实情况告诉我，我就不累了。看来，利用全国人大开会的机会，把去年公布的那些数字和今年的生产指标修改一下就好了。失去了一个机会，造成目前的被动。”

尔后，毛泽东又与专门负责冲印照片的胡秀云聊天。胡秀云离开毛泽东车厢后，遇到了中央办公厅根据杨尚昆的指示安排的录音员。录音员笑着对她说：

“小胡，刚才你在主席那里说了些什么，我全知道。”

录音员为了让胡秀云相信，就学了几句他们谈话的内容。胡秀云一听感到非常惊讶，于是就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也感到异常震惊，不过当时并没有说什么。

6月24日凌晨，专列抵达长沙车站，毛泽东想下车，工作人员说湖南省委派的车子还未到。毛泽东指了指窗外，那儿停着几辆伏尔加轿车。工作人员说：不够坐。他们还扳着指头算专列上的人数，数到了录音员。毛泽东惊奇地问道：

“车上有录音员？带录音员干什么？”

他这才把胡秀云说的情况联系了起来，一追究才知道是中央办公厅在会客室等处安装了微型录音设备，还专门配备了录音员。毛泽东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中央办公厅的杨尚昆、叶子龙解释是，毛泽东的谈话用笔记录，毕竟不完整，他们想把毛泽东的谈话录下来，留给后人。但是又怕毛泽东反对，就没有向他报告。所以，毛泽东一直也没有察觉。

后来，刘少奇召集有关人员开会，传达了毛泽东的批评。刘少奇把处理情况写成报告，呈送毛泽东，毛泽东批示同意，方才了结了此事。

再说毛泽东下了专列，高智问他：

“主席，要游泳不游？”

“不游。”

“是不是准备一下？万一要游……”

“不要准备。”

毛泽东乘车来到蓉园，稍事休息，就坐船去游览湘江。罗瑞卿要当地人员做游泳准备工作。高智赶紧说：

“罗部长，不能准备。我问过主席了，他有交代。”

“那也要准备呀。”罗瑞卿说：“万一主席要游呢？”

高智说：

“那也不要准备。因为主席讲了话，你还准备就准挨批。”

罗瑞卿有点不高兴，说：

“不准备，发生问题谁负责？”

高智也坚决地说：

“发生问题我负责，你不要准备。”

事后，有个人说高智：

“罗部长官不小了，你就那么说他？”

高智说：

“官大该说也得说。”

这话传来传去，就变成了“罗部长官大了，我照样说了他一顿。”警卫局的一位负责人借着这句传话，把高智狠狠地训了一顿。

再说毛泽东回到蓉园，对前来看望他的周惠说：

“周惠呐，我把王任重同志给你带来了。”

周惠闻言一怔，心想：王任重是大跃进的促进派，湖南湖北两省尽管有些矛盾，也只是心里较劲，并没有撕破脸皮，主席何出此言？他慌忙上前，握着毛泽东的手，叫了一声“主席……”

毛泽东又说：

“我带王任重来，就是要他向你学习，湖北要向湖南学习嘛。”

“学什么哟，我们有啥可学么？”

“学什么？好日子当穷日子过。”

“我们搞的也是一般般。湖南‘共产风’制止得早点，也是省委集体讨论决定的。”

“你是第一书记么。”

周惠不知毛泽东言外之意，说：

“主席，我不是第一书记。小舟是第一书记。”

“小舟我知道，他不是做实际工作的。你实际是第一书记。”

周惠颇不自安，说：

“我不是。”

毛泽东笑笑，退了一步，说：

“你是第二书记。”

“我也不是第二书记。周礼排我前面。湖南排名，‘三周’是周小舟、周礼、周惠。”

“周礼我知道，他做啥？他不管事嘛。你实际是第二书记。”

周惠惶恐不安地摇摇头。他不知道毛泽东为啥一见面就来这么一个开场白，自己原来准备好向他进谏大跃进祸国殃民的话，早已跑到九霄云外去了。只听毛泽东又说：

“好吧，进楼来谈。”

回到住所，落座之后，毛泽东点着烟，说：

“我这次来，要游游水，再爬爬山。”

周惠已经明白了毛泽东的意思，就说：

“今天休息休息，明天游湘江，后天再回韶山。”

毛泽东说：

“秀才死读书，读死书，这不行。还要学会读无字书，听无弦音。明朝那个徐霞客是你周惠的老乡，江苏人，没有官气，跑了那么多路，作了大量调查研究，终于否定了《禹贡》的‘岷山导江’的定论，提出‘金沙江导江’的科学论断。还有北魏的郦道元，他的《水经注》写得好，是因为他经过了亲身游历和实地考察，获得了大量的书本上没有的东西。”

说至此，他将眼睛一眯，学着旧时代教书先生，摇头晃脑地背诵道：

“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

周惠想想毛泽东刚见面时说自己是第一书记第二书记的那番话和这一番极富散文特色的议论，联想起自己曾经派张化儒暗查7省浮夸放卫星的事。心想：难道他知道了？他是赞成呢？还是不满意？不管怎么说，他的这些话，不是随便说的吧？周惠思来想去，也理不出个头绪，依然是一头雾水。

6月24日早饭后，周惠来见毛泽东。此时阵雨刚过，空气湿润。毛泽东说：

“周惠，咱们去走走，到后面去看看。”

毛泽东漫步在蓉园里，周小舟闻讯也赶来了。一行人来到东院，见墙上贴有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之类的大字报，毛泽东就认真地看了起来。他说：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15年内赶上英国，这是人民群众的意志和愿望。要爱护群众的积极性。有缺点错误，用大字报，用大鸣大放的方法来纠正，不要泼冷水。搞建设像打仗一样，杀敌1万，损兵3千，有缴获，有损失。有所得，有所失，不能泄气，6亿人泄气可不得了。”**

周小舟、周惠交换了一下眼神，觉得毛泽东讲的是有意开导他们要正确看待大跃进。这些话不能说没有道理，但还是改变不了自己对大跃进的看法，可一时又不知道该如何向毛泽东表达不同的看法。

6月24日下午2时，毛泽东在长沙湘江边登上8201号轮船，稍事休息后，随即更衣下水游泳。

时值汛期，江水暴涨，洪流湍急，波浪滚滚。毛泽东一面游，一面和陪泳的人谈话。他问道：

“你们是哪个单位的？”

陪泳人员说：

“我们是省体育学院游泳队的。”

“你们游泳队有多少人？”

“有20多个人。”

“太少了，还要多些。”

大家游了一段时间，毛泽东又问：

“你们累不累？”

大家都说：

“不累。”

“好！你们要勇于力争上游。”

游到橘子洲头分水处水流最急的地方，毛泽东说要上橘子洲头看看。一位陪泳者说：

“这里水流最急，请等一下。”

毛泽东说：

“这里水流最急，就是要从这个地方上去好。”

他坚持在那杂草丛生的地方登上了橘子洲头，身披一件蓝白条毛巾衣，步履稳健地向前走，嘴里还念念有词：

“常德德山山有德，长沙沙水水无沙。”

毛泽东走过一片菜地，到了一户农民家门前，一位老人面带微笑地搬来一条长凳请他坐。他刚坐下，附近的群众蜂拥而来。毛泽东不住地和群众打招呼。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捧着一杯热茶递给毛泽东，说：

“这杯茶请您老人家喝了吧，没有好招待的，只能表示心意。我们穷人不是搭帮毛主席，怎么会翻身呀！”

毛泽东连忙起身接过茶杯，说：

“今天看到了各位乡亲，我很高兴。”

这时候，人越挤越多，里三层外三层。工作人员借机说，毛主席要检查工作。群众便自觉地让开了一条道，毛泽东只好起身走了出来。他走进长岛大队第一生产队办的食堂，和生产队长握过手，又和其他人一一握手问好。看了食堂里的情形，又问了一些问题，他夸奖说食堂办得不错。从食堂里出来，看到地里种的豆角和苋菜，他转过脸来对陪同的人们说起南北方对豆角的“角”字发音如何如何的不同。

橘子洲头完全小学的师生们正在上劳动课，有两个学生去食堂喝开水，他们一眼就认出了毛泽东。毛泽东见少先队员向他举手行礼，就亲切地问：

“你们是哪个学校的？”

学生说：

“是橘洲完小的。”

毛泽东说：

“到你们那里去参观好不好？”

两个孩子高兴得跳了起来。于是，众人又簇拥着毛泽东向学校走去。路过一间猪栏时，毛泽东进去看了看，对生产队干部说：

“这里猪喂得不少，也喂得好。要多喂猪，又有肉吃，又有肥料，你们说对不对？”

完小师生们见毛泽东来了，急忙丢下劳动工具跑了过来。毛泽东微笑着问离他最近的一个女同学：

“你们上什么课啊？”

女学生说：

“上劳动课。”

“你们做些什么劳动？”

“有的学绣花，有的学种菜，有的养猪，养鸡，养鸭，养兔……”

毛泽东又问：

“学校是不是就在附近？”

一位老师回答说：

“几步就到了。”

毛泽东左手拉着一个男孩，右手拉着一个女孩，来到了学校，主动向师生们打招呼。师生们激动得高呼：“毛主席万岁！”

毛泽东来到学校的草坪里，被师生们围了个水泄不通。他问学校里有多少先生？有位老师说有9位。毛泽东的视线在人群中巡视着，问哪些是先生，都来了没有？

原来，老师们为了让学生离毛泽东近些，都站在学生后面。他们见毛泽东指着他们一个一个地问，这个是不是，那个是不是？早已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一个个连连点头。毛泽东还问：

“学校里有多少班，多少学生，有多少女学生？”

他听着校长的回答，点头微笑，又说：

“学生到校读书，走的路程远不远？”

校长说：

“都是就近入学，学生走的不远。”

“学生在校要读几年书毕业？”

“要读6年。”

毛泽东用征询的口气问他们，学制能不能缩短。还说，你们要改革旧学制，创立新学制。他又对学生们说：

“你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要努力学习，你们是有前途的。”

有位老师看学生们紧紧围在毛泽东身边，担心毛泽东受热，于是轻声说，请同学们散开一点。毛泽东笑着对学生们说：

“你们听他的命令，我也要听他的命令。”

离开学校，毛泽东登上了“韶山2号”轮船，扶着船舷频频向岸上的人们挥手告别。回到专列上，他让人去把高智叫来。高智进入他的卧室，见他光着膀子，只穿着一条裤头，显得很热的样子。毛泽东见高智来了，就说：

“太热了，我几天没有睡好觉，怎么办？”

高智说：

“下火车，住宾馆去。”

毛泽东说：

“不！我要回老家去。你给杨尚昆同志打个电话，告诉他我要去韶山，然后上庐山。电话通了以后，我们就发车。”

6月25日下午，下了一场雨，天气凉快多了。毛泽东在公安部长罗瑞卿、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38岁的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华国锋等人陪同下，乘吉姆车朝韶山飞驰。毛泽东凝望着车窗外的景色，不住地抽烟。

下午5时许，毛泽东回到了阔别32年的故乡韶山。

当晚，毛泽东下榻于位于松山的韶山招待所1号寓所。韶山人民公社党委书记毛继生来见毛泽东，他激动地说：

“主席，您终于回来啦！”

毛泽东握着他的手，仔细打量着，感觉很面熟，可一时又叫不出他的名字，便问道：

“你是……”

毛继生激动的情绪尚未平息，结结巴巴地说：

“我……我是这里的公社书记，叫毛继生。主席，您怕不认得我了吧，1954年夏天，我到过您那里，跟您在北戴河住了3天。”

毛泽东马上想起来了，哈哈大笑着说：

“你看你看，我的眼睛瞎起，连叔老子都不认得啦。”

毛继生不好意思地说：

“那年在北戴河，就希望您回乡看看。这一次回来了，希望您多住一些日子，对冲里的工作，多做指示。”

毛泽东说：

“你这么说，就把我当外客啦。我这次回来，是来看看家乡，会会乡亲。同时来的有罗瑞卿同志，公安部长；王任重同志，湖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同志，你们省委第一书记；还有华国锋同志。他们是我邀来的客人，都要在这里住两三天。同时，也要请你帮忙办一件事情。”

毛继生马上说：

“请主席指示。”

毛泽东摆摆手说：

“不是指示。这是我的私事。这次回来要请客，请乡亲们吃餐便饭。”

毛继生马上说：

“主席，您不要费心了，由我们来请客。”

毛泽东认真地说：

“不！我离开家几十年哒，欠了太多的人情债，明天请大家来叙一叙，团聚一番。事，要请你去办，钱，归我出！”

毛泽东扳着指头数着要请的人，有老地下党员、老农民自卫军队员、烈士家属、亲戚朋友等等，一共有40多人。毛继生一一记下了。

这一天深夜，招待所的电灯坏了。毛泽东对值班卫士封耀松说：

“我今晚兴致勃勃，要写一首诗，你给我找个煤油灯。”

封耀松把灯端来了，毛泽东就靠在床栏上，就着灯光，用报纸垫着一张白纸，手握铅笔，在上面写了涂，涂了又写。他嘴里念念有词，哼来哼去，大约有两个多小时，才停住笔，抑扬顿挫地吟诵了一遍。吟罢，他又拿笔写了一行字，作为小序。写罢，他吩咐秘书：

“你把这个拿去誊一誊。”

就这样，七律《到韶山》便问世了，其词云：

1959年6月25日到韶山。离别这个地方已有32周年了。

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6月26日清晨，毛泽东步出招待所的前坪，踏着山道，朝南岸方向走去。他回头对跟上来的毛继生说：

“今天我先到父母坟上看看。”

毛泽东父母的坟墓位于土地冲楠竹圫。离毛顺生夫妇的坟墓约四五十米处，还有好几处坟墓。毛泽东停下来问：

“就在这个地方吗？”

毛继生说：

“还在前面一点。”

毛泽东点点头，又往前走。来到一座坟墓前，只见这个土堆坐西北朝东南，周围长了不少杂草，墓中央还塌了一个洞眼，墓碑上写着：

显考毛公顺生 显妣毛母文氏老大人 之墓

男 泽东 泽民 泽覃 敬立

毛泽东好像记起来了，说了声：“是的。”他在双亲的墓前肃立良久。警卫局沈同副处长忙去旁边采了几根松枝，摘了几朵野花，用茅草扎成一束，递给毛泽东。毛泽东接在手中，把这几枝带露珠的松枝和野花，恭恭敬敬地放在坟上，然后深情地三鞠躬，眼圈有些红了。他对随行的人们说：

“前人辛苦，后人幸福。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毛继生问毛泽东说：

“主席，是不是把坟修一下？”

毛泽东说：

“不要了，保持原貌，添一点土，把洞眼填一下就行了。”

他又问毛继生：

“这坟为什么没有被毁坏？”

本传前边已经说过，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的恐怖时期，国民党反动派曾经派人寻找过毛泽东父母的坟墓，声言要挖坟毁墓。是韶山人民不顾一切保护了这座坟墓。毛继生见毛泽东问起此事，就回答说：

“这里的农民出于对主席的热爱，进行了保护。”

离开父母的坟墓，毛泽东漫步在稻田田埂上。他看见对面山腰樟树丛中冒起一股青烟，一个短发妇女正用耙子将草丛中的枯枝败叶搂出来，放进火里焚烧，便走了过去。短发妇女闻声回头，看见是毛泽东，便抱起孩子朝家里大声喊：

“毛主席来了！”

大队党支部书记毛迪秋和乡亲们闻声赶来。短发妇女把毛泽东领进一间干净宽敞的堂屋里。毛泽东像到了自己的家里一样，坐在竹凳子上，抽着烟，亲切地同大家拉起家常。

“这栋房子住几家？”毛泽东问：“我小时候的好朋友土地老倌和四道士有没有后代？”

大队支书毛迪秋指着短发妇女说：

“她就是四道士的儿媳妇。”

毛泽东高兴地问那妇女：

“我怎么没见过你？”

那妇女回答说：

“你老人家1927年就走了，我是1931年生的，所以没有见过呀！”

“你是哪里人？姓什么？”

“我是如意亭的，姓汤。”

毛泽东摇摇头，说：

“如意亭没有姓汤的。”

“我小时候从宁乡逃难过来的。”

这位逃难来到韶山的汤姓妇女，就是数十年后大名鼎鼎的毛家饭店的总经理汤瑞仁。毛泽东听她如此说，就点点头，发现她穿着解放鞋，又问：

“你爱人是干什么的？”

汤瑞仁说：

“他原来当过志愿军。”

毛泽东说：

“你是军属啊！他在外面打美国鬼子，你在家里打美国鬼子，你们俩都打美国鬼子。美国鬼子打完了，现在该好好搞生产了。”

汤瑞仁说：

“我一定听您老人家的话，搞好生产，多打粮食，支援国家建设。”

毛泽东问：

“今年每亩能收多少稻谷？”

这一问，在场的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才好。此时，全国各地到处都在“放卫星”，亩产千斤，双千斤，甚至上万斤的也有的是。众人正在为难时，有人说：

“亩产800斤。”

毛泽东摇摇头，说：

**“亩产800斤？依我看，平均亩产500斤就谢天谢地了。要实事求是，要计划种田，要科学种田。**我看见韶山的稻田绿化了，但山上树不多。韶山人多山多地少，要腾出田来种庄稼。”

大伙儿边听边点着头。有人说：

“感谢毛主席……”

毛泽东打断他的话，说：

“不要感谢我，要感谢人民。人民团结起来力量大！”

毛泽东和众人照了相，遂告辞出来，沿着小山漫步走向毛震公祠。

护士长吴旭君回忆说：“当地陪同的同志（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韶山公社党委书记毛继生同志）对他讲，里面没有什么看的了，祖宗的牌子已经没有了。意思是说可以不进去了。主席根本没有听他的劝阻，还是往前走，一边走一边说：‘管他三七二十一，鞠三个躬再说。’”

吴旭君个子不高，生得玲珑秀丽。她是在上海解放时参加革命的，后来和毛泽东的保健医生徐涛结了婚。吴旭君不但负责毛泽东的医护保健，也兼管抄录整理毛泽东的诗词新作，有时还兼一点秘书工作。

在毛氏宗祠里，毛泽东似乎在寻找着什么。原来是菩萨神龛不见了。

“多么可惜。”他对身边的人说：“应该留下的。没有钱求医，贫苦农民还要来求神许愿，吃香灰。神龛能给他们精神作用，给他们希望。人们需要这类帮助和鼓励。”

据吴旭君回忆：毛泽东走向祠堂大门口时，还边走边自言自语地说：

“菩萨是迷信，但烈士墓和祖宗牌子是个纪念。”

离开毛氏宗祠，毛泽东又来到韶山小学校。少先队员们手持鲜花，拉着毛泽东的手，前呼后拥地进了校门。孩子们不断地唱歌，毛泽东也微笑着不断地鼓掌。他又同师生们交谈了一会儿，走到排列整齐的少先队员队伍中，准备和孩子们合影留念。少先队员蒋含宇跑上来，给毛泽东戴上了一条红领巾。毛泽东高兴地说：

“我都60多岁了，也当少先队员了。”

他的话引起了孩子们一片笑声。他又对蒋含宇说：

“这个红领巾，我带回北京去喽！”

立刻又引起孩子们一片天真而可爱的笑声。摄影师侯波在这一片笑声中，赶紧按下了照相机的快门，拍下了一张可以使人听得见笑声的照片。

告别了韶山小学的师生们，毛泽东回到了阔别32年的上屋场。他进了堂屋，对着神龛做了一个揖，风趣地说：

“这是我小时候初一、十五工作的地方。小时候，我信过佛，后来慢慢不信了。”

那时候，毛泽东的母亲常常在神龛前烧香。在毛泽东生病时，母亲还让他吃一点香灰。毛泽东走到炉塘，对身边的人们说：

“1920年冬，我们兄弟姊妹就围在这炉子边烤火，我说服他们离开家乡，他们后来都走上了革命道路。”

走进横屋，他打量了楼上地下，对身边的人说：

“这里过去是我们家的客厅和饭厅。那时客人来，总是我父亲作陪，母亲带我们兄弟到灶屋吃饭。我们平时很少吃荤菜，餐餐吃蔬菜。”

他又指着小阁楼说：

“我小时候白天劳动，晚上回来就在那里看书或记账。”

穿过横堂屋，毛泽东来到父母亲的卧室，见左边的墙上挂着他和两个弟弟与母亲的合影，还有他和父亲与伯父毛福生及六弟毛泽覃的合影，心情顿时激动起来，非常惊讶地指着照片用地道的韶山话说道：

“咯是从哪里拱出来的呀？！”

他们母子唯一的一张合影，一直保存在外婆家。他和父亲的合影也被亲友们保存了下来。伫立在照片前，缅怀着早已作古的母亲和父亲，还有1935年牺牲在江西战场上的六弟毛泽覃，1943年牺牲在新疆的四弟毛泽民，如今只剩下了自己一个人了，心中该有多少感慨啊！良久，他小声说道：

“这是我的父亲母亲。我父亲得的是伤寒病，我母亲是因为脖子上长了一个疱，穿了一个眼，后来听说是淋巴腺瘤。那个时候医疗条件太差了，尽管他们年纪不大，但还是死了。照现在的医疗条件，他们是不会过早地离开人世的！”

毛泽东恋恋不舍地走出双亲的卧室，穿过厨房，来到过去放粮食的谷仓，看到谷仓上挂着一个量谷用的器具，便仔细地端详了片刻，只见上面刻着“毛四端”3个字，他深情地说：

“这是我太公的名字。那时候我们家还比较穷，这是我太公的唯一遗产。”

回到住所，毛泽东还沉浸在对父母的怀念中，他对罗瑞卿说：

**“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迷信什么鬼神。但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党、同志、老师、朋友也，还得承认。我下次回来，还要来看他们二老。”**

6月26日下午，应邀到松山1号寓所吃晚饭的毛泽连和爱人张玉莲，在滴水洞附近正好遇上去韶山水库游泳的毛泽东，毛泽连连忙喊了一声：

“主席三哥。”

毛泽东抬头见是毛泽连，便上前和他握手。毛泽连指着妻子介绍道：

“主席三哥，这是我的堂客，叫张玉莲。”

毛泽东又向张玉莲伸出手去，笑呵呵地对毛泽连说：

“哦，这是你的爱人，我们还没见过面呢。”

张玉莲握着毛泽东的手，十分激动，不知说什么好，只是喊了一声：“主席！”

“主席伯伯好！主席伯伯好！”

毛泽连的儿子毛岸平跑到毛泽东跟前连声喊着。毛泽连生有一对儿女，老大就是这个男孩，叫毛岸平，老二是个女孩，叫毛小青。毛泽东见是一个挺机灵的孩子在喊他，非常高兴。张玉莲连忙介绍说：

“这是我的细崽。这小家伙好调皮，我本来不让他来打搅您，可他‘蛮’得打滚，非要来！”

毛泽东哈哈大笑，连声称赞道：

“好，好！**他动了武的。胆子大，‘蛮’得打滚是他的‘核武器’，会有出息！”**

说罢，他叫毛泽连夫妇等一会儿，等他游了泳回来再一起去松山吃晚饭。

下午3点多，毛泽东兴致勃勃地来到韶山小水库坝上，走进右端的简易更衣棚换好衣服，从右边石阶上走到离坝基2米远的水边。他看到有人往水里丢救生圈，就说：

“不要依靠它。”

说罢，便跳入水中，几个运动员也随之跳下。毛泽东从右端踩水往水库中间游去，又用仰泳和潜水的方式，绕水库游了一周。站在左岸坝基上的群众见毛泽东游过来了，激动得高呼：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毛泽东伸出手向岸上的乡亲们挥手致意。他一边自由自在地游着，一边还向乡亲们打招呼：

“都下来游泳啊！”

乡亲们有的摇头，有的说：

“我们不会啊！”

“不会就学呀！”毛泽东指着身边的运动员，冲着岸上说：“他们都喜欢蛙式、蝴蝶式，我给你们表演一个新名堂！”

他转身对旁边的运动员们说：

“我当你们体育教师好不好？”

运动员们伸出手鼓掌：

“太好了，太好了！”

毛泽东说：

“你们会蛙泳蝶泳，我不会这些。我只会立正稍息这些基本动作，困觉坐凳子这些日常生活。”

说罢，他就来了一个立正姿势。只见他把手脚并拢，停在水里一动不动，水只到口边。运动员们也试着做，可是办不到，就说：

“主席，我们不行。脚一并拢，手就要动一动。手若不动，脚就得动一动。否则就会往下沉。”

毛泽东解释说：

“脚并拢好像一块木板，放在水里就不会沉下去了。”

他边说边做示范，又对岸上的乡亲们说：

“你们每人都要困觉，我困觉给你们看看。”

说着，把双手放在胸前，仰浮在水面上一动不动，就像躺在床上睡觉歇息一样，舒坦轻松。

“困觉还要翻身。”毛泽东又做出一个翻身的动作，又说：“起来还要坐。”

他立起身子，将右腿放在左腿上，就像坐在凳子上一样，稳当从容自如。他还让人给他点燃了一支香烟，悠然地吸着。运动员们跟着毛泽东学着做了一番动作，游到他面前说：

“主席，我们做睡觉的动作还基本可以，就是这立正、稍息、坐凳子的姿势，还差点火候。”

毛泽东爽快地笑了起来，他说：

“当兵要从立正稍息学起，游泳也得从这里学起。你们以后好好地去研究研究，锻炼锻炼吧。”

岸上的乡亲们看着毛泽东在水中是如此的潇洒，又是赞叹，又是高兴，笑得合不拢嘴。毛泽东一直畅游了两个小时这才上岸。他依然兴致很高，对身边的许多年轻人说：

“你们青年人以后要很好地锻炼身体，才能当好革命的接班人。”

他突然转对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说：

“小舟，咯个地方倒很安静，我退休后，在这儿给我搭个茅棚好吗？”

周小舟连连点头称是。后来，他立刻将毛泽东的这一想法告诉了中南局书记陶铸。

太阳落山的时候，毛泽东从韶山水库回来了，毛泽连夫妇乘坐他的车来到松山寓所。毛泽东同前来的乡亲们一一握手，他说：

“30年没见你们了，我是来看望你们的。”

当他握着毛照秋的手时，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我好像见过你。”

毛照秋连忙说：

“三叔，我是毛照秋，我小时候见过您呀！”

毛泽东高兴地说：

“你就是旭梅的儿子？照秋贤侄啊！”

他想起1953年毛照秋曾写信请求帮助介绍工作的事，就说：

“对啦，1953年我回过你的信。”

毛照秋说：

“是啊！您还勉励我安心在南方工作，保持前辈的光荣传统哩。”

毛泽东又询问起堂弟毛泽连的家庭生活：

“你们家里有盐、有油吗？”

张玉莲回答说：

“油盐还不大足。”

“粮食够吃吗？”

“不够。”

**“看来，粮食要分到户才行。**你们可以多种些玉米，今后生活会好些。”

毛泽东说完，叫在座的乡亲们提提意见。开始，大家都不敢讲，担心被扣帽子，挨批斗。经毛泽东再三动员，人们才胆大了。

据王任重回忆说：“其中一位老年人批评了我们湖北‘亩产万斤’的报道，他说亩产千斤也做不到。我告诉老人家，亩产万斤确实是谎报，但有少数高产田亩产千斤是真的。老人家还是摇头。”

又有人说：

“主席，你还不回来，人都要饿死了。”

毛泽东听了，颇有感慨地说：

**“我在中央不了解下面的情况，今天回来了，才了解到真实的情况，你们都要讲真话。”**

毛华村打着一双赤脚来了，见到毛泽东非常激动，他说：

“毛主席，我是一双赤脚来见您，对不住啊！”

毛泽东笑着说：

“没关系，随便一点好。”

他当即叫工作人员拿出自己的一双皮鞋，送给毛华村穿。

毛华村是韶山杨林炉门前罗鹤楼的三女婿。毛泽东询问他的爱人是什么时候去世的？有几个子女？家里生活怎么样？毛华村便将原配罗氏病逝于1936年7月，生有一子二女，以及现在的家庭生活情况，一一告诉了毛泽东。

眼看天色不早了，毛泽东发现亲属中没有他记挂着的毛碧珠，就问道：

“碧珠怎么没有来？”

旁边的地方干部没有回答，也不好回答。

“毛碧珠怎么没有请来？”

毛泽东盯着问。还是没有人回答。

“我让你们请我的亲属朋友，为什么毛碧珠没有人去请他？”

“碧珠划了富农。”

乡干部终于开口了。

“富农又怎么样？”毛泽东生气了：“他是我的堂弟，他还能害我吗？你们一定要去把他找来。”

毛碧珠终于来了，当他步履蹒跚地走过来时，毛泽东一时竟未能认出他。

“主席，三哥，我是老五碧珠呵！”

“你是五弟？！”毛泽东看着毛碧珠，走上一步，深情地拉着他的手说：“你也老了呵，瘦多了呀！”

说罢，拉毛碧珠坐在自己身边的椅子上，详细询问了他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经历，又问及他的妻子儿女情况。

“地方干部对你怎么样？”

毛泽东很关心这一点。毛碧珠很有分寸地说：

“他们没有把我当富农看。”

毛泽东望着这位堂弟，摇了摇头，说：

“我看你这个富农可划可不划。现在已经划了，你有什么意见？”

“没有意见。”

毛泽东把手伸过去，拉着毛碧珠那干枯的手，动情地说：

“你也老了，身体也不大好，不要再去劳动了。告诉你的后人，听党的话，噢。”

浑浊的泪水从毛碧珠的眼眶里流了下来，毛泽东的眼眶也湿润了。

该吃晚饭了，毛泽东与毛泽连、毛宇居、毛碧珠、沈绍华及毛福轩烈士的夫人贺菊英同桌。张玉莲则坐在邻近的餐桌上。毛泽东对贺菊英说：

“毛福轩同志为革命牺牲是光荣的。”

他要毛华村同坐一桌，给他夹了一块青蛙肉，说：

“请你吃田鸡。”

“田鸡是什么？”

毛华村问。毛泽东用地道的韶山话说：

“这田鸡就是麻蝈。”

一句话引得大家都笑了。

饭后，毛泽东叫毛泽连、张玉莲夫妇和大伙儿到坪里一起合影留念。毛泽连多喝了两杯酒，一副跌跌撞撞的样子，妻子张玉莲不得不扶着他坐在长凳上，自己则站在他的身后。照完相，毛泽东对张玉莲说：

“我还有事，还要开座谈会。你们坐我的车回去吧。”

于是，工作人员就把毛泽连夫妇送回了东茅塘。

据王任重回忆说：“饭后，毛主席又和我们3人（另两位是周小舟、华国锋——笔者注）谈了很久，谈了关于读书的问题，他说要读马列主义，还要读点历史，读些古诗词。谈到经济工作，他强调计划工作必须搞综合平衡，经济建设必须鼓足干劲，又要实事求是，管理国家和管理家庭一样，要精打细算。”

6月27日上午，毛泽东要在松山招待所1号寓所举行座谈会。他见到了工作人员刚刚接来的毛宇居的夫人谢素贞，凝神片刻，问道：

“你是——？”

旁边有人介绍说：

“她是宇居先生的老婆。”

毛宇居捋着花白的胡须，朝毛泽东笑着说：

“是，是。”

“噢，你就是大嫂子！”

毛泽东高兴地说。谢素贞也喊了声：

“毛主席，润之！”

二人亲切地握着手，毛泽东笑着说：

“大嫂子，几十年不见，你老了，我也老了啰。你家里怎么样？身体还好吧？”

“还好，身体也过得去。”

毛泽东点点头，嘱咐道：

“年纪大了，好好休养吧，今后家务事少做一点。我昨天还跟宇居大哥说了，请你们好好保重身体，争取多活一些年。”

“谢谢主席。”

谢素贞非常感激地说。此时，毛泽东还特意派人把外婆家的人也接了来。他开玩笑说：

“今天该请的都请到了，就差那位‘石干娘’还没来，是不是还等一等？”

众人闻言，都笑了起来。大家知道毛泽东所说的“石干娘”，就是他外婆家的那一块观音石。毛泽东见到表兄文南松的长子文孝根和他的妻子毛枚秀，他握着毛枚秀的手问：

“你的父亲是谁？”

毛枚秀说：

“我父亲叫毛德青。”

毛泽东说：

“你是德青大阿公的女儿，那我要叫你姑母啰！”

毛枚秀莞尔一笑，说：

“不敢，不敢！”

毛泽东又问了一声：

“你现在住哪里？”

毛枚秀说：

“住棠佳阁，我是文二十阿公的大媳妇。”

毛泽东的外婆家唐家圫，后来改名为棠佳阁。毛泽东闻言，笑着说：

“那你要叫我表叔啰！我们都不称呼了，平了平了，好吗？”

毛泽东见到赤着脚、挽着裤管、腿上沾有泥巴的30多岁的农民毛霞生，一问才知道他是毛福村的儿子，就笑着说：

“你小时候，我还抱过你哩！”

毛泽东看看邀请的人都到齐了，就开始在松山招待所和这些为革命做出贡献的老人和乡亲们座谈，他说：

“我离开韶山30多年了，难得回来一次，今天请大家来，很想听听各位的意见，特别想请你们老人对我提点意见。你们对当地政府有什么看法和意见，对生产生活安排有什么意见和建议，甚至对我本人有什么意见，都放心讲，不要有顾虑。”

他还对干部们说：

“你们当干部的要关心群众生活，搞好生产，把韶山建设好。韶山是我的家乡，外宾常来，不能丢人。如果韶山搞不上去，生活不好，也会影响社会主义国家的声誉。”

临散会，毛泽东诚恳地对大家说：

“以后你们每年向中央汇报两次韶山的情况。也要了解周围地区的情况，及时向中央汇报。”

座谈会结束后，毛泽东请大家吃午饭。他在为自己在私塾里的启蒙先生毛宇居敬酒时，毛宇居说：

“主席敬酒，岂敢，岂敢！”

毛泽东接着说：

“敬老尊贤，应该，应该！”

饭后，毛泽东要与父老乡亲们合影留念。他对谢素贞说：

“大嫂子，我，你、宇居大哥，还有几位乡亲，一起合个影吧。”

毛泽东站在乡亲们中间，谢素贞就站在他身边。她双手交叉在胸前，满怀敬意的侧身仰视着毛泽东，脸上洋溢着一种无比的幸福。站在同一排的还有毛宇居、杨舜琴、毛仙梅、毛裕初、贺福祥。

毛泽东又将外婆家的人请到身边，叫住摄影师，说：

“请给我和外婆家的人照一张相。”

欲知毛泽东离开韶山后去向何处？请看下一章详细分解。

东方翁曰：毛泽东“衣锦还乡”一节，值得仔细玩味！他在离开家乡32年之后回归故土，与亲朋邻里之间那种亲情，鱼水之情，无不情真意切，堪为后世楷模！笔者历来主张，我们后人在评价毛泽东的时候，应该承认他是人而不是神，他是凡人同时也是伟人！这才是对毛泽东的准确定位。因此也可以说，在毛泽东身后，不管是神化他或者是贬低、污蔑、反对他，同样都是站不住脚的。

**第71章**

**“要编3本书让他们读。第1本是关于好人好事的书。收集去年大跃进中**

**敢于坚持真理、不随风倒，工作做得好，不谎报，不浮夸，实事求是的例**

**子。第2本是关于坏人坏事的书。专门收集说假话、违法乱纪，或者工作**

**中犯了严重错误的例子。第3本是中央从去年到现在的各种指示文件。”**

话说1959年6月27日下午，毛泽东离开韶山，乘专列飞驰在湖南的旷野中，行至一山峦处，他吩咐列车停下来，下了车，凝神四望，向着一个小石岗走去。

铁道路基下有一条小路，毛泽东没有走那条路，而是踏着野草碎石向那座石岗走去。前面出现了带刺的荆棘，走在后边的一部分工作人员走上了小路。跟在毛泽东身后的卫士和胡秀云犹豫了，他们怕弄坏裤子。胡秀云说：

“主席，那边有路，走那边吧？”

毛泽东头也不回地说：

“路是人走出来的。我这个人哪，从来不肯走回头路。”

胡秀云只好自己选择了那条小路。毛泽东望望她的背影，又望望身边的卫士，问：

“你们怎么办？”

卫士们说：

“我们跟主席走！”

毛泽东把大手一比划，说：

“那好，我们就试一试。”

说罢，他带头前行。过了那座石岗，他对从小路上过来的人们说：

“你们说说，咱们谁的收获大？”

到了长沙，毛泽东给在武汉的周恩来打电话，商量庐山会议召开的具体问题，他说：

“人们的头脑有些发热，需要冷静下来学点政治经济学。这次会议不要搞得太紧张，要适当注意休息。”

毛泽东还告诉周恩来，他出了一些题目让与会者讨论。

6月27日晚，毛泽东让华国锋把杨开慧的兄嫂杨开智、李崇德，柳直荀烈士的遗孀李淑一，国民党元老唐生智、程潜、曹曲球以及他的老同学周世钊接来，请他们吃饭。李淑一握着毛泽东的手激动地说：

“主席，你还记得我？你给我的《蝶恋花》我可忘不了。”

毛泽东笑着点点头，对身边的柯庆施、华国锋等人说：

“她就是李淑一，是开慧的好朋友。她前年把悼念直荀的词寄给我看，我就写了《蝶恋花》这首和她，完全是按她的意思和的。”

吃罢晚饭，李淑一说：

“主席，我们合一张影么。”

毛泽东说：

“那好么，一起照个相吧。”

李淑一等人分站在毛泽东左右，毛泽东朝周惠等招招手，说：

“一起来。”

周惠便拉了罗瑞卿、华国锋等人过去，一道照了相。

6月27日夜，毛泽东到了武昌。

6月28日，毛泽东再一次畅游了长江。

这天下午，毛泽东从汉口乘“江峡”号轮船离开武汉，驶向九江。毛泽东在轮船上召集上庐山开会的各协作区负责人柯庆施、李井泉、王任重、林铁、欧阳钦、张德生等人谈话，提出了庐山会议要讨论的14个问题，要大家议一下。这14个问题是：1、读书。高干读《政治经济学》、《党的政策》和地县自编《好人好事》、《坏人坏事》。2、形势。好转没有？何时好转？3、今年的工作任务。4、明年的工作任务。5、4年的任务（“五年计划”的框子）。6、当前的宣传问题。7、食堂问题。8、综合平衡。9、**工业、农副业中的群众路线。**10、国际形势。11、生产小队的半核算单位问题。12、基层党团组织领导作用问题。13、粮食三定政策。14、**如何过好日子？**

这天晚上，轮船到达庐山脚下的九江，已经是11点半了。

6月29日一大早，毛泽东一行乘车和迎接他们的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及夫人水静，开始上庐山。

庐山南接江西省九江市，东临鄱阳湖，北濒长江，共有99个山峰，其主峰汉阳峰又叫大汉阳峰，海拔1474米。苏轼的著名诗句“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道出了庐山的雄奇秀丽。庐山一年四季风景如画，凉爽宜人。

毛泽东是第一次到庐山，虽然一路风尘，但毫无倦意，情绪很好。他在山下眺望着巍峨的山势，欣赏这“匡庐奇秀甲天下”的无限风光。他身边的一位也是初来庐山的工作人员好奇地问：

“到处是云彩，山在哪里呢？”

毛泽东笑着吟诵道：

“山在云雾飘渺间。”

他又转对杨尚奎和水静说：

“庐山，山好，水好，空气好，还有老表好！”

解放后，庐山上新修了公路，长约30余公里，汽车只可单行，依山环绕，盘旋而上。毛泽东乘车行了1个多小时才到了山腰，稍事休息，继续上山。

毛泽东在中途登上了含鄱口，瞭望鄱阳湖。大家要给毛泽东照相，负责保卫工作的沈同，给毛泽东梳理被风吹乱的头发。此时，有人正在拍照，毛泽东一看照相机的镜头还没有揭下盖子，就说：

“你看，她的盖子还没有揭开嘛。”

大家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一个工作人员说，今天的风这么大，该选个风和日丽的日子来就好了。毛泽东说：

“不对，你就是喜欢日暖风和的日子，好来游山逛景。温室里的苗苗经不起风吹日晒。在狂风烈日下登山观海，可以锻炼身体，开阔胸怀，长人志气，这也是练兵嘛。这和人们每天要吃饭睡觉和参加文娱活动是一个道理，都是为了强健身体，磨练意志，增长知识，好养精蓄锐，振作精神，继续为人民服务嘛。”

上了庐山，毛泽东下榻于180号院。他坐在柳条椅上，凝视群山，颇有感触。当晚草成《七律·登庐山》一首。

6月30日清晨7时许，毛泽东吃过早饭后，在180号院的阳台上和工作人员聊天，他对水静说：

“水静啊，我身边几个小伙子你都见过了，都是不错的，总想选择个漂亮点的。帮帮忙吧？”

水静说：

“行啊。就怕你的小伙子看不上呐，都长得这么精神。”

“小封，找个老表好不好啊？”毛泽东转向封耀松问，他又对水静说：“帮他找一个吧，你这儿的老俵很多么。”

叶子龙、李银桥也跟着起哄，他们说：

“好啊，江西老俵好啊，拉一个出色的来谈谈看吧。”

水静想了想说：

“你们180号楼里的小郑好不好？她叫郑义修，是省医院的护士。能上庐山服务的，都是选了又选，方方面面都优秀才行。”

毛泽东笑着说：

“我看也很好，水静，你就当个红娘吧。”

他又交代封耀松说：

“小封，就这样吧，接触接触看。”

后来封耀松还真的和小郑谈成了，在1961年结成了伉俪。

且说毛泽东见山上的管理员来了，自称余三保，就叫他坐下来聊一会儿。余三保是庐山的一级管理员，负责毛泽东的生活接待。他向毛泽东介绍了庐山的自然景观和名胜古迹。他说：

“庐山不仅是天然避暑胜地、疗养区，还是著名的风景区，名胜古迹多达200多处，而且还发现有铁云母、石英等10多种矿藏，前几年曾炼出不少钢铁。”

毛泽东笑着对余三保说：

“庐山是个宝贝，你在宝山工作，应该叫‘宝山’。叫‘三保’没什么意义。”

余三保听毛泽东这么一说，欣然接受，改名为余宝山了。他接着向毛泽东介绍起庐山名称的由来。他说，庐山又叫匡庐，是因“周文王时有匡姓7人，在此山结庐隐名”而得名。毛泽东认真地听着余宝山的介绍，二人不知不觉谈了一个多小时。

6月30日，毛泽东同周小舟谈话，他问：

“周惠那个农业会议结束了没有？”

周小舟说：

“今天结束。”

“叫他马上来庐山。”

“他感冒了。”

“感冒死不了人。”

毛泽东叫来秘书徐业夫，说：

“你给湖南挂个电话，叫周惠上山，通知江西省委接一下。”

1959年7月1日，毛泽东起床后见到余宝山，对他说：

“你昨天讲的周文王，我看是周定王吧！”

余宝山听了不禁一愣，他回去查阅《庐山志》，果真是周定王。余宝山没有想到，一个人民的领袖对这些细微末节的事情，竟然也调查研究得如此认真准确。

7月1日这一天，毛泽东改就《七律·登庐山》一诗。据随身人员记述，毛泽东在诗前曾写有小序云：

1959年6月29日登庐山，望鄱阳湖、扬子江，千峦竞秀，万壑争流，红日方升，成诗八句：

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

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

有一种说法7、8两句原来是：“陶潜不受元嘉禄，只为当年不向前”，后来在发表时改为陶令句。

这个时候，毛泽东的大女儿李敏刚毕业不久，要结婚了。可是，没有布票，没有工业券，再加上没有妈妈给她操心，毛泽东又不在家，她和未婚夫孔令华不知道该准备什么。罗光禄的爱人刘若风叫李敏跟爸爸说说，李敏很懂事，她说：

“小事情不要麻烦爸爸了。”

可是，李敏左等右等爸爸就是不回来，就给爸爸挂了一个电话。毛泽东说，现在回不去。李敏急了，就在电话中说：

“你那么大架子，请不回来，我们不等了。”

据李敏回忆说：毛泽东为这事几次让卫士长李银桥打电话给她说：婚期要推迟，一定要等爸爸返京后举行。毛泽东还亲自写信给她，要她注意身体，说会议结束后即刻返京。

7月2日下午4点，毛泽东约上了山的周惠谈话。周惠来到毛泽东的住室，报告说：

“主席，我来了。”

毛泽东正在吃饭，说：

“噢，来得好，来来，一道吃饭。”

“主席，我吃过了。”

“噢，我这个时间跟你们不同了。不吃饭就喝点酒。”

“我不会喝，一喝就上头。”

毛泽东说：

“你呀，是个老实人。说说吧，湖南的会开得怎么样？”

周惠“嗯”了一声，说：

“这次会开得还可以。我们也是先议了议形势，要求大家讲实话。这样算下来，去年还是估产过高了。报增产一成，谭老板给我们插了白旗，有些干部沉不住气，说报低了通不过。”

毛泽东说：

“谭震林没种过地，工人出身。”

周惠说：

“今年也报高了。上海会议加到450亿斤，大家议论，实际能争取300亿斤就不错了。”

毛泽东说：

“在韶山我问小舟，湖南提什么口号？他说：‘苦战3年，改变湖南面貌’。我说你30年也改变不了。那里的梯田，一季五六百斤就不得了，每年增产100斤，30年也没有万斤田呀。”

周惠说：

“郑州会议以后，形势逐渐好转。但问题并没有解决完。”

毛泽东说：

“就是去年那七八个月，特别是北戴河会议之后的3个月。到11月开始纠正。”

周惠说：

“虽然是3个月，影响怕长得多，也许要3年。下面的干部都反映农民怕变，怕再刮‘共产风’。现在多数公社还是大食堂，供给制。农民并不自愿，但上面不讲话，下面不敢动作。劳动积极性不高与供给制过大有关。湖南的意见，现在的条件供给制不能再搞了。去年没搞的公社，今年不能再搞。去年搞了的，今年要缩减。大办食堂这个提法不能再讲了，浪费太严重。”

他说罢，将带来的材料递给毛泽东，接着说：

“主席，这是大家对食堂的议论，绝大多数同志都是主张自愿为主，不能再硬性规定，强办下去。”

毛泽东“唔”了一声，接过材料，放在一边，说：

“公共食堂要自愿参加，但也不要一哄而散。对群众的积极性不要泼冷水。要团结，不要过于看重1个指头，2个指头，3个指头的问题。”

他放下筷子，又说：

“就这样吧。这次上庐山，要读书，不要事务主义。要看大局，算大账。”

7月2日这天下午，毛泽东在江西省庐山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第1次庐山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李先念、李富春、彭德怀、谭震林、张闻天、罗瑞卿、陆定一、陶鲁笳、柯庆施、李井泉、张德生、林铁、欧阳钦、陶铸、王任重、曾希圣、周小舟、周惠、杨尚奎、康生、陈伯达、杨尚昆、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李锐等。

彭德怀是在这一年的4月24日至6月13日率领军事代表团先后对苏联及东欧各国进行了50多天的访问，他原先不准备参加会议，毛泽东打电话要他来，他就只好上了山。

毛泽东在会议上首先就将要讨论的14个问题发表了意见。他在讲话中，在原来提出的14个问题以外，又增加了5个：1、团结问题（中央至县委）。2、农村初级市场的恢复问题。3、体制问题，即收回财权、人权、政权、商权，由中央和省市两级控制，反对无政府主义。4、协作关系问题。5、加强工业管理和提高产品质量问题。

会议决定：庐山会议采取先分后合的办法，开几天分组座谈会，讨论19个问题，尔后用两三天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必要的文件。

会后，毛泽东在6月29日来庐山途中和在这次会议上的两次讲话，整理成一个讲话记录，去掉了国际形势部分，这就成了庐山会议要讨论的18个问题。毛泽东要杨尚昆印发会议，全文如下：

一、读书。有鉴于去年许多领导同志，县、社干部，对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不大了解，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有鉴于现在工作中还有事务主义，所以应当好好读书。8月份用一个月的时间来读书，或者实行干部轮训。不规定范围，大家不会读。中央、省、市、地委一级委员，包括县委书记，要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时间3至6个月，或者一年。去年郑州会议提出读3本书，问读了没有，说是读了一点，读得不多，有的自己也没有读。对县、社干部，山东、河北的想法，**是给他们编3本书:一本是好人好事的书，收集去年大跃进中敢于坚持真理、不随风倒，工作有前进的，不说谎、不浮夸、实事求是的例子，例如河北王国藩，山东菏泽一个生产队。一本是坏人坏事的书，收集专门说假话的、违法乱纪的或工作中犯了严重错误的例子。每省要找几个，各省编各省的，每本不超过二万五千字。第3本是中央从去年到现在的各种指示文件（加上各省的），有系统地编一本书**。3本书大体10万字左右，每天读一万多字，一星期可以读完。读完后讨论，不仅读，还要考试。县、社党委成员能读政治经济学的也可以读。设法给县、社党委每年有一个系统思考问题的时间。**我们提倡读书，使这些同志不要像热锅上的蚂蚁，整年整月陷入事务主义，搞得很忙乱，要使他们有时间想想问题。现在这些人都是热锅上的蚂蚁，要把他们拿出来冷一下**。去年有了一年的实践，再读书会更好些。学习苏联，要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教科书有缺点，但比较完整。缺点如第一章讲和平过渡，通过议会夺取政权，哪有那回事？在西藏都不可能，一定要有武装。他们的缺点我们不要去学，但在去年，把苏联一些好的经验也丢了。

二、形势。国内形势是好是坏？大形势还好，有点坏，但还不至于坏到“报老爷，大事不好”的程度。八大二次会议的方针对不对？我看要坚持。总的说来，像湖南省一个同志所说的，是两句话：“有伟大的成绩，有丰富的经验。”“有丰富的经验”，说得很巧妙，实际上是：有伟大的成绩，有不少的问题，前途是光明的。基本问题是:（一）综合平衡；（二）群众路线；（三）统一领导；（四）注意质量。**4个问题中最基本的是综合平衡和群众路线。要注意质量，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全些，各种各样都要有。**农业中，粮、棉、油、麻、丝、烟、茶、糖、菜、果、药、杂都要有。工业中，要有轻工业、重工业，其中又要各样都有。**去年“两小无猜”（小高炉、小转炉）的搞法不行，把精力集中搞这“两小”，其他都丢了。**去年大跃进、大丰收，今年是大春荒。现在形势在好转，我看了4个省，河北、河南、湖南、湖北，大体可以代表全国。今年夏收估产普遍偏低，这是一个好现象。

今年这时的形势和去年这时的形势比较，哪个形势好？去年这时很快地刮起了“共产风”，今年不会刮，比去年好。明年“五一”可以完全好转。去年人们的热情是宝贵的，只是工作中有些盲目性。有人说，你大跃进，为什么粮食紧张？为什么买不到头发夹子？现在讲不清楚，促进派也讲不清楚。说得清楚就说，说不清楚就硬着头皮顶住，去干。明年东西多了，就说清楚了。

去年许多事情是一条腿走路，不是两条腿走路。我们批评斯大林一条腿走路，可是在我们提出两条腿走路以后，反而搞一条腿了。在大跃进形势中，包含着某些错误，某些消极因素。现在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包含着有益的积极因素。去年形势本来很好，但是带有一些盲目性，只想好的方面，没有想到困难。现在形势又好转了，盲目性少了，大家认识了。

三、今年任务。

四、明年任务。

五、4年任务。工、农、轻、重、商、交方面，过去是两条腿，后来丢掉了一条腿，重工业挤掉了农业和轻工业，挤掉了商业。如果当时重视一下农业、轻工业就好了。这几方面到底如何搞法？建设如何安排？

今年钢的产量是否定1300万吨？能超过就超过，不能超过就算了。今后应由中央确定方针，再交业务部门算账。粮食有多少？去年增产有无三成？今后是否每年增加三成？每年增加一千亿斤，搞到一万亿斤，要好几年。明年钢增加多少？增加400万吨，是1700万吨。后年再增加400万吨。**15年内主要工业产品的数量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还要坚持。**总之，要量力而行，留有余地，让下面超过。人的脑子是逐渐变实际的，主观主义减少了。**去年做了一件蠢事，就是要把好几年的指标在一年内达到，像粮食的指标一万零五百亿斤，恐怕要到1964年才能达到。**

过去安排是重、轻、农，这个次序要反一下，现在是否提农、轻、重？要把农、轻、重的关系研究一下。过去搞过十大关系，就是两条腿走路，多快好省也是两条腿，现在可以说是没有执行，或者说是没有很好地执行。过去是重、轻、农、商、交，现在强调把农业搞好，次序改为农、轻、重、交、商。这样提还是优先发展生产资料，并不违反马克思主义。重工业我们是不会放松的，农业中也有生产资料。如果真正重视了优先发展生产资料，安排好了轻、农，也不一定要改为农、轻、重。**重工业要为轻工业、农业服务。**过去陈云同志提过：先市场，后基建，先安排好市场，再安排基建。有同志不赞成。现在看来，陈云同志的意见是对的。要把衣、食、住、用、行5个字安排好，这是六亿五千万人民安定不安定的问题。安排好了之后，就不会造反了。怎么才会不造反？就是要使他们过得舒服，少说闲话，不骂我们。这样有利于建设，同时国家也可以多积累。赞成成立第三机械工业部，来管农业机械，搞农业机械设计院。现在这些事谁也不管，这么大个国家，没有人管不行。过去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反“左”倾时我曾说过，“炮是要打死人的，人是要吃饭的，路是要脚走的”。现在炮没有了，第二条、第三条还有，如果忘记了这些，不好办事。现在讲挂帅，第一应该是农业，第二是工业。

饲料要有单独的政策。现在是人吃一斤，牲口吃半斤；过一段，要人吃一斤，牲口吃一斤；再过一段，要人吃一斤，牲口吃两斤，牲口吃的要逐渐比人多。

**农业问题:一曰机械，二曰化肥，三曰饲料。农、轻、重问题，把重放到第三位，放四年，不提口号，不作宣传。**工业要支援农业，明年需要多少化肥、多少钢材支援农业，这次会议要定一下。粮食去年说增产三成，是否达到四千八百亿斤，我还有怀疑。今年说不增加了，我看增点还是可能的。以后每年增一千亿斤，1962年达到八千亿斤。

明年钢的指标是1700万吨，形成一个马鞍形。今年是1300万吨，比去年多400多万吨。后年2000万吨，大后年2100万吨到2300万吨，可以赶上英国。1962年2500万吨，可能少点，也可能多点，多了到2800万吨，少了到2300万吨也好。**赶上英国，说的是主要产品，钢太多了不一定好。**

积极性有两种：一种是实事求是的积极性，一种是盲目的积极性。红军的三大纪律，现在有两条还有用：“一切行动听指挥”，即统一领导，反对无政府主义；“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即不搞一平二调。**总的说来，群众生活提高了，文化水平也提高了。**共产主义风格有两种：一种是真要搞共产主义；另一种，这种占多数，是事情归他办，权力都归他，他就说是“共产主义”，归人家就是“资本主义”。山东曹县出现抢粮现象，这很好，抢得还少了，抢多了可以引起我们的注意。对那些摧残人民积极性的官僚主义就是要整一下。我们的国家是不会亡的，社会主义是亡不了的，蒋介石是回不来的。美国打来，我们最多退到延安，将来还会回来的。

六、宣传问题。去年有些虚夸，四大指标定高了，弄得今年不好宣传，现在有些被动。如何转为主动？上海会议时，有人提出，利用开人民代表大会的机会，把指标改了，后来没有这么做。现在看来失掉了点时机，但不要紧。指标改不改？看来改一下好。但改成多少，还拿不准。是否人大常委会开个会，把指标改过来。粮食是否以后不公布绝对数字，可以学习苏联，不宣传粮食指标。今后钢不算小转炉的，铁不算土铁。

七、综合平衡问题。**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主要缺点是没有搞平衡**。说了两条腿走路、并举，实际上还是没有兼顾。在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

有3种平衡：农业内部农、林、牧、副、渔的平衡；工业内部各个部门、各个环节的平衡；工业和农业的平衡。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是在这些基础上的综合平衡。

八、群众路线问题。群众路线有没有？有多少？

九、工业管理问题。特别要强调质量问题，能否在很短时间内解决？应该争取在一二年内解决。

十、体制问题。“四权”下放多了一些，快了一些，造成混乱，有些半无政府主义。要强调一下统一领导、集权问题。下放的权力，要适当收回，收回来归中央、省市两级。对下放要适当控制。反对无政府主义，不是说现在是完全无政府主义，而是说有些半无政府主义。说得过死不好，过活也不好。现在看来，不可过活。

十一、协作关系。划区协作，倒把原来的协作关系打乱了，搞了大的，挤了小的。**搞体系，工厂要综合发展，公社要工业化。**

十二、公共食堂。要积极办好。**按人定量，分粮到户，自愿参加，节余归己。**吃饭基本上要钱。在这几项原则下，把食堂办好，不要一轰而散，都搞垮了，保持百分之二十也好。

办食堂全国有两种办法：一为河南的积极维持，一为湖北的提倡自愿。湖北的基本解散了，有的未散，暂时回去了。湖北拟从少到多，开始30%至50%，将来达到80%。食堂要小，形式要多种，供给部分要少些，三七开或四六开，可以灵活些。食堂和供给制是两回事。

十三、学会过日子。**包括农村、城市，要留有余地，富日子当穷日子过，增产节约。**湖北是穷日子当富日子过了，农民批评有些干部，一不会生产，二不会过日子。应当把富日子当穷日子过。有些地方生产不见得比别处多多少，但只要安排得好，日子好过。今年不管增产多少，估计增产一点，还是按去年四千八百亿斤或者再少一些的标准安排过日子。口号是：**富日子当穷日子过。**

十四、三定政策。定产、定购、定销，群众要求恢复，看来是非恢复不可。政策3年不变，定多少，这次会议要定一下。增产部分四六开，征四留六，有灾照减。自留地不征税。

十五、恢复农村初级市场。

十六、使生产小队成为半核算单位。四川省的同志说，生产、分配在一个核算单位较好，现在改，影响生产，如何办？

十七、农村党的基层组织领导作用问题。基层党的活动削弱了，党不管党，只管行政。

十八、团结问题。**要统一思想，对去年的估计是：有伟大成绩，有不少问题，前途是光明的。缺点只是一、二、三个指头的问题。**许多问题是要经过较长的时间才看得出来的。过去一段时间的积极性中带有一定的盲目性。这样看问题，就能鼓起积极性来。

7月3日凌晨1时，毛泽东在入睡前服了安眠药，半靠在床上批阅李先念为中央起草的关于在大中城市郊区发展副食品生产的指示稿，他在上面加了两段话，其中一段是这样写的：

“**所谓农者，指的是农林牧副渔五业综合平衡。**蔬菜是农，猪牛羊鸡鸭鹅兔等是牧，水产是渔，畜类禽类要吃饱，才能长起来，于是需要生产大量精粗两类饲料，这又是农业，牧放牲口需要林地、草地，又要注重林业、草业。由此观之，为了副食品，农林牧副渔五大业都牵动了，互相联系，缺一不可。”

7月3日，庐山会议进入分组讨论阶段，与会者分为东北、华北、西北、华东、西南、中南6个小组。大家在小组会议上摆情况，谈意见，发言十分热烈。

被分配在西北组的彭德怀住在河东路176号院，刚离任的驻莫斯科大使张闻天住在177号院，两院相距不过50米。彭德怀下去散步或者到会场开会，常常碰到张闻天，两人免不了要聊上几句。

“你们那组讨论得怎么样？”

张闻天这一次问起了西北组的讨论情况。彭德怀浓眉紧锁，阴沉着脸说：

“唉，还不是遮遮掩掩不痛快。裤子要自己脱，不要人家拉嘛。江西现在还讲去年增产67%。脱了外裤留了衬裤，不肯脱光，自己给自己找被动！”

张闻天说：

“我们那边会议压力大，柯庆施护得厉害，只能讲好，不能讲坏。”

彭德怀说：

“我们西北小组情况还好。”

张闻天说：

“1958年小土群炼铁，浪费人力物力太大，影响秋收，结果是丰而不收。”

彭德怀说：

“炼土铁，我看是有得有失，或有失有得。”

张闻天摇摇头说：

“你的估价还比较高。我认为是得不偿失或损失很大，今年钢产量定1300万吨很难完成。”

彭德怀没有吭声，张闻天又说：

“**现在有些意见不好提，集体领导搞不起来。政治局扩大会议，连我们这些人都不知道要怎么开法？主席很英明，但整人也很厉害，有些方面跟斯大林晚年差不多。主席爱讲历史，他从中国历史学了不少好东西，但也学了些统治阶级的权术。”**

彭德怀说：

**“上海会议毛泽东批我。他自己犯了错误不认账，不检讨，反而责备别人。被胜利冲昏了头喽！骄傲嘛！”**

7月4日晨，毛泽东指示杨尚昆将两份材料印发会议，一份题为《几篇论述大跃进经验教训的文章》，一份题为《对我国几年来工业生产增长速度忽高忽低的一种分析》。

7月4日，毛泽东在李先念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大中城市郊区发展副食品生产的指示稿上又加写和改写了两段文字，其中一段是这样写的：

“**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一定可以做到有菜吃，有油吃，有猪吃，有鱼吃，有菜牛吃，有羊吃，有鸡鸭鹅兔吃，有蛋吃。我们应当有志气、有决心做到这一项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有伟大意义的社会主义事业，也应当有信心做到这一项事情。一切为了人民利益，望各级党委接到这个指示以后，精心策划，立即动手办起来。不但大中城市，县城及四乡集镇都要照此办起来。各级党委要有一个专门管副食品的书记或精心从事的干部。”**

7月4日晚，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同王任重、刘建勋谈话。他从明代杨继盛的两句诗说起，他说：

“‘**遇事虚怀观一是，与人和气察群言**’。这是椒山先生的名言。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这两句，并照此去做。这几十年的体会是：头一句‘遇事虚怀观一是’，难就难在‘遇事’这两个字上，即有时虚怀，有时并不怎么虚怀。第二句‘与人和气察群言’，难在‘察’字上面。察，不是一般地察言观色，而是**要虚心体察，这样才能从群言中吸取智慧和力量。‘诗言志’，椒山先生有此志，乃有此诗。这一点并无惊天动地之处，但从平易中见精深，这样的诗，才是中国格律诗中的精品。**唐人诗曰：‘**邑有流亡愧俸钱’，这寥寥7字，写出古代清官的胸怀，也写出了古代知识分子的高尚情操。**写诗就要写出自己的胸怀和情操，这样才能引起读者的共鸣，才能使人感奋。”

7月5日晨，毛泽东在李先念为报送粮食部副部长陈国栋的报告所写的一封信上写了一个题目叫《粮食问题》的批语，他写道：

此两件印发各同志。陈国栋同志的报告是一个重要文件。请各大区区长主持讨论，细致地讨论，讨论两次至3次。我基本上同意这个文件所述的意见。但觉：

1、假定今年年成比去年确实好的情况之下，征购1100亿斤，力争办到，这是变被动为主动的第一着。今年年成如果在秋收以后确实较去年好、确实证明无妄的时候，为什么不能征购到这个数目呢？

2、下年度销售计划，我感觉不但1020亿斤是太多了，这个文件上调整为855亿斤，似乎也略为多了一点。是否可以调整为800亿斤，或者810、820亿斤呢？告诉农民，恢复糠菜半年粮，可不可以呢？苦一年、两年、三年，就翻过身来了。多储备，少食用，以人定量，粮食归户，食堂吃饭，节余归己，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有稀有干，粮菜混吃，仍然可以吃饱吃好，可不可以这样做呢？

3、**多产粮，是上策。田头地角，零星土地，谁种谁收，不征不购，主要为了解决饲料，部分为了人用。恢复私人菜园，一定要酌给自留地。**凡此种种，可以多收。既已多收，可以多吃（主要猪吃，部分人吃，例如菜）。

4、好好地精细地安排过日子。是否可以按照1957年的实际产量安排过日子呢？1957年的日子不是过得还不错吗？这样做，农民的粮食储备就可以增得较多了。**手里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

5、在今年秋收确实知道粮食比去年增产的情况之下，一定要划出牲口饲料、猪饲料两种，一定要比过去多些，是否可以有人粮的一半？人粮1斤，饲料半斤。各地情况不同，势必有多有少，但一定要下决心注意这个问题。除灾地外，饲料一定要比过去多些。增加饲料，极为有利。牲口是动力。一部分牲口是肉食奶食（老牛、菜牛、奶牛）。粪可以肥田。皮、毛、骨、角，大有用处。**吃肉多，吃粮少，动物蛋白优于植物蛋白，人的体格会更发展，会更健康。**猪是肉食，又有肥料。在三、五、七年以内，力争做到1亩田1头猪。1头猪就是一个小型有机化肥工厂。肥料的主要出路是猪，是1亩田1头猪。

以上几点意见，只供同志们此次讨论的参考，切勿下传。不对之处，准备修改。

毛泽东 7月5日上午6时

毛泽东同时批示将戚本禹7月1日写出的关于他在四川新繁县亲自种植试验田结果的报告和《关于四川新繁县粮食生产真相的报告》印发会议。

前边已经说过，戚本禹等人在春节过后就去了新繁县，他本人种植的早稻经过半年的精心管理，亩产500多斤，不到600斤。他在《关于四川新繁县粮食生产真相的报告》中也如实报告了他所做的调查研究的详细资料。《报告》中是这样写的：

“去年中共新繁县委整理的关于选派罗世发（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农业劳动模范——笔者注）出席全国农业先进单位代表会议的材料上说，罗世发领导的那个管理区水稻平均亩产量是1929斤（以稻谷计算，市斤制，下同）比1957年增产214%。今年3月，罗世发在省万人生产动员大会上说，他们管理区去年水稻平均亩产量经过地委、县委反复查仓核对的结果是1304斤，比1957年增产112%（见1959年3月25日四川日报）。但是，这些文字都不真实。实际上，去年水稻平均产量远远没有这么高。今天他谈出真心话。他说，就他自己在小队里参加收打的情况计算，水稻的平均亩产并没有突破千斤关。真实情况是：双季稻：两季加起来，平均亩产有1000多斤；中稻：一二等田，平均亩产量有700斤；三四等田，平均亩产量只有五六百斤；有一块最好的上等白鳝泥田，亩产量是900多斤。他们去年双季稻的面积占水稻面积的30%。这样，早、中、晚3季加起来拉平计算，平均亩产量大致在750斤—800斤左右。罗世发认为，‘就按上述真实产量数字，去年的农业生产还是大跃进，成绩是很大的，是谁也推不翻的。’”“罗世发说，‘毛主席讲得硬是对的，一亩田能增产个二三百斤就算成绩很大了。不讲去年跃进数字，今年谁真正做到平均亩产800斤，都是应该得到金牌奖章的。’他又说，‘事实上去年真正能产上个八九百斤，都是不简单的，我们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农民在一起讲私房话，全国最有名的劳动模范陈永康种的水稻，平均亩产只有800斤，报的却是2000斤，这是私房话，不能追究，追究起来，开起会来要整死人。’总的说来，罗世发是一位风格相当高的农民党员。但是他和我们谈水稻真实产量时，思想上还是有矛盾的。他说：‘产量问题是个大问题，是两条道路斗争，说不对，否定了大跃进。右派才否定成绩，我们怎么能否定成绩!’有时他又说：‘我是共产党员，当不当全国代表不要紧，要紧的是国家。你亩产七八百斤，却上报2000斤，国家说打个折扣吧：一千四，征购400斤，给你们剩1000斤，几百斤做口粮，几百斤做牲畜粮，留几十斤做种子，几十斤储备粮，多余的还可以再卖点给国家。这个账不是很对吗？好！400斤征购粮真交了，就露相。’‘我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听了很多报告，你虚报这个跃进数字，国家计划就要受影响，更严重的是社员吃饭问题，这是个大事情，如果交了粮吃不上饭了，怎么办？我着急啊！’‘主席讲得对，要说老实话，农民听了都赞成（按：他们公社向农民讲述了毛主席要讲真话通信的精神，但没有详细传达毛主席的通信），去年报这么多，今年怎么办？我们当干部的心焦啊！’‘当然我们这个队不能代表人家，人家也许有先进的。’‘刚才说的这些话别人来了我不能说，参观团，记者来，领着他转，什么也看不出来。报2000斤，我也能报，抽查也抽查不出来。你们来了我得说真话，说真话，对党有好处。’‘别人来我也不敢说，说了背时，开会一追，是否定大跃进！’”

毛泽东在印发了戚本禹的报告之后，又找来李井泉谈话，问四川粮食亩产究竟是多少斤？李井泉在事实面前终于向毛泽东认了错。

7月5日是星期天，会议休会一天，由于天气晴朗，与会者纷纷出游。

7月5日晚上，毛主席突然问封耀松：

“小封，你什么时候值班？”

封耀松算了一下，报告说：

“主席，是7号、9号。”

毛泽东没再说什么，但他似乎在安排着一件很特别的事情。有关这件事情的经过，有几个人作了基本相似的记载：7月7日，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要他的夫人水静去南昌接贺子珍上庐山。（李敏在她的记述中认为：爸妈在庐山见面，可能与商量她的婚事有关。）

7月8日下午3时许，贺子珍和水静离开南昌，直奔庐山而来。到庐山牯岭，住在28号房。

7月9日晚，毛泽东在180号院住处接见了贺子珍。当时曾陪同过贺子珍的只有毛泽东的贴身卫士封耀松和水静两个人。

据封耀松记述：“7月9日晚，约9点多，一辆轿车停在180院楼下台阶边。当时，主席在2楼，就只有我一个人值班。我到车边，打开车门，将一位女同志扶下来，与同车来的水静同志一起，把她扶进1楼的卫士值班室。我马上去报告主席：

‘水秘书她们来了。’

主席说：

‘好的！’

然后看了看表，站起身来，好像要到楼梯口迎接的意思。我下去与水静同志一起把那位女同志扶上楼来。水静先下去了。我拿过藤椅，在主席对面放好，安排她坐下，然后泡了杯茶给那位女同志，又给主席的杯子添了水，并为主席放了烟在桌边，回到了卫士值班室。”

据王行娟在《贺子珍的路》一书中记载：“她来到一间屋子里，抬头一看，不觉一惊，里面坐着的竟是毛泽东。毛泽东见她来了，站起身，微笑着同她打招呼，请她坐下。

贺子珍做梦也没有想到在这个时候，能够见到毛泽东。她的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而且像打开了闸门的水坝，汹涌澎湃，再也关不住了。她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是不停地哭。毛泽东看了，温和地说：

‘我们见面了，你不说话，光哭，以后见不到了，又想说了。’

他问道：

‘你这几年生活得怎样？身体都好了？’

贺子珍的情绪慢慢平静下来。她仔细地看了看毛泽东，说：

‘我好多了，你身体不如以前了。’

毛泽东说：

‘忙呀，比过去更忙了。’

接着，毛泽东详细地问起贺子珍在苏联的情况，贺子珍一一说了。毛泽东听了，轻轻地叹口气，说：

‘你当初为什么一定要走呢？’

贺子珍的眼泪又禁不住流了下来，哽咽着说：

‘都是我不好，我那时太不懂事了。’

毛泽东也谈起了这些年的情况以及他辞去国家主席职务的事。毛泽东告诉贺子珍，娇娇有朋友了，问她同意不同意娇娇的婚事？贺子珍回答说同意，她已经见过了。毛泽东说，等他这次开完会回去，就要为她举行婚礼了。”

据汪东兴回忆：“毛泽东对我说：‘我们两个人谈得不错。贺子珍不讲话，只是哭。我怎么劝她她都不讲话，不讲话怎么能谈下去呢？没办法，我只好说，那你休息吧。我还问过她有什么困难没有，她也不讲话。’”

据封耀松回忆：“大约过了45分钟，主席按铃召我去，我给他们的杯里又加了水，绞了两条小毛巾放在桌子上，看他们谈得很热烈，就下去了。我回到值班室，水静同志问：

‘小封，他们还在谈吗？’

我说：

‘是啊。’

他们讲话的声音很响，至今我还记得很清楚。水静同志说：

‘小封，贺子珍同志身体不太好，是从山下边刚接上来的。’

至此，我才知道那位女同志是贺子珍。”

据王行娟记载：“他们在一起谈了一个多小时，毛泽东站起来说：

‘时间不早了，你休息吧，我们明天再谈。’”

封耀松回忆说：“我与水静继续谈着，铃又响了。我上楼，搀下贺子珍同志，对水静说：

‘主席要你去一下。’”

据王行娟记载：“水静走进毛泽东的书房。毛泽东身穿粗条子的睡衣，吸着烟，面部表情有些愁苦。他见水静走进来，对她说：

‘贺子珍的脑子已经不行了，所答非所问。’

他还说：

‘她拿走我3瓶安眠药，这种药很厉害，千万不能让她多吃，最好把药拿回来。’

毛泽东接着说：

‘你要好好照顾她，明天送她回南昌。’”

封耀松回忆说：“毛泽东还对水静说：‘下山以前，你一步也不要离开她，怕她出去碰到熟人，那不好。’

水静上去只一会儿，就下来与我一起搀着贺子珍上了车。看着贺子珍的表情很高兴，她说：

‘主席还像原来一样，只是老了点，头发有点花白。’

送走贺子珍一行，我上楼去，主席在屋里来回踱着步，对我说：

‘小封，你看怎么办呢？这个同志把我的香烟、安眠药都拿走了。香烟倒还不要紧，安眠药她吃了，身体不行的。’

主席让我再下楼为他去拿香烟，主席是离不开烟的。我拿烟上来，看了一下，主席显得既高兴又不高兴的样子。

‘小封啊！这个女同志，是女中豪杰，人是很耿直的，就是缺少文化。本来身体很好的，让她不要去苏联，劝也劝不好，苏联卫国战争期间，生活很艰苦的！我们也不知道消息……’

主席让我打电话给水静同志，不要把安眠药给贺子珍吃了。我马上下楼去与水静通了电话。因为主席的安眠药有3种，按顺序吃的，错服是会出事情的。

次日晨，水静同志来电话，说已将安眠药从贺子珍手中要回来了。我报告了主席，主席连连说：‘好，好！’就从烟盒内抽出一支烟点着，深深吸了一口。”

贺子珍在第3天回了南昌，毛泽东没有与她见第2次面。贺子珍事后对水静说，她把安眠药拿走，是不想让毛泽东吃这种药。

再说在7月9日那天晚上，毛泽东送走贺子珍以后，又是一个不眠之夜。他看了一夜的材料，一直到黎明前，才让封耀松为他擦了澡，梳了头，给他服了安眠药，安排他上床。他躺在床上还要看《楚辞》。后来终于将手中的《楚辞》置于心口上，慢慢地闭上了眼睛。

封耀松在床侧的凳子上继续静坐片刻，才悄悄地立起身，轻手轻脚地往外走。出于习惯，他迈出两步，又回头看了一眼。毛泽东静静地躺在那里，没有声息，眼角熠熠地闪出光泽。再仔细一看，不由得惊呆了，毛泽东的眼角沁出了两颗晶莹的泪珠。不知是由于家事的烦扰，还是国事的烦难？抑或是屈原那“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诗句对这位老人家的感染？

疲惫的封耀松没想到拂晓前又发现，本来已经睡了的毛泽东又起来了。他斜靠在床栏上吸烟，要思考7月10日的发言内容了。

正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烦心；古人今人后来人，人人如此。

欲知庐山会议后来的情况怎样？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庐山会议前提出的要讨论的14个问题，后来在会议上增加到了18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读书问题。他还提倡编写《**好人好事**》、《坏人坏事》和党的文件汇编3本书。自此以后，**“好人好事”这个口号响遍了中华大地，成为最时髦的流行语。人人争做好人好事，批评坏人坏事，真可谓是“六亿神州尽舜尧”**，开创了一代史无前例的社会新风尚。这种新风尚**克服了几千年以来的私有制的利己主义，发扬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奉献精神**，一直沿袭了近20年，的确是盛况空前！

另：彭德怀和张闻天在庐山会议分组讨论阶段的一段对话值得研究。张闻天说：“**现在有些意见不好提，集体领导搞不起来。政治局扩大会议，连我们这些人都不知道要怎么开法？主席很英明，但整人也很厉害，有些方面跟斯大林晚年差不多。主席爱讲历史，他从中国历史学了不少好东西，但也学了些统治阶级的权术。”**彭德怀则说：**“上海会议毛泽东批我。他自己犯了错误不认账，不检讨，反而责备别人。被胜利冲昏了头喽！”**本传前边已经交代过，毛泽东召开这次会议的本意是为了继续纠“左”，但他哪里知道，党内早已是暗流涌动了！张闻天、彭德怀的那些话，不正是后来会议由反“左”转变为反右的一个重要诱因吗？正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党内又一次严重的斗争不可避免地就要发生了！

**第72章**

**“我总是同外国的同志说，请他们隔10年时间再来看看我**

**们是否正确。路线的正确与否，不是理论问题，是实践的问**

**题，要有时间，从实践的结果来证明。”**

话说庐山会议开得非常活跃，在小组讨论中，仍然有两种不同的意见分歧，一种是企图否定大跃进和总路线；一种是认为纠“左”已经差不多了，对群众不能泼冷水。持这种意见的人，各组中都有，尤其是省委的负责人，他们不敢承认错误，怕否定自己，否定工作。

毛泽东在八届七中全会上就已经看出了这种情况，所以他在这次会议讨论前先定了一个调子，可如今不但没有统一思想，而且这两种人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了。

尽管会议的意见还没有统一，但从表面上来看，这时的会议是白天开会讨论，晚上跳舞或看戏，开得是轻松愉快，被称之为神仙会议。特别是毛泽东把《到韶山》、《登庐山》两首七律抄给周小舟、胡乔木订正后，有不少人也开始上山赋诗了。

此时，也有一些组长和中央的一些负责人，不断地来找毛泽东反映情况。他们抱怨说：

“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胜利的时候要看到问题。现在有些人在困难面前只看问题不看成绩，是不是要搞垮这个党才甘心？”

“抓住兔子尾巴当老虎打。”

还有几个人向毛泽东汇报说：

“彭德怀发言有问题。”

原来，彭德怀在小组讨论中，8天有7次发言，讲了许多意见。他说：

“人民公社我认为办早了一些，毛主席家乡的那个公社，去年搞的增产数，实际上没有那么多嘛。我去了解实际只增产了13%。我又问周小舟，他说那个公社只增产了14%，国家还给了不少贷款和帮助。前不久，主席也去过那个公社。我曾经问过他，你了解怎么样？他说没有谈这个事。我看他谈过的！何必隐瞒呢？是什么就是什么嘛！毛主席和党中央在全国人民心目中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滥用这种威信是不行的。去年乱传毛主席的意见，问题不少。什么‘算账派’，‘观潮派’，帽子都有了，对于广开言路有影响。有些人不说真话，摸领导人的心理。浮夸风、小高炉等等，都不过是表面现象，缺乏民主、个人崇拜才是这一切弊病的根源。好多省都给毛主席修别墅，这总不是毛主席让搞的吧。”

彭德怀还说，他和他的朋友们认为：“大跃进是一个错误，这个错误人人有责，包括毛泽东在内。”“公社的优越性是宣传出来的。”“什么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我看社会主义建设倒是一年不如一年。”“去年不仅是工作方法上有问题，而是带有路线性质的错误，中央要负责任。”

毛泽东听了这些汇报，漫不经心地将手一挥，说：

“此人是张飞，不就是提个意见呗。”

7月10日傍晚，政治局扩大会议在美庐2楼的大客厅里举行全体会议。

美庐原是蒋介石的别墅，是以宋美龄的名字命名的。

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了长篇讲话，他说：

“对形势认识要一致，如不一致，就不能团结。党内要团结，首先要把问题搞清楚，要思想统一。**党外右派否定一切，说我们‘人心丧尽了’，‘修天安门前面的工程，如秦始皇修万里长城’，说‘过去历代开创的时候，减税薄赋，现在共产党年年加重负担’**。所谓丧尽了，就是不仅资产阶级、地主，而且农民、工人都不赞成了。**天津有些局长、科长议论，去年大跃进是‘得不偿失’。**是不是这样？有些同志对形势缺乏全面分析，要帮助他们认识，得的是什么，失的是什么？比如说，为什么大跃进之后又发生了市场大紧张。不要戴帽子，不要骂一顿了事。”

“党内要团结，就要把问题搞清楚。**有人说总路线根本不对。所谓总路线，无非是多快好省。多快好省根本不会错。**过去搞1900项基建，现在安排788个，这还不是合乎多快好省方针的？**1800万吨钢不行，现在搞1300万吨，还是多快好省。去年粮食没有翻一番，但增加30%左右是有的。多快是一条腿，好省又是一条腿。**”

“现在证明一条，社会主义国家中过去总是说农业合作化以后要减产，但是我们的经验证明，合作化也好，公社化也好，不减产。人民公社叫大合作社，或者说基本上还是高级合作社，就没有问题了。问题就是把公社看得太高了。”

毛泽东又说：

“我总是同外国的同志说，请他们隔10年时间再来看看我们是否正确。**路线的正确与否，不是理论问题，是实践的问题，要有时间，从实践的结果来证明。**我们对建设是没有经验的，至少还要10年才有经验。**这一年来，我们开了不少会议，总是把问题加以分析，加以解决，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党内有些同志不了解整个形势，要向他们说明。**从某些具体事实来说，确实有得不偿失的。但总的说，不能说得不偿失。取得经验总是要付学费的。**去年北戴河会议以来，有些事情搞得不好。但总是抓工业了，自己负了责任，可能主观主义，但总比不搞好。一年实践，取得了这么多经验，不像过去只听别人讲，走过场，签字。经验是从成功、失败两方面来的。打仗先从打胜仗、后从打败仗中取得经验，搞建设也是如此。我们想快一点，想找一条正确的道路。”

毛泽东说：

**“不论谁批评，都要承认当时有一部分缺点错误**。去年4件事：1959年要搞3000万吨钢；基建1900多项；粮食翻番；办了人民公社。这4件事搞得很被动。为了3000万吨钢，引起各方不满。**不管右派左派，党内党外，要说是缺点，确实有，都承认。我们把道理讲清楚，把问题摆开，也不戴帽子，什么观潮派、怀疑派、算账派、保守派等等，都不戴。**打仗，世界上没有从来不打败仗的将军。打3仗，一败二胜，就建立了威信；如果一胜二败，威信就建立不起来。对去年一些缺点错误要承认。从一个局部一个问题来讲，可能是7个指头9个指头的问题；但从全局来讲，是1个指头2个指头，最多是3个指头的问题。成绩是主要的，彭老总也说是1个指头多一点的问题。

党的方针政策正确与否，不在制定之时，而在执行之后。过去的革命路线，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现在的建设路线，要再看10年。我们为革命死了多少人，头都不要了，还给什么报酬。要培养共产主义风格，不计报酬，为建设事业而奋斗。”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指定由胡乔木为组长，与陈伯达、田家英、吴冷西、杨尚昆5人，起草一个《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

7月11日，各小组的讨论开始围绕着起草文件的问题展开了。

7月11日晚，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和周小舟、周惠谈话，他说：

“这次会议初步安排开到15日，已经安排写《会议纪要》了。还有4天的时间，你们那里讨论的情况如何？”

周小舟说：

“湖南粮食情况较好，是由于没搞敞开肚皮吃，但其它方面一样紧张。食堂问题，湖南的反对派有6条理由：1、根本不节约。2、不利于养猪。3、破坏林业。4、不能积肥。5、不节约劳力。6、吃得不愉快。不过，我们还是要努力办好，采取些措施，粮食指标分配到户，按月领，以防浪费。”

周小舟所说的6条，都是在不久前结束的湖南农业会议上议出来的，周惠给毛泽东的材料上都有，毛泽东已经看过了。毛泽东说：

“斯大林讲过，集体农庄加食堂就是公社。他吃亏在于只许说好，从不讲缺点，所以有错不能很快纠正。”

他拿着香烟的手向外推了推，接着说：

“拒绝批评不行。有意见还是叫人家说出来好，否则怎么能统一思想？”

周惠从茶几上抽出一支烟，点上吸了一口，说：

“主席，现在还是有人不喜欢讲缺点，讨论会还是有压力，不能畅所欲言。”

毛泽东“噢”了一声，问道：

“哪个不让讲缺点？”

周惠说：

“李锐同志在小组会上发言，几次被人顶住，讲不下去。”

周小舟接口道：

“**李锐认为去年提以钢为纲不对，政治挂帅有副作用**。瑞卿同志不同意他的观点，几次顶住李锐。”

原来，罗瑞卿在这一个时期以来，不断地听到毛泽东检讨自己的错误，他心中甚是不安，也非常难过。如今见一些人仍然不停地提出批评，他感到无法接受，于是就挺身而出，维护毛泽东。

“唔，罗长子顶住了。”毛泽东笑笑。他过去常说“天塌下来有罗长子顶着”，现在天还没有塌下来，罗瑞卿就顶着了李锐。他将手一招，说：“叫李锐来，我们增加一个人。罗长子顶住不要紧，跟我说。”

工作人员马上去找来李锐。毛泽东一见李锐进来，就用手将包括他自己在内的4个人划了一个圈，说：

“李锐啊，我们来开个同乡会。我们可以随便谈。谁先谈？还是你们二周先接着谈？”

周小舟说：

“全民炼铁，各种高指标，其根子在粮食估产高了。”

毛泽东平静地说：

“也未必尽然。想多搞点钢铁，多做些贡献，早一点富强起来，丢掉落后，一穷二白也是动力。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要前进就会不断打破旧的平衡，建立起新的平衡。建国后，书记处分工我抓农业，北戴河会议以来总算抓工业了。1953年批评过薄一波同志，后来批评计委，这次我自己应负责任。”

周小舟见毛泽东如此说，愈发口无遮拦，他说：

“刮‘共产风’不能怪公社书记，主要怪上面。哪里有什么万斤田？**上有好者，下必甚焉。”**

周小舟的话，无疑是直接批评了中央领导人。毛泽东似乎没有任何反感，他轻轻地弹一弹烟灰，说：

“提倡敢想敢干是对的，但也确实引起唯心主义。**”**

周小舟说：

“‘书记挂帅’权力太大。去年传主席的话，有些乱传，更增加了紊乱。谭老板有些讲话和文件，湖南压下来没传达，湖南的密植偏稀一些。”

周惠插话说：

“湖南靠了两条，一是没搞瞎指挥，密植，所以没有失败的问题。二是把关把得紧，粮食指标到户，食堂不搞放开肚皮吃饭。”

毛泽东频频点头。周小舟又说：

“会议还是有压力问题，有些人有错不认，还是不愿多谈多听缺点。”

周惠又插话说：

**“许多问题应当摊开来谈，谁是谁非摊开来谈，互相交锋才有好处。”**

李锐听周小舟、周惠如此说，就建议说：

“最好把大区组打乱，各组人员互相穿插。这样更便于交流意见和情况，免得一个地区总是唱一种调子。”

毛泽东“嗯”了一声说：

“这个意见可取。”

李锐借机说道：

**“去年讲敢想敢干，发展到唯心主义方面去，起了副作用。‘以钢为纲’、‘三大元帅’等口号提得不科学。”**

毛泽东当即表态说：

“嗯，以后可以不提这些口号了。”

李锐又提议说：

“财经工作还是由陈云同志挂帅比较好。”

周小舟附和说：

“陈云搞经济工作历来稳重。”

周惠也说：

“陈云同志有经验，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第1个‘五年计划’在经济方面搞得很出色。主席，你那时不就多次赞扬他吗？”

这3个人极力称赞的陈云，的确也是党内一个极具特色的人物。了解他的人，对他的一些行为莫不叹为观止：他吃菜以青菜豆腐为主，每餐几块豆腐就是几块豆腐，任何情况下也不多吃或少吃一块，几十年如一日。每餐一小碟花生米，永远是13粒，一粒不多，一粒不少。会议上喝茶只放3片茶叶，工作人员都知道不能多也不能少。休息散步，每次13分钟，不多也不少。至于会客，除了谈工作，一般礼节性拜访，尽量拒绝。就是同意见面，最多也只是3分钟的时间。

毛泽东是了解陈云的，他说：

“过去陈云提出先安排市场，再安排基建，黄敬不赞成。现在看，陈云是对的。世上没有先知先觉，没有什么前知500年、后知500年的刘伯温。无非是多谋善断，留有余地。‘国乱思良将，家贫念贤妻’，这是《三国志》郭嘉传上的话。郭嘉这个人足智多谋，初在袁绍麾下不得施展。他说袁绍‘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欲与共济天下大难’，后来跑到曹操那里。曹操说他‘每有大仪，临敌制变。臣策未决，嘉辄成之。平定天下，谋功为高’。可惜中年夭折，曹操大哭。”

毛泽东略一停顿，又说道：

“陈云当总指挥好，但他有长处也有短处。”

请读者诸君注意，后世有人散布毛泽东所说的“国乱思良将，家贫念贤妻”是对陈云的高度评价，其风源大概就缘于此处。由上文可证，那一说法是错误的。还有一种说法说是毛泽东对陈云的这一评价来自王任重日记，不管是真是假，对照上文毛泽东说的“他有长处也有短处”，显然也是相互矛盾的，毛泽东不会忘记，陈云曾经是主要的反冒进者之一。

这正是：毛公历来重史训，今以郭嘉勉后人。后有断章取义者，张冠李戴蒙庶民。

再说李锐在谈话中对毛泽东说：

“各地大炼钢铁的情况，比如指标落实情况以及质量情况，冶金部一风不透，问不出消息。钢铁关键还是个质量问题，**我的意见是宁肯少些，但要好些。**”

毛泽东马上替冶金部李富春和王鹤寿说了公道话，他说：

“富春是依靠王鹤寿的。有些事不能全怪下边，不能全怪各部门。否则，王鹤寿会像蒋干一样抱怨：曹营之事，难办得很。或者叫你‘欲与共济天下大难’！”

毛泽东顿了一下，又笑着说：

“那个蒋干去盗书，辛辛苦苦，受不少惊吓，以为立了不世之功，结果还遭了白眼，他可不是委屈得很么？你们到我这里来不要学蒋干盗书。”

说完，他竟自哈哈大笑起来。周惠等毛泽东平静下来，问道：

“主席说蒋干盗书是什么意思呀？”

毛泽东说：

“你们讲去年传我的话，有些乱传。你们今天可不要学蒋干，回去也乱传。”

他点了一支烟，吸了几口，又说：

“**许多事我都要负责。**不过，有些也真负不了。比如人民公社，去河南七里营参观他们的公社，有个记者问：‘公社好不好？’我随口说：‘好’，谁知第二天就登报了，一下子全国都知道‘人民公社好’了。”

周小舟说：

“以后讲话不能乱传，还是形成文字好，以文字为准。”

毛泽东摇摇头说：

“此议不对。文字也一样不行。钢翻一番，一成文字，谁想到当成法律了，党比人代会可厉害得多。我这个人性格不大好，40岁以前肝火大，总觉得正义真理都在自己手里。现在还有肝火，对人总是武断，讨人嫌恶。或谓我意强，实在正是我弱的表现。

**郑州会议后，我开始右倾。粮食、钢铁、公社和食堂，都发生了问题。**下面讲了些假话，可以转告大家，心情也不要那么沉重。打麻将13张牌，基本靠手气。谁知道搞钢铁这么复杂，要各种原材料，要有客观基础，不能凭手气。去年的问题就是抓了个‘两小无猜’，别的忘记了，这是本末倒置。**去年农业是否增产了三成？还很怀疑。全国各地不平衡，有丰有歉，填平补齐后，三成很不易得哟。**

**有对立面不要紧，我自己就是个对立面，自己常跟自己打架；有时上半夜想不通，下半夜又想通了。**回去告诉同志们，中央愿意听取各种意见，但要保护群众的积极性，不能泼冷水，不能泄气。**希望这次会议能统一认识，改正缺点，好继续跃进。**”

毛泽东在和周小舟、周惠、李锐的谈话中明明告诫他们，你们不要学蒋干盗书，可周惠偏偏耐不住寂寞，第二天一早就拉着周小舟说：

“小舟啊，你去找老总谈谈怎么样？把主席昨天跟咱们谈话的内容跟他讲讲。彭老总是敢讲话的人。”

“对！”周小舟眼睛一亮，说：“老总讲话比我们分量重，有影响。”

周惠进一步分析说：

“华南、中南、西南3个组多谈还是有压力，但主席还是愿意听人谈缺点的。你动员老总去跟主席谈谈，趁热打铁，那些‘促进派’也就不好再护短了。”

“你这个主意好！”

周小舟激动起来便坐不住，他和周惠、李锐当即去找彭德怀，将昨天晚上毛泽东如何如何说，还有什么“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什么“国乱思良将，家贫念贤妻”，绘声绘色地鼓动了一番，只听得彭德怀心潮难平。彭德怀本来就认为毛泽东和多数人对“左”倾错误认识不够，现在听周小舟如此这般一说，救民于水火舍我其谁的干云豪气直冲脑门。但他自知与毛泽东历来有些疙瘩，与眼前这些毛泽东信任的“才子”自是有些不同，便说：

“哎，我这个臭脾气，怕同他谈不好呀？再说，有些意见还没有想成熟，在西北小组会上都没谈，一下子去跟他谈，莫谈出毛病来。我看，还是写封信吧？”

“嗯，写信也好。”周小舟继续鼓励他：“那就把你那些发言整理一下，我看就很好了。”

“我的发言，有些简报上也没登。”

“哎，简报不登，写到信里主席不就看到了？”

“行，我就写封信。”彭德怀难得一笑：“你当了我的参谋哟。”

俗话说，说话容易做事难。彭德怀这位横刀立马的大将军一旦提起笔杆，才知道笔杆子不如枪杆子好使。于是他改变了主意：写信何如说着爽快。他决定去找毛泽东谈谈。

彭德怀本来是知道毛泽东有晚上工作上午睡觉的习惯的，可他却耐不住性子，急匆匆地来到毛泽东的住处。正在值班的卫士田云玉曾在彭德怀身边工作过，见彭德怀来了，他就非常客气地说：

“彭总，主席睡觉了。”

这是彭德怀第1次被挡驾。他默然片刻，扭头走了。

7月13日清晨5时，毛泽东给杨尚昆写了一封短信，他写道：

尚昆同志：

5人起草小组，建议增加陆定一、谭震林、陶鲁笳、李锐、曾希圣、周小舟6同志，成为11人小组，先议两天，7月13、14即今明两天议事。14日夜印出交我及各组同志每人1份。15日下午到我处开大区区长会议，议修改意见，修改第一次，夜付印。16日印交所有同志阅读，会谈，修改缺点。文件名曰‘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你们在几天内一定要做苦工，不可开神仙会，全文不超过5000字。

此信收到后，今天上午立即开会动手实行。请少奇、恩来二同志到会，看此信，请他们二人加以考虑，是否同意。如果同意的话，立即施行。

毛泽东 7月13日上午5时

7月13日上午，彭德怀又去找毛泽东谈他的意见，毛泽东刚睡下，又未谈成。这是他第2次被挡驾。彭德怀已经失去了耐心，当晚就动手给毛泽东写信。

7月14日，胡乔木等人遵照毛泽东的意见，将写出的《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草稿，印发给与会者讨论。

《记录》中写道：产生大跃进中的缺点和错误的原因，主要是由于缺乏经验，部分是由于思想方法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对于客观经济规律的意义估计和认识不足，没有完整地有计划地执行总路线。对1958年以前我国建设的经验和苏联建设经验没有认真总结和研究。

《记录》中还强调说：在肯定成绩之后，对工作中的缺点必须加以充分的重视，不要怕说缺点。必须在全体党员干部中，提倡说老实话，提倡实事求是的讨论，应通过同志式的交换意见，逐步达到一致，不要采取粗暴武断办法，不要随便扣帽子。

《记录》又提出1960年的发展速度，要适当放慢工农业的发展，应在做好综合平衡的基础上，实现稳步跃进。

7月14日，毛泽东起床后看到了彭德怀叫参谋王承光在这天早晨送来的一封信。

这封信就是彭德怀从13日夜到14日凌晨写成的改变了他个人的历史同时也改变了庐山会议进程的著名的《意见书》。他让王承光抄写后，将信送给毛泽东。王承光从毛泽东处回来，彭德怀问：

“送到了？”

王承光说，送到毛泽东的秘书手里了。彭德怀说：

“好，好，送到了就好。这封信可不能掉了。”

他又将自己起草的原信提纲，让王承光送给张闻天征求意见。王承光回来了，彭德怀急切地问：

“给闻天同志看过了吗？”

王承光说：

“张闻天同志叫我给他念了一遍。他说：讲得很全面，你告诉彭总。”

彭德怀“噢”了一声，说：

“好，那就好。”

彭德怀在《意见书》中到底写了些什么内容呢？他写的是：

“在小组会上，还没有讲完的一些意见，特写给你作参考。我这个人简单，类似张飞，确有其粗，而无其细。因此，是否有参考价值请斟酌。”

彭德怀在信中首先肯定了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肯定农村公社化“具有伟大意义”，接着就着重讲1958年以来产生的“左”倾错误及其经验教训。他认为：“大跃进”全民大炼钢铁是“有失有得的”，他还写道：

“现时我们在建设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我们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还没有像处理炮击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在发展钢铁的认识上，有严重的片面性。……没有必要的平衡计划。”“浮夸风气，吹遍各地区各部门，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当时从各方面的报告材料看，共产主义大有快到来之势，使不少同志的脑子发起热来。”“严重的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容易得到真实情况，直到武昌会议和今年1月省市委书记会议时，仍然没有全部弄清楚形势真相。”“**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1958年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就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入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甚有益处。其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地不去追究个人责任。反之，是不利于团结，不利于事业的。”

《戚本禹回忆录》中曾分析说：“彭德怀用‘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个提法，实际是把目标指向刘少奇。这是有充分道理的。首先，彭德怀在《意见书》里引用了刘少奇在大跃进中的一些具体讲话，作为‘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证据。这是能说明问题的。其次，他后来责怪毛主席不该把这封信印发会议，同样也能说明问题。他说他是跟毛主席做私下谈话。是私下谈话，他就不会说毛主席本人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必然是另有所指，而他既然引用刘少奇的话作为‘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证据，那就是指刘少奇了。第三，彭德怀是元帅，是很有策略的人，他要是把矛头指向主席，就不会写那封信了。第四，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对红卫兵说‘刘少奇是极左的。你们现在才反刘少奇，我在庐山会议上就反了’。这也能证明他当时就是针对刘少奇的。总之，**彭德怀觉得刘少奇搞的浮夸风是严重的路线问题，他用‘小资产阶级狂热’这个党内人人都懂的说法，实际是希望中央换掉刘少奇，让他自己或者其他什么人上去来纠正刘少奇的错误。**”

毛泽东看了彭德怀的信，则苦笑着对正在给他添茶水的卫士长李银桥说：

“彭德怀送给我看的尽是消极材料，尽给我送消极材料。”

他拿起一支香烟，插入烟嘴。李银桥替他划着火柴，点燃了香烟。他又说：

“王任重、陶铸、柯庆施送的材料积极。**不管怎么说，这个人是敢讲真话的。**”

这天傍晚，毛泽东在散步时，一位负责人知道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信，就对毛泽东说：

“彭德怀解散中南海军乐团时，说这是搞特殊化。主席建议从各个专区选一名战士到一中队，搞五湖四海，便于了解各地情况，彭德怀也反对，也说是特殊化。”

毛泽东只“唔”了一声，笑笑，没说什么。

7月15日，周惠在中南小组会议即将结束的时候发言说：

“1个指头也罢，3个指头也罢，我看首先是把它谈透才好。”

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广西自治区第一书记刘建勋、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都在这一组。周惠说到激动处，脱口冒出了一句：

“依我看，去年各省第一书记应当各打50大板。”

这种一棍扫八家的话，几位第一书记虽然是硬着头皮听下去，可心里却都在骂他是翘尾巴，得理不饶人。而且这话很快就在各组传开了，成了后来激化矛盾的一个重要原因。

周惠走出会场，看到广西自治区第一书记刘建勋走在前边，便紧走几步，搂住刘建勋的肩膀，说：

“喂，建勋呐，我叫老霍给你捎个话儿，捎到了吧？”

周惠所说的老霍叫霍泛，是广西自治区常委、秘书长，与周惠是老熟人。刘建勋扭头瞥一眼周惠：

“捎什么话儿？”

“我骂你的话呀！”

“骂我什么啦？”

“我骂你又当婊子又立牌坊。你们广西搞‘两小无猜’，炼钢放卫星，《人民日报》通栏大标题，还套了红，第一名，发文章祝贺。过一天你又发电报，向中央说是假的，空的。反正报纸也登了，没法改了。你是又出了名，又落个讲老实话，做老实人。你这不是滑头吗？”

“哎哎哎，回去说。到你那儿去。”刘建勋和周惠私交深，他拉着周惠说：“到你那儿边吃饭边说。”

周惠说：

“行啊，反正是江西省的同志招待，我陪你喝两杯。”

二人来到餐厅，服务员端上饭菜和茅台酒。刘建勋说：

“周惠啊，你也别骂我，这事是韦国清办的，当时我不在家，卫星不是我放的。我回来发现了问题，才叫给中央发电报澄清。”

周惠说：

“影响造出去了，老百姓管你是韦国清还是刘建勋？你们一个主席，一个书记，你们都是广西自治区的，我说也是说你广西。”

服务员来斟酒，周惠拿过酒瓶说：

“我们自己来吧。”

他等服务员退出后，朝刘建勋举起酒杯，说：

“哎，建勋老兄，我们说点真话。你们当第一书记的，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呐……”

刘建勋赶紧拦住他的话头，说：

“哎，等等，你说什么呀？我们可没那么大道行。”

周惠说：

“怎么没有？你们一把手经常到朝中议事，你们往上说啥是啥。回来更不得了，第一书记不打雷，老天爷不敢下雨。主席下来也都是找你们一把手商量。”

刘建勋反驳道：

“主席召见你比召见我勤，你还提意见。说什么别光听第一书记的，也多听听其他书记的。我看主席就没少听你的嘛。”

周惠说：

“你这是抬杠了。总体上讲，入朝议事，回省决策，还是你们第一书记，你敢说不是？你们要多说点真话，反映点实际情况么。1958年搞出那么多东西吗？又是万斤粮，又是万吨钢，骗上骗下骗自己么。”

“哎，老兄，我刘建勋人微言轻算老几呀？大码头是柯大鼻子和王任重他们。要讲一言兴邦，一言丧邦，他们还有点分量。我人微言轻没分量么，讲了也压不住秤。”

“建勋啊，1958年无非3种人，一种是官僚主义，不了解下情，老老实实讲了假话。第二种是滑头，看风使舵讲了假话。第三种最坏，明知是假的还成心说谎。诺，就像我这张脸，明明有麻子，偏要擦粉充漂亮。”

7月15日这一天，毛泽东的工作人员已经接到通知，说是要准备下山。可是不久，他们又接到通知说，会议延期一星期左右。原因是毛泽东在和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举行的小范围碰头会上，传阅了彭德怀的信，接受刘少奇的建议，会议延期，讨论彭德怀的《意见书》。

7月16日晨，毛泽东在彭德怀的信上加了一个标题：《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批了7个字：“印发各同志参考。”

6时和7时，他还给刘少奇、周恩来、杨尚昆写了两封信。第1封信要求16日把与会人员打乱地区，重新分组，组长不变。他在信中说：“这么做，见闻广博得多了。可能大有益处。”信中还特意问到在东北养病的陈云病情如何，是否有可能来此参加7天会？请征询陈云意见。第二封信要求通知彭真、陈毅、黄克诚、安子文及若干部长和国家计委、经委、建委副主任上山，参加最后1个星期的会议。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陈毅曾经向毛泽东汇报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当时陈毅留守北京，相当于看守内阁，有临时处置权，可以调动军队。苏联武官去见陈毅，要求个别谈话，陈毅把秘书都遣走，只留下翻译。苏联武官开门见山地说，你们中央在庐山开会，你在北京可以乘机把权力拿到手里。陈毅听了火冒三丈，立即把这个武官请走了。陈毅马上把这个情况汇报给了主席。主席说，你让他多讲几句嘛，苏联策反也不是一次了。”

《戚本禹回忆录》中还说“彭德怀的信到了主席手里，主席就不能走了。主席说，不能我一个人看，我要开会的。这个李银桥都知道的，主席一看到信，就让他把打包的书都打开了。彭德怀后来说，这个信是给主席的，你怎么能发给大家？彭德怀不懂吗？他写的是正式信，是给中央提意见，不是给主席一个人提意见的，主席就得处理，不能就这么算了，起码要给常委们看看吧？所以庐山会议继续进行。继续开会后，彭德怀实际上活动更加积极。刘少奇等一批在中央的领导人，还有各省市的一些主要领导人，都是浮夸风一派的，都犯有彭德怀说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错误，毛主席把信一批下去，他们都看出了钉子：如果中央接受照彭德怀的意见，那他们这些对浮夸风负有直接责任的人，就都要垮台。这就是说，彭德怀的信把事情搞复杂了，把党内两派的矛盾直接拿到了桌面上，中央以刘少奇为代表、地方以李井泉为代表的浮夸派领导人都闹起来了。”

7月17日下午，毛泽东到水库去游泳，汽车行驶在盘山公路上，他隔着车窗望着一座座绿色的峰峦，兴致勃勃地问身边的高智：

“高智，你看庐山这么多树好不好？”

高智也高兴地回答说：

“好得很呀！”

“要是陕北的山上也有这么多树就好了。自然条件也可以得到改变。那里多么需要植树造林啊！”毛泽东一面沉思，一面又自言自语：“10年行不行？10年不行，20年行不行？20年不行，30年行不行？”

到了水库，毛泽东先游了一会儿泳，又与王任重在水库里划船。王任重问道：

“主席对彭老总信中所说的‘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怎么看？”

毛泽东说：

“现在我不发言。”

下午5时，毛泽东在“美庐”召见周小舟、周惠、胡乔木、田家英、李锐。他在谈话中说：

“关于总路线，真有70%的人拥护就不得了，真正骨干有30%也不得了啦，大部分人是随大流的。**昨天晚上我在组长会议上谈了态度：现在的情况，实质是反冒进，我是反冒进的头子。要有几个右派朋友，我是机会主义的头子。**

我要找唱反调的人通讯。计委这次来了反对派人，正面有李富春一个人就够了。只让签字不行，还得了解情况和问题。工业系统是独立王国，谁也进不去。我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孙悟空偷桃子，只有这个办法，开庐山会议之类。过去不懂得管理经济之复杂。革命是捣乱，而且敌人有机可乘。

6个地区大组人员打乱，使之不成体系。觉得谈来谈去一个腔调，问题展不开。

权力集中很不容易，过去司令部、政治部有矛盾，权力好不容易集中在前敌委员会。中央红军8万多人，到吴起镇剩7000人，开干部会，我说比过去强了，因为干部经过了这样艰苦的锻炼。当时许多人不同意我的看法。”

田家英说：他在四川蹲点调查，省委规定“双龙出海，蚂蚁出洞”，强令农民搞密植，闹得颗粒无收，老百姓饿肚子。“我在西南组讲这个情况，组长批评我，没让我讲下去。”

毛泽东说：

“他们当家。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人们都有保卫自己劳动成果的本能。李井泉是挑担子的人，容易有脾气。我提倡过密植，现在是中间偏右派。”

他还说：

“上山我就跟人讲，现在是天下大乱呐，但还不到报告老爷大事不好的程度。不要怕乱，告诉大家，不要怕学生上街，群众打扁担。”

周惠说：

“还是学生不上街、群众不打扁担的好。”

毛泽东说：

“乱了好。1957年汉阳学生闹事（那年4月间，汉阳县第一中学学生因农村中学学生升学指标过低，上街游行示威，到县政府闹事——笔者注），当时估计全国各地市一二万学生想闹事，也不过几百万人吧。脓疮还是破了好。”

胡乔木说：

“脓疮需要白血球去攻，但全身溃烂了，白血球失去平衡，就不行了。”

周小舟说：

“彭老总写给主席的信已经印发下来了。”

毛泽东说：

“我批了几个字，想听听意见。洛川会议后，华北军委分委发个小册子，不同意中央在洛川会议定的游击战为主的战略方针。这个小册子被王明拿去利用了。”

到吃饭的时候了，毛泽东与周小舟等人共进了晚餐。

7月17日晚，在北京主持军委工作的黄克诚，奉命从北京兼程抵达庐山。他刚刚在176号院安顿好，彭德怀就拿着他写给毛泽东的信来了。黄克诚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说：

“这封信提的意见我赞成，但信的写法不好，语言中有些提法有刺激性，你那样干什么？”

彭德怀说：

“实际情况那么严重，会上没有人敢说尖锐的话，我就是要提得引起重视。”

黄克诚说：

**“你总是感情用事。你和主席共事多年，应该互相了解较深，这些话何不与主席当面交谈，何必写信？”**

7月18日一大早，周小舟、周惠、李锐相约到176号院看望湖南省委前任第一书记黄克诚。周小舟介绍了他们昨晚同毛泽东谈话的情况，而后说：

“我们几个意见都是一致的，都觉得不彻底改变‘左’的方针不行。现在的问题是有些护短，意见统一不起来。”

李锐说：

“现在争论的重点是3句话中的中间一句话：问题不少。其它两头是一致的。关键在问题讲透。我们都感觉会议有压力，不能畅所欲言。一些人怕讲缺点，一讲就坐不住。”

周惠说：

“主要是自己屁股不干净。”

李锐说：

“思想如果不改变，下山后恐怕还会将‘左’的错误延续下去。”

黄克诚慢条斯理地说：

“主席教育我们要天天扫地、洗脸，检查缺点只会使我们前进，不会使我们倒退。不要急，我刚上山，先看看再说。”

李锐说：

“有些人对《议定纪录》里讲的3条意见也攻得厉害。其实在写的时候已经是反复斟酌，尽量注意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前提下把问题说透。”

黄克诚说：

“比例失调、共产风、命令主义和浮夸风，这是有目共睹的问题么。”

周惠问：

“黄老，你对彭老总的信是怎么看？”

黄克诚说：

“我粗看了一下，基本精神是好的。你们说有压力，不能畅所欲言，我在书记处会议上也讲过。我黄克诚总算一个敢讲话的人，但现在也不大好讲话了，彭老总讲了，信里提的意见我赞成。不过，**信里有漏洞，有问题，还有刺**。照实际情况，还可以说得重一些，但这话不能对彭德怀说。”

黄克诚在和周小舟3人谈话后，又和李先念谈了话。李先念也认为大跃进的做法太过了，一定要改变才行。黄克诚接着又去找谭震林谈话。谭震林一听说他和李先念谈了话，并且观点一致，就不高兴了，说道：

“你为什么先去看先念，不先来找我？你受先念影响了。”

黄克诚说：

“我和先念有些看法相同，不能说是受他影响。”

黄克诚和谭震林一向关系很好，又都是性格直率态度鲜明的人。但他们的观点不一致，说着说着就吵了起来。谭震林发火了，他说：

“你是不是吃了狗肉，发热了？这样来劲！你要知道，我们找你上山来，是搬兵，想你支持我们的。”

黄克诚也火了，他说：

“那你就想错了，我不是你的救兵，是反兵！”

7月18日，会议重新组合的6个小组开始讨论彭德怀的信，在与会者的发言中，两派之间开始了交锋。

彭德怀在西北小组会议上申明这封信是仓促写成的，没有完全写明自己的意思，要求中央办公厅在会后收回这封信。

这一天从下午到晚上，到“美庐”2楼向毛泽东汇报情况的人多了起来：

“主席，现在我们就是笼统抽象的肯定成绩，具体实在的大讲缺点。这样泄气泄下去，今后还怎么跃进？”

“他们的目的说到底，就是要完全停止大跃进。”

“周惠一盆冰水泼了整个庐山。别人都不行，都该打屁股，都当不了第一书记，就他能当第一书记。”

“周惠是去年被插了白旗要借机出气。按他的调门，指标越低越好，只许泄气不许鼓气，谁反对泄气谁就是‘压力’，就是‘护短’。只有彭德怀的信符合他的心思。”

毛泽东听着这些汇报，丝毫不急，不紧不慢地说：

“我看你们也不必着急。吴稚晖形容孙科，一触即跳。你们这个样子就是触不得。**要能听坏话，好话坏话，两种话都要听嘛。**

《阿Q正传》是一篇好文章，我劝看过这篇文章的同志，再看一遍。没有看过的同志好好看看。鲁迅在这篇文章里，主要写一个落后而不觉悟的农民，说他最怕人家批评，一批评就和人家打架。他头上长了几处癞疤，自己不愿说，也怕人家说，愈是这样，人家说得越厉害，结果闹得很被动。鲁迅在这个文章里，专门写了‘不准革命’一章，说假洋鬼子不让阿Q革命，不过是想抢点东西而已，可是这样的革命也是不准。过去，我们党内在这个问题上犯过错误，那是以王明为首的教条主义当权的时候。对不合他口味的人，他们总是随便给人家安上个犯过什么错误的罪名，不许人家革命，打击了很多人，使党受到很大损害。我们要记着这个教训。我建议大家看看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可以印发下去，每人一册，看几遍大有好处。”

田家英立即将毛泽东的这些话传给周小舟、周惠、李锐等人，他还说：

“主席要印发《阿Q正传》，劝告那些‘促进派’不要有缺点毛病触不得，像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一样，一触即跳。”

7月19日，在以柯庆施为组长的第二组会议上，周小舟侃侃而谈，他说：

“我的看法，这次会议把缺点讲透很有必要，只有如此，才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缺点不讲，或者讲而不透，是难于使我们自己正确地总结经验的。我认为正确地检查缺点，不仅不会泄劲，反而能够鼓足正确的干劲的。彭总给主席的信，我认为总的精神是好的，我是同意的。至于某些提法、分寸、词名，我认为是可以斟酌的。”

柯庆施说：

“谈到得失问题，就某一部分来说是有失。但就整个情况来说，不仅不是得不偿失，也不是有失有得，而是得多于失。不要说当这个大家不容易，我当这个小家也不容易，还经常买葱忘了买姜的。”

周惠发言说：

“去年‘大跃进’的成绩是伟大的，产生了总路线和人民公社的整套方针，组织形式也是正确的。但产生的问题也确实真不少啊！去年有个教训，稍有怀疑，稍有批评意见，就说是观潮派、算账派、促退派，还要插白旗。事实证明这是不利于我们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这次庐山会议，一些同志怕缺点讲多了泄气，怕因此否定成绩伟大。在这个问题上，我同意小舟的意见：在这样一个高级干部会议上，把缺点讲透不仅不会泄气，而且是十分必要的。否则难于使我们自己正确的总结经验教训，鼓足正确的干劲。彭老总的信提出一些意见，总的精神是好的，我感觉是好意，想把问题讨论透。当然，有些想法可能不够准确妥当。通观全信，对‘前途光明’这一条也嫌不足。但基本意见还是不错的。”

“我讲几句。”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瞥了一眼周惠，开始说道：“从甘肃去年的大跃进情况看，是‘得多于失’。甘肃去年的粮食落实数字120亿斤，比1957年增长41%。去年大办钢铁对不对？1957年甘肃1吨铁也不产，去年钢就炼了5万多吨，建设了一批小高炉，培训了1万多名技术人员和工人。这样既炼了钢铁也炼了人，不花点学费是办不到的，这些成绩没有去年的大跃进是办不到的，没有去年的群众运动也是办不到的，花再多的钱也是买不到的。最重要的是争取了时间，加快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这些成绩说明，得不偿失或有失有得的看法都是不对的，**大跃进的成绩和缺点不能等量齐观**。对此，必须在认识上统一起来，才能达到团结。”

7月20日凌晨1时至3时半，杨尚昆向毛泽东汇报了各组讨论的情况。毛泽东说：

“一、欠债是要还的，不能出了错误，一推了之。去年犯了错误，每个人都有责任，首先是我。二、缺点还没有完全改正，现在腰杆子还不硬，这是事实。不要回避这些事情，要实事求是。三、有些气就是要泄，浮夸风、瞎指挥、贪多贪大这些气就是要泄。四、准备和那些‘左’派，就是那些不愿意承认错误，也不愿听别人讲他错误的人谈一谈，让他们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7月21日上午，周恩来召集会议，讨论1959年的各项工作。

曾希圣想起周惠要“各打50大板”的话，再也压抑不住心中的怒火，突然“砰”的一声拍响了桌子，霍然起身，大发雷霆：

“他妈的匹！各省第一书记都该打50大板屁股，别人都不行，都不能当第一书记。”

他朝着周小舟吼道：

“就你们周惠能当第一书记！妈啦个匹，就你周惠行？”

周惠没有参加这个会议，周小舟是替人受过，被骂得张大了嘴巴，半天合不拢。他正在愣怔间，桌子又是“砰”的一声，谭震林也发火了，破口大骂：

“妈啦个匹！别人不行，周惠就行？他就能当第一书记？”

人们都怔住了。此时的黄克诚也不知道周惠为什么挨骂，可他见谭震林也如此暴躁，猛地涨红了脸，跟着“砰”的一声拍响了桌子，吼道：

“谭震林，你想干什么？”

“你想干什么？”

谭震林拍着桌子跳起身，要冲过来。

“你想干什么？”

黄克诚怒吼着要迎上去。

“哎哎哎，坐下，都坐下！”周恩来摆着双手说：“在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你们这个样子像话吗？”

谭震林和黄克诚都憋着怒气坐下了，脸红脖子粗地互相对视着。周恩来又说：

“有话慢慢说嘛，不要吵，不要闹。”

7月21日下午，张闻天在华东组会议上，作了长达3个小时的长篇发言，揭露和批判“大跃进”、“公社化”存在的问题，完全支持彭德怀的意见。张闻天在8000字的发言中，讲成绩的只有270余字，用了39个“但”字，13个“比例失调”，12个“生产紧张”，108个“很大损失”或“损失”，字里行间处处可见“太高”、“太急”、“太快”、“太多”。对于彭德怀信中所说的“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张闻天说：“这个问题不说可能更好一点，说了也可以，究竟怎样，可以考虑。但是，刮‘共产风’，恐怕也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

会议结束后，张闻天的秘书萧扬不无担心地对他说：

“你的发言可能会遭人批判。”

张闻天说：

“有可能，但也不一定。我的发言组织得相当严密，不好攻。”

晚饭后，张闻天让萧扬把他的发言提纲送给彭德怀看，彭德怀赞扬这篇发言“讲得很全面”。

历史往往就是这样巧合。这一天，赫鲁晓夫在波兰发表了批判和反对中国“三面红旗”的讲话。苏联和波兰通过新闻媒介，公开批判中国的“人民公社”和“大跃进”。台湾的中央社和美国的各大媒体迅速地转载并评论了苏联的文章。山下全国各地一些党内党外的批评意见，也纷纷送上山来，摆在了毛泽东的案头。

欲知毛泽东如何处理这些党内外的批评和攻击，且待下一章分解。

东方翁曰：有道是多事之秋自有多事之人，此话一点不假。否则，何以千百年来世事扰攘，永无宁日。毛泽东从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纠“左”，一路上开了多少会，讲了多少话，磨破了嘴皮子，进行了多少次批评和自我批评，一直把会议开到了庐山上，就是想在党内高层统一思想，做个总结，以利再战。没想到彭德怀偏偏在会议即将结束之时写了一个《意见书》。一石激起千层浪，与会者们有人高兴，因为有分量的彭德怀站出来说话了；有人愤怒，他们觉得彭德怀是揪着别人的尾巴不松手；有人窃喜，原本就想借助毛泽东整彭德怀的机会终于来了。加之张闻天又来了一个3小时8000字的长篇发言；更要命的是后来以周小舟为首的一部分毛泽东最信任的前任秘书和现任秘书，这些自以为是救世主的秀才们发出了一通“斯大林晚期”的谬论，最终使得庐山会议风云突变，酿成了一段让人扼腕的千古公案。

**第73章**

**“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是路线错误，难道少慢差费地搞建设**

**才是路线正确？从郑州会议以来，我们一直在检讨，在纠正‘左’**

**的错误，形势不是好转了吗？怎么就是自己不能纠正？只有请你**

**们来才行？”**

话说1959年7月21日晚，毛泽东召集部分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区负责人举行汇报会。

此时，毛泽东已经没有一周前那种轻松了，也没有3天前决定印发《阿Q正传》时那样坦然了。在庐山会议与会者中，已经分成了两大派：支持彭德怀意见的人越来越多了，不但有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刘澜涛、赵尔陆、陶鲁笳、贾拓夫、万毅，还有一个重量级的人物，他就是朱德。而与他们针锋相对的是，起而反击的人也越来越多了，除了大多数中央领导人及中央各部的一些负责人以外，几乎所有省、市、自治区的第一书记，都站在了彭德怀的对立面。而且双方的言辞也越来越激烈了。

支持彭德怀的人说：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个人决定”、“政治性问题”、“纠‘左’比纠右难”，毛泽东“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不像炮击金门、平定西藏叛乱那么得心应手”。会下还有人议论说：“举凡是犯路线错误，自己都是不能纠正的。”

反对彭德怀的人说：彭德怀是拉队伍。书记处快一半对一半了。彭德怀反对唱《东方红》，反对喊万岁。他在西北组发牢骚说：“延安整风操了我40天娘”。**他在南京的火车上讲：“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可能要请苏联红军来。”**

刘少奇、周恩来、彭真和各大区负责人在这天晚上的汇报会上都发言说，彭德怀的问题不解决，全党无法团结一心，共度难关。毛泽东一支接一支地吸烟，他说：

**“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是路线错误，难道少慢差费地搞建设才是路线正确？从郑州会议以来，我们一直在检讨，在纠正‘左’的错误，形势不是好转了吗？怎么就是自己不能纠正？只有请你们来才行？**为了你彭德怀，我给林彪发了复员费，叫贺龙登门道歉，叫萧克做检查，还有刘伯承泪洒怀仁堂。**请苏联红军来？苏联红军就听你的？跟你走我就上山打游击！”**

毛泽东的胸膛开始起伏，喘息声也逐渐变得粗重起来。又有人汇报说：

“今天总理召集开会，曾希圣、谭震林同黄克诚拍桌子大吵一通。”

“吵什么？”

“周惠说，各省第一书记应该各打50大板屁股，别人都不行，就他能当第一书记。”

毛泽东“噢”了一声，将大手一扇，说：

“现在党内党外都在刮风，党内一部分材料我还没看完。”

他略一停顿，嘴角浮出带有嘲讽的浅笑，接着说道：

“**不论什么话都让讲，无非是讲得一塌糊涂。要硬着头皮顶住**，反右时发明了这个名词。要顶住，顶1个月，2个月，半年，1年，3年5年，10年8年。”

有人插话说：

“打个持久战。”

毛泽东说：

“赞成。**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塌下来，因为我们作了一些好事，腰杆子硬。**我劝你们腰杆子要硬起来。**无非是一个时期猪肉少了，头发卡子少了，又没有肥皂，叫作比例有所失调，工业农业商业交通都紧张，搞得人心也紧张。**我也紧张，说不紧张是假的。上半夜你紧张紧张，下半夜安眠药一吃，就不紧张了。我劝同志们沉住气，继续往后看。”

毛泽东多年来从没有感受到这种压力，晚上失眠了。他吃了3片安眠药，但仍然无法入睡，只好在屋里来回踱步，以待黎明。

那些批评他的人，用孔子的话“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来咒骂他。毛泽东在不眠之夜，忍受着诅咒他断子绝孙的那种不公开的指责和折磨。

毛泽东纠正“左”的错误，是在肯定三面红旗的前提下进行的。彭德怀则认为三面红旗本身有问题，应当解决指导思想问题。毛泽东把国内外阶级斗争与彭德怀的意见联系起来，认为彭德怀是代表资产阶级向党进攻，怀疑彭德怀与赫鲁晓夫有联系。**赫鲁晓夫1958年在北京嘲笑中国的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刚从东欧回来的彭德怀也说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毛泽东认为彭德怀说“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是想在党内“出来挂帅”，要篡党夺权。**

他彻夜难眠，写信给正在北戴河度假的江青，附寄了一份准备答复彭德怀的发言稿。

江青打电话给毛泽东，说她马上飞到庐山来，以便在这场斗争中和毛泽东待在一起。毛泽东说：

“不要来了，斗争太激烈了。”

江青还是来了。

7月22日，毛泽东找来几个人谈话。柯庆施、李井泉对纠“左”不满，柯庆施认为，彭德怀的信是对着总路线，对着毛泽东的。他说：

“现在很需要主席出来讲话，顶住这股风，不然队伍就散了。”

7月22日晚，毛泽东后半夜吃了安眠药，还不能入睡，便打电话找来刘少奇和周恩来。他和刘少奇、周恩来议定：第二天开大会。

7月23日凌晨3点，刘少奇走后，毛泽东吃了3次安眠药，仍然睡不着。他已经几天没有好好吃东西了，管理员急了，问道：

“主席，你这几天吃不好，是不是饭做得不好？”

“不是你们的事。”

毛泽东说了这么一句，管理员不便再问了。值班卫士对管理员说：

“3天，整整3天不怎么吃饭。端上去了，又拿下来了，吃也只吃一点。咱不知道什么事，不但我们不知道，再往上七八个级别的也不知道。不是中央委员级的，谁也不知道，不准进去呀。”

7月23日上午，毛泽东来到交际处西餐厅，走到前台，他见政治局委员应该坐的第一排交椅上没有彭德怀，便四处张望，问：

“彭老总呢？”

李银桥望望会场，以下巴示意说：

“那边，门口。”

毛泽东终于看到了彭德怀剃了很亮的光头。他远远地坐在门那边，一脸的不悦之色。毛泽东走上主席台，坐了下来。他的眼圈里布满了红丝，以沉闷抑郁的声音开始讲话。他面无表情地说：

“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个把钟头，可不可以？”

他点燃了一支烟，吸了一口，稳定了一下情绪，接着说：

“吃了3次安眠药，睡不着。我看了同志们的发言记录及许多文件，还跟一部分同志谈了话，感到有两种倾向：一种是触不得，大有一触即跳之势。吴稚晖形容孙科，一触即跳。现在有些同志不让人家讲坏话，只愿人家讲好话，不愿听坏话。因之，有一部分同志感到有压力。两种话都要听。我跟这些同志谈过，劝过他们，不管好话、坏话，两种话都要听嘛。嘴巴的任务，一是吃饭，二是讲话。既有讲话之第二种任务，他就要讲。还有，人长了耳朵，是为了听声音的，就得听人家讲话。**话有3种：一种是正确的，二是基本正确或不甚正确的，三是基本不正确或不正确的。两头是对立的，正确与不正确是对立的。好坏都要听。**

现在党内党外都在刮风。**右派讲，秦始皇为什么倒台？就是因为修长城。现在我们修天安门，搞得一蹋糊涂，要垮台了。**党内这一部分意见我还没有看完，集中表现在江西党校的反应，各地都有。邵大个（江西省长邵式平——笔者注）你不必着急，你们搞出的这个材料，实在好，今天就印出来。所有右派言论都印出来了，龙云、陈铭枢、罗隆基、章伯钧为代表。江西党校是党内的代表，这些人不是右派，可以变就是了，是动摇分子。他们看得不完全，有火气，做点工作可以转变过来。有些人历史上有问题，挨过批评。例如广东军区的材料，有那么一批人，对形势也认为一蹋糊涂。这些话都是会外讲的，我们这一回是会内会外结合，可惜庐山地方太小，不能把他们都请来。像江西党校的人，罗隆基、陈铭枢，都请来，房子太小嘛。

不论什么话都让讲，无非是讲得一蹋糊涂。这很好。越讲得一蹋糊涂越好，越要听。‘硬着头皮顶住’，反右时发明了这个名词。我同某些同志讲过，要顶住，顶一个月，两个月，半年，一年，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有的同志说‘持久战’，我很赞成。这种同志占多数。在座诸公，你们都有耳朵，听嘛！难听是难听，要欢迎。你这么一想就不难听了。为什么要让人家讲呢？其原因在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塌下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做了一些好事，腰杆子硬。那些听不得坏话的人，他那个腰杆子有些不硬。你如果腰杆子真正硬，坏话你为什么听不得？我们多数派同志们腰杆子要硬起来。为什么不硬？无非是一个时期猪肉少了，头发卡子少了，又没有肥皂，叫作比例有所失调，工业、农业、商业交通都紧张，搞得人心紧张。我看没有什么可紧张的。我也紧张，说不紧张是假的，上半夜你紧张，下半夜安眠药一吃，就不紧张了。

说我们脱离了群众，我看是暂时的，就是两三个月、春节前后，群众还是拥护我们的，现在群众和我们结合得很好。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但不那么多。我同意同志们的意见：问题主要是公社运动。我到遂平谈了两个钟头。嵖岈山公社党委书记告诉我，7、8、9三个月，平均每天有3000人参观，10天3万人，3个月30万人。听说徐水、七里营也有这么多人去参观，除了西藏，都有人来看了，到那里去取经，其中多是县、社、队干部，也有省、地干部。他们的想法是：河南人、河北人创造了真理，有了罗斯福说的‘免于贫穷的自由’；就是太穷了，想早点搞共产主义，现在听说这些地方搞共产主义，那还不去看看。对这种热情如何看法？总不能说全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吧，我看不能那样说。有一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确是狂热，无非是想多一点、快一点。好省那时谈不到，总而言之是多快。这种分析是否恰当？3个地方3个月当中，有3个30万人朝山进香，这种广泛的群众运动，不能泼冷水，只能劝说：同志们！你们的心是好的，但事实上难以办到，不要性急，要有步骤。吃肉只能一口一口地吃，不能一口吃成一个胖子。你吃3年肉也不一定胖；比如林彪同志，我看他10年还不会胖；总司令和我的胖，也非一朝一夕之功。这些干部率领几亿人民，至少30％是积极分子；30％是消极分子（即地、富、反、坏、官僚、中农和部分贫农）；40％随大流。30％是多少人？是一亿几千万人，他们要办公社，办食堂，搞大协作，大规模耕作，非常积极。他们要搞，你能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不是小资产阶级，是贫农、下中农、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随大流的，这也可以，那也可以，不愿意的只30％。总之，30％加40％为70％，三亿五千万在一个时期内有狂热性，他们要搞。

到春节前后，有两个多月，他们不高兴了，变了，干部下乡都不讲话了，请吃地瓜、稀饭，面无笑容，因为刮了‘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提款’。对刮‘共产风’也要分析，其中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是些什么人？主要是县、社两级干部，特别是公社干部，刮大队和小队的，这是不好的，群众不欢迎。我们说服了这些干部，坚决纠正，用了一个多月时间，今年三四月间，就把风压下去了，该退的退，社与队的账算清楚了，队跟群众的账有些地方也算清楚了，未算清的再继续算。这一个月的算账教育是有好处的，极短的时间，使他们懂得了平均主义不行。听说现在大多数人转过来了，只有少数人还留恋‘共产’，还舍不得。哪里找这样一个学校、短期训练班，使几亿人、几百万干部受到教育？不能说你的就是我的，拿起就走了。从古以来没有这个规矩，一万年以后也没有这个规矩，也不能拿起就走。拿起就走，只有青红帮，青偷红劫，明火执杖，无代价剥夺人家的劳动。这类事，自古以来是‘一个指头’。晁盖劫的是‘生辰纲’，是不义之财，取之无碍，刮自农民归农民。我们长期不打土豪了。打土豪，分田地，都归公，那也取之无碍，因为是不义之财。现在刮‘共产风’，取走生产大队、小队之财，肥猪、大白菜，拿起就走，这样是错误的。**我们对帝国主义的财产还有3种办法：征购，挤垮，赎买。怎么能剥夺劳动人民的财产呢？只有一个多月就平息下这股风，证明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今年3、4月或5月，有几亿农民，几百万干部受了教育，讲清了，想通了。主要是讲干部，不懂得这个财并非不义之财，而是义财，分不清这个界限。

干部没有读好政治经济学，价值法则、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没有搞通几个月就说通了，不办了。十分搞通的未必有，九分通、七八分通。教科书还没有读，要叫他们读。公社一级干部不懂一点政治经济学是不行的。不识字的可以给他们讲课。梁武帝有个宰相陈庆之，一字不识，皇帝强迫他作诗，他口念，叫别人写：‘微生遇多幸，得逢时运昌。朽老筋力尽，徒步还南冈。辞荣此圣世，何愧张子房。’他说你们这些读书人，还不如老夫的用耳学。当然，不要误会，我不是反对扫除文盲。柯老（柯庆施——笔者注）说，全民大学，我也赞成，不过15年不行，恐怕得延长一点，几亿人口嘛。南北朝时有个姓曹的将军（指梁朝的曹景宗——笔者注），打了仗回来作诗：‘出师儿女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过路人，何如霍去病？’还有北朝的将军斛律金，这也是一个一字不识的人，他有《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罩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一字不识的人可以作宰相，为什么我们公社的干部、农民不可以听政治经济学？我看大家可以学。不识字讲讲就懂了，现在不是农民学哲学么，工人学哲学么，他们比我们，比知识分子容易懂。我们这次议事日程就有读书这一项。我也是个没学问的人，这个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我就没有看；略微看了一点，才有发言权，也是怕大家来考我，我答不出怎么办？要挤出时间读书，全党来个学习运动。

他们（指省以下各级地方干部——笔者注）不晓得作了多少次检查了，从去年11月郑州会议以来，大作特作，6级会议、5级会议都要检讨。北京来的人哇啦哇啦，他们当然听不进去：我们作过多次检讨，难道就没有听到？我就劝这些同志，人家有嘴巴嘛，要人家讲嘛。要听听人家的意见。我看这次会议有些问题不能解决，有些人不会放弃自己的观点，无非拖着嘛，1年2年，3年5年，8年10年。无非两个可能，一个可能放弃，一个可能不放弃，两者都可以，何必怕呢？我找大区区长开了一次会，我就是这么讲的，对不对？没有扯谎吧。听不得坏话不行，要养成习惯，我说就是硬着头皮顶住。无非是讲得一塌糊涂，骂祖宗三代。这也难。我少年时代、青年时代，也是听到坏话就一股火气。**我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这个原则，现在也不放弃。现在学会了听，硬着头皮顶住。听他一两个星期，劝同志们要听，你们赞成不赞成，是你们的事，不赞成，无非我有错误。有错误嘛，还是真有错误？假有错误？真有错误，我作自我批评，再来一次；假有错误，那是你们的事。**你们弄假成真，本来不错，你们说嘛。

第二方面，我劝另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的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据我观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动摇的。他们也说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都是正确的，但要看讲话的思想方向站在哪一边，向哪一方面讲。这部分同志是我讲的4种人里面的第二种人，‘基本正确，部分不正确’的这一类人，但有些动摇。所谓4种人是：完全正确；基本正确，但是部分不正确；基本不正确但部分正确；完全不正确。有些人在关键时是动摇的，在历史的大风大浪中不坚定。党的历史上有4条路线；陈独秀路线，立三路线，王明路线，高饶路线。现有是一条总路线，在大风浪时，有些同志站不稳，扭秧歌。蒋帮不是叫我们做秧歌王朝吗？这部分同志扭秧歌，他们忧心如焚，想把国家搞好，这是好的。这叫什么阶级呢？资产阶级还是小资产阶级？我现在不讲。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二次党代大会讲过，1956年、1957年的那种动摇，对动摇分子，我不赞成戴帽子，讲成是思想方法问题。也不讲小资产阶级，也不讲资产阶级。如果现在要讲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反过来讲，那时的反冒进，就是一种资产阶级的什么性？狂热？**资产阶级它不狂热，是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泄气性、悲观性了**。我们那个时候不戴帽子，因为这些同志跟右派不同，右派不搞社会主义，那些同志是要搞社会主义，没经验，一点风吹草动，就以为冒了，于是反冒进。”

毛泽东扭头对坐在旁边的周恩来说：

“**总理，你那次反冒进，这回站住脚了，干劲很大，极大，是个乐观主义了。因为受过那次教训，相信陈云同志来了，他也会站住脚的。”**

说罢，他点燃了一支烟，吸了一口，对众人说：

“**那次批周、陈的人，一部分人想取其地位而代之，有点那个味道，没有那么深，但是也相当深，就是不讲冒进了**。不讲反冒进，可是有反冒进的味道，比如‘有失有得’，‘失’放在前面，这都是仔细斟酌了的。如果要戴高帽子，这回是资产阶级动摇性，或降一等，是小资产阶级动摇性，是右的性质，往往是受资产阶级影响，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压力之下，右起来的。

**一个高级社，现在叫生产队，一条错误，七十几万个生产队，七十几万条错误，要登报，一年登到头也登不完。这样结果如何？国家必垮台。就是帝国主义不来，农民也要起来革命，把我们这些人统统打倒。办一张专讲坏话的报纸，不要说一年，一个星期也会灭亡的，大家无心工作了。马克思讲，莫说一年，就几个星期停止工作，人类也要灭亡的。只要你登70万条，专登坏事，那还不灭亡呵！不要等美国、蒋介石来，我们国家就灭亡了，这个国家应该灭亡，因为那就不是无产阶级党了，而是资产阶级党了，章伯钧的设计院了。**当然在座的没有人这样主张，我这是夸大其词。**假如办10件事，9件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就另外组织解放军。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

我劝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问题要注意，讲话的内容，我看基本是正确的，部分不妥。列宁讲，要别人坚定，首先自己要坚定；要别人不动摇，首先自己要不动摇。这又是一次教训。这些同志现在据我看，他们还不是右派，是中间派；也不是左派。我所讲的左派，是不加引号的左派，是真正的左派，马克思主义者。我所讲的方向，是因为一些人碰了钉子，头破血流，忧心如焚，站不住脚，动摇了，就站到中间去了。究竟中间偏左偏右，还要分析，**他们不是右派，但他们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我时常讲，**你们自己把自己抛到离右派30公里，接近30公里了，因为右派很欢迎这种论调，右派一定欢迎，不欢迎才怪，距离右派不过还有30公里。**这种同志采取边缘政策，相当危险。我这些话是在大庭广众当中讲的，有些伤人。但现在不讲，对这些同志不利。

我出的题目中加一个题目，本来18个题目，加一个团结问题。还是单独写一段，拿着团结的旗子：人民的团结，民族的团结，党的团结。我不讲，对这些同志是有益还是有害？我看有害，还是要讲。我们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第一方面的人要听人家讲，第二方面的人也要听人家讲，两方面的人都要听人家讲。我说还是要讲嘛，一条是要讲，一条是要听人家讲。为什么只有你讲得，我讲不得？别人讲不得？但是我劝许多人不忙讲，硬着头皮顶住。我不忙讲，也硬着头皮顶住。我为什么现在不硬着头皮顶了呢？顶了20天，快散会了，索性开到月底。马歇尔八上庐山，蒋介石三上庐山，我们一上庐山，为什么不可以？有此权利。

食堂问题。食堂是个好东西，未可厚非。我赞成积极办好，赞成那些原则，自愿参加，粮食到户，节约归己。如果在全国能保持1/3，我就满意了。我是讲全国范围。我这一讲，吴芝圃就很紧张，生怕把你那个食堂搞掉。还有一个四川，一个云南，一个贵州，一个湖北，还有一个上海，上海有11个县，90％以上还在食堂里。试试看，不要搞掉。不是跳舞有4个阶段吗：‘一边站，试试看，拼命干，死了算。’有没有这4句话？我是个野人，很不文明。我看试试看。1/3人口对5亿农民来说，多少人？一亿五千万，坚持下去就了不起了，开天辟地了。第二个希望，一半左右，如果多几个河南、四川、湖北、云南、上海等等，那么，一半左右是可能的。要多方面取得经验，有些散了，还得恢复。《红旗》登的一个食堂，败而复成，这篇是我推荐的。**食堂并不是我们发明的，是群众创造的。并不是公社发明的，是合作社发明的。**湖北有个京山县，京山县有一个合作社，那个合作社就办了个食堂。河北1956年就有办的，1958年搞得很快。曾希圣说，食堂节省劳力。我看还节省物资，包括粮食油盐柴草菜蔬，比在家吃得好。如果没有后面这一条，就不能持久。可否办到？可以办到。我建议河南同志把一套机械化搞起来，如用自来水，不用人挑水。这样可以节省劳力，还可以节省物资，节省粮食。我跟你们谈，你们说可以嘛。现在散掉一半左右有好处。总司令，我赞成你的说法，但又跟你有区别。不可不散，不可多散，我是个中间派。河南、四川、湖北等是左派。可是有个右派出来了：一个科学院调查组，到河北昌黎县，讲得食堂一塌糊涂，没有一点好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学那个宋玉的办法，写《登徒子好色赋》。”

接着，毛泽东就讲了宋玉写《登徒子好色赋》这个典故，而后说：

“我讲食堂，走了题了。科学院的调查，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食堂哪没有缺点？无论什么事都有缺点，无论什么人都有缺点，孔夫子也有错误。我看到列宁的手稿，改得一蹋糊涂，没有错误，为什么要改？食堂我看可以维持，可以多一点，再试试看，试它一年，二年，估计可以办得下去的。人民公社会不会垮台？我看现在这样大风大浪里头，没有垮一个，将来准备垮一半，还有一半；垮七分，还有三分。要垮就垮。食堂、公社办得不好，一定要垮。共产党就要做工作。办好公社，办好一切事业，办好农业，办好工业，办好交通运输，办好商业，办好文化教育。

许多事情根本料不到，以前不是说党不管党吗？计委是计划机关，现在却不管计划。还有各个部，还有地方。一个时期不管计划，就是不管综合平衡。不要比例，这一条没有料到，地方可以原谅，计委和中央各部，10年了，忽然在北戴河会议后不管了，名曰计划指标，等于不要计划。所谓不管计划，就是不要综合平衡，根本不去算，要多少煤、多少铁、多少动力。煤铁不能自己走路，要车马运。这点没有料到。我这样的人，总理、少奇同志这样的人，根本没有管，或者略略一管。我不是自己开脱自己，我又不是计委主任。去年 8月以前，我同大多数常委同志主要精力放在革命上头去了，对建设这一条没有认真摸，也完全不懂，根本外行。在西楼时讲过，不要写‘英明领导’，根本没有领导，哪来什么英明呢？

看了许多讨论发言，铁还可以炼。浪费是有一些，要提高质量，降低成本，降低含硫量，为真正炼好铁奋斗。共产党有个办法叫作抓。共产主义者的手，一抓就抓起来了。钢铁要抓；农林牧副渔，粮棉油麻丝糖药烟果盐杂，农中有12项，要抓。要综合平衡，不能每一个县都一个模子，有些地方不长茶，不长甘蔗，要因地制宜，不能到回民地区去买卖猪。党不管党；计委不管计划，不管综合平衡，根本不管，不着急。总理着急。无一股热气，神气，办不好事。李逵太急一点。列宁热情磅礴，可以感染群众，实在好，群众很欢迎。

有话就要讲。口将言而嗫嚅，无非是各种顾虑，这个我看要改，有话就要讲。上半个月顾虑甚多，现在展开了，有话讲出来，记录为证，口说无凭，立此存照。有话就讲出来嘛，你们抓住，就整我嘛。成都会议上我说过不要怕穿小鞋。穿小鞋有什么要紧。还讲过几条，甚至说不要怕坐班房，不要怕杀头，不要怕开除党籍。一个共产党员，高级干部，那么多的顾虑，有些人就是怕讲得不妥挨整。这叫明哲保身，叫作什么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我今天要闯祸，祸从口出嘛。两部分人都不高兴：一部分是触不得的，听不得坏话的；一部分是方向危险的。不赞成，你们就驳。你们不驳，是你们的责任，我交代了，要你们驳，你们又不驳。说我是主席不能驳，我看不对，事实上纷纷在驳，不过不指名就是。**江西党校那些意见是驳谁呵！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有两条罪状：一个，1070万吨钢，是我下的决心，建议是我提的。结果9000万人上阵，补贴40亿，‘得不偿失’。第二个，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推广之权。北戴河决议也是我建议写的。我去河南调查时，发现嵖岈山这个典型，得了卫星公社的一个章程，如获至宝。你讲我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也是有一点，不然为什么如获至宝呢？要上《红旗》杂志呢？我在山东，一个记者问我，‘人民公社好不好？’我说‘好’，他就登了报。这个没关系，你登也好，不登也好，到北戴河我提议要作决议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你们赞成了，也分点成。但始作俑者是我，推不掉。人民公社，全世界反对，苏联也反对。中国也不是没有人反对，照江西党校这样看，人民公社还有什么意思。还有个总路线，是虚的，实的见之于农业、工业。至于其它一些大炮，别人也要分担一点。你们放大炮也相当多，如谭老板，”

毛泽东以手指着谭震林说：

“放的不准，心血来潮，不谨慎。他是唱戏的，不然为什么叫谭老板？长处是有一股干劲，肯负责任，比那凄凄惨惨戚戚要好。关于共产要共得快呀，在河南讲起，江苏、浙江的记录传得快，说话把握不大，要谨慎一点。”

他又用手指指自己的鼻子，说：

“你说我不放大炮吗？我也放了3个：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炼钢铁，一个总路线。彭德怀同志讲的，张飞粗中有细，他说他粗中无细。我说我也是张飞，粗中有点细。公社我讲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要有个过程。当然那个过程，现在看起来，可能过于短了一点，我讲大体两个‘五年计划’。**要进到全民所有制，现在看来，可能要大大的延长，不是两个‘五年计划’，而是20个‘五年计划’也难说。**要那么久？还是不要那么久？

要快之事，马克思也犯过不少错误。我搬出马克思来，使同志们得到一点安慰。**这个马克思，天天想革命快，一见形势来了就说欧洲革命来了，无产阶级革命来了，后头又没有来；过一阵子又说要来，又没有来。总之，反反复复。马克思死了好多年，列宁时代才来。那还不是急性病？小资产阶级狂热性？马克思也有呵！”**

刘少奇插话说：

“列宁也有，讲世界革命很快就要来了。”

毛泽东接着说：

“世界革命，那个时候他希望世界来援助。后来不行了，搞出一个一国可以建设社会主义，这话在以前也讲过吧？”

刘少奇插话说：

“是一国可以胜利，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没有讲。”

毛泽东说：

“一国可以胜利，到这个时候，不建怎么办？只有一国。”

刘少奇插话：

“依靠自己本国农民可以建成社会主义没有讲。”

斯大林在《列宁主义问题》一书第六部分“关于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问题”中，曾经明确地提出了“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而且我们将和农民一起去建设它”。熟读马列经典著作的毛泽东，不但熟悉这些著名论断，而且还正在努力的践行着这一理论，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刘少奇在后两次插话中的断语，显然是错误的，毛泽东此时也顾不上理会他，只说了句“依靠农民”，便照着自己的思路继续说下去：

“巴黎公社起义之前，马克思反对。季诺维也夫反对十月革命，这两者是不是一样？季诺维也夫后来开除党籍，杀了头。马克思是否还要杀头？巴黎公社起义爆发之后，马克思就赞成了，但他估计会失败。他看出这是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哪怕只存在3个月也好。要讲经济核算的话，划不来。我们还有广州公社，1927年大革命失败，等等。我们现在的经济工作，是否会像1927年那样失败？像万里长征那样，大部分根据地丧失，红军和党都缩小到1/10，或者还不到？我看不能这样讲。大家也是这么个意见，参加庐山会议的同志都毫无例外地说有所得，没有完全失败。是否大部分失败了？我看也不能讲。大部分没有失败，一部分失败了。就是所谓多付了代价，多用点劳动力，多付了一点钱，刮了一次‘共产风’，可是全国人民受了教育，清醒了。现在要研究政治经济学，过去谁人去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我就不读。斯大林的书（指《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笔者注），我读了一遍，根本没有味道。那个时候搞革命，搞什么社会主义经济。唉，一到郑州，我就读了两遍，我就讲学，就有资格讲学了，不过刚刚在火车上读了两遍。我讲了两章，没有造谣吧。现在不够，现在要深入研究，不然我们的事业不能发展，不能够巩固，不能够前进。

**如果讲到责任，责任在李富春，责任在王鹤寿，其他部长多多少少有点责任；农业部有责任，谭老板有责任。主要责任应当说在我身上。**过去说别人，现在别人说我，应该说我。过去说周恩来、陈云同志，现在说我，实在是有一大堆事情没有办。你们看，**‘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中国的习惯，男孩叫有后，女孩不算。我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疯了。我看是没有后的。**一个大炼钢铁，一个人民公社。大跃进的发明权是我，还是柯老？我同柯庆施谈过一次话，我说还是我。你那个属于意识形态，你有没有责任（柯庆施曾在1957年12月上海党代会作过一个长篇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内容重提多快好省，要15年赶超英国，具有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大跃进’精神，极为毛泽东赞赏，成为南宁会议的先声——笔者注）？钢铁你要搞 600万吨，我要搞1070万吨，北戴河会议公报，薄一波建议，也觉得可行。从此闯下大祸，9000万人上阵。始作俑者是我，应该绝子灭孙。补贴40亿，搞小土群，小洋群。‘得不偿失’，‘得失相当’等等说法，即由此而来。我劝同志们，自己有责任的，统统分析一下，不要往多讲，也不要往少讲，都吐出来。无非拉屎嘛，有屎拉出来，有屁放出来，肚子就舒服了。今天不再讲别的，因为还要睡觉。你们要继续开会就开，我就不开了。讲了好久？不到两个钟头嘛。散会！”

宣布散会后，毛泽东起身张望着会场，问：

“彭老总呢？”

李银桥说：

“走了。”

据李银桥回忆：散会后，毛泽东出门朝坡下走，身边跟着陶铸、彭真、柯庆施、罗瑞卿，还有第4小组副组长舒同。罗瑞卿朝路边的树林转过身去小便。彭德怀这时候返身走了回来，他对着毛泽东说：

“我的信是写给你个人参考的，你怎么在会上印发了？”

毛泽东愣了一下，说：

“你也没有讲不要印发嘛。”

彭德怀扭头就走。毛泽东叫着他，招了招手说：

“哎，彭老总，我们谈谈吧？”

彭德怀虎着脸，胳膊一抡，说：

“有什么好谈的？没什么好谈的！在延安你操了我40天娘，我操你20天娘不行？”

他的声音很大，罗瑞卿正在小便，吓得一激凌，连忙赶过来了。毛泽东脸色非常严肃，停了停说：

“没关系嘛，我们有不同意见可以坐下来谈谈心嘛。”

彭德怀气得脸色涨红，又抡了一下胳膊，说：

“谈什么谈？你不是谈过了嘛！有什么好谈的！”

彭德怀又骂了一句走了。陶铸等人都怔住了。毛泽东被晾在那里，脸色很不好，吮了吮下嘴唇就走了，一路上再没有说话。

7月23日下午，周恩来先召集副总理们谈话，他说：

**“9000万人上山，1070万吨是一个革命。**2700至3000万吨则根据不多，现在落实到1300万吨。”

彭德怀气哼哼地说：

“我写的‘有失有得’是讲小土群这一点，只讲这一点，根本没讲小洋群。”

周恩来温和地说：

**“把‘失’放在前面是有意识的，**应该把落实同泄气区分开。”

彭德怀直通通地说：

“1070万吨，脑子热了一下，他是有一份的。但总的路线不能动摇，而且他比较冷得早，10月底冷下来了。这次会议，我为什么要写这封信供主席参考，我有个感觉，共产党有不敢批评的风气了，写个东西要字斟句酌，我实在忍不住了。”

周恩来又安慰他说：

“主席讲了，基本上是好的，方向不大对。当然，他没指名。要注意，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你还没有到反冒进那个情况，有那个趋势。你到此为止，认识了，就是了，这个批评也很好。”

彭德怀说：

“共产党里不能批评，这违反共产党的基本原则！”

**周恩来绕山绕水地讲到了钢、铁、煤、粮方面的紧张形势。彭德怀立刻叫了起来：**

**“这些情况你为什么不到大会上讲一讲呢？”**

**周恩来说：**

**“开始就讲这些困难，像诉苦会了，误会成泄气不好。”**

**彭德怀眯起两眼，盯住周恩来，说：**

**“你们真是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猾！”**

这天下午，会议分组讨论毛泽东上午的讲话。一部分人高兴，说讲话给他们撑了腰。一部分人紧张，一些曾对彭德怀的信说过好话的人，纷纷检讨。

7月23日黄昏，彭德怀在散步时迎面碰见聂荣臻，聂荣臻扬起一只手，招呼道：

“老彭啊，今天上午主席的讲话，考虑好了没有？”

彭德怀瓮声瓮气地说：

“是非曲直由人断，事久自然明么。”

聂荣臻劝道：

“老彭，不能采取满不在乎的态度，主席午前讲话，从政治上、组织上、路线上，已经提到了原则的高度，你应当考虑对党对人民如何有利的问题，写成书面发言。”

彭德怀说：

“现在很疲劳，写不出来，也写不清楚。”

聂荣臻说：

“你讲意思，叫秘书记录整理，然后，你自己再去斟酌，这样比较严密，也比较深刻些。”

彭德怀说：

“没带秘书，只带来一个管军事电报的大尉参谋，他写不了这类文章。唉，谁知道会出这么一档子事！”

“把秘书叫来，这种时候，一定要叫来。”

聂荣臻最后还一再叮嘱。彭德怀作别而归，后来还真的把秘书给叫来了。

7月23日晚，因会议原定延长7天已经到期，与会者们都准备下山了。毛泽东也交代身边的工作人员，准备明天下山。

可就在此时，几位政治局常委在一起议论说：

**“彭德怀脾气大，怕主席死后没人能领导得了。**”

几位老帅也在一起议论说：

**“彭德怀桀骜不驯，主席健在就这样，将来党内谁还管得了他？**”

于是，这些重要领导人物和大区、省委的领导人都先后来找毛泽东谈话。李银桥去倒水时听到他们讲的都是彭德怀。有人说，红军时期彭德怀就反对毛泽东。有人说，彭德怀原名叫彭得华，有野心，就是想得到中国。

毛泽东也觉得会议的目的没有达到，认识不统一就没法团结，不团结如何继续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因此，他决定会议继续延期。

不多时，各组就接到了正式通知，说不下山了，会议继续进行。

这天晚上，毛泽东显得很烦躁，吃了3次安眠药还不能入睡，只是躺着看书，看材料。他突然问值班卫士田云玉：

“你知道彭老总原来叫什么名字吗？”

毛泽东知道田云玉以前曾经跟着彭德怀工作过，有可能知道彭德怀的别名。田云玉见毛泽东这样问，便摇摇头，说不知道。毛泽东说：

“彭老总原来叫彭得华，就是要得到中国。”

田云玉大吃一惊，不由得打了个哆嗦。毛泽东又问：

“你知道庐山会议发生什么事情了？”

田云玉仍然是摇头，毛泽东不再说话，继续看他的书。

在庐山上这个不眠之夜，支持彭德怀的人们也像中央最高层领导人及各大区、各省委主要领导人一样忙碌着。一场惊人的风暴正悄无声息的在夜幕中慢慢地孕育着。

周惠和周小舟在房间里议论着毛泽东上午的讲话。周惠沙哑着嗓子说：

“一上山我就发言，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怕的就是听不进批评。现在果不其然，成了‘毒药’苦口要了命。**忠言也要分个阶级性？我们这些人还能是哪个阶级？良药还是毒药，难道真分不出？**”

周小舟情绪也非常激动，他说：

**“我怀疑主席这篇讲话是否经过常委讨论，是常委会的意见还是他个人的意见？自己有错误不许别人讲，就喜欢柯庆施那样一帮吹牛抬轿奉承迎合的人**。”

二人正说着，李锐进来了。

李锐是在上午听了毛泽东的讲话之后，与田家英、陈伯达、吴冷西一起信步到了半山亭，观摩了刻在大石上的王阳明的诗句。有人提议说，留副对联吧？李锐手执松枝正在沉吟，田家英已脱口吟道：

四面江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

田家英所吟此联，乃是岳麓山上的一幅楹联，他只是将上联中的“云”字改成了“江”字。时人及后人不知底细，还以为是田家英忧国忧民，才思敏捷，出口成章。因之颇为称道。其实，毛泽东早就说过，岳麓山上的这幅楹联，正是他在一师求学时的真实写照。

李锐下得半山亭，回到住处，依然是心情抑郁，憋闷了一个下午。晚上来找周小舟、周惠，自然是要一吐胸中块垒。周惠见李锐落座，遂“唉”了一声，长出一口气，又继续说道：

“**多年来的顺境，有些胜利冲昏了头脑**。在长沙我看一份材料，斯特朗曾赞扬主席超过马恩列斯，主席对此却没有表态。当时我说这不对。长江后浪赶前浪，学生超过老师也是正常的。可主席怎么能健在的时候被人这么比，这么说？**何况现在真超过了吗？不能这么讲吧。我的感觉，是确实骄傲起来了。”**

周小舟情绪更激烈，他说：

“**照上午的讲话精神发展下去，我看很像斯大林晚年**，**没有真正集体领导，只有个人独断专行。”**

李锐点点头说：

“苏联的教训值得深思。”

周小舟说：

“我看这样下去，非导致党的分裂不可。”

周惠说：

“17号晚上还谈得好好的，主席对一些问题的决定，反复变化也太快了。”

李锐说：

“从根本上讲，**主席还是喜欢高指标喜欢说大话喜欢放大炮的人**。当然，讲大话的人也有不同。柯庆施吹牛讲大话，还喜欢推卸责任。谭老板放大炮，但敢于负责，跟柯庆施不一样。**像黄克诚这样的偏于稳重多看困难的人，主席就不喜欢。**”

周惠又分析说：

“我们都是搞过群众运动的，究竟应该怎么看待群众运动？主席讲，‘1亿几千万人，他们要办公社，办食堂，非常积极’。实际呢？我看不能说是群众自发。主席先讲过话么，说高级社还不够大，应该更多的社合起来。甚至讲一个乡组成一个社。许多县社干部都是响应他的号召，并不是农民先提出这个要求。首先是我们去发动，然后才是农民响应。彭老总有些话很深刻，他说：‘毛主席与党中央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滥用这种威信是不行的。’砸锅炼铁，好锅炼成废铁，明明是违背人民利益的，但在一定时候群众也能响应，做出这种牺牲。党的威信就是这么高。可长远呢？滥用这种威信，我担心会走向反面哟。”

李锐也说：

“**明明讲的纠‘左’，一夜之间又变成反右，这样的讲话不是翻云覆雨是什么？**180度大转变，我可转不过这个弯。”

周小舟已经被二人说得脸上泛出红晕，他坐不住了，说：

“我建议咱们3人再去找主席谈谈，辩论一顿，争吵一顿也好。”

李锐摇摇头说：

“不行，现在去不合适。从上午的讲话看，主席正在气头上，去也没法谈。”

“那就找黄克诚。咱们找黄克诚去谈谈。”

“这种时候去，不好。”李锐劝道：“不要授人以柄。”

“现在去不合适。”周惠也说：“不要去了。”

“横竖不过如此，去，怕个什么？”

周小舟拨通了黄克诚的电话，黄克诚不同意他们去。周小舟已经激动得无法控制，越是不叫去越要去。黄克诚只好勉强同意了。

“走！”周小舟放下电话说：“一起去！”

李锐见事已至此，只好同行。周惠深知此举的利害关系，他说：

“你们要去就去，我累了，想休息。”

周小舟已经出了门，见周惠如此这般，返回来拉着他说：

“走走走，我跟黄克诚都讲好了，你怎么能不去？”

周惠拗过不过周小舟，只好披件衣服，跟着走。周小舟进得黄克诚的门就嚷起来：

“我们都快成右派了，只差30公里。”

黄克诚急忙摆着手说：

“别急，别着急，冷静些。主席支持左的，也不会不要右的。”

周小舟哪里还能控制得了情绪，他高声问道：

“主席这样突变，有没有经过政治局常委讨论？”

黄克诚无言以对，看着激动不已的周小舟只皱眉头。周小舟见黄克诚不说话，又脱口问道：

“主席有没有斯大林晚年的危险？”

“我认为不会。”

黄克诚至此已经不能不表态了。周小舟依然非常激愤，他说：

“袁世凯要称帝，有人就特意为他办一种报纸，专讲劝进的话。袁世凯就最喜欢听这种话！”

周惠已经坐不住了。只听周小舟又嚷道：

“前一阶段鼓励进言，让把问题讲透。现在一下子180度转变，这不是钓鱼吗？”

李锐也激动了，高声叫道：

**“他不能一手遮天！”**

黄克诚见他们越说越出格，顿时急了，声色俱厉地说：

“怎么能这样说话？主席又不是慈禧太后！有意见应该直接找主席当面谈么，现在这样议论算什么？不好嘛！”

周小舟一下子怔住了。周惠趁机将话头引开去，他说：

“今年的困难估计还不少，湖南去年虽然比左邻右舍好些，但日子也够紧张，不少地区都是靠南瓜粥度过来的。最近全省普遍有旱情，我真担心秋收。可这边的会议一下子也结束不了。”

周小舟已经冷静了下来。周惠也不住地看表。李锐一看10点多了，就准备离开。黄克诚见他们要走，就劝他们说：

“你们不要激动，事情会弄清楚的。要相信主席，主席是不会错的。”

正在此时，彭德怀手拿一封电报进来了。周小舟一见彭德怀，又激动了：

“老总呀，我们离右派只有30公里啦！”

彭德怀虎着脸，说：

“着急有什么用？30公里也不要着急！把一些模糊观点弄清楚也是好的。”

“太晚了。”李锐催促周小舟：“我们该走了。”

周惠也催着说：走吧。于是，3人告辞出了176号院子。李锐与周小舟、周惠分手，要回自己的住所。他刚走出几步，就听得周小舟说：

“哎，罗部长啊。”

李锐回头一看，周小舟、周惠正与罗瑞卿迎面相遇，打着招呼。于是就急忙闪身走了。罗瑞卿“嗯”了一声，警惕地瞥了一眼176号别墅，说：

“这么晚还没睡呀？干什么去了？”

罗瑞卿是党内出了名的光明磊落的大将军，对立就对立，斗争就斗争，历来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他只有一个心眼，就是紧跟毛泽东，维护毛泽东。周小舟面对这位铁骨铮铮的大将军不得不应酬几句，他说：

“随便走走。看了看黄克诚同志。”

这才叫：三湘降下申公豹，匡庐高悬打神鞭。

欲知庐山会议如何继续进行，请慢慢往下看。

东方翁曰：本章中有两个情节都是研究庐山会议的重要史料。一个是毛泽东在7月23日上午的讲话，一个是周小舟、周惠、李锐在去找黄克诚前后的谈话内容。两者须对照一下，认真研究，方能分清是非曲直。这很有必要。因为在毛泽东身后，在庐山会议这个重大事件上，一些人为了搅浑水无所不用其极，遗毒于后世，害人不浅！

关于上述第二个情节，《戚本禹回忆录》的记载可供读者参考，书中是这样说的：“庐山会议结束后，在会议期间一直在主席身边工作的林克，告诉了我在庐山会议上发生的这样一个情况。在庐山上，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周惠、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李锐等几个人经常晚上聚在一起。山上站岗的警卫战士发现了一个异常的情况。就是等他们这些人都进了屋子以后，就把屋子里边的灯都关上了，别人还以为里边没有人。等过了几个小时以后，人又一个一个从屋子里边走出来了。警卫战士把这个情况都作了记录，把他们几点开的灯，几点关的灯，都有什么人进去、出来等等，都作了详细值班记录。负责会议保卫工作的是罗瑞卿。罗瑞卿当时不仅是公安部长，而且还是‘防止突发事件委员会’的负责人。罗瑞卿看到了值班战士的记录，也觉得很奇怪。他就亲自到那个地方去看了，他在屋子外边的一个小树林里观察。直到那些人一个一个从屋子里边走出来了。走在最后的一个就是李锐。李锐这个人走路和别人不一样，别的人走路是朝前看的，而他却是老往后面看的。大概就是跟小说里说的司马懿差不多。可就在他回过头来看的时候，恰好同从小树林里走出来的罗瑞卿对上了眼。这一下就把李锐给吓坏了。以为他们的事情都已经被罗瑞卿发现了。”

**第74章**

**“我们讲了9个月纠‘左’，批判了9个月。你批判的那些，难道超**

**过了我们讲的？纠正了，批判了9个月，为什么还搞这一手？其目的**

**在瓦解中央领导，瓦解总路线，以为大批群众会集合于你们的旗下。**”

话说1959年7月24日，聂荣臻、叶剑英来到176号院，找彭德怀谈话。彭德怀说：

“我的信是写给主席的，是供他参考，并不是给中央的公开信，不可能对字句斟酌那么细，谁想到他拿去印发了？我既没有准备，也没有阴谋，讲的是实际情况。”

他越说火气越大：

“给主席写信反映情况，违反了哪条纪律，犯了哪条法？”

叶剑英问：

“你写信，事先同其他同志交换过意见吗？”

彭德怀说：

“小舟同志有两次到我这里来，谈了些湖南省的具体工作情况。我给他说，准备写封信给主席。没有同其他任何人提过这件事。”

“张闻天呢？”

“没谈。他几次来我这里，谈了些带全国性的经济建设工作，但绝没谈写信的事。”

聂荣臻慢条斯理地说：

“不能单从信的方面来看，要从如何对大局有利着想。要抛开信的本身，从全局利益来做检讨。”

7月25日下午，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常委和协作区负责人会议，提出了4条意见：

1、会议也还要继续展开，相互有什么意见都讲完，敞开来讲。2、现在要对事也要对人。3、前一段主要是纠“左”，现在要反右，因为现在右倾抬头了。4、要划清界限，要跟动摇的、右倾的划清界限。

7月25日夜，黄克诚还是睡不着。他从23日夜以后，每晚吃6粒安眠药，都是不能入睡。庐山上已经有了“湖南集团”的舆论，他的心病越来越严重了。周小舟、李锐所说的“斯大林晚年”、“一手遮天”这些要命的话，扰得他寝食难安。偏偏他们出门又碰上了罗瑞卿，必然会引起注意。

“小舟啊，23日晚你们出门碰见罗瑞卿，肯定会引出事。”黄克诚忧心忡忡地劝来看望他的周小舟说：“那天晚上你们一时冲动失言，万一走漏出去，很容易被认为是反对毛主席，最好你自己先向主席坦白说明情况。”

“不行啦。”周小舟忧惧参半，他说：“晚了，现在去说，只会惹出祸来。”

黄克诚见周小舟不理解自己的用心，张张嘴，没有再说什么。他也是党内一位刚直不阿、对毛泽东忠诚不二的大将军。他现在的焦虑是：几个高级领导干部，受了批评之后背地里那样议论领袖，自己不报告不处理，感到“良心上不安”。“而且，越拖得久，不是越显得心虚，越显得事情严重吗？”周小舟在毛泽东身边当了多年秘书，毛泽东对他很有感情，如果他去向毛泽东主动坦白，事情的结果可能还会好些。现在周小舟不去坦白，自己又不能主动去说。如果由自己捅出去，岂不成了“打小报告”？世人将怎样看待？谁人还能谅解？可是这样拖下去，万一……那样的话，后果将不堪设想！黄克诚进退维谷，只有独个儿默默忍受着失眠的折磨。

正是：秀才当枪使莽帅，惊雷入耳愁将军。

此时的周小舟也是度日如年，躁动不安，坐不住，躺不下。他来到周惠的房间，躺在床上的周惠，见周小舟脸色苍白，目光呆滞。

“睡不着？”周惠依然是慢声慢语：“坐吧，坐下来。”

周小舟坐不下来，在灯光下兜着圈子，他说：

“我想自己去找主席谈谈，我有一脑子问号，还有23号夜的事。黄克诚建议我去解释清楚。”

“你先坐下来么。”周惠将两条腿垂下床，点上一支烟，说：“要坐下来想想，想好了再动作。唉，抗战时我有4次遇险，得了条经验，临事不忙，这很重要。”

周小舟终于坐下来了，他皱着眉头问：

“怎么检讨？自己都没想通。”

“看这个形势，不检讨是不行了。有些事我也想不明白，曾希圣也是老同志了，干嘛对我这后生晚辈过不去？又拍桌子又骂娘的？”

“他就是那个脾气，跟柯大鼻子还不同。”

“就为我一句‘该打50大板屁股’的话，见面眉毛不是眉毛，鼻子不是鼻子的。”周惠吸了一口烟，又开始开导周小舟：“一般经验，反右要防‘左’，纠‘左’须防右。我对谭老板可能是意见提得尖锐了些，但我的思想情况还属于右倾。检讨要检讨了，也不能人家说啥就是啥，对自己不负责任，也是对党不负责任。”

周小舟点点头，缓缓起身，说：

“你休息吧，我自己再想想。”

7月26日凌晨，毛泽东针对李云仲的意见书，写出了《对一封信的评论》。

李云仲是国家计委基本建设局副局长，他在6月9日寄给毛泽东一封信，这封信长达1万多字。信中说：“从1958年第4季度以来，党的工作中，缺点错误是主流，因此作出结论说，党犯了‘左’倾冒险主义、机会主义的错误，而其根源则是在1957年整风反右的斗争中，没有同时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危险”。“几千万人上阵大炼钢铁，损失极大而毫无效益”。“人民公社也是错误的”。“有些地方简直是有失无得”。

毛泽东在这一篇3000字的评论中写道：

“收到一封信，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件。信的作者在我们的经济工作中搜集了一些材料，这些材料专门属于缺点方面的。作者只对这一方面的材料有兴趣。而对另一方面的材料，成绩方面的材料，可以说根本不发生兴趣。他认为从1958年第4季度以来，党的工作，缺点、错误是主流，因此做出结论说，党犯了‘冒险主义’、‘机会主义’错误，而其根源则是1957年整风反右的斗争中没有‘同时’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危险。**作者李云仲同志的基本观点，是错误的，他几乎否定一切。他认为几千万人上阵大炼钢铁损失很大，而毫无教益；人民公社也是错误的；对基本建设极为悲观；对农业，他提到水利，认为党的‘左倾冒险主义’、‘机会主义’错误是由大办水利引起的，他对前冬去春几亿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大办水利没有好评，他是一个‘得不偿失论’者，某些地方简直是‘有失无得论’者，**作者对这些结论性的观点放在第一段，篇幅不多。**这个同志的好处，是把自己的思想和盘托出，这跟我们看见的另一些同志大不相同，**他们对党和人民的主要工作基本上不是高兴，而是不满，对成绩估计很不足，对缺点估计过高，为现在的困难所吓倒，对干部不是鼓励，而是泄气，对前途信心不足，甚至丧失信心，但是不愿讲出自己的想法和看法，或者讲一点留一点，而采取‘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躲躲闪闪的态度。**李云仲同志和这些人不同，他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满腔热情地写信给中央同志，希望中央采取步骤，克服现在的困难，他认为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不过时间要长一些。这种看法是正确的。**信的作者对计划工作缺点的批评，占了信的大部分篇幅。我认为很中肯。**10年以来，还没有一个建议和敢于向中央中肯地有分析地系统地揭露我们计划中的缺点、因而求得改正的同志。**我就没有看见这一个人。我知道这种人是有的，他们就是不敢，也难越衙上告。因此我建议将此信在中央一级和地方一级（省、市、自治区）共两级的党组织中，特别是计划机关中予以讨论，将1958年、1959年自己所作工作的长短大小、利害得失加以正确的分析，以利统一认识，团结同志，改善工作，鼓足干劲，奋勇前进，争取经济工作及其它工作（政治工作、军事工作、文教卫生工作、党的各级组织的领导工作、工青妇工作）的新的伟大胜利。”

“我们党38年的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这是必然性。**时然而言，现在是讲这一点的时候了。不讲于团结不利，于党于个人都不利。现在这一次争论可能会被证明是一次意义重大的争论，如同我们在革命时期各次重大争论一样。**在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可能是没有争论、风平浪静的**。庐山会议可能被证明是一次意义重大的会议。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我们解决党内矛盾、人民内部矛盾的正确的已被历史证明有效的方法。我们一定要坚持这种方法。”

7月26日，会议分组传达毛泽东在25日提出的“要对事也要对人”的4点意见。会议并印发了毛泽东对李云仲来信的批语：《对一封信的评论》。

7月26日这一天，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惠、李锐都作了检讨。

会场上激烈的争论和批判的声音，不时传到对面不远的美庐2楼，吵得毛泽东整日未睡。他几次叫李银桥去会场看看，报告会场的情况。

这天晚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美庐2楼同彭德怀谈话，没想到**他再次拗着脖颈顶撞毛泽东说：**

**“在延安整风操了我40天娘，我操你20天的娘还不行？”**

**举座闻言失色。毛泽东看着彭德怀，良久，点点头说：**

**“尽你操，满足你操娘的愿望。”**

他越说声音越激越高亢：

“你在这里还只操了20天，还操不得？满足你40天，否则还欠20天的账，叫你耿耿于怀！”

众人无不激愤，开始和彭德怀算老账。他们从红军时期算起，算到延安，算到北京，一直算到了这次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只得违心地作了检查。

7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继续与彭德怀谈话。有人说：

“彭德怀同志这次所犯错误是严重的，根本原因还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没有接受，相反，很骄傲，犯上。”

周恩来说：

“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是辩证法，要脱胎换骨。**我多次犯错误，认识不全面，难道检讨了就没有骨头？驯服就没有骨头？所有领导同志都要驯服，否则如何胜利？**你的骨头是犯上。当然，彭总历史上是有很大功绩的，不能全盘否定，对问题还是要三七开。”

朱德慢条斯理地说：

“彭总的一个特点，是容易固执己见。如果是正确的，当然要坚持。是错误的，就要接受批评，改正错误。彭总有一股拗脾气，今后应该注意改掉。”

毛泽东皱着眉头，不高兴地说：

“看来我只好再上井冈山了。”

与会者们明白毛泽东的意思，经过一番议论，一致结论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

彭德怀也表示同意这个结论。

此后，中央警卫局向下列各位人员的警卫负责人宣布了3条纪律：

1、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周惠，不能擅自进入毛主席、刘主席的住地。2、这几个人的汽车不能下山。没有毛主席、刘主席的批准，九江机场的飞机不能起飞。3、这几个人不能互相接触。

7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初步批判了彭德怀等人的错误。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召开中共八届八中全会。

7月29日，毛泽东电召林彪上庐山。林彪在北京就知道庐山上出事了。

7月29日这一天，毛泽东写了一个批语，要求将新华社《内部参考》上刊登的3篇报道《赫鲁晓夫谈苏联过去的公社》、《番禺县有些农民自办小型食堂》、《增城县重灾公社见闻》，以及《外报就赫鲁晓夫谈公社问题挑拨中苏关系》，印发给与会者。他在批语中写道：

“请同志们研究一下，看苏联曾经垮台的公社和我们的人民公社是不是一个东西，看我们的人民公社究竟会不会垮台，如果要垮的话，有哪些足以使它垮掉的因素？如果不垮的话，又是因为什么？不合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掉，人为的维持不垮是不可能的。合乎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不了，人为的解散也是办不到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请同志们看一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近来攻击人民公社的人们就是抬出马克思这一科学原则当作法宝，祭起来打我们，你们难道不害怕这个法宝吗？”

7月29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有人将对彭德怀的批判与对赫鲁晓夫的批判联系了起来。还有的人说彭德怀是里通外国。

7月29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他在讲话中宣布了召开八届八中全会的决定，他还说：

“究竟采取一条什么路线好？现在要回答这个问题。同志们，大家都扯了很久了，开一次中央全会来再扯几天，我看就差不多了。方法应该开门见山，不搞外交辞令，横直讲老实话。疙瘩不解开，不好工作。有许多疙瘩多少时候了，不是现在才有，非一朝一夕之故。当面不扯，背后又有，那怎么好办事？把一些疙瘩解开，以利于团结起来工作。”

7月30日凌晨，毛泽东吩咐秘书说：

“找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今天上午谈谈。”

李锐接到毛泽东召见的通知，就对周小舟、周惠说：

“要做最坏的打算，攻势会越来越猛。我们议论的一些话弄出去是很危险的。”

周小舟皱着眉头“唉”了一声，说：

“早跟主席解释清楚也许会好些。”

李锐反问道：

“能解释清楚吗？”

周小舟、周惠面面相觑。李锐又交代说：

“议论的那些话，特别是23号晚上的议论，就像烧掉了一样，任何情况下不要再提啦。任何情况下！这样做免得情况说不清楚，越搞越复杂，对党，对主席，对谁都不利。”

黄克诚4人来到美庐二楼。毛泽东坐在沙发上，将大手一摆，说：

“坐吧，都坐。”

黄克诚4人依次落座。毛泽东说：

“中办发了3个文件，我写了批语，你们回去可以看一看。看苏联曾经垮台的农业公社和我们的人民公社是不是一个东西。看看赫鲁晓夫、杜勒斯，还有台湾，是怎么攻击人民公社、大跃进的。他们称人民公社是落后的大规模的奴役制度。说我们狂热的将它强加在6亿5千万中国人头上。说大跃进把中国古老而丰富的文化、习惯和信仰以及家庭生活的基本价值，用命令的方式全部根除了。不是一国内、二国际、三周围吗？你们看看这3份材料，赫鲁晓夫的那篇是放在前面。”

毛泽东所说的3份材料，就是前边已经提到的新华社《内部参考》上刊登的3篇报道：《赫鲁晓夫谈苏联过去的公社》、《番禺县有些农民自办小型食堂》、《增城县重灾公社见闻》；他所说的“赫鲁晓夫 那篇”，是指《外报就赫鲁晓夫谈公社问题挑拨中苏关系》。

毛泽东话头一转，盯住黄克诚，缓缓地说：

“我不了解黄克诚同志的历史。你同彭德怀的观点基本一致，人们传言，你同彭德怀是父子关系？”

黄克诚说：

“我和彭德怀同志的观点基本一致，只能就庐山会议这次的意见而言。过去我和彭德怀同志争论很多，有不同意见就争，几乎争论了半辈子，不能说我们的观点都是基本一致的。但我们争论不伤感情。江西打AB团时，有人要打我，差点杀头，彭总帮我讲了话，救了我，所以私人感情始终很好。我认为我们关系是正常的，谈不上什么父子关系。”

毛泽东吮吮下嘴唇，吸口烟，说：

“政治、思想、感情是统一的东西。我自己的理智和感情就总是一致的。看来我不了解你和彭的关系，也不了解你这个人，还得解开疙瘩。有人说你是彭德怀的政治参谋长。”

黄克诚说：

“我这个总参谋长，是毛主席你要我来当的。我那时在湖南工作，并不想来，是你一定要我来。既然当了参谋长，政治和军事怎么分得开？彭德怀的信是在山上写的，我那时还没有上山，怎么能在写‘意见书’一事上当他的参谋长？”

毛泽东说：

“**现在有个说法，叫湖南集团。你是湖南集团的首要人物，是军事俱乐部的主要成员。”**

黄克诚说：

“主席，我在湖南工作过多年，和湖南的负责同志多见几次面，多谈几次话，多关心一点湖南的工作，怎么就能成为‘湖南集团’？还有传‘军事俱乐部’的，又是从何谈起呢？”

周惠插话说：

“主席，黄克诚同志这个话有代表性。不然老熟人的往来就都成为问题了。要抓多少集团，多少俱乐部？人人自危只好老死不相往来。”

周小舟也说：

“‘湖南集团’的提法，有压力，希望能给以澄清。”

毛泽东说：

“可能是有点误会，此类议论你们不必介意。我同你们湖南几个人，好像还不通心，尤其同周小舟有隔阂。”

他看看周小舟，又说：

**“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小舟呐，希望你不远而复，及早回头。**”

周小舟张张嘴，不知如何回答是好。黄克诚岔开话题，谈到了当年东北战场“保卫四平”问题和长时期炮打金门的问题，表示了自己的反对意见。毛泽东说：

**“‘保卫四平’是我的决定，难道这也错了？”**

黄克诚说：

**“即使是你的决定，我认为那场消耗战也是不该打的。至于炮轰金门、马祖，稍打一阵示示威也就行了。既然我们并不准备真打，炮轰的意义就不大，打大炮花很多钱，搞得到处都紧张，何必呢？”**

毛泽东笑笑，说：

“看来，让你当个‘右’的参谋，还不错。”

周惠借机说：

“这两天不叫人说话，只许问什么答什么，一些问题不能辩论清楚。”

周小舟也说：

“会议上空气太紧张。”

毛泽东随意地将手一挥，说：

“要容许辩论，交锋。让大家把话说出来，说完讲透！”

“敲山震虎”的谋略，千百年以来，人们屡试不爽。毛泽东这天上午同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的一番谈话，还真的震出了一个人来，他就是早上还主动与周小舟、周惠订立攻守同盟的李锐。

7月30日这天晚上，李锐忍不住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还想说明一下您今天提到的‘湖南集团’的事。这件事最使我心情沉重，无刻能安。下面讲一下同我有关的情况。

听了主席23日的讲话后，我的心情紧张起来。晚上到小舟、周惠处扯谈，小舟也很紧张，想去找黄老谈谈。电话约后，3人就一起去了，谈了下我们的心情。黄老要我们不要紧张，有错误老老实实检查就好了；说彭老总的信一细看，问题很多。周惠又谈了一些湖南粮食等情况。临走时，彭总进来了，我们都站起来（房中没有多余的凳子）。彭总讲了一下他写信的过程，没谈几句，我们就走了。出来时在山坡上望见罗瑞卿同志，小舟二人过去打招呼，我从另一条路回我的住处——说明这一细节，是听说有小组追问这件事。**请主席相信我是以我的政治生命来说清楚这件事。如果不属实，愿受党纪制裁。**”

李锐的这封信，连夜由王敬先送给了毛泽东。

7月31日凌晨，毛泽东批示印发鞍山市委的一个报告，他在批语中写道：

“必须抓紧8、9两月，鼓足干劲，坚决反对右倾松劲情绪，厉行增产、节约。无论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都是如此。**反右倾，鼓干劲，现在是时候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看不到这一点，是瞎子。在庐山会议上提出反冒进，大泼其冷水，简直是罪恶。**”

接着，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粮食工作的指示》，全文如下：

粮食问题是关系6亿多人民生活的重大问题。根据过去几年的经验，只要全党重视了粮食问题，抓紧了粮食工作，即使是灾年，日子也会过得比较平稳。反之，如果思想麻痹了，工作放松了，即使是丰年，日子也不好过。这是一条重要的经验教训。在今后农业生产继续跃进，但是日子并不能一下子就富裕起来的情况下，记取这条教训更加重要。为此，中央对粮食工作特作如下指示：

一、鼓足干劲，多产粮食，是解决我国粮食问题的根本办法。**由于人口的自然增殖，每年要多吃一些粮食；改善城乡人民的肉食、禽、蛋和用粮食做的副食品的消费，要多用一些粮食；发展牲畜要用粮食；保证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也需要出口粮食。只有千方百计地力争粮食增产，才能保证这些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

二、**全党必须学会精打细算、省吃俭用地过日子。万不能生产多少就消费多少，一定要瞻前顾后，以丰补歉，细水长流，留有余地。**经验证明，在光景并不富裕、国家和农民手里基本上还没有粮食储备的情况下，只要能够把不富裕的日子当穷日子过，即使是富日子也要当穷日子过，就会过得比较平稳，过得比较舒畅。根据粮食部的估算，现在保证各方面的基本需要，大体上有4300多亿斤原粮就可以过得去，这可以作为我们过日子的底。应当告诉农民，多储备，少食用，**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有稀有干，粮菜混吃**。这样不仅仍然可以吃饱吃好，而且粮食储备也可以逐步搞起来。**农民只要手里有粮，心里就不慌，这样苦几年，就翻过身来了。**在今年秋收确实知道粮食比去年增产的情况下，应当比去年更多地划出一部分牲口饲料和猪饲料，用以增加畜力，增加肉食，同时又增加肥料。除了不吃猪肉的地区以外，各地应当在今后数年之内，因地制宜，分别做到两三个人一口猪，一个人一口猪，甚至一亩田一口猪。

三、**在农村中继续实行粮食定产、定购、定销的办法，在城市中继续实行粮食定量供应的办法。**经验证明，这是解决我国当前粮食分配问题的好办法。**庐山会议确定：1959年度定产为5000亿斤原粮，定购为1100亿斤贸易粮，定销为820亿斤贸易粮，从1959年起到1961年3年不变；人民公社和生产队的实际产量超过定产的部分，国家只增购40%。这对鼓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保证国家基本需要来说，都是必要的。**

四、在粮食管理办法上，中央对各省、市、自治区继续实行粮食购销差额管理的办法。根据定购1100亿斤、定销820亿斤的规定，购销余额为280亿斤。除了出口、军粮和养猪基地的饲料补助共120亿斤以外，中央只要80亿斤来补充库存，其余80亿斤归地方。去年各省、市、自治区借用了中央库存的，今年应当适当归还一部分。为了保证购销计划和差额调拨计划的实现，各省、市、自治区必须保证完成征购计划，不突破销售计划。

五、目前正是秋粮生长的决定性季节，又是夏粮征购的重要阶段。各地必须千方百计地抓紧秋粮生产，加强田间管理，克服旱涝灾害，力争今年秋粮和经济作物的大丰收。同时，**必须抓紧夏粮征购，力争完成国家计划，注意不要买过头粮。**必须抓紧八、九两个月，在粮食生产和粮食征购工作上，鼓足干劲，坚决反对右倾松劲情绪，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历次经验证明，对任何工作，只要抓得紧，抓得实，就一定可以做好。**反右倾，鼓干劲，是做好目前粮食工作的关键，也是做好全年粮食工作的关键。**

附发《一九五九至一九六零年度粮食征购计划》，望各地按照执行。各省、市、自治区的销售指标和购销差额，到今年粮食收成大体定局的时候再行确定。陈国栋同志关于1959至1960年度粮食分配和粮食收支计划调整意见的报告，中央同意，一并发给各地参考。

中央 1959年7月31日

这天上午，毛泽东在他的住处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彭真、贺龙。彭德怀接到毛泽东秘书的电话通知后，走进美庐2楼客厅，见刘少奇等人在座，另一边坐着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他们几个人是被召来列席旁听的。

上午10点50分，会议开始。毛泽东首先讲话，他一开始就有意点明李锐给他写了信。他说：

“李锐昨天晚上写给我的信，已经送与常委看了。”

接下来，他在讲话中系统地说起了立三路线、两次王明路线、高饶反党联盟的历史情况。他还说到了彭德怀在这几次路线斗争中，一直站在错误的方面，并举出了历史上不少的事例。

彭德怀插话说：

“我过去追随王明、博古路线，到1934年1、2月间，就已经转过来了，认识到还是由毛泽东同志领导好，这是事实证明了的。这话我向黄克诚谈过。”

毛泽东说：

**“在几次路线斗争中，你都摇摆。由于挨了整，心里恨得要死，今后也很难说。”**

彭德怀说：

“我都61岁了，耳已顺了，以后还能有什么呢？”

毛泽东说：

**“人们说你是伪君子，你历来就有野心。我66岁，你61岁，我会死在你前头，许多同志都对你有顾虑，怕难以团结你。”**

他又说：

**“我同你的关系，合作与不合作，三七开，融洽三成，搞不来七成，31年，是否如此？”**

彭德怀说：

“政治与感情，你是结合在一起的，我没有达到这个程度。你提得那么高，我还没有理解，跟不上，掉队远。许多历史事件，我一生无笔记，文件全烧了。对问题认识上有分歧，但不能说感情不融洽。”

彭德怀接着讲了一些往事，想表明他从很早的时候就把毛泽东当作自己的先生，对毛泽东是很尊敬的。他不同意毛泽东说他两人的关系是三七开。最后，他说道：

“我认为我同主席的关系是对半开。”

毛泽东说：

“还是三七开吧。”

这次会议连中午都不休息，午饭就是吃包子充饥，一直开到下午5点才结束。

1959年8月1日，毛泽东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继续进行。参加会议的还是7月31日原来的一班人。会议从上午10点开始。彭真让李锐做记录。

毛泽东的讲话，从井冈山到庐山，从军事到哲学，从马克思主义到斯大林，从党的历史上几次路线斗争，到苏联的教训，观点鲜明地批评了彭德怀。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都在其间插了话。有的说：

“你有大功劳，但全是因为有了毛主席、党中央，否则，顶多当个唐生智、程潜。”

有的说：

“这么多元帅支持你，是由于主席，但换不出你一条心。”

有的说：

“几十年本能反映，自信太高，过分自负，想当个大英雄。”

一直沉默的林彪发话了，他说：

“彭德怀同志这回是招兵买马来的，你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你要抛掉个人的过分自信，抛掉个人英雄主义。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别人谁也不要想当英雄。你我离得远的很，不要打这个主意。”

林彪此言一出，满座皆惊，朱德等人纷纷瞩目于林彪。彭德怀正要辩解几句，林彪抢先接着说：

“平型关吃了亏，是头脑发热，这是任弼时的决定。你那个百团大战，是大战观念。”

毛泽东对着彭德怀说：

“你组织性、纪律性很差，你有个说法：只要有利于革命，专之可也。打朱怀冰等，时机紧迫，还可说：‘专之可也’，打百团大战，为何不先报告请示一下？”

他转向众人，又说：

“彭德怀同志是资产阶级世界观，不是无产阶级世界观。方法论是经验主义的，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彭德怀同志这个人，是有两面性的，有革命的一面，也有反革命的一面。在民主革命阶段他是积极的，但革命的方法也有错误。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就有了变化。他对社会主义也有模模糊糊的认识，要群众又害怕群众。**9000万人上山炼铁的革命热情，他看成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彭德怀同志这次对时局估计错了，对自己的威信估计高了，对党内同志政治水平估计低了。”**

毛泽东盯着周小舟，说：

“没有看见？小舟，你上了当，搞合股公司，拉过去了。”

周小舟哭丧着脸解释说：

“我对彭老总说，有意见，应同主席谈，但莫起冲突。讲了3遍，不能起冲突。”

毛泽东嘴角浮现出一丝嘲意，说道：

“你还说不是，**散布空气，无民主自由。我们讲了9个月纠‘左’，批判了9个月。你批判的那些，难道超过了我们讲的？纠正了，批判了9个月，为什么还搞这一手？其目的在瓦解中央领导，瓦解总路线，以为大批群众会集合于你们的旗下。”**

周小舟低着头，无言以对。毛泽东接着说：

“小舟是否永远被拉过去？看小舟的态度，这个人不觉悟。‘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紧张’，他都接受。‘得失相当’、‘左难纠’，这就是没有马克思主义观点。小舟，你马克思主义观点少一点。这是对领导，不是对群众说的。有些事你不知道，信的目的何尝不知道？可以原谅，同意纲领不简单，是气味相投。**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你不知道**？我同省委书记，同任何一个人非议过彭德怀没有？同我讲彭不好的，统统挡回去。**要当面讲，不当面讲非英雄豪杰。**如罗瑞卿，要当面讲。”

周小舟神色有些不自在，挠挠已经秃顶了的头，说：

“联系过去那些历史看，我不了解彭总过去如何对抗。同意他的信，是我思想幼稚。”

毛泽东断然纠正周小舟：

“重点在此，思想有共同性！”

周恩来也说：

**“方向是对总路线进攻，站在右倾立场，信的锋芒指向总路线。”**

毛泽东重提1935年遵义会议后，林彪写信要让彭德怀担任前敌总指挥，是彭德怀鼓动起来的。林彪见毛泽东又提起了这回事，就插了话，终于说出了24年前那件事情的真相。他说：

“长征中我给中央写信要主席、朱总和恩来同志离开军事指挥岗位，由彭德怀同志来指挥红军作战，这事我并未和彭德怀同志商量，是我自己决定写这封信的。”

毛泽东把话题转到7月14日的信上，他说：

“彭德怀同志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言人。这次向党进攻，是有计划、有准备、有组织、有目的的。彭德怀同志讲‘小资产阶级狂热性’，锋芒是对着中央的，是攻击中央，反对中央。彭德怀同志写那封信是准备发表的，是用来争取群众，组织队伍，用他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要修正总路线，另搞一个出来。彭德怀同志那封信的前半部分说总路线正确，毫无感情，全部感情放在后半部分。”

彭德怀解释说：

“我的那封信有些问题考虑得不成熟，如说‘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些问题是带‘政治性’的等等。但都是出于自己的考虑，事先没有跟任何人商量过。当时想的主要是看到会议快结束了，写个信供主席参考，有无价值，请主席斟酌。没有想过信还要发表。”

毛泽东说：

“你这个人有野心，历来有野心。你说过参加革命做大事，说我是先生，你是学生，这都是客气话。先生、学生是讲集体，劳动人民才是先生。尊敬劳动人民为先生的思想你没有建立。**你要用你的面目改造党，改造世界。过去因各种原因未得到机会，这次从国际上取了点经（不能断定）。**去年郑州会议你未参加，武昌会议乱子一出，机会到了，出去考察，回来又到了湖南。”

彭德怀说：

“我的问题与国外无关。出国访问我实在不想去。出访期间，只是在罗马尼亚访问时，为回答对方的提问，就人民公社的所有制问题做过一点解释。除此之外，在其它国家访问时，关于中国的大跃进、人民公社问题从未谈过。我既没捞什么资本，也没有取经。”

毛泽东说：

**“上海会议重点是批评李富春，捎了你一句。去年八大二次会议我讲过，准备对付分裂，是有所指的，就是指你。”**

接下来发言的是朱德。他的发言比较温和，毛泽东做了一个手势，他就不讲了。刘少奇在发言中批判彭德怀说：

“根本问题，是自己思想上有一种想法，革命要革的，社会主义要搞的。但如何革法，过这个革命关，社会主义如何搞法，脑子里所想的社会主义与党是否完全一致，值得考虑。总有些不同，对我们的搞法，总是不满意。积极要求实现自己愿望，批评人，然后也合作。我们长征中认识，认为你爽直，对同志、友邻部队都照顾，感觉政治可靠，也注意政治。一件事感觉不好：会理会议前，你批评军委，很不守纪律，我听不下去了。建议打电报，不要这样讲。我要打电报，话都是彭的。写好电报交彭和尚昆，彭不签字。不签字不对，并不勇敢。从那以后，觉得此人不简单。以后想极力合作，求同一性，差别性少提，但搞不好；同彭这样的人，难搞成朋友。高岗事件前，对我有七八点意见，有些事同我毫无关系。如一件事，召集华北座谈会。账挂在我身上。另一件事，同去看关向应，关流着泪说：‘彭总，你不要反对毛主席，闹派别，我是快死的人了。’觉得我没发表意见，对我不满。高岗事件前，讲了对我很多不满的话。这种话，我沾不到边。有些不满并没有讲出来，延安整风审干，也不满意我。感觉彭的思想有自己的一套，同意主席讲的有野心，要按自己的面貌改造党和世界。根本问题在此。当面讲这些话。”

彭德怀在会议结束时说：

“不管会议最后给我做出什么结论，我保证做到3条：1、不会自杀。2、不会当反革命。3、不能工作了可以回家种田，自食其力。”

这次会议中午也没有休息，依然是吃包子充饥。

接着，在传达常委扩大会议精神的中央委员全体会议上，林彪、周恩来作了长篇批判彭德怀的发言。刘少奇在简短的发言中说：

“彭德怀同志发生这样一件事情，不是偶然的。1945年彭有篇检讨，谈到党内发生错误路线时，他要跟着走一段，但走不到底。有同志说，他有魏延的反骨，他有异己性，总是有刺，有时候就发牢骚，就骂。毛主席看出他的问题，这次在常委会上，毛主席讲，你这个人就是要闹分裂的，去年5月讲防止党的分裂，就是指彭德怀同志。说，这个人那么难于合作。主席讲三七开，是这样讲的：一二三次反‘围剿’是合作的；长征中反张国焘，除个别问题外，基本是合作的；解放战争时，基本上是合作的；抗美援朝，除开有些问题外，基本合作的；**整个8年抗战是不合作的**，有些时候是合作的。彭德怀同志有可能改造过来，他有动摇性。他这次要算大跃进的总账，不讲就不讲，一讲一大堆。因此这次对他算总账，很有必要。”

8月1日夜，毛泽东将他在7月29日批示3篇报道及批语批给王稼祥，又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稼祥同志：

此件（指赫鲁晓夫1959年7月在波兰讲话时攻击人民公社的材料——笔者注）请看一下，有些意思。我写了几句话，其意是驳赫鲁晓夫的，将来我拟写文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我看他们是处于被动了，我们非常主动，你看如何？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

8月1日晚10时，毛泽东给周小舟写了一封信，并附上《昭明文选》卷10中的《邱希范与陈伯之书》。

陈伯之是南朝齐梁间人，目不识丁，少时臂力过人，干点偷禾盗船的勾当，被人割掉一只耳朵。时逢乱世，曾任齐江州刺史，后降梁武帝，不久谋反失败，渡过长江投奔了北魏。4年后，梁武帝的弟弟临川王萧宏让他的记室邱希范写了一封信给陈伯之，这就是有名的《邱希范与陈伯之书》，陈伯之接信后重新归降梁主。

毛泽东在信中写道：

周小舟同志：

“迷途知返，往哲是与，不远而复，先典攸高”，几句见邱迟与陈伯之书。此书当作古典文学作品，可以一阅。“朱鳍涉血于友于，张绣剚刃于爱子，汉主不以为疑，魏君待之若旧”，两个故事，可看注解。

毛泽东 8月1日夜10时

如克诚有兴趣，可给一阅。

8月1日深夜，田家英来到180号院，卫士引着他登上2楼，他一进门看见毛泽东就哭了，“哭得很厉害”“放声大哭”，腿也软了，卫士劝不住。毛泽东只好离开沙发过来劝，也劝不住。田家英哭着说：

“主席，我年轻，没经验，上当受骗了。”

他一边流泪，一边检查，一边揭发。毛泽东一支接一支吸烟，脸色凝重，并无惊愕、震怒之类的声色，一切都在他的意料之中。

原来，田家英曾经多次和水电部副部长、毛泽东的兼职秘书李锐谈话，他的话后来被李锐称之为“危险的交心”，李锐是这样记述的：“田家英说，在他离开中南海的时候，准备向毛泽东提3条意见：一是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二是不要百年之后有人来议论（这是我们不止一次谈论过的赫鲁晓夫做秘密报告之事）。三是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第3条他感触最深，谈过反右派前夕的一些情况。我们都感觉毛泽东对经济建设太外行，去年不到前台来指挥就好了。他还讲过这样一副有针对性的对联：隐身免留千载笑，成书还待十年闲。我们都认为，毛泽东不如总结中国革命经验，专门从事理论著述为好。”

这一次，田家英把自己讲的话检讨了出来，把别人讲的揭发了出来；会上谈的说一遍，会下议论的也交代了出来，诸如：“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到了斯大林晚年”，“独断专行”，“有些像铁托”，“错误只有错到底才知道转弯，一转就是180度”。

毛泽东用力将烟头拧灭在烟灰缸里，轻轻叹口气，说：

“唉，莫哭，莫哭了。你还年轻，要振奋精神，继续搞好工作。”

他送走田家英，不停地踱步，横在面前的那堵墙，终于坍塌了一块墙角。

后来有人怀疑田家英和彭德怀有联系，经调查，他与彭德怀并无联系。毛泽东在一个发言材料上批道：

“这是挑拨，秀才还是我们的。”

这个批示保护了田家英，田家英又向毛泽东做了检讨，得到了毛泽东的谅解。毛泽东对田家英说：

“照样做你的秘书吧。”

欲知庐山会议上的事态如何发展，且待下一章详细叙述。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写给周小舟的信中引用典故劝他“迷途知返”，这本是爱护部下的一番良苦用心，却被一些人污蔑为玩弄封建君主一类把戏。真是岂有此理！难道眼看着自己的同志沿着错误的道路滑下去而不规劝，才是应该的吗？田家英不是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吗？但他知错能改，认真检讨，就得到了毛泽东的谅解。毛泽东说：“照样做你的秘书吧。”难道这也是什么把戏吗？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往往是反毛者的通病！

**第75章**

**“刮‘共产风’的问题没有了，‘一平二调三收款’没有了，浮夸风**

**没有了，现在，庐山会议不是反“左”的问题了，而是反右的问题**

**了。因为右倾机会主义在向着党，向着党的领导机关，向着6亿人民**

**的事业，向着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事业进攻。”**

话说1959年8月2日凌晨，毛泽东给张闻天写了一封颇有辣味亦有意味的信，他写道：

闻天同志：

怎么搞的，你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去了。**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这次安的是什么主意？那样四方八面，勤劳艰苦，找出那些漆黑一团的材料。真是好宝贝！**你是不是跑到东海龙王敖广那里取来的？不然，何其多也！然而一展览，尽是假的。讲完没两天，你就心烦意乱，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被人们缠住脱不得身。自作自受，怨得谁人？我认为你是旧病复发，**你的老而又老的疟疾原虫远未去掉，现在又发寒热症了。**昔人咏疟疾词（这首曲子，调名《叨叨令》）云：“冷来时冷的在冰凌上卧，热来时热的在蒸笼里坐，痛时节痛的天灵破，战时节战的牙关挫。真个是害杀人也么哥，真个是害杀人也么哥，真个是寒来暑往人难过。”同志，是不是？如果是，那就好了。你这个人很需要大病一场。昭明文选第24卷，枚乘《七发》，末云：“此亦天下之要言妙道也，太子岂欲闻之乎？于是太子据几而起，曰：涣乎若一听圣人辩士之言，涊然汗出，霍然病已。”你害的病，与楚太子相似。如有兴趣，可以一读枚乘的七发，真是一篇妙文。**你把马克思主义的要言妙道通通忘记了，如是乎跑进了军事俱乐部，真是武文合璧，相得益彰。现在有什么办法呢？愿借你同志之箸，为你同志筹之。两个字，曰：“痛改”。**承你看得起我，打来几次电话，想到我处一谈。我愿意谈，近日有些忙，请待来日。先用此信，达我悃忱。

毛泽东 8月2日

8月2日下午，毛泽东在庐山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因为这次会议是在特殊条件下临时决定召开的，所以有一部分中央委员是动用了空军的飞机送上山来的。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147人，列席会议的有15人。

会前，毛泽东批准印发了张闻天以前的发言材料。

在开幕式上，毛泽东首先发表了讲话，说明了全会的两个议题是：改变指标问题和解决路线问题，他说：

“**高指标成了一种负担。一改下来，我们担子就轻了**。这是自己立起一个菩萨，然后向它拜。我们现在破除迷信，把菩萨打烂，重新立一个合乎实际的指标。”

“我们的路线究竟对不对？现在有一些同志发生怀疑。去年八大二次会议所定的这条路线发生了问题。庐山政治局扩大会议已经一个月了。初上庐山还不清楚，有些同志要求民主，说我们现在没有民主，说话不自由，有一种压力，压得他们不敢讲话。当时就不晓得是什么事情，摸不着头脑。初上庐山，7月上半月那个时候有点神仙会议的味道，就是闲谈一顿，没有什么着重，没有紧张局势。后来才了解，为什么有些人觉得没自由呢？就是他们要求一种紧张局势。那种松松垮垮的情况，在他们看来不得要领，不过瘾。他们要攻击这个总路线，想要破坏这个总路线。**他们要言论自由，是要破坏总路线的言论自由，批评总路线的言论自由，批评去年下半年、今年上半年这一年的工作（重点还是去年）**。对于去年11月第1次郑州会议到现在9个月间中央的这些工作（批评‘左’的倾向，‘共产风’不刮了，公社实行三级所有制，指标逐步落实），他们看不到，他们看不进去，他们以为要重新议过。他们感觉到需要有一种空气，需要有一种民主，并且认为过去就是不民主，许多问题没有彻底讨论。因此我们感觉政治局扩大会议不够了，这个民主还小了，现在就请同志们，大家来开中央全会，这个民主大一些。他们还可能要求扩大，我们还有一个办法，有党代表大会，准备明年春季开党代表大会。”

**“现在要求民主，又是1957年那个要求大民主，大鸣大放大辩论，这么一种形势。**开头几天，我摸不着头脑，现在看来，是这么一件事。”

关于开会的方法，毛泽东说：

“应该是历来为我们大家所赞成的一种方法，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总要有一种希望。我们是希望团结，还是希望分裂呢？我们中央委员会这个团体，关系着中国的命运，现在社会主义的命运是在我们的肩上，我们担负这个命运，我们应该团结。……那么，对于犯错误的同志怎么办呢？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团结的目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只有这种方法。”

毛泽东最后说：

“一上山，我就讲了3句话：成绩很大，问题不小，前途光明。我想，这样的话总是可以的吧。后头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不少问题，可见得问题不小。”

“现在有一种分裂的倾向，已经有显著的迹象了。我们反了9个月“左”倾了，现在基本上不是这一方面的问题了。现在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的问题。**刮‘共产风’的问题没有了，‘一平二调三收款’没有了，浮夸风没有了，现在，庐山会议不是反“左”的问题了，而是反右的问题了。因为右倾机会主义在向着党，向着党的领导机关，向着6亿人民的事业，向着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事业进攻。**现在要指标越落实越好，反了几个月的‘左’倾，右倾必然出来。缺点确实是存在的，但已经改了，他们还要求改，他们抓住这些东西攻击总路线，把总路线引导到错误的方向去。”

8月2日晚，周小舟在晚饭后时而伏案挥笔，时而绕室踱步，正在给毛泽东写回信。周惠接了一个电话通知，说是毛泽东要找他谈话。周惠立即来到了180号院。

毛泽东坐在2楼的沙发里，吸着烟正在沉思问题。卫士轻声报告说：

“主席，他来了。周惠同志到了。”

“唔。”毛泽东点点头，将烟灰弹入烟灰缸。周惠进门报告说：

“主席，我来了。”

“坐。”毛泽东将大手一摆：“坐吧。”

“主席，找我什么事呀？”

“我找你挖墙角。”

周惠心中咯噔一下，皱起淡淡的眉头，故作茫然地问道：

“主席，挖什么墙角呀？”

“挖彭德怀的墙角！”

周惠顿时急了，一脸的大麻子憋得通红，委屈得叫了起来：

“怎么我是彭德怀的墙角？我是党员，我怎么是彭德怀的墙角？”

毛泽东笑了，用手指指茶几上的香烟，说：

“是墙角也不要紧，可以挖过来嘛。”

周惠顾不得去拿烟抽了，极力地辩白：

“主席，这样说我不同意。我是一块砖一块石头都可以，但只能是党的，党的领袖是毛主席。党把我砌到哪里就是那里，我怎么能成谁的墙角？”

毛泽东吸着烟注视着周惠，一口烟雾吐出，突然问：

“彭德怀跟你说过我些什么？”

周惠一怔，马上否定：

“没有。”

毛泽东摇摇头：

“你们在一起的时候不少，什么也没说过？”

周惠停了停，说道：

“主席，您知道，我参加革命的历史不算长，土地革命时期我还在读书种地，抗战时正式参加革命队伍，才见到彭德怀。在华北他是副总司令，我在北方局工作，打游击在一起，有时常住一个院子，见面虽然多，他是副总司令，能跟我们说什么？革命队伍中，在我们年轻人的心目中，毛主席是伟大领袖，朱德、彭德怀、贺龙、刘伯承是传奇式的英雄。我们怎么知道上面还有什么矛盾和斗争？以后职务渐渐升高了，知道的历史多了些，听到的事也才多了些。彭总这个人脾气大，爱骂人，他得罪人很多，不少人都怕他。我在湖南当书记，彭德怀来了，我当然要去看望。中央和各省领导来了，总不免要去看看吧？**彭德怀确实跟我谈过一次您，他说从前不服您，一次次同您矛盾斗争，结果事实都证明是你正确了**。王明排斥主席的领导，撤销了主席苏区中央局书记的职务，这时主席是很需要支持的，可是他对王明错误路线缺乏认识，打赣州他执行了，没打下来。撤围后，主席主张向北发展，和赣东北打成一片，他没有支持主席的意见。还讲了洛川会议，说主席提出在敌后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他的认识与主席的意见有差距，他说后来的事实证明主席是正确的，他从心里服了您。”

毛泽东认真听着周惠的话，一口接一口吸烟，说：

“他是一贯反对我的，几次路线都动摇。庐山这次怎么说？还有你。”

周惠说：

“主席，我是做实际工作的，这次上庐山，我说不来，又开农业会，又感冒，可主席叫我一定来。我想到什么说什么，主席不了解吗？我有意见并没瞒主席呀？在长沙这么讲，上庐山几次跟主席见面，心里有什么就说什么。”

毛泽东瞪一眼周惠，问道：

“被插了白旗，你一点气也没有？”

周惠说：

“怎么能没气？白旗有粮，红旗没粮，当然有气。”

“所以就要发牢骚，要出气，把锋芒对着所有的红旗。”

“是有点翘尾巴，看见他们老是自己正确我就有气。可这怎么能成右倾机会主义？还说我是俱乐部的，主席还要挖墙角，说我是谁的墙角……”

“好了，今天就谈到这儿吧。”

毛泽东将手一挥，结束了谈话。

正所谓：智者主意多，麻子点子多。藏首不露尾，不怕挖墙角。

送人断头台，保己是哲学。诸君若不信，好戏后边多。

这周惠回到住所后，周小舟说他已经写完了给毛泽东的回信，并给周惠讲了一下信的内容，周惠听了便说：

“说太多了。月要盈，你说什么它也在盈；月要缺，你说什么它也要缺。”

周小舟怔了片刻，方有所悟：是啊，你说了一，还要追三，说了七，还有十。他懊丧地说：

“已经给主席送去了。”

周惠淡淡地说：

“我家里有本郑板桥的书，真应该让你看看。”

8月3日，八届八中全会开始举行小组会议，揭发批判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周惠、李锐。他们这些被批判的人，一个一个被拆开，分配在各个小组中，分别进行面对面的批判。

8月4日晚，刘少奇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庐山人民剧院主持中央委员会会议，政治局常委都出席了会议。刘少奇传达了7月31日和8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谈话精神。

林彪在会议上发了言，他说：

“我是半路上山的，是先到的援兵，你们是最后到的一批援兵。”

紧接着，林彪开始批判彭德怀，他说：

“彭德怀说，延安整风操他40天娘，这次他不可以操20天娘吗？所以，他总的目的是为了操娘，为了骂党，骂中央，骂毛主席。他非常嚣张，头昂得很高，想当英雄，总想做一个大英雄。他参加革命，包含着很大的个人野心。毛主席才是真正的大英雄。他觉得他也是个大英雄。自古两雄不能并立，因此就要反毛主席。他平时摆出张飞的面貌，坦率的面貌，是很迷惑了一些人的。毛主席说，跟他的关系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三七开。他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是冯玉祥式的人物。”

朱德、周恩来也相继在会议上讲了话。

8月5日，毛泽东对《湖南省平江县谈冷公社稻竹大队几十个食堂散伙又恢复的情况》一文做了批示。他写道：

“一个大队的几十个食堂，一下子都散了。过了一会儿，又都恢复了。教训是：不应当在困难面前低头。像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这一类的事情，是有深厚的社会经济根源的，一风吹是不应当，也不可能的。某些食堂可以一风吹掉，但是总有一部分人，乃至大部分人，又要办起来。或者在几天之后，或者在几十天之后，或者在几个月之后，或者在更长时间之后，总之又要吹回来的。孙中山说：‘事有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为先知先觉者决志行之，则断无不成者也。’这句话是正确的。我们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属于这一类。困难是有的，错误也一定要犯的。但是，可以克服和改正。悲观主义的思潮，是腐蚀党、腐蚀人民的一种极坏的思潮，是与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意志相违背的，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违背的。”

8月6日下午，毛泽东在180号院听取各小组会议上的情况汇报，情况大致如下：

在批判彭德怀的小组里，彭德怀和康生、李井泉等人发生了正面冲突。彭德怀说：我给毛泽东同志的信是告计委的状，“我并不是攻击毛泽东同志”。“你说我是野心家，想把毛泽东赶下台，你们愿意听，我可不能那么讲。”“我没有律师辩护，你们像法庭审判。”“同黄克诚等人的工作关系是有的，私人关系没有。”

在批判黄克诚的小组里，有人劝黄克诚反戈一击。黄克诚却说：“落井下石得有石头，可是我一块石头也没有。我决不做诬陷别人、解脱自己的事。”有人说他是彭德怀的走狗，黄克诚说：“你杀了我的头，我也不承认。”

在批判张闻天的小组里，张闻天说：“谁想推翻毛主席？就是要推翻也推翻不了。”“我是做调查，看到海南岛有的地方饿死了人而干部却不敢说。我说过，问题这样严重，报纸上不能光讲成绩。确实不能光讲成绩呵！我把调查情况反映出来，也只是希望毛泽东同志出面领导来纠正去年的错误。”

在批判周小舟的小组里，周小舟说：“会议开始时，毛泽东同志肯定‘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在这个前提之下，把成绩说够，缺点讲透。23日毛泽东同志讲话完全反过来了，提出一个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问题。我对此认为是180度的转弯。”

在批判周惠的小组里，周惠说：“湖南的粮食问题不是右倾，毛泽东同志到长沙时，对湖南省的工作是肯定的。我是搞实际工作的，对插白旗有气，说了几句闲话，总理已经批评过了。其它问题没有。周小舟是对浮夸风、共产风、供给制有意见，主席也批评了共产风么。不能由此推论小舟同志是反对人民公社，他只是反对供给制、共产风。”

毛泽东听完了汇报，说：

“哎，允许交锋，允许辩论。我怀疑有些人是混进党内的投机分子。这里有4份材料，你们看看，我写了批语。”

他所说的印发《王国藩社的生产情况一直很好》等4篇文章的批语全文如下：

将这4篇印发各同志。请各省、市、区党委负责同志将王国藩人民公社一篇印发所属一切人民公社党委，并加介绍，请各公社党委予以研究，有哪些经验是可以采纳的。据我看，都是可以采纳的。第一条，勤俭办社；第二条，多养猪（不养猪的回族除外）；第三条，增殖大牲畜；第四条，增加大农具；第五条，食堂办法；第六条，工作踏实，实事求是；第七条，有事同群众商量，坚持群众路线。这些都是很好的。我想，每一个专区总可以找到一个至几个办得较好如同王国藩那样的公社，请你们用心去找，找到了加以研究，写成文章，公开发表，予以推广。**《目前农村中讲闲话较多的是哪些人》这一篇，也值得一看。这同目前在庐山讲闲话较多的人们是有联系的。**

毛泽东 8月6日

印时注意次序：１、苏联专家……；２、王国藩……；３、目前农村中……；４、明年重工业……。

8月6日晚，毛泽东得知刘思齐病了，就给她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娃：

你身体是不是好些了？妹妹考了学校没有？我还算好，比在北京时好些。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这是李白的几句诗。你愁闷时可以看点古典文学，可起消愁破闷的作用。久不见甚念。

爸爸 8月6日

8月7日上午，周惠在去会场途中正好遇到了罗瑞卿。身材高大修长的罗瑞卿，俯视着矮小敦实的周惠，大声喝斥道：

“周惠，你还不老实交代！李锐都承认了，你们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活动的，订攻守同盟是没有用的！”

关于李锐坦白和揭发的事，《戚本禹回忆录》中是这样说的：“李锐就一个人跑到主席那里去，要求见主席。见到主席以后，他把他们在一起开会所说的话都说了出来。在李锐向毛主席作坦白交代的时候，林克都在场。主席听了李锐的坦白交代以后，就马上找来罗瑞卿问了情况。”“又把周小舟、周惠等人找来谈话。李锐知道主席又找了周小舟、周惠谈话，生怕他们说的要比他说的多，所有又去找了主席作了补充的交代和揭发。把他们在一起说的，什么毛主席比斯大林晚年还要坏等等的话都说了出来。李锐甚至还揭发说，在他们开小会的时候，他亲耳听到彭德怀给部队打了电话。所以当李锐说他们是裴多菲俱乐部时，毛主席说，什么裴多菲俱乐部，是军事俱乐部。”

再说周惠听罗瑞卿如此一说，大吃一惊，他硬着头皮说：

“什么有组织有计划？我总不能说假话，编个组织活动出来吧？”

“他妈的，你就是不老实！不是你来拉我去听周小舟谈话吗？你们在主席那里谈了话以后，跟中了彩一样，拉我去谈？想宣传我，影响我？我看是想跟我施加压力，不让我阻止你们大谈特谈缺点！”

“那是你的推论，我没有讲。”

“主席23日讲话之后，你为什么不再找我了？为什么不来承认上次是宣传错了？你从根本上跟彭德怀、黄克诚的思想就是一致的！”

周惠不再吱声，硬着头皮只顾朝会场走。只听罗瑞卿在后面骂道：

“23日晚上你们到彭德怀、黄克诚那里去议论些什么？我从含鄱口看月亮回来，碰见你们时都10点半了。纸里包不住火，你们议论的内容，迟早是要被揭出来的！”

周惠的心猛地抽搐了一下，他明白已经坏事了。

8月7日本来是一个大晴天，可是周小舟的脸色非常苍白，心里也是乌云笼罩。他听着人民剧场那边不时传来的批斗彭德怀的怒吼和口号声，终于坐不住了，起身朝周惠的房间走去。

“周惠！”周小舟进门就绝望得叫了一声，说：“根本不存在反党集团，湖南派。我不是反对派，我是拥护中央，拥护毛主席的。”

周惠望着周小舟，茫然地点点头。周小舟痛苦地说：

“我们这次犯了错误，但我是清白的。”

此时，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周惠被分开在各个小组接受批斗，他们相互之间已经失去了联系，谁也不知道谁的情况如何。既然都说是反党集团，周小舟自然是要申明自己与反党集团无关。所以他又说：

“我与反党集团无任何联系。我确实与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都谈过话，我自己也到彭德怀屋里去过，谈过话。我说我没反党，没反毛主席，人家也不信。我的问题是跳进长江也洗不清了。”

周惠安慰他说：

“问题最后总是可以搞清楚的。”

周小舟说：

“搞不清了，至少在庐山是搞不清了。我的所做所言，自认为是爱护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但搞不清楚，我长100张嘴也讲不清了。我估计会关起来，或许杀头，但我绝对不会自杀。”

“还不至于如此。”周惠摇摇头说：“你想得太严重了。”

周小舟坚持说：

“轻不了，这方面的经验我还是有的。”

周惠皱着眉头沙哑着嗓子说：

“我的心情也是拥护党中央，拥护毛主席。我也有错误，没搞好防御工事，被小人钻了空子，搞被动了。”

周小舟哽咽着说：

“你同我的情况还不同，你说话谨慎，没留什么把柄，你也没有去过彭德怀的房间，只要检讨得好，估计还能回湖南。我们共事一场，彼此了解，声气相投。你回去以后，对我的小孩子关照关照……”

周惠眼圈红了，抓住周小舟的手用力地握着，说：

“放心好了，我会尽力的。”

周小舟仰天长叹：

“我估计最难过的日子该到了。”

这正是：书生昨日气如牛，事到如今泪花流。昨日怎不思今日？何必信口强出头。

再说8月7日这一天，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全文如下：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组，总政，团中央：

**现在右倾思想，已经成为工作中的主要危险。**

实际的情况是这样。在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运动中所遇到的主要问题逐步获得解决和生产指标比较落实之后，在六亿多人民共同参加的伟大的战役胜利之后，经过适当休整，一方面，广大干部和群众的伟大干劲，又在新的基础上日益高涨起来，为新的跃进而英勇奋斗；可是另一方面，在一小部分干部中，**右倾思想又开始抬头和滋长起来。并且以各色各样的形式，动摇军心，瓦解士气，妨碍人民公社的巩固和顺利发展，妨碍建设事业的跃进，妨碍总路线的贯彻执行。有些右倾保守分子，不但对于人民公社和去年以来大跃进的伟大成就，对于人民公社和大跃进运动中所遇到的主要问题迅速获得解决的事实，熟视无睹，不感兴趣；而且对于运动中所发生的错误和缺点，不管是否已经克服，都如获至宝一般地广为搜集，加以夸大，作为攻击社会主义建设各个战线上积极分子的武器。右倾保守分子，不是和群众站在一起，而是站在群众运动外边，指手划脚，非难人民公社，非难大办钢铁，非难大跃进，企图动摇总路线，散布悲观情绪，向干部和群众大泼冷水，松他们的劲，泄他们的气，实际是要把这些积极分子弄得灰溜溜的。**

有右倾情绪的人，不是实事求是地同群众商定可能实现的先进指标，而是把生产指标大大落在实际可能完成和必须完成的水平以下，而且认为指标落得越低越好。仿佛只有这样，才不是虚报浮夸，才不是主观片面。

还有一小部分干部，他们在口头上，虽然并不反对总路线，并不反对大跃进，但是他们在实际工作中，却缺乏朝气，缺乏干劲。他们对于工作中所发生的困难和问题，不是迅速抓住加以解决，而是畏难苟安，互相推诿，或者马马虎虎，拖一天算一天。

上述这些思想、情绪和作风，如果不彻底加以批判和克服，党的总路线的贯彻执行是不可能的，各项建设事业的继续跃进是不可能的，今年调整后的生产指标和基本建设计划的完成，也是不可能的。

各级党组织，必须抓紧八、九两月，鼓足干劲，坚决反对右倾思想，厉行增产节约、提高质量、降低成本，全面安排和节约使用劳动力、物力和财力。无论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都必须如此。**反右倾，鼓干劲，现在是时候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请你们立即在干部中，在各级党的组织中，对右倾思想和右倾情绪，加以检查和克服，使干部和群众，在实事求是和认识一致的基础上，鼓足干劲，全面的掀起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新高潮，用光辉跃进的成就，迎接国庆10周年。

中央 1959年8月7日

8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议定，将原来的6个小组合并成3个临时大组，彭德怀在李井泉一组，黄克诚在张德生一组，张闻天和周小舟在柯庆施一组，分别接受批斗。

8月9日下午，张闻天在连续的批斗中，终于低下了头，他交代说：

“彭德怀曾跟我谈到，中央常委会上只有毛主席一个人讲得多，别人很少讲话，他一个人说了算。我们还议论过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对反冒进的同志是否一定要采取那么个斗争方法？是否只注意了个人威信而没有注意集体威信？**还讲过要注意斯大林后期的危险。**”

同在一组的周小舟脸色惨白，他也承认：

“**还讲过毛泽东读中国的旧书很多，熟悉旧社会对付人的那套办法，很厉害。”**

8月10日，胡乔木在小组会上抓住有关“斯大林晚年”的谈话，作了题为《斥所谓“斯大林晚年”的污蔑》的发言，他说道：

“1、斯大林晚年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而毛主席则是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的创造者。2、斯大林晚年在党风上是不讲民主的或者很少讲民主的，连中央全会都不召开。而我们却不但经常开全会，而且经常开扩大的全会。毛主席十分重视党内民主，尊重同志们的意见，怎么能说和斯大林晚年相同？3、斯大林晚年提倡个人建设，毛主席在这方面也同他相反。4、斯大林在肃反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常把党内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同敌我矛盾混淆起来，以至在苏共党内有许多中央委员、高级将领被错误地杀害了。难道毛主席曾经杀过一个中委、一个将军、一个党代会的代表吗？5、斯大林晚年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停滞的现象。毛主席正好相反，简直可以说是辩证法的化身。他虽已六十几岁，精神比许多青年人都年轻，真正是生动活泼，一往无前。6、斯大林晚年对外犯过大国主义的错误。毛主席对别的国家一向很尊重，朝鲜问题就是一个好例子。对越南、蒙古的关系也是这样。”

8月10日，在批斗彭德怀的临时小组会议上，众人纷纷质问：

“彭德怀，你必须老实交代与张闻天、黄克诚的关系，你不要再骗我们了，别人已经交代揭发了！”

“你们在一起，什么话都能讲，为什么到了党的会议上就不讲了？你究竟还有没有一点党性？”

“说，快说！在组织面前要老老实实交代！”

“还不老实交代？你们是怎么议论南宁会议，怎么议论斯大林晚年的？说！”

彭德怀听着这一连串的问话和提示，沉重地喘着粗气。他已经明白，再没有退路了，只好说：

“张闻天有两次到我那里去，我与他有些臭味相投。在北京时我们谈过几次，也谈论过南宁会议的问题。张闻天说，他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什么情况也不了解，他不满意。我对毛泽东同志有成见，在政治上、思想上、感情上没有结合在一起，有时候我就受不了。比如在上海会议批评了我，我就不舒服。主席是斯大林晚年的问题，不是我讲的，是张闻天讲过，可能是在中南海时讲的。我听他讲没有表示态度。我只讲了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问题，我说毛主席解决了这个大问题，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

有人故意诈唬彭德怀：

“你讲毛泽东同志读了很多古书，很厉害。”

彭德怀说：

“我讲过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是很厉害的人，这个我讲过。张闻天为什么到我那里去？因为臭味相投他才去的。因为我脑子里反动的一面升起来了，加上过去的不满，联系在一起。他还讲毛泽东同志对中国历史很熟悉。”

又有人追问：

“你跟黄克诚究竟谈过这些内容没有？”

彭德怀说：

“我同黄克诚只是工作关系，除工作上的事，谈别的很少。张闻天在庐山3次到我楼上来，讲过毛泽东同志厉害，讲过是斯大林的晚年，讲过独断专行。”

这一天，黄克诚在临时小组会议上也受到了空前的压力。与会者纷纷斥责他：

“黄克诚，你至今没有交代出任何新材料。告诉你，别人已经都交代了！”

“你知道的至少比张闻天要多，现在就看你对党究竟是什么态度？”

“7月23日晚，周小舟、周惠，还有李锐，到你那里议论了什么？说！”

“你也是中央委员，为什么对组织隐瞒？你的党性到底到哪里去了？”

一连串的责问，像钢针一样刺入黄克诚的心里，使他陷入极大的矛盾和痛苦之中。交代吧，别人会怎么看待自己？不交代吧，身为中央委员怎么能向组织隐瞒？正在他左右为难之际，罗瑞卿带着李锐进来了。黄克诚心里咯噔一下，心想，糟糕，一定是李锐交代了，到这里来与自己对质来了。于是他不等罗瑞卿逼问，便开口了：

“主席在上海会议讲话后，彭德怀给我说过，‘主席要挂帅，难道过去不是他挂帅吗？’但有的揭发说的‘犯了错误不认账’这句话，彭德怀没有跟我讲过。他给我谈‘集体领导问题’，但确实没有讲‘常委会都是主席一人讲话’。关于斯大林晚年的话，彭德怀同志从没讲过。23日那天晚上是有人一时激动讲过。”

“谁？”“是谁讲的？”一片追问声：“说！”

黄克诚张了张嘴，说：

“李锐。”

会场里顿时一片哗然。黄克诚接着说：

“23日主席讲话那天晚上，他们3个人来到我处，李锐问过我：现在我们是否像斯大林晚年？我说不能比。给我的感觉，他们3个人并没有什么不良用心，只是一时的冲动失言。”

此时的李锐毫无思想准备，他被罗瑞卿带来是要对证黄克诚与高岗的关系问题，没想到黄克诚指认他说了‘斯大林晚年’的话。于是，他便将23日夜如何去黄克诚那里，3人如何说，黄克诚如何劝，一五一十说了一遍，他最后交代说：

“斯大林晚年这句话，确实有人讲过。我不是逃避责任，黄克诚没记错，是有人讲了。但不是我，也不是彭德怀和黄克诚，是周小舟。”

陈正人马上来到批斗张闻天、周小舟这一组，追问道：

“周小舟，黄克诚已经做了交代，你们3个人23日晚上在他那里谈了现在是斯大林晚年，反右会出乱子，你说了没有？”

迟早要发生的事终于发生了，周小舟面无血色，点点头说：

“我说了。我跟李锐讲的多，周惠讲的少。”

有人追问：

“为什么隐瞒至今？”

“我想找机会向毛泽东同志自己讲。”

“目的是什么？”

“我们是想向主席进忠言，觉得主席批评过分了。”

“实际是想给彭德怀打抱不平！”

“是有这个意思。”

“算不算阴谋司令部？”

“我说不是。”

“你说不是，为什么在黄克诚那里敢讲，在其它地方就不敢讲？主席说是反对派、湖南集团，是毛泽东同志错了，还是你错了？”

“根本不存在反党集团，湖南派。我不是反对派，我是拥护中央，拥护毛主席的。”

“你犯了这样大的错误，一点不感到良心责备，不知是什么心情？”

“我心地坦然，假如因此把我搞成反党集团的成员，肯定是个错误。”

李富春大口小口地吸着烟，神色严峻地问：

“你再讲一遍，斯大林晚年是什么意思？”

周小舟说：

“这次从反‘左’到反右，180度大转弯，我想不通。**我认为毛泽东同志多疑，独断专行，自我批评不够。”**

此时的周惠已经有些晕眩，他突然感到有人在拉他，回头一看，是胡乔木。胡乔木悄声劝道：

“周惠，这个时候可不能再有任何犹豫了，黄克诚、李锐已经交代了，你赶紧检查吧，越晚越被动。”

任是周惠再沉稳老练，也终于憋不住了。他起身跑到厕所关上门，默默地哭了一场。他回到会场，胡乔木又动员他说：

“周惠呀，今天和昨天不一样了。保卫总路线，保卫毛主席、党中央，你应当彻底检讨揭发。”

周惠点点头，心里却想：我的许多想法和讲话，都是受了你们的影响，可你们现在都要奋起保卫毛泽东和党中央，而我却站在了被告席上。

终于轮到周惠检讨了，他说：

“我不想上山，是主席叫我来的。主席召见我们3个人谈话说，‘我是反冒进的头子’，‘我是机会主义的头子’。我是想照主席的讲话精神把事办好。我就是针对湖南的实际情况，想把成绩说够，把问题讲透。讲问题时，客观上有一些内容与彭德怀、周小舟、李锐等同志是有一致之处……”

“你不要扯那么远了。” 有人打断了他的话，斥责他说：“讲要害问题！”

周惠依然不紧不慢地说着，把事情推得一干二净。与会者终于忍耐不住了，纷纷指责他：

“你还不老实，轻描淡写！”

“谈你跟湖南宗派关系，交代你在军事俱乐部里的活动！”

“彭德怀给主席的信，”周惠继续说：“事前我不知道，事后印发，我是和大家同时看到这封信，当时认为用心是好的，只是有些话不妥当而已，前途光明表达得不够。23日主席讲话以后，受到很大震动，一时没转过弯，怎么纠‘左’，一下子变成了反右？想不通……”

人高马大的甘肃省第一书记张仲良听不下去了，气得直拍桌子。会场里一片骂声。

“哎哎，你们不要嚷了。”主持会议的周恩来维持秩序，他说：“周惠年轻，没经历过这种场面，你们再嚷他就不讲了。”

周惠此时已经明白，再不讲点实在的是过不了关了，况且别人都已经承认了。于是他轻咳一声，就把23日晚上3人如何议论，如何去找黄克诚，谁人又说了些什么话，如此这般一点不漏地描述了一番。

欲知周惠以后如何继续保护自己，且待下一章分解。

东方翁曰：关于庐山会议那些事儿，周惠曾在一个访谈录里作了重要回顾，可供研究者参考，故择其要，立此存照：

“庐山会议开成这个样子，李锐要负很大的责任。”“千不该，万不该，我、小舟、李锐3个人，非要跑到黄老那里去发牢骚，后来彭总也来了，我们当时很激动，挨了批评，思想转不过弯来嘛。我们讲了一些话，现在看起来没有什么，但在当时却非常犯忌，包括主席的作为‘很像斯大林晚年’、‘一手遮天’、‘翻云覆雨’等等。”“李锐就在这个问题上，自作聪明，捅了第一个大娄子。几天以后，李锐仗着主席曾经对他的信任，给主席写了一封信，说明23日晚上的情况。写信是可以的，但关键是他在这封信里撒了谎，他隐瞒了那天晚上我们说的那些最敏感的话，同时却**发下了**‘**请主席相信我是以我的政治生命来说清楚这件事。如不属实，愿受党纪制裁’这样的重誓。这就埋下了一颗大炸弹。后来黄老在小组会上讲出了‘斯大林晚年’的问题，这颗炸弹就爆炸了**，因为主席已经把李锐的信作为会议文件印发了。”“再一个就是8月11日，李锐的立场突然来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从极力为自己辩解，到全盘认账。我记得他发言的题目是‘我的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活动的扼要交代’，承认‘攻击去年的大跃进和总路线’，承认‘大肆攻击主席和中央的领导’，承认写信是为了蓄意‘欺骗主席’，承认自己同黄老、周小舟、周惠有湖南宗派关系，承认自己是‘军事俱乐部的一员’。”“小舟听了李锐的发言后气得脸色发白，回到房间后大骂李锐是婊子养的，还声泪俱下地向我‘托孤’。”“主席和田家英情同父子，事发以后家英跪在主席面前大哭，说自己年轻不懂事，上了别人的当，主席当时就原谅他了。”“李锐在检讨的前一天，也许前两天，他曾经夜闯美庐，跪在主席床前，检举揭发‘军事俱乐部’问题，一个是说彭老总和张闻天确实曾经串联，彭总写给毛主席的信，事先给张闻天看过，最有刺激性的那句话‘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就是出自张闻天的手笔，而张闻天在7月21日的发言，事先也给彭总看过。当时张闻天有些犹豫，不想发言了，彭总还鼓励他：‘真理在我们手里，怕什么？’再一个就是说确实存在‘军事俱乐部’，7月23号晚上他们也不是单纯地去发牢骚，而是去订立攻守同盟，彭总也不是在他们快离开的时候才进去，而是早就进去的。”“因为李锐的这种作为，小舟至死也没有原谅李锐，他说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李锐居然是一个赵高、周佛海式的人物。”

**第76章**

**“据说你们都是头号的马列主义者，善于总结经验，多讲缺点，少讲成**

**绩，总路线是要修改的，大跃进得不偿失，人民公社搞糟了，大跃进和**

**人民公社都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表现。那么，好吧，请你们看看**

**马克思和列宁怎样评论巴黎公社，列宁又怎样评论俄国革命的情况吧！”**

话说1959年8月10日晚，毛泽东对曾希圣转来的《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恺帆下令解散无为县食堂的报告》作了批示。

原来，张恺帆在7月4日回到家乡无为县，见到了正在生病的母亲，母亲想吃一条鱼也吃不到，张恺帆到大食堂看了看，发火说，食堂不办了。有人说办食堂是中央精神，雷打不动。张恺帆说：“我就是雷公，统统散了。”他要求县委书记当晚立即贯彻执行。就这样，到7月15日，全县6000多个食堂全部解散了。其中有少数不愿意解散的，也被强行解散了。

毛泽东一支接着一支吸烟，他在这个报告上是这样写的：

印发各同志。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央委员会里有，即军事俱乐部的那些同志们；省级也有，例如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我怀疑这些人是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他们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在党内组织派别，散布他们的影响，涣散无产阶级先锋队，另立他们的机会主义的党。**这个集团的主要成份，原是高岗阴谋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就是明显证据之一。**这些人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他们是乐意参加的，有革命性。至于如何革法，也是常常错的。他们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精神准备，一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们就不舒服了。**他们早就参加了高岗反党集团，而这个集团是用阴谋手段求达其反动目的的。高岗集团的漏网残余，现在又在兴风作浪，迫不及待，急于发难。迅速被揭露，对党对他们本人都有益。只要他们愿意洗脑筋，还是有可能争取过来的，因为他们具有反动和革命的两面性。**他们现在的反社会主义的纲领，就是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不要被他们的花言巧语所迷惑，例如说，总路线基本正确，人民公社不过迟办几年就好了。**要挽救他们，要在广大干部中进行彻底的揭发，使他们的市场缩得小而又小。一定要执行治病救人的方针，一定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还要给他们革命与工作的出路，批判从严，处理从宽。

毛泽东 8月10日

8月11日上午，毛泽东在八届八中全会上发表讲话，他说：

彭德怀等人的意见是主观唯心主义和经验主义。**彭德怀30多年来，思想立场没有转过来，始终同党格格不入，是挂着共产主义者招牌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是抱着入股而来的党的同路人。**他们对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没有精神准备，是“党内的同盟者”，“马克思主义者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同盟者”。

毛泽东还说：

“这些人想把秀才们挖去，我看挖不去，不要妄想。秀才是我们的人，不是你们的人。不是有几位秀才最近倒霉吗？李锐不是秀才，他是‘俱乐部’的人。李锐同志啊，你在不在呀？你不是要求我在一个会议上取消‘湖南集团’称号吗？我不大愿意取消。不过，叫‘湖南集团’不合适，那是我与你们几个人讲的。譬如有张闻天，他就不是湖南人。”

“周惠也不是湖南人。”场内有人大声插话说。毛泽东继续说：

“周惠跟他们有区别。这个人据我看，与‘俱乐部’的人只是沾了一点边，你说他是‘俱乐部’的正式成员，我不相信。周惠这个人有缺点，但是比小舟好。小舟这个人他是不给你交心的，他的心使你看不见。小舟啊，我就是这么说的。你们不要妄想，把我们的秀才挖去。”

就这样，毛泽东以他的宽仁大度保护了陈伯达、胡乔木和田家英。

毛泽东最后说：

“要用团结合作收场，双方都交心通气，一看二帮，或者一批二帮，一斗二帮。现在不是批判吗？批过之后就变成一看二帮了，看你改不改，还要帮。我相信，经过这一次会议，我们全体会要大进一步。要实行批评从严，处理从宽，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

“要估计彭德怀等同志的两面性：革命性同反动性。**他们有革命性的一面，不要忘记这一面，他们的历史证明了这一面。**说他们完全不革命了，这不合事实。但他们脑筋里头资产阶级的东西不能不讲是反动的。**从7月16号起到今天，对他们那个反动性的批判比较着重，而现在我们要记起他们还有革命性的一面，同时还要批判反动性。我跟彭德怀同志谈过：难道我们30年的关系现在就在庐山分手吗？我们就决裂吗？我说不，不应当决裂，我们要合作。**”“这样，必须搞两条：批判从严，处理从宽。至于他们采取什么态度，那是他们的事。他们继续敌对，我们继续批判，继续批判从严。”

8月11日上午，李锐交了一份检讨书，题目是：《我的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活动的扼要交代》。他在交代中写道：

“在庐山会议的前一阶段，我和周小舟、周惠同志结合在一起，想把会议的方向导致多谈缺点，攻击去年的大跃进和总路线，并对绝大多数贯彻总路线的左派同志进行责难，因此散播会议有压力不能畅所欲言的空气。”

李锐在交代中还承认“大肆攻击主席和中央的领导”。承认与黄克诚、周小舟有“湖南宗派关系”。承认自己是“陷入这军事俱乐部的一员”。承认7月30日夜写给毛泽东的信是“欺骗毛主席，说是用我的政治生命担保写的”。

李锐以同案犯的身份做出这种认定和揭发，正是周小舟、周惠竭力避讳而决不认账的东西。所以他们二人怒不可遏，在房间里破口大骂。周小舟泪流满面，他说：

“我要去找主席说清楚！”

“算了。”周惠劝道：“说又有什么用？这样的气氛，越解释越乱。”

“信口雌黄，言不由衷，满纸胡说八道！对党对主席负责我也得说明真相，他这是推卸责任！”

“郑板桥说难得糊涂。算了，将来会有弄清楚的一天。”

“我自己去找主席，我在会上就讲过要找主席谈，横竖不过如此了。”

周小舟拿起电话联系，毛泽东同意在12日夜接见周小舟。

8月12日，毛泽东对辽宁省委执行中央关于反右倾指示的报告作了批示。他写道：

印发各省市。

各省、市、自治区的情况如何？辽宁那样的反右倾鼓干劲的部署，是否已经做了，效果如何？**看来各地都有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存在着，增长着。**有各种不同程度的情况。**有些地方存在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形势，必须按照具体情况，加以分析，把这股歪风邪气打下去**。辽宁做得很快，步骤也好，成绩显著。他们取得了主动权，迫使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处于被动。这个经验，值得各地注意。

毛泽东 8月12日

8月12日夜，毛泽东和周小舟的谈话一直到13日凌晨才结束。周小舟走后，他依然无法平静下来，不住地在室内踱步，根据周小舟所谈的内容，再次证明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

周小舟在几个小时的谈话中，并没有检查自己的错误，无非是恼火李锐的检查交代，不住地为自己辩解。毛泽东一直认真听着，除了插话问一些问题，始终没有表明自己的态度。

毛泽东一直把争取旧日的秘书周小舟的事看得很重，希望他迷途知返。现在看来，是没有希望了。他走到红木桌前，顺手拿过一张纸，从笔筒里拈起一支铅笔，写下一行字：

“昨夜谈之甚好，望即写出送我。”

毛泽东吸着烟，望着纸条沉吟了一会儿，重新拿起笔，将“好”字缓缓圈住，又涂了几笔，在其右上方另写了一个“畅”字。他对卫士说：

“把这个条子给周小舟送去。”

再说周小舟回到住室，周惠问道：

“怎么样？”

周小舟高兴地说：

“很好。”

“听进去了？”

“谈得高兴，这一次交了心。”

周惠仍是一脸狐疑。正在此时，毛泽东的秘书送来一张纸条，周小舟看后喜形于色的递给周惠，说：

“主席写的，我说的不假吧？”

周惠见上边写的是：“昨夜谈之甚畅，望即写来送我。”的确是毛泽东的铅笔手迹，其中的“畅”字是在勾掉了“好”字后添上的。周小舟见周惠还在琢磨，就问他说：

“怎么，你想什么呢？”

周惠“唔”了一声，说：

“主席原来写的是‘谈之甚好’。写事跟谈事不同，白纸黑字，不像谈话，没谈清马上还能再补充或解释几句。”

周惠一语点破了毛泽东的用意。周小舟顿时醒悟，他点点头，说：

“嗯，要字斟句酌。”

8月13日凌晨3点，周小舟拿着写好的材料来到周惠的房间。此时湖南省委副书记李瑞山也上了庐山，和周惠住在一起。

“瑞山，我给主席写的信，你帮我看看。”

“不看了，我也不了解情况，”李瑞山推辞说：“我不看。”

“周惠，你帮我看看。”

“你写好就行了，我就不看了。”周惠也明白看一看便有干系：“这么晚了，我也该睡了。”

“周惠，求你了。”周小舟坚持说：“帮忙斟酌一下文字，把把关。”

周惠只好接过材料，把其中与自己有关的地方改动了9处。周小舟还想让李瑞山看看，李瑞山断然拒绝说：

“我不看。”

周小舟让秘书抄写好后，就让秘书送往毛泽东住处。

8月13日上午9时，周小舟写给毛泽东的信，已经印发到与会者手中了。周惠接到印发信件一看，只见毛泽东在上面的批示是：

印发各同志。

**全篇挑拨离间，主要是要把几个秀才划进他们的圈子里去，并且挑拨中央内部。**

毛泽东 8月13日

周惠看罢，顿时惊出一身汗来。周小舟的秘书拿着印发材料问周惠说：

“周书记，怎么办，告诉不告诉周小舟同志？他吃了安眠药还没醒。”

“这还用问。”周惠大声说：“天大的事，快叫醒他！”

周小舟被推搡了几下，迷迷糊糊地坐起身，接过铅印件一看，立时清醒了。他绝望地叫道：

“怎么会是这样？”

8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展开抗灾斗争的紧急指示》，全文如下：

**抗旱、防洪、防涝、灭虫是农业战线上当前紧急的战斗任务。**今年夏季以来，不少地区气候很不正常，旱涝虫灾比往年多。**先是广东省6月间发生的大洪水；接着是河北、辽宁、吉林、内蒙古等省区的部分地区先后因暴雨集中，洪涝成灾，更严重的是我国中部地区河南、山东、安徽、湖北、湖南、江苏、江西等省的大片地区，在一个长时期内无雨，发生了严重的旱灾，并且在不少地区发生了虫灾。**面临着这样严重的水旱虫灾，各个地方都进行了顽强的抗灾斗争，并且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抗旱灌溉已经抢救了农作物约一亿亩。**1958年大跃进以来兴修的许多水库已经发挥了拦洪蓄洪、减轻下游洪水威胁的作用。**在抗灾斗争中，许多地方又实行了大协作，“大兵团作战”，再一次显示了人民公社的优越性。现在，雨季并未过去，洪涝灾害还会在各地陆续发生。据气象预报，中部地区各省八、九两个月的降雨量可能少于往年，这些地区的旱灾、虫灾威胁还有继续扩大之势。同时，还要注意到，现在受旱的地区，也有可能随后发生局部的集中暴雨，带来洪涝灾害。因此，各地必须**充分发动群众，把抗灾、防灾、灭虫斗争进行到底，把这个斗争作为当前最紧急的任务。**

为了战胜水旱虫灾，争取秋季丰收，首先必须坚决反对右倾思想和悲观、松劲情绪，鼓足干劲，从思想上、精神上把千百万农民动员起来，抱着“人定胜天”的信念，千方百计，充分利用一切可能，以翻江倒海的气概，同水旱虫灾进行坚持不懈的战斗。任何右倾保守思想和悲观，松劲情绪，都必须坚决克服，否则就不能鼓起广大群众的冲天干劲，来战胜当前的水旱虫灾。**要继续发扬群众路线的作风，继续实行在大跃进中已经证明是行之有效的组织领导的方法，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展开一个轰轰烈烈的抗灾战斗。**同时，要发扬患难相扶的精神，在互助互利的原则下，实行必要的大协作，发挥大集体的力量，战胜自然灾害。群众深深懂得：只靠小集体、单独作战，在严重的自然灾害面前是无能为力的；只有互助互利的大协作，才有可能战胜当前的自然灾害。人民公社应该在抗灾斗争中进一步充分发挥它的优越性。

**抗灾斗争所需要的排灌机械、汽油、燃煤、农药和各种防汛、灭虫器材的调拨供应工作，商业、农业和防汛指挥部门必须竭尽一切可能切实负责做好。**为了抢救受灾的农作物，商业部门和化学工业部门必须尽力设法增加生产和供应。**遭旱枯死和被水淹没需要改种的，农业部门和粮食、商业部门应该及早安排好改种所需要的种子供应。**

在遭受灾害的地区，应该切实把全部灾民如何过日子的计划安排好，大力提倡节约，大力提倡粮食和瓜菜混吃，节约粮食；要大量抢种一季晚熟作物和各种尚能种植的瓜菜红萝卜等作物，准备渡荒。历年来的经验证明，只要有了充分的准备，只要动员群众组织起来进行顽强的斗争，任何灾荒都是可以度过的。民政部门应该作好救灾工作。**农贷的发放也应该多照顾灾区。抗灾所用的汽油、化肥、农药等等物资，也可以根据情况，由省（市、自治区）决定，实行赊销。**

非灾区也应该提倡节约粮食，并且要用极大努力增产粗食，以便支援灾区。

今年的灾情比往年重。全党全民必须鼓足干劲，用最大的努力战胜灾害，争取秋季丰收，争取农业生产继续跃进。同时，对于局部的灾情特别重的地区，在国家和丰收地区的支援下，一定要千方百计地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战胜灾荒，在困难条件下完成继续发展生产和保障人民生活的伟大的光荣任务（见1959年8月14日《人民日报》——笔者注）。

从8月13日开始，八届八中全会举行全体会议，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惠先后在全会上作了系统的检讨。彭德怀在检讨中说：

“我坚决地、全部地抛弃那封信的错误立场、观点，坚决回到党的立场上来，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竭诚拥护党中央，拥护毛泽东同志，拥护党的总路线，永远做党的驯服工具。”“我万分诚恳地提议，撤销我国防部长和军委委员职务，并愿接受党的任何处分，请求党分配我去做党认为合适的工作。”

黄克诚在检讨中说：

“我7月19日的发言，是一个右倾机会主义的发言，发言中的观点与彭德怀同志信中的许多观点是一致的。不管我的主观愿望如何，实际上是配合彭德怀同志的信，向党的总路线，向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进攻。”“我的立场观点方法都是错误的，我成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成为‘庐山军事俱乐部’的重要一员，绝不是偶然的。”

张闻天在检讨中说：

“彭德怀同志的信和发言，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纲领，主要锋芒是反对毛泽东。”“这个军事俱乐部是有目的、有组织、有准备、有活动的。我曾经对彭德怀同志表示过一些和他同样的看法，未向中央报告，是我的严重错误。我是6月中间开始陷入军事俱乐部，7月23日以后逐步退出。为什么会陷入军事俱乐部呢？一是思想上右倾。二是教条主义的老而又老的疟疾原虫复活。三是宗派主义的老原虫复活。”“同志们说我有‘五毒’：狭、高、空、怯、私，我完全接受，愿意痛改前非。”

8月15日，毛泽东在全会印发的《哲学小词典》部分材料上，给与会者们写了一封简短的信。他写道：

各位同志：

建议读两本书。一本，《哲学小词典》（第3版）。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3版）。两本书都在半年读完。这里讲《哲学小词典》一书的第3版。第1、2版，错误颇多，第3版，好得多了。照我看来，第3版也还有一些缺点和错误。不要紧，我们读时可以加以分析和鉴别。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样，基本上是一本好书。**为了从理论上批判经验主义，我们必须读哲学。理论上，我们过去批判了教条主义，但是没有批判经验主义。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在这里印出了《哲学小词典》中的一部分，题为《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期引起大家读哲学的兴趣。尔后可以接读全书。至于读哲学史，可以放在稍后一步。**我们现在必须作战，从3方面打败反党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思想方面、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思想方面，即理论方面。**建议从哲学、经济学两门入手，连类而及其它各门。

毛泽东 1959年8月15日

这一天，全会还印发了毛泽东在一个题为《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群众运动》的文件上撰写的一篇辛辣无比的短文。全文如次：

一个文件摆在我的桌子上，拿起来一看，是我的几段话和列宁的几段话，题目叫作《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不知是哪一位秀才同志办的，他算是找到了几挺机关枪，几尊迫击炮，向着庐山会议中的右派朋友们，乒乒乓乓地发射了一大堆连珠炮弹。共产党内的分裂派，右得无可再右的那些朋友们，你们听见炮声了吗？打中了你们的要害没有呢？**

你们是不愿意听我的话的。**我已“到了斯大林晚年”，又是“专横独断”，不给你们“自由”和“民主”，又是“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又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又是“错误一定要错到底才知道转弯”，“一转弯就是一百八十度”，“骗”了你们，把你们“当作大鱼钓出来”，而且“有些像铁托”，所有的人在我面前都不能讲话了，只有你们的领袖才有讲话的资格，简直是黑暗极了，似乎只有你们出来才能收拾时局似的，**如此等等。这是你们的连珠炮，把个庐山几乎轰掉了一半。好家伙，你们哪里肯听我的那些昏话呢？但是**据说你们都是头号的马列主义者，善于总结经验，多讲缺点，少讲成绩，总路线是要修改的，大跃进得不偿失，人民公社搞糟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都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表现**。那么，好吧，请你们看看马克思和列宁怎样评论巴黎公社，列宁又怎样评论俄国革命的情况吧！请你们看一看：中国革命和巴黎公社，哪一个好一点呢？中国革命和1905——1907年的俄国革命相比较，哪一个好一点呢？还有，1958年——1959年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情况，同俄国1919年、1921年列宁写那两篇文章的时候的情况相比较，哪一个好一点呢？你们看见列宁怎样批判叛徒普列汉诺夫，批判那些“资本家老爷及其走狗”，“垂死的资产阶级和依附于它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猪狗们”？如未看见，请看一看，好吗？“对转变中的困难和挫折幸灾乐祸，散布惊慌情绪，宣传开倒车，这一切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无产阶级是不会让自己受骗的。”怎么样？我们的右翼朋友们。

既然分裂派和站在右边的朋友们都爱好马列主义，那么，我建议：将这个文件及我的这些话提供全党讨论一次。我想，他们大概不会反对吧？

毛泽东 1959年8月15日

8月16日，八届八中全会就要结束了，会议印发了毛泽东撰写的精彩无比的两个批语，作为对这次全会的总结。一个是他写在枚乘《七发》印发件上的批语，一个是他撰写的《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它》的短文。

毛泽东在印发件枚乘《七发》上的批语中写道：

“此篇早已印发，可以一读。**这是离骚流裔，而又有所创发。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属于浪漫主义流派，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屈原高居上游。宋玉、景差、贾谊、枚乘，略逊一筹，然亦甚有可喜之处。**

你看，《七发》的气氛，不是有颇多的批判色彩吗？‘楚太子有疾，而吴客往问之。’一开头就痛骂上流统治阶级的腐化。‘且夫出舆入辇，命曰蹶痿之机；洞房清宫，命曰寒热之媒；皓齿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醲，命曰腐肠之药。’这些话一万年还将是真理。

现在我国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无论是知识分子，党、政、军工作人员，一定要做些劳动，走路、游泳、爬山、广播操，都是在劳动之列，如巴甫洛夫那样，不必说下放参加做工、种地那种更踏实地劳动了。总之，一定要鼓足干劲，反右倾。

枚乘直攻楚太子：‘今太子肤色靡曼，四支委随，筋骨挺解，血脉淫濯，手足堕窳。越女侍前，齐姬奉后，往来游醼，纵恣于曲房隐间之中。此甘餐毒药，戏猛兽之爪牙也。所从来者至深远，淹滞永久而不废；虽令扁鹊治内，巫咸治外，尚何及哉！’枚乘所说，有些像我们的办法，对犯错误的同志，大喝一声，你的病重极了，不治将死。然而，病人几天，或者几星期，或者几个月睡不着觉，心烦意乱，坐卧不宁。这样一来就有希望了。因为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这种毛病，是有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的。‘所从来者至深远，淹滞永久而不废。’这个法子，我们叫作‘批判从严’。

‘客曰：今太子之病，可无药石针刺灸疗而已，可以要言妙道说而去也。不欲闻之乎？’指出了要言妙道，这是本文的主题思想。此文前段是序言，下分7段，说些不务正业而又新奇可喜之事，是作者主题之反面。文好，广陵观潮一段，达到了高峰。第9段是结论，归到要言妙道。于是太子高兴起来，‘涊然汗出，霍然病己。’用说服而不是压服的方法，见效甚快。这个法子，有点像我们的‘处理从宽’。首尾两段是主题，必读。如无兴趣其余可以不读。**我们应该请恩格斯、考茨基、普列汉诺夫、斯大林、李大钊、鲁迅、瞿秋白之徒‘使之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讲跃进之必要，说要公社之原因，兼谈政治挂帅的极端重要性。马克思‘览观’，列宁持筹而算之，万不失一’。**

我少时读过此文，40多年不理它了。近日忽有所感，翻起来一看，如见故人。聊效野人献曝之诚，赠之于同志。枚乘所代表的是地主阶级较低的阶层，有一条争上游、鼓干劲的路线。这是对于封建阶级上下两个阶层讲的，不是如同我们现在是对社会主义社会无产资产两个对抗阶级说的。我们的争上游、鼓干劲的路线，代表了革命无产阶级和几亿劳动人民的意志。枚乘所攻击的是那种泄气、悲观、糜烂、右倾上层统治的人们。我们现在也正有这种人。枚乘，苏北淮阴人，汉文帝时为吴王刘濞的文学侍从之臣。他写此文，是为给吴国贵族们看的。**后来‘七’体繁兴，没有一篇好的。昭明文选所收曹植‘七启’、张协‘七命’，作招引之词，跟屈、宋、贾、枚唱反调，索然无味了。”**

毛泽东在《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它》的短文中写道：

昨天上午我说，以《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为题的那一个文件，“不只是哪一位秀才同志办的，他算是找到了几挺机关枪，几尊迫击炮，向着庐山会议的右派朋友们，乒乒乓乓地发射了一大堆连珠炮弹”。这个疑问，昨天晚上就弄清楚了，不是庐山的秀才同志，而是北京的某某某（原文未指名——笔者注）同志和他的两位助手，发大热心，起大志愿，弄出来的。

**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10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20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旧的社会斗争止息了，新的社会斗争又起来。总之，按照唯物辩证法，矛盾和斗争是永远的，否则不成其为世界，资产阶级的政治家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一点也不错。不过，斗争形式，依时代不同而有所不同罢了。就现在说，**社会经济制度变了，旧时代遗留下来残存于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们头脑里的反动思想，亦即资产阶级思想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思想，一下子变不过来。要变需要时间，并且需要很长的时间。这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党内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这是毫不足怪的。没有这种斗争，才是不可思议的。**这个道理过去没有讲透，很多同志还不明白。一旦出了问题，例如1953年高、饶问题，现在的彭、黄、张、周问题，就有许多人感到惊奇。这种惊奇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社会矛盾是由隐到显的。**人们对于社会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的理解，是要通过自己的经验和实践，才会逐步深入的。特别是有一些党内斗争，例如高饶、彭黄这一类斗争，具有复杂、曲折的性质。昨日还是功臣，今天变成祸首。“怎么搞的，是不是弄错了？”人们不知道他们历史的变化，不知道他们历史的复杂和曲折。这不是很自然的吗？应当逐步地正确地向同志们讲清楚这种复杂和曲折的性质。**再则，处理这类事件，不可以用简单方法，不可以把它当做敌我矛盾去处理，而必须把它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去处理。必须采取“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批判从严，处理从宽”、“一曰看，二曰帮”的政策。不但要把他们留在党内，而且要把他们留在省委员会内，中央委员会内，个别同志还应当留在中央政治局内。这样，是否有危险呢？可能有。只要我们采取正确的政策，可能避免。他们的错误，无非是两个可能性：第一，改过来，第二，改不过来。改过来的条件是充分的。首先，他们有两面性，一面，革命性，另一面，反革命性。直到现在，他们与叛徒陈独秀、罗章龙、张国焘、高岗是有区别的，一是人民内部矛盾，一是敌我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可能转化为敌我矛盾，如果双方采取的态度和政策不适当的话。可能不转化为敌我矛盾，而能始终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可以彻底地解决，如果我们能够把这种矛盾及时适当地加以解决的话。下面的这些条件是重要的。全党全民的监督。中央和地方大多数干部的政治水平，比较1953年高饶事件时期大为提高了，懂事多了。庐山会议上这一场成功的斗争，不就是证据吗？还有，我们对待他们的态度和政策，一定要是符合情况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政策。我们已经有了这样的态度和政策。改不过来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无非是继续捣乱，自取灭亡。那也没有什么不得了。向陈独秀、罗章龙、张国焘、高岗的队伍里增加几个成员，何损于我们伟大的党和我们伟大的民族呢？但是，我们相信，一切犯错误的同志，除陈、罗、张、高一类极少数人以外，在一定的条件下，积以时日，总是可以改变的。这一点，我们必须有坚定的信心。我党38年的历史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这是大家所知道的。**为了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就要仍然把他们当作同志看待，当作兄弟一样看待，给以热忱的帮助，给他们以改正错误的时间和继续从事革命工作的出路。必须留有余地。必须有温暖，必须有春天，不能老是留在冬天过日子。我认为这些都是极为重要的。**

毛泽东 8月16日

在这天的全会上，全体中央委员一致举手通过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决议》，决议中说：

“**我们党内的一些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特别是一些具有政治纲领、政治野心的分子，竟然在这样的重大时机，配合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活动，打着所谓‘反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旗号，发动了对于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猖狂进攻。他们尽管在口头上有时也承认总路线是正确的，或者基本正确的，成绩是伟大的，但是在实际上却尽量夸大缺点，把目前国内形势描写成为漆黑一团，借以达到否定成绩、否定总路线的目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认为大跃进是‘左倾冒险主义’的行动，是‘得不偿失’或者‘有失无得’。他们把全国各地大办钢铁说成是一大罪状。他们看不到几千万人在一九五八年为钢铁翻一番而斗争的英雄气概和巨大成就；他们看不到，小土炉的阶段早已胜利地前进到小高炉的阶段；他们看不到，由于采取大钢铁企业和中小高炉、转炉同时并举的方针，已经大大加速我国钢铁工业发展和合理分布的过程，大大节约建设的资金。他们把农村成立人民公社说成是又一大罪状。他们看不到，这是几亿农民的伟大社会运动，是农业生产大发展、农田水利建设大发展、农民要求扩大协作的社会主义觉悟大高涨的产物；他们看不到，在贯彻执行按劳分配原则、明确规定公社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的条件下，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正是进一步发展农业中的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强大武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完全不是共产党人的满腔热情的态度，而是资产阶级老爷式的态度。他们站在群众运动的旁边指手划脚，利用早已克服了和正在迅速克服中的缺点向群众和干部泼冷水，散布松劲、泄气、埋怨、悲观的情绪，企图制造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混乱。”**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攻击的矛头，是针对着党中央和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针对着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因此，右倾机会主义已经成为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

“**资产阶级残余的思想政治活动既然存在，就一定会在共产党内找到他们的代表人物。而现在果然出了一小批代表他们说话的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些人中，有的是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有的是具有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个人野心家；有的是历史上犯了错误、受过批评、心怀不满的分子；有的是动摇成性的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了资产阶级的影响，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向党的大多数、党的领导机关和党的总路线乘机进攻，这种进攻带着重犯性质，形成了我们同他们的尖锐矛盾。但是这种矛盾现在还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如同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反动右派猖狂进攻那样的敌我矛盾。”**

“**这些人还有一种模模糊糊地要社会主义的倾向，他们对帝国主义对于我国的压迫，是要反抗的。他们是机会主义者，惯于看风使舵，看见大势于他们不利，他们感到孤立了，只要我们留有余地，他们又可以过来的，一部分共产党人的悲观主义思潮，右倾机会主义思潮，是社会上资产阶级反社会主义思潮在党内的反映。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思想政治斗争，是波浪式的，高一阵，低一阵，再高一阵，再低一阵，直到这一场斗争彻底熄灭为止，那就是资产阶级思想政治影响最后消灭的时候。”**

“**对于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同志，不管性质如何严重，党的方针仍然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仍然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批判从严，处理从宽’。掩盖矛盾，回避必要的斗争，不能达到团结的目的。犯错误的同志如果只是在口头上承认错误，而不在实际上揭露错误和改正错误，也不能达到团结的目的。犯错误的同志必须用实际行动揭露和改正自己的错误，我们则应该帮助他们认识和改正错误，使他们获得进步，重新和我们团结起来，为了党的总路线的伟大胜利而奋斗。”**

全会还通过了《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和《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公报》。

在《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中，这样写道：

“**把彭德怀同志和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调离国防、外交、省委第一书记等工作岗位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他们的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仍然可以保留，**以观后效。”

全会选举罗瑞卿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8月16日下午，毛泽东在八届八中全会闭幕式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我们这几位犯错误的同志，他们不仅不在北戴河对那种高指标提出意见，也不在去年11月郑州会议提意见，也不在12月武昌会议提意见，也不在今年1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意见，也不在今年2月底3月初第2次郑州会议上提意见，也不在今年3月底4月初上海会议、中央全会上提意见，而到庐山会议来提意见。他这个气候搞得不好。问题都解决了，或者剩下尾巴，情况好转了，我说，这些同志不会观察形势。他们为什么在那个长时间不提意见，而在这个时候提呢？这是因为他们自己有他们的一套。”“等到问题大部分解决了的时候，他们来提，就是认为这个时候如果不提，就没有机会了。再过几个月，时局更好转，他们就不好办事了，他们的扩大队伍、招收党员的目的就不能实现了。”

“这一次对于彭德怀来说，是第5次路线错误了，总要发作。两个阶段，两个总路线。所谓两个阶段，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这些同志，他们是为了参加那个阶段而参加共产党的。对于第二个阶段，要消灭资本主义、个体经济，没有精神准备。”

“今天小舟你赞成这个决议，我很高兴。今天以前我还相当悲观。你这个人，我跟你讲过，你是民主人士，你是挂着共产党招牌的民主人士。”

毛泽东在讲话中再一次提到了海瑞，他说：

“现在听说海瑞出在你们那个里头，海瑞搬了家了。明朝的海瑞是个左派，他代表富裕中农、富农、城市市民，向着大地主大官僚作斗争。现在海瑞搬家，搬到右倾司令部去了，向着马克思主义作斗争。这样的海瑞，是右派海瑞。我不是在上海提倡了一番海瑞吗？有人讲，我这个人又提倡海瑞，又不喜欢出现海瑞。那有一半是真的。海瑞变了右派我就不高兴呀，我就要跟这种海瑞作斗争。”

“我们是提倡左派海瑞，海瑞历来是左派，你们去看《明史·海瑞传》。讲我提倡海瑞，又不愿意看见海瑞，对于右派海瑞来说，千真万确。但不是左派海瑞，左派海瑞是欢迎的。如果不欢迎左派海瑞，不喜欢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来批评我们的缺点错误的这种人，这种同志，那么，就是错误的，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了。”

毛泽东还特意提到了高岗，他说：

“高岗这个事，我有责任，就是时间延误了。我本来想同习仲勋同志谈，我与他约了，目的就是跟习讲。因为**那时高岗想去陕北，我们想保留他的党籍，还想保留中央委员，让他回延安工作，本人也愿意。可是迟了一步，我没有来得及讲，他自杀了，竟这样结局，我也觉得遗憾。所以这事怪我，这是个很不好的事。**”

刘少奇插话说：

“陈独秀抗战初期曾要求到延安来，如果来了，看到革命胜利，也可能改过来。”

毛泽东说：

“他后来去世了。那个责任也在我，我没有把他接来延安。那时我们提了3个条件，他不能接受。当时我们还不稳固，那时就那么一点资本，那么一点根据地，怕他那套一散布，搞第四国际。现在我们本钱大了。**章伯钧、章乃器天天骂我们，还给他官做。**中国唯一见过托洛茨基的刘仁静，现在当翻译。”

周恩来插话说：

“罗章龙在教书。”

毛泽东做了个有力的手势，说：

“要给人出路！”

他说着，朝周小舟望去，接着说：

“要准许阿Q革命。阿Q不做自我批评，人家就越讲，打架打不赢，就说儿子打老子。”

“中央全会开15天了，今天闭幕。这次会议是一个很好的会议，是一次胜利的会。林彪同志，你刚才讲的那两句话，避免了2个东西，第一，避免了马鞍形。如果彭德怀挂帅，天下就要大乱，泄掉干劲。第二，避免了党的分裂，及时阻止了党的分裂。犯错误的同志自己还得到了挽救。”

至此，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闭幕了。众人依次走出会场，彭真叫住了周惠，他用遗憾的口味对周惠说：

“你呀，周惠！你要是不跟着闹，这湖南省委第一书记还不是你的？”

“我不行，”周惠垂着头说：“我水平不行。”

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在回忆王稼祥和彭德怀的关系时有一段话，可以作为庐山会议这一场斗争的注脚。她说：

“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表现，其实影响是很坏的，王稼祥同志并不赞成他的那些做法。他在历史上的确几次反对毛主席，毛主席都没有和他计较，都容忍了他。**彭德怀确有取代毛主席的意思，他对毛泽东恨得要命。他曾经在1956年和王稼祥讲过：‘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中国的明天，老毛搞个人迷信比斯大林还要厉害。有些人上升，除了会喊毛主席万岁外，再没有别的本事。只要我们大家齐心协力，就可以扭转中国的这种不正常状态。’**我听到彭德怀这些话，一再的警告稼祥，绝对不能和彭德怀来往。庐山会议前，彭德怀曾经给稼祥打电话，都让我给回绝了。我曾经对他不客气地说：‘稼祥已经被人利用得够多了，你们不要再把他往火坑里推了，你们谁有本事谁去当英雄，稼祥就是愿意平平安安地当个老百姓。’稼祥有时也批评我对彭德怀的态度不好。我对他说：‘这可是关系到我们共同命运的大事，你得听我的。在党内有什么意见可以正常的提，不要故意和别人闹别扭。’我已经看出，多年来毛主席对彭德怀的态度是作了最大忍耐的。彭德怀对毛主席毫不尊重，指着鼻子骂毛主席，连王稼祥回来都对我说：‘老彭太过份了，怎么能那样对待毛主席呢？他好像仗着什么人的势力这样做，我没有理睬他。他那不是在搞政治，而是要整毛主席。’稼祥才是真正地维护毛主席的威望的。庐山会议本来就是要作自我批评的，结果彭德怀那么一闹，会议转向了。王稼祥那时也可以和彭德怀讲几句话，但是他和彭德怀没有答一个腔。彭德怀勇气有余，方法不足，弄得毛主席3天3夜睡不着觉，终于发动了反彭德怀的斗争。”

再说八届八中全会以后，各省、市、自治区按照毛泽东和中央的部署，开展“反右倾”斗争，批判右倾情绪和右倾思想。

还有一件事必须提及，那就是胡乔木把毛泽东在全会闭幕式上讲到海瑞的这个信息，马上从山上传达给在北京的吴晗，要吴晗修改不久前刚刚撰写好的《论海瑞》一文。吴晗根据胡乔木的指点，加写了一段研究海瑞的现实意义：

“在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今天，我们需要站在人民立场、工人阶级立场的海瑞，为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而进行百折不挠斗争的海瑞，反对旧时代的乡愿和今天的官僚主义的海瑞，深入群众、领导群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海瑞。这样，封建时代的海瑞，还是值得我们今天学习的。”

胡乔木回到北京后，鉴于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遭到批判，为了避嫌，又在《论海瑞》一文的结尾处，加了一段骂“右倾机会主义者”的话。

不久，吴晗在1959年9月17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论海瑞》一文，结尾部分就采用了胡乔木的那一段话，目的是要划清海瑞与彭德怀的界线，并特别注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根本不是什么海瑞”。

欲知毛泽东后来能否顺利地实现他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伟大理想？请诸君继续关注本传第八卷：乱云飞渡。

东方翁曰：众所周知，在新中国成立后进行的3年朝鲜战争，不但影响了中国的经济恢复和发展，而且还因为外交人员的一个小小失误意外地使人民背上了13亿美元的战争外债。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毛泽东从1954年开始，领导全国人民在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的基础上，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开展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在世界的东方初步建立起了一座社会主义社会的擎天大厦，使中国逐渐成为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政治强国，实现了毛泽东“敢上九天揽月”的宏伟志向**。这的确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重大事件！

尽管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了一些不该出现的浮夸风和共产风，但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所呈现出来的经济腾飞，却是不争的事实。且不说国民经济全面地高速度地增长，单**就钢铁生产方面来说，国民党统治中国22年，每年炼钢不过5万吨左右，而新中国在1958年一年间就炼出了合格钢材800多万吨。这难道不是一个奇迹么？试想，如果没有大跃进时期搭建的钢铁工业体系，又怎么会有当今穷奢极欲的房地产泡沫经济以及方方面面的宏大的基础设施建设所必需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各种钢材呢？**正是在建国后的9年间（包括半年大规模的国内战争和3年抗美援朝战争在内），毛泽东不但先后领导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政治运动，而且还开展了思想文化方面的斗争，并初步提出了他在青年时期就立志要进行的教育革命、文化革命的重大命题。当然，在国内和国际两方面的特殊历史条件下，毛泽东以后要完成这些伟大的志向、理想、理论和实践，毋庸置疑，是要远比他搞战争、搞经济艰难得多了。这也正是本传在后边的三卷中，要着力描述那个时期的历史事件的重要原因。